

Mises

米塞斯是亚当·斯密之后市场经济理论的主要构建者，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领袖。米塞斯坚持古典自由主义，以孤军薄旅抵抗时代潮流的横逆，是欧洲文明的守灵人。

The Last Knight of Liberalism

米塞斯大传

〔德〕约尔格·吉多·许尔斯曼 著
黄华侨 主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von mises



The Last Knight of Liberalism

米塞斯大传

[德] 约尔格·吉多·许尔斯曼 著

主译 黄华侨

译者 梁捷 李井奎

沈路 李华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米塞斯大传 / (德) 许尔斯曼著; 黄华侨等译. —上海: 上海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

书名原文: MISES: The Last Knight of Liberalism

作 者: Jörg Guido Hülsmann

ISBN 978-7-5520-1291-0

I. ①米… II. ①许… ②黄… III. ①米塞斯 (1881~1973) —
传记 IV. ①K835.21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1782 号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16-396

米塞斯大传

著 者: [德] 约尔格·吉多·许尔斯曼

译 者: 黄华侨 等

责任编辑: 唐云松

出 版 人: 缪宏才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印 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53

插 页: 3

字 数: 94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1291-0/K·313

定价: 1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说明

240年前,亚当·斯密发现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奠定了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开创了现代经济学。亚当·斯密的伟大发现与瓦特蒸汽机的发明及牛顿的科学成就,一起将人类社会推入了现代文明的快车道。米塞斯是亚当·斯密之后对市场经济理论贡献最大的经济学家、思想家,他以其卓越的经济学成就,以及对西方文明深刻的洞见,丰富完善了市场经济理论,夯实了市场经济理论基础。在举世抛弃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倾向计划经济和权力干预的时代,米塞斯和以他为思想领袖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在民间和学术体制边缘坚持不懈地研究和传播市场经济理论,成为坚守自由市场经济信念的中流砥柱。

米塞斯一生勤于著述,著作等身,但他的著作及其传记资料的翻译出版一直不顺利。米塞斯的代表作《人的行为》夏道平译本,是公认的学术翻译经典,是老一辈经济学家的呕心之作,因为种种原因,简体字版直到2015年下半年才面世。《人的行为》是继亚当·斯密《国富论》之后,阐释市场经济理论的最重要的著作,初版于1940年代,中译本如此姗姗来迟,实在是不幸,只能说我们对市场经济理论过于隔膜,甚至是本能地排斥。米塞斯的传记资料翻译过来的也太少,与他在经济学与思想史上的地位不相称。坊间已经出版的有《米塞斯回忆录》和他的学生柯兹纳写的《米塞斯评传》两种(均为启蒙编译所策划),都不到10万字,非常精要,但毕竟太简略,读者迫切需要一部内容详实、资料丰富的标准版米塞斯传记。

《米塞斯大传》英文原著一千多页,译文近百万字,乃皇皇巨著,其翻译出版本应是国家级大社承担、学术基金资助的项目,但米塞斯研究不属于建制,主要是在民间和边缘,启蒙编译所不自量力,担起重任,在黄华侨博士等译者的帮助下,终于完成了这一学术使命。对在体制内的青年学者来说,参与《米塞斯大传》的翻译,近乎是在做公益,翻译不算科研成果,翻译费极其微薄,没有强烈的学术责任感,是很难坚持下来的,我很钦佩他们。这样一部大著,译文一定会有错讹,会有不少可

商之处,主要责任在我们编校工作严谨不够,水平不足。欢迎读者批评指正,欢迎交流;也欢迎更多的青年学者能参与启蒙编译所的学术翻译事业。

米塞斯毕竟是欧洲贵族遗老,维护的是资产阶级利益。他鼓吹市场经济,强调市场的唯一性,否定计划经济、攻击社会主义,其思想和方法论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请读者以批判的眼光阅读本书和米塞斯著作,正确辨识,摒弃糟粕。我们出版米塞斯的传记,是基于经济学与思想史研究的需要,填补学术空白,弥补文献资料不足,并非赞同米塞斯的思想 and 观点,更反对脱离实际盲目照搬,恳请读者垂察、体谅。

1940年夏天，希特勒的军队进驻法国，对瑞士形成了包围之势，此时米塞斯正和妻子玛吉特坐上一辆巴士，车上挤满了准备逃离欧洲的犹太人。为了避开围追堵截，巴士司机绕道穿过法国乡村，不时地停车向当地人打听前方德国人的行踪——遇到情况就从原路退回，寻找其他路线。

不到两个月之后就是米塞斯五十九岁生日。他是侵略者的通缉要犯。两年前，他们彻底搜查了他在维也纳的公寓，没收了他的档案，冻结了他的账户。那时，米塞斯希望他在日内瓦是安全的。然而现在，似乎整个欧洲都没有他的立锥之地了。不仅因为他是一位犹太出身的杰出知识分子，还因为他是众所周知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各种其他形式社会主义的大敌。有人把他称为“最后的自由主义骑士”。

他曾凭一己之力，带领奥地利摆脱了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并将国家从最终摧毁了两次大战之间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之中拯救出来，还使整整一代年轻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改信了市场。现在，他成了一位政治难民，动身前往一片陌生大陆。

他和玛吉特抵达美国之时，几乎身无分文，也没有收入来源。米塞斯过去的一些学生和弟子已经在英国和美国的大学获得了声誉卓著的职位（常常是在米塞斯的帮助下），而他本人却被视为一个不合时代潮流的人。这是政府计划和中央计划不断扩张的时代，他却是私有产权的拥护者，也是经济领域一切政府干预的反对者。也许最糟的是，他是文字推理和实在论的支持者，而他的时代却正进入实证主义和数理模型的全盛时期。没有一所大学愿意聘他。玛吉特甚至开始学做秘书。

此后十年，他们逐渐步入正轨，米塞斯也终于找到了新的盟友。他出版了他最重要的著作——《人的行为》。此书为他赢得了新的追随者，他们的仰慕和忠诚是他在欧洲无法想象的。

米塞斯于1973年10月去世，身边只有一群为数不多的仰慕者和追随者，然而这个群体却是一场正在迅速壮大的思想运动的核心。今天，米塞斯的著作激励着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和自由至上主义者，社会科学各个领域越来越多的学生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著作。一个完整的“米塞斯主义”经济学派诞生了，它在美国声势

最为浩大,并在西班牙、法国、捷克共和国、阿根廷、罗马尼亚和意大利广为传播。这场运动表明他的思想具有持久的力量和影响。

本书的目的是讲述这些思想在它们的时代是如何成形的。它将呈现一位令人惊叹的经济学家的生平和事迹。它将讲述他对奥地利学派和自由至上主义运动的个人影响。尤其是,它所描述的是这样一个人:他在毫不妥协地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不断改变自己,他的观点也是一步一步地逐渐产生,常常并不符合他最初的意愿。

米塞斯曾学习社会科学的历史主义方法,后来成了与之对立的奥地利学派和人文主义社会理论的舵手。他最初是维也纳青年左翼理想主义者,后来成了美国右翼势力的元老。他在早期曾经蔑视“金属主义”,后来成了100%金本位制毫不动摇的代言人。他的事迹激励着众多学生和追随者,其中许多人将把他的观点和方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比他本人走得还远。

本书对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刻画,主要涉及他的思想在时代背景下的发展。我们对他人格的情感层面所知不多。很早以来,他就注重自己的公共形象:米塞斯教授。他很小心地销毁了所有可能遭到潜在反对者利用的证据——从收据到情书。我们之所以能够讲述他的生活中某些较为私密的插曲,只是因为1938年3月希特勒的人从他的维也纳公寓搜走了一些私人记录。这些档案最终落入了红军手中。1991年,人们在莫斯科秘密档案中重新发现了这批文件,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资料来源。

本书的写作直接依据莫斯科档案和格罗夫城市学院档案中的米塞斯私人文件。我还查阅了维也纳商会、维也纳学术中学、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相关文件,以及贝蒂娜·比恩·格里夫斯女士从米塞斯遗产中继承的那些资料。不消说,我也认真研究了米塞斯的著作,还有他那个时代其他一些最重要的经济学家的著作。此外,我还试图深入了解他的学术研究的历史背景,虽然我在这些一般问题上仍然只是一个外行。所有这些材料在此首次联为一个整体。我希望它能成为未来米塞斯研究的一个有益起点。

由此,我将给出关于本书范围和意图的最后评论。虽然我没有见过米塞斯本人,许多年来,我一直是他的著作的学习者和仰慕者。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以下篇章也是我向这位伟大思想家表达感激之情的一个纪念。在我的经济研究中,我曾试图在他停止的地方继续前进,虽然未必是他会采取的方向。这就提出了关于这部传记的几个基本问题:我应该谈及我们时代受到米塞斯启发的那些研究吗?我应该讨论目前流行的关于米塞斯的有时颇为不同的解释吗?如果我们加入关于文献(文献很多)的批判性评注,也许可以改进本书,而且对于今天这个领域

的专家来说也会更加有用,但我决定克制自己。因为那会使我偏离本书主旨,不再谈论米塞斯本人,而是谈论关于米塞斯的文献。本书篇幅已经相当庞大,为了保证论题的集中,必须减少关于二手文献的讨论,不仅包括我自己的著作,也包括其他一些杰出的米塞斯学者,例如 Murry Rothbard、Richard Ebeling、Israel Kirzner、Joseph Salerno、Hans-Hermann Hoppe、Bettina Bien Greaves、Julian DelGaudio、Eamonn Butler、Patrick Gunning、Jeffrey Herbener、Percy Greaves、Hans Sennholz、Ralph Raico、James Rolph Edwards、Laurence Moss、Gary Norty、Carsten Pallas,和 David Gordon。这会带来一些不便,但在互联网时代,这种不便是可以接受的。

今天,我们对米塞斯的了解仍然如此之少,有关他的传记研究也才刚刚起步。因此,撰写一部米塞斯传的主要意义在于揭示:一位没有获得任何重要机构支持的学者,何以能够仅凭他的思想的惊人威力,在去世超过三十年之后,仍然掀起了一场不断壮大的国际思想运动。这些拥有如此巨大力量的思想究竟是什么?这位学者又是谁?他的目标是什么,经历了怎样的斗争、胜利和失败?他的思想如何产生于他的时代背景,又是如何经受住了他所面对的敌意?这些,我想,就是当前应该探讨的主要问题。热爱思想的人们——尤其是那些相信思想可以改变世界的人们——也许会觉得以下篇章值得一读。哪怕本书仅仅引起了对米塞斯本人及其著作的更多兴趣,它的目的也已达到了。

约尔格·吉多·许尔斯曼

于法国昂热

2007年5月

致 谢

本书是在 Lew Rockwell 的鼓励下写出来的,没有他的提议,我不可能完成这项写作,而且,随着计划变得越来越大,远远超出我们当初的设想,他仍然继续提供了毫无保留的支持。同样,如果没有众多富有献身精神的男男女女的资金支持,本书的写作也是不可能的。此外,还有许多其他人也在我的写作过程中提供了帮助和支持。我尤其受惠于 Bettina Bien Greaves 夫人的慷慨帮助,她让我的研究从一开始就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并向我开放了她从米塞斯遗产中继承的那些资料,以及她本人对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生平研究。她还向我提供了米塞斯夫妇的精彩相册,那是在她照料米塞斯夫妇期间拍摄的。我很感谢位于莫斯科的历史文献档案馆(Historico-Documentary Collections)特藏库工作人员的友好帮助:Vladimir Kuselenkov(馆长)、Vladimir Kurutajev(副馆长)、Rostislav Sokolov(翻译)和 Natacha Samsonova(馆员)。类似地,我也获得了维也纳学术中学校长 Herr Magister Siegel 以及格罗夫城市学院米塞斯档案管理人 Jeffrey Herbener 教授的在线支持。我还受益于 Hans-Hermann Hopp 教授的热情协助,他为我提供了他从维也纳商会获得的档案资料;还有 Jesús Huerta de Soto 教授,他为我提供了他从维也纳国家档案馆(Vienna Staatsarchiv)获得的档案资料;还有 Ivo Sarjanovich 先生,他为我检索了日内瓦国际关系高级研究院的档案。还有许多人也慷慨地向我指出了一些文献出处,或者积极帮我寻找资料。我要特别感谢 Philipp Bagus 先生、Gabriel Calzada Alvarez 教授、Paul Cwik 教授、Nikolay Gertchev 博士、Floy Lilly 博士、Anthony de Jasay 博士、Ralph Raico 教授、Reinhard Stiebler 先生、Joseph Stromberg 先生、Mark Thornton 先生、Shigeki Tomo 教授、Jeffrey Tucker 先生、和 Ki'ichiro Yagi 教授。我还得到了 Jeffrey Tucker 先生领导的出色而高效的编辑团队的协助,这对读者来说是极为有益的,他们是 B. K. Marcus 先生、Arlene Oost-Zinner 夫人、Judy Thommesen 夫人、David Gordon 博士、小 Jule Herbert 先生、Kathy White 夫人、和 Harry David 先生。此外,一些读者和审阅人帮我提高了本书的品质,我有幸在此向他们表达感激之情,尤其是 Walter Block 教授、David Gordon 博士、B. K. Marcus 先生、Joseph Potts 先生、

2 米塞斯大传

Ralph Raico 教授和 Herr Dr. Herbert Unterköfler。最后也十分重要的是,我要对我的好妻子 Nathalie 在我投入这项写作计划期间的默默支持,同时也为了我们一起度过的经济学和伟大经济学家之外的美丽人生表示感激。

目 录

前言	1
致谢	1

第一部分 青年时代

第一章 家族之根	3
第二章 学校时期	17
维也纳	17
维也纳犹太人	20
学术中学	22
奥匈帝国	29
奥地利式的社会主义	33
职业选择	37
第三章 维也纳大学	42
格林贝格的研讨班	45
军队服役与父亲之死	49
菲利波维希的研讨会	50
一位经济学家的诞生	56
追随大师	59

第二部分 奥地利学派

第四章 世纪末的经济科学	69
卡尔·门格尔：“经验主义理论”的先驱	69
德国背景下的门格尔著作	76
方法论之争	78
奥地利学派和戈森学派	81
奥地利学派的突破	87

欧根·冯·庞巴维克	89
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	94
约瑟夫·A.熊彼特	99
第五章 早期职业生涯	120
职业生涯的艰难伊始	122
平行生活	124
商会	126
乌云密布	129
社会政策协会的维也纳会议	130
在商会的突破	135
货币理论	136
第六章 货币著作	144
货币的本质	146
价值理论与货币理论的整合	150
维塞尔的货币理论	151
米塞斯的货币价值理论	156
货币不是中性的:康蒂永效应	158
汇率的决定:购买力理论	159
部分准备金银行和商业周期	162

第三部分 官员、绅士、学者

第七章 世界大战	175
初入战场	175
家乡前线	181
重返前线	185
新生	189
最后的任务	191
第八章 民族、国家与经济	202
移民、民族杂居和现代帝国主义	203
功效主义的社会分析	206
德国社会主义在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的错误	208
语言社群的政治经济学	210
第九章 1919年	219

新的战场·····	220
战后社会主义和无政府幽灵·····	222
后政府危机时代·····	229
通往健全货币·····	232
维也纳的学术圈子·····	237
第十章 哥白尼式转变·····	249
论证·····	251
思想背景·····	255
胜利·····	260
未竟的革命事业·····	264
第十一章 关于社会主义的专著·····	273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	274
民主制的功效主义论证·····	275
家庭政治经济学·····	277
经济计算问题的意义·····	280
道德风险:社会主义的另一死敌·····	282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软弱和妥协·····	283
协作法则·····	284
垄断理论·····	287
基督教伦理与市场经济之辩·····	290
社会主义等于毁灭主义·····	293

第四部分 盛年米塞斯

第十二章 全新的开始·····	303
哈耶克与理赔局·····	304
反通货膨胀的斗争·····	306
研讨会·····	308
维塞尔的长久阴影·····	310
伦敦经济学院的联系·····	317
金汇兑本位制的出现·····	319
恶性通货膨胀、通货竞争和货币改革·····	323
重新思考货币与信用理论·····	329
德国经济学家回归古典自由主义·····	331

地平线上的一线曙光·····	334
第十三章 政治哲学体系 ·····	350
干预主义理论的雏形·····	351
“反马克思主义”批判·····	353
新自由派批判·····	357
经济科学的转型·····	360
自由主义·····	366
第十四章 巅峰 ·····	375
1926年之行·····	375
商业周期研究所·····	378
面对金汇兑本位制袭击的奥地利政治·····	380
自由贸易、货币稳定和周期政策·····	382
新的理论家们·····	384
重新思考价值理论·····	386
走向新的社会科学认识论·····	390
个人的繁荣—萧条·····	393
第十五章 危机 ·····	404
大萧条的原因·····	406
伦敦助理·····	413
回归外汇管制·····	419
《社会主义》第二版·····	424
社会政策协会德累斯顿会议·····	427
经济理论的完成·····	430
维也纳的暮光·····	435

第五部分 米塞斯在日内瓦

第十六章 日内瓦岁月 ·····	455
高级国际关系学院·····	456
学院生活·····	458
疏远昔日盟友·····	462
米塞斯和新自由派·····	467
人民阵线·····	469
深刻转变·····	472

瓦尔特·李普曼大会	478
针对战后的计划	481
逃离欧洲	484
第十七章 一部经济学著作	504
思想体系概述	504
反心理主义	507
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是理性的	508
均衡、利润与亏损、企业家精神	510
消费者主权和利息	511
重写商业周期理论	514
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之争的最新进展	515
纯粹现金余额方法	517
第六部分 米塞斯在美国	
第十八章 流亡纽约	525
抵达纽约	525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529
黑暗时期和新的计划	530
在墨西哥的六周	537
奥地利国家委员会	539
新朋友	542
美国公民	548
第十九章 一场运动的诞生	560
自由至上主义的萌芽	561
纽约大学的长期访问	564
伦纳德·里德和经济教育基金会	566
弗雷德里克·尼迈耶	568
米塞斯与美国自由至上主义之争	570
计划造就混乱	573
朝圣山会议	574
筹备反革命行动	579
德国的新自由主义政变	580
纽约人	583

第二十章 《人的行为》及其影响	592
第一反应	593
米塞斯主义者	597
演讲和论文	600
《自由人》杂志	602
尼迈耶的关系	608
美国版《货币与信用原理》	611
幕后推手和巡回学者	613
纽约的学术圈子	615
一本米塞斯主义专著	619
森霍尔茨在格罗夫市城市学院	623
第二十一章 资本主义的认识论问题	635
一言以蔽之	637
科学及进行有益争执的文化	640
大众民主社会的英雄	643
历史研究	648
反资本主义心境	653
重新思考基督教信仰	654
第二十二章 运动的破裂	661
保守主义运动和自由至上主义的残存者	663
巴斯夏小组的解体	666
对抗新自由主义	670
第二十三章 最后的岁月	679
最后的写作	681
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最后交锋	684
与货币主义者的最后交锋	688
最后的荣誉	690
结语	702
译后记	707
参考文献	709
名称索引	741
主题索引	768

第一部分
青年时代



路德维希·海因里希·埃德勒·冯·米塞斯(Ludwig Heinrich Edler von Mises)生于1881年9月29日。他是整个家族首位生来就是贵族的成员。几个月前,奥地利皇帝刚刚册封他的祖父迈尔·拉赫米尔·米塞斯(Meyer Rachmiel Mises)贵族爵位。从此以后,家族姓氏改称冯·米塞斯(von Mises)。同时,皇帝准许他们使用敬语“埃德勒”(Edler)——字面含义就是“贵族”,通常赐予犹太人。¹

米塞斯的出生地是伦贝格(Lemberg),昔日“加里西亚和洛多梅里亚王国”(Kingdom of Galicia and Lodomeria)的首府。数百年来,加里西亚一直属于波兰,直到1772年波兰的大片国土被其强邻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才成为哈布斯堡王朝(House of Habsburg)的领土。²哈布斯堡是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家族,可是他们一直没有把加里西亚并入德意志,而只划为奥地利东北边陲的一个行省,作为哈布斯堡家族的私人领地。

在米塞斯出生的年代,哈布斯堡帝国是欧洲第二大政治实体,仅次于俄罗斯。17世纪末以前,哈布斯堡王朝还统治着西班牙及其遍布世界的海外殖民地。就在米塞斯出生之前不久,它还管辖着北意大利、比利时和德意志的黑森林地区。到1881年,帝国虽然失去了上述领土,仍然拥有十二个主要民族和六个庞大宗教团体。年轻的路德维希就成长在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浸淫于丰富多元的文化和民族遗产。³

即使按照奥地利的标准,加里西亚也是一个民族成分极其多样的地区。加里西亚的居民大多数是波兰人、罗塞尼亚人、犹太人和日耳曼人,也有为数众多的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和意大利人。犹太人在哈布斯堡的几乎所有领地都是少数民族,但是,东加里西亚的犹太人却是名副其实的多数民族。在米塞斯出生时,他们几乎是伦贝格市的最大族群,仅次于波兰人。⁴他们之所以迁徙到这个城市,是因为波兰的天主教统治者五百多年来对待犹太人比其他任何政府都要宽容得多。加里西亚对犹太人的法律保护始于1264年的卡利兹诏书(Statue of Kalisz),14世纪波兰国王卡齐米日大王(King Casimir the Great)及其后继者在随后的二百年间维持

并扩充了这些权利,而在同一时期,犹太人在欧洲的几乎所有国家都遭驱逐。经过几个世纪,犹太人社群在波兰赢得了越来越大的司法自治权,至18世纪末,波兰境内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犹太国家。这片国土成了全世界犹太人的家园,他们把它看成新的圣地。到1750年,大约70%的犹太人居住在波兰,这个数字甚至在波兰分裂时期还在增长:到1780年,全世界犹太人中有80%以上安家于此。⁵

由于早期犹太移民来自德国,因此,德国犹太人的方言意第绪语成为通用语言,甚至直到后来,其他地区犹太移民的涌入也未改变这一状况。如果他们曾有过对波兰语言和文化的吸收,那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缓慢的。犹太知识分子和商界领袖的同化最快,因为他们和波兰统治阶层生意往来密切,有着诸多共同利益。著名的奥地利历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埃里克·里特·冯·屈内尔特-莱丁(Erik Ritter von Kuehnelt-Leddihn)指出,波兰的这一背景对米塞斯的早期成长经历有着重要影响。屈内尔特-莱丁认为,年轻的米塞斯受到波兰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影响,这种思想和制度秉持共和主义自由的贵族理念。

事实上,自由主义运动主要就是由贵族阶层推动的,正是他们始终反对中央集权的压迫和控制。这一观察可以在许多国家得到验证,在英格兰有《大宪章》(Magna Carta),在匈牙利是《金皮诏书》(Golden Bull),在阿拉贡有不屈不挠的大人物党(Grandes),在法国则有投石党运动(Fronde)。波兰走得更远。早在1572年,波兰就实行了选举君主制,并自称为共和国。这些具有非凡独立精神的贵族提出了一个口号:“威慑外国君主,抵抗本国君主!”贵族掌握着政治权力,(在分裂前)他们没有头衔,人数却占全部人口的五分之一……这是一个没有法律特权的贵族阶层。有谚语道:“农庄里的贵族和城堡中的权贵是平等的。”由于所有贵族都是平等的,因此,他们不能容忍多数的支配。国会下院(Sejm)的议员拥有“自由否决权”(Liberum Veto),也就是说,只要一名议员反对,提案便被否决。⁶

这一波兰政治传统深深扎根于加里西亚上层阶级的文化中,对于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像米塞斯家族这样试图取得更高社会阶层接纳的群体,必定有着深刻的影响。

不过,尽管米塞斯的政治思想深受波兰传统的影响,他的父辈的文化抱负却指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事实上,整个19世纪,米塞斯家族一直在推动家乡加里西亚的德意志化进程。在他们眼中,德意志文化代表着社会进步。约瑟夫二世于

18世纪末推行的自由主义政策承诺了加里西亚民众更大的自由和犹太人的解放。这正是“左翼”世俗犹太人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在米塞斯家族这样殷实商人的坚定领导下,这些犹太人社团成了亲德的力量。⁷他们支持新的行政当局,欢迎非犹太的日耳曼移民,推动世俗的德意志文化进入犹太圈子。在促进本地犹太人的哲学和世俗科学研究方面,米塞斯家族的成员起着主导作用。海因里希·格雷茨(Heinrich Graetz)写道:

自从拿破仑战争以来,加里西亚最大的三个社区——布罗迪(Brody)、伦贝格和塔尔诺波尔(Tarnopol)——出现了一些小圈子,圈子成员为了自我修养、促进教育,以及致力于消灭恰巴德教派(Chassidism)而聚在一起……在伦贝格……建立了这么一个文学团体,它的领袖是一位家境富裕、博学多才的人:耶胡达·勒布·米塞斯(Jehuda Löb Mises)(1831年逝世)。他为伦贝格那些志向远大的年轻人提供赞助和建议,另外特别可贵的是,还为他们提供了一座藏有希伯来语文献和欧洲书籍的优秀的图书馆。⁸

1772年以后,哈布斯堡帝国向加里西亚强加了一个讲德语的官僚阶层,并鼓励日耳曼人定居在从波兰大公、耶稣会(Jesuit order)及各修道院手中没收的土地。⁹波兰的德意志化进程持续了差不多一个世纪,在此期间,波兰贵族一直试图摆脱奥地利的统治。1863年他们的努力再次遭遇挫折,此后波兰的旧政治势力最终与哈布斯堡帝国达成了妥协,以保证波兰俱乐部(Kolo Polske)对奥地利皇室的忠诚为代价换取了统治加里西亚的权力。1867年,波兰贵族在奥地利议会取得了“加里西亚决议”(Galician Resolution),决议赋予他们在帝国东部这个行省极大的自治权。维也纳的“波兰俱乐部”成了支持奥地利政府的主要力量之一,直到1918年帝国解体。¹⁰与此同时,加里西亚的德意志化进程逐渐倒退,最后完全停止。只有政府官员和世俗犹太人还在坚持——他们是德意志语言和文化的两大传统支柱。¹¹

1867年之前,亲德倾向是米塞斯家族影响当地政治事务的根本。随着铁路的出现,加里西亚和哈布斯堡帝国的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日益强化,使得米塞斯家族的影响甚至扩大到了全国。¹²

19世纪下半叶,铁路还是一项先进技术,它的出现深刻地改变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铁路公司支付最高的薪水,提供快速的晋升机会,吸引着当时最有活力、素质最高的年轻人。事实上,这些人全都属于19世纪出现的一个新兴知识分子阶层——工程师。他们通常出身资产阶级家庭,代表了聪明才智、亲力亲为、目

标取向和事业成功的典范。

- 9 在奥地利,铁路最早出现于19世纪20年代。到了19世纪40年代,政府试图把这些铁路收归国有。接下来的十年,许多铁路被国有化;然而,1848—1849年的动乱完全打乱了国家财政,以至于从1854年开始不得不重新对铁路进行私有化。¹³正是这次恢复私有制之后,铁路铺到了加里西亚。加里西亚铁路建设的两次主要投资,米塞斯家族都曾参与其中,并且介入很深,成了它们的董事和融资者。过了一代之后,到了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米塞斯的父亲阿瑟·埃德勒·冯·米塞斯(生于1854年9月6日)开始为切诺维兹(Czernowitz)铁路公司工作,而他的叔叔埃米尔则是卡尔-路德维希(Carl-Ludwig)公司的工程师。



米塞斯两岁

阿瑟·埃德勒·冯·米塞斯娶了维也纳的阿德勒·兰道(Adele Landau)(生于1858年6月4日)。¹⁴她的家族来自布罗迪,哈布斯堡王朝边境的一个城镇,当地居民几乎都是犹太人。她的父亲是菲舍尔·兰道(Fischel Landau),母亲是克拉拉·卡里尔(Klara Kallir)。阿德勒跟随阿瑟来到伦贝格,她在这里生下了路德维希和他的弟弟里夏德·马丁(Richard Martin)(生于1883年)。几年后,他们又有

了第三个儿子卡尔(Karl),但在路德维希12岁时,这个小儿子就因猩红热而夭折。在那个年代,阿德勒的老家布罗迪是波兰和俄罗斯之间的自由贸易区。她的家族善于利用这些获利机会,成了当地颇有影响的大富之家。她和阿瑟之间的婚姻并不仅仅是爱情的结果,也意味着东加里西亚两大家族之间更为全面的联盟。在1873年奥地利议院的选举中,三个加里西亚的犹太议员全部来自相互联姻的家族:约阿希姆·兰道(Joachim Landau)代表布罗迪城,纳坦·卡里尔(Nathan Kallir)作为布罗迪商会的代表进入议会,而路德维希的叔叔赫尔曼(Hermann)则当选为多罗毕其郡(Drohobycz)代表。¹⁵

10



米塞斯的父母阿瑟和阿德勒,摄于1880年左右

赫尔曼·米塞斯身上有着许多优秀品质,在他那代男性家族成员中无人能及,正是这些品质——热情、果断、聪慧、爱国、领袖气质,朴实无华而又文笔精炼——使得家族大放异彩。过了一代之后,这些优点为他的侄子路德维希所继承。¹⁶赫尔曼管理过一家大型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还在加里西亚勘探过石油,此后于19世纪70年代早期迁居维也纳,在一家主流报纸《晨报》(*Morgenpost*)工作。1873年,他代表加里西亚 Sambor-Stryj-Drohobycz 地区当了一届奥地利议会(*Reichsrat*)议员,接着重返新闻界,为另一家主流报纸《维也纳评论报》(*Wiener Allgemeine Zeitung*)撰稿,不知疲倦地鼓吹加里西亚的工业化。¹⁷

赫尔曼与其同胞兄弟和堂兄弟们延续了家族建功立业的传统,这一传统至少

11

可以追溯到他们的曾祖父——也即路德维希的曾曾祖父——埃夫拉伊姆·菲舍尔·米塞斯(Efraim Fischel Mises)。菲舍尔在伦贝格经营一家大型纺织品商行,也拥有一些地产。1772年波兰被瓜分后,住在这片贫穷乡村的居民从奥地利的统治中获益匪浅,因为新的统治者赋予了城乡居民史无前例的自由,尽管当时的女皇玛丽亚·特蕾西亚并不是犹太人自由的支持者。她的一些重要谋臣例如著名的索南费尔斯有着犹太背景,但她不能容忍犹太人在维也纳居住。¹⁸即使那些允许犹太人居住的城市,比如伦贝格,犹太人也强制聚居在特定的区域(*Judenviertel*)。一般而言,他们不得进入帝国“禁区”从事贸易,哪怕那些获得许可的犹太商人,也只能在交易日做买卖,而绝不允许过夜。这一禁令从她统治时期一直延续到19世纪。

12 体制虽恶,也有例外。在伦贝格城,犹太人如果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就可以在聚居区外居住:经济富裕、受过教育、不穿犹太传统服装。¹⁹菲舍尔·米塞斯就是其中一例,他享有在伦贝格的禁区居住和经商的特权,同时,他还担任当地世俗犹太组织——犹太文化团体(*israelitische Kultusgemeinde*)的主席。

1800年6月23日,菲舍尔的妻子生下了米塞斯王朝的真正奠基者、博学多才的迈尔·拉赫米尔·米塞斯。²⁰没过多久,这个男孩就在许多方面崭露头角,因此他的父亲很早就让他当了商行的合伙人。父亲还为迈尔定下一门与罗萨·哈伯斯塔姆(*Rose Halberstamm*)的门当户对的亲事,女方父亲经营一家重要的德俄出口贸易商号。迈尔就任犹太文化团体主席的时候,才刚满三十岁;一年后他担任了省法院(*Lemberger Wechselgericht*)的审计员,负责贸易事务。1842年父亲去世时,他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贸易公司。四十多岁时,他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还是一名很有影响的社会领袖,多次入选伦贝格市议会。他还创办了一所孤儿院、一所犹太学校和一座犹太人施粥所。同时,他还建立了一些为学术研究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提供资助的机构。²¹

13 自1840年起,迈尔就在伦贝格的犹太宗教社团担任多种职务,他是其中世俗、亲德一派的领袖。对于以他为首的“开明”犹太教派来说,列入议程的三项最重要的任务是:(1)普及德语;(2)创立德一以犹太教堂(*deutsch-israelisches Bethaus*),一个以德语提供服务的进步的犹太教堂;(3)创办德语犹太学校。这些计划的最大阻力,来自当地的拉比,一位正统德裔犹太人的领袖。19世纪40年代初他去世后,米塞斯一派请来了亚伯拉罕·科恩(*Abraham Kohn*)拉比,这位拉比以其进步观点著称。来到伦贝格后,科恩坚定不移地推进他的事业,让他的反对者们陷入了绝望。1848年9月,他被谋杀。²²

迈尔·拉赫米尔·米塞斯很可能是1846年后成功反抗波兰贵族的那次流血

暴动的领袖之一。这些波兰贵族试图重建古代的苦工制(*Robot*)——这是一种为贵族提供半工农奴劳役的古老习俗,18世纪末奥地利占领加里西亚后就逐渐消亡了。两年后,当革命起义在巴黎、柏林和维也纳相继爆发时,迈尔协助组织了加里西亚的运动。1848年3月加里西亚呈送皇帝的请愿书,他是四位签名的犹太人之一,该请愿书旨在争取社会各阶层的法律平等、实现犹太人的解放、创建加里西亚民兵,以及成立加里西亚议会。²³行动的初步成果之一,就是加里西亚于1848年4月17日彻底废除了各种形式的奴隶制——不过波兰贵族也从公共财政得到了一些经济补偿。同年,迈尔·拉赫米尔·米塞斯当选加里西亚议会议员,从此成为非正式的“犹太贵族”中一位引人注目的成员,积极投身于这个哈布斯堡帝国东部边疆省份的各项政治改革。他甚至还可能是一位让保皇党人们大为头疼的“民主制的煽动者”。



这枚铸币是米塞斯家族在1880年为纪念迈尔·拉赫米尔·米塞斯80诞辰委托铸造的。正面铸有迈尔肖像和出生日期。反面是米塞斯家族徽章,围绕徽章的文字是“80诞辰纪念”,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出自家族的感恩,1880年”。

你会觉得,人的一生能够这样度过,也就无憾了。可是对于迈尔来说,他一生中最高兴、最富挑战性的日子还没开始。这个时期始于19世纪50年代铁路修到加里西亚之时——这些铁路是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穿越欧洲大陆的。迈尔和儿子亚伯拉罕一起投身铁路事业,1859年,他们与奥地利军方签订合同,从加里西亚为军队输送小麦。军方当时正为与意大利开战做准备。正是这桩小麦生意,让他们接触到罗特席尔德(*Rothschild*)家族的金融帝国。1855年,安塞尔姆·冯·罗特席尔德创立信贷银行,专为实业融资服务,此后迅速成为在维也纳证交所上市的最大银行。当时它的主要业务之一就是为意大利战役融资。这笔生意一定非常顺利,因为到了1860年,亚伯拉罕当上了这家银行伦贝格分行的行长。而迈尔在三

年前就开始涉足银行业,担任了奥地利国家银行(Austrian National bank)伦贝格分行的行长,这家银行在1879年奥匈银行(Austro-Hungarian bank)成立之前一直是帝国的中央银行²⁴。等到迈尔的小儿子希尔舍(路德维希的祖父)当上哈勒施泰因和尼伦施泰因银行(Hallerstein and Nirenstein bank)的合伙人及运营总监,长孙赫尔曼跻身菲尼克斯保险公司高层,²⁵米塞斯家族的转型才算彻底完成。它从一家地方贸易公司做起,逐渐扩展到了利润最丰厚的国民经济产业——铁路和金融。



这枚纹章是1881年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册封路德维希·米塞斯的曾祖父迈尔·拉赫米尔·米塞斯贵族爵位时授予他的。纹章右上部分是商业和交通之神墨丘利的权杖,左下部分是代表十诫的圣典。

迈尔·拉赫米尔和他父亲一样,担任过伦贝格许多犹太文化组织的主席。红色绶带映衬着沙仑的玫瑰(Rose of Sharon)——这是启应祷文称呼圣母的名字之一,绶带上还有大卫王族的星型图案,是为犹太民族的象征。

16 1881年4月,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授予迈尔贵族头衔,同年9月,赐予他和他的合法后代享有尊称“阿德勒”的权利。这位孤独的族长,迈尔·拉赫米尔·阿德勒·冯·米塞斯,比他的两个儿子和最小的女儿克拉拉活得都长。²⁶1891年2月28日,他在伦贝格逝世,此时,他的所有孙子都已迁居维也纳。

这次迁居并无任何特别之处。1867年之后的自由主义政府废除了所有限制犹太人迁移的法令,因此许多原本住在东部省份的犹太家庭抓住机会,搬到了维也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比留在加里西亚的犹太人更注重世俗生活。维也纳的自由氛围使他们能够摆脱小宗教社群的约束,融入到更广阔的世俗社会中去。1867年以前,伦贝格和其他加里西亚重镇的城市生活,也能为犹太人提供美好的前景,就像生活在维也纳一样。但是,加里西亚改革打破了这一均衡,它将文化的主导权转移到波兰俱乐部手中。波兰贵族顽固地抗拒一切社会变革。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受到排斥。德语学校无法发展,社会变革也难以展开。1882年,犹太文化社团选出了一位亲波兰的主席,至此,德语文化彻底失去了在伦贝格犹太社群中的主导地位。²⁷

不过,对于路德维希的父亲阿瑟来说,促使他迁居维也纳的关键因素则要实际得多。19世纪70年代,奥地利重建国家财政部;19世纪80年代,政府逐渐收回铁路控制权。²⁸具有较大军事价值的铁路线最先被收回,包括加里西亚境内连接维也纳和俄罗斯边境的线路。²⁹随着铁路接管,阿瑟·冯·米塞斯进入政府部门,被任命为铁道部的工程顾问,工作地点就在维也纳。³⁰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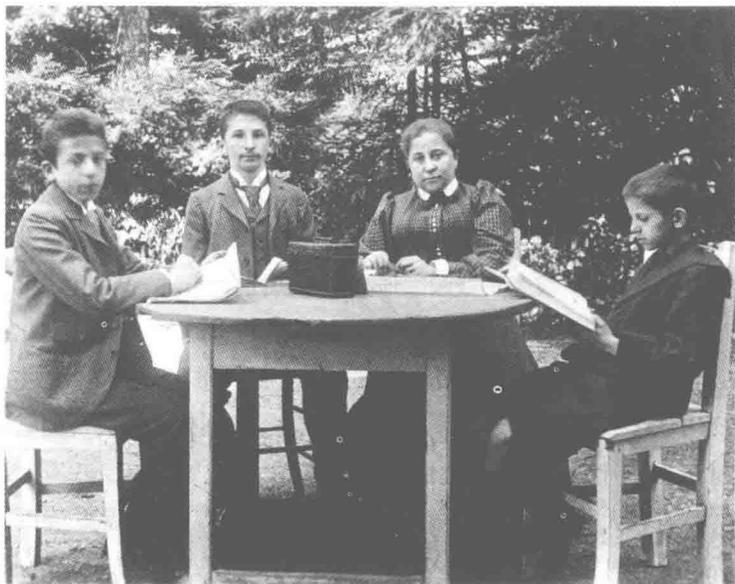
那个年代,进入维也纳的行政机构无论对谁都是职业道路上的一个重大改善:文职部门职位稀缺,社会地位远远高于其他任何职业。他们一家搬进了弗里德里希大街4号公寓,在那里住了十五年。阿德勒有一位仆人和一位厨师,协助她料理家务——这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家庭,她的主要职责和兴趣是教育自己的儿子。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他们送进一所好学校,为以后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

正如文化历史学家威廉·约翰斯顿所描述的,米塞斯一家成了那个年代典型的维也纳犹太家庭:

这类家庭一般都有一位经商的父亲,娶个比他更有文化修养的妻子。夫妇俩定居维也纳,通常住在莱奥波尔德施塔德区(Leopoldstadt),丈夫在外发展事业,妻子负责教育子女。身为母亲,她在文化上的志向将会传递给儿子们,鼓励他们从事某种自由职业从而超越他们的父亲。³¹

无论按照什么标准,阿德勒·冯·米塞斯对两个儿子的教育都是非常出色的。他们的成就远远超越了父亲。两人都是科学天才:路德维希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夏德则在自然科学领域。充满母爱的家庭教育为他们的杰出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只如此。阿德勒还教导他们懂得关怀他人,³²谦恭、节俭,³³尊重真理和美德而非世人的赞誉。她还教他们写作的艺术,教导他们不断追求卓越。

18



(从左至右)里夏德、路德维希、母亲阿德勒、卡尔

在他们后来的整个人生道路上,他们一直秉持着一丝不苟、有条不紊的作风。这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这种作风也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即使是徒步登山这样的大众运动,路德维希也会寻求专业指导,打网球则总有教练陪同。³⁴和母亲一样,路德维希和里夏德的文字表达清晰而又自然。从孩提时起,他们就为自己定下了最高的标准。随着他们的品位和知识素养不断提高,他们继续以这样的标准评判自己和他人的成就。

19

路德维希特别注意不让社会的或者政治的因素影响自己对人和事的判断。终其一生,他都看不起那些没有真才实学却又窃居高位的人。成年之后,更是公开蔑视他的绝大多数教授同行,并非因为他们的错误,而是看不起他们的浅薄。³⁵他完全无法容忍愚蠢之辈,因而四面树敌,几乎毁了他的事业;这也让他赢得了顽固学究的名声。

凭着他的出色天赋,米塞斯得以穿越人生道路上的重重障碍;其中,他的自然天赋来自他的故乡加里西亚。在这方面,他也是一个典型例子:

1880年之后,涌现出了大批犹太律师、医生、学者和记者,以及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和奥托·魏宁格(Otto Weininger)那样靠年金生活的人。他们在维也纳上中学和大学,祖辈则生活在加里西亚或摩拉维亚的乡村,

亲近土地和犹太文化的传统。不管这些年轻学子多么努力想要融入世俗生活,始终无法切断自己生长在犹太乡村的根系。他们保持着大地般的活力,热爱自然,眼界开阔,能够适应维也纳的传统。1860年后的维也纳犹太人,不是世代聚居城市的犹太后裔,就像柏林或法兰克福的犹太人那样。他们是城市的新移民,充满活力、抱负、文化理想,正是这些品质,使得他们能够完成惊人的创举。³⁶

20

朝气蓬勃、视界开阔、志向远大而又热爱文化,这些也体现在年轻的路德维希身上,正是这些优点使他能够不断提出创见。以下章节将会介绍这位新人如何首先征服了维也纳,最终征服了整个思想世界。



米塞斯三兄弟,从左至右依次为:卡尔、路德维希、里夏德

注 释

1. 关于米塞斯家族的详细情况,参见1881年梅耶·拉赫米尔·米塞斯的封爵公报,现藏奥地利国家档案馆(*Österreichisches Staatsarchiv*)。另见 *Österreichisches Biographisches Lexikon*

1815–1950, Vienna: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75, vol. 6。

2. “加里西亚和洛多梅里亚王国”在波兰被瓜分前就已不复存在。哈布斯堡家族选择这个名字,是为吞并行为寻找一个历史根据。中世纪后期,匈牙利国王安德鲁曾是加里西亚–洛多梅里亚国王(*Rex Galiciae et Lodomeriae*),即 Halitsch and Wladimir 的旧罗塞尼亚诸公国的国王。参见 Isabel Röskau-Rydel, “Galizien, Bukowina, Moldau,” in idem, *Deutsche Geschichte im Osten Europas: Galizien, Bukowina, Moldau* (Berlin: Siedler, 1999), pp. 11, 16。

3. 1918年,加里西亚回归波兰。不过,现在伦贝格及其周边地区属于乌克兰。在历史上,伦贝格也称 Lviv, Lwow, Lvov, Leopoli, L'wiv, L'vov, Lwiw, Leopoli, L'viv。

4. 1848年,加里西亚总人口520万。其中包括220万罗马天主教徒(基本上都是波兰人,但也有德意志人)、220万希腊天主教徒(罗塞尼亚人)、33.3万希腊正教徒,以及33.3万犹太人。1840年,伦贝格有63 000居民,其中30 000罗马天主教徒、4500希腊正教徒,以及25 000犹太人。参见 Röskau-Rydel, “Galizien, Bukowina, Moldau,” p. 48。

5. 参见 Cyprian Pogonowski, *Jews in Poland* (New York: Hippocrene Books, 1993)。犹太人在下述各国遭到驱逐:英格兰(1290)、法国(1306)、克罗地亚(1349)、克里米亚(1350)、匈牙利(1360)、德意志、波希米亚、意大利和普罗旺斯(1394)、奥地利(1421)、西班牙(1497)、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1495),以及葡萄牙(1497);参见 *ibid.*, p. 275。

6. Erik von Kuehnelt-Leddihn,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Ludwig von Mises*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99), p. 2。

7. 在正统犹太教的领导下,克拉科夫(Krakow)的犹太人社群仍然心向波兰。相反,在伦贝格,世俗犹太教徒得以自行其是。参见 Roskau-Rydel, “Galizien, Bukowina, Moldau,” pp. 88f., 145。

8. 参见 Heinrich Graetz, *History of the Jews*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shers, 1895), vol. 5, p. 612。

9. Röskau-Rydel, “Galizien, Bukowina, Moldau,” pp. 27–29。

10. 参见 Rudolf Sieghart, *Die letzten Jahrzehnte einer Grossmacht* (Berlin: Ullstein, 1932), pp. 334f。

11. 1880年,大约有32.4万加里西亚人以德语为第一语言;到了1910年只剩下约9万人。因此,德意志化运动对哈布斯堡王朝吞并的这块波兰疆土的影响,从数量上看是很微弱的,哪怕是在这一运动的高峰。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数新移民是天主教徒,因此得以顺利融入波兰原有的教区和学校中去。参见 Roskau-Rydel, “Galizien, Bukowina, Moldau,” pp. 88f., 130, 152。

12. 修筑铁路似乎是犹太人在奥地利发起工业化运动的副产品。威廉·约翰逊指出,1831年之后的几年,“萨洛蒙·罗特席尔德(Salomon Rothschild)说服梅特涅(Metternich)在哈布斯堡帝国的领土上推动工业化进程”。William M. Johnston, *Vienna, Vienna—The Golden Age, 1815–1914* (Milan: Arnoldo Mondadori, 1981), p. 29。

13. 参见 Alois Gratz, “Die österreichische Finanzpolitik,” Hans Mayer, ed., *Hundert Jahre österreichische Wirtschaftsentwicklung, 1848–1948* (Vienna: Springer, 1949), pp. 254f。

14. 他们于1880年10月17日结婚。结婚证见 Grove City Archive: file #6/9/1/1。证婚

人是非舍尔·兰道(阿德勒的父亲)和伊西多尔·尼伦施泰因(Isidor Nirenstein)。

15. Röska-Rydel, "Galizien, Bukowina, Moldau," pp. 70, 147. 约阿希姆·兰道是米塞斯外祖父的表哥。参见 Mises, *Erinnerungen* (Stuttgart: Gustav Fischer Verlag, 1978), p. 20。米塞斯的外祖母来自卡里尔家族,他的外祖父则是兰道家族的一员。

16. 关于赫尔曼·米塞斯,参见《1815—1950年奥地利传记辞典》中的相关条目, *Österreichisches Biographisches Lexikon*, 1815-1950 (Vienna: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vol. 6, p. 317。

17. 赫尔曼的选区多罗毕其附近,也即伦贝格西南地区,曾经盛产石油,后来被人称为“加里西亚的宾夕法尼亚”。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加里西亚是世界四个主要的石油产区之一,仅次于俄罗斯、美国、荷属东印度群岛。参见 Balduin Winter, "Die Rückkehr zum Kind. Wirklichkeit ist mehr als Realität. Drohobycz, die Heimat des Dichters und Traumtänzers Bruno Schulz im vergessenen Europa," *Die Ost-West-Wochenzeitung* (literature section; March 30, 2001)。

18. 1669—1670年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I)统治时期,犹太人被驱逐出维也纳。几年后,虽然这些措施表面上被废除,实际局面与1670年相比并无太大改观。就玛丽亚·特蕾西亚而言,文化历史学家罗伯特·卡恩认为:

玛丽亚·特蕾西亚即位不到五年,犹太人即被逐出波希米亚地区(1745);1777年,她曾写道:“今后除非有我的特别许可,任何犹太人都不得留在维也纳。”此后不到三年,特蕾西亚与世长辞;不到五年,约瑟夫二世颁布了著名的《宽容敕令》(*Toleranzpatent*)。(Robert A. Kann, *A Study in Austrian Intellectual History: From Later Baroque to Romanticism* [New York: Praeger, 1960], p. 158)

19. Röska-Rydel, "Galizien, Bukowina, Moldau," p. 68.

20. 关于迈尔·拉赫米尔·米塞斯,参见《1815—1950年奥地利传记辞典》条目“米塞斯,迈尔·拉赫米尔”, *Österreichisches Biographisches Lexikon*, 1815 - 1950, vol. 6, pp. 317f。

21. 这一系列的活动对他日后册封贵族功不可没。在弗朗茨·约瑟夫治下,捐助公共事业或创立公共福利基金是富有的实业家、商人和银行家获取爵位的重要手段。参见 Sieghart, *Die letzten Jahrzehnte einer Grossmacht*, p. 256。

22. Röska-Rydel, "Galizien, Bukowina, Moldau," pp. 73f. 格雷茨写道:

几乎在每个大的社群,都会兴起一个“开明”或“左翼”的派系,他们尚未与旧的派别决裂,但也到了分裂的边缘。极端正统派谴责他们为异教徒,因为他们偏爱纯正的语言和形式,不管是希伯来文还是欧洲语言文献。(Graetz, *History of the Jews*, vol. 5, p. 403)

23. Röska-Rydel, "Galizien, Bukowina, Moldau," p. 91. 该请愿书由波兰政治家斯莫卡(Smolka)、奇奥科夫斯基(Ziemalkowski)和卡耶斯基(Kulezycki)发起。同时,它要求在公共学校和公共服务部门采用波兰语。

24. 安塞尔姆·冯·罗特席尔德的儿子阿尔伯特(Albert)当了奥匈银行的总顾问,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奥地利金融市场的灵魂人物。他的父亲在奥地利国家银行中发挥的作用与此类似,虽然不那么为公众知晓。

25. 希尔舍·米塞斯娶了一位尼伦施泰因家庭的成员——玛莉·尼伦施泰因(Marie

Nirenstein)。参见 Grove City Archive: file #6/9/1/1。

26. 1881年,他的女儿之中还有两位健在:施特拉·克拉尔曼(Stella Klarmann)和埃莉泽·伯恩斯坦(Elise Bernstein)。

27. Röska-Rydel, "Galizien, Bukowina, Moldau," p. 147.

28. 参见 Gratz, "Die österreichische Finanzpolitik," p. 255。

29. Ibid., pp. 270f.

30. 其他家族成员的经历也差不多。到了19世纪90年代,阿瑟的兄弟和堂兄弟中,至少有三个——埃米尔(Emil)、费利克斯(Felix)和赫尔曼(Hermann)——来到维也纳。费利克斯是维也纳总医院的主治医师,赫尔曼则是著名记者和政治活动家。

31. Johnston, *Vienna, Vienna*, p. 200.

32. 慈善活动是她的教育的核心部分。参见她的自传体回忆录"A Day in the House of My Parents," *Tante Adele erzählt* (unpublished manuscript, 1929)。约翰·卡里尔(John Kallir)将这一章译成英文,放在了网上。

33. 路德维希终其一生都在严谨地记录自己的开销。他有一本账簿,记着自己的收入和日常开支。

34. 关于他在体育方面的训练,参见 Margit von Mises, *My Years with Ludwig von Mises* (Cedar Falls, Iowa: Center for Futures Education, 1978), p. 20。

35. 对于典型的德国经济学家,他写道:

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吓跑了聪明的、有求知欲的年轻人,却对傻瓜充满了吸引力……在每一方面,他们都是如此浅薄。他们伪装成历史学家,却对合作研究一无所知,要知道后者是历史学家最重要的工具。他们不懂得历史研究的精髓。他们运用统计学,却不明白基本的数学问题。对于法学、技术、银行、贸易,他们都是门外汉。他们对自己一无所知的课题发表著作,对此毫不脸红。(Mises, *Erinnerungen*, pp. 7, 67f.; *Notes and Recollections* [Spring Mills, Penn.: Libertarian Press, 1978], pp. 7, 102)

36. Johnston, *Vienna, Vienna*, p. 200.

米塞斯家迁居维也纳,是在 1883 年(也即路德维希的弟弟里夏德出生那年)至 1891 年之间的某个时候。可能发生在 1887 年秋天之前,那时六岁的路德维希刚上小学。他们在郊区的一所公寓安下了家,那里紧挨着当时的维也纳城,现在已经成了城市中心。这间位于弗里德里希大街 4 号的公寓,就是小米塞斯人生旅程的起点,在这里,他开始慢慢了解这个城市,它的历史和它的人民。

维 也 纳

数百年来,维也纳一直是哈布斯堡王朝的政治中心。1848—1849 年革命之后,随着弗朗茨·约瑟夫恢复王权专制企图的破产,奥地利的自由主义者于 19 世纪 50 年代末掌握了政治权力。他们的统治维持了三十年左右,时间长到足以重塑城市面貌,使之顺应自由主义的理想。他们拆除了分隔郊区和维也纳城的城墙,代之以环城大道(*Ringstrasse*)——那是一条宽阔的 U 型林荫大道,将旧城中心三面包围起来,剩下的那面则由多瑙河护卫。环城大道既是建筑上的成就,也富含美学意义。“由于中宫收敛,它的视觉效果超过 19 世纪任何一处城市改建工程——即使巴黎也不例外。”¹ 贵族仍然在新的大道周围拥有宫殿,而主要的建筑群却体现着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文化价值观。过去的高大城墙象征着君主治下的军事力量,现在,就在这些城墙旧址上,歌剧院和皇家剧院(*Hofburgtheater*)演出不断,以自然史和艺术为主题的壮丽的博物馆展示着人类艺术成就和科学发现,议会大厦² 成为新生政治力量的主场,新的大学校舍和证券交易所显示着经济发展的成果,一座宏伟的新哥特式市政厅则体现着君主专制世代之后市民自治的重新崛起。

小米塞斯很容易就能到达这些地点,步行不会超过二十分钟。维也纳城非常狭小,不像欧洲其他重要首都。³ 它是所有中央政治机构和行政部门的所在,是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也是整个帝国各大企业的总部驻地。可是,最多溜达半个小时,你就可以横穿这个帝国的整个核心地带⁴。

23 在维也纳的大街上,常会遇到一些帝国最有名望和最有权势的人物。想要避开某个地位显赫的名人,几乎不太可能。最常见到的是歌剧演员、戏剧演员,还有皇室成员。当一位著名的歌剧演员从旁经过,或者某位大公或女大公(全国超过六十多位)的马车驶过,人们会不约而同地鼓掌致意。而若某位歌剧或戏剧明星去世,则会降半旗致哀。⁵最好的例子——今天看来有些难以置信——就是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本人,他常常乘着马车从城里的皇家剧院驶向维也纳近郊的美泉宫(Schönbrunn Palace)。任何人都可以靠近他的马车,脱帽向这位白发苍苍的皇帝致意。

24 在你往返办公室、商店或学校的路上,要想避开朋友、亲戚和同事,同样也是不可能的。维也纳人在咖啡馆里交流心得、讨论问题、辩论时事,但他们彼此熟识的过程往往是在从家里去办公室的路上,或者去歌剧院、博物馆的途中。

维也纳的文化精英并不只在封闭的小圈子里活动。他们以广阔的社交生活而自豪,他们的圈子里既有官僚又有学者,既有歌剧演员又有科学家,既有股票作手又有艺术史家,既有哲学家又有画家,既有心理学家又有小说家,既有小事务员又有建筑学家,各色人等,无所不包。小城虽小,却是群英荟萃,正是因此,维也纳城成为——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一个文化温室,培育了20世纪文明之中诸多最有价值的成分。那些年里,维也纳成为现象学、医学、精神分析学、锡安运动、新艺术运动(*Jugendstil*)的发源地。它是现代分析哲学的摇篮之一,而最重要的是,它还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诞生地和根据地——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将要领导并加以改造的,正是这一学派的思想。按照文化历史学家卡尔·肖尔斯克的说法:

在伦敦、巴黎或柏林……各个领域的高等文化知识分子,不管属于学院还是美学领域,新闻或文学,政界或学界,相互之间并不了解。他们的专业圈子彼此隔绝。相反,在维也纳,直到1900年,精英阶层的凝聚力一直很强。沙龙和咖啡馆充满活力,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彼此交换看法和观念,此时他们与官商两界的精英分子也有交往,后者的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足可引以自傲。⁶

25 咖啡馆对维也纳的年轻知识分子影响深远。⁷当然,咖啡馆是喝咖啡、吃简餐的地方,但也是专业人士会面洽谈之所,还是普罗大众谈天说地之处。而对学生,咖啡馆还是一个学习场所。好的咖啡馆订阅科学、艺术和文学领域重要的国际期刊。订阅报刊只是为了吸引顾客,但是有了这些报刊,咖啡馆就兼具了私人图书馆

的功能。少年时代的米塞斯，一定耗费了许多午后时光在这些地方，汲取各个领域的最新知识，并与同伴们交流讨论。很可能就是在这里，他第一次了解到以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为首的德国历史学派，察觉到他们学说的疏漏。后来他回忆说：

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就发现施穆勒圈子的论点有着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他们反对实证主义，尽管科学定律源于历史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他们又相信经济学理论是从经济现象抽象出来。让我吃惊的是，这么明显的矛盾竟然很少有人注意到，也没有人提及。⁸

同样，他也觉得历史学派为了反对放任自由主义(*laissez-faire liberalism*)而提出的例子令人困惑。施穆勒及其盟友认为，现代自由主义时代与旧的集体主义时代水火不融。但是，这个论点毫无意义：

26

那时我还不理解自由主义的真义。但我觉得，单凭自由主义是18世纪的成就而不存在于过去的时代，并不能有力反驳自由主义……我不理解，仅仅因为遥远的过去存在公有产权，怎么就能得出他们的结论。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因为过去存在群交现在就应废除一夫一妻制和家庭。对我而言，这些论证完全就是胡说八道。⁹

整个城市浓厚的文化氛围几乎逼着维也纳人广泛涉猎科学、美学和艺术。思考和讨论这些话题并不只是精英阶层的专利。它们成了维也纳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几乎每一个人，从皇帝到家庭主妇，都对最新的科学成就略知一二，对某个演员或某部小说持有自己的看法。事实上，任何有关烹饪、艺术、科学和技术的成就都在这里得到充分的欣赏和批判。这一持久的批评传统——著名的维也纳“闲话”(granteln)——锻炼了每个人的头脑，并让维也纳人的评判标准达到无与伦比的程度。

虽然维也纳人对各项事业和艺术都有兴趣，但他们真正热爱的还是音乐。从1770年到1810年，前所未有的音乐创作在此大发异彩，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这样的天才音乐家接二连三地在维也纳亮相。¹⁰

这座多瑙河畔的城市成为世界音乐之都，并且保持这一地位直到20世纪。对音乐的热情将所有不同种族、社会阶层、政治阶层的人们凝聚在一起。当他们一起

27

欣赏新老大师的音乐时,就不再因政见不同而彼此分隔。在政治问题上,不可调和的世界观排除了客观标准和绝对真理,但在音乐上,优劣的标准却能达成广泛一致,人们用这一标准去评价维也纳爱乐乐团或者歌剧院的演出。正如威廉·约翰斯顿所说:“马虎(*Schlamperei*)在政治上还情有可原,在音乐或者戏剧上则不可容忍。”¹¹

米塞斯并不认可维也纳人在政治上的马虎态度,但同样对音乐充满热情。这种热情持续了他的整个一生。他的继女吉塔·谢雷尼(*Gitta Serény*)曾回忆起,在纽约时,她九十岁的老父亲坐在她身边欣赏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嘴里哼着曲子,眼睛闪烁着光彩的情景。

维也纳犹太人

28

路德维希的父母可以倚靠一个联系密切的亲戚网络,这对他们融入维也纳社会是一个极大的助力。具体而言,阿瑟和阿德勒的血缘关系包括当地的米塞斯家族和兰道家族,还有尼伦施泰因家族和卡里尔家族。路德维希和里夏德与尼伦施泰因和卡里尔家族年轻一代的友谊维持了一生。每到周末,路德维希常去看望他的外祖父菲舍尔·兰道,他非常钦佩这位长辈(他的祖父在他上高中之前就去世了)。而到暑假,则与尼伦施泰因家族成员和其他表兄弟们一起在乡下度过。

犹太家族网络之外的社交联系一定非常稀少。旧的维也纳人团体将新来者拒之门外,即使米塞斯家族这样的贵族血统,在他们眼中也因过于后进而不值一提。路德维希的时代,贵族头衔不再有效(至少官方如此)。1918年11月废除君主制后,新的共和政府废除了一切贵族头衔,并禁止在出版物中使用。根据奥地利的法律,路德维希·海因里希·埃德勒·冯·米塞斯变成了路德维希·米塞斯。不过,在奥地利之外,他将沿用曾祖父为自己的家族挣得的贵族头衔。

奥地利的自由主义时代在19世纪70年代达到顶峰。虽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自由主义逐渐走向衰落,但仍足以容许加里西亚和摩拉维亚的犹太人移居维也纳。世界所有伟大都市都从农村流入的新鲜血液中获得活力。雄心壮志的年轻人们带来了艺术、科学和商业领域的革新。¹²而在奥匈帝国,那些犹太新贵身上既有外省移民的野心,又有首次得以进入城市社会的激情。艺术和科学为犹太人提供了改变自己社会阶层的机遇,这是其他任何领域无法替代的。商业、出版、文学、戏剧、音乐、歌剧和科学成为世俗犹太人融入主流社会的主要途径。¹³

29

到了19世纪90年代,犹太人对维也纳文化的影响已经不容忽视。威廉·约

翰斯顿认为,在世纪之交,虽然犹太人不到维也纳人口的9%,却创造了接近半数的艺术和科学成就。这一令人瞩目的成功部分源于新移民的开放思想。几百年来,摩拉维亚、波希米亚和加里西亚的犹太人一直生活在犹太传统的重压之下,但他们和非犹太人打交道时,却不受这样的约束。¹⁴

有些德国城市,例如法兰克福和柏林,很早就有犹太居民,维也纳却不是这样,那里直到1848年之后才有大量犹太移民迁入。他们来自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加里西亚的村落,那些地方的犹太文化在相对隔绝的情况下延续了数百年之久。他们曾是住在乡村的犹太人。在波希米亚,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农民,很少有人接触过城市生活。他们曾经做过小商人,往来乡镇,从事贸易,或者为非犹太的地主提供金融服务。这些地区的反犹主义氛围比较稀薄,因为犹太人提供了非犹太的地主和农民迫切需要而又不愿亲力亲为的服务。乡村的这种经济互补保证了犹太人的安全和富足。¹⁵

在维也纳,来自东部省份的犹太家族构成了一个新兴、进步的自由主义社群的核心。维也纳为他们提供了全世界最好的学校和最好的文化设施。同时,这个全国最大城市的都市氛围为进步的犹太人提供了一种愿景,促使他们摆脱传统宗教诫命所限定的狭隘的生活方式。这个自由主义的犹太移民社群的领导组织是《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它的经济支持来自信贷银行——罗特席尔德家族在奥地利的旗舰机构。¹⁶

30

虽然米塞斯一家比维也纳大多数犹太家庭更为保守(阿瑟是维也纳犹太文化社团的董事,而阿德勒则是虔信的教徒¹⁷),路德维希的成长环境却倾向于对人类进步和去宗教化一视同仁,在这种氛围下,工程技术的发明者与哲学、艺术和科学的伟人逐渐取代了先知和圣人的地位。¹⁸

对年轻的米塞斯来说,科技成就给维也纳带来的转变是一个永无止境、不断进步的过程。他刚到这个城市时,还只是个小男孩,那时自由主义政府已经在街道和建筑上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每样东西都是新的,每样东西都散发着时代的气息。年轻的米塞斯见证了电灯取代煤气灯、汽车取代马车,目睹人们每天走向新的管道系统支持的公共喷泉。他见证了电话线路布满整个城市,甚至看到飞机在维也纳起降。米塞斯的同时代人,著名的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指出,这一进程也体现在社会和政治事务上,比如说,选举权的普及和倾向劳工利益的立法。新的城市中产阶级开始相信,所有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都会在适当的时候消失。种族和宗教的冲

31

突也会消解,人类最终将会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¹⁹

维也纳的犹太移民大多数是自由主义者。这不意外。他们很高兴能摆脱故乡的宗教和道德束缚,因此也倾向于反对新环境下的限制。他们担心的不只是政治秩序(在这种秩序下,德裔天主教徒享有某些特权),还有天主教会扮演的社会角色——天主教会的地位不禁让他们想起故乡的犹太教秩序。

32 有两件事把犹太的和非犹太的自由主义者联结在一起:反对教堂,反抗审查制度。对审查制度的反抗是从弗朗茨一世时代延续下来的。这位皇帝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将奥地利——尤其是维也纳——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试图监控国民一切思想活动。警察局的密探潜入咖啡馆和剧院,门房变成了情报员。外国的图书要进入奥地利市场必须经过批准,而许多外国作者的作品是被禁的。报纸遭到监控自不必言,就连剧院的演出都要事先得到批准。²⁰米塞斯一家于19世纪80年代搬到维也纳的时候,由于1848年自由主义革命的影响,严厉的审查制度已经有所松动,但它对维也纳人精神上的影响还持续存在。传统的城市居民对商业、科学和艺术领域的创新心存抵触,因为这些创新可能有失体面。他们都是受过教育、举止得体、品味高雅的人士,可是他们缺乏进取心和行动力,无法推动粉碎守旧势力抵抗的计划。企业家精神随着加里西亚“急切的东部犹太人”²¹一同到来。²²他们远比老维也纳人更不在意社会舆论的反对。数十年间,他们坚韧不拔的个人主义精神改变了维也纳文化,也改变了西方文化。

33

学术中学

1892年9月,在他11岁生日之前,米塞斯升入了学术中学(*Akademisches Gymnasium*),他将在那里度过八年的求学时光。当时的中学是非常特殊的机构,要求比现在的中学高得多,而且性质也大不相同。作为19世纪大陆教育体系的产物,那时的中学可以用“中学和大学的混合物”来形容。²³富裕的、有追求的父母会在孩子十岁左右把他送到中学,此前他们已经完成了四年的初等教育。中学有三种模式:古典模式,以八年的拉丁文教育和六年的希腊文教育为特色;半古典式,除学习拉丁文外,还会学习一到两门现代语言;完全的现代模式,只教现代语言。屈内尔特—莱丁指出,古典教育比另外两种教育模式享有更高的声誉,但这三种模式都有很高的要求:

通常,要求苛刻的中学生涯对整个家庭来说都是压在头顶的乌云。只要

一门课没有通过,整个学年都得重读。尼采、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还有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都是这样过来的!当然,年轻的米塞斯也选择了古典教育,现代语言则在课外学习。²⁴

中学期间,米塞斯阅读了凯撒、李维、奥维德、朱古达、西塞罗、维吉尔、塔西佗的拉丁文著作。在希腊文方面,他学习了色诺芬、荷马、希罗多德、狄摩西尼、柏拉图和索福克勒斯。²⁵ 维吉尔的一句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

不要向邪恶低头,鼓起更大的勇气,继续与之对抗。(Tu ne cede malis sed
contra audentior ito.)²⁶ 34

许多年后,他指出,古典文献,尤其是古希腊文著作的浸淫对于自由主义社会学以及他本人的思想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古希腊的政治哲学著作启发了反君权论(Monarchomachs)的思想、辉格党人的哲学、阿尔色修斯、格劳秀斯和洛克的理论,也是现代宪法及权利法案之父们的意识形态基础。正是古典研究,这一自由教育(或译博雅教育、通识教育)的精髓,在斯图亚特王朝统治下的英国、波旁王朝统治下的法国及诸侯分治的意大利唤醒了自由的精神。没有人比俾斯麦——尽管他是19世纪政治家中仅次于梅特涅的自由之敌——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一事实:即使在弗雷德里克·威廉三世统治下的普鲁士,高级中学和基于希腊和罗马文献的教育也是共和主义的大本营。²⁷

1851年,弗朗茨·约瑟夫专制统治初期,奥地利的学校已经进行了改革。在莱奥·图恩·冯·霍恩施泰因伯爵(Count Leo Thun von Hohenstein)的领导下,政府夺取了中学教育的控制权——而这本是天主教会的势力范围。现在政府引入了新的课程体系,为科学研究和奥地利官僚体系培养人才。宗教教育仍然是必修内容,接受来自相关宗教机构的代表(天主教教士和犹太教拉比)的监督。不过即使宗教教育也得尊重科学研究确立起来的事实和规律。²⁸ 35

1869年,公共教育开始成为义务教育。孩子必须读满四年小学(目的是将他们培养为良好公民),然后进入中等学校。中学会向未来的社会精英讲授人文知

36 识。只有大约 5% 的孩子可以升入中学。这个数字比课程设置更能说明中学的本质。进入中学就是成为少数知识精英之一。这意味着他们可以跟随那些被尊称为“教授先生”(Herr Professor)的老师学习,这些老师实际上相当于今天的大学教授,而不是高中老师。(大学的教职极其稀少。)而且这也意味着他们的评价标准极高,远超现代中学。

即使最优秀的学生也不一定能进中学:学费高昂,外部补助也很稀缺。(米塞斯的同学只有一位拿到补助。)不过,学校为了争取优秀生源,也会免去少数特别出色而又上不起学的学生的学费——在米塞斯的班级,这样的学生占到 20%。典型的中学学生是中产阶级或富裕阶层智力出众的儿子。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学生极少。

不过,虽然中学在各类学校中是最好的,不同的中学在质量或声誉上也存在差异。从学生的家庭背景和教师的质量来看,最好的学校都在维也纳。那里的教师都是著述颇丰的学者,在各自的领域积极研究并做出杰出贡献。例如,路德维希的拉丁文老师瓦伦丁·欣特纳博士(Dr. Valentin Hintner),就是爱尔福特的普鲁士皇家公共利益科学院(Royal Prussian Academy of the Socially Beneficial Sciences)院士。²⁹

37 在维也纳,有三所中学特别出众:特蕾西亚中学(Theresianum)、肖顿中学(Schottengymnasium)和学术中学(Akademisches Gymnasium)。它们都是男校。(维也纳的女生在独立的女校上学,不过,她们可以选择一所顶尖中学参加毕业考试。)玛莉亚·特蕾西亚女皇在 18 世纪中期创办了特蕾西亚中学,将其作为“骑士学园”——旨在培养贵族青年成为帝国未来的政府官员和政治领袖的学校。在米塞斯的时代,它仍然是只为上层贵族子弟设立的学校,出身中产阶层的学生只能做走读生。这些走读生中就有卡尔·卢埃格尔(Karl Lueger)(后来成为第一位非自由主义的维也纳市长)、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和约瑟夫·熊彼特。当然,也有一些家庭反感特蕾西亚中学的傲慢氛围,而更喜欢像本笃会肖顿中学和学术中学这样的学校。³⁰

学术中学是维也纳最世俗化的中学。因而,它也成为最受自由主义中产阶级尤其是富裕犹太家族子弟欢迎的学习场所。³¹在路德维希的毕业班上,三十五个学生中有十九人是犹太人,十三人是天主教徒,还有两人是新教徒。学校成立于 1453 年。今天,它位于贝多芬广场,靠近环城大道的东面。这是一座建于 19 世纪 60 年代的高耸的新哥特式建筑,带有罗马式的塔楼,高高的窗户,砖墙上爬满了常春藤。这就是路德维希度过了八年时光的地方。第一年,每周的学习安排是:宗教

(2小时)、拉丁文(8小时)、德文(4小时)、地理(3小时)、数学(3小时)、自然史(2小时)、书法(1小时)。大体上说,整个八年期间教授的课程是一样的;唯一的例外是希腊文,要从第三年开始学习。米塞斯虽然不是最好的学生(他学得真正出色的课是历史),至少也是最好的学生之一,最后他毕业时在全班三十三个学生中排名第六。

不过,学生们却对自己的学校有些不太满意,因为他们的老师都很严厉而又冷淡。在1851年霍恩施泰因伯爵领导的自由主义教育改革之前,奥地利的学校都由天主教神职人员主持。因而,课堂上讲授的主要是教会史和永恒哲学(*philosophia perennis*)。改革之后,政府官员代替了教士。这些新的世俗教授,完全浸淫在奥地利官僚体系的传统和观念之中,在课堂上,他们的态度自然也像其他部门的公职人员一样冷淡。他们的主要兴趣并不在于教育学生,而只是有效率地将自己的课程讲完。³²

38

除了老师激情不足之外,引起学生不满的原因还有一个,这个原因也解释了自由主义时代维也纳创造性成就的爆发:犹太男孩子们出身于文化背景深厚的家庭,但是学校却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智识启发。

那时也和现在一样,年轻学子只把学校当作例行公事走走过场。他们的兴趣和激情不在这里。不过,今天的学生会在课后参加体育运动或看电影,而19世纪末的维也纳孩子们却要继续学习学校不教的内容,广泛阅读和写作——换句话说,这才是他们接受的真正教育。在学校里,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必须阅读拉丁文和希腊文经典,他的脑子里得装满各种德国和欧洲历史的细枝末节,这一切,他做得毫无兴味。但放学后,他可以大量阅读科学和艺术的现代著作。为什么这些维也纳孩子们对休闲活动的理解与其他时代、其他地方的同龄人大相径庭?简单来说,答案就是:在世俗的环境中,传统的犹太文化获得了解放。

威廉·约翰斯顿指出:

在18世纪欧洲其他民族开始文化普及之前,犹太人已经拥有许多世纪重视教育的传统。因此,似乎命中注定,他们占据了那些要求识文断字的行业。³³

这些年轻学子来自上一代人刚刚离开乡村犹太传统的家庭,他们真正的兴趣在于探索世俗领域的知识——这对他们的父辈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他们沉浸在书籍、戏剧和歌剧中,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心。虽然他们的长辈教育他们要尊重宗教

39

知识,但他们发现在维也纳,世俗世界的知识要有趣得多。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似乎正是这一代人的典型。他回忆说,他最早对历史产生兴趣是在1888年,当时他读到一本家族刊物上记载的关于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和弗里德里希三世(两人都于当年逝世)的生平。那时,他才七岁。据他妻子回忆,他十岁时就开始撰写关于克里米亚战争的历史。不过,才起了头,他就放弃了这一计划,因为他发现一个英国历史学家已经就此题目发表了一部十卷本的著作。³⁴读中学时,他大量阅读德国历史学家的著作,这些著作都为新普鲁士王朝在德国境内的统治正名。它们对他的影响十分深远。他认识到,这些盛名远播的作者事实上都满怀偏见。³⁵因此,他很早就经受了批判精神的训练,一生受益无穷,最终使他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自由主义战士。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父亲阿瑟、母亲阿德勒及两个弟弟,摄于1893年左右

他年轻时的照片现在幸存不多,其中一张似乎预示了这些事件。卢·罗克韦尔(Lew Rockwell)评论道:

我经常回想起米塞斯小时候的一张照片,那时他大约十二岁,站在父亲身边。他穿着19世纪90年代流行的奥地利式外衣,手握球拍。照片模糊粗糙,但你可以从米塞斯的眼睛里感觉到一些东西,一种坚毅的性格和智慧的火花,虽然那时他还那么年轻。他的眼睛似乎通晓一切,似乎已明白了自己将来的

使命……我们仔细观察,想要找到是什么把他变成了一个战士,让他在别人倒下时还能巍然矗立,赋予他道德上的坚定信念,不管政治如何变化仍然坚持为真理而斗争。即使在这张模糊的照片中,我们也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一种光彩,这种光彩反映出他顽强的心灵。他绝不向专制政权妥协,而是不断推进人类自由的真理,直至生命最后一刻。³⁶

41

这些细节现在看来会比当时更加清楚。对于那个时代类似背景的女孩来说,路德维希对科学的巨大兴趣是很典型的,对艺术的热情也是一样。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排队等候皇家剧院或人民剧院(Volkstheater)的首演。放学后,则在咖啡馆与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等朋友们聚会,一起阅读报刊,交流心得体会。

米塞斯和凯尔森的生活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使两人之间的友谊特别有趣。他们生于同一年,在同一所学校读书。随后,在维也纳大学读同一个系,为学术生涯做准备,并且都在一战即将爆发之际发表了最初的一组论文。他们都认为没有所谓的科学的伦理学,所有的价值判断都是主观的。米塞斯以研究经济学的先验(*a priori*)法则而著称,凯尔森则是“纯粹法律理论”的先驱。两人娶的妻子都叫格雷特(Grete),二战爆发后都迁居到了美国,最终,于同一年、同在远离维也纳的地方逝世——米塞斯逝世于纽约,凯尔森则逝世于加利福尼亚。

凯尔森的家庭条件低于学术中学的平均水准,米塞斯则高于平均水准。(他是班上唯一的贵族。)一个是充满理想的贵族青年,一个是志存高远的文员之子,家庭背景的差异并未妨碍他们成为好友,并将友谊维持了一生。很有可能他们的相识是从康德哲学开始,尤其是康德的认识论。那时,他们才十六岁。德国的“观念论”哲学——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及后继者们的哲学——对维也纳年轻人的影响十分深远,尤其因为这些著作都被天主教会列为禁书。

42

凯尔森接触观念论哲学之后深受震动。通过阅读康德的著作,他得出结论,外部世界的现实性是有问题的。终其一生,他都将康德思想的这种主观主义解释运用到法学领域。在晚年,他仍念念不忘阅读康德著作是他思想发展的重要节点。³⁷

这位来自哥尼斯堡的哲学家(即康德)并未对米塞斯产生同样的影响。与凯尔森截然不同的是,米塞斯没有经历康德主义的顿悟,并在观念论哲学的启示下重建经济学。相反,米塞斯从个案分析出发,在此基础上进行概括和抽象。最终,他发现自己无法回避认识论问题,于是开始强调经济规律的先验性质。但即使在这一点上,康德主义的认识论也没有对他的思想产生显著影响。³⁸

43 米塞斯真正感兴趣的是政治史和政治行动。后来他才开始钻研法律、经济学、认识论、政治哲学——所有这些学科都是最初那些主要兴趣的副产品。在学术中学的德语期末考试中，他就如下问题写了一篇论文：“从奥地利历史的研究中，我们能得到什么道德启示？”³⁹虽然他的答卷已经找不到了，但从多年之后他的一篇文章可以看出1900年5月他所写的答案的部分端倪。在谈到历史研究的益处时，米塞斯写道：

它打开了人们的心智，让我们理解人类的本质和命运。它启迪着人们的智慧。它正是那备受曲解的概念也即自由教育的精髓。它是人文主义的核心方法，是将人类与其他生物区分开来的整个知识传统……个体身上的文化，不仅仅是熟悉现代科学、技术和公民事务，也不只是读书、看画、旅游、参观博物馆，而是吸收那些人类从动物进化为具有推理和怀疑能力的存在的进程中所出现的观念。它是个人通过参与祖祖辈辈遗留下来的全部优秀传统从而实现自我教化的努力。⁴⁰

44 奥地利的政治史错综复杂，当然足以吸引一位聪慧少年的注意。事实上，米塞斯后来的许多著作都可以看作是一种试图从经济学和社会哲学的角度理解时代问题的尝试。但是，即使在更基本的层面上，他感兴趣的也是现实问题：政府应该做些什么让自己的国家更好？米塞斯对单纯收集历史数据毫无兴趣。他想要解释历史——将观察到的事实回溯到其原因，并将这些洞见应用到现实之中。祖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是如何发展起来的？种族和社会冲突是如何造成的，该如何解决？君主制的根源在哪里？19世纪社会经历了巨大的进步，识字率增加、婴儿死亡率降低、大众消费提升，带来这些进步的原因是什么？

所有这些问题及其答案都是行为的先决条件。假设我们知道了社会生活中的因果规律，接下来该怎么做？比如，怎样才能将工人阶级的福利进一步提高，超过过去几十年的水准？从事商业和社会活动的家族传统使得年轻的米塞斯习惯于深入探究问题的实质。当他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斗争，他也一直坚持这一重点，如他所说，这使他能做好准备“积极参与到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之中”。所以，他转而研究能够指引政治事务的那些知识领域。由于他的时代，以及我们的时代的主要矛盾是经济问题，米塞斯最终成为一名经济学家。许多年后，他写道：

我们时代所有的政治冲突和矛盾最终都是经济问题。

以前不是这样。在16世纪和17世纪,导致西方文明各个民族分裂为不同阵营的争论是宗教问题。新教反对天主教,而在新教阵营内部,对福音书的解释彼此也不一致。整个18世纪以及19世纪大部分时期,宪政冲突充斥政坛。自由主义(在欧洲古典意义上)鼓吹代议制政府,反对君主专制和寡头政治。那时,一个人如果想要积极参与时代的重大问题,就必须认真研究这些争议……只有莽汉才会忽略激起同时代人思想争论的那些问题。

45

在我们的时代,以市场经济为代表的经济自由和以社会主义为代表的集权主义全能政府之间的冲突是最重要的问题。所有政治分歧都涉及这些经济问题。只有研究经济学,我们才能知道这些冲突的实质是什么。如果不进行经济学分析,人们就不会理解通货膨胀、经济危机、失业、工会主义、保护主义、征税、经济控制和类似问题……如果一个人对经济理论的基本思想一无所知,却来谈论这些问题,无疑只是鹦鹉学舌,拾那些比他见识高明的人的牙慧而已。如果一个公民参与投票却不尽力学习经济学,那他就没有尽到一个公民该尽的职责。⁴¹

在米塞斯的早年,奥匈帝国最大的社会矛盾就是经济冲突。报纸、新书、咖啡馆、大街上,到处都在争论这些问题。下面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世纪末奥地利的根本政治问题。

奥匈帝国

46

1866年,普鲁士军队在波希米亚的克尼格雷茨(Königgrätz)大败旧奥地利帝国的军队,此后,奥匈帝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正式登场。在德意志诸侯内部,奥地利与普鲁士的冲突是核心问题。虽然普鲁士通过军事胜利占据上风,但是哈布斯堡家族并未放弃恢复其传统上的领导地位的想法。

在这个民族国家的时代,阻碍哈布斯堡王朝实现自己宏伟蓝图的最大问题是帝国并非以日耳曼人为主体的。匈牙利人的数目与日耳曼人相当,而且全国还有数百万捷克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和罗塞尼亚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在自由主义者——他们是那个时代德意志诸邦最强势的政治力量看来,这种民族混杂的状况使得哈布斯堡家族失去了领导德意志帝国的资格。1859年败于意大利之后,奥地利各届政府试图建立一个更加日耳曼化、更加自由主义的帝国,以体现自由主义民族国家的理想。⁴²

1861年2月,施梅林首相(Schmerling)领导了一场宪法改革,试图通过设立地区议会(*Kurienparlamente*)解决民族问题。这场改革的基本思想是通过议会代表制度协调不同种族、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政治冲突,而不再诉诸一人一票的原则。这一宪法保证了政治和经济当权派的多数议席。大致上看,它保证了日耳曼人及其盟友的多数席位,即使他们在数量上不占多数。

47 施梅林体制试图弥补奥地利帝国非日耳曼化的问题。但随着军事上对普鲁士的失利,一个更为迫切的问题突然出现:分裂危机。哈布斯堡王朝发现,若要保障自己的权力基础,就必须确保匈牙利继续效忠自己。这点通过所谓的奥匈协议(*Ausgleich*)得以实现,该协议是在克尼格雷茨战役之后几星期内起草并通过的。⁴³奥匈协议在哈布斯堡的领土上确立了政治二元体制——帝国分为两个势力范围,一个接受日耳曼人统治,另一个则是匈牙利。它赋予了匈牙利贵族很大的自主权,使得他们在“匈牙利”的范围内,成为事实上的(*de facto*)统治者。⁴⁴作为交换,匈牙利势力不得反对日耳曼人在帝国其他地区的领导权,它们继续组成一个统一的王朝,实施统一的对外政策,拥有统一的军队。奥匈协议同样保证了帝国在经济上的统一。

然而,从一开始,奥匈协议就不利于内部和平,因为各方对其条款的解读存在根本的分歧。在日耳曼人看来,它是帝国各民族之间达成的协议,这就意味着签署方承认自己是一个更大的政治实体的一部分。皇帝并不是签约方之一,相反,他统领着整个政治实体,而协议是在该政治实体的各个部分之间达成的。相反,匈牙利人将奥匈协议看成了他们与匈牙利国王(正好也是奥地利和其他各国的统治者)之间的双边协定。他们与自己君主之间的协议只是正好和奥地利人与其君主之间的协议一样罢了。简而言之,匈牙利将自己看作一个通往完全自治道路上的主权国家,而奥匈协议只是这个进程中的一个步骤而已。⁴⁵

48 仅凭这个理由,奥匈协议就是失败的,因为它无法为奥地利各民族之间的和平共处提供基础,因而也就无法保障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力。年复一年,匈牙利人不断提出新的主张,获得新的让步,代价却是帝国其余部分的利益。日耳曼裔奥地利人认为这些越来越过分的要求实为一种政治勒索。他们对匈牙利人争论不休的行为深感绝望,这也动摇了帝国的立国之基。但匈牙利人并不觉得有丝毫问题,反而得寸进尺。

这从它对政治语言的影响可见一斑。“奥地利”和“帝国”这两个词逐渐被废弃,以适应匈牙利风格的政治修正。帝国的公共机构不再以“帝国”(Reich)为前缀(例如国防部为 *Reichskriegsminister*),而代之以“k. u. k”(kaiserlich und königlich——

帝国和皇家),于是国防部就变成了“k. u. k. Kriegsminister”。相反,匈牙利的政府机构以“国王”(kingly)中的“k.”为前缀,而其他非匈牙利地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议会,即以日耳曼人为主导的帝国参议院(Reichsrat)——的政府机构,则以“k. k.”(帝国皇家)为前缀。奇怪的是,这些其他地区甚至没有统一的名字,它们只是“帝国议会所代表的王国和领地”。⁴⁶罗伯特·穆西尔(Robert Musil)在他著名的世纪末小说《没有个性的人》(*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中,将这种混乱的缩写狠狠讽刺了一番。他把主人公的国度称为开开国(Kakanien, “k-k-land”),并称它是唯一一个因为没有名字而衰败的国家。

49

这纸协议也激起了其他地区的反抗,尤以克罗地亚人和捷克人为甚。⁴⁷他们都把奥匈协议看作试图保持当前日耳曼人和匈牙利人的政治特权的方案——事实的确如此。自称少年捷克人(Young Czechs)的捷克激进分子,就以残酷无情地模仿匈牙利人的斗争策略而著称。他们的代表拒绝参加帝国参议院(帝国的“奥地利半边”的议院)的活动,并宣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只能接受自己的波希米亚国王(正好也是皇帝)统治——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替捷克人争取更多的自由。

奥匈协议的最终结果是导致境内所有民族逐渐疏离帝国。各族激进分子越来越不愿意将自己看作一个更大整体的部分。他们将自己与哈布斯堡帝国其他民族之间的纷争看作是外交事务,而与帝国或者君主无关。1878年,波希米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南部斯拉夫地区归于奥匈帝国统治,使得上述趋势彻底激化。⁴⁸匈牙利人没有赋予新领地自治权,而是立即宣布自己拥有统治权,声称很久之前这里曾为匈牙利国王所征服。因此,波希米亚—黑塞哥维那成为匈牙利和“帝国议会所代表的王国和领地”共同统治的地区。此后的三十年,维也纳与布达佩斯的分治为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和塞尔维亚的冲突创造了肥沃的土壤。这就是最终将整个世界卷入世界大战,并摧毁了奥地利君主政体的主要原因。

50

所有民族的激进分子都学匈牙利人的做法,最终拒绝与其他民族相处。维也纳中央政府作出让步,允许地方政府机构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于是在1900年左右,德语、匈牙利语、意大利语、捷克语、波兰语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都成了官方语言。但是这种特权并不能满足激进派的要求。在世纪之交,许多意大利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乌克兰人、马扎尔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以及斯洛文尼亚人都在争取民族独立。⁴⁹他们坚持民族自治,认为仅在牵涉他们与其君主之间的关系时,才有所谓“国内”政策的问题。⁵⁰弗朗兹·约瑟夫越来越深地陷入一种几乎无法解决的困境,也即扮演一个遭到他的无数臣民唾弃的政治实体的唯一化身的角色:这个实体就是“帝国”。⁵¹人们仍然把他视为一个政治搭

档,但也只是因为他还有着国王的身份,也就是波希米亚国王、匈牙利国王、克罗地亚国王等等。在他臣民的心中,君主是联系不同地区和民族的唯一元素,他们只是没有兴趣或动机更换一个。米塞斯的一位同学回忆说:

51

在维也纳环城大道,大学距离议会不到 300 米。如果说年轻人在大学里几乎每天打架,那么议员之间的冲突也同样充满暴力,他们以一种在别的国家闻所未闻的狂热激情进行战斗。如果你从议会往前再走一百步,你会发现至少每天一次,有时更多,一辆两驾马车从霍夫堡驶出。马车里面坐着老迈的皇帝和同样老迈的亲信。他们驾着马车一路小跑前往美泉宫,几乎每天都在同一时刻,沿着同样的街道。马车前后没有侍卫保护,车内也没有警察,随便来个刺客就很容易得手。但是没人趁机行刺。⁵²

在他登上帝位之初,弗朗兹·约瑟夫就是一个极端保守分子,只是在输了两场战争之后,才同意建立宪政政府。最终,他成了这个几乎没有多少臣民真心拥戴的国家充满荣耀、接近神秘的象征。他主持了奥地利在 1848 年革命后开始的激进转型,一直持续到他统治的末期 1916 年。这场转型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位当时的见证者——弗朗兹·约瑟夫登基前后出生的一位民主主义者,回忆起皇帝在他所有臣民心中激起的敬畏之情:

52

皇帝经历了,事实上是共同发起了这次真正不朽的变革。几乎维持封建状态的土地领主和困于土地的农民,死气沉沉的小镇和行会组织的手艺人,带有围绕中心的城墙和堡垒还有大量防御土墙和斜堤的首都,教会精神力量支配下的整个社会,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马车和马——所有这些构成了弗朗西斯·约瑟夫(Francis Joseph)登基之初的环境。他经历了众多物质与精神上的创新。几乎所有创造或实现了市民、自由农民与乡村工人的土地财产、手工业与工业、大规模贸易、铁路与蒸汽船运输、保险与银行服务业的法律,都有他的签名。现代资本主义的巨大发展在他统治时期得以实现;此外还包括专制世袭国家转为君主立宪、自由市民阶层的兴起、市民议会的兴盛、帝国各个民族文化的发展,以及不可避免的工人阶级的成熟和最终崛起、社会观念的传播、社会立法的肇始。在我这个时代,所有见过弗朗西斯·约瑟夫的人都感觉到,他在推动一个漫长而又伟大的历史时期。很少有哪个人的一生能够包含如此丰富的内容。⁵³

即使那些没有继承对皇帝的深厚情感的人,也不会感受不到他在奥匈帝国政治体系中的关键作用。米塞斯的同时代人和同学费利克斯·索马里记得他的父亲告诉过他:

这个帝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很不一样。想象一下,皇帝和他的政府离开哪怕只是一年,那些民族主义分子一定会互相攻击,把对方撕成碎片。政府就是隔离野生动物园和外部世界的一道篱笆。没有哪个地方像我们一样拥有如此之多危险的政治野兽。

53

像费利克斯这样的青年小伙,很早就学会了欣赏奥地利君主体制带来的好处,懂得

君主制并非历史遗迹,而是在欧洲最危险的前线将八个民族联合起来的唯一可能的制度框架。⁵⁴

可是这也无济于事。1867年后,模仿匈牙利策略的情形迅速增长,到19世纪90年代后期达到顶峰。首相巴德尼伯爵(Count Badeni)寻求解决日耳曼人与捷克人之间民族冲突的方法,希望通过立法让两种语言在波希米亚政府中具有同等地位。日耳曼人视这个条例为给予捷克人的一系列让步中的“最后一根稻草”。巴德尼没有料到波希米亚日耳曼人的怨恨程度,而帝国其他地区则因他的立法而把矛头指向了他。他们开始扰乱议会议程,鼓动暴力抗议。一些社会最重要的部门爆发了群众骚乱,皇帝备受惊吓,于1897年11月解除了巴德尼的职务。

奥地利式的社会主义

帝国境内的民族冲突混杂了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自由主义改革直接或间接引发的社会冲突。贸易、运输、银行和工业的自由化,彻底改变了奥地利经济,侵蚀了旧贵族的社会与政治地位。贵族与教士鄙视新兴的资本家集团。他们在反对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政治对抗行为中,与转型过程中经济上的“失败者”站在了一起,这些“失败者”即传统生产方式雇用的大量人口,包括小规模农业以及在这个更有效率的工厂制造时代逐渐变得过时的手工艺人。如果“失败者”的意思是绝对收入的减少,那么他们并不必然是“失败者”。倒不如说,比起他们那些在

54

新兴资本主义企业找到工作的亲戚、朋友、邻居,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相对恶化了。

世纪末居住在维也纳的小资产阶级分子(Petit-bourgeois),特别憎恨新兴犹太中层和上层阶级的成功,那是奥地利社会引入自由主义改革以来最引人瞩目的变化。1848年之前,维也纳几乎没有犹太居民,因为犹太人不允许在城市里拥有土地,或在城内逗留超过三天。只有大约200个杰出的犹太家族,例如罗特席尔德家族,曾经获得对于这一政策的豁免权。其他所有人都必须在三天之内离开城市,然后从另一个城门进入,取得一张新的通行证。由于这个原因,大众几乎对犹太人一无所知,那些真正接触过犹太人的人,也只得记得他们是加里西亚和帝国其他乡村贫困的犹太法典学者。1848年革命废除了犹太人不得购置房产的禁令,从此以后,事情发生急剧的变化。到了1857年,超过7000个犹太人在维也纳定居。这只是犹太中层和上层阶级移民大潮的开端。19世纪60年代开始,富有的犹太家族成群结队地进入首都。到了世纪之交,维也纳大约已有145 000个犹太人了。到1910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75 000。只有华沙才有超过这个规模的犹太人口。⁵⁵

55 在维也纳这样的小城,现在不可能忽视犹太人的存在了。新的富裕犹太居民明显多于天主教暴发户(*nouveaux riches*)。对于传统的城市居民而言,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犹太人都是外来入侵者。维也纳的城市大众开始组织针对资本家的政治反击运动,这样一来,旧精英们就有隙可乘了。其中两个团体特别有力:德意志民族主义者(German Nationalists)和基督教社会主义者(Christian Socialists)。

米塞斯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亲眼见证了维也纳基督教社会党(Christian Social Party)的兴起。在1882年,维也纳修改了选举法,将普选权扩大到了低收入群体。⁵⁶这些选民最终保证了卡尔·卢埃格尔领导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在1895年社区选举中大获全胜。卢埃格尔,一般称为“英俊的卡尔”(der schöne Karl),是现代政治家的典型。他知道如何奉承“大街上的人”。他并不通过辩论获得胜利,而是完全依靠煽动选民的情感、恐惧以及怨恨。虽然他是在自由主义时代从底层阶级逐渐爬上来的,对犹太人也并无私怨,但是,他将他的选举运动清楚地建立在反资本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之上。

皇帝厌恶卢埃格尔的反犹策略,拒绝任命他为维也纳市长。但是经过连续三次选举的胜利,弗朗茨·约瑟夫最终让步,“英俊的卡尔”在1897年4月20日变成了维也纳市长。卢埃格尔立即着手通过将许多郊区并入维也纳来扩大他的权力基础。合并于1902年最终完成,维也纳变成一个基督教社会党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城市。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它将一直维持这一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后,红色社会主义者在这个城市赢得多数席位,开始了史上规模最大的村社社会主义(communal socialism)实验之一,将这个奥地利的首都变成了红色维也纳。

就像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与日耳曼民族主义者一样,社会主义运动是奥匈帝国自由主义转型的最终产物。不过,前两个集团都反对这场转型,社会主义者却与之并行不悖,其领导者们完全清楚这一讽刺意味,或者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辩证”——认为自己是“资本主义革命的孩子”。他们是打算弑父的被宠坏的孩子,赞美自由主义的经济成就,同时却又默默准备暴力推翻整个体制。

56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同一事态——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快速激进转型的两面。正是出于这个理由,两者都愿意联合犹太精英,接纳他们进入领导阶层。正如资本主义社会允许大批犹太企业家、议员和知识分子诸如李嘉图、迪斯雷利(DIsraeli)、路德维希·班贝格尔(Ludwig Bamberger)发家致富、建功立业,社会主义运动在其领导层面也可视作犹太运动。德国的拉萨尔(Lassalle)和卢森堡(Luxemburg),奥地利的考茨基、鲍尔(Bauer)和阿德勒家,都有犹太血统。简而言之,自由主义运动为新的生产方式的自由实验铺平了道路,从而导致了工厂系统的出现。随着大工厂而来的是犹太资本家和犹太人领导的无产阶级。⁵⁷

相比而言,新的城市无产阶层大部分是没有深厚传统的非犹太人。他们缺乏社会与政治组织,所以很自然就成了政治家与政治运动的争取对象。为了自己的事业,所有政党都试图拉拢这些新兴城市大众。到19世纪80年代,日耳曼民族主义者与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在这场争夺中已经取得优势。只是随着社会主义者在日耳曼人选举中获胜,事情才开始发生变化。他们的信徒扩展到奥地利的底层阶级,吸纳了许多人(但也不是所有人)加入到社会主义事业。⁵⁸当“英俊的卡尔”在选举集会中发表反犹太主义的诋毁言论时,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这是吸引原本支持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的选民加入他们阵营的稳当方法。

57

正如中欧所有社会民主党派一样,奥地利人的组织完全处在卡尔·马克思学说的支配之下。马克思重建了社会主义理论,使它特别能够吸引城市无产阶级。在他看来,无产阶级是代表社会主义未来的一个社会阶级。马克思认为,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只是社会变革的一个中间阶段。它们的主要功能是制造工人阶级,并使工人阶级陷入贫困,从而激励工人阶级进行终极的革命,这场革命将会创造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并导致历史的终结。

1893年,十二岁的米塞斯完成了他在维也纳学校的第一学年。到这一年,马克思主义已经失去大众的尊敬和兴趣了。《资本论》出版已有二十五年,社会的演变显然已经驳倒了马克思的预测:资本主义的内在趋势就是制造工人阶级的悲惨

生活。现在,令人难堪的证据导致社会主义精神领袖之间的分裂。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批评了马克思主义,并提出一个“修正的”社会主义理论。他承认资本主义具有提高大众物质生活水平的能力。他论述说,社会主义者与其彻底推翻资本主义,还不如致力于通过民主选举的政府来纠正它的错误。

58 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只是一股更为广泛的思潮的支流,这一思潮主张社会主义运动放弃马克思主义暴力推翻现有社会体制的教条。在维也纳医生维克托·阿德勒(Viktor Adler)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卡尔·考茨基的领导下,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明确承诺了政治斗争中的非暴力与合法性原则。⁵⁹1888—1889年在海恩费尔德(Hainfeld)召开的党代表大会联合了具有暴力倾向的意识形态激进分子和工会领导的温和派,在这次会议上,阿德勒和考茨基主张通过普选制度和议会立法实现渐进的社会改革。其他国家的激进马克思主义者无情地嘲笑这种对国家及其机构合法性的肯定,称这些温和派奥地利同志的路线为“k. k. 社会民主主义”。⁶⁰但这种新策略确实非常成功。

在学校时,米塞斯一直密切关注社会民主党人关于支持普选问题的思想转变。他亲身经历了这些冲突,以后他将花费大量时间分析这一问题。他的同时代人费利克斯·索马里回忆说:

59 维也纳会议已经过去八十四年,欧洲与美洲都蒙受着长久和平的恩惠,俯视奥地利的软弱、不成熟和对于暴君奴役的忍耐。我们的现实非常不同,因为我们在奥地利试图解决的那些重大问题,其他国家并没有面对过;相反,这些问题甚至还没有在其他国家出现,也许要到几十年以后才会出现。民族主义、政治反犹主义甚至共产主义,都已经是我们的斗争主题,而在世界其他地方,人们还在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这对古怪的二元对立之间摇摆。

整个世界其他地区都沉浸在自鸣得意的和平宁静之中,俯视着奥地利的混乱状态,如同看着一个怪物,这时我们这些年轻人却感到自己正处于政治事件的中心。因为我们的世界比其他地方要真实得多:我们不讨论,只战斗;我们并非局外人所想象的,空想前天的问题,而是已经想到后天的问题了。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新的野蛮主义四处泛滥,震惊了西方;对我们而言这却是一种熟悉的现象,我们将其视作一个高度发达和精致的文明的内心之中,野蛮和无间骚动的翻腾。我用了“我们”,意思是当时维也纳所有年轻知识分子:我们站在历史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上,并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感受这个时刻。⁶¹

职业选择

19世纪接近尾声,路德维希也到了法定成人的年龄,他花了一点时间考虑将来的人生道路。奥匈帝国为教育良好的年轻人提供了四类职业选择。按照他们的声誉排列,依次是:军队、政府、人文学科,以及商业。

在自由主义的后1848年(post-1848)的奥地利,除了某些例外,任何人都可以从事工业和商业,虽然它们还是常常受到数不胜数的管制的约束——这是1848年之前警察国家的残余。这些领域的活动吸引了中产阶级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全国最有冒险精神的社会阶层体现出了卓越的创业领袖能力,其中就包括在商业、60银行业、保险业表现极为出色的犹太人。自由经济给予这些企业家大量机会来为他们的同胞市民服务,并从他们身上赚取巨额财富。他们通常从帝国的一个省份起步,继而扩展到奥匈帝国的各个角落,有时还会发展成为国际企业。一旦达到这种规模,他们就把公司总部和自己的家族搬到维也纳。

然而,绝大多数外省工程师和企业家的孩子并不怎么渴望追随父辈的足迹。在父母的鼓励下,尤其是在母亲的个人支持下,他们更倾向于成为律师、医生、科学家、艺术家、公务员或政治家。年轻的路德维希也不例外。父亲的榜样激励着他,使他非常看重政府公务员的岗位,渴望运用自己的才智来为国家作出贡献。哲学、政治和历史对他远比家族的旧式生意更有吸引力。他决定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取得一个学位,然后在政府部门找一份工作。他在1900年5月通过了学术中学的毕业写作考试,然后在7月中旬通过了口试。当年秋季,他与同学凯尔森和欧根·恩格尔(Eugen Engel)一同进入了维也纳大学的法律与政府科学系(Department of Law and Government Science)。⁶²米塞斯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有一双蓝色的眼睛,身高5英尺8又1/2英寸(171厘米)。⁶³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敏锐的头脑,还有探求促进社会进步的思想的激情。他就是为大学量身定做的。

注 释

1. Carl E. Schorkse, *Fin-de-siècle Vienna* (New York: Knopf, 1980), p. 6.
2. 上议院(*Abgeordnetenhaus*)是古罗马风格,下议院(*Herrenhaus*)则是古希腊风格。
3. 直到19世纪90年代,维也纳也仅有六万居民。费利克斯·索马里回忆说:“中心之

外的一切都是所谓郊区(*Vorstadt*),几乎等于‘外省’。”Felix Somary, *The Raven of Zurich: The Memoirs of Felix Somary* (London: Hurst & Co., 1960), p. 1. 及至1900年之后,一场市政改革将维也纳及其近郊合并。旧维也纳城于是成为新城的中心。

4. 相比之下,横穿环城大道内的巴黎需要两个多小时,步行穿过伦敦的时间也大体相当。

5. William M. Johnston, *Vienna, Vienna—The Golden Age, 1815 - 1914* (Milan: Arnoldo Mondadori, 1981), p. 104. 约翰斯顿发现,即使只是歌剧院或者爱乐乐团的普通成员,也广受民众爱戴,“他们常在富人的沙龙上演奏室内乐”。

6. Schorkse, *Fin-de-siècle Vienna*, p. xxvii.

7. 关于维也纳的咖啡馆文化,参见Gustav Gugitz, *Das Wiener Kaffeehaus. Ein Stück Kultur- und Lokalgeschichte* (Vienna: Deutscher Verlag für Jugend und Volk, 1940)。关于咖啡馆对青年知识分子的作用,参见Stefan Zweig, *Die Welt von Gestern—Erinnerungen eines Europäers* (Frankfurt a. M.: Gustav Fischer, 1988), pp. 56f.

8. Mises, *Erinnerungen* (Stuttgart: Gustav Fischer Verlag, 1978), p. 4; *Notes and Recollections* (Spring Mills, Penn.: Libertarian Press, 1978), p. 2.

9. Mises, *Erinnerungen*, p. 4; *Notes and Recollections*, p. 2.

10. Johnston, *Vienna, Vienna*, p. 20:

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这些超级天才在两代之内、在同一个城市涌现,这在整个文化史上可谓史无前例。最接近的例子是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的罗马,或者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雅典。然而,音乐创作的超级天才和二线作者之间差距如此巨大,没有哪个艺术门类可以相比。

11. *Ibid.*, p. 104.

12. 威廉·约翰斯顿发现,绝大多数伟大的“维也纳”先驱不是出生在维也纳。*Ibid.*, p. 198.

13. 海因里希·格雷茨认为,犹太人进入维也纳社交生活的最早尝试,是由范妮·伊茨格(Fanny Itzig)实现的,她于18世纪80年代从柏林(也就是门德尔松圈子)迁居维也纳,建立了一个出色的沙龙。参见Heinrich Graetz, *History of the Jews* (Philadelphia, 1895), vol. 5, pp. 413f.

14. 参见Israel Shahak, *Jewish History, Jewish Religion* (London: Pluto Press, 1994)。

15. Johnston, *Vienna, Vienna*, p. 200.

16. *Ibid.*, p. 98:

这份报纸不断加强其亲德和反斯拉夫的立场。在其顾问和主编莫里茨·贝内迪克特(Moritz Benedikt, 1849—1920)的领导下,它在奥籍日耳曼人中间激起了反斯拉夫的情绪。它赞扬了1880年后与德国的结盟,并在1914年明确支持作为威廉二世的盟友参战……《新自由报》就像它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读者一样:在文化上品味高雅,在政治上则天真幼稚。

17. 参见阿德勒·冯·米塞斯的回忆录,“A Day in the House of My Parents,” *Tante Adele erzählt* (unpublished manuscript, 1929)。格雷茨提到,一位“伟大的拉比兰道”甚至反对

研究哲学和科学。参见 Graetz, *History of the Jews*, vol. 5, p. 402。

18. 肖尔斯克对犹太复国运动的奠基者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的评价也适用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1860年西奥多出生时,他的家族已经脱离了犹太人隔离区:他们经济富裕、宗教“开明”,政治上倾向自由主义,文化上则属德国。他们身上的犹太教影响已经很少,正如已被同化的犹太古典学者西奥多·贡珀茨(Theodor Gomperz)所说,只是一个“祖传遗物”(un pieux souvenir de famille)。(Schorske, *Fin-de-siècle Vienna*, p. 147)

肖尔斯克的父母甚至把他的犹太成人仪式称为他的“坚信礼”。

19. Zweig, *Die Welt von Gestern*, p. 17. 茨威格和米塞斯同岁,生于1881年,也生在一个刚刚迁居维也纳的犹太知识分子家庭,所以,茨威格的话也正代表着米塞斯的童年经历和感想。

20. Johnston, *Vienna, Vienna*, p. 17. 报纸审查制度一直持续到1900年以后(Ibid., p. 97)。

21. 这个表述出自斯蒂芬·茨威格。

22. 为什么弗朗茨警察国家的管制在维也纳比在外省更加有效?约翰斯通是这样解释的:

相比哈布斯堡王朝的其他地区,维也纳的审查制度和警察管制要严厉得多。在电报和铁路出现之前的年代,几乎不大可能像管理首都一样管理边远地区……自从玛丽亚·特蕾西亚建立中央集权统治之后,没有哪个时代像比德迈尔时期(Biedermeier period)那样,外省能在文化主导权上与首都抗衡。(Johnston, *Vienna, Vienna*, pp. 17f.)

23. Erik von Kuehnelt-Leddihn,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Ludwig von Mises*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99), p. 3.

24. 同上。

25. 关于米塞斯中学课程的详细信息,参见 *Jahres-Bericht über das k. k. Akademische Gymnasium in Wien für das Schuljahr 1899/1900* (Vienna: Verlag des k. k. Akademischen Gymnasiums, 1900),还有此前几年的年报。

26. Virgil, *The Aeneid*, VI, 95.

27. Mises, *The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 [Princeton, N. J.: Van Nostrand, 1956], pp. 93-94. 米塞斯认为:

希腊政治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赞美自由是人类最值得珍视的善,是仅供少数人享有的特权。由于不给外侨和奴隶以自由,他们所鼓吹的实际上是寡头等级专制统治。然而,把他们对自由的赞美都斥为虚伪,则大错特错。他们颂扬和追求自由时之真诚,一点都不逊于两千年后在美国《独立宣言》上签字的那些奴隶主们。(p. 93)

他继续写道:

激烈地要求从自由主义教育课程中取消古典学习,因而等于事实上摧毁自由主义教育,是奴性思想复辟的一个重要表现。(p. 94)

关于古典文献与自由主义的关系,相反的评价参见 Frédéric Bastiat, “Baccalauréat et socialisme,” *Oeuvres complètes* (2nd ed., Paris: Guillaumin, 1863), vol. 4, pp. 442-503. 巴斯

夏认为,古典文献留给我们的遗产是这样一个观念:社会完全是惯例的建构,法律可以将社会塑造成任何形态。

28. Johnston, *Vienna, Vienna*, p. 97. 其他改革家还包括弗朗茨·贝克斯纳(Franz Bexner)和赫曼·博尼兹(Hermann Bonitz)。

29. Königlich preussische Akademie der gemeinnützigen Wissenschaften.

30. Eugen Guglia, *Das Theresianum in Wien* (Vienna: Schroll, 1912). Somary, *The Raven of Zürich*.

31. Schorske, *Fin-de-siècle Vienna*, p. 135; Karl Kautsky, *Erinnerungen und Erörterungen* (The Hague: Mouton, 1960), p. 211.

32. Rudolf Sieghart, *Die letzten Jahrzehnte einer Grossmacht* (Berlin: Ullstein, 1932), pp. 15f.

33. Johnston, *Vienna, Vienna*, p. 217.

34. 参见 Margit von Mises, *My Years with Ludwig von Mises* (Cedar Falls, Iowa: Center for Futures Education), p. 15。

35. 参见 Mises, *Erinnerungen*, p. 3。他写道:“作为一个奥地利人,我不难发现这些作者的夸张语调。很快,我发现他们的分析方法也有问题,说得难听一点,就是歪曲历史。”Mises, *Notes and Recollections*, p. 3. 另见 Margit von Mises, *My Years with Ludwig von Mises*, p. 15。

36. Lew Rockwell, “Heart of a Fighter,” *The Free Market* 23, no. 7 (2005): 4f.

37. 参见 Rudolf A. Métall, *Hans Kelsen* (Vienna: Verlag Franz Deuticke, 1968), p. 4。

38. 多年以后,他对世纪之交兴盛的新康德主义运动(尤其是柯亨和纳托普)没有什么好话。他说,这是一个堕落的时代,而新康德主义正是它的哲学反映。参见米塞斯致拉赫曼,信件标注日期为1956年10月11日;Grove City Archive: Lachmann file。

39. *Jahres-Bericht über das k. k. Akademische Gymnasium in Wien für das Schuljahr 1899/1900*, p. 13. 考试的书面部分还包括数字和几何(包括证明几何定理),还有翻译。米塞斯必须把拉丁文译为德文、德文译为拉丁文,还要把希腊文译为德文。

40. Mises, *Theory and Histor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293–94.

41. Mises, “Eugen von Böhm-Bawerk and the Discriminating Reader,” *The Freeman* (August 1959)。

42. Sieghart, *Die letzten Jahrzehnte einer Grossmacht*, pp. 377ff.

43. 奥地利参议院于1867年12月21日通过了一条新宪法。关于奥匈协议,特别参见 *ibid.*, pp. 111ff.

44. 这一点对于斯洛伐克人和罗马尼亚人尤其重要。“克罗地亚及斯拉沃尼亚王国”也是匈牙利的一部分,但是相对比较自主。

45. 他们将这一诉求加在他们的合法代表——匈牙利国王身上。当然,国王正是弗朗茨·约瑟夫本人。

46. Sieghart, *Die letzten Jahrzehnte einer Grossmacht*, p. 113.

47. 奥匈协议的主要支持者是波兰人和意大利人。这两个民族都定居在那些他们拥有

政治和经济势力,但人口少于当地其他民族(鲁塞尼亚人、南斯拉夫人)的地区,他们在这些地区占据着主导地位。

48. 这是1978年柏林会议一项七国政府协定的条款之一。柏林会议讨论了东南欧和中东的领土问题。会议是在俄国击溃土耳其之后召开的,两国签署了一份协定,同时签约的还有奥匈帝国、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政府。

49. Johnston, *Vienna, Vienna*, p. 8.

50. 这一立场的最大问题是,传统政治版图(“王国与领地”)并不仅由单一民族构成。除了阿尔卑斯山区某些地方,所有传统领地都居住着至少两个民族,通常还会更多。

51. Sieghart, *Die letzten Jahrzehnte einer Grossmacht*, p. 391.

52. Somary, *The Raven of Zurich*, p. 11. 他继续评论道:

现代各大帝国的政治领袖藏在疾驰的防弹车内,受到无数卫兵的严密保护。亚里士多德就是这样界定君主和暴君的区别的:君主保护他的臣民,而暴君却必须依靠臣民保护自己。

53. Sieghart, *Die letzten Jahrzehnte einer Grossmacht*, p. 210.

54. Somary, *The Raven of Zurich*, p. 10.

55. 这些数字来自 Johnston, *Vienna, Vienna*, pp. 199f.

56. Sieghart, *Die letzten Jahrzehnte einer Grossmacht*, p. 311.

57. 格奥尔格·弗朗茨认为,不断壮大的奥地利犹太人势力有效促进了国产古典自由主义学说的发展。参见 Franz, *Liberalismus—Die deutschliberale Bewegung in der habsburgischen Monarchie* (Munich: Callwey, 1955), pp. 145–220, 439.

58. Sieghart, *Die letzten Jahrzehnte einer Grossmacht*, p. 348.

59. 关于阿德勒,参见 Karl R. Stadler, “Victor Adler,” *Tausend Jahre Österreich*, Walter Pollack, ed. (Vienna: Verlag Jugend und Volk, 1974), vol. 3, pp. 50ff. 考茨基有所不同,因为他鼓吹一种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他相信马克思已经发现了社会演化的严格规律。资本主义必然通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此,试图通过暴力变革“推进”历史进程也就变得毫无意义。诺伯特·莱泽(Norbert Leser)认为,由于这个原因,考茨基对奥地利社会主义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考茨基的决定论观点散布了宿命论,并破坏了社会主义“从业者”的活动。参见 Norbert Leser, “Otto Bauer—Friedrich Adler—Max Adler,” in *ibid.*, p. 256.

60. Sieghart, *Die letzten Jahrzehnte einer Grossmacht*, p. 351. (字母“k”的德语发音接近与排泄物有关的国际俚语。)

61. Somary, *The Raven of Zurich*, p. 7.

62. Rechts-und staatswissenschaftliche Fakultät der k. k. University of Vienna.

63. 根据他在1941年美国“身份与国籍宣誓书”,参见 Grove City Archive: Mexico 1942 files。

米塞斯学习法律和政府科学期间,维也纳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高等学府之一。它是鲁道夫四世(Rudolf IV)在1365年建立的。因此,学校的拉丁名字叫做“鲁道夫大学”(Alma Mater Rudolphina)。数百年来,它一直保留着中世纪大学的三个典型特征:政治与法律上的自治;仅设四大科系(法律、医学、人文和神学);由天主教会管理。

中世纪欧陆大学的自治具有传奇色彩。它超越了学术事务,实际上延伸到大学成员之间的一切法律关系。¹直到米塞斯就学维也纳大学时期,警察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仍然没有权力进入大学。

62 到20世纪初,大学在法律上的独立不再像过去那样了。自治程度削弱的另一个原因是保护人的更替。开明专制时代,掌控奥地利天主教会的权力,因而包括对维也纳大学的控制,转交给了哈布斯堡王朝。从18世纪中叶开始,奥地利统治者成功发起了一场旨在打破国际天主教会垄断势力的伟大运动,整个过程于1790年完成。教士阶层的官僚化——即所谓国家教会(Staatskirchentum),使得维也纳大学纳入了哈布斯堡王朝的控制范围。²

这项接管的后果之一就是,新教徒自1778年以后可以获得学术学位,而从1782年开始,犹太人获准可以进入法律系和医学系。一个世纪后,女性也可以入学了,首先是哲学系(1897年),接着是医学系(1900年),然后是法律系(1919年)。³政府接管维也纳大学的另一个影响是开始重组院系和研究机构。其中一个新建的系是哲学系(该系最初设立目的只是为了培养学生进入其他领域深造),另一个新系就是法律与政府科学系。

政府科学领域的第一个正教授席位创立于1763年,授予玛丽亚·特蕾西亚的顾问约瑟夫·冯·索南费尔斯(Joseph von Sonnenfels, 1732—1817)。他是女皇所能容忍住在她的城市的少数犹太人之一。⁴索南费尔斯是一位杰出的人物,创立了

几个重要的传统。他不只是应用政府科学领域的首位教授,也是第一位对维也纳精神生活产生影响的犹太人,还是第一位提出“经济观点”即严格地从功效主义角度评价政治问题的学者。作为一名热情的教师和天才的作者,索南费尔斯还开创了特点鲜明的维也纳经济学家—新闻记者传统,这一传统的后继者们包括了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ohm-Bawerk)、欧根·冯·菲利波维希(Eugen von Philippovich),还有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他们的思想传承有序,写作风格清晰、简洁和朴实,因而对奥地利的政治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米塞斯求学时期,法律与政府科学系的课程分为两个阶段。最初两年主要特色是法律史和法律制度的课程及研讨班,两年后参加第一次“国家考试”(Staats-examen),完成第一阶段的学习。国考共有三次,之所以称为“国考”,是因为主考官是作为奥匈帝国的代表特别委任的。接着,学生继续学习两年,熟悉奥匈帝国当前的民法、刑法、诉讼法,还有政府科学,其中包括经济学、经济史,以及一些公共管理的技术与法律方面的课程。第二阶段结束时要再次参加“国家考试”,内容是关于当前法律和政府科学。⁵

通过这些考试,就意味着完成了大学对一个从事法律专业的学生的要求。但在毕业后,开始职业生涯之前,还有为期两年的强制学徒期。有些学生,尤其是有志于成为职业学者的学生,还必须获得法学博士(doctor juris)学位,这就要求他们在三次“国考”之外,通过三次额外的考试,名为“严格考试”(Examina Rigorosa)。

米塞斯经历了所有这些学习阶段。1900年10月,他开始为期两年的法律史研究,主要是罗马法和教会法,以及中世纪法律制度和经济情况。今天,只有少数专家才去研究教会和中世纪法律。但是在米塞斯时代的奥匈帝国,从事法律或进入政府必须非常熟悉这些传统,并且扎实地掌握拉丁文。匈牙利政治建立在中世纪思想和制度的基础之上,而拉丁文直到1867年还是匈牙利的中学授课语言。直到1918年帝国末期,匈牙利知识分子与政治家在涉及自己国家的神秘基础的时候,仍然寸步不让。⁶

不过,虽然学生必须了解奥匈帝国的法律与制度传统,但在非匈牙利学生中间,这些主题并不常见。米塞斯在回忆录中也不觉得自己这段时期的研究值得一提。

讲课质量极其糟糕,部分因为教授一方完全缺乏消费者导向的意识。政府接管奥地利的各所大学后,这些教授就变得财务独立,收入与他们的听众数量无关,因而几乎没有动力去满足学生的需要。这既影响了他们的行为模式,也影响了他们

们的公共地位。政府将他们转变为公务员学者,或者不那么好听地说,宫廷知识分子。“学术自由”不再意味着政治独立。当公众提及“无限的学术自由”时,他们指的是免于负责或者免于承担后果的自由。按照屈内尔特-莱丁的说法就是:

65 教育的自由是无限的……即使一个教授不再授课,只读报纸,你也不能把他解雇。每一位教授都有终身教职,直到65岁或者67岁,才不得不以最后工资82%的水平退休。教授作为一个教师的素质无足轻重:人们并不期待教授是一个教育者,而只把他当作一位学者,让学生能有机会听他说话。⁷

米塞斯的早期大学生涯是一段复杂的经历。除了课程非常糟糕,不同民族学生之间的敌对情绪也在蔓延,而且反犹主义思潮广为传播。学生生活一般由联谊会组织,而联谊会往往按照原籍划分。这些组织为新到首都的人提供了一个同乡之间相互支持的网络,还会介绍他们认识已经功成名就的前会员,这将帮助他们今后找到合适的工作。但是联谊会经常堕落到专门组织大家饮酒狂欢,并且倾向于赞美暴力和军国主义的生活方式,夹杂着一种不成熟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不同的联谊会之间经常发生暴力冲突,尤其是在不同民族的学生之间。维也纳最大的非日耳曼学生群体是捷克人,他们与日耳曼学生之间的冲突几乎每天都会发生。⁸

66 维也纳大学仍然享有法律自治的地位,因此警察对阻止这些冲突无能为力,而激进的学生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来自维也纳的学生较少依赖同胞的支持,因此也不太有动力加入阵营的一方。然而重要的是,许多维也纳学生是犹太人,虽然他们中间很少有人根据宗教定位自己,那些联谊会却对这些易于辨认而又富有效率的竞争对手充满厌恶。

米塞斯尽力回避种族冲突和大学的放荡生活。他把自己完全投入到学业中,寻找一切机会提高自己。除了课程和研讨班,最初两年,他还一直参加“社会科学教育协会”(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Bildungsverein)的活动。这个协会没有党派倾向,它使学生能够接触到一些顶尖的知识分子。就是在这个协会,米塞斯第一次见到了历史学家卢多·哈特曼(Ludo Hartmann)与库尔特·卡泽尔(Kurt Kaser)、社会主义领袖卡尔·伦纳(Karl Renner),还有后来当了奥地利共和国总统的米夏埃尔·海尼施(Michael Hainisch)。参加协会的学生还有弗里德里希·奥托·赫兹(Friedrich Otto Herz)、奥托·鲍尔以及汉斯·凯尔森。⁹

当时在学生中最耀眼同时也最让人捉摸不透的是奥托·魏宁格尔(1880—

1903)。后来他发表了1903年博士论文《性与性格》(*Geschlecht und Charakter*),几乎在一夜之间红遍了奥地利和德国。这本书直到20世纪30年代重版了不下三十次,对德语思想中有关两性差异和两性关系的认识产生了巨大影响。魏宁格尔最早无疑是在朋友和仰慕者的小圈子里提出自己的想法的,凯尔森就是他的铁杆拥趸。米塞斯也许参加过几次魏宁格尔圈子的聚会,他写于1922年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文反映出了这些影响。

格林贝格的研讨班

大学的研讨班(*seminar*),是将一小群学生聚集在一个教授周围,由教授在专业领域内给予他们阅读和研究的指导。米塞斯特别得益于他在卡尔·格林贝格教授(Carl Grünberg)研讨班中的学习。格林贝格是一位年轻、充满活力的教授,当时刚从系里获得正教授资格。¹⁰

67

格林贝格知道他的班上这些才华横溢的学员的能耐,于是鼓励这些才上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在他指导下以达到发表水准为目标进行学术研究。仅仅一个学期之后,他就分配米塞斯一个研究计划,探讨1772年至1848年间加里西亚农民的解放运动。米塞斯从1901年复活节后开始了这项工作,一年当中对这个题目作出了很好的研究。他在维也纳档案馆(*Vienna Staatsarchiv*)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研究了所有可以获得的文献,涉及加里西亚农民法律地位沿革、约瑟夫二世皇帝推行的诸多改革,以及导致1848年革命的事件等等。他巨细靡遗地做了几百页笔记,最终提炼出一部文稿。他的成果马上就发表了,取了一个中性的题目,《加里西亚地主与农民关系的演变,1772—1848》,收录系里的著名丛书《维也纳政府科学研究》。¹¹

格奥尔格·F. 克纳普(*Georg F. Knapp*)曾对普鲁士农民解放运动的起因和影响作了深入研究,这场运动源于18世纪开始的各种农业改革。¹²他的研究获得广泛赞誉,使得农民解放这个主题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他的研究完全建立在档案的基础上。这种研究方法很快被德国学者路德维希和维蒂希(*Wittich*)借鉴,他们扩展和强化了克纳普对德国社会环境的分析。克纳普的方法后来也在奥地利得到应用,最著名的就是格林贝格的著作《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西里西亚的农民解放运动》(*Die Bauernbefreiung in Böhmen, Mähren und Schlesien*)。¹³正是凭着这部著作,格林贝格进了维也纳大学。他开始训练学生研究奥地利的农民解放问题,特别鼓励学生与他一同探索那些自己尚未涉足的帝国疆土。接着,格林贝格又写了另一本书,研究布科维纳的农业改革,米塞斯关于加里西亚农民解放运动的研究,就是

68

对这本书的一个补充。¹⁴

69

就其总体表述而言,米塞斯恪守老师的方法。他详尽无遗地利用了奥地利最大档案馆里一切可得的波兰与德国文献,发掘出许多不为人知的材料。他本应为此成绩感到骄傲,在他二十岁时,就在一个拥有很高声誉的丛书中出版了自己第一部学术著作,的确值得大大庆贺一番。可是,他后来回忆说:



卡尔·格林贝格

卡尔·格林贝格曾经在斯特拉斯堡与克纳普一起工作……他的著作在形式、表述和方法上都亦步亦趋地模仿克纳普关于普鲁士旧省份的著作。它既不是经济史,也不是行政史。它是官方文献的一份摘录,是对载于公文的政策的一个描述。这样一份记录,本来是随便哪个有点才干的政府官员都可以轻松完成的。

格林贝格的野心是在维也纳创建一个经济史研究中心,就像克纳普在斯特拉斯堡建立的那样……我尽了最大努力试图摆脱与克纳普体系之间过于紧密的联系,但我只是部分地做到了这一点。因此,作为此项研究的成果,我在1902年发表的作品更像是一份政府政策史,而不是经济史。¹⁵

在这本书的导言中,米塞斯描述了从15世纪到18世纪加里西亚农民处境的演变。他指出,在中世纪晚期,加里西亚农民享有一个相对较好的环境。他们只向地主支付较低的税收,不用担心从自己的土地上被赶走,经常享有司法自治的好处,甚至还有可以离开故土的虽然受限的权利。地主对农业没有兴趣,所以就把所有农业管理事宜交给农民自己和他们的代表。

70

波兰抗击德意志骑士团(German Order)连续两次取胜之后,事情开始发生巨大的改变。德意志骑士团曾在15世纪统治东波罗的海的大片地区。1466年以后,波兰人控制了但泽、默默尔和埃尔宾等港口,于是,出口波兰内陆地区的农产品变得有利可图。本地贵族试图对农产品,特别是农产品背后的农民取得更多的控制。事实证明这些努力非常成功:在18世纪初,加里西亚的波兰精英已经控制了所有的土地,加里西亚的农民成了地主的奴隶,被剥夺了一切权力,甚至可被出售或者交易。

米塞斯在第一章作了分析,指出这一事态在18世纪初期已经非常普遍。他解释说,波兰贵族本质上就是一个没有取得广泛支持的奴隶主俱乐部。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无法避免国家分裂(1772年至1795年),其后也无法重新确立独立地位的主要原因。罗塞尼亚农奴宁愿接受鲁普士或奥地利的统治,他们反正没有什么可以失去;无论如何,他们的处境只会变得更好。¹⁶

维也纳的新统治者非常精明,意识到这一事态下的政治机遇。“奥地利政府在加里西亚的政策,”米塞斯写道,“是以牺牲贵族利益为代价实现惠及农民阶层的目标。”¹⁷这种趋势由于约瑟夫二世皇帝坚持自由主义启蒙理想而得到强化。加里西亚归属奥地利之后,税收减少了,对农民的法律保护建立起来,现在地主与农民的产权变得更加清晰。更重要的是,奴隶制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农民不再被认为是地主的财产,不过,他们仍被迫劳动固定的时间——这是一种称为“苦工制”的义务,最初是在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皇时期建立的。

71

但是,约瑟夫二世于1790年2月驾崩,此时正是规模庞大的社会改革计划即将完成之际。改革未能明确界定所有团体的权利与义务,特别是农民不再被迫完成特定种类的工作,仅仅保证一定的工作时间。结果造成农民怠工以及农业产量的迅速下降。贵族阶层于是诉诸更重的惩罚,进一步破坏了社会关系。在19世纪最初的四十年里,民主制度鼓吹者们相信加里西亚是一块民主的沃土,因为农村人口似乎已为变革做了充分准备。米塞斯认为,绝大多数农民对那些鼓吹者们的信任并不超过当地贵族。他们信任皇帝,相信是他废除了苦工制度,无论那些波兰贵族多么巧舌如簧。于是当1846年2月波兰贵族反抗奥地利统治,企图恢复他们旧有的特权时,他们遭遇了团结一致的乡村农民阶层的反抗,这些农民无须奥地利军队的帮助就粉碎了贵族的反叛。¹⁸

在第四章,米塞斯详细描述了此次失败的贵族叛乱及其后果。他在这个问题上谈了许多。毕竟他的曾祖父就是这次事件的一个目击者,也曾支持农民的胜利。

胜利的农民相信,他们已经赢得了自由,也赢得了帝国的承认。但是维也纳政府并没有做好准备赋予加里西亚农民自由,也担心在帝国其他仍然存在强迫劳动的地区引起连锁反应。1846年12月,一部实质上维持现状(*status quo*)的法律得以通过,加里西亚农民觉得自己被出卖了。他们现在为1848年革命做好了准备,这次革命最终成功地废除了苦工制,而且是连根拔起。

72

虽然最后呈现出来的是一部仅仅涉及历史问题的著作,但是,米塞斯的研究触及了当时重要的政治敏感问题。克纳普-格林贝格-米塞斯论证的要点是,奴隶制是斯拉夫政权下的农民处境的一个典型特征,农民解放的真正尝试只是到了日

耳曼人统治时期才开始出现。米塞斯论证说,1772年波兰被瓜分后发生了多起叛乱,叛乱归于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叛乱不是真正的民族动乱,恰恰相反,这些行动纯属贵族冒险,何况同时触怒了维也纳的帝国中央政府和本地人民。由于民主运动未能得到农村劳动阶级的支持,它的领导阶层就与高级贵族结盟,于是转而支持在政治上“维持现状”。用米塞斯的话说:

[农民]听到谈论一个更好、更美的未来之时,眼睛发出多么异样的光彩;那里的人不再分为主人和奴仆,所有人都是弟兄。然而他们在[民主主义]反对派的话中听到的东西,却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贵族阶层的憎恨。他们不再希望听到关于波兰国家重建的说辞。波兰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无论波兰还是德国,对于他们毫无分别。但是他们确实知道奥地利文明的仆人为他们提供了仅有的帮助,帮助他们对抗暴虐的地主。农民遭受的不义之事还存于老年人的记忆之中,多亏皇帝的干预,他们终于可以不用忍受。但是因为他们的压迫者是波兰人,他们对所有“波兰”事物都只有厌恶之情。现在他们自称为“帝国人”(Kaiserlich)以及“奥地利人”。¹⁹

73

米塞斯的结论在波兰人和其他斯拉夫民族人群中都不太受欢迎,特别是在20世纪早期维也纳民族问题持续升温的氛围下。虽然表面上看,这些问题只是学术研究,但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这从以下事实可以看出:就在米塞斯著作出版的那年,一位年轻波兰历史学家也发表了一篇论文,文中观点正好相反——18世纪波兰农民的生活水平显然高于日耳曼人统治时期的农民。²⁰

米塞斯的研究也引起了一些共鸣。在他笔下,那些平息了贵族叛乱的同胞,是以自由战士的形象出现的,因此,他们也是加里西亚走向自由的“历史”发动机。

米塞斯的工作得到了该领域一位权威学者的积极评价。这位学者是来自斯特拉斯堡大学的路德维希——克纳普的一位学生。他把米塞斯的工作称为学术研究的典范,并赞扬了米塞斯的明晰的写作风格,认为这一风格继承了他的老师格林贝格的优点。²¹而在德国讲坛社会主义的主要喉舌施穆勒《年鉴》(Jahrbuch)中,有一篇评论文章说,这项研究包含了许多新材料,是一项非常了不起和有价值的工作。²²另一位专家,来自切尔诺维茨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zernowitz)的凯因德尔(R. F. Kaindl)教授,赞扬格林贝格培养出了优秀的学生,特别提到米塞斯“站在一个大体而言更高的角度”,彻底分析了维也纳档案馆中有关约瑟夫二世统治时期加里西亚改革运动的材料。²³

74

1902年7月15日,米塞斯通过法律史的“国考”,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学业。他的主考官特别关注奥地利帝国的历史,米塞斯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这位二十岁的年轻学子,看来已经拥有一个无可限量的学术前途。不过,进入第二阶段的学业之前,他还得服兵役。

军队服役与父亲之死

1902年10月1日,米塞斯成了一名志愿兵,服役一年,隶属帝国与皇家第6炮兵团(Imperial and Royal Division Artillery Regiment),该团后来更名为帝国与皇家第30野战炮兵团(Imperial and Royal Field Cannon Regiment)。²⁴犹太人自1788年以后开始履行兵役义务。他们经常在运输和炮兵部门服务,米塞斯就是一个典型例子。²⁵他在军队待了整整一年,驻扎在靠近维也纳的地方,直到1903年9月30日回到大学。此后,由于奥匈帝国与俄罗斯之间的政治危机,他还分别于1908年和1912年作为后备士官两次调入同一个团。1914年,他不得不再次回到军队,这次条件甚至更为恶劣。

奥地利军队自1815年打败拿破仑之后就再也没有赢过一次战役。这支军队在1859年的索尔费里诺战役中败给了意大利,又在1866年的克尼格雷茨战役中败给了普鲁士。但屡战屡败并不妨碍它在哈布斯堡帝国的各个角落享有无与伦比的美誉。它是帝国统一与安定的最引人注目的象征。在那些日子里,军队及其活动是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元素。现在军队一般驻扎在远离城市的地方,他们的行动也不容易被普通市民见到。而奥匈帝国的军队就驻扎在帝国的大小城镇。他们在广大市民的注视下操练,他们的仪表也成了纪律和高雅的标准。

75

在帝国的旧制度中,军队似乎最有民主的氛围。军官职位几乎对各个阶层的全体民众开放。军官之间相处融洽,团结一致,不会顾及彼此的社会背景。大部分人在私下交谈时用亲切的“Du”称呼对方,暗示着在王权下每一个人都是高贵的人,地位平等。军官得到认可和建立威望主要依靠个人表现。不过,要想晋升军衔,必须先进军事学校(Kriegsschule)学习,而要取得入学资格,人脉广泛是必不可少的。这时旧贵族就有一个天然的优势,而犹太人的出身却是一个障碍。²⁶

关键在于,多数出身低级贵族或中产阶级的充满抱负而又才华出众的年轻人,对于军旅生涯都会感到顾虑重重。中学毕业的男生可以自愿从军一年,以便取得后备士官的资格。几乎所有男生都这么做,因为参军是一种荣誉,对于将来求职(不管哪个行业)很有帮助。许多人在中学毕业后直接参军,然后再读大学。也有

76

些人像米塞斯那样,读满两年大学再去当兵,因为兵役可以让他们紧张的学业获得一个休息。他们在军队待满一年,通过一个很容易过的考试,证明他们已经具备担任军官的能力,就可以获得后备士官的军衔。

米塞斯热爱他的国家,为能穿上帝国与皇家军队的制服而感到骄傲。但是他从来没有夸耀或者谈论他从军一年的细节。总体而言,这段日子对他来说似乎挺没劲。

这也是他一生中的伤心时刻,其标志是三位亲人的悲惨去世。米塞斯最后几次见到父亲,其中一次是在他的叔叔费利克斯的葬礼上。虽然他对叔叔的去世感到难过,但与同年晚些时候父亲去世带来的痛苦相比,那就不算什么了。阿瑟·冯·米塞斯遭受胆囊疾病的困扰已有多多年,只能定期求助医疗减轻痛苦。1903年夏天他的兄弟去世之后,阿瑟和妻子来到卡尔斯巴德(Karlsbad,波希米亚一座著名的温泉城市。——译者注)。但到9月份,他的病情迅速恶化了。他们前往哈尔伯施塔特(Halberstadt)寻求治疗,10月1日做了手术,当天便去世,享年49岁。路德维希在四天后参加了他的葬礼。

77

就在葬礼前一天,10月4日,二十三岁的魏宁格尔自杀身亡,令他的朋友凯尔森和米塞斯深感惊愕。自杀是当时的时尚,特别是在年轻人中。就连鲁道夫王子——哈布斯堡帝国的王储,也在1889年自杀。魏宁格尔寻求一种戏剧性的退场。仅仅半年前,他刚出版《性与性格》第一版。他租赁了贝多芬去世时住的房子,就在大师的钢琴前举枪自杀。



米塞斯在帝国与皇家
第30野战炮兵团服役

菲利波维希的研讨会

20世纪初,大多数德意志经济学家都对教授经济学理论抱有轻蔑态度。他们认为政治经济学,就一门科学而言,其实属于历史学科(“历史主义”)。米塞斯回

忆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想起了他的老师格林贝格：

那时，1900年左右，历史主义(historicism)正处于全盛时期。人们把历史方法视为研究人类行为的唯一科学的方法。历史政治经济学家(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ist)站在历史启蒙的顶峰，带着不言而喻的厌恶，俯视着“正统的独断论者”。²⁷

这个学派的许多成员都有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他们公开呼吁实行更多的政府干预。有些人甚至鼓吹完全废除私有产权。这种态度为他们赢得了“讲坛社会主义者”(Kathedersozialisten)的称号。²⁸随着普鲁士人主导的德意志中央国家的建立，讲坛社会主义者开始流行并在德意志帝国的大学里占据了支配地位。他们政治地位的上升似乎已经不可阻挡，这也提高了他们在这个学科的前沿阵地的声誉。²⁹到了世纪之交，他们几乎已经垄断了德意志帝国的政治经济学教职，奥地利也即将陷落。米塞斯最初两年的主要导师格林贝格也是其中一员；事实上，维也纳大学之所以把他请来，就是为了提升政府科学的教学与研究水平，达到学术前沿——也就是说，达到其他德语大学历史学派的标准。

78

维也纳大学聘任格林贝格是个可怕的错误。由于职位空缺，其他教职员——除了两位是经济学家，剩下的都是律师——不得不选择了这位新同事。这些人不太可能把这个职位授予一位“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解释说：

他们必须在“奥地利学派”和德国大学讲授的所谓的“现代”历史学派这两个思想对立的学派之间做出选择。即使政治上的和民族主义的先入之见没有干扰他们的判断，他们也难免会对一种被德国的大学教授特别称为奥地利式的思想带有几分怀疑。过去从来没有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起源于奥地利。1848年革命后，直到根据德国大学的模式重组之前，奥地利的大学都是贫瘠的。对于不熟悉经济学的人来说，一种学说如果加上“奥地利”这个谓语，那就带上了强烈的反宗教改革运动和梅特涅治下的黑暗时代的暗示。对于一个奥地利知识分子，没有什么比让奥地利再度陷入旧日时光的精神愚陋更具灾难性了。³⁰

79

格林贝格的研讨班强化了米塞斯自己少年时代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认为，一个好的政府是经济与社会开明管理的第一推动力。米塞斯是在一个人们几乎无

限信任国家能够促进社会不断发展的氛围下成长起来的。这种国家信仰同时也伴随着对个人和社团的不信任——不相信他们能够达到政府行为的标准。他后来回忆说：

到 1900 年前后，德语国家的每一个人，不是国家主义者（干预主义者）就是国家社会主义者（state socialist）。人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一段糟糕的历史时期，幸运的是，它已经永远结束了。未来属于“国家”。国家应该接管所有可以征收的企业。其他那些也应予以一定方式加以管制，以免商人剥削工人及消费者……我刚进大学的时候，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国家主义者。³¹

80 绝大多数反对这类国家主义观点的理由是基于道德，面对官僚主义的侵占而捍卫个人权利。这些意见无人理会。因为它们无法拒绝合乎功效主义标准的政府干预——尤其因为 19 世纪如此之多的自由主义者自己也以功效主义作为他们的社会政策基础。显然，个人的私利不应阻碍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米塞斯开始研究法律时，他已经成了国家干预主义的支持者。他相信政府有能力解决各类社会问题，因此，他急于展开关于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的危害的科学研究。

然而，说来也巧，维也纳大学的法律与政府科学系正好就是一些直言不讳地反对历史主义和讲坛社会主义的学者的大本营。这些学者否认经济问题只能运用历史方法加以研究。他们建立了理性的经济理论，认为这是理解一些特定的经济现象——例如价值、利息、货币、收入等等所不可或缺的。这个学派最重要的理论家，是一位名叫卡尔·门格尔的人。

1871 年，门格尔出版了一本题为《国民经济学原理》（*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的著作。在这本书中，他开创了价值理论的边际主义方法——这是直到今天仍在使用的标准分析方法。凭这本书，他在维也纳大学获得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教职，随后一直在此讲学，直到 1903 年春天。19 世纪 80 年代，门格尔与古斯塔夫·施穆勒展开了一场关于历史方法和理论方法各自优点的激烈争论，由于这场争论，他在学术界名声大噪。随着争论的内容逐渐传播开来，这场“方法论之争”（*Methodenstreit*）导致德语经济学界分裂成了两个阵营：历史学派和后来以奥地利学派之名为人所知的学派。

81 到了世纪之交，大约二十位奥地利政治经济学教授成了门格尔的追随者，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³² 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两位姻亲兄弟：一位是欧根·冯·庞巴维克，曾四次出任奥地利财政部长，并担任因斯布鲁克大学（University of

Innsbruck) 政治经济学教授;另一位是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他是布拉格德意志大学(German University of Prague)政治经济学教授,并于1903年接替了门格尔在维也纳大学的职位。还有一位追随者是欧根·冯·菲利波维希,维也纳大学的正教授。虽然他不是一位重要的奥地利学派理论家,却是出色的教师。他的教材是当时最成功的德语经济学教材。这本教材几乎单枪匹马地抵挡住了历史学派排山倒海般的攻势,从而保证了经济理论教学在德语世界仍有一席之地。³³

米塞斯就读大学的最初几年正好与门格尔教学生涯的最后几年重叠,不过,在学习的第一阶段,米塞斯没有听过门格尔的课。后来当他服完兵役回到学校,开始第二阶段学习之时,门格尔已经退休,过着清幽的学者生活。不过很有可能,米塞斯听过1903年10月26日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接替门格尔职位的就职演讲。在这个演讲中,维塞尔试图扩展门格尔的货币理论,对货币价值及其在时间中的变化作了独到的分析。³⁴ 讲座的风格和内容截然不同于政府科学专业的学生过去在格林贝格研讨班上所听到的。维塞尔是一位纯粹的理论家,这么说的意思是,他的思想完全不涉及格林贝格那种繁重的资料研究。不过维塞尔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说家,他的讲座可能就是促使米塞斯深入了解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的重要事件,米塞斯是在两个月后开始读这本书的。不管如何,这次讲座以各种方式构成了米塞斯后来研究货币理论的基础和起点,其中细节,我们会在下文看到。

82

米塞斯参加了菲利波维希的政府科学研讨班,他在这个班上认识并结交了埃米尔·莱德雷尔(Emil Lederer),此人后来成为德国顶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这个研讨班成了那些最有激情的社会改革者的集会场所。菲利波维希的助教费利克斯·索马里可能是个例外,当时他已接受激进的自由市场观念。³⁵ 菲利波维希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他的思想兼具经济学上的门格尔主义倾向和政治上的干预主义立场,并以此著称。在所有倾向讲坛社会主义的学者中,他的著作具有最彻底的经济理论基础,米塞斯后来称赞他是历来坚持第三条道路政策的最彻底的理论家。“历史,”米塞斯这么说的时侯,并不含有讽刺意味,“会在菲利波维希身上看到一位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最杰出的拥护者,社会改革精神的典型代表”。³⁶

83

欧根·菲利波维希·冯·菲利普斯伯格(Eugen Philippovich von Philippsberg, 1858—1917)是旧奥地利一个军官世家的后代。他在格拉茨、维也纳、柏林和伦敦上过学,后来在门格尔指导下取得了任教资格(Habilitation)文凭,很快成了弗赖堡大学(University of Freiburg im Breisgau)的终身教授。1893年,他回到维也纳,担任政治经济学和公共财政的正教授。菲利波维希活跃于各种政治社团,几年后在大学和政坛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很年轻,曾是施穆勒式方案的热情拥护者,鼓

吹经济学中的历史主义和政治上的高度政府干预。不过,在门格尔和庞巴维克的影响下,他在弗赖堡期间开始重新考虑经济理论和经济自由主义的问题。这次反思的结果,我们可以在他的三卷本《政治经济学概论》(*Grundriss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的第一卷看到,这一卷是关于一般经济理论的。在这里,菲利波维希使经济理论服务于政治观点,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不过,他的国家主义色彩虽然弱于正式的讲坛社会主义,但也仍然主张广泛的政府管制。



欧根·菲利波维希·冯·
菲利普斯伯格肖像

84 回到维也纳后,他立即加入了维也纳费边社(Vienna Fabians)。³⁷这个团体举办各类公开会议和讨论,促进为“社会”事业服务的政府干预思想,这些事业主要是关于支持贫困工人阶级。菲利波维希的个人品格和精神气质使他成为维也纳费边社的核心人物,也使他们的影响力扩大到学者和商人中间。这些活动非常成功,以至费边社的思想最后纳入了奥地利所有政治党派的政治纲领之中。

菲利波维希也给他的研讨班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课堂上,社会政策问题是一个中心议题。学生往往不加考虑地直接支持各种社会福利方案,而菲利波维希则一遍又一遍地把他们拽回到有关政府干预之理论基础的讨论上来。他清楚地意识到,对于我们众所周知的那些信念的情感诉求或引证,并不足以证明通过公共组织实施压迫和强制的正当性。他督促他的学生为干预主义提供科学的论证,不断提出他们未曾考虑过的问题——这些问题他本人也没有找到恰当的回答。³⁸他在这些交流中的做法令人难忘,尤其是在那些最挑剔的学生眼中。米塞斯曾经这样提到菲利波维希研讨班的课堂氛围:

85 在这里,他可以提出自己的质疑而不至于遭到误解。在这里,他不是那位著名作者,以其已经结束、完成、明显不可动摇的论断呈现给他的读者。在这里,他向我们展现出了他的真正本性——一个艰苦搏斗、追求知识的思想者和探索者。³⁹

事实上,菲利波维希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政府干预措施可能引起不可预知的

后果。在他就任大学校长的演讲中,他警告说:

也许你们当中谁也没有这样痛苦的经历,有时甚至无法原谅那些满怀好意的人,关于他们的行为,我只能说:我从圣坛引来纯火,但我点燃的却不是纯净的火焰。⁴⁰

但是,这些经历并未动摇他的信念:政府干预是必不可少的。不管自由主义取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就——这是菲利波维希在课堂上和其他公共场合赞扬过的——仍然需要政府干预。他强调说,正是由于自由主义,欧洲人口数量才有可能在19世纪内从1.87亿增长到3.93亿,同时还提高了大众的生活水平——这是史无前例的飞速发展。他甚至认为,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在弘扬人性方面所做的都不及自由主义,唯一可能的例外是基督教对人的尊严的承认。他盛赞了自由主义在政治和经济事务上的解放力与创造力,然后话锋一转,指出唯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应该避免全面的个人自由。

自由体制激发出来的经济力量——规模庞大的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加上它所带来的个人价值和活力,构成了我们已经无法离开的生活的零件。

我们的现在和未来,都不可能摒弃经济自由之产物:多产的原创精神和经济组织的力量。该问的是,承认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是否必然意味着也要容忍不受限制的自由主义带来的最终后果,也就是说,坚持经济自由原则是否等同于接受个人主义的社会秩序。⁴¹

86

菲利波维希认为,我们可以享有个人自由的一切优势,同时根据具体情况弥补它的缺陷。他指出了需要实施这类弥补措施的特定领域,认为不受限制的个人主义将会导致社会解体,而且个人的利益并不总是符合社会整体的利益;还有,不受限制的经济自由可能造成垄断从而摧毁自身的基础。政府干预对于抵消这些缺陷是必要的。⁴²

菲利波维希的研讨班是对维也纳这些热切的年轻社会改革者们的重要训练,米塞斯就是其中一员。菲利波维希并不否认传统的经济自由之有效,他也确信他的学生都很熟悉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历史。这可能是他们大部分人愿意接受的那种程度的自由主义。但对米塞斯来说,研讨班却把他带到了意想不到的方

向,这个方向最终彻底地改变了他的学术道路,也改变了他的整个人生。

一位经济学家的诞生

大约在1903年的圣诞节,米塞斯第一次读到门格斯的《国民经济学原理》,这时他刚获得士官军衔,回到学术研究不久。这次思想邂逅永久地改变了他对科学和世界的看法。

米塞斯后来强调这本书“把我变成了一名‘经济学家’”⁴³——具体而言,就是让他对政府行为的益处产生了怀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事实上就是要去理解政府的局限。经济学家必须明白,政府不是全能的,它所宣称可以做到的事情,并非都能做到。今天,大部分职业经济学家可能拒绝这个界定,这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学家的职业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以至于现在的经济学家和他们战前的前辈除了头衔之外已经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不管如何,米塞斯理解了经济科学的实践本质,也即以下洞见:自由企业和个人的自愿联合优于国家强制推行的方案。他的这一理解延续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和伟大的18世纪和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économistes)的传统。

在1904年的维也纳,米塞斯独自一人走上了这条新的道路。阅读门格斯《国民经济学原理》的经历,使他远离了他的那些同学、教授,还有后来的同事。他的探索充实了自己的知识和精神世界,却也令他变得形单影只。二十五年后,弗朗茨·魏斯(Franz Weiss)仍然清楚记得米塞斯当年是怎样突然抛弃了与他以及其他小伙伴们共同的理想。魏斯警告年轻的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不要追随米塞斯,不要为了自由主义的陈旧教条而背叛“社会价值”。哈耶克推测说:

假如卡尔·门格斯没有早早步入垂暮之年,庞巴维克未曾英年早逝,米塞斯也许可以获得他们的支持。可是唯一一位尚在人世的老一辈奥地利学派学者就是我敬爱的老师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他却更倾向费边主义——他相信自己对边际效用理论的改进已经为累进所得税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证明,并为此感到骄傲。⁴⁴

阅读卡尔·门格斯并未立即造就《人的行为》的作者。米塞斯身上的国家主义是根深蒂固的:他在童年时代的早期就接受了国家主义,后来又在格林贝格和菲利波维希的研讨班上有意识地加以应用。他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持有共同的基本信

念：政府干预必定是有益的，而自由市场最多只是偶然如此。

门格斯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彻底改变了米塞斯在社会问题分析上的看法。门格斯的著作表明，个体消费者价值在市场上是至高无上的，因为它们不仅决定了消费品的价值，也决定了全部生产要素的价值。消费者通过购买支出掌控着整个市场体制的方向；资本家—企业家只是实现（或预期）消费者的愿望。市场并非偶然有益，而是必然如此。它是极其公正而优雅的。因此，所有政府干预必须经过慎重考虑，才能被容许中断市场秩序。

米塞斯费了一些时日，才得以消化门格斯的想法，分析它的优缺点，思考它的实践含义。他无法直接跳开以前的国家主义信念，彻底接受放任自由主义。而这正是门格斯著作的主要目标。米塞斯并非勉强承认门格斯理论的优点。从幼年时起，他就已经对纯粹历史方法产生了怀疑。他有一种强烈兴趣要从历史研究中得出实践教训，但又不知道怎么做。他在中学的时候读过的历史学派著作似乎也没解决这个问题。⁴⁵在格林贝格研讨班上学习的那段时间，他终于开始确信历史学派的拥护者的确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后来，他总结了历史学派的失败：

89

历史主义强调得对：为了了解人类事务领域的某些事情，我们必须熟悉它的发展路径。历史主义的致命错误在于，相信对历史本身进行分析就能昭示未来行动必须采取的策略。历史记载所提供的只是相关情形的描述，但是人的应对却依赖于行为的人赋予它的意义，依赖于他想达到的目的，也依赖于他为达到目的而选取的手段。在1860年，合众国的许多州还保留着奴隶制。纵使写奴隶制通史或美国奴隶制专史的作者如何谨慎忠实，也无法得出美国将对奴隶制采取的政策。福特着手批量生产的前夕，他所了解的汽车制造及营销情况，并没有昭示在此项业务内应该怎么办。⁴⁶

90

我们根本无法通过历史调查获得实践指导。只有门格斯主义的理论可以做到这点。但是，从理论开始，进而支持某种似乎是从门格斯主义的假设推出的政治方案，中间还有好大一步。米塞斯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慢慢克服了自己的偏见。他的政治激进倾向表明这个克服的过程一直延续到了他生命的晚期。他回忆起那个开端：

我直到上大学的第五学期，才开始怀疑干预主义的无上权威。菲利波维希教授指定我展开一个关于居住条件的调查。接下来的那个学期，勒夫勒

(Löffler)教授在他的刑法研讨课中要求我研究影响家庭佣人的法律沿革,当时,家庭佣人仍然遭受雇主的体罚。对我来说,事情显而易见:劳动阶层境况的任何提高都得益于资本主义,而社会立法却常常带来其创制者始料不及的相反结果。

不过,只有当我深入研究了政治经济学之后,才开始理解干预主义的真正本质。⁴⁷

91 两年后,他对劳工组织已经持有相当负面的看法。根据法律,议员开会期间禁止在国会前举行游行示威,然而1905年11月28日,他目睹25万工会会员践踏了这条法律。那个夜晚,他的朋友奥托·鲍尔兴高采烈地吹嘘这场无产阶级的胜利。米塞斯认为这是无政府主义。如果再来一个群众组织同样起来打破法律,该怎么办?岂不是要引发内战吗?鲍尔嘲笑了米塞斯的问题,觉得他的想法暴露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未来属于社会民主主义。⁴⁸

这是米塞斯从国家主义转向自由主义的早期,这个时期的情况,在他为菲利波维希研讨班写的题为《奥地利工厂立法的历史》的长篇研究报告中可以读到详细的描述。米塞斯在1904年或1905年初提交了这篇论文,随后发表在庞巴维克的杂志上。⁴⁹在这篇文章中,米塞斯指出,奥地利有组织的童工是国家的产物。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皇统治时期,为了消灭“懒惰、贫穷和罪恶[性行为]”而形成了强制童工制度。如此国家可以一举多得:把大街上的孩子赶走——表面上是为了孩子的利益,顺便可以促进大规模生产,减少公共福利开支。

因此,许多工厂主滥用这一规定也就不足为奇了。1785年,约瑟夫二世皇帝视察了特赖斯基兴(Traiskirchen)镇的一家工厂,工厂的情形使他深受震动,于是下令通过立法改善儿童的悲惨处境。米塞斯骄傲地指出,皇帝的命令要比英国《道德与健康法案》(Morals and Health Act)早十六年,但他也强调市场并非问题的根源。儿童的悲惨处境不是因为工厂主的企业家功能,而是因为缺乏契约关系。后来建造的儿童宿舍(Kinderhäuser)是孩子下工之后待的地方,米塞斯评论了这种宿舍带来的压迫:

92 儿童宿舍也许为青少年提供了比父母的房子更好的食宿条件,但是也把他们完全置于工厂主的控制之下。这种法律关系,我们可以解释为工资合同,但这只是从正式的角度来说;它的本质,其实更接近于奴隶制。⁵⁰

虽然这些事实并不支持关于政府在童工问题上所起作用的主流观点,米塞斯仍然没有打算否认奥地利政府能够改善儿童的处境。他狠狠地批评了一篇赞同童工自由市场的报告,认为那是“充满偏见”和“言过其实”的,尽管他也没有提出一个相反的论据。⁵¹最后他总结说,他要为“进步的”约瑟夫二世皇帝欢呼,因为他开启了社会政策的时代:

我们在这部法律(约瑟夫二世的法案发布于1785年11月20日)中最先遇到的双重见解——从卫生和道德的角度来看工厂劳动对儿童具有极其不利的影响,而这些弊病只有通过国家干预以及国家不间断的管制才有可能根除——成了现代社会政策的出发点。⁵²

我们可以在青年米塞斯的思想中看到那些不容置疑的假说的残留。但他已经学会了第一步:怎样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这一转变表现在他对政府行动之局限的日益严厉的分析。但是这种态度无法赢得那些知名学者的赞同。当他通过第二次和第三次“国家考试”时,他的法律科目成绩优异,政府科学却很一般——差到足以延缓他在主要学术兴趣领域的抱负。到了1906年2月20日,他已经通过了法学、政治科学和普通法律的考试。这样他就取得了“教规与世俗法律博士”(doctor juris utriusque)学位。他的母亲为他感到骄傲,朋友们则可能取笑他的“米塞斯博士”头衔——因为古斯塔夫·西奥多·费希纳曾用这个笔名发表过一些攻击19世纪早期德国唯物主义的讽刺文章。⁵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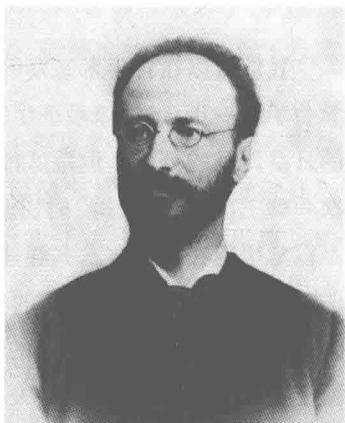
93

追随大师

米塞斯思想发展的关键成长时期,始于1905年夏季学期,当时欧根·里特尔·冯·庞巴维克在维也纳大学开设了一个研讨班,“庞巴维克研讨班的开幕是维也纳大学校史和经济学说史上的重大事件”。⁵⁴庞巴维克是卡尔·门格尔最得意的门生,他以一部讨论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的两卷本著作《资本与利息》(*Kapital und Kapitalzins*)成为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他是因斯布鲁克杰出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也曾四次出任财政部长。退休后,五十五岁的庞巴维克回到了他的母校,而学校专门为他在政府科学系设立了一个特别教职。接下来的九年,维也纳大学拥有三位德语世界最优秀的经济理论家:庞巴维克、维塞尔和菲利波维希。那个时期,是奥地利经济学教育的高点。

庞巴维克是一位杰出的教师,也是一位思维敏捷、谈吐清晰的大师。他的名声吸引了奥地利所有地区和国外的优秀学生。但把这些学生留下来的(常常待到毕业之后几年),是他那异常犀利的头脑,在他那里,最棘手的经济学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他的许多学生是奥地利学派的批评者——尤其是对他的著作,但庞巴维克一无所惧、不厌其烦地接受、检验、讨论所有摆在面前的论据,一遍又一遍地演示奥地利学派方法的应用。

第一个夏季学期就为整个研讨班定下了调子。庞巴维克花了整个学期讨论卡尔·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缺陷,并与才华横溢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尔展开广泛的辩论。年轻的鲍尔是社会党议会代表团的书记,他在奥地利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都有一套。他的书记职务的主要责任是解释社会党的当前路线,为其提供辩护。鲍尔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老练辩手,曾在学术圈内和学术圈外的无数场合试图捍卫马克思的观点。他还是社会主义期刊《战斗》(*Der Kampf*)的编辑,正在撰写一部即将为他博得广泛赞誉的学术著作,准备讨论奥地利政治的一个紧迫问题:多瑙河国家内部各个族群群体的共存。⁵⁵鲍尔是值得庞巴维克认真对待的辩论对手,但也仅此而已。鲍尔发现他根本就不可能提出这位老大师没有考虑过的论点。两人的碰撞给班上其他学生留下了特别的感觉:他们曾经拥有跟随一位真正大师学习的特别恩典。



欧根·里特尔·冯·庞巴维克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也是毕业之后继续参加研讨班的学生之一。虽然他在所有问题上都很有批判精神,但在庞巴维克面前仍然不禁感到敬畏。半个多世纪后,这位著名的《人的行为》的作者庞巴维克《资本与利息》新英译本出版之际曾这么说:

毫无疑问,庞巴维克的著作是对现代经济理论最卓越的贡献。这是每位经济学家必读并且还应带着最大的耐心仔细加以揣摩的一本书……虽然庞巴维克的伟大著作“只是理论”,没有触及任何实际应用,却仍然是西方生活方式对抗苏联破坏主义的伟大斗争的最强有力的精神武器。⁵⁶

庞巴维克的研讨班极大地加强了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的影响。在庞巴

维克的指导下,米塞斯更加系统地钻研经济理论文献。他开始了一项新的研究,基于这项研究,他写出了生平第一部伟大著作,一部关于货币与银行的著作。⁵⁷

这是一段学徒时期。米塞斯继续一点一点地摆脱国家主义偏见,熟悉19世纪英国和法国思想中货币分析的伟大传统。他开始发表关于货币和银行问题的论文,这些论文显示,他对政府在这一领域作用的想法正在变化。有些早期的观点也许会让仅仅通过《人的行为》和《货币与信用原理》了解米塞斯的读者大吃一惊。例如,在1907年关于奥地利汇率管制动机的一篇论文中,米塞斯强烈支持暂停现金兑换的政策,以便中央银行可以“区分对黄金的所谓合法需求和非法需求”,因为“如此一来便有可能保持维也纳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低于柏林和伦敦的水平”。⁵⁸

96

此时距他成为那位著名的“毫不妥协地反对所有政府干预政策”的学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正如他的早期论著表明的,他并非任意地或因为对其他看法的无知而采取了后来的观点。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能够成为他的时代最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完全是因为他在自己身上克服了那个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世界观的制约。“时代精神”(Zeitgeist)顽固地钳制着他的情感和直觉,却无法压制他的意志追随理性勇往直前,不管这条道路通往哪里。

* * *

在学生时代的最后几个月,米塞斯目睹了一次巨大的政治地震,此事预示着一个更加致命的时刻即将到来。

在亚欧大陆的东端,远离维也纳的地方,俄罗斯出乎意料地在一场战争中败给了日本。这场战争一举粉碎了莫斯科在远东的野心,整个欧洲突然发现,俄罗斯的力量即将调转枪头,对准西部边界。不过,更让人吃惊的是,这场失败显示了俄罗斯君主政体摇摇欲坠的艰难处境。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街头发生了暴乱,1905年10月31日,沙皇妥协了。在一份令人吃惊的《十月宣言》中,沙皇尼古拉二世承诺为俄罗斯制定一部宪法并选举一个议会。

97

维也纳和整个欧洲都为这一幕感到震惊,人们本来以为俄罗斯是世界反动势力最大的堡垒,现在却目睹了社会主义者的煽动如何侵蚀了俄罗斯的权力结构。11月1日,社会民主党在奥地利议会宣读了尼古拉的《十月宣言》,随后开始唱起《马赛曲》。维也纳工人涌上了街头。11月2日,米塞斯看到成千上万人沿着维也纳环城大道游行。游行队伍与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一天后,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提出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实行男性公民普选。

骚乱没有平息,也不只是发生在欧洲各国的首都。以后几年,新的革命将会动

摇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旧政权。一位维也纳市民后来回忆当时的革命氛围：

这些事件改变了当时欧洲社会的普遍意识，下一代人恐怕很难想象这种变化的深度。直到那时，君主制、国家主义和资本主义秩序还没有遭到怀疑。它们是不可动摇的。但是一夜之间，一切都变得成问题了。⁵⁹

新的困境也有一个正面效应，那就是皇帝终于被迫正视匈牙利的问题了。许多年来，匈牙利地主阶级的统治派系一直施压试图修改 1867 年奥匈协议。他们特别要求允许匈牙利军队放弃以德语为命令语言，要求匈牙利建立自己的中央银行，同时还要求通过国内关税使匈牙利从经济上脱离帝国其余部分。随着弗朗茨·约瑟夫批准给予帝国所有地区平等的投票权，这些匈牙利权贵的日子到头了。1907 年 1 月 30 日，基于社会阶层的奥地利议会 (Kurienparlament)——这一体制安排保证了权贵集团拥有多数议席——在它成立四十六年之后被废除了。1907 年 5 月 11 日，根据新的法律举行了第一次普选，选举结果是 (516 位中的) 86 位社会主义代表进入了议会下院 (Abgeordnetenhaus)。

注 释

1. “学术自由”这一说法事实上译自德语。参见 Erik von Kuehnelt-Leddihn,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Ludwig von Mises*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99), p. 3。

2. 教授的聘任必须经过皇帝批准，一如其他高级官员。参见 William M. Johnston, *Vienna, Vienna—The Golden Age, 1815–1914* (Milan: Arnoldo Mondadori, 1981), p. 97。

3. 关于维也纳大学，参见 Rudolf Kink, *Geschichte der kaiserlichen Universität zu Wien*, 2 vols. (Vienna: Gerold, 1854)；Franz Gall, *Alma Mater Rudolphina 1365–1965—die Wiener Universität und ihre Studenten* (Vienna: Austria Press, 1965)。

4. 他的教授职位全名是“警察与财政科学讲席” (*Lehrstuhl für Polizei und Kameralwissenschaften*)。关于索南费尔斯，参见 Robert A. Kann, *A Study in Austrian Intellectual History: From Later Baroque to Romanticism* (New York: Praeger, 1960), pp. 153ff.；另见 Hans Tietze, *Die Juden Wiens* (Vienna & Leipzig: Tal, 1933), pp. 107ff。

5. 这两个阶段的划分，与我们现在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学制是两回事。屈内尔特-莱丁指出，在米塞斯的年代，欧陆大学没有本科——“它们完全就是研究生院”。Kuehnelt-Leddihn,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Ludwig von Mises*, p. 3。

6. Rudolf Sieghart, *Die letzten Jahrzehnte einer Grossmacht* (Berlin: Ullstein, 1932),

pp. 115ff.

7. Kuehnelt-Leddihn,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Ludwig von Mises*, p. 3.

8. 在世纪之交,有数十万捷克人居住在维也纳。参见 Johnston, *Vienna, Vienna*, p. 200。

9. Ludwig von Mises, *Erinnerungen* (Stuttgart: Gustav Fischer, 1978), p. 13.

10. 在他学习的最初阶段,似乎也上过卡尔·西奥多·冯·伊奈玛-斯特内格(Karl Theodor von Inama-Sternegg)的中世纪经济史课程。伊奈玛-斯特内格是卡尔·门格爾的老对手。1879年,当时还在洛伦茨(Lorenz)领导下的法律与政治科学系曾经支持他出任政治经济学教授,最后这一职位由门格爾获得。伊奈玛-斯特内格是彻头彻尾的经济史学者。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9世纪晚期至16世纪的德意志经济史。参见 K. T. von Inama-Sternegg, *Deut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4 vols.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879-1901)。

11. Mises, *Entwicklung des gutsherrlich-bäuerlichen Verhältnisses in Galizien (1772-1848)*, Eduard Bernatzik and Eugen von Philippovich, eds., *Wiener staatswissenschaftliche Studie* 4, no. 2 (Vienna & Leipzig: Deuticke, 1902): vi + 144. 在他之后,他的一些同学和朋友也在这套丛书中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例如, Karl Pribram, *Der Lohnschutz des gewerblichen Arbeiters nach österreichischem Recht* (1904); Hans Kelsen, *Die Staatslehre des Dante Alighieri* (Vienna: Deuticke, 1906); Alfred Amonn, *Objekt und Grundbegriffe der theoretischen Nationalökonomie* (Vienna: Deuticke, 1911)。

12. 参见 Georg Knapp, *Die Bauernbefreiung und der Ursprung der Landarbeiter in den älteren Teilen Preussens*, 2 vols.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887); 另见 Knapp, *Die Landarbeiter in Knechtschaft und Freiheit*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891)。这个克纳普与今天以《货币的国家理论》(*Staatliche Theorie des Geldes*)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05)为人所知的经济学家克纳普是同一人。我们将在讲述米塞斯货币理论的时候讨论他的著作。

13. 参见 C. Grünberg, *Die Bauernbefreiung und die Auflösung des gutsherrlich-bäuerlichen Verhältnisses in Böhmen, Mähren und Schlesien*, 2 vols.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893-1894)。

14. 多年以后,一位名叫列奥·菲施曼(Leo Fishman 或 Fischmann)的年轻人写了一篇论奥地利中部(*Innerösterreich*)农民解放的文献。参见菲施曼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50年11月11日;Grove City Archive: "F" file。

15. Mises, *Notes and Recollections* (Spring Mills, Penn.: Libertarian Press, 1978), p. 6.

16. 在东加里西亚(伦贝格附近地区),罗塞尼亚人占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二,然而贵族几乎全是波兰人。参见 Isabel Röskau-Rydel, "Galizien, Bukowina, Moldau," in idem, *Deutsche Geschichte im Osten Europas: Galizien, Bukowina, Moldau* (Berlin: Siedler, 1999), p. 49。

17. Mises, *Entwicklung des gutsherrlich-bäuerlichen Verhältnisses in Galizien (1772-1848)*, p. 79.

18. *Ibid.*, p. 114.

19. *Ibid.*, pp. 104f.

20. August Rodakiewicz, *Die galizischen Bauern unter der polnischen Republik: eine agrarpolitische Untersuchung* (Brünn: Rohrer, 1902)。同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发表了该书的若干结论,

参见 Eugen von Böhm-Bawerk's *Zeit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Sozialpolitik und Verwaltung* 11 (1902): 153ff。

21. Mises Archive 107: 26f.

22. *Schmoller's Jahrbuch* 28 (1): 374 - 79; 参见 Mises Archive 107: 28ff。

23. Mises Archive 50.

24. K. u. k. Divisions Artillerie Regiment Nr. 6; k. u. k. Feld Kanonen Regiment Nr. 30; Einjährig-Freiwilliger.

25. Röskauf-Rydel, "Galizien, Bukowina, Moldau," p. 70.

26. 1918 年奥地利共和国成立后,这一状况开始发生缓慢变化。急剧而彻底的转变则发生在(国家)社会主义时期:在希特勒统治下,德国军队吸收了数万“半犹太人”(混血儿)加入正规部队,其中有些甚至当了将军、舰队司令或陆军元帅——这在旧政权下是不可想象的。参见 Erik von Kuehnelt-Leddihn, *Von Sarajevo nach Sarajevo* (Vienna: Karolinger, 1996); Bryan Mark Rigg, *Hitler's Jewish Soldiers* (Lawrence: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2004)。

27. Mises, *Erinnerungen*, p. 3; *Notes and Recollections*, p. 2.

28. 这个称呼与英语中的“扶椅社会主义”(armchair socialists)相类,不过此处的“椅子”是指欧洲大学体制中的正教授职位。也许“象牙塔社会主义”(ivory-tower socialists)的表述更加切题。

29. Ralph Raico, *Die Partei der Freiheit* (Stuttgart: Lucius & Lucius, 1999), p. 185.

30. Mises, *The Historical Setting of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69] 1984), p. 14.

31. Mises, *Erinnerungen*, pp. 10f.; *Notes and Recollections*, pp. 13, 16. 米塞斯补充说,他的观点只有一个方面不像他的那些同学那样错得厉害:他是“自觉的反马克思主义者”。

32. 参见门格尔致(奥地利)文化部的信,写于1902年3月19日,引自 Yukihiro Ikeda, *Die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r "Grundsätze" Carl Mengers* (St. Katharinen: Scripta Mercaturae Verlag, 1997), pp. 1f。

33. Eugen von Philippovich, *Grundriss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9th ed., 3 vols. (Tübingen: Mohr, 1911). 关于菲利波维希,参见 Mises, "Eugen von Philippovich," *Neue Österreichische Biographie*, 1st section, vol. 3 (1926), pp. 53 - 62; Ludwig Elster, "Philippovich von Philippsberg, Eugen,"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6 (1925)。另见阿蒙(Amonn)写的讣闻,载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3rd series, vol. 58, pp. 158 - 63, 以及海尼施(Hainisch)写的讣闻,载 *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159: 25 - 29。

34. Friedrich von Wieser, "Der Geldwert und seine geschichtlichen Veränderungen," *Zeit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Sozialpolitik und Verwaltung* 13 (1904); reprinted in Wieser, *Gesammelte Abhandlungen*, F. A. Hayek, ed. (Tübingen: Mohr, 1929), pp. 164 - 92.

35. Felix Somary, *The Raven of Zurich: The Memoirs of Felix Somary* (London: Hurst & Co., 1960), pp. 12f. 索马里最初受雇于卡尔·门格尔,协助他做社会学的研究。不过门格尔并不期待这些研究很快能出成果,他觉得他可能是在浪费这位优秀的年轻助手的时间。于

是让他去找菲利波维希,后者正好需要有人帮他编辑新版教材。

36. Mises, "Eugen von Philippovich," p. 60.

37. 维也纳费边社(Wiener Fabier-Gesellschaft)成立于1891年,主要人物是海尼施、佩纳斯托费尔(Pernerstorfer)和菲利波维希。

38. 这在经济学教授中似乎是非常罕见的。熟悉世纪之交经济学家圈子的米塞斯后来曾说:

普鲁士宪法冲突(1862)和魏玛宪法(1919)之间的几十年里,只有三个人理解了社会改革问题:菲利波维希、施托尔茨曼(Stolzmann)和马克斯·韦伯。这三位中,只有菲利波维希懂得一点理论经济学的性质和内容。(Mises, *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 [New Rochelle, N. Y.: Arlington House, 1977], p. 38.)

39. Mises, "Eugen von Philippovich," p. 61.

40. Ibid., p. 62.

41. Eugen von Philippovich, *Die Entwicklung der wirtschaftspolitischen Ideen im 19. Jahrhundert* (Tübingen: Mohr, 1910), p. 131.

42. Ibid., pp. 132-38.

43. Mises, *Erinnerungen*, p. 19; *Notes and Recollections*, p. 33.

44. 参见 F. A. Hayek, "Einleitung," introduction to Mises, *Erinnerungen* (Stuttgart: Gustav Fischer Verlag, 1978), p. xiv.

45. Mises, *Erinnerungen*, p. 7; *Notes and Recollections*, p. 7.

我对历史知识的强烈兴趣,使我能够及早发现德国历史学派的缺陷。历史主义并不探讨科学问题,它关注的是为普鲁士的政策和普鲁士的威权政府歌功颂德并且提供辩护。

46. Mises, *Theory and Histor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288; 着重号为后加。

47. Mises, *Erinnerungen*, pp. 13f.; *Notes and Recollections*, pp. 19f.

48. Mises, *Erinnerungen*, p. 58.

49. Ludwig von Mises, "Zur Geschichte der österreichischen Fabriksgesetzgebung," *Zeit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Socialpolitik und Verwaltung* 14 (1905): 209-71.

50. Ibid., p. 234.

51. Ibid., pp. 258ff.

52. Ibid., p. 270.

53. 例如,参见 Dr. Mises, *Beweis, dass der Mond aus Jodine bestehe*, 2nd ed. (Leipzig: Voss, 1832); idem, *Vergleichende Anatomie der Engel—Eine Skizze* (Leipzig: Industrie-Comptoir, 1825)。

54. Mises, *Erinnerungen*, p. 23; *Notes and Recollections*, p. 39.

55. Otto Bauer, *Die Nationalitätenfrage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Vienna, 1907). 关于鲍尔,参见 Norbert Leser, "Otto Bauer—Friedrich Adler—Max Adler," *Tausend Jahre Österreich*, Walter Pollack, ed. (Vienna: Verlag Jugend und Volk, 1974), vol. 3, pp. 258ff.

56. Mises, "Eugen von Böhm-Bawerk and the Discriminating Reader," *The Freeman* (August 1959).

57. 他的任教资格论文导师是菲利波维希。参见 Franz Baltzarek, "Ludwig von Mises und die österreichische Wirtschaftspolitik der Zwischenkriegszeit," *Wirtschaftspolitische Blätter* 28, no. 4 (1981): 127。菲利波维希的任教资格论文(在门格斯的指导下)讨论了英格兰银行的成就。参见 Eugen von Philippovich, *Die Bank von England im Dienste der Finanzverwaltung des Staates* (Vienna: Deuticke, 1885); 英译本 *History of the Bank of England and Its Financial Services to the State*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1)。另外,维塞尔的就职演讲可能对米塞斯在货币和银行问题上的兴趣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

58. Mises, "Die wirtschaftspolitischen Motive der österreichischen Valutaregulierung," *Zeit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Sozialpolitik und Verwaltung* 16 (1907): 571.

59. Sieghart, *Die letzten Jahrzehnte einer Grossmacht*, p. 74.

第二部分

奥地利学派



欧根·冯·庞巴维克



卡尔·门格尔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在米塞斯的早期岁月,他的问题意识和思想兴趣得益于四位伟大的经济理论家的著作:卡尔·门格尔、欧根·冯·庞巴维克、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和约瑟夫·熊彼特。

门格尔、庞巴维克和维塞尔是奥地利学派的化身。从19世纪末到1914年,他们的著作和文章(以及行为举止)给米塞斯在奥地利的写作提供了思想背景。米塞斯的主要贡献是试图解决这些著作提出的问题。他对未来几代奥地利经济学派学者的影响(或者,倒不如说是缺乏影响)只有在下述背景下才能得到理解:这个背景就是奥地利学派在1914年之前的奠基之作以及直到20世纪20年代在德奥圈子中维塞尔和熊彼特的杰出表现。

卡尔·门格尔:“经验主义理论”的先驱

米塞斯见过他们四位,不过,门格尔在米塞斯发现他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之前,已经从教学岗位上退休一年了。他们第一次见面大约是在1910年,此时,米塞斯正在参加庞巴维克的研讨班,并在撰写他的第一部著作《货币与信用原理》(*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如果有意从事经济学学术研究,通常都会拜访一下门格尔。门格尔会在家里,在他那令人印象深刻的藏书室会见他们,讨论这些学生的工作和研究计划。¹

102

门格尔于1840年生于新松奇(今属波兰)一个加里西亚小镇。他的父亲是律师,来自一个军官和公务员家庭;母亲出身于一个迁居加里西亚的富裕波希米亚商人家庭。门格尔的全名是卡尔·门格尔·埃德勒·冯·沃尔夫冈(Carl Menger Edler von Wolfesgrün),不过,他和他的两位兄弟——颇有影响的政治家马克斯(Max)和社会主义法学家安顿(Anton)都没有使用他们的贵族头衔。²

门格尔极具人格魅力,精力充沛。他年轻时是一位真正的博学之人,直到暮年,仍然思维活跃,不减当年。³他先在布拉格,后来又在维也纳学习法律和政治

103

学。他在维也纳大学的一位老师彼得·米施勒(Peter Mischler)是边际价值理论的拥护者,但显然那时门格尔还对经济学或者学术事业不感兴趣,他更偏爱非学术的写作。1863年,他在《伦贝格报》(*Lemberger Zeitung*)做记者。大约1864年,门格尔开始为法律和政治学博士学位做准备,通过了1865年3月的第一次考试。甚至在这个时候,由于对文学的兴趣,门格尔的学术前景也不明朗。⁴1867年3月,当通过了四次考试中的最后一次时,他还在写作几部喜剧作品。⁵



卡尔·门格尔

门格尔对写作的兴趣超过了学术。他创办了《维也纳日报》(*Wiener Tagblatt*),创刊时间是1865年11月26日。不久,门格尔开始在这份报纸上发表匿名小说《维也纳不朽的犹太人》(*Der ewige Jude in Wien*),标题有些令人反感。⁶1866年3月,他加入了另一份维也纳刊物的经济学团队,这份刊物就是《维也纳报》(*Wiener Zeitung*)。这份报纸是——

一个纯粹的政府机构,控制在部长会议手里,特别是内务部主席办公室。编辑人员都是政府选定的,官方的文章都在这些政府部门撰写,部长会议编辑、提交。⁷

104

这样,门格尔就成了一名政府雇员。这是一条终南捷径,为他提供了进入奥地利政府最高阶层的机会。⁸

政府职位带来了很高的声望,年轻的精英分子往往垂涎不已。即便是较为次要的职位,竞争也很惨烈。若想成功,就需要一个保护人(*Protektion*),即有人在政府中占据高位,能说上话,对任命产生影响。而对门格尔来说,最初可能是通过哥哥马克斯,不过他很快就学会了自己应付。

作为《维也纳报》的高级职员,他的任务之一就是撰写市场调查报告。诚如后来他告诉弟子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的那样,此时他才开始在实践中接触到价格理论。⁹他震惊于理论和现实的差异,贸易者们告诉他的那些真实的定价过程和他在大学里所学的标准教科书的解释大相径庭。通过近距离观察,他开始认为价

格最终取决于消费者的价值判断。正是这篇论文,为门格尔赢得了政府科学的任教资格(这是中欧传统大学的特许任教资格证书)。¹⁰1871年,他出版了一部名为《国民经济学原理》的著作。

在这本书中,门格尔对基本的经济现象例如经济财货、价值、交换、价格、商品和货币做了理论研究。他解释了这些现象的性质以及它们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会遵循的规律。这些当然都是一部优秀经济学教科书的应有之义。门格尔著作的特别之处,是他在解释这些现象时使用的方法。他试图追寻这些性质和规律的起因,一直追溯到那些至为简单的事实根据为止。他的目的是要证明,经济现象的性质和规律来自那些在经验上确定无疑的“人类经济的基本要素”,比如个人的需要、个人的知识、所有权和个别数量财货的取得、时间,以及个人的失误等。¹¹门格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在于确定了这些基本要素,从而分析和解释了这些要素如何导致诸如价格这样更为复杂的市场现象。他称这种方法为“经验主义方法”,以强调这与自然科学的方法是—致的。¹²

对今天的读者而言,这个标签让人困惑,因为它根本不是现代经验科学的实验方法。门格尔没有运用抽象模型,提出可证伪的假说以接受经验的检验。相反,他的方法是一种分析方法,肇始于最微末的经验现象,并以此为出发点进行逻辑推演。这把门格尔纳入了以下立场:认定市场交换和价格是宏观现象,继而解释这些宏观现象是如何由原子式的、但在经验上确定无疑的“人类经济的基本要素”引起的,这些基本要素则构成了一个微观经济世界,其中涉及个人的需要以及个人拥有和获取的边际数量财货。按照门格尔自己的语言,价格“绝不是有关交换的经济现象的最为基本的特征”,而“只是个人的经济活动之间经济均衡的表征,这些活动的附带现象而已”。¹³

正如后来的著作和通信所揭示的,门格尔充分意识到了他最重要的革新就是对这种新的“经验主义方法”一以贯之的运用,他也将这种方法称为“精确方法”(exact method)、“分析综合”(analytical-synthetic)或者“分析合成”(analytical-compositive)。在1884年2月致列昂·瓦尔拉斯的信中,门格尔批评了瓦尔拉斯的主张,瓦氏认为存在一种研究经济的数理方法。门格尔写道:

我们从问题中的大部分非常复杂的现象回溯到背后至为简单的基本要素,实在是很有必要的,这样我们就以一种分析的方法确定了那些构成这些现象也即价格的最终因素,然后根据这些基本要素的性质赋予其相对的重要性,通过对其重要性的认识,我们可以试着建立一些规律,正是基于这些规律,复

105

106

杂的人类互动现象产生于简单的现象。¹⁴⁻¹⁵

107 正是这种方式才使我们能够准确描述经济现象的本质,而非那些纯粹偶然的数量关系,这些关系仅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才适用于其他现象。谈及他的理论和他的法国通信者的价格理论之间的分歧,门格尔认为,真实生活的经验才是决定孰是孰非的唯一合法途径。一个理论的优点——

始终依赖于它在确定构成经济现象的真正因素(即那些对应于真实生活的因素),以及简单要素据以构成政治经济的复杂现象的规律方面获得成功的程度。

门格尔继续写道:

研究者通过分析方法得出一些与现实不相吻合的要素,或者,没有经过任何真正的分析,即从专断的公理出发进行研究,这种情况在所谓的理性方法下太常见了,必然误入歧途,即使他对数学的运用炉火纯青,也是如此。¹⁶

108 门格尔方法的经验主义基础和那个时代的英美方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后者是由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所开创的,它依赖于若干虚构的假定以及那些任意构造的总体概念,比如价格水平、资本家、地主和劳工等等。但门格尔的方法也和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当时占尽优势的风尚大不相同,当时德国经济学家采取的是历史学家的方法,他们把观察到的复杂现象,比如市场价格,当作分析的起点,而不是尝试去把它们解释为某些更为基本的因素的结果。

《国民经济学原理》一举打破了上述两种范式。为了发展出与真实世界保持联系的经济理论,门格尔建立起了微妙的平衡。他的著作格局宏大,也显示了边际价值原理——在早先的理论中,它的作用一直相当模糊——在经济科学中所具有的基础性和全方位的重要地位。

门格尔此书的核心是讨论价值的那章,占全书四分之一篇幅。门格尔的分析强调了价格形成的主观因素——消费者、企业家、股票市场交易商等等的个人判断,而学院派经济学家则把这些主观因素降到次要的地位,处于某些想象出来与人类感知无关的客观因素之下。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最为著名)曾经创造出一套彻底的客观主义价格理论,仅仅根据生产成本解释所有

财货的自然价格或长期价格。根据这种劳动价值理论,主观因素虽然可以导致真实的市场价格偏离“正确”的轨道,但却只是暂时的,绝不可能超出劳动客观成本的影响。因此,产品的价值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内在属性,就像重量和体积一样。它在财货自身“之内”,而非一个“来自外部”的偶然因素。

109

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也对欧洲大陆造成了很大冲击。法国大革命已经将经济研究的中心从欧洲大陆转移到了英国。拿破仑时代在遏制欧洲大陆的古典自由主义运动上尤为得力。因此,公众的注意力自然就转向了亚当·斯密,这位在依然生机勃勃的英国启蒙运动中受人崇仰的圣徒。斯密成了经济理论方面的主要权威,他取代了魁奈,把杜尔哥逼进了脚注,还让孔狄亚克变得无足轻重。



亚当·斯密



大卫·李嘉图

斯密成了政治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但在德国,却没人买他的账。德国经济学家远不像他们的西方同行那样,愿意接受斯密的思想。他们向往成为政府的雇员,因而痛恨不合时宜的政治倾向。威廉·罗雪尔(Wilhelm Roscher),一位伟大的经济思想史家,19世纪德国主要经济学家之一,说过一段著名的话:

德国人的民族特性……就是偏离英国和法国舶来的自由贸易规则,一头驶向特为政府干预而设的无数例外。¹⁷

德国教授也读亚当·斯密,甚至相当用心,但目的只是为了摆脱他的观点,认

110

为他的理论缺乏坚实的基础。他们承认斯密在这一领域的权威地位,至于斯密偏执与否,暂且不论,而对李嘉图则几乎是如弃敝屣。斯密的错误是可以商榷的,但在李嘉图的身上,他们无论如何都找不出任何科学上的优点。这种重斯密而轻李嘉图的倾向,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更加强烈,最后在如日中天的青年历史学派(Younger Historical School)的著作中达到了顶峰——他们连经济“理论”一起否決掉了。¹⁸

李嘉图在其《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创立了今天我们称为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他强调各种总量之间的关系,例如价格水平、平均工资、平均利润等,也包括一些有关社会阶层的总体概念,例如劳动者、资本家和地主。基于对这些总体变量之间关系的认识,他给出了一套影响深远的放任自由主义方案。但是,这种方法无法激起德国社会科学家的热情。自从法国的革命军队在抽象人权的红色旗帜下入侵德国,德国人就开始倾向于怀疑那些不是来自现实观察,而是源于理论的全而彻底的政治方案。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创伤,19世纪的德国历史学家、法学家和政治学家倾向于强调特定人类社会的具体条件,而不是关注整体(*en masse*)的不可观察的人性。

111 斯密有一个极为能干的鼓吹者,不知疲倦地努力推广英国古典经济学,此人就是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本身就是一部名著,在很多方面都比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更为成熟。萨伊给出了斯密主义(也许甚至包括李嘉图主义)经济科学一种公理化的阐释,极大地提高了这位苏格兰人缺乏系统的名著《国富论》的声誉。¹⁹他把英国经济学家对整个阶层或财货总量的关注进一步精炼化,将经济科学细分为宏观经济的三个部分:消费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最为紧要的是,他为古典经济学给出了一个在认识论上颇具吸引力的辩护,以表明这门科学是扎根在一般经验之中的。这种经验主义导向的方法论,更容易为欧陆学者所接受,也使他们深信,可以为李嘉图主义经济学及其政治宏图提供一种科学的依据。

萨伊是欧洲大陆推广英国经济学的核心人物,不过,他在思想上显然更多地受惠于自己本国的科学传统。²⁰到19世纪中叶,由于萨伊的努力,英国经济学已经成为欧洲和美国的学院正统。正是为了反对这一正统理论,门格尔展开了重新阐述价格形成过程的工作。

112 门格尔提出的价值理论和价格理论大量吸收了一个古老价格理论的残存思想,这一传统来自萨拉曼卡的后期经院学派,他们在16世纪和17世纪前期曾强调过定价过程的主观特性,这显然是英国古典学派未曾考虑过的。不过,西班牙后期

经院哲学家从未专门撰文探讨经济学,他们对价值和价格本质的揭示,散落于卷帙浩繁的文献之中。²¹

主观价值理论仅以这种分散的形式得以幸存,但也有一个重要例外,就是艾蒂安·德·孔狄亚克(Étienne de Condillac)的伟大著作——《商业与政府》(*Commerce and Government*)。此书与斯密的《国富论》同年(1776)出版印行,它在主观价值论的基础上给出了政治经济学第一个全面的公理化表述。但是,孔狄亚克的著作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法国的经济学家抵制此书。孔狄亚克出版此书的时候,已经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他并不认为遵循魁



让-巴蒂斯特·萨伊

奈门生的惯例有多大必要;不只如此,他还以一种独立和原创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这简直是一种冒犯,事实证明,这种冒犯足以阻碍把他的著作译成英文超过两个世纪之久。²²

尽管如此,《商业和政府》仍然是门格尔阐述他的经济价值理论时的主要灵感来源(法语是门格尔能够阅读的多门外语中的一种)。²³门格尔指出,只有当人们认识到经济财货的存在,才有价值现象,而且每个人都有关于这些经济财货重要程度的个人排序,或者用门格尔的话说就是“主观的”排序。

最重要的是,价值总是与商品的具体数量有关,也即特定情况下的“边际”单位,例如一杯水、四块面包、三颗钻石、两杯牛奶,诸如此类。价值永远不会涉及这些财货的全部有效存量,除非事实上的决策是在总量水平上展开。这一洞见是解决主观价值理论一个表面悖论的关键——这个悖论正是阻碍主观价值理论获得广泛接受的症结所在。如果一种财货的价格确实依赖于这种财货的主观重要性,那么,水对人类的生存而言至关重要,而钻石却远不及水重要,为什么水的价格远低于钻石?这一表面上的悖论对劳动价值论有利,事实上劳动价值论也是主观主义方法之外唯一的替代选择。无论劳动价值论的问题何在,至少不像它的主观主义对手那样如此明显地与现实相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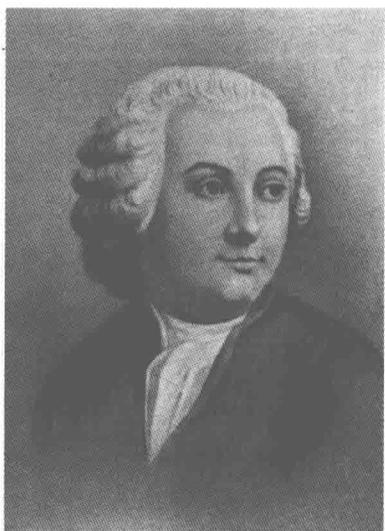
门格尔指出这一悖论只是表面的:一旦我们不再过问整个种类财货的价值,悖论就会自然消失。整个种类全部商品的价值在经济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们不属于人类决策的范围。反之,如果我们要问何种规律支配着商品具体数量的评价,

答案就会一目了然。水是如此丰富,不但可以满足最重要的人类需要(当然这也是估值最高的),而且还可以满足那些远不重要的用处,比如仅有装饰作用的喷泉之类;正是那个最不重

114

要、但仍可满足的价值,决定了每个单位水的经济价值,因此水的市场价格就比较低。相反,钻石如此稀有,可以得到的供给数量仅能满足那些最重要的需要,结果造成它们是如此昂贵。

门格尔还指出了生产要素的价值总是源于消费品的价值,舍此没有其他原因。与生产成本理论家的断言相反,一瓶酒有价值,不是因为它使用了有价值的土地和有价值的劳动生产出来;相反,土地和劳动投资于酿酒业之所以有利可图,首先是因为消费者认为这瓶酒有价值。



艾蒂安·德·孔狄亚克

最后,门格尔认为,价值的微观现象是独立于任何劳动分工的社会体系而存在的。因此,他在论价值的一章结束之后,才开始对交换、价格和货币这些宏观现象展开分析。

根据门格尔的分析,市场经济就像一个庞大的有机体,指向消费者需要的满足。不但市场价格,还有诸如货币之类的市场制度,都是一个理性秩序的组成部分,这一秩序无需政治权威的协助就可以存在并且运转下去。

孔狄亚克指出,人的需要才是一切社会制度最重要的调节阀,在某种意义上,门格尔补充了这一命题。孔狄亚克是在一种经济学的视角下作出这一论断,不过,另外一个角度更为人们所知:他的论证同样也是源于一种认识论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人的感知是由需要决定的。²⁴然而,他还缺少至关重要的边际主义的基础,正是在这一点上,门格尔建立了一个完整而彻底的新的经济科学。

115

德国背景下的门格尔著作

古代主观价值理论的一些残篇断简在19世纪德国经济论著中得以幸存。²⁵由于这一背景,人们更倾向于把这位来自维也纳的年轻经济学家视为改革者而非革命者,因而使他避免了类似孔狄亚克那样的命运。

在门格尔之前,德国各派经济学家都曾明确批评过劳动价值论,并在大体上拒绝了内在价值学说。门格尔认为价值在本质上是主观的(个人的、个别的),这在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作者中间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的确,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了解边际主观价值的原理。²⁶但是,他们的洞见仅仅是些断断续续的观察。门格尔的德国前辈没有一个认识到了边际价值的极端重要性,也没有人提出一个统一的主观主义理论。

19世纪60年代,德国的教科书中存在两个互不关联的分析层次。它们的价格理论具有典型的生产成本解释的特征,这是占据支配地位的成分;但又允许与之冲突的传统主观价值解释同时存在。²⁷卡尔·马克思大加嘲讽,对这种折中主义的公然展示进行了无情的奚落。而他的奚落是正确的。

在他的前辈的著作中,主观价值理论仅仅是些暗示,而门格尔则以一种系统的表述方式将其呈现出来,彻底革新了学界对人的需要、价值和价格之间关系的看法。他在那些最简单的事实(“人类经济的基本要素”)中寻找这些关系的原因,而这些简单事实又是可以通过经验调查了解的。基于这一系统尝试,门格尔得以在全新的基础上,讨论需要、财货、经济体系、生产、价格、收入、消费等等现象。

他与那些喜欢折中的德国前辈的分歧,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们的折中主义由于某些倾向而被强化,门格尔则避免了这些倾向。特别是,德国经济学家倾向于从事过度且常常没有意义的档案收集以及对经济现象的分类,这种倾向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氛围。君主政体的复辟以及随之而来的1815年至1848年间对自由主义的围剿,使得过于深入的理论研究变得不识时务,因为理论研究可能引发对政府限制的负面评价。正如威廉·约翰斯顿所说:“在一个禁止讨论基本原理问题的时代,学者只能埋头于资料收集了。”²⁸随着青年历史学派的崛起,经济分析的档案收集方法在19世纪末达到了顶点。正如新的德意志中央国家的许多其他学术雇员那样,他们都把自己看作“霍亨索伦王朝的思想卫士”。²⁹

门格尔一直小心翼翼回避的一个德国思想的缺陷,就是历史主义,即把经济现象的规律性视为“历史法则”的倾向——也就是说,这个法则是以时间和地点的具体环境为条件的。尽管那个时代的德国经济学家也会同意门格尔以下观点:所有经济现象彼此之间都有关联,经济科学的目的在于找出这些关联。但是,门格尔的分析却揭示了,这些联系是在所有时间和地点必然成立的法则。此外,他还指出,我们可以在不涉及具体历史背景的情况下研究这些联系。当然,他的书中也有很多关于这些一般规律的具体例证,但从根本上说,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是纯理论的一种演练。

116

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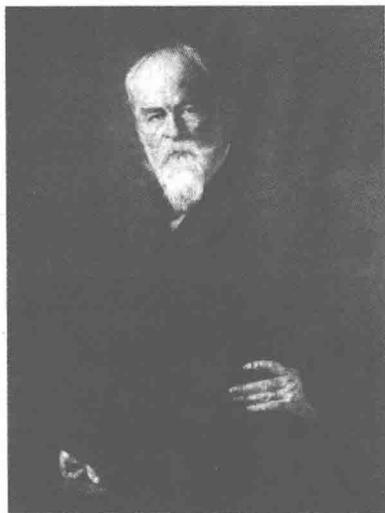
方法论之争

与此同时,在德意志帝国的大学里,一场风起云涌的运动正在兴起,这场运动的诉求与门格爾的观点完全相左,并且主张与传统的经济学方法彻底决裂。³⁰ 门格爾试图将经济理论转化为一门分析科学,而柏林的年轻激进分子则在寻求一种旨在全面推翻理论研究的努力——以历史研究完全替代理论研究。

118

这个团体的领袖人物就是古斯塔夫·施莫勒,一位来自哈雷大学的年轻教授。³¹ 施莫勒的宏伟目标是抵制放任自由主义在德国思想和实践领域不断增长的影响,这个首要目标完全压倒了他对理论和方法论的关注。他的策略是引发一场关于“社会问题”的大辩论——所谓“社会问题”,他指的是政府如何才能增进工人阶级的福利。政府能够而且应该提高工人阶级的福利,这是不容置疑的。

施莫勒通过联合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将他的方略付诸实施。这些盟友大多是大学教授和政府官员。1872年10月,施莫勒发起了第一次全国会议,邀请



古斯塔夫·施莫勒

各方人士齐聚一堂,共襄盛举,获得邀请的,都是我们认为关心[社会]问题并怀有同情和怜悯之心,并且不相信绝对的“自由放任和无为而治”(laissez faire et laissez passer)是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正确途径的人士。³²

施莫勒和另外两人是这个团体的长期领袖——一位是布雷斯劳教授卢约·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另一位是柏林统计学家恩斯特·恩格爾(Ernst Engel)。他们发起了一系列会议,发表关于罢工和工会、德国工厂法以及住房问题的演讲。

119

这些大学教授旗帜鲜明的反市场、亲政府倾向,很快为他们赢得了“讲坛社会主义者”的绰号。³³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第一次会议是在艾森纳赫召开的。同年,这里还举办了德国社会党(Sozial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的成立大会。德国社会党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因此,艾森纳赫成了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运动的

象征。现在,施莫勒的团体创立了社会政策协会(*Verein für Socialpolitik*),明确以促进新的德意志中央国家的福利政策为自己的目标。第一任主席是埃尔温·纳塞(Erwin Nasse),一位来自波恩的大学教授。施莫勒在1872年还是一个年轻人,1890年他接替了纳塞,直到1917年去世,一直留在主席任上。³⁴

协会每隔一年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另外还要召集选举产生的委员会(*Ausschuss*)。这些会议对德国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常常是直接的影响,因为协会为那些最有权势的社会集团的代表提供了一个中立的讨论平台。大学教授、工会官员、政府高官和企业家在协会里齐聚一堂,增进彼此了解,就当时的诸多议题达成政治上的妥协。强烈的实践导向在协会的出版物中也能反映出来。每卷刊物都会提出一个紧迫的社会问题,分析其症状,最后一成不变地以对政府行动的呼吁作结。拉尔夫·莱科(Ralph Raico)这样说道:

截至1914年,协会一共发行了134卷专题研究,其中大部分事实上就是
120
指控现存体制的各种缺陷和不平之处,每卷都在呼吁政府采取行动……讲坛
社会主义者的主要目标,就是在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尤其是在行政系统内部,
改变公共舆论,这个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达到了。³⁵

通过这些活动,协会成了巩固和扩展新的德国政府行政机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教授和其他公务员视自己为在各种彼此冲突的社会团体之间中立的调停人。任何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总有他们的身影,不是直接参与其中,就是居间调停。³⁶正如他们自视的那样,他们在左派和右派、民主政治和君主政体、功效主义和正义、劳工阶层和企业家之间闪转腾挪,以求政治上的妥协。³⁷他们把自己看成中立的仲裁者,因为他们总是站在新的中央政府这个更高的立场看待这些冲突,这个立场是
121
代表着整个民族的。

社会政策协会活跃的年代,正是德国政治中央集权的全盛时期。然而,从19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政府就站到了协会的对立面。协会的左翼势力不断煽动政治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甚至甘冒丧失政治中立美誉的风险。³⁸虽然施莫勒短暂地控制住了这种趋势,但是,协会的成功最终还是导致了它的陨灭。到19世纪末,协会已经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和社会领袖,其中包括马克斯·韦伯、路德维希·波勒(Ludwig Pohle)和安德烈亚斯·福格特(Andreas Voigt)这样一些原则上反对协会盲目拥护政府的著名人士——他们之所以加入这个组织,仅仅因为它在社会实践方面的重要地位而已。³⁹在马克斯·韦伯的领导下,这些人不断地与协会

当权派在政治事务的科学“论据”问题上发生冲突；一战之后，韦伯的追随者们永久地改变了协会的性质，使它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学术研究机构。

但是，在19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那些辉煌的岁月，社会政策协会尤其是古斯塔夫·施莫勒本人，彻底地改变了德语国家经济科学的前景。施莫勒也通过他与弗里德里希·阿尔特霍夫(Friedrich Althoff)的私人交情，对德国经济学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弗里德里希·阿尔特霍夫是普鲁士教育部的高级官员，1882—1907年间掌握普鲁士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的任命。不久之后情况变得更加明朗，谁要获得一个正教授职位，就必须无条件地赞同施莫勒在他的著作里详细界定的政治方案。

虽然施莫勒的主要反对目标是自由贸易运动的杰出人物，诸如亚当·斯密、萨伊和李嘉图这样的古典经济学家，但也确实有效地扼杀了任何一种经济理论在德国大学里的教学。施莫勒领导下的所谓青年历史学派，远远超出了对理论抽象的健全怀疑态度，而这种态度却是老一辈德国经济学家著作的特征。施莫勒学派直率地否认世间存在普遍的社会规律：只有一些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而变化的特定规律。政府科学的任务只是顺带研究一下这些依赖背景的规律。它的本职则是研究“正义观念”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具体含义，因为这才是“社会改革原则”的根本所在——调整现存社会制度以适应于当前流行的关于正当和正义的普遍情感。⁴⁰于是，施莫勒不断地鼓吹极端的相对主义和极端的法律实证主义，这两种学说用于支持他对全知全能的政府的信仰和崇拜，再合适不过了。

卡尔·门格尔关注施莫勒运动的发展已经有些年头。他意识到，由于青年历史学派的影响，德国和奥地利(后者完全处在德国思想轨道的范围之内)已经走上了一条彻底摧毁经济研究百年传统的道路。门格尔的第一部著作没有引起任何反响。虽然他在奥地利有一些追随者，但这部分归功于他的个人影响和学术权力。德国大学是无法攻破的。

门格尔决定对他的新方法进行系统的方法论辩护，来为将来实证经济分析方面的工作奠定基础。⁴¹这些努力的结果就是一本新的伟大著作《对于社会科学，具体而言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探究》。⁴²门格尔坚持认为，他所讨论的经济规律是现实世界的“精确”规律，而历史研究方法完全不能发现这些经济规律。

这些观点不可能不冒犯到学术当权派的历史主义情感，这种情感在门格尔那一代的经济学家中尤其强烈。事实上，虽然在老历史学派(罗雪尔、克尼斯、希尔德布兰德等人)的著作中，历史主义的论调已经颇为引人注目，但只是到了青年历史学派(施莫勒、莱克西斯等人)那里，历史主义才成为一种教条。施莫勒发表了

一篇书评,强烈抨击门格尔《对于社会科学,具体而言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探究》一书,声称门格尔未能运用恰当的历史研究证实他的分析;用今天的行话来说,门格尔已经陷入了纯理论的空转,根本缺乏“经验证据”支持他的结论。如果不是因为施莫勒试图给门格尔贴上“曼彻斯特个人主义方法”的标签,把他与名誉不佳的曼彻斯特学派联系起来进行诬蔑的话,这一攻击本来可以导向一场严肃的学术争论。⁴³

门格尔和施莫勒之间的争论,不久也把双方的弟子卷了进来,形势更趋激烈。在此期间,甚至连德国经济学界的元老威廉·罗雪尔,也对门格尔大加嘲讽。⁴⁴更多的文章和著作加入了这场集体交锋。⁴⁵辩论双方剑拔弩张、意气用事,这种情况很不寻常,这可能是因为对施莫勒来说,任何一种经济理论都是在为资本主义提供更多的依据。⁴⁶这场争论在1895年达到顶点,此时,门格尔最后一位重要的学生里夏德·许勒尔(Richard Schüller)发表了他的任教资格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逐条反驳了来自古典经济学家的批评——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Bruno Hildebrand)曾在他的维也纳大学就职演讲中表述过这些批评。⁴⁷

尽管这场争论异常激烈,门格尔和施莫勒之间的方法论辩论,对于澄清理论研究和应用经济研究之间的区别还是颇有裨益的。虽然争论没有取得任何持久的或确定的结论,但也的确重新激起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兴趣,突出了某些基本分歧的重要性,不过,这些基本分歧还要等待后来的经济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继续阐发,例如马克斯·韦伯、海因里希·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阿尔弗雷德·许茨(Alfred Schütz)。其中特别引起关注的是自然科学、历史学和经济学之间截然不同的性质。

在这场争论中,所有“理论家”都集结在了门格尔的身后,而所有“历史家”都集结在了施莫勒的身后,然而人们很少看到,这一对抗导致双方阵营内部的一些分歧遭到了忽略。这必然会带来混乱,尤其是在理论学者中间,这些学者容易被人视作(或自视为)是坚持“这一”(the)经济理论的,然而实际上他们对这门科学的内容和主题的看法五花八门。门格尔的独特贡献,则被视为仅仅是对“这一”(the)新的经济理论的主要架构所达成的广泛共识的一个部分而已。门格尔却并不认同这种看法。

奥地利学派和戈森学派

仅凭两本著作,门格尔就将经济思想和社会思想建立在了全新的基础上。

124

125

《国民经济学原理》开创了在经济理论中运用经验方法的先河,《对于社会科学,具体而言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探究》则为这一方法提供了辩护,并澄清了新的理论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的关系。经济科学不再只是研究可见的经济现象诸如价格、货币、生产,相反,它已成为探究这些现象如何起因于人的观念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的知识领域,而这个环境仅为满足人的需要提供了有限资源。

126 无论是反对者还是追随者,人们花了不少时间才领会了门格尔革命的全部意义。对他的同时代人来说,门格尔的方案之所以吸引人,不是因为它所隐含的新的宏伟图景,而是出于其他原因。尤其是,门格尔的独特分析方法将经济理论发展成了一门关于真实世界的描述性科学。正是这一点吸引了年轻的追随者。

门格尔的“经验方法”很符合那个时代的理想。学校和大学已经彻底转变了人们的观念,培养出了重视经验研究优点的年轻一代科学精英。在这方面,德国高等教育机构比起那个时代的其他国家都更彻底,他们坚持认为,必须在几乎所有领域展开经验研究。令人奇怪的是,这种研究导向竟然是伊曼努尔·康德“观念论”哲学的产物,这个学派强调,关于外部世界对象之知识,只能通过感觉经验获得,特别是通过观察取得。德国科学家比其他人更愿意离开他们的书斋和办公室,进行田野研究,投入对大自然的系统观察。著名的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就是这一运动的先驱之一,而其他人也很快开始跟上。德国科学在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医学、历史学,以及几乎所有知识领域,走在世界的前列。⁴⁸

127 然而通常是政府科学的名义讲授的政治经济学领域,寻求一种经验基础的要求却最终走向了对历史研究的理想化。历史主义声称,除了历史没有任何其他社会科学,而经济学哪怕带有丝毫科学的优点,也不过是历史发现的一般化而已。在这种情形下,门格尔的方法就成了一种富有魅力的替代选择,因为它表明经济理论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有权在不放弃经验研究的情况下开展独立的研究。这一思想的力量甚至吸引了不少具有历史学派背景而与卡尔·门格尔并无个人接触的学者。

最好的例子就是年轻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米塞斯在干预主义偏见中浸淫多年,并致力于为经济政策寻找真正的科学基础,但他并不觉得李嘉图的理论是令人信服的。不过,门格尔却使他深信,存在一种科学的经济理论——关于经验实在的一些命题。这种理论截然不同于历史研究的命题。米塞斯拜服于门格尔的论证,成了一位门格尔主义者,终身不渝。

在以后的著作中,米塞斯将对门格尔的观点作出修正,并加以一般化和限制。尤其著名的是他对经济科学的认识论地位的解释。米塞斯的看法是,这些命题是

在先验水平上为真的,因此无法通过感觉证据予以证实或证伪。但是,米塞斯提出这些主张的本意在于澄清他从门格尔那里继承的立场。门格尔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措辞与米塞斯的康德式表述之间有着非常醒目的区别,不过这一区别主要是修辞方面的。门格尔与米塞斯之间一脉相承的主要线索在于他们坚持同样一个科学纲领,即把经济理论发展为一门描述性学科,但又不同于其他描述性学科例如生物学或历史学。门格尔和米塞斯都相信,他们的理论描述了人的行为的某些一般特征,这些特征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存在并发生作用。这是他们与维塞尔或熊彼特的根本区别,也是直到今天门格尔派经济学家与其他经济学家截然不同的地方。

门格尔的方法也把他与里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和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明显区分开来,人们常把他们两位与门格尔一起视为价格理论边际效用方法的共同奠基人。这三个人差不多同时发表了对价格理论的系统阐述,并将这一理论建立在主观主义和价值的边际性质基础上。但是,除了这些基本思想方面的广泛共识,门格尔的理论和另外两位并没有太多共同之处。⁴⁹

128

为了阐述他们的理论,瓦尔拉斯和杰文斯必须克服一些巨大的障碍。他们两人没有德国的主观主义传统可供援引,也都遇到了学院势力的强烈抵制。不过,说到原创性和学术上的优点,他们都无法与门格尔比肩。⁵⁰与门格尔不同的是,杰文斯和瓦尔拉斯有一个具体的前辈可资借鉴,虽然此人不为世人熟知。他们认同和激赏这位前辈:德国独立学者赫尔曼·海因里希·戈森(Hermann Heinrich Gossen),此人已经预见到了他们的核心学说和研究价格理论的方法。

杰文斯和瓦尔拉斯追随戈森,提出了边际效用(marginal utility)价格理论,这一理论在描述可观察的事实方面显然不如门格尔的边际价值理论成功。一方是门格尔,一方是戈森、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两方之间的区别似乎鲜为人知,但是这个区别在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只有基于这一背景,我们才能理解米塞斯所作贡献的重要意义。



129

里昂·瓦尔拉斯

1854年,戈森出版了他那部耗费二十年心血写成的著作:《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⁵¹他在这部著作中把两种核心思想融汇到一个关于人的行为的一般理论之中。

首先,戈森认为,经济科学应该关注支配着人类心理状态的规律,因为它与人

的行为有关。而最重要的心理规律,在他看来,就是关于需要的满足的两个定律(laws of want-satisfaction),也就是后来著名的戈森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根据第一定律,消费某种财货得到的满足,会在某个点上达到最大。此时,提高或者降低消费,都不会产生更大的满足。根据戈森第二定律,所有财货都应该在这样的数量上进行消费:每种财货的边际消费带给总满足的贡献正好相等。

其次,戈森试图以代数和图表描述人的行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依靠几个隐含的、错误的假定。举例来说,他假定价值可以计量,而且不同的人的价值可以有意义地进行加总。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

130 正是这一进路,使得戈森的方法在德国学院经济学家眼中尤其值得怀疑,后者憎恶一切脱离可观察世界的推论。另外,戈森的著作也因严重的形式缺陷而饱受诟病,因为该书是以一篇连续文本写成,全书没有章节标题或目录。由于这种格式,以及他对代数和图表的过度使用,他的著作给人一种枯燥乏味的阅读体验。如果不是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发现了它,此书可能至今仍然无人问津。

杰文斯在出版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第一版时(1871),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前无古人的。1878年,杰文斯在曼彻斯特欧文学院(Owens College in Manchester)的继任者亚当森教授(Professor Adamson)偶然在一篇经济思想史文献中发现了戈森著作的引用,就告知了他的朋友杰文斯,于是,1879年《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二版出版时,杰文斯在前言里歌颂了戈森的伟大成就。⁵²

在这件事上,瓦尔拉斯甚至比杰文斯还要热情。他把戈森比作哥白尼和牛顿,并将戈森的书译成法文。⁵³当门格尔在一封信中告诉瓦尔拉斯,他觉得他的方法和戈森的方法之间有重大区别时,瓦尔拉斯勃然大怒,回信说他一想到门格尔竟然拒绝承认这样一位重要的前辈,就感到“令人作呕”。⁵⁴

131 戈森的确预见到了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的理论。⁵⁵他们三人分别提出了几种一般理论,这一点与门格尔关于价值和价格的一般理论非常接近。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心理学取向,以及他们提供的解释的确切类型。

在门格尔的理论中,“价值”一词并非指向心理感觉,而是表示边际单位财货X对个人的相对重要程度——也就是与其他财货Y和Z的边际单位相比,X的重要性。一种财货的市场价格来自买卖双方的互动,对他们来说,这种财货有着不同

的相对重要性。然而按照另外三位作者的理论,财货的价格虽然也是源于买卖双方的互动,但其原因却是,卖家和买家的感觉或福利(feelings or well-being)因对这一财货的支配而受不同程度的影响。门格尔将价格形成过程的原因解释为某一财货相对于其他财货而言的重要性,而戈森、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则将价格形成过程看成是财货的边际数量对心理状态的某种影响——这种影响被他们称作需要满足(戈森)、效用(杰文斯),以及得到满足的需要(瓦尔拉斯)。因而,杰文斯的边际效用和门格尔的边际价值在各自理论中扮演着同样的角色——它为市场价格提供了一种解释。但是,杰文斯的边际效用根据财货对人的感觉的直接影响解释财货的价格,而门格尔的边际价值则通过一种财货——按照参与市场过程的个体的需要——与其他财货相比的重要程度排序解释财货价格。

132

在戈森、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的心理学方法中,人的心灵是所有财货的经济意义的最大公分母;而在门格尔的理论中却没有这样的公分母。按照他的方法,“价值”并不独立于时间和地点的具体环境,它与这些环境不可分割,因而在不同的经济背景下有着不同的意义。根据戈森、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的理论,某一财货的“效用”数量在不同的情形下可能有所不同,而根据门格尔的理论,只要环境改变,价值的整个基础也就随即改变,因为这些财货将要和不同的财货进行比较。

不管我们觉得心理学方法还有哪些其他优点,至少有一点是颇有吸引力的,即它使我们在边际效用基础上建立数理价格理论成为可能。由于人的心理成为所有经济价值的公分母,我们可以设想把某一财货的消费带来的需要满足程度或效用表示为消费数量的数学函数;同样,还可以用具体的单位衡量满足程度和效用。通过这些单位,我们就可以在完全不考虑市场价格的情况下进行经济计算。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设想将许多个人效用函数加以整合,形成例如总效用函数之类的概念:一个人的满足和另一个人的满足可以加总成为一个单一的量,以代表“他们”的总满意度;而一个人的所得和另一个人的所失相加,在数学上就可以判定是否存在一个净收益或者净损失。⁵⁶

133

可能正是这些方面的考虑,促使戈森、杰文斯和瓦尔拉斯选择了心理学方法。他们并非以观察为起点,进而采用代数和几何方法作为呈现他们所观察到的现象的恰当工具。相反,他们是以下述事项作为开端——必须在经济学中应用数学方法,使其更加“科学”——然后才是寻找合理的假说证明他们所偏爱的方法之正当。⁵⁷这也解释了他们诉诸其他一些虚构假定的原因,这又是一个不同于门格尔方法的方面。在这三位学者的价格理论中,他们避免了李嘉图经济学依赖于总体概念这一缺陷。但是,由于他们热切地期望政治经济学能够成为一门数理学科,从而

134

又陷入了其他陷阱而不可自拔,也即对虚构的特定前提的依赖。为了能用数学代表效用、需求和价格,并用图表和代数表达这些概念,戈森、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假定,所有的财货都是无限可分的。而且,为了证明市场处于均衡状态是一个正当的假设,他们不惜忽略错误的存在。

正如古典经济学家之前的做法,戈森学派的价格是在特定条件得到满足时将会达到的那个价格:他们研究假想的均衡价格,而不是实际的市场价格。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奥地利学派与戈森学派之间的巨大分歧。门格尔为探讨真实世界的价格铺平了道路。在“科学”这一词汇的真正意义上——也即增进有关真实世界的知识,门格尔的著作使得经济学更加科学;相反,戈森、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的著作并不探讨事实,而只涉及臆说和猜想。威廉·雅费说得很对:

135 卡尔·门格尔截然不同于另外两位现代效用理论声名显赫的奠基人……熟悉原始文献的人们,绝不怀疑门格尔对需要与价值判断之间关系结构的处理,不仅比曾表示对这个问题并无特别兴趣的瓦尔拉斯,也比杰文斯的理论更为深刻、更具穿透力。⁵⁸

雅费继而界定了门格尔追求更为深刻的现实主义的根源,这种现实主义阻止了门格尔在完全脱离具体经验的心理构造的意义上发展“理论”:

门格尔过于贴近真实世界,无论其理论的文字演绎还是符号公式,都是如此;在真实世界中,他看到的不是清晰明确的均衡点,而是有限的不确定性,不仅孤立的双边物物交换,而且竞争性的市场交易也是如此……由于他对现实世界的坚定不移的关注,门格尔无法也没有对交易者所面对的众多困难进行抽象,这些困难就是如何获得形成市场价格精确均衡所必需的全部信息;他的方法也不允许他对遮蔽未来的不确定性进行抽象,即使只是多数当前交易发生之时必须对之有所预期的较近未来。他既没有排除非竞争群体的存在,也没有将市场上随处可见的垄断贸易者拒之门外。⁵⁹

门格尔在其学术生涯的最后阶段拓展了他的方法,用于处理社会问题。在这方面他同样是一位先驱。此时,“社会学”这个术语已经发明出来(法国实证主义者奥古斯特·孔德所创),不过还没有出现哪位得到公认的职业社会学家。卡尔·门格尔成了第一位由经济学而入社会学的社会学家。很多其他的奥地利经济

学家,例如熊彼特和米塞斯,都沿着他的足迹继续前进。米塞斯后来解释说,这种兴趣的扩大,只是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一书新观念的自然推演,因为这种新方法的主要旨是这样一种分析,它集中关注个体的人类行为,并把所有的社会现象视为个体之间互动的结果。⁶⁰

136

奥地利学派的突破

在维也纳大学,门格尔遭到了洛伦茨·冯·施泰因(Lorenz von Stein)的坚决反对,后者是德意志和奥地利主要的法国社会主义旗手。⁶¹施泰因拒绝了门格尔的首次任教资格申请,直到门格尔在维也纳出版商威廉·布劳米勒(Wilhelm Braumüller)那里自费出版了他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并将前两章的校样递交给施泰因,施泰因才接受了他的申请。但是,即使接受了申请,施泰因仍然没有批准通过门格尔的资格审查。直到德国一些学术刊物发表了几篇对他的著作给予好评的评论之后,门格尔再次申请,方获通过。

他立刻获得了维也纳之外的教学工作机会,但没有接受,因为一旦放弃《维也纳报》的职位,他将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于是,他留在维也纳大学当了编外讲师。一年后,巴塞尔大学为他提供了条件非常优厚的聘约。为了挽留这位天才的年轻教授,维也纳大学授予门格尔政治经济学副教授(*professor extraordinarius*)职位⁶²,并允许他保留《维也纳报》的工作。他接受了,此后整个职业生涯期间一直留在维也纳,教授银行、信贷、经济学概论和公共财政课程。⁶³1874年秋,他辞掉了《维

137

也纳报》的工作,专心从事研究,随后出版了《对于社会科学,具体而言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探究》一书。

他的所有学术活动都遭到了系里的抵制,为首的就是施泰因。门格尔决定建立一个新的联盟,与这些旧势力做斗争。1876年,他取得了胜利,因为他的职业生涯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变。之前那年的秋天,他成了二十二岁的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鲁道夫·冯·哈布斯堡(Rudolf von Habsburg)的私人家庭教师。

这一任命将是门格尔教学活动的顶点。不只如此,新的身份还使他的政治观点浮出水面,而对这些观点,此前他一直小心翼翼,从不在公开发表的著述里透露一星半点。在对鲁道夫王储的笔记本进行了认真分析之后,埃里希·施特赖斯勒(Erich Streissler)得出结论,这些档案“表明门格尔已经成了最纯粹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者……他心目中所能接受的政府活动的范围甚至比亚当·斯密还小得多。”⁶⁴施特赖斯勒继续说道:

138

门格尔为鲁道夫准备的讲稿,事实上可能是曾经写出的经济学理论文献中关于放任自由主义原则最极端的表述之一。只有在“极端反常”的情况下,政府采取经济行动才是合适的。只有在“灾难正在迫近”之时,在“政府的支持不可缺少”之际,国家的力量方可介入。否则,“政府干预”就“总是……有害的。”⁶⁵

门格尔非常精明,没有把这些对政府的看法表述为自己的个人观点,而是通过精心挑选的阅读材料阐述自己的思想。他甚至还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定为主要教材。尽管如此,门格尔的政治观点在奥地利政界似乎还是广为人知,因此,在任命他为鲁道夫的家庭教师这一问题上引发了争议。事实上,这导致了鲁道夫的父皇弗朗茨·约瑟夫手下保守派议员与他母后伊丽莎白属下倾向自由思想的议员之间的对立。不过,皇后拥有最后的决定权。

139

由于在鲁道夫身边工作,门格尔向学校请了长假,从1876年1月开始持续了两年之久。他成了“王储最信任的教师之一,不但得到王储本人,还得到王储长辈的信任”。⁶⁶门格尔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新的王室保护人很快擢升他为维也纳大学正教授,这是整个帝国能为经济学家提供的最受尊崇的职位。现在,门格尔对奥匈帝国学院社会科学的影响,已经无人能及。其他荣誉自然接踵而来:他成了奥地利议会上院(*Herrenhaus*)的终身议员、维也纳和罗马的科学院院士、法兰西学院(*Institut de France*)院士,以及爱丁堡皇家协会(*Royal Society in Edinburgh*)会员。⁶⁷

他运用手中的权力,平息他所在的维也纳大学科系内部的冲突。似乎他也运用这一权力将他的追随者安插在其他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上,其中就包括庞巴维克和维塞尔。⁶⁸

门格尔自视为新的社会研究学派的奠基者和领导者,开始广收门徒,并把他们派往各地。在一封1902年3月写给奥地利文化部的申请提前退休的密信中,他认为,自己的教学活动“已经产生了超越一般教学活动的成果。这些成果尤其涉及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基础”。他还指出,在他的支持下,很多优秀的学者已经获得了他们所在大学的任教资格,他们占据了奥地利各所大学绝大多数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除了他的主要追随者庞巴维克和维塞尔之外,他还提到以下这些人:埃米尔·萨克斯(*Emil Sax*)、约翰·冯·科莫齐恩斯基(*Johann von Komorzynski*)、罗伯特·迈尔(*Robert Meyer*)、古斯塔夫·格罗斯(*Gustav Gross*)、欧根·冯·菲利波维希、维克托·马塔亚(*Victor Mataja*)、罗伯特·楚克坎德尔(*Robert Zuckerkandl*)、赫尔曼·冯·舒伦-施拉腾霍芬(*Hermann von Schullern-Schrattenhofen*),里夏

德·赖施(Richard Reisch)和里夏德·许勒尔。没有从事学术事业的门格尔学生的名单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他们之中,包括莫里茨·杜布(Moritz Dub)、维克托·格雷茨(Viktor Grätz)、威廉·罗森贝格(Wilhelm Rosenberg)、鲁道夫·西格哈特(Rudolf Sieghart)和恩斯特·塞德勒(Ernst Seidler)。⁶⁹这些人将在米塞斯的个人生活和学术生涯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门格尔的成功不仅在于兴起了经济科学的大陆传统,而且也表现在他在奥匈帝国境内建立了一个志趣相投的年轻学者的关系网络。⁷⁰唯一的失败是未能帮助庞巴维克在维也纳大学获得教职。这位他所钟爱的弟子,分别在1887年和1889年两次提出申请,但是,每次教育部都选择了其他候选人。他们认为,庞巴维克和另一位教授职位拥有者(门格尔)一样,属于抽象理论和纯粹理论的一派,因此,应该为德国新历史学派提供一个代表席位。⁷¹不过,事实证明这并不是什么真正的障碍。1889年秋,庞巴维克来到维也纳,进了财政部,同时担任了维也纳大学的助理教授;1905年,他获得了正教授职位。因此,奥地利学派与所有其他的现代(边际主义)经济学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迅速占领了要害职位,获得思想传统和政治支持的双重保护。在学派的下一代领导者手里,它将产生无与伦比的影响。

欧根·冯·庞巴维克

门格尔申请退休之际,欧根·冯·庞巴维克已经成为他最杰出的弟子,并第四次连任了奥地利(k. k.)财政部长。

庞巴维克上升到了奥地利官僚机构的最高地位。在正常情况下,他不会有此作为。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也是优秀而高效的技术专家,但不是政治家。他憎恶蛊惑人心的把戏,蔑视社会主义思想。他能当上政府部长,只是因为奥地利内部的民族冲突(尤其是在日耳曼人和捷克人之间),使得整个国家实现政治统一的可能渐趋破灭。这一危机时期,奥地利政府暂由技术官僚掌控,作为其中一员,庞巴维克出任了政府财长。他受过的无可挑剔的学术训练,使他赢得了各方的尊敬,成为这种紧急局势之下的最佳人选。⁷²

1851年2月12日,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Böhm Ritter von Bawerk)生于摩拉维亚一个政府高官家庭。他在维也纳长大,并在维也纳肖顿中学(Schottengymnasium)接受了全面教育。他的父亲在1848年革命时期被委以重任,负责各类棘手谈判,其间深得皇帝的欢心。1854年,父亲受封为爵士,可是没过多久就英

142 年早逝。之后,母亲举家迁居维也纳,以保证欧根能够得到充分的教养。欧根是家中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

在肖顿中学,庞巴维克与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成为至交。两人将在维也纳大学一起学习法律和政府科学,发现经济学上的共同兴趣,最后都成为卡尔·门格爾的追随者。1872年,他们一起进入了下奥地利(Lower Austria)财政部,并于1875年通过了博士考试(门格爾是主考官之一),接着都选择了学术道路,获得声誉很高的政府奖学金项目的资助,与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德国政治经济学家们一起研修了两年。1875年,他们在海德堡卡尔·克尼斯的研讨班上学习了一年,接着在莱比锡威廉·罗雪尔和耶拿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的讨论班上花去了另外一年。后来,他们都成了政治经济学教授,同为新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代表,赢得了国际声誉。他们也都在紧急情况下成了内阁成员:庞巴维克于1889—1890年、1895年、1896—1897年和1900—1904年期间执掌财政部;维塞尔在1917—1918年成了末代帝国政府贸易部长。庞巴维克还娶了维塞尔的妹妹保拉(Paula),成了他的妻兄。

他们一起待在海德堡的那年,提交了预示着他们后来成就的论文。两人都以门格爾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为出发点,并在新的方向上拓宽了门格爾的事业——维塞尔的论文首次提出了机会成本分析,而庞巴维克则给出了他的利息理论的第一个版本。⁷³

143 庞巴维克在三十岁前就获得了任教资格,这要归功于门格爾的坚定支持。门格爾了解到因斯布鲁克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奥匈帝国少数几个此类教授职位之一)有了空缺,立即抓住机会把他最有天赋的追随者安排进去。

19世纪80年代是庞巴维克一生中成果最多的阶段:他出版了两卷本的鸿篇巨制,论述资本正面理论及其历史,这一工作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使他成为最著名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事实上,他也是第一位著作被译为英文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

144 然而,从1889年到1904年,担任财政部长期间的各种政府事务和其他公务活动,几乎占用了庞巴维克的全部精力,因此他的学术成果大幅缩减。⁷⁴一个例外是,他仍然担任维也纳大学的荣誉教授,并参与期刊《经济学、社会政策与行政管理》(*Zeit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Socialpolitik und Verwaltung*)的事务,这是他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与其他人共同发起创办的,后来这份期刊成了德国和奥地利理论研究的一个主要窗口。庞巴维克从财政部长位置上卸任之后,有了更多时间用在学术追求上,并被授予维也纳大学政治经济学新的教授职位。⁷⁵此时维塞尔已经接替

了门格尔,维也纳大学迎来了奥地利经济学家全明星阵容的辉煌十年。

从1905年起,到1914年去世,庞巴维克一直过着政界元老的生活。他的学术研究经常被其他事务所打断,最初他的职务是奥地利上议院终身议员(他于1899年当选),1911年以后,又当选为奥地利科学院的院长,这是“奥地利所能给予的最高学术荣誉”。⁷⁶他的主要学术活动,就是讲授一门冬季学期的高级经济理论课程,夏季学期则是每周指导一次研究生的研讨班。⁷⁷这个研讨班耗尽了他的精力,每次结束时他都感到精疲力竭。

145



奥地利100先令的纸币上印着庞巴维克的肖像

这可不是什么普普通通的研讨班。聚集在庞巴维克周围的群体,囊括了一所正规大学所能召集起来的所有最有才学的年轻学者。他们的名字完全可以进入任何一本20世纪社会科学名人录: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约瑟夫·熊彼特、里夏德·冯·施特里格尔(Richard von Strigl)、弗朗茨·魏斯、费利克斯·索马里、埃米尔·莱德雷尔(Emil Lederer)、鲁道夫·希法亭、尼古拉·布哈林(Nicolai Bukharin)、奥托·纽伊拉特(Otto Neurath),以及奥托·鲍尔。这些研讨班的成员将会成为伟大的经济学家,要不就是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将在今后数十年里留下自己的印记,不管对这个世界来说是好是坏。奥地利学派的年轻追随者们把庞巴维克当作他们无可争议的导师,在他的帮助下,继续着手发展和革新经济科学。年轻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Austro-Marxists),正如我们后来所称呼的,也加入了这个研讨班,直接面对这位曾经给予马克思《资本论》最具毁灭性的打击的学者。不过,他们逐渐对这位老师产生了敬仰之情,为他那广博的知识,为他对客观真理不偏不倚毫不松懈的追求,尤其是为庞巴维克与他们辩论时展现出来的意志和才

146

华——这正是他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米塞斯参加了这个研讨班，一直持续到1913年。庞巴维克作为学者和教师，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为他树立了一生的学术标杆。只有一点：米塞斯认为庞巴维克对待奥托·纽伊拉特太温和了。米塞斯觉得纽伊拉特是个狂热分子，实在让人难以忍受，因为他在批评经济学时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⁷⁸

有时，研讨班也会集中关注个别学员的学术贡献。例如，庞巴维克专门辟出了两个完整的学期，讨论米塞斯1912年关于货币理论的著作。很多研讨班成员在参加研讨班时已经建立了学术上的声誉，或者很快就会建立。不过，课程的主要议题仍然是庞巴维克自己的著作：价格理论、经济理论面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德国历史学派的挑战的存在理由、奥地利学派价值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比较，以及经济法制的意义及其重要性。

147 庞巴维克在所有这些领域均有重要建树。在他的任教资格论文手稿中，他已经提出了一个关于权利以及法律与商业关系的门格尔主义经济学理论。这份手稿经过删减刊印成书(1881)。⁷⁹在他任教因斯布鲁克的十年左右期间，庞巴维克专注于奥地利价格理论的发展。卡尔·门格尔已经解释了消费品的价格，但是他没有深入到生产品的定价上去。他认为，后者与前者没有根本的差别，除了生产品的价格是派生出来的这点之外，即它是由其生产出来的消费品的价值引致的。批评门格尔的人抓住这一点，把它当作他体系中的缺点，认为这种归属(imputation)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消费品都是通过多种生产品的联合投入才能生产出来。归属如何在众多的生产要素之间分配最终产品的价值呢？此外，生产成本确实对产品价格产生了影响，这难道不是明摆着的吗？

148 庞巴维克写了一篇关于价值理论的接近专著篇幅的长文(1886)讨论这些问题。⁸⁰这篇文章特别提出了一个他称之为“成本定律”的命题。庞巴维克解释说，如果是可以任意复制的消费品，那么，生产成本事实上是最终价格的直接原因。但是，他向我们表明，即便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生产成本本身最终仍取决于相应生产资料所能生产的其他消费品的价值。他的证明非常成功，许多奥地利和德国的经济学家因此转向了奥地利学派。三年之后，庞巴维克把此文的精华吸收进了他那部皇皇巨著，一部两卷本的论述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史的作品，此书尤其强调资本和利息理论。此书第一卷出版于1884年，对过去的利息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表述和批判。第二卷以《资本正面论》(*Positive Theorie des Kapitals*)为题，庞巴维克在这个主题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成为德语世界之外最为知名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在这本书中，他阐述了价值、价格和利息理论，后来，熊彼特曾以这样的口吻赞扬了

此书：

《资本正面论》提供了……一个囊括整个社会—经济过程的理论，虽然标题预示的范围较为狭窄……可以肯定的是，这部著作的最高目标，是要达到理论经济学所能期望达到的至高境界。某种程度上，这个目标作者达到了，很少有人能够与之比肩。

从此，工资、地租、资本、生产时期的长短以及生产方式的（物质）生产力，就成了相互决定的变量，因此，整个经济过程立刻呈现出了空前的简洁、清晰和完整，令人耳目一新。⁸¹

尤其是，庞巴维克还提出了关于利息的时间偏好理论，这个理论革新了这一领域的经济思维。以往人们一般认为利息是某一生产要素的报酬，但是庞巴维克重申这一命题：利息与生产本身无关，而是有着完全不同的来源，即对同类财货在当前和未来估值的不同。⁸²生产和资本只是间接与利息相关——仅就资本财货本质上是“未来财货”这个意义而言，所谓“未来财货”，是指经过耗费时间的生产过程逐渐成为消费品的财货。

在庞巴维克写作的年代，这些看似细微的区别，却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那个年代的特点就是各种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其中最著名的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领导的运动。社会主义者挑战主流经济理论，也即让-巴蒂斯特·萨伊的理论，根据后者，利息是资本的特殊收入。他们断言，唯有劳动创造了价值和收入，因此劳动单独创造了利息。利息支付流向资本家，只能说明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劳动阶级没有获得他们创造的全部价值。但是，根据庞巴维克的理论，利息不是由哪类人生产出来的，它是价值的延伸，它的存在独立于生产本身，仅在生产要素与产品的关系之中附带出现。如此一来（从而我们可以得出更为深远的政治意涵），利息就不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它将存在于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社会组织体系。任何重新分配的计划或者其他社会政策，都无法消除利息，甚至在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

庞巴维克还提出了另外两个具有高度政治意味的问题，两个例子都很有名。其一是在恩格斯编辑出版了马克思遗著《资本论》卷三之后，庞巴维克为该书写了一篇长达120页的评论，题为《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Zum Abschluss des Marxschen Systems）⁸³，发表于1895年纪念卡尔·克尼斯的文集。在这篇评论中，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经济学发出了致命一击，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尽管内在自洽，却是

建立在没有可观察的事实作为基础的假设之上,从而得出的结论也与真实世界相悖。

150 十九年之后,庞巴维克死前不久再次提出了社会政策的理论基础问题,他发表了一篇六十五页的论文,讨论工会施加的压力是否可以提高劳动阶级全体成员的生活水平这一问题。《权力或经济定律?》(Macht oder ökonomisches Gesetz?)还涉及更为基本的问题:是否存在独立于人们意志的经济规律这样的东西?如果存在这样的规律,那么它们就不可能被工会领袖或者政策制定者所打破或绕开。经过艰难的案例分析之后,庞巴维克表明,工会领袖和政治家们的幻想只不过是幻想而已。⁸⁴

庞巴维克遗产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乐于关注那些涉及极富争议的问题的前沿理论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整个奥地利经济学家“第二代”的遗产。而卡尔·门格尔则几乎将他的所有精力集中在纯理论上,完全忽略了马克思及其门徒。门格尔的同事和追随者,诸如萨克斯、楚克坎德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等人,都试图将新理论运用到他们周围新的社会运动中去。其中,庞巴维克在原创性和思想活力方面均为个中翘楚,这极大地影响了米塞斯。庞巴维克是政治经济学家的真正典范:一个集全面的历史知识和理论知识于一身,在重要的政策问题上有着清晰立场的人。至少在这一方面,米塞斯继承了这位大师的衣钵。

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

151 米塞斯从未受教于维塞尔,尽管维塞尔在1903年即接任维也纳大学卡尔·门格尔的教授职位,并且还是米塞斯政府科学考试的主考官。维塞尔于1851年生在维也纳,是一位政府高官之子。他生得颀长、英俊,举止优雅,深富贵族气质,一双蓝眼睛清澈明晰,后来又留了一副令人印象深刻的长胡子。他对艺术和文学的精通令人啧啧称奇,而且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钢琴师。他是旧时代的绅士,他的个人风度使他成为1914年庞巴维克去世后奥地利学派无可争议的领袖。⁸⁵

维塞尔有些不常见于伟大学者和教师身上的性格特征,不过其仰慕者们对此较为宽容。除了他自己的观点,他从不参与论辩或者讨论其他观点,而且他还是一位极为缓慢的读者和思想者。他很少引用别人的话,在早期著作的绪言里,也只泛泛地表示乐于承认他在思想上受惠于门格尔和杰文斯。这些特点结合在一起,本来足以将他从伟大学者之列排除出去,但在维塞尔这里,反而进一步激起了他的追随者对他的敬仰。

熊彼特这样赞扬维塞尔的缺点：

带着一种弥漫一切的平静,他将专业文献搁置一旁,这很快就被我们看作是他的一种特权。他甚至不能较快或者较多地阅读。而且,他几乎从不理会其他学者思想体系中的细节问题。他从不卷入辩论,无论是以专家身份还是个人身份。⁸⁶

哈耶克补充道：

152

他的著作从不涉及经济科学的现状。他也从未尝试打通现有的各种定理,或者通过纯粹的逻辑推演导出新的定理。很少有理论家像维塞尔这样,与通常的理论家形象相去如此之远……[他的理论沉思]完全支配了他,没有给他留下任何时间深入研究,或者系统分析他人的思想体系。他觉得必须如此,这就妨碍了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对现实的概念化,因此他也回避哪怕只是口头的讨论,如果这些讨论的结果不是对他的思想做出更好的说明的话。⁸⁷

显然,维塞尔无论在个人风度还是学术气质上均与庞巴维克大不相同。他的这位妻兄在经济学方面广泛阅读,对资本理论和利息理论文献如数家珍,事无巨细,均无遗漏,而维塞尔则只专心提炼他自己的冥思成果。庞巴维克的风格常常显得单调乏味,相反,维塞尔知道如何转换表达的语词。比如,他引入的“边际效用”这个术语,至今仍在主流经济学中使用。另外,庞巴维克总是深入一个主题的技术细节,维塞尔则珍视价值和价格理论的更为一般的特征,宁可把他的论证保持在抽象层面。对维塞尔的仰慕者来说,这种方法是有着决定性的优势的：

对于那些重视体系的逻辑自洽甚于一切的人来说,庞巴维克的体系在思想的连贯和一致方面,似乎更好一些。然而,维塞尔的著作作为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好的起点,而且常常是在那些因其不一致而为众人所诟病的地方。⁸⁸

153

庞巴维克得到过门格斯的直接支持,而维塞尔在门格斯的有天分的追随者名单上位次较后,不得不等待了很长时间,才得以跻身职位不多的帝国教授之列。门格尔很多年里已经熟悉了维塞尔论述价值理论的未刊手稿,但是他对这些手稿持

有很大的保留意见,一直没有推荐出版。不过,当布拉格大学的一个教授职位终于出现空缺,门格尔就敦促维塞尔将这些手稿提交维也纳大学以取得任教资格。他在1883年获得通过,此前门格尔已经写了一篇对维塞尔的著作做出高度评价的书评。随后,门格尔推荐他出任布拉格的教授职位。1884年,维塞尔成为一名副教授(*professor extraordinarius*)。1889年他当了教授,1903年接替了门格尔在维也纳大学的职位。⁸⁹

154 维塞尔受到戈森学派边际主义价格理论的启发,尤其是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在这方面,他不同于庞巴维克和大多数同时代的德语理论家。⁹⁰他是德语世界第一个对戈森著作表示赞同的学院经济学家。事实上,他在《自然价值》(*Der natürliche Werth*, 1889)一书中以戈森的需要饱和定律为基础给出了新的边际主义价格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被他称作“基本价值理论”的东西。⁹¹这些显而易见的参考有着特殊的分量,因为维塞尔的习惯是从不引述别人。经过他优雅的措辞,维塞尔将戈森那本晦涩到难以卒读的书,从湮没无闻的命运中拯救出来。⁹²

155 然而,这一独特取向很大程度上遭到了忽视,或者说(如果引起注意的话)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方法论之争渐趋融合后,德国和奥地利的主流经济学家在更宽泛的范畴上进行思考,对他们来说,维塞尔是门格尔主义“理论家”中的极端例子。事实上,维塞尔背离门格尔理论的程度正如背离历史学派一样。举例来说,维塞尔的理论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注重数量关系,而门格尔仅仅关心数量之间的定性关系。而且维塞尔的著作还有很强的心理学取向,这是由于当时风行一时的维也纳哲学家弗朗茨·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的著作,以及同样盛行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将认识论和逻辑学解释为心理学科之尝试的影响。维塞尔还依赖于虚构的假设,比如,价值是心理概念,而且可以度量,这也使他与门格尔区别开来。

156 这些观点在他的第一本书中就很明显,此书题为《论经济价值的根源和主要法则》(*Über den Ursprung und die Hauptgesetze des wirthschaftlichen Werthes*),是他的任教资格论文手稿,发表于1884年方法论之争的初期。⁹³虽然他在书中很少使用数学表达,但却经常提及“价值单位”,并且根据这些单位进行计算——这些单位可以进行加总,或者通过算术运算进行变换。⁹⁴他为那个时代的标准德语经济学词典写下了“边际效用”这个词条,主张“提出一些法则,使得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法则衡量和计算[*rechnen*]经济效用”,或者,换句话说,“发展出关于效用的经济计算”。⁹⁵按照维塞尔的观点,价值是效用的基数衡量尺度。如果经济财货X是不可重复生产的,那么X的价值就衡量了X自身的边际效用。但是如果经济财货X是可重复

生产的,那么 X 的价值就衡量了其他财货 Y 的预算效用 (foregone utility), 因为如果生产要素用于生产 X 而不是 Y, 则我们不可能享有 Y。换句话说, 可重复生产的财货之价值就是为了生产它而付出的机会成本。

这些关于价值的假设及其推论, 是维塞尔《根源和主要法则》赖以成立的基础, 这为他赢得了“纯理论家”的名声, 确切地说, 是在德语主流经济学家所蔑视的那种意义上的纯理论家: 这些人构建了理论, 却没有现实人类经验作为基础。历史主义狂人一定热爱维塞尔, 因为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 表明他们不是在与稻草人作战。要想找到一个充分的理由反对门格尔, 那是非常困难的



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

的, 因为门格尔将理论与经验紧密联系在一起, 但是毫无疑问, 这位后继者的著作缺乏经验根基, 所以, 也就缺乏科学的完整性。年轻的维尔纳·桑巴特 (Werner Sombart) 曾经接受施莫勒的委托对维塞尔《自然价值》一书作了评论, 他的结论是该书“满纸谬论”。⁹⁶

157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 方法论之争的激烈氛围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维塞尔著作的重要性。他那优美的文笔, 提炼妙语的高超能力, 比如像“边际效用”⁹⁷和“归属” (imputation) 这样的精彩术语, 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使他成为“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这意味着在同时代德语主流经济学家的心中, 他是一位与历史研究毫不相干的理论研究的提倡者。因为这种公开的形象, 维塞尔在德语经济学家中成功地推广了以下观念: “此一”新经济理论 (门格尔和他的门徒所拥护的) 只是应用心理学的一种形式而已。⁹⁸

维塞尔的观点在另一个重要方面也被证明是极重要的。正如前文所述, 他是门格尔的少数几位关注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社会主义学者的追随者之一。然而他与庞巴维克不同, 庞巴维克试图精炼门格尔的价格理论, 澄清和加强门格尔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作方式的真知灼见。维塞尔却认为, 无论如何, 门格尔的理论没有明确的政治含义。它不是为资产阶级的错误辩解——正如批评者所宣称的, 但也同样无法作为反对社会主义的根据。

维塞尔的观点根植于他关于价值和价格关系的理论。回忆一下, 维塞尔相信经济价值是可以进行算术运算的, 就像货币价格可以用于商人的计算一样。因此

158

从这一点来说,价值和价格没有根本的区别。价格只是“客观交换价值”——它们是显现出来的“主观交换价值”。理论上说,商人可以不用货币价格,而是直接根据价值完成计算,因此,社会主义计划委员会也可以这么做。直到今天,经济学门外汉们仍然广泛持有这一看法。维塞尔的成就在于,他给了这种观点一种成熟的表达,并且通过他在第二本书中的学说,发展了这一观点。该书题为《自然价值》(*Der natürliche Werth*)。⁹⁹

159 根据这种学说,企业家超过必要的数量生产某些商品的情况之所以可能,仅仅因为他们控制着最高市场价格。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价格不能显示合理的或者“自然的”价值,因此就出现了“客观交换价值(市场价格)与社会效用之间的冲突”。¹⁰⁰

于是,问题就是如何理解社会效用。这里,维塞尔指的是自然价值的概念。他断言说,经济财货的自然价值就是这些财货仅仅根据它们的可得数量以及效用而有的价值。¹⁰¹只要任何其他要素加入进来,市场价格就会偏离自然价值。这样,为了理解市场价格与社会效用之间的“冲突”,可以比较真实世界与虚构的没有产权的状态,以及脱离人类个体特殊的生物或经济特征的具有同质心理效用的状态。根据维塞尔的说法,这种虚构的状态可以在他所理解的“完全统一并且极端理性的共和国”,即“共产主义国家”达到。以此推论,真实世界的市场价格只是自然价值的一个不完美的表现。它们不仅受到各种弊端的影响——个人的自私、错误和其他摩擦,而且还受制于资源的分配。因此,只有在纯粹的维塞尔式“共产主义国家”,财货的实际价值才与它们的自然价值一致。

160 维塞尔没有给出支持这些主张的论据,显然,他认为这些主张的合理性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他在这些基本立场方面也未遇到什么异议。几乎没有必要强调,他的观点与门格爾的观点相距甚远,不仅在价值和价格概念上,而且在经济科学的性质上都是如此。门格爾相信,经济理论的任务在于描述人类经济中某些精确(*exact*)定律。它不涉及人的行为的所有方面,但又的确是把经济体系视为真实存在的,因而适用于经验分析。按照维塞尔的观点,经济科学仅仅处理自然价值的规律,而这是不可能存在于真实世界的。

米塞斯不觉得维塞尔的观点有什么可取之处。¹⁰²米塞斯的历史主义训练已经使他倾向于这样的观念:科学的本质是发现相关的事实,而非缺乏经验基础的推断。

由于维塞尔在经济理论教学方面的核心立场,也因为后方法论之争(*post-Methodenstreit*)时代的德国对于经济理论的各种互相竞争的方法的普遍困惑,维塞

尔得以重新定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使其背离了门格尔主义理论的本来面目,成为正在兴起的以戈森、瓦尔拉斯和杰文斯的著作为基础的新古典综合理论的一部分。

只有基于这个视角,我们才能理解维塞尔对新一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成长经历的个人影响。1903年到1920年间,他一直担任过去门格尔担任的职位,后来则以维也纳大学荣誉退休教授的身份继续参与教学,直到1926年去世。整个这段时期,一直是维塞尔在维也纳大学讲授经济科学的入门课程。庞巴维克的存在提供了某种平衡。但在1914年庞巴维克去世后,维塞尔在一般经济理论的所有问题上都确立了无可撼动的权威地位,这一地位更因他在同年出版的综合著作《社会经济理论》(*Theori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Wirtschaft*)¹⁰³而得到加强。整个第四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例如哈耶克、马克卢普(Machlup)、哈伯勒(Haberler)、摩根斯特恩(Morgenstern)和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这些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在走上自己的学术道路之前,都是这样在维塞尔主义的模子里铸造出来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19世纪80年代以来就没有再版过),而在新古典综合的精神下接受了训练。

161

由于这些影响,严格来说并不存在门格尔主义意义上的第四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所有那些通常划为第四代成员的年轻人,实际上最终都迷失在新古典学派之中——可能哈耶克是个例外,他在数十年后那本《科学的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1954)¹⁰⁴中重新发现了某些门格尔主义的主题。

第三代学人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对他们的影响非常有限,无论是在个人方面还是思想方面。他对这些人的基础训练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他们都是获得博士学位后才被接纳参加米塞斯的私人研讨会。而且,他们可能只把米塞斯当成一位货币理论方面的知名专家和一位极有争议的政治经济学家。米塞斯是以他在货币理论和社会主义方面的著作成名的,但是,他的学生里没有一个能够领会这些著作的深远意义,即使同事之中也很少有人理解。许多年后,他在一部经济科学通论《国民经济学》(*Nationalökonomie*, 1940)中阐发了这些意义,直到此时,他才成为一般经济理论方面的公认权威,而且直到此书的英文扩展版本《人的行为》(*Human Action*, 1949)面世之后,他才最终对后辈学生的理论视野有了持久的影响。¹⁰⁵

162

约瑟夫·A.熊彼特

米塞斯于1902年所做的关于1848年前加里西亚地主与农民之间关系的著名研究,使他成为主流历史主义经济学阵营的明星学生。当他转向卡尔·门格尔的

经济理论,也就失去了这个显赫关系网络的支持。庞巴维克死后,学界已经很少提及米塞斯所传承和发扬的门格尔主义传统。无论是逐渐衰落的历史主义传统,还是正在兴起的新古典经济学,他都与之格格不入。他的工作受到尊重,也享有了很高的声誉,但却成了异类,终其一生都在主流学术圈外徘徊——他的研究很难归入这门科学的一般发展趋势。

163 在年轻一代维也纳经济学家中,有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他是庞巴维克讨论班上的另一位学生。他比米塞斯年轻两岁,名叫约瑟夫·熊彼特。他在年仅二十五岁时就发表了一部长达 600 页的论述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题为《理论经济学的性质和要义》(*Wesen und Hauptinhalt der theoretischen Nationalökonomie*)¹⁰⁶,此书很快就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1908 年 10 月,他将这部著作提交给维也纳大学,申请任教资格。1909 年 3 月,在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的热情肯定下,他获得通过。半年后,二十六岁的熊彼特成了奥地利最年轻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任职于捷尔诺维茨省(Czernowitz)首府。两年后,他出版了第二本更有影响的著作《经济发展理论》(*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随后就在享有盛誉的格拉茨大学(University of Graz)取得了正教授的职位。从此,他开始了一个漫长的学术丰产期,后来他经由波恩去了哈佛。¹⁰⁷他还在实践领域担任过若干声名显赫的职位,但每次都很短暂,且以失败告终。作为第二任伦纳内阁的财政部长,他未能抑制 1919 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而在担任比德尔曼银行行长期间,银行又于 1924 年宣告破产。

164 熊彼特在政界和金融界的事业是其个人关系的产物。通过他的继父西吉斯蒙德·冯·凯莱尔(Sigismund von Kéler)将军的关系,他得以进入著名的特蕾西亚中学读书——这是 1914 年之前奥地利的伊顿公学。他在那里结识了好友鲁道夫·希法亭,此人后来成为奥匈帝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曾出任德意志帝国财政部长。熊彼特家境富裕,这使他有可能会在新成立的伦敦经济学院待了一年之久(1906—1907),并会见了坎南、马歇尔和其他英国经济学家。1913 年下半年,他访问了哥伦比亚大学,从而在美国打下了人脉基础。一战之后最初几个月局势混乱,希法亭邀请此时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经济专家的熊彼特加入了德国工业社会化委员会(Commission for the Socialization of German Industry)。熊彼特利用这一机会,证明了他在政治上的可靠性——他签署了一份旨在将德国煤矿业国有化的建议书。此后不久,他当上了奥地利财政部长。虽然他在任上时间不长,而且也没推行他的任何计划,至少从个人角度来说,他从这项任命得到了好处。他利用部长职权,批准了比德尔曼银行的成立。这家银行最终顺理成章地任命他为行长。熊彼特从未过问这家银行的日常事务,但在 1924 年银行破产后,他深感自己对银行股东难辞其

咎,因此,在接下来的十一年里一直努力工作,偿还债务。他开始发表很多文章,赚取稿费,由于这项收入仍嫌不足,熊彼特接受了哈佛大学条件优渥的聘任。¹⁰⁸

不过,对于熊彼特的职业生涯来说,最重要的因素还是他的卓越头脑。他有着超群的智力,也是一位天分极高的作家。¹⁰⁹他对经济分析中的细致区分和微妙问题非常敏感,这些都在他那充满魅力的文字中得到体现。尽管米塞斯(就像庞巴维克和很多其他奥地利经济学家一样)对熊彼特在一些经济理论基本问题上的研究不以为然,但也毫不犹豫地承认熊彼特有着过人的洞察力,并能通过自己的写作加以发挥。¹¹⁰最重要的是,熊彼特对创新的企业家在推动社会 and 经济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作过精彩绝伦的描述,许多人对此深感钦佩,米塞斯就是其中之一。



约瑟夫·熊彼特

165

虽然米塞斯和熊彼特在认识论问题和经济科学的性质方面存在根本分歧,不过,关于经济学和心理学之间的关系这个微妙但却重要的问题,他们在本质上还是一致的。19世纪中叶,由于影响深远的英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努力,经验主义认识论已经深入人心,根据这种认识论,所有科学都建立在某种经验之上。对数学和经济学来说,这一经验基础就是心理经验。穆勒的认识论在奥地利最初大受欢迎,例如,它塑造了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的认识论立场。但不久后,一股席卷中欧的风潮成功驱散了穆勒主义的方法。就在世纪之交,两位哲学家戈特洛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和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对J. S. 穆勒提倡的逻辑的心理主义发起了毁灭性的打击。¹¹¹他们的著作对维也纳所有领域的新生代知识分子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熊彼特更是这场从经济学中驱逐心理学的运动的急先锋。他认为,探寻人类价值判断的心理学或生物学原因是多余的;经济学分析可以整个建立在价值判断的形式特征之上,也即,任何一种同质商品的效用随着数量的增加而下降。这种纯粹形式的“需要饱和定律”根本不涉及心理学。甚至它也不是正确的经济科学的一部分,而只是一种相较其他假说更方便、更好地解释了市场价格的假说而已。经济学家必须把价值判断的形式特征作为他们演绎推理的“终极所予”(ultimate given),然后比较推论的结果与

166

观察到的真实世界。¹¹²米塞斯后来沿着类似的路线,提出经济法则与行为人的心理构成毫无关系,但他同时又不认同熊彼特关于经济法则性质的看法。对熊彼特来说,科学命题的唯一基础就是外部世界的可观察性。而且,经济研究的唯一恰当方法就是遵循那种在自然科学中已经取得成功的思路。简而言之,他是一位实证主义者,相信只有一种方法可以获得“事实”,那就是对外部世界的观察。另一方面,米塞斯遵循了门格尔独树一帜的“经验理论”方法,并且尽其可能收集相关事实。然而不幸的是,米塞斯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之前没有写过任何关于方法论的东西,而熊彼特的观点却对新生代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167 1900年前后,熊彼特的认识论观点风头甚至盖过了门格尔和维塞尔,这些观点加强了熊彼特著作的思想和美学吸引力。熊彼特的实证主义使他对激烈的方法论之争采取了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对于价格理论的问题,熊彼特采取了一种彻底不可知论的态度,他认为从科学的观点看,价格是否“真的”来自主观价值或者生产成本,全无所谓。熊彼特只把主观主义价值论视为一个假说,它之所以比生产成本理论更受青睐,并不是因为后者是“错误的”而前者是“正确的”,而是因为主观主义价值假说可以解释更大范围的价格现象,这一点是生产成本理论所不能及的。

在经济理论家中,熊彼特是第一位真正的实证主义者,这可能是受到维也纳物理学家和哲学家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著作的启发,后者在那个时代以及之后数十年间极有影响。马赫为20世纪30年代的维也纳小组和逻辑实证主义铺平了道路。在《理论经济学的性质和要义》一书中,熊彼特从根本上认为按照维塞尔和瓦尔拉斯的想法构造的现代经济科学才是真正马赫意义上的科学。¹¹³他的观点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四十多年后在那篇著名的经济学方法论论文中提出的观点非常接近。¹¹⁴但是,弗里德曼的表述只是一个大概轮廓,还不算是真正的理论表述,而熊彼特的《理论经济学的性质和要义》一书篇幅宏大,长达600页,充分论述了经济学实证主义的观点。

168 维塞尔盛赞熊彼特的这本著作,写下了生平唯一的一篇书评,赞扬熊彼特在表述经济科学主要内容方面取得的成就。¹¹⁵维塞尔提出的唯一告诫是关于方法论的,但这却是他自己通常认为相对较不重要的一个部分。他激烈地批评了熊彼特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以及后者反对将心理内省作为经济知识的基础这一态度。维塞尔声称,熊彼特的这种方法论立场,使他未能充分展现经济科学的本质(Wesen)。与熊彼特的主张相反,维塞尔之所以坚持自己的方法,是因为这种方法最适合于经济研究的主题,他说:

事实就是,他从外部借用了现成的方法,却对这种方法本身缺乏了解……他为精确自然科学的成功所蒙蔽,接受了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甚至包括那些根本不适合于我们这门学科主题的部分。这样他就采纳了一种人为的方法,使用这种方法,他将永远无法达到他希望从其前辈手中继承的结果。¹¹⁶

接着,维塞尔出色地反驳了熊彼特的如下观点:经济学的基本定理均具假说性质。维塞尔说,自然科学的假说是关于未知事物的假设,而经济科学的假设始终包含关于真实世界相互之间联系的认识,即使并不总是忠实地反映这些联系。他区分了经济学家所做的两类假设:分离性假设(isolating assumptions)和理想化假设(idealizing assumptions)。前者是进行“思想实验”(Gedankenexperimenten)所需要的;¹¹⁷这些假设用于描述作为理论分析主题的事态:

就像开展实验的自然科学家一样,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心智观察中作出各种分离。复杂的经验不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解释。我们必须将其分解成为一些较小的要素,以便理解它们的意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通过个别性质的组合,推断整体效应。¹¹⁸

169

然而,这些分离必须是严格现实主义的,因为它们的作用完全取决于其真实性。相反,理想化假设并不需要忠实地反映现实的联系,而是刻意将这些现实联系转化为一个“理想”形式——例如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假设。¹¹⁹因此,即使按照这一存在争议(维塞尔承认这是极具争议的)的形式,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也始终包含一个已知的存在于人类意识中的真实世界关联。如果听从熊彼特的建议,拒绝使用这类假设,那就只能得到不完整而且最终也无可取信于人的经济学论证。¹²⁰

尽管反对熊彼特误入歧途的方法论主张,维塞尔还是赞扬了《理论经济学的性质和要义》一书:

虽然[熊彼特]迅速略过了所有那些他认为已经有人做过充分研究的主题,不过,他在那些更为困难的问题上花费了很多时间。仅仅几年之前,在他开始研究经济学的时候,他就曾自豪地说他的书不是写给初学者的,而是针对已经深入了解这门学科前沿知识的读者。¹²¹

170

熊彼特的出现,以及借助维塞尔和庞巴维克之力的地位提升,对于追随戈森足

迹的经济学家国际网络的形成和巩固是一个重要的进展。他在维塞尔打下的基础上继续用心经营,使得德语经济学的前景变得更为安全,避开了今天以新古典经济学著称的经济学流派的攻击。虽然维塞尔推进了杰文斯的理论,但把杰文斯带到维也纳的却是熊彼特。通过对自然价值学说内涵的思考,他发现,维塞尔的体系与列昂·瓦尔拉斯在洛桑提出的全局均衡(*general-equilibrium*, 通译为“一般均衡”,确切含义应为“全局均衡”。——译者注)框架之间存在重要而深远的关联。无论是杰文斯还是瓦尔拉斯,都是在虚构的“理想”条件下建立价格决定理论,从而摒弃了人类经济的各种基本特征,这些特征是门格尔、某种程度上也是庞巴维克试图整合进新的价格理论中的。例如,瓦尔拉斯和维塞尔都认为人的错误只是阻碍现实世界按照本来的路线行进的“摩擦”而已;他们也都隐含地否认所有经济财货数量本质上都与人类有关(例如私有产权),也不承认某一财货的效用或价值本质上是与个人评价这一财货的具体情境有关。瓦尔拉斯和维塞尔把价格形成过程设想为自由浮动的数量和同样自由浮动(且可测量)的效用之间的机械的相互作用。这种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就是全局均衡理论——只不过在瓦尔拉斯那里是明确提出来的,在维塞尔那里则是隐含的。

171 在《理论经济学的性质和要义》中,熊彼特为全局均衡理论给出了一个大体基于文字的精炼表述。他补救了瓦尔拉斯和维塞尔的某些缺陷。例如,他解释了所有财货数量都是占有数量这一事实,并且提出经济行为的本质即为交换,这已经非常接近于经济科学就是关于人的选择的科学这一结论。后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里夏德·冯·施特里格尔和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发展了这一洞见,并且提出,基本的经济现象就是偏好一物甚于他物的行为,而且几乎所有经济法则都与此一现象有关,不管是以何种方式。¹²²

熊彼特此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是关于方法论和认识论问题的讨论,其中,他对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和变更方法(*method of variations*)(比较静态[*comparative statics*])首次作了简洁的描述。经济法则只是顺带提及,仅仅作为其方法论和认识论主张的例证而已。他最重大的贡献,乃是根据借自古典力学的静态和动态的区分,重写了整个全局均衡理论。按照熊彼特的看法,“静态”经济和“动态”经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状态;它们呈现出了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分析方法。¹²³熊彼特不是第一个强调应该分别对静态和动态经济条件进行分析的
172 经济学家。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在他的《财富的分配》(*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一书中就提出过这一方法,比熊彼特要早几年,此书在维也纳经济学家中很有影响。但是,熊彼特给出了一种关于静态—动态问

题的机械论的解释,指出在一个真正的静态经济中,某个特定日期的所有事件仅是昨日之事的重复而已。此外,他认为以往的经济学家已经专门讨论过静态条件,因为这本来就是全局均衡理论的问题。而动态条件却尚未得到考察,经济学家甚至还没有认识到相关问题的存在。

熊彼特试图以他的《经济发展理论》填补这一空白。这部著作出版于1911年,恰好就在米塞斯出版他的首部大作一年之前。该书是对《理论经济学的性质和要义》在动态理论方面的补充,后者只关注静态条件。第二本书则包含三个主要论题。

首先,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完全是具有开拓精神的“企业家”的功劳——这类企业家是人群中的异数,他们与其他人相比,就像灵缇(greyhounds)和贵宾狗(poodles)的差别一样。创新企业家是社会演化的真正动力。他们把闻所未闻的产品和生产方法加于仅仅起着调节作用的抗拒变化的社会。正是这个主题,使得熊彼特广受朋友和同事的尊敬。二十年后,米塞斯将此书列为德语国家对经济学的四大贡献之一。¹²⁴直到今天,一些最优秀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仍为此书痴迷不已。¹²⁵

其次,熊彼特把企业家描述为本质上一无所有的市场参与者。他们需要银行信贷(“空手套白狼”)为其项目融资,因为所有其他投资资本都已经与其他项目绑在一起。对于熊彼特来说,资本本质上是“购买力”,而不是一堆能够维持工人生产过程的真实财货。因此,银行家仅仅通过印制更多的钞票,就可以无中生有,创造新的“资本”。

173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断言在静态条件下不会存在利息现象。支付给资本投资的利息仅在动态条件下形成,也就是说,利息是变化的结果。它的原始形式是企业家利润。相反,支付给债券或银行信用的利息不过是企业家被迫与银行家分享的利润,目的在于保证合作的达成。熊彼特特别向庞巴维克的理论提出了挑战,后者认为创造了利息的是静态条件下的时间偏好。熊彼特延续了约翰·贝茨·克拉克的路线,坚持认为时间的流逝与静态条件下的生产无关,因为消费和投资总是“合拍的”。

熊彼特的第一个论题——企业家推动进步,已经证明是最少争议的,但是,凭着另外两个论题,他就打开了一个潘多拉之盒,其中装满了过去六位杰出经济学家——不乏熊彼特本人的老师——曾经耗费毕生心血与之战斗的古老错误。

庞巴维克立刻意识到了这些精巧的观点在未来的危险后果。他写了一篇关于《经济发展理论》的长篇书评,试图弥补他的这位最有天分的学生之一造成的危

害。庞巴维克明确表示,熊彼特的“动态”利息理论完全是错误的。此外,熊彼特的经济分析有些草率,这辜负了作者出色的思想天赋。书评开篇的一个段落甚至指责熊彼特缺乏职业操守:

174

熊彼特为他的奇思妙想乐此不疲,但是不幸的是,他不具备自律精神(*Selbstüberwindung*),未能使他本人和他的思想服从慎重而全面的交叉审视,这样的审视本来可以很快在各个方面发现问题。¹²⁶

剖析了《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些最重要的缺陷之后,庞巴维克进一步确定了熊彼特著作的基本精神:

我不打算对熊彼特所有思想进行持续不断的批评。此刻我只想简短地给出我的结论,那就是熊彼特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不管他在别的方面多么出色,这确实是一个重商主义肤浅推理的错误:关于生产信用(*productive credit*)之可能范围的确定,他把货币和支付方式的作用而非经济体中的真实财货供应视为基本要素。熊彼特比他所想的,也许比他所希望的还要接近劳和麦克劳德之流(*the Laws and McLeods*),并且很遗憾地远离了休谟,尽管他对后者多有赞誉。¹²⁷

庞巴维克在反驳他的这位旧徒的学说上煞费苦心。他很清楚,观念影响世界,错误的思想可以摧毁一个国家甚或整个文明,如果它们是以熊彼特著作那样的优雅和活力呈现出来的话。不幸的是,一年之后庞巴维克就去世了,他的衣钵传给了维塞尔和熊彼特。他们两人使得下一代维也纳经济学家成了新兴的新古典综合派的一个部分。

注 释

1. Mises, *Erinnerungen* (Stuttgart: Gustav Fischer Verlag, 1978), p. 19; F. A. Hayek, "Einleitung," Carl Menger, *Gesammelte Werke*, F. A. Hayek, ed. (Tübingen: Mohr, 1968), vol. 1, pp. xxxii.

2. 门格尔成功卸任鲁道夫王储经济学家家庭教师职位后,取得了加入爵士行列的权利。

门格尔没有使用这一头衔,因为他更偏爱中产阶级的身份地位。参见 Brigitte Hamann, *Rudolf: Kronprinz und Rebell* (Munich: Piper, 1978), pp. 77, 86。

3. 关于门格尔,特别参见 Friedrich von Wieser, “Karl Menger,” Anton Bettelheim, ed., *Neue österreichische Biographie: 1815 – 1918* (Vienna, 1923), vol. 1, pp. 84 – 92, reprinted in idem, *Gesammelte Abhandlungen* (Tübingen: Mohr, 1929); Hayek, “Einleitung,” pp. vii-xxxvi; Yukihiro Ikeda, *Die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r “Grundsätze” Carl Mengers* (St. Katharinen: Scripta Mercaturae Verlag, 1997)。

4. 大约十年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当时自己的健康问题应该归咎于过去繁重的职业活动,还有他少年时期某些阶段营养不良,而且花在咖啡、恋爱上的时间太多了。之后他决定花更多的时间在乡下度过,经常出门散步。参见小卡尔·门格尔关于其父老卡尔·门格尔职业生涯的小传,“X. Beginn der akademischen Laufbahn,” *Carl Menger Papers*, Duke University, Box 21。

5. Ikeda, *Die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r “Grundsätze” Carl Mengers*, pp. 65, 170。

6. 这是当时连载小说特别时髦的主题,那个时代新的文学体裁。在法国,“连载小说之王”欧仁·休(Eugène Sue)通过《游荡的犹太人》(*Le Juif errant*) (1844—1845)一书名利双收。小说中的主角象征了犹太民族许多世纪以来遭受的压迫。

7. Kurt Paupié, *Handbuch der österreichischen Pressegeschichte 1848 – 1959* (Vienna: Braumüller, 1960), vol. 1, pp. 波皮耶(Paupié)还声称,门格尔自己的报纸《维也纳日报》也有官方或半官方的性质,尤其是因为门格尔与贝尔克雷迪(Belcredi)的密切关系。

8. 维塞尔强调说:“他进入了政府部门。”参见“Karl Menger,” p. 84。另见 F. A. Hayek, “Einleitung,” p. xii; Ki'ichiro Yagi, “Carl Menger as Editor: Significance of Journalistic Experience for his Economics and for his Later Life,” *Revue européenne des sciences sociales* 30, no. 92 (1992); Hamann, *Rudolf*, p. 78。

9. Wieser, “Karl Menger.”

10. 显然,门格尔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兴趣。1869年1月,他还在另一份维也纳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小说:《圣马克思的乞丐》(*Die Bettlerin von St. Marx*),该报名为《大众日报》(*Allgemeine Volkszeitung*)。参见 Ikeda, *Die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r “Grundsätze” Carl Mengers*, p. 65, n. 168。

11. 按照20世纪分析哲学的术语,门格尔的“要素”可以称为经济理论的“基础(primitives)”。

12. Carl Menger, *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Vienna: Braumüller, 1871), p. vii。巴里·史密斯(Barry Smith)已经明确指出,门格尔在经济分析中应用了亚里士多德式的现实主义。参见 Barry Smith, “Austrian Economics and Austrian Philosophy,” in Wolfgang Grassl and Barry Smith, eds., *Austrian Economics: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Background* (London: Croom Helm, 1986), pp. 1 – 36; idem, “Aristotle, Menger, Mises: An Essay in the Metaphysics of Economics,” Bruce J. Caldwell, ed., *Carl Menger and His Legacy in Economics*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63 – 88。另见 Raimondo Cubbedu, *The Philosophy of the Austrian School* (London: Routledge, 1993), chap. 1, § 1。

13. Menger, *Grundsätze*; translated as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p. 191.

14. 门格尔于1884年2月写给瓦尔拉斯的信,翻译和发表于 Étienne Antonelli, "Léon Walras et Carl Menger à travers leur correspondance," *Économie appliquée* 6, nos. 2-3 (1953): 269-87。本段引自 pp. 280f; (英文)译文出自本书作者。

15. 威廉·雅费(William Jaffé)强调说:

卡尔·门格尔在他的经济学中避免使用数学,并不是他不通数学,而是出于原则。他在1883年6月28日致信瓦尔拉斯时,已经花了一些时间通读了瓦尔拉斯的著作,他并未声称缺乏理解这些著作所需的数学知识,就像其他通信者那样,我们可以肯定,如果他读不懂的话,一定会提到这点。相反,卡尔·门格尔宣称他在原则上反对把数学作为一种推进经济学知识的方法加以运用。(William Jaffé, "Menger, Jevons and Walras De-Homogenized," *Economic Inquiry* 14 [December 1976]: 521)

罗伯特·埃贝尔(Robert Hébert)称门格尔手头有19世纪中叶法国“经济工程学”(eco-engineers)发表前沿数理经济学研究的那些杂志。门格尔还有这个思想学派主要的代表性著作。参见 Robert F. Hébert, "Jevons and Menger Re-Homogenized: Who is the Real 'Odd Man Out'?"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57, no. 3 (1998): 329。

16. 门格尔1884年2月致瓦尔拉斯的信, p. 282。

17. Wilhelm Roscher, *Geschichte der National-Oekonomik in Deutschland*, 1st ed. (Munich: Oldenbourg, 1874), pp. 1014f.

18. 例如,参见 Gustav Schmoller, "Volkswirtschaft, Volkswirtschaftslehre und methode,"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3rd ed. (Jena: Gustav Fischer, 1911), vol. 8, p. 426, 其中施莫勒提到他的学派反对李嘉图片面观点的一场战斗。

19. 出于同一原因,萨伊也为取代欧陆经济思想的传统铺平了道路,这一传统可以上溯到西班牙晚期经院学者。直到今天,这一传统仍然存在和活跃于欧洲天主教国家。参见后文。

20. Murray N. Rothbard, *Classical Economics: An Austrian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Cheltenham, U. K.: Edward Elgar, 1995), chap. 1.

21. 关于学院派经济学,特别是萨拉曼卡(Salamanca)的晚期学院派,参见 Joseph A. Schumpeter, *A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Marjorie Grice-Hutchinson, *The School of Salamanca: Readings in Spanish Monetary Theory, 1544-160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2); Raymond de Roover, *Business, Banking, and Economic Thought in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Emil Kauder, *A History of Marginal Utility Theor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Murray N. Rothbard, *Economic Thought before Adam Smith* (Cheltenham, U. K.: Edward Elgar, 1995); Jesús Huerta de Soto, "New Light on the Prehistory of the Theory of Banking and the School of Salamanca,"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9, no. 2 (1996): 59-81。

22. Shelagh Eltis and Walter Eltis, "The Life and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s of the Abbé de Condillac," in Etienne de Condillac, *Commerce and Government: Considered in Their Mutual Relationship* (Cheltenham, U. K.: Edward Elgar, 1997)。

23. 门格尔引述孔狄亚克的次数,在其引证的国外权威学者中仅次于亚当·斯密。而且相较而言,门格尔更愿意引述孔狄亚克。

24. 特别参见 Etienne de Condillac, *Essai sur l'origine des connaissances humaines* (1746); *Traité des sensations* (1754); *Le commerce et le gouvernement* (1776)。这些著作都收入了他的 *Œuvres complètes* (Paris: Tourneux, Lecoq et Durey, 1822), vols. 1, 3, and 4。

25. 1807年,戈特利布·胡费尔兰(Gottlieb Hufeland)称主观主义理论为“传统观点”,并建议永远不要偏离这个理论。参见 Gottlieb Hufeland, *Neue Grundlegung der Staatswirtschaftskunst* (Giessen and Wetzlar: Tasche & Müller, 1807), p. 18。

26. 特别参见 Erich Streissler, “The Influence of German Economics on the Work of Menger and Marshall,” Caldwell, ed., *Carl Menger and His Legacy in Economics*; idem, “Carl Menger, der deutsche Nationalökonom,” B. P. Priddat, ed., *Wert, Meinung, Bedeutung* (Marburg: Metropolis, 1997), pp. 33–88; Ikeda, *Die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r “Grundsätze” Carl Mengers*。

27. 埃里希·施特赖斯勒(Erich Streissler)指出,阿尔弗莱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London: Macmillan, 1891)完全具备典型的德国教科书的结构。参见 Streissler, “The Influence of German Economists on the Work of Menger and Marshall,” Caldwell, ed., *Carl Menger and his Legacy in Economics*, p. 51。

28. William M. Johnston, *Vienna, Vienna—The Golden Age, 1815–1914* (Milan: Arnoldo Mondadori, 1981), p. 15。

29. 这种观点并不限于“意识形态”领域的知识分子,例如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或哲学领域。柏林弗里德里克-威廉大学(Frederick-William University)校长、电生理学的先驱埃米尔·迪布瓦-雷蒙(Emil du Bois-Reymond)在1870年8月3日的一次公开演讲中,称他的大学是“霍亨索伦王朝的思想卫士。”参见 Emil du Bois-Reymond, *Über den deutschen Krieg* (Berlin: Hirschwald, 1870)。

30. 施特赖斯勒《德国经济学对卡尔·门格尔和马歇尔著作的影响》。其中,施特赖斯勒还令人信服地纠正了以下这个至今流行的观念:年轻一代历史学派在某种程度上比卡尔·门格尔更深地扎根在经济科学的德国传统之中。正如施特赖斯勒所说,真正革命的其实是古斯塔夫·施莫勒,而不是门格尔。

31. 施莫勒是1864—1872年间哈雷大学的一位教授。作为普法战争中对法胜利的普鲁士-德意志一方的第一批受益者,他搬到了斯特拉斯堡大学(1872—1882),最终在柏林大学获得了一个教席(1882—1913)。

32. Gustav Schmoller, “Einladung zur Eisenacher Versammlung von 1872,” printed in Franz Boese, *Geschichte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1872–1932*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39), p. 241。

33. 这个中伤性的词汇“*Kathedersozialisten*”是海因里希·贝尔纳德·奥本海默(Heinrich Bernard Oppenheim)在他的 *Der Katheder-Sozialismus* (Berlin: Oppenheim, 1872)一书中杜撰出来的。参见 Ralph Raico, *Die Partei der Freiheit* (Stuttgart: Lucius & Lucius, 1999), p. 200。出席1872年首次会议的奥地利人只有一位弗里德曼博士(Dr. Friedmann)(可能是 Otto Bernhard Friedmann),一位维也纳记者。

34. 关于协会的历史,参见 Boese, *Geschichte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1872 - 1932*; Dieter Lindenlaub, *Richtungskämpfe im 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 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im Kaiserreich vornehmlich vom Beginn des "Neuen Kurses" bis zum Ausbruch des ersten Weltkrieges, 1890 - 1914* (Wiesbaden; Steiner, 1967); Irmela Gorges, *Sozialforschung in Deutschland, 1872 - 1914*, 2nd ed. (Frankfurt a. M.: Anton Hain, 1986)。

35. Raico, *Partei der Freiheit*, p. 188.

36. 许多年后,米塞斯这样概括他们的态度:

正是这种官场心理——就像布伦塔诺所言“社会政策协会的唯一正确的委员会”——认为那些能够号召最多的政府部门和官员的意识形态才是富有建设性和积极的。试图精简政府工作人员的人,则被视为“消极的思想者”或者“国家的敌人”。(Mises, *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 [New York: Arlington House, 1977], pp. 82 - 83)

另见 Mises, *The Historical Setting of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New Rochelle, N. Y.: Arlington House, 1969), p. 31。关于俾斯麦主义福利国家的历史,以及弗里德里克二世统治时期的历史,参见 Gerd Habermann, *Der Wohlfahrtsstaat: Die Geschichte eines Irrwegs*, 2nd ed. (Frankfurt: Ullstein, 1997)。

37. Gustav Schmoller, “Eröffnungsrede zum 25 jährigen Bestehen des Vereins auf der Kölner Tagung von 1897,” printed in Boese, *Geschichte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1872 - 1932*, pp. 253ff., in part pp. 262f.

38. *Ibid.*, pp. 260f.

39. 较早时期,反对协会活动最激烈的是一些会外人士,例如海因里希·奥本海默和朱利斯·沃尔夫(Julius Wolf)。参见 Raico, *Partei der Freiheit*, pp. 200ff。波勒和福格特直到 1905 年离开协会后才发表了他们对协会的影响广泛、切中要害的批评。

40. 例如,参见 Gustav Schmoller, “Die Gerechtigkeit in der Volkswirtschaft,” *Schmollers Jahrbuch* 5 (1881), pp. 19 - 54; *idem*, *Zur Social- und Gewerbepolitik der Gegenwart*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890); *idem*, *Grundriss der allgemeinen Volkswirtschaftslehre*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00)。

41. 参见他在 1884 年写给瓦尔拉斯的一封信件,英译文见 Antonelli, “Léon Walras et Carl Menger à travers leur correspondance,” pp. 269 - 87。此段记载见 p. 283。

42. Carl Menger, *Untersuchungen zur Methode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im besondern*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883); translated as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Method of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Particular*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5)。

43. Gustav Schmoller, “Zur Methodologie der Staats- und Sozial-Wissenschaften,” *Schmoller's Jahrbuch* n. s. 7, no. 3 (1883): 239ff. See also the review by Norbert Leser in *Conrad's Jahrbücher* n. s. 7, p. 273ff.

44. 参见罗雪尔 1886 年版的《概论》(*Grundlagen*),引自 Karl Milford, “Hufeland als Vorläufer von Menger und Hayek,” 见于 Karl Milford, “Hufeland als Vorläufer von Menger und Hayek,” in Birger Priddat, ed., *Wert, Meinung, Bedeutung: Die Tradition der subjektiven Wertle-*

hre in der deutschen Nationalökonomie vor Menger (Marburg: Metropolis, 1997), pp. 99f. 1871年,门格尔曾将他的《原理》(Grundsätze)题献给罗雪尔。

45. 就门格尔对讨论的贡献而言,参见 Carl Menger, *Die Irrthümer des Historismus in der deutschen Nationalökonomie* (Vienna: Alfred Hölder, 1884); idem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Zeitschrift für das Privat- und öffentliche Recht der Gegenwart* 14 (1887); idem, “Grundzüge einer Klassifikation der Wirtschaftswissenschaften,”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n. s. 19 (1889)。这些论文重印在 Carl Menger, *Gesammelte Werke*, F. A. Hayek, ed., 2nd ed. (Tübingen: Mohr, 1970), vol. 3。

46. 整个事态并不能完全概括为自由主义取向的理论家和国家主义的历史学家之间的对立。事实上也有一些倾向市场的历史主义者,例如卢约·布伦塔诺,以及一些具有很强的国家主义倾向的理论家,例如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甚至包括维塞尔。

47. Richard Schüller, *Die klassische Nationalökonomie und ihre Gegner* (Berlin: Heymanns, 1895)。希尔德布兰德已经接替洛伦茨·冯·施泰因,但只在维也纳待了一年。

48. 要想大概了解19世纪德国关于科学本质的思想,参见洪堡、高斯、沙米索(Chamisso)、菲尔绍(Virchow)、黑尔姆霍尔茨(Helmholtz)、兰克(Ranke)、布尔克哈特(Burckhardt)等人的论文原文,收入 Wolfgang Schirmacher, ed., *German Essays on Science in the 19th Century* (New York: Continuum, 1996)。

49. 关于这些作者之间分歧的描述,可以参见 J. R. Hicks, “Léon Walras,” *Econometrica* (October 1934): 338; Schumpeter, *A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p. 918; Jaffé, “Menger, Jevons and Walras De-Homogenized,” pp. 511ff.; Sandra J. Peart, “Jevons and Menger Re-Homogenized?”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57, no. 3 (1998): 307ff。按照一般流行的观点,瓦尔拉斯超越了门格尔和杰文斯,因为他是全局均衡理论的先驱,因而证明了所有经济现象的相互依赖关系。这种观点很奇怪,因为全局的相互依赖关系,事实上是任何经济分析的先决条件。事实上这只是对存在稀缺性这一说法的另一种表达方式罢了。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纠正了这一错误的观点,强调门格尔同样是在交互依赖关系之中分析了经济现象。参见 Mark Blaug, “Comment” [on O’Brien’s “Lionel Robbins and the Austrian Connection”], Caldwell, ed., *Carl Menger and His Legacy in Economics*, p. 186。

50. Jaffé, “Menger, Jevons and Walras De-Homogenized,” pp. 513ff., 518。法国有位前辈学者朱尔·杜普伊(Jules Dupuit),他在1840年代后期发表了两篇论边际价值的文章。参见 Robert Ekelund and Robert Hébert, *Secret Origins of Modern Microeconomics: Dupuit and the Engineer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9); and Jean-Pascal Simonin et François Vatin, *L'oeuvre multiple de Jules Dupuit (1804 - 1866): Calcul d'ingénieur, analyse économique et pensée sociale* (Angers: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Angers, 2002)。

51. Hermann Heinrich Gossen, *Entwicklung der Gesetze des menschlichen Verkehrs und der daraus fliessenden Regeln für menschliches Handeln* (Braunschweig: Vieweg & Sohn, 1854)。

52. 参见他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 1879年第二版前言, p. il。

53. Léon Walras, “Un économiste inconnu: Hermann-Henri Gossen,” *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April and May 1885)。这就是那位在与门格尔的通信中为他的德国同胞无法理

解《原理》感到遗憾的瓦尔拉斯。

54. 参见瓦尔拉斯1887年2月2日致门格斯的信,翻译并发表于Antonelli, "Léon Walras et Carl Menger à travers leur correspondance," pp. 269-87。其中pp. 285f引用了该信。另见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之间的信件往来,发表于《经济学家杂志》(*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1874年6月),在1887年1月27日致瓦尔拉斯的信中,门格尔强调说他的方法和戈森的方法之间只有有限的相似之处,但在“关键问题”上,并不一致。参见Antonelli, "Léon Walras et Carl Menger à travers leur correspondance," pp. 269-87. The letter is quoted on pp. 284f.

55. 雅费("Menger, Jevons and Walras De-Homogenized," pp. 515f)强调说,瓦尔拉斯起初并没有将边际效用递减与消费数量联系起来,而是与占有数量联系起来。瓦尔拉斯在其价格理论的心理基础上进行推论时,的确要比戈森和杰文斯更为谨慎,但是他在《政治经济学纲要》(*Éléments d'économie politique*)一书中,最终还是引入了戈森风格的心理分析。不过,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就我们的目的来说最关键的问题是,瓦尔拉斯(正如戈森和杰文斯一样)的价值是双边关系(*two-sided relationship*),其中涉及行为主体(*acting person*)和一个其他对象;而门格的对价值特征的分析至少包括三个要素:行为的人,以及根据行为主体的观点加以排序的两个事物。

56. Gossen, *Entwicklung der Gesetze des menschlichen Verkehrs und der daraus fließenden Regeln für menschliches Handeln*, pp. 80ff.

57. 这一事实对理解20世纪经济思想史是至关重要的。戈森显然是一位热情的数学家,他是在父亲的严厉督促下才去学习法律;参见F. A. Hayek, "Einleitung," introduction to Hermann Heinrich Gossen, *Entwicklung der Gesetze des menschlichen Verkehrs und der daraus fließenden Regeln für menschliches Handeln*, 3rd ed. (Berlin: Prager, 1927), pp. xf。他的所有追随者都有同样的思想倾向。正如马克·布劳格指出的那样,杰文斯最初学习化学和生物学,后来才将注意力转到经济学上。他的“灵感来自边沁关于愉悦和痛苦的‘幸福微积分’,后来又接触了狄奥尼修斯·拉德纳(Dionysius Lardner)和弗莱明·詹金斯(Fleming Jenkins)的著作,这是19世纪60年代英国的两位工程—经济学家”(*Great Economists before Keyn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ives and Works of One Hundred Great Economists of the Pa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00)。瓦尔拉斯希望正式从事文学、科学和工程学的研究。从他的父亲奥古斯特·瓦尔拉斯那里,他接受了这样的信念:效用最大化的概念是经济科学的基本要素。瓦尔拉斯的伟大追随者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也是一个工程师,转向经济学研究时已经四十二岁。同样,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和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的第一个大学学位都是数学。古斯塔夫·卡塞尔——按照布劳格的说法(*ibid.*, pp. 41ff),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写出过最受欢迎的教科书,是一位数学博士,之后还当过校长,这才转入经济学,成为瓦尔拉斯全局均衡理论最伟大的推广者。相较而言,奥地利经济学家的知识背景通常不是来自数理训练,而是通过法律学习。直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所有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必须首先取得法律学位,才能转向经济研究。因此,维也纳的经济学家以概念思考的卓越能力而著称,最为重要的是,他们热切地希望将他们的概念与可观察的真实世界联系起来。他们的法学训练有效地抵消了其中一些人对自然科学的热情(例如庞巴维克年轻时就对理论物理学很有兴趣;参见Joseph A. Schumpeter, "Eugen von

Böhm-Bawerk,” *Neue Österreichische Biographie* [Vienna, 1925], vol. 2, p. 65)。

58. Jaffé, “Menger, Jevons and Walras De-Homogenized,” p. 519.

59. *Ibid.*, p. 520.

60. Mises, *Money, Method, and Market Process: Essays by Ludwig von Mises*, Richard Ebeling, ed.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90).

61. 参见小卡尔·门格尔关于他的父亲老卡尔职业生涯的小传,“X. Beginn der akademischen Laufbahn”。

62. 大致而言,这一职位相当于目前美国的副教授。

63. 他一定是得到了某些政治势力的保护。这里应该牢记的是,门格尔的新闻记者活动使他很早接触到了地位显赫的政治势力。这些关系可能对他申请维也纳大学教授席位有所帮助。

64. Erich Streissler, “Menger’s treatment of economics in the Rudolf lectures,” Erich W. Streissler, and Monika Streissler, eds., *Carl Menger’s Lectures to Crown Prince Rudolf of Austria* (Aldershot, U. K.: Edward Elgar, 1994), pp. 4, 14.

65. Israel Kirzner, “Menger, Classical Liberalism, and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Caldwell, ed., *Carl Menger and His Legacy in Economics*, pp. 93 – 106; Ki’ichiro Yagi, “Carl Menger as Editor: Significance of Journalistic Experience for his Economics and for his Later Life,” *Revue européenne des sciences sociales* 30, no. 92 (1992); *idem*, “Carl Menger and Historical Aspects of Liberalism in Austria,” 该文发表于一部讨论卡尔·门格尔和自由主义历史视角的论文集 (Center for 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December 18 – 19, 2004)。

66. *Ibid.*

67. Kurt Rothschild, “Carl Menger,” Walter Pollack, ed., *Tausend Jahre Österreich* (Vienna: Verlag Jugend und Volk, 1974), vol. 3, pp. 67ff.

68. Klaus H. Hennings, *The Austrian Theory of Value and Capital: Studies in the Life and Work of Eugen von Böhm-Bawerk* (Cheltenham, U. K.: Edward Elgar, 1997), pp. 10f., 24, n. 13. 米塞斯关于门格尔和庞巴维克态度的描述,给了我们一个多少有些误导的时代图像。在 *Erinnerungen* (p. 22) 中,米塞斯强调,这些人对于通过个人权力促进他们的事业并不感兴趣 (另见 Mises, *Historical Setting of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p. 39)。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相当的权力,也不意味着他们从不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

69. Hayek, “Einleitung,” pp. xxxiiiif.

70. 门格尔退休时才六十二岁,还算比较年轻,一个主要原因似乎是他与女仆之间的一段丑闻。由于小卡尔的诞生,两人之间的隐情传扬了出去。门格尔承认,小卡尔是他的儿子。小卡尔使门格尔付出了结束他的学术生涯的代价,因此也改变了奥地利经济学的历史,因为在门格尔的指导下,这个历史一定会和他的继承者——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领导下的情形大不一样。但是小卡尔的诞生也使奥地利学派与主流学派之间通过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达成了谅解:小卡尔·门格尔自己后来终也成了一位著名的数理经济学家。

71. Shigeki Tomo, *Eugen von Böhm-Bawerk* (Marburg: Metropolis, 1994), pp. 157 – 62.

72. 关于庞巴维克,特别参见 F. X. Weiss, “Eugen von Böhm-Bawerk,” F. X. Weiss, ed., *Gesammelte Schriften* (Vienna: Hölder-Pichler-Tempsky, 1926; reprint Frankfurt a. M.: Sauer & Auvermann, 1968), vol. I, pp. iii – xv; Schumpeter, “Eugen von Böhm-Bawerk;” H. Schullern-Schrattenhofen, “Eugen Ritter von Böhm-Bawerk,” Adolf Günther, ed., *Die Universität Innsbruck* (Innsbruck: Tyrolia, 1928), pp. 17 – 21; Hennings, *The Austrian Theory of Value and Capital*; Tomo, *Eugen von Böhm-Bawerk*; idem, “Eugen von Böhm-Bawerk’s Innsbruck Lectures on Economics,” Eugen von Böhm-Bawerk, *Innsbrucker Vorlesungen über Nationalökonomie* (Marburg: Metropolis, 1998)。

73. 在格罗夫市档案馆可以找到题为《在克尼斯研讨班上关于利息的报告》(Referat über Kapitalzins im Knies’schen Seminar)的庞巴维克论文的复印件,档案编号 Box # 4。维塞尔的论文在其死后发表,Wieser, *Gesammelte Abhandlungen*, Hayek, ed. (Tübingen: Mohr, 1929)。

74. 庞巴维克担任财政部长期间的主要政绩是奥地利直接税制的改革。他于 1889 年开始推进这个计划,1896 年,改革方案获得投票通过,成为法律,与他最初的建议相比,几乎未作实质性的修改。除了其他条款,庞巴维克的法律还引入了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 5%),与累进税率原则一起进入了奥地利法典。参见 Schumpeter, “Eugen von Böhm-Bawerk,” pp. 75, 77; Alois Gratz, “Die österreichische Finanzpolitik von 1848 bis 1948,” Hans Mayer, ed., *Hundert Jahre österreichischer Wirtschaftsentwicklung, 1848 – 1948* (Vienna: Springer, 1949), p. 278。对他在财政部的活动的最全面叙述,见于 Tomo, *Eugen von Böhm-Bawerk*, pp. 53 – 65, 141 – 78。关于庞巴维克的经济理论,另见 Hennings, *The Austrian Theory of Value and Capital*。

75. 熊彼特称,作为部长,庞巴维克遵循的座右铭是:“财政部长必须随时为辞职做好准备,也要时刻表现得好像他从未打算辞去工作一样。”后来由于一项提高军队预算的政策没有相应的储蓄或增税支持,庞巴维克辞去了职务。参见 Schumpeter, “Eugen von Böhm-Bawerk,” pp. 79f。庞巴维克原则上并不反对额外的政府支出。事实上,克贝尔(Koerber)内阁(1900 – 1904)最大的策略就是通过一个野心勃勃的支出项目恢复和增强维也纳中央政府对奥匈帝国各民族的凝聚力。这个策略成功了。民族文化的冲突突然转入了不那么引人注意的地方,因为各民族的经济集团和金融势力觉得,中央政府的事务要比继续奉行对抗政策更为重要。参见 Rudolf Sieghart, *Die letzten Jahrzehnte einer Grossmacht* (Berlin: Ullstein, 1932), pp. 56ff。

76. Schullern-Schrattenhofen, “Eugen Ritter von Böhm-Bawerk,” p. 21。作者评论说,这次当选非常值得关注,因为经济学此时还不被视为一门声望很高的学科。

77. Schumpeter, “Eugen von Böhm-Bawerk,” p. 80。熊彼特和米塞斯(*Erinnerungen*, p. 23)都提到,庞巴维克曾拒绝出任一家维也纳重要银行的执行董事。

78. Mises, *Erinnerungen*, p. 24。

79. 该文献为 Böhm-Bawerk, *Rechte und Verhältnisse vom güterwirthschaftlichen Standpunkte*。(字面意思是:从经济物品的理论观点看权利和法律关系。)他的任教资格论文原始手稿有 728 页,标题为“Kritische Beiträge zur volkswirtschaftlichen Lehre von der Güternutzung”。参见 Tomo, *Eugen von Böhm-Bawerk*, p. 71。

80. Böhm-Bawerk, "Grundzüge der Theorie des wirtschaftlichen Güterwerths," *Conrad's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n. s. 13 (1886); reprinted as *Grundzüge der Theorie des wirtschaftlichen Güterwerths*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932).

81. Schumpeter, "Eugen von Böhm-Bawerk," pp. 70, 72.

82. 这一论题的线索可见 Menger, *Principles*, pp. 153f.; and William Stanley Jevons,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Macmillan, 1888), p. 72.

83. 1898年译为英文发表,题为 *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 (London: T. F. Uinwin, 1989)。

84. 这篇文章是对鲁道夫·施托尔茨曼(Rudolf Stolzmann)的批评性回应。可能庞巴维克也希望先发制人,防止错误观点侵蚀他的一些最有天分的学生。米塞斯就是一个例子,他在此前不久还主张公会要为所有工人提高工资率,至少在短期内应该如此。参见 Mises, "Die allgemeine Teuerung im Lichte der theoretischen nationalökonomie,"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Sozialpolitik* 37 (1912): 570f.

85. 若要了解他的主要追随者的狂热之情,可以参见 Hans Mayer, "Friedrich Freiherr von Wieser," *Neue Österreichische Biographie* (Vienna, 1929), vol. 6, pp. 180-98。更为关键的简介参见 Klaus H. Hennings, "Friedrich Wieser," Walter Pollack, ed., *Tausend Jahre Österreich*, vol. 3, pp. 71ff.

86. Schumpeter in *Neues Wiener Tagblatt* (July 10, 1921); quoted from F. A. Hayek, "Friedrich Freiherr von Wieser,"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125 (1926): 523.

87. Hayek, "Friedrich Freiherr von Wieser,"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pp. 523f.

88. *Ibid.*, p. 524.

89. Hans Mayer, "Friedrich Freiherr von Wieser," vol. 6, pp. 184, 187. Hayek, "Friedrich Freiherr von Wieser," p. 518.

90. 在他的任教资格论文序言里,他承认自己的思想受惠于杰文斯。他提到这位英国人是他灵感的主要来源之一(另一个是门格尔);参见 Friedrich von Wieser, *Über den Ursprung und die Hauptgesetze der wirtschaftlichen Werthes* (Vienna: Hölder-Pichler-Tempsky, 1884), p. Viii。

91. Friedrich von Wieser, *Der natürliche Werth* (Vienna: Hölder-Pichler-Tempsky, 1889), § 3, p. 7; *idem*,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Wirtschaft*, 2nd ed. (Tübingen: Mohr, 1924), p. 24. 哈耶克注意到,维塞尔通过戈森的需要饱和定律“在其心理学基础方面”对价格的基本原理“作了补充”(参见 Hayek, "Friedrich Freiherr von Wieser," p. 520)。正如我们上面已经指出的,门格尔的价值理论并未如此强调此类满足感的递减。

92. Hayek, "Einleitung," p. xiv. 在他为门格尔选集写的导言里,哈耶克指出,1870年 F. A. 兰格(F. A. Lange)的一本书已经正面提及戈森的著作(参见 Hayek, "Einleitung," p. x, n. 2),但是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维塞尔不是唯一一位沿着杰文斯主义路线发展了边际效用

分析的维也纳理论家,还有人也这样做了,其中尤其是两位非学院的经济学家:鲁道夫·奥斯特皮茨(Rudolf Auspitz)和里夏德·利本(Richard Lieben),他们在维塞尔之后出版了两本仅仅涉及价格理论的图表表达(某种程度上,也是代数表达)的著作。参见 Rudolf Auspitz and Richard Lieben, *Zur Theorie des Preises*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887); idem,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Theorie des Preises*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889)。两位作者不是学院中人,不过他们的研究非常出色,而且是建立在对该领域已有文献的彻底掌握的基础上,尤其是贝努利(Bernoulli)、拉普拉斯(Laplace)、屠能(Thünen)、杜普伊特(Dupuit)、戈森、曼戈尔特(Mangoldt)、门格尔、杰文斯、瓦尔拉斯、维塞尔、庞巴维克和劳恩哈德(Launhardt)。正如与他们同时代的维也纳杰文斯主义者一样,奥斯特皮茨和利本强调了他们经济分析的虚构本质。这样一来,由于注意到经济理论家无法通过实验分解原因和结果,他们断定经济学家“被迫带着他们的观念躲入一个抽象世界,因为这样可以更加容易地抓住问题;但是他又必须试着逐步改变假设以便接近真实世界”(*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Theorie des Preises*, p. vii; see also Wieser, *Der natürliche Werth*, part 2)。换句话说,不切实际的假设对于经济分析来说绝对是最为根本的。经济科学的现实主义充其量也就是对真实世界的一种近似,而不是对它的描述。不过,奥斯特皮茨和利本对数理均衡经济学的内在逻辑有相当敏锐的把握。例如,他们指出,只有当每个个体都在寻求个人满足的最大化,而且每个个体都知道如何选择最适合于这一目的的生产要素组合的时候,才能达到均衡(例如,参见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Theorie des Preises*, p. 537)。维也纳之外的杰文斯主义德语学者,包括 Knut Wicksell, *Über Wert, Kapital und Rente* (Jena: Gustav Fischer, 1893); 以及 Georg Sulzer, *Die wirtschaftlichen Grundgesetze in der Gegenwartsphase ihrer Entwicklung* (Zurich: Müller, 1895)。

93. 标题的字面翻译是“论经济价值的原因和主要法则”。这一著作尚未译成英文。

94. 在1911年的一篇文章里,他为这些——按照他本人的说法——理想化的假设所包含的虚构成分提出了辩护。参见 Friedrich von Wieser, “Das Wesen und der Hauptinhalt der theoretischen Nationalökonomie—kritische Glossen,” *Jahrbuch für Gesetzgebung, Verwaltung und Volkswirtschaft im deutschen Reich* 35, no. 2 (1911); reprinted in Wieser, *Gesammelte Abhandlungen*, Hayek, ed., pp. 10–34。我们将在下文讨论熊彼特的时候给出维塞尔的论证。

95. Friedrich von Wieser, “Grenznutzen,”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2nd and 3rd editions, Jena: Gustav Fischer, 1900 and later); reprinted in Wieser, *Gesammelte Abhandlungen*, Hayek, ed., pp. 88, 93。

96. 这个评论见于 *Schmollers' Jahrbuch* 13 (1889): 1488–90。

97. 维塞尔提出“边际”(Grenznutzen)这个术语,是为了传达杰文斯“最后效用”这个概念的含义。通过杰文斯的一个学生,菲利普·威克斯蒂德(Philip Wicksteed),这个新术语进入了英语世界;参见 Philip H. Wicksteed, *The Alpha-bet of Economic Science* (reprint,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888] 1970)。

98. 举例而言,维塞尔声称门格尔认为边际价值递减法则就是戈森式的“饱和定律”(Wieser, “Karl Menger,” p. 89)。庞巴维克对这种混淆也有一定责任。他对价值和价格理论的首次表述是在1886年,深受维塞尔《根源和主要法则》(1884)的影响,因而间接受到戈森和杰文斯的影响。他至少隐含地赞同这样的观点,那就是价值是一个心理现象,与人类的

情感领域有关,而且他还相信价值是可度量的,也可以进行人际比较。虽然这些假设在他的著作里(与维塞尔相比)扮演了一个相对无关紧要的角色,但他认同这些观点的事实,从根本上促使人们背离了门格尔现实主义经济学,而走向了新兴的新古典范式。瓦尔拉斯曾对门格尔(门格尔不太情愿承认戈森是他思想的先驱)抱怨说,毕竟,庞巴维克确实有着相同的观点,这一事件是颇具标志性的。瓦尔拉斯相信“我们不可能否认,是他[戈森]率先清晰地以数学形式表达了我所谓的效用(*utilité*)和稀缺(*rareté*),而这正是冯·庞巴维克的主观价值(*subjectiver Wert*)或边界价值(*Grenzwert*)”。引自瓦尔拉斯在1887年2月2日写给门格尔的信,译文发表于Antonelli, “Léon Walras et Carl Menger à travers leur correspondance,” pp. 269–87。此处段落引自 pp. 285f., 是由我翻译的。

99. 19世纪晚期卡尔·门格尔的一位学生罗伯特·楚克坎德尔,也是沿着同样的流行路线提出他的看法。在他眼里,价格只是价值的“表达”,并且他也反对庞巴维克的观点,后者认为价格和价值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特征,使得它们能够汇集在同样的分析框架下。参见 Robert Zuckerkandl, *Zur Theorie des Preises*, 2nd ed. (Leipzig: Stein & Co, [1889] 1936); reprint (Amsterdam: Liberac, 1968), pp. 24f. and passim.

100. Wieser, *Der natürliche Werth*, p. 54.

101. Ibid, p. 60.

102. *Erinnerungen*, p. 21. 米塞斯说,尽管维塞尔极富个人魅力,但他的研究并不具有原创性,而且对奥地利学派的发展弊大于利。米塞斯在解释自己的贡献时,明确表示他的工作是建立在门格尔和庞巴维克,而不是维塞尔的基础上。

103. Friedrich von Wieser,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Wirtschaft*, 1st ed. (Tübingen: Mohr, 1914). 英文版的书名为《社会经济学》,首次出版于1927年(New York: Adelphi), 附有 W. C. 米切尔(W. C. Mitchell)所写的前言。因此,维塞尔在国外也被认为是两次大战之间奥地利经济学的主要权威。这对解释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兴起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104.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哈耶克的著作讨论了社会科学中的所有基本错误——尤其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整体论的内在错误,他并没有论及经济理论中的“心理主义”。

105. Jeffrey M. Herbener, Hans-Hermann Hoppe, Joseph T. Salerno, “Introduction to the Scholar’s Edition,” Ludwig von Mises,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Scholar’s edition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98), pp. vff.; Joseph T. Salerno, “The Place of *Human Ac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conomic Thought,”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2, no. 1 (1999): 35ff.

106. Joseph A. Schumpeter, *Wesen und Hauptinhalt der theoretischen Nationalökonomie* (Munich: Duncker & Humblot, 1908). 关于熊彼特,参见 Eduard März, *Joseph Alois Schumpeter—Forscher, Lehrer und Politiker* (Vienna: Verlag für Geschichte und Politik, 1983); Wolfgang Stolper,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The Public Life of a Private Man*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Richard Swedberg, *Joseph A. Schumpeter—eine Biographie* (Stuttgart: Klett-Cotta, 1994)。另见 Stephan Böhm, “Schumpeter and Mises,” Klaus Hennings and Warren J.

Samuels, eds., *Neoclassical Economic Theory, 1870 to 1930* (Boston: Kluwer, 1990)。

107. 他也是1913—1914年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1927—1928年和1930年哈佛大学访问教授。

108. März, *Joseph Alois Schumpeter—Forscher, Lehrer und Politiker*, pp. 169ff.; Swedberg, *Joseph A. Schumpeter—eine Biographie*, pp. 100f.

109. 他年轻时野心勃勃,漫无边际。他想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奥地利最伟大的骑士和维也纳最伟大的人。参见 Swedberg, *Joseph A. Schumpeter—eine Biographie*, p. 71。

110. 较为次要的例子,是米塞斯对后来称为“显示偏好”理论的认可。参见 Murray N. Rothbard, “Toward a Reconstruction of Welfare and Utility Economics,” Mary Sennholz, ed., *On Freedom and Free Enterprise: Essays in Honor of Ludwig von Mises* (New Haven, Conn.: Van Nostrand, 1956)。同样,米塞斯同意熊彼得(以及社会学家格奥尔格·西美尔)的以下观点:如西美尔和熊彼得所言,选择或“交换”是经济学的基本现象。

111. Gottlob Frege, *Function und Begriff* (Concept and Object) (Jena: Pohle, 1892); *Die Grundlagen der Arithmetik* (The Foundations of Arithmetic) (Jena, Pohle, 1884); *Die Grundgesetze der Arithmetik* (Fundamental Laws of Arithmetic) (Jena: Pohle, 1893); Edmund Husserl, *Logical Investigations* (Halle a. S.: Max Niemeyer, 1900)。

112. Schumpeter, *Wesen und Hauptinhalt der theoretischen Nationalökonomie*, pp. 64ff.

113. 在1906年的一篇论述他所谓的理论经济学数理方法的文章中,他已经预见了这一论题;参见 Joseph A. Schumpeter, “Über die mathematische Methode der theoretischen Ökonomie,” *Zeit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Sozialpolitik und Verwaltung* 15 (1906): 30–49。

114. Milton Friedma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chap. 1.

115. Friedrich von Wieser, “Das Wesen und der Hauptinhalt der theoretischen Nationalökonomie—kritische Glossen,” *Jahrbuch für Gesetzgebung, Verwaltung und Volkswirtschaft im deutschen Reich* 35, no. 2 (1911); reprinted in Wieser, *Gesammelte Abhandlungen*, pp. 10–34.

116. *Ibid.*, p. 12.

117. 维塞尔没有在他的论文中使用这一表述,不过物理学家—哲学家恩斯特·马赫已经引入这一说法。参见 E. Mach’s 1897 paper “Über Gedankenexperimente,” reprinted in his *Erkenntnis und Irrtum*, 5th ed. (Vienna, 1926; reprint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91), pp. 183–200。

118. Wieser, “Das Wesen und der Hauptinhalt der theoretischen Nationalökonomie—kritische Glossen,” p. 22.

119. *Ibid.*, p. 23.

120. 维塞尔警告说,熊彼特的表述风格可能妨碍了对经济关系意义的理解:

熊彼特本人仍然了解这些意义,因为那是他的前辈已经教给他的。但是,他带领的学生却不再理解这些,因为熊彼特剥夺了他们接触那些至为微妙的联系的机会,而这些联系只对内在观察显现自身。(ibid. pp. 31f)

121. Ibid., p. 33.

122. Schumpeter, *Wesen und Hauptinhalt der theoretischen Nationalökonomie*, pp. 50, 80, 200; Mises, *Theorie des Geldes und der Umlaufsmittel* (Leipzig and Munich: Duncker & Humblot, 1912); idem, *Die Gemeinwirtschaft* (Jena: Gustav Fischer, 1922); idem, *Grundprobleme der Nationalökonomie* (Jena: Gustav Fischer, 1933); Richard von Strigl, *Die ökonomischen Kategorien und die Organisation der Wirtschaft* (Jena: Gustav Fischer, 1923); Lionel Robbins,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 (London: Macmillan, 1932).

123. Schumpeter, *Wesen und Hauptinhalt der theoretischen Nationalökonomie*, pp. 182f.

124. 米塞斯致海德小姐 (Miss Haider) 的信 (Brookings Institution), 信件标注日期为 1931 年 7 月 3 日; Mises Archive 66a: 87f. 他强调说, 他没有把自己的著作包括在内。

125. 参见伊斯雷尔·柯兹纳 (Israel Kirzner) 关于熊彼特的讨论, 见于 Israel Kirzner, *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pp. 79–81 and 125–31。

126. Eugen von Böhm-Bawerk, “Eine ‘dynamische’ Theorie des Kapitalzinsens,” *Zeit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Sozialpolitik und Verwaltung* 22 (1913); reprinted *Gesammelte Schriften*, Weiss, ed.; reprint (Frankfurt a. M.: Sauer & Auvermann, 1968), vol. 2, pp. 520–85; quote is from p. 521.

127. Böhm-Bawerk, “Eine ‘dynamische’ Theorie des Kapitalzinsens,” p. 552.

自童年时代起,米塞斯就对进步的未来充满憧憬,一心想为改善这个世界贡献一己之力。他出身于1867年后维也纳新兴的上层犹太家族,在自由教育的氛围下成长,相信艺术家和科学家构成了社会进步的先锋力量。¹通过科学研究推进启蒙,对于人性的继续发展至关重要。米塞斯无条件地把真理和思想诚实视为最高的价值,即使这种强硬姿态损害到了他的职业生涯和其他物质利益也在所不惜。秉持这一信念,他投身于一系列孤立无援的斗争,单枪匹马地面对那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埃里克·冯·屈内尔特-莱丁写道:

176

他从来没有完全归属某个特定阵营。他与周围人群始终格格不入……更糟的是,米塞斯自视为一个贵族、一个真正的绅士,拒绝一切妥协,从不隐瞒他的思想或信念。如果某人或者某物确实显得愚不可及,他会直言不讳,他受不了怯懦或无知……这个富有贵族气质的犹太知识分子是一个“奇人”(odd man out),无法适应任何固有模式。²

这些品质使他在维也纳的职业生涯举步维艰。奥地利首府居民以高雅品位、幽默和喜爱他们城市提供的娱乐而闻名于世,但是并不以坦率或勇气著称,而且他们公然蔑视那些他们缺乏的品质——尤其是来自外省的新贵。一位通晓奥地利民风的顶尖专家这样回忆这个多瑙河畔城市的精神气质:

说起来很可怕,人们不太接受持有独立见解的人,甚至那些只是拥护这些观点的人。迎合大众才会受到欢迎,而且,一个人的赞誉,不是因为他的努力,而只是因为他的成功,不是因为他这个人本身,而只是因为他的地位。³

显然,维也纳没有为米塞斯的天赋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不过,他仍然充分运用了他的才智,这要归功于他那坚定不移的毅力和为真理无条件献身的精神,即便

那些诋毁米塞斯的人也不得不对此肃然起敬。

正是这种坚持信念不计代价的基本态度,使米塞斯接受了门格尔和庞巴维克的思想。这几位思想家是基于事实而非想象提出了自己的经济理论,而且,米塞斯在历史学派传统下的工作也已向他表明,德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方法论是不结果实的。著名的历史学派批评者路德维希·波勒曾引述过一份讽刺杂志,该杂志把经济研究描述为类似“丈量工人的公寓,称其房屋太小”这样的活动。⁴

177

1906年2月,米塞斯完成他的研究生学业,毕业时可能已经计划要以某种方式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当时他对奥地利学派已有透彻的了解,并且充分认识到现有文献一些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特别是他意识到,在门格尔的追随者中,没有一位能够将货币理论令人满意地整合到门格尔理论的一般框架之中。这使奥地利学派受到一些严厉的批评,其中最著名的批评来自德国经济学家卡尔·黑尔费里希(Karl Helfferich),此人宣称货币理论与门格尔的价值理论是不相容的。⁵此后五年,米塞斯一直致力于通过撰写一部论述货币的系统著作弥补这一断裂,并打算将此书提交给维也纳大学,作为自己的任教资格论文。

获得任教资格的基本条件是提交一部全面的学术著作,不止涵盖某个较大的知识门类,展现作者运用理论思辨解释现象的能力,而且还须对当前的知识领域作出过重大贡献。要点在于,那些权威学者是把候选人作为同等的人加以接纳。这种认可绝不只是例行公事:一旦获得任教资格,就有权利在大学系统申请正教授的职位,与那些资格更老的申请者处于同等地位。

但是,先得写出这部著作,完成大量的必要研究。那个时代,这类学术事业要求非同一般的私人财力,或者非同凡响的充沛精力的支持。年轻学者从事一项长期研究时,并无大学职位可以养活自己。他们都是一些私人学者,与大学只有松散的从属关系;他们只能希冀任教资格论文取得成功,获得一个学术职位。与此同时,他们必须经历漫长的职业上和生活中的不安定阶段。如果他们不能,或者不想依靠自己的家族,就不得不以其他职业谋生,而在工作之余继续追求学术志愿。这是学术研究的艰辛历程,也是米塞斯从1906年到1911年走过的道路,最终,他在1911年把全部手稿交给了出版商。

178

米塞斯轻松度过了这段艰难时期。此时的他,正值青春年少,精力充沛,对自己的学术研究充满热情。如果他知道未来将近三十年都会这样度过,不知会不会感到绝望?后来他自己承认,要在德国或奥地利的大学谋取一个本来就很少的学术职位,对他来说简直难比登天。他曾用挖苦的语气说:“我不适合讲授普鲁士皇家警察科学(Police-Science)。”⁶不过,即使在年轻的时候,他就已经认识到,自

己将不得不在没有任何公共支持的情况下开拓自己的道路。奥地利出产过很多天才,而这些天才们也总是过着独立学者的生活。先驱者如孟德尔(Mendel)和贡普洛维奇(Gumplowicz)从来没有得到大学职位。奥地利政府“解除了博尔扎诺(Bolzano)和布伦塔诺的教学任务;孤立了马赫,并且从来没有为胡塞尔、布罗伊尔(Breuer)和弗洛伊德费过心思。它把庞巴维克视为能干的官员而不是经济学家。”⁷

然而,这些失败的例子没有阻挡米塞斯(以及成千上万志趣相仿的年轻人)追随他们前辈的足迹。后世将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定当如此,正如当代社会敬仰古代英雄人物一样。树碑立传,命名街道,都是纪念那些在他们自己时代不受重视的科学家和艺术家的方式。他们作出的牺牲,成就了人类社会几乎所有领域创造力的全面爆发,并让维也纳在国家社会主义(纳粹)掌权之前几十年内享尽荣光。

就在年轻的米塞斯开始自己的私人学生生涯,准备从事某种自由职业以维持生计的时候,维也纳的知识大爆炸已经显现出来。学术追求将是他的真正生命——这也赋予了所有其他活动以重要意义。他的“职业生涯”反而降到次要地位,只是为了支付账单的白班而已。这样,他从1906年3月15日开始了兼职实习时期,在下奥地利财政机构的维也纳总部工作。⁸

职业生涯的艰难伊始

这是公务员家庭子弟的传统选择。它曾是庞巴维克职业生涯的首个工作岗位,也是未来之星米塞斯的一个良好开端。⁹ 文机关的升迁机会较多,将来可能出任行政部门的高级职位,是当时法律专业毕业生们趋之若鹜的求职去处。¹⁰ 米塞斯的部门当时处在亚历山大·冯·施皮茨米勒男爵(Alexander Freiherr von Spitzmüller)的领导下,此人后来出任了信贷银行高管,最终成为奥匈银行(帝国中央银行)的最后一任总裁。¹¹ 耐心和忠诚的服务,加上一张巧妙的人际关系网络,本来会把米塞斯推到一个沿着这位伟大人物足迹不断上升的位置,而且,就凭他在货币和信贷理论上的兴趣,取得中央银行的高级职位不是难事。

但是,米塞斯很快发现这是一个错误。冗长的官样程式、庸鄙的精神气质,以及对于上级官员的人身依附,对他来说不啻当头一棒。后来他在讨论官僚体制的性质和意义时,可能回想起了这段经历:

政府工作不会给人展示个人天赋与才华的机会。严密的组织意味着进取精神的毁灭。年轻人对自己的未来没有想法。他知道有什么样的未来等待着他。他将会得到无数的办公桌中的一张,成为庞大工作机器上的一个齿轮,这些工作或多或少是机械性的。官僚统治技术的惯常路线将会削弱他的心智,紧缚他的双手。他会享有安全稳定的保障。可是,这种保障就像罪犯困于囚室一样。他将无法自由做出决策,无法塑造自身的命运。他将永远成为处于他人照看之下的人。他永远不是一个依靠自己力量的真正的人。他一看到那将埋葬自己的巨大办公楼,就会战栗不已。¹²

米塞斯不想把自己埋葬在这里。到了同年秋季,他请求体面的离开,这一要求得到了批准。 181

这个决定一定曾让他的家人和朋友深感震惊。他怎么能放弃同时代年轻人梦寐以求炙手可热的工作呢?“竟然有人自愿离开这样一个可以享有服事皇帝陛下特权的职位?”¹³米塞斯的选择的确不同寻常,同时也生动地说明了这位年轻人的个性。路德维希不是那种能够愉快接受关于良好职业的流行观念的模范市民。他有自己的想法,觉得公务员职业如同噩梦。他充满野心,拥有独立的判断力。他更相信自己的才干,而非那种赐予陛下忠实仆人的保护和荣誉。

辞职后,他决定当个私人律师。为了进入律师公会,申请者必须先到主要法庭进行为期两年的实习,以便熟悉奥地利的法院系统。从1906年10月到1908年9月,米塞斯一直在民事法庭、贸易法庭、刑事法庭、行政法庭以及维也纳城市地区法庭实习。这些机构的氛围与他在财政部门的经历并无太大区别。但是,至少还有一线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离开这个体制,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

那些年里,路德维希一定是家里的害群之马。他不适合生活在这个真实世界吗?难道他不知道妥协?弟弟里夏德却是全家的骄傲。他和路德维希同年毕业,之后,成为布隆大学(University of Brünn)(布隆即今日的布尔诺[Brno])的助理教授。1909年,26岁的里夏德升任斯特拉斯堡大学(University of Strasbourg)教授之职。这样的职业路径本来也是路德维希所向往的,但是现实却给他带来了不同的选择。 182

1908年秋天,随着两年实习期接近尾声,米塞斯开始在维也纳寻找合适的职位。里夏德·佩尔策(Robert Pelzer)开设的一家颇有声望的律师事务所录用了他,1908年10月,他在克鲁格街(Krugerstrasse)办公室开始了新工作,这地方正好位于维也纳的中心。¹⁴这个职位相对法庭日常公事的令人窒息的狭隘精神氛围,是个很

大的改善。不过,这家公司仍然没有真正摆脱法庭的官僚气息。米塞斯还会继续寻找其他选择。

平行生活

这些年间,米塞斯的学术事业抵偿了法庭日常工作带来的苦闷。他在货币理论和政策方面最早的研究成果是一篇关于奥地利外汇管制背后动机的论文。这篇文章刊载于庞巴维克的《经济学、社会政策和管理期刊》(*Zeit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Socialpolitik und Verwaltung*),讨论了利益集团加强价格和生产管制的方式。¹⁵1908年,他又写了一篇关于货币和信贷最新文献的综述,继续他的研究。¹⁶

183 1907年10月,米塞斯得到女子贸易学院(Trade Academy for Girls)的教职,为高年级学生讲授经济学,这对米塞斯的精神生活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补充。传统的男子中学一直为年轻精英阶层提供广泛的古典教育,以使他们适应大学阶段的研究,并为将来担当政府部门的重任做好准备,而女子学校则更注重具体的职业教育。直到此前不久,女性才获准许参加中学毕业考试(*Matura exams*),进入大学继续深造。但是,这些考试只在男子中学举行,因此,女孩必须在自己学校专设的毕业班(*Abiturientenklassen*)进行备考训练,考试当天再到就近的男子中学参加考试。

米塞斯讲授经济学、公共财政和奥地利政治。初入教坛,他一定运用了来自门格尔和庞巴维克的经典教学法。他会首先简要介绍一些有待解释的原则,继而讨论自己的主题,最后通过重复某些更为重要的原则,作出总结。¹⁷早在1907年,他在庞巴维克这个榜样(米塞斯一直坚持参加庞巴维克的研讨班)的大力鼓舞下,教过不少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女士。庞巴维克的激励贯穿了米塞斯一生的教学活动。米塞斯待人诚恳,工作严谨,对学生充满尊重,而且,不管学生的兴趣和能力多么微不足道,他从不忘记给予鼓励,所有这些为他赢得了全体学生的一致赞誉。这些优秀品质使得学生获益匪浅,其中首批学生来自维也纳一些条件较好的家庭,至于她们的名字,已经无从查考了。

184 1908年,米塞斯加入了住房改革中心(*Zentralstelle für Wohnungsreform*),这是一个谋求维也纳住房条件改善的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的协会。¹⁸他非常喜欢参加中心的的活动,在那里,他认识了一批杰出的经济学家,比如卡尔和埃瓦尔德·普里布拉姆兄弟(Karl and Ewald Pribram)、埃米尔·佩雷尔斯(Emil Perels)、鲁道夫·马雷施(Rudolf Maresch)、保罗·施瓦茨(Paul Schwarz)、埃米尔·冯·菲尔特

(Emil von Fürth)和罗伯特·迈尔。迈尔担任财政部长时,米塞斯受托起草了一份关于房产税的政策文件,这是当时奥地利议会的重要议程。在他的备忘录里,米塞斯认为,针对现存房产的征税,相比证券股份公司的重税而言,实在不是什么问题,后者阻碍了资本投向房地产业。令他深感欣慰的是,住房改革中心完全赞同他的报告。

大约与此同时,米塞斯还参与建立了一个讨论经济理论问题和其他社会科学基本问题的小组。¹⁹这个小组的其他领导人——卡尔和埃瓦尔德·普里布拉姆兄弟、埃米尔·佩雷尔斯、埃勒斯·克龙巴赫(Else Cronbach)也是庞巴维克研讨班的成员。庞巴维克的研讨班每周举行一次,大家可以和他们的伟大老师共处一室,然而时间实在过于短暂,无法对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彻底的讨论,因此他们决定另行创立一个论坛。这个论坛的首次正式会议于1908年3月12日召开,从那以后,小组开始定期聚会,不久就吸引了更多的会员加入。曾经领导住房改革中心的菲利波维希允许小组使用中心漂亮的办公场所作为会议地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个团体改组为国民经济学会(*Nationalökonomische Gesellschaft*),成为德语世界讨论经济理论最有份量的论坛。小组可能已经吸纳了若干外国学者,比如年轻的威廉·拉帕特博士(Dr. William Rappard)——1908—1909学年他曾在维也纳学习,二十五年后,他聘请米塞斯到日内瓦教授国际经济关系。²⁰

185

与此同时,米塞斯继续在货币和信贷研究方面取得进展。他写了两篇论文,可能是在庞巴维克研讨班上提交的,也投给了一些国外期刊。第一篇发表于英国的《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讨论了奥匈银行(中央银行)的外汇政策,他对这一政策持同情态度。²¹另一篇也是关于同一主题,但却更具批判性,讨论了奥匈银行关于纸币兑换黄金政策的法律问题。法律上说,奥匈帝国使用的是纸币本位,但米塞斯认为,通过奥匈银行的兑换政策,已经建立起了一套事实上(*de facto*)的金本位制,这一政策截至此时已经实行多年。他得出结论,银行承担兑现纸币的法律义务,并不会带来新的负担或者风险,只会变得更加规范。²²论文还没发表,他就意外地接到了来自中央银行高层官员的邀请。瓦尔德迈尔(Waldmayer)先生提供了一些对此项研究有用的资料,但作为交换,他要求米塞斯将论文呈交给银行,批准后方可公开发表。米塞斯拒绝了。²³这篇论文发表在施莫勒的《年鉴》上,之后引发了米塞斯与两位批评者的一场笔战,这两个批评者分别是:庞巴维克研讨班的同学奥托·纽伊拉特,以及《奥地利经济人》(*Der oesterreichische Volkswirt*)杂志的编辑瓦尔特·费德恩(Walther Federn)。²⁴

186

这个题目本身并不重要,米塞斯无法理解争论何以如此激烈。对于一个表面

看来清清楚楚的事实问题,为何会有如此多的混乱?直到两三年后,庞巴维克简明扼要地向他指出了事情原委,他才得知答案。纸币兑现的法定义务将会缩减银行的一项秘密基金,这笔基金正是银行用来支付贿赂和其他非法薪金的来源。因此,其受益人自然非常重视维护这样的观念:纸币兑现的法定义务对于货币政策来说是失策的。

米塞斯如何对待这一内幕?他应该揭露他的对手,并将他们的腐败事实公之于众吗?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对此类问题完全保持沉默。作为经济学家,他的使命仅仅在于揭露错误的经济学观点。如果他也参与讨论对手的腐败问题,那么学术讨论就偏离方向了。后来,他这样总结他的新座右铭:

187

面对他的对手,经济学家必须秉持这样一个虚构的假定:他们仅受不带偏见的客观理由的引导。一种错误观念的支持者的行为究竟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这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公开阐明的主张之对错。揭露贪污腐化并将此类内幕公之于众,是其他人的责任。²⁵

商 会

佩尔策律师事务所的日常工作比他早期的学术生涯还要令人失望。米塞斯时刻关注其他更加合适的工作机会,结果,很快就有一个机会不期而至。他的一位朋友维克托·格雷茨,曾被地方商会聘为经济顾问,现在推荐米塞斯继任自己的职位。

188

格雷茨在“下奥地利工商总会”(Niederösterreichische Handels-und Gewerbekammer)(下文简称商会)行政办公室已经工作了一些年头。他是和另外几位年轻经济学家例如阿尔弗雷德·特赖希尔一道进入商会的,当时商会做出战略调整,打算加强行政机构,提高它对奥地利经济政策的影响。²⁶商会这个新的战略,既是对政府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干预主义势力抬头的一种反应,也是对同一时期奥地利议会试图将商会从议会中排除出去的一种反抗。截至1907年,六十个商会机构一直在奥地利议会中直接拥有代表席位,因为根据旧的议会模式,代表席位属于预先确定的利益集团,例如贵族阶级、神职人员、城市居民等,当然也包括“工商阶层”。然而普选制度取代了旧的体制,因此,维也纳商会这个全国商会网络传统意义上的中心突然发现自己没有什么直接的政治影响力了。²⁷

然而,对商会来说,幸运的是新国会那些亢奋的议员完全不懂经济和法律事

务。由于没有能力预期新的法案对市场进程的影响,他们也没办法制定相应的法律以保证官僚体系的执行。国会的无能显而易见,局面令人尴尬,但对商会的行政办公室来说却是一个机会。他们开始给新的经济立法筹备过程涉及到的各种委员会和办事处提供技术上的协助。商会的服务来自奥地利商界官方代表机构,容易为人接受,也有相当影响。商会行政办公室再次成为奥地利经济政策舞台上的重要参与者。²⁸

这一局面对于行政办公室的职员来说非常有利。到了1909年初,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受聘担任了政府机构和各大公司令人羡慕的高层职位。1909年3月,特赖希尔也离开了商会,另谋高就。不久,他当上了一家重要银行的副董事长。²⁹ 189 此时特赖希尔的朋友格雷茨也接受了一家大型印刷公司的董事长职位,因此,他推荐米塞斯担任自己在商会的现任职务。米塞斯于1909年2月提出了申请,谈到他已发表的学术作品,并强调了自己的实践技能,例如对英语和法语(还有波兰语和一些意大利语)以及加比斯伯格(Gabelsberger)速记系统的掌握。商会不太可能收到很多像他这样能力出众的人员的求职信,事实上,与米塞斯资格相当的很多候选人都在谋求声望更高的公务员职位。他立即就被录用,4月1日开始上班。³⁰ 经过三年的摇摆,米塞斯终于找到了一个满意的职位,这一职位将会支持他此后的学术事业。此后二十五年,米塞斯一直待在这个岗位上。³¹

商会为我提供了唯一一个可以让我在奥地利展开工作的社会舞台……我凭个人力量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从官方角度说,我只是行政办公室的一名雇员……名义上我有一位领导和一些同事。[但是]相比任何一位商会官员,或者任何一位没有担任主要政党领袖的奥地利人,我的地位都是无可比拟的。我是这片国土上的经济学家。³² 190

商会执行以下三项主要任务:他们为政治集团提供对于新兴商业势力一定程度的控制;他们为商业集团提供国家机构中的代理人;他们协助保护既得商业利益避免新的竞争的损害。由此,从1884年到1901年间,维也纳商会对奥地利政治产生了巨大的、直接的影响,此时,它是奥地利工业公开的卡特尔式代理人,反对工业产品的自由贸易³³。在这场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商会取得了大量管制权力,越来越被认可为中央政府行政机关的左膀右臂。³⁴

如果以为米塞斯如今脱离官僚政治生活,加入了一个商业组织,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他的工作的确涉及某些私人组织的利益,但也保持了不少政府机构的特

191 征——这不但体现在声誉上,也体现在所受的约束上。新工作的主要好处在于那些政府部门无法提供的东西:给予个人能力自由发挥的空间,以及个人对于公共辩论的影响。米塞斯充分利用这些机会,复苏了这个已经成为一纸空文的机构的资本主义精神。

米塞斯加入了商会第一部门,成为一名分析人员³⁵,此时正值奥地利税法大修之际,自从庞巴维克和他的经济学团队于1896年领导了直接税制改革以来,这是第一次重大修订。庞巴维克式的改革为政府财政建立了一个一直延续到1909年的方案。1908年,财政部出台了一个新的“改革计划”,这个计划几乎未对税收结构作出任何变动,但却提高了个人税和公司税。战前米塞斯在商会的主要工作就是领导了一场反对政府改革计划的广泛运动。³⁶尽管他还是一个新手,但很快就超出了人们的预期。不久,他受托主持与财政部代表进行的谈判。他们最终达成了妥协,调和了政府增加税收的意图和商会下辖的工商圈子的利益。

192 他的第一项任务是研究拟议中的啤酒税和其他酒精饮料税的影响。1909年5月中旬,米塞斯参加了商会关于提高啤酒税后果的会议。与会人员根据标准的经济学观点批评了这种增税,指出它将消灭一些边际企业。³⁷但是,两个月后再次召开同一议题的会议时,商会的态度发生了令人震惊的转变。米塞斯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在他入职之后的第一份报告中,他不但提出了我们熟悉的边际企业问题,也涉及了立法提案背后的农业利益这一微妙的政治主题,此后几年,他写了很多这类报告。米塞斯用了大量细节指出商业从业者和农业生产者之间存在不公正的销售配额,还有酒类农业产品的特殊补贴问题。这次会议完全以米塞斯报告中的结论为基础,公开谴责了这些做法。³⁸

接着,米塞斯转向了那些涉及个人遗产和馈赠,以及关于公司税和公司法的立法提案。关于前一问题,他在1909年12月上旬的一次商会全体会议上作了报告。³⁹米塞斯指出,更高的税收和计划出台的法律的复杂程序将会伤害商业,而且他再次强调,新法对待农业人口好于城市工商阶层。但是,他也提请人们考虑一些更加深远的问题,注意这些立法活动将会导致奥地利的法院落入财政部的控制。

193 另有几位年轻的经济学家也在这次会议上提交了报告,不过,这些报告没有对公众或报界产生太大影响。⁴⁰米塞斯的报告无论在分析范围和严谨方面,还是在政治魄力上都树立了新的标准。变革之风席卷了整个商会。尽管商会的管理层并不总是同意这位新雇员在报告中表达的观点,⁴¹但是,他们确实在政治上斩获颇丰。因为米塞斯看似极端的立场始终基于全面彻底的研究,因而,商会能够在政治博弈中占据更加有利的地位。

乌云密布

与此同时,奥地利的外交政策也于1908年经历了一次重大转折。当时土耳其的革命已经摧毁了数十年来一直无法推动真正改革的神权政体,国家政权落入一群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手中,他们就是后来著名的青年土耳其党(Young Turks)。⁴²青年土耳其党谋求极端的改革措施,以使土耳其更加接近西方的民主政治。欧洲的领导者惊奇地看到这些青年土耳其党人将他们的理念如此迅速地付诸实施。他们中的很多人相信,土耳其不久将会重新获得令人敬畏的力量,从而引起东南欧政治版图的剧变。

维也纳的鹰派立即煽动兼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奥匈帝国军队自1878年以来就已占领这些领土,但却一直没有正式吞并。战争的支持者坚持认为,奥匈帝国无法承受拖延不决的后果,因为土耳其人很快就会强大到足以要求归还他们的前殖民地。随着局势逐渐明朗,维也纳的鹰派准备自行采取行动,于是,奥匈帝国与俄罗斯支持的塞尔维亚之间的战争几乎到了一触即发的边缘。在所谓的兼并危机中,大量军队开赴帝国南方和北方的边界地区,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就在其中。然而,战争还是被制止了,因为俄罗斯人撤销了他们对塞尔维亚人的支持。经过一年谈判,波斯尼亚成为奥匈帝国的领土。但是这一事件对于外交关系有着持久的负面影响。奥匈帝国的鹰派人物,外交部长埃伦塔尔(Aehrenthal)成功游说了俄罗斯、法国、意大利和英国政府同意这次兼并,但是奥地利政治家在国际上的传统信誉遭到破坏。那个时代的政府高官鲁道夫·西格哈特回顾说,这次兼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序曲。”⁴³在接下来的若干年里,不断升级的危机将欧洲列强纠缠在一起。1912年奥匈帝国再次派遣军队开赴前线,对抗俄罗斯-塞尔维亚联盟。最后时刻,俄罗斯人又一次撤退,但两年后,他们就不再退让了。

194

这次兼并活动也对国内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自由派总理贝克(Beck)于1908年辞职,抗议此次兼并。奥地利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最后一个时期就此结束。这个时期始于1900年克贝尔(Koerber)政府的上台(庞巴维克担任了这届内阁的财政部长),该政府统治了奥地利八年,受到自由主义媒体、商界和金融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从1900年开始,每一任总理都是通过奥地利官僚体系内部升迁上台,他们的统治基础都是紧急状态法(emergency laws),该法允许帝国皇帝不经议会批准直接任命政府。但是,克贝尔开创了“通过新闻媒体治理国家”的方法,他的继任者高奇(Gautsch)和贝克也都娴熟地继承了他的方法。他们不只是帝国的

行政首脑,同时还能通过与民众的直接沟通来发动政治上的变革,这样一来就绕开了政党组织。⁴⁴

195 之后继任的那些政府不再能够取得自由主义势力尤其是新闻界的支持,仅这个原因,就使他们无法在战争即将爆发之际解决任何紧迫的政治问题。由于民族冲突频发,民主热情受阻,帝国逐渐失去民心。在无情的离心力下,这个国家即将走向分裂。

社会政策协会的维也纳会议

接下来的若干年里,这些发展趋势渐次浮出水面,包括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两次巴尔干半岛战争和摩洛哥危机,但在1909年,世界尚未分裂。米塞斯喜欢他在商会的新工作,同时也继续追求其他知识兴趣,包括庞巴维克的研讨班,还有他和朋友佩雷尔斯等人一起创立的讨论小组。

1909年9月,社会政策协会全体会议在维也纳召开。事实证明,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最重要的一次知识分子盛事。这次会议在9月底召开,主要讨论了市政当局名下公司的问题和生产概念的问题。米塞斯可能是在这时参与了协会的讨论。他肯定参加了由其老师菲利波维希组织和主持的分会讨论。⁴⁵

196 菲利波维希是协会的副主席,他成功地发起了一项关于“国民经济的生产力及其经验衡量”的课题研究。⁴⁶这是协会历史上第一次讨论纯粹的经济理论问题。此外,由于菲利波维希非常重视社会政策运动,因此,理论问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维也纳会议上关于生产力的争论将成为协会乃至德国经济学的历史上一个重要时刻,因为这次争论的主要特点就是占据主流地位的历史学派学者和一群才华横溢的,包括维尔纳·桑巴特、贝恩德·哈姆斯(Bernd Harms)、韦伯兄弟以及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牧师在内的年轻学者群体之间的对抗。⁴⁷

这些年间,马克斯·韦伯成了反对协会两大预设前提的领袖人物,这两个预设就是政府干预主义的作用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他之所以成为这一派系的领袖,不仅因为引人注目的个人魅力,而且,尤其因为他是作为一个干预主义者和历史主义者在协会中开始其学术生涯的。其他不满的声音——迪策尔(Dietzel)、沃尔夫(Wolf)、埃伦贝格(Ehrenberg)、波勒、帕索(Passow)以及阿道夫·韦伯(Adolf Weber)⁴⁸,从来没有在施莫勒派内部占据显赫地位,只有马克斯·韦伯于1893年作为讲坛社会主义传统下冉冉升起的新星当选为委员会委员。米塞斯这样写道:

马克斯·韦伯在接触经济学之前就当上了经济学教授,这是那个时代的成例。这反映了[历史]学派对于“社会科学”性质的看法,以及法律历史学家的专业技术知识……他在接受该职位时……身上法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成分,使得他对于历史学派处理法律和历史问题的方式十分不满。这就是为什么他树立了在方法论和认识论研究方面的先驱地位的原因。这一问题把他引向关于历史的唯物主义哲学,从这里他又进入了宗教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最后他在社会科学体系内部进行了一场宏伟的尝试。但是所有这些研究都使韦伯一步一步离开了他年轻时代树立起来的政治和社会理想。他第一次转向了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和功效主义。⁴⁹

197

此时施莫勒派仍然占据统治地位,但与他们的观点相反,马克斯·韦伯和他的兄弟阿尔弗雷德认为,诸如“政府应该做这或者做那”之类的规范命题并没有科学基础,仅仅反映了作者个人的价值判断。⁵⁰这种观点通过维也纳会议一年之前出版的熊彼特的《理论经济学的性质和要义》一书得到加强,熊彼特的著作旗帜鲜明地主张经济研究应该模仿自然科学。韦伯兄弟也认为主流学者应该对政府干预所引发的问题进行系统的检视。

1905年曼海姆的全体会议上,年轻的激进分子与学术权威就卡特尔和反托拉斯政策问题进行了第一次公开交锋。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协会的大多数人都对卡特尔的组建表示欢迎,把它视为一项反移民的制度创造。⁵¹到了19世纪90年代,主流观点开始逆转,主要原因是政府官员嫉妒快速增长的公司势力。曼海姆会议试图成为这一新导向的重要里程碑。这次会议邀请了布伦塔诺、莱迪(Leidig)、施莫勒和基尔多夫(Kierdorf)来讲座,提出各种政策建议,以加强大企业内部工会的力量,牵制公司权力,使得大企业能够负起社会责任。比如说,施莫勒就曾建议,公司管理委员会应有四分之一席位留给政府代表。⁵²

198

在随后的争论中,弗里德里希·瑙曼、维尔纳·桑巴特和马克斯·韦伯对这些分析和结论提出了猛烈的抨击。韦伯甚至指责施莫勒持有一种关于国家本质的陈旧、虚幻的概念。不过,对当权派地位的致命一击来自牧师瑙曼的演说,此人似乎一直停留在他的马克思主义阶段。⁵³他认为,卡特尔的形成来自强大的世俗力量,这种力量是不会被弱小的国家及其支持手工业的中产阶级政策击溃的。此外,正如米塞斯多年以后提出的周密论证一样,瑙曼指出,拟议中的政府干预不可能达到他们本来试图达到的目标。这些干预措施“从技术上或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是毫无意义的”。瑙曼的演说激起了听众异常热烈的掌声,掌声持续的时间对尴尬的

199 施莫勒来说实在太长了,后来他嘲笑说那种反应“太疯狂了”。⁵⁴

根据惯例,施莫勒对会议作了限制。他称瑙曼是一个煽动者,如果不能允许他与瑙曼保持距离的话,他将不得不辞去协会主席职务。很多人认为施莫勒的反应有点过激,老牌批评家如路德维希·波勒和安德烈亚斯·福格特还为此放弃了自己的会员资格。这场论证最终平息了,特别是因为在马格德堡(1907)举行的下一次会议讨论的是较少有争议性的主题,例如对年轻经济学家的培养以及城市管理问题。但是,这一阶段是为维也纳会议所作的准备,正是在维也纳会议上,社会政策运动的核心议题提到了日程上。

开始两场会议讨论的是市属企业的问题。就像往常一样,很多演讲和讨论涉及技术问题,尤其是企业管理方面的技术问题、融资方式、雇员薪酬等。然而,韦伯兄弟引入了一些相当根本的思考,打破了市政社会主义者之间这种惬意的交流。一位参加了这次维也纳会议并支持主流观点的协会杰出历史学家后来回忆起当时韦伯兄弟的言论对他的“震动”:

就像众多的演讲者强调的那样,整个争论集中在这个所有人都认可的观点上,那就是市有化——某些合适的产业从私人手中转到市政府手中——总是意味着社会的进步,然而,阿尔弗雷德·韦伯反对这种观点。他指出,市有化导致人口中占据多数的部分转化为官僚,他毫不含糊地把这点视为巨大的缺陷。⁵⁵

200 阿尔弗雷德·韦伯曾大胆提出,成为一名公务员可能意味着某些地方出了差错,而把大量人口转化为国家雇员就更不用说了。就此而言,他否定了协会本身的职责,这些职责本来是为广泛的政府干预和规模更大、更有权势的官僚体制奠定“科学”的基础。演讲结束后,只有很少的时间留给大家讨论,不过,韦伯兄弟和施莫勒派之间的对峙将在次日继续。这次他们讨论的则是国民生产力这一核心概念。

支持政府干预的常见理由强调收益率与生产力之间的区别。典型的施莫勒派教授认为,一项投资的利润主要显示了基于个人观点的投资的重要性。只有在一些非常特殊和罕见的情况下,它才同时指向投资的社会价值。因此,从更大的、“社会”的观点来看,关键问题是按照“生产力”的标准应该如何使用社会稀缺资源。但是,是否存在一些客观标准,区分资源使用的生产力高下?在这个关键点上,讲坛社会主义教授保持了沉默。菲利波维希觉得学术操守要求澄清这个理论

问题,他专门举办了一场“奥地利人”关于生产力理论的会议,由他和他杰出的同事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主讲。

菲利波维希做了两场报告。他对国民生产力这个概念的历史作了出色的综述,但却回避了报告真正的主题,也就是国民经济生产力的性质和量化之可能性的问题。菲利波维希仅仅关注一个较小的问题,即技术进步对生产力的影响。这一避重就轻的做法,部分是由于这个主题的难度,同时也是为了避免引起韦伯兄弟及其同盟者们的激烈反弹。

第二场讲座也回避了国民生产力的具体含义这个关键问题。维塞尔的主题是货币价值和价值变化的度量,特别对生产力问题作了一番探讨。一般认为,货币价格可以作为衡量经济体之生产力的一个尺度,或者至少是生产力变化的尺度。这又预示着,我们可以分析或者量化这个尺度本身的变更——货币价值的变化。现在,对于如何准确理解货币价值,维塞尔自有一套说辞,他重述了他在一篇长文中的立场,该文在会议之前已经发表于协会刊物。⁵⁶根据这篇论文,他在讲座中集中讨论了货币价值衡量这一技术问题。⁵⁷ 201

维塞尔的讨论再次表明,他相信经济财货的自然价值并不仅与个人有关。倒不如说,一种财货的自然价值就是它在一个社会环境中的一般经济意义。两种财货的价值差异显示,评价较高的财货一般而言要比评价较低的财货更加重要——不仅对于个体,而且对于所有共同体内的主体都是如此。总之,不同价值之间的差异反映的是价值的等级关系。因此,“从经济观点看”的优劣问题就可以参照价值差异判定。不管技术过程存在哪些问题,一切事物的价值都可通过心智的探求获得确定。至少原则上说,度量经济生产力和经济进步是可能的,正如度量货币价值的变化是可能的一样。 202

照理来说这位才华横溢的“理论家”应该是与占据协会主流的历史学派成员格格不入的。然而通过上述观点,维塞尔得以弥合了其中一些分歧。事实上,协会的传统目标是为公共政策提供理论指导,而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说,这就要求我们能够比较经济事态的优劣。维塞尔式的经济学可以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给出这类区分,尽管维塞尔本人并不愿意接受某种特定的政策立场。

维塞尔结束演说之后,最先发表评论的是赫克纳(Herkner)和克纳普,他们都是传统观点的拥护者,这种观点认为国民生产力的概念大致而言是一致的,尽管很难给它一个操作层面的意义。不过,紧接下来的场面,如同米塞斯后来回忆的那样:“协会内部第一次出现了令人难忘的思想交锋,经济—理论和民族—政治观点的融合受到了猛烈的攻击。”⁵⁸维尔纳·桑巴特引领着这场攻击,否认国民生产力

这个概念对科学研究的用处。之后,戈特尔-奥特里连菲尔德(Gottl-Ottlilienfeld)也和他的论调一样,声称国民生产力概念和真实世界毫无关系。

203 最后,轮到马克斯·韦伯提出了一个问题。他已等待了很长时间,终于有机会就科学研究性质的问题向他的对手发难。他以科学研究“价值中立”的理想而闻名——也就是说,科学研究应该严格限于相关事实的认定。⁵⁹他本人热情洋溢,并不相信价值中立需要将情感和个人研究的目的严格分开。但是,价值中立的确意味着科学家(尤其是社会科学家)应该严格区分实然和应然,还意味着他绝不能将自己的个人偏好与有关事实的研究结果混为一谈。在对菲利波维希的正面攻击中,韦伯认为并不存在客观的方式表述人类总体的生产力。“国民生产力”这个概念起着一种规范的作用,而非描述功能。因此,它在经济科学中没有用武之地,应该扔进经济学家的垃圾箱,“它在那里适得其所”。⁶⁰

意味深长的是,马克斯·韦伯的主要攻击目标是菲利波维希和施莫勒。然而韦伯私下承认菲利波维希是干预主义运动真正的精神领袖。菲利波维希给韦伯的回复,向世人证明了自己对这一称号当之无愧。多年后,米塞斯回忆道:

菲利波维希支持的事业已被颠覆;今天我们普遍认识到,建立价值判断并非科学的任务。但在那场遭遇中,菲利波维希却站在了错误的一方,他比他的对手更了不起,而事实证明,他的对手却是正确的。这些对手接受马克斯·韦伯的领导!再也没有比那场著名辩论的最后评论环节更能显示菲利波维希思想气质的耀眼光芒,更加深刻地以其雄辩的演说技巧来打动听众的了。⁶¹

204 讲坛社会主义权威全力以赴试图证明在经济分析中引入民族因素是正当的,并坚持认为这种做法也是“科学”的。在维也纳,他们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是对于受到巨大挫折的马克斯·韦伯而言,协会已经不再是一个真正进行科学探究的合适平台了。⁶²维也纳会议后,他建立了德国社会学学会(Germ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并于一年后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了首次会议。⁶³事后看来,这次退却是不必要的。维也纳会议后,施莫勒和菲利波维希大势已去。他们无法吸引新一代学者的兴趣。1917年施莫勒去世,新人开始掌控社会政策协会,并将德国的社会研究引向完全不同的道路。

米塞斯就是其中一位,他完全认同马克斯·韦伯的看法,即科学纯属事实导向的学科,这一观点得到了新的社会学学会章程的强调。在他此后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庞巴维克死后,米塞斯将为真正的经验研究不懈斗争。20世纪20年代期间,

他甚至赞成采用马克斯·韦伯的作为经验社会科学简略表述的“社会学”概念描述自己的著作,以此反对具有价值倾向的德国“政府科学家们”。后来他意识到,其他多数作者使用这个术语建立了一门平行的社会科学,而其基础完全不同于经济学,于是他摒弃了这个习惯。不过这是后面章节的主题了。

205

在商会的突破

1910年1月底,米塞斯完成了一篇耗费数月精力写成的长篇报告。他将这一报告提交给了商会全体会议。在这篇报告中,他讨论了提高公司所得税率的立法提案,这一立法将使公司经理阶层承担更多税赋,并赋予财政部门审计公司账簿的权利。米塞斯批评了新法的不公,因为法案是以奥地利工业(奥地利工业正是商会的委托人)为代价增加政府收入,而有利于农业生产者。米塞斯提议,公正地应用现行税法,才是更为合理的政策。⁶⁴

他在商会的工作留给他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甚至比通常还少,但他似乎一直遵循铁的纪律继续自己的研究。1910年,他有两篇东西发表:一篇关于奥地利政府财政改革的文章(在一家新出的法国期刊上);另一篇关于货币与信贷最新文献的综述,是为庞巴维克参与的期刊《经济学、社会政策与行政管理》写的。⁶⁵

不过,他为商会作的报告使他获得了更大的名声,这些报告受到他的朋友和敌人的密切关注,维也纳的日报称赞它们“非常透彻”、“详尽无遗”、“研究出色”以及“资料充分,记录翔实”等。

透彻全面的工作以及在商会圈子表现出的思想领导能力,为米塞斯赢得了一定程度的公众认可,这使他能在奥地利统治精英的核心机构针对政府政策发表评论。于是,1911年10月,他在《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的一篇文章中批评了财政部长比林斯基(Bilinski)提出的增加收入所得税的议案。⁶⁶大约一年后,他又批评了国会议员施泰因文德(Steinwender)的税收议案,指出这些议案将会重新引过去(庞巴维克之前的)税收立法方面的不良习惯,例如,仅仅基于奥地利国会当前权力平衡之类的短期考虑。⁶⁷

206

政府有着增收旧税、开设新税的持久冲动,这是公共议程上永远的主题。1911年10月底,商会召集各个方面的汽车协会,开会讨论政府对汽车征税的计划。与会代表提出方案,呼吁政府不要超出德国汽车税收的规模,且只对那些在奥地利停留超过三个月的外国人征税。米塞斯对这些软弱无力的方案深感不满。⁶⁸1911年11月的另一次会议上,商会提出了提高肉类价格的问题,米塞斯同样非常失望。

米塞斯的报告强调了一个常识观点,即最简单的解决方案就是开放外国肉类进口。但是,这个方案不是“政治上可行的”方案。另外一种简单而有效的解决方法是削减肉类税收,然而由于政府长期的财政困难,同样也是“难以实施”的。

207 尽管遇到这类挫折,米塞斯还是坚持自己的策略,试图改变奥地利的税收结构。1912年3月,他跻身顾问(Konsulent)行列。他众多报告的关键之处在于指出,通行的税法丝毫不敢触动各种既得利益,尤其是奥地利农业的利益,因而阻碍了工业的进步。⁶⁹他在寻求一种折衷,既保证政府较高的收入,同时又防止负担全部落在自己的委托人身上。他的不屈不挠终于有了回报。1914年早些时候,国会为一项新的税收法律进行投票,这项法案满足了商会的大部分要求。新法规定了1600先令(原为1200先令)收入的税收减免,同时也对政府审计公司账簿的权力作了限制。负面情况是,新法增加了对酒类和香槟的征税,同时也提高了所得税,增加到6.7个百分点。⁷⁰

是的:一项累进税在不到7%的地方封顶。真是美好的往日时光!

货币理论

上班时间,米塞斯沉浸于琐碎而复杂的奥地利税收政策问题,但他还是设法写出了关于货币与信贷的著作。他有一年时间没写任何文章,而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这本书的写作中。1911年12月中旬,他终于完成了手稿,题为《货币与流通媒介理论》(*Theorie des Geldes und der Umlaufsmittel*)(英译本出版时误作《货币与信用原理》[*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根据形式对等原则,下文仍旧译作《货币与信用原理》。如果提到的是德文原著,则译为《货币与流通媒介理论》。——译者注)

208 看到自己超过五年的艰辛工作终于有了结果,米塞斯非常兴奋。此前他已联系过一些知名的出版商,现在决定接受莱比锡东克尔与洪布洛特出版社(Duncker & Humblot)的邀约。⁷¹这是经济出版方面最有声望的一家出版社,曾为熊彼特轰动一时的处女作出过一个出色的版本。米塞斯迫不及待地修改校样,并做最后的改动,同时隔三差五地打听出版周期。在他的催促下,东克尔与洪布洛特出版社甚至特地招聘了几个新员工。⁷²1912年6月14日,这部新书终于送到了经销商手中,每部标价10马克。

米塞斯第一本著作的长期影响只能以波澜壮阔来形容,因此我们将在下章对其主要思想展开深入探讨。九十年后,此书仍然不断重印,至今仍是货币理论家的灵感来源。尽管最初遭到绝大多数德国经济学家的抵制,但是,米塞斯工作的价值

立刻得到了专业领域最为杰出的头脑的认可。马克思·韦伯称它为“处理实质货币问题最为可取的理论”。⁷³熊彼特称赞它的“有力和原创”，并且注意到批评家“像以往一样”在讨论非实质性问题时对这些品质的忽略。⁷⁴战后，阿尔伯特·哈恩（Albert Hahn）也强调了米塞斯著作的门格尔式品质，称“作者乃是一位经济理论的大师，从不陷于追求虚构抽象的诱惑，而是坚守在事实的坚实基础上”。⁷⁵大西洋彼岸，一位年轻的经济理论先驱出于同样的理由赞扬了此书：“对我来说，冯·米塞斯身上似乎具备超乎寻常的条理和力量。他的《货币与流通媒介理论》是一部极为出色的著作。冯·米塞斯对货币理论文献有着广博的知识，对于他所遇到的困难，有着敏锐的洞见。”⁷⁶

不过，最大的认可还是来自庞巴维克，他在研讨班上花了整整两个学期专门讨论米塞斯的这部著作——这一荣誉无人可及，甚至熊彼特也不例外。庞巴维克承认熊彼特才华出众，但却写道，他希望看到熊彼特转到更加认真严肃的工作上去。显然，米塞斯的著作就是庞巴维克心目中期待的这类严肃的理论著作，而其经久不衰的成功也再次证明了这位老牌大师的正确判断。



20 世纪 20 年代的米塞斯

米塞斯将这本书提交给了维也纳大学，希望取得任教资格，并申请成为编外讲师（*Privatdozent*）——这是一种私人讲座任教资格，可为学生提供一些选修课程。他的申请在 1913 年春天得到批准，就在那年夏季学期，他开始授课。那是多么光辉的岁月，能在庞巴维克、维

塞尔、菲利波维希和米塞斯门下接受指导！可是这种日子毕竟不多。奥地利学派的全明星阵容仅仅维持了三个学期。1914 年 8 月，庞巴维克去世，米塞斯则被派往前线打仗。在这场战争中，他的一些最优秀的学生不幸殒命。⁷⁷

注 释

1. 参见 Carl E. Schorkse, *Fin-de-siècle Vienna* (New York: Knopf, 1980), 该书以提出下述观点而知名: 科学和艺术方面的兴趣, 是对政治生涯的一种替代, 因为现存的君主政体堵

塞了这种从政的通道。肖尔斯克的主张依赖于以下隐含假设:政治就其本身而言比科学或艺术更加令人满足。这个假设告诉我们更多的是关于肖尔斯克个人的价值判断,而不是那个时代德国和奥地利年轻人的主流看法。

2. Erik von Kuehnelt-Leddihn,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Ludwig von Mises*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99), pp. 6f.

3. Rudolf Sieghart, *Die letzten Jahrzehnte einer Grossmacht* (Berlin: Ullstein, 1932), p. 263.

4. Ludwig Pohle, *Die gegenwärtige Krisis in der deutschen Volkswirtschaftslehre* (Leipzig: Deichert, 1911), p. 52.

5. 参见 Karl Helfferich, *Das Geld* (Leipzig: Hirschfeld, 1903).

6. Mises, *Erinnerungen* (Stuttgart: Gustav Fischer Verlag, 1978), p. 69f.; *Notes and Recollections* (Spring Mills, Penn.: Libertarian Press, 1978), p. 105.

7. Mises, *Erinnerungen*, pp. 23; *Notes and Recollections*, p. 39.

8. 关于米塞斯早期职业发展的最重要的资料来源是他在 1909 年写给商会的求职信和个人简历(*curriculum vitae*)。这封信现在保存于马克卢普和米塞斯的通信档案,藏于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另见一封没有日期和落款的信件手稿(写于 1937 年秋季);Grove City Archive: Kammer für Handel, Gewerbe und Industrie files.

9. 参见 Joseph A. Schumpeter, "Eugen von Böhm-Bawerk," *Neue Österreichische Biographie* (Vienna, 1925), vol. 2, p. 65; Shigeki Tomo, *Eugen von Böhm-Bawerk* (Marburg: Metropolis, 1994), p. 53.

10. "当时普遍认为公务员是最卓越的贵族职位(*nobilium officium par excellence*),却看不起私有企业的高级主管职位。"Sieghart, *Die letzten Jahrzehnte einer Grossmacht*, p. 158.

11. 1909 年履历记载了他在维也纳的帝国财政管理机构(k. k. Finanzbezirksdirektion)的实习职位。1932 年米塞斯写给施皮茨米勒的七十寿诞贺信中,提到一个地方政府财政总部(Finanz-Landes-Direktion)的工作。参见 1932 年 6 月 12 日的信件, Mises Archive 71: 151。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米塞斯后来成了施皮茨米勒时期奥匈银行政策的最尖锐和最有影响的批评者。

12. Mises, *Bureaucrac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4), p. 94.

13. 引自 Heinrich Treichl, *Fast ein Jahrhundert* (Vienna: Zsolnay, 2003)。这个问题是特赖希尔的父亲阿尔弗雷德问的,他是米塞斯的朋友,曾经在更早时间里也做过同样的决定。

14. 克鲁格街 13 号,二楼。

15. Mises, "Die wirtschaftspolitischen Motive der österreichischen Valuta-regulierung," *Zeit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Sozialpolitik und Verwaltung* 16 (1907): 561 - 82.

16. Mises, "Neuere Schriften über Geld-und Bankwesen," *Zeit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Sozialpolitik und Verwaltung* 17 (1908): 660 - 74.

17. 埃里希·施特赖斯勒指出,门格尔在他的讲义里就是使用这种技巧教育鲁道夫王储;参见 Streissler, "Menger's treatment of economics in the Rudolf lectures," Erich W. Streissler and Monika Streissler, eds., *Carl Menger's Lectures to Crown Prince Rudolf of Austria* (Aldershot,

U. K.; Edward Elgar, 1994), p. 11。

18. 参见 Mises, *Erinnerungen*, pp. 14f。

19. *Ibid.*, pp. 64f。

20. 参见 Martine Brunschwig Graf, Jean-Claude Frachebourg, Norman Scott, and Peter Tschopp, *HEI 1927 – 2002* (Geneva: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2), p. 45。此书的这一部分是由诺曼·斯科特撰写的。

21. 参见 Mises, “The Foreign Exchange Policy of the Austro-Hungarian Bank,” *Economic Journal* 19 (June 1909): 201 – 11。杂志编辑埃奇沃斯 (Edgeworth) 本来邀请了菲利波维希来写这篇文章,但是菲利波维希没有时间,于是推荐了米塞斯。

22. 参见 Mises, “Das Problem gesetzlicher Aufnahme der Barzahlungen in Oesterreich-Ungarn,” *Jahrbuch fuer Gesetzgebung, Verwaltung und Volkswirtschaft* (Schmollers *Jahrbuch*) 33, no. 3 (1909): 985 – 1037。他也在另一本书中表达了这些思想,见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London: Jonathan Cape, 1934); reprinted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1980), 并在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对这一问题作了评论,见 Mises, “Austrian Empire, Finance and Banking,”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2th ed. (1921), vol. 30, pp. 323f。

23. 关于此事,参见 Mises, *Erinnerungen*, pp. 28 – 32。

24. 参见 Walther Federn in *Jahrbuch fuer Gesetzgebung, Verwaltung und Volkswirtschaft* (Schmollers *Jahrbuch*) 34 (1910): 151ff.; Otto Neurath, “Gesetzliche Barzahlungen und Kriegsfall,” in *ibid.*, pp. 417ff.; Mises, “Zum Problem gesetzlicher Aufnahme der Barzahlungen in Oesterreich-Ungarn: Ein Schlusswort gegenüber Walther Federn,” in *ibid.*, pp. 1877 – 84。另见 Federn's piece in *Der oesterreichische Volkswirt* 44 (July 31, 1909)。

25. Mises, *Erinnerungen*, p. 31; Notes and Recollections, p. 51f。他还谈道:

我一直严格遵循这些原则,终生不渝。我知道许多——即使不是全部——我所接触过的干预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贪腐问题。但我从来没有利用这些材料打击对手,因为这些内幕并不总能正确地为人们所理解……我婉言谢绝了许多关于我的对手的欺诈行为和贪污活动的可以作为呈堂证供的材料,却因此招来了诸多忌恨。

26. 维也纳商会的这一决定,似乎在 19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的德国和奥匈帝国很多地方都有类似情况;参见 Franz Boese, *Geschichte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1872 – 1932*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39), p. 126。

27. 参见 Franz Geissler, “Die Entstehung und der Entwicklungsgang der Handelskammern in Österreich,” Hans Mayer, ed., *Hundert Jahre österreichischer Wirtschaftsentwicklung, 1848 – 1948* (Vienna: Springer, 1949), pp. 104, 108。另见 Bundeskammer and Wiener Kammer der gewerblichen Wirtschaft, eds., *100 Jahre Handelskammern in Österreich* (Vienna: Amtsblatt der Bundeskammer der gewerblichen Wirtschaft, 1948), p. 136。

28. 参见 Mises, *Erinnerungen*, pp. 45f。

29. 参见 Treichl, *Fast ein Jahrhundert*, p. 17。战后,他和熊彼特一起经营比德尔曼银行,熊彼特曾任行长,不过任期很短。

30. 一位作者声称,米塞斯是在 1909 年 10 月 15 日作为一个临时实习生 (*Konzipient*, 刚

刚通过考试而有志于成为律师者)获得聘用的。参见 Alexander Hörthlechner, “Ludwig von Mises und die österreichische Handelskammerorganisation,” *Wirtschaftspolitische Blätter* 28, no. 4 (1981): 141。这个说法可能有误。1909年5月的一份报纸上,曾报道米塞斯是“商会机构的代表”。参见 *Neue Freie Presse* (10 May 1909), p. 4。

31. 此时,米塞斯仍然居住在一区弗里德里希大街4号。1911年,路德维希和妈妈搬到了另外一处公寓。新址是沃尔蔡勒大街(Wollzeile)24号,也在一区。见格罗夫市档案馆的居住证(Wohnungszeugnis), Grove City Archive: file #6/9/1/1。1937年他母亲去世后,由于住房管制条令的限制,路德维希无法继续保留这个公寓。当年的10月31日,他找到了新的租客,这个租客给他留了一个房间,他在那里存放自己的图书和个人文件。参见他写给房管局的信,日期为1937年9月24日;Grove City Archive: file #6/9/1/1。

32. Mises, *Erinnerungen*, p. 46。

33. 他们的对手是农业部门,后者支持自由贸易,但仅限于工业品。参见 Bundeskammer and Wiener Kammer der gewerblichen Wirtschaft, eds., *100 Jahre Handelskammern in Österreich*, p. 126。商会的态度依然是温和而理性的。一些奥地利工业领域的强硬派分子因此成立了许多更加激烈的组织,特别是成立于1875年的工业俱乐部(*Industriellenklub*)。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与其他类似组织合并,成立了奥地利工业联盟(*Hauptverband der Industrie Österreichs*)。米塞斯的密友魏斯·冯·韦伦施泰因领导了这个组织。

34. See Bundeskammer and Wiener Kammer der gewerblichen Wirtschaft, eds., *100 Jahre Handelskammern in Österreich*, p. 135f。

35. 这个职位的正式称呼是“Konzipist”。参见 Mises Archive 107: 79。

36. 参见 Alois Gratz, “Die österreichische Finanzpolitik von 1848 bis 1948,” Hans Mayer, ed., *Hundert Jahre österreichischer Wirtschaftsentwicklung, 1848 – 1948*, pp. 265, 307, fn. 70, 309, fn. 123。

37. Mises Archive 107: 55b。

38. Mises Archive 107: 55c。他在战后的一本著作里指出,商业从业者和农业生产者之间的冲突涉及一些民族问题,前者是占主导地位的日耳曼人,后者则是非日耳曼人。参见 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Vienna: Manz, 1919), p. 134; translated by Leland B. Yeager as *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64f。

39. Mises Archive 107: 55d, 62。

40. 例如,参见 Mises Archive 107: 62, 71a 中的新闻报道。

41. 例如,参见 Mises Archive 107: 71。

42. 世界各地出现了各种“青年”运动:捷克、中国,在文学、绘画、政治等各个领域。

43. Sieghart, *Die letzten Jahrzehnte einer Grossmacht*, p. 138。

44. *Ibid.*, p. 143。

45. 参见 Boese, *Geschichte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1872 – 1932*, pp. 131, 133; 另见米塞斯写给弗朗茨·伯泽(Franz Böse)的信,日期是1919年9月30日,藏于 Mises Archive 53: 47f。

46. 其他讨论主题包括地方政府名下企业的问题,以及纪念德国经济学家汉森的纪念讲座,由格奥尔格·F. 克纳普主讲。

47. 参见 Mises, “Max Weber und der Kathedersozialismus,” *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reprint,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29] 1976, pp. 85ff.); Dieter Lindenlaub, “Richtungskämpfe im 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 *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Beiheft no. 52 (1967), pp. 272ff. ; Dieter Krüger, “Max Weber und die ‘Jüngeren’ im 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 Wolfgang Mommsen and Wolfgang Schwentker, eds., *Max Weber und seine Zeitgenossen* (Göttingen: Veröffentlichungen des Deutschen Historischen Instituts London, 1988), pp. 98 – 136。

48. 阿道夫·韦伯与阿尔弗雷德·韦伯和马克斯·韦伯兄弟并无血缘关系。

49. Mises, *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pp. 86f. ; the translation is from Mises, *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 Hans Sennholz, trans. (New York: Arlington House, 1977), p. 103.

50. 海诺·海因里希·瑙(Heino Heinrich Nau)指出,马克斯·韦伯只是阐述卡尔·门格尔的方法论立场而已。他的主要贡献是综合了门格尔的方法论与海因里希·李凯尔特的价值关系理论。因此,关于价值中立的争论本身成了门格尔和施莫勒之间方法论之争的继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所谓的实证主义之争(*Positivismusstreit*)中又出现了新一轮性质相同的辩论,这场运动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旨在反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卡尔·波普尔和追随者。参见 Nau, “‘Zwei Ökonomien.’ Die Vorgeschichte des Werturteilsstreit in der deutschsprachigen Ökonomik,” Nau, ed., *Der Werturteilsstreit. Die Äusserungen zur Werturteilsdiskussion im Ausschuss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1913) (Marburg: Metropolis, 1996), pp. 9 – 64。

51. 卡特尔减少了国外竞争,因而至少一段时期之内削弱了竞争最不激烈的那些行业的工资下调压力。这些行业雇用的工人会比其他情况下更加缺乏移民的动机。

52. “Verhandlungen der Generalversammlung in Mannheim,” *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116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06)。

53. 关于瑙曼,参见 Ralph Raico, *Die Partei der Freiheit* (Stuttgart: Lucius & Lucius, 1999), chap. 6。

54. Boese, *Geschichte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1872 – 1932*, p. 113.

55. *Ibid.*, p. 133.

56. 参见 Friedrich von Wieser, “Der Geldwert und seine Veränderungen,” *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132 (Munich, 1909); reprinted in *idem*, *Gesammelte Abhandlungen*, F. A. Hayek, ed. (Tübingen: Mohr, 1929), pp. 193 – 242。

57. 讲座手稿也发表于协会的系列出版物。参见 Friedrich von Wieser, “Über die Messung der Veränderungen des Geldwertes,” *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132 (Munich, 1909); reprinted in *idem*, *Gesammelte Abhandlungen*, Hayek, ed., pp. 243 – 52。

58. Mises, “Eugen von Philippovich,” *Neue Österreichische Biographie* (Vienna, 1926), 1st section, vol. 3, p. 56.

59. 参见 Max Weber,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Tübingen: Mohr)。

60. Max Weber, "Verhandlungen des Vereins für Socialpolitik in Wien, 1909," *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Socialpolitik* 132 (Munich and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10): 583.

61. Mises, "Eugen von Philippovich," p. 60.

62. 维也纳的争论延续到了1914年5月1日在柏林召开的委员会会议,此次会议只讨论了一个问题,就是价值判断在经济科学中的作用。为了避免令人不快的公开纷争,作为会议讨论基础的十五篇文章没有发表,也没有辩论记录。这次会议是价值判断之争的高潮,后来,价值判断之争改头换面,又出现在1960年代发生的所谓实证主义之争上。幸运的是,先前那十五篇文章此时终于得以出版。参见 Nau, ed., *Der Werturteilsstreit*。

63. 1909年1月初,马克斯·韦伯参加了在柏林召开的一次会议,筹办社会学会。除他之外,还有三十九名初始会员,其中包括费迪南德·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格奥尔格·西美尔、维尔纳·桑巴特、弗里德里希·赫克纳、保罗·巴尔特(Paul Barth)、路德维希·戈德沙伊德(Ludwig Goldscheid)、赫尔曼·坎托罗维奇(Hermann Kantorowicz)、弗朗茨·奥本海默、恩斯特·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和他的兄弟阿尔弗雷德·特勒尔奇。马克斯·韦伯也是1910年法兰克福第一次会议开幕邀请函上的签名者,在这次会议上,滕尼斯当选为会长,马克斯·韦伯本人担任司库。

64. 参见 Mises Archive 107: 70, 95。

65. 参见 Mises, "La Réforme financière en Autriche," *Revue Économique Internationale* 7, no. 4 (October 1910): 39 - 59; idem, "Neue Literatur über Geld- und Bankwesen," *Zeit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Sozialpolitik und Verwaltung* 19 (1910): 385 - 95。

66. 参见 Ludwig von Mises, "Die neue Regierungsvorlage zur Abänderung des Personalsteuergesetzes," *Neue Freie Presse* (#16931, October 10, 1911); copy is in Mises Archive 106: 7。

67. 参见 Mises, "Der 'kleine Finanzplan' des Abgeordneten Steinwender," *Neue Freie Presse* (December 5, 1912); copy in Mises Archive 106: 10。

68. 参见 Mises Archive 107: 81。

69. 在他活动的最后阶段,这一论证曾经特别提出来过。一个极好的例子就是他于1913年5月提交的关于保险合同征税提案的报告。其中米塞斯批评了对农村和城市人口的区别对待,以及该提案对财政部门既得利益的过度倾斜。参见 Mises Archive 107: 92。

70. 参见 Gratz, "Die österreichische Finanzpolitik von 1848 bis 1948," p. 264。

71. 米塞斯获赠50册样书,同时不得不为分担出版费用(总计2264.18马克)支付了1372.50马克(或者26.6盎司黄金)。该书第一版印数1000册,外加100册免费分送评论家或者作为礼物送人(参见 Mises Archive 50a: 36f)。

72. 参见米塞斯的书信, Mises Archive 50a。

73. Max Weber,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3rd ed. (Tübingen: Mohr, 1947), vol. 1, § 6, p. 40. 在英文版中,这段话的翻译不是十分正确:"货币理论的形成尤得力于冯·米塞斯,对于这位作者来说,是最可取的。"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ed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 78.

74. 参见 Joseph Schumpeter, "Das Sozialprodukt und die Rechenpfennige: Glossen und

Beiträge zur Geldtheorie von heute,”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Sozialpolitik* 44 (1917 – 1918)。

75. “这部著作主要优点在于,作者全面掌握了这一理论,从不允许自己陷入脱离实际的抽象中去,而是完全扎根于事实。” Albert Hahn, review in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Sozialpolitik*, quoted from Mises Archive 87a: 11f.

76. Benjamin M. Anderson, *The Value of Money* (New York: Macmillan, 1917), p. 100.

77. 参看 Mises, *Erinnerungen*, p. 18。另见奥托·埃尔利希(Otto Ehrlich)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2年4月29日;Grove City Archive: Ehrlich file。

米塞斯一生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建立了一套关于人类行为的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最先展现在《国民经济学》(1940)和《人的行为》(1949)中。他的体系来自两项在时间上交错重叠的研究项目,其中第一项涉及经济科学本身,第二项则讨论这门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从1929年到1962年间,他陆续出版了对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反思。¹他的整个庞大的经济学研究计划跨越了从1912年到1940年的时期。这项研究始于货币理论著作,其中,米塞斯展开了他后来予以扩展并加以系统化的原创主题,并最终在《国民经济学》中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212 这一伟大的原创主题,就是将货币与信贷理论整合到门格爾的价值和价格理论框架中去。米塞斯在他的第一部著作《货币与信用原理》中讨论了这一问题,此书为他赢得了令人垂涎的在奥地利大学任教的机会。卡尔·门格爾也是由于货币理论方面的原创贡献而获得任教资格,他的货币理论发表在《国民经济学原理》第8章。就此而言,米塞斯延续了门格爾的传统,把自己的学术声誉建立在货币分析的基础上。不过,他不只写了一章,而是提供了一部完整的论著。

卡尔·门格爾货币理论的主要论点是将货币的产生解释为一种社会秩序。他强调说,货币不会像雅典娜蹦出宙斯的头颅那样神奇地出现,而是一步一步地从非货币的商品演化而来。²不过,门格爾没有将他的边际价值理论应用到货币本身。《国民经济学原理》的读者可能会有一个奇特的印象,那就是价值理论仅仅应用在消费品和生产要素上,货币并不受制于这一理论。

那么,边际价值与货币之间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呢?这是《货币与信用原理》一书的核心问题。米塞斯在此书的第二部分即全书核心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从而将奥地利学派价值和价格理论扩展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货币不仅不再是特殊情况,而且也能被新的边际价值理论完全包容进来。

在这部著作中,米塞斯尽其所能对货币和信贷理论进行整合,使其与价值和价格理论融为一体。从一开始,他就意识到自己的说明可能并不充分。后来他解

释说：

准备这本书时,我面临的²¹³最大困难就是,我打算仅就经济问题全部领域的一个有限部分给予特别关注。但是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必须是全面而统一的整体。在经济学中,没有什么专门领域。为了处理局部,我们必须将之建立在²¹⁴综合所有问题的一个理论总体基础上。但是我不能使用任何现成的理论。门格尔和庞巴维克的体系已经不再让人完全满意。我准备在前辈大师已经发现的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但是我不能接受他们对一些基本问题的处理方式,而货币理论必须从这些问题开始。

根据那个时代流行的观点,货币理论可以和经济问题的整体架构分离开来——实际上,它甚至可说不属于经济学;从某方面说,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基于这种观点,英美各国的大学为货币和信贷理论设立了专门的教授职位。我的目的就是要揭示这种立场的错误,并把货币理论置于恰当的位置,作为经济科学整体的一部分。

如果我能安心工作并有充裕的时间,我可能会以直接交换理论作为卷一的开篇,然后继续讨论间接交换理论。但实际上我却是以间接交换开始的,因为我觉得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利用。我知道我们当时处在一场大战的边缘,而我想在战争爆发之前完成这本著作。因此,我决定只用几个论点越过货币理论的狭隘框架,而把更为全面的论著推延到将来。³

他的预言不幸言中,很多年里,战争及其后果使他无法在公开出版的书中系统阐述更为一般的思想。不过,这些思想却得到了战争经历的哺养,通过一篇论述社会主义体制下经济计算问题的论文,显示了更为强大的力量。这篇论文发表于1920年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该刊可以说是当时德国社会科学期刊中最前沿的刊物。其中,他对价值判断(valuation)和基于货币的经济计算之间的差异作了详细解释,他在《货币与信用原理》中曾强调了这一差异,但没作过具体阐释。米塞斯指出,经济计算一定是市场价格的计算,而价格只有在私有产权所有者的互动中才会产生。正是因为我们可以根据经济计算作出决策,劳动分工的扩大才成为可能。因此,社会主义社会(根据定义,这一社会的生产方式不存在私有产权,因此也就没有市场价格)无法产生扩展的劳动分工。如果人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理性的劳动分工体制,那么这一社会至今尚不存在,也永远不可能存在。

米塞斯遵循庞巴维克的方式,从看似晦涩的理论区分之中,得出了一些关键的政治洞识。他以这篇经济计算论文为基础,写出了一部讨论社会主义的综合著作(1922);他曾深藏心底的思想,经过多年的生长,终于在短短几个月内再次爆发出来。

在《国民经济学》和《人的行为》中,他最终基于价值判断和经济计算之间的差别而对整个经济科学作了全景式的描述。

我的《国民经济学》最终提供了一个让我可以充分阐述经济计算问题的机会……至此,我完成了这个三十五年前便已开始的研究计划。⁴

215

货币的本质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是卡尔·门格斯的真正信徒,他对货币理论的阐述,开篇就是关于货币本身性质的分析。然后才继续讨论货币购买力的决定因素,以及他所谓的流通媒介(*Umlaufsmittel*)对于货币体系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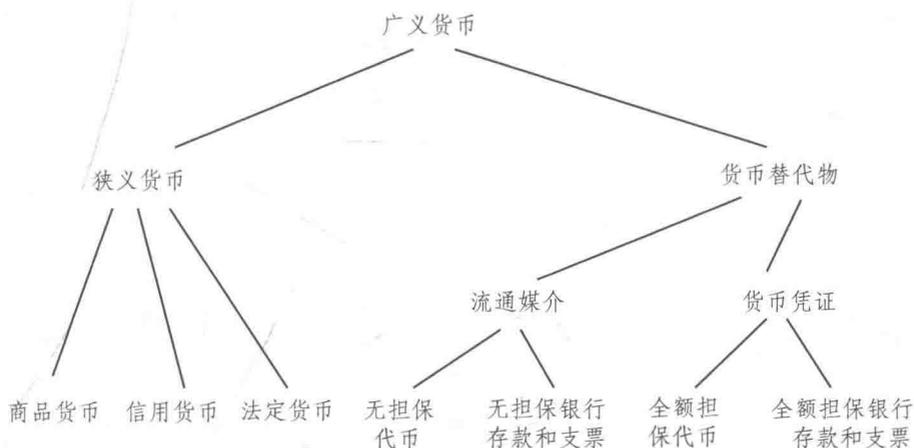
关于货币本质的讨论,米塞斯非常倚重卡尔·门格斯的著作。这位奥地利学派创始人已经指出,货币不是根据物理性质来定义的,不论是何种商品充当货币都是如此;货币的特征在于以下事实:充当货币的财货(1)是一种商品,(2)用于间接交换,以及(3)买卖这种财货主要是为了用于这些间接交换。

门格斯也强调了货币是由于不同的需要难以相互匹配而在市场上自发产生的。例如,一个制板凳者想从农民那里购买一打鸡蛋,而农民已经有了足够的板凳,或者一个画家打算从啤酒商人那里购买一杯啤酒,可是这个啤酒商人对艺术毫无兴趣,诸如这类情况,就不得不诉诸间接交换。人们先将他们的产品换成较易销售的商品,比如盐巴、小麦或者银币,然后通过后续交易再以这些“交易媒介”换取鸡蛋和啤酒。这一事实的重要意义在于,货币体系不用通过一个先验的社会契约或者政府法令产生。⁵

216

米塞斯从四个方面补充并精炼了这一关于货币本质的分析。

首先,他不认为货币的各种不同功能——交换手段、价值储藏、支付手段、延期支付方式、价值尺度(*numéraire*)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米塞斯主张,一种商品能够作为价值尺度存在,只是因为它可用作交换手段;同样,一种商品能够成为价值储藏工具,纯粹由于它是可销售的。这样一来,货币的功能就有了层级之分:交换手段是最根本的,也是其他功能的必要条件。



其次,米塞斯提出了一种关于货币对象(monetary objects)的完备分类。所谓货币对象,按照门格的语言,就是所有获得普遍认可、能够充当交换媒介的事物。在最基本的层面,米塞斯将若干类“狭义货币”与若干类“货币代用品”或替代物区分开来。狭义货币就其自身而言是一种财货。相反,货币替代物相对狭义货币来说只是一种法律权益。通常它们是由银行发行,可在发行银行的柜台上兑换为真实货币(参见上图)。

217

为了明确货币与货币权利之间的基本区别,他应用了庞巴维克在一本关于法律权益经济学的开拓性著作中的关键洞识。米塞斯强调:“债权不是财货;它们是获得财货处置权的一种手段。这决定了它们的全部性质和经济意义。”⁶正如他在该书后面部分表明的那样,这些特性非常重要,不仅在把货币理论纳入门格尔价值和价格理论框架方面而言,而且对于分析银行业务在货币体系中的作用方面也是如此。米塞斯金融理论的核心是对两种截然不同的货币替代物之经济意义的全面分析。米塞斯指出,货币替代物要么得到相应数量货币的担保——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是“货币凭证”,要么缺乏这样的担保——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流通媒介。米塞斯在他著作的第三部分以全部篇幅分析了流通媒介的经济后果。⁷

第三,米塞斯反驳了那种认为货币价格是价值尺度的观念。此处他依据的是捷克经济学家弗朗茨·丘赫尔(Franz Cuhel)的著作,丘赫尔在几年前的《论需要理论》(Zur Lehre von den Bedürfnissen)一书中澄清了新门格尔主义价格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⁸他是心理主义边际效用理论(戈森-杰文斯-维塞尔)的拥护者,不过尽管如此,他对价值和效用理论的若干贡献还是有价值的。

218

丘赫尔反驳了庞巴维克和维塞尔关于边际效用的定量主张——这是指财货供

应的均质单位,其中每个单位提供同样的效用。根据庞巴维克的观点,使用若干单位带来的效用可以叠加,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比如消费十五个李子带来的效用正好等于消费一个李子的效用的十五倍。但丘赫尔反对这个观点,认为这和边际效用递减法则的基本思想是矛盾的,后者是说,来自一种财货每一额外单位的消费之满足,低于前一单位的消费所得到的效用。⁹

219 丘赫尔还提出了一个压倒性的论据,否定了满足程度的人际比较。消费两种不同财货所得到的好处,只能间接加以比较,而且这个比较只在作出决定的那个时刻才有意义。如果一个人选择享受 A 而不是 B,我们可以推知 A 对于此人来说必然比 B 带来更多的满足,因为在作出选择的那个时刻,A 和 B 都可以获得,彼此进行直接竞争。¹⁰因此,实际的个人选择为快乐的相对大小提供了证据。然而却是唯一一类可以获得的证据,因为我们从根本上无法感知他人的相对满意程度。¹¹我们只对我们自身各种需要的满足所带来的效用有着直接知识。他人的效用只能来自推断,而且是间接地通过他们的实际决策获知。

由此可知,根本不存在什么价值计算,甚至也不存在价值度量。即使货币也没有固定的价值,因此无法为价值计算提供基础。此外,由于货币价格是个体评价过程的结果,它们是个别的历史事件,永远取决于它们出现其中的特定环境。与瓦拉斯方程组所暗示的相反,不同时间和地点的货币价格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固定的。

220 因此,我们不能追随欧文·费雪的尝试,建立一个货币数量和货币价格(价格水平)之间关系的数量法则——就像物理学上那样。出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考虑,米塞斯非常重视价值理论的这一关键含义:

人的行为领域不存在固定不变的关系,因此我们无法通过数学方程解决实际问题,就像力学方程引入来自经验的数据和常数解决实际问题那样。

在这本论货币的书里,我没有直接摆下一句反对数理经济学的言论。我提出了正确的学说,同时克制自己不去攻击数学方法。我甚至经受住了揭露“流通速率”(velocity)这个空洞术语的诱惑。我驳倒了数理经济学,因为我已经证明货币数量和单位货币的购买力之间并不具有反比关系。我的论证表明,人们从前相信的存在于“经济数量”之间的唯一一个固定关系,事实上是一个变量,这个变量的值取决于个别情况下的予料(data)。这样一来,它也干掉了欧文·费雪和古斯塔夫·卡塞尔的交易方程。¹²

米塞斯对机械数量理论的批评,影响远远超越了货币理论领域。因为数量理

论的这一版本代表着一个更为广泛的议程：一般社会科学的数量理论。米塞斯指出，社会领域并不存在联系人的行为与其结果的固定不变的数量关系。苹果需求增加，任何时候都会导致更高的苹果价格。但是却不存在这样的法则，告诉我们苹果需求增加 10 个百分点，苹果价格上升例如 8 个百分点或 14 个百分点。实际数量永远依赖于每个具体情况的特定环境。 221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米塞斯比门格尔更加明确地讨论了货币国家主义或“货币国定派”（chartalists）的主张。门格尔曾经提出货币可以在市场中自发产生，但是国家主义者仍然宣称货币是国家的创造。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可以上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贯穿整个中世纪，这一争论没有停息，最后才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以门格尔式的方法暂时得到解决。但是到了 19 世纪末，国家主义卷土重来。法国的塞努斯基（Cernuschi）、奥地利的诺伊保尔（Neupauer），以及德国的莱克西斯（Lexis）再次宣扬货币只有经过国家宣布才为货币的言论。¹³ 不过，这一观点最著名的支持者是格奥尔格·克纳普——就是这位克纳普曾经开创了关于德国统治作为东欧农民的解放力量的研究。克纳普在《货币的国家理论》中认为货币是法律秩序的一种创造，因此货币理论只能作为法律史的一个分支研究。¹⁴ 根据克纳普的观点，货币是经由政府宣布才产生的。国家说这是货币或那是货币，它就立刻成为对应一定数量真实财货的代币。因此，货币的本质就是政府指定的代币（拉丁文的特许状 [Charta]），可以作为合法有效的支付手段来使用。¹⁵ 222

克纳普的观点起先并不被人看好，¹⁶ 但也的确获得了一些杰出银行家的早期支持，¹⁷ 并最终赢得了许多支持货币国家理论的拥趸。不管如何，他的货币国家理论完美地补充了已在德国经济学教授中流行的国家主义信念。正如米塞斯后来评述的那样：

德国的国家主义经济学派，在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克纳普的《货币的国家理论》那里可能已经达到顶峰。就其阐述的理论来说，这本著作本身并不如何出众，毕竟它的教义已经在圣典学者、法理学家、浪漫主义作家以及某些社会主义分子的著作中风行了很多个世纪。它的不同寻常之处就是它的成功。¹⁸

克纳普的根本错误在于，他没有看到只有涉及已经成立的契约，并且事关延期支付问题的时候，政府命令才起作用。事后看来（*Ex post*），政府能够决定什么可以作为“货币”单位，因而也能决定什么可以作为支付单位。但是，它并没有权力强 223

制市场参与者未来使用哪种交换手段：

只有商业使用能将商品转换为一般交换媒介。不是国家,而是所有那些参与市场交易的主体的普遍实践,创造了货币。¹⁹

价值理论与货币理论的整合

尽管新的边际主义价值和价格理论已经彻底改变了经济科学,但是货币理论事实上未受触及。此处,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作为古典经济学家都支持同样的观点,强调货币仅仅是取得对人类生活具有某种有益影响的“真实”财货的工具,但是货币本身并非这些财货。他们认为,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市场交换的最终目的从来不是用货币换取“真实财货”,而是用真实财货交换其他的真实财货。而从国民经济的角度,他们着重强调货币数量并不影响可用财货的总体数量。

224 基于这些洞见,他们得出结论,货币与国民财富是无关的,因此在分析一国福利时,政治经济学(处理整个国家经济利益的学问)可以置货币于不顾。²⁰这一观点最著名的隐喻就是“货币面纱”,这个概念是指货币仅仅是人类与真实经济之间的一层中间介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曾给出了这一看法的清晰表述:

物物交换时可以互相交换的各种物品如果用来换取货币,也可以换得等量的货币,因此这仍然是互相交换,只是交换过程由一种活动改为两种活动。各种商品的相互关系不因货币而有所改变。由此发生的新的关系只是这些商品与货币本身的关系,即它们可以换得多少货币,换句话说,货币本身的交换价值如何决定。²¹

根据穆勒的观点,货币无论如何都不影响国民财富,它只是“反映”或者“对应”背后非货币的实在而已。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也赞成这个观点,因此他们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据称的“真实”经济因素上,而忽略了货币理论。

225 新的经济理论的支持者或反对者并非没有注意到这种遗漏。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评论说,价值理论的新发现没有被应用到货币上。²²杰出的德国经济学家卡尔·黑尔费里希甚至认为新的边际主义方法不能用于货币。在《货币》(*Das Geld*)一书中,这位未来的德国银行总裁和德国财政部长认为,在边际效用方法中(按照他的理解,边际方法是把财货的市场价格解释为这些财货的各种服务

带来的心理效用的结果),一种财货的决定价格的效用完全依赖于这种财货的有效数量。但是对于货币,永远无法给出这种完全的依赖关系。虽然得自其他财货的服务与其市场价格无关,但是来自货币使用的服务却直接依赖于它的市场价格(也即购买力)。换言之,货币的边际效用不仅依赖于其数量,还依赖于其市场价格。因此,任何基于边际主义方法解释货币价值的尝试都会遇到一个难以克服的循环:货币的市场价格不能从其边际效用推出,因为这个效用本身就依赖于它的市场价格。²³

维塞尔的货币理论

奥地利阵营内部第一个对此作出反应的是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他把货币价值作为1903年10月26日他在维也纳大学就职演说的主题,讲稿发表时题为“货币价值及其历史变迁”(Der Geldwert und seine geschichtlichen Veränderungen)。²⁴这是维塞尔第一次表述关于货币理论与奥地利价值理论之间关联的思想。直到1926年去世,货币理论一直是维塞尔经济研究的核心。他为1909年社会政策协会的维也纳会议写了两篇长文,还为了一本战后出版的标准德国社会科学辞典《政治科学手册》(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提供了一篇关于货币的长篇词条。直到临终之前,他还在修改最后这篇文字。

226

这些出版物代表着整合边际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的第一次尝试,维塞尔因此得以在德语世界货币经济学家之中保留了崇高的威望。他对德国货币思想的影响,当然也因其作为奥地利学派奠基人之一的权威身份而得到加强。但是,他之所以能够成为货币经济学领域的杰出学者,主要原因在于其货币思想很好地迎合了绝大多数同事的已有概念,在这点上,他的处境远比米塞斯1912年提出货币理论时好得多。维塞尔是银行学派(Banking School)的代表,他的思想在德国世纪之交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米塞斯则发展了通货学派(Currency School)。²⁵⁻²⁶

维塞尔货币思想的所有基本要义都已出现在他的1903年讲座中。根据他的基本假设,并不存在对货币本身(per se)的需求。如果一种财货用于间接交换,货币并非交换目的,而只是获得“真实财货”的中介而已。货币本身没有价值,而只代表可用货币换得的其他财货的价值。维塞尔并不否认诸如金银这些历史上的交易媒介是商品货币,不过按照他的看法,仅当它们出于非货币的目的而被需要时,才是商品。现代交换媒介,譬如纸币和“货币代用品”(对货币的合法债权,可用于取代相应数量的真实货币),就完全不是商品了,因为它们仅仅作为交换媒介而存

227

在。没有对纸币本身的需求,而仅有对纸币所能交换的商品的需求。前者的价值完全来自对后者的需求。

228 但是,如果现代货币不是商品,又是什么呢? 如果它自身不是交换的目的,又是如何用于市场交换的呢? 维塞尔坚持认为,虽然货币确实能够将商品从一个所有者手中“转移”到另一个所有者手中,但它更重要的作用是度量了它所转手的商品的价值。²⁷简言之,货币在本质上是价值的一个标准、一个度量标杆或计价物(*numéraire*),它被用于市场交换,是为了度量它所换取的那些商品的价值。对维塞尔来说,这种度量过程本质上是对交易商品在所有其他商品的整个序列中的位置进行排序的过程,货币的价值就来自这种排序。²⁸

根据维塞尔的理论,现代货币的“弹性”使它成为价值的一个理想标准。维塞尔盛赞银行学派的伟大支持者托马斯·图克(Thomas Tooke),认为商品数量的增加会引起货币代用品数量的相应增加,以及所谓的货币流通速率的上升。这些增长不会对货币价格产生独立的影响,相反,它们的弹性确保了货币均衡在现有货币购买力水平上自动达成。²⁹

229 黑尔费里希的批评呢? 如果货币的价值完全来自商品,那么,断言货币衡量商品价值不是循环论证吗? 维塞尔没有多此一举引用黑尔费里希的著作,可能是认为他已经解决了循环问题,因为他强调了货币不是商品,货币只是通过货币可以购得的其他财货的占位符,所以不存在循环问题。可以说,财货度量财货,通过货币。当然,市场价格也不必然与价值成比例,但是正如他在《自然价值》(1889)中主张的那样,这个问题随着国民经济达到完美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就会自然消亡。

维塞尔还从完全不同的角度,通过引入历时视角(*diachronic perspective*)分析了货币价值的决定:货币价值是如何建立在时间变化基础上的。这次他也没有提到黑尔费里希的批评,不过,关于货币价值的历时决定,已经隐含地否定了循环推理的责难。黑尔费里希的批评只能针对货币购买力的共时(*synchronic*)决定问题:我们无法从今天的货币价值获知今天的货币市场价格,但如果今天的货币价值依赖于昨天的价格,这个批评就不成立了。维塞尔指出,事实就是这样的情形。表面的循环论证消失,一个纯粹的因果链出现了:两天前的货币价格决定了昨天的货币价值,而这又决定了今天的货币价格,等等。

维塞尔认为,货币价值在那些首次作为货币使用的商品所满足的需要那里,有其“历史根源”。这种原初的货币商品的原初使用价值,是货币购买力进一步变化的基础。在每个时刻,货币的过去价值都成了评估现在正在交易商品的价值的基礎。这些交易改变了现存的价格,或在商品价格总序列中增添新的价格,因而改变

了货币价值本身,这样也就改变了未来价值度量的基础。³⁰维塞尔强调他的理论包含以下两点:(1)货币只有作为商品货币才能开始出现,不过(2)一旦货币开始形成,并具备了未来价值变更的历史基础,它就不再必须保持商品货币的形态。因此,纯粹的纸币在后期某个阶段是可能的。³¹

230

维塞尔非常重视这个论点,因为单单这点似乎就可解释当时奥匈帝国货币体系发展过程的一些情况。1892年之前,奥匈帝国官方采用的是银本位制。但为了给1848年至1849年、1859年至1860年以及1866年的战争筹措资金,这个君主国发行了大量的纸币。这些纸币在发行时是不可兑换的,但将来有兑现的希望,因此它们也被当作货币使用。它们的流通获得了法定货币法的进一步支持。因为不一定能兑现,钞票流通时就打了折扣。但在1879年早些时候,发生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情况:白银开始打折出售,而政府钞票却开始溢价流通。这是怎么回事呢?之前一些年里,白银产量有了较大提高,很多国家黄金已经取代白银成为通货。随着需求减少,供给增加,白银价格急剧下跌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³²

是这样吗?维塞尔相信这一事件实际上反驳了他所谓的货币“金属”理论。根据这种理论,货币价值不是来自需求,而是来自用于制造货币的金属的内在价值。金属主义的拥护者们因此能够轻而易举的解释为何纸币折价流通——毕竟,它不是真正的货币。但是,若要解释纸币何以变得比据称的真正货币更有价值,他们就铩羽而归了。整整十三年的时间里,奥匈帝国货币体制似乎成了纯法定货币之可行性的真实世界证据。维塞尔的货币价值历时理论则给出了关于这一现象唯一可取的解释。

231

不过,这还没有穷尽维塞尔货币分析方法的全部解释力。利用货币度量标杆理论,维塞尔也对货币价格的长期上升给出了原创性的描述。³³他认为,这种现象源自所有发达国家都可见到的一个巨大转变,即这是放弃物物交换接受货币交易的结果。简言之,货币的购买力减少是因为货币经济流布更广。³⁴维塞尔看法如下:越来越多的商品换成货币,这些额外商品的边际价值不断降低;更低的边际价值继而导致货币边际价值的减少,也即导致货币购买力的降低。

六年后,他在《货币价值及其变迁》(*Der Geldwert und seine Veränderungen*)中对他的理论作了重要澄清,这篇长文是为协会1909年维也纳会议写的。³⁵在这篇论文中,他全面整合了货币理论和一般价值理论,清楚说明了他的货币价值理论是如何与价值的主观主义理论相结合的。

后来被称为“货币价值的收入理论”的核心论据是这样的:随着个人收入增加,边际货币单位的价值趋于减少。考虑一个给定的时期,一个行为主体在给定的

232

价格下,花费全部可支配货币收入购买消费品的情景。维塞尔指出,货币主观边际价值来自(等于)此人以其收入所能购买的最不重要的消费品所带来的效用。行为主体一旦具备了这种货币主观边际价值的认识,也就有了一个个人度量标杆可用,于是,他继续在市场上买卖货物,而且总是以他所能买得起的最不重要的消费品的效用作为参照,度量这些货物的价值。³⁶

233 在1903年的演说中,维塞尔已经着重强调,货币价值仅仅是派生的,因此,在市场上真正交换的不是货币,人们互相交换的是真实财货。³⁷货币将“原始的交换”“一分为二”。首先商品A换成一定数量的货币,然后这些货币换成一些其他商品B。在1909年,维塞尔进一步澄清这个观点,认为市场上的供求仅在A和B之间是可见的,而货币不过是“介入”而已。根据维塞尔的说法,这是直接交换和间接交换唯一的差别。这种介入的好处在于,货币使得“伟大的社会簿记”成为可能。维塞尔使用了这一借自仓库生意的语言描述国民经济的经济过程。按照他的隐喻,货币的每一数量起着一张存款收条的功能,这些收条可以轻松地从一个社会成员转手到另一个成员手中,从而给予他们双方进入储存着每个人劳动的公共库存的机会。

交易双方都将商品投入国民经济过程,以求从中获得所需商品,他们彼此之间存在某种伟大的国民簿记,它的意义在于,显示每个人都投入了与其意图获取的价值相当的真实价值。³⁸

米塞斯后来把这种对货币本质的描述称为“指派理论”(Anweisungstheorie),因为它的本质是把货币视为一种符号(代币)。³⁹这一理论可以上溯到18世纪的约翰·劳,他是凯恩斯之前最伟大的通货膨胀支持者。劳抹杀了货币与信用之间的差别,他写道:

234 国内贸易依赖于货币。贸易数量越大,需要雇用的人力也就越多……他们可以为了信用而工作,但是,除非信用能够进入流通,以便向工人提供生活必需品,否则这样做是行不通的;如果进入流通,则信用就是货币,而且对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都会产生同样的影响。⁴⁰

19世纪中叶,指派理论在银行学派拥护者的著作里得到充分发展。⁴¹从此,它在德意志诸邦扎下了根。指派理论早期的德国反对者是奥托·米夏埃利斯(Otto

Michaelis)和阿道夫·瓦格纳。后者写道:

货币概念就是可转手的借据的一种,表示货币所有者曾为公民社会提供的各种服务。它授权这一货币所有者,可从其他任一所有者手中,以他想要的财货的形式,取回与他的服务同等的价值。⁴²

历史学派轻视经济学的理论化倾向,在他们的时代,瓦格纳关于货币的论著成了这些主题的主要思想来源。由于瓦格纳的影响,之后几代德语经济学家皈依了银行学派的信条。⁴³在奥地利,维塞尔、熊彼特和希法亭发扬了瓦格纳的思想。质疑这一新的正统学说的第一位德语经济学家正是米塞斯。他力图为通货学派的基本原理辩护,其中杂糅了门格尔对货币的分析。他理论的核心部分是这样的洞识:货币就其自身而言乃是一种经济财货,而不只是其他财货的代表。

235

至于米塞斯为何持有这些观点,我们不得而知,不过,门格尔对他的影响当然也混杂了庞巴维克在这一问题上的类似观点。庞巴维克曾在大学讲座里强调过关键点:

货币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财货,与其他财货并无二致;只是它的需求更大,另外它的流通也比所有其他商品都更广泛。货币不是符号或抵押;它不是某种财货的记号,而本身就有价值。它自己就是一种真正的财货。⁴⁴

庞巴维克和米塞斯得出截然不同于熊彼特与维塞尔的政策结论并不奇怪。米塞斯认为货币的存量从根本上说无关紧要,而维塞尔则强调了货币作为度量标杆的功能必须不受干扰,它的价值应该尽可能稳定,所有不稳定的因素应该予以消除。维塞尔建议,废除商品货币,代之以纯粹的纸币,可以优化国家通货。事实上,纸币会更稳定,因为它的价值不受对于货币商品来说的非货币需求的影响。⁴⁵

236

维塞尔也澄清了自己的理论,认为货币价格的长期增长是货币交换取代物物交换的结果。他主张,货币经济的发展在货币交换的网络之内带来了更多的生产要素。这些要素必须得到支付,而其货币价格(之前是用自然物来支付的),代表着生产的货币成本的增加;这些新增的成本不得不“加到”售价上。显然在这个过程中,总的货币收入增加了,而真实收入并未改变,这样一来货币价值就下降了。证毕(*Quod erat demonstrandum*)。⁴⁶

米塞斯的货币价值理论

维塞尔并非全盘皆错。通过参照过去的价值来解释货币的当前价值,在货币理论中是一个关键突破。维塞尔的著作激发了弗朗茨·X.魏斯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两位年轻的维也纳经济学家精炼这一粗疏的思想,并将其锤炼成为新的货币价值学说。⁴⁷

米塞斯后来称为“回归定理”(regression theorem)的理论将成为他的货币思想的支柱之一,不过首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维塞尔的理论中两个相关的问题。

237 首先,维塞尔无法整合回归与市场的定价过程。他已经发展了货币购买力的纯粹价值理论:他的一般假设是,建立在市场上不同商品彼此之间的交换比率只是价值比率的不同表现而已。⁴⁸但是米塞斯认为,这个假设全然站不住脚。价值和价格之间并无这样的对应关系,甚至在完美的维塞尔式共产主义世界也是如此。门格尔和庞巴维克曾令人信服地断言,虽然市场价格的确来自个别的价值判断,但它们在数量上与其得以形成的价值来源并无关系。

维塞尔观点中的第二个基本缺陷是,他不认为货币就其自身而言就是一种财货。货币只是背后的真实财货的象征——一层“面纱”或者一种“指派”(Anweisung)而已,这样一来,货币对于定价过程就没有独立的影响。这种假设与边际价值理论的主要原理相互矛盾。尽管所有其他市场交换都是逆向评价的结果——每个交易伙伴都偏爱他买到的商品甚于他支付的价格,然而按照维塞尔的理论,使用货币的市场交换却要遵循等价原则。⁴⁹通过支付一定数量的货币,而从“社会大仓库”取得一些财货,人们承认这些财货与之前为了取得等量货币而售出的财货(“存在社会大仓库里”)具有同等价值。

米塞斯在《货币与信用原理》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在于他将我们从货币面纱的迷思中解放出来。货币究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商品,而不只是由于历史的偶然。认识到这一点,米塞斯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将货币理论整合到边际价值理论的一般框架中去了。

238 他的整合工作将货币的商品本质与经过庞巴维克提炼的门格尔价值和价格理论结合起来,同时也结合了维塞尔关于货币当前价值需要一种历时解释的洞识。米塞斯甚至可以依靠门格尔的现金持有理论,这一理论择要而言(in nuce)已经包含以下洞见:货币自身就是一种经济财货,而不只是其他财货的代表。但是,要将这些因素融会贯通形成内在一致的理论,还需要对货币经济学历史悠久的几个支

柱予以致命一击,尤其是那种将货币仅仅视为面纱的古典传统。米塞斯充分意识到了这对他的理论来说是关键,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这本著作的导言中进行了把各种类型货币(狭义货币)从货币替代物之中区分出来的看似有些枯燥乏味的工作。事实上,这些替代物正是维塞尔和其他指派理论的支持者们提到货币时心中默认的象征或占位符。米塞斯煞费苦心的分析证明,主流理论将货币替代物不恰当地一般化为货币本身。虽然货币替代物的价值的确与背后的真实财货(例如一盎司的黄金)的价值对应,但是黄金货币的价值本身并不对应任何事物;相反它受制于同样决定所有财货价值的一般的边际价值递减法则。

* * *

米塞斯试图抛弃货币面纱的迷思,在这方面几乎取得了成功。在某处,他仍然重提了这个错误学说。他声称,一个边际单位货币的价值等于将要购买的一个单位商品的价值。相关段落如下:

货币的主观价值永远取决于可凭货币换取的其他经济财货的主观价值。事实上,货币的主观价值是一个派生概念。如果我们希望估计某一给定数量的货币的重要程度,同时我们知道某项满足依赖于这一重要程度,那么我们只有假设货币具有给定的客观交换价值,才能进行此项估计。“货币的交换价值就是通过这些货币可以获得的物品的预期使用价值。”⁵⁰

239

无论何时,人们珍视货币,都是因为在在他看来货币具有一定购买力。⁵¹

此处的失误在于,那句“预期使用价值”是引自维塞尔的。这和他后来在《国民经济学》和《人的行为》中的论述相冲突,在后两本书中他解释说,一定数量货币的主观价值就是在某人的现金余额(cash balance)下持有这一数量的价值。⁵²同样的错误似乎还隐藏在他的以下主张中:过去大约二十年间(上溯至1911年),货币替代物的增加使得更高的经济增长成为可能——比在金本位下更高,因为黄金数量增长较慢。⁵³⁻⁵⁴

到《国民经济学》(1940)出版时,米塞斯已经将这些失误从思想中祛除了。⁵⁵但是,这部早期货币理论专著仍被视为他在这一领域的最终结论。1945年后最有影响的货币理论家唐·帕廷金(Don Patinkin)就曾引用上述段落批评米塞斯,因为这段引文显露出了货币面纱的陈旧观念。帕廷金说,这些观点隐含了一种关于货币价值的循环解释。⁵⁶他的批评是对的,不过他的总体看法(在他看来,前辈未能提出

240

一个关于货币价值的一致解释)却忽略了米塞斯后来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和《人的行为》。

货币不是中性的:康蒂永效应

那种认为货币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财货,而不只是其他财货的占位符的看法,使得米塞斯尤其强调货币对真实经济的影响。人们通常都会重视通胀和通缩对延期支付产生的影响。通胀意味着更高的未来价格——即更低的货币购买力,这对债务人有利,而让债权人蒙受损失。相反,通缩则会使债权人受益而使债务人蒙受损失。到此为止,还算不错。米塞斯追随古典经济学家例如大卫·李嘉图等人的思想,强调货币供给的通胀和通缩不能提高一国整体的潜在生产能力。但这种变化的确可以产生其他社会后果,尤其是对社会结构和资源分配而言。

241 虽然通胀和通缩无法改善社会整体状况,但却改变了社会不同成员之间资源分配的结构,而且势必影响这些资源在不同用途上的边际价值。例如,通胀增加了个体 A(债务人)手中的货币,而减少了个体 B(债权人)手中的货币;由于这两个人有着不同的主观价值以及不同的企业家眼光和天分,他们在货币使用上也会有所区别,例如会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进行投资,会给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工资率下支付不同的工资,等等。

这些简单的思考,说明货币供给的变化对真实世界具有普遍而深入的影响——这一事实并未引起米塞斯的许多同时代人的注意,他们仍然沉浸在货币面纱学说中。例如庞巴维克就很不愿意承认货币具有真实效应,因为他已经习惯于以总体术语来思考货币而非基于社会内部的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他试图弱化米塞斯的发现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收入效应的确创造了一些偶然的“摩擦”,但不能改变经济和社会的长期状态。⁵⁷

米塞斯对通胀和通缩的社会后果的分析,并不局限于延期支付方面的思考。他还分析了通胀和通缩对现场交易(spot exchanges)的分配效应。他评论说,例如在通胀的情况下,如果通胀同时且以相同比例影响所有社会成员,那就不会发生分配效应。但在真实世界中,这一条件永远无法满足。通胀起初只会影响社会的某些成员,通过他们与其他人的互动,最终影响了社会中其余的人。

242 举例来说,我们假设一个封闭国家开采出了新的金矿。金矿出产的新增黄金流入商业领域,最先进入矿主的腰包,然后依次流入那些与他们交易的人

的腰包。如果我们将整个社会大致分为四个集团,即矿主、奢侈品生产商、其他生产商和农业从业者,那么,前两个集团可以享受到货币价值下降的好处,这其中前者比后者获得的收益更大。但是只要影响继续扩大到第三集团,情况就不同了。这个集团由于前两个集团需求增加而获得的利益,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奢侈品价格的上升抵消掉了,因为在货币贬值开始影响其他商品之前,奢侈品的价格已经充分吸收了货币贬值的效应。最后,对于第四集团来说,整个过程只会带来损害。农产品价格的上升虽然可以补偿农民的利益,但是在此之前,他们却要为一切工业品支付较高的价格。农业人口的经济困难时期,在农产品价格终于上升之后,固然可以宣告结束,但他们也就无法获得更大利益来补偿曾经遭受的损失。也就是说,他们不能按照货币贬值之前的价格水平,花掉他们后来增加的收入,因为价格的上升已经蔓延到整个社会。他们在旧的较低的价格水平下卖出自己的产品,而又不得不在新的更高的价格下购买别人的产品,因此,他们在早期遭受的这种损失无法得到任何补偿。矿主以及与矿主关系最近的群体所获得的利益,正是来源于这些最后承受货币价值变动之后果的群体的损失。⁵⁸

因此,通胀和(以此推断)通缩本质上是再分配现象。它们不能使社会在整体上更加富足,但却影响了社会的收入分配、资源配置以及收入。 243

米塞斯关于货币影响真实经济的分析,奠基于他对过去一些重大通货膨胀现象的研究,⁵⁹以及他对古典经济学的研究。⁶⁰今天,这些影响有时称为“康蒂永效应(Cantillon effects)”⁶¹——以18世纪早期爱尔兰裔法国银行家和经济学家理查德·康蒂永(Richard Cantillon)的名字命名。康蒂永在他的《商业性质概论》(*Essay on the Nature of Commerce in General*)中首次描述了通胀的重新分配和重新配置效应。⁶²关于这一主题,《货币与信用原理》是强调上述效应的最新论著之一。在米塞斯写作的年代,欧文·费雪、古斯塔夫·卡塞尔和其他经济学家开始忽略这些问题,而只集中关注货币供给变化的总量后果。⁶³他们的方法赢得了时代,因此通胀最致命的效应之一从此隐藏在了新的“宏观经济学”探测范围之外。⁶⁴ 244

汇率的决定:购买力理论

米塞斯还在另外一个重要问题上与主流观点分庭抗礼,这个问题就是两种货币之间汇率的决定因素。为了表明自己的看法,他复兴了一个已被流行的货币面

纱迷思取代的古老学说。

245

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货币价值只是货币背后真实商品价值的反映,因此自然认为汇率同样只是某些真实事态的反映。这样一来,国际收支平衡理论就在高级经济学教育中取得了实质的垄断地位,并且主导了德国和奥匈帝国中央银行的政策。⁶⁵根据这个理论,国际货币的流动(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同国家通货之间的汇率),趋于接近一个使得商品和劳务的进出口相对比重与外国存款和外国债务的相对比重达到平衡的比率。这些真实因素是自变量,而国际货币支付和汇率则是应变量。这个理论的政治含义是,面对令人不快的汇率贬值,政府必须采取措施改变这些真实因素,以图阻止货币流动的后果,也就是说,他们必须通过关税、进口配额和其他措施,减少进口。

米塞斯发表的第一篇货币政策论文是1907年关于奥匈银行汇率管制背后动机的论文,在这篇文章里,他已经开始反对上述正统学说。他断言货币价值理论还不成熟,货币数量和汇率之间的关系仍然不得而知。⁶⁶五年后,货币价值理论在他的头脑中得到了充分发展。他论证了以下观点:收支平衡理论家们把真正的因果链弄反了。进出口的成交量,以及外国债务和债权的数量,并不是独立于汇率的,相反,它们完全依赖于汇率。

收支平衡理论忘记了,对外贸易的体量完全依赖于价格;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如果没有价格差异使得贸易有利可图,就不会发生。⁶⁷

246

他继续解释这一错误的根源:

毋庸置疑的是,如果单单注意交易方面每日或者每时的波动,我们就只能发现任一时刻的收支平衡状态的确决定了外贸市场的供给和需求。但这仅仅是探讨汇率决定因素的一个开头而已。接下来的问题是: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任一时刻的收支平衡状态?对此,唯一可能的答案就是:价格水平和决定收支平衡的价格差所引起的购买与销售活动。汇率上升之时,只要能够发现买者,哪怕价格高昂,国外商品也会被进口。⁶⁸

米塞斯指出,正是李嘉图首先提出了关于汇率决定的正确观点。两种货币之间的比率只取决于每种货币的相对购买力。在一个自由市场里,汇率问题无关紧要,因为货币只是用来购买非货币的商品而已。

不同种类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对应于每种货币与其他经济财货之间的交换比率。如果1千克黄金可以交换 m 千克的某类商品,而1千克白银可以交换 $m/15 \frac{1}{2}$ 千克同类商品,那么金银之间的交换比率就是 $15 \frac{1}{2}$ 。我们把这一比率称为静态的或自然的比率,如果存在一些干扰因素改变了两种货币之间的这一比率,那么,自发的力量将会发生作用,趋于重建此一比率。⁶⁹

这一分析的政治意义与收支平衡学说建议的完全相反。事实上,并无必要动用政府干预手段阻止汇率的下跌,因为或早或迟下跌的汇率将会平衡两种货币的购买力,从而阻止进一步的下跌。 247

正如米塞斯后来承认的那样,这种思想实际上已包含在古典货币数量论、格雷欣法则和英国通货学派的学说中了。他的分析建立在现代主观价值理论基础,并对旧的观点予以提炼,以一种更加缜密的方式重述出来,但其实践方面的结论没有改变。米塞斯回顾道:

为了向经济提供“必要的”货币数量,政府施加干预以求管制国际货币流动,然而此举实属多余。无论何种情况,不合心意的货币流出必定是政府干预的结果,正是这些干预赋予了不同价值的货币以相同的法定购买力。为了避免摧毁货币秩序,政府必须做的一切,以及所能做的一切,就是避免任何这类干预行为。这就是古典经济学及其直接继承者——通货学派的理论家的货币理论的要点所在。⁷⁰我们可以根据现代主观价值理论精炼和发展这一学说,但是进行全面革新,改弦易辙,却是不可能的。⁷¹

米塞斯的阐述最终将对中央银行的政策产生影响,但一开始并没有引起注意,而且它的应用也受到阻挠。最为不堪的谩骂来自某位库尔特·辛格,此人是克纳普的追随者,他攻击米塞斯缺乏逻辑。⁷²数年后,米塞斯在给埃米尔·莱德雷尔的一封信中评论了此人: 248

今天,对我本人来说非常遗憾的是,历史已经证明我比那些通胀支持者更为正确。如果克纳普和他的弟子是对的,我的收入就会比现在高得多了。⁷³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米塞斯感到有必要回到汇率决定问题上来,因为收支平衡

理论的持续盛行已经把奥地利推向了恶性通货膨胀的边缘。在 1919 年那些狂热的日子里,他写了一篇论文,讨论“收支平衡与汇率”(Zahlungsbilanz und Wechselkurse),事实证明此文非常及时,正好赶在局势不可收拾之前影响了奥地利的货币政策,使奥地利摆脱了恶性通货膨胀的危险。

249 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间,瑞典经济学家古斯塔夫·卡塞尔在德国经济科学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米塞斯的著作出版若干年后,卡塞尔提出了这个理论的一个变种,而没有提及同时代奥地利先驱的著作。⁷⁴卡塞尔的阐述更加成功,这可能是因为他创造了流行的新词“购买力平价”用以描述均衡汇率,也可能是因为他没有米塞斯那么尖酸刻薄;米塞斯曾把收支平衡学说的支持者公开指责为业余爱好者,称他们的分析肤浅可笑——尽管事实的确如此。于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人们这样对待李嘉图的这个理论:“如果赞成,就称为卡塞尔的理论;如果反对,就称为米塞斯的理论。”⁷⁵

部分准备金银行和商业周期

米塞斯在健全货币和货币替代物之间所作的细致区分,自然引出货币替代物的作用这个问题。他在著作的第二部分指出,只要货币替代物真正代表存入银行的相应数量的货币(按照米塞斯的术语,只要它们都是货币凭证),就不会影响货币购买力和货币价值,也不会影响分配和资源配置。只有在没有 100% 货币准备支持的情况下,它们才会对价格、分配以及资源配置产生影响。这些无准备或仅有部分准备的货币替代物(流通媒介)的发行,增加了广义货币数量,提高了商品的货币价格,并重新对资源作了分配。这种分配有利于最初收到货币替代物的人,但却是以最后收到的人的损失为代价。因此有必要将其分离出来,单独进行分析,探讨流通媒介而非真实货币的扩张带来的特殊后果。《货币与信用原理》的最后部分,也即第三部分,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

首先,米塞斯分析了为什么流通媒介会对货币价格产生影响。尽管它们只是法律文书,但人们对待这些法律文书的方式——买入和卖出——就像它们都是真实货币一样,不管背后有无真实货币作为支撑。因此,流通媒介数量的增加导致价格水平上升,而且,价格上升的方式和原因与真实货币增加产生的效应是一样的。

250 其次,在部分准备金银行业体系中,存在一种稳步增加流通媒介发行量的趋势。没有银行可以承担纸钞发行急剧扩张的后果,因为它将立即面对众多兑现要求。但是,如果流通媒介的增加幅度很小,小到允许其他银行跟进,银行就能稳步

增加这一发行量。

这一分析引向了米塞斯在这本书中的核心贡献之一：一个全新的商业周期理论。此处，米塞斯综合了庞巴维克资本理论和通货学派商业周期理论。⁷⁶

米塞斯认为，无准备货币替代物的发行会把利率降低至均衡水平以下，这样就会刺激企业家们启动消耗过多资源的投资项目。生产过程需要耗费时日，因此整个生产过程期间，从事生产的人们需要得到供应。为了成功完成一个新项目，必须充分提供消费者认为比这一项目将会生产的产品更加重要的各类财货。因此，实现额外的生产计划，需要在企业家的支配下投入额外的消费品。这些额外的消费品只能来自净储蓄。因此，没有充足的储蓄，也就不可能有生产结构的扩展。从中我们可以得出，如果新项目的启动不是因为净储蓄，而只是因为部分准备金银行将利率降到了均衡水平以下，那么最终的生产结构将是不可持续的。对于所有这类生产过程来说，其完工在物质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足够的储蓄支撑更长的生产结构。

这种不可持续的情况不是那么一目了然，因为新增投资是在“较高”的生产阶段，在时间上距离最终的消费品较远。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整个经济体系变得非常糟糕，难以为继的情况日益明显。一般所谓的“经济危机”，正是这种状况的清算之日。企业家于是发现，由于缺乏原始资本（originary capital），不是所有项目都能如期完成。有些项目只能简化实施，其他的不得不彻底停工。因此这时看来，投资在这些项目上的物质资源和人类劳动都被浪费了。社会变得穷困不堪，工人失业，工厂倒闭，如此等等。

251

为什么是流通媒介首先导致了错误投资的情况？米塞斯认为，当它们通过信用市场进入流通领域，就会发生这种情况。此时，新增的信用供给降低了利率，使其低于均衡水平或“自然”水平。企业家们可以在更优惠的条件下取得更多贷款，并将这些额外资金投入新项目的生产阶段，此时这些生产距离最终消费品还很遥远。这些新的生产活动，以及随处可见的新的机会，蛊惑人们相信经济远比以前增长得快，这就是所谓的“繁荣”。但是市场的参与者迟早会意识到这样的事实——这种繁荣是不可持续的，达到顶点后，经济开始“破裂”，经济危机爆发。

米塞斯在提出这项理论时，可以参考前人的两项重要发现。首先是英国通货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根据这个学派的思想，部分准备金银行体系引起流通媒介的持续增长，直到银行（尤其是中央银行）无法满足兑换需求为止。接着，由于流通媒介突然失去所有价值，导致货币流通崩溃，而这又继续加深了危机。⁷⁷其次是克努特·维克塞尔的思想，他发现货币扩张可能是利息的货币比率与均衡比率之

252

间的差异引起的。然而,这些前辈没有论及米塞斯商业周期理论的主要论题,也就是整体经济错误(economy-wide error)的原因和扩散,以及错误扩散过程由于涉及资源的跨期配置不当因而必然走向终点的观念。⁷⁸

253 维克塞尔在他的名著《利息与价格》(*Geldzins und Güterpreise*)中详细阐述了大卫·李嘉图的观察结果,即通胀货币政策只会暂时降低利率,因为商品价格迟早会跟上来。因此,任何希望永久降低利率的尝试都要不断增加货币供给。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永久通胀的政策是否可以持续。维克塞尔首先指出,“降低利率”这个概念并非关注利率的绝对水平,而是关注货币利息的市场利率和所谓自然利率之间的相对水平,⁷⁹他以这个论点回答了上述问题。然后他又声称,货币利率不可能无限背离自然利率,因为新货币的持续流入迟早会引起商品价格的超比例上涨,这会促使银行调整货币利率以图接近自然利率。⁸⁰但是,正如米塞斯指出的,维克塞尔未能表明何种机制能够迫使银行进行这一调整,因而他的主张只是空谈而已。⁸¹严格说来,维克塞尔根本没有提供商业周期的解释,而且尽管他深刻地地区分了自然利率和货币利率,却未看到二者之间的背离将会导致资源的跨期错误配置。⁸²

254 此后,米塞斯还将继续发展和精炼他在任教资格论文中提出的商业周期理论。⁸³在1912年,他认为自己只是发现了关于商业周期的众多令人信服的补充解释之一。因此,他在这一部分结尾§5的开头这么定位自己的发现:“提出一个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并非本书的任务。我们仅在货币和流通媒介的机制可能引发经济危机现象之时,才会考虑它们。”⁸⁴他以多少有些冗长的方式继续断言,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也会引发商业周期,尤其是商业周期可能也存在于物物交换经济中。他对自己发现的意义所作的这些限制,大概是为了防止前辈的批评,毕竟此书是他寻求获得任教资格的基础。情况可能就是如此,米塞斯最终坚定了自己的信心,开始采纳关于商业周期研究的更为明确的观点。从《货币与信用原理》的第二版开始,§5的这些谦词就被删除了,现在的第一句是这样的:“我们的银行理论……最终引出了一个关于商业周期的理论。”



克努特·维克塞尔

注 释

1. 这一研究的里程碑是他的论文“社会学与历史学”(1929)和几本著作:*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 (first German edition, 1933;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George Reisman [Princeton, N. J.: Van Nostrand, 1960; 3rd ed.,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03]); *Nationalökonomie* (Geneva: Editions Union, 1940); *Human Actio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9; 3rd ed.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98]); *Theory and Histor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reprinted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85); and *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New Rochelle, N. Y.: Arlington House, 1962)。

2. 参见 Carl Menger, *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Vienna: Braumüller, 1871); idem,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Methode der Socialwissenschaften und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insbesondere*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883)。

3. Mises, *Notes and Recollections* (Spring Mills, Penn.: Libertarian Press, 1978), pp. 55f.

4. Mises, *Erinnerungen* (Stuttgart: Gustav Fischer Verlag, 1978), p. 74; *Notes and Recollections*, p. 112. 另见 Murray N. Rothbard, *Ludwig von Mises: Scholar, Creator, Hero*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88), and James Rolph Edwards, *The Economist of the Century: Ludwig von Mises in the History of Monetary Thought* (New York: Carlton Press, 1985)。

5. 尽管门格尔对货币演化过程给出了谨慎的分析(按照他的观点,这个过程是社会秩序演进的最好例证),但他不是第一位指出货币并非来自社会契约的经济学家。在门格尔的前辈中,有约翰·劳(John Law, 1705)、费迪南多·加利亚尼(Ferdinando Galliani, 1751)、艾蒂安·德·孔狄亚克(1776)、亚当·斯密(1776)、安东尼奥·杰诺韦西(Antonio Genovesi, 1788)、让-巴蒂斯特·萨伊(1802)和理查德·惠特利(Richard Whately, 1832)。关于这一进路在19世纪的出现,参见 Arthur E. Monroe, *Monetary Theory before Adam Smith*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23] 1966)。

6. Mises,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p. 65; 另见米塞斯引述的庞巴维克, *Rechte und Verhältnisse vom güterwirtschaftlichen Standpunkte*, pp. 120ff。

7. 遗憾的是,此书的英文版标题“货币与信用原理(*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未能体现他的这一重要区分。“流通媒介”这个术语字面上可以译为“流通手段”,相当于英文语境中的“信用媒介”(fiduciary media)。因此,此书的标题应为“货币与流通媒介(信用媒介)理论”,但出版商认为这一标新立异的术语容易引起读者反感,于是改为现在这个相对简单然而不太准确的书名“货币与信用原理”。他们没有注意到以下实情:即便在德语原版中,这一表述也是非常罕见的。米塞斯对语言的创新颇有敌意,除非这一创新有助于分析迄今为止遭到忽略的那些现象。货币凭证和流通媒介的差异就是这样一个遭到忽略的现象,以至于现有的科学术语甚至缺乏表达这一差异的手段。出于这一目的,米塞斯引入了流通媒介这一术语,甚至不惜把它用在标题上,以示重要。

8. 参见 Franz Cuhel, *Zur Lehre von den Bedürfnissen. Theoretische Untersuchungen über das*

Grenzgebiet von Ökonomik und Psychologie (Innsbruck: Wagner, 1907)。

9. Ibid., pp. 190f. 庞巴维克在一篇关于价值理论的长文中已经提出这种观点,那是他第一次阐述价值理论。参见 Böhm-Bawerk, “Grundzüge der Theorie des wirtschaftlichen Güterwertes,”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n. s. 13 (1886): 48。正是这一段遭到了丘赫尔和米塞斯的抨击。多年后,米塞斯说,此文论点截然不同于庞巴维克《资本正面论》(New York: G. E. Stechert, 1930)的相应段落,“与庞巴维克理论的整体思路并不一致”(米塞斯致 A. E. 弗尔斯特[A. E. Foerster],信件标注日期为1965年3月2日;Grove City Archive: Böhm-Bawerk file)。这封信引起了一个问题,因为米塞斯此处指出庞巴维克最终认识到了他的错误,并在新版的《资本与利息》(South Holland, Ill.: Libertarian Press, 1959, vol. 2, bk. 3, part A, chap. 3, p. 148)中给出了正确的表述。但是,在《货币与流通媒介理论》第二版(Munich and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24, p. 13)中,米塞斯又说,庞巴维克没有就这一主题添加任何新的内容。

10. 参见 Cuhel, *Zur Lehre von den Bedürfnissen*, pp. 178f。

11. Ibid., p. 210. 丘赫尔用“Egenzen”这一不同寻常的名字称呼主观效用。与此类似,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则称主观效用为“ophélimité”。

12. Mises, *Notes and Recollections*, p. 58.

13. 参见 Henri Cernuschi, *Nomisma; or, “Legal Tender”* (New York: Appleton & Co., 1877); Josef von Neupauer, *Die Schäden und Gefahren der Valutaregulierung für die Volkswirtschaft und die Kriegsbereitschaft* (Vienna: Lesk & Schwidernoch, 1892); Wilhelm Lexis, “Papiergeld,”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Jena: Gustav Fischer, 1893; 2nd ed., 1901, 3rd ed., 1910)。米塞斯曾提到过诺伊保尔的书,参见 Mises, “Die wirtschaftspolitischen Motive der österreichischen Valutaregulierung,” *Zeit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Sozialpolitik und Verwaltung* 16 (1907): 578。

14. 参见 Georg F. Knapp, *Staatliche Theorie des Geldes*, 2nd ed. (Munich &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18), p. 1。

15. Ibid., p. 31. 克纳普认为,他必须创造一个全新的语汇,以便充分讨论货币理论问题,于是就在其他众多创新之中,出现了“特许”这个表述。

16. 尤其是安德烈亚斯·福格特,他是反施莫勒经济学家小组的领袖之一。这个小组规模很小,但是发展很快,他对克纳普作了一个不利的评论。参见 Andres Voigt, “Die staatliche Theorie des Geldes,”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62 (1906): 317–40。

17. 参见 L. Calligaris, “Staatliche Theorie des Geldes,” *Münchener Allgemeine Zeitung* (February 1, 1906); idem, “Staatliche Theorie des Geldes,” *Österreichische Rundschau* 7, no. 80 (May 10, 1906); F. Bendixen, *Das Wesen des Geldes*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08), p. 3; idem, “Fünf Jahre Geldtheorie,” *Bank-Archiv* 10, no. 10 (1911): 145ff.; W. Lexis, “Eine neue Geldtheorie,”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Sozialpolitik* 5 (1906): 557–74; idem, “Die Knappsche Geldtheorie,”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3rd series, 32 (1906): 534–45。

18. Ludwig von Mises, *Staat, Nation und Wirtschaft* (Vienna: Manz, 1919), p. 5, n. 3. 米

塞斯提到安德森的结论——克纳普的书“对德国人关于货币的思考有着广泛影响。它是把国家置于一切事务核心这一德国思想倾向的典型代表”。Benjamin M. Anderson, *The Value of Money* (New York: Macmillan, 1917), p. 433. 他也引用了卡尔·门格尔对《货币的国家理论》获得成功的愤怒评论：“这是普鲁士警察科学发展的逻辑结果。这个国家的精英在经济学发展了两百年后仍把这类甚至不是什么新鲜货色的胡言乱语奉为主臬,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样一个国家?” Mises, *Erinnerungen*, p. 20; *Notes and Recollections*, p. 35.

19. Mises,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p. 93.

20. 这种评估社会问题的独特视角, 也反映在经济学科的标准德文名字里: “Nationalökonomie” (国民经济学), 以及 “Volkswirtschaftslehre” (国家经济理论)。

21. John Stuart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Fairfield, Conn.: Augustus M. Kelley, [1848] 1976), bk. 3, chap. 7, § 3, p. 488.

22. 参见 Knut Wicksell, *Geldzins und Güterpreise* (Jena: Gustav Fischer Verlag, 1898)。

23. 参见 Karl Helfferich, *Das Geld*, 5th ed. (Leipzig: Hirschfeld, [1903] 1921), pp. 544ff. 值得注意的是, 黑尔弗里希在他的表述中没有区分物理的和价值的术语。

24. 参见 Friedrich von Wieser, “Der Geldwert und seine geschichtlichen Veränderungen,” *Zeit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Socialpolitik und Verwaltung* 13 (1904); reprinted in Wieser, *Gesammelte Abhandlungen* (Tübingen: Mohr, 1929), pp. 164–92。

25. 米塞斯后来解释说, 通货学派的原则对讲坛社会主义者的大脑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因为它似乎没有给政府干预留下空间。德国的教授

倾向银行学派。历史学派的胜利, 实际效果是将通货学派驱逐出去了。卡尔·马克思、阿道夫·瓦格纳、黑尔弗里希、希法亭、哈芬施泰因 (Havenstein) 以及本迪克森 (Bendixen) 都坚持银行学派的学说。(Ludwig von Mises, *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 [New York: Arlington House, 1977], p. 94)

甚至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德国货币经济学家的主流观点仍然认为银行学派在所有实质问题上都已击败了通货学派。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这位货币面纱理论的主要支持者, 也认为银行学派稍作修正之后在货币面纱理论的大获成功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参见 W. Mildschuh, “Geschichtliche Entwicklung der Geldtheorie,”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4 (1927): 720; J. S.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book 3, chap. 24. 英格兰银行条例 (1844) 已将通货学派的原则变成了法律, 但却未能阻止 1846 年危机的爆发, 穆勒的观点可能深受此次危机的影响。

26. 在 *Geldzins und Güterpreise* (pp. 34ff. 以及其他各处) 中, 克努特·维克塞尔已经严厉地批评了银行学派的主要原则。他的著作在那个时代被严重忽略了, 就像米塞斯的《货币与信用原理》一样。这两本书直到一战之后才获新生。

27. 参见 Wieser, “Der Geldwert und seine geschichtlichen Veränderungen,” pp. 180f. 这也是克努特·维克塞尔的观点; 尤其可以参见 *Geldzins und Güterpreise*, chap. 3, 在此他详细解释了相对价格和货币价格的区别。维克塞尔的书刚出版时对当时的德国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不过他的货币观点似乎影响了他的同胞古斯塔夫·卡塞尔, 通过卡塞尔, 这些观点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引起了广泛的学术关注, 此时卡塞尔的教科书已经成为德国大学理论

经济学方面的主要参考著作了。参看 Gustav Cassel, *Theoretische Sozialökonomik*, 4th ed. (Leipzig: Deichert, 1927), 特别是第三卷。

28. 出于类似原因, 维克塞尔相信, 一个不用现金的支付体系或者纯粹的信用经济是可能的。参见他的 *Geldzins und Güterpreise*, pp. 58, 64ff。

29. 参见 Wieser, “Der Geldwert und seine geschichtlichen Veränderungen,” pp. 169, 175, 179。

30. 参见 *ibid.*, pp. 175, 184。

31. 参见 *ibid.*, pp. 176f。

32. 参见 Reinhard Kamitz, “Die österreichische Geld- und Währungspolitik von 1848 bis 1948,” Hans Mayer, ed., *Hundert Jahre österreichischer Wirtschaftsentwicklung, 1848 – 1948* (Vienna: Springer, 1949), pp. 145f。

33. 参见 Wieser, “Der Geldwert und seine geschichtlichen Veränderungen,” pp. 184ff。

34. 他承认, 商品货币的产量增加是货币购买力长期呈下降趋势的另外一个原因(参见 *ibid.*, p. 192)。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政府支出, 它以税收的形式“前移”, 这样就“提高”了价格, 也意味着更低的货币购买力(参见 *ibid.*, p. 186)。

35. Friedrich von Wieser, “Der Geldwert und seine Veränderungen,” *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Socialpolitik* 132 (Munich and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09); reprinted in Wieser, *Gesammelte Abhandlungen*, Hayek, ed., pp. 193 – 242。

36. *ibid.*, pp. 204f., 208, 211。维塞尔强调, 货币的价值只有在消费品的货币交换中才能确定。这就排除了诸如不在市场交换中使用的闲置现金或生产产品的货币交换。生产产品的价值实际上只来自消费品的价值(参见 *ibid.*, pp. 214, 219)。

37. 参见 *ibid.*, pp. 165, 173。维塞尔此处认为, 货币只有在作为货币资本进行买卖的情况下才是交换的对象。

38. Wieser, “Der Geldwert und seine Veränderungen,” p. 220。约瑟夫·熊彼特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参见他的 *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11), p. 196。

39. 在米塞斯著作的英文版中, *Anweisungstheorie* 译作“债权理论”(claim theory)(参见 Mises,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appendix)。然而, 这一翻译多少有些不合适。“债权”这个术语提供了一种隐含的对于指派理论关于货币本质看法的法律解释。但是, 比起从法律角度把货币解释为债权, 指派理论的缺点似乎要小一点。显然, 市场交换与权利兑现在范畴上是不同的。但是指派理论家们从不赞成这类明确的(而且显然错误的)货币解释。他们的学说恰恰因为模棱两可, 反而保留下来。

40. John Law, *Money and Trade Considered with a Proposal for Supplying the Nation with Money* (Edinburgh: Anderson, 1705), chap. 2。虽然米塞斯拒绝这一观点, 却把劳在货币的货币性需求和非货币性需求之间的区分作为一个基本要点接受下来:

这样设想是合理的: 如果白银作为金属使用并且它的价值来自这一用途, 那么白银也是物物交换的对象, 可以根据它在物物交换中的价值充当货币。货币白银的额外用途将会增加它的价值, 因为作为货币, 它弥补了物物交换的不足和不便之处。因此, 随着需求增加, 白银得到一个额外价值, 其值相对于于货币用途引起的更大需求。(*ibid.*,

chap. 1)

41. 特别参见 Henry D. Macleod, *Theory and Practice of Banking*, 2 vols. (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55), vol. 1. 在第一章, 作者把货币描述为“可转移的债务凭证”。尽管米塞斯拒绝这种观点, 但他仍从麦克劳德 (Macleod) 那里得到了重要的教训, 即银行存款本质上是和银行支票一样的货币替代物。不过麦克劳德接着认为, 无需制定特别措施限制新钞票发行; 而米塞斯则得出结论, 认为存款创造必须受到限制, 正如货币发行通过皮尔银行条例 (Peel's Bank Charter Act) 受到限制一样。

42. Adolf Wagner, *Die russische Papierwahrung* (Riga: Kymmell, 1868), p. 44.

43. 米塞斯讨论了瓦格纳的影响, 见 *Money, Method, and the Market Process: Essays by Ludwig von Mises*, Richard Ebeling, ed. (Boston: Kluwer, 1990), chap. 7。

44. Eugen von Bohm-Bawerk, *Innsbrucker Vorlesungen uber Nationalokonomie*, Shigeki Tomo, ed. (Marburg: Metropolis, 1998), p. 211. 来自他 19 世纪 80 年代在因斯布鲁克的讲座。我们只能假设他在维也纳的讲座也强调过同一观点。

45. 参见 Wieser, “Der Geldwert und seine Veranderungen,” p. 240.

46. 参见 *ibid.*, pp. 229f.

47. 参见 F. X. Weiss, “Die moderne Tendenz in der Lehre vom Geldwert,” *Zeitschrift fur Volkswirtschaft, Socialpolitik und Verwaltung* 19 (1909): 532ff.

48. 维克塞尔依据的是同样的假设。参见 Wicksell, *Geldzins und Guterpreise*, pp. 17ff.

49. 维克塞尔的货币思想再次受到同样一个缺陷之害。参见 *ibid.* pp. 20f., 64f.

50. 此处米塞斯引用了 Friedrich von Wieser, *Der naturliche Wert* (Vienna: Holder-Pichler-Tempsky, 1889) p. 46.

51. 参见 Mises,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p. 119.

52. 参见 Mises, *Nationalokonomie* (Geneva: Editions Union, 1940), pp. 361f.; *Human Action*, Scholar's edition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98) p. 408.

53. 与此类似, 他在自己第一篇讨论货币问题的出版物的一开始就宣称, 流通媒介应该根据货币需求加以“调整”。根据同一思路, 他讨论了引起流通媒介匮乏的条件。如果支付手段的数量滞后于经济发展, 就会发生这种状况。这将“必然导致信用受限, 从而引起经济危机的征兆”。参见 Mises, “Die wirtschaftspolitischen Motive der osterreichischen Valutaregulierung,” pp. 562, 572。

54. 后来米塞斯在讨论一个稍有不同的问题时承认, 他写《货币与信用原理》时“仍然深受穆勒的影响” (*Notes and Recollections*, p. 60)。这使他未能断然反对庞巴维克关于货币引致“摩擦”的思想, 但是穆勒的影响似乎远不止于此。

55. 参见 Nikolay Gertchev, “Dehomogenizing Mises's Monetary Theory,” *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 18, no. 3 (2004): 57–90。

56. 参见 Don Patinkin, *Money, Interest, and Prices: An Integration of Monetary and Value Theory* (Evanston, Ill.: Row, Peterson, and Co., 1956)。

57. 参见 Mises, *Erinnerungen*, p. 37. 庞巴维克在他的课程里强调了康蒂永效应, 但是仍相信它们的“主要”后果是导致一个更高的价格水平。除此之外, 它们只是影响了债权人和债

务人之间的关系。Böhm-Bawerk, *Innsbrucker Vorlesungen über Nationalökonomie*, pp. 220f.

58. Mises,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pp. 239–40.

59. 他的老师格林贝格曾经分析过拿破仑战争时期通胀的再分配效应, 参见 Grünberg, *Studien zur österreichischen Agrargeschichte*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01), pp. 121ff. 米塞斯在他的《货币与流通媒介理论》德文第一版(1912)第222页之后讨论了这些例子。但在后来的版本中他去掉了这些段落, 因为他相信, 由于近期德国和奥地利经历了通货膨胀, 已经没有必要通过历史案例描述通胀的危害了。

60. 他引证了大卫·休谟和大卫·李嘉图。在同时代人中, 他只参考了 Rudolf Auspitz and Richard Lieben,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Theorie des Preises*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889), p. 65. 米塞斯在《货币与信用原理》第240页之后引用过此书。米塞斯未曾提及的其他先驱, 包括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bk. 3, chap. 8, § 2, p. 491; Hermann Heinrich Gossen, *Entwicklung der Gesetze des menschlichen Verkehrs und der daraus fließenden Regeln für menschliches Handeln* (Braunschweig: Vieweg & Sohn, 1854), pp. 205f.; and John E. Cairnes, “Essay Towards A Solution of the Gold Question; The Course of the Depreciation,” *Essays in Political Economy: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London: Macmillan, [1858] 1873), pp. 53ff.

61. 这是马克·布劳格的表述。参见 Mark Blaug,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4th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21ff.

62. 参见 Richard Cantillon, *Essay on the Nature of Commerce in General* (reprint, New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2001)。同样, 米塞斯也复兴了局部价格差异的分析, 自康蒂永以来, 这一分析也湮没无闻了。参见 Eduard Heimann, *History of Economic Doctrines: An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45), p. 43。

63. 特别参见 Irving Fisher,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Money: Its Determination and Relation to Credit, Interest, and Crises*, 2nd ed.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13] 1985)。

64. 相反, 米塞斯的分析可能影响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后者认识到了康蒂永效应的极端重要性, 他支持货币稳定作为一项社会保守策略。特别参见 John Maynard Keynes, *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 (London: Macmillan, 1923); 另见 idem, *Indian Currency and Finance* (London: Macmillan, 1913);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London: Macmillan, 1920)。凯恩斯在《经济学刊》(1914年9月号:417—419)上评论米塞斯著作时颇有轻视之意, 言辞颇为含糊, 模棱两可。后来他承认:“阅读德语时, 我仅能清楚理解我已经知道的事情。”*Treatise on Mone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0), vol. 1, p. 199, footnote.

65. 参见 Otto Heyn, *Irrtümer auf dem Gebiete des Geldwesens* (Berlin, 1900), pp. 30f.; idem, *Die indische Währungsreform* (Berlin, 1903), p. 82; W. Lexis, “Papiergeld,”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3rd ed. (Jena: Gustav Fischer, 1909–1911), vol. 6, p. 989; Georg D. Knapp, *Staatliche Theorie des Geldes* (Leipzig, 1905), p. 208。

66. 参见 Ludwig von Mises, “Die wirtschaftspolitischen Motive der österreichischen Valutarregulierung,” *Zeit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Sozialpolitik und Verwaltung* 16 (1907), p. 565。

67. Mises,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p. 284.

68. Ibid.

69. Ibid., p. 207.

70. 这里,米塞斯指的是他在《货币与流通媒介理论》德文第一版中对这些前辈的讨论。*Theorie des Geldes und der Umlaufsmittel*, 1st ed. (Leipzig and Munich: Duncker & Humblot, 1912), pp. 203ff.

71. Ludwig von Mises, “Die geldtheoretische Seite des Stabilisierungsproblems,” *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164, no. 2 (Munich: Duncker & Humblot, 1923): 21f.

72. 参见库尔特·辛格的书评,载于 *Deutsche Wirtschaftszeitung* (June 1, 1913)。

73. 米塞斯致莱德雷尔,信件标注日期为1920年1月29日;Mises Archive 73: 41f。

74. 参见 Gustav Cassel,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Foreign Exchanges,” *Economic Journal* 26 (1916): 62 – 65; idem, “Abnormal Deviations in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Economic Journal* 28 (1918): 413 – 15; idem, *Theoretische Sozialökonomie*, 4th ed. (Leipzig: Deichert, 1927), §§ 60 and 89。

75. Mises, *Notes and Recollections*, p. 60.

76. 几乎与此同时,庞巴维克研讨班的另外两位学员在研究银行学派理论时也提出了原创的商业周期理论。参见 Rudolf Hilferding, *Das Finanzkapital* (Berlin: Dietz, 1947 [1910]), part 4, chaps. 17 to 19; Joseph A. Schumpeter, *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Munich: Duncker & Humblot, 1911)。

77. 19世纪中期一群法国经济学家提出过同样的思想。维克托·博内(Victor Bonnet)认为,固定资本的过度投资(过度是指相对流动资本的投资而言不成比例)应对经济危机负责;查理·科克兰(Charles Coquelin)预见到了克努特·维克塞尔的工作,他提出一个假说,认为商业周期是由信用扩张造成的。参见 Charles Coquelin, *Du credit et des banques* (Paris: Guillaumin, 1848); Victor Bonnet, *Etudes sur la monnaie* (Paris: Guillaumin, 1870)。关于19世纪商业周期理论的一个优秀综述,可见 Eugen von Bergmann, *Geschichte der nationalökonomischen Krisentheorien* (Stuttgart: Kohlhammer, 1895)。

78. 1903年,维尔纳·桑巴特在社会政策协会的汉堡会议上提出了商业周期的“比例失调理论”(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Socialpolitik 113;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03)。桑巴特认为,黄金产量增加激起了资源的重新配置,但是,一旦黄金生产停止,这将是不可持续的。继之而起的危机(其中一起曾在1900年到1902年间袭击了德国)也因此成了一场结构性危机,它反映了资本品使用不当造成的恶果。桑巴特的理论没有考虑到跨期错误配置的问题。

79. 按照一种维克塞尔式的风格,维克塞尔把自然利率定义为仅在真实要素(非货币的)影响下形成的利率;参见 Wicksell, *Geldzins und Güterpreise*, pp. iii, 93ff。他还把它定义为使得价格水平保持不变的利率(ibid., p. 92)。上述两种区分都导致了后来理论家们的巨大混淆,但是米塞斯的商业周期理论似乎表明进行类似区分是有益的。在《人的行为》中,他最终指出这一区分乃是均衡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区别。两种利率都是货币利率,因此能够重合。

80. 参见 ibid., pp. v – vi。维克塞尔注意到,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在与蒲鲁东的争论中得出过类似结论。不过,巴斯夏没有坚持伴随而来的价格上涨一定是超比例的。参见

Frédéric Bastiat, *Œuvres complètes*, 6th letter to Proudhon。

81. 参见 Mises, *Theorie des Geldes und der Umlaufsmittel*, 2nd ed., pp. 364ff。

82. 维克塞尔指出,较低的货币利率(相对低于自然利率)将会刺激生意人启动更多投资项目,甚至提出,较低的货币利率扰乱了全局均衡。在这方面,维克塞尔与米塞斯的发现非常接近(参见 *Geldzins und Güterpreise*, pp. 87f., 97)。但是他没有看到以下推论:此时,生产结构建立在了一条当前物质条件无法完成的道路上。

83. 仅就米塞斯的商业周期理论而言(part 3, chap. 5, in part § 4),第一版和以后各版没有区别。除了少数例外,文字完全没有改动(1st ed., pp. 425 - 36; 2nd ed., pp. 366 - 75)。整个第五章都是如此,除了第五小节。这样,从第一版开始,米塞斯的商业周期理论就包含着对强迫储蓄、价格逆动、自然利率以及由于流通媒介所致的对自然利率的偏离、生存资金的重要性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的相同讨论,以后各版均是如此。第一版和第二版之间的差别就在第五章的结论那一节,即第五小节,在此米塞斯讨论了自己对商业周期理论贡献的意义。

84. 参见 Mises, *Theorie des Geldes und der Umlaufsmittel*, 1st ed., p. 433;(英文)译文出自本书作者。

第三部分

官员、绅士、学者



和许多人一样,米塞斯多年前就预见了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但与别人不同的是,他对此充满忧虑。他是奥匈帝国陆军中尉,热爱自己的祖国。但他不是沙文主义者,他鄙视那种最终将把整个欧洲大陆卷入一场巨大灾难的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各国的许多杰出男女——特别是奥地利的贝尔塔·冯·苏特纳(Bertha von Suttner)和英国的伯特兰·罗素,都有同样的看法,并致力于促成国家之间的和平交往,反对狂热的民族主义。然而,这些个人倡议并不足以压倒主战派。在爱国主义的伪装下,政府至上的执政理念已经使战争不可避免。

战后,米塞斯将会详细讨论这些问题。他解释了战争如何源于国家崇拜,例如此次大战就是源于民族国家崇拜。¹但在当时,作为一个不可知论的犹太人、文化上的德意志人、政治上的个人主义者、科学上的世界主义者以及奥地利爱国者的米塞斯认为,自己必须加入这场民族主义战争。奥匈帝国是抵御俄国铁蹄的唯一堡垒,那些俄国佬早就准备入侵这片土地,摧毁它的西方自由。也许这种政治态度是自相矛盾、不合时代精神的,但米塞斯相信,在这件事上自己别无选择。终其一生,他一直坚持这一立场,正如一位同时代的朋友和仰慕者所说:“你是一位个人主义的斗士,却又如此珍视集体主义的价值。而事实上,即使在你的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完全丧失个人安逸之时,你也从未失去纵观全局的眼光。”²

初入战场

一个星期六的清晨,米塞斯整治行装,来到维也纳拥挤的火车北站。他搭乘八点的快车前往故乡加里西亚的一个城市——普热梅希尔(Przemysl)。他将在这里与第30野战炮兵团部队会合。列车设有军官特别车厢,这让长途旅行舒适了许多。相伴而行的有两位骑兵军官,埃瓦尔德·普里布拉姆和奥唐奈伯爵(Count O'Donnell),还有一位维也纳大学编外讲师埃尔温·斯特兰斯基(Erwin Stransky)医生。这些年轻人中没有一人能够忘掉这次旅程。斯特兰斯基后来回忆说,米塞斯

谈到了自己的家乡加里西亚，聊起它的历史，教堂建筑的风貌，等等。时间过得很快，夜里大约七点钟的样子，米塞斯在普热梅希尔下了火车，并祝旅伴一路顺风。³那一天是1914年8月1日。

259 战斗没有马上开始。直到8月5日德俄战争爆发后，奥匈帝国才正式对俄宣战。甚至此后两周内也没有发生大的战事。交战双方都需要时间动员各自的军队。奥匈帝国和德国的军事动员本来应该更加便利，因为它们的国土面积较小，但俄国人显然早有准备——早在6月28日奥地利的斐迪南大公遇刺后不久，他们就开始了军事动员。

奥匈帝国和德国的联盟在军事上面临一个重大困难：他们在三条战线上都面对着兵力远胜己方的敌人——尤其是数量庞大的俄国军队。1914年，俄国的人口粗略算来有1.73亿，与之相比，德国只有6800万人口，奥匈帝国的居民也只有5000万。俄罗斯帝国的广袤领土使它无法在短时间内将可动员的250个师迅速集结起来。不过，俄军将领仍然设法在最初几个月内将80个师投入战场。这些军队只需对付德国的10个师和奥地利的38个师，因为德国把90%的军队部署在了西线，而奥匈帝国的49个师中有11个部署在了南线塞尔维亚。⁴

260 奥匈帝国北线军队的任务是阻止俄国人入侵几乎无险可守的日耳曼平原。虽然山区易于防守，但他们不能退入喀尔巴阡山，否则俄军只需派出一小部分军队牵制他们，其主力就可以长驱直入德国境内。因此，尽管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奥匈帝国军队却不能一味防守，他们还要发动进攻，力图在加里西亚平原阻击俄国人。奥匈帝国军队的策略是将俄国人拖入持久战，以一场又一场的战役消耗他们的力量。这一策略仰赖奥匈帝国在士气民心、军队训练、士兵教育程度以及战斗热情等方面所占的相对优势。战后，米塞斯提到奥地利无情的攻势时说：“奥地利军队的精英都被无谓地牺牲了。”⁵他认为这些进攻“毫无价值也漫无目的”，然而他们确实有一个目标：将俄国人尽可能久地阻止在加里西亚。在这点上，他们是成功的。阵亡的军人包括许多米塞斯的亲人、朋友、同事和学生。

这场战争导致的死亡人数和毁灭程度是空前的。现代科学和技术深刻地改变了战争的方方面面，从协作到装备，再到战术和战略，而且还让拥有强大火力、高度机动的炮兵部队成了战场上的主角。虽然奥匈帝国军队的装备优于敌军，但在人数上远逊于对方，几乎节节败退。⁶9月底，已有一万多名加里西亚难民涌入维也纳，⁷而奥匈帝国军队则远远退到了普热梅希尔后方，背靠着喀尔巴阡山。在战争的最初几周和几个月内，几乎每天都有奥匈帝国的炮兵连（一连约100人）甚至炮兵团（一团约500人）全军覆灭的消息传来。

炮兵是主要的打击力量,也是敌人攻击的首要目标。米塞斯的炮兵连不得不频繁转移阵地,常常还得冒着枪林弹雨进行。暴雨的来临不仅妨碍了他们的行动,也证明了奥匈帝国的军装制服没有防水能力。短时间内想从军队的官僚机构那里得到救济是毫无希望的。于是米塞斯只好动用私人力量,让母亲给他的士兵送衣服。⁸

米塞斯本人通过军队的邮政系统得到了母亲的特别关怀。阿德勒·冯·米塞斯给儿子寄了镶软毛的皮手套、电照灯、火柴、鞋带、羊毛衣衫、驼毛裤子、驼毛防护手套、阿司匹林、香烟、眼镜以及杂志刊物,还有路德维希最喜欢牌子的吊裤带、花露水、香皂、白兰地和鲑鱼罐头。她像会计一样,将寄去的每样东西都列在清单里,这样就能够按时寄送,并控制儿子的开支状况,她尤其对儿子的烟草消费盯得很紧。⁹她也告知米塞斯维也纳的各种事件,尽管因为审查,她不能说得太明白或谈论太多细节。米塞斯大概只能看到官方或半官方的报纸和刊物。1914年8月末,他得知自己最敬爱的老师欧根·冯·庞巴维克在去往瑞士的途中,于蒂罗尔去世。¹⁰

261

邮件寄到士兵手上要花好几周,尤其在军队频繁转移阵地之时。1914年9月,通信整整中断了三周,而且很不寻常的是,媒体上也没有关于米塞斯所在部队的任何报道。当他的名字终于出现在《新自由报》¹¹上,家人和朋友真是大大松了口气。马丁·尼伦施泰因(Martin Nirenstein)立即写信给他:“这次胜利仍将站在自由一方。”¹²

与此同时,米塞斯的弟弟里夏德正驻扎在维也纳附近的巴登。他正在做飞机发动机试验,手下指挥着一个包括数名士兵和一名中尉的研究小组。¹³自1909年成为普鲁士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应用数学教授后,他的兴趣一直集中在航空领域。里夏德本人也是一名飞行员,1913年他还还在大学里教授动力飞行课程。他和军队研究小组一起,制造出一架600马力引擎的飞机,并于1915年投入使用。根据这项军用研究,他出版了《飞行理论》(*Fluglehre*)一书。这本书奠定了里夏德作为世界著名的航空学领域先驱的地位。¹⁴但这位年轻教授急于进入前线,那里的战斗仍然十分激烈和密集。

262

在10月份的前半段,德国和奥匈帝国的联军一度曾将俄国驱逐,并将战线向前推进了近60英里。两周后,他们又在俄国的反攻下撤了回来。但对俄国人来说,时间非常紧迫。当时保持着相当大自由度的奥地利经济正为奥匈帝国军队提供越来越多的助力。战争物资的生产所带来的巨大利润最初尚未缴纳额外的重税,因此得以迅速投入扩大生产,以便转变生产结构,适应战争需要。¹⁵许多商人和

263

工厂主已经着手调整自己的计划和投资,应付新的形势;而且和往常一样,这些私人投资对前线局势的反应快速而又高效。例如1914年10月,一些奥地利商人开办了一家工厂,为缴获的大炮生产弹药。¹⁶但是,政府在战前对军工相关企业的长期管制确实造成了一些问题。米塞斯后来解释说:

奥地利工业不仅要提供远远超过和平时期所需的战争物资,还要填补和平时期遭到忽略的空白。奥匈帝国野战炮兵开战时用的枪炮实在太劣质;重型和轻型野战榴弹炮和山炮在它们被军方采用的时候就已经过时了,连最低的要求都满足不了。这些枪炮出产于国有工厂。私有企业在和平时期无法获得生产野战炮和山炮的合同,只能向中国和土耳其供应这些物资。现在,它们除了要为扩大炮兵部队生产军用物资,还要制造出更好的炮械,取代那些无用的旧炮。奥匈帝国的军服和军鞋的情形也差不多。¹⁷

264 私有企业的更高生产力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并帮助奥地利赢得了一场重大胜利。随着这场胜利,奥军于1914年12月6日结束了发生在波兰城市罗兹附近持续一个月的战役。数日后,奥匈帝国军队又赢了利马诺瓦-拉帕纳弗(Limanova-Lapanow)大捷,这个地方离卡尔·门格尔的出生地新松奇仅十五英里远。12月12日,俄国人败退了三十余英里,溃败途中三万士兵被俘。¹⁸这些事件是东线战场的决定性转折点。经过近四个月的激烈战斗,德国和奥匈帝国军队终于扳回了俄国人最初在数量上的优势,并在之后的几个月将他们逐出东境。里夏德写信给路德维希,以典型的米塞斯家族式的轻描淡写语气,说他很高兴“俄国人这下有的乐了”。¹⁹

显然,路德维希现在甚至有时间学习鲁塞尼亚语了,这可能是为了重建新的地方政府而做的准备工作。²⁰他也常给里夏德写信询问母亲的身体状况。母亲的脚部受伤,几个月来一直备受折磨。里夏德回信说目前各种疗法都不见效,他设法邀请与米塞斯家族有私交的举世闻名的医生阿德勒教授为她治疗,但没成功。²¹前线倒是传来了好消息:圣诞节前三天,里夏德和他的老朋友马丁以及胡戈·尼伦施泰因(Hugo Nirenstein)在维也纳报纸上看到路德维希被擢升为奥匈帝国陆军中尉。²²仅仅两个月后,路德维希又获得了一枚最高荣誉勋章(*allerhöchste Belobigung*)——皇帝表彰了他在战争中的功绩。²³

之后,战事短暂地平寂了一阵,公众把注意力转向战争给帝国社会结构造成的破坏。在维也纳,食品供应出现了严重短缺,商店门口排的队伍一天比一天长。路

德维希收到母亲绝望的来信,描述了她与家里的厨师特雷泽的斗争,因为这个厨师不懂战争时期该怎么节约。²⁴而前线则发生了通敌叛国的丑闻。1915年4月3日和4日,布拉格的第28步兵团未经抵抗就被俘虏了。²⁵

1915年5月初,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军队终于开始了进军东方的长途行军。意大利在5月23日加入战争,站在了协约国(英国、法国和俄国)一方。但此事无关大局,甚至没有拖慢同盟国在北线的强势推进。一个月内,他们重新攻占了普热梅希尔,并乘胜击退敌军,深入俄国境内。²⁶东线的力量平衡彻底反转,根本原因主要是经济上的。米塞斯后来解释道:

266

1915年春夏,同盟国军队在东线战场上取得的巨大技术优势,以及那场深入沃尔尼亚(Volhynia)境内塔尔努夫(Tarnów)和戈尔利采(Gorlice)的战役的胜利基础……来自工业的自由体制,同时也得益于德国和奥地利的劳工在输送各种军需物资方面取得的惊人成就……德国和奥匈帝国军队的高层很清楚他们为什么没有迫于压力将那些提供军事物资的私有企业国有化。他们对国有企业有着毋庸讳言的偏爱,国企与其观念更为契合,也更适应国家威权政治,但他们却撇开了国企而转向私企,因为他们知道,这个艰巨的生产任务只能倚靠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私有企业去完成。战争社会主义非常清楚为什么人们没有在战争的第一年就把军工企业托付给它。²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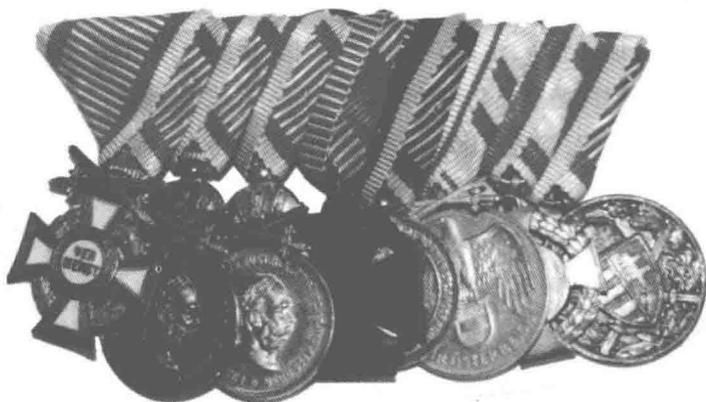
八月初,同盟国重新夺回伦贝格,米塞斯深感安慰,他终于获准两周的休假。8月16日,他离开前线到了克拉科夫,搭乘下一趟火车回到维也纳。他在前线待了一年多,从种种危险中幸存下来。虽然臀部受伤令他痛苦了好几个月,但他看起来仍旧健壮而有活力。他给自己用了大量的水杨酸(Salicyl),这是母亲寄给他的退烧和止疼药。²⁸当他开始要求更多的剂量时,母亲拒绝寄送,要求他回家卧床休养。²⁹家里已经有一人死去——他的表兄马克斯·兰道(Max Landau)医生,因为检查太多斑疹伤寒症尸体而受感染去世。³⁰

267

米塞斯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度过了军旅生涯最艰难最危险的阶段。休假结束后,他返回前线,待了近六周,之后从1916年12月到1917年12月,又是一年。不过,这些远征给他带来的混乱,都比不上他在北线战场上第一个月的经历。

1915年晚些时候,米塞斯免除现役,被遣往匈牙利的索普隆。他在此待了近两个月,臀伤的医治虽不见效,但能从战场上活着回来已属万幸。人们将前线返回的士兵视为英雄,米塞斯从最恶劣的情况中挺了过来,也总算可以享受他们的感谢

与敬佩了。³¹因为临敌的杰出表现,他再次获得奖章(银质军功奖章),新闻热烈地报道了皇帝对这位谦逊的“广受爱戴的预备役中尉”的赞扬。³²米塞斯得享盛名的原因在于他作为军官对战友表现出的关爱和照顾。³³



米塞斯的战争勋章(从左至右)

1. 十字军功勋章(*Militär-Verdienstkreuz*)。颁给那些在和平时期热诚坚定地提供卓越服务,在战争时期表现英勇和指挥优秀的军官。正面:德国十字,中间是“Verdienst”(功勋)字样。刀剑表示身临战场。

2. 银质军功勋章(*Signum Laudis in silver*)。表彰值得皇室嘉奖的始终如一的优异表现。正面:弗朗茨·约瑟夫的头像,刻有“奥地利皇帝、波西米亚国王、匈牙利使徒国王”铭文(拉丁文缩写)。刀剑表示身临战场。背面:桂冠里刻有“*signum laudis*”(拉丁文“奖章”)字样铭文。

3. 金质军功勋章(*Signum Laudis in gold*)。表彰战争或和平时期的卓越贡献。正面:弗朗茨·约瑟夫的头像,刻有“奥地利皇帝、波西米亚国王、匈牙利使徒国王”铭文(拉丁文缩写)。刀剑表示身临战场。背面:桂冠里刻有“*signum laudis*”(拉丁语“奖章”)字样铭文。

4. 卡尔军团十字勋章(*Karl-Truppenkreuz*)。颁给在战场上抵抗敌军超过一年,并至少参与过一次战斗的士兵。正面:“*grati—princeps et patria—Carolus imp et rex*”(感激,君主与祖国——查理,皇帝与国王)。背面:两个王冠与C(可能是指查理)以及“*vitam et sanguinem—MLCCCCXVI*”(生命与血——1916)。

5. 金质军功勋章(*Signum Laudis in gold*)。将领战役勋章。正面:弗朗茨·约瑟夫的头像,以及“奥地利皇帝、波西米亚国王、匈牙利使徒国王”铭文(拉丁文缩写)。刀剑表示身临战场。背面:月桂枝花冠,中央是“*signum laudis*”(拉丁文“奖章”)字样的铭文。

6. 战争纪念勋章(*Kriegserinnerungsmedaille*)。1932—1933年设立。颁给所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过的人。金质勋章,由奥地利共和国授予。正面:一只鹰立在印有奥地利共和国国徽的盾牌上,刻有“*für Österreich*”(为了奥地利)字样的铭文。刀剑表示身临战场。背面:“1914—1918”字样铭文,以月桂枝花冠环绕。

7. 钻石纪念十字勋章。纪念弗朗茨·约瑟夫60周年庆典:1848—1908。金质十字造型。正面:弗朗茨·约瑟夫的头像,位于十字中央。

8. 匈牙利第一次世界大战纪念勋章。1929年,摄政王、海军上将霍尔蒂(Horthy)设立。颁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过的人。正面:查理大帝(Charlemagne)的纹章盾饰。背面:钢盔与“*pro deo et patria—1914—1918*”(为了上帝与祖国——1914—1918)铭文。

家乡前线

如果能以一种荣誉的方式提前退役,米塞斯应该会欣然接受。1914年秋,他曾动用自己在商会的工作关系试图调到其他岗位。商会已经被迫提供了四十五位职员履行兵役,不过有些人仍然留在他们的战前岗位上,或调到军部工作,因为军部与商会的合作极为密切。³⁴米塞斯不属于少数那些无须亲临战场的幸运儿。他有很多天赋,唯独未能掌握官场的诀窍,不知道如何操纵军方行政部门,让自己成为官僚体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便回避危险的任务。马克斯·韦伯出色地描绘了形形色色的现代领导方式转向官僚体制的巨大变革,而米塞斯许多过去的同僚和学生可谓深谙其道,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熊彼特、莱德雷尔和卡尔·普里布拉姆。

北线的战事平息后,他们终于认为米塞斯可以回来担任行政事务了,事实证明商会的关系也起了一定作用。1915年12月22日,米塞斯在维也纳过圣诞节期间接到了军部把他调到位于维也纳的军部第13部门的命令。³⁵

回到维也纳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可以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然而,他的臀伤还是恢复得很慢,比预期的更加令人担心。12月底,米塞斯在巴登镇的奥匈帝国军队医院接受了检查,巴登是维也纳附近的一处军事基地。哈克米勒医生发现米塞斯感染了斑疹伤寒,开了一张以硫黄为基础的药方。不过治疗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接下来的几个月,米塞斯又被送往维也纳的两位专家医生那里接受特别的臀部治疗,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了按摩疗法、热风疗法还有步行锻炼。³⁶

这个时期他的正式驻地应为巴登的凯勒庄园(Villa Keller),不过大部分的夜间他可能是在维也纳市中心的家里度过的。为了应对战争经济的挑战,他的朋友们正在国家官僚机器里主导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在维也纳过夜的他也因此亲身体验了“革新”给日常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这些专家紧跟当时的思想潮流,1916年初着手在越来越广泛的制造领域和消费领域推行中央经济计划。由于现行政府体制无法胜任这个任务,他们把目光转向了现成的卡特尔组织,将它们改造成强制机构,并让它们隶属于奥匈帝国的各个政府部门。这些战争中心(Kriegszentralen)控制了工业产品的销售和初级原料的配置。³⁷它们规模庞大的活动获得了位于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奥匈帝国银行机构的资助。³⁸格茨·布里夫斯(Götz Briefs)后来描述了这一渐进的转变,它让战时的奥匈帝国一步步走向了老大哥式的全能国家:

先向民政当局提出商业建议,在与私人进口商的竞争中优先照顾[他们的]进

270

271

口,接着,基于垄断、优化和存货分配,以此逐步扩展他们的业务,在其组织内取得越来越多的控制权。³⁹

这些举措试图自上而下管理整个社会,虽然没有达到德意志帝国那样的比例或强度(奥地利人向来以粗枝大叶闻名于世,善意的草率甚至马虎,有效阻止了德国式指令经济在奥地利的全盘实施),但也非常有力地表明了——至少在米塞斯眼里——实行社会主义只能带来普遍的贫困,并证实了他在此前可能已经产生的对于政府干预自由市场的愚蠢行为的所有成见。⁴⁰“他们是‘有组织的’,却没注意到他们的所作所为恰恰导致了组织的溃败。”⁴¹

272 随着零售市场灭绝,只剩下寥寥数家挑选出来的食品商店还在开门营业,于是庞大的人群就在这几家得益于政府配给的商店门前排起了长龙。排队黄油(*Butterstehen*)、排队鸡蛋(*Eierstehen*)、排队牛奶(*Milchstehen*)——几乎所有生活必需品都要排队购买,而且常常需要排队几个小时,这是新的日常生活的悲惨现实之一。⁴²怎样才能应付这种现实而不至于失去理智?米塞斯赞扬他的叔叔马库斯是一位真正能够应付最低生活标准的榜样,他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竟然也能攒下一点积蓄。⁴³不过,米塞斯也为其他人提供了很多物质支持,从黑市上购买额外的食物分给母亲和一些陷入困境的女士。他在1916年的基本薪水是183克朗⁴⁴,足以购买一些额外的土豆或面粉。1916年12月,米塞斯被迫再次离开维也纳前往东部前线,于是只得请求埃米尔·佩雷尔斯关照家中的妇女——佩雷尔斯是米塞斯在商会的同事,也是庞巴维克研讨班上的朋友。⁴⁵

米塞斯和佩雷尔斯的朋友圈子还包括瓦莱里·阿德勒(*Valerie Adler*)——他在营养局(*Ernährungsamt*)担任顾问,还有卡尔·普里布拉姆和埃瓦尔德·普里布拉姆兄弟、某位奥利·施瓦茨,以及一位埃米尔·施。⁴⁶他们常常结伴欣赏歌剧和戏剧演出,或在咖啡馆海阔天空地聊着政治、经济和文学。偶尔,这些会面也会在一个更加正式的场合进行,参与人数也会更多。例如,1916年11月16日,米塞斯
273 参加了奥地利政治学会(*Österreichische Politische Gesellschaft*)的一次聚会,探讨当前的货币问题。熊彼特从格拉茨赶来主持讨论,在会上敦促米塞斯与他的老对手瓦尔特·费德恩展开辩论。⁴⁷熊彼特做了开场演讲,他陈述说,过高的物价和疲软的克朗汇率带来的货币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他认为物价过高是克朗弱势的原因,而物价的上升则是因为商品短缺和银行滥发纸币;唯有通过减少货币总量才能让物价和汇率回归正常。关键在于,克朗必须恢复到原先的购买力水平。米塞斯没有作什么补充,他在会上只阐述了外汇交易中心的外汇管制是无效的,但费德恩则从

国际收支平衡角度解释了当前局势,指责贸易逆差应为克朗疲软负责。值得注意的是,不只是外汇交易中心负责人赫尔·冯·兰德斯贝格(Herr von Landesberger),大多数演讲者都赞同费德恩的观点。⁴⁸

作为一名编外讲师,米塞斯也恢复了在维也纳大学的教学活动,他在课堂上详细讨论了自己的货币理论与德语大学盛行的各种观点之间的区别,尤其分析了克纳普、熊彼特、维塞尔,还有菲利波维希的观点。⁴⁹前线经历改变了他的举止和外貌,让他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时更增添了一番战争老兵的沉重分量。当时,年轻的海因里希·特赖希尔(Heinrich Treichl)曾在父母餐桌上见到过米塞斯,对他那暗红色的胡须印象尤其深刻。⁵⁰他的战友一定也有此印象:米塞斯偶尔会被戏称为“赤鹿”(Rotwild)。⁵¹

274

一位名叫路易丝·佐默(Louise Sommer)的女学生极为仰慕这位直言不讳且措辞尖锐的年轻讲师。她遍读了他的所有作品,很快就想深入了解他对每一件事的看法。显然,他们甚至进行了深夜的促膝长谈,通过这些交往,佐默小姐成了米塞斯的朋友——也许不只是朋友。平常待人冷淡的米塞斯与她分享了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向她倾诉了自己的压抑情绪。当再度返回前线后,他给她寄去了春天的初花。⁵²战后,路易丝·佐默成了米塞斯有关自由主义和政治的观点的坚定支持者。

1916年5月5日,米塞斯接到命令,加入了“战争经济学科学委员会”(Scientific Committee for War Economics),这是军部新成立的一个委员会。⁵³就像许多类似的战时机构一样,委员会为高级知识分子提供了特权岗位。这个部门集中了许多成名的年长学者和优秀的年轻学生,包括米塞斯、布罗达(Broda)、卡尔·普里布拉姆、布罗克豪森(Brockhausen)、阿德勒、佩雷尔斯,还有巴尔奇(Bartsch)等人,可能还有熊彼特和阿尔弗雷德·阿蒙。⁵⁴委员会的整个意图是建立一个讨论平台,深入分析战争的经济问题和战略上的“经济目标”。

显然从一开始,至少对任何稍微了解一点米塞斯观点的人来说,关于军事胜利的预期经济利益问题,米塞斯当然会与奥匈帝国政界和军方一些极有权势的人物还有委员会的许多成员持有不同意见。他绝不认为征服东部地区会给未来的奥匈帝国带来任何经济上的好处。一些站在古典自由主义立场的委员会成员也深明此理,但他们选择了沉默;米塞斯与他们不同,他已经做好准备,打算向那些战时的实权人物进言,全然不顾他们可能会给他穿小鞋。

275

孟德斯鸠曾说过,士有为国赴死之责,而无为国撒谎之任。⁵⁵这似乎也是米塞斯的座右铭。他已经用事实证明了自己愿意为国捐躯。如今他向世人显示了纵使招惹权贵也要尊重事实的决心。米塞斯在委员会的会议和发布会中频频亮相,为

他的经济不干预论辩解。他也完成了一篇文章,重申了这个观点的科学论证。他的文章于1916年12月发表在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中,用了一个中性的标题《论贸易政策的目标》(*Vom Ziel der Handelspolitik*)。⁵⁶

276 米塞斯指出,“从纯粹的经济学角度看”,自由贸易胜过保护主义是不容置疑的。李嘉图改进和完善了古典自由贸易理论,不过他的理论有个前提,就是资本和劳动只在一国疆域之内自由流动。米塞斯却证明了,即使上述条件不成立,自由贸易理论仍然牢不可破。李嘉图的自由贸易世界存在富国和穷国,关税和进口配额无法改变这个局面。而在米塞斯的自由移民的世界中,国家只有人口密集和人口稀疏之分,所有国家的工资率和银行利率都会趋于相等。这一论证再次说明,保护主义对于改善这类境况没有任何助益。⁵⁷⁻⁵⁸

米塞斯指出,没有任何“经济”理由可以反对人口和资本的跨境流动,接着,他用这篇文章的大部分篇幅讨论了至为重要的“非经济”理由,也就是民族主义。他陈述说,国际移民与“民族原则”互相冲突,所谓民族原则就是以促进同族之人(*co-nationals*)的壮大和福祉为政策目标的原则。移民出境会导致侨民被外族同化吸收,这对原民族是一个“损失”,这种损失就成了“非经济”层面反对自由贸易的初步理由。但是,米塞斯表明,这一反自由贸易的结论站不住脚。的确,移民会削弱原民族的实力,但是保护主义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至少,米塞斯认为,它“无法以有利于民族福祉的方式实现既定目的”。⁵⁹他评论说,即使大力颂扬保护主义的人士也必须注意到,他们提出的政策不可能实现“他们制定的那些目标”。⁶⁰

277 相比之下,其他国家的反日耳曼移民法律是对大量移民带来民族异化威胁的合理反应。⁶¹简言之,德国无法通过保护主义改变自己的厄运,同时其他国家的政策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困境,而德国对此已经无能为力。米塞斯对德国的民族主义感到绝望,他清醒地总结了当时的形势:

建立一个世界帝国(*Weltreich*)的基础是人口繁殖速度接近其他世界帝国,并且定居区域能为人口发展提供足够空间。如果缺乏这些条件,贸易政策本身并不能为建立一个世界帝国作出任何贡献。⁶²

278 米塞斯推测,德国在国际政治上的孤立地位,是由于缺乏足够的领土容纳快速增长的人口。其他国家(民族)已经控制了满足德国扩张主义所需的领土,共同的利益促使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殖民地,也正确地“感受到德国必定是他们的天然敌人”。⁶³

接着,米塞斯批评了社会民主党领袖卡尔·伦纳的方案。伦纳计划建立一套全面的保护关税体制,作为奥地利籍日耳曼人和奥匈帝国其他民族之间未来关系的基石。伦纳认为,各民族间的政治联合要以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他试图通过保护主义人为地建立这个共同基础。米塞斯反驳说,在我们这个民族主义时代,保护主义实际上加深了各民族间的敌意,因为它保护的是已经工业化的民族。他以战前奥地利本土日耳曼民族与匈牙利民族之间的对抗为例阐述自己的观点,这种对抗曾经导致奥匈帝国的政治秩序摇摇欲坠。

论证的力量和发表的场合让主战派再也无法忽视米塞斯,于是麻烦也接踵而至。

重返前线

1916年8月底,罗马尼亚作为协约国一方参战。随着生力军的加入,俄罗斯联军将战线一举推进到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并开始向匈牙利平原挺进。不过他们的胜利是短暂的。法金汉和马肯森的德军阻止了协约国军队,收复了丢失的领土,并把敌人逐回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脉,再从那里侵入罗马尼亚的心脏地带,深入到布加勒斯特附近。协约国放弃了山区的阵地,显然他们也没有能力保住罗马尼亚平原。又过了一个月,罗马尼亚的所有领土都被同盟国攻克,俄罗斯联军向乌克兰败退。

279

与此同时,奥地利也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1916年10月21日,一位激进分子——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克托·阿德勒的儿子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在维也纳一家餐厅开枪射杀了首相卡尔·施蒂尔克(Karl Stürgkh)伯爵。显然,刺杀是为了抗议政府长久拒绝召集议会做法。而就在一个月后,八十六岁高龄的老皇帝弗朗茨·约瑟夫溘然长逝。至此,唯一能把帝国内各个貌合神离的民族团结在一起的人物也不在了。他的曾侄,二十九岁的卡尔继承了王位,并任命了一个由克拉姆-马丁尼茨(Clam-Martinic)伯爵领导的新政府。

新旧政权交替之际,米塞斯接到命令离开了第13部门。这份敕令极为简短。他原本期望能从军部的一个部门调到另一个部门,然而事情变得很明显,他被踢了出来,再次派往前线。

随着任命的细节传达,前途也日渐黯淡。起初,他觉得自己会像以前那样率领一个正规的野战炮兵团,然而最后一刻的命令却明白表示,他将被派往山区,这意味着生命受到更严重的威胁。⁶⁴更有甚者,他的新山炮营情况极为糟糕。这个炮兵

280 营在1916年2月意大利战役期间组建,自成立起就屡屡遭遇血战,人员、马匹和物资损失惨重。就在米塞斯接手前不久,罗马尼亚军队刚刚摧毁了他们的弹药补给线。⁶⁵看起来,维也纳似乎有人想一劳永逸地除掉米塞斯,按照当时的情形来看,这个阴谋成功的可能性极大。

12月5日,米塞斯来到罗马尼亚的勒姆尼库沃尔恰镇(Râmnicul Valceri,现在的Râmnicu Vâlcea),加入了新的部队——第22山炮团第一炮兵营。他从当地德军那儿得到了一辆汽车,然后前往布加勒斯特,12月11日抵达罗马尼亚首府,在普鲁士军队的总司令部接到了新命令,随后和他的炮兵团一起转移到喀尔巴阡山脉的一处高地驻扎,就在特兰西瓦尼亚和布科维纳之间。⁶⁶

米塞斯等了三周才收到维也纳寄出的第一份邮件。⁶⁷而他母亲的包裹根本无法送达,最后还是通过在军部任职的弗朗茨·魏斯的关系,辗转交到米塞斯手里。⁶⁸与此同时,米塞斯发现人的身体可以承受惊人的低温而不昏厥,不过他臀部旧伤再次痛苦地复发了。⁶⁹

281 维也纳传来的消息丝毫无法振奋他的士气。2月中旬,叔叔马库斯身心彻底崩溃,证明路德维希严重低估了物质匮乏带来的伤害。⁷⁰米塞斯还收到了卡尔·普里布拉姆的一封信,普里布拉姆接替了他在科学委员会的职位。普里布拉姆担心米塞斯会有一些想法,于是写信给他,向他保证自己没有主动争取这份工作。⁷¹

米塞斯没有嫉恨,即使遭遇了这些不公,仍然愿意为国捐躯。终其一生,他一直是个输得起放得下的人。不过人们还是很想知道,1917年3月他在喀尔巴阡群山之间躲在山炮后面瑟瑟发抖之时的感受。他从佩雷尔那里得到消息,卡尔·普里布拉姆获得了骑士十字勋章(Ritterkreuz),已经荣升贸易部社会政策部门的部长秘书一职。

* * *

喀尔巴阡山脉的气候极其恶劣,不过比起北线战场头几个月的情况,这次的新任务却没有那么危险和刺激。敌军疲惫不堪,几乎构不成任何威胁,同时俄国国内对沙皇的政治抵抗也日益强烈,尤其是反对继续战争。东部战线得到了相对的平静,米塞斯甚至有时间和他的军官同僚讨论文学和经济。⁷²

1917年3月14日,俄国君主制被推翻,紧接着成立了亚历山大·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三周后,一直不愿与专制独裁的俄国沙皇结盟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领导他的国家加入协约国一方。前线的均势被打破,军队也重新部署。

4月初,米塞斯的山炮营向北方深入,转移到一个新的战略要地。新阵地的海

拔更高,他们在海拔 6000 英尺的地方架起了大炮。⁷³然而,前线仍然太平无事,交战 282
双方的战意也明显消退。俄国、德国和奥地利等国强大的社会民主党派的和平方案,进一步加深了各方对继续战争的普遍怀疑情绪。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干扰因素,例如,如何处理与新的德国邻居的关系。德国军队的傲慢程度毫不亚于他们的效率。甚至普通士兵也往往把外国盟友视为无能的下等伙伴。米塞斯好几次不得不亲自出马,与那些声称对奥匈帝国军队拥有管辖权的不可一世的德国军官交涉。⁷⁴战后,他在一篇探讨德奥货币统一问题的著名论文中提到,“北德意志人倾向于认为,任何与南德意志人尤其是奥地利人有关的事物都是低等的和异类的”。⁷⁵

1917 年的 5 月末和 6 月初,米塞斯是在维也纳度过的,可能是一次两周的假期。⁷⁶他在维也纳目睹了新皇帝登基以来的变化。卡尔正欲扶植自己的亲信把持军政大权。罢黜旧臣可能需要付出一定的政治代价,但他试图依靠民众的支持弥补这一损失。弗朗茨·约瑟夫在位时,除非是通过皇帝陛下任命的内阁大臣,否则任何人不能直接与皇帝讨论政治事务。但是,卡尔却为那些有意建言献策的人士敞开了皇宫的前厅。果不其然,许多臣民响应了皇帝的号召。在米塞斯的朋友中,就有汉斯·凯尔森和约瑟夫·熊彼特等人写了几份备忘录,详细阐述了各自的政策建议。鲁道夫·西格哈特也见证了此事,他回忆说:“不计其数的上书和谒见。人人都当起了顾问——从女大公到祭司、从下人到神父、从奸商到侃爷。”⁷⁷新政府也在 5 月 30 日召集了三年多来首次奥地利议会上院和下院会议。这是新皇帝争取民心的策略之一——考虑到过去数月里生活水平的急剧恶化,这是必要的手段。 283

米塞斯惊讶地看到,食品供应在他离开后半年内短缺到如此程度。他预计市场上很快就买不到任何食物了,即便排几个小时的长队也会空手而归。他祖父的厨师一度要排队三个小时才能买到肉,而他母亲因无力维持,不得不解雇了厨师。⁷⁸更不幸的消息是,从前的老师欧根·冯·菲利波维希因久病不治,于 6 月 4 日亡故。

6 月 9 日,米塞斯带着这些观感,启程离开维也纳,回到了他的山炮营。⁷⁹他的返回相当及时,因为东线战场的最后一次重大战役即将拉开帷幕。从 1917 年 7 月 1 日开始,在所谓的克伦斯基攻势之后,德国和奥匈帝国联军再度夺取了布科维纳。7 月底,米塞斯和他的炮兵团转移到了距离原先阵地往东约 60 英里处的新的永久驻地,位于布鲁斯图瑞(Brusztury)和查达奇(Czardaki)地区。⁸⁰一个月后,东线的战争事实上就结束了,他的炮兵团由于在进攻查达奇时的卓越表现而得到 284

嘉奖。⁸¹

与此同时,米塞斯在科学委员会的那些同事平安度过了战争岁月。米塞斯知道,政治反对派的宿命就是在国家机器里被边缘化,把持政权的主战派拥有一件相当有效的边缘化武器——将反对派派往前线送命。明知如此,眼见本会成为这个国家思想领袖的人物却要在前线面临子弹的威胁,还是令人无法忍受。随着反对经济扩张计划的声音沉寂,腐败无能的懦夫成了技术官僚精英,奥地利主战派得以在政府里肆意妄为。

米塞斯没有屈服。在7月的激战里,他忍受着臀部刺骨的疼痛,⁸²仍然挤出时间为《新自由报》撰写有关公共政策的文章。⁸³后方维也纳的朋友对此既惊又喜,路易丝·佐默致信给他:

我真嫉妒您能娴熟地通过自我隔离把个人烦恼摆在一边……我几乎要羡慕您那不受外界影响的生活方式。您当然有时间去写作——纵在枪林弹雨中,您也能找到时间。⁸⁴

285 幸运的是,米塞斯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再也不用经受炮火的洗礼——炮兵团在7月和8月初的战斗是布科维纳的最后战斗。但这并不意味着米塞斯的前线任务结束,他的炮兵营接到命令,与南线的奥地利第一军团汇合。⁸⁵

东线战事的平息让奥匈帝国得以腾出手来,准备向意大利人发动一场新的攻势。1917年10月至11月间进行的第12次伊松佐河战役(Isonzo Battle),是米塞斯在这场战争中经历的最后一次战役,也是他作为军人的最后一战。他在南线度过了让人精疲力竭的六周,战火纷飞,还要忍受阿尔卑斯山严寒气候的煎熬,此外,他的臀部依然疼痛不已。某天,炮兵团驻扎在这个地区的主峰龙博恩山(Hoch Rombon),米塞斯报告说:“漫天的浓雾和暴风雪,地上积着50厘米厚的新雪,道路全部中断,大量电线受损,必须冒着生命危险才能修复。”⁸⁶他还提到手下的士兵已无更多木头生火取暖,正在饱受感冒和风湿病的折磨。不过他和他的部队相当幸运,三天后,德国和奥匈联军就在一场正面攻击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把装备更为精良的意大利人赶到弗里乌勒(Frioul)和威尼托的平原上。⁸⁷一位历史学家猜测说:“进攻一方的推进本可更为迅速,只是他们咕咕直叫的肚子无力抗拒意军溃退留下的美酒和佳肴的诱惑。”⁸⁸至此,米塞斯再次逃离了鬼门关。

新 生

286

到11月中旬,米塞斯已经离开了前线,也离开了科学委员会。⁸⁹后者原因不明,不过这似乎是他的处境逐步得到改善的起点。事实上,从那时起的相当一段时间,他的生活不断好转。退出委员会的几天后,他被擢升为上尉。1917年12月3日(此时他刚获准休假18天),他接到命令,加入了军部第十部门——战争经济部。⁹⁰部门首长是林诺奇(Linoch)上校,他与米塞斯关系很好。林诺奇允许他自由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⁹¹米塞斯把尽可能多的时间用在写作一本新书上,书名暂定为《帝国主义》。⁹²此书将总结他对战争的反思。他也恢复了教学活动。

当时冬季学期已经开始,因此开设一个研讨班已经太迟,不过米塞斯很可能在全国教育协会(Volks-Bildungs-Verein)举办了周日讲座。⁹³如果确有其事,那么这场经历对他教育大众的美好理想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在《回忆录》(Notes and Recollections, 1940)中提到,当时他已意识到古典自由主义高估了普通大众做出独立判断的能力。

1918年春季和夏季,他负责讲授一门大学银行理论课程,同时也为一些学生的课外阅读和研究方向提供建议。⁹⁴当时还不允许女性进入法律与政府科学系就读(两年后才可以),不过米塞斯课程的大部分学生都是年轻女士。因为战争的缘故,留在维也纳的男生极少。这些女生可能来自哲学系,自从1897年以来,女性就可以进入哲学系就读。

287

班上只有几位男生,其中一位是里夏德·冯·施特里格尔博士,曾是米塞斯在庞巴维克研讨班的同学。以后他将成为两次大战之间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之一。施特里格尔和《新自由报》一位经济专栏编辑的妻子海伦妮·杜布两人的参与,体现了那个年代研讨班的特色。研讨班的作用不仅在于教学,同时也为水平与教师不相伯仲的成人提供了讨论场所。每场讨论都由当天的主题报告开始,通常是由一位学生主讲,然后米塞斯会针对报告内容和报告主题本身进行评论,并回答参与者的提问。

5月18日,米塞斯从一位没有薪水的编外讲师晋升为副教授。⁹⁵奥地利的副教授职位和美国大学体系的同名职称不太一样,这个职位并不是全职教授,也同样不领薪水,不过它有任期,和美国的副教授相比,也享有更高的社会声望。

288

还有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是米塞斯与马克斯·韦伯的相识。⁹⁶这位德国学者早已成为一位传奇人物,但他已超过十年未登讲台,一直在海德堡大学从事个人研

究。现在，韦伯出人意料地在维也纳高调亮相，吸引了无数学生和教授围观。他与米塞斯的相识，让两人顿有相见恨晚之感。米塞斯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关于经济科学的逻辑和认识论问题的著作，大半都在回应韦伯的观点。而且在大学课程和私人研讨会上，米塞斯反复鼓励研究韦伯的著作。相应的，韦伯赞赏米塞斯的货币理论，称之为已刊印的文字中“最可让人接受的”。他也似乎从维也纳的这位年轻同僚那里学到了一些知识。1918 年韦伯在维也纳逗留期间，米塞斯使他相信，在社会科学中，确实有一门完全与历史不相干的独立学科的存在。经济理论是一门真正的科学学科，它的主题是对手段和目的之间关系的分析，此一分析可以在不需要价值判断的情况下进行。⁹⁷更进一步，米塞斯说服韦伯相信，经济理性——也即经济核算——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的。⁹⁸

289 战时福利国家的规模继续扩大，而米塞斯仍然支持私有体制，不仅在理论上，也在个人生活方面采取相应的行动，例如从自己家庭的食物供应的改善（即使连黑市也在萎缩），到那些渴望远离前线的朋友和同僚的工作安置等等。⁹⁹米塞斯曾呼吁把不毛之地的百姓迁出并安置到维也纳或其他地区，此事让他声名远扬。¹⁰⁰他的这些行动常常得到友人维克托·格雷茨和路德维希·贝特海姆-加比永（Ludwig Bettelheim-Gabillon）的大力协助。¹⁰¹

米塞斯在给别人安排工作方面的成功，至少部分归功于他的“臭名昭著”。他敢于公开反对主战派，敢于戳穿他们所谓的军事扩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诡辩。虽然没能撼动主战派的政策，这份勇气却吸引了人们对他还有他的作品关注。他成了一位公众人物，应邀在律师代表协会（*Advokatenwählerverein*）的全体会议上发表关于奥地利公共财政的演讲。¹⁰²米塞斯似乎在两个月前发表于《新维也纳日报》（*Neues Wiener Tagblatt*）的一篇文章中讨论过这个问题。¹⁰³他把奥地利税法比作一块东拼西凑的烂布，这块烂布是由长达百年的税收改革、错误、相互竞争的特殊利益拼凑而成。他激烈批评政府引入一次性紧急税收（*Sonder-abgabe*）的方案，警告说新税会成为永久性的，并指出健全的财政政策必须考虑到政府收入和政府开支两方面的因素。他的演讲获得了巨大成功。1918 年 3 月 11 日，周一，米塞斯作为奥地利（唯一）的经济学家开始了长达 15 年的公共生涯。

290 1918 年 5 月，反敌宣国防办公室邀请他作了一次讲座，主题为“战争国债的意义”。这是一次“信息课程”，旨在培训那些从事军队宣传工作的军官，他们的任务是向军队灌输爱国主义思想。¹⁰⁴反敌宣国防办公室的主要意图是推动奥匈帝国战争国债的发行。但是，米塞斯不愿成为宣传工具，因此，他在演讲中为战争财政的自由市场方案做了令人信服的辩护。他特别强调了利用通货膨胀为战争融资将会带来的灾

难后果。这次演讲通过速记讲义的方式发表,米塞斯甚至没有机会审查笔录。¹⁰⁵

最后的任务

291

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推翻了克伦斯基政府,随后呼吁东线战场的交战各方立即无条件停火,恢复战前格局。不仅如此,他们还开始将协约国战前制定的惩罚德国(如果他们取胜的话)的绝密计划公之于众。内幕曝光为协约国带来了沉重的政治压力,协约国开始寻求初步的和平方案,因为他们当初开战的理由如今已经失去了神圣的光环。邪恶的德意志专制独裁与人道的西方民主制度之间的鲜明对比开始褪去,逐渐被一幅更加丑陋的现实画卷所取代。但最重要的是,布尔什维克推动的和平进程改变了军事形势,奥地利和德国终于有望从尴尬的两线作战局面脱身。

然而和平前景未能立即实现,因为布尔什维克无法接受德国一方坚持的战争赔款。1917年圣诞前夕,双方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Brest-Litovsk)举行了和平谈判,以德奥对俄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签署一份将整个乌克兰拱手让出的和平协议而结束。于是,最初有望成为德奥在军事和政治上重大胜利的局势演变成了一场灾难。同盟国失去了把军队及时调动到西线的宝贵时间,而强加的“和平协议”也未能安抚俄国人,同盟国宝贵的军力被迫分出一部分以防备俄国可能的反击。简言之,同盟国的所有政治优势丧失殆尽。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威尔逊,以及西方媒体抓住机会发动宣传攻势,把《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描述成敌人帝国主义扩张的铁证。

军事占领乌克兰的最初原因是为了掠夺丰富的自然资源。然而在德国和奥地利,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米塞斯明白这点。他在《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论贸易政策的目标》(On the Goal of Trade Policy)。该文指出,对于资源的经济控制,即使在缺乏政治控制的情况下也可获得。通过正常的贸易渠道就能得到乌克兰的资源,没有必要对整个地区实施军事占领。米塞斯毫不妥协地坚持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几乎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

292

军事占领乌克兰真正的“经济”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它为一小撮人带来了不劳而获的财富。比如现在这个例子,占领区的经济掠夺大权被托付给了某个“东方集团”(Ostsyndikat),这是一个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工业巨头和银行巨头组成的卡特尔。集团的每位成员都有垄断乌克兰某项资源的权利。利益相关的各方于1918

年5月在柏林召集了一次会议,制定了大概的战利品瓜分方案,尤其是确定了各方的“贸易代表团”及其独占的贸易领域。¹⁰⁶

柏林会议也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乌克兰未来的货币构成是其中之一。奥地利方面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因为奥地利战时的通货膨胀导致大量克朗流入了被占领区。关于乌克兰货币的决定,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克朗的需求,弄不好会让克朗跌破法定兑换率。

293 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奥匈帝国大量滥发通货——就像所有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一样,这就导致本国货币相对通货膨胀程度较低的外国货币的汇率持续下降。要想阻止通货膨胀及其征候(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唯一的根治方法当然是停止印制额外的纸币克朗,但这对许多国家主义者和货币狂人来说实在令人望而生畏。他们试图回避这个方案,寻求其他解决办法,他们的小花招就是在纸币的抬头印上其他商业银行而不是维也纳奥匈帝国中央银行的名字。奥地利人在意大利占领区就要了这个手段。他们向意大利人收购物资,支付的却是“信用社纸币”(Darlehenskassenscheinen),上面印的货币单位是里拉,以此来提升克朗对里拉的汇率。

类似方案也在东线实施。1918年8月,德国曾在其占领区支付自己印的卢布,东线司令部(East Army Command)的银行办公室提交了一份备忘录,¹⁰⁷提议在奥地利占领区也采取类似措施。按照银行办公室经济学家的看法,市场上的克朗过剩是由于大量军事开支都用克朗支付所致,而从德国进口的货物,尚不足以消耗市场上过多的克朗。德国当局只关心马克的坚挺,并不情愿参与合作以期达成稳定的汇率。因此,奥地利军队也应改变政策:(1)打击从奥地利走私到俄国的非法行为;(2)改用卢布作为支付手段。这些政策让银行办公室有时间消化乌克兰过剩的克朗,具体办法是由东线军团在当地的金库吸收有息活期存款(利率为2%),因此这些金库就充当了奥匈帝国中央银行分部的角色。按照设想,这可以让数以百万计囤积在私人口袋和保险箱里的克朗再次回到市场流通,因而对国民经济和货币本身都有好处。银行办公室显然没有料到,这些措施对实现既定目标完全没有助益。奥匈帝国几乎没人能理解这类问题,更遑论去解决它们了。

294 1918年6月,维也纳联合银行(Union Bank in Vienna)行长奥托·卡茨(Otto Katz)带着一项财政政策使命找到米塞斯,请他出面协助解决乌克兰的货币问题。他提出由米塞斯负责这个重要占领区的货币政策。小组的负责人将是克劳斯阁下(Exzellenz Kraus),他是米塞斯在布科维纳的最后战役和第12次伊松佐河战役时的长官。¹⁰⁸这项使命对米塞斯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作为一名三十六岁的陆军

上尉,他在军中的职务级别已经低到不能再低了,而他复员之后的处境也没多大改观,他的主要资本是作为一名货币和金融专家而获得的卓著声誉。因此,卡茨的委托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至少这个职位使米塞斯有望成为决策层的一员。感谢上帝和命运送来了卡茨及其委托,米塞斯除了全心全意接受这项任命之外,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不过,米塞斯毕竟是米塞斯,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接受这份工作的条件,就是拥有充分的决策权,独自一人承担乌克兰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责任。这意味着他被调到文职部门后的职位相当于波斯尼亚国务卿的地位。¹⁰⁹最重要的是,他要求彻底明晰自己的科层权威,以避免今后的官场摩擦影响工作。他在提出这个要求的同时,也单刀直入地批评了奥地利官僚体制的陈规陋习。他认为,奥地利人不同于他们的德国兄弟,缺乏客观独立地推进一项事业的能力:

295

为回应外界关于我们的议论——诸如“他们只靠人品取胜”或“船到桥头自然直”之类而提出的寻常的安慰之辞,真是大错特错。我很确定可以凭着自己的能力闯出一番天地,谋到一份“舒适”的职位。但要做到这点,最重要的是保持客观。因为上述那些个人优势的取得,是通过在应当保持坚定的时候屈服于圆滑的手段,或是通过占用本应投入坚实工作的时间耍不必要的阴谋诡计。我们应该具备客观公正的品格。德国人的客观就是他们成功的基础。¹¹⁰

米塞斯并未幻想自己的要求得到满足。为了完成某项工作而定下明晰的合作条款不是奥地利行政当局的行事风格,而他认为事情也就到此结束了。不料过了几天,维也纳帝国总参谋部的一位高级军官,陆军中校马克西米利安·埃德勒·冯·贝歇尔(Maximilian Edler von Becher)邀请米塞斯担任财政和货币顾问,加入第二陆军指挥部,并让他提出加入的具体条件。米塞斯在1918年6月26日写信答复这一邀请。

米塞斯建议把第二陆军指挥部的文职机关分割为三个部分:政治事务部、金融与货币事务部、公共财政部。他愿意负责金融与货币事务部。他要成为一名手握实权的官员,才能与其他政府人员打交道;他必须成为奥匈帝国的雇员,才能化解奥地利、匈牙利和地方政府雇员之间的冲突。出于同样的理由,继续保留商会的职位似乎就不太可取了。因为他若要负责货币事务,就一定会参与修订乌克兰和奥地利贸易局的协议,而贸易局是商会有一个附属组织,拥有乌克兰进出口生意的垄断特权。由于贸易局的官员受到商会的管辖,他与贸易局的协商不仅难以服众,而

296

且还会引起民族主义者的愤怒,人们会把这类协商视为损害其他民族利益的“内奥地利”的交易。

贝歇尔似乎同意米塞斯的观点,在一封写给上级的正式推荐信中几乎逐字逐句地复述了他的原话。米塞斯收到了这份公开文件的副本,在文件里,贝歇尔建议邀请米塞斯前往敖德萨作个口头报告,同时了解一下基辅和乌克兰其他较大城镇的情况。

然而在总参谋部的铁幕后面,高层的方案却是诱使这位顽固的上尉合作,而不满足他的要求。7月中旬,第10部门的负责人林诺奇上校接到了一份继续裁员的命令。这份命令来自最高当局,而且明确指定了裁员的名单。米塞斯位列其中。他从林诺奇处得到消息时,明白自己的唯一选择就是前往前线或无条件接受乌克兰的任命了。¹¹¹林诺奇设法拖延了米塞斯离开巴德加施泰因(Bad Gastein)的期限。¹¹²随后,东部军团的司令阿尔弗雷德·克劳斯(Alfred Kraus)将军委派米塞斯前往敖德萨和基辅进行一次为期两周的任务,命令他对乌克兰的货币和财政状况做汇报。¹¹³

米塞斯于9月7日抵达敖德萨,很快了解到德国人正在筹建一个乌克兰部分准备金制中央银行,但是这个方案遭到了奥地利人的抵制,尤其是帝国财政部的赫尔·波拉克(Herr Pollak)和维也纳银行家协会(Vienna Association of Bankers)。¹¹⁴根据当时的形势,乌克兰的任何货币发行机构在政治上都不可避免地会是一家垄断纸币发行权的中央银行。问题在于新机构是仅限于提供通货呢,还是企图解决这个地区迫在眉睫的财政问题。

若要解决财政问题,就会损害新货币的稳定性,但还有别的办法能够卸下这些财政负担吗?米塞斯在会晤当地奥地利指挥官时,说服奥地利银行家们采纳了另一个办法,就是向乌克兰民众销售奥地利的证券和债券。¹¹⁵

为避免德国人鼓吹的通货膨胀政策,米塞斯的策略是通过增加国外对奥地利证券和债券的持有量,寻求一种民间解决途径。后来在一份给克劳斯将军的报告中,他评论了时局并且给出建议,希望尽可能改进这家筹备中的机构。特别是,他建议未来的央行仿效沙皇俄国的银行模式。¹¹⁶乌克兰中央银行应是一个纯粹的政府机构(例如,区别于之前的英格兰银行和德意志帝国银行),应有一半的储蓄作为现金储备。至于投资政策,这家新银行应遵循私人银行的原则:不进行风险投资,不进行长期投资。米塞斯也强调,存款准备金率对建立纸币的信心和信用“至关重要”。储备必须是现金,任何其他方式都

无法为货币持有人提供任何切实的保障,或以任何方式阻止导致纸币彻

底贬值的不受限制的纸币发行。法国指券(assignats)的历史就是前车之鉴,它在当时曾以法国全部地产作为“抵押”。¹¹⁷

这就是米塞斯提出的部分准备金制中央银行体系,也即我们后来所知的金汇兑本位制。他建议保留全部流通纸币的三分之一作为准备金,而且这些准备金必须是现金(黄金或白银),或者外国货币,或者可以兑现为外国货币的外汇汇票。此外,银行的经营管理“当然”也要接受政府监管,最好是由贸易部长负责,因为财政部出于财政目的而有滥用权力的倾向。

米塞斯的方案没有付诸实施。当他回到维也纳一周后,帝国的保加利亚前线就崩溃了,又过了一个月,奥匈帝国和德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均告瓦解。战争在突如其来的混乱局面中结束,而帝国延续数百年的秩序也几乎在一夜之间荡然无存。

注 释

1. 特别参见 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Vienna: Manz, 1919); translated by Leland B. Yeager as *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3); and, *Omnipotent Government: The Rise of the Total State and Total War*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4)。

2. 1917年9月路易丝·佐默致米塞斯的信; Mises Archive 4: 143ff。

3. 参见 Mises Archive 62:143ff. and 100:3。

4. 参见 k. u. k. Armee, *Kriegsereignisse im Norden. Von der Mobilisierung bis einschliesslich der Schlacht bei Lemberg*, "Österreichisch-ungarische Kriegsberichte aus Streffleurs Militärblatt" (Vienna: Seidel & Sohn, 1915), bk. 1, pp. 7ff。

5. 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p. 112n; *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p. 138n。

6. 关于奥地利炮兵部队的装备与组织的各种资料, 详见 Mises Archive 3:23ff。

7. 参见 Mises Archive 100: 28。

8. 参见米塞斯书信, Mises Archive 100:13, 23, 15, 29, 31。米塞斯后来公开谴责了当局对于普通士兵的苛刻待遇, 认为这种情况严重阻碍了战事的进展:

军官和普通士兵的补贴是按截然不同的标准发放的, 而且前线战士的军饷待遇竟比后方的工人还差。从政治上看, 这种做法错得离谱, 极度挫伤士气!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p. 135, n. 18; *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p. 166)

9. 参见米塞斯书信, Mises Archive 100:20, 26, 35; 102:6, 7, 8, 18, 33。

10. 参见 Mises Archive 2:97。

11. 参见米塞斯书信, Mises Archive 100:19, 22。

12. 参见米塞斯书信, *Mises Archive* 2:98。

13. 参见米塞斯书信, *Mises Archive* 100:49。

14. 此书1918年初版于柏林,二十年内一直是飞行理论领域的标准著作。作者去世后,此书又于1957年重印了第六版。战前,里夏德·冯·米塞斯已经凭借《流体力学技术原理》(*Elemente der technischen Hydromechanik*, Leipzig: B. G. Teubner, 1914)一书赢得了专家声誉。

15. 米塞斯强调,战争时期公共舆论强烈要求对军工产业所获的巨额利润征收重税。由于意识到战争物资高效的私人生产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奥地利领导阶层最初没有顺从这种舆论要求。参见 *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pp. 142f。

16. 参见米塞斯书信, *Mises Archive* 100: 44。

17. *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p. 114; *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pp. 140f. 另见 Rudolf Sieghart, *Die letzten Jahrzehnte einer Grossmacht* (Berlin: Ullstein, 1932), p. 282。

18. 参见 k. u. k. Armee, “Kriegsereignisse im Norden. Von der Mobilisierung bis einschliesslich der Schlacht bei Lemberg,” *Österreichisch-ungarische Kriegsberichte aus Streffleurs Militärblatt* (Vienna: Seidel & Sohn, 1915), bk. 2, p. 35。

19. In the German: “es mit den Russen besser geht.” 参见1914年12月18日里夏德·冯·米塞斯寄给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明信片; *Mises Archive* 2: 102。

20. 至少,米塞斯的舅舅阿尔弗雷德·兰道是这样猜测的。在1914年12月3日写给米塞斯的一封信里,他推测米塞斯学习鲁塞尼亚语是为了协助特诺普新政府(*Gouvernement Tarnopol*)的行政事务。参见 *Mises Archive* 2: 118。鲁塞尼亚语是一些在奥地利统治下生活在加里西亚东部的乌克兰人的语言。

21. 参见通信, *Mises Archive* 2: 102。此人应为阿尔弗雷德·阿德勒(1870—1937)。直到20世纪30年代,阿德勒仍是维也纳最著名的心理学家。他最初与西格蒙·弗洛伊德一起工作,不过没过多久他就形成了自己研究路子,重点关注每位病人的特殊状况(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psychologie*])。

22. 参见通信, *Mises Archive* 2: 103。

23. 参见通信, *Mises Archive* 2: 116。关于他获得军队勋章的详情,可见 Marcel Klang, *Die geistige Elite Österreichs* (Vienna: Barth, 1936), pp. 617f。

24. 参见通信, *Mises Archive* 102: 14。

25. 参见 *Mises Archive* 2: 21f., 24。后来他注意到,只有奥地利籍日耳曼人和匈牙利人全心全意地支持君主制,而军中的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往好了说也是三心二意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是为另一方而战;参见 *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pp. 112f。

26. 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米塞斯保留了其中一些剪报。参见 *Mises Archive* 102: 29, 31。后来他评论说胜利应归功于那时俄军落后的武器军备;参见 *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p. 112n。

27. *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pp. 114f.; *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pp. 141。

28. 水杨酸主要提取自柳树皮。

29. 参见通信, *Mises Archive* 102: 4, 6。

30. 参见通信, *Mises Archive* 102: 27。

31. 参见 Mises Archive 3: 34。

32. 1915年11月28日,索普隆《厄登堡报》(*Ödenburger Zeitung*)短讯:

我们的英雄。声名远扬、深受爱戴的预备役中尉,路德维希·埃德勒·冯·米塞斯博士,入伍前为维也纳大学的编外讲师,现任职于我军第30团,因面对敌人的杰出表现,再次获得银质军功勋章。

33. 他在此后的一生中一直与他们保持联系。例子可见20世纪60年代他与奥托卡尔·舒尔茨上校(Col. Ottokar Schulz)和马克斯·索卡尔(Max Sokal)的通信;Grove City Archive: "S" files。

34. 参见 Mises Archive 2: 36 中的书信。

35. 参见 Mises Archive 3: 34f。

36. 参见 Mises Archive 3: 30ff。

37. 米塞斯后来指出,战时的中央计划始于外汇交易中心。参见 Mises, "Austrian Empire. Finance and Banking,"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2th ed. (1921), vol. 30, pp. 323f。

38. 参见 Jurij Krizek, "Die Kriegswirtschaft und das Ende der Monarchie," R. G. Plaschka and K. Mack, eds., *Die Auflösung des Habsburgerreiches* (Munich: Oldenbourg, 1970), pp. 43 – 52; Götz Briefs, "Kriegswirtschaftslehre und Kriegswirtschaftspolitik,"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wissenschaften*, 4th ed. (Jena: Gustav Fischer, 1923), vol. 5, pp. 984 – 1022; H. Wittek, "Die kriegswirtschaftlichen Organisationen und Zentralen in Österreich," *Zeit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1922); Otto Göbel, *Deutsche Rohstoffwirtschaft im Krieg* (Stuttgart: Carnegie Stiftung, 1930)。

39. Briefs, "Kriegswirtschaftslehre und Kriegswirtschaftspolitik," p. 1017.

40. Mises, *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p. 146;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pp. 118f. :

详细描述同盟国战争时期愚蠢的经济政策是经济史的任务。例如,政府一度下令屠杀牲口减少畜栏数,原因是饲料短缺;过了一阵却又发布了禁止屠杀牲口的命令,并采取措施提高畜栏数。各行各业都处在类似的无脑计划的统治下。互相矛盾的措施犬牙交错,直到整个经济结构倾塌为止。

41. 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p. 114; *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p. 140.

42. 大约在8月20日,米塞斯抵达了维也纳。此时已经度过了一周“排队黄油、排队鸡蛋、排队牛奶”生活的一位亲戚泽尔琳迎接了他。参见 Mises Archive 2: 123。

43. 参见 Mises Archive 4: 106。

44. 参见 Mises Archive 2: 43ff., 5: 23。183 克朗大约相当于200 金法郎或1.867 盎司黄金。

45. 参见 Mises Archive 4: 38。

46. 参见 Mises Archive 4: 35f., 77, 110ff。埃瓦尔德·普里布拉姆在“住房改革中心”工作,1917年8月与玛丽安娜·菲尔特(Marianne Fürth)订婚(参见 Mises Archive 4: 173)。

47. 参见通信, Mises Archive 56: 22。

48. Mises Archive 107: 94.

49. 不久,他在一篇为韦伯《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所写的文章中发表了这些思想,

后来这篇文章收入他的《货币与流通媒介理论》(Munich and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24)第二版。参见 Mises, “Zur Klassifikation der Geldtheorie”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monetary theory),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44 (1917–1918): 198–213; idem,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London: Jonathan Cape, 1934), appendix A。

50. 参见 Heinrich Treichl, *Fast ein Jahrhundert* (Vienna: Zsolnay, 2003), p. 15。

51. “Rotwild”是一种德国红鹿。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红色狩猎动物”。

52. 参见 Mises Archive 4: 69f。另见《民族、国家和经济》出版后的通信, Mises Archive 53: 56ff。

53. 参见 Mises Archive 2: 87。似乎不久前的1916年4月,他短暂地到访过驻扎在匈牙利瓦萨尔海伊(Vasarhely)的原先所属的部队(参见 Mises Archive 2: 77)。

54. 关于凯尔森和阿蒙,参见 Mises Archive 4: 61f.; 关于布罗达,参见 Mises Archive 4: 97ff.; 关于施瓦茨、普里布拉姆、布罗克豪森、阿德勒、佩雷尔斯和巴尔奇,参见 Mises Archive 4: 41f。

55. “Être vrai partout, même pour sa patrie [sic]. Tout citoyen est obligé de mourir pour sa patrie; personne n'est obligé de mentir pour elle.” Montesquieu, *Oeuvres complètes* (Paris: Gallimard / Pléiade, 1996), vol. 1, “Préceptes,” p. 1415。

56. 参见 Ludwig von Mises, “Vom Ziel der Handelspolitik,”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42, no. 2 (1916): 561–85。米塞斯突然离开维也纳后,莱德雷尔才读到了校样(参见 Mises Archive 4: 37, 217)。12月底,莫尔出版社(Mohr Publishers)签了一份93.75马克的稿酬单,不过米塞斯可能直到1917年5月份才回信。6月份,莫尔出版社把这笔稿酬汇到了米塞斯在奥地利邮政储蓄银行(Österreichische Postsparkasse)的账户,计142克朗4海勒(参见 Mises Archive 2: 94ff)。

57. 参见 Mises, “Vom Ziel der Handelspolitik,” pp. 564f。米塞斯还为(相对)人口过剩和人口过少制定了一个比较标准:“一个国家的常住人口,如果比整个世界实行自由迁徙制度时的人口要多,我们就认为这个国家是人口过剩。”(ibid., p. 576)

58. 也许早在菲利波维希研讨班时代,他就对现代移民问题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兴趣。19世纪90年代以来,菲利波维希大大促进了德国经济学家对移民问题的研究,虽然他始终未能成功地在社会政策协会的会议上发起关于这个主题的讨论。参见 Eugen von Philippovich, ed., “Auswanderung und Auswanderungspolitik,” *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Socialpolitik* 52 (1892); 另见他的一位学生对奥地利移民问题的跟踪研究: Leopold Caro, “Auswanderung und Auswanderungspolitik in Österreich,” *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Socialpolitik* 131 (1909)。

59. Mises, “Vom Ziel der Handelspolitik,” p. 567。

60. Ibid., p. 570。

61. 他指出,(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移民国家的产业工人之所以能成功推动反移民法的通过,缘于来自欧洲的大量移民威胁到了民族统一:“无疑,所有国家都会坚决关闭他们的移民大门,以消除对自身民族成分的威胁,就像白人殖民的土地长久以来一直拒绝黄色人种迁入一样。”(ibid., p. 574)

62. Ibid., 577。

63. Ibid., p. 578.
64. 参见 Mises Archive 4: 74。
65. 参见 Mises Archive 4: 124ff。
66. 参见 Mises Archive 2: 852ff。他们直到 12 月 19 日才抵达预定位置,可能是糟糕的路况和敌人的行动妨碍了他们行军。
67. 他最早在 1917 年 1 月 11 日给维也纳的朋友写了回信,送去了新年祝福。参见 Mises Archive 4: 38。
68. 参见 Mises Archive 4: 229ff。
69. 参见 Mises Archive 4: 110ff., 115。
70. 参见 Mises Archive 4: 106。
71. 参见 Mises Archive 4: 61f。事实证明普里布拉姆在毛遂自荐方面很有天赋。
72. 参见 Mises Archive 53: 7。
73. 参见 Mises Archive 4: 54f., 95f., 101。
74. 参见米塞斯 5 月 3 日关于他与一位德国军警官员交涉的报告, Mises Archive 3: 80。
75. Mises, “Der Wiedereintritt Deutsch-Österreichs in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ie Währungsfrage.” Michael Hainisch, ed., “Wirtschaftliche Verhältnisse Deutsch-Österreichs,” *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158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19), p. 169。
76. 参见 Mises Archive 4: 18f., 101。
77. Sieghart, *Die letzten Jahrzehnte einer Grossmacht*, p. 246。
78. 参见 Mises Archive 4: 192, 200f。
79. 参见 Mises Archive 4: 205f。
80. 参见 Mises Archive 3: 41ff., 54, 71f., 95。这些档案也提到了以下地区:库茨马克斯(Kozmacz)和波卡拉(Prokaraw)(3: 52)、普里瓦斯基劳特克(Prewarskic Rotc)(3: 64)、古丁汤姆纳塔克(Gutin Tomnatek)(3: 101)和其他地区(比如,3: 46, 104, 110)。米塞斯的代号是“赤鹿”(3: 64)。他们在战斗中的最后一些行动似乎是在 8 月 8 日,敌人是罗马尼亚军队(3: 67)。
81. 嘉奖于 9 月 3 日颁发。参见 Mises Archive 4: 51。
82. 显然,臀部旧伤在战斗中严重恶化。参见海伦妮·迈尔松(Helene Meyerson)(Mises Archive 4: 79)和贝特尔海姆(Bettelheim)(Mises Archive 4: 6)后来信件里的评论。
83. 文章刊登日期大约在 8 月 20 日,以及此前,参见 Mises Archive 4: 102。
84. 8 月 3 日致米塞斯的信件,参见 Mises Archive 4: 87ff。羡慕之情或许来自她自己在照料一位寄养的小孩(4: 143ff)却觉得力不从心的缘故。她似乎深信,米塞斯是永不疲倦的。她曾敦促米塞斯至少发表他的货币理论类型学,那是他在前年的货币经济学课程上讲到的。参见 Mises Archive 4: 143ff., 225。
85. 参见 Mises Archive 51: 107; 4: 103; 7: 12。
86. 这份报告的记录日期是 1917 年 10 月 21 日,参见 Mises Archive 4: 15。
87. 按照米塞斯的判断,这场胜利是因为意大利士兵的低劣装备。参见 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p. 112 n。在同一本书里,米塞斯指出(第 82 页),奥地利军队从未被意

大利人打败过。

88. Gordon Brook-Shepherd, *The Austrians: A Thousand-Year Odyssey* (New York: Carroll & Graf, 1997), p. 198.

89. 参见 Mises Archive 2: 12。

90. 参见 Mises Archive 2: 11, 19。通常缩写为: 10 K. W. Abt. des k. u. k. KriegsMin。这个部门位于塔博尔施特拉斯街 18 号 (Taborstrasse 18) 维也纳二区 (即所谓的利奥波斯坦 [Leopoldstadt]) 的国家大饭店 (例如, 参见 Mises Archive 51: 80)。

91. 看来他也参与了商会活动。参见施梅林 (Mises Archive 51: 23) 和泰恩塔尔 (Tayenthal) 的信件 (51: 31)。

92. 参见 Mises Archive 54: 2。此书原名《帝国主义》, 后来以《民族、国家和经济》为书名出版。

93. 参见 Mises Archive 51: 47。

94. 克特馨·皮克 (Käthchen Pick) (1918 年 5 月 17 日; 参见 Mises Archive 51: 32) 和某位贝尔曼 (Bermann) (1918 年 6 月 27 日; 参见 *ibid.* 51: 32) 的信件中提到他的银行理论训练 (*Banktheoretische Übungen*)。课程内容参见 Mises Archive 17: 15。学生名单参见 Mises Archive 17: 22。米塞斯与舍恩多夫 (Schöndorf) (51: 1)、匿名人士 (51: 5)、路易丝·佐默 (51: 21f., 61f., 86)、伽马 (Gama) (51: 40f.) 和希尔德·奥本海默 (Hilde Oppenheimer) (51: 46) 之间曾有通信论及研究内容。

95. 副教授 (*Ausserordentlicher Universitätsprofessor*)。这次晋升是由帝国 5 月 7 日的一项决定促成的。

96. 1919 年 11 月, 由于住宅维修, 韦伯住在雅费家中 (73: 57)。韦伯去世几年后, 米塞斯为李凯尔特的韦伯雕像 (1928 年 12 月, 73: 35f.) 捐款, 至今我们仍然可以在海德堡大学瞻仰这座雕像。

97. 参见 Mises, *Erinnerungen* (Suttgart: Gustav Fischer, 1978), p. 5。

98. 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讨论这一影响。

99. 某位伊雷妮·施梅林 (Irene Schmerling) 写于 1918 年 8 月 29 日的一封信件透露了内情。她写道: “弗劳·辛格最近对我说您在找我 (我想您是对食品感兴趣? ——我只有人造蜂蜜!)。” (“Fr. Singer erzählte mir kürzlich, dass Sie nach mir gefragt hätten (wohl um Lebensmittel? —es ist nur Kunsthonig da!)”) 米塞斯在 1918 年 11 月/12 月的年薪为 1120.51 克朗 (参见 Mises Archive 51: 52)。折合 71.05 美元, 换算数据来自 Mises, “Austrian Empire. Finance and Banking,”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2th ed. (1921), vol. 30, pp. 323f。

100. 米塞斯帮助过的人包括 (但不限于): 他的战友 I/22 部门军官格赖夫斯 (Greifs) 的兄弟 (Mises Archive 51: 45, 72), 某位佩奇克 (Petschek) (51: 65f.)、某位施泰纳 (Steiner) (51: 74f.)、某位斯基姆 (Skiem) (51: 80ff.)、某位祖斯曼 (Sussmann) (52: 2), 很可能还有里夏德·冯·施特里格尔 (51: 59f.)。米塞斯其他朋友的名声可能不好。格赖夫斯也找过凯尔森, 请求帮忙安置他的兄弟卡尔, 他致信米塞斯说: “如果您见到凯尔森, 请转告他, 我对他的沉默并不感到惊讶, 而对自己的沉默感到羞愧。” (Mises Archive 51: 91)。甚至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也来找米塞斯。许多年后, 莱奥·菲施曼 (Leo Fishman) 回忆了他拜访米塞斯的往

事。参见菲施曼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50年11月11日;Grove City Archive:“F”file。

101. 参见 Mises Archive 51: 78; 52: 2。

102. “Wandlungen der österreichischen Finanzpolitik.” 这次邀请来自威廉·维泽尔蒂尔(Wilhelm Wieselthier)和尤利乌斯·勒夫(Julius Löw)。参见 Mises Archive 106: 16。

103. 参见“Finanzreform und Vermögensabgabe,” *Neues Wiener Tagblatt* (January 23, 1918); a copy is in Mises Archive 106: 16。

104. 参见 Mises Archive 2: 4。

105. 参见“Über Kriegskostendeckung und Kriegsanleihen,” copy in Mises Archive 10。米塞斯评论说:

1918年夏,军队最高司令部组织了一次课程,为那些从事军队爱国主义教育的军官培训……我的演讲以速记讲义的方式发表,但我甚至没有机会校稿。(Notes and Recollections [Spring Mills, Penn.: Libertarian Press, 1978], pp. 66f)

106. 参见 Mises Archive 8: 2ff., 31ff., 36ff.; 9: 14, 162ff. 掠夺占领区的经济资源以支持战争的做法有着悠久的历史。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增加了一样工具——全面经济计划。参见 Georg Holzbauer, *Barzahlung und Zahlungsmittelversorgung in militärisch besetzten Gebieten* (Jena: Gustav Fischer, 1939), pp. 1–18。

107. 标注日期是1918年8月25日;参见 Mises Archive 51: 69ff。

108. 有趣的是,带着政治使命去见米塞斯的是银行行长卡茨。显然,众所周知卡茨和维也纳的上层政坛关系密切,所以米塞斯很认真地对待了这份提议,在一封1918年6月20日的回信中做出了答复(参见 Mises Archive 51: 104)。想必因为卡茨是一位银行行长,通晓货币事务,才被派去寻找一位合适的货币专家。

109. 参见 Mises Archive 51: 104ff:

不过这样一个职位不能授予一位炮兵上尉,一个像我这样不论从外表上看还是实质上看都不属于决策圈的人物。依我看来,这个职位应当和波斯尼亚国务卿的职位相提并论。

110. Mises Archive 51: 108ff.

111. 参见林诺奇上校致米塞斯(在巴德加施泰因),信件标注日期为1918年7月20日;Mises Archive 51: 50ff。

112. 他的离职期限延长到了8月25日。其间米塞斯住在 Badeschloss 饭店(参见 Mises Archive 2: 17f)。

113. 参见 Mises Archive 8: 2ff., 9, 26; 18。

114. 参见 Mises Archive 8: 9。

115. 参见 Mises Archive 8: 20f。

116. 参见“Bemerkungen betreffend die Einrichtung einer ukrainischen Notenbank” (Remarks Concern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Ukrainian Central Bank) in Mises Archive 51: 114ff. 这份报告没有标注作者。不过,文章风格和内容表明这份报告确实出自米塞斯之手。另见收入 Mises Archive 51: 95ff 的研究材料。

117. Ibid.

正如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渴望认识和理解那场毁灭了旧世界的战争,理解战争的起因和后果。曾有一段时间,他预感这场战争会有一个可怕的结局,因此一从前线服役归来,他就开始将自己的思想落成文字。尽管事务繁忙——例如他在新的共和政府工作、商会活动、教职任务等等,但他仍然坚持继续整理一部新书。这部书稿将会深入分析战争的起因,论述他的切身体会,探讨战后奥地利在政治上面临的挑战。

如同往常一样,白天辛勤工作后,他在晚上开始埋头写书,每天写上几个钟头,直到深夜。1919年6月初,他完成了全书手稿,随后离开了维也纳,到他钟爱的巴德加施泰因休假几周。他当时起的书名是《帝国主义》(*Imperialismus*),但在出版时用了《民族、国家与经济》(*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这个名字。¹虽然此书在他的全部著作中知名度不高,当时却给很多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奠定了他作为战后奥地利以及后来整个欧洲最重要的古典自由主义斗士的不朽地位。²

此书收入了三篇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文章,并以这个理论分析了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历史。第一篇几乎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二。其中,米塞斯开创了一种新的分析方法,可称为“民族政治经济学”,他用这种方法解释德国帝国主义。在他看来,帝国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主要原因。第二篇里,他全面批判了德国战争社会主义带来的所谓福祉。第三篇,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和政治主张进行了详细分析。

这本书包含了米塞斯将在20世纪20年代详细讨论的大部分政治观点。尽管他探讨的历史事件各有其特殊性质,但他对这些事件的观察却有着内在联系。正如他本人在书中指出的,我们不能把1914年之前的德国帝国主义视为日耳曼种族特有的问题。他认为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结果,不管何时何地发生,都有可能导致相同的结果;而到1919年,这些因素已经导致另外几个国家的帝国主义政策了。³

移民、民族杂居和现代帝国主义

301

1914年,德国的主流政治思想是独裁主义,大多数德国人相信纯粹的实力是获得政治成功的充要条件。因为一个强大的政府将无所不能、无往不胜,政治的实质就是让国家得以主宰一切。米塞斯认为这种观点缺乏远见。但为什么在所有民族中,偏偏是德意志人向帝国主义屈服?为什么他们不像其他西方国家那样怀有崇尚个人自由、私有制和民族自决的古典自由主义情怀呢?米塞斯给出了两个答案,一个基于德国自身国情,另一个则涉及国际关系。他指出,不管从哪个角度解释,德国的帝国主义都是源于民族自决原则和民主原则之间的冲突。

1848年以前,日耳曼人与自由主义思想曾有过一个短暂的蜜月期。在那之后,由于当时东部省份和奥匈帝国面临的某些特殊情况,日耳曼人倒向了“国家主义”。在这些地区,日耳曼人属于当地的少数民族。民主制度的引入会使政治权力从日耳曼人的中央政府转到当地的主体民族手中,例如波兰人、乌克兰人、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斯洛伐克人等等。这样一来,长期处于支配地位的日耳曼人就将失去政治参与的机会。因为在民主制下,必然采用主体民族的语言。⁴只要自由主义党派仍处于反对党地位,德国的民族自决原则和多数原则之间的冲突就不会凸显出来。然而1848年革命后,东部地区盛行的民主思想威胁到了新的自由主义政权,于是德国的自由派从此就反对民主了。⁵

302

德国的第二个大问题就是人口相对过剩。古典自由主义已经在贸易和人口自由流动方面废除了阻碍自由的重重障碍。于是,人们向那些工作条件更为优越的地方迁移,他们的劳动也变得更有生产力。许多德国人举家搬到了英国定居者的数量占绝对优势地位的殖民地。生活在英语环境下的德国移民被迅速同化,这是德意志民族的损失。德国政府绝望地企图扭转这种趋势,颁布了一整套保护关税措施,目的是减少德国工人迫于生产力更高的外国竞争压力而移民海外的动机。随着这种政策日渐显露败象,政府遂改弦易张,定下了征服英国殖民地的计划。德国政府开始建造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来对抗日不落帝国的守护者——英国皇家海军。这又反过来促使英国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米塞斯认为,德意志人敌视多数统治政体的首要原因,是杂居人口中德意志人居于少数民族地位。德意志人更倾向于少数统治多数,而非被多数统治。米塞斯不是在进行道德说教。他的目的是解释过去发生了什么,至于将来应当如何,则留给其他人来发表意见。⁶德国的例子没有先例可循,在自由主义历史上,民族自决

303

原则与多数原则还是第一次变得不可调和。

不过,帝国主义并不只是德国特定环境的产物。人口迁移在世界各地都形成了“不利”的民族杂居状况,为帝国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从这方面来说,德国的例子具有普遍的意义。事实上,在所有那些大规模人口迁移显著改变了当地民族平衡的国度,帝国主义都出人意料地以强势姿态再度登场。米塞斯指出,捷克人、俄罗斯人、波兰人,还有匈牙利人都在追随德国人的脚印。美国和澳大利亚也因为各自的移民政策步上帝国主义的后尘,民族杂居环境诱发的帝国主义已经成了一个世界性问题。⁷

这种现代帝国主义比它的早期版本更加强大、更具毁灭性,因为它有短暂却璀璨的自由时代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为依托:

现代暴君的统治远比他们的前辈更加容易。在一个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中,只要控制了商品交换和思想交流的方式,他的政权就远比古时的凯撒更为牢固。轮转印刷机不难套上镣铐,只要控制了印刷机,他就无须担心口头和文字抗议了。责难当代的暴君可不是容易的事情。⁸

304 工业时代的暴政不会轻易达到它的极限。如果只满足于思想和意识控制(政治统治的关键要素),独裁政权可以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但是,私有体制的破坏注定导致中央集权的末日,因为这将摧毁独裁统治的经济基础。自由终将复兴,只是至少在一段时期内会屈服于奴役:

只有一个外部条件能够抑制这股毁灭浪潮……如果自由和私有制湮灭,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经济机制势必无以为继。浪潮自会退去,而经济将倒退回原始形态。只有到那时人类才能再度呼吸在自由的空气里。⁹

这场战争的一个极具讽刺意味和令人悲哀的一面,就是德国的帝国主义精神反而把那些起初决心要打败这种精神的民族争取过来了。

帝国主义迫使所有不愿服从的人民拿起了武器。为了对抗帝国主义,热爱和平的一方必须不择手段。如果他们在这场斗争中获胜,或许他们确实粉碎了敌人,可是他们自己也被敌人采用的手段和思考方式征服了。他们再也不会止戈息战,因为他们自己也成了帝国主义者。¹⁰

国际联盟是伍德罗·威尔逊的智慧结晶,创立目的是维持战后由盎格鲁-撒克逊和法兰西民族主导的世界格局,正如一百年前的神圣同盟是为了维持后拿破仑时代新的力量平衡那样。在国联里,帝国主义的“1914年思想成功战胜了1789年思想”。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斗争的这个讽刺结局虽然是德国人的悲剧,不过“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它并没有决定性意义”。

305

要点仍然在于,这些民族正在受到“惩罚”,而没收理论再度兴起。如果我们承认民族自决原则可把弱勢的“邪恶”民族排除在外,我们也就推翻了民族自由联合的第一原则。¹¹

不仅如此,为了确保民主世界的安全,国联追求一种盲目一刀切的做法,而忽略了以下这个困难的事实:在民族杂居地区,民主政府不仅不会带来民族解放,反而导致民族迫害:

凡尔赛的国际联盟接受[民族]原则……只是为欧洲民族考虑。他们没有想到,在那些不同民族混合杂居的地方,这样的做法只会激化各族之间的冲突。更加严重的是,国际联盟没有认可迁徙自由,美国和澳大利亚仍然有权把不受欢迎的移民拦在国门之外。像这样一种国际联盟,只有当它能够压制反对力量时,才能继续存在;它的权威和贯彻原则的能力以武力为基础,弱势一方或会屈服于武力,却绝不会承认国联做法正当。德国人、意大利人、捷克人、日本人、中国人等其他民族绝不会视国联为正义,绝不会承认北美、澳大利亚,还有东印度地区无可估量的土地和财富应该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所独占,绝不会承认法国有权圈起数百万平方公里最富饶的土地,当作自己的私家花园。¹²

306

德意志民族的确遭到不公正的对待,但是米塞斯预见性地警告说:“如果德国未来的政策被复仇思想主导,那将是德意志民族和全人类最大的不幸。”他建议德国人永久放弃帝国主义,转而寻求民族自治并与其他所有民族和睦相处。这不是一个道德要求,而是一个最符合德国人利益的政策方针:

为遭遇不公而反击,为受到惩罚而复仇,这样的确能满足低级的本能。但在政治上,复仇者对自己造成的伤害不亚于对敌人造成的伤害。世界劳动者

的联合体建立在参与各方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只要他还希望维持和扩大这个联合体,他就必须首先放弃所有的怨恨。以牺牲自己的福祉为代价来熄灭自己的复仇怒火,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¹³

功效主义的社会分析

307 在一个以国际劳动分工为基础的高度发达的文明世界,发动战争或寻求建立一个帝国不符合任何民族的利益。培养对压迫者的怨恨情绪乃至寻求今后的复仇,都不符合德国的利益。而战胜的西方同盟国自身走上帝国主义路线的做法,损害的恰是自己的利益。米塞斯相信这样纯粹的功效主义考量远比任何道德诉求更为有力,更能使强权者不滥用自己的力量而选择和平道路。

我们绝不能把米塞斯基于理性主义的功效主义和杰里米·边沁的功效主义等同起来。边沁是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的英国哲学家,他对政治功效主义做出了最好的诠释,声称政治的目的应为促进最大多数公民的最大幸福(一种规范陈述)。虽然米塞斯的确受到了边沁著作的启发,不过他的首要兴趣并不在于为功效主义在政治中的应用正名。¹⁴

308 马克斯·韦伯的著作使米塞斯意识到,必须在科学分析中舍弃规范问题。科学处理的是现实世界,而非理想世界。因而,米塞斯的兴趣不在于功效主义是否应该指导政治,而在于它在政治上的应用:一个政策能否实现其预期目的?在他看来,这是那种能够客观回答的问题。任何其他方法都有纠缠到规范问题上的风险。因此功效主义对社会科学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打着功效主义旗帜的现成政治纲领,而在于它为社会问题提供了一种实事求是的客观判断方法。米塞斯所理解的功效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视角。¹⁵这个视角就是关于理性是否合宜的分析,它的范畴是手段和目的。

308 这些问题在经济思想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约翰·洛克在对货币减色(通货膨胀)的分析中,已经强调了关键在于这种政策“能否实现它所预期的那些目的”,¹⁶继而表明事实并非如此。类似的,亚当·斯密也强调过,垄断殖民地贸易的做法降低了所有国家的国民收入,即使那些本应受惠于垄断的国家也不例外。¹⁷在对那个时代的干预主义贸易政策做了全面分析后,他得出结论:

这样看来,凡是一种学说,如要对于特定产业予以异常奖励,违反自然所趋,以社会上大部分的资本拉入这种产业;又或要对于特定产业加以异常

制限,违反自然所趋,强迫一部分原来要投入在这产业上的资本撤离这种产业,那实际上都足以颠倒他所要促进的大目的。那只能妨碍社会富强之进步,不能加速它前进的脚步;只能减少而不能增加土地劳动年产物的真实价值。¹⁸

后世的经济学家也以同样的方法进行政策分析,直到卡尔·门格的时代。在米塞斯看来,门格尔也是一位功效主义者。他在《对于社会科学,具体而言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探究》和另外几本著作中,主张经济科学处理的就是经济法则,而这些法则考虑的是为实现一个给定目的可采取的最佳手段。¹⁹门格尔非常欣慰地注意到他的同事海因里希·迪策尔在《对于社会科学,具体而言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探究》一书问世时发表了两篇持同样观点的论文。²⁰迪策尔主张经济学家无须假设人类行为由原初的“经济”动机所推动。经济科学不是在探求动机,而在于发现实现一个给定目标的最佳手段。简言之,迪策尔眼中的经济科学近似于社会技术,他也最终提议把这门科学重新命名为“社会—经济学”(socio-economics)。²¹

309

门格尔和迪策尔的著作影响了那些被排斥在德国历史学派圈子以外的年轻的德语经济学家,尤其是路德维希·波勒。波勒批评了讲坛社会主义者,认为善意能够促成良策的想法不切实际。他强调,有必要去分析一项拟议中的政策能否产生其倡议者所料想的有益后果。²²

310

因而,门格尔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站在功效主义立场的米塞斯则延续了这种传统。在《民族、国家与经济》和以后的许多著作中,他向世人表明,合宜分析对于理性评价所有重大政治议题都是极其有用的。实际上,只有功效主义方法才为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之间的理性比较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共同平台。米塞斯反复论证说这些政治体制只是为了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之共同目标而采取的不同手段。²³因此,唯有功效主义的社会分析方法才有可能在这些不同手段之间进行理性选择:

或许社会主义的确代表了一种更好的劳动组织形式。让那些下这个断言的人们来理性地证明它吧。如果证据充分,那么我们这个团结在自由主义旗帜下的世界必将毫不犹豫地投向共产主义。在一个民主国家,谁会反对一项肯定会为绝大多数人民带来最多福祉的改革呢?政治上的理性主义并没有在原则上拒绝社会主义。²⁴

德国社会主义在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的错误

311 基于理性主义—功效主义方法,《民族、国家与经济》分析了三种形式的德国帝国主义:(1)过去追求民族荣耀的德国帝国主义;(2)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加速了全盘社会主义进程的中央经济计划(战争社会主义);(3)在社会民主党人的工团主义(syndicalism)和无产阶级专政旗帜下绚丽绽放的帝国主义。

虽然米塞斯没有直接定义帝国主义,但他的意思非常明确,帝国主义就是反对“自决、自主、自治”的主义。²⁵“1789年思想”的精髓是自由民主,它要求“最坚决和最彻底地实行”那种“人民和商品的全面自由流动,以及私有产权和个人自由获得全面保护”的原则,并“解除国家对学校体系的所有强制措施”。²⁶

312 米塞斯解释说,战争社会主义不仅未能支持德国的战事,还是导致轴心国惨败的五个灾难性失误之一。²⁷对于战争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来说,德国经济在战争爆发后面临的紧急状态,或者德国如今面临的艰巨任务,都构成了他们在各个经济层面实施强制的中央计划的充分理由。但是,这样的理由却建立在一个逻辑谬误上。米塞斯承认,的确存在一个紧急状态,制造业的结构也必须尽快从平时时期调整到战时环境。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就应该接管经济。正确的问题是为了实现必要的调整,中央计划是否比自由市场更为合适。米塞斯进而证明事实并非如此。²⁸

米塞斯也揭示了战争社会主义表面的繁荣是一种危险的幻象,这种繁荣来自同时伴随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篡改了企业家的经济计算结果。增加的账面收入改变了他们的盈亏核算,他们相信自己在盈利,而实际上却正在消耗自己的资本。类似地,他戳穿了那个广为人知的神话,即认为通过政府国债拉动的战争经济是一种让后代人为我们这代人的战争埋单的方法。他说,这种观点是“彻头彻尾的错误”:

战争只能依赖当前物资进行。我们只能用手边现有的武器作战,我们只能用手边现有的财富支援战争。从经济角度来看,是我们这一代人在发动战争,战争的所有物质代价也只能由我们这一代人承担。²⁹

313 对经济本质的普遍误解和战时中央经济计划造成的后果,对于加速全盘社会主义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那些社会主义者也在谴责战时经济体制,部分是由于他们不喜欢大众把社会主义与战争联系起来的想法,也有部分是由于他们本身思

维上的混乱。米塞斯反驳说：

社会主义意味着生产资料从私人所有转变为社会所有。这就是社会主义，其余的一切都是次要的。我们遇到的问题，比如，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由谁来掌权，是世袭皇帝、凯撒，还是全民的民主组织形式等等，都是完全无关紧要的。³⁰

在《民族、国家与经济》第三章，米塞斯解释说，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困惑，根源在于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主义党派在实践中把三个不同元素拼在了一起：马克思的中央集权社会主义、工团主义（激进的工会主义），以及民主制度。

社会主义者为民主而斗争，是因为卡尔·马克思的理论预言社会主义将是无产阶级的多数统治。³¹他们事业的民主部分是德国自由主义者已经放弃了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延续。这为他们赢得了普遍的同情，甚至在资产阶级中也不乏支持者。但是，多数原则并非社会主义的核心教义。社会主义唯一的实质成分是对全部生产资料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中央控制。应该接受理性审视的正是这一准则。强制的中央控制生产究竟是否比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更有效率？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我们将不得不舍弃社会主义。³²所有其他考量都是次要的。例如，米塞斯提到，在1919年时，没有必要非等无产阶级在德国和奥地利形成多数（再实行全盘社会主义），因为民众主体已经是社会主义者了。但是，如果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的设想是不正确的，那么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够维持社会主义秩序。

314

无产阶级专政要用恐怖手段把反对派扼杀在萌芽状态。他们相信一旦剥夺了资产阶级的财产，除掉了所有公开批评的可能，社会主义必将万年永续。毋庸置疑，这种专政的方式可以实现很多事情，首先，欧洲的所有文明都将毁在它的铁蹄之下；只是，他们也不可能因此而建立起一个用社会主义秩序维持的社会。如果共产主义社会秩序在带给“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方面不如生产资料私有制有效，那么即便恐怖手段也无法消灭自由主义思想。³³

米塞斯指出，社会主义极端依赖以下信念，即一旦实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社会成员就会按照与先前生活中完全不一样的动机行事。人们不会再追求自己的私利，而只全心全意为集体服务。如果有人对这种社会主义新人（New Socialist Man）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如果他在寻求一种体制，能够协调真实世界人类的个人利益与

315

更大的社会利益,那么自由主义已经找到了——私有制。³⁴

在实际的政治事务中,社会主义者早已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成了工会的政治部,而马克思当年很鄙夷地称工会为“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赞成选民讲究务实的行事方式,只在演讲中才会宣扬马克思主义思想。不过,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的角度来看,工团主义的方案都要比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更糟糕,因为它摧毁了劳动分工与合作精神:

工团主义有意把工人的生产者利益放在首位。它使工人群众成了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未必这么主张,不过大体如此),但却没有废除私有制,而且也无法保证平等。它确实消灭了现有分配上的不平等,却也引入了一个新的不平等,因为投资于私人企业或制造领域的资本价值与这些企业或行业雇用的工人总数根本就不相称。制造企业或部门雇用的工友越少,投入其中的物质生产资料的价值越高,则每一位工人的收入就越多。工团化的国家不会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一个工人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工团将成为资本的主人。工团主义会让所有的生产改良成为不可能;它没有给经济进步留下一点空间。它是适合农民和手工业时代的思想,在那个时代经济关系是相对停滞的。³⁵

316

因此,工会主义只会带来彻底毁灭。它把小范围有组织地劫掠提升为一个普遍原则。米塞斯批评的焦点不在于它的道德缺陷,而在于它无力维持现代文明特有的大规模劳动分工。工会主义绝对不适宜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语言社群的政治经济学

米塞斯对帝国主义政策的批评,如果只是针对社会主义、工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战争经济,尚有许多传统观点可以引证。但他面临的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任务,即要驳斥那种认为帝国主义有助于增进民族福祉的观点。他的全新分析,精彩地验证了卡尔·门格尔关于个人主义方法论甚至能够用于宏观集体现象分析的洞见。

《民族、国家与经济》第一篇的主要论题是政府没有能力改善治下民族的生存环境。原因是民族的兴衰成败都受自然法则的支配。政府的力量可以影响但却无法消除那些法则的运作,而且任何干预最后都将损害民族的利益。米塞斯首先分析了自由社会的民族状况,继而考察政府力量对民族演变的影响,通过这些分析论证了他的观点。他在政策建议部分呼吁国家的去民族化,或者更准确地说,呼吁政

317

府尽量避免干预治下语言社群的生活。

米塞斯追随舍雷尔(Scherer)、格林(Grimm)和奥托·鲍尔的做法,把民族定义为语言社群(language communities)。他强调说,就民主政权而言,这一定义不只是一种传统习惯,因为在民主制度下,沟通(因而,语言)是最基本的政治手段。因此,语言社群有着极为关键的政治地位。³⁶⁻³⁷那么,决定语言社群兴衰的自然法则又是什么呢?米塞斯考察了影响民族演变的种种客观因素,³⁸但他的关键考量开始于这样一个事实:语言社群的成员身份并非永久固定,而是可以转变的,所有个体都能自行决定离开他先前的民族而加入另一个民族。米塞斯强调,在自由社会里,民族将会成为一种纯粹的自愿联合。

不应违背任何一个民族或民族之一部分的意愿,强行把他们纳入某个他们不愿加入的政治联合。那些怀着自由思想、有意建立一个国家的民族全体,本身就表现为一个政治上的民族;祖国、父国就是他们居住的故乡的名称,爱国成为自由思想的同义词。³⁹ 318

自由主义不知道什么是征服或吞并,就像它对国家本身抱着无所谓的态度那样,所以国家的疆域问题对它一点都不重要。它不会强迫任何人违反自己的意愿融入国家体制。任何希望移民海外的人都不会受到阻碍。当国家的一部分人民希望退出联盟,自由主义不会阻止他们。殖民地若要独立,就让他们独立吧。民族作为一个有机的实体,不会随着国家的改变而壮大或缩小;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也不会从国家的兴起和没落中得到或失去什么。⁴⁰

那么,决定一个语言社群中个体成员身份的是什么呢?米塞斯忽略了家族、历史、文化和个人的政治环境等客观因素,而把重点放在了自觉自愿的同化上。他断言说,出于现实原因,说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的社群,在与说多数民族语言的社群进行贸易和其他形式的社会交往过程中,会趋向于被多数民族同化。因此,若不考虑其他条件,一个地区的少数民族有消失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的趋势。米塞斯强调,同化过程取决于个体成员的阶级地位,因为阶级地位决定社会联系。只要习俗和法律严格控制此类空间流动和社会流动,少数民族就能继续维持独立。而当古典自由主义废除了这些陈规旧俗,情况就发生了急剧变化。结果出现了惊人的人口迁移——物质的和社会的,打乱了各民族间的既有平衡。米塞斯特别关注空间流动能力提高产生的影响,因为19世纪末期,人口的空间流动已经达到了一个无比庞大的规模。这些迁移时常造就了混合文化的地域环境,威胁到地区原先语言社群

的存续,使它们在同化过程中渐渐消亡,也因而激化了政治上的对抗和冲突。⁴¹

米塞斯不相信有办法可以阻止人口流动,因为人口流动符合移民的个人利益。⁴²那么,有什么方法能够缓和人口迁移必然导致的民族矛盾?米塞斯主张,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是减少国家在社会中的作用,因为民族之间的政治冲突基本上都发生在争夺国家机器上:

当然,多语地区民族之间争夺政权的斗争不可能彻底消失。但随着国家职能受到限制,个人自由得到扩大,斗争将不再如此尖锐。任何希望民族之间和平相处的人,都应反抗国家主义。⁴³

320

通往永久和平的道路并非加强国家和中央的权力,如同社会主义为之奋斗的那样。国家对个人生活的干涉越多,在政治上对个人越重要,民族杂居地区引发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自由主义试图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权力,这将极大地缓和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不同民族之间的对抗情绪。唯一真正的民族自治就是个人享有自由,不受国家和社会的束缚。经济和生活的“国家化”(statification),必然导致民族斗争。⁴⁴

321

在此,米塞斯为解决民族冲突问题提供了一个与当时的流行模式截然相反的选择。奥地利是多民族国家,有着处理民族斗争问题的丰富经验,因此在分析和解决这类问题方面,它的思想、政治和制度的历史都要比其他国家更为悠久。⁴⁵例如,一直延续到1848年的奥地利特兰西瓦尼亚大公国宪法(Siebenbürgen)为撒克逊人(日耳曼人)、匈牙利人、塞克勒人分别提供了各自的议会和行政部门,而涉及各民族共同利益的事务则由一个共同的议会负责,用拉丁语讨论。丑陋的一面是,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主体民族罗马尼亚人没有获得代表权,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因素,这样的安排可谓完美。⁴⁶1848年革命期间,有人曾提出过一个有望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案。1849年3月4日,立宪大会的议员们(当时已经转移到了克莱姆西尔[Kremsier])对克莱姆西尔宪法提案进行了表决,那部宪法议案的要点就是废除组成帝国(“王国和领地”)的旧有领土单位(territorial units),而由行政县(administrative counties)取而代之,行政县的边界根据当地居民的民族成分划定。日耳曼民族主义者当天就作出回应,通过施瓦岑贝格亲王(Prince Schwarzenberg)提交了一份反议案。从此以后,不同语言具有法律上的平等地位的原则就一直处于防守地位,并最终落败。⁴⁷

革命的失败虽然阻止了克莱姆西尔宪法的实施,却阻止不了思想的延续,尤其

是在社会民主党的各项议程中。1899年布吕恩(Brünn)大会上,社会民主党人决议按照民族成分设立平行国家机关,试图以此解决民族冲突问题。他们相信,这个办法可确保每个民族的“民族自治”,从而一劳永逸地化解民族斗争。为了给奥地利树立一个榜样,他们改造了自己的党派,设立了平行民族机构。⁴⁸在随后的数年里,党的精神领袖卡尔·伦纳和年轻的奥托·鲍尔恢复、改进和推广了以新的民族县取代旧的领土单位的想法。⁴⁹然而历史还是证明,民族主义热情过于强大,即使社会主义的团结精神也无法将它驯服。1907年实行普选制后,社会民主党就迅速分化成数个民族组织,完全失去了对奥地利政治的影响。

322

在米塞斯理论的帮助下,事后看来,我们可以界定这些失败的根源。在米塞斯之前,所有人都试图通过政府解决民族争端问题。没有人认识到(或承认),国家的必要条件(*sine qua non*)——强制联合,恰是民族冲突的根源。仅仅改变政府的具体举措,当然不可能解决由于政府的本质造成的冲突。

但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距离保持多远才最合适呢?政府应该“放任”社会到什么地步呢?米塞斯论证说,技术—行政(technical-administrative)性质的问题是唯一的界限:

国家疆域的大小……无关紧要。至于人口过少导致国家无法独立生存,则是另一个问题。目前需要注意的是,许多国家事务在小国比在大国负担更重。比如,欧洲仍然存在许多“袖珍国”,诸如列支敦士登、安道尔、摩纳哥等。我们看到,这些国家只有在邻国的帮助下才能建起自己的各级法院组织。大国能为它的公民提供完备的法院系统,但是显然,对于这些微型国家而言,组建这样的法院系统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比如它们就没有财力建立上诉法庭。⁵⁰

因此,米塞斯支持社会的彻底自由化。这一进程在政治上不应有任何限制。实践中,唯一的限制就是琐碎的技术因素。换句话说,米塞斯欢迎各国领土自由竞争。在一个自由的“国际”社会里,这将是基于语言的各种文化之间的和平竞争,个人自愿的同化选择将决定形形色色的语言社群的命运。米塞斯感到,面对这一文化竞争的现实,唯一有尊严的态度就是民族自信心:

323

一个民族,如果相信自身及其未来,如果强烈地感受到其成员之间不仅通过偶然的血统出身相连,更由共同的文化纽带所维系,并且每位成员珍视这一

共同文化甚于一切,那么,当某些个体投入其他民族,他一定可以泰然处之。一个民族如果了解自己的价值,必会克制自己,不会强行束缚那些希望迁至别处的人,不会违反他人的自由意志,强迫那些志趣不同的人融入她的民族社群。这是为了让本民族文化的吸引力在与其他民族的自由竞争中证明自己——仅此一点就值得一个民族引以为豪,仅此一点就是真正的民族和文化政策。完全没有必要运用权力手段和政治统治实现这个目的。⁵¹

米塞斯论证说,政治权力不但没有必要,也没能力改善一个民族的处境。在一个自由社会里,人们经常会迁移到那些生产条件更优越的地区。所有人都有从相对贫穷的地方迁移到相对富饶的地方的动机。人口流动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所有地区的工资水平和利息水平相当为止。⁵²因而在一个自由化的世界,消除收入差距是自然趋势。最终全世界将不复有贫穷或富裕的地区之分,只有人口密集和人口稀疏之别。

324

米塞斯指出,政府的干预改变不了人们从相对贫穷的地区迁往相对富裕地区的动机。相反,如果政府试图用保护关税体系把人们留在这片土地上,只会使问题恶化。保护关税或许阻止了那些受到国外竞争影响最大的人们的移民企图,却降低了全社会其他成员的人均收入,因而增加了其他人的移民动机。不带偏见的合宜分析再次得出了反对政府干预的结论。米塞斯总结说,要在政治上解决民族主义问题,唯一的理性方法就是遵循古典自由主义箴言:减小政府规模、开放边界,坦然面对国际移民带来的文化竞争。



1926年,米塞斯45岁

注 释

1. 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Beiträge zur Politik und Geschichte der Zeit* (Vienna & Leipzig: Manzschke Verlags- und Universitäts-Buchhandlung, 1919); translated by Leland B.

Yeager as *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3).

2. 此书打动的第一位读者就是打印书稿的商会年轻秘书:特蕾泽·蒂贝格尔(Therese Thieberger)。她一直担任米塞斯的助手,直到1934年米塞斯离开维也纳前往日内瓦。此后他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朋友关系。参见蒂贝格尔致米塞斯,1971年12月5日;Grove City Archive; Thieberger file。

3. 鲁道夫·西格哈特(Rudolf Sieghart)非常强调这点:

1919年的和平敕令把奥匈帝国从地图上抹去,在未来的世界历史上,这个帝国很可能化为烟云。经历了种种斗争和苦难,最后却只留下一些历史名词,正如迦太基那样。但是,它的大多数继承国并未解决帝国曾经花费了如此痛苦的努力试图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世界各地蔓延开来,只要仍有少数族裔继续为了他们文化的存续而斗争,这些问题还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萦绕在人们心头。(Rudolf Sieghart, *Die letzten Jahrzehnte einer Grossmacht* [Berlin: Ullstein, 1932], p. 361)

4. 米塞斯承认诸如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这样的伟大思想是不依赖于语言的。但他指出(*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pp. 38, 41, 87),这些一般观念的具体应用受到语言和基于语言的文化的限制。

5. 意味深长的是,立宪会议(*konstituierender Reichstag*)率先讨论同时也是讨论最为激烈的问题,就是1848年7月22日开幕大会的会议语言的选择。参见Isabel Röskau-Rydel, "Galizien, Bukow-ina, Moldau," in idem, *Deutsche Geschichte im Osten Europas: Galizien, Bukow-ina, Moldau* (Berlin: Siedler, 1999), p. 96。

6. 参见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p. 1。

7. 参见ibid., pp. 45, 63f., 74, 90, 107n。

8. Mises, *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p. 216。

9. 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p. 178; *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p. 217。

10. 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p. 180; *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p. 219。米塞斯在这里表达的观点与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在他著名文章《论西班牙对合众国的征服》("The Conqu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Spain", *Yale Law Journal*, January 1899)中的观点如出一辙。萨姆纳在文中论证说,尽管民主的美国在1898年战争中战胜了帝国主义的西班牙,但西班牙的精神却征服了美国。

11. 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p. 181; *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p. 220。

12. 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p. 74; *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p. 91。

13. 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p. 181; *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p. 220。

14. 后来他批评了边沁政治思想的关键缺陷,边沁颂扬民主的多数裁定原则,认为它是自由的根基。参见Mises, *Theory and Histor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67f。

15. 参见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p. 174; *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p. 211。

16. John Locke, "Some Considerations of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Lowering of Interest and Raising the Value of Money," Patrick Hyde Kelly, ed., *Locke on Mone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vol. 1, p. 304.

17. 参见 Adam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94), bk. 4, chap. 7, pt. 3, p. 660 及其余各处。

18. Ibid., bk. 4, chap. 9, p. 745. 同时代其他经济学家也持同样的看法。比如, 艾蒂安·德·孔狄亚克指出几乎所有类型的经济干预主义其实都是“反贸易”的。参见 Condillac, *Commerce and Government* (Cheltenham, U. K.: Edward Elgar, 1997), 第二部分。

19. 参见 Carl Menger,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Methode der Socialwissenschaften und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insbesondere*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883), in particular appendix 6, pp. 262ff.; reprinted in Carl Menger, *Gesammelte Werke*, F. A. Hayek, ed., 2nd ed. (Tübingen: Mohr, 1969), vol. 2; idem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Zeitschrift für das Privat- und öffentliche Recht der Gegenwart* 14 (1887); idem, “Grundzüge einer Klassifikation der Wirtschaftswissenschaften,”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n. s. 19 (1889)。后两篇论文曾重印于 Menger, *Gesammelte Werke*, vol. 3。

20. 参见 Heinrich Dietzel, “Der Ausgangspunkt der Socialwirthschaftslehre und ihr Grundbegriff,”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39 (1883): 1 – 80; idem, “Beiträge zur Methodik der Wirtschaftswissenschaften,”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43 (1884): 17 – 44, 193 – 259。

21. 参见 Heinrich Dietzel, *Theoretische Socialökonomik*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895); idem, “Selbstinteresse und Methodenstreit in der Wirtschaftstheorie,”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3rd ed. (Jena: Gustav Fischer, 1911), vol. 7, pp. 685 – 97。

22. 参见 Ludwig Pohle, *Die gegenwärtige Krisis in der deutschen Volkswirtschaftslehre* (Leipzig: Deichert, 1911), pp. 13f。

23. 参见 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pp. 141 n., 148f., 150, 182。

24. 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p. 182; *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p. 221。

25. 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p. 37; *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p. 46。

26. 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p. 79; *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p. 96. 相比之下, 多数裁定原则在他眼里只是一种手段而非民主制度的组成部分; 参见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p. 36。

27. 其他还有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错误。军事错误是: (1) 预期战争是短期的; (2) 预期不间断的攻击带来军事奇迹。政治错误是: (1) 未预见到会被四面围攻; (2) 在德国政治上优先考虑东普鲁士地区容克贵族的利益。参见 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pp. 111ff。

28. 米塞斯的战时财政观点影响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轻自由市场经济学家, 比如斯特凡·波斯尼 (Stefan Possony) (*Die Wehrwirtschaft des totalen Krieges* [Vienna: Gerold, 1938]) 和格奥尔格·霍尔茨鲍尔 (*Barzahlung und Zahlungsmittelversorgung in militärisch besetzten Gebieten* [Jena: Gustav Fischer, 1939]), 还影响了干预主义者如阿道夫·兰佩 (Adolf Lampe) (*Allgemeine Wehrwirtschaft* [Jena: Gustav Fischer, 1938])。虽然兰佩偏向“市场游戏”的思想, 他还是建议企业活动应该得到中央指导。

29. 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p. 137; *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p. 168. 他进而解释,发行债券(而非征税或通货膨胀)的战时财政手段仅仅调整了未来的资源分配。

30. 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p. 140; *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p. 172.

31. 米塞斯评论说,德国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坚持民主道路,只因为他们在 1914 年之前总是处于反对党地位,不需要对东部地区的民族同胞承担任何责任。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社会主义者在德国和奥地利上台,他们就渐渐改变了想法。他们原本会走上与德国自由主义者同样的道路,只是随着东部省份的脱离,民族杂居问题也随之消弭。参见 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pp. 105f.

32. 参见 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p. 152f.; *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p. 185f.

33. 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p. 169; *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p. 206.

34. 参见 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pp. 157ff. 在后来的著作里,基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的论证,他向我们表明,问题恰恰在于根本没有办法界定什么才叫符合集体利益。

35. 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pp. 163f.; *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p. 199.

36. 参见 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pp. 9f. 他说,一个民族的特定语言产生了特定的“政治结构”,特别是决定政府运作的特定的思想基础(*Staatsgedanken*);参见 *ibid.*, pp. 12, 38, 41, 87。

37. 米塞斯并不认为在现代政治中,语言社群是唯一的或最重要的因素。他推断种族社群更为重要。问题是有关种族和种族关系的社会学还没有充分发展出有理有据的科学陈述。不管怎样,他承认,“对白种人不使用暴力”已经成为“现代政治世界法则中的一项原则”,也就是说,欧洲对殖民地的黑人族群使用暴力是合法的,而对白人族群使用暴力是不合法的。德国帝国主义侵犯了这项原则,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参见 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pp. 62, 64f.; *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pp. 76, 79f.

38. 例如,他考察了书面语言的作用,指出它在方言之间的竞争中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最先拥有文字的方言就成了标准语。参见 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pp. 17ff.

39. 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p. 27; *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p. 34.

40. 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pp. 31f.; *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pp. 39f.

41. 参见 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p. 48。

42. 他顺便提到了自己对移民经济学的贡献,因为他突出了相对人口过剩的重要性,这种相对过剩不同于人们熟知的绝对人口过剩。参见 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pp. 45ff. 之前他已提出了相对人口过剩的概念,参见“Vom Ziel der Handelspolitik,”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42, no. 2 (1916): 576。

43. 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p. 62; *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p. 77.

44. 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pp. 78f.; *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p. 96.

45. 至于奥地利的语言立法,参见 Alfred Fischel, ed., *Materialien zur Sprachenfrage* (Brünn: Irrgang, 1902); *idem*, ed., *Das österreichische Sprachenrecht*, 2nd ed. (Brünn: Irrgang, 1910); Sieghart, *Die letzten Jahrzehnte einer Grossmacht*, pp. 421ff.

46. 参见 Eduard Bernatzik, *Die Ausgestaltung des Nationalgefühls im 19. Jahrhundert* (Han-nover: Helwing, 1912), p. 30。

47. 参见 Sieghart, *Die letzten Jahrzehnte einer Grossmacht*, p. 323; Röska-Rydel, “Gali-zien, Bukowina, Moldau,” p. 97。

48. 此后,中央议会里的社会民主党派系就自称为“社会民主党议员同盟”,参见 Sieghart, *Die letzten Jahrzehnte einer Grossmacht*, pp. 351ff。

49. 参见 Otto Bauer, *Die Nationalitätenfrage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Vienna: Verlag der Wiener Volksbuchhandlung, 1907); translated as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ities and Social Democrac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卡尔·伦纳以假名西诺迪克斯(Synoptikus)和鲁道夫·施普林格(Rudolf Springer)发表了他对民族问题的看法。参见 Synoptikus, *Staat und Nation* (Vienna: Dietl, 1899); Rudolf Springer, *Die Krise des Dualismus und das Ende der Déakistischen Episode in der Geschichte der Habsburgschen Monarchie: eine politische Skizze* (Vienna: published by the author, 1904); idem, *Grundlagen und Entwicklungsziele der Öster-reichisch-Ungarischen Monarchie* (Leipzig: Deuticke, 1906)。一战结束后,他用真名发表了:*Das Selbstbestimmungsrecht der Nationen: in besonderer Anwendung auf Oes-terreich* (Leipzig: Deuticke, 1918)。

50. 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pp. 66f.; *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p. 82.

51. 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p. 61; *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p. 76.

52. 此处,米塞斯补充了李嘉图关于自由贸易的分析,李嘉图的分析是建立在资本和劳动力仅在国内自由流动的假设上的。参见 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pp. 51ff。

战争似乎永远不会停止，可是突然就结束了。保加利亚于1918年底投降，同盟国的巴尔干前线旋即崩溃。这次，战场形势十分明显，同盟国再也无法从别的地方抽调足够的兵力堵住东南战线的缺口。同盟国输掉了这场战争。

面临战败的局面，战前帝国内部的民族矛盾再次抬头，而且来势更为凶猛。如今连捷克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匈牙利人，还有塞尔维亚人都在寻求政治独立。¹10月4日，年轻的皇帝向威尔逊总统提交了和平建议，竭力企图挽救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旧秩序。十二天后，卡尔最后一次绝望地试图与国内群起反抗的各民族达成和解，他放弃了自己王朝的传统政策，试着充当起反对派的开路先锋。卡尔下达了一份诏书，宣布以联邦政府的形式重建奥地利—匈牙利，而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地区将享有自治权。²他的努力悲惨地失败了。事实上，这份诏书仅仅加剧了危机——它被广泛解释为宣告了帝国的解体和各民族脱离的合法性。鲁道夫·西格哈特后来陈述说：“世界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一个帝国以这种方式有组织地解体的先例。”同样也是这位作者，在奥地利议会上的最后演讲中，总结了这份诏书颇具讽刺意味的本质：“甚至在奥地利各民族舍弃母国之前，母国就舍弃了他们。”³

326

卡尔的诏书颁布两天后，协约国回复说，仅仅给予哈布斯堡王朝各领地自治权是不够的，皇帝必须赐予分裂主义者和君主国的敌人以全部的权利。10月21日，革命在维也纳街头爆发，随后几周席卷了匈牙利、巴伐利亚，还有柏林。匈牙利领袖米夏埃尔·卡罗伊（Michael Karolyi）从前线撤回匈牙利军队，南线战场旋即崩溃，屡战屡败的意大利因而获得了战场上最后一刻的胜利。⁴当鲁登道夫（Ludendorff）的军队于1918年11月11日投降时，德国也不再是一个君主制国家了，同样面临着急速的政治瓦解局面。它的南线盟友的命运则更悲惨：奥匈帝国被彻底从政治地图上抹去了。

从前土地广袤、人口繁盛、民族众多的哈布斯堡王朝，如今剩下了什么呢？民族分离截掉了古老帝国的绝大部分，甚至很难为这剩下的一小片土地选定一个国

327 名。残余的国土拥有 630 万人口,日耳曼民族占绝对优势。显然不可能再称它为奥匈帝国——匈牙利已自立门户。也不可能称为奥地利,因为这个名词在历史上从来不涉及国界,而只用于表示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疆域: *Österreich*——东方帝国。于是,残余的国民自发地把他们的国家命名为 *Deutschösterreich* (German-Austria, 德意志奥地利)。这个国名显露了他们内心的不安与缺乏身份认同。

皇帝的诏书曾经提议帝国内各民族建立各自的“民族议会”。帝国议会的日耳曼议员立即接受了这个想法,于 10 月 21 日在维也纳正式集会,宣布他们的会议是“德意志 - 奥地利临时民族大会”。10 月 30 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临时会议议员自称拥有德意志 - 奥地利国的最高领导权。虽然他们尚未决定新国家的形式(卡尔皇帝还没有正式逊位),仍然任命了一个由社会民主党人、基督教社会党人、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组成的政府。领导权落入社会主义者卡尔·伦纳手中,他成了奥地利最黑暗时期的国家总理。

临时政府成立十二天后,皇帝正式退位并出走国外。社会党议员同时推动了两项议程,一是立即宣布新共和国成立,二是宣布与德意志帝国合并。当时德意志帝国的主导政治力量是社会主义。这个新国家的领导阶层,当务之急居然就是瓦解自己的国家。德国宣布投降一天后,新的德奥共和国在诞生之日就宣布要并入新的德意志共和国。那是 1918 年 11 月 12 日发生的事情。

新的战场

328 战前数年,社会民主党已在政治上失势。到了 1911 年,它已经分裂成形形色色的民族组织,在国民大会(*Reichstag*)的选举中也遭到了重大挫折。⁵但是,战争和最终的战败局面让政治当权派颜面扫地,而社会民主党人由于他们的“在野”身份俨然成了当时国内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只是尚未通过选举确立地位。他们在失去赫赫有名的党魁之时,也迎来了光荣之日。维克托·阿德勒于 11 月 11 日去世,而昔日在庞巴维克研讨班上作为一名学生与大师激辩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尔,一跃成了党内头号人物。不过,鲍尔尽管在党内有坚挺的支持,却还年轻、激进,缺乏民众认可。因此,政府的领导权也保留在较为温和的卡尔·伦纳手里,这番政治格局直到 1920 年 6 月才改变。

鲍尔麾下的激进派试图推动伦纳的政治改革,发动一场社会和经济革命。他们全力谋求奥地利经济的国有化和奥地利并入德意志帝国的方案——当时的德意志帝国已经牢牢掌握在社会民主党手中。当这些努力失败后(如下文所见,主要

归功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对鲍尔的个人影响),德意志奥地利的政治气候随即慢慢扭转。1919年2月的选举不仅产生了制宪大会,还表明社会民主党人远非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强大。伦纳被迫接纳基督教社会党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伊格纳茨·塞佩尔(Ignaz Seipel)主教加入他的内阁。塞佩尔的党派将在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主导德意志奥地利的政坛。

选举之前那个戏剧性的冬季,没人能预见即将来临的变化。人们有更多眼前的事情需要担心。新奥地利共和国的经济形势甚至比德国还要糟糕。普通市民缺乏基本的生活物资,马铃薯、食糖和煤炭尤其匮乏。传统上,奥地利人从帝国其他地方购买这些物资——从北部的捷克邻居、东部的匈牙利和加里西亚平原。但如今这些地区都获得了政治独立,而它们的新领导人使国际贸易陷入停顿。战争失利,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且短期内没有缓和迹象。从纯粹的财政角度来看,德意志奥地利人是所有参战民族中最大的输家。⁶

1918年至1919年冬季,奥地利人大多对新政府满怀希望,民心尚能镇定。因为人们相信,一个由开明精英组成的政府最终一定会克服战后的政治和经济混乱。然而,新上台的精英却着手延续和贯彻先前帝国政府的种种政策,即当时的战争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与当时众多新领袖私交甚密的同时代观察者,米塞斯解释道:

战后,所有社会主义团体从一开始就不打算放弃任何战时采取的措施,而试图沿着一条全面社会主义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如果听到他们在公共场合发表与此相左的言论,那只是他们在安抚民众,消除民众对于快速社会主义化和针对个人不利措施的疑虑,遏制反对力量。不管怎样,他们已经找到了能让更多社会主义措施出台的口号,即所谓的过渡时期经济。⁷

国民议会在其成立的第一个年头,就致力于推动“社会立法”,通过投票把最新



奥托·鲍尔

施。受过教育的公众仰望奥地利政府,就仿佛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公众仰望米尔顿·弗里德曼、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和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主导的美国政府一般。权力和知识终于联合了——幸运的奥地利啊!可是,虽然拥有不可否认的个人魅力和经济学训练,社会主义者还是失败了。

* * *

新经济体系的基石就是奥匈中央银行的印刷机。税收远不足以支持政府各种各样的施舍,增税既在政治上不可行,也很可能无法带来足够的财政收入。政府也无法再发行更多的国债,因为市场上已经没有足够的克朗借给政府。政府的信用也一败涂地:没人会指望政府偿还战争期间欠下的堆积如山的债务。因此,新政府若要建立起一个全面福利国家,只剩下一条途径可走:开动印钞机。

1919 年是危机之年。政府利用通货膨胀支持社会主义,由于这种灾难性的政策,原先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在这一年严重恶化。正是这场危机将年轻的共和国推到崩溃边缘。而文明社会之所以延续,无政府幽灵之所以消退,完全仰赖一些伟大人物坚定不移地对抗种种困难,在文明国度里保存了自由和资本主义之花。

战后社会主义和无政府幽灵

331 大凡新成立的政府,正式职务并不总是反映真实的权柄。比如,奥托·鲍尔(时任外交部长)由于得到奥地利社会民主主义内部好战集团的支持,甚至比总理卡尔·伦纳更有权势。直到 1927 年,政府出乎意料地顺利平定了社会民主党发动的一场暴乱,才改变了这种政治格局。

332 外交部当时下设一个贸易政策部,负责准备即将来临的和平谈判中有关贸易的部分。这个部门延请了一些强烈倾向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外界顾问:许勒尔、米塞斯、索马里,以及施泰纳(Steiner)。⁸米塞斯与鲍尔、莱德雷尔和熊彼特既是同学,也是在军部的战争经济部的同事,彼此私交甚密,这自然也是他能在新政府里获得一席之地的决定性因素。另一个因素是鲍尔深知米塞斯对奥地利的忠诚。第三个原因则是为了笼络最有学问的反社会主义者——这也是当局由来已久的策略。但米塞斯的加入是一把“双刃剑”。假如战争没有爆发,假如帝国没有瓦解,那么政府和广大奥地利民众当然会注意到他在货币事务方面的见解,毕竟他已是享有盛名的货币和银行专家,也是商会在这些事务上的发言人。但如今他的观点则承载了政治上的分量。虽不能畅所欲言,但他的一言一行都会立即得到广泛的关注。

尽管如此,米塞斯对政府实际政策的影响却很有限。他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与外国商界、银行界及政府代表就战前和战时的金融债务进行冗长乏味的谈判。在政府内部,同僚们常向他征询意见,不过通常并不听从。⁹

以鲍尔为例,米塞斯的影响被证明是短暂的。米塞斯只影响过他的一次决定,却是一次影响深远和无比重要的决定:

完全由于我的努力,布尔什维克主义才没有在维也纳大行其道。只有寥寥无几的几个人支持我,而且他们的援手基本没有用处。我只身一人,单枪匹马地说服了鲍尔放弃与莫斯科结盟的想法。激进派的年轻人拒绝服从鲍尔的权威,热衷于单独行动,违背党派领导层的意愿。他们太幼稚无能,轻易就被成熟的对手挫败。他们甚至连组建一个半吊子共产主义政党都做不到。事态的发展牢牢掌握在老社会民主党领袖手里,而鲍尔拥有最终的话语权。¹⁰

1918年至1919年之交的冬季,米塞斯说服鲍尔终止了维也纳的布尔什维克化,在此之前,两人还惺惺相惜、互相敬重。米塞斯与西方和中欧的几乎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有私交,不过在他眼里,只有鲍尔“超过一般的庸人”。他承认鲍尔在哲学、古典经济学、历史和自然科学方面拥有渊博的知识,同时还是杰出的演说家,能够迅速投入最困难的问题——“他本可以成为政治家,如果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话”。问题在于,最终腐蚀了鲍尔的智慧、道德操守和个人诚信的,是他的所学所行都以一个先验的(*a priori*)马克思主义信念为基础。

333

奥托·鲍尔作为一位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到维也纳大学就读……(他)下定决心,绝不背叛马克思主义信念,绝不屈服于改良主义或修正主义,绝不成为另一位米勒兰(Millerand)¹¹或米凯尔(Miquel)¹²。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狂热,无人能出其右。后来他的妻子海伦妮·贡普洛维奇(Helene Gumplowicz)进一步坚定了他的决心,直到1918年至1919年冬季前,他一直是赤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在那个冬季成功说服这对夫妻:奥地利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试验注定会在短期内惨败,也许几天内就会失败。奥地利严重依赖于从国外进口粮食,而粮食进口唯有通过先前敌人的援助才有可能。在停战后的头九个月内,维也纳的粮食储备最多只能维持八到九天。西方列强连一根手指都不用动,就能轻易摆平维也纳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几乎没人认清当时的局势。人人坚信布尔什维克主义即将来临和势在必行,人人都想让自己

334

在新秩序里获得更高的地位。天主教会及其信徒们——即基督教社会党,已经准备好迎接布尔什维克到来,他们的心情之急迫,正如二十年后主教和大主教们热情欢迎纳粹主义一样。银行经理和工业巨头则希望以“管理者”的身份在布尔什维克世界里过上体面优越的生活……

我清楚国家存亡在此一举。布尔什维克主义会在短短几天内造成维也纳的饥荒和恐慌。成群结队的暴徒很快就会遍布维也纳的街头,随后的杀戮将摧毁维也纳残余的文化和文明。我就这些问题与鲍尔夫妇进行了许多次彻夜长谈,直到我最终成功说服他们为止。鲍尔的克制决定了维也纳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他继续写道:

(鲍尔)绝不会原谅我,因为我让他成了米勒兰。来自追随他的布尔什维克党徒的攻击对他的伤害尤其深刻。不管怎样,他没有把自己怒不可遏的憎恨转向反对者,而是向我发泄。他竭尽所能地摧毁我,煽动沙文主义教授和同学反对我。但他的企图失败了。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没和鲍尔说过半句话。¹³

3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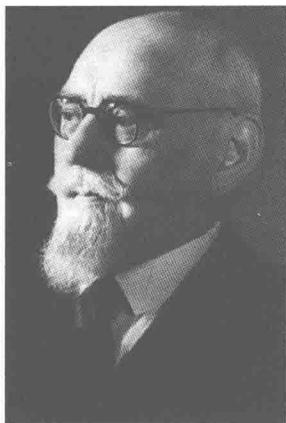
在这之后,鲍尔和他的伙伴调整了政策,试图间接实现他们热爱的共产主义社会。他们不是复制俄国的政治革命模式,而是寻求零敲碎打地实现共产主义。¹⁴他们的施政方略主要有三点:(1)部分征收私有财产;(2)以劳动力和消费品的人为“价格”体系取代自由市场定价;(3)消灭旧政权的一切残余。

在这条最后的战线上,维也纳社会主义者至少实现了一项持久的胜利。1919年4月3日,政府颁布了一条法令,禁止使用所有贵族和荣誉称号。庄严的贵族称号缩写“von”(冯)被禁止出现在出版物里。这条法律由卡尔·伦纳签发,同时还禁止使用表示尊敬的“Edler”(埃德勒),表示高贵的谓语“Erlaucht”(阁下)、“Durchlaucht”(殿下)和“Hoheit”(陛下),还有贵族阶级称号“Ritter”(骑士)、“Freiherr”(男爵)、“Graf”(伯爵)、“Fürst”(侯爵)和“Herzog”(公爵)等。在名片、书籍和其他印刷刊物方面,这个禁令一直延续到今日。不过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奥地利,人们在私人会晤和口语中依然沿用旧时称呼。在图书刊物和信件里,米塞斯的姓名变成了“路德维希·米塞斯”,在日常活动中,他仍被称为“冯·米塞斯教授”。

这一空前绝后的立法带来的主要好处就是激发了奥地利人的风趣才智。一位

有着高贵血统的绅士在他的名片上印上了“*geadelt von Karl dem Grossen, entadelt von Karl Renner*”——被卡尔大帝封爵,被卡尔·伦纳撤爵。

在征收私有财产方面,当时的政府政策并未留下长久影响,不过这项政策确实在生效的几个里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损害。执行这一破坏性政策的主要政府机构是一个新成立的由埃米尔·莱德雷尔领导的政府办公室,称为“国家社会化委员会”(Staatskommission für Sozialisierung)。办公室与德国的姐妹组织合作十分密切。德国人已经召集了一批专家学者,考察煤矿开采的社会化是否可行。¹⁵1919年2月15日,在与约瑟夫·熊彼特的合作下,这些专家公布了一份报告,认为社会化不仅可能,而且为避免简单的“国有化”(Verstaatlichung),还是必要的。他们完全没有解释两者的差别。¹⁶



卡尔·伦纳

委员会成了让政府蒙羞的典型,这个理应掀起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的政府,却根本不知道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委员会的成员明白,他们必须为委员会的存在找到理由。莱德雷尔在战后召开的社会政策协会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提出了成立委员会的设想,会议于1919年9月在雷根斯堡召开。他批评了俄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模式,嘲笑那只是一种“消费者的社会主义”(consumers' socialism)。德意志奥地利政府的伟大目标必须是彻底的社会主义经济转型。莱德雷尔就此讨论了两种策略,其一是将所有的私营企业都交由工人控制。莱德雷尔声称这种方法可能确立“经济上的民主”,因此是朝着建立整个社会的民主社会主义跨出的第一步。第二种策略是一次性征收一大笔资本税,用于偿还战争债务。¹⁷这种做法会让国家立即掌控工业资本。唯一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确保在“国有化”之后,实现一个真正的“社会化”。但是,这次他也没有解释两者的区别。¹⁸

摆上桌面的种种方案,唯一具体的建议似乎就是征收一次性资本税了,像熊彼特那样理性的学者也支持这种手段。米塞斯试图通过商会坚决反对这个方案。¹⁹他辩论说,强制征收资本税会迫使奥地利的企业家背上债务重担,迫使他们依赖金融资本家。米塞斯也评论说,在看似并无恶意的“一次性”措施背后,其实隐藏着社会主义者的长远政治目标。他指出,社会主义者们只谈利润共享,却不谈对企业实际结构的影响:

不管怎样,如果国家持有所有企业的股份,那么国家也会分担企业的亏

336

337

338

损；不仅如此，国家甚至还会被迫关心私人企业的经营管理，而这就是社会主义者想要的。²⁰

无论如何，社会主义政府最具破坏力的冲击，在于延长和维持了战时价格管制体系。战前的帝国政府已经着手以政府主导的劳动力和消费品“价格”体系取代自由市场定价。不管对错，这个措施的目的就是集中经济力量支援战争。社会主义者上台执政后，他们让这个体系覆盖的范围更加广泛，他们相信在他们的主导下，价格管制体系可以成为把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奥地利改造成无产阶级天堂的手段。因此在政府机构的管理下，奥地利的劳动力服务价格要高于国际价格，而农产品价格却低于国际价格。

339 社会主义者以邻为壑的做法为整个国家树立了榜样，这是维也纳执政者未曾预料的。各省不愿顺从维也纳式的社会主义，他们都有自己的本地方案。各省都在掠夺本地的富豪，而不愿意与维也纳坐地分赃。这些利益冲突是政府的社会主义议程的自然结果，在战时社会主义时期已经有所体现。²¹如今这些利益冲突全面爆发了，全国的乡镇都加速陷入经济福利主义。而维也纳却得不到任何资源，只有开动印钞机。于是，伴随快速的政治和经济崩溃而来的，就是克朗的急剧贬值。米塞斯致信莱德雷尔说：

当前的货币环境让人绝望，根源在于可怜的公共财政状态。只有农民还能缴纳一点税收，而他们也公开宣布说，不会再上缴任何东西了。另一方面，政府却认为有必要每月支出几百万克朗来供养不事生产的城市人口。²²

不同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分子，维也纳社会主义者不愿动用武力胁迫外省服从中央的命令。他们认为危机是制度性的，希望通过法律手段弥补。他们没能看到，真正的问题是维也纳和外省各自为政的经济政策引发的根本冲突。

340 1919年12月2日，米塞斯在奥地利经济学家协会（Association of Austrian Economists）作了一次演讲，他在演讲中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演讲主题是“从整体经济角度分析维也纳与各省的政治关系”。²³他论证说，维也纳唯有继续参与国际劳动分工才能繁荣发展。奥地利的农业绝不足以养活维也纳的工人，必须从国外进口粮食；而要进口粮食，必须以工业品的出口来交换，哪怕德奥合并也无法改变这种局面。当前的政策是开动印钞机为政府提供财政支持，这只是一种典型的短期工具。政府尚能维持，只因为它在消耗社会主义之前数十年里积累的资本。无节制

的印刷钞票注定会造成货币和经济的浩劫。

这些公开的评论并不能体现米塞斯的真正看法。毕竟他还是公众人物,以国家利益为重是法律上的义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卸下公职,才会大胆评论当时的公共政策。不过,通过一份1919年末他写给维也纳重要银行家和实业家们的机密备忘录,我们可以推断出他对奥地利时势的真正看法。²⁴

我们正在接近货币崩溃的边缘。我们当前的货币政策只有一种:印钱,印钱,再印钱,几乎没有改变的迹象。我们无从合理地要求社会民主党在一夜之间承认社会主义思想已经破碎,承认自己数十年来一直宣扬的教条被证明是错的。我们也无从期待基督教社会党,因为他们理想的世界是一个由自给自足的农夫和渴望“勉强维持生计”的小手工艺者组成的世界,一个停滞不前的经济体系。基督教社会党数十年来一直在大力推动职业资格证书和高昂的关税政策,与列支敦士登的君主联手拥护一个“没有工厂的奥地利”方案,并且和卢埃格尔及施莱辛格(Schlesinger)并肩为了“天父的金币”和“人民的货币”而奋斗。我们不可能指望这个党派一夜之间转而拥护自由贸易和个人自由。我们也无从指望经济和金融的挫折会让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得到任何经验教训,他们总是其他支持激进社会改革的党派的先锋。如今这些人正积极拥护扩大事业人员编制,而后者的工团主义精神已经掏空了我们的公共财政。这些人没有从外交政策中学到任何教训,唯独念念不忘在世界大战中遭遇的惨败。这是吾国的不幸,作为一个以工业品出口立国的国家,其民众居然对现代经济政策的精神茫然无知。我们的政策完全建立在帝国主义、重商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对于“民族”经济的狂热幻想上。²⁵

341

米塞斯指出,政府高层认为通货膨胀是次要的问题,与当前的政治问题没有直接关系。他们认为,政府能够通过控制物价抑制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在国内造成的影响,并且通胀的国际后果(汇率暴跌)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汇率不会对国家产生直接影响。正如米塞斯解释的,不管怎样,坐视克朗汇率暴跌是极为短视的行为。大部分工人阶级的食物都通过国外的走私途径获得——事实上,正是黑市维持了维也纳民众的生存。如果克朗汇率没有止跌的希望,走私商人最终会拒绝接受克朗纸币,后果就是立即导致城市平民的生活难以为继。米塞斯进而写道:

342

考虑到民众的认知水平,这种状况无疑会愈演愈烈,终至不可收拾的地

步。人们首先会劫掠零售商业,然后就是公共建筑、银行殿堂、私人宅地。政府仅剩的最后一点权威将荡然无存,武装暴徒会横行整个国家。各处都会出现暴乱,但首先会出现在工业中心周围,会让城市毁于一旦。因为今天的乡村早已武装起来,由装备精良和纪律严明的当地警察力量保护。

由于我们同时面临来自国外的巨大威胁,因此,国内的无政府状态会更加危险。大众的极端反应很容易伤害到外国侨民,从而给外国的军事入侵制造借口。诚然,协约国对我国情况不甚关心,他们当前军事上的虚弱也让他们无力入侵。但是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则不然,两国都拥有训练有素的强大军队。注重沙文主义荣耀的两国会热衷于夺取德意志奥地利,尤其是维也纳的一部分领土。捷克人不是凭借光荣的军事成就赢得独立,这让他们感到羞愧;在匈牙利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军队的战斗中,捷克军队胆小地从战场逃离,更被捷克的军国主义者视为奇耻大辱,因此他们对民族荣耀的渴望是可以理解的。马扎尔(匈牙利)人的军队也热衷于“民族”荣耀……不管是捷克还是马扎尔人,都会利用一切机会报复“维也纳”往日加于他们身上的所谓不正义。实际上,捷克人会因为对他们初生政权的极度失望而寻求报复;马扎尔人会为罗马尼亚人对匈牙利的劫掠而复仇。²⁶

343

米塞斯非常清楚他在提及匈牙利人对维也纳虎视眈眈时说的是什么。1919年夏初,米塞斯主持了与初生的匈牙利共产主义政府(后来证明是短命的)代表的谈判,内容是奥地利公民在匈牙利的财产权问题。匈牙利驻奥大使是代表团官方全权代表,但此人绝少参与会谈。因此,匈牙利方面真正有决定权的是戈罗格博士(Dr. Görög)和波兰尼博士。戈罗格是一位无趣的官僚,没有任何强烈的政治情感;波兰尼思维敏捷,是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者,在许多次会议上与米塞斯针锋相对。他们漫长的讨论常常涉及社会哲学的根本问题。²⁷可以想象,这些交锋涉及的不仅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牵涉到维也纳对匈牙利的不公。因此米塞斯知道,建立在奥匈帝国废墟上的这个小国,在军事上哪怕暴露出丝毫动摇,都有可能以一场匈牙利的入侵而告终。当前的奥地利军队过于虚弱,无力阻止外敌入侵。当然,奥地利可以仰赖德国军队的援手,不过协约国多半不会允许德国出兵干涉;总之,宝贵的时间会浪费在外交协商上——足够让匈牙利人对维也纳发起一场掠夺性的征服,然后扬长而去。

344

实际上早在1919年9月圣日耳曼合约签订之前,维也纳就遭到过入侵,但侵略者不是捷克人或匈牙利人,而是意大利军队。意大利人长驱直入维也纳,掠夺了

这座文化名都的艺术收藏和图书馆。²⁸匈牙利的共产主义者本会如法炮制,只是一场反革命运动把他们撵下了台。后来的条约对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施加了约束。维也纳暂时消除了外国军事占领的威胁,但却无法回避来自内部的危险。政府如果继续滥用通货膨胀政策支持社会主义试验,很可能导致国内社会的彻底崩溃,也很可能导致一场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起义。

后政府危机时代

米塞斯理解通货膨胀的本质,也明白通货膨胀本身产生的通胀情绪是战争经济遗留给新共和国的最庞大的政治负担,当时能有这番认识的人寥寥无几。不过在社会主义者眼里,他只是一位熟悉货币机器的能干的技术官僚罢了。加入新政府的头几个月,米塞斯也确实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数次将奥地利从混乱的边缘拉回来。

米塞斯知道,用印钞机支持政府财政的做法违背了公共财政的所有既定原则。正如他在《货币与信用原理》中解释的,那是一种高风险和暂时性的权宜之计。如果任由印钞机继续运转,必将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然而事已至此,在当时的情形下,他相信若想维持维也纳的法律和秩序,印钞是唯一的方法。

如今的财政支出远远高于财政收入,任何寻求限制支出和增加收入以平衡预算的努力,都遭遇了几乎无可抗拒的政治困难。目前形势下别无他法,唯有直接或间接地开动印钞机来支援国家财政,唯有通过发行纸币才能提供其他途径都无法筹得的资金。²⁹

345

货币扩张违背了古典自由主义原则,但这并不是米塞斯唯一一次为实行紧急货币扩张政策辩解。哈耶克说,这样的选择可称为**亡命政策**(*desperado policy*):它“本质上是亡命之徒的政策,他们已经一无所有,只为得到片刻的喘息时间”。³⁰不过我们要牢记,米塞斯采取这类政策,是出于功效主义的理由。从他的立场来看,严格说来根本没有科学的“古典自由主义原则”说法,只有有效和无效的政策之分。他认为,在1918—1919年冬季开动印钞机是维持政府运转的唯一可行的手段。

似乎还有一些其他的紧急状况,同样需要政府大力开动印钞机。在哈布斯堡帝国政治解体数月之后,货币和金融体系也跟着解体。此前,战争债券基本上都由

346 本国日耳曼人认购,他们代表了富人和城市人口群体。战争结束后,现金主要集中在非日耳曼人占主导地位的帝国农村地区。粮食经由黑市运进城市,现金则流向农村地区。所以毫不奇怪,帝国各地新的民族政府上台后,首要措施之一就是拒绝承担帝国欠下的战争债务责任。这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决定,对他们的民众主体有利无害,也是脱离地区的反德意志运动的要求。这样一来,清偿债务的责任全部落到日耳曼人身上。按照当时的形势,新的民族政府和西方列强这样的做法可谓名正言顺。³¹

债券持有者们很快意识到,单凭小小的奥地利共和国,不可能独力承担所有的战争债务。于是,人们就到奥匈中央银行按照折扣价格兑现债券,而央行则来者不拒,照单全收,满足所有的兑现要求。债券持有者想兑现多少债券,央行就印多少纸币。如此,维也纳的债券持有者至少挽回了他们的一小部分投资。但是随着新钱的无限滥发,农村地区的现金持有者眼睁睁看着手中货币的购买力日益下跌。

347 奥匈中央银行利用它对纸币克朗发行的控制抵消了各脱离民族拒绝承担战争债务的方案,不管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领导人们是否考虑过这点,他们如今只剩下一条路可走:必须舍弃奥匈中央银行的货币,建立本国的货币。技术上说,这意味着在境内流通的纸币克朗上“盖”上本国央行的图戳,使其成为相互区别的独立货币。1919年1月初,南斯拉夫率先实施了这个方案,而米塞斯立即就此事评论,在《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上发表了一篇匿名文章。³²他在文章中还对形势作出预测,比如,南斯拉夫将利用一部分盈余现金,在依然使用奥地利克朗的地区购买金融和其他资产。这会(1)增加南斯拉夫的财富,用毫无用处的纸币买到真正的商品,(2)导致奥地利物价上涨,而南斯拉夫经济则会因其货币的独立而得到保护。

348 战后纸币克朗的通胀性回流一直是经历了战时通货膨胀的克朗流通地区挥之不去的梦魇。如今噩梦成了现实,米塞斯立即着手采取应对措施。奥地利唯一有效的策略就是做同样的事情——在境内流通的纸币克朗上“盖”上本国央行的图戳,建立独立的奥地利货币。于是,从1919年1月中旬起就上演了真正荒诞的一幕,健全货币的守护者却亲自执行了纸币的生产。³³米塞斯非正式地接洽了管理着一家大型印刷厂的朋友维克托·格雷茨。米塞斯在信件中对印刷厂为奥匈中央银行提供更多印刷设备一事表示关切,因为央行原有的印钞机无力承担迅速替换流通中克朗的重任。格雷茨回应说:

至于周二的谈话内容,鄙人斗胆通知阁下,鄙人已就纸币生产的问题进行

了调查,得知极有可能在必要的短暂延迟后,就能确保私人印刷厂的纸币生产。施泰尔米尔(Steyrermühl,格雷茨的公司)可以提供10台平压印刷机。考虑到任务紧急,我们可以三班制24小时连续运转,如此在效率上将媲美30台平压印刷机。³⁴

行动必须迅速,而第一步就是在奥地利的纸币克朗上加盖印戳。2月初,米塞斯在《新自由报》上的一篇匿名文章里为发行新币辩解,呼吁政府尽快行动起来。³⁵第二天,政府就颁布了一项法令,下令在奥地利流通的纸币克朗上盖上奥匈中央银行的戳记,这个过程到6月份完成。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于2月底开始在克朗上盖上本国央行的戳记,而奥地利人显然并不感到意外。³⁶米塞斯在一篇为社会政策协会准备的文章中详细解释了此事,文章涉及德国和奥地利货币联盟的问题。³⁷他在7月初完成了这篇文章,他在最后的定稿里写道:

349

德意志-奥地利必须行动起来。我们不能等到其他国家都从奥匈帝国克朗转到本国克朗才行动。我们必须主动脱离奥匈克朗,防止其他国家的那些纸币不论出于什么理由,因为没有盖上本国央行的戳记而流回德奥国并增加这里的通货膨胀。我们必须阻止捷克斯洛伐克财政部,他们已经在捷克半数的纸币克朗上盖了捷克央行的戳记,我们不能让他们使用那些回收的克朗来购买德意志-奥地利的股票和债券。我们必须阻止数以十亿计的流通在乌克兰和中立国的纸币克朗成为德意志奥地利一国的货币。³⁸

米塞斯当然没有提到,他本人已着手采取了文中倡议的步骤,政府只是批准了既成事实。1919年3月15日,熊彼特接任财政部长,进入卡尔·伦纳的第二政府,新政府由伦纳的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共同组阁。熊彼特立即把货币改革作为自己的首要议程,而内阁经过一天的紧张讨论就通过了,参与讨论的有奥匈帝国央行和外界专家,比如兰德斯贝格、哈默施拉格(Hammerschlag)、威廉·柯尼格(Wilhelm König)、瓦尔特·费德恩,还有米塞斯。³⁹1919年3月25日,政府颁发了一份行政命令,授予了盖上央行戳记的纸币克朗以法定货币的地位,并否定了未盖戳记的纸币克朗的合法地位。

350

这似乎成了熊彼特在财政部长任内取得的少数成就之一。熊彼特在新政府的两党内都没有权力基础。社会民主党人信任他,是因为他利用自己的学术权威支

持国有化大型工业。基督教社会党人喜欢他,是因为他长久以来抵制与德国合并。他仅有的政治资产就是他那赫赫有名的国际声誉。他是公认的经济权威,而且内阁总理也正确预见到了,这在战后与国际债主的谈判中会起到很大作用。然而,就力图把政府财政拉回正常轨道的努力而言,他的盛名却无法提供任何帮助。在他提出的方案中,没有一个要点付诸实施:他没能强行征收一次性资本税来偿还战争国债,没能稳定货币,也没能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1919年10月17日,在其他内阁成员拒绝支持他的财政方案后,不幸的熊彼特承认失败并辞去了政府职务。

通往健全货币

纸币克朗盖上戳记阻止了一场灾难发生,但是艰巨的难题当然还在后头——如何让奥地利的货币政策和公共财政恢复理性。此事必须尽快着手,但一般知识分子却看不到任何摆脱混乱局面的办法。停下印钞机似乎就意味着让企业和劳动者破产:

351

从理论角度看,实行自由经济原则是正确的做法,但是不经过革命性的转变,这个原则无法实现(因为在当时的情形下会导致大批企业家和劳动者破产)。因此,政治后果将会阻止这个原则发挥作用。⁴⁰

在现实中,这种“毁灭”本来不会对工人造成伤害。停止膨胀货币将会留下一个完好无损的实体经济产业——这也是劳动者收入的来源,生产场地、工厂和其他生产品仅会改变其所有权而已。通货膨胀的作用是在经济上阻止资本品广泛的重新配置。从既得利益集团转到私人企业家手中。从更深的层面上说,社会主义维持现状并不是在保护工人阶级,而是在保护既得利益集团。基于这个角度,那种认为米塞斯的反通胀主义努力是“在政治上不可行”的观点,其实是当权者愿不愿意接受的问题。

米塞斯在当年冬季和1919年春季发起了反通胀运动。他的最大资本就是维也纳自由主义报刊的读者——一个拥有很高地位的阶层。此时他是一位公认的金融事务权威,这个身份为他的声明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公众会仔细解读他对当前局势的评论——以至于为了避免公众的过度解读,他更愿意匿名发表某些文章。当接到管理着一家大型印刷厂并发行《新维也纳日报》的朋友维克托·格雷茨的邀请,米塞斯欣然应邀。格雷茨找不到胜任的记者报道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方

面的新闻,因此他希望米塞斯为他的报纸撰文。米塞斯虽然多产,但他已经在替《新自由报》撰写货币政策文章。⁴¹不过格雷茨开了一个颇有吸引力的条件:每天清晨8时到9时会有一位速记员来到公寓,让米塞斯口述文章。不仅如此,米塞斯还可以不用署名,因而不会有迹象表明这些新闻是出自非新闻人员之手。⁴² 352

米塞斯还就这些问题发表公共演讲,对象几乎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听众(律师和商人,而非政客),他们深为他的个性和演讲风格所吸引。⁴³他必须克服的障碍之一,就是通货膨胀的效应还不为人所知。在德国和奥地利,价格管制遏制了国内物价上涨,因而把通货膨胀最显而易见和令人痛苦的后果限制在那些日渐萧条和没有监管的市场和黑市上。公众因此上当受骗,谬论得以生根发芽。这些谬论反过来导致了恶劣政策的出台,尤其是外汇管制政策。

唯一能证明克朗出现问题的“正式”证据,就是汇率的连跌不止,尤其是和中立国货币的汇率。然而鼓吹通货膨胀的一些人成功蒙蔽了公众。他们辩称,国际收支平衡机制导致了汇率的下跌,而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与汇率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353

米塞斯发表了两篇文章,简明扼要地驳斥了收支平衡理论,并为货币数量理论辩护。他指出,尽管货币数量理论有很多缺陷,但其主要观点仍然是成立的,即货币数量的变化和物价水平的变化呈正相关。

《货币数量理论》和《收支平衡与外汇汇率》⁴⁴发表在了一本小众的专业杂志上,而且米塞斯不得不极为小心谨慎,逐字逐句地推敲自己对收支平衡理论的批评,以确保这些文章通过政府的审查。即便如此,他对当前货币政策的正面攻击还是遭到了一些经济政策方面“专业人士”的激烈抵抗,其中包括齐格弗里德·罗森鲍姆(Siegfried Rosenbaum)——他是英奥银行(Anglo-Austrian Bank)行长,也是瓦尔特·费德恩杂志的主要赞助人。不过,紧箍咒还是被打破了。米塞斯的文章在接下来的数年间被公众广为传阅和探讨。后来如果不是米塞斯自己阻止《贸易平衡与外汇汇率》(Balance of Trade and Exchange Rates)重刊的话,它们本会流传得更为广泛,他有意把这篇论文加进《货币与信用原理》的第二版。

米塞斯在发起健全货币运动的同时,也为货币改革制定了两套方案:一套正式方案,针对“正常”情况下的行动建议;另一套是应对突发情况的秘密方案。在新共和国的头几个月,有一个货币方案提议几乎吸引了奥地利政府和公众的全部注意力,那就是与德国达成货币联盟。忧心忡忡的奥地利人在帝国解体后缺乏政治和民族认同,因此普遍的看法是奥地利无法独立生存,除非有来自北方老大哥的帮助。米塞斯临危受命,负责在与德国人即将进行的磋商中确定奥地利的立场,并受 354

货币政策协会(*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之邀,为协会的特刊撰写一篇分析奥地利经济的专业报告。这个特刊的意图是总结奥地利的形势,从而让更多德国公众了解他们南方友邦的特殊国情。

米塞斯报告的技术细节对现代纸币世界仍然有着重要意义。他指出,拟议中的德奥货币联盟面临的所有困难都源于一个问题:两国当前使用的都是纸币。

两个国家以纸币为基础的货币共同体几乎是不可行的,除非从一开始就决心戒除未来的通货膨胀并在实践中恪守这个原则。一旦政府为了增加国库收入而诉诸通货膨胀措施,那么在如何分配注入市场的新钱的问题上,两国一定会出现分歧。⁴⁵

355 基于纸币的唯一一个成功的货币共同体是1867年成立的奥匈二元君主制帝国,因为奥地利和匈牙利使用名义上的共同母国(奥地利帝国)的货币。然而这种货币共同体能够成功,只因为它是建立在流通中纸币总量不会增加的原则基础上,因而从一开始就避免了分配冲突。但是,如果拟议中的货币同盟涉及任何通胀措施,那么,米塞斯认为唯一能避免分配冲突的方法就是两国组建一个共同的财政部。

因此,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只有两国实现了(或者至少开始启动)政治一体化进程,德意志奥地利才有可能采纳德意志帝国的货币。⁴⁶

米塞斯的立场是,奥地利应该在货币同盟的头几年得到特别补助,因为奥地利人为战争付出了更大代价,因战败蒙受的损失也更大。同时,两国的财政协议必须允许奥地利的企业家在央行折现战争国债。这点绝对必要,因为和德国企业家相比,奥地利人把太多的资本投在了战争国债上。米塞斯坚持以上两点,在25页的报告里各提到了两次。

至于克朗转换马克的兑换率问题,米塞斯认为,兑换率应该建立在两国当前货币的通行市场汇率基础上。兑换率也必须对马克在将来与黄金的比率负责。他建议,兑换率以通行的市场黄金价格为基础。试图重建战前汇率的做法会殃及出口产业,在当前形势下会带来毁灭性后果,尤其对奥地利人损害更大。

要把目前两个独立的纸币体系转变为期望的货币同盟,最好的途径就是建立一个马克汇兑体系作为过渡。按照这个方案,奥地利的中央银行将开始以马克偿

付奥地利的克朗,因而让克朗成为纸币马克事实上的替代品。“据此,德意志奥地利采纳德国货币的想法就付诸实施。克朗就变成了马克的代名词。”⁴⁷最后一步就是用马克纸币完全取代克朗纸币。 356

这个解决方案简单而优雅,只是在米塞斯完成他的报告的修正稿时已经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了。1919年5月初,协约国开出了对德和平条件,其中一条就是德国不能和奥地利合并。西方各国拒不让步,6月28号,德国代表签署了《凡尔赛和约》。

政治联盟既然行不通,奥地利与德国的货币和财政一体化也就化为了泡影。但是米塞斯在他的报告里指出,即使根据《凡尔赛和约》的条款,他的货币合并方案也还是行得通的。实际上,拟议中的马克汇兑本位有着法律上的巨大优势:

德意志奥地利采纳马克汇兑本位并不需要德意志帝国政府任何行动的配合,因此不会影响德意志帝国的合约义务,也不会涉及和平协议有关奥地利独立的条款。⁴⁸

不过他的政府同僚倾向于其他选择。他们没有优先考虑健全货币,仍然设法避免偿付战争国债,剥夺私人储蓄。停止通货膨胀、废除物价管制、走向放任自由主义这些米塞斯式的改革不在他们考虑范围之内。原因很多,其中一条是米塞斯的这些政策会暴露战时社会主义政策产生的巨大的资源再分配效应。伦纳和鲍尔于是另求他法。

对付“货币过剩”效应的一个办法就是夺取个人的现金持有量。为了剥夺德意志奥地利前债权人的财产,政府计划出台阴险的财产税(*Vermögensabgabe*)——这个词可以译为“财产共享”。这种假借慈善名义的措施是对国内资本家的全面攻击。战争时期,正是资本家在大量认购战争债券;而在旧的克朗货币区解体后,又是他们蒙受巨大损失从奥匈中央银行折现债券。所以这个提议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商会的强烈反对,社会主义者被迫考虑另觅他法。 357

9月10日,奥地利签署了和平协议,随后得到西方的贷款援助。这让政府获得了新的财政弹性。外国贷款基本上用于购买维也纳所需的食物,以养活毫无生气的无产阶级大众。而许多奥地利人正翘首以盼将来获得更多的西方援助。米塞斯公开反对这个幼稚的想法,指出外国资本家和外国政府不会有兴趣在经济上长期支持维也纳自取灭亡的社会主义试验。

维也纳工商协会(*Vienna Association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就奥地利的货

币问题组织了一次讨论会,支持米塞斯的方案。⁴⁹米塞斯和友人威廉·罗森贝格是会上的主发言人。⁵⁰罗森贝格解释说,外汇管制和银行监管阻止了当前急需的外国贷款的流入,反倒鼓励了成本高昂的物物交换和黑市交易。当前的经济援助只是暂时的。他提议给予外国企业在诸如矿业、修路和旅游业上的特权,以便吸引外国
358 贷款。米塞斯接着评论说,罢工和停产在奥地利随处可见,唯一的例外就是奥地利央行,它的印钞机日夜运转不息。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纸币克朗很快就会毫无价值。纸币的流通将会崩溃,随后就是社会的混乱。米塞斯接着解释了当前乱局的原因:政府本身就在制造通货膨胀,又以必然伴随的物价上涨为借口,强制实施价格管制和其他更多干预。就像古罗马帝国那样,如今的奥地利政府也处于要为大都市的群众提供生计手段的局面。奥地利不应指望得到更多的西方经济援助,唯一的脱身之法就是政府实行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

这个局面有让整个国家陷入混乱与暴力的危险。但是,米塞斯对政府解决这个难题的能力完全不抱幻想。他费了不少时间得到这个教训,经历了痛苦的过程。他本来认为一个开明的政府会实施彻底的货币改革,但如今知道政府绝不会这么做。他转而提出了一套革命性的私有化策略,以取代健全货币的设想,并下定决心立即贯彻这套策略。

米塞斯的计划有一个基本的范式转变,即彻底忽略政府,把货币体制的改革变成国内主要银行家、商人和实业家的事情。1919年秋季,米塞斯分发了一个机密备忘录。他在备忘录中说,通货膨胀和暴跌的克朗汇率会导致民众放弃使用纸币克朗,这个危险迫在眉睫,必须为这一天做好准备。

我们几乎不能指望政府做好这样的准备。财政部在过去五年里不仅遵循而且一直维护这种灾难性的通货膨胀政策。他们对货币贬值的唯一原因熟视
359 无睹,这又加速了克朗的贬值。我们不能指望他们一夜之间改变想法。一些负有制定政策之责,也正确看到这些政策的经济后果的领袖人物,到目前为止仍然无法克服政府内部的陈规旧习。公民必须通过自己的力量实现政府无法做到的事情。我们对政府的所有希望,就是政府不要阻碍私人领域的作为。银行有责任准备好必要的措施,以面对货币崩溃的悲惨后果,也只有与银行联手,工商业的巨头才能贡献一己之力。这既与他们自身利益休戚相关,也是为了社会整体的利益。⁵¹

米塞斯接着给出了自己的计划细节。他提议用外国货币取代克朗。如果通胀

速度足够缓慢,就没必要采取其他措施。克朗会被逐渐取代,不会扰乱商业运作。危险完全在于货币突然面临崩溃的局面,届时市民将会一无所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将会瓦解,并将催生不幸和暴力。正是预见到这种可能性,米塞斯敦促奥地利企业家寻求3000万瑞士法郎的贷款,这笔贷款足以支付一个月的工资和小额支付。不仅如此,这笔贷款应以极小面值获得,这点非常重要,否则对街上的民众来说毫无用处。

奥地利法律不允许这样的做法,但在米塞斯计划所指的紧急状况下,法律上的考量就是次要的了。而且他敦促读者不要对这种紧急状态的可能性绝望,而是把它看成促进政治进步的机会:

我们无法通过理性讨论驱逐数十年来主宰大众头脑的政治思想。唯有顺其自然,让它走完整个生命历程,除了一场巨大的灾难,没有什么能够将它埋葬…… 360

我们的货币必然迎来剧烈贬值,对此我们只能预先接受。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政策一定会与通胀主义相伴而来。社会主义政策必会导致货币秩序全面崩溃。历史证据历历在目,其中不仅包括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还有当前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或多或少仿效俄国模式的其他国家,即使它们倾向于不太血腥的手段,没有表现出雅各宾派和布尔什维克那般的穷凶极恶。货币崩溃的后果同样让人难以承受,解脱之法就是摧毁引起货币崩溃的体制本身。指券的崩溃是雅各宾派政策的死亡之吻,标志着新政开始。我们国家同样如此,导致经济政策关键变革的动力将来自货币的崩溃。⁵²

维也纳的学术圈子

米塞斯的主要工作仍然是商会秘书,由于这个身份,政府推动奥地利民主化的努力让他获益匪浅。

1919年,平等主义浪潮席卷了商会,并最终在1920年2月25日投票成为法律。商会如今改称“下奥地利贸易、商业和工业议会”(Lower Austrian Chamber of Trade, Commerce, and Industry),所有商会成员不论纳税多寡,都享有平等投票权。商会行政办公室的内部组织结构也做了调整。新的法律规定,各行各业在行政办公室享有更加平等的代表权,甚至在其范围内拥有一定程度的自治。行政办公室新成立了一个“运输部”(Department of Transport)和一个“银行及信用部”(Depart- 361

ment of Banking and Credit)。米塞斯专门负责货币和信用事务。由于维也纳商会的特权地位,米塞斯在新岗位上行使的领导力远远超越了维也纳和下奥地利的地理边界。⁵³

米塞斯也在维也纳大学和(暂时地)出口学院(*Exportakademie*)继续担任经济学教授的职务。⁵⁴他恢复了自己在战前组织的定期经济理论讨论。这些研讨会吸引了奥地利和德国一些对社会科学理论问题有着共同兴趣的经济学家。米塞斯圈子的核心成员几乎囊括了维也纳的所有顶尖学者——尤其因为,维也纳公认最负盛名的理论权威维塞尔对这类思想交流不感兴趣,所以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的观点都没有吸引到一个这样的交流团体。不久,这个核心圈子成为更加正式的“国民经济学会”(Nationalökonomische Gesellschaft)。因此,米塞斯的圈子成了德语世界那些散居各地而又孤立无助的理论家的中心。熊彼特以优美的文笔总结了他们对这个维也纳团体的态度,有一次因故无法出席团体的研讨会,他说,自己真心希望“能向我们的团体发表演讲,与情趣相投的同伴一起,在理论的牧场上享受大餐”。⁵⁵

在米塞斯的学术活动中,最耗时间的是他在维也纳大学主持的研讨班,不过这也让他得以摆脱烦琐的商会事务和无可救药的政治局势。他热爱教师职业,热爱思想和思想辩论。1918—1919年冬,没有任何政治动荡能够阻止他以一位经济学教授的身份主持自己的第二届大学研讨班。第一次讨论时,研讨班成员都是君主国的臣民。但两周后,当他们再次回到课堂上,就俨然是共和国公民了。奥匈帝国的最后一任首相恩斯特·塞德勒博士(Dr. Ernst Seidler)也出现在课堂上,这一定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塞德勒很可能是从战前商会的常规活动中得知了米塞斯的大名。⁵⁶

米塞斯打算在研讨会上强调价值理论对分析市场现象的重要性,同时鼓励各种不同的价值理论交锋:主观价值理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数理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以及弗兰茨·奥本海默的客观价值理论。他试图让班上的学生逐一介绍上述所有学说。研讨班也突出了有关价值度量的讨论环节,以及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之间的差异。⁵⁷除了讨论权威刊物上的最新文章,米塞斯还在研讨班上向学生介绍重要的古典经济学家。他也鼓励学生进行课外研究,撰写特定主题的文章,并为这些课外活动提供大量帮助。他敦促学生广泛阅读,避免带着任何特定目标或特定问题——这也是他毕生一直提倡的原则。他试图通过多种途径提供帮助,从向学生出借自己的私人藏书,到毕业后为他们寻找合适的工作等等。

尽管饱受战争摧残,维也纳仍然是一个辉煌的学术中心。除了奥地利经济学派在维塞尔、米塞斯和迈尔的带领下继续发扬光大,还有许多其他奥地利或维也纳学术圈子,包括理论物理学和哲学(莫里茨·石里克[Moritz Schlick])、法学(凯尔森)、精神分析(弗洛伊德、阿德勒)、历史(多普施[Dopsch]和年轻的奥托·布伦纳[Otto Brunner]),还有艺术史(马克斯·德沃夏克[Max Dvorak]和约瑟夫·斯特泽哥维斯基[Josef Strzygowski])。不过,虽然对于打算研习理论经济学的学生来说,米塞斯的课堂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但是他的讲座和学术活动只能停留在初级水平。⁵⁸因此,米塞斯试图建立一个私人研讨会,进行更高层次的讨论。维也纳活跃着许多这样的私人团体,这些团体各具特色,取决于参与成员的兴趣和水平。许多学科的先驱者都曾组织过自己的私人研讨会,通过小范围的讨论来训练他们的追随者,西格蒙·弗洛伊德就是如此,他在战前已经组建了一个团体。汉斯·凯尔森在战后的团体也是一个例子。有些学术圈子没有中心人物,例如米塞斯、普里布拉姆兄弟和埃米尔·佩雷尔斯在1908年建立的学生社团,这个社团最终成了国民经济学会——赫伯特·冯·菲尔特(Herbert von Fürth)和冯·哈耶克在20世纪20年代初建立的一个学生社团。一些学者同时在几个圈子拥有成员身份,例如汉斯·凯尔森的学生,后来成为凯尔森助理教授的费利克斯·考夫曼(Felix Kaufmann),他既是凯尔森创办的法学研讨会的成员,又是米塞斯的社会科学研讨会的成员,还加入了哲学界的维也纳小组。米塞斯也参加了几个不同的团体,1919年春季和夏季,他既加入了国民经济学会,也是讨论马克思著作的研讨会的成员。⁵⁹很有可能是在这个有关马克思的研讨会上,米塞斯坚定了他对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藐视态度。他在这里了解到,马克思主义党派是由两个派系组成:一派从未研究过马克思,只知道他书里一些广为流传的片段;另一派只读马克思的著作,而把所有其他文献全都扔在一边。马克斯·阿德勒(Max Adler)就是前者,他的马克思主义知识仅仅限于马克思提出“上层建筑理论”的寥寥数页。至于后者,则以东欧人居多,他们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袖。⁶⁰

364

365

米塞斯自己的私人研讨会开始于1919年11月26日,第一讲是伊丽莎白·埃弗吕西(Elisabeth Ephrussi)关于卡弗利息理论的报告。以后的演讲者包括施特里格尔、图根哈特(Tugendhat)和佐默。⁶¹米塞斯称为“小型研讨会”(privatissimum)的讲座,很可能是在他的商会办公室进行。不管怎样,这里就是未来几年研讨会的聚会场所,在此举行的研讨会,只有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才才有资格参与。不过,学位可以是任意学科的,设立与会资格的目的,只是保证参与者对科学研究的態度。



米塞斯在维也纳的一些学生后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著名学者：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左上)、戈特弗里德·哈伯勒(右上)、阿尔弗雷德·许茨(左下)和弗里茨·马克卢普(右下)

米塞斯毫无保留地支持他的女学生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例如他安排玛丽安娜·冯·赫茨菲尔德(Marianne von Herzfeld)和海伦妮·利泽尔(Helene Lieser)担任奥地利银行和银行家协会(Association of Austrian Banks and Bankers)的经济学家。海伦妮·利泽尔是奥地利首位获得政府科学博士学位的女性,后来成为位于巴黎的国际经济协会(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秘书。米塞斯的另一位女学生玛尔塔·斯特凡妮·布劳恩,后来在布鲁克林大学和纽约大学担任教职,她回忆说:

冯·米塞斯教授从不限制任何参与者选择他们希望讨论的主题……我在

许多城市居住过,参加过许多团体。我可以肯定,再也没有第二个团体在讨论的密度、兴趣和思辨水平上能够达到米塞斯研讨会的高度。⁶²

通过这些讨论,米塞斯不仅公开宣扬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也主张一种彻底的古典自由主义世界观。要知道在那个年代,维也纳和西方的主流思想家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因此,米塞斯以“自由先生”(der Liberale)闻名于世,用今天的英语来说,我们称他为自由至上主义先生(Mr. Libertarian),一位活着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之魂。⁶³许多年后,他的学生弗里茨·马克卢普强调了米塞斯的信念对其他人的影响:

米塞斯能够成为一个学派的中心人物,足以证明他是一位优秀的导师。并不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演说家或一位出色的课堂表演家,而是因为在阐述自己思想时的坚定态度,这种态度引起了学生的兴趣。不过兴趣是两方面的:有时能令学生信服,有时也会激起学生的批评。

马克卢普继续指出了这位曾经的老师的不足:

367

他常常过于矜持和沉默寡言。初次见面的人,可能因为他表面的冷淡或某种程度上缺乏同情心而感到难以接近。不过当你对他有了更多了解,就会知道他是一位极富同情心的人。他是一位不愿意妥协的人,即使妥协或许会给他带来物质上的好处。他会顽固地坚持自己的信念。尽管我觉得这是真正的美德,有时却会招致别人的反感。⁶⁴

的确,米塞斯在面对自己反对的观点时,偶尔也会表现出愤怒,但他显然没有让思想分歧转变成人身攻击。他意识到,在新人与旧人之间,产生分歧是必然现象。因此,他鼓励所有方向上的思考。比如,20世纪20年代末,米塞斯推荐数量经济学家埃瓦尔德·沙姆斯(Ewald Schams)获得了洛克菲勒奖学金,称赞他为“我国最有才华的年轻经济学家之一”。⁶⁵他也推荐过一家致力于研究经济心理学的小型私立机构的主管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⁶⁶,而此人的方法论和政治观点几乎完全与米塞斯相反。⁶⁷

他在维也纳的一些青年研究伙伴后来的确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传奇人物:哈耶克、哈伯勒、马克卢普、许茨,还有摩根斯特恩——这里仅举其中几位。虽

368

然这些青年才俊通常都是迈尔和施潘的正式学生和合作者,但是他们的学术研究却是通过与米塞斯的合作才得以提出和发扬光大。他们与米塞斯之间的关系有个特点,就是他们并不以服从的姿态面对米塞斯。施潘、迈尔和凯尔森似乎用一种与米塞斯全然相反的态度对待他们的学生。⁶⁸

在那些岁月里,米塞斯也见证了劲敌奥特马·施潘(Othmar Spann)的崛起。施潘被任命为经济学正教授,并于1919年5月5日发表了就职演讲。⁶⁹施潘的世界观与个人主义方法论截然相反。他把自己的方法论称为“普遍主义”(universalism),主张以思考宏观整体作为社会分析的开端,而把人类社会的个人因素摆在次要地位的。

诸如此类的竞争对手和意见分歧极为普遍,而且也不局限于大学。20世纪早期的维也纳思想界是一个由数十位思想导师组成的网络,他们在各自的私人研讨会上向信徒和追随者们宣扬自己的主张。观念的自由市场带来思想的百花齐放,而维也纳的这种思想传播体系正是一个范例。在这个体系下,诞生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Austro-Marxism)、精神分析法、实证主义法学(legal positivism)、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和行为学(praxeology)。不过,要论国际声誉和影响的深远,这些圈子中只有三个可以傲视群雄:精神分析法、逻辑实证主义,以及米塞斯小组。

注 释

1. 尤里·克里策克(Jurij Krizek)认为,战争期间奥匈帝国的强制性中央集权经济扩大了民族冲突,集权政策让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工业和金融业单方面获益。参见Jurij Krizek, “Die Kriegswirtschaft und das Ende der Monarchie,” R. G. Plaschka and K. Mack, eds., *Die Auflösung des Habsburgerreiches* (Munich: Oldenbourg, 1970), pp. 43–52。

2. 奥地利企图以一个设想中的新奥匈联邦政府框架为底牌与美国媾和,参见Erik von Kuehnelt-Leddihn, *Von Sarajevo nach Sarajevo* (Vienna: Karolinger, 1996), p. 21。

3. Rudolf Sieghart, *Die letzten Jahrzehnte einer Grossmacht* (Berlin: Ullstein, 1932), p. 248。

4. 参见Christian Eckert, “Friedensverträge. II. Vom staatswissenschaftlichen Standpunkte,”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4th ed. (Jena: Gustav Fischer, 1927), vol. 4, pp. 444ff., 515。

5. 参见Sieghart, *Die letzten Jahrzehnte einer Grossmacht*, p. 354。

6. 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Vienna: Manz, 1919), p. 134; translated by Leland B. Yeager as *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64f.

7. 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p. 144; *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p. 176.

8. 事实上,鲍尔外交部的所有高官,包括鲍尔本人,都是犹太人或犹太裔。1918年11月22日(Mises Archive 107: 55a)和1919年1月11日,维也纳报纸《帝国邮报》(Reichspost)暗讽鲍尔接手的外交部,“犹太人里夏德·冯·许勒尔博士(Richard von Schüller)——最近去世的实业家塔西格(Taussig)的一位近亲”,以及许勒尔的下属“犹太人冯·米塞斯博士,布罗达博士和施泰纳博士”似乎让人无法接受。然而事实上,正如一份“犹太民族”报刊《维也纳晨报》(*Wiener Morgenzeitung*)指出的,米塞斯和索马里是奥地利最重要的货币理论家(参见 Mises Archive 107: 44)。

9. 米塞斯常与鲍尔、莱德雷尔(国家社会化委员会负责人)还有熊彼特(1919年春出任财政部长)会晤。参见 Mises Archive 53: 13。

10. Mises, *Notes and Recollections* (Spring Mills, Penn.: Libertarian Press, 1978), p. 77.

11. 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and),生于1859年,法国社会主义者,起初非常激进。掌权后,他的行动限于温和改良措施。

12. 约翰·冯·米凯尔(John von Miquel, 1821—1901),德国政治家,起初是一位极端革命主义者,后来据称彻底放弃了激进主义,旨在“采取改善民生的务实措施而不顾党派方针”。

13. Mises, *Notes and Recollections*, pp. 16—19. 关于米塞斯在阻止奥托·鲍尔和妻子海伦妮·贡普洛维奇把他们的布尔什维克计划付诸实施一事上所起的关键作用,这段文字是唯一的直接材料。约翰娜·瓦尔纳博士(Johanna Wallner)在1919年2月致米塞斯的信件可以提供一些旁证。她在信中给米塞斯留了她的电话号码,并请求他代为向鲍尔博士致以问候。“在当前的形势下,”她写道,她不希望用琐事打扰(behelligen)鲍尔(参见她写于1919年2月16日的信件, Mises Archive 53: 30ff)。因此,她知道鲍尔政务繁忙,而且米塞斯也很可能在这段时间内频繁与鲍尔会晤。

14. 鲍尔在改变自己对社会化问题的立场之前,一直是奥地利左翼社会主义分子的领袖。自那以后,他逐渐向中间立场靠拢,并巩固了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参见 Norbert Leser, “Otto Bauer—Friedrich Adler—Max Adler,” Walter Pollack, ed., *Tausend Jahre Österreich* (Vienna: Verlag Jugend und Volk, 1974), vol. 3, p. 270。

15. 德国的社会化委员会在1918年12月5日首次召集,包括了奥地利的教授莱德雷尔、希法亭、熊彼特、西奥多·沃格尔斯坦(Theodor Vogelstein)(德国战争社会主义经济的前主要执行者)、颇有影响力的出版商海因里希·库诺(Heinrich Cunow)、工会领袖奥托·休(Otto Hué),以及德国教授卡尔·巴洛德(Carl Ballod)、罗伯特·维尔布兰特(Robert Wilbrandt)和委员会的秘书长爱德华·海曼(Eduard Heimann)。到1919年3月,不仅维也纳,德累斯顿、慕尼黑和斯图加特也成立了类似的委员会。参见新斯巴达克思主义者曼弗雷德·贝伦德(Manfred Behrend)那篇信息量十分丰富的文章“‘Der Wandschirm, hinter dem nichts geschieht.’ Bildung, Tätigkeit und Ende der ersten deutschen Sozialisierungskommission” *Glasnost* (1998); 及文中引用的文献。

16. 参见 Sozialisierungskommission, *Vorläufiger Bericht über die Frage der Sozialisierung des Kohlenbergbaues* (Berlin, February 15, 1919); quoted from Behrend, “Der Wandschirm, hinter

dem nichts geschieht”。

17. 战时的1916年10月4日,社会政策协会已经在柏林的一次会议上讨论过这类方案。海因里希·赫克纳(Heinrich Herkner)大力支持通过一次性充公税解决巨额战争债务问题。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当时在德国财政部工作,激烈反对任何有关这些提议的讨论,因为它会损害政府兜售战争国债的努力。参见 Franz Boese, *Geschichte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1872 – 1932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39), p. 153。

18. 参见 *ibid.*, pp. 160f. See also Lederer's paper in "Verhandlungen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in Regensburg 1919," *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159 (1920); and Alfred Amonn, *Hauptprobleme der Sozialisierung* (Leipzig: Quelle & Meyer, 1919). Amonn belonged to the German-Austrian Staatskommission für Sozialisierung。

19. 米塞斯涉及此事的证据可见他与弗劳·菲舍尔(Frau Fischer)之间的通信,菲舍尔是他在商会的秘书。参见1919年7月份的通信, *Mises Archive* 53: 40。米塞斯前往巴德加施泰因度假后,菲舍尔女士曾写信给他。

20. *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p. 140; *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pp. 171. 20世纪40年代初,米塞斯在美国讨论资本税时,奥地利的经验为他提供了充分的材料。参见他的评论"Report of After-Dinner Discussion, July 30, 1941 on The Prospects for and Extent of A Capital Levy," Grove City Archive: Trusts and Estates file。

21. 参见 *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p. 119; *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pp. 146f. Fn。

22. 米塞斯致埃米尔·莱德雷尔,信件标注日期为1919年10月21日; *Mises Archive* 73: 58。

23. Gesellschaft der österreichischen Volkswirte; "Die politischen Beziehungen Wiens zu den Ländern im Lichte der Volkswirtschaft." 参见 *Mises Archive* 107: 20a, 55。这次演讲随后刊登于《新维也纳日报》和《政治经济学档案》(*Wirtschaftspolitisches Archiv*),对公众造成了一定影响。商人兼律师赫尔·罗斯-泽弗里德(Herr Roth-Seeffrid)对奥地利就像对自己的后花园一样熟悉,他曾致信米塞斯:"我真希望此文能在德国广为传阅,很不幸地,我必须承认,那里盛行的是关于德奥合并之类的极不明确的印象。"(*Mises Archive* 74: 2; 鄙人翻译)罗斯-泽弗里德生活在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米塞斯也许在度假时遇见过他,比如1927年的8月份(*Mises Archive* 62: 6)。

24. 参见"Über die im Hinblick auf das Fortschreiten der Geldentwertung zu ergreifenden Massnahmen" (On the measures to be taken on behalf of the decreasing value of money) in *Mises Archive* 109。

25. "Über die im Hinblick auf das Fortschreiten der Geldentwertung zu ergreifenden Massnahmen," p. 1 in *Mises Archive* 109: 2。

26. "Über die im Hinblick auf das Fortschreiten der Geldentwertung zu ergreifenden Massnahmen," p. 6 in *Mises Archive* 109: 7。

27. 参见 *Mises Archive* 74: 11ff. 多年后的1924年2月,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给米塞斯寄去了他的论文"Sozialistische Rechnungslegung",这篇论文曾刊登在《社会科学与社会

会政策文库》第49卷(1922)。他请求重印米塞斯为论文撰写的评论。波兰尼当时居住在维也纳的第7区。他的信件似乎不是很明确(参见 Mises Archive 80: 87)。

28. 参见 Christian Eckert, “Friedensverträge. II. Vom staatswissenschaftlichen Standpunkte,” p. 511。

29. Mises, “Der Wiedereintritt Deutsch-Österreichs in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ie Währungsfrage,” Michael Hainisch, ed. *Wirtschaftliche Verhältnisse Deutsch-Österreichs* (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vol. 158;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19), pp. 155.

30. F. A. Hayek, *Profit, Interest, and Investment and Other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Fluctuation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39), pp. 63f., n. 1.

31. 米塞斯相信并在以后一段时间内继续认为,历史将会证明这些受到民众欢迎的反日耳曼法律是短命的。1919年5月9日,他参加了一个由货币保护协会组织的会议,讨论在接下来和平协商中奥地利的地位(参见 Mises Archive 107: 22, 44b)。许多媒体刊登了他在会上的发言,他陈述说,苏联拒绝偿还沙皇政权欠下的债务,而协约国驳回了苏联的要求,坚决要求苏联还债。因此,按照同样的原则,协约国一定也会拒绝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南斯拉夫政府的请求,责令它们共同承担奥匈帝国的债务。这符合历史悠久的国际法原则。在这个议题上,任何其他的立场都会祸及国际贸易,因而损害协约国自身的利益。不论如何,这番无可辩驳的观点没能阻止协约国站在斯拉夫继承国一边。憎恨常常胜过利己。

32. “Die Abstempelung der Kronennoten im jugoslawischen Staate,” *Neue Freie Presse* (# 19536; January 14, 1919); 副本见于 Mises Archive 106。这类匿名文章常常署名为“一位主管货币的重要政治家”。米塞斯的权威体现在文章的写作风格和语言词汇,同样也体现在以下事实中——这些文章被保存在公共档案里(莫斯科的文件保管人可以按照收到的文件的“自然”顺序保管)。

33. 他写道:

在奥匈君主国分崩离析的时刻,货币问题只是一个技术上的印刷问题,以及在这个重大的货币政策时刻如何获得印刷版、纸币和油墨的问题。(Ludwig von Mises, “Republic of Austria. Banking and Financ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2th ed. [1921], vol. 30, pp. 348f)

34. 格雷茨致米塞斯的信,标注日期为1919年1月16日; Mises Archive 53:1。

35. 这篇文章署名为“von einem hervorragenden Währungspolitiker”(出自一位主管货币的重要政治家之手),《新自由报》(1919年2月11日);副本见 Mises Archive 107: 39。

36. 米塞斯很可能在《新自由报》的一篇文章上也评论了这个事件。参见杜布在2月25日的信件, Mises Archive 53: 16。

37. 这篇文章早先已引用过,“Der Wiedereintritt Deutsch-Österreichs in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ie Währungsfrage,” pp. 145 - 71。奥地利“重返”德意志帝国指的是1867年之前的那段岁月,当时它的王室领地(*Kronländer*)是德意志邦联(*Deutscher Bund*)的一部分。邦联是在哈布斯堡王朝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是后拿破仑战争时代神圣罗马帝国在德语地区的继任组织,因为神圣罗马帝国已于1806年瓦解。1867年,随着普鲁士在克尼格雷茨战役中击溃了奥匈帝国,邦联宣告解散。

米塞斯在1919年7月初完成了这篇文章,不过他在1919年初就发表了本文的一个早先版本;参见国务卿乌尔班(*Staatssekretär Urban*)标注日期为1919年3月5日的信件,其中提及了本文, *Mises Archive* 53: 29。

38. Mises, “Der Wiedereintritt Deutsch-Österreichs in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ie Währungsfrage,” pp. 153f. See also his presentation in Mises, “Republic of Austria. Banking and Finance,” pp. 348f.

39. 参见 *Mises Archive* 107: 23。

40. 这是埃米尔·莱德雷尔对米塞斯的论文《收支平衡与外汇汇率》的评论。参见 *Mises Archive* 73: 57。

41. 在那些的日子里,米塞斯常被要求在当天交稿,而他似乎也能接受。参见 *Mises Archive* 53: 16, 一篇写于1919年2月份的文章,关于捷克政府货币政策的含义。

42. 参见格雷茨标注日期为1919年3月8日的信件; *Mises Archive* 53: 44。以同样的方式,米塞斯也应邀为《铎恩国家周刊》(*Dorn's Volkswirtschaftliche Wochenschrift*)提供货币政策分析,这是一份经济学周刊,担任编辑的是原先战争经济科学委员会的一位同僚。参见编辑的信件,标注日期为1919年1月27日。编辑也邀请他在女子俱乐部(*Frauenklub*)发表演讲,题目是“社会主义和经济计划”。两周前,奥托·纽伊拉特已经以这个主题发表过一次演讲,米塞斯则提供了一剂解毒剂。

43. 例如,他在1919年5月2日对贸易协会会员发表了一次演讲,题目为“论货币政策的手段和目的”(参见 *Mises Archive* 53: 12)。这次演讲似乎非常成功,沉重打击了通货膨胀党人(参见 *Mises Archive* 107: 21, 44a 的新闻报道)。米塞斯在这一年做了很多次这类演讲,比如1919年10月在奥地利商会的一次例行会议上(*Mises Archive* 107: 44c)。

44. “Die Quantitätstheorie” and “Zahlungsbilanz und Wechselkurse.” 两篇论文的副本可见 *Mises Archive* 39。

45. Mises, “Der Wiedereintritt Deutsch-Österreichs in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ie Währungsfrage,” p. 156.

46. *Ibid.*, pp. 156f.

47. *Ibid.*, p. 164.

48. *Ibid.*, p. 165.

49. 讨论会在1919年11月11日召开。参见 *Mises Archive* 107: 44d 的新闻报道。

50. 威廉·罗森伯格(*Wilhelm Rosenberg*)是一位以探讨货币问题知名的作家。参见他的 *Valutafagen*, 2nd ed. (Vienna: Manz, 1918)。

51. Mises, “Über die im Hinblick auf das Fortschreiten der Geldentwertung zu ergreifenden Massnahmen,” p. 7; *Mises Archive* 109: 8.

52. *Ibid.*, pp. 2f. (*Mises Archive* 109: 3f) 不经意间,米塞斯在这里表达了许多年前卡尔·门格尔在私人笔记中陈述过的思想:观念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轨迹(*ideas must run their course*)。20世纪30年代初,哈耶克在编辑门格尔的著作时发现了这份笔记。米塞斯后来在自己的书里提到了这份笔记,参见 *The Historical Setting of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69] 1984), pp. 36f。

53. 关于1920年的法律改革,参见 *Bundeskammer and Wiener Kammer der gewerblichen Wirtschaft*, eds., *100 Jahre Handelskammern in Österreich* (Vienna: Amtsblatt der Bundeskammer der gewerblichen Wirtschaft, 1948), pp. 143ff.; Franz Geissler, “Die Entstehung und der Entwicklungsgang der Handelskammern in Österreich,” Hans Mayer, ed., *Hundert Jahre österreichische Wirtschaftsentwicklung, 1848 – 1948* (Vienna: Springer, 1949), pp. 110ff.

54. 米塞斯与出口学院的关系,参见 *Mises Archive* 53: 3。出口学院后来更名为“世界贸易大学”(Hochschule für Welthandel),再更名为“经济大学”(Wirtschaftsuniversität)并沿用至今。

55. 熊彼特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18年12月9日,*Mises Archive* 51: 130f。

56. 这些学员中的大部分也参加了夏季研讨班,讨论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问题。英奥银行总裁、瓦尔特·费德恩杂志《奥地利经济学家》(*Österreichischer Volkswirt*)的赞助人齐格弗里德·罗森鲍姆显然也是参与者之一,参见罗森鲍姆1919年9月的信件(*Mises Archive* 53: 33f),他在信里提出,希望能够参加不久之后另一次研讨班,与米塞斯和佐默博士小姐一起探讨问题。

57. 参见 *Mises Archive* 17: 25。

58. 1919年,维也纳大学新设了政府科学学位,这个学位非常强调经济学。学生必须在经济学、公共财政、经济史、统计学、一般国家理论、公共管理和国际法课程方面修满六个学期。为了获得政府科学的博士学位,学生还须撰写一篇论文并通过“两次全面考试”。参见 *Amtsblatt der Universität Wien* 6, no. 9 (June 1919)。

59. 后一个团体于周一晚间在国家社会化委员会的办公场所碰头。团体的大部分成员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或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人士,比如莱德勒和克特·皮克(Käthe Pick);参见皮克致米塞斯的信件,*Mises Archive* 53: 50。皮克是米塞斯在1918年建立的研讨会的成员,受过银行经济学理论训练,参见她与米塞斯的通信,*Mises Archive* 51: 85, 53: 50。她也参加了随后的大学研讨班。

60. 参见 *Mises, Erinnerungen* (Suttgart: Gustav Fischer, 1978), p. 11; *Notes and Recollections*, p. 16。他提到的唯一例外就是奥托·鲍尔,参见上文。

61. 参见 *Mises Archive* 17: 37。布鲁西很可能是埃弗吕西银行的女继承人。玛吉特·冯·米塞斯提到丈夫的偶尔打趣,说如果不是遇到玛吉特,他本会娶一位富有的女继承人。他说的大概就是伊丽莎白·埃弗吕西。参见 *Margit von Mises, My Years with Ludwig von Mises*, p. 19。

62. *Margit von Mises, My Years with Ludwig von Mises*, 2nd enlarged ed. (Cedar Falls, Iowa: Center for Futures Education, 1984)关于米塞斯的私人研讨会,参见 pp. 201 – 11。另见 *Notes and Recollections*, pp. 97 – 100; Martha Steffy Browne [or Martha Stefanie Braun], “Erinnerungen an das Mises-Privatseminar,” *Wirtschaftspolitische Blätter* 28, no. 4 (1981)。

63. 玛丽安娜·赫茨菲尔德的一封信(1919年10月1日,见 *Mises Archive* 53: 9ff。)最能说明这个问题。赫茨菲尔德小姐的双亲与米塞斯私交甚好,有时会邀请米塞斯到家里共进晚餐。

64. 马克卢普致沃尔特·E. 斯帕尔(Walter E. Spahr),信件标注日期为1940年10月24

目;Hoover Institution; Machlup-Mises correspondence file。施帕尔是纽约大学经济学系的主任。马克卢普的信是机密的。

65. 参见1929年4月米塞斯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信件, Mises Archive 62: 125。沙姆斯是维也纳的一位平均主义者(*Sektionsrat*)。在此之前,他一定曾在巴黎待过一段时间,也许和洛克菲勒奖学金有关;参见 *ibid.* 73: 13f。

66. 奥地利经济心理研究中心(The Österreichische Wirtschafts-Psychologische Forschungsstelle),米塞斯是董事会成员。

67. 参见 Mises Archive 67: 7。

68. 只要比较一下默里·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的《米塞斯传》(*Ludwig von Mises: Scholar, Creator, Hero*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88])和鲁道夫·马特尔(Rudolf MétaI)的《凯尔森传记》(*Hans Kelsen* [Vienna: Verlag Franz Deuticke, 1968]),就能清楚看出这点。

69. 奥特马·施潘的演讲在同一年刊印,题为 *Vom Geist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Jena: Gustav Fischer, 1919),后来作为附录载于 *Fundament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3rd ed. (Jena: Gustav Fischer, 1923)。

社会主义者借着选举制度的东风一步登天,这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一夜之间手握大权,开始发号施令。但是结果证明,他们完全不知道如何推行雄心勃勃的“社会主义经济”方案。¹过去五十年里,社会主义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却从未涉及“社会”(在实践中,就是社会主义政府)如何管理经济的问题。人们认为这样的问题是不科学的,因为社会主义的降临原本是个不可阻挡的自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托尼(Tawney)、拉斯基,以及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的其他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全都深信,社会主义最终将以完全成熟的形态“自然出现”,恭候世人的景仰。用一位高度同情社会主义事业的作者的口吻来说:

他们还未充分考虑过这个问题: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想要维持甚或改进资本主义提供的生活水平,必须满足怎样的经济条件?从技术角度看,他们也未曾充分注意到社会主义经济相比资本主义经济的优势和劣势所在。然而,除非他们多少了解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除非他们能够从经济角度证明他们的观点……否则他们几乎没有希望说服大众相信他们所拥护的制度。²

370

迄至1919年,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席卷了德国和奥地利的政治舞台,但却没有一位社会主义领袖考虑过上述问题。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 1867—1922)是战时中央计划经济最杰出的捍卫者,他确信,经济的主体方向应牢牢把握在国家手里,实际上也就是把握在他自己的手里。战争时期,他高歌战争社会主义;和平年代,他又竭力支持全能政府。他1917—1919年间的著作几乎就是地毯式的文字轰炸,塑造了未来整整一代人的思想观念,其中就有哈耶克。³其他国家主义者也为同样的路线而奋斗。⁴于是战争结束后,似乎突然冒出了一股激进社会主义的人民运动,祈盼立即实现共产主义。匈牙利和巴伐利亚都出现过短命的共产主义政府,这些政府基本上延续和加强了战时中央计划经济。米塞斯的宿敌奥托·纽拉特就曾担任过巴伐利亚政府的领导人,他发表了自己的成功故事和建立

371

新社会的计划。⁵直到1919年夏末的前几个月,通往全面共产主义的大门一直畅通无阻。但是社会主义领袖——卡尔·考茨基、奥托·鲍尔和马克斯·阿德勒——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满足广大民众的需要。

有一点很清楚,维也纳的社会主义者(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认为中央计划经济就是全能政府;在这点上,他们与拉特瑙截然不同。他们希望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但是,计划似乎应由整个社会推进,而不只是一小撮技术官僚精英分子的事情。1919年1月,奥托·鲍尔发表了一组文章,后来这些文章收入了一本题为《通往社会主义之路》(*Der Weg zum Sozialismus*)的小册子。⁶鲍尔在文章里倡议说,应该沿着工团主义路线逐步征用私有工业企业,企业的资产应由工人管理,或者由工人、消费者和公仆组成的委员会管理。但是,无论是鲍尔还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其他思想领袖都没有考虑过他们的方案是否有效。没有一个人尝试过比较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运作。⁷事实证明,这是他们的理想中最为关键的战略弱点。

372 1919年秋,奥地利的形势非常恶劣,尤其是维也纳。食品短缺、供暖不足,街灯摇摇欲灭。米塞斯患了流感,过了几周才好。办公桌上文件堆积如山,但他丝毫没有工作的意愿。然而正是在这段时期,他完成了有史以来最优秀的经济学论著。

他曾答应莱德雷尔,要为韦伯的《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撰写一组文章,当时莱德雷尔正要接替维尔纳·桑巴特出任《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的执行编辑。1919年11月14日,米塞斯告诉莱德雷尔,第一篇文章的标题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⁸他正在撰写一本系统而全面批判所有形态的社会主义方案的著作,此文就是其中的核心篇章。他一定是在完成《民族、国家与经济》后不久就开始了这个计划,而写完整部书稿则花了两年时间。

发表的时机也很重要: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已入垂暮之年,很快就要退休。虽然米塞斯并不认为自己能有多少机会接替维塞尔,出任这个门格尔曾经担任过的教授职位;不过在任命确定之前发表一本令人印象深刻的著作显然会有助于他当选,这倒并非什么不切实际的希望。

373 不过出于种种理由,米塞斯可能觉得在出版一本单独的著作之前,提前发表其中的核心章节是有益的。他希望立刻对奥地利的政策产生影响。另外,率先发表经济计算章节也是出于教学的考虑。米塞斯试图证明,纯粹的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他的论证涉及一个过去完全没有引起经济学家注意的问题。事实上,他的论证直接违背了当时在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维塞尔范式最核心的教义之一:维塞尔的归属理论(theory of imputation)。提前发表经济计算章节可以给读者更多

时间消化这篇反社会主义大作的中心思想。

为了应对来自经济理论权威和其他利益集团可能的批评,米塞斯利用自己的研讨班来讨论分配理论,尤其是归属理论的根本问题。数理经济学家恩斯特·塞德勒博士做了一次简短的演讲,拉开了1919年10月开始的三次研讨班的序幕。这几次讨论课的内容全是归属理论问题。米塞斯很可能是在用他的新观念与学生进行辩论。

不幸的是,讨论课的记录没有保存下来。这些讨论必定涉及经济理论的细枝末节,远远超出了大部分学生的理解能力。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米塞斯随后组织了一个规模更小的团体,仅对一些高级成员开放。

论 证

在冬季研讨班的最初几个星期,米塞斯对他的经济计算章节作了细微调整,加入了在研讨班上遇到的各种批评和意见。最终,他在1920年1月初国民经济学会的一次会议上正式公开了这篇论文。这次会议聚集了当时全世界最优秀的一批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学者。一些与会人士如约瑟夫·熊彼特、阿尔弗雷德·阿蒙、马克斯·阿德勒、海伦妮·鲍尔等早已与米塞斯有多年之交,知道他是一位热情洋溢的个人主义斗士,对社会主义的批评毫不留情。他被视为远比大多数批评社会主义的人士更有挑战性,那些人大都倾向于批判社会主义屡屡失败的历史。米塞斯对社会主义的糟糕记录了如指掌,可是他的批评仅仅涉及理论,而非历史。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总是忽略过去的失败,认为它们与未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可行性毫不相干。米塞斯挑战的正是他们实现自己宏伟理想的可能性。

标准的批评认为社会主义夸大了人类热爱劳动的程度,这个问题米塞斯在《民族、国家与经济》里已经讨论过了。社会主义者的回应是,人们现在憎恨工作,只是因为市场经济在客观上剥夺了他们的劳动和劳动果实。未来将会诞生社会主义新人,他们不再沉溺于自私自利,而是在集体利益中获得自身的极大满足。米塞斯反驳说,没有任何国家能比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德意志帝国更加注重作为社会主义新人标配的利他主义了。如果社会主义在德国都不能成功,那还能在什么地方成功呢?

这是一个不错的论点,不过和米塞斯在1920年1月会议上提出的论点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此时,米塞斯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无论民众的心理状态和动机如何,社会主义都会在经济上劣于资本主义。即使未来产生社会主义新人,中央

计划经济依然存在致命的缺陷。

米塞斯详细阐述了他在《民族、国家与经济》中只是简单论及的一个问题，他在书中曾提到价值或货币计算在国民经济资源分配中的作用。当时他评论说，生产资料必须时时更新补充，不仅为扩大生产规模，更为维持现有生产机制。那么问题在于，哪些生产资料应该更新？就像所有的经济决策一样，这里也存在着权衡和优先的问题。若要理性地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必须对当前生产资料的损耗程度有一个清晰的判断标准。“在一个静态社会里”，生产资料“总是仅被其他同类生产资料替换”，米塞斯论证说，静态社会的人们以现有的生产结构作为具体准绳，但是，“在一个变动不居的经济体中，这种简单的计算方式对于大多数生产资料来说是不适用的，因为用尽和耗竭的生产资料可能不是被同类而是被别的类型的生产资料替换”。在这样一个动态的环境下，“适用于原始静态经济的实物单位计算，就必须转变为货币价值计算”。⁹米塞斯进而描述了商人的经济计算的社会功能：

个别生产资料消失在生产过程中。不过，资本仍然得以维持和增加。那不是独立于经济人的意志而存在的自然过程，而正是他刻意行为的结果。这些行为统筹安排生产和消费，以便至少能够维持资本价值的总量，只在出现盈余时才把多余的资源用于消费。这一切的前提条件就是价值计算，而会计是价值计算的辅助手段。会计的[社会]经济任务是衡量生产是否成功。它必须确定投入的资本是增加、维持抑或减少。因此，[个别的]经济计划以及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分配比例都要基于之前的会计计算。¹⁰

米塞斯在1920年1月的演讲沿着同样的思路进行，他强调经济计算在分配生产要素方面的关键作用。听众表示赞同，他们中的大多数过去只把经济计算视为反映资本家个人利益的“盈利计算”，却从未想过它是经济事务中理性的化身。本来，在这个所有准则都有可能遭到质疑的世界，代数和算术始终是颠扑不灭的真理。现在，米塞斯直达其论证核心，提出了两个大胆的命题：

第一，社会主义无法利用市场经济司空见惯的经济计算。因为企业的经济计算必须基于生产要素的货币价格。社会主义不存在以货币计算的价格。这是由于价格只能通过交换产生，而交换的前提是至少存在两位所有者。但是按通常的定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全部生产资料都由社会统一管理。这些生产资料属于一个统一的经济实体：社会、“人民”、共同体或国家——总之是个集体概念。关键在于，从经济角度看，在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下，所有生产要素都只有一个所有者。

因此,生产要素无法交换,也就无从产生货币价格。也因此,社会主义不能基于资本主义市场常见的经济计算分配生产要素。

第二,不存在其他经济计算的手段。经济计算需要生产要素的货币价格,只能存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

经济计算代表着经济理性,因此,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

与会者立即意识到,米塞斯踏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人们已经从许多角度批评过社会主义,但几乎不曾怀疑过中央计划的效率问题。如果米塞斯的命题为真,那就撼动了社会主义大厦的根基。他将优雅而彻底地一举击溃马克思及其当代门徒,例如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和新兴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出席了这次会议。简言之,米塞斯的论文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猛力一击,驳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全欧洲普遍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教义。¹¹

377

接踵而至的辩论既澄清了米塞斯论证的关键层面,也预示了社会主义理论家在随后数年里会采取的形形色色的思路。社会主义学者试图捍卫他们体系的正确性,掩盖体系本质上的经济非理性。米塞斯后来在一封致莱德雷尔的信中总结了这次讨论:

我的首要意图是要揭示自由经济制度下的经济计算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无法想象的,因为经济计算的前提是必须形成生产资料的货币价格。在国民经济学会的讨论中,我演讲的这个部分大体得到了与会人士的认可,即使马克斯·阿德勒和海伦妮·鲍尔也只在一点上提出了异议,即相较于自由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的经济理性会选择其他方式和途径。但是这些其他途径到底是些什么,他们没有指明。

阿蒙也基本认同我的观点。我刚与他通过电话。我告诉他,您希望他为《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整理一下对我这篇论文的评论。他回答说,虽然从根本上认同我提出的社会主义的消极一面,但由于无法为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体系提出积极建议,恕无法从命。

378

熊彼特提出了以下建议: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发给每位同志一定数量的记账货币作为工资,并为自由定价留下余地,从而通过商品交换产生货币价格。不管怎样,这个建议还是无法绕过我在前面指出的问题。因为高阶财货(higher-order goods)仍然处在流通领域之外,即使有了记账货币,仍然无法理顺生产资料的价格,因此,经济计算在生产领域无法实现。

我相信我的论据已经充分阐明了我的观点的要旨,准确说就是:社会主义

无法实现自由经济制度下的经济计算。我也看不到社会主义可以采纳任何其他他想象得到的经济计算方法。我相信这是社会主义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对于社会主义理论来说,远比过去提出的关于平均利润率的问题严重得多。¹²

这场争论开启了后来旷日持久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大辩论,并成为“现代经济学中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¹³

379 国民经济学会的会议以米塞斯的胜利而告终。会前,所有人都期待他义不容辞地捍卫自由主义的最后堡垒,不料他却转守为攻,把一次保卫战变成了对社会主义理论核心的突袭战。维也纳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精英们在离场时神情黯然,他们曾相信马克思主义早已赢得了这场思想之战,剩下的只是那些来自特殊利益集团和蒙昧人士的无谓抵抗罢了。米塞斯的对手们提出的异议显然愈加站不住脚,大部分观点也早已在米塞斯的意料之中,在以后的数周、数月和数年里,米塞斯将继续保持他的优胜地位。

埃米尔·莱德雷尔的评论颇能说明问题。¹⁴就像阿德勒和海伦妮·鲍尔一样,他也口若悬河地大谈特谈至今仍不得而知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体系的优越性,辩称它将兼有资本主义经济计算各种替代方案的优点。但他却说不出这样一个体系的实质内容。¹⁵莱德雷尔还评论说,资本主义的会计方法未能描述真实的画卷,而仅是程式化的模型,严重依赖于企业家判断力这一主观因素。但是米塞斯早已承认了这些缺点,它们与他的论文主旨无关。实际上,他并没有说过资本主义经济计算会比社会主义经济计算更客观,而是说,任何经济计算都以生产资料的货币价格为前提。在资本主义社会,相关价格(未来的货币价格)的确只能通过推测得知,但问题是只有在资本主义里才有价格可以推测,社会主义连价格都没有呢。

380 与此类似,莱德雷尔也把米塞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无法得到理性指引的说法,曲解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不会产生任何理性的领袖。米塞斯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缺乏理性分配任何资源的衡量标准。没有这些衡量标准,即便最伟大的领袖也无法有效组织生产。米塞斯写道:

我根本不是在说社会主义社会无法产生优秀的领袖。我的推断是,这些领袖不会擅长理性,而会擅长感性和直观。¹⁶

这的确是一个出色的推断。米塞斯在此总结了一个全能政府时代政治领袖的本质。

思想背景

米塞斯这个论证的政治含义十分明显。如果米塞斯是对的,全面社会主义就不再是一个有效的选择,只有资本主义或某种顺应市场的混合经济才是摆在台上的可行政治方案。

不过,这个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的论证在理论上还有更深远的意义,远远超出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部分经济学家的认识。事实上,这个论证是迈向新的生产理论的第一步和决定性的一步,后者将建立在与主流经济学完全不同的基础上,而在当时,奥地利学派仍然属于主流经济学派。尤其因为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的著作和伟岸的人格魅力,大多数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都不自觉地接受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学说,穆勒认为生产和分配是人类政治经济活动中的两个独立领域,无论是在经济分析还是政治实践方面都相互独立。按照穆勒的观点,生产本质上是一个技术问题,只有分配才有所谓分配正义。经济科学仅仅探讨分配制度,也就是市场经济。穆勒说道:

381

然而很明显,在政治经济学的两大领域——财富生产和财富分配领域中,只有后者与价值问题有关;而且后者也仅就分配动力为竞争而非惯例或常规而言,才与价值问题有关。即使社会安排不取决于交换,或者不许交换,生产的条件和法则也仍将同现在一样。¹⁷

与此相应,人们认为所有权和占有问题是法学而非经济分析的主题。

穆勒对生产和分配关系的描述,与卡尔·门格尔关于财货等级的理论(theory of the order of goods)是不相容的。根据门格尔的理论,高阶财货(离最终消费品较远的财货)的价值来自低阶财货(lower-order goods)(离最终消费品较近的财货),而后者的价值则来自最终的消费品。生产要素之所以有价值,只是因为它们为消费品的生产服务。因此,道路、机器、车辆、石油等等,所有这些财货的价值,都来自于它们间接为消费者提供的享受。这一基于常识的观察彻底颠覆了古典经济学的思路——价值的生产成本理论认为,消费品之所以有价值,只是因为生产它们的资源是有价值的。

不过,准确解释生产要素的价值如何来自消费品的价值,不是一件轻松简单的任务。什么叫价值“来自”某处?换句话说,当我们说行为入把消费品的价值“归

382

于”某个生产要素,究竟是什么意思?卡尔·门格尔只是简单地讨论了价值的归属(*Zurechnung*)问题。¹⁸可以这么说,门格尔和庞巴维克都相信消费品的价值取决于行为人的法律状态,因此在他们看来,生产与分配密不可分。两人的著作都很重视市场经济的环境,但却忽略了如何根据不同的法律框架修正分析结果的问题。

在早期奥地利学者中,只有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系统性地分析了价值与分配的关系。他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详细阐述门格尔价值归属理论的基础上,给出了一个全新的回答。¹⁹

383 门格尔把他的归属理论建立在以下假设上:价值是一个数量,或者至少是某种延展实体(*extensive entity*)。这个假设对他的归属理论是必需的,因为如果价值没有延展性质,我们就难以理解它为何能从某一事物归属到另一事物上。德国一些最杰出的经济学权威同样认同这一假设。²⁰当然,这个假设不会与边际效用理论的主流解释冲突。由于维塞尔的努力,人们普遍把边际效用理论视为一种处理人的满足感和饱足度的“心理学的”方法。这些心理感觉在强度和持续时间方面是可变的。

维塞尔不加怀疑地采纳了门格尔关于价值是一个数量的假设,另外,他还在门格尔思想体系里加入了对价值本质的进一步推测。特别是,他得出了关于价值的两个新观点,后来证明,这些观点在他自己的价值理论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也预示了那些将在20世纪其余岁月里得到应用的经济分析方法。

首先,维塞尔提倡使用如下虚构:无须涉及行为人的财富或收入也可以有意义地谈论价值。²¹独立于收入和财富的价值即为“自然价值”。当然,资本品的自然价值来自最终消费品的自然价值。而消费品的自然价值如何归属资本品,则是归属理论的主题。

384 其次,自然价值对所有人都相同,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价值是客观的。例如,维塞尔声称,货币数量的增加导致了每个人手中持有货币的价值的下降,因此他认定,任何给定数量的货币,对于富人的边际价值要比穷人低。因此,尽管维塞尔也有一些言论强调了价值始终与某个行为的个人有关,但他的自然价值理论却彻底切断了财货价值与任何具体的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

这就是维塞尔关于资本主义缺陷的理论出发点,同时,也是他的政策建议的出发点。显然,现实中货币经济带来的结果不太可能与一个自然价值支配的经济体系相同。根据维塞尔的理论,只有当所有社会成员在财富和收入方面彻底平等时,货币经济的价值才会与自然价值一致。那么,既然自然价值是所有可能的真实经济的理想境界,所以很自然地,我们的经济政策就应该保证所有生产要素都依它们

的自然价值得到对待。也许在一个完美的共产主义社会可以实现这一理想。不过,也有可能市场经济中通过大量的政府干预得以实现。²²

维塞尔理论的实际应用和伟大创新之处,就是它彻底颠覆了价值理论在生产 and 分配中的地位。在穆勒的思想框架中,价值理论并不关注生产过程,而只涉及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分配问题。维塞尔反其道而为之,指出有关分配的决策可以忽略财货的价值,而在有关生产的决策中,价值问题就是核心问题,否则一定会产生资源浪费。现代边际效用价值理论不仅可以解释所有社会组织类型里所有财货的价值,还能用在一切想象得到的社会里,解决生产要素的估值和分配问题。因而,与穆勒不同的是,维塞尔的价值理论是一个真正的一般理论。²³以货币价格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计算,只是价值计算一般原则的一个应用——而且还是一个有着严重缺陷的应用。 385

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维塞尔的分析框架已经成了正统。²⁴他的归属理论在技术细节方面的确存在争议,而且还有庞巴维克稍有不同的研究方法与之抗衡。²⁵不过价值归属理论所倚仗的一般假定和主要优点,尚未遇到任何一位主流理论经济学家像样的抵抗。最值得注意的,庞巴维克没有提出实质的反对意见。虽然庞巴维克对维塞尔重视经济学虚构的作法并不怎么热心,但也采纳了门格勒的价值概念,即价值是一个延展实体,可以归属到其他事物。因此,庞巴维克加重了维塞尔给年轻的经济理论家带来的混乱。 386

唯一从理论上对维塞尔理论的正统地位发起挑战的,却是一位来自俄国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者——尼古拉·布哈林,他曾是庞巴维克研讨班上的学员,后来成了苏维埃俄国最顶尖的经济学家。布哈林的《有闲阶级经济理论》(*Economic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于1917年在俄国首次刊印,他在这部著作里全面攻击了新兴的边际效用理论,并以奥地利经济学派为主要的炮轰对象,因为“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最强劲的对手就是奥地利经济学派”。²⁶

布哈林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驳斥奥地利人自我标榜的价值理论的一般性。他评论说:“马克思关注的是历史性地确立起来的人际关系,而庞巴维克却提出了人、物之间关系的一般形式。”²⁷但是这些一般关系形式不足以解释市场价格,因为市场价格的产生,也像许多其他事物一样,源自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偶然特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私有产权和商品生产。布哈林说:

显然,甚至经济学的基本现象,即价值现象,也不能以商品满足人类欲望这种对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普遍存在的状态加以说明,然而这正是奥地利学 387

派的“方法”。

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奥地利学派忽略资本主义的特性,走上了一条完全错误的方法论道路。²⁸

米塞斯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理论不仅超越了维塞尔的理论,也推翻了穆勒和马克思的学说。

第一,米塞斯认同布哈林对旧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批评,指出不可能存在一般的价值计算原理,因为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价值计算这种事情。事实上只有价格的计算,而价格又只能存在于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时代和地方。经济计算的存在是一件历史的偶然事件。

第二,米塞斯指出,经济计算的历史偶然性本身就宣告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破产。经济事务中的理性只存在于私人占有资本品的时期。反之亦然,越是接近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经济事务就越缺乏理性。理性的经济秩序并非自然本性,而是完全依赖于脆弱的人类制度,而这需要通过持续的文化和政治努力耕耘获得。

第三,米塞斯粉碎了穆勒关于生产和分配相互独立的教条。资本主义的生产受到商人的经济计算的指引,但是这些计算只存在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下。在那些缺乏私有产权的体制下,不可能存在这样的计算。因此,生产依赖于分配,分配也依赖于生产,两者不可分割。

* * *

388 米塞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不可能性的论证借鉴了前人的两个洞见。这些洞见融入了《货币与信用原理》第二章对货币理论的概述。

第一个思想来源是格奥尔格·西美尔和约瑟夫·熊彼特的著作,他们把经济行为的本质定义为交换,人的每次行为都“换得”一个看来较好的状态而非一个较差的状态(今天我们会说“选择”而非“交换”,但意思相同)。²⁹正如米塞斯后来指出的,人类行为的这一本质特征同时也是价值现象的基础。在《货币与信用原理》少数几段论述价值理论的部分,米塞斯决定性地阐述了门格尔对价值的定义,“所谓价值,就是一种财货或一种财货的一定量,在我们意识到对于它的支配关系到我们欲望的满足时,为我们所获得的意义”。³⁰

按照门格尔的价值定义(有时与他实际的价值分析冲突³¹),价值是单个经济财货自身的特性。相反,米塞斯所定义的一件财货的价值,却是明确以另一件与它

做比较的财货为参照的,而且他还强调,这一“比较”是建立在选择的基础上,因为它涉及“评价行为”。简言之,米塞斯同意熊彼特的观点,认为价值与满足感或任何其他感觉无关,因此,经济学家不需要涉足心理分析领域。价值是序数性的,是相对的,是一种关系。价值不是一个数量。米塞斯强调了这些非正统的观点,继而界定了价值与人类的选择密不可分:

389

每笔经济交易都以一次价值比较为前提。但是,这一比较之所以必要和可能,仅仅因为有关人士必须在若干商品中加以选择。³²

通过这些段落,米塞斯把奥地利经济学的价值理论——经济分析的基石——架设在一个全新的轨道上。卡尔·门格尔曾经断然否认价值现象依赖于人类的选择。他相信,只要这个问题与自由意志扯上关系,“就会从根本上否定经济学作为精确科学的地位”。³³门格尔因而强调,是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因素决定了定价过程。市场价格最终取决于个人的需要,而个人的需要只能以稀缺的手段来满足。他意识到人类必然拥有关于手段和目的之间“因果关系的知识”,但是门格尔式的定价分析几乎没有关注这个主观因素。³⁴在门格尔的分析中,价格和价值理论是柏拉图式财货理论的一个分支。而到了米塞斯这里,它则成了基于现实的人类行为理论的一部分。

390

其次,米塞斯这个基于选择的价值理论也结合了弗朗茨·丘赫尔的见解,后者认为个人决策背后的价值是无法度量的。在审视了这个领域的著作后,他相信弗朗茨·丘赫尔是正确的,丘赫尔强调价值只是经济财货之间的一种纯粹的序数关系,总是无法脱离由具体的个人、时间和地点组成的环境。

评价行为不能容许任何种类的度量。诚然,每个人能够说出一块面包是否对他比一块铁的价值更大,或比一块肉的价值更小。由此可见,每个人都能做成一张很长的价值比较表:由于此表必须假定欲望与商品之固定的组合,故只能在一定时期之内有效……除了个人如此构成的价值等级之外,经济活动再无可资依据的其他基础。当两个单位商品在两个人的价值等级表上处于不同次序时,即有交易行为发生。交易将在市场中继续进行,直至任何两人均不能通过商品互换而使换得的商品,在价值等级表上较所放弃商品居于更高的次序为止。如果个体想在经济基础上进行交易,他只需就个人的判断来考虑有关商品的相对重要性。这种对比较价值(relative value)的估计,根本不涉及

391

度量的观念。³⁵

米塞斯这些段落几乎已经预示了他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理论。1920年讨论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的论文,只是他对卡尔·门格尔价值理论最初修正的一个重要应用:人类无法计算价值——只能计算价格。但是依赖是相互的。如果不理解米塞斯对价值理论的修正,就无法充分理解他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理论。

20世纪20年代早期,几乎没人理解米塞斯对价值的定义。这个新的价值理论深埋在一本讨论货币的著作中,得不到世人的关注也是很自然的。再者,他的大部分读者对这类理论问题只是略知皮毛。那些关注货币理论的读者通常不太了解一般价值理论,而对一般价值理论感兴趣的经济学家又不太可能对一位年轻货币经济学家的价值理论辨析进行深入探索和思考。随着时间的推移,米塞斯的地位日渐边缘化,他的经济计算观点越来越难以为一代新兴的专业经济学家所理解。

392

胜 利

1922年初,米塞斯已经完成了一本全面论述社会主义的著作手稿,并在寻觅优秀的学术出版商。³⁶慕尼黑的东克尔与洪布洛特出版社回绝了米塞斯,因为艰难的通货膨胀正在摧垮德国经济,出版一本厚达五百页的学术专著要冒巨大的风险。蒂宾根的莫尔出版社(Mohr)有兴趣出版,但是要求米塞斯删减五分之一的篇幅。米塞斯继续寻找,在2月份与耶拿的古斯塔夫·菲舍尔出版社(Gustav Fischer)签了一份出版合同。

米塞斯的版税可根据通货膨胀进行调整,但他们的合同对此只有相当含糊的约定。³⁷从2月份合同签订到7月份出版发行的这段时间,物价急剧上涨,而菲舍尔出版社颇有风度地把稿酬增加了一半,米塞斯对此深感欣慰。³⁸事实证明,菲舍尔出版社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此菲舍尔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一直是米塞斯著作的出版商。

393

此书出版后获得了巨大成功。当时德国经济学界对于主流的历史学派和讲坛社会主义的不满正在日益加深,人们逐渐觉得他们理论的弊端远大于好处。这是此书大获成功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战前,德国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正统地位已经有了衰落的迹象。³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利加速了社会主义的失势,更多专家学者乐于倾听其他学说。在这种形势下,米塞斯的著作得到了当时德国社会科学界两位巨匠的肯定和支持:马克斯·韦伯和海因里希·赫克纳。

韦伯在《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此书于1922年在他死后出版)中提出的思路与米塞斯1920年的论文大致相同,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规划局不可能把它的资源配置建立在经济计算基础上。⁴⁰一些作者例如奥托·纽拉特⁴¹设想用“实物计算”代替资本主义的货币价格计算,韦伯对此并不认同,他评论说:

今天的企业,根据货币成本计算赢利,以此比较不同的生产方式,以及不同种类的原料和原料的不同处理方式。而对实物计算来说,这方面就存在着巨大的困难,客观上是无法解决的。

394

韦伯随后的讨论表明他完全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和具体表现,以及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法:

企业始终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它的各个部门是否非理性地运作,也就是说,是否无利可图,如果是,又是什么原因?问题在于确定哪些部分的实物消耗(按照资本会计的术语,就是成本)是可以节省下来的,或者尤其重要的是,可以更加合理地用于其他环节。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和有把握从货币记账的“成本”(包括相应的利息开支)和“收益”关系中进行事后核算查明。然而,想要完全通过实物计算的方式做到这点,却是极端困难的;即便可以,也是在非常简单情况下才有可能。我们可以相信,这不是一个通过“改进”计算方法就可以克服的困难,而是使得任何进行真正严格的实物计算的企图成为不可能的根本障碍。

即便引入无货币的工资系统也无法根除非理性的问题,因为这些方法从一开始就不适合识别非理性的根源。

根本问题在于,人们如何可能发现组织的哪个地方采用这些生产方法是有利可图的,因为这个部门还存在着某些非理性的因素。正是在如何找出这些地方方面,实物计算碰到了一些困难,而用货币计算进行事后计算不会产生这种困难。

韦伯继续指出阻碍实物计算方案实施的关键因素,也即,只有货币归属能够生效,效用归属只是一个妄想:

395

作为企业计算基础的实物会计(它将包括一个按部就班的经济体中那些异质的和他律的生产单位),我们在讨论归属问题时会发现它的根本局限。因为这样一个系统的归属问题,不像簿记的事后盈亏计算那样采取简单的形式,而是像它在边际效用理论中那样以极富争议的形式出现。为了合理利用生产手段,实物计算系统必须算出各个资本财货的“价值”指标,这些指标承担现代商业会计中账面价值的“价格”功能。但是我们一点也看不出如何确定尤其是如何检验这些价值指标。例如对于不同的生产单元,它们是否有所不同(根据经济配置),还是在整个经济体中都是统一的、基于某种“社会效益”的,也就是说,按照(现在和将来的)消费的要求?

韦伯告诫读者,不要误以为这只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以为只要投入足够的人力资源寻找解决方法就能最终克服:

有人认为,只要付出足够心力试图解决无货币经济体的问题,就能发现或发明一种会计方法。这是无济于事的。对于任何类型的全盘社会主义,这都是一个根本问题。由于在这个决定一切的根本点上,我们没有办法提供任何方法,以便实施一个合理的“计划”,因此,我们无法谈论合乎理性的“计划经济”。

396 显然,韦伯和米塞斯完全独立地提出了同样的想法。⁴²不过,很有可能是米塞斯启发了韦伯最初的灵感,因为两人在1918年夏季学期韦伯访问维也纳大学期间曾经多次促膝长谈。当时政府为军官开设了一门课程,教授他们如何处理各类基本政治问题,两人都担任了课程的教员。其中一次课程,韦伯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一般问题的演讲。后来这篇演讲的笔记经韦伯同意得以发表。⁴³值得注意的是,韦伯在这篇论述社会主义的演讲里丝毫没有提及经济计算问题。

虽然如此,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当韦伯以56岁之龄于1920年6月14日去世时,他和米塞斯在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而且,韦伯的鸿篇巨制也于1922年最终出版,这部巨著遂以作者绝对的权威成了米塞斯的坚强后盾。这让德国主流经济学家大为惊惶,那时他们仍然醉心于讲坛社会主义传统。此外,就仿佛是在声援韦伯和米塞斯一般,全世界社会主义模范国家的领袖弗拉基米尔·列宁适时宣布从经济阵线部分撤退:苏维埃俄国将实行新经济政策,引入更多的商业和贸易自由。之前苏联曾企图废除货币和市场,却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而这

正是米塞斯所指出的全盘社会主义必然出现的现象。

不过,真正给予德国学院社会主义致命一击的,却是阵营内部重要人物的反戈。海因里希·赫克纳接替了施莫勒在柏林大学的职务,并担任了社会政策协会的主席。这在事实上意味着他已经成了施莫勒的接班人,扛起了历史学派和德国社会政策运动的大旗。1922年9月,协会在埃森纳赫召开了五十周年纪念大会,这次会议表明,赫克纳站在了那些憎恨过度的历史主义和学院社会主义的人士之列。他呼吁更多的节制,实际含义就是重新审视古典经济学的信条。赫克纳陈述说,即便伟大的施莫勒也在去世之前不久向他吐露,担心年轻一代缺乏“从自由贸易的角度思考”的能力。赫克纳认为,这一能力的匮乏已经导致了荒谬观点,比如夸大国家改变经济法则的力量,而且也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⁴⁴

这些观点已经变得较为可接受了。赫克纳的演讲也受到与会听众的热烈欢迎。第二年,赫克纳发表了一篇广为流传的论文,内容为“论经济科学对社会政策改变了的意义”。他在文章中论证说,工会严重妨碍了战后的经济重建,尤其表现在他们抵制延长工作时间以及任何限制罢工权的提案上。德国经济受到更为错综复杂的监管制度的深深束缚,而工会就是监管制度背后的主要政治推动力量。通晓历史的经济学家对于这场运动的最终后果深感忧虑:它将或者造就某种乖张的工会寡头政治,或者造就一个重商主义政策国家。过激政策引发的一个自然反应就是反向的过激。令人畏惧的曼彻斯特学派将会卷土重来。赫克纳接着单独挑出米塞斯的《社会主义》作为这股自由主义思想回潮的最重要的例子,几乎公开赞同所有米塞斯严厉批判社会主义的地方。赫克纳敦促他的同僚彻底审视这些新的理论经济学家的思想,他说:

397

398

在这条研究路线上,维也纳经济学家路德维希·米塞斯写的《社会主义》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最精彩和最有启发性的著作。这位作者站在最新科学前沿,在一定程度上以全新的观点为基础,强有力地批判了所有类型的社会主义和他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所有事物。⁴⁵

这番评价把米塞斯的《社会主义》从象牙塔里的小众阅读拉到了主流经济界,并成就了它贯穿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恶名。赫克纳的让步不仅前所未闻,甚至称颂一位可憎的“理论家”,这在工会内部引起了巨大的愤慨,工会成员愤怒地要求重新评定赫克纳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⁴⁶不过,赫克纳的威望也迫使德国主流经济学家重审被他们视为珍宝的科学和政治教条。颇有影响力的海因里希·佩施

(Heinrich Pesch)承认米塞斯是新曼彻斯特主义的领袖。他解释说:

由于米塞斯的睿智和对社会主义的原创性批判,他已经赢得了一些作者的尊重和认可。那些作者的观点原先与他截然相反,他们拥护立法保护妇女儿童和(强制)推行职工保险。⁴⁷

399 这些作者中,有许多人开始看到社会主义方案在战后的失败不是因为公众缺乏心理或思想准备;失败源于那些方案自身的缺陷——米塞斯和韦伯的著作所强调的缺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放弃他们原先的社会主义理想。这轮思想转变后来被称为“社会政策危机”,⁴⁸米塞斯及其著作在这场“危机”中的核心作用可以通过以下事实推断:截至1924年10月,单单有关经济计算⁴⁹这个主题,就有超过二十本专著和论文出版。

大约三十五年后,米塞斯回顾了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理论的影响,发现自己的观点改变了后来的辩论内容。他评论说:

此前所有支持伟大变革的观点都破产了。从那时起,社会主义者不再寄希望于他们论证的可信,而把希望放在大众的抱怨、羡慕和憎恨上。今天,甚至精通“科学”社会主义的专家也完全依赖这些情感因素。当代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的基础就是价值判断。社会主义也被歌颂成唯一公平的社会经济制度。⁵⁰

未竟的革命事业

400 米塞斯的经济计算理论的核心是:基于货币价格的经济计算是市场经济中企业家行动的必要思想工具,但是,依据“价值”的经济计算却是无法实现的。只有通过一个延展单位的倍增才能实现数学计算。举例来说,一个苹果可以与一个苹果相加,一克拉白银可与另一克拉白银相加;反之,一部电话不可与一首钢琴协奏曲相加,机智无法与沉默相加。这些单位的度量尺度各不相同,所以不能通过数学运算相连。价值也如此,由于价值不具备延展性,因之无法度量,所以我们也无法量化一件事物的价值。

不过,价值可以定性地从消费品“归属”到生产要素,这是在价值依赖的意义上说的:生产要素之所以有价值,只因为它们用于生产有价值的消费品。但是没有

所谓定量的价值,不存在价值的计算,只存在价格的计算。20世纪40年代,米塞斯在他的经济学著作里清晰明了地表达了这个思想,总结了他对这个问题毕生的思考:

货币表示的价格可以相加,偏好程度[也即价值等级]不能相加。我们不能单独抽出价值或价值的部分。价值判断不是别的,只是仅仅指涉某物优于他物。

价值归属的过程,无法帮助我们直接从联合产品的价值导出单个生产要素的价值。此一过程对于经济计算毫无帮助。只有市场运作提供经济计算的必要条件,因而确立了每种生产要素的价格。经济计算,总是价格的计算,决不涉及价值。⁵¹

这些见解为社会科学研究和人类社会的演化开辟了全新的视角。若要选出米塞斯对人类知识的最大贡献,那一定是他的经济计算的一般理论。1920年的这篇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论文是向阐述这个理论跨出的第一步。

401

米塞斯几乎是在挑战整个职业经济学界。自从亚当·斯密时代以来,他们就心照不宣地把他们的推理建立在一个前提上,即所有的人类行为都基于某种经济算式。米塞斯坚持认为这一可能性仅存在于市场经济中。如果没有市场,就只剩下了个人的价值判断。经济理性是政治和历史的偶然产物。人类文明的所有经济前提——广泛和深刻的劳动分工、资本密集产业、生产要素的理性分配,只存在于那些保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

然而,米塞斯发表他那篇讨论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原创论文时,他的表述并没有后来那样坚定。1920年,对读者来说很清楚的是,他认为“度量”价值是不可能的;然而他似乎承认价值是一种心理感觉。⁵²许多读者一定奇怪为什么在原则上无法度量情感的不同强度。而且,如果情感强度可以度量,那为什么就不能计算这些用情感定义的价值?实际上,米塞斯本人的语言为这种怀疑推波助澜。在20世纪20年代初,他没有强调经济计算“总是价格的计算,决不涉及价值”。恰恰相反,就在那篇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计算根本问题的论文里,他反复强调了经济计算是一种“价值计算”或“计算价值”。

402

某种程度上,混乱来自术语。米塞斯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使用“价值”概念。术语“wert”(值)在德语里的含义与英译的“value”同样模棱两可——这个单词在定性意义上指价值,但也可以指市场上的交换率。不过就算没有语义上的含

糊,米塞斯本人也确实存在着明显的混乱。比如,在1922年出版的讨论社会主义的著作里(以1920年的论文为基础),他写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和劳动力不停地流动,直到各地的边际效用拉平为止。”⁵³这句话与价值计算之不可能性是相冲突的。

403 他的年轻读者大都熟悉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关于奥地利经济学派价值理论的阐述,他们必定以为米塞斯和维塞尔在价值理论方面大体一致。毕竟,米塞斯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来挑战经济计算本质上是价值计算的观念。他仅仅指出,只有在市场经济下才存在价格这种计算单位允许计算生产要素,而社会主义国家缺乏这样的单位。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唯一认识到丘赫尔-米塞斯价值理论与主流的维塞尔理论之间关键区别的却是卡尔·兰道尔(Carl Landauer)。他是一位狂热的社会主义者,发表了两篇对《社会主义》的评论,文中充满了对作者个人的谩骂。兰道尔写道:

通过他的基本命题,米塞斯彻底站在了边际效用学派主要思想的对立面……边际效用学派的经济计算不是任何特殊经济制度的特征,既然它可以应用于资本主义,就能够也必会应用于共产主义制度。⁵⁴

404 米塞斯在1920年前后的著作和通信使用的表述让我们得出结论:他本人并没有完全理解自己的价值理论与经济计算理论之间的关系。在这些早期著作中,没有一处提到这个明确的判断,即经济计算“总是价格的计算,决不涉及价值”。因而他的读者和学生错失这一要点就在意料之中了。他们把1920年的论文误认为是一个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聪明的技术挑战。他们没有看到(多半也无法领会)这篇论文的深层意义。米塞斯向革命性地修正经济科学和政治哲学方向跨出了第一步,但是他没能传达完整的信息。结果就是,对于正在奥地利崛起的整整一代年轻经济学家们来说,他缺乏扭转他们思想的必要的冲击力,无力促使他们走出维塞尔经济学的阴影。优秀的年轻才俊如哈耶克、哈伯勒、摩根斯特恩和其他第四代奥地利经济学家们所接受的教育,都把价值计算当作经济科学中不容置疑的学说。

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米塞斯认识到了自己在教学上的失误,于是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详细解释他的价值理论的认识论意义。然而为时已晚,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已经着手用维塞尔的观点重新思考和表述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理论,这让他的论证比起米塞斯的版本更加脆弱。颇为典型的是,哈耶克本人相信自

己只是在澄清米塞斯的立场。这个混乱困扰了奥地利经济学派长达数十年之久，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一些学者重新强调了米塞斯和哈耶克的方法之间的重要区别。⁵⁵

注 释

1. Eduard März, “Die Bauer-Mises-Schumpeter-Kontroverse,” *Wirtschafts-politische Blätter* 28, no. 4 (1981): 66f.

2. Benjamin E. Lippincott, “Introduction,”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B. E. Lippincott*, ed. (New York: McGraw-Hill, 1964), p. 4.

3. 参见 Walther Rathenau, *Zur Kritik der Zeit* (Berlin: Gustav Fischer, 1912); idem, *Deutschlands Rohstoffversorgung* (Berlin: Gustav Fischer, 1916); idem, *Probleme der Friedenswirtschaft* (Berlin: Gustav Fischer, 1917); idem, *Von kommenden Dingen* (Berlin: Gustav Fischer, 1917); idem, *Die neue Wirtschaft* (Berlin: Gustav Fischer, 1918); idem, *Die neue Gesellschaft* (Berlin: Gustav Fischer, 1919); idem, *Der neue Staat* (Berlin: Gustav Fischer, 1919); idem, *Autonome Wirtschaft* (Jena: Diederichs, 1919)。这批文献数量庞大,必然引起各种反对意见。例如,参见 Walter Lambach, *Diktator Rathenau* (Hamburg: Deutschnationale Verlagsanstalt, 1918); Theodor Fritsch, *Anti-Rathenau*, 2nd ed. (Leipzig: Hammer, 1919)。关于拉特瑙对米塞斯的影响,参见 Hans Jörg Hennecke,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Düsseldorf: Wirtschaft und Finanzen, 2000), pp. 40f。

4. 参见 Friedrich Bendixen, *Sozialismus und Volkswirtschaft in der Kriegsverfassung* (Berlin: Guttentag, 1916); Richard Riedl, *Die Aufgaben der Übergangswirtschaft* (Vienna: Veröffentlichungen des Generalkommissariates für die Kriegs- und Übergangswirtschaft No. 1, 1917); Karl Pribram, *Die Grundgedanken der Wirtschaftspolitik der Zukunft* (Graz: Leuschner & Lubensky, 1918); Rudolf Wissel, *Die Planwirtschaft* (Hamburg: Auer, 1920); idem, *Praktische Wirtschaftspolitik* (Berlin: Verlag Gesellschaft und Erziehung, 1919)。维塞尔是德国政府的一位部长。批判的声音寥寥无几,其中包括 Andreas Voigt, *Kriegssozialismus und Friedenssozialismus* (Leipzig: Scholl, 1916); and Julius Meinel, *Zwang oder Freiheit?* (Vienna: Manz, 1918)。

5. 参见 Otto Neurath, *Durch die Kriegswirtschaft zur Naturalwirtschaft* (Munich: Callwey, 1919); idem, *Die Sozialisierung Sachsens* (Chemnitz: Verlag des Arbeiter- und Soldatenrates, 1919); Otto Neurath and Wolfgang Schuhmann, *Können wir heute sozialisieren? Eine Darstellung der sozialistischen Lebensordnung und ihres Werdens* (Leipzig: Klinkhardt, 1919)。

6. Otto Bauer, *Der Weg zum Sozialismus* (Vienna: Verlag der Wiener Volksbuchhandlung, 1919)。

7. 社会主义历史学家爱德华·梅尔茨曾低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参见 März, “Die Bauer-Mises-Schumpeter-Kontroverse,” p. 70。

8. “Die Wirtschaftsrechnung im sozialistischen Gemeinwesen.” 参见米塞斯致莱德雷尔, 1919年11月14日; Mises Archive 73: 56f。

9. 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Vienna & Leipzig: Manz, 1919), p. 130; translated by Leland B. Yeager as *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59f.

10. Mises, *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p. 160;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pp. 130 - 31. 米塞斯进而强调了在这个过程中主观判断的作用:

会计并非完美无瑕。会计数字的精确性虽然让门外汉印象深刻,但却只是表面现象。它所涉及的对于财货和债权的评估,总是建立在预测基础上,而预测又总是依赖于对一些或多或少具有不确定性的因素的解释。

11. 后来证实米塞斯还有一位重要前辈,就是著名的荷兰经济学家尼古拉·皮尔逊(Nicolas G. Pierson)。皮尔逊出任过荷兰的财政部长和荷兰央行行长一职。在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卡尔·考茨基的辩论中,皮尔逊论证说,任何经济体系都必须解决定价问题,社会主义者应该说明在没有市场体系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定价。参见 Nicolas Pierson, “The Problem of Value in the Socialist Community,” F. A. Hayek, ed.,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Critical Studies on the Possibilities of Socialis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35), pp. 41 - 85。皮尔逊这篇论文写于1902年,最初以荷兰文发表,在德国和奥地利流传不广。只是在米塞斯的论文开始引发争议之后,这篇文章才被翻译成德文和英文。

12. 米塞斯致埃米尔·莱德雷尔的信,标注日期为1920年1月14日,参见 Mises Archive 73: 52ff。米塞斯最后一句是指庞巴维克发起的一场辩论,庞巴维克使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理论受到严厉批评。

13. Mark Blaug,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5th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557.

14. 他没有出席1920年1月的国民经济学会会议,不过,他给米塞斯送去了一份打印稿,稿件没有标注日期。参见 Mises Archive 73: 60ff, 这份文件是 73: 49ff 的打印副本。

15. 莱德雷尔声称未来社会主义经济计算:

本质上将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计算,不同之处在于,它将增加许多元素,减少一些元素,还有一些会以不同的方式评估;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完全不同的体系,但仍然是一个体系。我们在这个体系里发现了普遍的元素,可行的经济计算方法正是发端于此。(同上)

16. 米塞斯致莱德勒,信件标注日期为1920年1月14日; Mises Archive 73: 54。

17. John Stuart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1891), bk. 3, chap. 1, p. 298.

18. 参见 Carl Menger, *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Vienna: Braumüller, 1871), p. 124。至于他的归属理论(财货等级理论)的来源,参见 Johann F. E. Lotz, *Revision der Grund-Begriffe der National-Wirtschaftslehre* (Koburg and Leipzig: Sinner, 1811), vol. 1, p. 108; Johann A. Oberndorfer, *System der Nationalökonomie* (Landshut: Krüll, 1822), p. 307; F. B. W. Hermann, *Staatwirthschaftliche Untersuchungen*, 1st ed. (Munich: Fleischmann, 1832), p. 65。

不过需要注意,门格尔关于合作生产问题的解决思路是没有前例的。参见 Yukihiro Ikeda, *Die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r "Grundsätze" Carl Mengers* (St. Katharinen: Scripta Mercaturae Verlag, 1997)。

19. 参见 Friedrich von Wieser, *Der natürliche Werth* (Vienna: Hölder-Pichler-Tempsky, 1889), chap. 3, pp. 67ff。

20. 参见门格尔时代最负盛名的德语经济学教科书, Karl Heinrich Rau, *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7th ed. (Leipzig and Heidelberg, 1863), p. 166: 没有人会心甘情愿地达成一次亏损的交易,也即在一次交易中,得到的价值不会少于放弃的价值。

21. 他本人把这个推测视为一种虚构,也为虚构作为必要的科学分析工具辩解。事实上,虽然维塞尔的自然价值理论在政治上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但是同样需要强调的是,他的方法论对于更加广泛的领域的影响。数理经济学家不再隐瞒他们的推理依赖于虚构这一事实,可是他们仍然相信不切实际的假设产生的错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相比之下,像门格尔这样不使用数学工具的经济学家则强调科学必须描绘现实。他们不愿使用数学工具,正是因为他们看到数学工具的应用与追求真实是不相容的。维塞尔有意识地坚持“虚构演绎”的合理性,从而违背了门格尔的这个传统。参见 Wieser, *Der natürliche Werth*, part 2。

22. 塞缪尔·博斯塔菲(Samuel Bostaph)对维塞尔价值理论的缺陷进行了非常有启发性的分析,参见 Samuel Bostaph, “Wieser on Economic Calculation under Social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6, no. 2 (2003); idem, “Friedrich von Wieser’s Theory of Socialism: A Magnificent Failure,” *Politická ekonomie* 53, no. 6 (2005)。

23. 而且我们可以补充一句,那是一个真正“科学”的理论,因为它不会让专攻学术的经济学家投身于任何特定的政治运动——就像麦克斯韦的方程式不会让一位物理学家隶属于任何政治党派。维塞尔强烈谴责形形色色的经济学派与各自支持的政治议题之间的密切关系,批评这些学派不是在追求“真正的知识”,也就是在维塞尔看来不受政治意义污染的知识。与这些学派相异,他的方法涉及“经济真理的最为核心的领域——关于那些普遍存在于所有社会组织形式的因素的真理”。显然,这就保证了政治上的中立,因而在他看来也就具备科学的客观性。参见 Friedrich von Wieser, “Karl Menger,” *Neue österreichische Biographie: 1815 – 1918* (Vienna, 1923), vol. 1, pp. 91f。

24. 最好的例子就是马克斯·韦伯邀请他为享有盛名的“社会经济规划大纲”(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k)系列撰写一本经济学概论,这个系列旨在描述社会科学的现状。于是维塞尔写出了他的《社会经济学》(*Theori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Wirtschaft*, Tübingen: Mohr, 1914)一书。这本著作于1914年首次出版,直到20世纪30年代一直是德语经济学的主要参考书目(1924年刊印了第二版)。

25. 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期间,讨论归属理论技术细节的著作层出不穷。比如,Leo Schönfeldlly, *Wirtschaftsrechnung* (reprint; Munich: Philosophia, 1924); Wilhelm Vleugels, *Die Lösungen des wirtschaftlichen Zurechnungsproblems bei Böhm-Bawerk und Wieser* (Halle: Niemeyer, 1930)。

26. Nikolai Bukharin, *Economic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p. 9.

27. Ibid., p. 51.

28. Ibid., p. 53.

29. 参见 Georg Simmel, *Philosophie des Geldes*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01] 1991), p. 35; Joseph A. Schumpeter, *Wesen und Hauptinhalt der theoretischen Nationalökonomie* (Munich and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08), p. 50.

30. Carl Menger,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15. 门格尔也把价值定义为“经济人所支配的财货,对其生命与福利必具有一定的意义。价值就是经济人对财货具有的价值所下的判断。”(ibid., p. 121)

31. 见第四章:“Fin de siècle Economic Science.”

32. Mises,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0), pp. 51f.

33. Menger, *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p. viii;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48. 他继而写道:

某物是否对我有用,要在怎样的条件下才对我有用;这物是否为财货,是否为经济财货,并在怎样的条件下是财货,怎样的条件下才是经济财货;这物是否对我有价值,要在怎样的条件下才对我有价值,并具有多大的价值;在两个经济主体间是否能进行财货的经济交换,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进行经济交换以及在经济交换的时候,财货的价格将在怎样的界限内形成等等,这一切,恰如化学规律独立于化学家的意志之外一样,也独立于我们的意志之外。

34. 门格尔死后出版的《国民经济学原理》第二版(1923)再度强调了定价过程的客观因素。除了其他方面,门格尔在此还区分了“虚假的”和“真实的”人类需要。参见我们在第14章的讨论。

35. Mises,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pp. 52f.

36. 参见 Mises Archive 55: 2ff. 他已经发表了手稿的一部分,即关于经济计算的那章。他也试图在一本纪念马克斯·韦伯的文集里发表第三章(社会秩序与政治结构[The Social Order and 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但是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因为《社会主义》先于文集出版。参见东克尔 & 洪布洛特出版社的卡尔·盖贝尔(Karl Geibel)1922年4月的来信,收于 Mises Archive 55: 6。

37. 这个因素也揭示了米塞斯的优先考虑及其商业头脑。

38. 1922年7月米塞斯得到1.92万马克的稿费。参见 Mises Archive 75: 27ff. 这笔稿费相当于38.92美元。几个月后的1922年10月,德国马克仍然在迅速贬值,米塞斯的这笔稿费仅值6.04美元。不管怎样,我们可以设想米塞斯迅速把马克换成了克朗,因为当时克朗与美元的汇率保持稳定。

39. 参见 Ludwig Pohle, *Die gegenwärtige Krisis in der deutschen Volkswirtschaftslehre* (Leipzig: Deichert, 1911), p. 6.

40. 参见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ed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vol. I, pp. 100 - 03. 下文的引文摘自这一部分,尤其是第102页后。德语原版参见 Max Weber,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3rd ed. (Tübingen: Mohr, 1947), vol. 1, chap. 2, § 12, pp. 53–58.

41. 参见 Otto Neurath, *Bayrische Sozialisierungserfahrungen* (Vienna: Neue Erde, 1920); idem, “Vollsozialisierung: Von der nächsten und übernächsten Zukunft,” *Deutsche Gemeinschaft* 15 (1920)。1919年春, 纽拉特曾是短命的慕尼黑巴伐利亚革命政权的要员, 担任中央计划经济办公室 (*Zentralwirtschaftsamt*) 主任。革命被镇压后, 马克斯·韦伯曾在法庭上替他辩护。参见 Allan Mitchell, *Revolution in Bavaria, 1918–1919: The Eisner Regime and the Soviet Republic*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293ff。

42. 韦伯于1920年6月14日去世, 生前或已读过米塞斯为他的《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写的文章, 那篇文章发表于当年的2月或3月。《经济与社会》的编辑们在“实物计算”章节的结尾处提到了米塞斯的著作, 指出: “在本书出版期间,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一篇文章处理了同样的问题。” (ibid., p. 107)

43. 参见 Max Weber, *Der Sozialismus* (Vienna: Phöbus, 1918)。

44. Heinrich Herkner, “Die Zukunft der Sozialpolitik,” *Jubiläumstagung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in Eisenach 1922* (Munich and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23), p. 95.

45. Heinrich Herkner, “Sozialpolitische Wandlungen in der wis-senschaftlichen Nationalökonomie,” *Der Arbeitgeber* 13, no. 3 (1923): 35.

46. 参见 Franz Boese, *Geschichte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x*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39), p. 181。

47. Heinrich Pesch, *Lehrbuch der Nationalökonomie* 5 (Freiburg i. Br.: Herder, 1923), p. ix. 佩施是“社会连带主义”(solidarism)(米塞斯在著作里批判过的一种社会主义变体)的主要推手。

48. 参见 Mises, *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 (New Rochelle, N. Y.: Arlington House, 1977), p. 101。

49. 参见 Mises Archive 75: 50。

50. Mises, *Theory and Histor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65.

51. Mises, *Human Action*, Scholar's edition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98), p. 332; emphasis added. 若干年后, 他写道:

价值并非一物所固有。价值不存在于事物或环境之中, 而存在于进行评价的人的主观意识里。我们不能认为价值是某物或某种事态的属性。评价行为始终是把一个事物或环境与另一个事物或环境进行比较。外部世界的万事万物在评价过程中获得等级。评价是把某一事物或事态, 不论真实存在抑或幻想出来, 与另一件真实存在抑或幻想出来的事物或事态进行对比, 并且把两者根据行为人的偏好程度进行排列。(Mises, *Theory and History*, p. 23)

52. 在米塞斯的货币理论著作的第一版, 米塞斯曾写过: “作为一种心理感觉, 价值无法度量; 然而, 有可能把它与其他类似的心理感觉相互比较。” (*Theorie des Geldes und der Umlaufsmittel*, 1st ed. [Munich and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12], p. 16) 意味深长的是, 在1924年该书的第二版里, 米塞斯采纳了一种去心理化的价值理论, 承认评价过程是一种行为而非感觉。他删除了书中的上述句子, 用这句话替换: “评价行为不能容许任何种类的

度量。”(*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p. 52)

53. Mises, *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1), p. 203.

54. Carl Landauer, “Übersicht über die neuesten Publikationen Deutschlands und des Auslands,”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121, no. 2 (1923). 副本参见 Mises Archive 42: 4。

55. Joseph T. Salerno, “Mises and Hayek Dehomogenized,”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6, no. 2 (1993); Hans-Hermann Hoppe, “Socialism: A Property or Knowledge Problem?”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9, no. 1 (1996); Jörg Guido Hülsmann, “Knowledge, Judgment, and the Use of Property,”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10, no. 1 (1997).

1919年开始,米塞斯着手准备一部研究社会主义的专著,上述那篇讨论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的论文,就是这部完整专著的预演。这本新书将会详尽讨论经济计算问题的根本意义,不过它的内容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米塞斯以鞭辟入里的洞察分析了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的方方面面,描绘了一幅原创的令人窒息的社会主义浮世绘。

这部皇皇巨著是在非常普通的环境里写就。米塞斯利用白天全职工作和夜间研讨会之余,每天奋笔耕耘数小时,花了两年时间完成了这部长达500页的手稿。不过我们可以设想,他那两年间的思想工作是综合先前二十年思考的结果。自从对社会理论产生兴趣以来,米塞斯与朋友和对手进行过的所有讨论,他读过的所有作品和听过的所有讲座,最后都在《社会主义》中体现出来。至少基于这点,这本书是他迄今为止写过的最伟大的著作。就像他的其余作品一样,这本书充满了原创的思想。这个主题为他提供了大量的讨论话题,远比单纯讨论货币和流通媒介的本质广泛得多。不过,题目范围并没有宽泛到阻碍他写出一本真正的专著,涉及社会主义几乎所有方面的问题。

除此之外,不同于后来的那本经济学著作(1949年的《人的行为》),他没有在这本书里让自己或读者陷入对基本的认识论问题和概念性问题的冗长讨论中。¹结果是令人惊异的。此书树立了米塞斯作为“在世的奥地利最伟大的思想家”的盛名。²而且,正是这本书让整整一代的年轻知识分子摆脱了马克思主义教条,转身投入古典自由主义怀抱。莱昂内尔·罗宾斯、弗里德里希·奥古斯都·冯·哈耶克、威廉·勒普克(Wilhelm Röpke)、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以及后来的许多学者,都曾提到《社会主义》在他们的思想形成时期产生的决定性影响。哈耶克还把米塞斯比作伏尔泰、孟德斯鸠、托克维尔,以及约翰·斯图亚特·穆勒。³

正如一封书信评论的,米塞斯本来可以获得更大的成功,如果他采用一个更加有力的书名,而非笨拙的“*Die Gemeinwirtschaft*”(字面意思是共同体或共同经济)的话。⁴如此一来,英美读者在理解这本书的主题时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困难,以至于

要等到十三年之后,英文版以《社会主义》的书名出现时才恍然大悟。

407 此书第一卷的开篇,米塞斯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剖析。他不是根据社会主义本身的是非曲直,而是从一个比较的视角出发,把社会主义社会和一个依据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组织的社会的情况进行对比。米塞斯遵循着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和其他自由至上主义哲学家的传统,强调了私有产权在构建自由社会中的中心角色。他也强调了契约和民主在和平解决冲突方面的重要性,并且以家庭——或者按照今天的说法,两性关系——为例做了一个精彩的分析。

在此书的后四卷(第二卷到第五卷),米塞斯详尽阐述了四个一般性命题:(1)社会主义的承诺是空洞的,因为它的中央指导生产的方案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行不通;(2)不存在必然通向社会主义的社会进化过程;(3)从伦理上也找不到经得起理性推敲的社会主义辩护理由;(4)社会主义的真正特征不是改善,而是恶化人类的生存条件,因为社会主义政策摧毁了社会的资本基础。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

古典自由主义旨在把尊重私有产权提升为人类合作的首要原则,针对这点的一个最普遍的指控是私有制让有产者受益,牺牲了广大无产者的利益。正如“私有”这个语词所暗示的,财产被有产者所独占,无产者则被剥夺了财产带来的好处,在私有制下只有极少数的有产者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米塞斯在《社会主义》的开篇就证明了私有产权的“社会”功能,从而正面反驳了这个指控。

408 米塞斯论证道,在经济意义上,“拥有”一件财货意味着享用这件财货带来的好处。许多好处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人享用,最明显的例子是某种私人服务比如理发;此外,众多日用消费品例如食物也是如此,一定量的食物只能被一个人所消费,即享用。耐用消费品的例子稍有不同,比如电视或沙发,可以有几个人一起享用,虽然不一定是同时享用。

但是当我们把目光转向生产资料,例如工厂、种植园、机器工具等等,情况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这类财货带来的好处并没有为他们的所有者(在狭义的法律意义上,即拥有财产控制权的人)独占。相反,在这些生产资料的帮助下,他们为消费者带来了最终的消费品。因此从本质上说,这些生产要素带来的好处没有为它们法律上的所有者独享。所以,法律上的所有者在经济意义上并非“拥有”这类财货。经济意义上“拥有”生产资料的是全体人民,是全体人民在享用这些财货制造出来的消费品。

关键在于,这个结论完全独立于盛行的社会组织。消费者不仅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拥有”生产要素——在那里他们是生产要素法律上的(集体)所有者,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是如此。米塞斯解释道:

经济意义上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也就是说,使生产资料服务于人的经济目的,不像占有可被短期或长期消费的消费品那样,必须占有实物。要喝咖啡,我不必拥有巴西的咖啡园、远洋货轮以及咖啡加工厂,尽管这些生产手段都为我们面前的这杯咖啡所必需。其他人拥有这些手段但为了我而运用它们,这就足矣。在存在分工的社会里,不论是物质资料还是人力要素,没有人是这些生产资料的独占性的所有者。全部生产资料都服务于在市场买入卖出的每一个人。因此,即使我们不想把所有权说成是由消费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分享,我们也必须把消费者视为实际意义上的真正所有者,把法律意义上的所有者视为他人财产的管理者。⁵

409

米塞斯对待新的术语非常谨慎,他强调说,他不会在后文把消费者称为“真正”的生产资料所有者,而会继续使用约定俗成的术语,把法律上控制生产资料的那些人称为所有者。

不过,术语的保留当然不会改变他的发现。米塞斯解释了以下事实(这一事实也是所有严肃反对古典自由主义的那些人,从马克思到菲利波维希都承认的):资本主义不是单纯的剥削制度,不是剥夺大多数人的利益以供少数人享乐。资本主义前所未有地改善了大众的生活条件,这并非偶然。资本积累的真正本质就是为社会全体成员即消费者提供最终的福利。⁶唯一的问题在于,社会主义方案是否能够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是否能够超越资本主义为他们提供的生活水平。米塞斯早就回答了这个问题,根据他在1920年那篇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论文,社会主义带来更大生产力的承诺看上去相当空洞。

410

民主制的功效主义论证

进一步的分析揭示了,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不是少数幸福资本家的一项特权,而具备真正的社会功能。米塞斯采用同样的视角看待政府,从而发现了民主制度的根本理由。民主制度本身不是目的,它的作用是实现一个没有其他政府体制能够实现的社会功能。

传统上,民主斗士都以基于伦理或自然法的理由捍卫这种政体。他们宣称人人人生而平等,因此全体人民都应平等地参与政治决策,而只有民主制度才能实现人人平等。米塞斯觉得这种推理并不能让人信服。他认为人们显然生来就不平等,而且他也没有兴致讨论那些基于自然法的论证,在他看来那只是一个虚构概念罢了。人们对于虚构概念总是无法取得共识。恰恰相反,我们可以预期,人人都会为了支持各自的政治立场而捏造出各种版本的“自然”法则。因此,自然法的思想并不适合用在政治上,在米塞斯看来,政治的意义就是为了解决冲突。

411 尽管如此,米塞斯在《社会主义》中显然相信共和民主政体。但他支持这一政体的根本原因却与传统的民主主义理论十分不同。对米塞斯来说,社会制度合理与否,只看它是否能改善社会成员的生活条件。相应地,他思考的起点是生活条件仅能通过生产活动加以改善,而劳动分工要比孤立的个人劳动更有生产力。因此,尽可能地改善生活条件就等于尽可能地鼓励劳动分工,并尽可能地增进分工的效率。这一思想曾指引了他对经济计算问题的分析,并引导他得出以下结论,即资本主义下的劳动分工要比社会主义下更有生产力,因为只有前者可以建立在经济计算的基础上。

米塞斯在《社会主义》中强调了这一个基本思想的另一个意义。劳动分工只能发生在人们和平共处的情况下,暴力冲突必然扰乱社会合作,因为社会将分裂为相互攻击而非相互合作的各个派系。暴力冲突摧毁稀缺资源,而非创造更多的资源。因此若要改善生活条件,我们必须选择那些倾向于减少暴力冲突的政治制度,这正是民主政体的功能。

它的功能是缔造和平,避免暴力革命。即使在非民主国家,也只有得到民意支持的政府才能长期执政。任何政府的力量都不取决于武装,而是取决于控制武装力量的精神。当权者总是以少数面对大多数,只有多数人对他们的统治心悦诚服,他们才能获得和维持政权。一旦变故发生,如果政府依靠的人不再认为自己必须支持这个政府,政府的根基就会发生动摇,迟早要倒台。非民主国家的人群和体制只能通过暴力改变。失去民意支持的制度和个人将在剧变中被扫地出门,被新的制度和个人取代。

412 但是,任何暴力革命都以鲜血和金钱为代价。生灵涂炭,经济活动因破坏而陷入停顿。民主试图通过协调国家意志(通过国家机关表达的意志)与多数人的意志,阻止这种物质损失以及伴随而来的精神创伤。它使国家机关在法律上服从当下多数民意从而达到这个目标。它在内政中实现了和平主义在

对外关系中力求实现的成就。⁷⁻⁸

米塞斯没有盲目拥护任何一个民主概念,他警告了从某种错误的自然法思想发展出来的教条式的过度民主。他尤其注意到,直接民主没有什么特殊优点。和其他所有生活领域一样,政治也是一种劳动分工。⁹ 他也强调了绝对不能认为民主制度是共同意志的无限统治:

民主国家不受限制的权力与独裁者不受限制的权力之间并无实质区别。那种吸引了政治煽动家及其信徒的观念,认为国家可以为所欲为以及不应抗拒主权人民意志的观念,所有这些造成的后果可能比堕落君主的凯撒狂躁症(caesar-mania)更加恶劣。

413

米塞斯得出结论说:“只有在自由主义的框架内,民主政治才能履行某种社会功能。没有自由主义的民主只是个空壳。”¹⁰ 民主制度内在的最大危险就是把自由至上主义要求的法律平等歪曲成为经济上的平均主义。

这是政治煽动家的沃土。煽动穷人仇富心理的人,定能应者云集。民主政治为这种尽管隐蔽但却无时无处不在的精神创造了最适宜的初始条件。过去的所有民主国家都是毁在这一点上。我们这个时代的民主也正在奔向同样的下场。¹¹

家庭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最成功的诡辩之一就是提出社会主义“超越”了自由主义,解放了全人类。社会主义者如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曾经称赞资本主义解放了生产力,但是资本主义走得不够远,没能废除阻碍人类繁荣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将废除这最后一道人吃人的堡垒。只有那时,彻底的自由才会降临人间。

414

18世纪和19世纪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曾用一种类似的理由来为自己的理论辩护。他们承认女性的生活环境较过去的几个世纪已经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改善程度还不够。婚姻制度束缚了女性进一步解放,婚姻法把男性对体态柔弱的女性的支配奉为神龛,限制了女性的生产力。解决办法就是取缔婚姻,代之以两性之

间自愿和松散的结合。

415 两种论证之间的高度相似当然不可能逃脱米塞斯的法眼。他已经证明了社会主义反对私有产权论调的可笑,现在又在书中继续驳斥女权主义反对婚姻制度的谬论。他向我们表明,历史上女性生活条件的改善源于契约原则的进步,后者是以承认私有产权为基础,同时也是源于暴力侵犯女性财产权利现象的消除。男性能够主宰女性,只是因为拥有妻子的人身和财产。¹² 社会一旦承认女性拥有合法的财产权利,就摧毁了男性支配女性的经济基础。顺着这个思路,米塞斯认为女权主义只有在承认私有制和彻底的男女法律平等的前提下才能称为自由主义的一个分支。米塞斯这些断言确实是个体人格发展的理性基础。

妇女在婚姻中为保持个性而进行的斗争,是争取人格完整的斗争的组成部分,这种人格完整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理性社会经济秩序的特征。它所牵涉到的不只是在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女性的利益;把两性的利益对立起来,像极端女权主义者所做的那样,是非常愚蠢的。如果女性不能自我发展,不能作为一个平等而自由的伙伴和同志与男性结合,那将是整个人类的不幸。¹³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误入歧途。他们呼吁取缔婚姻制度。他们寻求的是阻止女性与男性的自愿结合,认为这种方式会损害女性的权益。这个理论错在哪里? 反对私有产权的观点之所以站不住脚,是因为私有产权实现了其他所有社会制度无法实现的社会功能。

416 那么,婚姻制度的社会功能又是什么呢? 一定存在一个这样的功能,毕竟女性没有结婚的法律义务。结婚是她们的自愿选择。因此,女性本可轻易避免踏上那个按照女权主义者的说法将会损害她们权益的命运。那么她们为何选择结婚? 米塞斯指出,与其他任何可选的社会安排相比,婚姻更能满足女性的特殊需要。这些特殊需要源于以下事实:“性爱”的需要,“依靠一个男人”的冲动,以及“她对丈夫和孩子的爱耗费了她的大好年华”这一事实。¹⁴

显然,米塞斯与当前的左翼女权主义观点格格不入。尽管如此,他在《社会主义》中表达的观点并非一个充满怨恨的沙文主义者的恶习。恰恰相反,这是那个时代广为接受的性别差异理论的一个更为小心谨慎的版本。这个广为接受的理论,就是奥托·魏宁格尔在世纪之交基于当时最新的科学数据建构起来的关于男女问题的一般理论。魏宁格尔划分了男性气质(M)和女性气质(F),两种气质以

不同比例存在于每个个体的体内。女性当然受到女性气质的支配。魏宁格尔说：

性兴奋状态是女性整个生命中最重要的一瞬间。女性始终在相当程度上是从属于性欲的。女性完全沉浸在她的性活动中，沉浸在性交活动和生殖活动的全部范围，也就是说，在她与丈夫、孩子的关系中。她的生活完全围绕这些事情，相反，男性却并不仅仅与性有关……

因此，性爱充满和占据着女性生活的全部，而男性还会对其他许多事情感兴趣，例如战斗与玩乐、社交与宴会、辩论与科学、商务与政治、宗教与艺术……

女性的生活只有性爱，别无其他；而男性的生活却是性爱加上其他事务。¹⁵

这就是为什么女性有选择婚姻的倾向。而且由于这个决定，她们放弃了那些如果不结婚的话本可以获得的成就。在米塞斯看来，这似乎足以解释为什么女性的成就无法与男性的成就相媲美了。

417

也许女性能够做出选择：要么放弃对于女人来说最为深沉的愉悦，即做母亲的愉悦，要么放弃她在人格方面向更加男性化发展的努力。也许对她而言不存在这种选择。也许她压制自己的母性欲望会使她的全部女性机能受到伤害。但不管哪种情况，事实仍然是：只要她做了母亲，不管已婚还是未婚，她的生活就不能像男性那样无拘无束了。天资卓绝的女性，即使做了母亲，仍然可能小有所成，但由于女性面对性别机能的首要要求，天才和伟大的事业是与她无缘的。¹⁶

米塞斯是少数居于领袖地位而能积极支持年轻女性知识分子的先驱之一。在他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的有海伦妮·利泽尔、玛丽安娜·赫茨菲尔德等人。利泽尔、赫茨菲尔德、伊尔塞·明茨(Ilse Mintz)、玛尔塔·斯特凡妮·布劳恩、伊丽莎白·埃弗吕西等都是他的私人研讨会的固定成员。确实，他无法为她们之中的某位谋得一个教授职位——在这点上他也无法帮到他的男性学生，甚至他本人也无法晋升教授，不过他还是能够帮助她们中的一些人找到令人羡慕的工作，在过上体面生活的同时亦能追求学术。我们再次以赫茨菲尔德和利泽尔两位女士为例，因为两人都受雇于奥地利银行和银行家协会。

418

米塞斯拒绝激进女权主义的观点,不是因为他缺乏对女性的同情心,或者因为受到内心一些邪恶欲望的驱使,企图让女性“待在她们原来的地位”,而是思想的一以贯之引领他坚持自己关于性别关系的看法,即使这个看法在他的圈子里多半会让一些雄心勃勃的女性愤愤不平,比如布劳恩女士。在米塞斯看来,这些只是事实而已,围绕它们争论没有意义:

两性特征及其命运之间的差异,就像人类的另一些不平等一样,不是一纸政令就能消灭的。使妇女在内心一直感到不自由的并不是婚姻,而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她们的性别特征要求她依靠一个男人,她对丈夫和孩子的爱耗费了她的大好年华。那些要在放弃爱情和婚姻的生涯中寻找幸福的妇女,并没有人间的法律阻止她这样做。可是那些没有放弃爱情和婚姻的妇女,无法保留足够的力量像男人那样去把握生活。事实上,不是婚姻和家庭,而是占据了她全部人格的性特征束缚着她。“废除”婚姻未必能使女性更加自由和幸福,也许只会夺走她人生的实质内容,却无法提供任何东西加以弥补。¹⁷

经济计算问题的意义

419 此书的第一卷以讨论两性关系结束。在第二卷,米塞斯转而考察了社会主义本身。在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理论(他收录了1920年的论文)后,他着手讨论了
这个论证的深刻意义。

工作报酬的支付将完全无章可循。因为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经济社会所采用的价值计算方式,在这里派不上用场,原因正如我们所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能进行这种价值归属。经济现实显然会限制社会任意奖赏劳工的劳动;从长远看,工资总额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大于社会收入。但在此限度内,社会可以自由行动。它可以不管质量如何,对所有的工作支付同样的报酬,它也不难根据不同的工作质量区分不同的工时。但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必须保留对产品进行具体分配的权利。¹⁸

在实践中,这意味着个体社会成员在面对社会的独断专横时将没有任何自卫能力,而在现实世界里,集体的决定是由那些掌握中央决策权的小团体做出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管理者需要决定所有生产要素的“分配”。这不仅意味着他们要

决定如何使用每一片土地,还要决定如何分配“人力资源”。管理者所处的岗位必然需要他们对个人和家庭下达命令,通知那些家庭在何时何地前往何方和住在何处。他们必须作这些决定,不是出于邪恶的信仰或个人对权力的滥用,而是因为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共同占有所有生产资料,包括劳动力),即个体必须服从中央计划者的意志。显然,社会主义绝不会是“自由”的体制: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发布和执行命令的巨大专制主义联合体。这就是所谓“计划经济”和“消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含义。想象军队的内部结构,即可更好地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结构。¹⁹ 420

社会主义无法扭转个人思想是自由的事实,但是,如果所有具体的表达工具为当权者严格控制,那么思想也无法自我表达。“没有哪项审查制度、哪个帝王、哪个教皇曾拥有像社会主义那般压制思想自由的力量。”²⁰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这或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但是在1922年,这个断言似乎与俄国当时发生的情形并不一致,在苏维埃政权下,一种全新的前卫艺术正在那里冉冉升起。米塞斯依然坚持己见:

社会主义社会必将实施精神生活的国有化,因此必定会扼杀一切精神进步的可能性。人们可能在这一点上自欺,因为在俄国,新的艺术形式正在成为时尚。但是,在苏维埃上台时,这些创新的作家早就在从事工作了。过去他们郁郁不得志,现在他们同这个新政权站在一起,是希望得到它的承认。然而一个大问题是,未来的革新者能否取代他们现在占据的位置。²¹

以后的历史证实了他的观点。苏联帝国在1991年崩溃,而远在帝国解体之前,东欧国家的艺术和文化机构早已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前卫艺术思想奉为永恒的真理和美学标准,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被奉为“圣经”一般。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尽职尽责地延续着革命传统,而柏林剧团忠实地复制着贝托尔德·布莱希特(Bertold Brecht)的作品,原封不动地以先前的表演方式一遍遍上演。 421

米塞斯也重申了关于工作和动机的更加传统的观点。他从区分劳动产生的直接满足(源自工作本身的满足)和间接满足(薪水)入手,挑战了以下假说,即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本身会把任何工作变成纯粹的享乐。这一假说本来十分荒谬,社会主义者却普遍相信。米塞斯评论说,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只能收获自己

劳动回报的一部分。因此,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所有社会成员都有回避苦差事的强烈动机:

现在可以断言,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可以设想社会主义的生产率高于资本主义。相反可以说,如果没有制度上的动力促使工人克服劳动艰辛和付出最大努力,劳动生产率必然会下降。²²

米塞斯论证说,不仅劳动供给方面存在问题,资本供给也受到影响。某人的收入储蓄增加了社会资本,可用于投资更有效率的产业。而就像生产资料的性质那样,储蓄所得的好处主要不是为资本家而是为消费者享受。用现代术语来说,储蓄是“公共财货”。但在社会主义国度,储蓄的动力又在哪里呢?

422

资本的保持和积累需要付出代价。为了将来更大的满足,必须放弃眼前的满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放弃……是由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以及通过节约消费而即将成为所有者的人做出的。他们将来的收益当然不是悉数归自己所有。他们必须与通过工作取得收入的人分享利益,因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积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也提高了工资。但是,大体上说,通过量入为出(即不把资本用于消费)和节俭(即增加资本)而获得的收益对他们来说确实是值得的,这足以激励他们保持和扩大资本。这种激励愈强烈,对资本的迫切需求就愈能得到更充分的满足。至于那些因投资长远而得不到满足的当前需要,它们的迫切性越小,就越容易被舍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维持和积累资本是不平等的财产和收入分配的功能之一。²³

道德风险:社会主义的另一死敌

社会主义管理方式无法算出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比例,米塞斯在讨论了此一事实将会造成的后果之后继而指出,还有另外一个同样“不可逾越的障碍”,阻碍着社会主义方案的实现:

它不可能找到一种组织形式,能使个人的经济活动脱离与其他公民的合作但又不使其面对完全成为赌博的风险。²⁴

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制度使得下级单位的决策者可以不负责任。通过个人行为成本的社会化,社会主义在社会的每个层面都诱发了道德风险。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所有成员都知道他们行为的大多数负面效应都会让其他人来承担。于是,比起一个实行严格私有产权制度的社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人都更容易鲁莽行事。因为在私有制下,除了行为者本人外,没人为他分担责任。

423

这个问题无法通过推出工资奖惩手段激励人们行为“适度”加以解决。

但是,问题的症结与其说是让经理分享利润,不如说是如何让他分担自己的经营造成的亏损。公有企业的经理没有产权,因此除了纯粹的道德意识,只对亏损的相对很小的份额承担责任。如果一个人的物质条件只与利润有关而与亏损无关,这无异于激励他轻举妄动。不但公有企业,私有企业也是如此,那种允许相对贫穷的管理人员分享一定比例的利润的做法,已经提供了这样的教训。²⁵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每个财产所有者都对其私人财产负有个人责任,所以他有充分的理由不鲁莽行事,并让自己的行为与其他社会成员保持和谐。相反,社会主义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切断个人行为和个人后果之间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个人行为必然会超出让系统良好运转所需的程度。²⁶

只有一个弥补办法,即对下级单位的行为严加约束。为了保护经济体系免遭各级部门不负责任的鲁莽行为的伤害,中央不得不剥夺他们所有的自主决策权,详细指示他们的所有行动,并保留规则以外所有事务的决策权。简言之,社会主义需要一个主宰一切的官僚体制。

4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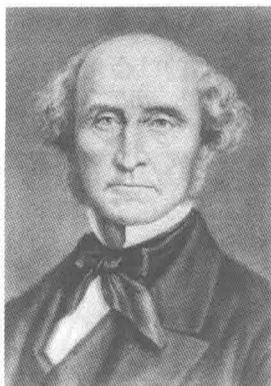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软弱和妥协

米塞斯特别关注计时工资的讨论。当时普遍的看法是,计时工资经济理论已经驳斥了对社会主义的标准指控,也就是社会主义计划会遇到激励不足的麻烦,而资本主义不存在这个问题。在这个议题上,社会主义者找到了一位意料之外的盟友——公认的古典自由主义守护神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穆勒在他优美的散文里强调说,只要工资按劳动时间计算(计时工资),而不是按工作表现计算(计件工资),资本主义也会遭遇激励问题的困扰。

米塞斯注意到,穆勒的观点“数十年来一直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支柱之一,较之社会主义煽动者那些激发仇恨、经常自相矛盾的观点,他的观点为社会主义的

425

流行作出了更大的贡献”。²⁷然而,米塞斯发现至少对熟知边际价值理论的读者来说,揭穿穆勒理论的缺陷并不困难。英国的经济学家不曾考虑过这个事实,即计时工资依工种而变化。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仍然有动力克服消极怠工的情绪。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无疑,在计时工资制下,工人工作的积极性以保住饭碗不致丢掉为限。但是,如果他能够多做,如果他的知识、能力和力量允许,他会寻求难度更高、从而收入也更高的职位。他也可以仅仅因为懒惰而不这么做,但这不是制度的错。在激励人们发挥最大的勤奋方面,这个制度做了它所能做的一切,因为它保证每个人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最大差别,就在于社会主义做不到这一点。²⁸

在此,米塞斯讨论了穆勒在劳动经济学问题上的一个错误,这是米塞斯首次挑战这位公认经济学界泰斗的神圣地位。米塞斯最后认为,穆勒的盛名极大地损害了政治自由主义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社会主义》出版五年之后,米塞斯直截了当地说: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是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追随者,但是在晚年,由于受妻子的影响,他充满了软弱的妥协。他慢慢地滑向了社会主义,在轻率地混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方面,他可谓第一人。正是这种混淆导致自由主义在英国衰落,并降低了英国人民的生活水准。或许正因如此,不管怎样,我们必须熟悉穆勒的主要著作。²⁹

426

协作法则

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后,米塞斯把目光转向了社会主义必然性学说。卡尔·马克思及其追随者声称,自然法则支配下的社会演化必然引导人类走向社会主义。这个演化过程的推动力量,第一是阶级斗争的辩证法,第二是资本主义固有的垄断倾向——这一倾向导致经济决策的集中,从而为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打下了基础。我们或许认为米塞斯讨论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断言是在浪费时间,因

为他已经证明了社会主义劣于资本主义。但是米塞斯不这样认为。即使我们证明了社会主义劣于资本主义,人类社会也可以有演化到社会主义的倾向。因此,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单独讨论。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一个核心理论就是阶级斗争理论,根据这个理论,社会演化源自社会不同阶级之间必然的利益冲突。历史是一出长剧,不断上演着敌对集团的相互对抗。敌对集团随着时代变迁有所不同——国王对抗贵族、贵族对抗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对抗无产阶级,但是阶级斗争原则本身是贯穿历史始终的永恒主题。

在《社会主义》中,米塞斯深刻批判了阶级斗争的概念。当时许多马克思主义阵营之外的思想家,包括雅利安人至上主义者,都接受了某种版本的阶级斗争理论。米塞斯同意暴力冲突在社会进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不同意的是暴力具有建设性作用的想法。米塞斯主张,暴力就其本质来说,无法扮演阶级斗争理论的拥护者为它赋予的角色。阶级斗争无法解释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最多只能解释某个协作团体的成员的行为方式如何异于其他团体。没有一个完善的合作关系理论,社会进化的动力依然会是个谜。

427

那么,人们为什么要合作呢?大卫·李嘉图有一个著名的发现,是关于国际贸易这个特例的,米塞斯把这个发现加以一般化,给出了一个简洁明了的答案:人类互相合作,是因为劳动分工比孤立个人的自给自足生产更有生产力。

国际分工理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它表明,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只要资本和劳动在不同国家间的流动遭到阻碍,制约地理分工的将是比较成本,而不是绝对成本。把同一原理应用于个人分工也会发现,个人不仅在同某些能力高于自己的人的合作中得到好处,也能在同各个相关方面都不如自己的人的合作中获益。³⁰

李嘉图几乎没有提及后来所谓的“比较成本优势理论”,他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把讨论这个理论的关键段落扔在了第七章的一个注脚里。以后的经济学家意识到,这个理论不仅关于国际贸易,也是人际交换的普遍法则,因而涉及所有的劳动分工形式。³¹它解释了为什么人类协作具有价值——不仅对于找到一个高级伙伴的低级工人是如此,而且对高级工人也是如此。优势是相互的,即使并不一定对称。这解释了为什么儿童、残疾人、老年人都可以在劳动分工的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即使他们或许在所有方面的能力都不如合作者。它解释了为什么

428

工业国家如美国或日本,受惠于与别国国民的合作,即使别国的资本更稀缺,单位成本更昂贵。简言之,甲乙两人之间的劳动分工总是有益的,即使甲不容置疑地在所有方面都优越于乙。这是一个真正的“协作法则”。³²

429 米塞斯独立发现了人类行为的一个普遍法则。他强调了这个法则的深远意义,在这点上他超越了所有其他经济学家。这个法则几乎适用于一切情况,因为它的前提只是“合作伙伴之间存在天赋或处境的差异”,而这几乎是一个永恒的事实。³³根据这点可以得出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阶级斗争理论把这些差异视为暴力冲突的根本原因,而如今人们可以用更加善意的态度看待这些差异了。因为这些人际的或团体之间的差异也为互补合作提供了巨大潜力。所以,协作法则的力量是把差异从冲突原则转变成了友好原则。用米塞斯的话来说:

分工给劳动带来更大的生产力,发挥着凝聚社会的作用。它使人们在争取福利的共同奋斗中成为同志,而不是生存竞争中的竞争对手。它化敌为友,化干戈为玉帛,使个人结合为社会。³⁴

社会差异提供了互惠合作的巨大动力,这个论断当然有着无比重要的政治意义。如果这个命题为真,政府显然应该尽量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管制,从而不去阻碍互惠互利的合作。它直接否定了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市场上政府应该“创造公平竞争平台”的概念。协作法则支持单边主义政策(unilateralism)。许多年后,米塞斯在私人信件中写道:

430 所有国家,无论大国还是小国,富国还是穷国,都能拥有自由经济,无论他国采取什么政策都不妨碍它的经济自由。世人相信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预设了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政策,这是一个普遍的认知错误。另外,如果一个国家采用金本位制,它会享受到稳健货币带来的所有好处,甚至在其他国家疯狂滥发纸币的情形下也是如此。当然,在国际分工的时代,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采取社会主义是其他所有国家的损失,因为它削弱了整体生产力。例如,俄国和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导致了小麦产量的降低,由此引发了国际市场上小麦价格的上涨。但是,没有国家能够通过在国内社会主义化,在减少本国生产的情况下还能规避社会主义的恶果。³⁵

提出协作法则后,米塞斯转而回答了他最初关于社会演化动力的问题。社会

演化必然通向更加广泛的劳动分工吗？他考察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发现一个建立在更加广泛和密集的劳动分工基础上的社会，“更有希望保护社会成员免遭不幸和贫穷，更有能力武装自己抵御敌人的攻击”。³⁶这个事实本身并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而仅仅引发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些社会能发展出更高层次的劳动分工？米塞斯引述了法国社会学家伊祖莱（Izoulet）的话，指出这种现象的原因纯粹是思想因素：

使社会得以形成、发展和维持的是社会精神，即合作的精神。一旦失去了这种精神，社会便会再次四分五裂。国家的消亡是社会的倒退，即从劳动分工向自给自足的倒退。社会有机体分解为它由以开始的细胞。人依然存在，但社会消亡了。³⁷

米塞斯指出，古典自由主义发展出了一套严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并强调了私有431产权的社会功能，从而决定性地推动了社会精神的高涨。在以后的著作中，米塞斯还会详尽阐述思想在社会演化过程中的作用，提出思想是社会动力学的根本原因，其中最著名的是《理论与历史》（*Theory and History*, 1957）。不过，他的《社会主义》已经为今后的讨论奠定了基础。

垄 断 理 论

讨论了阶级斗争理论之后，米塞斯再把矛头指向了马克思论证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第二个理由：垄断理论。他不仅考察了马克思主义断言资本主义造成了大规模经济集中化的理论，还考察了新兴的新古典主义垄断价格理论。后者被广泛用于指证市场经济之恶，并且许多人以此表面证据（*prima facie*）为理由，呼吁政府干预，出台反垄断政策。

米塞斯从马克思主义学说着手评论说，马克思主义认为私有制会产生更高的资本集中化，但是，现有统计材料并不支持马克思的论断。³⁸另一方面，显然，过去一段时期的工业生产有趋向于建立大型工厂的现象。不过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似乎混淆了不同类型的集中化。因此，米塞斯着手区分并分析了三类集中化：工厂设施、企业、个人财富。他指出自由市场确实存在着工厂大型化的趋势，但强调说这432仅仅是劳动分工的结果，大型工厂可以满足更广阔的市场需求。基于类似的理由，或会出现企业的集中趋势。但米塞斯强调，个人财富，尤其来自盈利的工业企业的

财富并没有集中化。其主要原因是,与普遍的假设相反,资本投资未必会产生利润。成功的投机本质上是一项冒险事业,始终存在着血本无归的可能。只有少数家族能够成功经营企业超过两到三代。积累的财富或者投资到地产,或者在未来的投机中损失。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依赖于工厂和企业具有集中趋势这一经验观察,但是统计数据同时表明不存在任何显著的个人财富的集中,米塞斯的分析调和了上述经验观察与统计数据之间的冲突。更大规模的工厂为更大规模的团体(股票和债券所有者)所拥有。工业上有益的集中化,前所未有地降低了生产的单位成本,而未必会带来个人财富的集中。

这个结果与马克斯·韦伯和弗里德里希·瑙曼的看法完全一致,两人在一战前就为这个立场辩护,当时他们在社会政策协会的会议上与支持反垄断政策的人士据理力争。经济集中可以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市场现象,甚至为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还是必要的。1922年,韦伯和瑙曼都已去世。只有米塞斯还在《社会主义》中支持经济集中,这让他成了他们事业的最著名的拥护者。³⁹

433 20世纪20年代,米塞斯以一个作家和维也纳商会秘书的身份抵制奥地利的反垄断运动,当时商会是奥地利大型企业和银行巨头的讨论场所。他反对通过政府资助提升手工业者的地位,不是因为他厌恶小企业或是忽视他们的才艺,而是因为从更广的社会角度来看,为这些政府援助提供辩护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手工业者面临困境,是因为他们无法与大企业竞争,但就此得出与大企业竞争是不公平的结论却是错误的。⁴⁰

自由市场的经济集中是有害的吗?米塞斯在回答中明确把两类有害的“垄断”与有益的集中区分开来。第一类有害垄断是,只有一个市场参与者提供了一种不可或缺、独一无二又无可替代的服务,不过这种情况似乎只在理论上存在。什么商品或服务具备这种特性呢?空气和水当然是不可或缺的财货,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根本不是经济财货。米塞斯指出,这种垄断类型极为罕见:

434 像中世纪教会那样操纵着向信众施予恩典的权力,也许是取得这种垄断的捷径。逐出教会、停止教权如同死于口渴和窒息一样恐怖。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作为组织起来的社会将形成这样的垄断,所有经济物品都将集中在它的手里,因而它能强迫公民执行它的命令,实际上它是让个人在服从和饿死之间选择。⁴¹

米塞斯接着阐述了第二种垄断,即价格理论的产物“价格垄断”。价格垄断就是一位卖家可以限制他的生产以便提高价格,同时获得更高的销售总额,因为此时市场对于他的产品的需求缺乏弹性。当然,只有在缺乏竞争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否则的话,一旦我们这位本想成为垄断者的生产者开始限制产量,这个领域的任何竞争对手都会扩大他们的产量,从而平抑价格。但是米塞斯强调,这类垄断的产生除了缺乏竞争之外,还必须具备第二个条件,就是需求相对缺乏弹性。

这些条件产生了一个反常的市场现象。在竞争情况下,每位生产者都努力提高产量,以便尽可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在“价格垄断”的情况下,垄断者却有限制产量的动机。

垄断的唯一特征是,在特定的需求曲线下,最大净利润产生于比卖方竞争情况更高的价格……所以,这种条件下的垄断有三种结果:与自由竞争条件相比市场价格较高、利润较多、销量和消费量较低。⁴² 435

然而这种观点经不起推敲,原因是一家公司或一个工厂的限产并不等于社会整体产量的减少。当“价格垄断者”限制了自身的产量,他就自动解放了生产要素,因此有更多的生产要素可以被用于生产其他商品和提供其他服务。垄断商品的供应量是减少了,却导致了其他商品供应的增加。如果以上说法为真,那么“价格垄断”又有什么错呢?又有什么害处呢?价格垄断当然损害了垄断商品消费群体的利益,但是它让其他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受益。我们可以用纯粹的事实分析在这些冲突的个人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吗?米塞斯认为这是可能的。他清楚地看到了“垄断商品的生产减少,必定增加其他商品的生产”。不过,他提出了另外的考量:

这些当然都是较不重要的商品,如果垄断商品的更多迫切需求能够得到满足,这些较不重要的商品本来是不会被生产和消费的。这些商品的价值与没能生产出来的垄断商品的较高价值之间的差额,便是垄断给国民经济造成的福利损失。私人利润和社会生产力在这里是相互抵触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社会将会采取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行动。⁴³

没有任何作者曾对这个问题作过如此深刻的思考。⁴⁴许多年后,他谈到了这个 436

贡献的意义：

所有讨论垄断问题的人，都曾强调限制垄断商品的总消费量损害了相关群体的利益。如今，在《社会主义》中……我讨论了原来被束缚于垄断商品生产的一般生产要素得以解放最终必然导致生产延伸的命题。我解释了生产的延伸只会涉及较为次要的商品（当然，是从消费者的观点来看）。它们较为次要，是因为“如果对更多的垄断商品的迫切需求能够得到满足，这些较不重要的商品是不会被生产和消费的”……没有证据表明除了我的设想之外，价格垄断还有其他损害社会福祉的地方。⁴⁵

437 米塞斯对事实的注重和敏感远远超过他的政治倾向。毫无疑问，他会非常乐于看到自由市场始终以最佳的方式迎合消费者。但在垄断问题上他发现市场并不总是如此，而他也坚持自己的发现。即使许多年后米塞斯的美国门徒默里·罗斯巴德以一种彻底为自由市场开脱的方式重新表述了垄断理论，米塞斯依然坚持原来的观点。⁴⁶

米塞斯承认价格垄断在理论上的可能性，但也强调了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的垄断都是政府干预的人为产物。⁴⁷在自由市场里，除了第一产业外，任何其他产业都不太可能发生垄断。“采矿业，从该词的最广义上讲，是它们的真正领地。”⁴⁸但即使在采矿业，价格垄断也不像垄断理论中所表现的那般有害，因为限制矿产产量意味着人类更加节约地利用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

基督教伦理与市场经济之辩

米塞斯彻底分析了社会主义存在的实际问题，继而开始批评那些支持社会主义方案的伦理学说。他在这里尤其重视基督教，考察了基督教对一个自由社会的支持程度，以及基督教倾向于侵犯私有产权的程度。

438 米塞斯开门见山地指出，在所有伟大的一神教中，只有基督教是活的信仰。基督教的教义覆盖了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涉及狭义的人类精神问题，还涉及人的伦理关怀，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和政治关系。米塞斯指出，这是宗教生存下去的必然选择，否则它的信徒就会“从别处寻找答案，这意味着宗教失去对信众的控制和对精神的影响。离开社会伦理，宗教就是无生命的。”⁴⁹因而，米塞斯的立场与那些提倡基督教是一个活的信仰的人士一致，不是因为基督教与政治的瓜葛，而

是因为它的政治维度(political dimension)。⁵⁰

但在1922年,对基督教的社会和政治维度的认识不仅是一个教义问题。耶稣会士、天主教主教、新教牧师的建议对日常生活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长久以来,基督教在政治上的具体表现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也是一直为米塞斯所熟悉的,它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发源于奥地利阿尔卑斯山脉地区和其他天主教日耳曼人居住的乡村地区。这场运动的崛起是为了反对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自由主义改革,当时的改革诞生了高效的工厂生产,它们与银行信用和铁路交通结合,取代了陈旧的手工业生产方式。这场社会变革以惊人的速度降低了原先精英阶层的社会地位,土地贵族和神职人员的上地位遭到来自实业暴发户的挑战并逐渐为他们所取代,而实业家又常常是犹太人。基督教社会主义是旧精英知识分子的产物,他们否定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力图扭转变革的趋势。埃格伯特·贝尔克雷迪伯爵、冯·福格尔桑男爵(Freiherr von Vogelsang)和鲁道夫·迈尔(Rudolf Meyer)号召重建中世纪的行会,将信用机构纳入国家控制,颁布工厂法并通过关税和社保计划保护国内劳动力。⁵¹

439

这是米塞斯亲身经历的政治基督教。在《社会主义》的第29章,他对自己的经历给出了一个理论解释。基督教社会主义真的以耶稣基督的教导为基础吗?米塞斯给出了斩钉截铁地回答。他说,基督没有给他的门徒留下任何建立世俗社会的规则,因为他相信天国已经临近:

耶稣期盼着当那个时刻来临,所有的行动和思考都转移到神的国度时,上帝会亲自重组社会,这使他的教义变得极为消极。他拒绝一切世俗存在,而又并不提供取而代之的事物。他甚至要解除一切现存的社会关系。他的使徒不仅不应关心自谋生计,不仅不应劳动并放弃一切财产,而且仇恨“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耶稣能够忍受罗马帝国的世俗法律和犹太律法的规定,不是因为他承认它们的价值,而是因为他对它们很漠然,轻蔑地把它们视为只在一段很有限的时间内重要的事情。他有着消灭社会关系的无限热情。这种完全否定的纯粹和力量,背后的动力是对新世界的奇思妙想和热切希望,因此才有他对一切现存事物的激烈攻击。任何东西都可以摧毁,因为万能的上帝将重建未来的秩序。不必细察是否有什么东西能从旧秩序带到新秩序,因为这个新秩序无须人的帮助就会出现。所以,它不要求信众有伦理体系,有任何朝着积极方向采取的特定行为。信仰并且只有信仰、希望、期望——这就是他需要的一切。他不必为未来的重建贡献什么,上帝自己已经

440

把这一切准备好了。原始基督教这种完全否定的态度在现代最明显的对应是布尔什维克主义。⁵²

米塞斯认为,耶稣的教导完全不关心世俗的物质生活,这个事实可以解释为何千百年来基督教能以极大的灵活性接受形形色色的政治制度。⁵³但是耶稣教导的来世性质,真的可以作为一个充分的证据,证明基督的教导与政治自由不相容吗?米塞斯认为可以,继而提出了第二个对基督教不利的证据。我们非但无法“在《新约全书》中找到一句可以解释为拥护私有财产的话”,而且耶稣基督也把疏忽之罪(sin of omission)变成了蓄意之罪(sin of commission):

441

当然,有一件事情是很清楚的,无论多么巧妙的阐释也难以掩盖。耶稣的话充满了对富人的不满,他的使徒在这方面也毫不逊色。富人因为富有而受谴责,乞丐因为贫穷而受赞美。耶稣没有向富人宣战,没有宣扬对他们复仇,唯一的原因是上帝说“复仇在我”……直到现代社会主义时期,在基督教世界出现的反对私有财产的运动,无一不从耶稣、使徒和基督教神父那里引经据典,更不用说像托尔斯泰那样把福音书对富人的不满作为教义的核心和灵魂的人了。这是救世主的话播下罪恶种子的一例。这些话比迫害异端和烧死巫师引起了更多的伤害和流血。⁵⁴

可以想象,这些篇章会让米塞斯在基督徒读者中受到多少欢迎。不过,并非只有忠诚的基督徒怀疑他是否正确理解了政治基督教。当然,耶稣的福音书在历史上被滥用过无数次。世上没有任何学说可以避免被滥用的命运,就连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学说也无法幸免。但是,米塞斯的言论似乎不仅大胆放肆,还带来了不解与困惑。基督教看起来是如此坚决地反对建立任何世俗社会,那么,西方文明何以能在基督教的支配下茁壮成长?米塞斯自己也承认,直到1922年基督教依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宗教,而且它在西方大步前进的几百年间一直生机勃勃。为什么会这样呢?

米塞斯回答说,这些文化成就是“教会,而不是基督教的功劳”,而且“耶稣的社会伦理对这种文化的发展没有任何贡献”。⁵⁵

442

基督教是否能与一个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和谐共存?我们的证据得出了对上述问题的否定回答:有生命力的基督教无法与资本主义共存

或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之下。⁵⁶

自由主义与基督教本质上是对立的,它们之间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或者基督教继续占据上风,或者自由主义把基督教扫地出门。没有妥协的可能。

十年后,米塞斯改变了他的想法。在《社会主义》第二版,他添加了两段文字,让本章的结论更加节制和宽容。米塞斯写道,基督教和自由主义或许并非像他之前设想的那样格格不入。它们或可共同繁荣,只要建立一个新的综合:

然而,也许还有一条出路。谁也无法十分肯定地预见教会和基督教将来怎样。罗马教廷和天主教现在面对的问题,要比他们过去一千多年遇到的任何问题更加难以解决。这个世界范围的普世教会的存在本身,正受到沙文主义者的民族主义的威胁。它借助精致的政治技巧,维护天主教原则度过了所有的民族战争动乱,但是,它必须每天都更清楚地认识到,它的继续存在是与民族主义观念水火不容的。除非它打算屈服,给民族主义教会让路,否则它就必须借助一种能使各个民族和平共存的意识形态,把民族主义赶走。然而,教会在这样做时将会发现,它不可避免地要信奉自由主义。没有任何别的学说可以给它帮助。

443

如果罗马教会要寻找一条出路,使它摆脱民族主义带给自己的危机,它就必须彻底转变。这种转变和改革也许会让它无条件地承认生产资料私有制不可或缺。但是,最近教皇的《四十年通谕》表明,它离这一目标仍很遥远。⁵⁷

不清楚是什么改变了米塞斯的想法。可能是当了伊格纳茨·塞佩尔主教的顾问后,让他对基督教和自由主义有了新的觉悟。据许多天主教徒作证,塞佩尔拥有圣人般的品格。米塞斯也意识到其他学者正在努力修补资本主义和天主教之间的鸿沟。于是,有朝一日他将把著名的耶稣会士冯·内尔-布罗伊宁(O. von Nell-Breuning)称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拥护经济自由的极少数德语经济学家之一”。⁵⁸

社会主义等于毁灭主义*

米塞斯对社会主义的分析,丝毫没有为马克思和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作家共

* 米塞斯攻击社会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请读者客观鉴别。——编者注

444 同构筑而成的社会主义宏伟大厦留下情面。⁵⁹那么社会主义的真正意义在哪里呢？答案似乎在全书的最后一章揭晓了：

事实上，社会主义压根就不是它所宣扬的那种东西。它不是一个更美好、更精彩的世界的拓荒者，而是数千年来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的破坏者。它不事建设，因为破坏就是它的本质。它不生产任何东西，它只是坐享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创造出来的东西。既然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只有作为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经济秩序的社会主义碎块才能生存，所以走向社会主义的每一步必然毁坏已经存在的东西，从而导致它自身的灭亡。⁶⁰

毁灭工作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思想家和艺术家一直处在这场运动的最前线：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数十年来，再没有比欧洲的社会秩序和道德的普遍崩溃经过更加彻底和更加全面的准备了。我们已经经历了这一崩溃，至今仍在感受着它。所有的科学和艺术都为毁灭作出了贡献。⁶¹

445 此处，米塞斯似乎与卡尔·路德维希·哈勒(Carl Ludwig Haller)没有什么不同，后者是19世纪欧洲最杰出的“反动”思想家之一，声称平等主义的“毁灭精神”是雅各宾派自由主义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特征。哈勒认为，平等主义计划在企图消灭自然的社会不平等方面，永远都是以卵击石。面对这个不可能的目标，平等主义者不是选择放弃，而是试图按照他们的理想改造世界。他们领导了一场反对所有形式的权威以及所有源于权威的社会组织的战争：学术、教会、教士、贵族、政府、家庭、父母。社会纽带来自自然的不平等，但是这场战争摧毁的仅仅是这些社会纽带，而不是不平等在事实上的存在，所以雅各宾派毁灭了社会。哈勒在米塞斯之前就曾说过：

如果社会还没有全线崩溃，如果我们尚能拯救社会的一些残垣断片，这只是因为(雅各宾派计划)在物质层面执行的不可能性，因为人类有时显而易见的愚行以及令人欣慰的不一致性，甚至还因为邪恶的存在。⁶²

米塞斯和哈勒当然认同平等主义的毁灭性质，但是米塞斯不赞成哈勒对法国

大革命之后出现的所有制度革新的谴责。他也不同意英国教授赫恩肖(F. J. C. Hearnshaw)把社会主义斥责为体制化劫掠的观点。按照米塞斯的风格,把劫掠的概念带到理论分析中未免有点太道德化。米塞斯的论点是技术性的:社会主义行不通,就这么简单。米塞斯在写给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位通信者的信件中这样评价赫恩肖:

我完全认同您的说法,把社会主义视为劫掠是非常错误的。如果建立在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上的社会秩序能够行得通,社会主义会和资本主义一样诚实和公正。⁶³ 446



20世纪40年代末的米塞斯

注 释

1.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米塞斯在书中破天荒地使用了一张图表,描绘劳动效用的典型曲线形状,作为劳动时间的函数。这是他出版的所有著作中仅有的一次。参见 Mises, *Ge-meinwirtschaft*, 1st ed. (Jena: Gustav Fischer, 1922), p. 154。有意思的是,米塞斯的图表来自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的《政治经济学原理》(*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Macmillan, 1888)。

2. 这是1925年初,费利克斯·考夫曼向玛吉特形容米塞斯的用语,当时米塞斯刚刚认识未来的妻子玛吉特·谢雷尼(Margit Serény)。参见 Margit von Mises, *My Years with Ludwig*

von Mises, 2nd enlarged ed. (Cedar Falls, Iowa: Center for Futures Education, 1984), p. 14。

3. 参见 F. A. Hayek, “Einleitung,” introduction to Ludwig von Mises, *Erinnerungen* (Stuttgart: Gustav Fischer Verlag, 1978), pp. Xif。又见 Erich Voegelin,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vol. 34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0。

4. 弗里茨·G. 施泰纳致米塞斯, 标注日期为 1930 年 12 月 8 日; Mises Archive 66: 23: “我始终认为这个书名导致了这本精彩的著作没能得到它应有的广泛传播。”

5. Mises, *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1), p. 31.

6. 大约 160 年前, 亚当·斯密已经用极为相似的方法分析了不平等的土地所有权产生的经济影响。他论证说, 不平等的所有权对土地的实际使用几乎没有影响。他说, 土地所有者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做出几乎与在土地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做出的一样的分配”。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759] 1976), p. 304。

7. *Ibid.*, pp. 61f. 他提到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Marsilius of Padua) 似乎在《和平保卫者》(*Defensor Pacis*)中也采用了类似的论证。今天, 这种论证思路常常被归功于卡尔·波普尔的贡献, 参见 Karl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London: Routledge, 1945), vol. 1, chap. 7。不过年轻的波普尔很可能是从《社会主义》一书学中到了这种论证思路, 就像许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

8. 请注意米塞斯的观点——政府无法违背大众意志而统治——在西方思想史中有着悠久的传统。特别参见 Thomas Aquinas, “Über die Herrschaft der Fürsten,” *Staatslehre des Thomas von Aquino*, F. Schreyvogel, ed. (Vienna, [1274] 1923), part 2, chap. 2, pp. 65f (最近许多学者认为这一章实际上应划入第一部分第 10 章); Etienne de la Boétie, *The Politics of Obedience: The Discourse of Voluntary Servitude* (New York: Free Life Editions, [1562] 1975), p. 50; 以及 David Hume, “Of the First Principle of Government,” *Essays, Moral and Political* (Minneapolis: Liberty Fund)。

9. 米塞斯引用了马克斯·韦伯的话, 写道:

民主不会因为来自大众的领袖专职从事政治而有所减损。如同分工社会中的任何其他职业一样, 政治需要职业化, 业余政治家是无用的。(*Socialism*, pp. 63–64)

10. *Ibid.*, p. 64.

11. *Ibid.*, p. 66.

12. 在米塞斯写作的年代, 许多西方国家的夫妻状况依然如他所写的那样。例如, 作为早期社会工程学的一个例子, 法国的拿破仑法典就以法律明文规定了男性的支配地位, 丈夫是家庭全部资产在法律上的所有者; 参见 Xavier Martin, *L'homme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sa compagne* (Bouère: Dominique Martin Morin, 2001)。奥地利直到 1918 年才赋予妇女以投票权, 其他国家的日期如下: 德国(1919)、加拿大(1920)、英国(1928)、法国(1946)、意大利(1946)、日本(1947)、瑞士(1971); 参见论文“Wahlen,” *Staatslexikon*, 7th ed. (Freiburg i. Br.: Herder, 1989), col. 830。

13. Mises, *Socialism*, pp. 90 - 91. 在另一处他写道:

如果女权运动追求的是男女法律地位的平等,如果它追求的是妇女的法律和经济自由,以便她们能够依照自己的喜好、愿望和经济状况安排自己的生活,那么就此而言,它不过是主张和平和自由的演化的伟大自由主义运动的一个分支。一旦它越过这个界限而攻击社会生活制度,以为这样就能排除自然的障碍,它便成了社会主义的精神产儿。(p. 87)

14. *Ibid.*, p. 90.

15. Otto Weininger, *Geschlecht und Charakter*, 19th ed. (Vienna: Braumüller, 1920), chap 2, pp. 106 - 08. 在第 12 章,魏宁格尔继续指出,对于女性来说唯一具有绝对价值的活动就是性交。只是由于女性同时也是被动和接受的一方,因此她们才会倾向于接受男人的价值观例如贞操和对艺术与科学的兴趣。因而,在她们真正的性欲本质和她们表面上支持的价值观之间就产生了一个内在的冲突。歇斯底里是这一冲突的自然反应,关于这一点魏宁格尔没有过多解释,而只是说布劳尔(Breuer)和弗洛伊德正以非常有前景的方法进行研究。

16. Mises, *Socialism*, p. 86.

17. *Ibid.*, p. 90.

18. *Ibid.*, p. 139.

19. *Ibid.*, p. 163.

20. *Ibid.*, p. 169.

21. *Ibid.*, pp. 167 - 68.

22. *Ibid.*, p. 161.

23. *Ibid.*, p. 178.

24. *Ibid.*, p. 186.

25. *Ibid.*, p. 191.

26. 这些问题不仅涉及企业管理,也涉及“私事”,比如生儿育女的时机和数量等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不会想到“在生活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生孩子”。米塞斯总结说:“一个不对人口增长进行强制管理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难以想象的。”(p. 175)事实证明,这又是一个先见之明。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终于发现必须通过强制堕胎来限制人口的增长。

27. *Ibid.*, pp. 154f.

28. *Ibid.*, pp. 155 - 56. 又见 p. 152。

29. Mises, *Liberalism: In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Irvington-on-Hudson, N. Y.: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1927] 1985), p. 195.

30. Mises, *Socialism*, pp. 260f. 他继续阐述了这个原则:

在 A 优于 B 的条件下,如果 A 需要 3 小时,而 B 需要 5 小时来生产商品 P; A 需要 2 小时, B 需要 4 小时生产商品 Q, 那么如果 A 只生产 Q, 让 B 只生产 P, A 就会从中得到好处。如果各用 60 小时生产 P 和 Q, 那么 A 的劳动成果是 $20P + 30Q$, B 的劳动成果是 $12P + 15Q$, 两者相加是 $32P + 45Q$ 。但是,如果 A 只生产 Q, 他会在 120 小时里生产 60 件, 如果 B 只生产 P, 他会在同样的时间里生产 24 件。这样, 活动结果就是 $24P + 60Q$, 由于对 A 来说 P 有 $3:2Q$ 的替代值, 对 B 来说有 $5:4Q$ 的替代值, 这意味着产量大于 $32P$

+45Q。

31. 参见 Vilfredo Pareto,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reprint, Geneva: Droz, [1896] 1964), vol. 2, p. 859. Edwin Seligman,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1905), § 95, pp. 225f. and § 200, pp. 491f.

32. 米塞斯只在他的后期经济学著作中使用这种表述。参见 Mises, *Nationalökonomie* (Geneva: Editions Union, 1940), pp. 126ff.; idem, *Human Actio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9), pp. 158ff. 他在此处提到“李嘉图的协作法则”。不过,李嘉图理论的一般化其实已经出现在《社会主义》中。

33. Mises, *Socialism*:

历史上的劳动分工源于自然界的两个事实:人类能力的不平等和地球上人类生活外部条件的多样性。这两个事实其实只是一个,即自然的多样性,自然不会重复自身,却创造着具有无限多样性的宇宙万物。(p. 259)

34. Ibid., p. 261.

35. 米塞斯致波夫,信件日期为1950年12月26日;Grove City Archive: Ballvé files.

36. Mises, *Socialism*, p. 272.

37. Ibid., p. 275. 他强调说:

没有证据表明社会演进肯定沿着一条直线稳步前进,社会停滞和社会倒退乃是不可忽视的历史事实。世界史是已消亡文明的墓场,在印度和东亚,我们都看到了处于停滞状态的文明的大型实例。

38. 熊彼特不久前刚刚支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说法。参见 Joseph A. Schumpeter, “Sozialistische Möglichkeiten von heute,”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Sozialpolitik* 48, no. 2 (1921): 314. 参见同上,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42)。

39. 米塞斯毕生坚持这个立场,反对政府的反垄断政策。他常常是孤军奋战,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他以八十高龄还在朝圣山学社的辩论中讨论经济集中化问题。例子参见 Mises, “Ein Wort zum Monopolpreisproblem,” Peter Muthesius, ed., *Vom Sinn der Konzentration* (Frankfurt: Knapp, 1965)。

40. 除了反垄断政策必然带来的腐败,事实证明这些政策常常在实践中导致灾难性后果,因为它们以牺牲高效产业的利益为代价让低效的产业获益,却无助于改善小企业面对大企业竞争时的整体处境。对于这些失败的实践,并没有批判性的研究。米塞斯的资料来自于霍夫拉特·波森德纳(Hofrat Pöseneiner),一位负责实施“工业政策”的官员。米塞斯试图说服他将这些经历付诸文字。参见米塞斯致布洛德尼兹(Brodnitz),信件标注日期为1927年4月5日;Mises Archive 62: 21。

41. Mises, *Socialism*, p. 344.

42. Ibid., p. 346.

43. Ibid., p. 348. Mises, *Gemeinwirtschaft*, 2nd ed. (Jena: Gustav Fischer, 1932), p. 359.

44. 1922年以前,对垄断价格理论最详尽的阐述来自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的著作,维也纳理论界对他的评价很高。克拉克声称垄断削弱了自由竞争,而价格垄

断比公共垄断更恶劣。参见 John Bates Clark, *Essentials of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and London: Macmillan, 1914), pp. 374ff., 397。

45. 米塞斯致汉斯·赫尔维西(Hans Hellwig), 标注日期 1956 年 11 月 29 日; Grove City Archive: Hellwig file。米塞斯在信中也提到了《国民经济学》中的段落(p. 336), 他在那里更清楚地陈述了自己的观点。

46. 参见 Murray N. Rothbard, *Man, Economy, and State with Power and Market*, Scholar's edition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03), chap. 10。

47. Rudolf Hilferding, *Das Finanzkapital* (Berlin: Dietz, [1910] 1947), chaps. 21 and 22 曾经有类似的评价。不管怎样, 这位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国家垄断是资本主义的自然结果。因此, 米塞斯无法支持希法亭的分析, 而更倾向于推荐弗赖堡教授罗伯特·利夫曼(Robert Liefmann)的研究, 利夫曼详细分析了德国政府如何在过去的历史中造成垄断。参见 Robert Liefmann, *Kartelle und Trusts* (Stuttgart: Moritz, 1924)。

48. Mises, *Socialism*, p. 350.

49. Ibid., p. 370.

50. 卡尔·施米特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同样的看法, 参见 Carl Schmitt, *Politische Theologie*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22)。施米特严厉批判了古典自由主义法学, 抨击现代法学偏离了神学政治基础。奥特马·施潘也是一个旧学派出身的天主教知识分子, 他和教皇庇护九世一样, 相信基督必会重建整个世界。在米塞斯自己的朋友圈中, 埃里克·沃格林是对这些问题最感兴趣的。参见沃格林的早期著作 *Die politischen Religionen* (Stockholm: Bermann-Fischer, 1939)。

51. 参见 Rudolf Sieghart, *Die letzten Jahrzehnte einer Grossmacht* (Berlin: Ullstein, 1932), pp. 299f。

52. Mises, *Socialism*, pp. 375f.

53. 参见 ibid., p. 376。这个命题再次与同时代一本著作提出的命题类似, 参见反自由主义者卡尔·施米特的 *Römischer Katholizismus und politische Form*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23)。不过, 施米特并不相信耶稣的教导是彻底的来世论。他认为天主教会能够存续, 正是因为它始终享有为了完成使命所必需的少数自由。

54. Mises, *Socialism*, p. 379.

55. Ibid., p. 380.

56. Mises, *Gemeinwirtschaft*, 1st ed., p. 421; (英文)译文出自本书作者。出于未知的原因, 英译本在出版时对这句话的翻译不如德文版果断:

面对所有这些证据, 似乎只能对上述问题“是否有可能使基督教与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社会秩序协调一致”作出否定回答。有生命力的基督教似乎不能与资本主义并存。(Mises, *Socialism*, p. 386)

57. Mises, *Socialism*, pp. 386f.

58. 米塞斯致帕克, 标注日期为 1953 年 5 月 14 日; Grove City Archive: Tax Foundation file。米塞斯请内尔-布罗伊宁寄给他一本税收基金会的小册子《1953 年财政状况》(*Fiscal Facts for '53*)。

59. 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反应是可以预见的:他被刻画成了“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参见 Kapeljush 发表在《布尔什维克》第 15 期(1924 年 8 月 15 日)上的文章;Mises Archive 1: 9ff. 文件内包含这篇文章的德译本,是米塞斯在 1925 年秋季从莫斯科的奥地利代表团收到的。

60. Ibid., p. 414.

61. 米塞斯致一位未知的通信者,标注日期为 1926 年 2 月 9 日;Mises Archive 80: 24。想必是写给小说《失传》(*Polythea*)的作者。

62. Carl Ludwig Haller, “Über einige Parteienbenennungen zum besseren Verständnis der Zeitungen und anderer moderner Schriften,” *Satan und die Revolution—und andere Schriften* (Vienna: Karolinger, 1991), p. 78.

63. 米塞斯致梅耶多夫,信件标注日期为 1928 年 6 月 10 日;Mises Archive 88:6。另见 Mises Archive 88:8 梅耶多夫致米塞斯的回信。

第四部分
盛年米塞斯



由于1919年9月10日《圣日耳曼昂莱条约》(Treaty of Saint-Germain-en-Laye)的签订,奥地利的形势急剧恶化。这项条约旨在保证德意志民族在政治上的虚弱,而不是维持国际长久和平,所以它更像勒索而不是真正的协议。¹ 它把所有负担都加在了奥匈帝国的德意志奥地利部分,而且,在处理奥匈帝国继承国之间的关系时,它也总是打压德意志奥地利而偏袒其他国家。这是基于以下的考虑:哈布斯堡王朝长期维持对捷克、斯洛文尼亚、意大利、克罗地亚和波兰的日耳曼霸权政策,所以德意志奥地利必须承担战败和帝国解体的全部代价。

450

基于这种立场,条约规定把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Deutsch-Österreich)改名为奥地利共和国(Republik Österreich)——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条很不寻常的条款。但是,新的奥地利共和国只能忍受这种不加掩饰的蛮横要求。随着民族自决原则用于确保捷克、波兰和南斯拉夫从奥匈帝国独立出去的合法性,“让日耳曼人付款”的目标也成了一个新的原则。以捷克为例,人们援引“历史法则”证明苏台德区并入捷克的合法性,而事实是日耳曼人首先在这个地区定居,并且仍然是多数民族;在意大利的例子中,为了在布伦纳山口建立一个“天然的国界”,南蒂罗尔被划入了意大利。在德意志奥地利本土,“独立”被认为要比它的居民加入德意志帝国的愿望更加重要。《圣日耳曼条约》签订三个月后,所有奥地利地方议会都投票赞成与德意志帝国建立经济联盟。协约国在1919年12月17日立即作出反应,坚持奥地利不能放弃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

德意志奥地利丧失了近四万平方英里的土地,这超过其领土的三分之一。几个世纪以来,日耳曼人一直在那里居住和耕作。条约的大部分其他条款都更进一步地羞辱了德意志奥地利,并恶化它与邻国的关系。

最紧迫的问题是财政方面的。协约国要求德意志奥地利单独负责前奥匈帝国的债务。战争债券和其他与战争相关的债务都是以克朗发行的,因而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印刷更多的钞票解决。但是还有两类财务责任,事实证明是永久和有害的:公务员的工资和国有企业的巨额赤字。

451

奥匈帝国的公务员多数是日耳曼人,大多住在维也纳。帝国解体后,德意志奥地利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公共服务体系原本是为五千万人口设计的,现在的负担却落到了五百万人口身上。政府采用各种办法试图减少公务员的数量,但到1922年,仍有十分之一的人从国库领取薪水。

政府冗员是旧帝国的遗产,而亏损巨大的公共企业却是社会民主党人的成就。社会民主党“社会化”了煤矿和其他工业。

在这样的处境下,德意志奥地利是无法支付任何人的索赔的。它的国民养活自己都很困难,尤其是在维也纳。与东部各省的传统贸易通道已经荡然无存。与捷克、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兰等邻国——这些国家比奥地利更加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贸易也降到了最低点。不仅不能支付赔款,德意志奥地利还要依靠之前的敌人的金融支持才能存活。而奥地利也确实在1919年年底起得到了援助。

哈耶克与理赔局

452

按照条约第248条,新奥地利必须赔偿外国政府及其国民的损失。这些外国受益人并不限于协约国,还包括旧奥地利的非日耳曼地区——按照条约的描述,这些地区是“协助”协约国的国家。第248条很大程度上是《凡尔赛和约》类似条款的翻版,这些类似条款涉及的德国情况则要简单得多。这样的条款在奥地利如何实施是完全不清楚的。这次又是维也纳商会的公共管理专家找到了解决方案。

战争期间,米塞斯的朋友埃米尔·佩雷尔斯建立了一个奥地利海外资产保护办公室(Office for the Protection of Austrian Assets Abroad),²旨在保护奥匈帝国公民的私人财产,为公民在敌国的已有资产建立档案。1920年秋,随着《圣日耳曼条约》的批准,奥地利政府把该组织改组为官方的理赔局(*Abrechnungsamts*)。佩雷尔斯继续担任行政长官,另有几个人,包括米塞斯,也被安排到这个部门工作。两位商会秘书非常注重组织运作的效率,尽量保持理赔局机构的精简。到了1922年,在德国柏林的类似组织已经拥有超过1000名雇员,而维也纳的机构只有150人,还要处理比德国复杂得多的情况。³

1922年6月,佩雷尔斯荣升新职,离开了理赔局,米塞斯成为继任者。两年半后,米塞斯也离开了这个职位。从表面上看,离职的原因是他担任了商会副会长,而他的研究工作也无法保证他有足够的时间继续承担理赔局的事务。他的前雇员们称赞他通过实业界和银行界的关系网络成功发行了理赔局债券(*Abrechnungsschuldverschreibung*),为赔款程序产生的支付款项融资。⁴不过,报纸揭露了米塞斯和

财政部关于战前债务支付问题(财政部已经延期了)⁵的冲突。简言之,真正的问题在于,米塞斯已经说服一些人为政府融资,现在政府却拒绝还款。米塞斯不愿意留在这样一个组织里。

对米塞斯本人来说,在理赔局的那段时间是特别值得纪念的,他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年轻学生,后来成为他最重要的思想盟友和长期的朋友。1921年12月,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1899—1992)刚到理赔局申请职位时,已经获得了他的第一个博士学位(法学)。米塞斯亲自主持了面试。哈耶克递交了一封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写的推荐信,信中称赞哈耶克是一位前途无量的经济学家。⁶米塞斯微笑着说他从未在课堂上见过哈耶克,但因为维塞尔的推荐信,拒绝这个年轻人显得有些无礼,所以就当场录用了哈耶克。米塞斯把研究货币和银行理论的工作分派给了他。而哈耶克也通过提醒米塞斯留意自由银行理论迅速证明了他是一位有用的助手。

跟其他同学相比,哈耶克更敢于冒险。他的同辈人如哈伯勒和沃格林都非常不愿偏离传统的职业道路,所以1924年著名的洛克菲勒基金开始为奥地利学生提供奖学金时,他们最终都离开维也纳奔赴美国深造。⁷但哈耶克满怀探索之心只身前往纽约,身上不名一文,只有投入艰苦学术研究的才华和思想准备。米塞斯鼓励和支持了这个计划。

获得第二个博士学位(经济学)后,哈耶克于1923年3月去了纽约,一直待到1924年5月。⁸他在那里找到了一份为经济学教授杰里迈亚·W. 詹克斯(Jeremiah W. Jenks)担任翻译的工作,他曾在1922年在维也纳见过詹克斯教授。后来,哈耶克又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for Economic Research)为韦斯利·米切尔(Wesley Mitchell)教授工作,为后者的商业周期著作搜集数据。⁹米切尔十分仰慕维塞尔,他将哈耶克提供的一些关于维塞尔的背景资料,用作维塞尔著作美国版的序言。哈耶克也和他谈到了米塞斯。让米切尔无比惊讶的是,哈耶克把米塞斯与伏尔泰、孟德斯鸠、托克维尔以及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相提并论。¹⁰

当哈耶克返回维也纳时,他已经完全掌握了美国商业周期研究的方法,事实证明,他在美国学到的知识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两年后,米塞斯建立了奥地利商业周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

455 期研究所(Austrian Institute for Business Cycle Research)——主要是为了给哈耶克提供一个合适的职位。哈耶克的老师维塞尔曾经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维也纳的主要联系人。哈耶克还在曼哈顿时,维塞尔设法为哈耶克争取到了洛克菲勒一等奖奖学金。但当通知送达这位年轻人时,他却回到维也纳了。¹¹此时他已经不愿接受那份奖学金。随后,米塞斯试图聘用哈耶克在商会图书馆工作,但是,最终获得这个职位的是哈伯勒。¹²这些早期问题预示了哈耶克一生缺乏追名逐利的才能。

反通货膨胀的斗争

米塞斯鼓励哈耶克和他指导的所有学生研究货币和银行问题,他这样做事出有因。此时奥地利公共财政极其糟糕,大量政府支出只能通过印刷更多的钞票来支付。同时,战时的外汇管制政策还在执行,以使公众相信政府是在反通货膨胀,而不是在制造通货膨胀。

456 米塞斯成功促使商会反对外汇管制。在商会的会员大会上,他引述了一些信件,在这些信件里,企业家描述了当前货币制度如何使得他们实质上不能为那些在地理上很近却使用不同货币的顾客服务。¹³米塞斯对货币政策还有更加直接的影响。由于在理赔局和第一届伦纳政府担任的职务,他也成为奥匈银行的少数资深顾问之一。奥匈银行是旧君主国的中央银行,但在共和国成立之后仍继续运营了几年。

奥匈银行主管亚历山大·施皮茨米勒不仅决定停止克朗贬值,还打算提高克朗的外汇汇率,他的做法类似于后来丘吉尔在英国采取的措施。¹⁴米塞斯当然反对施皮茨米勒的计划,而且也不同意他的观点——当前克朗币值在低价位上的稳定等于国家破产。米塞斯的立场可以从他的著作推断出来,包括以下这篇1923年论文片段:

认为“贬值”就意味着国家的破产是十分错误的。将货币稳定在当前低价位上的影响——即使只考虑它对现存债务的影响,也是相当不同的。它既不限于又不至于引起国家的破产。说它不限于国家的破产是因为它的影响不限于公共债务,还包括私人债务;说它不至于引起国家的破产是因为,一方面它还会影响纸币支配之下的政府资产,另一方面它不影响基于硬通货或外币的债务……

货币引致的货币购买力变化的一般经济效应,特别是对贸易—政治的影

响——因而也包括提高货币购买力的效应，在货币稳定之前会抵消任何增加货币价值的企图。货币在当前价值水平上应该稳定下来。¹⁵

米塞斯的论点最终获得了胜利，并为1922年秋的货币改革提供了基本原则。457
但是，这个胜利是经过他与施皮茨米勒的激烈抗争后才取得的。施皮茨米勒一直不相信米塞斯，并一再与他发生冲突。或者用外交辞令来说，施皮茨米勒

采取的措施在我看来是不适当的。我已经公开声明反对这些措施，例如外汇管制，在与施皮茨米勒阁下讨论时我已经屡次解释了我的观点……我没有说服他接受我的观点。¹⁶

后来施皮茨米勒赞扬米塞斯是最重要的奥地利货币政治家。¹⁷然而，米塞斯一直强调自己的影响完全是通过著作和公开演讲获得的。1922年的货币稳定是唯一一次符合他期望的官方政策。

1921年10月21日，米塞斯在奥地利政治学会发表了题为“奥地利当前的公共财政状况”¹⁸的演讲。他认为政府只有通过取消食物补贴、出售公共企业才能达到预算平衡，其他任何提议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平衡预算这个问题。458

朔贝尔(Schober)政府仍然青睐印钞机，不断增加的克朗纸币迅速面临实际购买力下降的问题——奥匈银行发行的银行券越多，它们就变得越弱。到1921年秋，这种发展演变成对奥地利经济的严重威胁，逐渐成为奥地利企业财务计划的障碍，并抑制了劳动分工。

德国存在同样的现象，那里最著名的货币专家、帝国银行行长鲁道夫·哈芬施泰因和财政部长卡尔·黑尔费里希都相信这些现象之间并不存在因果联系。马克购买力下降的原因之一在于德国国际收支赤字，而帝国银行增加(名义)马克供给对于避免实际马克供给下降趋势是必要的。

这些观点对奥地利公众和政府内部权势集团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但米塞斯不相信这一套。货币购买力的下降速度比新币印刷速度还快，不过，这是因为货币持有者的当前预期关心的是货币将来的购买力：

如果一种货币的未来前景不太乐观，那么，它的投机价值(对将来购买力的价值做了预期)就比当前实际货币需求和供给状况决定的价值要低。商品459
的要价和支付价格会更接近于预期的将来状况，而不是决定于当前流通中的

货币需求和货币数量……当前可用的货币数量并不足以支付预期的未来货币需求和数量决定的价格。因此,贸易会因纸币不足受阻。人们手里没有足够的货币执行已经达成的交易……这种现象在1921年晚秋的奥地利已经非常明显。¹⁹

因此,事实上在增加货币发行与货币超过比例的贬值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印钞机并不能停止或逆转奥地利货币供给的下降,相反,更多的通货膨胀只能更加恶化这种状况。

问题在于,施皮茨米勒的奥匈银行仍然是通货膨胀派的大本营。²⁰奥匈银行追随黑尔费里希-哈芬施泰因路线,绝望地试图通过印刷更多的钞票来赶上不断萎缩的克朗。米塞斯尽可能地进行了反击,在1922年2月《新自由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通货膨胀与货币短缺:反对继续使用印钞机》(Inflation and the Shortage of Money: Against the Continued Use of the Printing Press)和《三十年前与今天奥地利的货币问题:一个评论》(The Austrian Monetary Problem Thirty Years Ago and Today: A Commentary)。²¹他特别希望提高公众对于通货膨胀破坏经济的认识。奥地利已经成为一个穷国,必须通过缩减资本基础(capital base)支付至少一部分进口商品,但是通货膨胀会把这些全摧毁掉。正如他向莫里茨·杜布解释的那样:

我认为在评估我们的状况时要严格区分两件事:一方面是通货膨胀,它导致所有商品和外币的价格上升;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国民必须依靠资本消耗生活,通过出口资本资产例如可转移债权和其他所有权凭证支付进口商品。然而在某程度上,两者存在着一种紧密联系:通货膨胀导致商业利润计算的扭曲,而这成了毫无节制地消耗国民经济资本积累的心理基础。货币贬值导致人们长期信以为真的利润成了虚假利润。²²

研讨会

如果说米塞斯正在开展对抗经济无知带来的危险的运动的话,那么教室就是运动总部。1920—1921年冬季学期的主题是商业周期理论,一些特色讨论集中于经济危机问题、什么是“正常的”、“好的”和“坏的”经济状况,以及1900年至1902年、1907年和1873年的经济危机和商业周期的永久影响。²³

1921—1922年冬季学期,米塞斯的大学研讨班集中讨论了一些货币理论的重

大问题。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学期,因为那些日后成为学术明星的学生第一次参加了他的研讨班,包括哈耶克、哈伯勒、马克卢普和许茨。²⁴

虽然“理论经济学研讨班”的教学实践与奥地利货币政策的紧迫问题相关,但是,米塞斯的私人研讨班讨论的主题与现实政治事件却没有直接联系。²⁵

此后几年,私人研讨班继续讨论经济问题的基本概念,不过,内容逐渐转向各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科学方法的讨论。²⁶⁻²⁷

哈耶克有时觉得这些辩论很折磨人,所以当他离开维也纳去纽约时感到很放松:

总体上说,我有点厌倦了前几年在维也纳占用了大量时间的讨论,例如主观价值理论或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²⁸

462

他比较了美国和自己家乡讨论问题的方式,称赞美国式讨论主题更为集中:

说到这里的理论讨论,他们有一大优势,即存在一种普遍接受的学说——实际上就是马歇尔学派的学说,而且这是被无可非议地接受的。确切地说,当讨论一个问题时,讨论可以集中在问题本身而不是整个经济学的基础。²⁹

到1924年5月哈耶克返回维也纳,论坛已经有了明显的跨学科性质。只有三分之一不到的成员,如施特里格尔、哈伯勒、哈耶克、马克卢普、摩根斯特恩、利泽尔和布劳恩,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经济学家,所以讨论必须比当时一般的辩论更加“哲学化”。会议在每两周召开一次,时间是周五晚上。晚上7时,二十多位成员聚在米塞斯的商会办公室里。先由一位成员发表一个简短的主题发言,然后继续讨论到10时30分。这时讨论会的“正式”部分结束,与会者转到通常是一家名为“重返佛得角”(Ancora Verde)的意大利餐厅进行他们的“非正式”辩论。最有激情的辩手们(米塞斯通常是其中之一),最后会到金斯特勒咖啡馆待到凌晨两三时。后来米塞斯坚称他在这个圈子里既非老师也非指导者,而只是平等者中的首席(the first among equals)。

属于这个圈子的每个人都是自愿来的,他们只受求知欲的引导。他们来时还是学生,经过这些交往我们都成了朋友。后来,甚至我的一些同辈也加入了这个圈子。访问维也纳的外国学者是很受欢迎的客人,他们非常积极地参

464

与讨论。

私人研讨会……以前是,以后也永远是我的年轻朋友们的社交圈子。外人对我们的聚会毫不知情;他们看到的只是参与者个人发表的著作。

我们并不培植学派、社团或宗派。我们虽然互相支持对方,可是我们的方式与其说是赞同不如说是反驳。只有一件事把我们联合在一起,就是推进人类行为科学的热情。每个人都遵循自己的原则,自行其是。我们从不组织起来或者仿效帝制德国和战后德国的“科学家们”令人作呕的“言行举止”。我们从未考虑发行期刊或者出版文集。每个人都以适宜于思想者的方式做自己的事。不过我们每个人仍然为整个团体而努力,不图回报——除了朋友之间的感激和赞赏,当然,不是喝彩。

这就是我们不事张扬的思想交流,其中盖有大义存焉。我们沉浸其中,感到愉快和满足。³⁰

维塞尔的长久阴影

465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部分成员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卓越地位,20世纪20年代米塞斯在维也纳举办的研讨班——尤其是在他的商会办公室举办的私人研讨会,已经成为传奇。即使米塞斯的个人影响没有人们期望的那么大,这些聚会对年轻学者的成长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哈耶克、哈伯勒、施特里格尔和马克卢普,他们断断续续地与米塞斯一起工作了十多年。

对这些人来说,米塞斯更多的是一位榜样而非教师。在私人研讨会的讨论中,正如他从庞巴维克那里学到的一样,米塞斯显示了分析各种社会问题的能力,但没有培植一个“学派”鼓吹自己的学说。当然,每位学者都希望有人能够发现自己的研究道路有趣且重要,值得让人在他止步的地方继续工作。但是,米塞斯没有做过任何努力鼓励学生继承自己的衣钵,而事实上他在维也纳期间也没有收过弟子。

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个人主义理想。米塞斯充满了席勒、赫尔德、洪堡和其他德国古典作家的理想主义,认为人类活动的终极目标就是个人的自由发展。这比任何宗教、政治或种族教条都更重要。他当然不缺少坚定的政治和科学信念,但是这些信念和他给予个人主义理想的尊重相比,只是次要的。1926年后,他接替维塞尔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维也纳的主要联系人,因而有了提供或保留物质利益的机会,但他没有利用这些权力支持自己的追随者。虽然这是一种高尚的姿态,却把竞争优势留给了那些无所顾忌的对手。

不过,20世纪20年代没有兴起一个米塞斯学派的最重要原因,是米塞斯并未享有最高的专业声望。当哈耶克、哈伯勒、马克卢普和许茨首次参加研讨班时,米塞斯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货币经济学专家和一本关于当代政治问题(《社会主义》)的颇受争议的著作的作者。虽然他是德语世界最著名的理论家之一,但对学生而言,相比法律和政府科学的另外三位教授汉斯·凯尔森、卡尔·格林贝格和奥特马·施潘,³¹他还缺少显赫的声望。凯尔森是著名的奥地利共和宪法的缔造者和纯粹法学的开拓者,格林贝格是社会民主运动在维也纳的主要精神领袖,施潘则是德语世界最成功的社会科学教科书的作者。

466

1919年,施潘取得了菲利波维希的教职,此时这个职位已经空缺两年。他是经济学教授中吸引学生最多的。他的“普遍主义”理论是早期“有机”社会理论的精致版本,后者在天主教国家例如奥地利一直广为流传并且深入人心。在战后的危机混乱年代,普遍主义不仅对多数人来说更易接受,也适应了人们对安全和权威的深刻渴望。维塞尔和米塞斯仅仅处理相对狭窄的经济主题和奥地利学派边际价值分析的技术问题,而施潘却对着学生大讲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他的讲座和研讨会吸引了大量情感生活沉浸于天主教、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学生。施潘最著名的学生是后来的奥地利总理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Engelbert Dollfuss),但他对奥地利学派的其他年轻学者例如哈耶克和摩根斯特恩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施潘远远不如他的维也纳大学同事成功。最初,他获邀参加国民经学会会议,但很快就发现根本无法与奥地利学派成员(维塞尔、米塞斯、迈尔、魏斯和施特里格尔)进行有效的辩论。并非因为政治倾向不同,³²问题在于施潘的直观方法与其他会员的分析方法完全相反。他相信社会理论的目标是把握总体的意义,而其他人则认为这样是不科学的。后来米塞斯明确说明,拒绝施潘的方法并非出于对个人主义方法论优点的武断坚持。关键在于,科学的本质是处理部分而不是整体。经济理论家必须界定社会实在之中相互关联的局部,并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³³

467

那些没有接受施潘的美学、方法论和政治倾向的学生,在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的课堂上找到了现成的替代选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直到1926年去世,维塞尔一直是维也纳无可争议的经济理论权威。1922年冬季学期开始,维塞尔虔诚的弟子汉斯·迈尔继承了导师的职位,维塞尔则担任权力社会学荣誉教授,继续他的讲座。³⁴由于迈尔的存在和1924年维塞尔经济学教科书《社会经济理论》第二版的成功,³⁵在维塞尔去世多年后,维塞尔范式仍然统治着维也纳。

468

无论按照何种标准,汉斯·迈尔都是个二流学者。他能获得维塞尔的职位,实

实际上是由于他的前任的影响。米塞斯一定希望自己得到这个职位,毕竟他已经发表了三本著作,其中两本还是非常出色的。而迈尔还没有一本自己的著作,也很少发表论文。但是迈尔一直很聪明地自诩为维塞尔最重要的门徒。³⁶

469 迈尔这样的人也能继承维塞尔的教职,确实令人沮丧。不过,米塞斯未能得到这个教职本身倒也不是因为有什么不光彩的内幕。更有可能的候选人是约瑟夫·熊彼特,他享有很高的声誉,尤其在年轻人当中。凭着《理论经济学的性质和要义》(1908)一书,他在德语世界已经成为名人;而《经济发展理论》(*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1911)则为他建立了国际声誉。这两部著作都比米塞斯的第一本书更早发表。1909年,比米塞斯年轻两岁的熊彼特已经在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的积极支持下成为奥地利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被认为是纯理论领域的主要代表,仅次于维塞尔。

现在,熊彼特在伯恩大学(University of Bonn)获得了教职。他是唯一一位来自奥地利而在一所德意志帝国的大学获得教职的重要理论家。事后看来,他在伯恩的那段时间非常成功。在他的领导下,经济学系成为经济理论的主要中心,并把研究重点放在了数理经济学上,他的学生埃里克·施奈德(Erich Schneider),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主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

但在同行眼中,纵然是熊彼特,也称不上是两次大战之间德语世界最好的理论家。这个称号属于瑞典的古斯塔夫·卡塞尔,一个从数学转行到经济学的人。他的主要使命是发扬瓦尔拉斯数理经济学。他的《社会经济学》(*Theoretische Sozialökonomik*)很快成为两次大战之间流传最广的经济理论教科书,并被翻译成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语言,在国际上大获成功。³⁷卡塞尔因反对以价值理论和效用理论作为价格理论的基础而闻名。

470 维塞尔、熊彼特和卡塞尔都是“文字的瓦尔拉斯主义者”(verbal Walrasians)。³⁸他们的著作拥护瓦尔拉斯经济学的思想,但却没有深入数理方法的细节。他们在瓦尔拉斯范式历史上的关键时刻保持了它的活力,而且设法使它成为德意志帝国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这其实是一种革命。仅仅十年之内,他们促使大批德国年轻的经济学家远离历史学派,转向了洛桑学派的数理经济学;通过他们的主要著作的翻译,这种影响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德语世界。

奥地利学派的门格尔传统通过庞巴维克的少数弟子(特别是米塞斯)得以保持活力,但是,这些追随者没有大学的正式教职,因而无法全身心投入奥地利学派范式的研究,也无法培养学生和提供未来的教授教职。在德意志帝国的崩溃引起历史学派信条普遍破灭的关键时刻,地位崇高的维塞尔,作为硕果仅存的现代德国

经济学理论创始人,却把那种文字的瓦尔拉斯学派置于权威地位。他们的著作把整整一代学者引向了数理经济学,他们的表述方式迷惑了缺乏了解的读者,让读者以为这些作品与门格尔学派理论家的作品没有本质区别。而维塞尔还是来自奥地利的经济学家,他的身份,无疑使得这种混淆和困惑雪上加霜。

即使在货币、银行和商业周期理论以及社会主义这些较窄的理论领域,米塞斯也不是最高权威。货币理论领域的更高权威依然是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他是奥地利货币价值理论的开拓者,并为标准德语辞典《政治科学手册》³⁹撰写了关于货币的条目。维塞尔支持的银行学派准则和货币的分配理论,由于另外一位依然活着的战前理论经济学家权威熊彼特的著作,而进一步得到了加强。⁴⁰ 471

虽然米塞斯关于货币和商业周期的观点在20世纪20年代有了越来越多的拥护者,特别是在年轻经济学家当中,但他仍然缺乏顶级学院经济学家的权力和影响。⁴¹那些有意成为职业经济学家的学生都被建议埋首于维塞尔和熊彼特的思想。他们确实就是这么做的。奥地利学派的第四代所接受的奥地利经济学首先是维塞尔的著作,这种成长经历使得他们在导师去世后很久才形成自己的经济分析方法。 472

今天,人们通常认为哈耶克是米塞斯的学生。但他身上继承的维塞尔精神遗产同样令人印象深刻。1922年至1923年,哈耶克在汉斯·凯尔森和奥特马·施潘的指导下完成了关于归属理论的经济学博士论文。这篇文章的基础是价值问题和价格理论的维塞尔主义方法,而这与米塞斯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理论是不相容的。⁴²三年后,哈耶克修改了这篇博士论文,在《康拉德年鉴》(*Conrad's Jahrbücher*)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此时他已经对计算理论有所了解,但并没有改变对归属问题的看法。以下就是哈耶克就该主题写下的评论,其中没有提到米塞斯的名字:

人们相信尚未发现这一(归属)问题完全令人满意的答案。当然,就此而言,我们还不能在一开始就排除以下可能,即只有交换经济能够发现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因素,因而无法进行价值归属,这是几位年轻作者的观点。然而,如果认为这种观点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对于经济运行就将无法给出基于主观价值理论的满意解释,而且,这些作者的许多研究也将缺乏根据。⁴³ 473

哈耶克继续解释和发展维塞尔的归属理论。在他看来,维塞尔的理论“仍是当代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基础和最详尽的研究”。⁴⁴他明确反对米塞斯的论点,因为这个论点不符合维塞尔的以下假设:所有社会现象都可以仅在价值理论基础上得到解释。这一事实对于理解后来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辩论非常关键。虽然

哈耶克在争论中表面上站在米塞斯一方,但是两位盟友之间有着深刻的分歧。米塞斯反对社会主义,是因为生产要素只能在一个市场经济中得到评价。哈耶克并不支持这个观点,因为这与他的经济思想的基础框架是冲突的。

474

哈耶克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反社会主义观点,不过,这篇讨论归属理论的论文已经显示了他在今后的取向。哈耶克对庞巴维克归属理论的主要批评是,庞巴维克把未来消费品的价值视为终极所予,但事实上,它们依赖于现在对生产要素的使用的决定。⁴⁵只有全局均衡模型才能描述这种错综复杂的依赖关系,解决难点重重的归属问题。哈耶克在论文结论中提到瓦尔拉斯学派的数理经济学已经成功地处理了一个类似的问题。但他警告不要把数理归属理论应用到实际问题中。虽然他们可能“通过简化的例子证明主观价值理论原则上是适用的,



1961年的哈耶克和米塞斯

但是问题的复杂性“会导致任何一个大的经济系统在实践中都不可能应用归属原则”。⁴⁶这正是哈耶克后来在社会主义批判中强调的论点。

475

作为一位维塞尔价值论者,哈耶克无法赞同米塞斯以下观点:因为不存在价值归属这种东西,所以一个理性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不可能的。那么,从经验上说,市场经济绩效更好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哈耶克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提供的最终答案,是基于18世纪和19世纪一些经济学家的著名观点。这些作者认为价格包含了关于市场状况(短缺、过剩)的信息,并在市场经济中引导生产。⁴⁷哈耶克把这个观点植入一种一般知识理论,用以解释信息在人类行动和经济理论中的作用,指出市场价格对于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传递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市场经济真正优于中央计划经济的地方在于信息自由传递的优势。市场价格是更好的信息传递方式。⁴⁸

这些未来理论的种子是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播下的。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来自米塞斯,但是他的经济思想的分析框架却受维塞尔著作和课堂的滋养。因此,哈耶克成为维塞尔死后出版的重要论文选集的编辑,并在Hölder-Pichler-Tempsky(该社出版了维塞尔所有的开创性研究)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也就不足为奇了。终其一生,哈耶克一直有意识地把自己定位为奥地利学派维塞尔分支的一员。1978年,在米塞斯去世几年后,哈耶克对这个分支几乎完全被他所谓的米塞斯支派取代感到遗憾:



1974年，哈耶克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图为瑞典国王向哈耶克授奖

今天，米塞斯和他的学生已经成为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这是无可非议的，虽然他只是代表了其中一个分支——门格尔的学说已经在他的弟子那里分裂了，其最亲近的朋友和亲戚欧根·冯·庞巴维克和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我得承认我这么说时颇费了一番踌躇，因为我对维塞尔的传统抱有很大期望，他的后继者汉斯·迈尔也曾努力推进这一传统。虽然（这一传统）本来应该更加富有成效，但是这些期望直到目前为止还是落空了。如今活跃于世的“奥地利学派”，几乎完全集中在美国，基本上就是米塞斯学派，这一分支可以回溯到庞巴维克，而维塞尔曾经寄予厚望之人，虽然继承了维塞尔的教授席位，却始终未能完成重托。⁴⁹

476

但是，米塞斯去世一年后，哈耶克获得了诺贝尔奖，这引起人们对他的著作的新兴趣，也使维塞尔范式有了第二次延续的机会。

* * *

20世纪20年代早期,受米塞斯影响最深的学生是弗里茨·马克卢普-沃尔夫(1902—1983)。在私人研讨会所有未来的明星成员中,只有他是在米塞斯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的。⁵⁰马克卢普来自一个企业家家庭,父亲是厚纸板生产商。年轻的弗里茨一边在维也纳大学学习经济学,一边帮父亲管理工厂。1923年,他在米塞斯的指导下撰写博士论文时,还参与了家族在匈牙利开办新的工厂的事务。那年结束时,工厂已经开始运转,而马克卢普也获得了博士学位。米塞斯允许他参加私人研讨会,这样他和米塞斯的关系就变得更加密切了。马克卢普也和自己的导师一样,热爱滑雪和剑术,他们可能在体育馆和大山里一起度过了很多时光。

他们拥有共同的犹太血统,这当然也是不寻常的融洽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20世纪30年代米塞斯写给马克卢普的书信带有真正朋友的语气,而在回应其他圈内朋友(如哈耶克)时,总是礼节性地保持几分距离。犹太血统同时也是他们学术生涯的主要障碍。大约从1922年开始,德国民族主义者和天主教团体发起了一个旨在减少大学里犹太人数量的运动。⁵¹米塞斯在旧政权下已经当上副教授。但在新共和国时期,他的职位没有获得晋升。他的弟子也是一样。马克卢普获得了博士学位,但也仅此而已。

这种形势一定在两人之间造成了同病相怜的情感。不过,即使情况恶劣至此,也不能阻止精力充沛的马克卢普在大学体制外开创一番成功的事业。几年后,他成为奥地利纸板卡特尔的会员,并当选为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协会(*Verein österreichischer Volkswirte*)秘书。马克卢普是有雄心壮志和卓越才干的人,即使在后来的岁月——那时他已迁居美国并致力于学术事业,成功企业家的干劲仍然没有离他而去。多年后,肯尼斯·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为纪念他而写的一首诗就是上述事实的证言:

哦,快乐的人儿坐在
弗里茨的身旁,或脚下
他的思想,深刻而又迷人
快如疾风,超越音速
当他加速前进,一切都迅速后退
人们满脸惊愕,看到
一位超音速的维也纳人

他的才智和活力,似乎
没有因为岁月而减弱。⁵²

马克卢普以金本位制为题撰写了博士论文。1925年,这篇论文刊印成书。在附录中,他把李嘉图的《关于一种经济而安全的货币的提议》(*Proposals for an Economical and Secure Currency*) (1816)译成了德语。六年后,他发表了一项关于银行信用和股票市场在商业周期中的作用的研究。⁵³这两本书表明作者出色地吸收了米塞斯货币分析的方法,同时对于扩展他导师的著作也是卓越的贡献。米塞斯以自己从未用来描述其他弟子作品的措辞赞扬了第二本书——“一部杰作”。⁵⁴

479

但就在此书出版后不久,他们的友谊开始变得紧张起来。马克卢普移居美国,开始适应(或许太热衷了些)新学术圈。他们关系的低点是在20世纪60年代,当时马克卢普激烈反对金本位制。有好几年,他的老师拒绝和他谈话。米塞斯夫人最终努力重建了他们的友好关系,但是过去的友谊不复存在。

伦敦经济学院的联系

战后最初几年,战争赔款问题是国际事务中的头等大事,而且直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一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最初,主导谈判的是战时领导英国和法国的同一批政治家。由于强烈的战时修辞风格,他们充满激情的选举运动要求他们实行抵制战败国的强硬政策。在这种环境下,奥地利的财政和赔款问题不可能取得什么进展。结果,卡尔·伦纳领导的第二届奥地利政府在1920年6月选举失败。米夏埃尔·迈尔(Michael Mayr)领导的新政府虽然没有取得更大的外交成就,但还是接替了他们。1920年12月之后,主导谈判的人变成经济专家时,事情慢慢有了转机。但是因为英国和法国(特别是法国)国内的政治压力,这些人也不能达成可行的妥协。在布鲁塞尔、巴黎、伦敦、戛纳、日内瓦的会议,以及巴黎第二次会议和伦敦第二次会议,都没取得持久的成果。

480

米塞斯似乎至少参与了其中一些会议。毕竟他是理赔局的主管,而且在商会的职位也使他成为奥地利商业和银行业的非正式发言人。他在金融和货币领域是雄辩的专家,他稳重的声音对于那些海外人士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⁵⁵可能就是在这些场合,米塞斯第一次遇到了来自西欧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一直紧密合作,这些人是巴黎的夏尔·里斯特(Charles Rist),伦敦经济学院(LSE)的西奥多·格雷戈里(Theodore Gregory)、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

481 idge, 后来成为贝弗里奇勋爵)等。⁵⁶20世纪20年代,米塞斯与伦敦经济学院的联系缓慢而稳定地建立起来,特别是通过他对年轻的莱昂内尔·罗宾斯(1898—1984)的影响。⁵⁷

正如那个时代的多数年轻知识分子一样,罗宾斯也是社会主义者。由于萧伯纳、韦尔斯和拉斯金的校园读物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成了**国家行业协会同盟**(National Guilds League)的会员,并参加了“饮料贸易国有化劳工运动”。但是,真实世界劳工运动的经历,惊醒了这位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他开始阅读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著作,于1920年至1923年间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经济学——伦敦经济学院是行会运动领袖西德尼和比阿特丽斯·韦布夫妇(Sidney and Beatrice Webb)创办的。

不像自己的妻子和朋友萧伯纳⁵⁸,西德尼·韦布珍视学术自由,因此,伦敦经济学院得以避免成为费边主义学术喉舌的命运。20世纪20年代,这所学院云集了大量杰出的经济学家,最著名的是埃德温·坎南,还有西奥多·格雷戈里,以及后来的罗宾斯本人。

482 格雷戈里要求罗宾斯和其他学生阅读美国和欧洲大陆当代主要经济学家的著作,其中许多作者与他都有私交。因此,罗宾斯对古斯塔夫·卡塞尔、欧文·费雪和弗兰克·A.费特(Frank A. Fetter)的著作都很熟悉。后来他转向奥地利人,可能在1922年《社会主义》发表后不久,他就读了德文版。后来他回忆说,这本书对自己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使他更加坚决地脱离了早期的社会主义理想。⁵⁹

米塞斯著作中处理政治问题的功效主义视角引起了罗宾斯的共鸣,而伦敦经济学院另外两位教师休·多尔顿(Hugh Dalton)和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则强化了罗宾斯的这种认同。尤其是沃拉斯,他是一位伟大的教师,也是杰里米·边沁和哲学激进派(Philosophical Radicals)著作的权威。他始终强调,理性主义是政治学的正确方法,尤其在涉及选择政治手段时。

像维也纳的年轻同辈一样,罗宾斯通过与一群天才朋友例如雅克·卡亨(Jacques Kahane)、阿诺德·普兰特(Arnold Plant)和格奥尔格·图根哈特的日常讨论深化课堂知识。⁶⁰未来的岁月,这些人将成为英国奥地利学派的核心人物。

米塞斯与罗宾斯第一次见面可能是在1924年秋。那年10月,他写信给古斯塔夫·菲舍尔说,他接到一位牛津的经济学教师“Robins先生”“非常认真的提议”,建议将《社会主义》第二部分译成英文。事实证明,“Robins”就是罗宾斯,他的到访是有人极力推荐的。⁶¹罗宾斯刚在牛津大学得到一份临时工作(直到1929年,他一直在牛津和伦敦经济学院之间来回奔波)。后来几年,他致力于《社会主

义》一书的翻译,再后来又发起了翻译米塞斯《货币与流通媒介理论》的项目。1926年后,罗宾斯承担了伦敦经济学院的各项管理工作,因此这些项目进度明显放慢,以至于他不得不找了一位合作译者。但他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特别是对米塞斯著作的兴趣持续上升。20世纪30年代初,维也纳与伦敦之间的联系已经非常频繁,米塞斯和他的学生经常到伦敦经济学院举办客座讲座。1931年秋,F. A. 哈耶克最终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伦敦的盛况达到顶峰。

483

金汇兑本位制的出现

发现奥地利战后金融灾难的解决方案并没有耗费很长时间。1922年秋,在日内瓦的一次会议上,大家取得了第一个真正的突破。1922年10月4日,一份协议在日内瓦签订。这份所谓的《日内瓦协议》是1921年末开始的一系列谈判的最终结果,当时奥地利得到承诺可从英国、法国、捷克和意大利借款。条件是奥地利政府必须允许各国在奥地利实行制度化的监督,并将部分政府收入和资产抵押给外国债权人。

最初,这些条件对于奥地利总理约翰·朔贝尔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但是时间已经不多。外债的唯一替代方案是增加税收和通货膨胀,而这些措施更加糟糕。社会民主党坚决抵制对普通民众增税。他们还在鼓吹一项特别财富税——这一直是流行的提议,但却不能平衡预算。而更严重的通货膨胀必然带来货币体系的崩溃,接踵而来的是社会动荡。

1922年5月底,事情有了转机;此时,伊格纳茨·塞佩尔主教成了政府首脑,决心带领奥地利走出财政噩梦。他具备处理奥地利政治灾难状况的经验,曾是1918年海因里希·拉马施(Heinrich Lammasch)领导的最后一届帝国政府的成员。作为一名天主教神父,塞佩尔不是那种因为必须做出不受欢迎的决策而会感到绝望的人。他住在维也纳的修道院里,不像党内同志那样容易受到各种诱惑和私人关系的影响,也不像他们那样暴露在个人名望的聚光灯下。⁶²他知道依赖西方债权人有条件的国际贷款是危险的策略,因为这会导致国家依赖外国势力。⁶³但是若要摆脱通货膨胀的毒害,就没有其他选择。米塞斯和朋友威廉·罗森贝格说服塞佩尔相信改革的必要性。⁶⁴他们坦诚相告,强调改革必然带来危机,可能会有大规模的失业,其他一些利益也会受到伤害。这个危机只是释放通货膨胀已经造成的伤害,但是公众却会将之归咎于改革者。塞佩尔非常欣赏他的顾问的坦率。米塞斯

484

485 后来回忆说：“他采纳了我关于健全货币的全部想法，而我则与他合作。”⁶⁵ 同月，米塞斯受命出任理赔局的主管。⁶⁶

* * *

在表明自己的最初倾向后，塞佩尔采取行动，给了以奥匈银行为大本营的奥地利通胀派一个沉重的打击。按照《圣日耳曼条约》第 206 条规定，他废除了旧的中央银行，建立了新的央行。这家央行由里夏德·赖施领导，赖施是卡尔·门格爾的学生，也是庞巴维克时代财政部的公务员。他当上新的中央银行行长时，刚被任命为米塞斯主管的理赔局的副局长。

塞佩尔的改革打击了那些依靠通货膨胀获取利益的集团，特别是国有企业和社会主义者执政的地方政府。战争刚结束，这些地方政府就立刻开始了一系列昂贵的福利项目，而这些工程只能通过奥匈银行印刷的纸币支付。对政府来说，损害这些利益仅需承受很小的政治成本；甚至可能是塞佩尔改革的一个令人愉快的副作用，因为它伤害的利益集团正是部分社会主义在野党。然而结果表明，正是改革的成功延长了这些利益集团的生命。因为稳定的货币体系吸引了大量外国资本进入奥地利，而这些资本正好被用来为地方的福利项目融资。

486 改革也明显削弱了奥地利对金融和经济事务的国家主权。塞佩尔政府同意建立一个财政专员办公室，它将控制今后奥地利的公共财政。这项行动有效地把塞佩尔的预算权交到协约国控制的国际联盟手里。一位前鹿特丹市市长，阿尔弗雷德·齐默尔曼 (Alfred Zimmermann) 博士，奉命出任财政专员并在维也纳待了三年。⁶⁷ 因为奥地利被殖民地化，其政府就成了外国势力的附庸——社会主义者毫不迟疑地指责塞佩尔放弃国家主权。塞佩尔的盟友德意志国家主义者也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这些事情。

米塞斯曾是这次改革背后的推动力量。他认为奥地利可以不要 6.5 亿克朗的贷款，但却不能没有财政专员。奥地利的政客需要一个倒霉的家伙来对不受欢迎的政策承担责任。他并不十分赞赏齐默尔曼博士本人，但却非常敬重行政长官汉斯·帕曹尔 (Hans Patzauer)。汉斯·帕曹尔是来自财政部的公务员，普遍认为，米塞斯与帕曹尔关系极好。这种工作关系使米塞斯成为权力经纪人，例如，维也纳大学的领导只要打算增加预算，就去寻求他的“建议”（游说帕曹尔）。⁶⁸

* * *

日内瓦会议不仅为奥地利的财政灾难提供了解决方案，也为所谓的金汇兑本

位制(gold exchange standard)铺平了道路。⁶⁹

国际货币体系在19世纪70年代已经形成,覆盖了整个西方世界及其殖民地——这就是古典金本位制(the classical gold standard)。这一体系的货币是黄金,但在多数情况下,通货(加入这个体系的国家实际流通的支付方式)是各国中央银行仅有部分准备金的银行券。在许多国家(主要是俄国、奥匈帝国和印度),国家通货不仅以央行金库的实物黄金,还以其他黄金计价的通货作为准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种同时持有黄金和黄金计价的国外货币的做法成为一个标准程序,于是它就成了著名的“金汇兑本位制”。⁷⁰

487

战争期间,大多数国家都放弃了古典金本位制,然后通过通货膨胀来为军费融资。战争结束后,许多政治家试图重建国际金本位制。但是,战争累积的债务如此巨大,以至于如果按照与战前相当的价值清偿,多数政府都要破产。另一方面,这些政府也不愿意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正确的印象):债权人已经受骗,政府无法兑现它们的承诺。在这个背景下,一个自然的解决方案是采用金汇兑本位制。这套体系的优势在于一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信任另一家拥有实物黄金(兑现所需)的央行,来最小化它的黄金储备(无须承担利息)。它的劣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还不明显。在这种体系下,货币兑现要比“古典的”部分准备金本位制更不可靠。因为它使货币兑现依赖于某个其他国家的预先兑现,这样它就给了这些外国央行某种政治杠杆。法兰西银行就以无情地运用这种杠杆而出名。

488

1922年秋的日内瓦会议迈向了创造国际金汇兑本位制的第一步。在这次会议上,各国央行代表同意进行更密切的合作。主要想法是帮助无法兑现纸币的各国央行摆脱困境,同时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协调”中央银行的政策。几年后,米塞斯简单明了地描述了协调的含义:协调一致的各国央行将会一起增发纸币,这样可以避免单边通货膨胀必然带来的汇率下降的尴尬。⁷¹

为了压制货币衰败的主要症候之一而对各国通货膨胀政策进行协调,直到今天仍是政府惯用的诡计。央行的合作,对于通货膨胀较快的货币区域的债务人来说,是一种恩惠。没有外国的协助,他们的货币会持续贬值,因而也不可能获得外国贷款。央行协作解决了这个问题,不过,这是以牺牲债权人的利益和货币较稳定国家的潜在债务人的利益为代价的。20世纪20年代,这一机制曾为最无情的债务人的利益服务,这些债务人就是奥地利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自治政府和省政府。

米塞斯参加了财政部讨论《日内瓦协议》对奥地利影响的专家会议。⁷²短期内,西方贷款给了塞佩尔政府一些灵活性,通货膨胀也得到了控制(从1922年9月开始,汇率稳定在每美元70 000克朗左右);但从长期来看,只有在消除通货膨胀的

489

情况下实现预算平衡,才能获得经济稳定和奥地利的政治独立。因为经济仍然低迷,所以财政收入大量增加是不可能的;又因为周边国家竖起了保护性的贸易壁垒,经济迅速复苏也不可能。唯一的办法是削减政府开支。

政府的最大支出是巨额食品价格补贴以及铁路和邮政部门的巨额亏损。⁷³但这些都是社会主义者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sacred cows),因为害怕反对派会有过激反应,尤其是失业率可能迅速上升,塞佩尔不敢触碰这些禁地。⁷⁴因此,他把削减政府支出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解雇 50 000 名公务员上面。

通过这些措施,奥地利预算的紧张状态终于缓解。 Kron 的稳定和奥地利财政对国外监管的实质依赖增加了奥地利债务人特别是奥地利地方政府的信誉。这一趋势又由于为金汇兑本位制铺平了道路的日内瓦会议的协议得到强化。而从 490 1920 年开始并在 1923 年初达到高峰的美国通货膨胀(美国在 1920—1921 年已经克服了一次较小的战后衰退)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趋势。现在奥地利的机构因为几乎无限制的新贷款流入而受益。⁷⁵

这进一步增加了奥地利社会主义者野心勃勃的支出计划,特别是在“红色维也纳”。美国的资金正好为庞大的村社社会主义试验融资。十年内,维也纳变成了一个小型保姆政府:为工人阶级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所有需要。维也纳一位市长曾在米塞斯出席的场合吹嘘:“维也纳人生来就在社会民主主义之中,生为社民人,死为社民鬼。”让那些社会主义旁观者沮丧的是,米塞斯用维也纳的谚语进行了回应:“俗话说,即使拥有四层楼房,人最终也难免一死。”⁷⁶

新的美国贷款也支持了维也纳工会激烈的阶级斗争。工会依靠的是从新的公共基金获得支持的社会下层组织。某份文件从奥地利企业的角度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自由工会(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工会)恐怖政策的结果是,工厂的状况已经变得难以忍受。自由工会胁迫非社会民主派的工人加入他们的组织,并给他们各种各样的基金捐款。通过威胁罢工,他们迫使企业家承认他们的组织是 491 工人阶级利益的唯一代表。他们阻止工厂雇用具有其他政治倾向的工人,甚至要求解雇那些人;所以,成千上万的工人被判处失业。⁷⁷

天主教社会主义者试图通过立法禁止工会恐怖活动,但是社会民主派国会议员否决了所有这些议案。

政府力量通过刺激信贷获得增长,这对奥地利工业利益和农业利益之间的传

统冲突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奥地利保守派地主组织正是在这两方面压力下产生的。一方面,匈牙利和其他周边国家进口的农产品压低了地主集团产品的价格;另一方面,奥地利工业对工人有着日益增长的需求,通过更高的工资吸引了农民。为了抵制这些趋势,地主利益集团寻求政府关税和垄断的保护,他们还试图(当然未能成功)与大工业家达成一项秘密协议——他们提出,稳定的农业部门是保守秩序的脊梁。进入工业部门的农民越多,按照马克思主义组织的咒语和马克思主义文化行事的工人也就越多。因此,根据地主的说法,为了奥地利工业的利益,不应向农业争取劳动力。⁷⁸

虽然没有那么激烈,其他欧洲国家也有类似的发展趋势。大体方案始终是一样的:敌对状态结束后,为了支持不断增长的政府福利,弥补国有企业亏损,战时通货膨胀得以永久保存下来。德国和俄国政府一直采取这种危险的政策,直到以痛苦的恶性通货膨胀和货币体系的崩溃为结局。别的政府没有那么鲁莽,但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仅当他们在刚形成的金汇兑本位制框架下获得大规模的国外贷款尤其是美国贷款时,才会放弃这一策略。此时,他们就从通货膨胀转到了债务上。在美国的帮助下,欧洲缺少削减政府赤字的自律的最初问题变得更加糟糕,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就是在一个更大的规模上自我复制。

492

米塞斯不止一次地谴责“喧哗的20年代”的这种做法。1925年2月27日,他在布达佩斯匈牙利科布登协会(Hungarian Cobden Association)以“欧洲公共财政的疗法”(Therapy of European Public Finance)为题做了一次讲座。他指出,暂时中止通货膨胀还远远不够。⁷⁹这只是货币和金融改革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必须大规模削减政府预算中的支出项目。“通过解雇公务员来启动公共财政改革是错误的。人们应该通过减少多余的政府项目——最主要的是减少政府企业——来启动改革。”他还强调,正是由于“债券的大规模发行,使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能够实现国有化和社会化的计划”,这些计划针对的是工业、文化和基础设施。

外国信贷似乎永远不会枯竭,这就创造了政府拥有无限资源的印象。对政府扶持的需要和对政府全能的信心无限增加。喧哗的20年代为30年代喧哗的独裁者搭好了舞台。

493

恶性通货膨胀、通货竞争和货币改革

与此同时,社会政策协会已经把货币稳定问题纳入1923年会议议程。米塞斯

受邀撰写了一份专家报告作为会议讨论的基础——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引起关注的前兆。⁸⁰后来他回忆说,他的“货币理论只在通胀主义政策面临崩溃的时候和场合才得到了研究,例如德意志帝国”。⁸¹1923年前,最流行的货币著作是一位法兰克福的年轻经济学家阿尔伯特·哈恩写的。通过发展熊彼特的资本理论(在熊彼特那里,资本是“抽象”的购买力),哈恩强调,基于信用的信贷扩张有着创造“强制储蓄”的正面效应,所以更高的增长率可以在没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获得。在书中,他实质上已预见到了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中的所有重要主题。⁸²但在1923年,德国经济学家开始重新考虑通货膨胀的好处。他们再次希望听到异议。1923年2月底,米塞斯递交了手稿《从货币理论的观点考虑稳定问题》(Die geldtheoretische Seite des Stabilisierungsproblems)。⁸³

这个标题容易引起误解。实际上,这篇文章结合了今天称为动态货币竞争的复杂分析和米塞斯的一个简短说明:如何为通货膨胀货币向金本位制的转变做好准备。由于对德意志帝国经济政策直接而显著的影响,这篇文章成为米塞斯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

米塞斯在文章开头指出持续的通货膨胀必然会以货币体系的崩溃结束:

最近几个月,德意志帝国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份粗略的画面:一旦人们开始相信货币的贬值过程不会停止,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人们因不愿意持有纸币而开始购买他们不需要的或者至少不是立刻需要的商品,那么,迫使纸币不再作为一般交易媒介使用的过程就开始了。这是纸币“非货币化”的最初阶段。这一操作内在的恐慌性质必然会加速整个过程。安抚激动的大众一次、两次、三次甚至四次是可能的。然而,事件最后总会到达一个终点,那时就没有回头路了。一旦贬值如此迅速,以致于卖家哪怕以最快速度把钱花掉而仍然害怕蒙受巨大损失时,就再也没有任何机会拯救货币了……德国马克至今(1923年1月)仍然还是货币,只是因为人们普遍相信持续的贬值很快就会停止,甚至它的单位价值可能还会提升。一旦人们意识到这种观点站不住脚,就会开始把纸币驱逐出货币位置。如果这个过程可以拖延一些时日,那也只是表示对马克未来价值的预期有了突然的转变。前面描述的疯狂购买现象已经给了我们关于这一过程如何开始的预警。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它的整个过程。⁸⁴

它确实走完了整个过程,至少在德国是这样。1923年里,这个过程以指数级

别加速,至10月份攀上了货币实质崩溃的顶峰。1923年秋,德意志银行的1700台印钞机一天二十四小时运行,用掉了三十家造纸厂的全部产品,直至纸张供应成为瓶颈。⁸⁵

496

有段时间,米塞斯不得不对自己的文章不能及时发表而影响政策感到担忧。5月份,他曾写信给出版商,表达对延迟发表的不安。⁸⁶文章中,米塞斯讨论了替换通胀货币的两种方案。替换过程可能会在一阵恐慌中开始,例如在几天甚或几小时内,坏货币就被放弃。通货替换也有可能缓慢进行,这样可以保证一个平稳的过渡。米塞斯对平稳替换过程有亲身经验。文中的描述符合他对战后维也纳恶性通货膨胀的观察:

人们逐渐采用外币或黄金作为国内贸易的支付和结算手段,这在许多商业部门已经达到了相当可观的比例。结果,越来越多的德国马克兑换为某种外币,越来越多的外币进入这个国家。因为外币需求持续增加,各种各样的外币而非商品进入国内市场,价值相当于运往国外的商品价值的一部分。渐渐地,该国积累了可观的外币存量。这实质上缓和了本国纸币本位最终崩溃的影响。然后,如果小额交易也用外币;如果工资因此也用外币支付,开始是部分用外币,然后全部用外币;如果政府最终意识到它在征税和支付官员工资时也要使用外币,那么,所有这些外币需求的总额(对于绝大部分这种需求)在这个国家内已经有了充足的供应。官方通货崩溃造成的状况并不必然意味着笨拙的物物交换。从各个渠道来的外币履行了货币的职责,即使不那么令人满意。⁸⁷

497

米塞斯将平稳转变与恐慌场面进行了对比,如他所说,后者很有可能就是1923年德国通货膨胀的情形:

如果纸币崩溃不是一步一步进行,而是突然进入恐慌——就像现在可能发生的,事情必然会更加糟糕。国内的金银和外币供应是微不足道的。战争期间人们曾急切地把国内黄金存量集中于中央银行,这种做法,加上执行多年的对外币交易的限制,使得窖藏的良好长期短缺,无法满足纸币本位崩溃的最初几天和几周为了平稳过渡所需的货币流通。人们可以通过出售股票和商品、贷款,或从国外撤回账户余额,以满足国内交易对外币的需求,但这必须耗费一些时间。同时,人们不得不拼凑起各种各样的紧急代币。⁸⁸

498

1923年早秋,一些机构自发成立,带领德国走向替代马克之路。10月,汉堡银行开始发行以外币为基础的银行券,基尔也成立了一家相似的银行。同时,莱茵兰一家基于金本位制的银行正在筹备成立。德国经济分裂为几个货币区的时代即将来临。⁸⁹但历史走上了另一条路。

8月初,卡尔·黑尔费里希递交给政府一份拯救计划。黑尔费里希的想法是在马克贬值已经达到极限的公众当中创造新的信心。他的战略纯粹基于普通人的货币心理学的考虑。⁹⁰黑尔费里希计划建立一家新的银行,名为地租银行(Rentenbank)。这家银行以德国所有的商业资产为抵押,这些资产赋予了它32亿马克的债权。因此,德国的所有企业,包括农场主和银行,都对地租银行负有共同的连带责任。地租银行将会发行地租马克(Rentenmark)。

在普通德国人的心目中,“建立在价值稳定的土壤上”的地租马克成功阻止了马克进一步贬值。但是,危机的结束另有原因:地租马克开始流通的第一天,新马克的印刷就停止了。正如米塞斯在给社会政策协会的报告中强调的:“任何货币改革的前提是停止印刷纸币。”⁹¹

米塞斯拥护“100%的边际金本位制”,因此他相信,重回金本位制是必要的。⁹²这两个措施紧密相连。两者的设计思路都是为了把政府逐出货币领域。他解释道:

使用商品货币的原因,正是为了阻止政治影响货币单位的价值。黄金不是(仅仅)由于耀眼光芒或其他物理和化学特质才成为标准货币,而是因为黄金数量的增加或减少独立于任何政治权力的命令。金本位制的关键功能在于,货币数量的改变服从决定黄金生产收益率的法则。⁹³

那么,米塞斯这时想到的是哪种特殊类型的金本位制呢?显然,他认为在当前环境下,包含金币流通的全面金本位制是不必要也是不明智的。他还认为,金汇兑本位制也是可以接受的,其中,通货完全由部分准备金制下的银行券构成——只要银行法严格限制银行券的发行。

他的战前研究已经向他提出警告,部分准备金制银行券的发行规模可能会有日益扩大的倾向;而且,如果这种类型的通货膨胀是一步一步缓慢进行的,则不存在对它的天然限制。所以他在1923年的报告里提倡,所有后续的银行券发行都要有百分之百准备金。因此,米塞斯的计划只是被动接受部分准备金银行券的存在,而关键是阻止这种银行券进一步发行。所有银行券的后续发行都必须由发行银行

提供完全的黄金准备。

新货币体系的基础和基石就是，绝对禁止任何没有完全黄金准备的银行券发行。德意志银行的银行券、信贷银行的银行券、各种类型的紧急通货以及代用货币的总量，减去德意志银行和私人银行持有的黄金和外汇，将由法律定为德国流通银行券的最大数量。这个数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再增加，除了前面提到的为了季末支付(end-of-quarter payments)的方便外。超过这一限制的任何银行券发行都必须由存储在德意志银行的黄金或外汇担保。这里显然采用了《皮尔银行法案》(Peel's Bank Act)的主要条款，因而也就继承了它的全部缺陷。但在此时，这些缺陷不太重要。我们的目标只是通过停止印刷钞票来废止通货膨胀。唯有禁止所有没有金属支持的银行券发行，才能最好地服务于我们当前奋力争取的目标。⁹⁴

为了决定黄金与通货之间最合适的兑换率，米塞斯建议货币当局采取以下步骤：停止印刷钞票，然后让市场决定通货与黄金之间的兑换率。简言之，就是停止制造通货膨胀，然后让市场决定马克的黄金价值。在后来的整个职业生涯，米塞斯关于货币改革的技术方面的观点一直没变。1953年，他为《货币与信用原理》英文版增加第四部分时，又提出了一个100%边际金本位制的更加详尽和彻底的方案。⁹⁵

501

米塞斯反对那种认为黄金数量可能不足以维持世界上所有国家都采用金本位制的观点——这是那位颇有影响的古斯塔夫·卡塞尔后来所持的观点。米塞斯认为，价格机制总会平衡供给与需求。此外，他还观察到全球黄金供给从1914年起一直增加，而黄金贸易却在下降，所以不存在低于1914年价格的危险。最后，全面的黄金流通也是不必要的。

回归金本位制并不必然意味着国内小额或中等规模支付都用金币支付。因为，即使是李嘉图在他的著作《关于一种经济而安全的通货的提议》中提出来的金汇兑本位制也是一种真正可靠的金本位制。近几十年的货币史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⁹⁶

他追随李嘉图的观点，甚至建议立法规定德意志银行只能兑换金块而不能兑换金币。这将是遏制兑现需求的有效手段，因为银行在按金本位制运行的第一年

502 可能无法满足太多兑现需求。然而以后的某个时刻,为了阻止银行券过度发行,可以考虑减少公众的银行券使用习惯,然后以有效的黄金流通取代银行券流通。⁹⁷

事实表明,米塞斯对金汇兑本位制下仍有通货膨胀危险的担忧是有理由的。许多年后,他在《人的行为》中对自己早期著作中采取的温和立场感到遗憾,因为这给政府留下了太多权力:通过货币当局,政府可以继续发行金汇兑通货。他指责金汇兑本位制背后的根本错误,也即,它把“保存金属通货所需的成本视为一种浪费”。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都曾持有这个观点,因此它享有极大的信誉和声望。然而,米塞斯却视之为“古典经济学家最严重的缺陷之一”。

在讨论金汇兑本位制的问题时,包括本书作者在内的所有经济学家都没有意识到,它轻易地赋予了政府控制国家通货的权力。经济学家愉快地假设,没有哪个文明国家的政府有意利用金汇兑本位制作为通货膨胀政策的工具。⁹⁸

米塞斯关于回归金本位制的讨论显然是基于以下假设:一种没有通货膨胀的货币秩序是好的货币秩序。但是如果有人基于财政理由反对这个观点,会怎样呢?这些被米塞斯称为“有条件的通胀主义者”承认,为了平衡国际收支而制造通货膨胀是不必要的。但他们认为在某些状况下,政府利用通货膨胀作为特殊税收形式是合适和便利的。米塞斯注意到纸币印刷事实上是政府收入的三种形式之一,其他两种分别是税收和借款。⁹⁹在他看来,经济学不能决定应该采取这些技术中的哪一个。但是,关于纸币通货膨胀的社会和经济后果及其政治意义,经济学还是有些东西可说的。米塞斯表示,就其本性来说,通货膨胀是非民主的:

503 当政府不能发行债券又不敢增税时,它总是被迫采取通胀措施,因为它害怕假如增发债券或增税的财政和一般经济后果显现得太快,政府体系会失去支持。所以,一项经济政策若要掩盖其影响,通货膨胀就成了最重要的心理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反民主政策的工具,因为通过欺骗公共舆论,它使一种政府体制得以永久保留,而如果所有事情都公开的话,这个体制是没有希望得到公众认可的。¹⁰⁰

尼古拉·奥雷姆(Nicolas Oresme)是14世纪的学者,也是第一篇货币论文的作者。米塞斯重新发现了他在其著作中首次加以强调的一个事实。奥雷姆指出,

降低成色(那个时代的通货膨胀技术)是以牺牲公众利益为代价而使君主们受益。君主们因此而从国王变成了暴君:

我认为,君主声称有更改铸币的权力的主要和最终原因就是,他可以从中获得利润或收益……君主的收益必然就是公众的损失。但是,不管君主给公众造成了多少损失,都是不公正的,都是暴君行为而非国王应该做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因此,君主最终可能会把臣民的几乎所有货币或财富收入囊中,把他们变成奴隶。这是残暴的,事实上就是真正的绝对暴政,就像哲学家描述的和古代史中呈现的一样。¹⁰¹

504

米塞斯回顾了19世纪自由贸易运动的科布登(Cobden)、布莱特(Bright)和巴斯夏着重指出的福利国家与战时国家的密切关系。他强调说,通胀主义者的心态不是一个孤立现象,而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部分。这种心态也是赞成表面上温和和通货膨胀的提议的基础:

[通胀主义]属于帝国主义、军国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基于同样理由,支持金本位制的健全货币政策属于自由主义、自由贸易和和平主义。正如从1914年开始横扫世界的全球灾难不是自然现象,而是统治我们时代的观念的必然后果一样,我们的货币体系的毁坏也只是某种主流货币政策意识形态的必然后果。¹⁰²

* * *

马克稳定之后没几个月,依靠德国持续通货膨胀的银行和其他私人企业的状况就不可维持了,他们开始缺乏现金。¹⁰³许多企业破产了,最著名的是比德尔曼银行,其总裁是约瑟夫·熊彼特。

505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奥地利的一些大银行试图聘任经济学家熊彼特为挂名负责人,以维持外国债主的信心。有几次他们也向米塞斯寻求支持,但米塞斯始终拒绝这些提议,因为他认为所有的商业银行都要破产。¹⁰⁴这并不是装腔作势。事实上,他一直将自己的个人账户留在奥地利邮政储蓄银行。

重新思考货币与信用理论

1923年3月前的一段时间,米塞斯曾与东克尔与洪布洛特出版社代表讨论过

《货币与流通媒介理论》再版的问题。他计划加入“几个必要的附加部分”，但是为了保持全书的篇幅，又打算在别的地方做些删节。他拒绝了第一个方案，认为不太合理，不仅在财务上，也因为这个方案要求他删节该书的六分之一。他指出，第一版（第一版最终也卖完了）的协议对他一点都不理想，因为他甚至不能弥补自己的花费。1923年3月31日，他终于签了一份合同。这份合同约定印刷2000本，外加50本赠书和150本评论用本。¹⁰⁵

506 虽然第一版所要传达的信息本质上没有什么改变，但他还是觉得必须考虑经济理论的各种最新发展，以及他本人观点的变化，最重要的是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最新看法。他还想进一步发展利息理论和商业周期理论；现在他相信，过去低估了自己对这些领域的贡献：

至此我已得到以下结论：我的理论是在详尽讨论和继承通货学派学说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个理论本身就是对危机的充分解释，而不仅仅是对基于直接交换理论的解释的补充——如同我在第一版中设想的那样。¹⁰⁶

他还添加了许多内容，包括描述当前银行政策问题的一节，处理货币理论与中央集权政策的一章，还有一篇关于货币理论分类的短文。¹⁰⁷他删除了讨论恶性通货膨胀历史案例的几个较长章节。这些章节在经历了长期货币稳定的1912年是必要的，目的是为阐明，如果继续执行当时的政策，很有可能迎来危险的通货膨胀。但到1924年，就不再需要了：“最近几年的经验已经为本书的基本论证提供了足够多的例子，所以这些讨论现在可以省去了。”¹⁰⁸

507 的确，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就是米塞斯理论的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证。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对通货膨胀的“社会后果”的预言，即再分配效应。所有的通货膨胀必然会将利益再分配给最先获得新货币的人，但是德国通货膨胀造成的再分配规模如此庞大、如此明显，以至于很难让人忽略。大多数公众的个人储蓄化为乌有，同时，有着良好政治关系的无情的投资者却聚集了大量财富。

米塞斯对这些事件的愤怒不是直接指向那些有政治关系的人，而是指向那些把这些关系用于聚集财富的人。第二版导言的一份未发表的草稿中有一段话，透露出1923年末他的精神状态。考虑到“谎言运动的领导人”会抵制他的著作，他陈述道：

本书初版和再版间期，欧洲各国政府发起了一场反对经济科学的战争，一

场如其失败一样顽固的战争。当权者政治信条可悲的崩溃显示了他们权力的限度。中央集权理论连同中央集权政治也已经崩溃,而长久以来不受重视的经济科学重新回到了它的荣耀之位……虽然目标只是追求真理,本书的第一版还是不可避免地遭到那些为货币崩溃铺路的理论的拥护者们激烈、残酷和背信弃义的攻击。¹⁰⁹

1924年3月末,手稿的最后部分交到出版商手中,东克尔与洪布洛特出版社为在夏季学期完成印刷而热情工作。第一批平装本最终在7月第二周准备上市,而精装本在7月18日由装订商交付。¹¹⁰

508

对于一本理论著作,尤其是一本反主流观点的著作来说,此书的销售从一开始就非常好。¹¹¹这一成功也不完全出人意料,因为米塞斯是奥地利战后首届政府的新秀,又是《社会主义》的作者。¹¹²

德国的恶性通胀和德意志奥地利的高度通货膨胀已经严重破坏了政府当局的信誉。职业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都在寻求出路。在这种背景下,韦伯在其死后发表的《经济与社会》中的评论(他认为在所有货币理论中,米塞斯的理论是最可接受的),已经引领更多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关注这位奥地利经济学家的著作。

德国经济学家回归古典自由主义

《货币与流通媒介理论》第二版的出版非常及时,因为社会政策协会年会正好于1924年9月在斯图加特召开。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货币改革论》德文版在米塞斯的书之前几个月已由东克尔与洪布洛特出版社出版,年会提供了一个抵消该书影响的颇受欢迎的解毒剂。¹¹³

509

与此同时,德国的形势已经明显好转。5月,主张复仇主义的庞加莱政府在法国大选中失败,埃里奥(Herriot)、潘勒韦(Painlevé)和白里安(Briand)控制的新领导阶层立即着手结束对鲁尔区的政治占领。因此,德国政府终于能与昔日的敌人达成一项金融协议,并取得了比奥地利两年前在《日内瓦协议》中获得的更好的条款。德国得到西方8亿黄金马克的贷款用于支持德意志银行的储备,以便满足推行金汇兑本位制的要求。与维也纳不同,柏林政府不必做出任何可能削弱政治主权的巨大让步。1924年8月16日,这份基于美国特使查尔斯·道斯报告的协议在伦敦签订。因为所有参与方都一致同意,所以它是战后第一份真正的政府间

协议。¹¹⁴

最终,大众恢复了一定程度的乐观情绪。这显然有助于德国经济学家面对韦伯和米塞斯晚近著作引发的“社会政策危机”。斯图加特的与会者们开辟了社会政策协会历史上的新战场,在会议的最后两天,大多数讲演者有条件地支持自由贸易。至此,超过五十年鼓吹福利国家、通货膨胀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一家独大的老传统结束了。¹¹⁵

510 辩论安排在议程的最后一刻。这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第一,德国政府将于1925年1月恢复对外贸易的主权(此项自由曾被《凡尔赛和约》否决);第二,道斯计划(Dawes Plan)最终创造了政治决策的可靠基础。基于协会的使命,它将试图为即将来临的国会辩论提供思想指导——虽然斯图加特会议之前不可能委托任何研究论文。因此,赫克纳在受邀演讲的人选方面的选择势必奠定整场辩论的基调。他选了四位声名在外、据他所知接受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马克斯·泽林(Max Sering)、克里斯蒂安·埃克特(Christian Eckert)、伯恩哈德·哈姆斯(Bernhard Harms)和格奥尔格·格泰因(Georg Gothein)。在会议中,这些人确实呼吁德国政府倡导重建全球自由贸易,但是格泰因和泽林认为还应保留一些关税,不是为了保护某个产业,而是作为确保推进贸易自由的未来国际谈判的基础。¹¹⁶

这些声明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107位与会者接着就签署了一份“大学教授宣言”,呼吁贸易自由。¹¹⁷米塞斯的朋友格奥尔格·雅恩在1927年的一篇文章中说明了这个事件对德国自由贸易运动的重要意义:

511 [新的自由贸易的倡议]已经在一份宣言中体现出来,这个宣言是由一批学院经济学家,在社会政策协会讨论贸易政策改革问题的斯图加特(1924)会议后签署的。宣言称:“德国新的经济结构、《伦敦协议》的影响以及世界市场上合作力量的重要变化,使德国面临全新的贸易政治形势。”签署宣言的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代表中有许多人曾在战前鼓吹德国贸易政策的基本原则(贸易保护),这些代表强调,在当前形势下,德国被迫把世界贸易的优势转变为自己的优势,尤其是为了合理化其农业和工业。因此,他们能就工业和农业的关税达成一致,使其不至超出一定限度,而是成为促进国际贸易更加自由的必要和充分的手段。

雅恩继续写道:

这些学院经济学家的要求就是贸易政策回到 19 世纪的自由贸易思想……农业和工业的主要部分也许需要继续得到保护。但是国家更大的利益在于自由贸易,而不是保护关税政策,后者只会增加而不是减少问题。¹¹⁸

这可能是米塞斯参加过的协会会议中最令人欣喜的一次,虽然他并不完全同意宣言的全部条款。¹¹⁹ 这些事件肯定令他非常惊讶。在巴德加施泰因过完暑假后,米塞斯只在维也纳待了两三天,就动身去了斯图加特。他本来并不打算参与讨论,不过,其他参与者把他视为新动向幕后的主要推动力量,在他们的要求下,米塞斯最终作出让步。¹²⁰

于是,米塞斯在贸易议程结束后作了一个评论,这时大会已经转向货币和通货膨胀问题。米塞斯指出,会议已经“在经济思想的去重商主义(de-mercantilizing)进程中取得了重大进展。”贸易保护主义思想

在这个群体中已经失去很多过去曾经拥有的吸引力。货币理论领域也一样。所有支持货币国家理论的鼓吹者都消失了,而不久前还叫嚣取消金本位制的某些人,现在开始鼓吹黄金计算和金本位制。

米塞斯还提到例如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埃森(Alfred Schmidt-Essen,当时一位颇有影响的货币问题作者)那样的人,他们声称金本位制是一种只对美国和英国有利的货币秩序。谈到这个观点,米塞斯说:“导致我们货币贬值的不是外国商品,而是我们连同金融理论一起接受下来的,反抗和拒绝数量理论的外国教条。”然后他回忆起三年前一个晚上的故事,当时他和一位德国访客漫步在维也纳街道,几乎所有工厂都已停业或大规模削减生产,只有奥匈银行的印钞机忙个不停。

形势确实有所好转。通货膨胀已经停止,通胀派及其理论(最著名的是货币的银行理论)也失去了权威地位。在协会会议中,米塞斯的观点没有遇到任何严肃的反驳。梅尔希奥·帕伊(Melchior Palyi)只是提到他对银行理论的批评有点过火。¹²¹ 米塞斯自己唯一反对的是费利克斯·索马里关于货币改革涉及宪法修正案的观点。索马里的观点预示了 20 世纪晚期宪法经济学派的一个原则,他声称,货币稳定本质上是一个立法问题,可以通过一份恰当的货币宪法限制中央银行管理权力加以解决。米塞斯反对这个观点,因为他认为,这种方法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即通货膨胀心态。归根结底,中央银行政策是由思想而不是法律条文决定的。¹²²

512

513

地平线上的一线曙光

514 《货币与流通媒介理论》第二版的成功和社会政策协会的重新定位,显示了思想氛围和政治气候的转变,这一转变在1923年后进入高潮。1923年是“社会政策危机”和马克稳定之年。两者的核心都是米塞斯的著作。这一事实并未引起普通公众的注意,但对学术领域和货币政策领域的主要圈子来说是很明显的。

那些年间,米塞斯的影响没有那么广泛的主要原因是他在宣传方面的不足。他不是雄辩家,缺少赢得听众的个人魅力。他有杰出的才智,冷峻而不失幽默,但是他的思想常常过于微妙,而使欧洲上层社会之外的普通大众难以理解。而且,如果他用外语发言,他的机智就离他而去了。他说法语和英语时一定不太自在。他的英语口语很重,法语虽然要好得多,但离完美还很遥远。如果米塞斯有着梅纳德·凯恩斯、欧文·费雪、维尔纳·桑巴特或奥特马·施潘那样的沟通天赋,谁知道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会转向何方?

即使如此,米塞斯还是产生了重要影响。1924年后,他成为一个广受欢迎的演说家;1925年后,他还担任了奥地利商会驻国际商会的官方代表。这些会议和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建立起来的联系为他的思想在整个欧洲传播提供了一个机会。¹²³他是主张重返金本位制的主要声音。他的努力成功促成了金汇兑本位制在奥地利的实行。

515 虽然只是金汇兑本位制(它是部分准备金制,准备率低于它的前身金本位制),但至少名义上黄金再次成为该国货币。1925年1月1日,新的基于黄金的货币——先令,取代了克朗。¹²⁴至此,小小的奥地利开启了一场回归金本位制的运动,这场运动在几个月后达到高潮,4月25日,英国也恢复了黄金货币。在许多方面,这次改革与1892年首次引入克朗的改革是类似的。克朗本身就是基于黄金的货币。两次改革都有奥地利经济学家的关键支持。正如最初的克朗是卡尔·门格勒的创造一样,最初的先令也是米塞斯的劳动成果。¹²⁵

516 此前一年,米塞斯曾得到一次绝佳的机会,解释和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这是一次广为传播的演讲,是他在新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召开的某个德意志工业家协会全体年会上的演讲。米塞斯阐述说,回归金本位制是当前货币政策最迫切的问题。¹²⁶一家当地报纸事先获得了他讲演的详细摘要,当天晚上,这家报纸根据摘要刊发了一篇对会议和米塞斯讲演的详细报道。前帝国的所有主要报纸都报道了这条消息并广为传播。¹²⁷最终,讲演全文以《当代金融和货币政策问题》为题发表。¹²⁸

这次登台亮相的背景很有意思,因为他们给米塞斯整个到访期间的言谈举止定了调子。协会秘书是某位亚诺夫斯基博士(Dr. Janovsky),他找米塞斯作一个关于当代公共财政和货币政策问题的演讲。米塞斯选了“重返金本位制——当代货币政策的主要问题”这样一个题目,亚诺夫斯基担心听众会觉得这个讲座似乎与他们感兴趣的实际事务没有关系。他还担心米塞斯的评论争议太大。协会举办的会议确实吸引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几个邻国政坛要人的密切关注,而主基调讲演者的发言往往会被理解为代表了协会的正式立场。按照亚诺夫斯基的意思,协会还没有就捷克斯洛伐克货币政策问题形成明确的意见。而且亚诺夫斯基还提到,协会上次有关货币问题的决议还同意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鼓吹的政策,而凯恩斯反对所有剧烈贬值的货币恢复战前对等的价值。¹²⁹亚诺夫斯基没有提到的是,他自己就是一个银行理论经济政策的鼓吹者,而且还参与过与米塞斯的本地仰慕者例如弗里茨·沃尔夫鲁姆(Fritz Wolfrum)的斗争。¹³⁰

米塞斯批评凯恩斯、乔赛亚·斯坦普(Josiah Stamp)和费雪的改革提议高估了价格指数衡量货币价值的有效性。他强调,金本位制的优势并不在于任何类型的价值稳定,而在于它对政治程序的独立性。战前黄金购买力的下降并不是由于这种金属本身的生产,而是由于流通媒介的生产。无论它有多少缺点,金本位制都比政府管理的货币要好。¹³¹

517

* * *

对米塞斯来说,1925年也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带来了一个重大突破。他终于遇到了将成为他妻子的女人。

弗里茨·考夫曼(Fritz Kaufmann)是一位年轻律师,也是米塞斯私人讨论会的成员,他曾举办一次晚宴,而玛吉特·谢雷尼(Margit Serény)就是六位客人之一。米塞斯赢得坐在他身边的这位女士的芳心简直就是奇迹,因为几乎整个晚饭期间他都在讨论经济学。但另一方面,他的全神贯注给了她观察他的机会。这是她最初的印象: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那美丽清澈的蓝眼睛,这双眼睛总是关注着同他谈话的人,从不移开。他的鬓角已稍稍发灰,黑头发梳到两边,没有一点不相称。我喜欢他的双手,和他修长的十指。这些手指清楚显示了他从不用它们从事手工劳动。他的衣着平静高雅,定做的黑色礼服和丝质领带非常相称。他的姿势表明他一定当过军官。¹³²

518 晚饭后他与她交谈,并去了一家舞厅。显然米塞斯是一位蹩脚的舞者——至少按照玛吉特的标准,所以那晚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聊天。事实上多数时候是她在说,米塞斯则聚精会神地听。玛吉特身高5英尺4英寸,褐色头发和灰蓝眼睛,是一位非常有魅力的女人。现在,他们交谈时,他发现她也是一位谈谐热忱的人。肯定就是在那一晚,他爱上了玛吉特。第二天,他送了红玫瑰给她,邀请她共进晚餐。这是第一次,而在随后两年里,有许多这样的晚餐。

玛吉特·谢雷尼是一位来自汉堡中产阶级家庭的演员。战争期间,她曾在维也纳主要剧院之一的德国国家剧院(*Deutsches Volkstheater*)演出。两人第一次见面时,她已经三十五岁,是一位有两个孩子(吉多和吉塔)的富有魅力的寡妇。1917年初,就在她来维也纳不久,她就与一位匈牙利贵族费迪南德·谢雷尼(*Ferdinand Serény*)结了婚。1923年丈夫去世,给她留下了一笔遗产,但在通货膨胀期间损失了大部分价值。

519 米塞斯非常谨慎,这是他的一贯作风。即使情感可能快要把他征服。他能够信任一位女演员吗?正如玛吉特后来指出的,上流社会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女演员是高级应召女郎。他后来向妻子坦白,自己曾通过查阅《新自由报》的档案记录核实她对职业发展的描述。¹³³他可能还与堂兄鲁道夫·施特里佐沃(*Rudolf Strisower*)谈过,因为他曾做过费迪南德·谢雷尼的医生。这些调查证实了玛吉特对各种情况的说法。



1919年的玛吉特·谢雷尼。她是德国国家剧院的成员,左侧照片是当时在维也纳出售的明信片。

但还有更根本的障碍阻挠他们之间浪漫关系的发展。一方面,路德维希的母亲阿德勒对玛吉特保留着很大的意见。实际上,米塞斯的女朋友没有一个得到过她的承认。她一定曾对爱子的择偶标准有不同的设想,而她的观点对路德维希是非常有分量的,尤其是因为他的某种哲学观念可能使他完全弃绝婚姻。这些问题涉及婚姻性质,以及,同时成为丈夫和学者的可能性。《社会主义》中的一段完全不带浪漫色彩的段落道尽了全部:

520

婚姻是调节个体与社会秩序之间关系的社会机制,通过这个机制,某一领域的活动,包括所有的任务和要求,被指派给他。那些杰出之士,虽然各种能力远远超出常人,但并不能承受这个机制对大多数人生活方式的调整所必定包含的压力。感觉自己充满发明冲动和肩负伟大使命的人,时刻准备牺牲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违背自己的使命;这样的人不会为了妻子和孩子的原因而扼杀其冲动。在天才的生活中,无论多爱一个女人,无论如何与她一起生活,这些都只占据其生命的非常小的位置。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说那些在其生命中性爱已经完全升华,转向其他渠道的伟人,例如康德;或是那些以其炽热的精神贪婪地追求爱的人,他们不能接受婚姻不可避免的失望,奔波于无休止的一个激情转向另一个的冲动。一个天才即使结了婚——虽然他的生活可能非常平淡,他对性的态度也无异于他人——他也不可能在不会违背自身的情况下而感到不受婚姻束缚。天才绝不允许自己被任何对同伴的舒适的考虑所羁绊,即使这同伴至为亲近。婚姻的纽带变成了天才无法忍受的束缚,他试图遗弃或者至少是松开它以便自由行动。已婚的夫妇必然在普通大众之中并肩而行。任何想走自己道路的人,都必须挣脱婚姻。找到一个女人愿意并能够在这孤独之旅中与他携手前行,实在不太容易。¹³⁴

此书的所有版本都保留了这段话。路德维希逐渐允许玛吉特进入目前为止他的孤独之旅。但在另一方面,他又在寻求真正伴侣之爱。后来玛吉特推测,对他(完全公共的)生活的根深蒂固的不满,是米塞斯坏脾气的真正原因。最可怕的爆发都留给了他所爱的女人:

521

他的脾气坏得吓人,也很让人惊讶。有时,他会突然爆发。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其他方式来称呼它们……他的脾气突然就来了,大多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会失去控制,开始大声喊叫并说脏话。这些都是那么突然、那

么难以置信,刚开始几次我都吓得要死。无论我说什么,都只会使他更愤怒。不可能使他平静下来。¹³⁵

不过,经过几年的婚姻生活,他变得理性多了,并且不再那么易怒。



米塞斯和妻子玛吉特

注 释

1.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国、英国和美国出现了许多声明和分析,谴责这个条约延长了国家之间的敌对,因而成了未来欧洲和平的负担。例如,参见法国外交官 Alcide Ebray, *La Paix malpropre (Versailles)—pour la reconciliation par la vérité* (Milano: Unitas, 1924); 另见一位英国外交记者的证词, Sisley Huddleston, *In My Time* (New York: Dutton & Co., 1938)。关于《凡尔赛和约》和《圣日耳曼条约》后果的一般讨论,可以参见同时代的见证者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Howe, 1920); Sisley Huddleston, *War Unless*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33); idem, *Popular Diplomacy and War* (Rindge, N. H.: Richard Smith, 1954); Christian Eckert, “Friedensverträge. II. Vom staatswissenschaftlichen Standpunkte,”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4th ed. (Jena: Gustav Fischer, 1927), vol. 4, in particular pp. 509 - 12; Felix Ermacora, *Der unbewältigte Friede—St. Germain und die Folgen* (Vienna and Munich: Amaltha, 1989); and Jacques Bainville, *Les conséquences politiques de la paix* (Paris: Fayard, 1920)。

2. Schutzstelle für österreichisches Vermögen im Auslande.

3. 参见 *Friedensrecht* 1, no. 11 (June 20, 1922) 中的报告。这份刊物是理赔局的正式出版物。

4. *Friedensrecht* 4, no. 2 (February 1925).

5. *Neue Freie Presse* (November 18, 1924), p. 12.

6. F. A. Hayek, "Einleitung," introduction to Ludwig von Mises, *Erinnerungen* (Stuttgart: Gustav Fischer, 1978,) p. xii.

7. 劳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基金会(The Laura Spelman Rockefeller Fund)接受比尔兹利·拉姆尔(Beardsley Ruml)于1922年提出的一项建议,进入了社会科学领域。1923年,基金会开始资助社会研究,侧重长期的具有“科学”取向的项目。同年,基金会建立了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同样也是出于拉姆尔的提议。参见 Raymond Blaine Fosdick, *The Stor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New York: Harper, 1952), p. 193ff.

8. 在开往纽约的船上,他开始翻译皮尔逊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价值问题的文章。译稿可能在8月份已经完成,哈耶克把它交给了当时的《杂志》(*Zeitschrift*)编辑魏斯。参见哈耶克致米塞斯,1923年8月的信件;Mises Archive 79: 15f.

9. “我在这边通常也能找到一份工作。目前我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为米切尔教授的商业周期研究收集资料。”哈耶克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24年1月12日;Mises Archive 81: 23。

10. Hayek, "Einleitung," p. xi.

11. F. A. Hayek, *Hayek on Hayek: An Autobiographical Dialogue*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67.

12. 米塞斯致哈耶克,信件标注日期为1924年2月8日;Mises Archive 81: 24。信中,米塞斯对哈耶克在纽约时寄来的报告表示感谢,并谈到了商会图书馆的工作。

13. 参见维也纳商会的文件档案。

14. 例如,参见1921年5月24日一次会议档案,关于银行讨论汇率政策的一些前提。与会者包括施皮茨米勒、维塞尔、熊彼特、施维德兰(Schwiedland)、席夫(Schiff)和米塞斯。参见 Mises Archive 74: 3ff.

15. Ludwig von Mises, "Die geldtheoretische Seite des Stabilisierung-sproblems," *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164, no. 2 (1923): 19f.; (英文)译文出自本书作者。米塞斯指出,不可能“补偿1914年至1923年期间马克债务所有者的损失”,因为“当前债务的所有者并不总是已经遭受了损失的那些人。大批可转移债权和相当部分其他债权在过去几年里已经转手。”

16. 摘自米塞斯1924年在社会政策协会会议上的第二次发言;参见 Mises Archive 22: 80ff。直到许多年后,施皮茨米勒仍然坚持他的信念。1929年3月,他作了两次关于奥地利中央银行政策的演讲。他抨击银行和企业采取的立场,在第二次演讲中,他还多次提及米塞斯,批评米塞斯缺乏所谓的一致性。参见 Mises Archive 80: 81。

17. 米塞斯在1924年社会政策协会会议上的发言对施皮茨米勒的这一评价作出回应;参见 Mises Archive 22: 80ff。另见奥地利工业联合会(Hauptverband der Industrie Österreichs)施蒂里亚分会秘书魏登霍费尔(E. Weidenhoffer)在1924年3月致米塞斯的信件中所作的相

同声明; Mises Archive 80: 81。

18. 参见 Mises Archive 107: 24 中的新闻报道。

19. Mises, “Die geldtheoretische Seite des Stabilisierungsproblems,” pp. 6f.; translated as “Stabilization of the Monetary Unit—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ory,” *On the Manipulation of Money and Credit*, Percy L. Greaves, trans. (New York: Free Market Books, 1978), pp. 8f.

20. 这个问题尤其涉及奥地利的经理阶层,他们绝大多数是国家主义者和通胀主义者。匈牙利的银行经理一般来说是金本位制的支持者。1924 年米塞斯在社会政策协会与施皮茨米勒辩论时提到了这一点。参见 Mises Archive 22: 80ff。

21. Mises Archive 74: 31.《新自由报》的编辑莫里茨·杜布特别感谢了米塞斯的第二篇文章,其中引用了卡尔·门格尔的一篇讲稿,门格尔本人也曾是《新自由报》的编辑。

22. 米塞斯致莫里茨·杜布,1922 年 6 月 24 日, Mises Archive 74: 37. 莫里茨·杜布是《新自由报》的经济学编辑,也是几本关于经济问题的通俗读物的作者。战后一段时期,他发表了两本著作,探讨货币供应膨胀带来的“灾难性的繁荣”。参见 Moriz Dub, *Katastrophenhaushalt und Geldentwertung* (Stuttgart: Enke, 1920); idem, *Die weitere Entwicklung der Katastrophenhaushalte in Oesterreich mit Streiflichtern auf Deutschland* (Stuttgart: Enke, 1922)。

23. Mises Archive 17: 53, 53b, 55.

24. Mises Archive 17: 55, 55b.

25. Mises Archive 17: 3f.

26. Mises Archive 17: 5. 这份记录似乎并不完整。

27. Mises Archive 20: 7ff. 这份记录似乎并不完整。缺失 1922—1923 年的记录。

28. Hayek, *Hayek on Hayek*, p. 66.

29. 哈耶克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是 1923 年 8 月 17 日; Mises Archive 79: 15。

30. Mises, *Erinnerungen*, p. 64; (英文)译文出自本书作者。

31. Eric Voegelin,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vol. 34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2f.

32. 施潘的反犹太主义臭名昭著。他在 1919 年晋升正教授,显示了在某种意义上更广泛的反犹运动已经开始影响共和国早期的大学生活,将维也纳大学转变成了针对米塞斯和其他犹太知识分子的战场。事实证明,凯尔森是最后一位取得正教授职位的犹太人,那是在 1918 年。参见 *ibid.*, p. 6。

33. 参见米塞斯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 Ludwig von Mises,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33] 2003), pp. 42–50。

34. F. A. Hayek, “Friedrich Freiherr von Wieser,” *Jahrbuch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125 (3rd series vol. 70 [1926]): 526.

35. 此书列入著名的《社会经济学纲要》(*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k*)丛书。这套丛书出版于 1914 年到 1930 年,共 12 卷。有些已经出过两个版本(战前和战后),尤其是较早几卷。其中讨论经济科学历史和一般经济理论的部分至今仍有持久的价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卷 *Wirtschaft und Wirtschaftswissenschaft* (1914, 1924),收入了以下几篇论文: Karl Bücher, “Volks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sstufen;” Joseph Schumpeter, “Epochen der Dogmen

und Methodengeschichte;” Eugen von Philippovich, “Entwicklungsgang der wirtschafts- und sozialpolitischen Systeme und Ideale. I. Die Entwicklung bis zum Kriege;” Eduard Heimann, “Entwicklungsgang der wirtschafts- und sozialpolitischen Systeme und Ideale. I. Die jüngste Entwicklung.” 同样重要的是第三卷,收入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的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Wirtschaft* (1914, 1924), 还有第四卷,包含马克斯·韦伯著名的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1922)。

36. 维尔纳·诺伊德克(Werner Neudeck)指出,迈尔只是在长幼尊卑的等级序列中排位比较靠前而已。当时迈尔已经担任布拉格和格拉茨的有薪教授(*Ordinarius*),而米塞斯只是维也纳的一名无薪讲师(编外讲师,*Extraordinarius*)。参见 Werner Neudeck, “Der Einfluss von Ludwig von Mises auf die Österreichische akademische Tradition gestern und heute,” *Wirtschaftspolitische Blätter* 28, no. 4 (1981): 26。

37. “卡塞尔的著作具有论证简洁、清晰易懂的特点,这保证了它的成功。它被译为许多语言,可能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最受欢迎的经济学教科书。”Mark Blaug, *Great Economists before Keyn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ives and Works of One Hundred Great Economists of the Pa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42。

38. 熊彼特和卡塞尔都自称是瓦尔拉斯主义者。关于维塞尔的瓦尔拉斯主义,参见 Mises, *Erinnerungen*, p. 21; George Stigler,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Theories: The Formative Period* (New York: Macmillan, 1949), p. 158; Hans-Hermann Hoppe and Joseph T. Salerno, “Friedrich von Wieser und die moderne Österreichische Schule der Nationalökonomie,” Herbert Hax, ed., *Friedrich von Wiesers “Über den Ursprung und die Hauptgesetze des wirtschaftlichen Werthes,” in Vademecum zu einem Klassiker der österreichischen Schule* (Düsseldorf: Handel und Finanzen, 1999); Bruce Caldwell, “Wieser, Hayek, and Equilibrium Theory,” *Journal des Economistes et des Etudes Humaines* 12, no. 1 (2002); Joseph T. Salerno, “Friedrich von Wieser and F. A. Hayek: The General Equilibrium Tradition in Austrian Economics,” *Journal des Economistes et des Etudes Humaines* 12, no. 2&3 (2002)。

39. 这部《政治科学手册》也反映了商业周期理论领域的等级秩序。其中,最长的词条来自阿图尔·施皮特霍夫(Arthur Spiethoff),他属于施莫勒派,反对一切对商业周期的货币解释。参见 Arthur Spiethoff, “Krisen,”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4th ed. (Jena: Gustav Fischer, 1925), vol. 6。

40. Joseph A. Schumpeter, “Das Sozialprodukt und die Rechenpfennige,”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Sozialpolitik* 44 (1917)。

41. 1926年,米塞斯为庆祝维塞尔七十五岁诞辰纪念文集(*festschrift*)所写的文章选了这样一个标题:货币在经济财货领域的作用。他在文中抨击了处于主流地位的维塞尔关于货币的收入理论,指出一般货币和作为货币特殊形态的黄金本身就是一种经济财货——而不只是其他“真实”财货的符号,因而边际价值理论可以直接用于讨论货币,而非仅仅通过货币背后的真实财货间接加以讨论。这篇文章直到六年后才发表。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于1926年去世。纪念文集的编辑汉斯·迈尔决定出版一套四卷的当代经济科学总览。其中收入了米塞斯的稿子,“Die Stellung des Geldes im Kreise der wirtschaftlichen Güter,”

Hans Mayer, ed., *Die Wirtschaftstheorie der Gegenwart* (Vienna: Springer, 1932), vol. 2, pp. 309–18; translated as “The Role of Money in the Realm of Economic Goods,” *Money, Method, and the Market Process: Essays by Ludwig von Mises*, Richard Ebeling, ed. (Boston: Kluwer, 1990)。

42. Hayek, *Hayek on Hayek*, p. 66. 维塞尔的方法也影响了施潘的思想, 参见 Shigeki Tomo, “The Year 1922: A Watershed for Mises and Hayek”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September 2003)。类似地, 归属概念也是法学理论家非常熟悉的思想。汉斯·凯尔森开创了纯粹法学, 这一理论把所有单独的规范都回溯到一个基本规范。特别参见 Hans Kelsen, *Hauptprobleme der Staatsrechtslehre* (Tübingen: Mohr, 1911)。20 世纪 20 年代初, 他在一些关于主权问题的著作中重申了这一命题。参见 Kelsen, *Das Problem der Souveränität und die Theorie des Völkerrechts* (Tübingen: Mohr, 1920); idem, *Der soziologische und der juristische Staatsbegriff* (Tübingen: Mohr, 1922)。

43. F. A. Hayek, “Bemerkungen zum Zurechnungsproblem,” *Jahrbuch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124 (3rd series vol. 69 [1926]): 3; translated as “Some Remarks on the Problem of Imputation,” *Money, Capital, and Fluctuations: Early Essays*, Roy McCloughry,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p. 35.

44. Hayek, “Bemerkungen zum Zurechnungsproblem,” p. 6; trans., p. 39.

45. 这个论证一直是哈耶克思想的主要成分。例如, 参见 Hayek, “Competition as a Discovery Procedure,”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5, no. 3 ([1968] 2002)。

46. Hayek, “Bemerkungen zum Zurechnungsproblem,” p. 18; trans., p. 53.

47. Étienne Bonnot, Abbé de Condillac, *Commerce and Government: Considered in Their Mutual Relationship* (Cheltenham, U. K.: Edward Elgar, 1997), pp. 261f. :

如果贸易是完全自由的, 那么, 商品数量和需求将是完全透明的。商品会以真实价格出现, 而且均匀分布在每个地方……但是一旦消灭了贸易的一切自由, 我们就无法判断数量和需求之间是否存在不平衡, 或者不平衡在哪里。

另见 Hermann Heinrich Gossen, *Entwicklung der Gesetze des menschlichen Verkehrs und der daraus fließenden Regeln für menschliches Handeln* (Braunschweig: Vieweg & Sohn, 1854), pp. 90ff., 231; Adolph Thiers, *De la propriété* (Paris: Paulin, Lheureux & Cie, 1848)。

48. 参见 F. A. Hayek,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49. Hayek, “Einleitung,” pp. xivf. 迈尔一支止于他的学生威廉·韦伯 (Wilhelm Weber), 后者成了“奥地利第一位凯恩斯主义的重要教师”。Werner Neudeck, “Der Einfluss von Ludwig von Mises auf die Österreichische akademische Tradition gestern und heute,” *Wirtschaftspolitische Blätter* 28, no. 4 (1981): 32. 诺伊德克断言, 米塞斯是奥地利最后一位致力于建立一个具有国际声誉的学派的经济学家 (参见 *ibid.*, p. 31)。

50. “严格地说, 只有马克卢普是米塞斯原来的学生。”(Hayek, “Einleitung,” p. xii) 关于马克卢普, 参见 Jacob Dreyer, *Breadth and Depth in Economics: Fritz Machlup—The Man and His Ideas*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1978)。

51. Gerhard Jagschitz, *Die Jugend des Bundeskanzlers Dr. Engelbert Dollfuss* (University of Vienna; Doctoral dissertation, 1967), pp. 144f. and passim. 参与这场运动的主要组织是天主教德国学术委员会(Katholisch-Deutscher Akademikerausschuss)。

52. 肯尼斯·博尔丁所作,引自 Gottfried von Haberler, “Fritz Machlup: In Memoriam,” *Cato Journal* 3, no. 1 (1983): 14。

53. Fritz Machlup, *Der Golddevisenstandard* (Halberstadt, 1925); idem, *Börsenkredit, Industriekredit und Kapitalbildung* (Vienna; Springer, 1931)。

54. “马克卢普-沃尔夫博士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第二本书(《交换信用、产业信用和资本构成》)确实是一部杰作。”(米塞斯致基特里奇[Kittredge],信件标注日期1933年3月31日;Mises Archive 67: 5。这是一份申请洛克菲勒奖学金的推荐信。)米塞斯总结说:

毫无疑问,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马克卢普都有资格得到洛克菲勒奖学金。这不只是我的意见(作为他多年的老师),也是每个人都会同意的。去年他在伦敦经济学院作过一个讲座,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55. 那些年间,米塞斯受邀为《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新版第12版(实际上是补充第11版的两卷增补)共同执笔撰写两个词条。参见“Austrian Empir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2th ed. (1921), vol. 30, pp. 323-24; “Republic of Austria,” *ibid.*, pp. 348-49。

56. 1922年11月,米塞斯说他曾“与一位英国教授谈及”他的著作《社会主义》的英译本(参见米塞斯致齐默尔曼的信件,标注日期为1922年11月22日;Mises Archive 75: 20)。这里可能是指格雷戈里,因为他是赠书名单上唯一一位英国人(参见Mises Archive 75: 8的名单)。米塞斯与威廉·贝弗里奇的交往,有案可查的最早记录是在1924年夏季,当时米塞斯向他(还有格雷戈里)寄赠了《货币与流通媒介理论》第二版(参见米塞斯和他的出版商东克尔与洪布洛特出版社之间的通信,日期为1924年6月24日,Mises Archive 78: 28, 35)。1924年11月初,米塞斯来到伦敦,和罗宾斯谈到《社会主义》的译本(75: 11),随后寄赠了一本《社会主义》,可能是作为圣诞礼物(参见57: 51)。此时他已熟练掌握英语,这可以从他为罗宾斯(后来还有施瓦茨)翻译的《社会主义》部分译文写的评论上看出(83: 23ff., 4ff.)。不过,他与格雷戈里和罗宾斯会面的时候,可能是讲德语。格雷戈里能够熟练运用德语,而罗宾斯可以听懂德语谈话,虽然口头表达并不流利。

57. 关于莱昂内尔·罗宾斯,特别参见他的 *Autobiography of an Economist* (London: Macmillan, 1971); D. P. O'Brien, *Lionel Robbins* (London: Macmillan, 1988)。

58. Robbins, *Autobiography of an Economist*, pp. 73-74。

59. *Ibid.*, p. 106. 在那些年,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入学一年后,必须证明自己能够翻译两种外语文献。

60. 图根哈特可能就是那位参加了1919—1920年冬季学期米塞斯第一次私人研讨会的图根哈特。据此看来,伦敦和维也纳的圈子很早就有密切的私人交往。

61. 米塞斯致菲舍尔,信件标注日期1924年10月7日;Mises Archive 75: 49。

62. 他本人是君主主义者(monarchist),他的最大成就是调和了奥地利天主教和共和国

之间的冲突,因此挽救奥地利避免了其他各国如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命运。这几个国家在建立共和国之后,政治上的右派很快分裂为保守君主主义者和共和民主派。参见 Heinrich Dimmel, “Ignaz Seipel,” *Tausend Jahre Österreich*, Walter Pollack, ed. (Vienna: Verlag Jugend und Volk, 1974), vol. 3, pp. 299ff。

63. 关于这一依赖的事后分析(*ex-post analysis*),参见施皮茨米勒和其他人的声明,*Verhandlungen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in Zürich 1928. 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175* (1929)。

64. 细节参见 Franz Baltzarek, “Ludwig von Mises und die österreichische Wirtschaftspolitik der Zwischenkriegszeit,” *Wirtschaftspolitische Blätter* 28, no. 4 (1981): 132; Mises, *Erinnerungen*, pp. 50–54。

65. 米塞斯致梅利什(Mellish),信件标注日期为1962年1月25日;Grove City Archive: “M” files。另见 Mises, *Erinnerungen*, p. 51。塞佩尔的经济和政治观点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主流天主教社会组织观念的影响,尤其是教皇利奥十三世的《新事通谕》(*Rerum novarum*, 1891)。他也以严厉批评种族反犹太主义著称;在他眼中,奥地利犹太人是国家的少数民族,应该享有少数民族的一切权利。参见他的文章“Minoritätenschutz und Judenfrage nach dem christlichsozialen Programm,” *Volkswohl* 10, no. 2 (February 1919)。

66. 前任主管是米塞斯的朋友埃米尔·佩雷尔斯,此时已经升任其他职位。他被任命为公共工程信用机构(*Kreditinstitut für öffentliche Arbeiten*)的主管。

67. Eckert, “Friedensverträge. II. Vom staatswissenschaftlichen Standpunkte,” pp. 512ff。

68. Mises, *Erinnerungen*, pp. 54, 62。

69. R. G. Hawtrey, *Monetary Reconstruction*, 2nd ed.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926), chap. 6。

70. 一些奥地利人因此声称,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由他们的财政部长施泰因巴赫(Steinbach)于1897年发明的。然而事实上,这个体系是大卫·李嘉图设计的,“Proposals for an Economical and Secure Currency,”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Piero Sraffa,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1973), vol. 4。

71. Mises, *Geldwertstabilisierung und Konjunkturpolitik* (Jena: Gustav Fischer, 1928)。

72. Mises Archive 74: 25。

73. 政府拥有烟草专卖和食盐专卖,但是收入微薄。参见米塞斯的陈述;Mises Archive 57: 16。

74. 1922年8月底到12月底,领取政府补助的失业者仅在维也纳市就从24 000人上升到58 000人。1923年2月24日,维也纳和周边地区有112 000名失业者,其中98 000领取政府补助。参见米塞斯日期不明的信件,收信人未知,Mises Archive 57: 16。这份文件总结了米塞斯对1923年初奥地利经济形势的看法。这是写给一位未知的英美朋友的回信,他在不久前曾来过维也纳。整个1923年,失业人数有110 000人。接下来的几年还将继续上升,1929年将达到大约200 000人。参见 Redaktionskomitee der Wirtschaftskommission, *Bericht über die Ursachen der wirtschaftlichen Schwierigkeiten Österreichs* (Vienna: Österreichische Staatsdruckerei, 1930), p. 25。

75. Murray N. Rothbard, *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 5th ed.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00); Benjamin Anderson, *Economics and the Public Welfare* (Indianapolis: Liberty Press, 1979), esp. chap. 18. See also the figures in Milton Friedman and Anna J. Schwartz,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710ff.

76. Mises, *Erinnerungen*, p. 58; *Notes and Recollections* (Spring Mills, Penn.: Libertarian Press, 1978), p. 90.

77. 摘自产业俱乐部 (*Industrieller Klub*) 1929—1930 年冬季报告。参见 Mises Archive 66a: 53ff。

78. *Ibid.*

79. 参见 Mises, “Die Sanierung der europäischen Staatsfinanzen,” in Mises Archive 40b; 57: 53. 匈牙利科布登协会 (The Magyar Cobden-Szövetség) 是布达佩斯自由市场商人、经济学家和新闻记者的团体。在米塞斯之前,桑巴特、奥本海默、里斯特和乔治·佩什 (George Paish) 都曾在这个协会发表过演讲。协会对他们的接待非常豪华 (里兹饭店), 酬金可能也很丰厚。米塞斯在布达佩斯的主要联系人是费利克斯·施瓦茨 (Felix Schwarz), 但施瓦茨不是一位学者。施瓦茨定期到维也纳拜访米塞斯, 也和经常刊登米塞斯著作书评的一份布达佩斯期刊 *Pester Lloyd* 有过来往 (参见 Mises Archive 78: 34f., 45; 80: 50)。

80. 许多年后他写道:

1912 年我的货币著作刚出版时, 所有德国评论家都以很不友好的态度否定了它。只是由于货币的崩溃——而当通货灾难降临, 货币崩溃摧毁的绝不只是货币体系——连社会政策协会也开始重新考虑这一问题, 并邀请我而不是克纳普或本迪克森撰写一份关于货币稳定问题的报告, 1924 年我的货币著作第二版也获得了更多的接纳。(米塞斯致沃尔克马尔·穆特修斯 [Volkmar Muthesius], 信件标注日期为 1959 年 5 月 18 日; Grove City Archive: Hahn files。)

81. 米塞斯致阿道夫·格罗特 (Adolf Grote), 信件标注日期为 1959 年 6 月 29 日; Grove City Archive: Grote file。

82. Albert Hahn, *Volkswirtschaftliche Theorie des Bankkredits* (Tübingen: Mohr, 1920). 由于德国恶性通货膨胀和一些批评声音的影响, 尤其是来自哈耶克和其他奥地利学派成员的批评, 哈恩最终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参见 1930 年该书的第三版)。再到后来, 他写了一篇文章对他 1920 年的陈述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New York and London: Harcourt, Brace, 1936) 中的相应段落进行了比较。参见 Albert Hahn, “Continental European Pre-Keynesianism,” *The Economics of Illusion*, chap. 16; reprinted in Henry Hazlitt, ed., *The Critics of Keynesian Economics*, 2nd ed. (Irvington-on-Hudson, N. Y.: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1995), pp. 287–303。

83. 东克尔与洪布洛特出版社 (协会的出版商) 致米塞斯, 信件标注日期为 1923 年 2 月 26 日; Mises Archive 78: 6。

84. Mises, “Die geldtheoretische Seite des Stabilisierungsproblems,” *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164, no. 2 (Munich: Duncker & Humblot, 1923); 4f., 8f.; translated as “Stabi-

lization of the Monetary Unit—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ory,” pp. 6, 11.

85. Anton Burghardt, *Soziologie des Geldes und der Inflation* (Vienna: Böhlau, 1977), p. 65. On the German inflation see F. D. Graham, *Exchanges, Prices, and Production in Hyperinflation: Germany, 1920 – 23*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30); Costantino Bresciani-Turroni, *The Economics of Inflation: A Study of Currency Depreciation in Post-War German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37); Rudolph Stucken, *Deutsche Geld-und Kreditpolitik, 1914 – 1963*, 3rd ed. (Tübingen: Mohr, 1964), chaps. 3 and 4.

86. 米塞斯致东克尔与洪布洛特出版社, 信件标注日期为 1923 年 5 月 25 日; Mises Archive 78: 14。出版延迟的原因是文集的另外一位作者——前部长克莱因, 未能及时退回校样; 参见东克尔与洪布洛特出版社致米塞斯的信件, 标注日期为 1923 年 5 月 18 日, Mises Archive 78: 12。作为社会政策协会的出版商, 通常意味着会对货币政策产生某种影响; 参见 Franz Boese, *Geschichte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1872 – 1932*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39), pp. 164, 183f。

87. Mises, “Die geldtheoretische Seite des Stabilisierungsproblems,” p. 10; translation p. 13.

88. Ibid., p. 15.

89. Stucken, *Deutsche Geld-und Kreditpolitik, 1914 – 1963*, p. 49.

90. Ibid., p. 52.

91. Mises, “Die geldtheoretische Seite des Stabilisierungsproblems,” p. 13.

92. Ibid. 我相信, “100% 边际金本位制” 这个表述来自菲利普·纳塔夫教授 (Prof. Philippe Nataf's)。

93. Mises, “Die geldtheoretische Seite des Stabilisierungsproblems,” p. 16; my translation.

94. Ibid., p. 33; (英文) 译文来自本书作者。他暗示的缺陷是指缺少对于支票账户和其他货币替代品的法律限制。

95. 不过, 1953 年的米塞斯方案本质上与他在 1923 年提出来的是一样的。参见 Mises,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3), part 4。

96. Mises, “Die geldtheoretische Seite des Stabilisierungsproblems,” p. 17; my translation.

97. Ibid., pp. 34f.

98. Mises,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9), p. 780.

99. Mises, “Die geldtheoretische Seite des Stabilisierungsproblems,” p. 30.

100. Ibid., p. 32; my translation.

101. Nicholas Oresme, “A Treatise on the Origin, Nature, Law, and Alterations of Money,” Charles Johnson, ed., *The De Moneta of Nicholas Oresme and English Mint Documents* (London: Nelson & Sons, 1956).

102. Mises, “Die geldtheoretische Seite des Stabilisierungsproblems,” p. 36; my translation.

103. Hawtrey, *Monetary Reconstruction*, chap. 4.

104. 参见 Mises, *Erinnerungen*。他有好几次机会本来可以增加自己的收入。战前一些银行的主要高管,例如信贷银行(施皮茨米勒)和地产信贷银行(Bodenkreditanstalt)(西格哈特),基本年薪高达5万克朗,而米塞斯那样的公务员在20世纪20年代只有1.2万克朗。参见 Bernard Michel, *Banques et banquiers en Autriche au début du 20e siècle* (Paris: Presse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1976), pp. 324f。

105. 参见米塞斯和东克尔与洪布洛特出版社的通信, Mises Archive 78: 7, 9, 17, 38。米塞斯让东克尔与洪布洛特出版社将50本赠书中的14本直接寄给了收件人。剩下的36本由他自己分配,参见 Mises Archive 78: 28。

106. Mises,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0), p. 34.

107. Mises, “Zur Klassifikation der Geldtheorie”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monetary theories),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44 (1917/1918): 198–213.

108. Mises,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p. 35.

109. 参见米塞斯手稿, Mises Archive 78: 32。他曾计划给这份导言加一个标题《货币与流通媒介理论在理论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The Place of the Theory of Money and Fiduciary Media Within the System of Theoretical Economics)(参见 Mises Archive 78: 33),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

110. 参见 Mises Archive 78: 7, 20, 22, 26, 38 中的书信。

111. 销售记录如下(参见 Mises Archive 78: 2, 52): 1924: 839/721, 1925: 420/409, 1926: 144/139, 1927: 78/77, 1928: unknown, 1929: unknown, 1930: 70, 1931: 110。1932年5月21日剩余库存为150册。1932年,东克尔与洪布洛特出版社已经着手洽谈此书第三版的出版事宜。按照销售情况来看,可以肯定,这个版本本来是会发行的。但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阻止了这个计划。

112. Herbert Döring, *Die Geldtheorien seit Knapp*, 2nd ed. (Greifswald; Bamberg, 1922); Melchior Palyi, *Der Streit um die Staatliche Theorie des Geldes* (Munich: Duncker & Humblot, 1922); G. M. Verrijn Stuart, *Inleiding tot de Leer der Waardevastheid van het Geld* (The Hague: Mouton, 1919); Walter Eucken, *Kritische Betrachtungen zum deutschen Geldproblem* (Jena: Gustav Fischer, 1923)。米塞斯的书中没有提到后一本书,但在信中曾经提及;参见 Mises Archive 80: 52。

113. Mises Archive 78: 21。凯恩斯在他的书中采纳了欧文·费雪和古斯塔夫·卡塞尔的立场,根据这种立场,货币政策应该致力于保持货币购买力的稳定。

114. Eckert, “Friedensverträge. II. Vom staatswissenschaftlichen Standpunkte,” p. 490.

115. 两年前,在艾森纳赫举行的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米塞斯的朋友格奥尔格·雅恩(Georg Jahn)已经成功鼓动协会转型成为一个纯粹的研究机构(参见 Boese, *Geschichte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1872–1932, pp. 176ff.)。这一倡议得以成功似乎归因于两个动机。一方面,马克斯·韦伯关于社会科学价值中立的理想已经在年轻一代中赢得了许多追随者。另一方面,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在其成员中也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产生了一个政治激进派。这一激进运动消灭了主流的中间路线,而在过去,中间路线曾是协会内部政治妥协以及协会影响政府政策的主要力量。

116. Boese, *Geschichte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1872 – 1932, pp. 186ff.

117. 参见“Verhandlungen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in Stuttgart 1924,” *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170 (1925): 139ff。

118. Georg Jahn, “Freihandelslehre und Freihandelsbewegung,”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4th ed. (1927): 369f., vol. 5.

119. 直到 1924 年 10 月底,他一直没有签署这份宣言。参见宣言副本和支持者列表, Grove City Archive: “I” file。

120. 米塞斯的讲稿是一些只有关键词的笔记。后来他把这些笔记整理成了两篇手稿,寄给了协会主管出版流程的管理人员弗朗茨·伯泽(Franz Boese)(参见 Mises Archive 80: 56)。这份手稿连同米塞斯的注释,现藏 Mises Archive 22: 71ff。

121. Mises Archive 80: 55.

122. 通过批评货币政策的执行效率,米塞斯似乎也提出了理性预期理论的一个雏形。他强调说,他并不打算指出一个更加开明的货币当局可以阻止未来的通货膨胀。他的论点是,普通大众的经济启蒙将会导致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完全失效。只要公众意识到汇率下降,每个人都会转向走私,到那时候,政府就无法通过印制纸币为自己融资了。

123. 米塞斯致埃里克·沃格林,信件标注日期为 1925 年 6 月 12 日; Mises Archive: 79: 11:

下周我将前往布鲁塞尔[参加商会会议]……然后再去伦敦,看望我的一些英国朋友。我对这次访问充满期待,虽然我在伦敦只能停留很短时间。

124. 兑换率为 10 000 克朗 = 1 先令。克朗是 1892 年为取代金券而引入的,不过此后几年金券仍然继续流通。替代过程到 1900 年 1 月 1 日结束。

125. 关于门格尔在 1892 年改革背景下的写作,参见 Carl Menger, *Gesammelte Werke*, F. A. Hayek, ed. (Tübingen: Mohr, 1968), vol. 4。

126. 这个协会的名称是德意志工业联盟(*Deutscher Hauptverband der Industrie*)。会议地点在特普利茨协会总部,时间是 1924 年 3 月 15 日;参见 Mises Archive 57: 20ff。米塞斯可能在柏林为商人与工业家协会(*Verein Berliner Kaufleute und Industrieller*)作过一个类似的演讲。参见奥斯卡·海曼(Oscar Heiman)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 1923 年 12 月 31 日; Mises Archive 57: 1。

127. Mises Archive 57: 24.

128. Mises, “Finanz- und währungspolitische Fragen in der Gegenwart,” *Mitteilungen des deutschen Hauptverbandes der Industrie* 5 (12): 201 – 09, Teplitz-Schönau, March 20, 1924.

129. Mises Archive 57: 11.

130. Mises Archive 80: 64. 亚诺夫斯基后来成了米塞斯主义者。参见他在 1932 年 2 月 3 日写给米塞斯的信,他在信中批评了某位耶利内克(Jellinek)的通货提议,认为这个提议无法达到他自己提出的目标(参见 Mises Archive 71: 62)。1932 年秋,亚诺夫斯基在奥地利经济学家协会(*Gesellschaft österreichischer Volkswirte*)作了一个讲座。米塞斯协助安排了这次演讲(参见 Mises Archive 71: 126)。

131. Mises, “Die Goldwährung,” *Neues Wiener Tagblatt* (April 12, 1925). 副本藏于 Mises

Archive: 106; 18。

132. Margit von Mises, *My Years With Ludwig von Mises*, 2nd ed. (Cedar Falls, Iowa: Center for Futures Education, 1978), p. 13. 正如作者正确指出的,此书是关于米塞斯生平的唯一一本一手证言。但是,它的陈述并不完全可靠,兹举两例。首先,作者在自己的年龄问题上撒了谎,她自称的年龄要比实际年龄小六岁。甚至在她的墓碑上,出生年份也错标为1896年。她的正确出生年份是1890年,这在她的结婚证上,还有美国入境档案上,都有记录(参见1941 U. S. "Affidavit of Identity and Nationality;" 副本存于Grove City Archive: Mexico 1942 files)。其次,玛吉特自陈她是“两人首次见面后,米塞斯唯一想娶的女人”。虽然这话可能没错,但接下来那句话,她声称路德维希“从未改变过他的感情,或他对这一决定的决心”,这显然是错的,我们会在后面章节看到。这些例子表明,必须审慎对待玛吉特·冯·米塞斯的自传体回忆录。只有不与其他证据冲突的地方,本书才会用到她的陈述。

133. *Ibid.*, pp. 3, 9.

134. Mises, *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1), pp. 85f. 米塞斯对天才的讨论(p. 166),已有萧伯纳《谋生和创作》(*Earning a Living and Creative Work*)的先例。米塞斯当时并不知道萧伯纳的这段描述。二十五年后,一位来自德国的通信者指出了两者的相似之处。参见约翰内斯·巴纳(Johannes Bahner)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7年6月12日;Grove City Archive: "B" file。

135. Margit von Mises, *My Years with Ludwig von Mises*, p. 36.

经济科学最早出现于18世纪的法国,从那时起,它就一直关注政策制定的实践问题。政府对经济的影响是经济书籍和小册子关注的核心,而对所有其他问题的处理,则要视其对于深入理解正在考虑的政策问题是否必要。

但是,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时期,理论家们关注的是对市场经济的分析,这多少有点片面。学术研究现在致力于解决新的理论问题。整个学科不再对政策问题有太多关注。

新的边际价值理论是否改变了传统上源自经济学的政治含义?

实际上,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米塞斯的所有出版物都在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讨论这个问题。他可以参考前辈的某些工作——特别是庞巴维克的短文《权力与经济法》(Power and Economic Law),该文从门格斯的视角分析了政府对劳工市场的干预。但是按照米塞斯的观点,讨论经济学的政治含义需要一个更为综合的方法。他的伟大贡献是展现出功效主义方法是如何发扬这一进路的。对此,他的《民族、国家与经济》已经给出一个概要描述。

524 20世纪20年代,米塞斯提出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关于社会组织的功效主义理论。他所设想的理论不仅适于分析所有过去曾经存在的经济制度,还可分析所有可想象的经济制度。他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实现这一想法的重要一步,因为他得出结论,评估“所有可想象的经济制度”的想法远不如听上去那么雄心勃勃。

他继续说,所有可想象的制度只有三个类型,特例分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

资本主义是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一套分工制度。它的特征是很多个体或群体的合作,其中没有谁能控制全部资本品。人们合作的基础是对现存财产权利的尊重,并受合同、礼物和交易规制。

相反,社会主义是一个由其中的某个个体或群体控制所有生产资料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存在以交易为基础的合作,因为交易是以交易的物品有不同的所有者为前提的。

到了1922年,这项研究的主要部分已经完成。现在米塞斯可以转向第三种制度——曾是经济学的传统主题的干预主义。他的主要目的是,从门格勒的视角,通过应用古典经济学家的功效主义方法,重建传统的政府干预主义分析。米塞斯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主要写于1922—1926年,后来作为《干预主义批判》(*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的几个章节重新发表。¹

干预主义理论的雏形

525

政府对原本不受限制的市场加以干预是否有益于国民经济,这是经济学家的传统问题。他们的典型答案是,那是不可能的。经济学产生后,18世纪的剩余年代以及19世纪大部分时期,这个定论一直是经济学家之为经济学家的本质特征。每一代经济学家都致力于精炼这一解释,即为何政府干预是不合适的。

20世纪20年代初,米塞斯开始着手重新完善和系统化经济研究的这个传统领域,此时,他已通过对李嘉图国际贸易理论的一般化,为政府干预分析做出了重要贡献。² 鉴于李嘉图已经研究了只有商品可以进行跨国交易的情况,米塞斯去掉了劳动力和资本不能流动的假设。在1916年讨论贸易政策目标的一篇文章中,他描述了自由移民和资本自由流动对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以及国家组织的影响。最主要的是,他分析了贸易政策(关税、配额和补贴)是否有利于加强或维持“国家的强大”——属于国民社会的人数及其福利。他的回答是否定的。贸易政策“不可能以对国家有益的方式达到这个目标”。他还评论道,即使贸易保护主义的拥护者们也必须注意到,他们所提议的政策不可能推进,更不用说达到“他们自己设定的那些目标”。³

526

三年后,他在《民族、国家与经济》中更加有力地重述了这个论证。通过详细的理论与历史分析,他表明,德国1879年后执行的保护关税政策并未达到终止德国工人移民国外的目标。⁴

对米塞斯来说,精心阐释经济学的这个传统领域的第二个时机来得有点意外。1922年,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邀请他参与编纂标准社会科学词典《政治科学手册》第四版。维塞尔的邀请带有勉强和高傲的姿态。⁵ 他给米塞斯的约稿不是以米塞斯过去的研究为主题,而是关于价格管制——这个主题本来可以交给任何一位平庸的经济学家。涉及货币、银行、商业周期理论和社会主义的条目给了其他作者包括维塞尔本人。米塞斯试图婉言谢绝,但在维塞尔的坚持下,他最终答应撰写关于价格管制理论的条目。⁶

527

价格管制理论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领域,两种互不相容的观点支配着这个领域。一方面,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直截了当地否认了价格管制之可能性。自然法则支配着社会和经济,而政府法令不可能违背这些自然法则。创造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基于几个原因,这是不明智的)或许是可能的,但是创造一个以政府法令为基础的社会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政府科学的讲坛社会主义教授提出反驳,指出法律和政府法令对价格的管制显然是真实存在的。自然规律不能阻止它们存在,也不能阻止它们按照当局的意愿改变价格。这些事实证明,创造一个混合经济,或者“第三条道路”是可能的。它可以在避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极端的弊端的同时,融合二者的优势。

现在米塞斯确信,经济规律就像自然规律一样,是不可违背的。⁷那么,他如何对待讲坛社会主义者的反对呢?他运用了《民族、国家与经济》中讨论过的功效主义分析方法。米塞斯认为,关键问题不是实施价格管制是否可能(显然可能),而在于价格管制是否能够达到政策制定者的目标。他在文章中继续指出,价格管制实际上已经偏离了它们预先设定的目标。因此,即使站在政策制定者本身的主观立场来看,价格管制也是有害的。

528

就此而言,老一代自由主义者(和某些老一代社会主义者)的看法是对的:如果我们寻求的是一个有意义的、无破坏性的经济体制,那就不存在“第三条道路”。米塞斯强调,这正是价格管制理论的政治含义。这一洞见反过来直接导致了自由放任政策的采纳。因为这个原因,古典自由主义就其价值取向来说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恰恰是经济科学的直接应用。⁸

只有在一种意义上,即“在某些生产资料为公共所有而其他生产资料为私人所有的意义上”,才可以有意义地谈论混合经济。⁹换句话说,有意义的经济制度是以清晰界定与尊重财产权利为前提的。如果政府通过法令和法律模糊财产权利,使自己成为生产要素的实际共同所有者,那么,原来的所有者会以一种与政府宣称的目的相反的方式行使自己的剩余控制权。物价管制阻止要素所有者按照他们认为最好的方式行使自己的财产权利。它们“固定价格,使之背离不受限制的市场本来应该形成的价格水平”。¹⁰因此,要素所有者就转向各种各样将会危害政府计划的次优行为。

米塞斯指出,要素所有者意料之外的反应,将会激起政府进一步侵犯公民的财产权利,因而导致干预主义的恶性循环。每次更多的干预都会被新一轮事与愿违的反应抵消,如此等等。只有政府控制了所有生产要素,亦即建立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过程才会停止。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和奥地利就是完美的

例子:

追踪战争经济政策的人,可以轻易发现上面提到的阶段:最初是物价管制,然后是强迫销售,然后是生产和分配管制,最终就是,试图实施全部生产过程和分配的中央计划。¹¹⁻¹² 529

米塞斯还讨论了种种其他例子,以说明物价管制适得其反。关于限价之破坏性的最重要的例子就是工会强制执行而得到政府被动支持的最低工资。这个例子还有更加广泛的理论意义,因为它显示出“对我们的分析来说,施加管制的高压机构究竟是‘合法的’国家组织还是公共权力认可的组织,是无关紧要的”。¹³

“反马克思主义”批判

530

关于物价管制的文章重述了古典自由主义者反对政府扰乱市场价格的理由,之后,米塞斯又对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统治德国的两大思潮,也即支持干预主义的两种主要理论(即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展开了系统批判,从而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政治哲学体系。

战后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悲惨失败,极大损害了他们作为社会进步先锋力量的形象。米塞斯、马克斯·韦伯和鲍里斯·布鲁兹库斯(Boris Brutzkus)的著作中对这种失败的解释已经促使许多经济学家修改了自己关于政府的恰当规模的观点。但其他人继续死不悔改地鼓吹全能国家(total state),只是他们抛弃了社会主义者的平等思想。

维尔纳·桑巴特是这个群体无可争议的领袖,他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经济学界最耀眼的明星。桑巴特学术生涯的开端,就是在学术圈中普及了马克思主义,那是他在 1896 年的著作《19 世纪的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Sozialismus und soziale Bewegung im 19. Jahrhundert*)¹⁴。后来的版本表明,桑巴特逐渐疏远了他最初的马克思主义理想。1924 年,第十版以一个新的书名重新出版,直截了当地否定了马克思社会主义。¹⁵桑巴特已经回归主流的施莫勒式社会主义了,这种社会主义鼓吹一个没有平等主义理想的全能国家。¹⁶ 531

桑巴特的聪明才智为他赢得了卓越的地位。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只是教条式地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义,而桑巴特却试图以一个追求客观批判的头脑分析和发展他们的学说。这使他的作品成为当代反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知识分

子进行彻底批评的完美目标,米塞斯在一篇题为《反马克思主义》(Anti-Marxism)的文章里发表了这样的批评。¹⁷

米塞斯已经在讨论价格管制的文章里指出,干预主义的缺点并非源于某些政府追求的平等主义,而恰恰在于政府干预的本质,即对私有产权的侵害。无论是否明确追求平等主义,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都是破坏性的经济制度。即使他们追求其他分配理想甚至精英体制(meritocracy),仍然是不合宜的社会组织形式。自由社会和一个全能政府控制下的非平等社会,也许会有一些表面上的相似之处,但是二者在本质上还是不同的:

表面上看,国家主义(etatism)社会理想与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没什么不同。国家主义并不准备推翻传统法律秩序并正式地将所有生产性私人财产转变为公共财产……但实际上所有企业都将由政府运营。按照这种方式,所有者将保持对其财产的名义所有权和商标,以及获得“合适”收入或“与其身份相称”的收入。每家企业都成为办事处,每个职位都是公务员……政府决定价格,政府决定生产何种物品,如何生产,以及生产多少。不存在投机,不存在“额外的”利润,也不存在亏损。不存在政府预定之外的创新。政府指导和监督一切。¹⁸

米塞斯指出,全能政府观念的错误与政府的个别议程无关。如果政府的目标是改善“集体生活”(相对于简单的个体集合),则它就不是全能的。但如果它追求的是提高公民全体的福利,它也不是全能的。在这两种情况下,政府干预都是事与愿违的。由此可见,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的区分虽然源远流长,似乎至关重要,其实却是次要的。首要的区别是行得通的政策与行不通的政策之间的区别。这又引出基于私人产权的社会秩序(行得通)与基于侵犯私人产权的社会秩序(行不通)之间的区别。因此,究竟是个人还是集体运行经济,是无关紧要的——只要集体的所有个体成员的财产权利都得以保留。它也说明企业规模的大小是不重要的。只要私人产权受到尊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就只奖励提供最优产品的公司。如果某些公司要比其他的大,那也没有问题。¹⁹

米塞斯强调了上述事实,以抵制迪策尔、卡尔·普里布拉姆和施潘的学说,他们对两次大战之间的德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西方的政治思想有着巨大影响。迪策尔和普里布拉姆支持个人主义,而施潘拥护集体主义,但他们一致同意这些就是终极范畴,所有的政治观点都从它们派生。²⁰米塞斯不以为然。他认为有一

种观点既非派生于个人主义也非派生于集体主义,即社会分析的功绩主义方法。²¹他已经证明这个方法在分析静态和动态社会“整体”问题例如语言社群时是多么成功,他还强调,对于这些整体的分析正是理论社会科学的关键。²²相信个人行动可以脱离广阔社会背景获得理解,是错误的,正如认为恰当理解社会整体要求社会分析自身必须是整体主义一样。

534

功绩主义方法本身就是真正的科学方法,因为它把所有社会现象都追溯到经验事实:

功绩主义的社会学说并不涉及形而上学,它只是把以下这个确定无误的事实作为它的出发点:所有生物都肯定他们生活和成长的意志。劳动分工比起单独行动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使个人日益联合,形成合作。社会是劳动的分工与协作。²³

每个人都寻求增进自身福利,而协作劳动要比单独劳动更有效率。因此,如果个人福利的增加是以更多物质财货为前提,则通过参与分工,他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达到目标。社会就是这样形成的。

对于社会的这一经济解释,其中所有要素都是可以确定的事实。相反,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学说对社会起源无法做出因果解释,因为他们是基于假定而不是基于事实分析。米塞斯继续指出,同样的批评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斗争理论。他并不否定人类历史是以许多集团斗争为特征的,也不否认这些斗争通常都对历史过程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但他认为,这些时髦的社会斗争理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只是其中一个特例)的实际成果远远少于所宣称的。集团斗争不是,也不可能是人类生活的基本要素。真正的问题是每个集团最初是如何形成的。在解释集团斗争之前必须先解释集团的形成,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所有斗争理论都没有做到。

535

这种疏忽的原因不难察觉。我们无法证明一个协作原理,因为协作只存在于协作团体之内,超出这个范围就将失效。如果战争和冲突是所有社会发展的驱动力,为何它只对阶级、种族和民族是真的,而不是对所有个体之间的冲突?如果我们把这种战争社会学推向它的逻辑终点,我们根本不会得到社会学说,而是“一种非社会交往理论”。²⁴

米塞斯指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甚至对其最基本的概念都没有提供经验根据。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意义上,什么是“阶级”?马克思从未定义过它。“意味深长的是,《资本论》第三卷遗稿恰好就在讨论阶级问题时突然终止。”米塞斯继续说:

536

马克思去世已经超过四十年了,阶级斗争也已成为现代德国社会学的基石。然而,我们却要继续等待它的科学定义和轮廓。没有什么比阶级利益、阶级状况和阶级战争的概念,以及阶级状况、阶级利益和阶级意识形态的构想更含糊不清的了。²⁵

维尔纳·桑巴特是德国社会学家无可争议的领袖。他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们都采纳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斗争是现代社会的终极驱动力的观点。虽然桑巴特成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对手,但他的分析依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他只是放弃了某些实践结论,而这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一直以来从阶级斗争理论中演绎出来的。他没有也无法提供一个理论替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方案。他唯一的异议来自以下这个假设:根据阶级斗争理论,事情会如此这般地发展,而它们不该发生,因此政府应该抵制这种发展。然而按照这个说法,桑巴特和许多德国社会学家就又远离了科学王国,进入了宗教和伦理的领域。实际上,桑巴特支持重回中世纪的社会组织形式——行会,正如凯恩斯在英国提议的“一种回归,可以说是向中世纪分立自治(separate autonomies)观念的回归。”²⁶与此相似,少数彻底批判马克思阶级斗争概念的理论家如奥特马·施潘,也对所谓的中世纪国家社会主义的美好惊叹不已。米塞斯断定:

537

对于每位科学思考者来说,马克思主义引起异议的地方就是它的理论,但这种理论似乎没有冒犯反马克思主义者……反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体系的政治主张,而不是反对它的科学内容。他很遗憾马克思主义政治对德国人民造成的伤害,但却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及解决方案的陈腐和缺点对德国精神生活的伤害。尤其是他没有察觉到,政治和经济困难正是这些精神灾难导致的。他没有意识到科学对日常生活的重要性,而且他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甚至相信塑造历史的不是思想而是“真正的”力量。²⁷

* * *

《反马克思主义》这篇文章引起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愤怒。米塞斯该当何罪?

首先,他竟胆敢以其对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无药可救的缺点的尖锐分析批评伟大的导师。其次,他又声称,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本质上与20世纪20年代以来到处涌现的各式各样的国家社会主义没有区别,而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多数又是反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产物。于是,部分意大利社会主义者抵制马克思的教导,宣称自己为“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在本尼托·墨索里尼的领导下上台。德国也有一场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这场运动之父是弗里德里希·瑙曼,说来奇怪,他后来又被尊为20世纪德国自由主义的教父。²⁸从20年代开始,直到最后痛苦的结束,国家社会主义的领袖一直是阿道夫·希特勒。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大声反对把他们与法西斯主义者和国家社会主义者归在一个名称之下。但是正如米塞斯表明的,这些集团之间的所有区别都是表面的。从经济意义上说,他们是一致的。

538

新自由派批判

讨论了桑巴特和其他一些顽固不化拥护强力中央政府的人之后,米塞斯开始对讲坛社会主义运动中较温和的一支进行了批评。²⁹由于“社会政策危机”的影响,这些知识分子丧失了对全能政府的信心。他们把自己视为“社会自由主义”——意思是他们意识到了自由市场的某些根本缺陷,并鼓吹通过政府干预弥补这些缺陷。这个派别的领袖是海因里希·赫克纳、卢约·布伦塔诺和利奥波德·冯·维泽。他们最重要的战前前辈是欧根·冯·菲利波维希和弗里德里希·瑙曼。³⁰

德国社会自由主义运动盗用“自由主义”这个术语的企图与英国的伦纳德·霍布豪斯(Leonard Hobhouse)、美国的约翰·杜威相似。³¹两个派别都支持比古典自由主义广泛得多的政府行动范围,他们还嘲笑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立场。那么,为何他们还要称自己为“自由主义者”呢?他们使用该词的唯一原因就是他们不信任完全的中央计划理想。全能政府威胁到了个人自由的核心:个体公民的“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但与古典自由主义者相反,这些新的社会自由主义者并没有在原则上地反对影响深远的对公民“经济自由”的限制。他们声称,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对私人产权的侵犯是正当的,例如不工作无收入的“原则”,或者,政府干预使得经济更加接近完全竞争(perfect competition)模型的论点。他们还认为经济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它要求一个人对其同类某种程度的冷漠无情。

539

剩下的事情就是推销了。他们预见到了20世纪西方民主国家政党政治的一个重要策略,便让自己以自由主义者的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因为个人自由观念依然

流行,其中隐含着积极含义。这个策略如此成功,以至于在今天,“自由主义者”和“自由主义”通常表示与其最初含义完全相反的事物。

米塞斯反对这种思想和实践的混淆。他强调,利害攸关的不是词语的使用,而是一个实质区别:不受政府干预限制的经济与以这种干预为特色的经济体制的区别。在新的意义上使用“自由主义者”这个词,就是为了模糊这种区别。

540 新自由派给人的印象是,似乎政治仅仅涉及所要达到的目标。他们暗示,我们只有两个选择:一边是冷酷无情和容忍寄生(parasite-friendly)的经济自由,一边是热情与公正的公民自由。³²但是,米塞斯解释说这种观点纯属无稽之谈。政治不关乎目标,而是关乎手段。古典自由主义者通常也像他们的社会主义对手一样珍爱同样的理想。他们分道扬镳的地方是实现这些理想的实践方案:古典自由主义赞成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而所有其他政治信念的典型标志就是试图通过侵犯私人产权达到目标。

在理想的古典自由主义社会中,每个人在其个人所有权范围内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所有人际关系都基于相互同意。每个人都与别人合作来促进共同利益,假如某方不愿意,合作就会停止。在另一方看来,合作以这样的方式取消可能显得有些残酷,但是,阻止合作取消的唯一办法就是强迫对方在违反其意愿的情况下继续合作,而这就不再是促进双方的共同利益了。因此,资本主义秩序看似过分冷漠的地方,事实上恰是基于相互同意的合作所带来的有利结果:

541 在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买方试图找一个花费最少的地方购买一件经济物品,排除其他的考量,他的行动不是因为“感受不到辛苦”。如果一家出色的企业成功打败一家低效的企业,也不存在什么“残酷的手腕”,或者“肆意打压和奴役同行”的现象。这个例子的整个过程并不伴随遭到自由主义厌弃的令人不快的效应或者资本主义“副作用”。恰恰相反!竞争越激烈,就越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功能以提高经济生产。铁路取代马车司机,织布机取代手工织布工,制鞋厂取代鞋匠,这些都没有违背自由主义的意图。当小帆船所有者被大蒸汽船公司取代时,当几十个屠户被一个屠宰场取代时,当数百个商人被一家百货公司取代时,并不意味着“打压和奴役同行”。³³

的确,理想的古典自由主义社会从未存在过:“即使我们回顾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巅峰时期的英国社会,我们能获得的关于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的画卷仍然是不完全的。”³⁴因此,资本主义是一个“未知的理想”,正如安·兰德(Ayn Rand)

后来所说。³⁵实现这样一个社会既非不可能也非不受欢迎。经济科学显示,它是可行的政治选择,而所有替代选择都是较差的。社会主义的效率必然低于资本主义,因为它不可能应用经济计算;而干预主义根本就不可行。米塞斯断言:“经济知识必然引向自由主义。”³⁶最佳证据就是,社会自由主义至今无法提出一套可以证实他们想法的经济理论。

显示社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能的突出例子是工资理论。正如韦布夫妇曾经提出的,布伦塔诺试图证明,工会能够推高所有工人的工资,高于自由市场所能达到的水平。他们的著作已经遭到庞巴维克、波勒和阿道夫·韦伯的致命打击。³⁷现在,米塞斯在一篇题为《社会自由主义》(Social Liberalism)的文章中结束了这个争论。他补充说,即使工会能把所有工人的工资提高到一定水平,还有另一个根本问题要问:

542

如果工会真的拥有这种力量,能够提高所有工人的平均工资,以至超过没有干预时的水平,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工资能够达到多高?能够高至吸收所有“不劳而获”的收入和必须支付给资本的收入吗?或者,存在一个稍低一点的界限,当工资升到这里时必须停止?这是“权力理论”就每一种价格必须回答的问题。但是直到今天,没有一个人曾试图解决这个问题。³⁸

换句话说,如果工会(或任何人)仅仅通过显示权力就能真的提高所有人的工资,也就是说,如果价格真的依靠权力而不是经济规律,那么,为什么要求工资(比如)增长10%?为什么不要求增长100%或1000%或1000000%?问题本身就是它的回答。“工资是讨价还价权力问题”的理论是荒谬的。

社会自由主义者清楚这些问题,因此他们否定了所有经济科学的有效性。但正如米塞斯表明的,这种掩耳盗铃的态度等于放弃思想,并创造了危险的政治真空。社会自由主义者甚至否认当前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几十年来,他们已经使德国人习惯于意志和权力是所有社会进步的动力的想法。现在,就连他们自己都对全能政府失去了信心,但却撇下了充满旧偏见的毫无出路的人们。在他的结论中,米塞斯清楚说明了这样一个严重的政治危险:大众要求建立社会主义,而他们的政治领袖却不愿意顺从这个要求:

543

政治不敢采纳流行意识形态要求的東西。经历了痛苦的经验教训,它在潜意识里已经对流行的意识形态失去信心。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却没有人考

虑以有益的意识形态取代明显无益的意识形态。人们没有期待理性的帮助。一些人躲到神秘主义的巢穴中,另一些人则把希望寄托于即将到来的“强人”——暴君会考虑并照顾他们。³⁹

* * *

544 米塞斯在1926年2月末递交了《社会自由主义》手稿。⁴⁰此时,他已经决定了以后要出的两本书。第一本将是他批评不同形式的干预主义教义的论文集,其中将包含他的《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还有一两篇对他的《价格管制理论》中的命题加以一般化。第二本书将从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的角度阐明上述发现的政治含义。后来,第二本书首先面世——1927年以《自由主义》(*Liberalismus*)为题出版;只过了两年,另一本书以《干预主义批判》(*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为题出版。

经济科学的转型

至1926年初,米塞斯已经研究了干预主义一般理论的四个要素:两个案例研究,分别涉及国际贸易和价格管制领域,一篇对德国盛行的冒牌反马克思社会主义(anti-Marxist socialism)的批判,还有一篇对社会自由主义的批判。现在,他必须把这些要素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干预主义理论。1926年10月他在鹿特丹和乌得勒支的演讲是一个机会。后来,这些演讲的手稿整理成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⁴¹这篇文章将价格管制论文中的命题进行了一般化,并特别强调了米塞斯的工作与以前几代经济学家的连续性。

545 米塞斯试图回应的一个异议是,他的理论似乎认为,所有政府行为必然与其声称的目的相反。他是某类无政府主义者吗?通过回应这个异议,米塞斯试图精确描绘哪些政府行为构成“干预”,哪些不是。简单地说,他的回答是,如果政府尊重私人所有者自由运用他们自己的财产的意愿,那么政府就没有“干预”。干预只是那些试图背离所有者的意愿而使用财产的公共行为。

干预是某个社会权威发出的,迫使所有者的生产方式和企业家的雇用方式不同于他们的意愿的限制命令。⁴²

米塞斯强调,干预主义是比政府不当行为范围更广的现象。干预主义的典型

特征就是,它是“经过授权”的对私人产权的侵犯。如果没有得到“社会权威”的委托,这种侵犯会被视为一种犯罪。那么,这些社会权威到底是什么?它们的典型特征是,它们的行动是由一种“思想权力”(geistige Macht)宣布为合法的。因此,它们的干预措施就被认为是对私人产权的合法侵犯。思想权力可把侵犯私人产权的垄断权利授予某个特定机构;所有国家主义理论都是如此,不过国家主义只承认某些特定群体(例如“国家”或“政府”)侵犯私人产权是合法的。而思想权力亦可授权没有中心机构的侵犯私人产权的行为。例如,宗教教义禁止支付高利贷那样的“高价”时就是这样。⁴³

干预主义的典型特征是,它会产生不受欢迎的共同所有权(unwanted co-ownership)。政府(或任何其他干预者)宣称对财产拥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权,但又把其他权利留在所有者手中。按照米塞斯的观点,甚至直接征收都不能算是干预,因为它所涉及的所有权变化是很清楚的。

最重要的是,旨在保护私人产权物理完整性的措施不是干预。这种保护在古典自由主义者眼中是政府的正当功能,因此,米塞斯的干预主义理论不能被解释为无政府主义。⁴⁴然而,米塞斯强调,“保护产权”不应过度解释。为了回应20世纪20年代在经济学家中日益流行的一个观念,即自由市场本质上如同瓦尔拉斯模型的“完美竞争”,米塞斯警告说:

546

旨在维护竞争的管制,根本就不属于保存私人产权秩序的措施。流行的错误认为,同一产品的不同产商之间的竞争是理想的自由秩序的主旨。事实上,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是私人产权,而不是某个遭到误解的自由竞争概念。是否存在许多录制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唱片的生产资料是由私人所有而不是政府所有。这种误解,连同受到自然权利哲学影响的对于自由的解释,已经导致人们试图通过立法禁止卡特尔和托拉斯以阻止大型企业发展。⁴⁵

此处,米塞斯第一次讨论了他余生将不得不在许多场合面对的谬误——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时,新古典运动席卷了整个学术界,完全竞争模型成了市场经济的理想代表。⁴⁶这个错误的政治影响是灾难性的。新的方法开启了政府部门一个没完没了的议程,他们通过层出不穷的新奇干预,试图将现实世界塑造成他们那个不可能的模型。

547

米塞斯察觉到了这种危险。经济科学曾是19世纪自由观念的思想基础。它是处理现实人类生活的科学,而不是虚假建构,后者乃是新兴的新古典主义运动的

核心。此外,它也是有着明确政治含义的科学,而不只是一种智力训练。这门科学就其本性来说是令掌权者憎恶的。它的结论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政治正确的冒犯,而政治正确突然发现自己暴露在理性批评的冰冷光照下。此时德国正在进行关于国家失业救济计划的辩论,米塞斯知道自己的做法是很得罪人的。他说:

548

在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中,失业不过是一种过渡或摩擦现象。各种阻碍劳动力跨地区或跨国自由流动的因素都会使均衡工资的形成更加困难。它们还可能导致不同类型劳动力报酬的差异。但是如果企业家和资本家能自由处理这些问题,就不可能造成大规模长期失业。寻找工作的工人总能找到工作,只要他们根据市场状况调整工资要求。

如果工资由市场决定而不受干扰,世界大战和最近几十年的破坏性经济政策的影响将足以使工资率下降,不会造成失业。今天被视为资本主义失败证据的失业范围和持续时间是由以下事实引起的:工会和失业补助使工资水平高于不受阻碍的市场所能形成的水平。⁴⁷

米塞斯知道,为了坚持这些真理,他会使大多数同事的生活陷于困境。他也理解,为何他们之中敢于清楚说出这门学科中最基本的教训的人是如此少:他们大都要依靠政府的支持。反对他们的雇主或赞助者既不礼貌,又不明智。

如果谁敢质疑限制资本家和企业家的正当性,他就会被鄙视为某个有害的特殊利益集团的雇员,或者,至少也会受到沉默蔑视的对待。人们很容易掉进服务于“资本”的猜疑中。任何使用经济论证的人都不能逃脱这种猜疑。⁴⁸

549

真正的经济学家遭到排斥,于是,那些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获得(或希望获得)学术职位的人都热衷于避免任何冒犯权势集团的行为。如果他们试图冒险颠覆某些有权有势的社会集团,最保险的策略就是含蓄隐晦地陈述他们的发现。里夏德·施特里格勒的著作《应用工资理论》(*Angewandte Lohntheorie*, 1926)实际上肯定了工会不可能提高所有工人工资的古老洞见。米塞斯在此书中发现:“施特里格勒的所有表述遣词都非常小心,就像过去几个世纪的作者为了避免遭到质询和责难所用的方式一样。”⁴⁹

通过类似方式,越来越多的年轻经济学家开始把注意力转向抽象的技术性问题,这些研究不会包含任何不受雇主欢迎的政治含义。这有助于解释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和博弈论的成功。

米塞斯评论道,传统经济研究的这种倒退,部分源于对社会科学价值中立的错误解释。按照这种理解,所有针对实践政治的评论,由于处理的是政治问题,都不可能是科学的。这就是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和其他人坚持的观点。⁵⁰米塞斯对此并不认同。经济分析是合宜分析(suitability analysis),它检验一个提议的手段是否适于达到宣称的目标。这是一个事实问题,因此一定有一个科学的答案。⁵¹⁻⁵²如果经济学家因为一项政策无法达到它的支持者宣称可以达到的目标而否定这项政策,就可以求助于他们这门学科的权威。米塞斯指出,关于价值中立的错误观念可能导致年轻一代经济研究的贫瘠,他得出结论:

550

如果所有经济研究都遭拒绝,无法获得认可,我们就摧毁了经济学。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无数年轻的心灵将自己的时间耗费在那些并不适合他们天赋的研究上——如果不是处在现在的环境下,他们本会转向经济问题——因而无法对科学做出多少贡献。因为陷入了上述错误,他们错失了重大的科学任务。⁵³

米塞斯描述的情形,是经济科学获得新定义的开始,改变定义是为适合年轻人和有野心的人的需要,他们唯利是图,愿意将某些有利的错误提升至原理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米塞斯只是旁观者,因此,他还未像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看得那么清楚。1926年,米塞斯确实觉察到经济科学的更新换代会使文明遭受严重威胁——这门学科曾经以其公共政策的实践含义塑造了现代社会。经济学转向了囿于己见的技术学科,这一转型导致它在政治上变得毫无力量。基于虚构假设的纯粹“理论”没有科学有效的公共政策含义,因而也就无法威胁到既得利益,这个理论的拥护者也就不必惧怕报复。显然,这种状况正合大多数经济学同行之意,无论雇主还是雇员。但对科学、人类自由和经济进步,却无疑是一个灾难。

551

经济学的转型等于放弃了以往数代经济学家为这门学科赢得的尊敬。不过,即使那些拥护真正经济科学的人,也有可能由于他们的自我标榜,摧毁这门学科剩余的一点信誉。这些优秀的作家和演说家、畅销教材的作者宣称,在他们之前不存在经济学。罗伯特·利夫曼、弗朗茨·奥本海默和弗里德里希·冯·戈特利布·奥特里连菲尔德(Friedrich von Gottl-Ottlilienfeld)继承了卡尔·马克思的修辞策略;马克思觉得,通过轻视他的前辈和同时代人的努力,可以提高自己观点的尊贵地位。⁵⁴他们谴责过去所有关于经济规律的描述,由于这些作者的雄辩,他们的非难

552 获得了广泛的听众。⁵⁵一般读者几乎不可避免地得到这样的印象：经济科学的最高水平依赖于某个个别作者的工作。

不幸的是，由于这些引导，公众开始相信经济学中的所有事情都是不确定和有疑问的，而经济理论只是形形色色的学者个人意见的汇集。这些德语国家的作者创造了一幅令人兴奋的画面，从而成功掩盖了存在一种理论经济科学的事实——这门理论经济学尽管在细节上特别是在术语上有差异，但在所有科学友邻之间仍然享有盛誉。⁵⁶

如此一来，政府干预就不再受到审查。显然，如果从一开始就不存在诸如经济科学这样的东西，如果所有关于经济政策真正影响的想法都只不过是个人观点，那么因为这些观点而改变政策就是没有意义的了。

553 米塞斯不仅相信存在经济科学，而且尤其相信，它对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分析要比所有潮流变化和思想流派更加久远。换句话说，恰恰是在这个与它关系最密切的领域，即经济政策分析领域，经济学是最持久和最不可动摇的。在这个问题上，经济思想存在一条不曾中断的连续谱系。这条谱系从18世纪重农主义开始，经由古典经济学家和19世纪法国的自由放任学派，再经不同学派的边际革命，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米塞斯自己的工作。

米塞斯当然承认各个学派之间分歧很大，但他强调，这些分歧从未影响实践结论。在阐述政府干预对经济的影响时，这些学派之间并不存在重要的观点分歧。总体上说，经济学家在实践问题上是一致的。显著的意见分歧只存在于经济学家和那些根本否定存在经济学的人之间。

此处我们无须讨论冲突体系之间更深的认识论问题，也不需要考察对立体系的多样性。对于干预主义的研究只有两种，一方面是融合古典理论的现代经济学，另一方面是否定体系和理论的人，不论他们如何小心翼翼掩饰他们否定理论知识的可能性。对于这些分歧，我们的回答很简单：尽力创造一个比我们的理论更能令你满意的理论知识体系。然后我们可以重新讨论。

米塞斯以下面这段明白透彻的文字作总结：

然而，确定无疑的是，如果要从经济理论的角度为干预主义进行辩护，试

图说明它是有意义的,那么不管现在还是过去都是徒劳无功的。事实上,从任何角度看,它都是无意义的。不存在从经济学通往干预主义的道路。⁵⁷

* * *

到了21世纪之初,米塞斯对实践问题中经济思想的连续性的强调,以及他对“经济学家”的刻画似乎不再正确了。而原因不过是,他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注意到的转型,现在已经完成了。当代主流经济学完全将注意力集中在通过数学、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来为现实建模的纯粹技术问题。⁵⁸结果,当代的职业经济学家不再是米塞斯意义上的,也即不再是贯穿整个19世纪意义上的真正的经济学家。事实上,米塞斯和哈耶克(在后者否定了早期的新古典观点之后)的奥地利学派,是古典意义上唯一的20世纪经济思想流派。意味深长的是,许多年后,约翰·R·希克斯(John R. Hicks)这样谈到奥地利学派:

554

我是在他们的传统中写作;而随着我工作的进行,我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比它最初出现时更加宽广和深厚的传统。“奥地利学派”不是主流之外的一个特殊学派;他们就在主流之中,脱离主流的是其他学派。⁵⁹

不过事实证明,米塞斯对不同经济思想流派之间同质性的强调(关于一般而言的经济理论,以及特殊而言的政府干预主义分析),是有问题的。熟悉米塞斯工作的当代经济思想史家声称,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米塞斯和几乎所有其他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一样,并不清楚经济分析的门格尔方法与其他边际效用学派方法之间的巨大分歧。这些历史学家声称,正是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之辩促使米塞斯和哈耶克变得激进,刺激他们反思自身方法的独特性,并与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和里昂·瓦尔拉斯的追随者严格区分开来。⁶⁰

555

当然,米塞斯的普世主义(ecumenism)并不涉及经济理论的所有问题和所有分支。他试图传达的信息是,存在关于政策制定的经济科学(economic science relevant to policymaking)。他认为,这个断言的最好证据就是,存在所有经济学派一致同意的经济规律。卡尔·门格尔的弟子不赞成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但却支持他所写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几乎所有论点。⁶¹米塞斯强调这些共同观点,并非认为存有的分歧无关紧要,而是因为他试图说清这一事实:经济学的实践意义不仅仅是个人观点。干预主义是无效的。所有经济理论都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

自由主义

通过对干预主义的动态分析,米塞斯已经获得了有关人类社会所有可能的经济组织形式的完整图景。因此,发表他的首部长篇综合著作的时机已经成熟。他想为自由社会提供一个充分的辩护,不是基于美学和伦理的考量,而是将其奠基于坚实的经济科学之上。他将继续阐述自由概念在诸多领域的更深含义,如垄断与反托拉斯、国家、殖民主义、民主、对外贸易和外交政策等等。此书将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有著述的一个综合,是对《民族、国家与经济》和《社会主义》中相关的政治结论以及关于干预主义的最新著作的一个总结。米塞斯把所有这些主题纳入了一本仅有175页的小书,于1927年以《自由主义》(*Liberalismus*)为名出版。⁶²直到今天,它一直是最重要的政治自由主义宣言之一。它不是针对经济学家或更大范围的学者群体的讲演,它也不包含任何对社会科学的新贡献。倒不如说,它是一部关于经济学最新进展的阐述和应用的著作——一部为大众,为奥地利和德国公民乃至全世界所有公民的而写的著作。

557 这些“最新进展”大半是由米塞斯自己的研究构成的。《社会主义》已经出版五年,他的论文《干预主义》不久前刚刚发表。但米塞斯表述自己观点的语气,似乎这些观点就是自由主义“本身”的观点,而他这么做也并无不妥。他已经界定了最新进展。他对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的观点是不可反驳的,也确实推进了古典自由主义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工作。而且,米塞斯解释了这种古典自由主义关于产权、自由、和平、平等、政府、民主、社会主义、自由市场等的观点;这本书实质上就是为他自己的研究成果提供一个简洁的陈述,首次详细说明它们的政治含义。

通过强调两个基本事实,米塞斯开始了论证:第一,劳动分工比起孤立个人的工作具有更高的物质生产力;⁶³第二,除了少数苦行者,所有人都愿意自己的劳动具有更高而不是更低的生产力。这两个事实代表了一个共同基础,即使社会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也不会否认。那么问题在于,哪种分工方式最有效率?所有社会成员都会同意这是一个关键问题,而分歧之处在于哪个答案是正确的。自由主义者主张把劳动分工的所有事项都托付给个人决策,这些个人基于相互同意和对私人产权的承认来设计竞争性的合作方案。社会主义者则主张剥夺所有私人产权——或者至少在生产资料领域废止私有制,对他们来说,劳动分工应由中央计划组织,中央计划可以管理个人之间合作的所有方面。社会民主派和其他支持“第三条道路”的派系,则主张部分的剥夺以抑制他们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的过度发展。

按照米塞斯关于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的洞见,正确答案显而易见。社会主义不可能与资本主义一样有效率,因为它没有货币计算,因而缺乏必要的手段用以比较完全不同的产品以便做出选择。干预主义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它无法达到其支持者所宣称的目标,这也是马克思憎恶它的原因。⁶⁴它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稳定的经济秩序的基础,因为它有转向社会主义的倾向。既然所有其他方案都会浪费资源、破坏财富,无偏见的观察者因而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是唯一理性的、有效率的经济秩序。一个人可以喜欢或憎恶资本主义,可以在伦理上为它辩护或攻击它,但事实是,没有任何制度可以取代它。经济化和大规模劳动分工只有在以私人产权为基础的自由市场上才有可能,因而,自由市场就必然比其他任何社会制度更有生产力,也更能增进幸福(幸福毕竟是由物质资料增进的)。

558

因此,自由主义的首要目标是确保有效的劳动分工,而其政治纲领的基本要求是保护私有产权以便达到上述目标。所有其他要求都是次要的。例如,如果我们主张所有社会成员都有人身自由(反对奴役),这是基于以下事实,即自由人比奴隶工作得更好。因此,打破奴隶的枷锁不仅仅是所有其他公民的利益诉求,也符合奴隶主的利益。与之相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假定不是基于某些自然法的观念,按照后者,人是生而平等的。但对米塞斯来说,显然,人是生而不平等的。但他仍然坚持认为,人应当享有法律面前的平等。为什么?因为如果人们在法律面前不被平等对待——如果某些人拥有高于其他人的特权,那么人为的群体冲突便会发生,从而扰乱和平这一分工的基础。⁶⁵同样的理由也适用于民主。米塞斯重申了功效主义对民主的辩护,这个辩护最初是他在《社会主义》中提出的。在写给颇有影响的左翼自由主义(瑙曼主义)杂志《帮助》(*Die Hilfe*)的一位编辑埃克伦茨(Anton Erkelenz)的信中,米塞斯详细阐释了他的方法在20世纪20年代背景下的重要意义:

559

您有点遗憾地声称我“从原则上说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只是基于经济理由才是民主主义者。毫无疑问,政治原则只有从它们的社会后果的角度来看才有所谓好坏之分。如果一个人不能提供任何赞成民主的理由,仅仅宣称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利,他怎么能驳倒反对民主的人?而且,这样的立论难道不会让人在面对以下反对意见时感到很无力吗?这种反对意见认为,人类是极其多样的,因而,赋予好人和坏人以平等的权利,也是不合理的。年轻学子转而抵制民主,首先是因为支持民主的通常理由是完全错误的。⁶⁶

560 他还把同样的考虑用于法西斯主义的例子。他强调,法西斯主义的产生,是为了应对第三国际残酷无情的布尔什维克政党。从这个意义上讲,法西斯主义者用赤裸裸的武力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暴力,也无可厚非。除了武力本身,不存在其他解决武力的良药。但法西斯主义者的危险在于,他们盲目相信武力是万能的。和平和社会合作最终只能建立在思想王国的胜利之上。⁶⁷“法西斯主义仅是一种应对危机的权宜之计。过高估计它的危害将是一个致命的错误。”⁶⁸不幸的是,那个致命错误未能避免,人们没有吸取教训。法西斯主义的错误不在于容忍使用武力(所有社会都使用),而在于盲目崇拜武力。

561 对米塞斯而言,重要的教训在于,法西斯主义的错误不是因为它源于集体主义,而是因为它拒绝私人产权的社会功能。许多现代自由主义者仍然认为资本主义是个人主义的自然结果和反映,而社会主义——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来自集体主义。不管这个观点有何优点,米塞斯都不赞成。他强调说,劳动分工组织好坏的问题,与社会应该服务于个人的需要还是个人应该服务于社会的需要这个问题无关。⁶⁹既不存在个人主义科学,也不存在反对它的集体主义科学。对米塞斯来说,以下事实是很明显的:只有一种方法能够使社会运作,那就是对私人产权的相互尊重。因此,社会是否在某种意义上先于个人或者个人是否在某种意义上先于社会,这样的问题是离题的;而且,鉴于只有一类社会交往可以标上“合作”这个名称,这个社会合作体系为谁服务也是无关紧要的。

他的著作没有产生预想的结果。多年后,米塞斯在个人通信中写道,该书在“德国和奥地利都不成功,瑞典语译本也不能阻止走向计划经济的动力”。⁷⁰过了几年,希特勒掌权后,当局命令出版商销毁了所有剩余库存。⁷¹

注 释

1. Mises, *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Jena: Gustav Fischer, 1929; reprint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76); *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 Hans F. Sennholz, trans. (New York: Arlington House, 1977). 米塞斯非常重视这项研究,这可以从以下事实推测出来:在那几年,米塞斯几乎没有从事任何其他研究,甚至拒绝了撰写一本货币政策标准教材的邀约。参见米塞斯写给享有盛誉的《经济政策大纲》(*Grundriss der Wirtschaftspolitik*)丛书编辑的信,标注日期为1924年12月12日;Mises Archive 80: 57。米塞斯说他很忙,在他接受任何新的任务之前必须完成“一大堆计划”。

2. 颇有意思的是,米塞斯提出的国际贸易理论是对李嘉图模型而非约翰·斯图亚特·

穆勒理论的一般化。

3. Mises, "Vom Ziel der Handelspolitik,"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42, no. 2 (1916): 567, 570.

4. 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Vienna & Leipzig: Manz, 1919), pp. 57ff.

5. “但是，我实在不想把你排除在新版《政治科学手册》编写工作之外。你就不能写篇关于价格管制的词条吗？”维塞尔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22年4月1日；Mises Archive 74: 32。

6. Mises, "Preistaxen. I. Theorie,"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4th ed. (Jena: Gustav Fischer, 1925), vol. 6; reprinted as "Theorie der Preistaxen" in Mises, *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pp. 123–36; *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 pp. 139–51.

7. Mises, *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p. 125.

8. *Ibid.*, p. 123. 米塞斯赞同惠特利大主教 (Archbishop Whately) 的观点，把经济学称为“交换科学” (science of catallactics)，参见 Richard Whately,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olitical Economy*, 3rd ed. (London: Parker, [1832] 1847), p. 5。

9. Mises, *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p. 136; *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 p. 151.

10. Mises, *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p. 128; (英文) 译文出自本书作者。米塞斯区分了这些“真正的”价格管制和那些仅仅认可市场本来就会产生那些状态的管制。

11. *Ibid.*, p. 131; (英文) 译文来自本书作者。

12. 米塞斯对战时价格体系干预政策动态的描述，反映在格茨·布里夫斯为《政治科学手册》撰写的词条上：

战争经济价格同时也意味着奥地利的最高价格政策。这里的经验恰如德国所发生的：人为高价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因此无法引导它们进入最需要它们的那些贸易和消费渠道。特别是意大利参战及奥地利遭到封锁之后，原材料和商品的日益稀缺导致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沿着德国已经走过的道路继续堕落下去：政府征用、商品的中央定量配给和支出。(Götz Briefs, "Kriegswirtschaftslehre und Kriegswirtschaftspolitik,"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4th ed. [1923], vol. 5, p. 1017)

13. Mises, *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p. 133; *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 p. 31, 56ff.

14. 桑巴特出现之前，德国大学非常挑剔地接受了马克思的著作。在美国，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同样遇到学术圈子的保留意见，直到桑巴特之后大约四十五年，约瑟夫·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制》(*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42) 中对马克思做了通俗介绍，把他视为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15. Werner Sombart, *Der proletarische Sozialismus* ("Marxismus"), 10th ed., 2 vols. (Jena: Gustav Fischer, 1924).

16. 以下是米塞斯说过的关于桑巴特最为正面的评论：“他有很高的天赋，但他从未严肃地思考和工作过……不过，与他谈话还是要比与大多数教授更加引人入胜。至少他还不至于蠢。”Mises, *Erinnerungen* (Stuttgart: Gustav Fischer Verlag, 1978), p. 68; *Notes and Recollections* (Spring Mills, Penn.: Libertarian Press, 1978), p. 103。

17. Mises, "Antimarxismus,"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21 (1925) reprinted in Mises, *Kri-*

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pp. 91 – 122; translated as “Anti-Marxism,” in *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 pp. 107 – 38.

18. Mises, *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pp. 124f. ; *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 pp. 140f.

19. 凯恩斯确信,通过攻击和批评个人主义,他已经摧毁了自由放任主义。参见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End of Laissez-Faire* (London: Hogarth Press, 1926), pp. 39f. 凯恩斯对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二分法的假定,使他预见到了现在闻名于世的关于社会组织最优规模的科斯观点。因此凯恩斯总结说,“控制单位和社会组织的理想规模大致介于个人和现代国家之间的某个地方”(ibid., p. 41)。科斯理论的最佳表述,参见 Ronald Coase,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20. Heinrich Dietzel, “Individualismus,”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4th ed. (1923), vol. 5; Alfred Pribram, *Die Entstehung der individualistischen Sozialphilosophie* (Leipzig: Hirschfeld, 1912); Othmar Spann, *Der Wahre Staat* (Leipzig: Quelle & Meyer, 1921)。

21. Mises, *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pp. 95f., 111. 他说:

在最后的分析中,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并无冲突,因为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比独自一人更加有效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个人为社会做出的牺牲只是暂时的,是为了更大利益而放弃较小利益。这就是常被引用的利益和谐学说的本质。(*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 pp. 112f.)

22. “社会是什么,来自何处,如何变迁——这些问题本身就是科学的社会学要研究的问题。” Mises, *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1)。

我们再来彻底澄清一下,米塞斯相信正面分析社会整体的产生和变化必须依赖方法论个人主义。基于这一分析,人们可以运用功效主义方法,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项给定的政策是否适于达到它的目标。奥特马·施潘不仅否定作为政治取向的个人主义,而且否定作为方法的个人主义。

23. Mises, *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p. 96; *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 p. 112.

24. Mises, *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p. 100; *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 p. 116. Mises quotes here Paul Barth,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als Soziologie*, 3rd ed. (Leipzig: Reiland, 1922), p. 260.

25. Mises, *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pp. 101f. ; *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 pp. 117f.

26. Keynes, *The End of Laissez-Faire*, pp. 42f.

27. Mises, *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p. 121; *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 p. 137.

28. 参见 Ralph Raico, *Die Partei der Freiheit* (Stuttgart: Lucius & Lucius, 1999), chap. 6。

29. Mises, “Sozialliberalismus,”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81 (1926); reprinted in Mises, *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pp. 55 – 90; translated as “Social Liberalism,” in *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 pp. 71 – 106.

30. 正如 Raico, *Die Partei der Freiheit*, chap. 6 解释的,瑞曼启发了战后几个常常相互冲突的社会运动。

31. 霍布豪斯(1864—1929)是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位社会学教授,以其著作《自由主义》闻名于世(*Liberalism*,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911)。关于约翰·杜威的作品,特别参见 *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 (New York: Putnam, 1935)。

32. 这一混淆的极端例子是凯恩斯,他不仅认为政治涉及人们追求的目标,也涉及对待这些目标的情感态度。因此,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曾经]在于:资本主义经济机制的主要动力来自个人的生财(money-making)和拜金(money-loving)的强烈欲望”(Keynes, *The End of Laissez-Faire*, p. 50)。

33. Mises, *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pp. 67f.; *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 p. 84. 类似地,他说:

事实上,对于生产资料的控制本身就会带来不劳而获的收入。反对不劳而获就必须反对生产资料的私有产权。因此,自由主义无法同情这些努力。如果他还是要这么做,他就不是自由主义者。(*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p. 65; *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 p. 81)

34. Mises, *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p. 68; *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 p. 84.

35. 参见 Ayn Rand, *Capitalism: The Unknown Ideal* (New York: Penguin, 1967)。

36. Mises, *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p. 70; *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 p. 86.

37. 米塞斯本人曾在一篇早期文章中解释了,工会可以在短期内提高所有工人的工资;参见 Mises, “Die all-gemeine Teuerung im Lichte der theoretischen nationalökonomie,”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Sozialpolitik* 37 (1912): 570f. 他在 20 世纪 20 年代关于干预主义的研究使他确信,这种短期提升必定导致资本消耗的代价。

38. Mises, *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p. 80; *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 p. 96.

39. Mises, *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p. 90; *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 p. 106.

40. 参见 his letter to Brodnitz, editor of the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dated February 26, 1926; Mises Archive 80:20。

41. Mises, “Interventionismus,”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Sozialpolitik* 56 (1926); reprinted in *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translated as “Interventionism,” in *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 pp. 15–55.

42. Mises, *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p. 6; *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 p. 20.

43. 参见米塞斯在 1927 年 11 月 16 日的大学演讲; Mises Archive 24: 6。

44. 米塞斯用“无政府主义”这个术语表示没有产权保护的蒲鲁东式社会思想,而用“无政府状态”指称在他看来这样一个社会必然带来的混乱状态。这时他想到的还不是后来的学生默里·罗斯巴德的无政府主义。后者用了同一个词,鼓吹没有现代国家的自由市场社会——在这个体制中,甚至私有产权的保护也是私人提供的。参见 Murray N. Rothbard, *For a New Liberty*, 2nd ed. (San Francisco: Fox & Wilkes, 1978); idem, *The Ethics of Liberty*, 2nd ed.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8)。

45. Mises, *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p. 4; *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 p. 18.

46. 关于经济学界观点的改变,参见 Thomas DiLorenzo and Jack High, “Antitrust and Competition, Historically Considered,” *Economic Inquiry* (July 1988)。作者指出,1920 年期

间,新兴的新古典主义运动日益放弃了为现实世界建模的想法,开始赞成将现实世界挤入理论模型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Procrustean bed)。另见 Frank Machovec, *Perfect Competi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s* (London: Routledge, 1995)。

47. Mises, *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p. 20; *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 p. 34.

48. Mises, *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p. 17; *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 p. 31.

49. Mises, *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p. 39; *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 p. 53.

50. 参见 Friedrich von Wieser, “Karl Menger,” Anton Bettelheim, ed., *Neue österreichische Biographie; 1815 – 1918* (Vienna, 1923), vol. 1, pp. 84 – 92, reprinted in idem, *Gesammelte Abhandlungen*, F. A. Hayek, ed. (Tübingen: Mohr, 1929)。

51. 经济学家的个人价值与这里的问题无关。米塞斯通过以下例子阐述了这一点：

当我说价格管制是不合理的,我的意思是它们无法达到它们本来想要达到的目标。现在共产主义者可以回答说:“我赞成价格管制,只是因为它们阻止了市场机制的平稳运行,它们使得人类社会变成一个‘无意义的混乱’,以便更快进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那么,价格管制理论没有什么可说的,正如生理学也无法回答一个想要利用氢氰酸杀人的人一样。(*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p. 27; *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 p. 41)

52. 经济分析显示,一切政府干预对于达到它们意图达到的目标来说,都是无效的(关于事实问题的陈述)。按照这个结论,古典自由主义认为不应实行干预政策(价值判断):

政府应该限于保护私人产权,消除自由市场对于个人或团体的一切障碍。这只不过是以下原则的另一种表述:自由放任,无为而治。(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 (Mises, *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pp. 37f. ; *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 pp. 51f.)

53. Mises, *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p. 28; *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 p. 41.

54. 参见 Robert Liefmann, *Allgemeine Volkswirtschaftslehre* (Leipzig: Teubner, 1924); Franz Oppenheimer, *Theorie der reinen und politischen Ökonomie*, 2nd ed. (Berlin: Reimer, 1911); Friedrich von Gottl-Ottlilienfeld, *Wirtschaft und Technik*, 2nd ed. (Tübingen: Mohr, 1923)。

55. 当然,利夫曼并不打算搞臭经济科学。米塞斯的意思是,这种影响是利夫曼修辞的无心之失。不过,凯恩斯的情况完全不同,他是有意识地试图破坏经济科学的名誉,以便维护政府的干预主义。凯恩斯声称自由放任主义没有科学基础,而是完全建立在政治哲学的几个假设(作为自然权利的私人产权)和神学(利益的和谐)基础上的。参见 Keynes, *The End of Laissez-Faire*, pp. 11, 26。米塞斯没有引述凯恩斯的话,但他指出这些说法错失了关键之处。私有财产并不需要自然法的辩护,而只需要合宜分析的支持。此外,利益和谐学说的神学外衣,也只是外衣而已。在《反马克思主义》中,米塞斯已经证明“对‘预定和谐’思想的攻击并未触及问题的实质,因为它只是功效主义社会理论的重新表述而已”。 *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p. 98; *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 p. 114。

56. Mises, *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pp. 29f. ; *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 pp. 43f.

57. Mises, *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p. 41; *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 p. 55.

58. 这些模型与它们宣称刻画的真实世界之间的关系,直到现在仍是一个疑问,而且从一开始就是如此。

59. John R. Hicks, *Capital and Time: A Neo-Austrian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3), p. 12.

60. 特别参见 Israel Kirzner,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New York: Macmillan, 1986); idem, “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 Lessons for Austrians,”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2 (1987)。

61. 米塞斯后来提到政治经济学“是好几代英国思想家的成就,它在休谟和亚当·斯密那里获得了出色的表述,而在李嘉图那里臻于完美,它是启蒙哲学的最为精美的成果”。至于古典自由贸易理论和保护主义,他评论说:“批评家们没有展开以下这个(无望的)任务:发现李嘉图推理过程中的某些错误的三段论。” Mises, *The Historical Setting of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69] 1984), pp. 20, 23.

62. Mises, *Liberalismus* (Jena: Gustav Fischer, 1927; reprint Sankt Augustin: Academia Verlag, 1993)。

63. 对于这个观点核心内容的强调,在西方思想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3世纪圣托马斯·阿奎那关于政府本质的讨论。参见 Thomas Aquinas, “Über die Herrschaft der Fürsten,” F. Schreyvogel, ed., *Staatslehre des Thomas von Aquino* (Jena: Gustav Fischer, 1923), part 1, chap. 1, pp. 11f. 米塞斯极有可能非常熟悉这个版本的圣托马斯经典著作,因为此书收入了奥特马·施潘主编的一套丛书。

64. 米塞斯分析了马克思关于干预主义的观点,参见 Mises, “Marxism and the Labor Movement,” *Omnipotent Government*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4), chap. 7, sect. 2。

65. 此处米塞斯再次支持了本质上与圣托马斯相同的观点,后者强调维护和平是政府的最高目标,这是因为,如果没有和平我们就无法获得劳动分工的果实。参见 Thomas Aquinas, “Über die Herrschaft der Fürsten,” part 1, chap. 2, p. 19。

66. 米塞斯致埃克伦茨,没有标注日期; Mises Archive 56: 6ff. 他在1942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了同样的看法,演讲题目是“平等原则与社会秩序”。他区分了18世纪的两股思潮:强调生而平等的自然法学说,以及“更加现实的”功效主义观点:“人与人是不同的,但是法律不能区别对待。”参见他的讲稿注释的两个版本,藏于 Grove City Archive: Mexico 1942 file 3。

67. 他颇有远见地指出:

法西斯主义在一些国家的胜利仅仅是围绕财产问题的一系列长期斗争中的一个插曲。下一个插曲将是共产主义的胜利。但是,最终决定斗争胜负的不是武器,而是人的观念。观念可以将人们组织起来,告诉他们应该用手中的武器向谁开火,为谁而战。(Mises, *Liberalism: In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Ralph Raico, trans. [Irvington-on-Hudson, N. Y.: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1985], p. 51)

68. 这句话的前面还有以下这段(常常遭到断章取义的引用),以便“证明”米塞斯支持法西斯的荒谬言论:

不可否认的是,试图建立独裁统治的法西斯主义以及类似运动完全是出于一种最美好的愿望,它们的介入,目前来说已经拯救了欧洲的文明。法西斯主义在这方面所做

的贡献将永远载入史册。但是,它的政策虽然带来了暂时的救助,却并不能保证持续的胜利。(ibid., p. 51)

69. Ibid., p. 60.

70. Mises to Faustino Ballvé, letter dated October 29, 1949; Grove City Archive; Ballvé files.

71. 古斯塔夫·菲舍尔致皮埃尔·阿米吕斯(Pierre Hamilius),信件标注日期为1950年12月8日和1951年11月14日;Grove City Archive; Hamilius files。1959年9月初,阿米吕斯和米塞斯一起参加了纽约的一次会议,随后他把这些信寄给了米塞斯。

1923年见证了奥地利和德国政治范式的转变。在此之前,社会主义曾是几乎无可争议的理想,而通货膨胀也是无可置疑的经济政策工具。1923年后,多数中欧知识分子对前者的幻想已经破灭,并坦率地反对后者。政策辩论不仅转变了话题,它们已经改变了倾向。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们认识到了依靠政府提高社会福利是有问题的。年轻一代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学会了比老一代学者更具批判性地思考政府干预主义和社会主义计划。这场迅速成长的反国家主义(antistatist)运动,由于1933年初希特勒上台,在还是少数派的时候就夭折了,但直到最后,它都是一场蓬勃发展的运动。毫无疑问,其倡导者正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²

1926年还给米塞斯的好运带来了另外一项改善。他开始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合作,并创办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研究所为一些年轻的政治盟友(最著名的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提供了以经济研究为生的机会。以后几年,米塞斯还参与了各种欧洲自由贸易组织,并以国际商会为平台拓展人际关系、推进古典自由主义政策。但是,由于他的主要著作没有一本译成法文或英文,因此,他的影响主要限于德国和奥地利。1929年至1932年可以算是第一次米塞斯革命,在这期间,米塞斯成了社会政策协会的委员,所有重要的经济学教科书都讨论了他的著作,而且越来越多的年轻经济学家开始在研究中继续讨论米塞斯提出的课题。

566

正是在这些年,米塞斯写了一系列划时代的关于价值理论和经济学认识论问题的文章,从而完成了他的思想体系——至少是这个思想体系的概要。如果不是因为希特勒的兴起,这场静悄悄的革命本来会对德语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但事实上,这些思想却不得不等到另一个时间与地点——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才成为第二次米塞斯革命的基础。

567

1926年之行

1926年国际商会代表大会在美国召开,这是米塞斯第一次穿越大西洋。他经

过伦敦,在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历史上的关键时刻见到了坎南和罗宾斯。莱昂内尔·罗宾斯已于上个秋季从牛津回到了伦敦经济学院,他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持续兴趣,尤其是对米塞斯的工作的兴趣,将是未来一年的头等大事。

不过,埃德温·坎南没有给米塞斯带来什么好消息。他就要退休了,伦敦经济学院管理层打算聘请哈佛大学的阿林·杨格(Allyn Young)教授接替他的职位。杨格以其顽固的实证主义知名,人们期待他使经济系成为经济学转型——从经济科学转向应用数学——的一个重镇。这曾是该校社会主义创立者和纽约的劳拉·斯佩尔曼纪念基金(Laura Spelman Memorial)筹划已久的计划,后者捐给伦敦经济学院大笔款项用于研究经济学的“自然基础”。³⁻⁴当米塞斯驶



1926年的米塞斯

568

向纽约时,一定看到了伦敦上空的乌云。然而最终,两件大事放慢了伦敦经济学院转变的步伐:杨格于1929年意外去世,莱昂内尔·罗宾斯转向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米塞斯在美国待了大概两个月。⁵除了参加国际商会的会议,他还出现在各种公共场合,至少其中部分活动是为了吸引美国投资者到奥地利。由于米塞斯和其他人的公关活动,到他访问美国的时候,奥地利在美国享有很好的声誉。他一定非常满意地注意到,美国商务部的通告是这样写的:奥地利

在1925年大体上维持了1924年的进展,根据奥地利国家银行董事会年度报告,在几个方面取得了可观的进步,特别是在财政、货币和信用问题上。⁶

569

在纽约市,米塞斯还会见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管理层,似乎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时机了,就在米塞斯回到维也纳后不久,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逝世,米塞斯成了基金会在维也纳经济学家的主要联系人。⁷后来他回忆说,洛克菲勒基金会已经“对我的教学与研究工有了一定兴趣”。⁸在奥地利,米塞斯对选择未来的洛克菲勒奖学金获得者有着决定性影响。迁居日内瓦时,基金会还支付他在高级国际关系学院(Graduat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薪水,他最终迁往美国后,基金会支付的薪水仍然构成了他最初四年收入的最大份额。

米塞斯在纽约结识的朋友使他的整个旅途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学界听众的

反应却必定是令人失望的。美国的大学显然缺乏理论工作的兴趣,而且过分夸大实证研究的前景,尤其是统计研究。

米塞斯参加国际商会的会议时已经发现,越来越多的美国代表支持干预主义观点。在美国的见闻,证实了他关于美国正在抛弃自由主义的印象。回到维也纳后,他在几次讲演中总结了他的观感,特别是一次关于“美国经济政策的转变”的演讲,这是他在1926年11月为工业家俱乐部(*Industrieller Klub*)的奥地利顶级企业家小圈子做的。12月,他向更多的听众发表了一个演讲,这次的主题没有那么敏感,题为“美国与欧洲经济的重建”。⁹

570

在回欧洲的船上,米塞斯读了《社会自由主义》的校样,同时,他也计划撰写一篇关于干预主义的更长的论文,这篇论文最终于10月份在鹿特丹的一次会议上提交。¹⁰⁻¹¹不过,动身前往荷兰之前,他参加了两个会议: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柏林大学的演讲和社会政策协会在维也纳举办的1926年全体大会。

1926年9月初的某个时候,米塞斯去了一趟柏林。¹²凯恩斯的演讲是以他的著作《自由放任的终结》(*The End of Laissez-Faire*)为基础的,此书出版于两个月前。20年代中期,凯恩斯在德国就已经享有盛誉,他是最早批评《凡尔赛和约》的西方知识分子之一。在他看来,《凡尔赛和约》就是一部狭隘的复仇宣言,而且是不可能贯彻实施的。¹³在那之后,他的著作就被迅速译为德文,还有一些德国经济学家在剑桥参加了他的课程。米塞斯后来回忆说,凯恩斯本人深受讲坛社会主义的影响,但他最终“在许多方面超越了他们”。¹⁴凯恩斯的新书可能使德国公众更加喜爱他,特别是他的德国同僚——他们相信自由存在许多缺点,而对这些缺点的批评,已经成了他们的一个传统。¹⁵

5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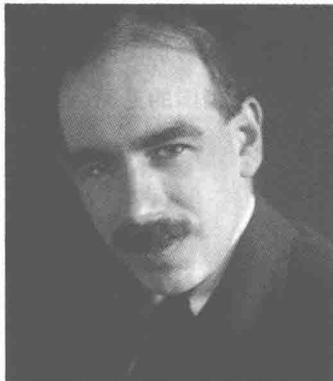
《自由放任的终结》读起来像是对反自由主义观点的一个拙劣模仿。例如,凯恩斯列举了几条真实世界的经济不符合“完全竞争”模型的特征,然后声称,这些都是自由放任的问题,而不是完全竞争概念本身的问题。¹⁶此书已经预示了他在十年后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将会详加阐释的观点。他辩解说,许多“我们时代的巨大罪恶都是风险、不确定和无知的结果”,就好像这些可以被社会主义或干预主义消除一样。凯恩斯好像没有意识到,他对“当代”社会问题的解释是多么荒谬。

572

为了处理人类生存的普遍问题,凯恩斯鼓吹以下政策:(1)“由一个中央机构审慎地控制货币与信用”;(2)“大规模搜集和传播与商业状况相关的数据,包括全面公开所有有用的商业事实,如果必要,就以法律的形式”;(3)全面控制储蓄与投资;(4)控制人口。按照凯恩斯的观点,最后一条要求政府致力于控制人口的数量

和质量——就像养殖户控制牲畜一样。¹⁷

米塞斯对凯恩斯这套反对自由放任的观点完全不以为然。正如他后来就此事所做的评论,凯恩斯此书在思想上是微不足道的。凯恩斯不过是重述了许多过去曾经提出又被反驳的论据。¹⁸让凯恩斯变得重要的是他的个性和他在剑桥大学的身份带来的威望。他对《凡尔赛和约》的批评更是提高了他的威望,为他赢得了作为公正的观察家的国际声誉。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573

米塞斯回到维也纳时,里夏德·许勒尔由于对德国和奥地利失业率上升原因的解釋而在社会政策协会引起公愤。¹⁹他论证说,长期失业源于工会和企业家同时加强了各自的政治权力。有组织的劳工和有组织的资本已经侵蚀了市场的自愈过程,因为市场自愈涉及工资和价格的下降。²⁰这一陈述冒犯了许多与会的经济学家,不过,提出这种论点本身不再是禁忌。虽然协会动作缓慢,但它正在走向自由市场激进派的方向。这种思想转变体现在过去备受冷落的学者例如米塞斯的社会地位的提高。即使左翼成员,例如基尔的阿道夫·勒韦(Adolf Löwe),现在也与维也纳支持自由放任的学者保持了友好关系。²¹

商业周期研究所

574

1926年美国之行,哈佛大学的经济周期实证研究给米塞斯留下了深刻印象。更准确地说,他对月度报告的商业成功很感兴趣。订阅一年的价格大约为100美元,在当时是一笔小小的财富了。²²许多年后,推销那些报告的销售团队成员之一弗雷德里克·尼迈耶(Frederick Nymeyer)成了忠实的米塞斯主义者,并创办了自由至上主义出版社(Libertarian Press),一家致力于传播米塞斯著作的出版社。1926年米塞斯还没有见过尼迈耶,不过哈佛之行启发了他在奥地利创办类似研究所的设想。他的想法是利用销售研究报告所得,资助年轻一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几乎没有机会取得公立大学稀缺的教职。

维也纳拥有一个活的学术传统,一直吸引着大量优秀学子。但是,奥地利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财政窘境使它无法发挥这一潜力;而且,私人力量也因20世纪20年代的通货膨胀消耗殆尽——无论之前曾经发挥过多大作用。如此一来,

学术职位更加稀少。学生的录取和研究项目的资助日渐受党派左右。大学普遍政治化了,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如此。

在这个背景下,创办私立研究机构,通过销售研究成果获得资金而不依靠国家资助,就成了一个颇有吸引力的选择。米塞斯做了充分的准备,考察了国外类似研究机构的运作方式和组织结构,并咨询了世界各地的专家。事实上,他不是第一个想到要这样做的人。国际联盟多年来一直鼓励美国和欧洲建立商业周期研究机构。²³继哈佛大学(1919)、NBER(米切尔于1921年创办)和伦敦(1922)后,这股浪潮也到达了德国的柏林、汉堡、基尔和埃森(都在1925年)。同年,一群商人和学者建立了私立的经济协会(*Konjunktur-Gesellschaft*),作为法兰克福商会的分支机构,继而又成为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的附属机构。协会主席是欧根·阿尔特舒尔(Eugen Altschul),他亲自传授年轻经济学家统计学知识和其他英美商业周期研究常用的方法。类似地,几年后,保罗·拉扎斯菲尔德身边的一些年轻人也将在维也纳建立私立的消费研究所,米塞斯担任了这个研究所的理事。

575

1926年秋,米塞斯为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下文简称“研究所”)的成立作了最后的准备。²⁴理事会(*Kuratorium*)的构成反映了米塞斯的学术人脉,同时,至少在名义上也包含了所有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米塞斯把汉斯·迈尔和卡尔·普里布拉姆也拉进了自己的学术阵线,资金来源是米塞斯在维也纳银行家和实业家圈子的一些朋友,例如维克托·格雷茨、海伦妮·利泽尔和古斯塔夫·魏斯-韦伦施泰因。同时,他还得到了商会同事的支持,例如奥托·盖林格(Otto Geiringer)和埃米尔·佩雷尔斯,以及商会本身的支持,它为研究所提供了办公空间。其他理事席位留给了一些公共行政部门的代表,例如劳工会议(Chamber of Labor)、国家银行(*Nationalbank*)和联邦铁路。理事会主席是里夏德·赖施。米塞斯本人是两位副主席之一,实际上他是新机构幕后的主要推动者。

研究所下设一个执行委员会,由一位商会代表负责。不过,日常工作另有一位主管,头衔是所长(Director)。米塞斯设法安排哈耶克担任这一职务。起初,他最重要的工作是确保研究所主要产品《奥地利商业状况月度报告》(the monthly reports on Austrian business conditions)的出版。这些报告借鉴了哈佛经济研究委员会的三曲线经济晴雨表。哈耶克本人撰写了第一份报告,这份报告篇幅很长,包含了他们研究活动采用的各种定义和定量方法的详细描述。几年下来,哈耶克越来越多地采用其他人提供的稿件。到1931年,研究所的月度报告发行量已经达到了500份。²⁵当年秋季,哈耶克离开维也纳,成了伦敦的经济学教授,摩根斯特恩则接替他承担了研究所的领导职务。

576

除了月度报告,研究所还组织学术会议和讲座,同时,研究所也是理论经济学前沿研究的焦点。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研究所还出版了一套关于商业周期理论的丛书,这也成了年轻一代奥地利经济学家发表自己成果的自然出路。²⁶

577 这是米塞斯创办过的唯一一个研究机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研究所是私立机构,这就保证了最大限度的政治独立。多年后,一位研究所的所长承认,这家机构的私立性质是它在奥地利政坛上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基础。他还提到,在那些困难时期,正是米塞斯的就职演讲(其中提到了独立的问题)给他带来了力量和勇气。²⁷

面对金汇兑本位制袭击的奥地利政治

578 米塞斯创立研究所并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建立联系之时,正好遇上奥地利商业环境发生了根本转变。1922年10月签署的《日内瓦协议》和同时进行的货币改革已经消除了政府的财政危机,但却是以奥地利的主权为代价。通货膨胀仍在持续,只是速度已大大放缓,但是,失业人口却从1922年的49 000人飙升到了1925年的150 000人。红色维也纳和其他社会主义地方当局在外国贷款的帮助下日益壮大。商业也在扩张,尤其因为维也纳的金融和实业共同体已成功恢复了与前奥匈帝国其他地区战前原有的联系。战争对中欧地区社会组织造成的伤害似乎已经痊愈。稳步的增长开始影响奥地利人的心理。许多人现在相信,这个国家注定要充当东方和西方的中间角色。乐观主义和痴心妄想互相结合,把债务融资(debt-financed)的经济扩张推向了一个无法预料的未来。

这些幻想由于1925年金汇兑本位制的建立而告破灭。新的货币体系刺激了国际劳动分工,并促进所有参与这一体系的国家的快速增长。但也无情地暴露了这些国家干预主义政府的局限。²⁸国际竞争压低了价格,消费者虽然拍手称快,可是企业却发现,由于工会的力量和根深蒂固的经济管制,几乎不太可能削减成本来应对竞争压力。

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通货膨胀减弱了工会和管制造成的伤害,因为成本的上升正好与价格的上涨相对应。但是随着1925年国际金本位制的确立,销售价格开始趋于稳定,甚至有所下降,而劳动力成本并没有向下的弹性。奥地利的企业经营变得更加困难和令人沮丧。工业化的农场发现自己很难通过股东资本或债券募集新的资金。工会、地方政客和报纸开始督促银行填补这

个缺口。他们“必须履行经济责任”，挽救“困难时期陷入困境的企业”。²⁹

这就是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米塞斯关于货币问题和公共财政问题的著述和演讲的背景。研究所成立后不久，他就进行了一次受到广泛关注的公开讲话，主题是奥地利干预主义政策的后果。³⁰米塞斯指出，在金本位制下做了一年生意，现在是时候对奥地利经济政策的影响做出一个冷静的分析了。通货膨胀对商业会计的影响已经耗尽，新的基于黄金单位的资产负债表更加真实地反映了经济状况。此前的政策不仅对企业的收入征税，而且实际上还消耗了他们的资本。³¹

579

米塞斯要求立即削减税收负担和企业由政府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支付比例。他还呼吁公共企业的私有化，例如邮政储蓄事务所、铁路、邮电系统、林业部门、煤矿和钢铁公司。他指出，这些企业的亏损高达1.7亿先令，超过联邦政府1927年全年的财政赤字（1.35亿先令）。³²米塞斯说，这一灾难是以下两项完全错误的公共财政原则的必然后果：（1）财政开支优先，财政收入根据财政开支确定（量出为入）；（2）资本和私营企业的税收不会影响平民大众。

580

米塞斯建议私有化那些具有赤字倾向的公共企业，这无异于扇在国家主义者脸上的一个耳光，无论他们属于哪个党派。国家主义的主要堡垒是奥托·鲍尔的社会党，而他们喜欢的政治“说服”方式，就是武装暴动的公开威胁。不过，在米塞斯发表讲话几个月后，社会主义者和维也纳警方之间的一次摊牌使得这些威胁的可信度遭受了严重挫折。此事发生在一次颇有争议的法庭判决后，按照社会主义者的看法，这次判决是对政治右翼势力的偏袒。社会主义者试图在1927年7月15日星期五发动一场总罢工和游行示威。³³对政府来说，这几乎是明目张胆推翻政府的企图。人群聚集在司法部所在的宫殿前面，有人试图放火焚烧建筑，警方立即介入。甚至在军队到达之前，就有九十名示威者在随后的大屠杀中遇害。米塞斯在写给巴黎一位从前学生的私人信件中评论说：

周五的骚乱就像一场暴雨洗净了空气。社会民主党已经动用了一切力量，最后仍然失败了。街头战斗以警方的彻底胜利告终——所有军队都效忠于政府。

581

总罢工已经瓦解；因此，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只能取消这一行动。

事实证明，社会民主党长期以来用以胁迫政府和公众的那些威胁，远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危险。³⁴

总罢工的失败和随之而来的大屠杀也对米塞斯个人生活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影响,我们将在本章的结尾看到。

自由贸易、货币稳定和周期政策

米塞斯不愿参加任何有组织的政治运动。在1924年11月的一封信中,他谢绝了某个奥地利自由贸易组织的荣誉职位,声明“我不属于任何政治或经济—政治组织,这是一个原则问题”。³⁵此后几年,由于欧洲自由贸易运动的早期成功,他的这一态度发生了变化。不过,事实证明最初的畏惧是正确的,他的政治参与虽然热烈而引人注目,却是短命的。他在这场运动的许多国际友人身上,看到了政治计谋、裙带关系,还有其他一些可疑行为,这些行为是以损害自由贸易事业为代价的。米塞斯需要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离开这些政治活动。

582

机会很快来了。欧洲关税协会(*Europäischer Zoll-Verein*)是一个欧洲自由贸易组织,米塞斯曾在这里找到了奥地利人的舞台。这个协会的国际委员会发起了一场反对奥地利并入德意志帝国的运动(德奥合并问题)。不管是米塞斯还是他的奥地利同僚,都不愿意与这场辩论的任何一方发生关系,因此,米塞斯督促委员会脱离这场运动,而委员会忽略了他的要求,米塞斯就于1929年2月离开了这个组织。

官方自由贸易运动的理想破灭后,米塞斯又回到了观念的战场上。

* * *

在频繁参与欧洲关税协会活动的时候,米塞斯已经根据最新进展重写了货币理论,特别是考虑了金汇兑本位制的运作。

1928年2月,他发表了一篇面向普通公众的介绍现代货币史重大事件的文章。³⁶几周后,他又投入了另一项工作:完成一本关于货币稳定和旨在消灭商业周期的经济政策问题的专著。3月17日,他向古斯塔夫·菲舍尔提供了一份手稿。米塞斯强调,此时正是出版这样一本著作的时机,因为商业周期问题已经引起普遍的兴趣,同时也因为社会政策协会将在秋季召开的年会上讨论这些问题。³⁷菲舍尔表示赞同。5月22日,《货币稳定与周期政策》(*Monetary Stabilization and Cyclical Policy*)开始发往各个书店。³⁸

583

在这本书中,米塞斯对欧文·费雪关于货币改革的观点提出了系统批判,后者已在学院经济学家中赢得了广泛支持。费雪的观点说服了诸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古斯塔夫·卡塞尔这样的人支持类似的方案。根据费雪的看法,如金币和

银币这样的商品货币的缺陷在于未能提供固定不变的购买力标准,因此就给长期投资和延期支付合同带来了额外的风险。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用购买力稳定(这是以价格指数定义的)的通货取代金本位制。

米塞斯指出,货币购买力的稳定对于资本密集(capital-intensive)的生产方式来说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市场参与者在决定长期投资或签订合同时,会很好地预期货币购买力的变化。不仅如此,由于货币购买力的定义不可避免地依赖于任意的假定,因此,费雪的价格指数标准在本质上与流行的商品货币本位并无任何区别。价格指数可能相对某种特定的指数标准是稳定的,但是,没有一种价格指数能够满足所有市场参与者的需要。因此,任何单一的指数对于许多市场参与者来说在稳定购买力上必然失败。费雪的方案根本不能建立价值稳定的货币,而只是一种根本不会出现在自由市场上的价值转换。

按照米塞斯的观点,关键问题不是价值稳定而是分配问题。当然,金本位制确实无法产生稳定的购买力,但是,金本位制的优点在于它的分配效应不受政治干涉的影响。任何人为的通货例如纸币总是容易受到政治的操纵,因而导致资源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基于政治交易的力量,而非消费者的意愿。

584

费雪完全忽略了这个问题。就像所有支持价格稳定的人一样,他只关注价格水平的变化导致的再分配效应。但是正如米塞斯表明的,这个问题已经在市场上体现出来,并表现为毛利率中的“价格溢价”(price premiums)。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抵消“康蒂永效应”导致的再分配——新的货币总是在不同的时间流入不同的市场参与者手中。费雪的诊断没有触及这个问题,他的货币改革方案也忽略了这一点。

在这本书的第二部分,米塞斯提出了他的商业周期理论的一个修正版本。他区分了两类不同的通货膨胀:流通媒介(fiduciary media)的膨胀和正当货币的膨胀。米塞斯指出,商业周期的不断重现(recurrence)的本质完全是由流通媒介膨胀造成的。货币供给的增长或多或少是一次性的,它们可能造成错误投资,但是影响并不持久。相反,流通媒介却有不断重复试验的倾向,因为商人和政客相信增发流通媒介是降低利率的合适手段。³⁹根据这一解释,米塞斯补充了先前的商业周期分析——那时他关注的只是连接繁荣和破产的中间过程,而没有包含对于周期不断重现的解释。

585

米塞斯更加激进地赞扬了自由银行制度。在货币著作的第二版,他曾说过,未来的货币改革者应该更加慎重地重新考虑自由银行制度问题。现在,历史地看,流通媒介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只是因为国家卷入了银行体制。政府授予某些银行发行货币的垄断特权,还在部分准备金制崩溃时加以干预,保护这些银行。因此,部分

准备金制银行的危机扩散到了更大的范围,远远超过它们在一个自由银行体制下本来会达到的程度。1922年日内瓦会议后,(部分准备金制的)中央银行之间的合作得到了加强,并且已经成了金汇兑本位制下的标准做法。这些合作只会进一步加深问题的严重程度。

自由银行体制本可以缓和这些危机。但是米塞斯不相信我们能够克服政治的阻力,重新建立自由银行体制。他希望未来的货币政策制定者明智一些,留意他的商业周期理论的教义。⁴⁰

新的理论家们

586 米塞斯希望未来的货币政策更加明智,现在看来似乎有些天真,但在当时并非如此。1928年是米塞斯对德国货币思想的影响达到顶点的一年。在苏黎世召开的社会政策协会会议上,绝大多数稿件都致力于讨论他的著作。一位来自维也纳的与会者后来回忆说:“1928年,几乎所有教授和会员都很尊敬和仰慕米塞斯。”⁴¹还有件事也体现了他的影响:1928年5月,他的英国巡回演讲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米塞斯访问英国正好就在他的货币稳定著作即将出版之际。他的讲稿也已写好,主题是“私有产权与社会主义”,并向伦敦大学出版社提供了手稿用于出版。但出版社最终拒绝了,理由是手稿的篇幅太短。⁴²

尽管如此,1928年的巡回演讲仍然是维也纳—伦敦“奥地利轴心”(Austrian axis)黄金时代的亮点之一。米塞斯后来回忆说,他在20世纪20年代曾经加入英国皇家经济学会(British Royal Economic Society),因为学会当时还没有提出左翼的议题。“那个时候,莱昂内尔·罗宾斯和威廉·贝弗里奇爵士(现在是威廉勋爵)被人称为‘奥地利学派’,因为他们赞同我的观点。”⁴³

587 米塞斯英国巡回演讲几个月后,社会政策协会在苏黎世召开了年会。讨论的主题“商业周期研究的目标和方法”是在1926年维也纳会议上确定的。《货币与信用原理》第二版比1912年版本获得了更多正面评价,这一点当时就很清楚。战时通货膨胀的一般经验和战后的恶性通货膨胀使得米塞斯“商业周期是流信用(fiduciary credit)泛滥的后果”的想法较易得到普通大众的认同。接下来的几年,商业周期的货币解释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以至于到了1933年,米塞斯本人也已相信这一理论成了德国和奥地利的主导理论。⁴⁴

1928年苏黎世会议是这一进程的重要里程碑。为了筹备这次会议,协会的经



社会政策协会会议,1928年9月11日到13日在苏黎世大学召开。第三排和第四排:桑巴特、哈耶克、马克卢普、迈尔、施特里格尔、德真费尔德(Degenfeld)、米塞斯、施皮茨米勒、贝特尔海姆(Bettelheim)、于诺(Hunold)。上面两排:摩根斯特恩、沙姆斯、勒韦、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吕斯托(Rüstow)、迪策。

济理论小组委员会出版了一本关于商业周期理论的370页的册子,其中收入的论文绝大部分是年轻一代经济学家写的——他们已经放弃了历史主义,转向理论问题的研究。其中包括奥伊肯(Eucken)、哈耶克、哈恩、勒韦和库琴斯基(Kuczynski)。米塞斯本人积极参加会议讨论并总结说,当前讨论本身就是进步的证据,虽然尚未达成广泛的一致,也遗留了很多问题。仅仅十六年前,日耳曼人中讨论贸易周期货币理论的还只有他一个人。他感到骄傲的是,他的许多当时不被接受的思想,现在对于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已是老生常谈。如果与1903年的会议(二十五年前)相比,进步就更明显了,那是协会此前唯一一次讨论了经济危机问题。⁴⁵

588

几个月后,米塞斯当选为协会委员会的六位新成员之一。⁴⁶虽然他本人并不觉得这件事多么重要,但却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体现他在那个时期的学术地位了。他在1912年还是个异类,现在已经成了一位备受敬重的学术领袖。协会原有势力也许并不欣赏他,但很现实,承认他是协会内部日益增长的一场运动的代表人物。然而更重要的是,他的崛起说明理论研究重新得到尊重,而创办协会的那代学者是轻视理论的。

589

重新思考价值理论

年轻一代学生开始崛起并加入了理论家的行列,对米塞斯来说,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迹象。历史学派的魔力显然已经破灭。但是,一个新的危险在地平线上隐隐出现——坏理论。

对于其中一个重要领域,即价值理论,这一危险已经非常现实。卡尔·门格尔已经在这个领域应用了“精确方法”并取得了巨大成功;米塞斯本人则精炼了门格尔的分析,强调了价值与选择之间的关系。但这些著作对年轻一代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许多新的理论家相信,经济理论只适用于受到“经济因素”指引的人类行为——如果经济因素这个词有意义的话,必须也存在非经济因素。这样一来,似乎就预设了两种价值类型的存在:经济的与非经济的。

随着1923年卡尔·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修订第二版的出版,这个错误被强化了。此书长期绝版,而门格尔也从未授权出新的版本。新版的修订部分是在门格尔死后留下的手稿中找到的。其中最重要的是,门格尔引入了“真实财货”和“虚假财货”的区分,这一区分似乎确认了以下观念:经济科学仅仅处理一种特殊的价值类型,即可以用于经济计算的真正价值。

米塞斯至少在《货币与信用原理》时期曾确信,价值计算的概念是个空想。唯一的价值计算就是运用货币价格的计算。但在讨论社会主义计算问题的时候,他一定意识到了,他曾多么低估年轻一代心灵接受价值计算概念的程度。由于他的这一论证在表述上模棱两可,那些没有彻底熟悉米塞斯的价值理论的人,就不太可能注意到以下这个根本主张:没有价值计算,只有价格计算。⁴⁷ 20世纪20年代早期,几乎没人看清这些困难。米塞斯首次在维也纳国民经学会陈述他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理论时,面对的是在庞巴维克研讨班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但在以后几年,由于以下两个因素,能够使人们真正理解他的理论的环境更加快速地消失了。

第一,强调价值理论一直都是奥地利学派的招牌。门格尔主义价值理论是关于价值判断的理论,而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的价格理论却是基于效用概念,这个概念完全属于心理满足领域。庞巴维克死后,维塞尔彻底主导了奥地利的价值理论,他是奥地利经济学派中离门格尔主义最远的人。

第二,在德语国家,古斯塔夫·卡塞尔开始推广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的以下思想:价格理论不能没有价值理论。⁴⁸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米塞斯本

人曾间接地复兴了瓦尔拉斯全局均衡方法：他的反社会主义理论把支持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推到了全局均衡理论阵营，这可能是他们逃离价值问题 and 经济计算问题的唯一出路。 591

到 20 世纪 20 年代末，米塞斯已经不可能忽略价值和价格之间广为流传的混淆。一个重要例子是他在 1929—1930 年间与利奥波德·冯·维泽的通信，维泽是科隆大学的社会学家。维泽指出，意大利数理经济学家恩里科·巴罗内 (Enrico Barone) 已经表明经济学的全局均衡模型可以用于解决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问题。米塞斯回复说，巴罗内的整个证明都是基于一个站不住脚的假设：不同个体的主观价值可以还原到一个共同的因子。⁴⁹

此时，米塞斯已经承认问题部分出在自己之前写作上的含糊之处，因此他开始更正这些问题。于是，在《货币与信用原理》第二版中，他对价值理论的表述做了“去心理化”的处理，删去了容易引起误解的句子“作为一种感觉，价值无法度量；[然而]我们可以将它与类似的感觉进行比较”，而代之以“价值判断无法进行任何种类的度量”。⁵⁰虽然这个变化没有影响关于价值作为定量实体问题的实际分析，但却标志着一个有意识的转变：否定心理主义价值概念，转而认为价值是一种行为 (act) 而不是感觉 (feeling)。 592

他的下一步动作就要大胆得多。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米塞斯发表了一篇单纯只为批评他的学术先驱的文章。他不同意门格尔和庞巴维克的某些段落，这些段落导致了对他们的价值理论的“客观主义”解释。米塞斯批评门格尔的想象需要 (imaginary want) 概念的伦理含义，认为这个概念对于解释市场价格来说是不必要的；与此类似，他批评庞巴维克对经济动机和非经济动机之间的心理学区分也是不必要的。米塞斯强调，门格尔和庞巴维克提出的“现代理论的本质”，是承认人的行为来自选择，而选择总是与具体选择所涉及的特定数量财货的相对重要程度有关——也即“边际”数量。这里并没有心理学的用武之地：

对交换学 (catallactics) 来说，决定市场交换率的最终相关原因是这一事实：个人在交换行为中对一定量的财货 A 的偏好大于一定量的财货 B。他恰好这样而不是那样行为的可能理由……对市场价格的决定一点都不重要。⁵¹ 593

其他学科诸如心理学、生理学和文化史可能会试图确定促成某个选择的决定因素。经济科学仅仅考虑个人 (“主观的”) 价值本身，它“独立于所有心理学或伦理学的原因”。⁵²那么，为什么那么多经济学家试图分析这些因素？米塞斯解释说，

这个不幸的习惯源于经济思想史的一个意外。主观价值理论的发展正好遇到了心理学的一个发现,也就是“欲望饱和规律以及供给增加时单位边际效用递减规律”。⁵³

这篇文章(《关于主观价值理论基本问题的评论》)发表于1928年2月,此时距米塞斯最初提出社会主义计算问题已经超过八年。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社会政策协会决定在年会上讨论价值理论问题。米塞斯和阿图尔·施皮特霍夫(Arthur Spiethoff)受聘担任价值理论特刊的编辑,以便为这些讨论做准备,此书后来屡次推迟,最终在1932年秋于德累斯顿面世。⁵⁴

米塞斯为这本书写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描述了主观价值理论的发展,另一篇分析了主观价值理论批评者的心理动机。在第一篇里,米塞斯对价值理论进行了系统描述,根据这一描述,他解释了过去对价值理论的一些贡献。他再次强调了偏好行为,或人的选择,是“人的行为的基本要素”。⁵⁵不过他也首次阐明了价值与价格之间区分的更深含义。现在他看到了1920年社会主义计算论文的更加广泛的理论意义——它是通往一种一般经济计算理论的第一步也是决定性的一步,按照这种思路,经济学只是更为一般的人类行为理论的分支。20年代,米塞斯把这个学科称为“社会学”,但他最终决定把它称为“行为学”(praxeology)——行为的逻辑。

行为学处理人类所有行为背后的一般原理,而经济学则处理较窄的问题,即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下人类行为的规律。这一体制的典型特征是,它使一种指引行为的盈利计算成为可能。商人可以比较一种产品的预期货币价格和生产过程涉及的货币费用。他们还可以比较任何一种投资的预期利润和其他可选方案的预期利润。项目的选择将会保证资源的投入,并阻止其他项目获得融资,因而这个过程就可建立在可选方案基于通用数量单位的评估的基础上。⁵⁶简言之,商人的货币计算使他可以按照共同标准比较可选方案。因此,他就得以略过对于物理异质的财货状态的简易判断(summary judgments)。⁵⁷现在人们可以定义“收入”为“收益减去成本”,可以定义“储蓄”为“收入减去消费”,还可以提供资本、利润和亏损的准确而有意义的定义,如此等等。

因此,经济计算带来了其他社会组织体制中没有的现象。探讨这些现象是经济科学的任务。行为学处理一般人类选择(价值判断),而它的分支经济学处理那些可以基于定量经济计算的价值判断。

相比之下,其他经济学家相信经济计算在市场经济框架之外也是可能的。他们认定基于市场价格的计算只是经济计算的一种形式。不仅如此,他们还相信,社

会成员按照效用标准进行计算,原则上也是可能的,因为他们认为效用是可以计量的。因此,因为经济科学是计算行为的科学,所以它的一切要素如同边际价值理论一样拥有同样广泛的适用范围。诸如储蓄、消费、资本、利润、亏损和效率这些范畴,不仅是市场范畴,而且也是一般人类行为的范畴。

米塞斯 1931 年的价值理论论文突出了奥地利学派和新古典学派之间的方法差异。前者才是真正一般和现实主义的方法,可以用于所有个别的人类行为。它不只是探讨反映“理性”价值的“理性”选择,而是涉及一切选择和价值。相反,新兴的新古典主义选择分析并不适用于一切人类行为,而只涉及那些如果行为主体严格遵循效用计算的结果我们有可能观察到的行为。按照这个观点,经济科学并不处理人类行为本身,而只处理人类行为的某个方面——“正确的”行为或“逻辑的”行为。

这是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支持的立场。维塞尔在一篇罕见的讨论方法论的文章中鼓吹使用例如“经济人”这样的“理想化抽象”,这也算是前后一致。⁵⁸维尔弗雷多·帕累托也采取了同样的姿态,按照他的看法,理论社会科学主要处理“逻辑行为”而非一般人类行为。⁵⁹而且,虽然帕累托不像维塞尔那样强调效用计算这个核心概念,但他仍然明确宣称市场价格只是用于解决基本经济等式的有用的“辅助变量(auxiliary variables)”。这些等式在每个经济系统中都是一样的,它们不依赖于社会的政治结构,而它们的最终要素是个人的口味与障碍(成本)。⁶⁰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可以直接去掉,因为全局均衡联立方程可以产生中央计划机构的记账方式所需的任何“价格”。

597

即使社会主义国家废除了一切交换,并禁止一切买卖,在以下意义上价格也不会消失:至少就像与财货分配和转化有关的记账方式那样,价格仍然保留下来。⁶¹

米塞斯承认,奥地利学派价值理论可以解释任何一个有意识的行为——不管是否可以计算,因此,经济人的理论可以一般化为行为人的(*homo agens*)的理论。相反,其他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相信,虽然边际效用理论只能解释计算的(逻辑的、理性的)行为,它仍然是人类行为的“一般”理论,因为效用是决定所有人类行为的普遍因素。对于新古典学派来说,经济学仍然是经济人的理论,正如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一样,只是它的主角不再局限在市场上——经济人随处可见。

598

时至今日,这一区分仍然是米塞斯主义者和维塞尔-帕累托世系的著名学者

群体之间的分界线,后者包括加里·贝克(Gary Becker)及其掀起的运动。⁶²这也是为何米塞斯主义者在解释例如增长、垄断、福利、法律与经济的关系、货币、冲突等等问题时,明显不同于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家的原因。

价值理论问题和经济计算问题远比单独一章所能处理的更加重要,这应该是一本教科书的主题(如果曾经有过的话)。20世纪20年代晚期,米塞斯表明了这些问题处于社会科学的核心地带。40年代,他将提出一套经济计算理论,而那将是他在人类行为一般理论方面的主要大厦之一。

走向新的社会科学认识论

米塞斯对价值理论的科学含义和政治含义的反思,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更为一般的研究的一部分:将此前不同分支的研究融为一体,讨论它们的意义,填补其间的空隙。

其中一个领域就是认识论,而自由和私有财产在认识论上一直不是无懈可击的。门格尔和施莫勒之间著名的方法论之争并未带来必要的澄清。关键问题是,是否存在一门理论社会科学——或者,经济学家的科学修辞是否只是一种吹嘘。

在此前的著作中,米塞斯曾经遵循沃尔特·巴杰特(Walter Bagehot)的观点,指出社会理论对于解释观察获得的丰富资料是必不可少的。因而,社会分析首先需要一种理论,然后才能接近研究目标。⁶³他也批评了“经验主义”,因为经验主义者认为他们无需依赖理论就可解释观察到的外部世界。⁶⁴1926年,这些陈述只是作为记录存档。但是,基于事后的认识,我们知道这些看法预示了米塞斯今后三十五年间将要从事的一项新的研究的开始。他发现社会科学中最落后的一个领域是认识论——这是解释社会科学如何与现实相关的元理论(meta-theory)。

他在这个领域的第一个贡献,是一篇讨论“社会学”与“历史学”之间关系的文章。⁶⁵米塞斯在这篇文章中说,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方法论之争已将经济学课程逐出了德意志帝国的大学校园,但它并没有澄清下述这个核心问题:是否存在一门有权要求获得科学地位的社会理论。不过与此同时,另一条战线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威廉·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海因里希·李凯尔特、马克斯·韦伯和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的著作澄清了历史研究的认识论性质。⁶⁶这些学者的研究得出了以下两个重要洞见。

首先,自然科学方法论之应用于人类行为科学,并未穷尽历史学家的任务。历史研究的真正目的是解释处在影响行为的特殊环境下的具体人类行为。

其次,历史研究离不开理论工具。并不存在完全不受理论解释影响的历史研究这种东西。例如,仅仅对观察到的现象进行分类,诸如“他是国王”或“她是我的邻居”或“他们是德国人”之类,就不只是纯粹事实的描述。这些描述用到的语词事实上是一些理论工具。马克斯·韦伯曾经提出一种认识论,指出对于历史科学必不可少的理论工具的逻辑特征,他把这些工具称为“理想类型”(ideal types)。⁶⁷

601

基于这些洞见,米塞斯试图解释“社会学”(他用这个术语表示“关于社会现象的理论科学”⁶⁸)是历史学科所需的理论工具之一。他的长文很大篇幅是对马克斯·韦伯方法的批判性讨论。米塞斯强调了韦伯作为历史研究逻辑学家的功绩,但也着重指出,尽管韦伯在经济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他毕竟不是一位经济学家。在米塞斯看来,韦伯一点也不了解经济理论。他之所以享有理论家的盛誉,是因为他开辟了历史学科一种新的、非常一般的形式,米塞斯建议把它称为“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

韦伯死后出版的主要著作《经济与社会》收录的研究属于德国近几十年产生的最好的科学文献。但这本著作最重要的部分并不是我们所说的意义上的社会学理论;它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历史学。历史学研究一个具体城镇,或者德国城镇,或者中世纪的欧洲城镇。直到韦伯那时为止,历史学并不知道还有像他这本书中那一章如此精彩的东西,这一章干脆探讨一般的“城镇”,即所有时代和所有民族城镇聚居地的普遍理论,城镇本身的理想类型。⁶⁹

韦伯的研究虽然出色,却与普遍有效的科学如经济学无关。关键在于诸如一般城镇这样的理想类型是虚构的;它们并不适用于所有现象,甚至也不适用于任何现象,虽然它们设计出来是为描述这些现象。韦伯用了“理想”这个表述,正是在与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相同的意义上,也即虚构的假设。这些虚构污染了利用它们得到的科学和政治结论:“使用它们的命题必然是有类似缺陷的。”⁷⁰相反,经济规律涉及普遍存在的人类行为内在的因果关系。在任何一个例子中,只要原因给定,根据经济规律必然产生某种特定后果。米塞斯解释说:

602

社会学的规律既不是理想类型也不是平均类型。倒不如说,由于这门科学的目的在于认识每个个别的人类行为的本质的和必然特征,因此从这个角度,这些规律是从现象的充分性和多样性中挑出来的东西的表述。社会学概念的得出并不是“通过单方面强化一个或几个方面,通过把多重分散而不

连续的个别现象整合为一个内在统一的概念陈述；这些现象在有的地方多一些，在有的地方少一些，偶尔也根本没有，但它们与这些单方面强化了了的方面是一致的”。倒不如说，社会学的概念是以同样方式在它们涉及的每个个别事例中都可找到的特征的一般化。⁷¹

603 米塞斯指出，不管是历史的还是理论的社会分析，主题都是“人的行为”。要点在于，不是所有可观察的人类动作（behaviors）都可称为行为（action）。相反，人的行为是动作的一个特殊子集。行为是来自有意识的决断的动作，也就是说，受到稀缺约束的动作。“只有在存在稀缺的地方，才有行为；如果没有稀缺，也就没有行为。”米塞斯继续说：

一旦认识到这点，也就隐含地认识到，每个行为都涉及在各种可能性之间的选择。所有行为都是为了实现可得目的的可用手段的经济化。行为的基本规律是经济原理，每个行为都要受它支配。否认经济科学之可能的人，必然始于怀疑经济原理的普遍有效，即就其本质而言经济化的必要性是所有行动的特征。但是，只有那些完全误解了这种原理的人才会这样做。⁷²

但是，普遍有效的人类行为理论的认识论地位是什么？在1929年的论文里，米塞斯已经触及这个问题，他说，经济理论“在它使用理性方法的意义上，是理性主义的”。他又进而总结了这些理性方法的特征，即“推论理性”（discursive reasoning）和“科学理性”（scientific reasoning）。⁷³四年后，他才做出那个著名的论断，即理论社会科学是先验学科，其有效性并不依赖于感觉证据。

604 1929年关于“社会学与历史学”的论文，简单地讲，已经包含了米塞斯用于反驳极端历史主义主张的论据，这种极端历史主义认为，没有普遍有效的社会理论，因为人类心智的结构处于一种永恒变动的状态。米塞斯论证说，经验证据无法证实这一主张。不仅如此，他还指出这个历史主义的主张是自我否定的：

历史主义支持者没有看到的是，即使像这样的命题“古典经济学的定理对于构建这些定理的时代包含一定的真理”也只有在接受了超时空的、普遍正确的理论时才能确切地加以说明。⁷⁴

米塞斯也指出了另外一方的错误，他们认为社会理论的逻辑性质可以和自然

科学的理论完全相同。虽然人的行为的确严格取决于外部因素,但是,这一认知本身并不足以构建人的动作的数学模型。我们还应知道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人的选择,而我们并没有这些知识。米塞斯指出:

然而,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外部因素在人的心智中如何转化为反映并影响外部世界的思想和意志。我们只在事后(*post factum*)才能确定这点,而绝不能从表述为规律的已知的规则中提前演绎出它。⁷⁵

因此,社会科学家有必要以具体的人类行为作为分析起点,作为一个终极所予(*ultimate given*)。他不能指望以任何数量的数量精确性确定人的动作。经济学家的命题是在性质方面(*qualitatively*)的精确。 605

在这一论证中,米塞斯重述了过去他在货币理论领域的工作:

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重要性完全不同于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重要性。这是因为物理学能发现在经验上不变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用方程式表示出来。从而以物理学为基础的科学的工艺学就能以量的确定性解决一些给定的问题。工程师能够计算应该怎样建造桥梁,以便承受一定重量。在经济学中不能证明这些不变的关系。例如,货币数量论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货币数量的增加引起货币单位购买力下降,但是货币数量增加一倍不会使其购买力下降一半。货币数量与购买力之间的关系不是不变的。认为从有关某些商品供求关系的统计研究中可以得出适用于这种关系未来状况的定量结论是错误的。无论这种方式得到什么结论,它只具有历史意义,而像确定不同物体的特殊重力这种事情,却是普遍正确的。⁷⁶

个人的繁荣—萧条

606

米塞斯没有料到,同时也很高兴1927年7月15日总罢工的失败。但他并不奇怪民众在维也纳街头集会时发生的大屠杀。他最先想到的是警告玛吉特·谢雷尼这一危险。他提醒玛吉特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孩子们走出家门。然而,当天白天玛吉特还是出门了,于是,米塞斯给管家留下了详细的指示。⁷⁷

玛吉特当天傍晚才回,她为米塞斯如此关心她和孩子,深受感动。过去她很尊敬米塞斯,但他们在考夫曼寓所初次见面后的两年内,她并没有回报他的这种体

贴。红玫瑰和昂贵的香水无法征服她的心。她就是无法理解这个男人：

我们刚刚认识的最初一年，路对我几乎是个谜。过去我从未见过这么谦逊的人。他知道自己的价值，却从不自夸……我想，是他身上那种极其诚恳的情感强烈吸引了我。这种情感如此强烈，以至于他虽然写了数千页关于经济学和货币的著作，却不知道如何形容自己，或者解释自己的感觉。⁷⁸

幸运的是，有时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表达。1927年7月的那天，玛吉特似乎第一次感受到了对米塞斯的爱意，他的进攻对她来说变得更加容易接受了。这是他们友情的一段短暂“繁荣”的开始，但不到两个月，就结束于一次激烈的冲突。

607

那天晚上，米塞斯去看玛吉特，确认一切平安。由于电话线断了，他没法给玛吉特打电话。他带着玛吉特在环城大道走了一会，那里仍然能感受到白天的骚乱：外面只有男人，除她之外，没有一个女人。散完步后，他邀请她去参加舞会。她同意了，他知道这意味着很大的进展。过了些天，他第一次挽着她的手，出现在舞厅里。接下来的那个周末，他在维也纳的中央公园普拉特公园(Prater)的一个黑暗角落里第一次吻了她——据她后来回忆，就像一对中学情侣一样。几天后，她有事要去趟汉堡，他说他会向她求婚，但先要下定决心当她孩子的继父。他们告别时，计划8月底在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会合，那是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的度假胜地。

8月25日，玛吉特登上了慕尼黑开往贝希特斯加登的列车。米塞斯突然在中途的一站上了火车，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惊喜。他们在贝希特斯加登订了相邻的宾馆房间。为了保持体面，他称玛吉特为妹妹。如他所说，他们享受了一段美妙的婚姻培训之旅。两人谈了他们的结合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她可能无法满足他的愿望一起生个孩子；她不得不再次成为犹太人以取悦他的母亲；他的母亲不能参与婚礼的一切筹备工作，因为她会毁了一切，就像上次那样。⁷⁹

608

9月4日星期天，他们回到了维也纳，然而此时突然发生了一个命运攸关的转折。米塞斯毫无预兆地病倒了。回来之后的周二，他和玛吉特共进晚餐，周三他再去看她，却因发烧和剧烈头痛备受煎熬。由于这些原因，他不再谈论婚礼的事。他必须有个清醒的头脑才能宣布他一生最重要的决定。然而玛吉特觉得她已经等了很长时间，渐渐有些不耐烦了。她告诉他，自己一天也不能再等了，他必须马上决定。后来他写信给她提到此事：

“要么现在,要么永远也不!我不允许你拖延这个决定哪怕只是几个小时。”没有哪个热恋中的女人会说这话。你只要一句温言,就会让我感到快乐,并将永远把我羁绊在你的身边。但你没有。你对我不像一个恋人,倒像一个冷酷的敌人。

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失望。我本来希望在你身上找到真爱和善意,但却发现了冷酷,毫不妥协的冷酷。我本来已经克服了所有先前的恐惧,对此我没有丝毫隐瞒,因为我相信真爱要比我们相处的前路上的困难更为强大。⁸⁰

似乎一切都结束了。他们分手了,两人都宣称他们之间的问题是无法调和的。玛吉特甚至退回了她在汉堡的时候他写给她的情书。

第二天早上,玛吉特感到懊悔,于是写信给他,但他没有回复。她继续每天写信,一直没有回音,过了些天,终于接到了米塞斯打来的电话。米塞斯重申了此前周三说过的话。他们已经分手了,永远。

609

没过多久,米塞斯一定是发现了令他发烧的真正原因——一种罕见的外科急腹症,于是住院接受手术治疗。⁸¹玛吉特已经不再写信,不过她从米塞斯的远房表兄、她的已故丈夫的医生施特里佐沃那里得知了米塞斯的病情。她甚至为了他的康复而向上帝祈祷,后来她曾宣称自己一直是无神论者,但这次意外却表明事实也许并非如此。

最后玛吉特又开始给米塞斯写信,但仍然没有得到回复,于是她恳求医生阿德勒教授催促米塞斯回信彻底解释清楚他的态度为何如此顽固。由于这是来自一位同事的半正式请求,米塞斯觉得还是答应为好。他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直言不讳的回信,并强调说,他本来不想让她感到难堪。玛吉特退回了这封信,说她不值得他这么做。

1927年或1928年某个时候,米塞斯又开始给玛吉特打电话。但米塞斯并不说话。他只是让她接电话,听到她的声音,有时一天要打两次。后来的一天,他再次出现在她的公寓,没有任何解释,他们恢复了1927年9月中断的关系。她仍然等待他的求婚,但他仍然无法走出这一步。后来她写道:

我们结婚前,这段爱情一定曾是他生活中一个非常令人苦恼的因素——他是如此心烦意乱,以至于他觉得宁愿在喀尔巴阡山脉阿尔卑斯山投入一场战斗,却可能永远无法赢得现在这场反对自己的战斗。⁸²

610 最后,玛吉特再也忍受不了了。她离开维也纳到了伦敦,做了一段时间的翻译。直到他们在泰晤士河畔再次相遇,她才回到维也纳。

注 释

1. 这是伊默拉·戈格斯(Irmela Gorges)对当时三个主要社会科学组织的研究主题和方法取向所做的全面研究的核心发现,这三个社科组织是:社会政策协会、德国社会学学会(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Soziologie)和科隆社会科学研究所(Cologne Forschungsinstitut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参见 Gorges, *Sozialforsch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18 - 1933* (Frankfurt a. M.: Anton Hain, 1986), pp. 694 - 98。

2. 一位在 1928 年见过他的年轻人,后来回忆说:

正如埃德温·坎南在英国、弗兰克·H. 奈特(Frank H. Knight)在美国、路易吉·伊诺第(Luigi Einaudi)在意大利的地位一样,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是德语世界(奥地利、德国和瑞士)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复兴运动的开创者。(Albert Hunold, editorial of *The Mont Pèlerin Quarterly* 3, no. 3 [October 1961]: 3)

米塞斯在政策辩论方面的主导作用,乃是基于实证分析领域类似的领袖地位,这在 1925 年卢约·布伦塔诺《纪念文集》中可以看出,该书描述了一战之后经济学的最新进展。米塞斯侧身十三位引用次数最高的作者之列,其他作者包括庞巴维克、布伦塔诺、卡塞尔、奥伊伦堡(Eulenburg)、凯恩斯、马克思、J. S. 穆勒、李嘉图、熊彼特、桑巴特、施潘、瓦尔拉斯和维塞尔。参见 Moritz J. Bonn and Melchior Palyi, *Die Wirtschaftswissenschaft nach dem Kriege*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25)。

3. 参见 William H. Beveridge,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Its Problems, 1919 - 1937* (London: Allen & Unwin, 1960), esp. pp. 50, 83, 85, 88ff., 109。伦敦经济学院的创办者是西德尼和比阿特丽斯·韦布夫妇(Sidney and Beatrice Webb)。劳拉·斯佩尔曼纪念基金则以约翰·D. 洛克菲勒的妻子命名,后来并入了洛克菲勒基金。1923—1924 年,LSM 向伦敦经济学院捐赠了将近 100 000 美元;1926 年,它又捐赠了 500 000 美元用于研究经济学的“自然基础”,以及 175 000 美元用于其他项目。

4. 经济学可以转向应用数学或应用生物学的思想,是凯恩斯一段著名格言的极好例证:“每一代人都在‘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阴影下劳碌。”参见 John Maynard Keynes,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6] 1973), p. 383。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和他的追随者例如埃奇沃斯(Edgeworth)由于推进了经济学中数学的应用,在英国学术界影响很大。应用生物学方向的主要拥护者则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的麦加圣地坐落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动态分析。”(*Principles of Economics; An Introductory Volume*, 8th ed. [London: Macmillan, 1920], p. xiv) 凯恩斯完全清楚他在说什么。

5. 他在位于纽约的劳拉·斯佩尔曼纪念基金有一个邮箱。参见米塞斯致布洛德尼兹,

信件标注日期为1926年2月26日;Mises Archive 80: 20。

6. 参见商务部的报告,Mises Archive 57: 79;另见 Baker-Kellog 投资书(investment letter),标注日期为1926年4月24日;Mises Archive 57: 70。米塞斯显然是通过芝加哥的某位 W. W. 韦尔什(W. W. Welsh)先生得到这份投资书。

7. “庞巴维克和维塞尔死后……米塞斯显然成了这个学派的领袖”(Fritz Machlup, “Ludwig von Mises: The Academic Scholar Who Would Not Compromise,” *Wirtschaftspolitische Blätter* 28, no. 4 [1981]: 9)。另见 Werner Neudeck, “Der Einfluss von Ludwig von Mises auf die Österreichische akademische Tradition gestern und heute,” *ibid.*, p. 27。

8. 米塞斯致美国国务院,信件标注日期为1941年12月20日;Grove City Archive: Mexico 1942 files。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维也纳当地的协调专员是英国出生的阿尔弗雷德·弗朗西斯·普里布拉姆(Alfred Francis Pribram,他与卡尔和埃瓦尔德·普里布拉姆没有亲戚关系)。

9. 这次演讲是在捷克斯洛伐克为德意志工业联盟作的。参见米塞斯致《经济学杂志》(*Magazin der Wirtschaft*),信件标注日期为1926年12月20日;Mises Archive 80: 10。

10. Mises Archive 57: 65ff.; 83a。

11. 当年秋季,他可能还提交了这篇论文的另外一稿,进行了一个两小时的讲座,题目是“政府和国民经济”。这次是为留学维也纳的美国学生设计的夏季大学课程(国际大学课程)。参见米塞斯致玛尔塔·斯特凡妮·布劳恩,信件标注日期为1926年7月20日;Mises Archive 83: 59。

12. 米塞斯致布洛德尼兹,信件标注日期为1926年9月16日;Mises Archive 80: 5。

13.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Howe, 1920)。凯恩斯评估了德国遵守和约经济条款(战争赔偿)的能力,关于这一评估的根本错误的批评,参见 Henry Hazlitt, “The 1919 Prophecies of Maynard Keynes,”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March 11, 1945), p. 5; Etienne Mantoux, *The Carthaginian Peace or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r. Keyn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14. 米塞斯致蒙特斯·德奥卡(Montes de Oca),信件标注日期为1949年2月26日;Grove City Archive: Montes de Oca files。

15. 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在最后一本书中对凯恩斯的支持,可以看出凯恩斯受到了多么热烈的欢迎,其中提到凯恩斯以法令纸币取代金汇兑本位制的建议:

只有像凯恩斯那样视野开阔、思想敏锐的经济学家,才会提出是否可能以其他货币体系取代金本位制的问题,这一新的货币体系将以更低的代价维持稳定的兑换率。(Friedrich von Wieser, “Theorie des Geldes,”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4th ed. [Jena: Gustav Fischer, 1927], vol. 4, p. 716)

16. 按照凯恩斯的观点,这些问题的复杂性来自:

(1)如果有效的生产单位相对消费单位来说规模很大……(2)如果上头成本或联合成本是当前的;(3)如果内部经济倾向于生产集聚;(4)如果调整所需时间较长;(5)如果无知超过知识;(6)如果垄断和联合妨碍了交易的平等。(John Maynard Keynes, *The End of Laissez-Faire* [London: Hogarth Press, 1926], pp. 32f.)

17. Ibid., pp. 47f.

18. Mises, "Das Ende des Laissez-Faire, Ideen zur Verbindung von Privatund Gemeinwirtschaft" (The end of laissez-faire; ideas for combining the private and public economy),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82 (1927): 190–91. 显然,米塞斯把这篇评论发表前的副本寄给了伦敦的格雷戈里,参见 Mises Archive 83: 58。

19. 米塞斯可能出席了这次会议。不过根据传闻,一些“奥地利绅士”没有参加这次他们本该参加的会议,这让协会秘书弗朗茨·伯泽大为沮丧。米塞斯也有可能是其中之一。

20. Franz Boese, *Geschichte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1872–1932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39), pp. 194f.

21. 1926年社会政策协会维也纳会议结束后,米塞斯立即向阿道夫·勒韦推荐了斯蒂芬·茨威格,谋求基尔的一个职位。茨威格即将获得博士学位。米塞斯是在大学研讨班上认识他的。勒韦看重茨威格与米塞斯之间“令人愉快的关系”,最终录用了茨威格。参见勒韦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26年10月2日;Mises Archive 80: 17f。

22. 当时的100美元可以购买大约5盎司黄金,因此,放在今天(2006年2月)将超过2500美元。

23. 参见 Manfred Mautner and Franz Nemschak, *Zum 25 jährigen Bestand des Österreichischen Institutes für Wirtschaftsforschung* (Vienna: Österreichisches Institut für Wirtschaftsforschung, 1952), p. 9. 商业周期研究是当时非常流行的研究课题,也是一个似乎与国际经济合作有关的问题。国联的倡议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

24. 从法律角度看,研究所是一家私立协会,于1926年12月2日公开注册。参见章程副本, Mises Archive 57: 85ff. 关于研究所最初几年的情况,参见 Mautner and Nemschak, *Zum 25 jährigen Bestand des Österreichischen Institutes für Wirtschaftsforschung*; 又见 Carl Theodore Schmitt, "The Austrian Institute for Business Cycle Researc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9, no. 1 (February 1931): 101–03。

25. 莫尔/西贝克(Siebeck)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31年4月25日;Mises Archive 93: 13。

26. 洛克菲勒基金会在1929年至1938年间提供了资助。参见 Mautner and Nemschak, *Zum 25 jährigen Bestand des Österreichischen Institutes für Wirtschaftsforschung*, p. 12. 这套丛书的前七卷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现在已经成了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典之作:F. A. Hayek's *Geldtheorie und Konjunkturtheorie* (1929); Fritz Machlup's *Börsenkredit, Industriekredit und Kapitalbildung* (1931), Hayek's *Preise und Produktion* (1933), Erich Schiff's *Kapitalbildung und Kapitalaufzehrung im Konjunkturverlauf* (1933), Oskar Morgenstern's *Grenzen der Wirtschaftspolitik* (1934), Machlup's *Führer durch die Krisenpolitik* (1934), and Richard Strigl's *Kapital und Produktion* (1934)。1934年米塞斯离开了维也纳。此后,1931年接替哈耶克担任研究所所长的摩根斯特恩,开始出版了一些明显较少奥地利学派色彩的著作:Ragnar Nurkse's *Internationale Kapitalbewegungen* (1935), Gerhard Tintner's *Die Preise im Konjunkturverlauf* (1935), and Abraham Wald's *Berechnung und Ausschaltung von Saisonschwankungen* (1936)。除了这套丛书,理论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国民经济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Nationalökonomie*)

(1930年创刊),汉斯·迈尔担任了这本杂志的主编,刊发了许多开创性的论文,研究内容包括经济学中时间的作用、均衡分析、资本理论,以及商业周期理论等等。

27. 弗朗茨·内姆沙克(Franz Nemschak)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64年1月3日; Grove City Archive: Österreichisches Institut für Wirtschaftsforschung files。

28. 米塞斯后来在一份提交给奥地利政府的报告中总结了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的经验,这份报告是1930年根据政府要求与其他作者共同撰写的。参见 Redaktionskomitee der Wirtschaftskommission, *Bericht über die Ursachen der wirtschaftlichen Schwierigkeiten Österreichs* (Vienna: Staatsdruckerei, 1930)。

29. Rudolf Sieghart, *Die letzten Jahrzehnte einer Grossmacht* (Berlin: Ullstein, 1932), p. 195. 西格哈特继续说:

后来又是同一批人责难银行董事[他指的是规模庞大、有影响力的地产信贷银行,那些年间,他曾担任这家银行的董事]过于慷慨地顺从这些企业的贷款要求。

30. 这是他在下奥地利商业协会(Niederösterreichischen Gewerbeverein)的全体会议上讲的。他的讲稿的公开发表版本的一个副本,收入 Mises Archive 62: 41。

31. 1925年之前,税法和其他管制措施禁止奥地利的企业以黄金价格为准计算资本消耗。因此,法律准许的资产负债表反映了企业不切实际的乐观景象。参见 Redaktionskomitee der Wirtschaftskommission, *Bericht über die Ursachen der wirtschaftlichen Schwierigkeiten Österreichs*, p. 12。

32. 另外,由于租金管制法令,各级政府收入大幅减少——1914年它们拥有超过一半的城市出租房产。

33. 那个年代的游行示威理所当然是一种武装示威。社会党拥有自己的独立军队——“共和保卫联盟”(Republikanischer Schutzbund)。这支军队建立于1924年,到1928年人数大约80 000人;参见 Ernst Hoor, *Österreich 1918 - 1938* (Vienna: Bundesverlag für Unterricht, Wissenschaft und Kunst, 1966), p. 101。处于政治谱系另外一端的政治势力也有类似的武装,叫作“乡团”(Heimwehr),或者“保卫家乡”运动,这是1918年之后突然出现私人军事组织,后来分裂为爱国的“奥地利人”和国家社会主义两派;1933年9月,前者加入了新的“祖国阵线”(Vaterländische Front)。

34. 米塞斯致施泰纳,信件标注日期为1927年7月21日;Mises Archive: 62: 20。弗里茨·格奥尔格·施泰纳曾是米塞斯在维也纳大学研讨班上最出色的学生之一。参见 Martha Steffy Browne [Braun], “Erinnerungen an das Mises-Privatseminar,” *Wirtschaftspolitische Blätter* 28, no. 4 (1981): 111。

35. 米塞斯致“反对通胀和经济强制自由贸易联盟”(Freihandelsbund gegen Teuerung und Wirtschaftszwang),信件标注日期为1924年11月11日;Mises Archive 80: 60。

36. Mises, “Die Lehre vom Gelde,” *Forschungen und Fortschritte* (Berlin, February 1928)。

37. 米塞斯致菲舍尔,信件标注日期为1928年3月17日;Mises Archive 87a: 17。

38. 米塞斯收到550马克稿费。他让菲舍尔寄给他一张德国银行的支票。菲舍尔直接寄了15本赠书给这些书的收件人,另外15本赠书和10本作者购书寄给了米塞斯。参见通

信, Mises Archive 87a: 3, 7。

39. Mises, *Geldwertstabilisierung und Konjunkturpolitik* (Jena: Gustav Fischer, 1928), p. 58.

40. Ibid., pp. 61, 65f., 73ff., 81ff.

41. Browne [Braun], “Erinnerungen an das Mises-Privatseminar,” p. 116. 另见 Gertrud Pütz-Neuhauser, “Zur Entwicklung der Konjunkturtheorie im deutschen Sprachraum in der Zwischenkriegszeit,” B. Schefold, ed., *Studien zur Entwicklung der ökonomischen Theorie VIII*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89), pp. 97f. 这次会议的与会者有 300 人。

42. 伦敦大学出版社致米塞斯, 信件标注日期为 1928 年 5 月 25 日; Mises Archive 62: 69。

43. 米塞斯致弗里德里克·尼迈耶, 信件标注日期为 1953 年 5 月 14 日; Grove City Archive; Nymeyer files. 他还加入了美国经济学会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出于同样的理由。

44. 米塞斯致乌戈·帕皮 (Ugo Papi), 信件标注日期为 1933 年 3 月 17 日; Mises Archive 94: 3. 威廉·勒普克在 1922 年关于商业周期的任教资格论文中, 甚至没有提到米塞斯; 参见 Wilhelm Röpke, *Die Konjunktur* (Jena: Gustav Fischer, 1922)。十年后, 他已经读过奥地利人的著作; 参见他的 *Krise und Konjunktur* (Leipzig: Quelle & Meyer, 1932)。他第一次见到米塞斯是在 1922 年的协会会议上。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 他在德国赔偿办公室工作。他与米塞斯在处理战争债务问题的国际会议上似乎经常见面。

45. Mises Archive 22: 8ff. 20 世纪 20 年代晚期德语世界关于商业周期理论的辩论的核心问题是, 这一理论是不是, 或是否可以里昂·瓦尔拉斯全局均衡理论的一部分; 或者, 它是否需要一个不同的方法。克里斯托夫·吕尔 (Christof Rühl) 讨论了哈耶克、勒韦、卢茨和熊彼特的方法, 参见 Rühl, “Der Beitrag deutschsprachiger Ökonomen zur konjunkturtheoretischen Debatte der Zwischenkriegszeit,” H. Hagemann, ed., *Zur deutschsprachigen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ichen Emigration nach 1933* (Marburg: Metropolis, 1997), pp. 243–92. 米塞斯没有主动参与这一方法论辩论。后来他在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形成自己的全局均衡理论的时候, 讨论了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我们将在第 16 章和第 17 章谈谈他的贡献。关于货币商业周期理论从维克塞尔到哈耶克的进展, 参见 Carl-Ludwig Holtfrerich, “Zur Entwicklung der monetären Konjunkturtheorien: Wicksell, Schumpeter, Mises und Hayek,” in Schefold, ed., *Studien zur Entwicklung der ökonomischen Theorie* 8, pp. 103–40。

46. 米塞斯在 1929 年 3 月 6–7 日的改革委员会会议上缺席当选。他收到那些年间他最亲密的盟友格奥尔格·雅恩寄来的一份报告, 雅恩是哈雷的一位教授。参见雅恩致米塞斯, 信件标注日期为 1929 年 3 月 9 日; Mises Archive: 22: 42。

47. 参见本书第 10 章关于“哥白尼式转变”的讨论。

48. Vilfredo Pareto, *Manuel d'économie politique*, 4th ed. (Geneva: Droz, 1966 [1909]), vol. 3, § 36; Gustav Cassel, *Grundgedanken der theoretischen Ökonomie* (Leipzig and Erlangen: Hatschek & Scholl, 1926)。

49. Enrico Barone in F. A. Hayek, ed.,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Critical Studies on*

the Possibilities of Socialism (London: Routledge, 1935). 米塞斯引述了此书的 §§ 17, 80 和 168。参见米塞斯致维泽, 信件标注日期为 1929 年 12 月 12 日; Mises Archive 91: 4. 书信往来是科隆的当面讨论的延续。1929 年 12 月 3 日星期二, 米塞斯曾在科隆作过一个讲座, 题目是“经济利益与政治党派”。当时的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系主任鲁道夫·赛弗特(Rudolf Seyffert)组织了系列讲座“当代政治理论”, 并邀请米塞斯主讲其中一次。参见赛弗特致米塞斯, 信件标注日期为 1929 年 10 月 18 日; 米塞斯致赛弗特, 信件标注日期为 1929 年 10 月 28 日; Mises Archive 62: 107, 112。

50. 在最初的文本中, 我们读到: “Als Gefühl ist der Wert jeder Messung unzugänglich; Vergleiche mit anderen, gleichartigen Gefühlen sind möglich,” *Theorie des Geldes und der Umlaufmittel*, 1st ed. (Munich and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12), p. 16。十二年后他把这句话修改为: “Der Wertungsakt ist jeder Messung unzugänglich” (2nd ed., Munich and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24, p. 11)。英译为: “Acts of valuation are not susceptible of any kind of measurement,”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0), p. 52。类似地, 1925 年秋米塞斯在一封写给罗宾斯的信中谈到他的《民族、国家与经济》, 说他必须彻底重写此书。参见米塞斯致莱昂内尔·罗宾斯, 信件标注日期为 1925 年 10 月 9 日; Mises Archive 83: 61。

51. Mises, “Remarks on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of the Subjective Theory of Value,”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 3rd ed.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03), chap. 5, p. 178. 最初发表时是“Bemerkungen zum Grundproblem der subjektivistischen Wertlehre,” *Archiv für Soc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February 1928)。

52. Mises, “Remarks on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of the Subjective Theory of Value,” p. 180.

53. 米塞斯继续说:

所有注意力都转向了这个规律, 而且, 它被错误地作为新理论的主要和基本规律。实际上, 新理论更经常地被称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而不是主观主义学派的学说, 后者本来更为合适, 并可避免误解。(Ibid., p. 180)

54. 参见 Ludwig von Mises and Arthur Spiethoff, *Probleme der Wertlehre* (Munich and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31)。这是协会系列出版物中的第 183/I 卷。它的姊妹篇第 183/II 卷于 1933 年出版, 其中包含德累斯顿会议的进展。

55. Mi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ubjective Theory of Value,”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

人的所有有意识的行为都涉及偏好某 A 甚于偏好某 B。这是一种在提供给他们两种可选的可能之间做出的选择行为。只有这些选择行为, 即这些作用于外部世界的内在决定是我们的资料。我们通过构建重要性这一概念来理解它们的含义。如果一个人偏好 A 甚于偏好 B, 我们就说, 在做出这一选择行为时, A 看来对他比 B 更重要(更有价值, 更合意)。(p. 149)

56. 实际选择过程只是可能基于盈利计算, 并不排除还有其他决策方式。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商人为朋友建造一座会客大厅, 而非为他的顾客建造一座工厂。然而, 即使在这个例

子中货币计算的好处仍然有所体现,因为它会告诉商人,为了他的个人消费——为朋友提供免费餐饮所带来的满足,他所放弃的是什么。如果没有价格,他将无法计算自己选择的机会成本。

57. 我们不能说1 000 000加仑牛奶是否多于(或少于)1000头生产这些牛奶的奶牛,也不能说一座宫廷园林是否多于(或少于)100名修建这座园林的工人。原因在于,所有这些事物都是异质的,因此无法进行数量比较——如同苹果和橘子相加的问题。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无法判断利用奶牛生产牛奶是否比利用工人修建园林更有效率。但是一旦所有这些可以用货币交换,我们就能进行数量比较,只要比较它们的货币价格即可。根据这些价格的高低,我们就能说牛奶比奶牛换得更多(或更少)的货币,园林比工人的服务换得更多(或更少)的货币。并且,根据出售和购买的价格比率(收益率),我们可以确定用于生产牛奶的货币比用于修建宫廷园林的货币是否更有(或更无)效率。

58. Friedrich von Wieser, "Das Wesen und der Hauptinhalt der theoretischen Nationalökonomie—kritische Glossen," *Gesammelte Abhandlungen*, F. A. Hayek, ed. (Tübingen: Mohr, [1911] 1929).

59. Pareto, *Manuel d'économie politique*, chap. 2, § § 1–18. 只是在承认人类行为的目标具有主观特征这个意义上,帕累托才是一位主观主义者(see *ibid.*, chap. 3, § § 29f.),这就是为什么他要严格区分(客观的)效用和(主观的)“满足度”(ophelimity)。然而一旦涉及行为手段,帕累托的主观主义就止步不前了,因为他声称他在这里只考虑“合乎逻辑的行为”。

60. *Ibid.*, chap. 3, § 152.

61. Vilfredo Pareto,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71), chap. 3, p. 155. 他继续说:

使用价格是解决均衡等式的最简单、最容易的方式;如果人们坚持不用价格,他们也会在另一个名字下继续使用它们,因此这里只有语言的变化,而非事实本身的变化。

62. 尤其参见 Gary Becker,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Knopf, 1971); *idem*,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63. Mises, *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Jena: Gustav Fischer, 1929; reprint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76), p. 72; 另见 *idem*, *Gemeinwirtschaft*, 1st ed. (Jena: Gustav Fischer, 1922), p. 355。

64. Mises, *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p. 28.

65. Mises, "Soziologie und Geschichte,"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61, no. 3 (1929): 465–512; reprinted in Mises, *Grundprobleme der Nationalökonomie* (Jena: Gustav Fischer, 1933), chap. 2; translated as "Sociology and History,"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 3rd ed.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03), chap. 2.

66. 米塞斯特别称许“新批判主义的德国西南学派”(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和韦伯)提出了“理解”概念——历史科学的特殊方法。参见 Wilhelm Windelband, *Präudien*, 8th ed. (Tübingen: Mohr, 1922), vol. 2, pp. 136ff.; Heinrich Rickert, 2nd ed. (Tübingen: Mohr, 1913); *idem*, *Kulturwissenschaft und Naturwissenschaft*, 3rd ed. (Tübingen: Mohr, 1915); Max

Weber,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7th ed. (Tübingen: UTB, 1988); Henri Bergson, *L'évolution créatric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07] 1991)。

67. Max Weber,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3rd ed. (Tübingen: Mohr, 1947), chap. 1, § 1.

68. 《社会学与历史学》这篇文章将是米塞斯最后一次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他曾在《社会主义》(Jena: Gustav Fischer, 1922)第一版中用到这个术语。

69. Mises,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 pp. 114f.

70. *Ibid.*, p. 118.

71. *Ibid.*, p. 98. 米塞斯此处引用了 Weber,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Tübingen: Mohr, 1922), p. 191。

72. Mises,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 pp. 85f.

73. *Ibid.*, pp. 98f.

74. *Ibid.*, p. 114.

75. *Ibid.*, pp. 122f. 一年前,米塞斯在《货币稳定与经济政策》(Jena: Gustav Fischer, 1928)中仍然持有许多关于经济学认识论的经验主义观念。虽然他强调了某些类型的理论对于解释观察到的事实是必要的(pp. 39 - 42),但在另外一处,他却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断言哈佛的商业晴雨表提供了对流通—信用理论的统计验证(p. 69)。

76. Mises,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 pp. 128f.

77. 关于这点及下文,参见玛吉特·冯·米塞斯关于这一事件的打印记录 Mises Archive 105,可能写于1927年11月。

78. Margit von Mises, *My Years with Ludwig von Mises*, 2nd enlarged ed. (Cedar Falls, Iowa: Center for Futures Education, 1984), pp. 18f.

79. 我们仍然在复述玛吉特·冯·米塞斯对于这些事件相当模糊的记录(保存在 Mises Archive 105)。根据“她不得不再次成为犹太人”这段话,我们只能推测她在嫁给新教徒费迪南德·谢雷尼之前曾是犹太人。“婚姻培训之旅”(training period for marriage)可以有多种解释,但是最有可能的是出于这一原因。

80. 米塞斯致玛吉特·谢雷尼,信件标注日期为1927年11月3日;Mises Archive 62: 35f. 米塞斯是在玛吉特的医生阿德勒教授的要求下写下此信的,阿德勒教授传达了玛吉特的愿望,并充分解释了为什么他拒绝再次见到她。此处的这位医生一定是指路德维希·阿德勒;参见 Margit von Mises, *My Years with Ludwig von Mises*, p. 8。

81. 9月16日他还在医院。参见米塞斯的秘书写给《哥尼斯堡哈通舍报》(*Königsberger Hartungsche Zeitung*)的信,标注日期为1927年9月16日;Mises Archive 62: 10。

82. Margit von Mises, *My Years with Ludwig von Mises*, p. 19.

1929年10月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崩盘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冲击。中欧尤其深受影响。奥地利企业的利润空间在高税率和工会力量的综合影响下本来就很紧张,结果私营企业越来越不能吸引应对巨变所需的资本。此外,德国和奥地利的经济日益依赖于公共支出,而这些支出却是通过美国和法国稳定的贷款资金流融资的。这个过程的主角不是联邦政府,而是二级政府或地方自治政府。因为拥护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很多市长都用战后的外国贷款实施对企业的公有化,特别是交通和公用事业部门。在新的公共管理下,这些企业的绩效急速下滑,但是,这又得到更多的外国贷款补偿。直至1928年,资本主义西方的通货膨胀政策仍然可以成为中欧福利国家促进增长和得以维持的基础。然而,1928年6月法郎的稳定停止了法国的资本输出,而美国联邦政府提高利率后,美国新的对外贷款也下降了百分之五十。宴会结束了。

612 米塞斯的专业职责之一就是吸引资本流入奥地利。他曾代表他的国家参加为半公共的商会组织的国际会议,试图通过提高奥地利信用风险的良好声誉保护国家利益。¹例如,1930年3月底到4月初,米塞斯去了一趟伦敦,任务就是宣传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研究所为奥地利商会在伦敦的宣传部门(今天我们会把它称为公共关系办公室)准备的英语指南。²

米塞斯还有一项私人使命:他必须再见一次玛吉特。自从一年前离开维也纳后,她从未写过信。他通过某些渠道打听到她的地址,并在到达伦敦当晚见到了她。她回忆说:“从第一眼,从第一刻,一切就如以前一样。我们都知道以后也永远不会改变。”³几个月后,她回到了维也纳——私人使命完成了。

613 米塞斯此次的正式使命是他不太成功的事务之一。1929年10月,华尔街暴跌后,奥地利和德国迅速失去来自美国的贷款。即使是米塞斯的说服能力也无法阻止危机进入奥地利。事实很快证明,经过村社社会主义、工会和飞涨的税收数十年来残害,奥地利企业家已经无法减轻压力。整个欧洲的证券市场急速下滑,并在一年之内达到有史以来的最低点。

就像所有金融危机爆发时的情况一样,各种各样真正的和自封的专家都在鼓吹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案。这些方案毫无二致地涉及加强政府干预。而最常见的灵丹妙药是对金本位制的干预。几位心怀好意的业余学者还把他们的改革提案递交给米塞斯。他们都未读过他的著作。他们只是想找一个声誉卓著的货币专家增加他们计划的筹码。其中一位实际上提出了一种基于电力的货币的建议!米塞斯通常都会回复,在某次回复中甚至还说他欢迎出版那位先生的提议;对这些观点的公开辩论将是建设性的,并有助于找到解决当前货币问题的方案。⁴这并不是无聊的讨论,有时他还自己安排这样的讨论。夏洛特·冯·赖希曼(Charlotte von Reichmann)就是一个例子,她是法兰克福大学的年轻经济学家。不像那些民科,她确实读过米塞斯的货币理论。实际上,她通读过米塞斯的所有著作,并且非常崇敬这些著作。然而在博士论文中,她鼓吹一种非常不同的关于信用本质的(具有通货膨胀倾向的)观点,宣称即使是纸币信用也是真实资本。1931年10月她把论文寄给米塞斯,恳请他的指正,令人惊讶的是,她收到了非常正面的回应,甚至邀请她到国民经济学会发表演讲。⁵

1930年,奥地利政府邀请米塞斯加入了一个专门的经济委员会,研究目前国家遭受种种困难的原因,这些困难包括:长期的高失业率(1929年,工商业界的200000名工人或24%的工人失业)、大量的破产、生产设备闲置,以及大量奥地利企业缺乏盈利能力。米塞斯是三位匿名编辑委员会成员之一,该委员会最后发表了1930年10月的最终报告。⁶另外两位成员分别是一位工会领袖和劳工部长埃德蒙·帕拉(Edmund Palla)以及基督教社会民主党的新秀、后来的奥地利总理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Engelbert Dollfuss)。

这份报告详细描述了降低奥地利企业竞争力的各种因素。它指出,通货膨胀年代(1914—1925)已经在奥地利公众中造成了一种通货膨胀主义的心态。持续增长的价格和收入现在已经被视为一个常态。⁷这种心态与世界市场上销售价格的平稳或下降是相冲突的,而奥地利自1925年引入金本位制所面临的就是这样的世界市场。在金本位制下,只有本地产品的批发价格或有可能上升,而且还很有限,而生产成本却在持续上升。税收的增加超过30%,公共社会保障体系支出的增加超过50%,130万工业工人的工资率则上升了24%左右。持续的成本上升挤压了企业利润,因而不可能再吸引外国资本,而这是快速调整奥地利工业所必需的。委员会因此建议缩减公共支出和公共收入,并且为了降低劳动成本,重新议定工资合同。

米塞斯对这份报告并不满意。⁸他认为它没能确定主犯——福利国家和工会。

614

615

他将利用下次机会澄清是非,并以自己的名义撰写。他还在自己的私人研讨会上讨论了与危机相关的主题,这是在1930—1931学年,也是多年以来首次讨论纯粹的经济问题。⁹类似地,大学研讨班在冬季学期讨论了资本的形成、维持和消耗问题。¹⁰夏季学期本来计划讨论方法论问题,却因米塞斯不得不去美国出席国际商会的会议而意外取消了。

616 对米塞斯来说,这几个学期远比那些公共辩论更令他满意——由于他享有奥地利最伟大的货币理论家的声誉,这些公共辩论是少不了他的。危机期间,他在公共讨论中遇到了一些更有影响的货币民科。他坚持认为,大萧条比过去任何一次危机都更持久也更严重,这是因为它的根源在于通货膨胀和商业系统化的合力影响。

1930年10月末的一次公开场合,米塞斯与罗伯特·艾斯勒(Robert Eisler)进行了辩论。艾斯勒是一位隶属于国际联盟巴黎办事处的奥地利经济史学家。¹¹他写过一部关于货币史的著作,并在巴黎索邦大学和享有盛誉的日内瓦私立高级国际关系学院(*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s Hautes Études Internationales*)讲授自己的货币政策方案。他鼓吹一整套反危机政策方案,就是后来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艾斯勒宣称,1929年后的危机源于以前的紧缩政策,特别是紧缩的金本位制。在他看来,危机可以通过国际货币管理技术的简单改变加以克服:取消任何形式的金本位制,并创造一种不兑现的国际货币体系。这将解决劳工市场、农业、住房和其他领域的各种问题。它可以对大型公共工程进行融资,并支付给工人足够的工资以及养老金,还可以保证工业家和银行家的高度繁荣。它甚至还能平息社会内部的社会对立。

617 米塞斯与艾斯勒的辩论没有书面文件保留下来,不过,米塞斯的论点可以通过几个月后一次公开讲座的讲稿推断出来,那是他在德意志工业联盟——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工业协会的全体会议上的讲演,题目是“世界经济危机的原因”。¹²讲座时间是1931年2月28日,随后很快就以一个稍有不同的标题发表在一套重要的经济学系列丛书之中,这套丛书也收入了许多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的危机分析。¹³

大萧条的原因

在这篇只有34页的文章里,米塞斯提出了一个简明而透彻的经济危机分析。他指出,市场经济受到企业家满足消费者偏好的要求的管制。而通货膨胀扰乱了

市场的自我管制。它导致商人高估投资的获利可能,因而使得他们作出错误的投资决策,造成资源的浪费。这些错误在危机中显现出来,例如1929年美国股票市场的崩溃。市场参与者现在修正他们的计划,并对经济状况采取更加审慎的态度。就业机会和资本品从不可维持的生产项目转向那些目前对消费者最重要的,因此也是最具盈利可能的企业和工业。失业者以更低的工资找到新的工作,生产得以继续,经济重新开始增长。

米塞斯强调,这是过去商业周期的典型情况,但却并不完全合乎当前的状况。以前,繁荣阶段几乎没有失业,甚至在最严重的失业和不景气期间,失业也是暂时的。失业持续的时间最多也只是与市场参与者寻找有利可图的新劳动分工的时间一样长。但是这次,米塞斯观察到事情显然不同,差别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不得不调整了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这次除了大规模的通货膨胀,在欧洲不存在对应的普遍繁荣阶段。

618

按照以往的经验 and 我们的理论,人们应该设想危机更加温和。但它却何止是严重,似乎短期之内商业状况根本无法看到起色。¹⁴

本来我们可以合理地设想,当前危机不会比紧随繁荣而来的危机更加痛苦。相对较弱的繁荣应该导致相对较缓的危机。但现在情况不是这样。为什么?米塞斯回答说,目前的不景气是由两个叠加在一起的因素造成的。此次的商业周期只是加重了失业和盈利机会的缺乏。但这些问题一直存在,而且还将继续存在,并不依赖于商业周期。

此时,缺乏盈利机会和失业都因大萧条而恶化了。然而,在战后那段时间,它们是一种持续存在的现象,即使在经济高涨阶段也没有完全消失。在此我们遇到了一个新问题,一个不能单独由周期变化理论解释的问题。¹⁵

战后的长期经济危机原因何在?米塞斯认为存在多个原因,而每个都与政府干预有关。因此,米塞斯结合了商业周期理论和干预主义理论来解释大萧条。他的备选原因中最不具有争议的是价格管制和公共财政的恶劣影响。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同意,价格上限造成消费品的短缺,而价格下限则产生无益于任何人的产品滞销。他们也都同意,政府的扩大增加了生产成本,而对资本的征税则导致资本家偏好消费他们的财富而不是再投资。不过,较有争议的是米塞斯对劳动市场的态度。

619

米塞斯是极少数有勇气彻底贯彻供求定律的经济学家,甚至将其应用到就业和工资上。失业的主要原因非常明显:获得政府支持的工会。¹⁶

620 米塞斯认为,在不受限制的市场上,失业只能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可能始终存在一定数量的求职者……正如不受限制的住房市场上总是同时存在闲置公寓和寻找公寓的人一样。”¹⁷今天我们会说,搜寻成本导致一定数量的自然失业。¹⁸然而除了这种自然失业,市场将在由企业家的竞争性需求和工人的竞争性供给形成的工资率上出清。“现在,这种自我管制的市场受到获得政府权力支持的工会的强烈干扰。”工会试图使其成员的工资率高于市场工资率。“工会寻求的这种目标只能通过运用暴力实现。”米塞斯继续解释道:

只有那些属于工会的工人,亦即那些要求工会规定的工资水平并以工会规定的方式工作的人,才被允许在企业工作。如果企业家拒绝接受工会的条件,就会引起罢工。忽视工会禁令希望工作的工人将因暴力行动而被迫克制自己。自然,工会这些策略的前提是政府容忍这种行为。如果政府按其通常的方式介入这些事件,阻止那些伤害求职者、破坏机器和其他企业设施的罪行,那么,情况就会有很大不同。但屈服于工会是现代政府的典型特征。¹⁹

621 政府的这种立场,使得工会可以侵犯资本家的财产和工人或潜在工人的人权,因此,工会能将工资推到市场工资率之上。但在这个更高的工资水平,企业不可能雇用所有本来会被雇用的人。结果就是失业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民众的不幸。短时间内,大众也许会容忍他们的不幸,但早晚他们都得工作。即使工会也不可能抵制如此大规模的群体运动,所以通过税收支付的失业救济制度也就应运而生了。米塞斯得出结论说:

失业作为一个长期的群体现象,源于工会推高工资率的政策。如果没有失业救济,该项政策很快就会崩溃。因此,失业救济不像误入歧途的公共舆论所假设的那样,是一项缓和失业导致的紧张状况的政策。相反,它是造成失业成为长期群体现象的因果链上的一个要素。²⁰

简言之,经由政府干预,危机转变成了大萧条。而这个经济灾难反过来又凸显出了国家之间的政治对抗,并刺激产生新一轮毁灭性政策。²¹

如何摆脱这种邪恶的循环？米塞斯认为，最终我们将别无选择，只有废除所有的政府干预，并与工会力量正面对抗。这种对抗越早越好。持续的时间越长——例如通过通货膨胀，资本损耗就越多，这又会导致工资和生活水平不断下降。²²然而这一思想仍然很受欢迎。正如他的讲稿发表后米塞斯写给巴黎朋友的信中所说的：

今天，除了十几个或二三十个理性的人外，整个世界都完全认同两点：债务可以不用偿付，而且，经济应该通过强劲的通货膨胀刺激。²³

不过，并非所有对他观点的批评都是基于上述主张。一些批评者认为米塞斯过于片面。他在商会的一些同事认为，仅仅关注政府干预主义问题是不合理的。还存在着类似企业家干预主义的现象，它们也带来了非常近似的问题。²⁴米塞斯回应了这类观点，要点包含在他写给商会同事鲁道夫·冯·贝尔曼(Rudolf von Bernmann)的一封信中。鲁道夫·冯·贝尔曼认同米塞斯关于政府干预问题的立场，但他还是坚持认为，政府不是唯一进行干预的机构。²⁵在回信中，米塞斯强调了市场选择过程的特殊性质：

当然，企业家也会犯错，从来没人否认这点。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典型特征就是，企业家如果犯错就会不断削弱自己作为企业家和财产所有者的地位……因此，不受干预措施阻碍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提供了一个在资本家和企业家中间进行选择的永久可能……为什么德意志帝国和奥地利无能之辈可以坐在CEO的职位上那么多年？这是因为在一个干预主义国家里，行政官员的任命主要基于他们是否在更高官员(他们可能也是更为“低能”的)那里有着较好的名声；还因为那些早已破产的企业只因各种干预措施的支持才能人为地持续那么多年。²⁶

那段时间最流行的失业现象解释，至少在学术圈内，来自埃米尔·莱德雷尔，他的观点发表于收入米塞斯小册子的同一系列丛书。莱德雷尔嘲笑了“那种原始观念：面对失业，我们总是可以通过削减工资回归均衡”。他认为危机是快速技术进步的结果——技术进步如此之快，以至于市场参与者的调整从本质上说变得不可能了。根据莱德雷尔的观点，如果创新只发生在消费品领域，失业就不会产生：新的产业会吸收所有的剩余劳动力。但是，创新可能带来快速的技术进步，而技术

622

623

进步又导致成本更低的机器取代人力劳动,如果这一更新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企业家无法跟上步伐,就会产生失业。²⁷

624 这个论证的问题不仅在于隐含地假设企业家的投机不可能跟上技术进步,而且还有更深的假设,即技术进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独立于企业家而产生。在为荷兰教授维瑞京·斯图亚特(C. A. Verreijn Stuart)纪念文集所写的一篇文章里,他讨论了为什么超越调整速度的技术进步这个想法是毫无根据的。²⁸米塞斯指出,现存资本结构的价值迫使企业家不断权衡应该继续维持还是更新换代,在这个意义上,资本有着固有的保守性。有些看法认为,任何新的技术,仅仅因为它比目前使用的技术更加优越,就一定会取代现有技术——这不是实情。只有获得了市场价格的保证,才有可能发生彻底的更新换代。

莱德雷尔、康拉德等人试图通过其他解释反驳米塞斯关于危机根源的分析,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则正面讨论了他的主要论题。他们批评米塞斯关于在不受限制的经济体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市场通过价格调整而出清的观点。埃里希·卡雷尔(Erich Carell)宣称,供给和需求的每一次变化都会带来累积(维克塞尔主义的)效应,而这又会放大最初的不均衡。²⁹威廉·勒普克则认为:

625 对我来说,危机持续到当前阶段,期望工资水平的削减重建均衡似乎是错误的。错误的原因在于,给定当前生产停顿的总量,每次价格和收入的削减都会导致支付手段以增加银行系统流动性的形式不断变得贫瘠,因而进一步扩大了不均衡。显然,米塞斯及其追随者没有充分考虑今天我们拥有庞大而又未利用的生产能力的事实;换句话说,我们有巨大的“资本剩余”,而这些剩余需要信用扩张显现出来。由于这个原因,认为政府投资剥夺了私人投资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一个反常的事实是,私营经济的生产资料将会因此而倍增,这是基于纯粹静态的思想所不可能了解的。³⁰

在《经济危机的根源》(The Causes of the Economic Crisis)中,米塞斯已经预见到了这类论点。他注意到,有些经济学家已经提出了关于通货膨胀何以对经济有益的一种新理论。这些经济学家完全知道失业产生于过高的工资水平。但他们不是直接面对工会,要求停止他们有害的行为,而是“建议欺骗工会。”米塞斯总结了这类论点并找出它们的关键缺陷:

在下次通货膨胀中,名义工资水平不应改变,而这将等同于实际工资率的

下降。这种主张乐观地假定,在下一次繁荣时期,工会不会要求进一步增加工资,而只是默默地注视实际工资的削减。³¹

预测工会如此行事是不合理的。米塞斯基于常理反驳了这种新的亲通货膨胀(pro-inflation)论点。以此类推,它也适用于所有其他“庞大而未利用的生产能力”的所有者,正如勒普克所宣称的。我们也不应该假设这些所有者会默默地接受以低价销售或出租他们的这些资源。但是由于经济难题不断增加,主导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又将政府行动视为万能的灵丹妙药。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狂热气氛中,理性思考非常稀缺,不同意见也极不受欢迎。正如《经济危机的根源》的一位评论者解释的那样:

工会力量已经变得如此强大,成为国家和公共舆论中如此重要的政治因素,以至没人敢于冒险说出真相——报刊不敢,他们竭力避免遭到同情反社会观点的指控;政府也不敢,他们害怕变得不受欢迎,害怕暴露于各个党派无所顾忌的煽动中。毫不奇怪,这些党派以抵制工资削减的好战呼声吸引了大众。³²

626

政治正确的灾难一直延续到20世纪结束。一些米塞斯的评论者情不自禁地称赞他敢于面对铺天盖地的反对意见。欧根·阿尔特舒尔称米塞斯为“自由主义最极端的代表”,承认他能毫不畏惧地持续辩论。³³另一位评论者说:“维也纳教授米塞斯不屈不挠地反对政府干预市场运行,人们把他称为‘最后的自由主义骑士’。”³⁴

甚至他的一位同样无所畏惧的盟友弗里茨·沃尔夫鲁姆,也批评他过于强调工会干预是危机的主要因素。沃尔夫鲁姆更希望米塞斯强调其他因素,例如价格管制:“因为每个人都更善于认识别人的过错,而且毕竟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启蒙普通大众。”³⁵

* * *

启蒙大众!米塞斯常常觉得,恰恰是精英阶层需要更多理性之光。一个相关例子是1931年他的美国和加拿大之旅,在那里他参加了国际商会(ICC)代表大会,并会见了许多同事和经济学家。³⁶

627

美国贸易政策是国际商会会议上最热门的话题。1930年7月,《斯穆特-霍

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获得美国国会通过,并由胡佛总统签署生效。这项法案授权对进口的农产品和工业制品征收美国历史上最高的关税。一年内,情况已经非常清楚,这项法案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它保护了面向国内市场的农场主和制造商,却伤害了消费者和面向外国市场的农场主和制造商。它从根本上破坏了国际金本位制。而美国的政治领袖不愿承认这点。总统、国会和国际商会会议上的美国代表坚定不移地推行他们中一些人所谓的“新经济”政策——通过政府干预拯救资本主义经济(通过虐待病人看病)。几个月后,胡佛签署了《1932年税收法案》。这个法案带来了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最大规模的税率增长,但是,税收的绝对数量并未增加,也未能阻止当年年末胡佛在改选中的失败。从1933年起,新任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还将加强始于《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新政政策。³⁷

628 在国际商会1931年华盛顿会议中,制造这些政策的干预主义精神是很明显的。米塞斯在信里写道:

在国会里我再次看到,今天,与不断上升的保护主义做斗争是多么困难。美国政府和政党积极反对任何要求美国实行适度关税的企图。³⁸

我在美国的所见所闻并不令人愉快。美国官方坚守高关税政策……可以肯定,美国在其国内和国外经济政策中实行的是最有害的干预主义计划。³⁹

可是,奥地利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而且还在迅速下滑。米塞斯3月份在奥地利国家银行(*Oesterreichische Nationalbank*)股东大会上公开指出,银行已经成功稳定住了先令的汇率。⁴⁰那可能是关于奥地利金融最可称道的一件事了。但他知道,严峻的问题还在面前。他有好几次拒绝了几家主要银行的管理职务,因为他相信,这些银行已经破产了,破产状态何时显露出来只是个时间问题。

629 1931年5月初,清算的日子来临了。奥地利的最大银行——罗特席尔德家族控制的信贷银行,因为拖欠行为导致奥地利的整个支付系统陷入了迫在眉睫的危险之中。⁴¹回到维也纳后,米塞斯不得不谢绝了几次就该事件及其对奥地利政府平衡预算的影响进行评论的邀请,声称这种公开声明无法与他作为奥地利商会秘书的立场保持一致。针对银行管理人员的刑事诉讼开始了,而奥地利法律禁止在法官判决前有任何影响公众舆论的行动。⁴²由于规模太大无法承担倒闭的代价,信贷银行得到了德意志帝国央行的援助。作为交换,它和其他主要银行必须通过后门再次引入外汇管制。⁴³按照要求,他们应该阻止客户的任何黄金出口。米塞斯肯定

已经感觉到了,这种重商主义思想的复活是终结的开端。他在回复向他约稿的杂志之一《德意志经济报》(*Deutsche Wirtschafts-Zeitung*)编辑的信中吐露说:

我们的金融状况远比官方观点承认的更加糟糕。出于关心选民——特别是众多的公务员,国会反对任何强硬措施。⁴⁴

“官方观点”不愿承认奥地利的社会主义困境,这也源于媒体的堕落。尤其是关于维也纳市的报道。维也纳已经成为村社社会主义的国际橱窗。正如米塞斯在与一位荷兰扶轮社(Rotary Club)会员的通信中指出的,没有一家维也纳报纸敢于反对房租管制、批评预算或维也纳的其他财务报告,因为这些报纸在许多方面都要仰赖市政当局。⁴⁵极少数经济学家有足够看穿公共宣传的批判精神,敢于公开反对的就更少了。米塞斯身边的圈子再次填补了这个空白,尤其是当哈耶克发表了关于租金管制的研究。⁴⁶

630

米塞斯非常肯定,奥地利的所有重要银行都会破产⁴⁷,因此他把个人账户保留在别处。这些预言以惊人的速度成为现实。信贷银行只是因为获得了罗特席尔德家族在巴黎和伦敦的银行的帮助,才得以避免破产的命运。但是其他银行几乎没有来自海外的救星。两个月内,金融崩溃蔓延至整个奥地利,并于1931年7月13日黑色星期一到达德国。声誉最好的德国银行之一达姆施泰特国家银行(*Darmstädter und Nationalbank*)关闭了柜台,并触发了连锁反应,很快就将整个德国的支付体系卷入其中。政府强令银行和资本市场停业整顿,于是国际支付也暂停了。

6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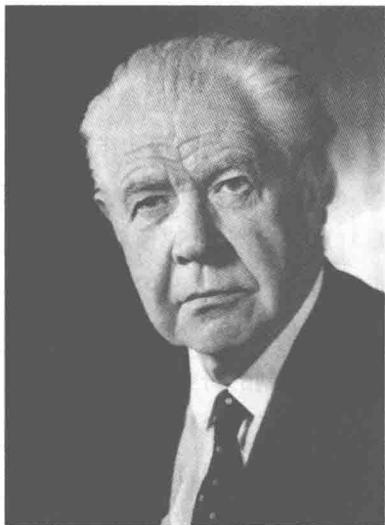
伦敦助理

1931年春,欧洲政治前景黯淡。喧哗的20年代成了相对自由并有国际经济合作的一个短暂插曲。现在钟摆又回到干预主义和国家崇拜。仅有的希望是少数一些未受当时政治偏见影响的个人和群体。其中最具有前途的是莱昂内尔·罗宾斯领导的伦敦经济学院。

罗宾斯的职业生涯非常顺利。他在牛津待了两年,于1929年继意外去世的阿林·杨格之后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的系主任。罗宾斯周围聚集了一批才华出众的学生,他们将成为20世纪经济学界耀眼的明星: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威廉·赫特(William Hutt)、约翰·希克斯、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

dor)、阿巴·勒纳(Abba Lerner)、提勃尔·德·西托夫斯基(Tibor de Scitovsky)、乔治·沙克尔(George Shackle)、路德维希·拉赫曼(Ludwig Lachmann)、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和厄休拉·韦布(Ursula Webb)(她嫁给了希克斯)。⁴⁸他们直接受到米塞斯思想的熏陶,这在维也纳之外是绝无仅有的。

632 米塞斯对罗宾斯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他的著作,但从20年代早期开始,他们也建立了私人联系。到1931年,米塞斯已经非常熟悉该校教职员,甚至可以向外国访问学者提供详细指导,告诉他们如何拜访伦敦经济学院的师生。例如,在1931年1月致瓦尔特·祖尔茨巴赫(Walter Sulzbach)的信中,米塞斯建议祖尔茨巴赫与格雷戈里和罗宾斯联系,称他们是“当代英国最好的经济学家和最自由的灵魂”。祖尔茨巴赫可以去办公室找到他们,如果不在那里,就直接去家里拜访。梅耶多夫和施瓦茨肯定愿意见他,只要他把名片交给秘书,并提及他是米塞斯的朋友。如果需要图书馆管理员黑迪卡先生的帮助,也可以采取同样的办法。⁴⁹



莱昂内尔·罗宾斯

那个时期,罗宾斯对米塞斯的仰慕是毫无保留的。他热切地劝说同胞改变信仰,并成功地促使朋友阿诺德·普兰特转向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事业。他还邀请米塞斯和他最亲近的一些学生定期举办客座讲座,以此提高米塞斯主义在经济学系的影响。他的长期计划是建立一种对抗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恶劣影响的有效平衡。凯恩斯对通货膨胀和政府干预的鼓吹已经横扫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还有英格兰银行。

罗宾斯也试图阻止这一思潮在自己学校的传播。这不仅涉及政治取向,也是经济学的性质和方法的根本问题。多年来,伦敦经济学院的管理层一直想使该校成为像数学和生物学那样的经济学研究中心。硕果仅存的几位老一代经济学家不相信年轻的罗宾斯强大到足以阻挡实证主义改革者。

633 不过,当哈耶克于1931年1月末2月初访问经济学系并介绍他的商业周期理论时(他的理论基于庞巴维克对资本的精巧阐释),意外的机会出现了。这是哈耶克与罗宾斯第一次会面,在此之前罗宾斯只是通过著作了解他。⁵⁰罗宾斯尤其喜欢哈耶克对美国经济学家威廉·特鲁芬特·福斯特(William Trufant Foster)和沃迪

尔·卡钦斯(Waddill Catchings)的学说的批评⁵¹——这两位是过度储蓄阻碍经济增长这一观念的影响颇广的支持者。类似观念在英国尤其在剑桥非常流行——现在我们知道,凯恩斯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开始筹划消灭食利阶层的计划。⁵²因此,罗宾斯邀请这个年轻的奥地利天才加入英国的运动。

哈耶克举办了四次讲座,听众既有教授,也有学生。这些讲座毁誉参半。资深教授多数还不是很了解奥地利经济学,他们觉得哈耶克高大的形象比他的论点更能给人留下印象。但年轻听众却震惊了。罗宾斯的计划是让学生直接从当代理论研究的中心受到启发。在这种热情指导的影响下,他们确实觉得哈耶克的演讲是巨大的成功。他们中的一位后来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此人在回忆这些讲座的文章里这样写道:

我待在伦敦经济学院的那段时期,它们无疑是最成功的系列公开讲座……尽管理解哈耶克还有很多困难,但听众还是被深深迷住了。对我们来说,他讲的似乎非常重要,让我们明白了许多之前不明白的事。听了这些讲座后,我们知道了为什么会存在萧条。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的大多数学生和很多教师都成了哈耶克主义者,或者至少将哈耶克方法的一些要素纳入他们自己的思考中了。⁵³

634

罗宾斯自己后来将哈耶克的讲座描述为一个“既困难又刺激”的“轰动事件”。⁵⁴他立即准备出版讲座的讲稿,并开始为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游说一个职位。可能是应罗宾斯要求,哈耶克写了一篇对凯恩斯《货币论》的评论,并将手稿交给罗宾斯。罗宾斯是伦敦经济学院院刊《经济学》(*Economica*)的编辑。那位剑桥经济学家的著作刚于1930年12月出版,哈耶克对它的评论才华横溢而又具毁灭性。现在罗宾斯可以说服伦敦经济学院董事威廉·贝弗里奇发给哈耶克一个邀约了。哈耶克成了政治经济学图克教授(Tooke Professor of Political Economy)。他的讲座以“价格与生产”为名出版,而对凯恩斯著作的评论则发表在《经济学》上。

最后的自由主义骑士在伦敦找到了一个可敬的助手。

同年秋天,哈耶克与罗宾斯合作主持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首次讨论会。他在课堂上阐释和捍卫了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经济学系的全体教师都参加了。在给米塞斯的信中,哈耶克描述了讨论的气氛:

635

一些后进(等级,不是年纪!)同事,特别是希克斯、贝纳姆(Benham)或托伊桑比(Toysonby),也非常杰出。对我来说有大量的学习机会,而我之所以不能这样,仅仅是因为罗宾斯把我当作一位杰出的专家,因此人们总是希望就所有事情听取我的看法。我第一次意识到,相对于同事和多数经济学家,甚至在我狭窄的研究领域之外,使我能够拥有优势的所有东西都归功于您(在这一点上,我从您那里得到的恩惠是不言而喻的)。在维也纳,人们之所以较少意识到这点(从您那里得到的知性的恩惠),是因为它是我们这个圈子毫无疑问的共同基础。如果在伦敦经济学院,我没有辜负人们太多的期望,那将不是归功于我,而是归功于您。然而,如果您的著作被翻译为英文并广为传播,则(我的)优势(对其他人的)将消失殆尽。⁵⁵

米塞斯当然为这种进展感到高兴。此前,罗宾斯的一位学生赫特发表了资本主义对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影响的修正主义报告(这份报告摧毁了那种认为自由市场导致贫穷工人阶级状况更加恶化的既有观点)。米塞斯在1931年12月的信中对赫特的著作进行了评论:

636

在英格兰,人们能够观察到一个偏离非理论(atheoretical)方向的决定性转向。今天,这场以伦敦经济学院和罗宾斯为中心的运动将会产生最伟大的科学和政治影响。⁵⁶

罗宾斯与哈耶克轮流鼓励他们的维也纳大师更加频繁地访问伦敦。米塞斯获得一份长期有效的邀请,随时可以住在罗宾斯家里。哈耶克说:“在这里,您至少拥有和其他地方一样多的忠诚的仰慕者,而如果通过经常性的个人访问能够加强这种影响,那将是一件好事。”⁵⁷随着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的出版,米塞斯的影响达到了绝对高点。罗宾斯向米塞斯赠送了这本书,称为“向英国读者宣传现代经济学方法论意义的一个笨拙的尝试”,并对“我的阐述的生硬”致歉。⁵⁸

但是,伦敦经济学院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恋情并不持久。新的奥地利学派学说最初受益于其醒目和新奇,但是它们的政策含义却无疑会妨碍长期转变。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威廉·贝弗里奇,他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曾受罗宾斯对米塞斯作品逻辑严格性的狂热的感染,因而对古典自由主义政策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⁵⁹但到哈耶克1933年初发表他的就职演说时,威廉爵士已经“再度成为一个

纯粹的社会主义者了”。哈耶克推测,这个转变是他对“刚刚读过而又没有读懂的《社会主义》的情绪化反应”。⁶⁰ 637

伦敦经济学院师生偏离了米塞斯,转向了正在兴起的文字瓦尔拉斯主义运动,哈耶克本人对于这一转向起了一定作用。这场运动始于十年前的德国,是由维塞尔、卡塞尔和熊彼特领导的。鉴于哈耶克的学术背景,这一点并不令人吃惊。他的经济思想是在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的课堂上培养起来的,而他也从未隐瞒自己的学术师承。米塞斯对此十分清楚。⁶¹

哈耶克不仅强调奥地利学派与洛桑学派(Lausanne Schools)的共同特征,他还相信后者在技术上更为先进,因此更加适合处理经济分析中需要较多技巧的问题,特别是价值归属问题。在以资本理论为主题的第一次伦敦经济学院研讨会上,他就提出了这些观点。他一定是在课堂上发现了年轻的约翰·希克斯的支持,当时希克斯已经开始致力于将瓦尔拉斯和帕累托引入伦敦经济学院的计划。⁶²他们的影响在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第二版(1935年出版)中可以明显感觉得到。第一版几乎完全忽略了洛桑学派,而第二版却到处都是关于数理经济学家的讨论。 638

哈耶克使得罗宾斯的圈子熟悉了第四代奥地利经济学家的观点。他支持那种认为全局均衡理论代表经济学最高水平的看法,并且认为,所有文字演绎经济学家(verbal economists),包括米塞斯,都在这同一个框架中工作。他们坚信,任何进一步的研究都必须从这里开始。摩根斯特恩和哈耶克最深刻地感觉到了改革的必要,但他们都没领会到,替代方法已经存在。米塞斯反对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的论证的逻辑结构完全超越了瓦尔拉斯范式,而这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哈耶克两本货币著作的英文版都先于米塞斯著作的英文版出版。⁶³他是第一位对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直接产生个人影响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而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来说,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是继德国和奥地利在20世纪30年代转向社会主义后最后的也是最美好的希望。因此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之前那段危机岁月,哈耶克要对英国和美国大多数经济学家心目中的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印象负责。比起那位来自剑桥的最大的竞争对手,他似乎不太成功。

后来,哈耶克曾懊悔自己在1936年没有反驳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就像他曾反驳《货币论》那样。他似乎认为,自己没有那样做是凯恩斯革命成功的关键。但这肯定夸大了当时他对英国同行的影响。哈耶克在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没有做到的,正是米塞斯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也做不到的:通过论辩的 639

微薄之力逆转学科走向。哈耶克有过机会,但在英国主流观点看来,他的著作是有争议的。斯拉法对《价格与生产》的评论降低了哈耶克的影响力,这一负面影响至少与哈耶克对《货币论》的评论打击凯恩斯的程度相当。

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哈耶克从其真正的导师那里继承下来的不一致和矛盾所导致的。哈耶克过去曾是、并且终其一生都是维塞尔的门徒。事实就是如此,尽管哈耶克在整个第四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中是方法论和政治观点最接近米塞斯的一位。⁶⁴不过,主要原因却是,在他三十多岁时,为了符合罗宾斯的期望,哈耶克承担了过多的工作,把自己搞得不堪重负。他从未成功发表过除了短文和更大部头书稿(但未完成)的摘录之外的东西。这是他常常哀叹的事。他从未有充分的时间思考经济理论的基础问题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所有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他对货币理论、资本理论和商业周期理论的描述主要是对现有学说的概括综合。在不能依赖其他人的工作作为支撑框架的地方,他就迷失在细节分析中,并且从未创造出自己思考主题的一个连贯图景。⁶⁵

640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和米塞斯的《社会主义》英文版同年出版。这时,大家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最初的好奇心已经褪色。舞台是为本地优胜者的归来搭建的。哈耶克在天才学生中间宣扬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工作没有取得进展。而正是这批学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决定了整个世界的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在伦敦经济学院工作十年后,哈耶克已经耗尽了从米塞斯那里继承的权威,并失去了反对迅速崛起的凯恩斯革命的前盟友。

回想起来,这似乎是一次失去的机会。哈耶克处于关键的位置,本来可以为奥地利经济学派在英国和美国的兴起做好准备。他当然可以做得更多一些,从而提高奥地利学派在伦敦的地位,让情况变得不同。但实际情况就是那样,哈耶克来到伦敦经济学院时,正是经济学系主任在政治上较为软弱,而学院管理层试图将经济学转向应用数学的努力吸引了大量才华横溢的学生开拓这个新领域的时候。此外,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还没变成它将成为的那个样子。这个学派还处于米塞斯突破性飞跃之前的阶段。首次在《国民经济学》(1940),继而在《人的行为》(1949)中表述的经济思想的完整系统,当时还只能见到最粗略的纲要。

最后,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哈耶克不是一位米塞斯主义者。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哈耶克就已经是他几年后描述的那种全局均衡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事后想来,对哈耶克没有做到他从未开始做的事情,或者没能取得他如果努力争取将会取得的成功而惋惜,是毫无意义的。他无法在20世纪30年代阐明和捍卫一个直到40年代才完善起来的学说。

回归外汇管制

从华盛顿国际商会会议返回奥地利后,米塞斯度过了繁忙的两个月,试图控制信贷银行危机带来的政治危害。7月底离开维也纳时,他已经协助击退了建立正式外汇管制制度的企图,如果这个企图成功,奥地利将倒退到1922年。他于9月中旬返回维也纳,正好及时得知英格兰银行放弃了金本位制,并拒绝以黄金兑现它发行的银行券。⁶⁶米塞斯感到震惊,害怕情况继续恶化。他称:“一周之内,英国将陷入恶性通货膨胀!”这一声明令研讨班学员,尤其是英国学生厄休拉·韦布非常吃惊。⁶⁷此时他还未能完全预见即将到来的政治崩溃。一周后,他再次离开维也纳,此次目的是去伦敦和法兰克福讲座。⁶⁸当他在10月6日返回维也纳时,政府已再次正式引入外汇管制,因而回到了一个他曾以为已经永远逝去的坏的旧时代。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写道:

641

奥地利的情况正在变化,我担心最坏的情况到来。我们发现自己再次处于管制经济中。外汇存量被“管理”着,各个工业领域都在建立某种类型的中央经济机构,虽然冠以不同的名称……高利贷法和征收就在眼前。人们没有汲取任何教训,也遗忘了所有事情。在这种环境下,你可以想象我的心情。⁶⁹

642

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盛极一时的短暂的自由贸易时代现在已经面临崩溃。更多的坏消息接踵而至。米塞斯的一些前盟友现在正用那些被驳倒了无数次的理论鼓吹通货膨胀。⁷⁰

有一件事可以代表整个状况:1930年7月,米塞斯受邀为国际联盟黄金委员会写一份备忘录。委员会的使命是,“考察和汇报黄金购买力波动的原因及其对各国经济生活的影响”。成员包括凯恩斯、卡塞尔、斯普拉格(Sprague)、和扬森(Janssen)——这无疑是一个坏信号。米塞斯依然接受这份任务,并于1930年10月初将论文递交给国际联盟(洛克菲勒资助的)经济情报单位主任亚历山大·洛芙迪(Alexander Loveday)。⁷¹不过出版推迟了。一年后米塞斯接到通知,黄金委员会征集的所有备忘录都不会出版,表面理由是预算因素。⁷²

米塞斯受邀加入了新的外汇管理委员会,而他的工作就是做所有他不赞成的事情。他接受这个职位可能是为了避免损害奥地利的国外信用:他的缺席会使外国投资者不安。

643

在一封给罗宾斯的信中,米塞斯描述了这个新的体系和他在其中的作用:

就在我返回维也纳时,疯狂的外汇管制获得通过。这个不幸的制度的顶端是一个外汇管理委员会。它决定所有与我们的对外贸易有关的事务,所以它也是某种类型的国民经济的最高管理者。我是该委员会中唯一的非干预主义成员,置身其中,好像置身于莫斯科第三国际的执行委员会……

存在一种对新干预主义措施、“国家资本主义”和“超干预主义”的普遍狂热……通过指出英国现在也正在采取保护关税政策,任何抵制这种政策的努力都会遭到专横的反对。⁷³

这个委员会的权力很快就被大大地削减了,可能是米塞斯从内部煽动的结果。米塞斯在信中称之为中央计划局,但是仅仅两周后,他在写给哈耶克的信中称,这个委员会是“一个完全多余的机构,因为它没有权力”,还说他后悔答应在那里浪费时间。⁷⁴

644 不过,委员职位似乎曾有足够的力量影响外汇在个别企业间的配置,这给予了米塞斯并不想要的照顾特别利益集团的权力。例如,1932年1月,他收到一封来自亚伯拉罕·弗罗魏因(Abraham Frowein)的信。弗罗魏因是一位重要的德国工业家,也是国际商会的副主席,他还在维也纳拥有一家丝绸厂。而获得外汇以支付进口原材料对这家企业的经营至关重要。米塞斯没有理睬“作为回报,今后如有差遣,但凭吩咐”的提议,而是将弗罗魏因的代表介绍给了委员会负责丝绸工业的一位同僚。⁷⁵

既然奥地利人不能购买外汇,也不能将先令带出这个国家,那么对普通人来说,旅行几乎就是不可能的——而米塞斯要经常去国外讲座,所以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⁷⁶不过,他刚与古斯塔夫·菲舍尔签订了新版《社会主义》的出版合同,古斯塔夫·菲舍尔同意成为米塞斯的非正式理财顾问。他不必支付版税给米塞斯在维也纳的账户,而是保留这笔钱,并将它一点一点送到米塞斯在德国旅途中下榻的宾馆。⁷⁷因此,米塞斯得以参加一些会议,例如1932年1月在柏林举行的社会政策协会董事会与委员会会议,以及同年9月的协会年度大会。

645 1931年秋回家后,米塞斯组织了一次国民经济学会会议,并在一次热情洋溢的演讲中抨击那种认为当前危机源于资本主义的缺陷,因而要求通过更多政府干预进行补救的观念。对于当前灾难,唯一的理性反应最终将是抵制工会。工会才是危机背后通货膨胀政策的根本原因。这次演讲吸引了国际关注。⁷⁸

一些人的反应是歇斯底里的,尤其是在米塞斯发表《危机与资本主义》(*Die Krise und der Kapitalismus*)表明自己的立场后。⁷⁹他过去的学生黑德维希·伦贝格尔(Hedwig Lemberger)声称,如果经济学除了允许不受限制的市场削减工资率以解决失业问题外,再没有其他方法,它就破产了。她认为,米塞斯的曼彻斯特自由主义分析仅仅适用于19世纪的状况,而当前的危机失业源于难以管理的快速技术进步。这是埃米尔·莱德雷尔已经解释过的。⁸⁰米塞斯回复说:

经济生活崩溃的原因在于工会政策使得工资率高于不受限制市场形成的工资率,以及政府通过失业救济和拒绝保护求职者支持该项政策,但我无法理解为什么看清这些原因就是宣告了经济学的破产……流水线作业与失业毫无关系。19世纪也存在流水线作业,甚至比今天的程度还高。但因为那时不存在对工资的干预,被解雇的工人可以在新的产业或延伸产业找到工作。如果不是大量妨碍工人自由迁移和改变职业由政府规定,他们可能被吸收得更快。我的假设不仅依托于过去一些时代的经验,如你所相信的,还特别在于无可辩驳的理论思考。⁸¹

646

最终,危机以与十年前的战后危机相同的方式平静了下来:更多的外债。1932年7月,奥地利从国际联盟获得3亿先令的外国信贷。通往新开端的道路已经畅通无阻。

* * *

危机促进了对商业周期研究的新的兴趣,同时也促使人们寻求政府操控经济的方式,以避免经济在繁荣与破产之间越来越激烈的摇摆。维也纳商业周期研究会发表了两份专刊,后来成了经济学文献的经典: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和弗里茨·马克卢普的《外汇信贷、工业信贷与资本形成》(*Börsenkredit, Industriekredit und Kapitalbildung*)。米塞斯对这些著作非常骄傲,尤其是马克卢普的书,他称之为杰作。人们非常需要奥地利学派对这些当代基础实践问题的分析,以反驳流行的反资本主义观点。米塞斯过去十多年的教学使命现在有了回报。多年后,米塞斯圈子的一个成员在书信中回忆“米塞斯、哈耶克、施特里格尔、摩根斯特恩和迈因尔(Meinl)这些死硬分子”⁸²利用一切可用的媒体和机构去为经济自由辩护,抵制政府干预主义。⁸³

647

这些活动对公共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奥地利政府推行的相对节俭的计划

取得很好的正面效果,这与其他西方国家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大量采用前凯恩斯赤字消费政策形成了鲜明对照。从 1932 年到 1937 年,工业和农业领域国民生产获得引人注目的增长,政府预算取得平衡,外债也减少了一半,中央银行的储备翻了一番,而失业人数也从 310 000 降到 220 000。⁸⁴

这个团体的一位盟友弗里茨·沃尔夫鲁姆建议对当时的状况进行彻底矫正:货币部门完全自由化。沃尔夫鲁姆不仅建议取消外汇管制。他还要求取消一切对私人铸币和私人发行银行券的限制。他认为,这种改革不仅是走出当前困境和避免将来类似危机的办法,还将导致其他国家的货币自由化。而这反过来又会提高贵金属的价格,并进一步使早期采纳者获益:

可以确信,第一个自由化货币经济的国家将从富有成效的利益中获得最大的利益;显然,这个过程一旦开始,每一个国家都必须跟随其他国家。⁸⁵

648 正如沃尔夫鲁姆的例子显示的,危机导致了古典自由主义运动内部的分化。一些人放弃了自由主义并转向干预主义,而其他人为了维护自由则变得更加激进。莱昂内尔·罗宾斯在写给米塞斯的信里说:

每天都有对自由交易和私人产权的新的侵犯,事情变得很清楚,能够为资本主义制度提供思想保卫的人非常稀少。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当尽力而为,可是,我们之中并没有那么多人投入这场战斗……这场危机让人难过的地方是,它似乎驱使许多曾经出色的自由主义者转向了另一阵营。对我来说,情况刚好相反,所有怀疑和情感保留都已经清除,我明白自己要比过去更加“严格”(streng)……当然,从敌方论据的质量判断,在那个层面上击败它应该不难。⁸⁶

米塞斯赞同这种看法。12 月底,他为《新自由报》写了一篇由两部分组成的文章,讨论金本位制及其敌人。他认为在国际交易中,黄金是不可替代的。即使在国内交易中,政府采用通货膨胀政策的程度越高,这种金属的地位也会变得越强。⁸⁷

649 1932 年 2 月,记者罗伯特·朔伊(Robert Scheu)邀请米塞斯参加一种全新的采访形式:脱口秀。⁸⁸他接受了这个提议。朔伊的想法是,就当前紧迫的经济问题对杰出的专家进行现场采访。采访会在一个公共礼堂进行,并广播给听众。1932 年 3 月初,第一位受访者是奥特马·施潘。奥特马·施潘很少进行公开演讲,不过当

晚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成功。米塞斯还有些迟疑。从以前的通信中,米塞斯知道朔伊是一个货币民科,他会制造一连串的问题要求米塞斯回应。最终,3月17日星期二,米塞斯在脱口秀中出现,讨论金本位制与其他货币制度的比较、一国经济体中货币流通的管制、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中的角色、国家通货的创造以及西尔沃·格泽尔(Silvio Gesell)的理论——格泽尔是德国最受欢迎的货币民科,他鼓吹通过对“窖藏”或者储蓄征税鼓励消费的新法律。⁸⁹

1932年4月初,米塞斯最终促使商会采纳一项反对人为操控先令汇率的决议。阿尔伯特·哈恩从法兰克福写信询问米塞斯,他在多大程度上对商会报告的内容负责。对此,米塞斯回复说:

决议源于我起草的第一份草案,但是,经过困难和漫长的磋商后,为了获得一致同意,它已经是经过妥协的修订版。因此,我自己当然不能负公共责任。我只是将事情陈述得尽量清晰。⁹⁰

奥地利政府没有改变路线。到了6月,在不扰乱价格体系的情况下回归旧的黄金平价已经变得不可能了,因为这个价格体系已经适应当时的环境。经济状况显著恶化,米塞斯非常愤怒,在一封写给德国同僚和朋友G. M. 维瑞京·斯图亚特(G. M. Verrijn Stuart)的信里严词谴责:

650

在奥地利,我们站在干预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残骸上。所有公共企业财务状况都很糟糕……大量的税金必须用于弥补这些赤字。失业率上升,失业救济毁坏公共财政……但是,愚蠢的极致是外汇管制。

想要研究彻底的国家社会主义、城市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后果的人应该研究奥地利,在这里我们享受着政府“不间断”的干预。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那些“仅仅”主张支持保护关税和反对进口禁令的人都成了自由贸易者。⁹¹

可能就在此时,米塞斯成了“金属主义者”——他曾支持金汇兑本位制,但现在提倡金属货币,因为金属货币可以将政府完全排除在货币政策之外。⁹²二十多年前,在第一版《货币与信用原理》中,他几乎是嘲笑了那些相信贵金属铸币是比银行券更好的货币的笨蛋。⁹³他年轻的时候碰到过的金币和银币都只是收藏品(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收藏家)。他一直很清楚金属本位在保持货币数量对政治操控

651

的独立性方面的优点,但他从来没有提倡金银币的实际流通。可是,现在的证据是不可否认的了:即使在货币生产领域,政府也是不可信任的。

在他的余生,米塞斯始终是一位金属主义者。在1948年1月举办的一次讨论金本位制的圆桌会议中,米塞斯只发言了一次,只是为了强调另一位发言人的观点:

在目前情况下,不回到有效的金币流通是不可能回归金本位制的……如果日常交易使用金币,如果每个人都惯于接受和支付金币,如果人们惯于携带金币进行零售交易,公众就会明白黄金才是国家标准货币的事实,就会明白这个国家是基于金本位制的。这个认知不仅具有教育价值,它使普通人及时明白,政府是在坚持健全的货币政策,还是在干预货币体系。以下事实清楚表明了缺乏有效金币流通的金本位制的弱点:它使普通人在早期阶段辨识出通货膨胀的存在成为极其困难的事情……有效的金币流通使选民成为金本位制的监护人。这是它的主要功能。⁹⁴

《社会主义》第二版

政治层面的战斗也影响了米塞斯的学术追求,特别是教学。1931—1932年私人研讨会的聚会更不规律,或者,总之不像通常那么有计划。至少有些阶段显然是在讨论资本和商业周期理论,马克卢普、摩根斯特恩和布洛赫都曾作过主题发言。⁹⁵

米塞斯的大学研讨会现在关注社会科学的认识论问题。⁹⁶冬季学期的主题有:理论与实践和事实与理论之间的关系;是一应该的不同含义;经济学知识的普遍有效性;定量和定性知识;统计、历史和理论研究的关系;理解(*verstehen*)的含义;动作主义(*behaviorism*);数理方法;经济学预测;经济学与社会学。

米塞斯不得不推迟了他在1932年夏季学期的课程,因为他要参加国际商会的两个会议,同时还要参加在柏林举办的一个国际经济会议——此次国际经济会议再次联合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政治家和专家讨论当前危机对国际商业和金融的影响。⁹⁷⁻⁹⁸研讨会继续冬季学期的讨论,特别是关于动作主义及其与德国历史学派方法的关系、“意义”在社会科学中的含义及其与功效主义的联系、经济人的概念、经济学与社会学、社会学与历史学,以及,再次讨论了经济学的预测。⁹⁹

米塞斯在1931—1932年最大的学术计划是为《社会主义》第二版的出版做准

备。从美国一回来,他就自己桌子上发现了一封来自古斯塔夫·菲舍尔的信件,通知他《社会主义》就要售罄,并询问他是否有兴趣发行第二版。¹⁰⁰他当然愿意。第一版印数为2000册,外加100本赠书和评论本,发行两年内就卖出了1000多本,以至于菲舍尔在1924年曾预测,1925年后的某个时候可能需要出版第二版。¹⁰¹不过,销售最终没有达到预期。

米塞斯的朋友F. G. 施泰纳(一个巴黎银行家)认为,此书不够流行的主要原因在于它的德文标题不好。关于“公有经济”(Gemeinwirtschaft)的知识,对于教育程度较低的读者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施泰纳希望新版尽快出现:

现在,某种失败主义情绪正在资产阶级成员之间扩散,而且扩散的程度要比你的著作首次出版时更为严重。你的著作的出色论证可以提供必要的鼓励。¹⁰²

米塞斯可能在1931年夏开始着手修订手稿。为了不增加书的篇幅,他不得不删除某些部分以增加新的内容。¹⁰³例如,他听从罗宾斯的建议,加入了一个对工团主义不可能性的评论,还增加了对海曼《剩余价值和公有经济》(Mehrwert und Gemeinwirtschaft, 1922)的讨论,作为新版的附录。¹⁰⁴关于海曼的部分强调了定价问题的动态性质。生产要素的价格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消费品价格,因为企业家是为未来消费而生产的,而未来的消费品价格不能直接从当前价格推断。

654

1931年10月底,米塞斯将修订稿前405页交给了菲舍尔。然而,由于米塞斯更深深地卷入了与外汇管制的斗争,修订过程慢了下来。为了不至拖延太久,米塞斯请求四位朋友帮他检查校样。¹⁰⁵分工进行得很顺利,1932年2月26日,米塞斯将最后的部分寄给了菲舍尔。菲舍尔次日就收到了稿件,并立即转寄给了位于瑙姆堡(Naumburg)的利珀特公司(Lippert & Co.)。一个月后,菲舍尔拿到了第一批书,4月1日,米塞斯在维也纳收到了自己的赠本。¹⁰⁶⁻¹⁰⁷

这本书对米塞斯来说是一个经济上的成功。米塞斯收到了1500册书的预付款,按销售价格的15%,加上版税共有4050马克。但最令人满意的结果是朋友和敌人的反应,他们都认为新版是“科学的经济学文献中最重要的反社会主义著作,肯定也是最重要的自由主义著作”。¹⁰⁸有些批评认为米塞斯没有考虑解决社会主义计算问题的最近尝试,可是他们没有试图提及或描述这些所谓的新方案。另一些批评将米塞斯的观点视为“乌托邦”。有些评论显然可怜米塞斯,认为他的激进主义让盟友越来越少。其中一个评论写到米塞斯的“悲剧命运”:

655

(他)如此坚定与坦诚地拥护所谓“古典”经济学家的自由主义,这使他成为一个令人为难的人——对于那些正常而言本会赞同他的人来说。米塞斯鄙视一切对社会政策和意识形态问题的让步,因此,他为许多不像他那么有勇气的自由主义理论家提供了一个廉价机会,让他们以一种自私和“怜悯”的方式将自己与他区分开来。¹⁰⁹

656 这个评论不经意间指出,米塞斯为所有人,包括评论者本人,提供了一个极大的好处。他们都反对全能政府,但是又不愿意像这位维也纳经济学家那样激烈地缩小国家范围。米塞斯把这些半生不熟的自由主义者置于一种舒适的中间位置。他们可以利用他的观点,而又不必采纳这些观点的实践含义。米塞斯使得他们看起来不那么激进了。

米塞斯的激进主义确实疏远了一些本来会成为亲密战友的人,这是事实。但它同时改变了许多思想开明的读者的想法。他们愿意比较他的观点与他们自己偏见之间的优劣。这些读者通常承认米塞斯对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的分析是恰当的。米塞斯的著作让他们理解了,不应混淆资本主义和观察到的“传统经济秩序”现实。

一个评论者说:

这部著作的最大价值可能就是,它表明当代资本主义(所谓的个人主义经济制度)的缺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以下事实:一段时期以来,我们没有出现过这样一种制度,更不用说它还由于国内利益和对外政策的原因而遭到扭曲。¹¹⁰

另一位评论说:

在某些圈子,人们称米塞斯为自由主义经济秩序最后一位逻辑一致的代表。他当然不是最后一位,但却是许多年来第一位敢于全面思考这样一种秩序的全部后果并以不可动摇的逻辑树立和证明一种学说的人。¹¹¹

657 最热情的回应来自一批年轻经济学家,但这些追随者并不认为米塞斯的观点能够迅速改变主流倾向。其中之一是乌兹堡大学的格奥尔格·哈尔姆,他说米塞斯本人过于乐观了:

我认为没有一本著作能像您的《社会主义》一样在其领域内具有如此重大的革命意义。后人可能会比您的绝大多数同时代人更清楚地认识这点。您曾说过,今天您的观点很少受到挑战,我相信您太高估了您的同时代人。莱德雷尔讨论您的《社会主义》的小册子,“计划经济”,不就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吗?¹¹²

社会政策协会德累斯顿会议

米塞斯的确高估了他的那些同僚,1932年1月4日和5日于柏林召开的社会政策协会董事会和委员会会议上,他就遇到了这样一些人。他曾不成功地鼓励哈耶克参加这些会议:“无疑它会很有趣,或许它将是取缔高利贷(*Brechung der Zinsknechtschaft*)之前的最后一次会议。”¹¹³ 658

米塞斯希望说服委员会在即将举行的德累斯顿全体大会上讨论价值理论和卡特尔经济学。但经过激烈的辩论,两个方案均遭反对,委员会决定将国家自给自足——通过贸易孤立获得经济“自给自足”的问题纳入议程。米塞斯认为这个决定完全不可接受,并认为它可能会毁掉协会。协会内部没有讨论自给自足问题的共同基础,将它作为讨论主题势必强化而非缓和成员之间的冲突。¹¹⁴

米塞斯的幻想破灭了:协会无意促进有效的科学协作。他甚至都不打算参加德累斯顿会议了,不过,他从施皮特霍夫那里得知,最终会有一个小组委员会讨论价值理论问题,于是他改变了主意。¹¹⁵ 为了准备这次会议,施皮特霍夫和米塞斯编辑了一本价值论文集:《价值理论问题》(*Probleme der Wertlehre*)。该书的一些章节来自奥地利学派价值理论和价格理论的支持者和反对者。¹¹⁶ 对作者的选择保证了所有主要观点获得充分表达。表面上看,最大的区分就是现代经济学家(支持边际价值理论作为价格理论基础的人)和他们的各类对手,包括卡塞尔主义者(克龙普哈特[Kromphardt])、历史主义者(戈特尔特)、马克思主义者(奥本海默)和普遍主义者(施潘)。这种区分也反映出米塞斯和施皮特霍夫的合作编辑关系,因为施皮特霍夫就被认为属于不同阵营。但更关键的是,这本书是米塞斯策略的一部分,他试图通过此书告诉大家:经济学不仅是个人意见的问题。某些根本的事实是所有过去和现在经济学家一致同意的,不管他们属于哪个不同的学派。 659

1932年9月28日与29日全体大会结束后,小组委员会会议立即开始了。米塞斯作了开场讲话,强调边际价值理论能够独立解释所有经济现象,而且不同形式的边际原理之间并没有经济科学的敌人声称的那么不一致。¹¹⁷ 一家报纸报道说,参

加这次会议的是一个来自维也纳的大代表团,以及“支持国外盛行的边际效用学派”的学者。这些与会者表明了“怎样才能继续推进维也纳学派和洛桑学派富有成效的理论发展。”¹¹⁸

660 讨论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发生很多争论,因为价值理论的反对者们——利夫曼、卡塞尔、施潘和奥本海默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他们的追随者也没有出现。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太寻常的事情,人们在会议序幕时就注意到了。因此,辩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维也纳人自己的事情了。

但从当代历史角度看,德累斯顿会议也是一个突破。它是德国政治经济学复兴的一个高点。在此之前的十年,经济理论重新获得了高等教育领域的认可,而在这个领域,历史学派曾在很长一段时期拥有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这一变革体现在1931年的三本出版物,而米塞斯在其中扮演着核心角色。

这些出版物中最重要的是阿道夫·韦伯教科书的第三版。按照米塞斯的判断,这本书是当时最重要的德语经济学教科书。¹¹⁹类似地,法兰克福教授巴奇(Budge)发表了她的货币经济学教科书:《货币理论》(*Lehre vom Geld*)。他在书中承认了米塞斯的成就,并批判性地讨论了米塞斯的观点。¹²⁰最后,同样重要的是,格奥尔格·哈尔姆根据波勒的笔记,出版了晚近路德维希·波勒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准教科书的修订版。大量的增加内容带来了对社会主义计划的更为根本的反驳,它的观点得到来自《社会主义》和米塞斯其他作品的引文的支持。

661 同年,哈尔姆在乌兹堡的一位博士生卡尔·瓦格纳(Karl Wagner)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他的论文彻底粉碎了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得到了米塞斯的赞赏。¹²¹瓦格纳是一位很有希望的年轻经济学家,后来遭到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冷遇。米塞斯在德国土壤上撒下的种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冬季。他们中的多数没能熬过纳粹统治时期。幸存的几位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经历了一轮短暂的怒放,协助在俾斯麦和希特勒曾经肆虐的土地上重建了市场经济。

1932年德累斯顿会议让我们感受到了未来可能的发展路径——如果允许米塞斯自由开展关于经济科学的自由至上主义政治含义的讨论的话。会议第一天的论题是“工业化与失业”。当时维尔纳·桑巴特是协会副主席,负责遴选和邀请演讲者。不过,似乎很难找到他认为合适的演讲者。最终,他选择了他的弟子,苏黎世的曼努埃尔·赛祖(Manuel Saitzew)和基尔的格哈德·科尔姆(Gerhard Colm)。但他们都不赞同桑巴特主义路线,这一路线将德国和奥地利的大规模失业视为工业经济化和作业流水化的结果。他们认为,这样的技术变迁不会导致永久和大规模失业。赛祖认为,真实的原因包括高关税,而科尔姆指出,原因在于强大的工会

和卡特尔导致的工资和其他价格的刚性。科尔姆还声称,现代的破产法以及对亏损企业的补贴伤害了市场的选择过程,因为这些法律对债务人太宽容了。显然,这些观点是不为桑巴特或协会当权派所喜的。¹²² 662

1932年9月29日星期四(也即会议次日)的情况,更加有力地说明了经济常识已在多大程度上取代了过去对干预主义教条的拥护。会议原定讨论自给自足问题,但却再次走上了按照协会领袖的预期来看完全不同的方向。这次,桑巴特仍然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为自给自足提供坚实的基础。他最终安排了康斯坦丁·冯·迪策(Constantin von Dietze)和埃米尔·莱德雷尔,而他们最多只是温和的自给自足论者。¹²³ 迪策对自给自足的支持有些敷衍了事。迪策主张,“食物自由”在战争中是必不可少的,另外,农业工人的身体条件更加适合成为士兵。但他最后却得出结论说,自给自足不能解决失业问题,他真正的信心在于自由市场的力量。这次大会的高潮是,身居柏林大学要职的埃米尔·莱德雷尔以其权威地位进行了一场“基于传统自由贸易学说和最新统计数据的才华横溢的演讲”,¹²⁴ 声称没有比德国更不适合采取保护主义政策的国家了。在接下来关于自给自足的辩论中,几乎所有发言者都强调,不应该将自由贸易视为与国家利益对立而反对它,也不应该以其他国家的贸易政策为条件制定自由贸易政策。

路易丝·佐默为维也纳一家重要商业报纸写了一篇关于此次会议的评论,她注意到了以下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讽刺:协会中的大多数人现在都拥护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佐默将这个新的多数派的出现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当时海因里希·赫克纳对米塞斯的《社会主义》的赞同导致了一场“社会政策危机”。佐默写道,米塞斯的思想是20年代德国知识分子地图转变的首要动因: 663

米塞斯(在该书中)提出的思想已经影响到了社会政策协会的整个思想体系,并使之转向支持自由市场经济。从这点看,协会无疑改变了它的目标。它现在已经成为经济原理和经济秩序问题的辩论战场。这是协会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在这一年的会议中,自由市场观念获得了复兴,而反对自给自足和整个束缚经济生活的限制和管制体系的战斗,也以更大的能量爆发出来。¹²⁵

米塞斯终于开始激发起年轻一代德国经济学家的自由精神,然而就在此时,旧讲台社会主义赢得了最终的全面胜利。1933年1月30日,他们的思想后裔阿道夫·希特勒出任了德意志帝国首相。

纳粹掌权后,立即开始了他们的同步行动(*Gleichschaltung*)计划(强迫一致行

动,字面意思是“同步”),这个计划的目标是迫使所有机构服从已经控制联邦政府的中央纳粹组织。协会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成为纳粹机构的一部分,要么自行解散,最终在1936年12月,它体面地选择了解散。而更值得尊敬的是,米塞斯为了抗议同步行动法案,在三年前就退出了协会。¹²⁶

* * *

不仅如此,米塞斯还是呼吁国际社会为那些遭到纳粹驱逐的德国学者提供新的工作机会的发起人之一。1933年3月底的一天,贝弗里奇和罗宾斯在维也纳与米塞斯共进晚餐。他们的一位奥地利朋友冲进布里斯托尔饭店大厅,带来了纳粹解雇大量犹太学者如博恩、曼海姆(Mannheim)和坎托罗维奇(Kantorowicz)的消息。他们三人当场就讨论了怎样帮助这些德国社会主义者的问题。在法国和英国设立救助基金雇用他们是否可能?贝弗里奇宣称他将负责伦敦经济学院的救助行动。回到伦敦后,罗宾斯组织了一次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委员会会议,投票表决一项雇员“自愿”减薪以为救助基金募集资金的计划。他还说服贝弗里奇支持一项更大的计划,最终创立了一个全国规模的救助基金。在一封写给米塞斯的信中,罗宾斯报告了行动的进展,赞扬米塞斯从一开始就敏锐地洞察了新形势的实践意义,并发起了一个有效的回应。¹²⁷

经济理论的完成

在讨论价值理论的德累斯顿会议中,米塞斯已经强调,只有在那些不排除普遍有效的社会理论之可能性的人中间,才会发生富有成效的辩论。而那些基于先验理由排除这种可能性的人,被迫支持米塞斯最终称为多逻辑论(polylogism)的东西——这是一个极端历史主义假说,即不存在普遍有效的社会理论,因为人类的心智结构是不断变化的。根据这种假说,不仅不存在一种普遍有效的人类行为理论,实际上有多种不同的“行为逻辑”。

社会主义者约瑟夫·迪茨根(Josef Dietzgen)曾是多逻辑论最直率的拥护者,他独立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发展出了一种唯物主义哲学。¹²⁸1929年,随着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Ideologie und Utopie*)的出版,多逻辑论开始进入科学辩论的视野。¹²⁹它迅速获得了所有政治阵营的支持。它是人们回避论据的考察(尤其是由经济学家提出的)和以谩骂的情绪诉求取代严肃的推理过程的便利工具。鼓吹多逻辑论者“可将所有他不喜欢的理论直接宣布为资产阶级理论,而不用仔细

研究它们的内容和论据”。¹³⁰毫不奇怪的是,德国种族主义者渴望采用同样的轻松战略,以避免对雅利安优等种族意识形态的批判性讨论。米塞斯回忆道:

布雷斯劳大学的比贝巴赫(Biberbach)教授对盎格鲁—撒克逊—法兰克—犹太数学和德国数学作了区分。诺贝尔奖获得者莱纳德(Lenard)教授相信,只有德国物理学是真正的物理学,所有其他国家的物理学都只不过是胡说。¹³¹ 666

几年后,米塞斯解释了这种思想潮流的历史背景:

直到19世纪中叶,每个人都想当然地认为人类的心智逻辑结构在所有人类之间没有不同。所有……人类关系都是基于这个假设。无论人们在何处遇到别人,在这一点上他们从来不会有任何疑惑。所有哲学家和所有普通人都同意——都一致认同这个信念。

但在19世纪中叶,卡尔·马克思阐释了一种不同的观点。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不同阶级成员之间的心智逻辑结构是不同的。人类心智无法发现真理而只能发现意识形态。在同一阶级的成员眼中,意识形态看起来是真实的,但在其他阶级的成员的角度来看,则是毫无意义的。每一阶级都制造自己的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又被后来的其他阶级的意识形态拆穿。按照这种方式,马克思将约翰·洛克的哲学形容为“资产阶级哲学”。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将叔本华称为食利阶级哲学家,将尼采称为大企业的哲学家。第三国际的创始人列宁和第二国际的书记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曾研究过马赫的物理理论是否属于资产阶级。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则被某些布尔什维克打上了“资产阶级与反动分子”的烙印。¹³²

在1932年德累斯顿辩论中,米塞斯指出,任何对多元逻辑假说的支持都会陷入一种自相矛盾,因为只有假设人类心智结构独立于社会阶级或种族阶级,观点交换才有意义: 667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把这个词不仅理解为以马克思的名义宣誓效忠的政党的成员,而且理解为所有在思考有关人类行为的科学时求助于马克思的人——堕落到与不是自己阶级同志的人讨论科学问题,就已经放弃了他的

理论的首要原则。如果思想是以思想者的社会存在为条件的,他怎么能理解我,我又怎么能理解他呢?如果存在一个“资产阶级”逻辑和一个“无产阶级”逻辑,那么作为“资产者”的我,又如何理解作为“无产者”的他呢?那些真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必定赞成彻底区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科学;而且,只需必要的修正,这样的区分也适用于那些认为思想是由思想者的种族和国籍决定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者不会对运动竞赛的区分感到满意,例如区分为一个“资产阶级”奥林匹克运动会和一个“无产阶级”奥林匹克运动会。他必须首先在科学讨论中进行这种区分。

668

社会政策协会和社会学会组织的许多毫无成效的讨论都可归因于对这一原则的忽视。在我看来,武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是错误的,但有些马克思主义者试图与他们所谓的“资产阶级科学”的代表进行讨论,却是立场混乱。逻辑一致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会试图反驳他称为“资产阶级”的对手。他要在物质上和道德上消灭他们。¹³³

在一篇为德累斯顿会议准备的论文中,米塞斯已经强调过多逻辑论的更宽泛的含义,将它刻画为一个“对逻辑和科学的浪漫反叛”,并指出它“并不将自己限定在社会现象和人类行为科学的范围之内。它是对我们整个文化和文明的反叛”。¹³⁴

在德累斯顿,埃米尔·莱德雷尔指出这种观点有些夸大其辞。米塞斯错误地认为,“存在决定意识”理论意味着思想的任何一个个别例子都是意识形态,但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意识形态是指经济利益的精神化。按照莱德雷尔的观点,并没有人声称不存在普遍有效的理论。逻辑学和数学当然都是普遍的。但这不能否定还有其他学科,它们的基本范畴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历史状况,或者说当时的社会结构以及思想者的社会地位”。莱德雷尔继续说:

669

现在的问题是,经济学究竟属于第一类完全依赖于纯粹的直觉(*reine Anschauung*)和逻辑的科学,还是属于现代社会学意义上——或者如你所愿,马克思主义意义上——取决于社会的知识领域。冯·米塞斯先生显然与重农主义者意见相同,后者相信重农主义的理论就像毕达哥拉斯定理一样对每个理性的思想者都有效。……显然,冯·米塞斯先生声称经济理论在其全部范围内具有同样的等级、同样的有效性,而这正是我所否定的。经济理论有一个核心独立于历史经济发展,这是事实。但是这种一般理论,或者精确理论,或者纯粹理论,虽然使我感到亲切,从全部历史阶段来看,却并不是经济行为理论

的本质。这个理论的基本内容没有那么宽泛,它本质上只包含静态过程或静止循环(Kreislauf)。它最终从经济化的原理演绎出了所有的推论,似乎适用于依赖自然的人类一样。¹³⁵

米塞斯在回应中指出,静态经济理论并不仅仅适用于静态过程,还尤其适用于变化。“静态”这个术语并不意味着探究的对象是一个静态经济,而是说它是一种特别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研究一个变量发生变化的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换句话说,在保持所有其他数据不变的假设下。¹³⁶但米塞斯还没有澄清他关于经济学认识论特征的观点。这将是回到维也纳后的任务,在那里他完成了论文《人类行为科学的任务和范围》(The Task and Scope of the Science of Human Action)。

米塞斯计划出版一部关于经济分析基本问题的新书,而用这篇文章作为前言。此书将收入过去五年内他在认识论和价值理论领域发表的各种文章。他的设想是澄清经济科学的基础,不仅通过对其哲学特征的一般讨论,还通过重申价值和资本理论的核心概念。因此,这本书不仅包括从哲学角度对经济学的介绍,还有对价值和不可转换资本的实际经济分析。前三章探讨认识论问题,构成大概五分之三的篇幅。接下来四章处理价值理论,而结语是他为维瑞京·斯图亚特纪念文集写的论文。

670

1932年圣诞节,米塞斯完成了这本书稿的修订,并于1933年1月3日写信给古斯塔夫·菲舍尔,希望出版此书。菲舍尔不太相信这本书能卖得好,但同意出版。4月中旬,米塞斯收到了第一批《经济学的基本问题》(Grundprobleme der Nationalökonomie)。¹³⁷

此书第一章是米塞斯的新文章《人类行为科学的任务和范围》。它是米塞斯多年营建的经济学体系的拱心石。米塞斯回应了莱德雷尔的挑战,认为经济法则则是先验为真的,与逻辑和数学法则地位相当。¹³⁸直到今天,这仍然是他最具争议的信条之一,但是由此引发的多数争论都是源于对他的立场的误解。20世纪的社会科学家一般认为,科学总是以“经验”为基础,因而所有基于某种任意的“先验”原则的命题都不是科学。米塞斯同意这点。从早年作为学生开始,他就已经是一个坚定的事实导向的支持者。在关于价值判断的争论中,他热情地支持马克斯·韦伯,认为科学的恰当范围是如其所是的世界,而非如其当是的世界。米塞斯自己严格持有这样的观点,即真正的科学总是与可验证的事实相关。

671

那么,为何他的认识论观点如此具有争议呢?多数其他社会理论家相信,与社

会科学相关的事实可以通过基于观察的研究方法得知。米塞斯不赞同这个观点。米塞斯继承了卡尔·门格尔追求“经验理论”的传统,相信经济理论描述了真实世界的事实,例如,人类进行选择的事实。¹³⁹但是这类事实是无法观察的——我们不可能通过例如视觉、嗅觉或触摸了解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不是一门经验科学,但它仍是一门科学,因为它所处理的事实虽然不是人类感官对象,却是真实的。正确分析这些事实的方法是通过“推论理性”。

米塞斯再次强调,他深信经济学是一个更为一般的社会理论的一部分。现在,他更精确地描述了这个一般理论的详情。它是人类行为的理论:

672

人类行为科学致力于获得普遍有效的知识。作为一个理论体系,这门科学迄今为止最精心阐释的分支是经济学。在其所有分支中,这门科学是先验的,而不是经验的。正如逻辑学和数学一样,它不是得自经验,而是先于经验。它现在就像过去一样,是行为和行动的逻辑。¹⁴⁰

莱德雷尔认为经济理论只有一部分是普遍有效的,也即在处理人类行为与自然的均衡关系方面是普遍有效的。米塞斯如何回应莱德雷尔的这个观点?米塞斯指出,“普遍有效”并不意味着所有人类行为法则都适用于人类行为的每个个别例子。相反,它意味着,无论何时,只要一个法则指定的具体条件得到满足,这个法则就是有效的。条件是否存在是一个经验问题;但是一旦得到满足,法则就在先验层面上为真。

例如,如果在我们的思想中没有暗含着经济数量关系的概念和经济财货的概念,我们就不能理解经济行为和经济的概念。只有经验能够告诉我们,这些概念是否适用于我们生活其间的环境下的任何一件事。只有经验能够告诉我们,外部世界并非所有东西都是免费财货。但是,告诉我们什么是免费财货、什么是经济财货的不是经验,而是理性,理性是先于经验的。¹⁴¹

673

人类行为得以发生的某些经验条件是普遍给定的。例如,所有人类行为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所有行为的人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老。其他经验条件,例如货币的使用具有相对偶然的性质。但是,无论这些条件是普遍的还是偶然的,一旦它们出现,就会产生特定的客观效应,而这就是人类行为先验理论的主题。

人类行为理论并不依赖于感官搜集的资料,而更依赖于我们通过推论理性知

道的先验事实,因此,我们无法通过完全来自观察的经验对它加以验证或反驳。米塞斯强调了这一个基本的认识论事实的实践含义:

人类行为始终面对作为一种复杂现象的经验;甚至在能够把经验放在一个可以证实或否定的假说的前后关系之前,就必须首先用理论来分析和解释它。因此,当对立的学说的支持者们指出同样的历史资料作为自己正确性的论据时,伤脑筋的僵局就产生了。统计学可以证明某些事情的陈述正是对这种真理的一种流行认识。无论一种政治或经济纲领多么荒谬,在其支持者眼中,都不会与经验相矛盾。任何先验地相信自己的学说正确性的人总能指出,某个根据他的理论若要取得成功必须满足的根本条件还不具备。每一个德国政党都在第二帝国的经验中寻找自己纲领正确性的证据。社会主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经验中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只有转向普遍正确的理论,才能解决有关具体历史经验的证明能力的争执——这种理论是与所有经验无关的。每种据称来自历史的理论论点都必然成为脱离任何历史的纯粹理论的逻辑论点。¹⁴²

674

维也纳的暮光

经济学认识论问题在米塞斯的维也纳私人研讨会继续得到讨论,但在那里,他的观点遇到了比在德累斯顿多得多的反对(也更高明)。研讨会的几位成员同时也是一个实证主义哲学讨论小组(维也纳学派)的成员,包括费利克斯·考夫曼和罗伯特·瓦尔德(Robert Walder)。他们将这些问题带入了完全不同的视角,而且他们的观点与研讨会主持人观点的冲突是那些聚会中最精彩的部分。研讨会(通过后来其主要参与人的回忆积累起来)的名气大多归功于它最后几年的方法论之争。米塞斯把他们描述为“充满活力,甚至有着强烈激情的人”。¹⁴³

1933—1934 学年的讨论非常出色,而且很幸运地迎来了大批杰出客人的到来。此时,米塞斯已经不仅仅是一位闻名遐迩的作者,他是德语经济学界公认的领袖。1929 年初当选为社会政策协会董事会成员后,私人研讨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客人,尤其是来自外国的客人。阿尔文·汉森于 1929 年到访,1930 年 5 月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呆了一段时间,卡弗(、巴特森(Batson)和其他人在 1931 年到访。但最高潮是在 1933—1934 年,这段时期有四位日本学者(石谷[Itschitani]、水谷[Midutani]、大高[Otaka]、竹村[Takemura]),还有休·盖茨克尔(Hugh Gait-

675 skell)、罗格纳·纳克斯(Ragnar Nurkse)、卡尔·普里布拉姆、弗朗索瓦·佩鲁(François Perroux)、格哈德·廷特纳(Gerhard Tintner)和伊曼纽尔·温特尼茨(Emmanuel Winternitz)等参与了讨论(此处只列出较重要的访客)。¹⁴⁴

3月9日,米塞斯为一场为期三个月的辩论作了开场演讲,这次辩论专门讨论经济学是否属于一门先验的人类行为科学的问题。米塞斯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同时还强调了考夫曼的立场。考夫曼认为经济科学是基于一些来自习俗的(可能虚构的)约定的学科。¹⁴⁵米塞斯的论文强调了自己的观点难以说服其他参与者的原因。这篇文章比他以前写的文章更进一步,他强调说,经济理论是一门先验学科,因为它不能通过实验室的实验得到验证或反驳。这种论辩方式相当难以让人信服,因为它似乎只是从一个技术难题得出一个认识论的结论。至少,对于后来四位发言者没有说服力。¹⁴⁶

* * *

676 1931年经济危机后,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提议与鲍尔领导的社会党建立一个联合政府。鲍尔拒绝了,选票很快转向奥地利国家社会党(Austrian National Socialists)。基督教社会党现在相信,遏制国家社会主义浪潮的最佳方法是采取独裁方式镇压政府的反对派。1933年1月30日,国家社会党在德国掌权后,这种策略得到全面加强。许多观察家预期奥地利也会落入他们手中,特别是因为他们通过大众媒体和恐怖爆炸反对奥地利政府及其盟友,以支持他们在奥地利的分支机构。¹⁴⁷

奥地利政府在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领导下试图阻止纳粹浪潮,保持奥地利的独立。他们陷入绝望后,最终决定与法西斯意大利结盟,同时对内政策也寻求建立独裁手段。¹⁴⁸1933年3月4日,为了抗议一个程序问题,议会的三位议长全体辞职,于是陶尔斐斯利用这次恰当的机会,废除了议会共和制。三位议长中的最后一位正式召集议会于3月15日开会,但此时陶尔斐斯插手了,他说服议会中的基督教社会党议员支持他的政变(*coup d'état*),并派警察阻止(亲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和德国民族主义者在3月15日的联合。后来的几个月里,陶尔斐斯还取缔了共产党和德国纳粹党的奥地利支部。自此以后,他根据1917年通过的紧急法案实行独裁统治。5月20日,他建立了爱国阵线(*Vaterländische Front*),号召所有力量都效忠
677 于奥地利国家。在1933年9月11日的一次大会上,陶尔斐斯宣告,他的祖国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基于社会等级,在一个强有力的独裁领导下,社会主义的、基督教的和日耳曼民族的奥地利”。¹⁴⁹

在意识形态方面,陶尔斐斯政体依赖于最新的天主教政治和社会理论,这套理

论体现在奥特马·施潘和教皇庇护十一世的著作里。他们赞美那种基于职业身份或社会阶层的社会秩序。^[150]施潘的观点对德语世界有很深的影响,不过他的影响仍然无法与庇护十一世的教皇通谕(*Quadragesimo Anno*, 1931)相提并论,后者对社团主义运动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正如米塞斯在瑞士的一位通信者所说,年轻的天主教政治家们完全被这种思想感染了,其影响甚至超过了奥特马·施潘的思想。¹⁵¹

1934年2月,警察试图夺取社会民主党在林茨省城的一个军械库,这是社会主义者最后一次起来反抗陶尔斐斯的独裁统治。陶尔斐斯血腥镇压了他们的反抗,并不失时机地利用这次机会将社会民主党逐出了议会。随后,剩下的代表投票产生了一部“新宪法”,这部宪法从根本上回到了1907年前的宪政体制。议会成员不再由普选产生,而是由主要的“社会团体”例如地主、牧师、工会和工业家等指定。新宪法于1934年5月1日公布。1934年7月25日,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在国家社会党一次未遂的政变中遇刺身亡。随后,德国军队开始向奥地利北部边境进军。只是因为墨索里尼在南部边境集结军队,誓言保卫奥地利国家的独立,德国军队才被召回。自此以后,奥地利的命运就置于意大利政府的手中了。¹⁵²

在这些事件发生的过程中,米塞斯在维也纳的生活也越来越令人不快。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样,正式的政府审查制度再次出现。多年来,弗里茨·马克卢普一直每周为《新自由报》撰写评论。1934年5月他停笔了,因为只有少数题目仍然不受审查,这样的写作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就在此时,马克卢普获得了一笔洛克菲勒奖学金,追随沃格林和哈伯勒的脚步去了美国。现在,米塞斯自己也将离开,这是他的朋友和同事圈子的巨大遗憾——他们在他的私人研讨会多年来最兴盛的时候向他道别。

费利克斯·考夫曼最后一次为米塞斯写的歌:

再见,米塞斯教授
米塞斯小组将何去何从,
在未来的岁月?
日内瓦不能满足我们的期盼,
我的手指不会停止敲击。
这个问题永远萦绕我心,
研讨会就是我的全部……¹⁵³

6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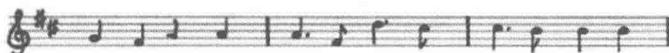
679

ABSCHIED VON PROFESSOR MISES

by Felix Kaufmann

Melody: O alte Burschen-
herrlichkeit

1. Was	soll denn mit dem	Miseskreis	im nächsten Jahr ge-
2. Bald	wird die hohe	Fakultät	mit Schauern es er-
3. Die	Schüler, die so	eifervoll	für Mises' Lehre
4. Nun	zieht der Meister	seiber fort	und lehrt auf andre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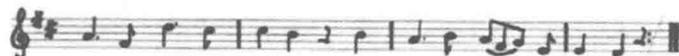
schehen?	Wir können doch nicht	dutzendweis von
fassen,	dass mit dem einen,	der da geht, gar
stritten,	die gegen jeden	Einfuhrzoll, so
Stuble	und schafft ein neues	Zentrum dort, der



hier nach Genf mitgehen.	Ich raufe mir das
viele Wien verlassen.	Für England und für
kühn Attacken ritten.	Sie weilen längst im
alten Wiener Schule.	Wir hoffen, dass sein



letzte Haar. Was	mach ich ohne	Seminar!	O
USA, wird	Wien jetzt fern doch	Genf ganz nah.	O
fernem Land, weil	man sie hier so	schlecht verstand.	O
starker Geist, dem	Völkerbund die	Wege weist.	Und



jerum, jerum,	jerum,	o quae mutatio	rerum.
jerum, jerum,	jerum,	o quae mutatio	rerum.
jerum, jerum,	jerum,	o quae mutatio	rerum.
denken sein in	Treuen	und denken sein in	Treuen.

米塞斯小组之歌

来吧,我们欢聚一堂,在这周五

米塞斯私人研讨会的时刻。

我定会来,哪怕是在五月

那是迄今为止最美妙的日子。

哦,花开花落,事理必然

然而你将发现,真理永不落幕。

真理充满我们之间,直到最后一刻。

当你开始辩论,

你会发现,很快又到深夜!

今晚你将发现我在米塞斯的身边,今晚

我不需要漫步街头。

社会、经济和真理,就是这些

我们辩论、辩护,自由自在!

若你渴望清晰的领会

不惜代价,那么你应当来,来到我们中间!

因为清晰、智慧和真理引导我们

来到这里,米塞斯小组。

你可知道一个满载讨厌怪癖的问题,

来吧,护送它到米塞斯的门口。

这次它将清楚知道潜伏的危险

它的外壳将被剥落,直抵核心。

当然,许多外壳知道这个命运

坚果坚不可摧,但是这次

它们会在那些懂得演绎文字的舌尖融化,

就像巧克力奶油,我们的朋友热情选择,

让沉默成为一首快乐的副歌,

但是现在,让我们再次齐唱:

(副歌)

时钟快要走到十时,智慧充满我们的心灵,

然而我们的身体需要更多。

绿锚发出召唤,而在这里,我们的肚子发现,

进口关税拉平了比分。

这里,ERE是我们的座右铭,

享用意大利面,还有意大利烩饭。

我们想象不到时间过得这么快

午夜钟声敲响,我们来到钟爱的地方

一个美丽的小咖啡馆;

巧妙地结束了这样一天。

(副歌)

哦,时间,到了必须要问为什么的时候,
可是这样的质疑真的聪明吗?
生活继续前行,永不停息,
而我们都只扮演了一个小角色。
我们可以游向前方,却不关注
潮流的方向,世界的焦点。
难道不该,把这些想法留在海湾,
推开我们的汽车,欣赏今天的一切。
然而我们手头没有交易,
我们仍然必须站立。

注 释

1. Mises, *Erinnerungen* (Stuttgart: Gustav Fischer Verlag, 1978), p. 53.

2. 米塞斯致西蒙(Simon),信件标注日期为1930年4月9日;Mises Archive 66a: 28; 另见米塞斯致未知通信者,信件标注日期为1930年4月28日;Mises Archive 66a: 45. 米塞斯利用这个机会见了他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些朋友,但是事先没有向他们太多(如果有的话)提及这次旅行。因此,他没有见到罗宾斯。当时罗宾斯出城有段时间了,于是他约罗宾斯共进午餐,结果4月1日星期一在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碰到了梅耶多夫。梅耶多夫可能把他介绍给了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的阿里斯托·菲利普斯(Alistor Phillips)。他们还计划会见赫恩肖,但是后者不在伦敦。参见米塞斯致罗宾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30年4月12日;Mises Archive 83: 21; 梅耶多夫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30年3月30日;Mises Archive 88: 2。

3. Margit von Mises, *My Years with Ludwig von Mises*, 2nd enlarged ed. (Cedar Falls, Iowa: Center for Futures Education, 1984), p. 21.

4. 米塞斯致弗里茨·阿恩施泰因(Fritz Arnstein),信件标注日期为1931年12月17日;Mises Archive 95: 6。

5. 当米塞斯邀请她作个讲座,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的老师嘲笑说,这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邀请,米塞斯只是对他在法兰克福圈子朋友的学生表示礼貌而已。但米塞斯确实是认真的。当他感谢赖希曼接受前往维也纳的邀请时,她惊呼说:“但是,应该是我感谢你才对呀,就像魔棒一挥,你把我从许多无名科学家中提升出来!”参见 Mises Archive 71: 22-35 的通信。

6. 里夏德·冯·许勒尔是这个委员会的正式主席,但他不参与撰写报告。参见 Franz Baltzarek, “Ludwig von Mises und die österreichische Wirtschaftspolitik der Zwischenkriegszeit,”

Wirtschaftspolitische Blätter 28, no. 4 (1981): 136; Mises, *Erinnerungen*, p. 49。

7. Redaktionskomitee der Wirtschaftskommission, *Bericht über die Ursachen der wirtschaftlichen Schwierigkeiten Österreichs* (Vienna: Staatsdruckerei, 1930), p. 19.

8. 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不满意。普遍认为这份报告是一份曼彻斯特资本主义的宣言。米塞斯在其中的作用是很明显的。参见 Baltzarek, “Ludwig von Mises und die österreichische Wirtschaftspolitik der Zwischenkriegszeit,” p. 136。作者声称,米塞斯的观点在经济危机早期曾对奥地利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9. 参见 Mises Archive 40: 14 的课程大纲。

10. 参见 Mises Archive 17: 219 的课程大纲;另见布洛赫(Bloch)的信件,其中提到克佩尔(Köppel)的讲座, Mises Archive 17: 202a, 203。

11. 维也纳奥地利俱乐部(Österreichischer Klub in Wien)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30年10月14日; Mises Archive 66: 2f。1930年12月1日星期一,米塞斯显然在维也纳进行了另外一次公开讲话;参见施泰纳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30年12月8日; Mises Archive 66: 23。关于艾斯勒,参见 Irving Fisher, *Stabilised Money: A History of the Movement*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35), pp. 100-02。

12. 米塞斯致西贝克,信件标注日期为1931年2月19日; Mises Archive 92: 36。

13. Mises, *Die Ursachen der Wirtschaftskrise* (Tübingen: Mohr, 1931)。1931年2月19日,米塞斯曾接触过 Mohr 的 CEO 保罗·西贝克,讨论他的捷克斯洛伐克讲稿收入《法律与国家》丛书的问题。西贝克很高兴地接受提议,到了3月2日,他们已经达成协议:米塞斯可以拿到30本赠书,每16页80马克,任何一版印数不得超过2000本(参见 Mises Archive 92: 32ff.)。米塞斯还把原来的标题《世界经济危机的原因》改为《经济危机的原因》(参见 Mises Archive 92: 11)。四月中旬,在去美国之前,他完成了修改。除了30本赠书,他还另外订购了25本,并把这55本中的20本直接寄给了受赠人。稿费(170马克,参见 Mises Archive 93: 14)打入了他的邮局支票账户(参见 Mises Archive 92: 13)。

14. Mises, *Die Ursachen der Wirtschaftskrise*, p. 14.

15. Ibid, pp. 14f.

16. 他的观点已经公开发表过。参见他在1926年文章《社会自由主义》中的评论,重刊于 *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Jena: Gustav Fischer, 1929)。1926年1月,《新维也纳日报》(*Neues Wiener Tagblatt*)采访了米塞斯,就如何降低失业率的问题咨询了他的看法(参见 Mises Archive 80: 26)。1930年3月6日,维也纳杂志《上午世界》(*Welt am Morgen*)发表了米塞斯支持废除失业救济的文章(参见 Mises Archive 66a: 40)。关于其他持有同样看法的经济学家,特别参见 A. C. Pigou, *Industrial Fluctua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27); Jacques Rueff, “L’assurance chômage cause du chômage permanent,” *Revue politique et parlementaire* (December 10, 1925); Lionel Robbins, *The Great Depression* (London: Macmillan 1934)。

17. Mises, *Die Ursachen der Wirtschaftskrise*, p. 15.

18. 五年前,米塞斯在《干预主义》一文中曾把这种自由市场失业称为“摩擦现象”,这种现象在静态经济下,也就是均衡状态下,是不存在的。参见 Mises, *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pp. 13, 20。

19. Mises, *Die Ursachen der Wirtschaftskrise*, pp. 16f.
20. *Ibid.*, p. 18.
21. *Ibid.*, pp. 26, 32.
22. *Ibid.*, pp. 31f.
23. 米塞斯致弗里茨·格奥尔格·施泰纳,信件标注日期为1932年1月9日;Mises Archive 71: 11。
24. Otto Conrad, “Der Interventionismus als Ursache der Wirtschaftskrise ein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Ludwig Mises” (Interventionism as cause of the economic crisis—a dispute with Ludwig Mises), 打印稿见 Mises Archive 23: 42ff。米塞斯的回应题为《企业家的干预主义? 回应奥托·康拉德的前述评论》(Interventionismus der Unternehmer? Entgegnung auf die vorstehenden Ausführungen Otto Conrads), 打印稿见 Mises Archive 23: 31ff。
25. 贝尔曼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31年8月24日;Mises Archive 95: 23ff。贝尔曼曾是米塞斯1918年的学生。后来米塞斯推荐贝尔曼进了商会,两人一直保持密切的私人关系。参见他们的通信,Mises Archive 51: 31f.; 95: 32。
26. 米塞斯致贝尔曼,信件标注日期为1931年9月10日;Mises Archive 95: 22。
27. Emil Lederer, *Technischer Fortschritt und Arbeitslosigkeit* (Tübingen: Mohr, 1931)。许多年来,他一直鼓吹这一观点,另外他也主张通胀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创造额外的财富。例如,参见他在维也纳《工人报》上的评论《技术进步》(Der technische Fortschritt), *Arbeiter-Zeitung* (September 4, 1927): 12。
28. Mises, “Das festangelegte Kapital,” *Economische Opstellen: Aangeboden aan Prof. C. A. Verrijn Stuart* (Haarlem: De Erven F. Bohn N. V., 1931), pp. 214–28。
29. Erich Carell, review of Mises’s *Ursachen der Wirtschaftskrise* in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135 (1931): 924f.
30. Wilhelm Röpke, review of Mises’s *Ursachen der Wirtschaftskrise* in *Zeitschrift für Nationalökonomie* 4, no. 2 (1932): 273–75。
31. Mises, *Die Ursachen der Wirtschaftskrise*, p. 31。
32. Walter Tschuppik in *Süddeutsche Sonntagspost* (November 8, 1931); Mises Archive 45: 66。
33. Dr. Eugen Altschul in *Magazin der Wirtschaft* (June 19, 1931)。
34. Albert Lauterbach in *Der Holzarbeiter* 40, no. 4 (February 18, 1932)。
35. 沃尔夫鲁姆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31年5月4日;Mises Archive 77: 22。
36. 参见书信,Mises Archive 66: 28; 66a: 85, 98, 109, 129; 68: 51; 83: 14。
37. 参见 Murray N. Rothbard, *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 5th ed.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99), esp. chap. 11: “The Hoover New Deal of 1932.”
38. 米塞斯致威廉·克莱因(Wilhelm Klein),信件标注日期为1931年6月10日;Mises Archive 66a: 100。
39. 米塞斯致弗里茨·沃尔夫鲁姆,信件标注日期为1931年6月10日;Mises Archive 77: 23。

40. 会议举行日期是1931年3月20日。参见古斯塔夫·利纳特(Gustav Linert)的报告,载 *Mises Archive* 66a: 175。

41. 安塞尔姆·冯·罗特席尔德(Anselm von Rothschild)于1855年创办了信贷银行,这是一家旨在刺激经济发展的公私合营银行。它在1931年遇到的困难本质上应归咎于两年前罗特席尔德家族曾屈服于奥地利政府挽救半公共的地产信贷银行的要求,当时这家银行已经隶属于一家运营了几周的银行。事实证明,合并这家破产机构即使对于路易斯·冯·罗特席尔德(他拥有信贷银行30%股份)这样精明的银行家也是一个灾难。

42. 直到三年后,他才觉得可以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分析这些事件:“Der Weg der österreichischen Finanzpolitik” [The path of Austrian financial policy], *Wirtschaftliche Nachrichten* 18, no. 1 (January 10, 1935): 38-39。

43. 参见 Aurel Schubert, *The Credit-Anstalt Crisis of 193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Howard S. Ellis, *Exchange Control in Central Europ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44. 参见米塞斯的信件,标注日期为1931年6月10日, *Mises Archive* 66a: 107。

45. 米塞斯致约瑟夫斯·吉塔(Josephus Jitta),信件标注日期为1931年6月10日; *Mises Archive* 66a: 102。吉塔是海牙扶轮社主席。米塞斯在战前多次访问荷兰(1926—1936),但从未见过他。两人首次见面是在1949年第二届朝圣山会议上。参见通信, *Grove City Archive*: Jitta file。

46. F. A. Hayek, *Das Mieterschutzproblem. Nationalökonomische Betrachtungen* (Vienna: Steyrmühl-Verlag, 1930)。米塞斯很喜欢这本书,并在私人通信中作了推荐。例如,参见米塞斯致沃尔夫鲁姆,信件标注日期为1931年6月10日; *Mises Archive* 77: 23。另一项出色的研究是 Josef Schell, *Gerechtigkeitsidee und Mietengesetzgebung* (Vienna: Manz, 1927)。舍尔娶了一位参加过米塞斯在商学院(Handelsakademie)课程的年轻姑娘。参见舍尔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55年1月29日; *Grove City Archive*: Schell file。

47. 他从1921年后就持有这一看法。参见 Mises, *Erinnerungen*, p. 46。

48. 科斯回忆他在伦敦经济学院早年生活的文字是以下面这段开始的:“我将讨论英国经济学发生了什么,但有那么几个时期,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经济学发生了什么。” Ronald Coase, *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 19。

49. 米塞斯致祖尔茨巴赫,信件标注日期为1931年1月12日; *Mises Archive* 66a: 70。

50. 玛尔塔·布劳恩后来曾说,罗宾斯多年来一直试图把哈耶克请到伦敦经济学院。Martha Steffy Browne [Braun], “Erinnerungen an das Mises-Privat-seminar,” *Wirtschaftspolitische Blätter* 28, no. 4 (1981): 115。

51. 哈耶克以这本著作获得了维也纳大学的任教资格,发表于1929年,见“Gibt es einen Widersinn des Sparens?” *Zeitschrift für Nationalökonomie* 1, no. 3 (1930)。

52. 凯恩斯提出,一项降低利率的审慎政策“意味着食利阶层的消亡,因而,也意味着资本家不再能够利用资本的稀缺价值扩大其压迫力量”。John Maynard Keynes,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New York and London: Harcourt, Brace, 1936), p. 376。

53. Coase, *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 p. 19.

54. Lionel Robbins, *Autobiography of an Economist* (London: Macmillan, 1971), p. 127. 罗宾斯继续写道(p. 128):

在《价格与生产》系列讲座中让我们如此兴奋的分析结构,我并不认为今天已经获得了它们应得的地位和承认,那是我们中的一些人——显然包括还在写作的作者——努力为它们争取的。

55. 哈耶克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31年11月21日;Mises Archive 81: 19ff. 哈耶克继续写道:“我必须告诉您这些,因为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觉得受惠于您。而且,既然罗宾斯和普兰特全力支持传播您的思想,那么,我希望我能取得某种成功。”

56. 哈耶克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31年12月7日;Mises Archive 81: 18。

57. 哈耶克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32年1月11日;Mises Archive 81: 2。

58. 罗宾斯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32年5月25日;Mises Archive 83: 1。Lionel Robbins,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 (London: Macmillan, 1932)。

59. 他是一位众所周知的干预主义支持者,尤以他对自由劳动市场的观点著称。参见William Beveridge, *Unemployment: A Problem of Industry*, 2nd ed.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930)。

60. 哈耶克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33年3月10日;Mises Archive 81: 5。米塞斯回复说:“我很遗憾,《社会主义》对威廉爵士的影响不是我的本意。顺便问一句,他读过英文版吗?”米塞斯致哈耶克,信件标注日期为1933年3月17日;Mises Archive 81: 6。据此,英文版手稿在1933年3月之前一定已经完成了。贝弗里奇的反对可以解释为什么此书直到1936年才出版。

61. 值得注意的是,米塞斯非常欣赏哈耶克关于“资本消耗”的文章,认为这是他的所有作品中最好和最清晰的一篇——当时哈耶克已经出版了两本早期的关于货币和商业周期的著作。参见米塞斯致哈耶克,信件标注日期为1931年12月18日;Mises Archive 81: 17。

62. 希克斯从1929年开始讲授经济学高级课程,即在罗宾斯执掌经济学系的同时。参见Robbins, *Autobiography of an Economist*, p. 129。

63. F. A. Hayek, *Prices and P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1931); idem, *Monetary Theory and Trade Cycle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1933); Mises,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London: Jonathan Cape, 1934); idem, *Socialism* (London: Jonathan Cape, 1936)。

64. 商业周期研究所成立之后的几年,他的政治观点与米塞斯几乎无法区别。对他的活动的描述,参见Hans Jörg Hennecke,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Düsseldorf: Wirtschaft und Finanzen, 2000), pp. 87-91。

65. 关于这个问题,最好的例子是F. A. Hayek, *Pure Theory of Capital* (London: Macmillan, 1941)。这是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十年的研究成果,但却是一部全无头绪的著作。

66. 参见Mises Archive 66a: 142; 69: 8中的通信。英格兰银行于1931年9月19日暂停支付。

67. 关于这一事件的报告,参见John R. Hicks, *A Market Theory of Money* (Oxford: Clarendon, 1989), p. 101。厄休拉·韦布此时正在维也纳学习。几年后她嫁给了约翰·希

克斯。

68. 在伦敦,米塞斯住在罗宾斯家里。参见米塞斯致罗宾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31年11月23日;Mises Archive 83: 9。另见米塞斯致莱德雷尔,信件标注日期为1931年10月6日;Mises Archive 73: 10。他可能是在9月底安排了这次旅行,以便回避在维也纳举办五十周岁生日庆典。他曾要求秘书阻止一切此类安排。如果这些生日晚会的组织者二十年后再回来,他会更加高兴。参见蒂贝格尔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1年8月12日;Grove City Archive: Thieberger files。

69. 米塞斯致沃尔夫鲁姆,信件标注日期为1931年10月24日;Mises Archive 77: 21。

70. 例如,赖施发表了一篇论文认为,虽然一切流通媒介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倾向于通货膨胀的,但如果这种流通媒介仅仅作为短期商业信用发行,就是无害的。参见 Richard Reisch, “Das Kreditproblem der Volkswirtschaft,” *Zeitschrift für Nationalökonomie* 3, no. 1 (1932)。正如我们将提到的,赖施是奥地利国家银行的总裁。米塞斯在私人信件中对这篇文章作了评论:“可怕。”米塞斯致施泰纳,信件标注日期为1932年1月29日;Mises Archive 71: 11。

71. 洛芙迪(国际联盟)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30年7月1日;Mises Archive 91a: 3ff。

72. 国际联盟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31年10月13日;Mises Archive 66a: 141。与此同时,凯恩斯和其他人出版了《麦克米伦报告》(London: HMSO, 1931),它是通货膨胀金融制止价格水平下跌的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

73. 米塞斯致罗宾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31年11月23日;Mises Archive 83: 9。该委员会的德文原名是“外汇顾问委员会”(Devisenbeirat),或者更明白地说,“国家银行分配外国货物的顾问委员会”(Beirat für die Devisenzuteilung in der Nationalbank)。

74. 米塞斯致哈耶克,信件标注日期为1931年12月7日;Mises Archive 81: 18。

75. 弗罗魏因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32年1月16日;Mises Archive 71: 16;米塞斯致弗罗魏因,信件标注日期为1932年1月21日;Mises Archive 71: 17。战后,弗罗魏因成了ICC的荣誉主席,并与米塞斯继续保持良好的关系。参见他们的通信,Grove City Archive: “F” files。

76. 还有其他个人原因:他在奥地利公共事业和工作信用社(*Österreichisches Creditinstitut für öffentliche Unternehmungen und Arbeiten*)拥有一个小额账户,所有外汇支付都通过这个账户进行。米塞斯用这个账户支付购书款,例如《社会科学百科全书》,这是他在外汇管制实施之前订购的。然而这一“私下结算”的费用上涨了22%。参见 Mises Archive 71: 107ff 中的通信。

77. 例如,参见菲舍尔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32年9月26日;Mises Archive 68: 7。

78. 哈耶克在伦敦也听到了关于这次演讲的报道。参见哈耶克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31年11月21日;Mises Archive 81: 21。

79. Mises, “Die Krise und der Kapitalismus,” *Neue Freie Presse* (October 17, 1931)。

80. 黑德维希·伦贝格尔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31年11月15日;Mises Archive

66a; 158。

81. 米塞斯致伦贝格尔,信件标注日期为1931年11月21日;Mises Archive 66a; 157。

82. 约尔格·劳德瓦尼(Jorge Radványi)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59年3月21日; Grove City Archive; Buenos Aires file。

83. 马克卢普、摩根斯特恩、哈伯勒、哈耶克等人在1931年至1934年间为格雷茨的《新维也纳日报》撰写的文章,最近已经集结出版,参见 Hansjörg Klausinger, *Machlup, Morgens-tern, Haberler, Hayek und andere* (Marburg: Metropolis, 2005)。

84. 参见 Ernst Hoor, *Österreich 1918 – 1938* (Vienna: Bundesverlag für Unterricht, Wissenschaft und Kunst, 1966), pp. 142f。

85. Fritz Wolfrum, “Das Geldproblem,” typewritten manuscript dated November 12, 1931, pp. 8f.; Mises Archive 77; 17f.

86. 罗宾斯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31年12月19日;Mises Archive 83; 5ff. “Streng”意为“严重”。

87. Mises, “Die Goldwährung und ihre Gegner,” *Neue Freie Presse* (December 25 and 30, 1931)。

88. 参见他们的通信和相关文件,Mises Archive 71; 52, 58f., 158ff。

89. 雄辩而有权威的凯恩斯成了格泽尔理论的一个代言人。’s views found a spokesman in the eloquent and authoritative Keynes. 参见 Keynes,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chap. 23, sec. 6。

90. 米塞斯致哈恩,信件标注日期为1932年4月9日;Mises Archive 71; 45。

91. 米塞斯致 G. M. 维瑞京·斯图亚特,信件标注日期为1932年6月30日;Mises Archive 71; 136。

92. 米塞斯致詹姆斯·加德纳(James Gardner),信件标注日期为1964年3月30日; Grove City Archive: “G” file。米塞斯此处声明他支持“古典金本位制(而不是……金汇兑本位制)”,而且,“我改变了30多年前关于金汇兑本位制的功能的想法”。

93. 参见 Mises, *Theorie des Geldes unter Umlaufsmittel*, 1st ed.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12), pp. 44, 48, 56f。

94. 他用下划线划出了斯帕尔说过的某些话。参见米塞斯评论的打印稿,Grove City Archive; Courtney files。后来米塞斯把这些观点整合进了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9, p. 780) 以及1953新版的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London: Jonathan Cape, 1934), pp. 450ff。

95. 参见他们的论文,Mises Archive 40; 21f。

96. 参见课程表,Mises Archive 17; 233。

97. 因斯布鲁克的 ICC 会议于4月份第三周召开,世界贸易周(Welthandels-Woche)于5月第一周召开,慕尼黑 ICC 会议于5月18日开始。参见书信,Mises Archive 68; 10, 13; 71; 38; 81; 14; 85; 5。

98. 1932年柏林世界经济会议(*Weltwirtschaftskonferenz Berlin 1932*)是《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组织的为时一周的会议——世界贸易周的一部分。5月6日周五上午米塞斯

回到维也纳,处理商会紧急事务。参见文件和书信,Mises Archive 71: 10; 77: 6。

99. 参见课程表,Mises Archive 17: 258, 261。

100. 菲舍尔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31年4月24日;Mises Archive 68: 52。

101. 参见他们的通信,Mises Archive 57: 34; 75: 15, 37。

102. 施泰纳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30年12月8日;Mises Archive 66: 23。

103. 米塞斯致菲舍尔,信件标注日期为1931年10月26日;Mises Archive 68: 47。

104. 参见罗宾斯与米塞斯之间的通信,标注日期为1931年11月12日和23日;Mises Archive 83: 9f。事实上,米塞斯在他的书中照抄了几年前发表于《文库》的关于社会主义计算问题分析最新进展的调查全文。参见Mises,“Neue Beiträge zum Problem der sozialistischen Wirtschaftsrechnung,”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51 (December 1923): 488 - 500。

105. 参见米塞斯和菲舍尔之间的通信,标注日期为1931年10月26日和27日;Mises Archive 68: 46f。

106. 参见他们的通信,Mises Archive 68: 31ff., 46。

107. 他收到了30本赠书,其中10本是精装本。20本(6本精装)寄到了维也纳。米塞斯和菲舍尔把剩下的10本外加米塞斯本人订购的9本寄给了以下这些人:精装寄给罗宾斯、安德森、祖尔茨巴赫和贝弗里奇;平装寄给格雷戈里、哈耶克、维瑞京·斯图亚特夫妇、阿道夫·韦伯、帕索、维泽、奥斯瓦尔特、弗洛伊格尔斯(Vleugels)、哈尔姆(Halm)、哈恩、勒普克、沃尔夫鲁姆、布鲁兹库斯和莱德雷尔。

108. Anonymous, “Die Gemeinwirtschaft,” *Der Deutsche Volkswirt. Literatur-Beilage* no. 1 (December 23, 1932). 其他评论者说:

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战斗,迄今已将近百年,如今进入了最后阶段。最多几年或十年之内,就可分出胜负。在这场斗争的高点,米塞斯的书是一次关键的行动。我们无法评估它的思想和经济含义,以及长期而言,它的政治含义。(Anonymous, “Sozialismuseine Utopie,” 1. *Handelsbeilage der “Berliner Börsen-Zeitung”* [November 3, 1932])

109. E. W. E., “Die Planwirtschaft und ihre Gegner,” *Die Tat* 24 (10)。

110. “Die Gemeinwirtschaft,” *Kartellrundschau* 7/8 (1932)的评论。

111. W. W. [Weiss-Wellenstein], “‘Die Gemeinwirtschaft.’ Die zweite Auflage des Werkes von Ludwig Mises,” *Mitteleuropäische Wirtschaft. Wochenbeilage der “Neuen Freien Presse”* (December 10, 1932)。

112. 哈尔姆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32年4月16日;Mises Archive 71: 89。回信如下:

我发现,莱德雷尔那本极其含混的小册子《中央计划经济》清楚地说明,社会主义理论已经彻底破产了。事实上,使用货币在他看来是经济计算唯一的基础。但他没有看到,如果一个社会的生产资料不归私人所有,那就缺了生产资料的价格形成过程。不仅如此,更典型的是,他还堕入了考茨基的错误观点,竟想利用过去的价格作为一个起点。讨论这个问题的几页没有提供任何新东西,甚至比社会主义作家过去提供的论证更加混乱。(Mises to Halm, letter dated April 26, 1932; Mises Archive 71: 37)

113. 米塞斯致哈耶克,信件标注日期为1931年12月18日;Mises Archive 81: 17。“取缔高利贷”这个短语可能暗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1920年2月24日计划的第11点。

114. 米塞斯致莱德雷尔,信件标注日期为1932年4月9日;Mises Archive 73: 4;米塞斯致阿蒙,信件标注日期为1932年4月27日;Mises Archive 71: 143。

115. “我还没有完全放弃一切希望,我们仍然可以在社会政策协会内部做一些富有成效的工作。一切都取决于德累斯顿会议的议程和新的协会主席。”米塞斯致格奥尔格·雅恩,信件标注日期为1932年7月15日;Mises Archive 71: 133。

116. 参见 Mises and Arthur Spiethoff, eds., *Probleme der Wertlehre* (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183, no. 1, Munich and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31), vol. 1。

117. 他的发言未加标题收入了 Mises and Arthur Spiethoff, eds., *Probleme der Wertlehre* (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183, no. 2, Munich and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33), vol. 2, pp. 1–12; 后以《关于价值理论的争论》(Der Streit um die Werttheorie)为题重刊于米塞斯文集 *Grundprobleme der Nationalökonomie* (Jena: Gustav Fischer, 1933), chap. 7; translated by George Reisman as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Theory of Value,”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 3rd ed.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03), chap. 7。

118. Martha St. Braun, “Die diesjährigen Verhandlungen des Vereines für Sozialpolitik,” *Neue Freie Presse* (October 8, 1932)。

119. 1931年11月韦伯曾寄了一本自己的书给米塞斯。米塞斯回信说:“我向您的著作取得的成功致意,这是公众舆论开始逐渐朝着健康观念转变的迹象。”米塞斯致阿道夫·韦伯,信件标注日期为1931年11月15日;Mises Archive 66a: 156。

120. 米塞斯非常感激。参见他致巴奇的信,标注日期为1931年6月13日;Mises Archive 66a: 98。大约过了两年,就在希特勒攫取德国政权不久,米塞斯声称自己的货币理论已经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占支配地位的商业周期理论。参见米塞斯致乌戈·帕皮,信件标注日期为1933年3月17日;Mises Archive 94: 3。

121. 米塞斯说:“你的工作应该受到欢迎,不仅作为一项科学成就,而且也作为一次政治行动。”米塞斯致卡尔·瓦格纳,信件标注日期为1931年6月8日;Mises Archive 66a: 117。

122. Franz Boese, *Geschichte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1872–1932*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39), pp. 229ff.

123. *Ibid.*, pp. 232ff.

124. Martha St. Braun, “Die diesjährigen Verhandlungen des Vereines für Sozialpolitik,” *Neue Freie Presse* (October 8, 1932)。

125. Louise Sommer, “Für die freie Verkehrswirtschaft! (Die Dresdner Tagung des Vereines für Sozialpolitik),” *Wiener Wirtschafts-Woche* (October 12, 1932), pp. 7f. Sommer was by then a private lecturer in econom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Geneva.

126. 参见信件和其他材料,重刊于 *ibid.*, pp. 273ff。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8年,协会得以重建。不过米塞斯不希望与这个战后组织发生任何关系。参见米塞斯致佐默,信件标

注日期为1957年6月11日; Grove City Archive; Sommer file。

127. 罗宾斯致米塞斯, 信件标注日期为1933年5月19日; Grove City Archive; Robbins files。另见 Robbins, *Autobiography of an Economist*, pp. 143f。

128. 参见 Eugen Dietzgen, ed., *Gesammelte Werke*, 3rd ed. (Stuttgart: Dietz, 1922), 尤其是第三卷, 其中包含约瑟夫·迪茨根“关于逻辑的书信”和“一位社会主义者漫游认识论领域”。

129. Karl Mannheim, *Ideologie und Utopie* (Bonn: Cohen, 1929)。

130. Mises, “Economics and Politics,” Grove City Archive; Mexico 1942 file 6。

131. Ibid. 另见 Lothar Gottlieb Tirala, *Rasse, Geist und Seele* (Munich: Lehmann, 1935)。作者是一位医生。

132. Mises, “Economics and Politics”, 1942年1月或2月在墨西哥国立大学的演讲; 引自玛吉特·冯·米塞斯手写讲稿注释, 藏于 Grove City Archive; Mexico 1942 file 6。米塞斯在这次讲座中谈到的问题, 最终发表于 *Omnipotent Government*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4), chap. 6, sect. 6。

133. Mises,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Theory of Value,” chap. 7 of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 pp. 218f. 他有一篇收入《价值理论问题》(此书是德累斯顿会议的讨论基础)的论文已经触及这个问题, 现在他把这个问题视为一个基本问题加以讨论。参见 Mises, “The Psychological Basis of the Opposition to Economic Theory,” chap. 6 of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 p. 201。

134. Mises, “The Psychological Basis of the Opposition to Economic Theory,” p. 214。

135. Lederer in Mises and Spiethoff, eds., *Probleme der Wertlehre*, vol. 2, pp. 114f。

136. Mises in *ibid.*, p. 117。

137. Mises, *Grundprobleme der Nationalökonomie: Untersuchungen über Verfahren, Aufgaben und Inhalt der Wirtschafts- und Gesellschaftslehre* (Jena: Gustav Fischer, 1933)。几乎三十年后, 米塞斯的美国学生乔治·赖斯曼(George Reisman)才将此书翻译出来。美国版最终采用了一个稍有不同的标题《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 Princeton, N. J.: Van Nostrand, 1960)。

138. Mises, “Aufgabe und Umfang der allgemeinen Wissenschaft vom Handeln,” *Grundprobleme der Nationalökonomie*, chap. 1; translated as “The Task and Scope of the Science of Human Action,”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 chap. 1, pp. 1–69。

139. 因此他坚持说: “为了科学的目的, 我们必须从个人的行为出发, 因为这是我们能够直接认识的唯一事物。”(*ibid.*, p. 44) 他还声明:

除非通过推论, 科学无法前进一步。它的出发点应该具备人的知识所能达到的最大程度的确定性, 而且必须由此继续前进, 逐步进行逻辑演绎。作为先验的科学, 它可以从一些对思想来说必然的命题出发, 这些必然命题得到无可置疑的证据的支持和保证; 或者, 作为经验科学, 它可以从经验开始。(*ibid.*, p. 49)

140. *Ibid.*, pp. 13f. 他继续指出, 人类行为理论最终与逻辑科学是一致的:

人的思想服务于人的生活与行为。它不是绝对的思想, 而是指向计划中的行为的

事先考虑,也是对于已经完成的行为的反思。因此,在最后的分析中,逻辑与普遍正确的人类行为科学完全是一回事。

141. Ibid., p. 15.

142. Ibid., p. 30.

143. 米塞斯致马克卢普,信件标注日期为1934年7月12日;Hoover Institution; Machlup-Mises correspondence file。

144. 逗留维也纳期间,休·盖茨克尔开始重译庞巴维克的《资本与利息》(*Capital and Interest*),此书当时只有一个译本,是根据第一版译出的。米塞斯后来回忆说,还有其他英国经济学家也愿意承担这项任务,那个时候,英国公众对奥地利经济学家的兴趣正浓,因此甚至出版也不是问题:“他们放弃了这项任务,因为他们觉得盖茨克尔会完成他的计划。”但是,这个参加米塞斯维也纳研讨会的年轻人未能完成这项工作。后来盖茨克尔投身政界,成了战后英国工党政府的燃料电力大臣。参见米塞斯致尼迈耶,信件标注日期为1947年11月22日和1950年11月8日;Grove City Archive; Nymeyer files。

145. Mises, “Leitsätze zur Erörterung der methodologischen Probleme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zur Kritik des Kaufmann’schen Standpunktes” (Basic principles for the discussion of the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for a critique of the Kaufmannian position); typewritten manuscript, dated March 9, 1934, 6 pp.; Mises Archive 32: 2-4.

146. Felix Kaufmann, Robert Wälder, Erich Schiff, Oskar Morgenstern.

147. 参见 Erik von Kuehnelt-Leddihn, *Von Sarajevo nach Sarajevo* (Vienna: Karolinger, 1966), p. 47; Hoor, *Österreich 1918-1938*, pp. 74, 106, 114。

148. 1934年3月17日,奥地利与意大利签订《罗马协定》,加强了双方之间的联盟关系。

149. 1934年3月1日,米塞斯成为爱国阵线商会分支机构的成员。加入爱国阵线可能是强制的,会员包括所有公共机构或半公共机构的雇员。米塞斯的会员证(编号282632)现藏 Grove City Archive; file #6/9/1/1。他也是“Werk Neues Leben”的成员,这是爱国阵线的下级组织。参见他的会员证(编号406183),现藏 Grove City Archive; Kammer der gewerblichen Wirtschaft für Wien file。

150. 可以认为他的真正意图是在其他方面。历史学家恩斯特·霍尔(Ernst Hoor)指出,陶尔斐斯是奥地利第一共和国时期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有意识地、直言不讳地试图重建奥地利民族——区别于德意志民族——的政治家,而且,他的政策也是依此制定。参见 Hoor, *Österreich 1918-1938*, p. 75。

151. 劳亨奈尔(Lauchenuer)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32年12月30日;Mises Archive 97: 3。可以认为,这些年轻政治家们赋予了教皇通谕强烈的国家主义解释,而不是真的得到通谕内容的支持。米塞斯后来承认,起草教皇通谕初稿的O.冯·内尔布罗伊宁(Jesuit Pater O. von Nell-Breuning)是“二次大战之间少数几位鼓吹经济自由的德国经济学家之一”。参见米塞斯致帕克,信件标注日期为1953年5月14日;Grove City Archive; Tax Foundation file。

152. 参见 Mises, *Erinnerungen*, pp. 89-91; Kuehnelt-Leddihn, *Von Sarajevo nach Sarajevo*

vo, p. 52; Hoor, *Österreich 1918 - 1938*, p. 115。意大利于1936年改变了它的联盟阵营,当时法国和英国对意大利入侵和吞并阿比西尼亚的行为实施了制裁。于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建立了新的同盟关系,从而葬送了奥地利独立的希望。

153. (英文)译文出自阿琳·奥斯特-青纳(Arlene Oost-Zinner)。

第五部分

米塞斯在日内瓦



经济危机加剧了遍布欧洲的政治对抗。相信民主制度能够应付当前挑战的公民已经越来越少。似乎只有两种解决方案是可行的,且都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无产阶级的独裁统治(更准确地说,是工会上层和社会主义政党领袖的独裁统治),或者决心恢复旧秩序的威权独裁统治(authoritarian dictatorship)。

1934年2月6日,由于一场金融丑闻的影响,两个右翼群众组织走上巴黎街头示威游行。愤怒的暴民试图进攻波旁宫区,警察随即开火,打死十五人,打伤了好几百人。达拉第(Daladier)领导的法国政府因此倒台。此后,暴力冲突扩散到其他国家,包括奥地利。

米塞斯后来曾说,促使他离开奥地利的的原因是纳粹党在奥地利势力不断壮大。¹他这么说的时侯,并不是指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的政府。当时,陶尔斐斯的政府已经在奥地利政治中再度引入了威权统合主义(authoritarian corporatism),目的是抵制社会主义——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还是纳粹的社会主义。米塞斯指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奥地利分支,该党得到柏林的大力支持,为了占据维也纳街头而投身于日复一日的战斗。在他眼里,陶尔斐斯的威权主义政策只是为了保卫奥地利的独立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这种政策长期来说是不合适的,尤其是如果普遍的政治心态没有改变的话。

684

1934年3月,米塞斯兴奋地收到来自位于日内瓦的高级国际关系学院的聘约,邀请他担任国际经济关系客座教授,他立即接受了。²不过他并不是逃离奥地利,如果此时不走,四年后纳粹上台攫取了国家权力,他就非逃不可了。他带着一股厌恶之情迁居日内瓦,但他以为这只是临时的安排。

此时米塞斯已经为商会工作了很长时间,可以提前退休了。可是他不想断了他的退路,于是他和商会达成了一个协议,根据这个协议,他将在学校休假期间继续为商会做些工作,他的薪水将会降到以前的一半。³1934年12月初,他第一次返回维也纳,在他原来的岗位上工作了几周。此后他还继续担任维也纳商会的顾问和联络人员。

米塞斯经常在一周的中段回到奥地利首都,逗留一到两天。只要他在维也纳,玛吉特总是随行。她仍然在等待,而他却不能下定决心向她求婚。此后的三年,他们的爱情仍然无法摆脱他母亲的阴影。

高级国际关系学院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内瓦曾是一座宁静的城市,虽然那时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已经设在此处。战后,这里成了国际劳工组织(ILO,1919)和国际联盟(1920)的大本营。后者是在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倡议下成立的。他的想法是建立一个旨在平息民族国家之间冲突,避免诉诸战争的国际政治组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威尔逊没有获得美国参议院最低票数的批准,因此美国无法加入这一新的组织。在创始者缺席的情况下,国联于1921年开始运作。人们选择日内瓦作为它的总部地址,是因为瑞士长期保持中立地位的缘故——那个时候,这种地位可不只是徒有虚名的——另外还因为日内瓦在文化上是一个法国城市。

这个新的国际官僚机构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之一就是缺乏合格的工作人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位名叫威廉·E.拉帕特(William E. Rappard, 1883—1958)的瑞士籍国联主管提议创办一所特殊的双语学校,促进国际政治问题和国际管理问题方面的高级学术研究。学校预计提供法语和英语课程,另外还将“充分利用国联和国际劳工组织的资源,包括专业知识、档案,以及对于新的多边主义背景下国际事务处理方式的直接观察”。⁴

拉帕特是外交官,也是宪法史学家,他身上具备一切能够为这个项目带来勃勃生机的素质。⁵他不只是卓越的外交家,交游广阔,熟悉政客、学者、政治家、私有企业和基金,同时还是一位广受尊敬的学者,任教于哈佛大学和日内瓦大学,还担任了日内瓦大学学术委员会的委员,在委员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甚至曾经短暂执掌整个大学。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他很幸运,与伍德罗·威尔逊私交甚笃,后者是他在哈佛大学1911年至1913年期间的同事。⁶这当然不止在一个方面提供了许多帮助。

1926年,日内瓦大学与纽约洛克菲勒基金会开始联合办学,筹建这所旨在促进国际政治关系研究的新学校,拉帕特当选为院长(rector),日内瓦大学提供了学术方面的协助和监督,洛克菲勒基金会承诺则与日内瓦市和瑞士联邦政府合作资助这所学校。

从1924年开始,拉帕特一直在与洛克菲勒基金会进行接触(或者更准确地说,

是劳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纪念基金会[Laura Spelman Rockefeller Memorial Fund]。1926年,洛克菲勒代表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博士(Dr. Abraham Flexner)⁷向日内瓦教育部承诺捐赠五笔每年20 000美元的资助,这笔捐款为学校的创建开了绿灯。拉帕特聘用了法国人保罗·芒图(Paul Mantoux)担任首任主管。1927年9月,学校正式落成,名为高级国际关系学院(*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Internationales*)。⁸随后几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扩大和增加了资金支持(范围和数额),并将“在此后20年内继续成为主要的赞助机构。”1938年,该校获得每年80 000美元的资助,到了1948年,已经累计得到总额140万美元的资助。⁹

拉帕特和芒图首次相遇是在1919年的凡尔赛和会上。凭着他和伍德罗·威尔逊的个人关系,拉帕特获得了特别外交观察员的身份。而芒图则是同盟国一方的主要翻译员,并且撰写了四人会议(Council of Four)的官方记录。¹⁰拉帕特早就知道芒图,因为芒图写过一些经济史方面的东西,这些著述为他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声誉。他年纪轻轻就发表了一部关于18世纪工业革命的专著,那部专著使他一举成名,迅速蹿升到法国学界和政界的上流阶层。凡尔赛会议结束后的几个月,他成为拉帕特在国联理事会中的同僚。由于其学术背景和政治背景,他成为创办新学校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人选——同时也是一个杰出的人选。

后来拉帕特加入了芒图在学院的管理工作,他们一起主导学院长达二十年之久。事实表明,正是两人默契的合作保证了学院的成功和学院内部热情友好的氛围,使它成为一个对于世界各国学者来说非常诱人的踏足之地。米塞斯的职位是一个面向国际知名经济学家的为期一年(后来得以延期)的访问学者岗位,他在这个位置上待了六年。在他之前担任这一职务的有塞缪尔·帕特森(Samuel Patterson)(费城)、弗兰克·格雷厄姆(Frank Graham)(普林斯顿),还有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芝加哥)。其他一些最近到访的国际知名经济学家还有古斯塔夫·卡塞尔(斯德哥尔摩)和西奥多·格雷戈里(伦敦)。米塞斯很有可能是通过格雷戈里的引荐来到日内瓦——他们认识已经有些年头,1933—1934年在国际商会还曾有过密切的合作。¹¹不过这个任命的提议也有可能来自别人——如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 Zimmer)教授,他管理着日内瓦国际研究学院(Genev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曾于1929年12月请求米塞斯推荐有资格获得奖学金的合适学生。¹²不管怎样,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米塞斯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之间长期的密切联系再次发挥了有益的影响。1933年1月希特勒掌权后,米塞斯本人曾经积极帮助德国同行在国外找到新的工作,这些职位里,至少有一部分很有可能是获得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因此,一旦奥地利的政治局势变得对他来说难以忍受,

687

688

689

他本人获得同样的支持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不出所料,经过1934年2月的暴力冲突和随之而来的事件,他也走上了这条道路。要说米塞斯的名字出现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工资单上,也许有些夸大其词(拉帕特坚持认为资助不应附加任何条件,同时瑞士方面也为学院提供财政支持,这两个因素有效排除了上述情形),尽管如此,事实仍然是,在日内瓦期间,米塞斯的薪水大部分来自洛克菲勒基金,此后的数十年间也是如此。¹³

学院生活

拉帕特开玩笑说,学院的教师队伍这么优秀,都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功劳。古列尔莫·费雷罗(Guglielmo Ferrero)就是一个例证,他是历史教授,到日内瓦前曾在意大利遭到软禁;其他人像米塞斯、凯尔森和勒普克也是如此,他们在此找到了一个再也不用担心政治问题的避风港。对凯尔森来说,语言问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他讲一口流利的法语,而英语却很糟糕。¹⁴米塞斯对英语的掌握程度也不及法语。

这些流亡学者搬到日内瓦湖畔后,很快发现他们的新学校还提供了宜人的社会氛围和士林风气。1934年秋米塞斯来到这里,住进了克里格路(*chemin Krieg*)16号的一套公寓(克里格路的字面意思就是“战争之路”)。不过当合同第一次延期后,他搬进了大仲马路(*chemin Dumas*)3号另外一套更好的住宅。这时,除了拉帕特和芒图之外,固定的教职员工又增加了以下几位:欧仁·博雷尔(Eugène Borel)、麦克·伊斯门(Mack Eastman)(经济学)、汉斯·韦贝格(Hans Wehberg)(国际法)、莫里斯·布尔坎(Maurice Bourquin)(外交史)、皮特曼·波特(Pitman Potter)(政治科学)、保罗·古根海姆(Paul Guggenheim)(国际公法)、古列尔莫·费雷罗(现代史)、卡尔·布尔克哈特(Carl Burckhardt)(现代史)、汉斯·凯尔森(法律)。米塞斯和这些人的私人关系似乎非常融洽——至少从学院生活的标准来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之间竟然存在某种程度的社会交往——这些知名学者就像其他职业群体一样往来应酬:互相拜访、招待客人,结识同事的家庭成员。他们喜欢这种生活。显然,米塞斯和拉帕特、芒图、布尔坎和费雷罗在一起感到非常自在。¹⁵

米塞斯还与别的一些学者建立了联系,他们分别来自国际联盟经济情报单位(洛芙迪、哈伯勒、廷贝亨、米德[Meade]、科普曼斯[Koopmans]、波拉克[Polak]、弗莱明[Fleming]、纳克斯、康德利夫[Condliffe]和希尔格特[Hilgerdt])、国际劳工组织(卡尔·普里布拉姆)和日内瓦研究中心(约翰·B.惠顿[John B. Whitton])。这

些团体之间最直接的共同纽带就是，他们都要依靠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那些年间，洛克菲勒基金会启动了大量商业周期研究国际项目，这些项目特别关注经济稳定问题。基金会不仅资助国际联盟和拉帕特研究生院的经济学家，同时也资助鲁汶、纽约、巴黎、索菲亚、维也纳和华沙的一些商业周期研究机构。基金会的管理人员小心翼翼地避免指定任何研究议程，可是他们的倾向是无法忽略的。于是，此后数十年间，一群手握财政资助大权的外行主导了商业周期研究的方向。国联的权威和洛克菲勒的金钱成了指路明灯，带领着诸如亚历山大·洛芙迪和阿尔文·汉森这样一些人；从此以后，商业周期研究就开始朝着越来越数量化的方向发展。¹⁶到了米塞斯迁往日内瓦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一个时代错误——早年洛克菲勒基金参与社会科学的一个遗迹。

1934年，这些倾向已经相当明显，但还没有获得支配地位。米塞斯这些人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自行决定研究计划，而且在日内瓦他们还拥有最好的工作环境。学院的舒适宜人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的规模：整个30年代，学院一直很小，几乎不受官僚主义的干扰——全部行政人员只有六位主管和一位兼职的会计。至于学生人数，几乎从未超过一百名，其中只有一半不到申请攻读博士学位。固定的教职员工即使在1938年最高峰时也只有十二位，其中包括拉帕特和芒图。¹⁷除了这些常设职位，还会补充一到两名访问教授，每次逗留一个学期，或者一年。此外还有客座教授，他们提供备受瞩目的短期课程，通常只上一周。所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造就了令人惬意的环境，几乎称得上是一个学术天堂。拉帕特这么解释他的成功秘诀：

692

我不知道……对高年级学生来说，还有什么办法……比让他们时时刻刻不拘礼节地置身于那些最杰出的专家中间更有益的了。只要这些专家是精心挑选的——不仅因为他们的思想和博学，同时也因为他们的人格魅力；只要能让他们明白，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推进自己的学术研究，以及指导和帮助高年级的学生……那么，我相信我们的任务就圆满完成了。¹⁸

每位教授都可以自行决定自己的课程和研讨会的主题。唯一的要求是他们必须偶尔为那些非专业学生开设导论性质的课程。就实际情形而言，这意味着米塞斯除了三个小时必须承担的正课之外，有时还要为非经济学者开设导论性质的经济学课程，这些课程由他和另外几个经济学家轮流主持。

693

学校占用了宏伟壮观的普兰塔摩大厦(Plantamour mansion)地下室和第一层，

后者坐落于杜平长廊(Promenade du Pin)5号,旧城中心的边界。1934年10月25日米塞斯开始授课。他开设了两小时的国际金融研讨班,还有一小时的“货币政策的国际视角”课程,授课时间在周四下午5时15分到6时。1934年11月15日的一次课上,米塞斯作了关于金本位制和受控通货问题的开幕讲演。

因此,只要完成三小时的教学任务,米塞斯就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从事任何自己认为适宜的研究——所有这些都是带薪的,而且还是一笔相当丰厚的薪水,每年总计25 000瑞士法郎或者233.375盎司黄金,大致相当于20世纪30年代的8177美元,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价值计算,就是这个数目的十五倍左右。¹⁹

694 多年以来,他一直告诉学生,高额薪水加上极少的工作约束,就是大学教授低产的主要原因。(他到日内瓦几年后,哈耶克告诉他一个最新发现:亚当·斯密对于学术高薪也持有同样的看法!²⁰)现在正好提供了一个机会,米塞斯可以借此证明自己错了,因为他最终写出了自己的经济科学研究的综合著作——这是他在二十年前因为预料战争临近而搁置的一个写作计划。

就在他接受聘任开始讲授货币理论的同时,他的货币理论英文译本正好出版发行。经过多年准备,巴特森(Batson)终于完成了这个译本,在罗宾逊的帮助下出版,书名译为《货币与信用原理》。这是米塞斯著作的第一个外文版本——正好赶上可以支持他在国际经济关系领域的教授职位。米塞斯对译者的态度是完全放任不管,此后也一直保持这种做法。虽然在公共领域由于政府的缺陷使得自由放任成为不可动摇的原则,可是这个原则却并不总能应用到私人事务中去。许多年后,米塞斯在和一位来自奥地利的年轻同僚的通信中抱怨说很难找到优秀的译者。“我被译文中的曲解和错误彻底震惊了,我的英文著作的法文译本和德文译本,还有我的德文著作的英文译本和法文译本,充斥着这类错误。”²¹例如,就此处的情形而言,英译书名“货币与信用原理”(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当然比硬译“货币与流通媒介理论”(theory of money and fiduciary media)更加清楚明了,可是却也磨灭了原文的锋芒。原文标题的要点正是强调流通媒介的特殊性质,按照书中的观点,流通媒介扭曲了货币经济的运作。

695 为了未来的学术生涯,米塞斯不得不设法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在写给马克卢普的一封信中,他提到希特勒主义的实际后果之一就是降低了德语语言的地位。²²未来属于英语。为了练习英语,米塞斯决定在学院使用英语而不是法语授课。按照后来形势的发展,米塞斯这个决定可以说是极其幸运的。学院的一般要求是教授和学生必须同时懂得法语和英语两种语言,不过按照惯例,人们可以只讲自己觉得比较轻松的一门语言。于是以英语提问而用法语回答就成为极其常见的

情形。与此类似,在书面考试中,学生也可以任选一种语言,而不用管卷面是用何种语言出题。家庭作业和博士论文甚至享有更大的自由,除了上述两种语言,也可以用德语或意大利语完成。²³

不过,米塞斯始终未能熟练掌握英语。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录制的一些录音带可以看出,即使他已经用英语讲课长达三十年之久,仍然带有浓重的口音。因此,人们可以设想他在日内瓦早期的课程对于学生的耐心可是一个相当严峻的挑战。米塞斯尽了最大努力弥补自己在语言上的不足,他的做法是把讲义提前写出来,可他的表达方式仍然很糟。他是个严谨的教师,但却从来不是出色的教师,他在课堂上是无法与那些富有魅力的演讲者竞争的,例如布尔坎和拉帕特,他们通过自己的人格魅力和演说技巧深深打动和倾倒了听众。1935—1936学年参加学院课程的哈佛研究生帕克·T·哈特(Parker T. Hart)写了一份透露内情的学生评测。在第一学期末,哈特没有提到米塞斯,但在第二学期末,他用下面的话赞扬了米塞斯:

我逐渐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对于当前经济问题的分析而言,米塞斯教授属于这里最优秀的教师。他的课程标题似乎与讲课的内容没有太大关系,不过他的教学总是发人深省、明白易懂——而且总是事先清清楚楚地写出来,这是别具一格的特色。从语法的角度说,他的英语留有许多未尽之处;第一印象恐怕是让人不舒服的。不过,他用词非常丰富,而且他的意思总是清晰的。简言之,他的确是“经久不衰”(wears well);另外,对于那些关注旧奥匈帝国覆灭后遗留的经济难题的人们来说,他的帮助尤显珍贵。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会通过具体经历以及广泛旅行和“现场”研究获得的亲身观察带动讨论和课程的气氛。²⁴

696

他在日内瓦的这么些年,为何没有教出哪怕一个杰出的学生?这篇报道暗示了其中一些原因。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学院学生的普遍心态:他们急于获得一个国际组织的雇用,即一个政府部门的雇用。我们大概可以认为,这类学生未必特别能够接受米塞斯的启发。他在这些年间最著名的两位学生成了战争经济学的专家,他们是斯特凡·波斯尼(Stefan Possony)和埃德蒙·西尔伯纳(Edmund Silberner)。²⁵

不过,米塞斯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总体而言是相当好的,这也是普兰塔摩大厦普遍氛围的体现。米塞斯进入学院的最初两年,曾在学院学习的一位学生后来回忆

697

一场晚会(在这些晚会中,学生和教员可以一起参加字谜游戏)上的某个情景时说:

芒图先生和罗兰·夏普(Roland Sharp)结成搭档,扮演勒安得耳与海洛(Leander and Hero)的经典爱情故事。夏普脸上长着黑色的小胡子,但他仍然努力表现出一些女性气质,他在头上系了一条亮丽的红缎带,爬上一张摆在高高的屏风后面的椅子,举起一支蜡烛,指引勒安得耳前进。芒图先生勇敢地脱掉外套,在地板上模仿横渡达达尼尔海峡的游泳动作,他不仅赢得了晚会的头奖,也在我们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不只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也是一位非常风趣的人。²⁶

698 米塞斯有了一个新的业余爱好,他也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快乐,这个爱好就是驾驶。在维也纳的时候,他的全部活动都局限于市中心的范围,而日内瓦的新生活却要求更大的流动性。为了方便前往山区和法国进行短途旅行,他需要一辆汽车。他一定是在1935年或1936年的某个时候开始学习驾驶的。1936年末,他取得了驾驶执照和一辆轿车。他还在学车期间就已经迷上了驾驶,因此,在取得驾照前大约六周,他就买了第一辆交通工具——一辆黑色的八缸福特轿车,称为“长程旅游豪华版”(Grand Tourisme Luxe)。²⁷最初他总是在司机的陪同下驾驶;渐渐地,他可以自己驾车远足了。他的第一位一日游乘客是海尔佩林。1937年春,他和玛吉特出发到蓝色海岸(Côte d'Azur)度过了两周假期。²⁸他那时和以后都一直是差劲的司机。他虽然开得不好,却很喜欢开车,而且他也真心希望能和心爱的女人分享自己新的激情。他安排玛吉特在维也纳参加驾驶课程。²⁹他们在公路上度过了许多幸福的时光。

疏远昔日盟友

米塞斯逐渐远离了从前一些最亲近的伙伴。20世纪30年代是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最富有戏剧性的例子是弗里茨·马克卢普和莱昂内尔·罗宾斯,两人都是在这些年间改变了他们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看法,特别是关于货币和金本位制。关于马克卢普,米塞斯最终断绝了与他之间的一切联系,持续多年没有任何来往。此事涉及人品问题。否认金本位制的重要性是一回事,但他相信马克卢普变节是因为缺乏原则。³⁰

20世纪30年代,这种疏远的种子刚刚种下,我们只是靠着事后的认识才能看出这一过程是从何处开始的。1934年,马克卢普离开维也纳前往美国,这时他拿的是洛克菲勒的生活津贴。1935年2月到6月,他在哈佛大学讲学,接着来到洛克菲勒新建的一所学校布法罗大学担任全职教授。然而,马克卢普不是坚定的奥地利学派学者,他投入了新的经济学思潮。米塞斯一定已经感觉到自己这位从前学生摇摆不定。1936年1月他向马克卢普呼吁:

我希望你在那边不要变成美国人,相反,我希望你能让美国人转向自由主义和奥地利学派。他们真的需要这种转变。³¹

十七个月后,他委婉地询问马克卢普,奥地利经济学家能从新的垄断竞争理论中学到什么。马克卢普在米塞斯的信里加了一句:“这不是问题所在。不过如果我们仍然要提出这个问题的话,那么答案就是:相当多。”³²

与莱昂内尔·罗宾斯的破裂没这么严重。米塞斯在日内瓦的第一学年快结束时,罗宾斯曾经来到学院做了次为期一周的享有盛誉的讲学活动,这些课程不仅吸引了整个学院的教师,还吸引了“地方当局的议员、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³³1935年夏,罗宾斯作了一系列关于国际经济组织问题的讲演。³⁴他带着家人一同前来,他们来到山地和米塞斯一起登山。罗宾斯的孩子后来回忆起,经过一天登山运动,米塞斯在他们的背包里塞满了瑞士巧克力。不过1935年12月后,两人的通信就停止了,只有1943年曾经再度联系——就罗宾斯这方面来说,是有些不情愿的。当时米塞斯进行了最后一次努力,试图挽回罗宾斯,让他重新回到自由阵营。³⁵

罗宾斯后来非常明确地背离了他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曾经珍视的那些思想。他在自传里说,希望自己从来没有写过《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 (1934)这本书。《经济计划与国际秩序》(*Economic Planning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1937)是他的最后一本“奥地利学派”著作,他在这本书中发表了自己的日内瓦讲演。在另一本书《阶级冲突的经济基础》(*The Economic Basis of Class Conflict*) (1939)中,罗宾斯开始重新考虑“闲置资源”的问题,他觉得这个问题的存在破坏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理论的适用性。从那以后,奥地利学派对罗宾斯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弱,逐渐居于次要的地位。他和米塞斯仍然保持着友好的私人关系,但是他们不再是思想上的战友了。³⁶

不同于马克卢普和罗宾斯的情况,米塞斯与哈耶克之间的情谊在这些年间更趋坚定,尤其是在战争期间。正是哈耶克管理着米塞斯在伦敦的银行账户。他为

米塞斯订阅《经济学》和《经济研究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也为他订购图书——此一安排可以表明米塞斯给予自己的前维也纳同事极大信任。米塞斯生性谨慎,除了他的银行顾问和古斯塔夫·菲舍尔(德国信用管制最初几年为他服务的一位准银行家),他从不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财政状况。³⁷

维系他们友情的关键因素是哈耶克对自由市场的尊重和欣赏,而非他们在政治学或经济学上的见解之某种亦步亦趋的符合一致——尽管哈耶克感到有必要向他的前导师保证“不必担心我会变成一个凯恩斯主义者”。³⁸哪怕有些相当重大的争论,他们的友情仍然得以延续。这些争论没有影响两人的私人感情和学术联系,不过,在1974年之后奥地利学派的复兴运动中却会产生重大影响。

这些争论是什么呢?维塞尔对哈耶克经济思想的影响,在哈耶克关于货币均衡和“中性”货币的理论中留下了烙印,而这两种理论都是米塞斯明确反对的。当哈耶克转向资本理论后,另外一些争点也显露出来。1934年春,弗里茨·马克卢普就一般而言的资本理论思想和个别而言的生产时期概念,咨询了奥地利学派的核心成员——米塞斯、哈耶克、施特里格勒、哈伯勒、马克卢普。5月份米塞斯回答了马克卢普的五个问题,声明他们中的三人都没有正确理解生产时期概念。马克卢普略显惊讶地答复道:

702 不管您是否仍然从根本上彻底反对我(和哈耶克)的观念,我都非常感激您的来信。严格地说,哈耶克关于资本理论的新著从头到尾都是您反对的。³⁹

随着哈耶克把注意力转向社会主义理论,另外一个分歧显露出来。1935年,哈耶克编了一本文集,支持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无法实现的观念。书中包含一篇哈耶克写的引言、皮尔逊和米塞斯的两篇经典文章,以及两篇结论性的文章,讨论大陆文献(哈尔姆)和英语文献(哈耶克)关于这一问题的最新争论。⁴⁰

703 在这篇引言中,哈耶克指出米塞斯是第一位强调“定价过程”必须包含中间产品和生产要素否则就不可能进行经济计算的作者。然而哈耶克所说的“定价过程”似乎仅指货币价格的表达——换句话说,他的论证看起来是基于一个维塞尔式的假设,也就是说,货币价格只是表达价值和进行价值计算的一个方便工具。⁴¹于是关于运用数学方程组作为经济计划的工具的建议,哈耶克承认,这一建议“并非在逻辑矛盾的意义上是不可能的”。倒不如说,在哈耶克那里,中央计划的真正问题乃是所需信息的类型和数量所导致的。⁴²

首先,中央计划制定者需要知道关于所有个别财货的地点和物理特征的准确

信息。其次,他们必须集中一切可用的技术知识以及关于如何获得新的技术知识的知识(“思想技术”)。第三,他们必须知道“不同种类和数量的消费财货的相对重要程度的资料”。即使满足所有这些要求,社会主义经济计算无疑仍是不切实际的,不过,并不是像米塞斯所说的那样完全不可能。哈耶克强调:

人们提到的所有这些困难“仅仅”因为人类心智的缺陷。这就是说,我们不能认为这些建议在任何绝对的意义上是不可能的,但是仍然站得住脚的是,这些阻碍我们取得可欲目标的严重障碍的确存在,而且我们似乎没有办法克服这些困难。⁴³ 704

哈耶克的结论是,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实际困难。对他来说,这个关于缺少货币价格的经济计算的深刻认知问题,就是他反对中央计划的经济学论据的开始和结束。米塞斯也认识到了知识问题的存在及其重要意义。⁴⁴但他还意识到了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更深的问题。就米塞斯而言,“定价过程”并不只是解决一个知识难题——它不只是通过货币价格的可知现实(knowable reality)“表达”了价值的可知现实。相反,定价过程创造了一个若非如此也就无法认知的现实。哈耶克会追随维塞尔争辩说,如果基本的知识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我们就能计算生产要素的正确价格。米塞斯否认了这种哪怕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性。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在他那里是概念上不可能的。

1938年,米塞斯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社会主义计划委员会运用数理经济学方程组作为计算工具的问题。⁴⁵

米塞斯说,哈耶克低估了社会主义计划委员会知道未来消费者偏好这个假设的重要性。哈耶克已经指出,获取这些知识将会遇到巨大的实际困难。米塞斯同意这个看法。但还有一个逻辑难题,即使我们拥有关于未来的知识,这个难题仍然存在。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些已知的未来消费者偏好塞进一组方程组然后得到一个资源分配方案。瓦尔拉斯、帕累托和巴罗内的方程组仅仅描述了全局均衡状态下的经济体系看起来是什么样的。它们描述了均衡状态的经济,而非趋向均衡的经济。真实世界的经济总是处于变迁之中;它持续处于非均衡状态。根本的经济问题乃是选择接近均衡状态的最佳行为,并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执行这一选择。由于人是在当下面临真实世界的抉择——不管这人是企业家还是社会主义独裁者,因此,根据一些理论构想了解假设的未来消费者偏好,根本没有什么作用。他的关键问题是决定接近均衡的下一步行动。全局均衡方程组本身并没有为解决这个问 705

题提供任何信息。

米塞斯认为市场经济超越社会主义的决定性优势是对当下经验(present experience)的利用。对一个社会主义独裁者来说,关于当下环境的知识只不过是推测经济最终均衡状态的一个起点,但是这些推测每天都被一些不可预见的变化推翻。恰恰相反,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可在当天的决策中利用当天的经验。他们可以运用自己掌握的关于当下环境(供给方面)的知识,以及当下关于未来环境(需求方面)的企业家意见,对现存经济结构进行零星改善。

706 显然,米塞斯曾经向哈耶克提交了这篇论文的若干未被接受的版本。即使是最终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杂志》(*Revue d'économie politique*)的稿子,也未能说服哈耶克。他私下写信给米塞斯说:

关于这篇论文我有很多话要说,但它提出的问题是如此广泛,很难在一封信里解释清楚。正如我在巴黎提到的,对于这篇论文的最后一段,甚至新的修改我也不是完全满意。假设企业家个人关于未来的所有知识都已集中在经济独裁者的头脑里,同时假定他有能力解出代入这些数据的无数联立方程。那么,是否真的还会余下另外一个问题,关于企业家和独裁者之间位置的差别?我不是那么肯定。⁴⁶

此时,哈耶克已经发表了那篇现在非常著名的关于“经济学与知识”的论文,他在文中提出,瓦尔拉斯、帕累托和维塞尔的全局均衡经济学是套套逻辑命题系统——在某种程度上是“纯粹的选择逻辑”,因此也是无可辩驳的。它没有提供对于真实经济如何运作的充分解释,因为它一开始就假设基本问题,也即,如何获取知识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哈耶克认为市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市场价格起着信息交流机制的作用,而社会主义的重大弊端恰恰就是缺少这样的机制。

707 因此,哈耶克对于如何走出全局均衡暗箱已经有了自己的解决方法。他强调了信息问题和知识获取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要性,而他采取的观点是他试图调和瓦尔拉斯框架和生活实际的尝试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问题在于,他把这些问题投射到了所有理论家的身上,尤其是米塞斯。那篇1937年论“经济学与知识”的文章目的就是反对他相信存在于米塞斯身上的先验论。⁴⁷实际上,这篇文章充其量只是对瓦尔拉斯全局均衡理论不必要的先验假设的一个批评,哈耶克本人助长了这些假设的传播。

哈耶克认为知识和信息问题非常重要,但是他的思考并未改变米塞斯对经济

科学先验性质的看法。哈耶克把这一事实归因于他那66岁导师的思想过于顽固。然而,不愿接受新思想的其实是哈耶克。早在米塞斯发表那篇讨论价值的本质以及经济理论与真实世界之间关系的开创性的论文之前,哈耶克和同学们已经在这些问题上形成了自己的看法。⁴⁸

尽管如此,哈耶克仍然是米塞斯最喜爱的学生,也是最亲近的支持者。1937年春,哈耶克来到日内瓦,主持了一门非常出色和成功的临时课程(*cours temporaire*)。一年后讲座内容发表在《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Monetary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tability*)上,这是他写过的最好的著作之一。不幸的是,米塞斯未能出席全部课程。就在哈耶克到达日内瓦不久,米塞斯收到了母亲病危的消息,立刻启程返回维也纳。⁴⁹阿德勒·冯·米塞斯没有经历很长时间的病痛折磨,她死于1937年4月18日,四天后下葬,儿子们出席了葬礼。

708

母亲和路德维希感情极深,以至于她成了米塞斯和玛吉特婚姻的一个障碍。现在,婚礼的大门打开了。

米塞斯和新自由派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的不同意见,只是米塞斯和昔日战友之间更大分歧的一个征兆。

米塞斯毫不掩饰地支持此时已经声名狼藉的曼彻斯特学派的主要信念,但他所做的远远不止这些。他表明,任何第三条道路都是内在地不稳定的,因为它无法解决自己声称可以解决的问题,于是始终鼓动更多的政府干预,直到干预主义转向彻底的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是不可行的。剩下只有一个有意义的选项:百分之百的资本主义。米塞斯再三强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别无选择。推测第三条道路政策可能适合某个特定群体的情感,这是荒谬的。只有私有产权得到保护,社会才有可能存在,事情就是这样。

这一启示正好与老一辈自由主义者遥相呼应——米塞斯出色地重申了他们年轻时代的理想,这让他们倍感惊喜。然而新兴一代并未全心全意接受米塞斯的观点,他们是在弥漫着国家主义的思想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中学老师和大学教授已经慢慢认可了隐藏在社会主义背后的主要思想: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学说、资本主义导致工人阶级经济贫困的观念,以及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体制趋向垄断的信念。

709

从积极方面说,米塞斯当然颠覆了成熟形态的作为理想政策的社会主义。哈

耶克、马克卢普、哈伯勒、罗宾斯、佩鲁和勒普克将会深刻影响西方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策走向,不再膜拜全能政府的幻象。事实证明这对历史进程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但是,米塞斯的影响未能鼓起他们全心全意回归充满活力的自由主义的勇气,而19世纪的曼彻斯特学派和世界范围的自由放任运动正是以这种自由主义为其特征的。

此时,米塞斯尚未发表那部关于经济科学的系统著作,他将在那里阐明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的科学论据。关于社会体系的一般经济理论的某些重要成分,这时已经初露端倪。但是直到1940年之前,我们并不清楚这些成分如何相互关联,它们又是基于怎样的一般分析框架。1940年,米塞斯最终发表了这部系统论著,题为《国民经济学》(*Nationalökonomie—Theorie des Handelns und Wirtschaftens*)。但是,1940年的哈耶克已经是一位51岁的知名学者,对他来说,这本书来得太迟了,对他那一代的其他人来说也是一样——勒普克和马克卢普和罗宾斯,以及20年代所有其他曾经由于米塞斯的指引离开社会主义的人们。在这些人的心目中,米塞斯关于社会主义之不可能性和干预主义之无效性的早期著作产生了一个悖论。米塞斯说服他们相信,成熟的社会主义既不可行,也不可取;他还说服他们,中间道路是被高估了的。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尚未质疑这种看法:19世纪自由主义已经失败,因为它的经济体系即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并未产生好的结果。他们相信以下这个简单事实: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一定趋向垄断,而且正是由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19世纪工人阶级过着悲惨的生活。⁵⁰

对这些人来说,理论已经否定了社会主义的可行性,而历史则表明了资本主义的缺陷。我们应该走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可以经由某种方式避开米塞斯关于干预主义必然适得其反的论证。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解决方案乃是基于这样一种知识建构,这种知识建构把社会经济划为两个成分:(1)一个制度框架,以及(2)一些在这个框架内运作的过程——其中最为人知的就是定价过程。根据这个新的信条,政府不应干涉这些过程,但它必须建立和维持这个制度框架。这套假设就是后来所谓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典型特征。我们在哈耶克写于1935年的一篇论文中可以发现新自由主义世界观的清晰表述。论及米塞斯关于干预主义的理论,哈耶克说,米塞斯的论证并不证明“旧式的彻底的自由放任是我们可以合理拥护的唯一一种资本主义的形式”。他继续说:

承认私有制原则,无论如何并不必然意味着现存法律体系下有关财产权利的内容界定是最恰当的。什么是最恰当的、最能保证顺畅和有效竞争的永

久框架,这个问题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但必须承认的是,经济学家令人遗憾地遗漏了这一问题。⁵¹

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及其美国追随者开始相信产业集中已经产生了有害的结果,应该通过政府干预加以缓和。这一思想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就是谢尔曼法案,直到今天,这一法案已经导致官僚机构的权力取代了消费者的权力。在德国,由于威廉皇帝统治时期推动的社会政策,第三条道路哲学变得无处不在。接着,法国紧随其后,第三方案(tierce solution)成为必要,新政时期的美国也是如此。

然而,直到20世纪30年代新自由主义才出现了一些纲领性的宣言——毫不奇怪,仍然是在德国和美国。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一份文献出自芝加哥经济学家亨利·西蒙斯(Henry Simons)。他在1934年发了一篇题为《自由放任的积极方案》的工作论文——“积极”一词是指这个方案要求政府实行充分的干预政策,而古典自由放任主义是一个“消极”方案,因为它没有提供对政府干预的辩护。西蒙斯呼吁政府管制货币和银行,阻止垄断出现,并为贫困人口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的确是对放任自由主义的背弃。⁵²

这些观念完美地表达了整整一代经济学家的感受——他们成长于彻底的国家主义知识氛围,不过仍然了解古典自由主义的教导。F. A. 哈耶克、威廉·勒普克、弗里茨·马克卢普、米尔顿·弗里德曼、迈克尔·波兰尼、瓦尔特·奥伊肯,还有其他许多人,他们是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接受大学教育和决定性的知识冲击。30年代后期,他们开始获得更多的资深职位,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右派的精神领袖。⁵³他们的新自由主义鼓舞了战后许多公共机构的工作,这些机构遏制了日益增长的国家主义浪潮,尤其是朝圣山学社和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多年后,新自由主义的议程开始由新的一波教育机构推动,例如人文研究所(Institute for Humane Studies)、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以及阿特拉斯研究基金(Atlas Research Foundation)。

人民阵线

与此同时,文明之敌步步紧逼。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斯大林已经在国内政策和国际舞台上同时展开了新的攻势。通过一系列的试验,他在共产党内部进行了大规模清洗,杀害了一些最重要的对手及其支持者。在日内瓦,他的外交部长

713 李维诺夫(Litvinov)打造了一个“反法西斯”同盟,第一次把西方民主国家和莫斯科的国际社会主义结成联盟。⁵⁴当然,这个同盟的共同基础是反对罗马和柏林的国家社会主义。事实证明,李维诺夫的行动是非常成功的。现在回顾,这可能是20世纪历史上迄今为止最有效地侵蚀了西方对俄式国家主义的抵抗基础的策略。⁵⁵

最初,日内瓦的西方外交官抵制俄国的主动姿态。但是,西班牙内战(1936—1939)的影响瓦解了这种态度。自那以后,西欧国家一门心思只在防范国家社会主义。柏林、罗马和马德里法西斯政权的出现,立即对法国和英国的国家安全产生了威胁,而国际社会主义的危险看起来还很遥远。日内瓦的外交官没有一个能够想到红军进抵易北河和维也纳的情形。这种想象力的缺乏,由于共产主义对美国罗斯福政府的渗透而加强了。尤其罗斯福夫人还保持着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团体的交往。⁵⁶

714 罗斯福用一大堆新法律和机构席卷了美国,这些措施让整个国家越来越像“旧欧洲”。⁵⁷新政在美国是新的,但在欧洲却是旧的。米塞斯在美国发生的这些事件中看到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社会主义以来,他们曾经谴责过的一切蠢行。他写道:

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不只在其发源地,而且在整个世界都得到热情拥护。这种普遍赞同的原因,在于新政的基本思想正好符合公众舆论。每个人都相信,必须用更多的政府干预取代资本主义和私有企业。尽管某些个别措施遭到批评,新的政策作为整体仍然广受好评。⁵⁸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相信,美国资本主义注定走向灭亡。罗斯福选举那年,熊彼特从波恩迁往哈佛,他有一段广受征引的怨言,说自己本来可以好好待在德国的。⁵⁹

美国新政和德国新政之间还有其他一些区别,其中涉及共产主义。人们很快发现,美国政府奉行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的政策。罗斯福的第一项举措就是建立了一家银行,为布尔什维克提供融资渠道。美国虽然不是国联会员,毕竟参加了反法西斯同盟。

715 1936年春,共产主义者发起的“人民阵线”在法国和西班牙的选举中获胜。虽然共产主义者待在幕后,表面上避免涉及任何有关布尔什维克式政变的企图,但事实仍然是,这些国家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社会主义政府。现在,法国社会主义者做了他们的奥地利和德国同志十八年前曾经做过的事情。莱昂·布卢姆(Léon

Blum)和他的政府实行了军需工业的国有化,取缔右翼政治组织,增加了义务教育,禁止了对工会暴力的反抗,规定了工资水平的法定增长,减少劳动时间到每周40小时而不削减周薪从而进一步强制提高了最低工资水平,规定了每位雇员每年两周的最低法定假期(附带纳税人友情赞助的火车票),强迫所有规模超过十位雇员的公司付钱给工人“代表”监督新的政策的实施。

毫不奇怪,大量中小企业因为这些管制停止运营,同时,许多在此过程中丢掉工作的工人没能找到新的工作,因为幸存下来的企业在新的最低工资水平下雇用不起他们。资本家纷纷逃离法国,很快莱昂·布卢姆不得不依靠国债和通胀维持政府运作。1937年6月他辞职了,在位仅仅一年有余。1938年4月,新的达拉第政府掌权,废除了所有这些新的社会主义法律,并在一场短暂而暴力的对抗中粉碎了工会的势力。

在西班牙,纠正过程迟缓得多,也暴力得多。1936年5月米塞斯来到马德里出席一个旨在促进国际研究的会议。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他说这次会议是为了改善国际关系而迈出的一步。⁶⁰但是西班牙和其他国家的关系直到整个国家分崩离析也没有任何改善。米塞斯向马克卢普报告说:“工团主义者(anarcho-syndicalists)正在准备接管政府,‘右翼’分子则磨刀霍霍。”⁶¹

716

1936年7月,随着内战爆发,新的人民阵线政府勉强上台执政。经过两年多的血腥战斗,付出超过一百万西班牙人生命的代价,佛朗哥将军领导的极权主义暴乱分子最终胜利地向马德里挺进。

《货币与信用原理》的西班牙语译本已经问世,距离战争爆发只有几周。⁶²它已注定被遗忘,直到几十年后,一群坚定的经济学家才使这部著作重新焕发生机。在西班牙外,关于自由放任的议论同样变得无人理睬,自由社会的敌人反倒赢得越来越多的听众——特别是如果那些支持政府控制的花言巧语足够灵活,因而能够适应各种不同政体。于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德国大出风头,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甫一出版,同年就在德国有了译本。凯恩斯在德译本前言中吹嘘说,他的理论特别适合极权政体,他还悲叹,可惜不太合乎自由社会的普遍形势。⁶³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刚发表时,米塞斯未予置评。直到凯恩斯主义风起云涌,并把英国经济学家提升到学界领袖的地位,米塞斯才有所反应。在米塞斯眼里,凯恩斯革命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根本就不重要。凯恩斯没有提出哪怕一种新的学说,⁶⁴甚至他的主要错误也是旧的错误,已经被人反驳了成百上千次了。因此,对待凯恩斯主义的恰当方式就是从社会学的观点出发。1948年,米塞斯写道:

717

若要正确评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学术圈内获得成功，你必须考虑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大学经济学科的普遍情形。

718

过去几十年间占据经济学教席的人里，只有少数几位真正的经济学家，即那些熟知现代主观主义经济学理论之人。老的古典经济学家以及现代经济学家的观念在教科书和课堂上遭到嘲讽；他们被人称为老古板、正统派、反动分子、资产阶级，或者华尔街经济学。教师为他们一贯拒斥曼彻斯特主义和自由放任的抽象教条而感到骄傲。⁶⁵

两年后他继续写道：

那些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是新观念的先驱。他们提出的经济政策与同一时期的政府和政党实行的政策不一致。一般而言，公众舆论需要几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才会认可经济学家传播的新观念，并在政治决策层面做出相应调整。

719

这和凯恩斯勋爵的“新经济学”不同。他所鼓吹的那些政策，恰恰就是几乎所有政府，包括英国，早于他的“通论”出版多年已经实际采用的政策。凯恩斯不是致力于提出管理经济事务的新方法的改革者或拥护者。他的贡献其实是为那些掌权的人喜欢的政策提供表面的辩护，尽管所有经济学家都把这些政策视为灾难性的。他的成就就是合理化这些已经实行的政策。⁶⁶

深刻转变

720

1937年8月1日到6日，米塞斯参加了第九届国际哲学大会，他向大会提交了一篇论文《人类行为科学的逻辑特征》。米塞斯在会上遇到波兰哲学家塔德乌什·科塔宾斯基（Tadeusz Kotarbinski），后者提交了一篇很有意思的论文，讨论“关于一般行为学的方法论的概念”。⁶⁷虽然这篇论文本身未对米塞斯的思想产生持久影响，不过，科塔宾斯基使用“行为学”一词表示关于人类行为的一般理论，对于这一做法，米塞斯大感兴趣。米塞斯曾经在另一位波兰学者、数理经济学家欧根·斯拉茨基（Eugen Slutsky）写于1926年的一篇论文中见过这个术语。⁶⁸他在维也纳私人研讨会的讨论中偶尔也会用这个词。⁶⁹不过，他很厌恶术语创新，因此，他不愿意在公开出版的著作中用这个词，即使他确实需要一个较好的标签替代“人类行为通论”这个累赘的表述。整个20年代，他用的词是“社会学”，但是到了30年代

初, 他已承认大多数社会科学家是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理解这个词的。在那些狂热的反经济学家例如奥特马·施潘和维尔纳·桑巴特的影响下, “社会学” 已经成了另外一门社会科学的缩写——这门学科没有整合经济学原理, 反倒排斥经济学, 试图以其他理论解释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有限市场经济。

不过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名称: 行为学 (praxeology)。在学术文献里, 这是一个逐渐流行的概念, 不仅如此, 它的拥护者用这个词表示的意思似乎和米塞斯对人类行为一般科学的理解是一致的。科塔宾斯基可能对米塞斯说过他的“战斗的一般理论”, 这是他把一般行为学方法应用于战争现象的结果。⁷⁰ 而且很有可能也是科塔宾斯基向米塞斯介绍了某些行为学的先驱, 例如法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埃斯皮纳斯 (Alfred Espinas)。⁷¹ 米塞斯发现埃斯皮纳斯著作中“行为学” 的含义和他理解得很不一样。斯拉茨基对这个术语的用法稍微接近自己的观点, 但也仍然不是完全一致。⁷² 不管怎样, “行为学” 尚未沾上反经济学的那层含义, 就像“社会学” 那样 (而且哈耶克在伦敦发来消息说这个术语在英语中还不为人知), 因此, 米塞斯最终采用了这个术语表示他的人类行为通论。

721

这部伟大著作也在其他学术领域取得进展。其中一个重要领域是他过去二十年不太涉足的方法论。以前他也写过经济学方法论方面的文章, 但是没有涉及经济分析较为专门的细节问题。现在, 米塞斯精心阐述了自己在旧作中讨论过的关于方法论的零散看法。⁷³

1938年3月初在维也纳一个纪念法国数理经济学先驱奥古斯丁·库尔诺 (Augustin Cournot) 的会议上, 米塞斯提交了第一篇完全讨论方法论问题的论文。⁷⁴ 确切地说, 米塞斯处理的是数理经济学的核心要素, 也即经济均衡 (economic equilibrium) 概念。他指出, 这个概念在经济分析中的确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并没有数理经济学的鼓吹者认为的那么重要。作为企业家利润或亏损的逻辑对立面, 均衡建构是必要的。在均衡状态下, 没有利润或亏损这类东西。只有在不均衡中, 才会存在这些现象。但是, 这些说法只是重新阐述了弗兰克·奈特精心建构起来的基本概念框架, 而且米塞斯还强调说, 均衡建构只对正确理解利润和亏损概念是必要的, 而对理解其他经济现象没有帮助。⁷⁵

722

* * *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 奥地利商会进行了彻底的重组。米塞斯主动要求 1938 年 1 月 1 日以后退休, 他强调说, 如果他们需要, 他会继续为新的商会工作。⁷⁶ 他们的确需要。1938 年 2 月初, 联邦商会 (Bundeskammer) 新任主席的得力助手威廉·贝

723

克尔(Wilhelm Becker)请求米塞斯出任货币与金融事务部主管。唯一的附带要求是米塞斯必须放弃他在日内瓦的职位。大概是在2月20日,米塞斯回到维也纳讨论这个计划。⁷⁷他之所以又想回到维也纳,原因之一可能是学院的财务状况不太稳定:1936年期间,事情变得非常明显,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些成员越来越不愿意继续提供支持。

724 因此,1937年秋季,米塞斯认真考虑了返回维也纳的可能。接着,他费了很多精力思考祖国的主要政治问题:维护公民自由,抵抗来自北方和南方的强大邻国入侵。米塞斯确信,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建立一个东欧语族(国家)联邦,以一个强大的多瑙河中央国家为核心。1938年初,他在一篇10页的论文中提出了一项改革的总体计划,题为《重建多瑙河地区新秩序的一些原则》(Principles for the Creation of a New Order in the Danube Area)。⁷⁸他在这篇文章中认为,建立这样一种新秩序需要东欧诸国克服贸易保护主义,因为在米塞斯看来这是它们之间发生冲突的根源,因此,也是它们无力对抗俄国、德国和意大利这三个强大邻国的原因。但若要放弃贸易保护主义,需要做的远远不止在法律上废除关税和进口配额。这也意味着消灭某些特权,涉及货币政策、税收、卫生与安全管理和建筑法规、公共建设工程、铁路运输率,以及许多其他公共行政领域。从这个分析中米塞斯得出了一个非常深远的结论。仅仅通过一个关税同盟限制各国政府的主权是不够的。的确,应该建立一个联邦政府行使全部行政职责。如果没有一个中央政府凌驾于所有国家政府之上,后者将会采取民族主义的政策,压迫境内少数民族,从而导致紧张和冲突,最终搞垮整个邦联。

简言之,米塞斯提议奥地利与多瑙河地区其他较小国家组成政治联邦,以便抵消此时的军事威胁,但这一联邦要行得通,必须先行消除各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因此,联邦的政治机构必须实行彻底的集权。⁷⁹

725 需要强调的是,米塞斯提出此项建议的主要目的不是建立多瑙河地区更加紧密的经济合作。因为,无须任何政治联合,也能实现这种经济合作,只要每个政府单方采纳自由贸易原则。他的方案的要点是在现有条件下获取最大限度的政治自由。在他看来,奥地利和这一地区其他国家只有两个选择:放弃部分自治权——变得足够强大以便抵抗外国压力,或者丧失全部自治权。它们要么成为德国、俄国或意大利统治下的附庸省份,要么就在一个共同的中央政府下获得自治。

725 多数奥地利政治领袖憎恨政治集权这一前景。他们首先寻求的是民族自决。米塞斯的论文表明他们错了。在目前环境下,民族独立对于达到民族自决的目的不是一个合适的手段。那些抵制多瑙河盆地中央政府的人,毫无保留地相信英国

和法国愿意提供永久的保护。但是,这两个国家将会倦于为了东方国家的利益而战斗,最终他们定会要求建立一个能够独立生存的政治体系。

1938年2月,米塞斯带着这些计划前往维也纳。⁸⁰但他回到这个多瑙河畔的城市还有别的原因:走完婚姻的书面程序。大约十年之久,玛吉特耐心地等待他的求婚。1937年圣诞节,在母亲去世八个月后,路德维希终于准备好了。他抛开所有甜言蜜语,以他一贯的简洁明了提出:“不能继续这样。没有你我活不下去,亲爱的。我们结婚吧。”⁸¹——这就是真实的米塞斯。玛吉特难以置信,这是她有生以来最幸福的时刻。他们立刻安排。其中一个程序是在婚礼前六周当众宣布婚约。

726

可是,外界事件冲淡了个人的幸福。预定举行婚礼之前的几周,阿道夫·希特勒威胁奥地利总理许士尼格(Schuschnigg)说,德国将在奥地利挑起内战,并将入侵奥地利。许士尼格发了一个极短的通知,宣布举行全民公决,决定德国统一奥地利的问题。投票将在下周日即3月13日举行。米塞斯正在城里,可能是刚出席了维也纳的库尔诺会议。在这期间,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德国正在准备攻击奥地利,阻止公民投票的举行。小心谨慎的米塞斯知道他在纳粹军队黑名单上的排名非常靠前,于是就在3月10日周四或11日周五早上离开了——事实证明,不算太早。

1938年3月11日周五,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带领一支分遣队到达维也纳,试图逮捕希特勒的主要敌人并没收他们的财产。⁸²两天后的3月13日,德国军队到达维也纳,结束胜利的行军后,一群人闯进米塞斯的寓所大肆搜查。3月底,盖世太保来了,带走了二十一箱米塞斯的东西,然后查封了这间房子。到了秋天,盖世太保又来一次,取走了剩下的东西。他们洗劫一空——米塞斯几十年来积累的藏书、他的私人信件、画作、银器、私人档案和政府文件——全部东西,甚至包括换洗衣物。后来米塞斯再也没有看到这些东西,也不知道它们的下落。⁸³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红军在波西米亚的一列火车上发现了他的私人文件以及纳粹政权其他一些重要敌人的档案。他们把这些东西送往莫斯科的秘密档案室。米塞斯去世十八年后的1991年,人们重新发现了这批档案。如今它们成了这位伟大经济学家的传记作者眼里最珍贵的资料。⁸⁴

727

对他寓所的洗劫只是一个开始。新的政府当局很快停止支付他的薪水和退休金,并对他的银行存款课以“逃亡税”(Reichs-fluchtsteuer)和犹太人税(Judenabgabe)。⁸⁵他们还没收了路德维希和里夏德继承的遗产中最易出售的部分:广为人知的150枚稀有金币和超过3000枚其他铸币和勋章,这些都是1903年父亲阿瑟·冯·米塞斯留给他们的。⁸⁶米塞斯家族的资产已经成了自由劫掠的对象了。

728

纳粹费尽心力准备接管奥地利政府。他们研究了所有曾经质疑过纳粹事业和纳粹理想的著作,即便只是稍稍涉及。兼并后,他们搜寻这些著作的作者。哪怕完全无害的人,就像卡尔·布罗克豪森这样有着国际声誉的慈善家和和平主义者,也被德国秘密警察请去喝茶。⁸⁷不过,盖世太保也抓走了国家社会主义在维也纳最大的支持者奥特马·施潘。这位《理想国家》(*Der wahre Staat*)的作者一直非常欣赏强权政府,当然,这个政府应该遵循正确的思想,即他的思想。有关方面曾经考虑吸收他为希特勒的宣传卫士,不过很快失败了。他和儿子拉斐尔进了达豪集中营,他在那里受到拷打,丧失了部分视力。⁸⁸

这个时代不能容忍耿介之士。这是汉斯·迈尔之流的时代。合并后,过了几周,迈尔向国民经济学会全体会员发了封信,宣布非雅利安会员已被取消会籍。迈尔继续保留他在大学的职位,直到战争结束、社会民主党重新上台以后,他仍然待在那个位置上。

数十年后,莱昂内尔·罗宾斯回忆自己对维也纳的感情是如何突然走到尽头的,当时,

汉斯·迈尔,这位任职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曾经任教过的大学的资深经济学教授,这位我曾不止一次亲耳听见谴责希特勒及其所作所为的人,作为国民经济学会主席,本来可以不失体面地关闭学会,可他没这么做,反倒开除了犹太会员,这是一个永远无法抹去的耻辱。从那以后我再也无法振作起来回到维也纳了。⁸⁹

这也是米塞斯对此事的感受。战争结束后,他花了很多年才稍稍平复心情,重新回到这座一度深爱的城市。

许多学者不得不离开奥地利,为汉斯·迈尔之流在新纪元里的地位让路,他们中的很多人经过瑞士。此后的岁月,米塞斯花了更多心血帮助这些流亡国外的奥地利侨民寻找工作。⁹⁰终于到了某天,米塞斯自己在日内瓦的职位因为财务关系也变得岌岌可危了。他和弟弟里夏德还要照顾那些未能及时逃出的亲戚和朋友。这些经历改善了他们兄弟两人的关系,虽然还谈不上那么亲密。路德维希和玛吉特是在7月结婚的,但他不认为有必要在信中提到婚事。一个月后里夏德通过他们的姑母范妮知道了此事,随即向路德维希写信求证,但即使这样,回信的也是玛吉特而不是米塞斯。后来她的情感和魅力终于修复了这对固执的兄弟之间的关系——那时他们已经并肩站在大西洋的西海岸了。

德奥合并后,玛吉特和女儿吉塔曾滞留维也纳好几周,因为她们没有办完出国必需的书面程序。当时,如果她们和米塞斯的关系被人知道,就会陷入极大的危险。最后她们终于离开了,路德维希手捧鲜花在苏黎世火车站迎接她们。后来她回忆道:

731

在我们婚前十三年的共同生活中,我从未见他哭过。婚后整整三十五年,我也从未见他哭过。但那时他哭了,完全不受控制、毫不掩饰地哭了。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下,他也并不以此为耻。⁹¹

1938年7月6日,他们在日内瓦结婚了。⁹²一个非常简单的行政仪式,在场只有一位民事法官和两位见证人:汉斯·凯尔森和戈特弗里德·冯·哈伯勒。路德维希和玛吉特在法国阿尔卑斯度过了蜜月。这是他们生活中幸福时光的盛大开幕。现在,米塞斯可以多快好省地埋头完成他的巨著。而且他有时间和金钱可以和玛吉特度过一段快乐的日子(她的孩子住在寄宿学校,只有假期才和他们团聚)。

他们一起度过的时光对米塞斯人格的转变产生了深远而正面的影响。他的见解仍然顽固,举止仍然拘谨,但在待人接物方面,渐渐不再那么守旧。最重要的是,他的性情更加平和。过了几年,玛吉特曾深感惧怕的狂躁和发怒完全不再出现了。⁹³他非常需要她的爱,他也得到了。虽然她也有极强的个性,但却为了他的快乐而使自己的生活完全迎合他的需要。到达日内瓦后,她不得不重新开始。米塞斯的朋友魏斯-韦伦施泰因已经告诫过她,和米塞斯在一起的生活不会那么轻松。千真万确,最初他们的生活非常艰难。米塞斯直到婚后才把她介绍给自己最亲密的朋友,而且不忘告诫她:“在日内瓦,男人说话的时候,女人必须保持沉默。她们只能在一旁倾听。”⁹⁴甚至凯尔森和哈伯勒两位尽管是他们的证婚人,她也是婚礼前不久才认识的。而且直到此后玛吉特才搬入路德维希的公寓。到了那儿她才不出意料地发现,这是一个单身公寓:

732

家具非常高档,保养也好。但是整个公寓在我看来就像一个百货商店的陈列。又冷又没人情味。⁹⁵

不过从一开始,他的人格转变就已初显端倪。米塞斯改变了自己的态度。玛吉特不再只是朋友和恋人,现在她是冯·米塞斯夫人,是他一直渴望的伙伴,

他真切深沉的爱情的对象。这一转变如此彻底和剧烈,以致他后来甚至拒绝谈论婚前的十三年。“就像他把过去的岁月装进大箱子,藏在阁楼上,然后扔掉了钥匙。”⁹⁶对玛吉特来说,他与过去的彻底决裂将会一直成为重负,但是好处也是明显的:

733

自我们结婚那天开始,他就像变了个人。不是说他开始用礼物讨好我——他不会懂得这些,而是他身心放松、温柔亲切,眼睛闪着幸福的光芒。我做的每件小事都是他感兴趣的。对他来说世界已经变了……他对我的深情和爱意让我深受感动。他对我做的任何事都不会生气或不满,他也从不指责。直到他生命的尽头,没有一天他不对我说:“我爱你,亲爱的,噢……我多么爱你。”依我看来,直到婚后,他才第一次真正感到满足和快乐。⁹⁷

奥地利的事变使他们原来的很多维也纳朋友来到日内瓦,几乎就像回到了过去的时光:他们与海伦妮·利泽尔、路易丝·佐默、莉泽·贝格尔(Lise Berger)、汉斯·凯尔森和尼伦施泰因家的人一起享用午餐和晚餐。⁹⁸几乎每个周末他们都要驱车穿过法国边境,在米其林指南的帮助下,领略美味的法式料理和边境两边阿尔卑斯山区美丽的风景。在路途中,玛吉特勇敢地协助新婚丈夫。他的性格里肯定有爱冒险的一面,他很享受高速行驶的刺激和山路弯道的离心力。有一次他在其中一个弯道失控,车子突然倾往路边的篱笆,挂在山谷的悬崖边。夫妇俩紧张地屏住呼吸。幸好车子没有再动。接着他慢慢倒退回路上,更加小心、沉着地继续旅行。⁹⁹

734

另外还有几次恐怖经历,不过原因各不相同。有一天正在旅行途中,一辆黑色轿车拦住了他们,下来一个穿着黑色大衣的男人,对米塞斯说要和他谈谈。他要求米塞斯跟他坐上另一辆车,米塞斯当然拒绝了。黑衣男子语带威胁。幸好这时来了一位朋友,帮他们解了围。这位朋友是国联高官,一露面,这些陌生人就匆忙逃回车子离开了。米塞斯一家非常清楚,他们刚刚躲过了一起未遂的绑架。

此类事件促使他们考虑彻底离开欧洲移民美国。1938年秋他们认真考虑了这个选择。¹⁰⁰不过,留在瑞士的人身威胁并非唯一的考虑因素。米塞斯已经知道自己的学院财务困难,很有可能无法延续他的聘约。

瓦尔特·李普曼大会

婚后过了七周,路德维希参加了一个历史性的会议,“旧式”曼彻斯特自由主

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拥护者共同参与这次会议。他的新娘可能原谅了他,甚至可能陪同他去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举办地点在巴黎。

新自由主义最初纯粹是个非正式的现象,它的支持者几乎都是经济学家。他们通过几个学术机构组成的自发网络进行合作,例如位于巴黎的国际商会。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这个网络已经达到临界质量,可以在新的第三条道路的旗帜下组成一个更加正式的组织。新兴的新自由主义网络慢慢有了更加系统的形态,其中一个重要步骤是在1937年,美国记者瓦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出版了新自由主义宣言,题为《美好社会原则研究》(*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Good Society*)。¹⁰¹

735

这本书吸引了欧洲新自由主义者的注意,因为李普曼清楚雄辩地表达出他们内心深处对于当前政治和经济危机根源的想法。那些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人们虽然反对社会主义,但却不愿与自由放任的曼彻斯特教条扯上太多关系。李普曼不但反对老自由主义者,也反对同时代的社会主义煽动者。李普曼的中间路线立场迎合了同胞的实用主义心态。对于政治冲突,美国人倾向采取一种实际的研究进路,愿意通过协商和妥协解决问题。李普曼非常精明地把社会主义和曼彻斯特主义一同视为顽固的教条。他对比了这些“过激分子”和他自己专注实际的方案。这和两次大战之间新自由主义的欧洲大陆经济学家正好互相呼应,他们和李普曼的唯一区别,就是在对美好社会的设想的细节上存有差异。

其中一位是路易·鲁吉耶(Louis Rougier, 1889—1982),他是巴黎大学的哲学家,也是某个“多瑙河中心”(Centre Danubien)机构的主管。鲁吉耶认为李普曼的书是对最近一段时期自由主义学者逐渐形成的一致意见的精彩阐述,其中最著名的是米塞斯、罗宾斯、拉韦涅(Lavergne)、马利欧(Marlio)和吕夫的著作。¹⁰²他很快安排出版《美好社会》¹⁰³的法文版,并抓住机会在巴黎召集了一次为期五天的学术讨论会,“会议的意图是回顾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试图界定真正的自由主义学说、实行自由主义的必要条件,以及自由主义新的责任。”¹⁰⁴

736

此事发生在1938年8月26日至30日,地点是国际知识合作学院,聚集了许多很不一样的自由主义代表。他们分裂成了至少四个在历史、理论和现代自由主义政治议程方面观点截然不同的阵营。

第一阵营代表了新自由主义的主流,主张不仅在实践上,而且也在理论上推动与强制社会主义的妥协。他们愿意在任何个别问题上让步,以便自己的一般议题能更加迎合选民。他们的立场可以算作“市场优先”社会民主主义。

第二阵营人数较少,其中包括像哈耶克这样的人,他们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各个

方面均感不满,并且支持更大范围的政府干预。然而相比第一阵营,他们的基本兴趣在于个人自由,因此随着时间流逝,他们逐渐采取日益激进的态度,越来越倾向于古典自由主义立场。

737 第三阵营同样也是一个人数很少的群体,包括亚历山大·吕斯托(Alexander Rüstow)这样的人,对于自由主义的任何主张,他们都不乐意支持。他们的主要反对目标是平等主义,正如他们所鼓吹的。他们认为,为了维持自由社会,等级制度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只有等级制度下的威权才能有效传承自由的文化传统。法国大革命的大错就是不仅废除了旧制度下的强制等级制度,还废弃了等级原则本身。革命者狂热支持平等主义,于是就把自然等级这个婴儿连同强制等级这盆洗澡水一起倒掉了。

最后,作为第四阵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赞成19世纪的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基于他本人在过去十八年里提出的一个更加精致的理论基础。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不管是在自由至上主义圈内还是圈外,人们已经普遍承认米塞斯是当代曼彻斯特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¹⁰⁵

李普曼大会显示,米塞斯的三个洞见已经对新自由主义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他们本来觉得成熟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从经济上说是可行的甚至是值得向往的,但是米塞斯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计算是不可能的,这一论证促使他们放弃了一切此类想法。其次,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论证说服他们相信竞争定价是自由市场最重要也是决定性的特征。第三,他们赞同米塞斯关于自由主义的原创理论,其中强调私有产权秩序是唯一可行的劳动分工体系。

738 然而,后两个洞见逐渐被扭曲,以适应新自由主义的干预主义观点。米塞斯的意思只是说,只有存在私有产权的地方才有可能发生基于计算的劳动分工,但新自由主义者却试图操纵法律和司法体系以图“改进”本来应该出于政治自由放任主义的自发的劳动分工。对这些人来说,市场是极重要的,但是他们相信政府干预可以改善市场过程的“效率”和“公平”。与社会主义者不同,新自由主义者相信市场引导社会走向正确的方向,但与古典自由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们认为不受限制的市场不能发挥其真正潜力。

在《美好社会》(1945)德文第一版的前言中,威廉·勒普克强调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取向是社会机器的优化:

因此,问题不是:支持还是反对自由放任?而是:哪种司法秩序(*Rechtsordnung*)适合一个公正、自由、具有最高的生产力,并且基于一种复杂劳动分

工体系的经济体制?¹⁰⁶

他们就是这样理解米塞斯的社会体制理论。由于这种理解的影响,新自由主义者也重新解释了米塞斯关于竞争定价之重要性的洞见的意义。米塞斯曾经指出,一个合理的劳动分工可以仅仅基于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于是这又要求这些生产要素必须属于私人所有。但是,新自由主义者仅仅关注价格本身,却忽略了自由定价得以发生的条件。对他们来说,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的论证的实际结论,不是一般而言政府不应介入产权,而是应该避免干预具体价格问题。在大会上,李普曼因为区分了“市场兼容的干预”和不相容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干预而受到赞扬。¹⁰⁷只有直接干预价格机制的运作,才是非法的。如果政府懂得克制自己,仅仅限于控制法律框架,而市场参与者可以在这个框架下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追求他们的目标,那么这种干预按照新自由主义观点是无可厚非的。

739

战后新自由主义理论的统一原则就是试图在某些情况下为自由辩护,同时又在另一些情况下为国家支持的暴力辩护,而他们用的却是同一个理论。这些努力的最重要的成果是公共财货(public goods)理论和芝加哥(科斯)法与经济学理论。

米塞斯无情地批评了新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的意义的解释。按照他的观点,“价格机制的运行”和“市场框架”之间的武断区分是毫无意义的。政府干预的本质是侵犯私有财产权利,因此任何时候都会影响价格机制。的确,只有直接干预定价过程才会导致某些特定现象——最受关注的就是短缺和过剩,但还有很多问题也与经济计算有关。从根本上说,政府干预究竟是直接涉及价格的,还是通过价格形成过程的“框架”间接实现的,其实无关紧要;无论何种情况,市场价格都被扭曲了。

针对战后的计划

740

除了忙于他那本经济学大作(或者按照他现在的称呼——“行为学”),米塞斯同时也花了很多时间在文章和教学中探讨当前具体政治问题。¹⁰⁸他用行为学的一般原理解释纳粹的崛起,他还可能提出了希特勒之后时代的计划。他也在一本书稿和一些较长的便笺上写下了这些想法。

1938年,他已经完成了一部书稿,描述“德国人民走向国家社会主义的过程”——这是1940年7月的暂定书名,当时他把书稿的一份副本留给了同事波特。这本著作最终在1944年以英文发表,书名定为《全能政府》(*Omnipotent Govern-*

ment)。在这本书里,米塞斯精心阐述了自己在早年提出的论题,这些论题见于1919年的《民族、国家与经济》一书,其中他解释了德国帝国主义崛起的原因。现在他强调的是,国家主义的保护主义时代创造了战争激励。保护主义助长了某些国民支持政府实行保护主义措施的兴趣,虽然这些措施是以牺牲所有公民的利益为前提的。同时它也牺牲了外国人的利益,于是这些外国人便会通过颠覆那个政府维护自己的利益。后来米塞斯在一篇面向美国听众的论文里重新表述了这个观点:

741 老一代自由主义者的论证可以浓缩在一句话里:在一个自由世界里战争是无用的……这个法则是绝对正确的,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它的条件是“在一个自由世界里”……我们的世界完全不同,在这个世界里,你不能说战争是无用的。断定公民个人不能因为一场胜利的战斗而获益,肯定是不对的……在奉行国家干预主义的世界,一个国家的领土扩张对于每个国民都是极端重要的。领土越大,他从自己政府获得的利益也就越大。每次新的征服都会减少对他的歧视的范围。¹⁰⁹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米塞斯已经开始思考战后面临的问题,他绝对肯定希特勒将会输掉这场战争。1940年5月战火终于烧到西方世界,这时米塞斯已经得出结论:战后一段时期的主要经济问题将是资本短缺。为了吸引外国资本,刺激资本积累,政府将会被迫接受对其主权的大幅削弱。

为了外国资本,这些国家将会被迫放弃货币、信用、贸易和税收领域的一切权力。它们将会被迫无条件地服从国际法庭的司法管辖,并且接受一支国际警察部队执行这些法庭的决定。

米塞斯承认,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奇怪,但是一国政府可以自由选择是否接受这些条件以便得到外国资本,同时会有充分的政治原因促使它们放弃国家主权。

742 小国必须得到有效保护,免于大国侵略。国际警察必须阻止那些试图秘密重整军备的国家实行它们的计划。破坏和平的政府必须受到严惩,参照各国惩处劫匪和杀人犯的方式。¹¹⁰

1940年5月,米塞斯已经仔细拟定了一份非常详尽的奥地利战后重建计划。这个计划颇有意思,因为(1)这是他所从事的应用工作的典型代表,这些应用工作包括他在商会背景下的活动;(2)这份计划表明米塞斯扩大了市场经济框架内政府活动所能允许的范围。¹¹¹

在米塞斯看来,奥地利只有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才能养活650万人口,而这就需要企业家的活动,因为只有他们知道如何服务于世界市场。这是他的思考起点。旧奥地利曾经拥有大约一千个这样的人。现在,这些企业家都不在了,因为政府、工会和整个国家发起了一场反对他们的战争。其中至少三分之二是犹太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念,他们的企业是“雅利安化”的,工人和生产方式就是企业的全部:企业家只是剥削者。“然而,缺了企业家的精神和活力,企业就是一堆废铜烂铁。”由于外汇管制和中央计划,即使那些没有遭到杀害或拷打的企业家,也无法继续他们的事业。

因此,不久后奥地利将会面临远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困难得多的处境,因为尽管政府制造了重重阻挠,当时正是那些富有创新精神而又勤勉肯干的企业家拯救了国家。这次奥地利不能指望战后外国资本输入了。

米塞斯的战后正面计划包含几个标准的古典自由立场,例如,通货必须基于黄金,中央银行必须保证按照法定比率兑现纸币和活期存款;不得允许外汇管制,并且奥地利必须遵循严格的自由贸易政策。¹¹²

不过,米塞斯也建议了几项政府干预的措施。他说,奥地利绝对不能对奢侈品课征进口税(这意味着对其他商品征收进口税),因为奥地利出口的主要部分就是这类商品。出于公众健康和动物检疫方面的原因实施进口禁令是合法的,另外,政府必须维持军火进口。出口禁令只在政治局势紧张的时期出于军事方面考虑才可允许。与此类似,只有涉及军火、毒品和毒药的生产和交易,才能允许限制商业活动。

米塞斯支持彻底的政治中央集权计划。谈到征税制度,他说:“一切税收和关税都应直接归于国家。社区机构没有征税的权力。他们的权力来自国家。”¹¹³为了避免“代价高昂的双重管理”,只应允许国家指挥全部县级行政系统。国家的中央机构以下只有一个层次,就是县级行政分支和法院。社区机构必须执行一般立法为其指定的任务。它们的唯一收入应该来自国家,以及国有企业和资产。这一超集权结构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贪污腐化和公款浪费。邮政、电信和电话系统将由维也纳的邮局独家经营。公共行政系统的就业应该依照法国竞争体制加以管制,以便阻止保护主义、任人唯亲和贪污腐化。

743

744

米塞斯接着讨论了如何处理曾在纳粹手下干过的奥地利政府官员。他们是否可以继续留任公共服务机构,必须根据“国家利益”逐一审查。

教育系统“必须完全重建”。¹¹⁴小学(Volksschule)应收归国有,并且所有高等教育机构都由教育部直接负责。米塞斯甚至提出了一些关于具体教育内容的建议:文理中学学生必须学习英语和法语,同时考试要求应该大大提高,因为“只有极其出色和勤奋的学生才值得国家为他们的教育支出专项经费”。¹¹⁵

米塞斯对奥地利大学的批评是非常严厉的。它们的开支不断增长,科学水平反倒越来越低。因此,维也纳大学必须在西欧学者和执教海外的奥地利裔教授的帮助下重建。格雷茨和因斯布鲁克的大学必须全部关闭,因为它们很久以来就已丧失了自称大学的资格。¹¹⁶

为了缓解战后资本的稀缺,米塞斯建议面向外国资本家和企业家大力宣传新奥地利的自由贸易政策,同时,吸引旧奥地利的企业家返回祖国。¹¹⁷他还建议研究“法国文化宣传的手段”,通过介绍“奥地利儿女辉煌的文化成就”,提高奥地利在世界上的形象。¹¹⁸因此,奥地利代表的推选必须更加谨慎。奥地利应该只派这样的人吸引西方资本:“他们由于巨大的科学成就或其他杰出品质而享有崇高的个人声誉,因此,可以凭借此种名望传扬奥地利的主张,如果没有他们,这种宣传就会暗淡得多。在这点上,法国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¹¹⁹

这些建议,米塞斯从未以个人名义付印出版。他一直严格区分自己的学术著作(他在其中是毫无保留的)和他作为一名经济和政治顾问所写的东西。他的奥地利战后重建计划属于后者。¹²⁰这个计划运用了他的科学洞见——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在奥地利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合宜的和不合宜的政策洞见,同时也考虑了实际运作的政治力量,以及报告的目标读者的政治倾向。

逃离欧洲

1939年的夏天格外美丽。路德维希和玛吉特在艾克斯莱班(Aix-les-Bains)度过了假期,那儿有壮丽的阿尔卑斯风景,几乎可与他们在奥地利常去的度假胜地巴德加施泰因媲美。¹²¹里夏德·冯·米塞斯在前往美国的途中拜访了他们。他在6月已经得出结论,认为土耳其不再安全了,因此决定接受哈佛大学的一个访问职位。¹²²很快他就会明白这个决定多么及时。

1939年9月1日战争爆发,此时米塞斯极有可能已在审阅《国民经济学》校样。奇怪的是,战争最初的八个月,西线完全没有动静。法国和英国政府已经对德

宣战,履行它们对波兰的承诺。但它们什么也没做,袖手旁观德国军队在两周内占领波兰,甚至未对同时入侵波兰的苏联宣战,尽管希特勒和斯大林瓜分波兰的秘密协定昭然若揭——他们延续了腓特烈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传统。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法国和英国完全没有做好投入一场新的战争的准备——不管是军事上、经济上还是心理上。这时存在一种普遍的情绪,尤其是在法国,认为上述原因并不值得发动另一轮大屠杀。他们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得莫名其妙、白费力气,而且《凡尔赛和约》虽然让德国屈辱,却并未创造正义。条约通过建立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诸国,为这些原来的少数民族提供了保护,但是德国仍在那里虎视眈眈,如今新的压迫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波兰人的遭遇比起1914年之前在德国和奥地利治下没有什么实际分别。德国人在希特勒的领导下终于开始保护他们在东方的国外同胞,而大量西欧人却感到这一外交政策是无可非议的。这一态度并不说明人们的消极或冷漠,它是那个时代支配整个西方的政治教条的自然后果,这个教条就是:民族自决是最高政治原则。

不过,虽然大部分西方公民没有感受到德军对他们生存的威胁,他们的政府却已清楚表明了自己的立场。1939年9月,西方列强决定阻止希特勒,但这个决定只是道义呼吁——不仅如此,即使这样一个决定也是三心二意的,并且由于布尔什维克在日内瓦多年以来的“反法西斯”游说而遭损害。不过这毕竟是一个开始,最终这项努力将会导致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

米塞斯没有谈过这个问题,但是,玛吉特开始不安。她对德国入侵有所预感,于是请求米塞斯考虑移民美国或其他地方。虽然不太情愿,米塞斯还是在与弟弟里夏德和弗里茨·马克卢普的通信中讨论这一可能——他们两位已经到了大西洋彼岸。¹²³马克卢普曾经提过一个“加利福尼亚假期”的想法,邀请米塞斯和本杰明·安德森以及另外几位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朋友一起参加。此时安德森刚刚来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他是当时仍然籍籍无名的经济系最有影响力的人。UCLA表示很感兴趣,系主任写了两封信给中间联系人马克卢普。但在这个过程中,事情变得非常混乱。最初,马克卢普告诉米塞斯UCLA只能提供相对较低的薪水,因此米塞斯拒绝了。¹²⁴米塞斯请他的朋友转告系主任佩格勒姆(Dudley Pegrum),自己的奥地利护照已经过期,因此他暂时不能接受这个聘约,如果这个邀请能够推迟一年,他将非常感激。米塞斯的信还在路上,马克卢普再次来信,指出UCLA的邀请将会“为他取得一份美国的永久非配额移民签证,这在目前可以算是一笔财富了”。¹²⁵这个理由说服了米塞斯。与此同时,他又收到朋友翁格尔(Unger)的越洋电报。翁格尔在日内瓦时是米塞斯的学生,现在在纽约。他以电

749 报文体告诉米塞斯,这个决定是个错误。2月28日米塞斯一收到马克卢普的来信,立即回信表示自己的护照和签证问题已经解决,将前往加利福尼亚。如果他的回信通过越洋电报发给马克卢普,1940年8月时米塞斯可能已经在加利福尼亚开始了新生活,以后的历史也会变得不同。但是米塞斯通过平邮寄出了回信,当马克卢普收到回信时,已经替米塞斯回绝了聘约。于是马克卢普又写了一封信给安德森“试图尽量婉转地提出重新协商”,但他收到了一份安德森的秘书的回信,说老板正在休假。¹²⁶一个月后,佩格勒姆明确回绝了他的要求。

* * *

与此同时,米塞斯自己也和安德森保持联系,虽然没有涉及什么重要问题。1940年3月,《国民经济学》已经付印,但是尚无迹象表明战火很快会烧到西欧。¹²⁷对于西方国家的多数公民来说,他们觉得这种情况也不一定发生。本杰明·安德森在洛杉矶新的职位上写信给米塞斯,说他有意夏天来访欧洲。他还犹豫不定,不过不是因为害怕危险:

750 我的感觉是,现在这个时候前往欧洲,哪怕是到中立国家,就像来到一个朋友家里,而这朋友的家人却在接受手术,在这些忙碌而警惕的人中间,我可能只会成为额外的负担,因为比起和外国经济学家讨论问题,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¹²⁸

米塞斯在回信中向他的美国朋友保证,这些担心都是没有根据的:“你怀疑现在访问欧洲是没有意义的。但是现在正是你来这里了解事态进展的最佳时机。”¹²⁹

米塞斯曾经深信不疑,新的大战将以上次战争结束的方式开始——战壕。他深信法国及其盟国将会抵挡德国的任何进攻。现代技术已使防御成为最有效率的军事策略:

旧式战役允许一方绕过敌方的侧翼,但在伟大的欧洲战争剧场上,这个时代已经逝去。因为现代武器和通信技术重新塑造了军队和战术的巨大规模,这样就为消除侧翼攻击威胁,实现新的军队布阵方式提供了可能。现在侧翼只在海洋或者中立领土,已经无法绕过。只有正面攻击方式仍然保留下来,但是面对装备同样精良的敌人,正面攻击恐怕也难奏效。¹³⁰

因为心里存着这样令人欣慰的想法,米塞斯才有心情捧着自己的毕生杰作、刚刚装订好的《国民经济学》,陶醉其中。但是他的快乐没有维持多久,很快就被一个意想不到的惊人消息压倒了。1940年5月,德军结束了“假战争”,开始以一系列闪电战蹂躏西欧。米塞斯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他没有意识到,形势已经再次发生了深刻变化。装甲师已经能够快速攻击哪怕非常庞大的军队的侧翼,尤其是在空军掩护下。两次世界大战间期,少数军事理论家已经察觉这一威胁,但是直到1940年春,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General Heinz Guderian)及其麾下才使这一威胁成为事实。¹³¹米塞斯几乎不敢相信他在报纸上读到的消息。“比利时!荷兰!”他在5月10日的笔记本上惊呼。此后不到两周,古德里安抵达海峡,切断了盟军的供给线。敦刻尔克的英国人狼狈撤退,于是德国人开始一个个地蚕食剩下的大约八十个左右法国师团。¹³²6月14日,米塞斯再次惊呼:“巴黎!”三天之后则是“停战!”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按照他后来的回忆,1940年5月是“欧洲有史以来最悲惨的一个月。”¹³³这是他在预测重大政治事件或经济事件方面所犯的唯一一个错误。

751

随着盟军在敦刻尔克溃败,米塞斯明白不久后就无法离开日内瓦了,也许几天,也许几周,只是时间问题。他在日内瓦的居留很快就不再安全。他必须有所行动。他是德国政府的通缉要犯,在黑名单上排名靠前。德国人已经试过绑架他,几乎就要得逞。他们还向瑞士当局施压,要求交出米塞斯。瑞士拒绝了,但他们曾向米塞斯透露,这样决定乃是出于仁慈,另外,他的签证仍要每年续签一次。虽然德国人还在阿尔卑斯山的另一侧,但对他而言,情况已经相当危险(也很无礼)。如今,轴心国军队几乎从四面八方包围了瑞士,米塞斯感到自己在日内瓦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752

汉斯·凯尔森和威廉·勒普克也面临相同处境。至少有一段时间,拉帕特和芒图计划为他们三人提供在维希法国的工作岗位。但谁也不会相信这是一个充分的保障,接下来的几周,他们积极寻求前往美国的机会——法国投降不到两周,他们都得到了这样的机会。¹³⁴米塞斯和勒普克拿到前往美国的邀请函后,重新权衡了再次移民的利弊。最终,米塞斯和凯尔森离开了,而威廉·勒普克留在了瑞士。勒普克也是纳粹通缉名单上的要犯,因此,他的命运取决于瑞士当局。但是他有勇气,而且确信朋友的影响力能够帮助他留在这个国家;他相信西方世界迟早会打赢这场反对德国的战争,就像上次那样。¹³⁵这显然是他们圈子的普遍看法。哈耶克致信米塞斯说:

753

我完全赞同你对未来的看法。我一点也不怀疑我们将面临一段可怕的时期,不过最终我们将会胜利。但是旧的欧洲,我们再也无法看到……看来并非不太可能的是,未来一段时日,我们可能全都要在大洋彼岸重新团聚。我并不想在战争继续的时候逃跑,不过也许离开以后我会发现,如果要继续工作,我可能不得不追随你。¹³⁶

事后回想,人们可能觉得勒普克的决定是正确的。米塞斯本来可以留在日内瓦。他一生中最幸福的一些年头就在那里度过,而且在那里拥有理想的学术工作环境。从个人来说,迁居美国是一个不幸。但是如果米塞斯留在欧洲,今天的思想领域和整个世界将会变得怎样?他可能永远不会用英语写作。《人的行为》可能不会问世,因此,那些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纽约深受米塞斯影响的才华横溢的学生,可能也就无法看到此书——今天,正是那些学生在继续传播米塞斯的思想。

* * *

754

于是,米塞斯接受了伯克利(Berkeley)的一个邀请。这是5月16日在马克卢普安排下通过无线电报发给他的。¹³⁷他很快开始办理出国手续——签证、从里斯本到纽约跨越大西洋的旅费,等等。不过,这些事情费了几周,事实表明这段等待时间有点太长了。凯尔森已于5月28日搭乘最后一班航班离开瑞士,从洛迦诺飞往巴塞罗那。路德维希和玛吉特准备走的时候,意大利已经参战,并且加入德国一边,袭击法国的东南侧翼。虽然意大利的突击没有成功,但是,通过航班飞离瑞士已经不可能了。德国和意大利军队即将完成对瑞士的包围。他们已经控制空中交通,并将禁止未经许可的飞机离开这个国家。现在只剩一条逃离路线:搭乘巴士,但是他们必须等到7月3日才能顺利通行。¹³⁸那是一个星期三,当天下午他们得到通知,次日上午6点钟他们可以搭上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的汽车离开。时间紧迫,虽然他们的箱子很多天前就已收拾好了,仍然没有时间最后拜访一次芒图和拉帕特。米塞斯写了一封信和他们道别,然后离开了。¹³⁹

755

德国人尚未占领瑞士和西班牙边界之间的全部法国领土,但他们的军队已在一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路口设立了检查站。因此,汽车司机只好开车穿过德国防线,尽量避免与他们直接接触。幸运的是,司机经验丰富,为人谨慎,而且还得到了当地居民的帮助。他一次又一次停下来与人交谈,他们会告诉他前方道路德军的行踪。然后他就离开公路,绕到一些更加隐蔽的乡间小路,常常这样开出好几英里。透过车窗,乘客可以看见一些妇女排队领取面包。他们得知,黄油已经没有

了,肉类也变得非常稀缺。这辆主要运载犹太难民的巴士缓慢而坚定地穿过法国东南省份。每次逗留都让他们倍感焦虑,每次听到前方德国军队的一点消息都让他们充满恐惧,每次绕道而行都在侵蚀他们的勇气。玛吉特对坐在前面的一对夫妇——年轻的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和他怀孕的妻子感到心烦,因为他们坚持一直开着车窗。焦虑。旅途似乎无穷无尽,终于,一天傍晚,他们到达了挨着法国塞贝尔(Cerbères)的西班牙边境。

他们在西班牙当局的检查站得知,边境已经关闭了一周。只有美国和英国公民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获准进入西班牙继续旅行。次日,瑞士公民同样出于外交理由获准入境——这意味着,葡萄牙人以及出身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旅客困在边境上了。他们在法国一侧的旅馆住了一晚,米塞斯和玛吉特订了个便宜房间。西班牙官员建议他们去找附近城市佩皮尼昂(Perpignan)的西班牙领事。领事发现他们的法律文件非常齐全,于是写了一封推荐信给边境官员,但却完全无用。现在边境官员坚持他们必须得到马德里的特别批准,而且声称(后来证明是错误的)这些旅客的葡萄牙签证不再有效。

这是周六。已经过去两天。纳粹军队距离塞贝尔还有多远?米塞斯必须行动起来。周六下午,他做了所能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发了封电报向威廉·拉帕特和路易·鲁吉耶求助。¹⁴⁰

756

鲁吉耶已经加入马歇尔·贝当(Marshal Pétain)的新法国政府。马歇尔·贝当已是八旬老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享有盛誉,这段经历使他成为法国最伟大的英雄。现在他已同意在这个国家最黑暗的时刻出面担起领导重任,因为那些带领国家陷入目前溃败局面的人已经放弃了他们的职责,惊慌失措地逃离了这个国家。他能依靠的只有极少数人,其中之一就是鲁吉耶,他任命鲁吉耶担任他与同盟国英国之间的外交联络官,如果可能的话,也负责与西班牙之间的联系。因此,鲁吉耶可以通过私人关系为米塞斯和车上其他处于困境的乘客求情。不管怎样,米塞斯设法联系上了鲁吉耶的办公室,并被告知前往佩皮尼昂的西班牙领事处取得新的签证。与此同时,拉帕特帮忙解决了葡萄牙签证的问题。

7月8日,周一,米塞斯只身乘坐火车前往图卢兹,带着和他同行的所有滞留乘客的护照。他在图卢兹得到了新的葡萄牙签证,然后再去佩皮尼昂盖上新西班牙图章。直到深夜他才回到边境小镇,其他旅客都在那里焦急等待。除了葡萄牙人,他为所有人带回了新的签证。

次日上午,汽车重新开回边境控制站,这次他们可以通过了。正如米塞斯后来所写的,经过六天停顿,“似乎毫无希望的非常困难的处境”,这些旅客又获得了新

的生机。¹⁴¹

* * *

757 几小时后,他们到达了巴塞罗那,在那里,他们预订了飞往里斯本的下一趟航班的座位。到达葡萄牙后,米塞斯立即联系了他的旅行社。但是他们预订的轮船已经离开了。现在可以订到的最近的轮船,要到三周后才会起航。米塞斯安排了两个航程作为候补。他们在帕克酒店(Park Hotel)租了房间,其间只打开了一个箱子,其他箱子原封未动,以便随时可以离开。

结果,他们在里斯本只待了几天。玛吉特惊讶地看到,丈夫似乎到处都有朋友和同事——这个城市全是等候前往美国的外国人。他们拜访了几位学者和以前国际商会的同事。玛吉特本人关心的主要是女儿的命运。哈耶克咨询过她在法国的学校校长,但没有联系上。

1940年7月25日,周四上午,玛吉特接到旅行社的电话。一艘船有空余的客舱,几小时内就要离开。他们得快一点。

当天,路德维希和玛吉特·冯·米塞斯登上一艘名为“欧罗巴号”的邮轮,离开了欧洲。大约八年后,米塞斯才重新踏足大西洋东岸。但那时他已是美国公民,正在美国着手重建奥地利经济学派。

注 释

1. 参见一次访谈的报道,“Von Mises to Speak Tonight,” *Santa Ana Register* (October 17, 1944); 副本见 Grove City Archive: Hoiles files。

2. 拉帕特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34年3月19日;米塞斯致拉帕特,信件标注日期为1934年3月23日;Grove City Archive: Graduate Institute Archive。

3. 商会办公室主任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34年10月31日;Grove City Archive: Kammer für Handel, Gewerbe und Industrie files。这份文件也谈及1936年和1937年的薪水问题。在这两年,米塞斯的年薪为14 620先令。

4. Martine Brunschwig Graf, Jean-Claude Frachebourg, Norman Scott, and Peter Tschopp, *HEI 1927 - 2002* (Geneva: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2), p. 40. 又见 p. 50。

5. 他的母亲是巴塞爾霍夫曼-拉羅氏家族(Hoffmann-Laroche)的后裔。1919年7月,拉帕特成为新的红十字会联盟(League of Red Cross Societies)的秘书长,1921年卸任。1919年之前,他已经是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委员。他的代表作为 *Die Bundesverfassung der Schwei-*

zer *Eidgenossenschaft*, 1848–1948—*Vorgeschichte, Ausarbeitung, Weiterentwicklung* (Zurich: Poly-graphischer Verlag, 1948)。

6. 参见利奥波德·布瓦西耶(Léopold Boissier)和卡尔·J.布尔克哈特在拉帕特家族编辑的纪念文集集中的证言: *William-E. Rappard* (Geneva: Kundig, 1961), pp. 45, 57。

7. 正是这位弗莱克斯纳写了著名的弗莱克斯纳报告(Flexner Report): *Medica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A Report to 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 (1910)。这篇报告导致美国六所医学院关闭了四所。

8. Brunschwig et al., *HEI 1927–2002*。特别有趣的是关于1927年至1978年的部分,由诺曼·斯科特(Norman Scott)执笔。

9. *Ibid.*, pp. 37, 72, 81。

10. 战争期间,他曾担任他的大学朋友艾伯特·托马斯(Albert Thomas)和劳合·乔治之间的私人翻译,后两人都曾接受委托协调英国和法国军需工业的重组。战争结束时,乔治已是首相,托马斯也很快当上了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的主席。“大局已定。芒图创立了新的事业。”(*ibid.*, p. 51)

11. 参见1934年7月9日的无标题声明打印稿;Grove City Archive: Kammer für Handel, Gewerbe und Industrie file。迈克尔·海尔佩林(Michael Heilperin)后来声称,拉帕特和这些经济学家与夏尔·里斯特、雅克·吕夫(Jacques Rueff)、雅各布·瓦伊纳和莱昂内尔·罗宾斯有着特别密切的联系。参见 *William-E. Rappard*, p. 78。

12. 阿尔弗雷德·齐默恩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29年12月12日;Grove City Archive: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Internationales files。齐默恩是日内瓦大学教授,也是知识合作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的国际事务主管。学院成立之前,他曾多年组织“国际事务暑期学校”——齐默恩学校。此后他转到牛津大学。参见 Scott in Brunschwig et al., *HEI 1927–2002*, p. 29。

13. 这一密切的财务联系(依赖)未受各方重视。1942年,特蕾西·基特里奇写信给美国国务院说:

基金会十多年来已经非常熟悉冯·米塞斯教授的工作,并资助了他在维也纳和日内瓦主持的研究项目,也支付目前他在国家经济研究局的津贴。

基特里奇致艾奇逊(Acheson),信件标注日期为1942年1月5日;Grove City Archive: Mexico 1942 files。事实上,洛克菲勒基金会全额支付国家经济研究局的津贴。

14. 1933年凯尔森被赶下了科隆大学的讲坛,随后收到来自高级国际关系学院、伦敦经济学院和新社会研究学院的聘约。语言问题使他选择了日内瓦,因为那里的教授可以使用法语授课。参见 Rudolf Aladár Métall, *Hans Kelsen* (Vienna: Verlag Franz Deuticke, 1968), p. 64。

15. 米塞斯致威廉·赫兹(Wilhelm Hertz)(日内瓦),信件标注日期为1961年11月9日;Grove City Archive: “H” files。在这封信中,米塞斯回忆了那些平静的岁月,那时他与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一起研究和交流,其中特别提到了上述四位。

16. Neil de Marchi, “League of Nations Economists and the Ideal of Peaceful Change in the Decade of the ‘Thirties,” C. D. Goodwin, ed., *Economics and National Security* (Durham, N. C. :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43 – 78.

17. Scott in Brunschwig et al., *HEI 1927 – 2002*, pp. 53f. 芒图并不是一直都在学院——1928年他就已经举家迁往巴黎了,因为这座塞纳河畔的城市为他的孩子提供了更好的教育环境,而且也因为他一直在整理凡尔赛会议的官方记录。因此,在同一年,拉帕特担任了学院的助理院长(co-director)。

18. Rappard quoted from Scott in Brunschwig et al., *HEI 1927 – 2002*, p. 56.

19. 拉帕特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34年3月19日;Graduate Institute Archive。美元价值可以根据以下数据计算:20 瑞士法郎 = 0.1867 盎司黄金;35 美元 = 1 盎司黄金。这份合同的核心条款(3 小时授课,25 000 瑞士法郎年薪)一直沿用到他在学院的整个任期结束;参见安德烈·米萨尔(André Mussard)(学院秘书)的证明,标注日期为1940年6月6日;Graduate Institute Archive。

20. 哈耶克致米塞斯的信中对亚当·斯密的引用,信件标注日期为1937年10月15日;Grove City Archive; Hayek files;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了很多,并且非常仔细地考察了欧洲一些主要大学的体制和历史;我对自己的发现感到满意:在欧洲的几乎每个角落,大量此类团体已经退化和堕落,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一些大学发给教授的高额薪水,而且这些薪水几乎与他们的工作强度完全无关。

21. 米塞斯致鲁道夫·贝特霍尔德(Rudolf Berthold),信件标注日期为1959年11月4日;Grove City Archive: Berthold file。

22. 米塞斯致马克卢普,信件标注日期为1934年10月23日;Hoover Institution; Machlup-Mises correspondence file。

23. 这一信息来自1939—1940学年的学院情况总览。

24. 帕克·T.哈特写给纽约国际教育学院的一份报告摘要的打印副本。拉帕特从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校长罗恩先生(Mr. Rohn)那里得到了这份报告的副本,罗恩组织过美国和瑞士之间的学生交换项目。参见拉帕特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37年3月25日;Graduate Institute Archive。

25. 哈伯勒后来专门提到了J.马库斯·弗莱明(J. Marcus Fleming)和亚历山大·卡夫卡(Alexandre Kafka)。参见Gottfried von Haberler, “Mises’s Private Seminar” in “Erinnerungen an das Mises-Privatseminar,” *Wirtschaftspolitische Blätter* 28, no. 4 (1981): 123。

26. Hal Lary quoted from Scott in Brunschwig et al., *HEI 1927 – 2002*, p. 67.

27. 参见销售合同(标注日期为1936年9月30日)和他的驾驶证(标注日期为1936年11月13日),现藏Grove City Archive; file # 6/10/1/1。这辆轿车的售价为5900 瑞士法郎,大约是他年薪的四分之一。

28. Margit von Mises, *My Years with Ludwig von Mises*, 2nd enlarged ed. (Cedar Falls, Iowa; Center for Futures Education, 1984), p. 27.

29. Margit von Mises, *My Years with Ludwig von Mises*, 2nd enlarged ed. (Cedar Falls, Iowa; Center for Futures Education, 1984), p. 27.

30. 在1965年的一次会议上,马克卢普把恢复金本位制的努力归结为特殊利益政治。

米塞斯当时也在现场,从那以后他就拒绝与马克卢普交谈。据他夫人所言,米塞斯说:“他上过我在维也纳的讨论课……他对这些问题一清二楚。他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知道得更多,而且他也完全清楚他在做什么。”Margit von Mises, *My Years with Ludwig von Mises*, p. 146. 马克卢普关于这一事件的评论参见 *ibid.*, pp. 192f.

31. 米塞斯致马克卢普,信件标注日期为1936年1月11日;Hoover Institution; Machlup-Mises correspondence file。

32. 米塞斯致马克卢普,信件标注日期为1937年6月29日;Hoover Institution; Machlup-Mises correspondence。

33. Scott in Brunschwig et al., *HEI 1927-2002*, p. 63.

34. 这些讲座的成果是一本题为《国际经济计划》(*International Economic Planning*, London: Macmillan, 1937)的书。

35. 米塞斯致罗宾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35年12月10日;Grove City Archive; Robbins file。米塞斯评论了罗宾斯的《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第二版(London: Macmillan, 1932),尤其是罗宾斯对“经验”一词的用法。米塞斯谈了套套逻辑(tautologies)的意义和作用,然后指出他是从迈尔松(Meyerson)那里学到的。参见Émile Meyerson, *De l'explication dans les sciences* (Paris: Fayot, 1927)。

36. 关于奥地利学派对罗宾斯思想发展的影响的简要介绍,参见Denis P. O'Brien, “Lionel Robbins and the Austrian Connection,” Bruce J. Caldwell, ed., *Carl Menger and His Legacy in Economics*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55-84。奥布赖恩强调了罗宾斯无处不在的折中主义。他指出,在罗宾斯身上,维塞尔和迈尔的影响始终是与米塞斯相匹敌的,如果没有超过的话。

37. 这个存款账户在《货币与信用原理》出版后是有相当资产的。1936年2月,米塞斯在这个账户拥有237英镑以上;到了1939年5月,已经将近780英镑。参见哈耶克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36年2月15日,以及关于1939年5月之前账户明细的打印资料,Grove City Archive; Hayek files。

38. 哈耶克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1年1月12日;Grove City Archive; Hayek files。

39. 马克卢普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34年9月25日;Grove City Archive; Machlup files。马克卢普问卷原件的副本,以及米塞斯、哈耶克、哈伯勒、马尔沙克(Marschak)和马克卢普本人答卷的副本,也在同一个档案里。一年后,摩根斯特恩驳斥了平均生产时期足以衡量资本强度(capital-intensity)的观念。参见Morgenstern, “Zur Theorie der Produktionsperiode,” *Zeitschrift für Nationalökonomie* 6 (1935): 196-208。历史学家哈拉尔德·哈格曼(Harald Hagemann)认为,这个批评对于哈耶克在后来的著作中放弃生产时期概念起了一定作用。参见Hagemann, “Einführung,” Harald Hagemann, ed., *Zur deutschsprachigen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ichen Emigration nach 1933* (Marburg: Metropolis, 1997), pp. 13f。

40. F. A. Hayek, ed.,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Critical Studies on the Possibilities of Socialism* (London: Routledge, 1935)。此书附录收入了巴罗内1908年的文章,认为社会主义管理委员会可以利用全局均衡方程系统作为制定计划的工具。

41. Hayek, "The Nature and History of the Problem," in *ibid.*, p. 33.

42. Hayek,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Debate," in *ibid.*, pp. 208ff. 哈耶克对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的看法与众不同,这是因为他接受了全局均衡数理分析,将其视为现代经济科学最前沿的表述。这是已为各方正确注意到的。例如:

伦敦经济学院的哈耶克教授和罗宾斯教授是继米塞斯之后经济学家中最主要的社会主义反对者。他们显然深受巴罗内的影响。他们发起了第二轮攻击,一般来说,这轮进攻是在承认一个基本原则后才会有有的。他们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一种理性的资源配置,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是他们否认了这在实践上的可行性。(Benjamin E. Lippincott, "Introduction,"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ed., B. E. Lippincott [New York: McGraw-Hill, 1964], p. 13)

43. Hayek,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Debate," p. 238.

44. 他在最初的1920年论文中已经指出了这些问题,并且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始终贯穿这些。例如,参见 *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Irvington-on-Hudson, N. Y.: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2002), p. 110.

45. Mises, "The Equations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and the Problem of Economic Calculation in a Socialist State,"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3, no. 1 (2000). 本文最初是用德语写的,但未发表。加斯顿·勒迪克(Gaston Leduc)的法文译本1938年发表于 Charles Rist's *Revue d'économie politique* 97, no. 6 (1938): 899-906。此处引用的英文译本是由薇拉·史密斯(Vera Smith)翻译,最初是为《经济学》杂志准备的,但没有发表在那里,因为杂志的编辑委员会拒收所有曾在其他地方出现的投稿。

46. 哈耶克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38年10月20日;Grove City Archive: Hayek files。

47. Hans Jörg Hennecke,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Düsseldorf: Wirtschaft und Finanzen, 2000), pp. 131-34. 作者引用了1981年哈耶克写给特伦斯·哈钦森(Terence Hutchinson)的一封信:

不过,我在1936年演讲的主要目的是委婉地向米塞斯解释为什么我无法认同他的先验论。米塞斯通常不太接受后进学者的批评,然而奇怪的是,他接受了我的论证,但却坚持认为这与他的观点没有冲突。

48. 参见上书“风云变幻”一章中的“维塞尔的漫长阴影”部分。

49. 哈耶克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37年5月10日;Grove City Archive: Hayek files。

50. 关于19世纪资本主义历史表现的错误看法,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纠正过来。F. A. Hayek, ed., *Capitalism and the Histori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4)是一个微弱的开始。

51. Hayek, "The Nature and History of the Problem," in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p. 135.

52. H. C. Simons, *A Positive Program for Laissez-Faire. Some Proposals for a Liberal Economic Policy* (Public policy pamphlet no. 15;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4).

53. 他们中的一些人,尤以哈耶克最为著名,后来转向了一种更加接近自由放任主义的立场。但是,发生这一转变的时候,新自由主义的蒸汽压路机已经势不可挡了。

54. 关于这些事件的亲历描述,参见 Sisley Huddleston, *In My Time* (New York: Dutton & Co., 1938)。米塞斯也是一位亲历者。他评论了苏联策略的转变,参见 *Theory and History: An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Evolutio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350。

55. 西方新闻记者和知识分子在掩饰苏联政权的真实面貌上扮演了一个可耻的角色。例如,参见 Sally J. Taylor, *Stalin's Apologist: Walter Duranty, the New York Times's Man in Mosco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以及 Paul Hollander, *Political Pilgrims*, 4th ed. (New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1998)。

56. John T. Flynn, *The Roosevelt Myth* (New York: Devin-Adair, 1948); reprin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alph Raico (San Francisco: Fox & Wilkes, 1998)。

57. 关于这些新的法律和机构,这里仅举以下几例: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1933)、建立价格管制体制的《农业调整法案》(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 1933)、根据《国家工业振兴法案》(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设立的国家复兴管理局(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试图建立强制工会的《瓦格纳法案》(Wagner Act, 1935)、征收74%利润的未分配利润税(1936)、确立更高的最低工资标准和每周40小时最高工作时间的《工资工时法案》(Wages and Hours Act, 1938)。

58. 这是米塞斯为 A. S. J. Baster, *Le crépuscule du capitalisme américain—étude économique du New Deal* (Paris: Librairie de Médicis, 1937)写的序言的第一段。

59. 事实证明这些预感是有道理的。参见 Thomas DiLorenzo,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s New Deal: From Economic Fascism to Pork-Barrel Politics,” John V. Denson, ed., *Reassessing the Presidency*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01), pp. 425–51。

60. 参见 *El Sol* (May 31, 1936)头版。副本现存 Grove City Archive: Madariaga file。

61. 米塞斯致马克卢普,信件标注日期为1936年6月;Hoover Institution: Machlup-Mises correspondence。

62. 米塞斯致鲍斯(Baus),信件标注日期为1938年11月6日;Grove City Archive: Baus file。

63. John Maynard Keynes, *Collected Writings* (London: Macmillan, 1973), vol. 7, p. xxvi:

本书旨在提供的整体产出理论比之于自由竞争及大量放任政策下既定产出的生产和分配理论,更易适合于极权国家的条件。

类似地,1933年凯恩斯同意他的一篇译为德文的关于“国家自给自足”的论文删除某些可能冒犯新的希特勒政府的段落。参见 Knut Borchardt, “Keynes' ‘Nationale Selbstgenügsamkeit’ von 1933. Ein Fall von kooperativer Selbstzensur,” *Zeitschrift für Wirtschafts- und Sozialwissenschaften*, vol. 108, pp. 271–84。

64. 凯恩斯革命兴起时,一些杰出的思想史家已经指出,凯恩斯关于货币供给、就业和产出这些变量之间关系的看法,早在重商主义思想那里已经有所阐述和强调。参见 Eli Heckscher, *Mercantilism*, 2nd ed. (New York: Macmillan, [1930] 1955); Jacob Viner,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New York: Harper and Bros, 1937), chaps. 1 and 2。这意味着,凯恩斯不仅不是一位革命者,反而是旧制度 (*ancien régime*) 的反动代表。一项对于他的巨著的最详尽的研究,毫无疑问地证实了这一点:

现在,我已通过以下文字,一个一个命题、一章一章,有时甚至是逐句逐句地分析了凯恩斯的《通论》,对于某些读者来说,这一分析可能过于冗长乏味,然而尽管如此,我却未发现哪怕只是一个重要的学说既是正确的又是原创的。(Henry Hazlitt, *The Failure of the "New Economics,"* 2nd ed. [Irvington-on-Hudson, N. Y.: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1959) 1994], p. 6)

65. Mises, "Stones into Bread, The Keynesian Miracle," Henry Hazlitt, ed., *The Critics of Keynesian Economics*, 2nd ed. (Irvington-on-Hudson, N. Y.: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1995), p. 313. 这篇文章首次公开发表于1948年3月的一期《开诚布公》上。

66. Mises, "Lord Keynes and Say's Law," in Hazlitt, ed., *The Critics of Keynesian Economics*, p. 319. 此文于1950年10月首次发表在《自由人》。

67. 参见各卷 *Travaux du IX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 (Paris: Hermann & Co., 1937)。这些会议记录收入了《科学和产业新闻》(*Actualités scientifiques et industrielles*) 系列。米塞斯的论文在 volume 5, pp. 49-55, 科塔宾斯基的论文在 volume 4, pp. 190-94。

68. Eugen Slutsky, "Ein Beitrag zur formal-praxeologischen Grundlegung der Ökonomik," *Annales de la classe des sciences sociales-économiques* (Kiev: Académie Oukraïenne des Sciences, 1926), vol. 4. 米塞斯引用了这篇论文,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 3rd ed.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03), chap. 1, p. 6. 这段文字里出现了“普遍行为学”的短语,似乎表明米塞斯在1933年已经采用这一术语。但在德语原文中,米塞斯使用的是一个稍有不同的表述:一般实践理论 (eine allgemeine Praktik), 意思是关于人类实践或人类行为的一般科学。参见 *Grundprobleme der Nationalökonomie* (Jena: Gustav Fischer, 1933), p. 14. 不过,按照米塞斯后来采用了这个术语来看,这个翻译仍然是可靠的。

69. Robert Wälde, "Diskussionsbemerkungen zu den Leitsätzen von Professor v. Mises zur Erörterung der methodologischen Probleme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typewritten paper, dated April 19, 1934, 10 pp.; Mises Archive; 32; 7-11. 在这篇论文的第6页,瓦尔德说米塞斯曾谈到过“行为学”(Praxeologie),而在第5页他用了“先验的行为学体系”(System des praxeologischen A priori) 这个表述。

70. 一年以后这项研究作为科塔宾斯基一本书的法语附录发表。参见 Tadeusz Kotarbinski, "Considérations sur la théorie générale de la lutte," *Z Zagadnien Ogólnej Teorii Walki* (Warsaw, 1938), pp. 65-92。

71. Alfred Espinas, "Les origines de la technologie" *Revue philosophique* 15 (July to December 1890); idem, *Les origines de la technologie* (Paris: Felix Alcan, 1897). 米塞斯显然没有直接读过埃斯皮纳斯的著作。哈耶克在伦敦为他查找了相关文献,另外,也是哈耶克发现了埃斯皮纳斯书中相关段落原封不动地来自埃斯皮纳斯早年发表的另外一篇文章。参见哈耶克致米塞斯,手写便条,标注日期为1939年11月12日;Grove City Archive: Hayek files。

72. 米塞斯致鲁道夫·贝特霍尔德,信件标注日期为1959年11月4日;Grove City Ar-

chive: Berthold file。米塞斯因此开启了行为学的第二传统。早期法国学派的当代追随者自称为“行为学家”(praxiologists)并把他们的学科称为“行为学”(praxiology)。这些学者大部分是法国和波兰的大学教师,他们出版了一套丛书 *Praxiology: The International Annual of Practical Philosophy and Methodology* (New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1992); 特别参见第7卷: *The Roots of Praxiology—French Action Theory from Bourdeau and Espinas to Present Days*, V. Alexandre and W. W. Gasparski, eds. (2000)。米塞斯本人隔着一定距离关注这些行为学家的进展。1956年,他饶有兴趣地注意到一本《行为学杂志》(*Journal of Praxiology*),它的编辑是佛罗里达墨尔本大学(University of Melbourne in Florida)的一位学者(Grove City Archive: Hugh P. King file)。他在写给史蒂芬·B·迈尔斯(Stephen B. Miles)的信中区分了上述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信件标注日期为1961年4月19日;Grove City Archive: “M” files。

73. 偶尔他也在书信中就经济学的方法论和逻辑性质发表一些有趣的评论。特别有意思的是在一封致莱昂内尔·罗宾斯的信中,对《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第二版(New York: Macmillan)的评论。参见米塞斯致罗宾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35年12月10日;Grove City Archive: Robbins files。这封信也证明了米塞斯与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之间的交往;他提到与数理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就是那位奥地利学派开山祖师儿子的儿子)的通信。

74. 米塞斯致马克卢普,信件标注日期为1938年3月5日;Hoover Institution: Machlup-Mises correspondence file。这篇论文最终发表于会议记录汇编,题为《经济科学的工作假设》(*Les Hypothèses de Travail dans la Science Économique*), *Cournot nella economia e nella filosofia* (Padua: Cedam, 1939), pp. 97–122。在早先的著作里,他只是稍稍触及方法论问题。例如参见他对“静态方法”和“动态法则”之可能性的评论, Mises, “Sociology and History,” in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 pp. 117f。

75. 有时,他也支持均衡概念作为一种方法论工具用于分析动态变化。参见 Mises, *Gemeinwirtschaft*, 1st ed. (Jena: Gustav Fischer, 1922), p. 151。比较 Mises, *Human Action*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98), p. 248。需要注意的是,米塞斯非常了解数理均衡理论的最新研究,例如瓦尔德(Wald)、罗森斯坦-罗丹、摩根斯特恩等人刚刚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Nationalökonomie*)的文章。

76. 参见一封没有标注日期和地址的手写书信(写于1937年秋);Grove City Archive: Kammer für Handel, Gewerbe und Industrie files。

77. 贝克尔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38年2月8日和1938年2月14日;Grove City Archive: Kammer für Handel, Gewerbe und Industrie files。最终,这场改革把商会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官僚机构。关于这一变化的亲历记录,参见马德(Mader)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9年10月31日;Grove City Archive: “M” file。

78. Mises, “Leitsätze für die Neuordnung der Verhältnisse im Donauraum,” undated manuscript, 10 pp。他留了一份副本在日内瓦研究生院,不过当他1940年前往美国的时候,也随身带了一些。

79. 他还讨论了更多细节:地方政府和法庭必须考虑少数民族的需要,任何一种使用人数超过当地人口15%的语言,都应作为工作语言。因为各国经济立法必须统一,特别是自由贸易和银行与货币条例,因此,民众需要一个中央议会和中央司法机构。这些机构的会议文

件将以一种官方语言记录,米塞斯认为应该选择法语或英语。这些中央机构应该设在维也纳,因此维也纳将会拥有一个特殊的地位,相当于美国的华盛顿特区。为了避免国内民众的猜忌,必须任用一些法国人或英国人担任联邦官员。

80. 后来他又为了建立一个东方民主联盟(Eastern Democratic Union)修改了计划,这份计划包含了更多的细节,两篇主要论文直到最近才得以发表:Entwurf von Richtlinien für den Wiederaufbau Österreichs (May 1940, 51 pages) 和 An Eastern Democratic Union: A Proposal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urable Peace in Eastern Europe (October 1941, 43 pages);这两篇文章都已译为英文并发表于 Richard Ebeling, ed., *Selected Writings of Ludwig von Mises: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form and Reconstruction*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2000)。

81. 引自 Margit von Mises, *My Years with Ludwig von Mises*, p. 27。

82. Joachim Fest, *Hitler* (Berlin: Deutsche Buch-Gemeinschaft, 1973), p. 753。

83. 参见 Mises, “Information” (March 4, 1939)——这是米塞斯留在当时转租出去的房间内的物品的大概清单;Hoover Institution; Hayek-Mises correspondence。

84. 米塞斯的私人图书有着不同的命运。纳粹把他的藏书送到了柏林一个新建的犹太图书馆(*Judenbibliothek*)。这是海德里希(R. Heydrich)帝国保安部(Sicherheitsdienst)控制下的一座图书馆,坐落于艾泽纳赫大街(Eisenacher Strasse)12号。然而,今天已经没人知道米塞斯藏书的下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避免盟军轰炸,犹太图书馆的藏书几经周折分散到各省。它们还经历了各种转移、与其他图书馆交换,还有盗窃。参见 Werner Schroeder, “Bestandsaufbau durch Plünderung—Jüdische Bibliotheken im RSHA 1936–1945,” paper presented at an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Raub und Restitution in Bibliotheken* (Vienna City Hall, April 23–24, 2003)。迄至1956年,米塞斯已经知道自己的一些藏书“出现在德国一些二手书店”,他觉得自己的一些书信(其中有两封是西格蒙·弗洛伊德写给他的)也许“有朝一日会落到某个手稿交易商手里”。米塞斯致艾斯勒,信件标注日期为1956年10月11日;Grove City Archive; Sigmund Freud Archives file。

85. 九年后,他的前秘书提到商会不情愿地补偿了他的那些应得收入,写道:“但是,你曾预言我们会被骗光一切,现在看来真是一点不错。”蒂贝格尔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7年12月16日;Grove City Archive; Thieberger files。

86. 参见米塞斯致克勒(Köhler),信件标注日期为1955年11月17日;一封1959年5月25日之后书信的手写稿;1960年4月1日的书信;Grove City Archive; Köhler files。另见1960年米塞斯写的遭窃铸币清单,不过显然没有提交给政府当局。克勒是维也纳的一位律师。米塞斯是在1955年听说美国和奥地利签署一项条约后和他联系的。然而,索赔的有效期限已于1953年到期。大部分金币来自波兰或1892年前的奥地利。1962年,米塞斯最终获得了赔偿——不是来自奥地利,而是来自德国政府,按照这批藏品估计重量的价值:大约25金衡制盎司。

87. 参见布罗克豪森关于这一事件的打印报告,现存 Grove City Archive; Brockhausen file。

88. 米塞斯后来证实:

并非所有受迫害者都是反纳粹分子。例如,奥特马·施潘教授是最杰出的纳粹学

说拥护者之一,但却因为与希特勒的私敌格雷戈尔·施特拉瑟尔(Gregor Strasser)的联系,而被关在集中营里待了一段时间。(《奥地利的纳粹与民主派》[Nazis and Democrats in Austria],打印稿,标注日期为1946年3月18日;Grove City Archive; U. S. Government Agencies file)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在希特勒监狱里服刑的经历,最终却在战后洗白了他。施潘的学说继续在维也纳讲授,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参见Karl Milford and Peter Rosner, “Die Abkopplung der Ökonomie an der Universität Wien nach 1920,” Harald Hagemann, ed., *Zur deutschsprachigen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ichen Emigration nach 1933*, p. 481。

89. Lionel Robbins, *Autobiography of an Economist* (London: Macmillan, 1971), p. 91.

90. 恩格尔-雅诺西在土耳其找不到工作,因为在那里只有土耳其人被允许讲授现代史课程。参见里夏德·冯·米塞斯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38年6月30日;Grove City Archive: Richard von Mises files。米塞斯写信给马克卢普说:“一大批维也纳人转向我求助,但我已经完全无能为力。没有人能获准留在瑞士。”米塞斯致马克卢普,信件标注日期为1938年6月17日;Hoover Institution: Machlup-Mises correspondence file。玛吉特后来回忆说:“我们竭尽所能帮助大家。我们的起居室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型红十字会办公室。我一直在记录、打包、邮寄。”(*My Years with Ludwig von Mises*, p. 39)

91. Margit von Mises, *My Years with Ludwig von Mises*, p. 31.

92. 结婚证原件现藏高级国际关系学院。玛吉特的登记信息:匈牙利籍,1890年7月3日出生,父亲名为阿尔贝特·赫茨菲尔德(Albert Herzfeld),母亲名为塞利察·冯特海姆(Selica Fontheim)。

93. Margit von Mises, *My Years with Ludwig von Mises*, p. 36.

94. Quoted from *ibid.*, p. 33.

95. 她继续说:

我第一次看到冰箱,我们在维也纳还没有这个东西,这对我是一个真正的奇迹。我爱闪闪发光的厨房,但在其他方面我却有些困惑。公寓很小……我不知道我的东西应该放哪。(Ibid., p. 31)

96. Ibid., p. 36.

97. Ibid., pp. 35-36.

98. 米塞斯也经常拜访当地的古根海姆家和金斯贝格家。参见金斯贝格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1年6月19日;Grove City Archive: “L” file。

99. 这点一直没有改变。他们都很喜欢驾驶,但驾驶技术却很糟糕。他们至少还遇到过两次严重的事故,分别在1948年和1966年。

100. 里夏德·冯·米塞斯在一封写给米塞斯的信中提到了玛吉特类似的说法,信件标注日期为1938年12月29日;Grove City Archive: Richard von Mises files。此时,米塞斯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已经快要完稿”。米塞斯致马克卢普,信件标注日期为1938年12月18日;Hoover Institution: Machlup-Mises correspondence file。

101. Walter Lippman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Good Society*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37).

102. Louis Rougier, “Préface,” *Le Colloque Walter Lippmann* (Paris: Librairie de Médecis, 1938).

103. Walter Lippmann, *La Cité Libre* (Paris: Librairie de Médecis, 1938).

104. Louis Rougier, “Préface.” 后来他强调会议的目的是定义新自由主义。参见 Louis Rougier, “Le Néo-libéralisme,” *Synthèses* (December 1958)。

105. 参见左翼学者 Eduard Heimann, *History of Economic Doctrines: An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45), p. 19。《社会主义》法文版的匿名评论者称作者是“奥地利经济学派无可争议的领袖”(Review of *Le Socialisme in Les Industries Mécaniques* [Paris, June 1938])。路易·博丹邀请米塞斯加入 1939 年新办的一个法国比较经济学期刊的学术委员会,他告诉米塞斯,所有政治倾向在这个委员会中都有一席之地,因此,自由主义如果能够得到米塞斯这样的大师的捍卫,就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参见 Baudin to Mises, letter dated May 18, 1939; Grove City Archive; Baudin file)。直到二十年后,米塞斯独一无二的作用,仍然得到法国自由放任学派最后一批幸存的学者的承认。1957 年 9 月,巴斯泰(A. Bastet)教授写信给米塞斯说,米塞斯是“我们的大师伊夫·居约(Yves Guyot)”的传人——居约本人又是古斯塔夫·德·莫利纳里(Gustave de Molinari, 1819—1912)的传人。而莫利纳里又是伟大的“原始奥地利学派”(proto-Austrian)学者弗雷德里克·巴斯夏(1801—1850)的传人。参见巴斯泰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 1957 年 9 月 5 日;Grove City Archive; “B” file。

106. Wilhelm Röpke, “Einführung,” in Walter Lippmann, *Die Gesellschaft freier Menschen* (Bern: Francke, 1937), p. 32。正如这篇前言表明的,勒普克深受李普曼著作的影响,他相信,李普曼的著作已经对新自由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07. 吕斯托因为自己早在 1932 年就杜撰了“自由干预主义”(liberaler Interventionismus)这个表述而感到自豪。参见他致沃尔克马尔·穆特修斯信件的副本,标注日期为 1955 年 5 月 23 日;Grove City Archive; Muthesius fil。他可能是指他在 1932 年社会政策协会德累斯顿会议上的发言。

108. “我在日内瓦的课程讨论现代政治思想中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学说,我常在课上耗费大量时间[全面反驳纳粹主义思想]”(Mises, “Post-war Reconstruction,” type-written manuscript dated May 28, 1941, 22 pages, quote is from p. 9)。译文发表于 Ebeling, ed., *Selected Writings of Ludwig von Mises*。

109. Mises, “Post-war Reconstruction,” pp. 3, 4, 12.

110. Mises, “Gedanken über die Wirtschaftspolitik nach dem Kriege” (Thoughts on postwar economic policy), undated manuscript (probably 1940), 19 pages; see pp. 17f.

111. Mises, “Entwurf von Richtlinien für den Wiederaufbau Österreichs,” report dated May 1940, 51 pages。在 Grove City Archive 中还有这份报告的一份初稿,包含 48 页。

112. 不过,米塞斯进而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观点:

自由贸易并不意味着取消一切进口税。它只是意味着人们不能通过征收进口税提高国内市场的价格,从而使得国内产商比国外竞争者更高的价格销售他们的产品。因此,有两类进口税是与自由贸易相容的:(a) 财政关税(financial duties)[必须相应于

国内的营业税],以及(b)扭曲关税,有些国家如果实行敌对奥地利贸易利益的政策,那么针对这些国家的全部或特定部分的进口商品可以征收扭曲关税。 (“Entwurf von Richtlinien für den Wiederaufbau Österreichs,” p. 24)

113. *Ibid.*, p. 26. 他非常详细地列出了税收清单:(a)酒类和烟草的销售税;(b)仅对消费者购买的商品征收的销售税;(c)用于支持社会保障体系的工资所得税;(d)住宅消费的累进税;(e)豪华轿车税;(f)彩票所得税;(g)纸牌税;(h)特定行政行为费用[注册专利、商标等等];(i)针对超过6%资本收益的“适度税收”,这笔税款将支付给有限责任公司的股票持有者。米塞斯强调说,除了c之外,不应征收任何所得税。处罚收入就像杀死下金蛋的鹅。不仅如此,一切公共企业如收入无法弥补成本,就必须变卖或关闭。

114. *Ibid.*, p. 31.

115. *Ibid.*, pp. 31 - 32.

116. *Ibid.*, p. 32.

117. *Ibid.*, p. 36.

118. *Ibid.*, p. 37.

119. *Ibid.*, p. 38.

120. 一位研究过他在商会的活动的历史学家指出:

在大学里,以及他的著作中,米塞斯向人们展现的是一个毫不妥协的自由市场拥护者的形象。但是作为一位实践者和商会政治家,他却要灵活得多,只要被迫放弃的不是什么根本原则,他也愿意妥协。不过,即使是在妥协的时候,他也仍然有些生硬,不会偏离那些他已认准并同意的行动路线。(Alexander Hörtlehner, “Ludwig von Mises und die österreichische Handelskammerorganisation,” *Wirtschaftspolitische Blätter* 28, no. 4 [1981]: 142)

121. 1939年8月7日,米塞斯从艾克斯莱班写信给一位乔瓦尼·德马里亚(Giovanni Demaria);Grove City Archive: Demaria file. 他同意一位意大利译者翻译他的《货币与流通媒介理论》,同时声明,他保留外语译本的一切权利。这个译本可能没有完成,但这件事表明意大利法西斯远比德国纳粹更为宽容。米塞斯比较了俄国的自由和法西斯的自由,见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 (Princeton, N. J.: Van Nostrand, 1956), chap. 4, section 4 and chap. 5。

122. 参见里夏德致路德维希,信件标注日期为1939年6月13日和7月23日;Grove City Archive: Richard von Mises files. 他们可能是在8月8日会面。

123. 参见通信,Grove City Archive: Machlup files。

124. 马克卢普猜测 UCLA 最多只能支付每年4000美元。米塞斯说他的要求不高,但是他的家用开支实在太太,如果 UCLA 的预期收入只有这么一点,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维持生活。参见米塞斯致马克卢普,信件标注日期为1940年2月28日;Grove City Archive: Machlup files。

125. 马克卢普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0年2月15日;Grove City Archive: Machlup files。

126. 马克卢普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0年4月17日;Grove City Archive: Machlup files。

127. 1940年1月《国民经济学》开始下厂印刷。米塞斯半开玩笑地预测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本以德语出版的经济学著作了。参见米塞斯致马克卢普,信件标注日期为1940年1月30日;Hoover Institution; Machlup-Mises correspondence file。

128. 本杰明·M.安德森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0年3月1日;Grove City Archive; Anderson file。

129. 米塞斯致安德森,没有注明日期的信件手稿;Grove City Archive; Anderson file。

130. Mises,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Vienna: Manz, 1919), p. 112n.; translated by Leland B. Yeager as *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38 note.

131. 德国人在正面对抗敌军时对空军力量的纯粹战术运用,来自法国海军轮机长鲁热龙(Rougeron)的理论,后者在20世纪30年代初总结了一战的经验。恰恰相反,西方盟军最终采纳了意大利朱里奥·杜黑将军(Giulio Douhet)的理论,根据这种理论,空军应该轰炸敌国内地的城市和补给线,以此摧毁他们的经济和民众的士气。1918年春英国皇家空军刚成立时,它的战略规划办公室已经预见到了杜黑的理论。但是当时由于战争的结束使得这一理论无法付诸实践。参见Giulio Douhet, *Luftherrschaft* (Berlin: Drei Masken Verlag, 1935); Colston Shepherd, *The Airforce of Today* (London & Glasgow: Blackie & Son, 1939)。感谢菲利普·埃杰特(Philipp Egert)提供这些信息。

132. 1940年6月3日,路易·博丹写信给米塞斯说,巴黎很平静。“我们对我们的初期失利并不奇怪。我们需要时间摆脱糟糕的领导人,调整人民的心态。人民阵线已经让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33. 米塞斯致罗亚尔·威尔伯·弗朗斯(Royal Wilbur France),信件标注日期为1946年10月31日;Grove City Archive; France file。

134. 拉帕特致凯尔森、米塞斯和勒普克,信件标注日期为1940年5月27日;芒图致拉帕特,信件标注日期为1940年5月24日;Grove City Archive; Mantoux file。

135. 此时瑞士周围都是法西斯政权,自然也要适应新的政治格局,以便继续维持最大限度减少冲突的战略。例如,1940年9月,瑞士在政治机构和组织中临时启用了纳粹称号,设立了“大区领袖”(Gauleiter)和一个“劳动阵线”(Arbeitsfront)组织。然而,逗留在这个小小山国的移民,永远无法获得保证他们不会被移交给他们逃离的那些政府。参见赫尔曼·冯·格里迈森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0年11月25日;Grove City Archive; Grimeisen file。勒普克似乎也曾考虑移民美国。参见哈耶克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0年6月1日和1940年8月29日;Grove City Archive; Hayek files。

136. 哈耶克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0年6月1日;Grove City Archive; Hayek files。

137. 副本现藏Grove City Archive; Hayek files。一个月后,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彭罗斯(Penrose)教授另外写了一封“正式的”确认信,寄给日内瓦研究中心的皮特曼·B.波特教授,督促他为米塞斯前往美国提供帮助。信中警告说,任何国家如果阻止米塞斯的安全通行,将对美国公众舆论产生负面影响。

138. 哈耶克曾敦促米塞斯与鲁吉耶取得联系,以便获得法国过境签证。“他已经创造

了一些奇迹。为了避免浪费时间,我将同时发封电报给他,您可能会收到他的消息。”哈耶克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0年6月1日;Grove City Archive: Hayek files。

139. 6月10日他已经写了一封给芒图和拉帕特的告别信。参见 Grove City Archive: Mantoux file。可能就是这次,他也留下了一份礼物给图书馆:一本带有卡尔·门格尔评注的 George F. Knapp, *Staatliche Theorie des Geldes*, 2nd ed. (Munich &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18)。参见西尔伯纳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0年12月11日;Grove City Archive: Silberner file。

140. 拉帕特立即做出反应,当天里斯本的阿姆扎拉克教授 (Professor Amzalak) 发了一封电报。参见电报抄本,现藏 Graduate Institute Archive。

141. 引文来自米塞斯写给拉帕特的信件,标注日期为1940年7月14日;Graduate Institute Archive。这封信报告了米塞斯在法国边境的危险经历。另见玛吉特略有不同(可能较不准确)的描述, Margit von Mises, *My Years With Ludwig von Mises*, pp. 51 - 56。与他们逃离欧洲有关的正式文件和通信,现藏 Grove City Archive: files #6/10/1/2 and #6/10/1/3。

1940年5月,《国民经济学》正好赶在出版社倒闭前印刷出来,然而甫一问世,马上又被埋葬在战争的洪流中。米塞斯寄了一些书给朋友和同事,然而许多人从未收到。米塞斯开玩笑说:“我猜纳粹拿这些书当柴烧了。”¹

760 此书得以幸存,只因为它的英语新版《人的行为》吸引了世界各地读者更多的注意,这是旧版远远不及的。不过,最早呈现米塞斯整个思想体系的,还是《国民经济学》,这一体系是他在三十多年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²一般的经济学教科书只是许多互相矛盾的理论碎片的拼合,那时如此,现在也一样。但米塞斯的著作呈现了社会法则的连贯体系,同时也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描绘了一幅社会实在的全景画面,从最宏观的全局到最细微的局部,无不涉及。它是最好的社会哲学。

米塞斯懂得一部完整著作的意义。范围较小和篇幅较短的著作无法容纳各式各样的思想观念。说服读者之前,米塞斯必须首先教育读者——这是干预主义时代的本质任务,因为这个时代的普通公民经常暴露在亲政府的宣传下。有一次他在答读者信中写道:

我试着回答一下你对我的书提出的那些问题。事实上,书就是写给所有朋友的一封信——既给作者已经认识的朋友,也给他将来希望认识的朋友。³

不过,米塞斯对文字世界的力量并无过分的信心。在1957年从墨西哥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表示了立刻开始讨论这位朋友在上封信中提出的那些理论问题的愿望。当面交谈也许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对那些问题的彻底讨论“如果通过文字,只能以一整本书的形式进行,而且书面文字永远无法取代口头语言”。⁴

在绪论(与《人的行为》绪论基本相同)中,米塞斯确立了全书的论题。此书旨

在按照以往遭到这一领域所有著作忽略的两个核心问题来呈现整个经济科学体系,这两个问题就是:认识论和价值理论。⁵

接着,他以751页的篇幅提出了他的体系,全书分为六篇。这样一来,他过去的所有发现都将纳入到正确的上下文中,同时还融入了那些日内瓦期间形成的新成分。

第一篇讨论了人的行为的特征,以及作为行为存在基础的一切可以想象的行为条件。他先用一章描述了行为的基本特征,特别强调了动作和行为之间的区别,然后讨论了行为科学的认识论问题(第2章)。⁶接着他转向了对行为的更加详尽的分析(第3章),其中,他提出诸如交换、价格、成本、成败和得失之类的现象并非仅仅出现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而是一般人类行为的特征,它们是行为的范畴。

第3章也讨论了“手段与目的”以及“偏好”这两个范畴。米塞斯没有沿用旧奥地利学派讲到价值(value)时所用的术语。作为替代,他用偏好(preference)概念,因为这个概念更能传达行为范畴源于人的选择这一含义。这个术语选择当然能够帮助我们避免误解,尤其是自奥地利价值理论之父门格尔强调了价值不涉及人的自由意志后。⁷根据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经济科学研究人的需要和满足这些需要必需的经济财货之间的关系。而在瓦尔拉斯的《纯粹经济学要义》(Éléments)那里,正如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及此后直到80年代的主流看法那样,经济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市场交易的价格和数量的学科。但是按照《国民经济学》的理解,这门科学的真正对象是人的行为,尤其是选择。

762

第一篇还有一段值得注意的文字,在此米塞斯首次提出作为行为学法则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⁸它与饱和这一心理现象无关。相反,这规律涉及一个简单的事实:较多数量的某种同质物品可以满足比起较少数量此类物品更多的目的。不过这些额外目的,恰恰因为它们是额外的,因此就没有那些已经通过较少数量物品得到满足的目的重要。此处,米塞斯背离了其他经济学家,最突出的是维塞尔,后者对这一规律采取了戈森的心理学解释。米塞斯在行为学和心理学之间划出了严格界线,并在本书其他一些重要段落强调了这个区分。下文我们还会关注其中一些。

在第二篇,我们的作者探讨了那些构成个人之间互动的人类行为的特征。而在此书后面部分,他分析了三种基本社会体制的特质:市场经济(第四篇)、社会主义(第五篇)和受到限制的市场经济(第六篇)。

他也重述了他在《社会主义》中提出的社会理论,但是这次是在恰当的上下文中。⁹他强调了“李嘉图协作法则”和理性对于形成人类社会所起的关键作用。

763

在第三篇,他完成了二十年来他1920年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计算不可能性

论文的知识同化。他以大约 35 页篇幅最终提出了一个经济计算的一般理论；另外，他把这个理论放在了恰当的位置，就是转向关于人类合作的所有具体体系分析（第四篇到第六篇）之前。当然他在 20 世纪 20 年代写的关于价值理论的论文中已经预料到了这一建筑术的必要安排。不过，在一般性的论证中强调评价（偏好）和计算的区别是一回事，把这一洞见应用于具体分析又是颇为不同的另一回事。

764 第四篇讨论市场经济，篇幅超过 400 页——全书一半以上。在这部分，米塞斯重新表述了自己在以往的研究中提出的许多理论：垄断价格理论、货币与信用理论、著名的商业周期理论、工资理论，以及市场所有参与者利益和谐的学说。但他并非简单重复自己，而是提出了过去思想经过彻底修改的版本。他扩展了最初在《社会主义》中提出的垄断理论，当时他的重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垄断理论的讨论。他以全新的语言重新提出了利益和谐理论，反驳了凯恩斯、罗宾逊和张伯伦（不完全竞争）等人的英美理论。在货币理论中，他认为出于政治原因的货币供应调整从经济学观点来看是不必要的，这个规则不能容忍任何例外。最后他整合了商业周期理论和利息理论——他以前从未书面讨论过这个主题。

除了利息，他对市场经济的分析的主要新颖之处在于强调了企业家的作用。米塞斯仔细区分了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做出成功决策的企业家，和作为基本经济（在不确定情况下承担风险的）功能（function）的企业家精神。正是这一经济功能，导致利润和亏损这一特殊收入成分的产生。《国民经济学》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澄清了企业家功能在市场经济运作中的作用。然而米塞斯觉得除非通过某种有些迂回的解释，否则他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为了定义企业家精神，必须给出利润和亏损的恰当定义。但对米塞斯来说，没有澄清均衡的本质及其在经济科学中的作用，就不可能定义利润和亏损。因此他不得不以内容稍嫌基础的一章开始了第四篇，在这一章，他讨论了对市场经济进行逻辑分析必不可少的一些方法——具体说就是各种均衡概念。只有这样，他才感到解释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和意义的基础已经奠定。

第五篇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米塞斯没有重复《社会主义》的主要发现。他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对社会主义方案的反驳的核心论题：只要生产资料属于集体所有，经济计算就不可能。因此，第五篇可以视为第三篇的扩展。米塞斯讨论了 20 世纪 30 年代出现的一些社会主义经济计算方案，其中最著名的是英美国家学者提出来的。他否定了通过虚拟市场确定价格的想法，也驳斥了数理经济学可以（哪怕只是理论上）克服经济计算问题的观念。

在第六篇，他对干预主义的讨论远比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的几篇论文更加全

面和细致。论证的总体思路仍然一样：干预主义适得其反，因为奉行干预主义的政策无法达到它的创制者公开宣称的目标。《国民经济学》做出了全新的重要贡献。即使在重述自己过去学说的地方，米塞斯也进行了很多修改——常常是实质性的修改。因此，几年后，当耶鲁大学出版社考虑委托翻译此书，邀请戈特弗里德·冯·哈伯勒担任匿名审稿时，哈伯勒却声称此书几乎没有包含任何新的东西，这就有点不寻常了。¹⁰

反心理主义

米塞斯对经济科学的阐述与所有现代作者都截然不同，因为他在行为学和心理学之间进行了严格区分。直到现在，这仍然是其门徒的著作的决定性特征。

米塞斯并不否认，一个人的心理背景、世界观、知识、有意识的动机、潜意识的冲动等等对其作为有着直接的影响。他也没有忽略朋友 F. A. 哈耶克在那些年开始强调的特别是与知识获取有关的重要的心理问题。米塞斯的观点是，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完全独立于这些心理状况的人类行为的法则。

例如，在第 4 章，米塞斯讨论了目的与手段、价值等级和需要等级。但他没有论及人们如何或为何选择目的和手段，或者，如何或为何持有特定的价值和特定的需要。他认为，我们的确在所有行为中都使用一些手段实现一些目的，同时需要和价值可以排序 (ranked)。¹¹ 在第 15 章 (“市场”)，他指出消费者至高无上，因为他们的购买决定引导着整个市场。¹² 这显然是正确的，不管消费者购买什么或为何购买。因此，他不探讨这些问题。在第 16 章 (“价格”)，米塞斯阐述市场参与者的数量决定了价格决定的幅度有多狭窄。但这意味着市场参与者的数量并不影响价格如何形成。无论市场参与者的数量是多少，市场价格始终取决于边际的买者和卖者的决策。¹³ 因此，市场参与者偏好某一物品 A 甚于另一物品 B 这一简单事实的后果足以解释所有价格的形成。¹⁴

行为学是探讨这些规律的科学。它考察了人会做出这样那样的选择这一简单事实的诸多后果。就一个选择与其后果之间的关系而言，行为学考察了不同的手段在实现特定目的之时是否合适的问题。在行为学的分析中，目的是“所予”，不过这并不是说人类不能选择目的，或者正确目的的选择是没有疑问的，而是说目的的选择不在这门特殊科学考虑的范围之内。¹⁵

至于市场参与者的知识，米塞斯强调了如下事实：市场参与者并非同等程度地掌握信息。但即使他们全都拥有相同的信息，他们对这些信息的评价也是不

同的。¹⁶

谈到均衡,米塞斯再三指出,市场永远不会达到这一状态,这是一个纯粹的心理建构,它的唯一作用就是分析利润和亏损。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均衡建构以便解释价格传导的一个具体要素。但它不是解释价格(工资、利息、商品价格)所必需的。¹⁷

因此,按照米塞斯的看法,均衡不是评价市场的正确标准。有些经济科学的批评者指出,市场从未建立不同商品和服务之间的完美平衡。对于他们,米塞斯有两点回应。¹⁸首先,他指出失衡这一事实并未驳倒经济学说,因为经济科学可以解释任何事态,并把它们视为消费者做出特定评价这一事实的后果。其次,评价市场的恰当参照应为政府干预。政府官员不是超人,因此我们不能做这样一个先验假设:委托他们管理市场将会带来改善。正如政府干预主义的分析所示,事实恰恰相反。

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是理性的

768 在《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中,米塞斯已经指出,人类社会得以建立的基础在于,与相对独立行动的个体相比,人类合作将会带来较高的物质生产力。这是古典自由主义社会哲学的关键,也是自由放任曼彻斯特主义政治方案的基石。在《国民经济学》中,米塞斯着手比较了这一社会哲学和其他世界观的异同。他强调,经济分析已经提供了关于人类社会起源的纯粹基于事实的描述。

18世纪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社会哲学以及现代经济学提出的科学理论,并不诉诸任何超人力量的奇迹干预。个人接受通力合作取代单独行动的每个步骤,都使他的境况获得立即的、可见的改善。和平合作与劳动分工的优势是普遍的。这些优势立刻惠及每一代人,而不只是未来的子孙后代。个人为了社会所作的牺牲,可以得到更大利益的充分补偿。他的牺牲是表面的、暂时的;他放弃了较小的收益,以便日后收获更大利益。任何理性的人都不至于无视这一明显事实。如果社会合作由于劳动分工领域的扩大而得到深化,或者,如果和平的法律保障和防卫措施得到加强,那么,其间动机就是所有相关个人试图改善自己生活境况的欲望。个人追求自己(得到正确理解的)利益时,同时也就加强了社会合作与和平交往。社会是人的行为——旨在尽可能地消除不适的人类冲动——的产物。¹⁹

接着他又继续指出这一发现具有更加重要的文化和哲学意义：

休谟以来直到李嘉图的英国政治经济学精心阐述的劳动分工理论的历史作用，在于彻底清除了关于社会合作的起源和运作的形而上学理论。伊壁鸠鲁学派的哲学开创的人类精神、道德和知识的解放运动，至此达到顶点。一种自律的、理性的道德，取代了旧时他律的、直觉主义的伦理。法律与法制、道德法则与社会制度，不再作为高深莫测的天命得到敬畏。它们源于人类自身，评判它们的唯一准绳就是对于人类福利是否合宜。²⁰

769

经济学家就是这样解释社会：它是人的创造，是为了满足个体需要而由许多协力合作的个体通过设计和履行创造出来。相比之下，其他诸如普遍主义和集体主义这类思路，却认定了社会的界定可以独立于个人行为。对集体主义者来说，

社会是有自己生命的实体，独立且分离于诸多个人的生活，它的行动乃是代表自身利益、为了实现自身目标——不同于个人寻求的目标。

米塞斯继续指出，基于社会概念，可以得出一个自然的结论：

当然，可能出现社会目标与社会成员目标之间的对抗。为了确保社会的繁荣和继续发展，必须控制个人的自私行为，迫使他们为了社会利益牺牲自我中心的企图。²¹

770

因此，我们需要给出一个关于如此构想的“社会”之恰当利益的定义。米塞斯认为，科学无法提供这样的定义。于是，

所有这类整体主义的学说，必然放弃人文科学的世俗方法和逻辑推理，转向神学的或形而上学的信仰表白。²²

米塞斯强调了这一问题的认识论方面：

所有种类的普遍主义、集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社会哲学的实质问题是：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标志认识真正的法则、上帝话语的真正使徒，以及正当的权威。

这是因为,自称是上帝差遣来的人很多,而这些先知中的每一位都宣扬不同的福音。²³

均衡、利润与亏损、企业家精神

771 米塞斯是读了卡尔·门格尔和欧根·冯·庞巴维克的著作,才理解了作为理性社会秩序的市场经济,其中一切生产要素都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不仅生产要素的分配,而且这些要素的所有者的收入,也都仅仅依赖于它们为满足人的需要所做的相对贡献。一切价值和一切价格,正如弗兰克·费特所说,全都依赖于市场民主体制的日常公民投票。²⁴

但是,米塞斯发现这些前辈中没有任何一位对生产结构连接消费者偏好的过程给出令人满意的描述。他在庞巴维克研讨班上的同学约瑟夫·熊彼特已经精彩地说明了企业家如何驱动市场。根据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²⁵企业家是革新者,他们不时打断惰性的经济体系的平滑运行。

熊彼特自有他的道理。在市场经济中,创新的确起着核心作用。但是,这一观点和作为一种理性社会秩序的市场经济的门格尔式图景怎样才能取得一致?企业家获得创新利润这一熊彼特式观念,和一切收入取决于消费者意愿这一门格尔式洞见是否相互抵触?在《国民经济学》中,米塞斯调和了熊彼特和门格尔。他从熊彼特那里吸收了企业家是市场过程的动力的观念。但是,他们并不因为创新本身获得利润——而只因为创新提高了消费者需要的满足水平。

772 企业家常常根据他们对消费者未来偏好的预期调整生产结构。不同的企业家实际上是为支持不同的消费者需要而做出决定。他们会为某种未来的想象产品的赢利作出预期,基于这一预期他们来到要素市场与其他企业家竞争,出价争夺可供选购的生产要素——工人和原料供应。这一竞价过程决定了一切生产要素的收入,同时保证了只有最重要的(就未来消费者支出而言的“重要”)投资项目可以实现。

企业家精神的动力是利润动机。利润是一个人因为承担了不确定性而得到的特殊报酬。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家的行为必须小心谨慎、认真负责,因为任何错误决定都由他们个人承担责任。亏损是对不成功的企业家行为的惩罚。利润和亏损就是企业家精神的衡量标准。

所有商人都是企业家吗?所有企业家都是商人吗?如果不是,我们怎么区分企业家和“普通”商人,以及其他市场参与者?米塞斯回答了这些困难的问题,他

把企业家精神定义为一种社会功能,也就是说,为未来的不确定性承担责任的功
能。米塞斯理论中的企业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人所扮演的角色——再者,也
绝不仅仅限于商人。根本上说,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企业家,只要他承担了不确定性
的后果。利润和亏损不只决定商人的收入,而且决定工薪阶层和资本家的收入。
它们总是混在具体要素收入例如工资和利息当中。

米塞斯必须在自己的理论中解决的最大问题之一,是怎样给出利润和亏损的
准确定义。特别是,他必须将利润和亏损与利息区分开来。他的解决方法是,利润
和亏损是人犯错误的结果。换句话说,利润和亏损只能存在于非均衡的环境下。
与此不同,货币利息最终来自时间偏好,不涉及市场参与者是否做出好的或坏的决
定。货币利息既存在于全局均衡下,也存在于非均衡下,但是利润和亏损只存在于
后者中。

不过,这一论证使得澄清全局均衡的准确意义及其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成为 773
必要。米塞斯认为全局均衡——在他那里称为静态经济(*stationäre
Wirtschaft*)²⁶——只是一个纯粹的方法论工具。它是一个想象建构(*Gedankenbild*),
在真实世界中并无所指。它的唯一用处就是定义利润和亏损。

消费者主权和利息

在《国民经济学》中,米塞斯终于探讨了利息理论,这是他所尊敬的老师庞巴
维克的主要研究领域。米塞斯在20世纪20年代维也纳大学的课堂上经常讨论当
代利息理论。在那些年,他还计划写篇关于利息的论文,但是总有其他看来更加重
要的问题需要讨论。²⁷到了日内瓦,他终于有了闲暇填补这个空白。²⁸

庞巴维克开创了一个奥地利传统,界定了后来属于利息理论探讨范围的那些
现象。他认为,信贷业务中支付的“利率”实际上是一个更为广泛的现象的次要方
面。这一现象的主要方面我们可以在市场上见到的某些特定的价差现象中找到。
庞巴维克理论的起点是这样一个常见现象:成功事业的特征在于,付给生产要素的
价格总额和作为产品收益的价格总额之间存在一个正的差额。企业家通过出售产 774
品赚取的收入,多于他们付给用于生产这些产品的生产要素的费用。

这个现象引起一个基本疑问:销售收益和成本开支之间的差额是否可能因为
企业家间的竞争而被“套利掏空”,或者,是否至少部分差额永远无法消除。换句
话说,这一差额的某一部分是否包含纯粹的利息成分?如果包含,原因何在?

庞巴维克的伟大成就在于明确阐明了利息理论问题是一个价值问题——也即

财货之间优先次序的显现。利息是人的选择和交换的结果,而非人的行为以外的因素引起的。作为行为背后偏好的结果,利息反映了一种基本的价值差异现象——选择较高价值同时舍弃较低价值。可见,利率显示了产品的价值与相应的生产资料包括“等待”或“使用”资本的总价值之间的不等。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思路,例如卡尔·门格尔的利息理论,因为后者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上述两个价值之间存在一种基本的相等关系。²⁹按照门格爾的看法,利息是生产要素的一个组成成分的价值,然而庞巴维克却把利息视为一个价值差额。

775 但是这样一个价值差额来自哪里?根据庞巴维克,“相等数量和质量的当前财货一般比未来财货具有较高的主观价值。”³⁰后来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费特杜撰了“时间偏好”这个术语表示这一现象。³¹因为当前财货相对未来财货的时间偏好,生产要素(用于生产未来产品)比起此时此地相应数量的产品具有较小价值,如果没有时间偏好,它们的价值应该是相等的。

庞巴维克强调时间偏好只是利息的近似原因(*proximate cause*)。它的根本原因(*ultimate cause*)是某些甚至更为基本的东西。他有一个著名看法,认为时间偏好本身是由两种心理倾向引起的:(1)当前的需要通常不如未来的需要更易得到满足,以及(2)人类易于低估未来需要的价值。他还认为时间偏好的原因在于较为迂回的生产方式具有更高物质生产力——这是著名的时间偏好“第三原因”。³²

米塞斯舍弃了庞巴维克对时间偏好的心理解释。米塞斯认为,心理学永远无法证明时间偏好是人类行为的本质要素。在某些行为中,庞巴维克描述的心理因素确实会起作用,使得当前财货优于未来同类财货。但在其他例子中,也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形。庞巴维克本人已经承认了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他认为时间偏好只是“一般来说”而非在所有人类行为中都存在。³³

776 庞巴维克关于时间偏好本质的看法有两个互相关联的缺点。第一,它与价值和价格表现在人的选择之中这一事实很难调和。如果选择是自由的,我们怎么能说未来价值按其本质(或者至少“通常来说”)与当前价值处于某种确定的关系之中?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庞巴维克进路与主观价值理论相互冲突。他对时间偏好的看法涉及同质的当前和未来财货之间的价值差额,但是两批财货存在于不同的时刻这一事实本身就自动地表明了它们是异质的财货。庞巴维克本人含蓄地承认了这一点,他强调说,当前财货和未来财货的价值可能不同乃是因为它们“是为两组不同的需要服务”。³⁴这里的第二点对于旧的时间偏好理论是毁灭性的,因为我们甚至无法声称当前财货和未来财货“具有相同性质”而不陷入自相矛盾。

不仅如此,我们在庞巴维克关于时间偏好现象的模棱两可的描述中可以看出,

他并未断言时间偏好永远是正的,因为他只强调了“一般来说”当前财货优于相同的未来财货。³⁵于是,在米塞斯的这些前辈手中,时间偏好理论只是这样一个论断:同类的未来财货和当前财货的价值之间的一种确定关系是存在的。他们中间没有一位提出关于这一假想关系的站得住脚的解释,有的只是凭借直觉诉诸一个显而易见的市场现象:产品销售收入高于相应生产要素的费用。但这正是利息理论需要解释的一些事实——它们不能自己解释自己。

777

米塞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他基于一些先验的根据断言,时间偏好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正的。人的行为按其本质就意味着偏好一个目的较早得到满足而非较晚得到满足。于是,与庞巴维克、费特和费雪相反,米塞斯断言时间偏好不是人的心理倾向的后果,而是行为的跨时本质。多年后,米塞斯在私人信件里出色地总结了论点:

时间偏好不是一个“心理假设”,而是人类生活和实践的这个宇宙的物理结构和化学结构的效应。它指的是以下这个事实:为了活在三月,必须首先活过二月。

如果我们称为时间偏好的这一现象是不存在的,人们就会仅仅消费那些易于快速腐败的东西。除此之外所有其他东西他们将会永远储存起来或是用于投资,在他们眼里,这样的行为方式将比短期投资获得更大的产出。³⁶

米塞斯没有那么用心澄清他的前辈曾经利用时间偏好概念试图解释的那些现象,不过他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彻底改写。庞巴维克、费特和费雪使用时间偏好概念的时候,他们指的是存在于两个不同时间的两种物理相似的财货之间可观察到的价值差额。但米塞斯用这个术语是指同一件财货两种不同用途之间的一个反事实的价值差额。时间偏好涉及某件财货的当前用途和这件财货的未来其他用途之间的价值差额,不过人们只有做出不同选择才会认识此一其他用途。如果我现在而非以后使用一件财货,那就显示我更偏好现在而非以后使用。于是,这也必定意味着对我来说它的当前价值高于我在未来使用它的价值。

778

如同庞巴维克,米塞斯也相信时间偏好只是利息的近似原因。但他不认为利息的根本原因是人类的某种心理倾向,而是赞同弗兰克·费特和弗朗茨·丘赫尔的看法,主张利息的根本原因在于消费的必要。³⁷事实就是,如果人不消费,就无法继续生存,因此人的行为之中必须存在某种时间偏好,否则人类就会灭绝。这并不是说时间偏好是决定人的行为的唯一因素。而是意味着,为了继续生存,人类必须

在**某些时刻**偏好较短而非较长的生产过程,即使较长的生产过程具有更大的物质生产力。

米塞斯指出,如果可以不顾生存的需要,人们永远都会选择最长的生产过程。³⁸正是为了生存的需要,行为的人也会考虑时间的流逝,并且在某些时刻,偏好较早的结果而非较晚的结果。

779 考虑三种不同的捕鱼方式:在第一种方式下,每小时结束时能够捕到1条鱼;第二种方式,每天结束时能够一次捕到10条鱼;第三种方式,每个周末能够一次捕到100条鱼。假设我们观察到某人采用了每天结束时能够一次捕到10条鱼的方式。米塞斯解释说:此人没有选择100条鱼的备选方案,是因为比起较长程序能够获得的额外收获,他的时间偏好更强。他不想等待一个星期。另外,他选择一次10条鱼而非一次1条鱼的方案,唯一原因就是**在这个例子中**,额外收获的吸引超过他的时间偏好。

我们且在米塞斯经济学的总体理论框架内凸显这一解释的重大意义。在此,消费似乎是一切经济现象的根源。卡尔·门格尔及其门徒曾经认为,消费者选择直接决定了消费品的价格,并且间接决定了生产原料的价格。时间偏好也是一样,由于时间偏好,资本和利息现象似乎也是根源于消费。这一解释的巨大魅力(至少从米塞斯的观点来看)在于,它不强调任何心理倾向,而依赖于没有消费就不存在人类行为这一基本事实。因此,时间偏好的消费理论天衣无缝地把资本和利息理论整合在一般价格理论之中。在利息领域——正如在更广的市场过程中,消费者是至高无上的。

重写商业周期理论

现在,根据利息理论,米塞斯澄清了利息和货币数量变化之间的关系。奥地利(米塞斯)商业周期理论断言,出现资源配置跨时错误的原因在于通胀引起的利率下降。但是,“下降”的准确含义是什么?米塞斯并不打算宣称利率的简单变化就会引起一个商业周期。今天的利率低于昨天的利率这一事实本身并不意味着错误配置已经发生。

780 在《货币与信用原理》中,米塞斯的分析基础是维克塞尔关于自然利率和货币利率的区分。但是,按照米塞斯在经济计算和货币非中性方面的研究,这一区分是站不住脚的。根本就不存在自然利率——按照定义,它是物物交换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利率。而且,即使存在这样一个“自然”利率,它与货币经济的分析也没关系。

货币并不只是蒙在物物交换经济上的一层面纱。它会影响到一切经济关系。在使用货币的经济体中,价格、收入、分配和社会位置将会完全不同于一个没有一般交换媒介的社会。因此,货币经济中的利率必然不同于同样一个经济体在市场参与者决定放弃货币之便利的情况下的利率。即使我们假定“自然”利率和货币利率是可以比较的(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也不意味着任何时候只要“自然”利率高于货币利率,都会引起跨时错误配置。

在《国民经济学》中,米塞斯重新阐述了他的商业周期理论。他提出判断货币利率下降是否有害的一个新标准。这个标准不再是维克塞尔的只存在于物物交换经济的自然利率,而是没有信用膨胀的经济体中的货币利率。³⁹

市场上信用供应的任何增长都会降低利率,但是如果这一增长来自纸币或钞票的印制(而非来自储蓄),那么,虚假的较低利率就会扭曲企业家的利润计算。由于利率降低,大量商业计划就会显得有利可图,继而投入建设。但是,物质生产要素不足以完成这些更多更大的项目。信用扩张并不意味着真实的经济要素资源的扩张,只意味着货币供给通过信用市场得到扩张。结果就是,支撑信用扩张引起的新的生产结构在物质上已经变得不可能了。最终,繁荣必定破灭而告结束。⁴⁰

781

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之争的最新进展

米塞斯并不相信支持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论证有了什么进展。但是新的亲政府观点对他来说提供了深入阐述这一问题的机会。他区分了自己在1920年已经指出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四种不同建议。

第一候选方案主张根据纽伊拉特劳动时间进行经济计算。但是这种方法不起作用,因为它遗漏了物质生产要素,而且不同类型的劳动是异质的。

第二候选方案同样希望发掘一种取代货币价格的经济计算媒介,在这方面它与上述方法有些类似。只是这里提出的替代标准不是劳动时间,而是效用,例如维克塞尔理论中的效用概念。面对这一反驳,米塞斯指出,人类无法测量效用,只能划分效用等级(排序)。不同数量的供应,其中单位效用必然是不等的。因为缺乏这种同质性,它们无法用于计算价值的单位。

根据第三种建议,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创造一个虚拟市场,命令工厂经理按照资本主义行事方式经营企业。这种想法结合了价格体系和通过政府任命经理进行“社会”控制的两大优点,同时又可避免官僚作风和垄断。在20世纪30年代这类方案曾经风靡一时,到了《国民经济学》出版的时候,它们已经取得新的正统地位,

782

此后一直延续了半个世纪。⁴¹

一位新理论家、波兰社会主义者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认为,米塞斯的理论需要做些补充,因为正是米塞斯的“有力挑战迫使社会主义者认识到引导社会主义经济资源配置的适当的经济会计体系的重要性。”于是,兰格提议“应该为米塞斯教授立一座雕像,放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央计划局大厅的一个显赫位置”。⁴²

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雅量采纳这一建议,不过弗罗茨瓦夫大学(University of Wroclav)树立了一座奥斯卡·兰格的雕像,一直保存至今,显然是为了纪念他的不朽建言。一代代学生被教导说,社会主义至少在理论上是一种可行的经济体制;有些作者甚至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主张(有了统计学在手)东欧的苏式经济优于或者很快就会优于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⁴³这一观念到1989年就销声匿迹了。⁴⁴柏林墙的倒塌让每个人认识到了严酷的现实:七十年的社会主义,唯一成就只是制造了苦难、污染和奴役。历尽千辛万苦,这个世界终于认识到它在1922年本来可以通过一本现成著作认识到的东西。在《社会主义》中,米塞斯分析了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甚至早在所有社会主义学者想到之前。而且他也已经看出这种想法的阿喀琉斯之踵:道德风险。

虚拟市场导致经理不负责任。成功经营的某些收益仍然是私有的(成功的管理人员可以获得较高声望和职位晋升),但是经营不善的所有成本都由全体公民承担。因此,这个国家的经理阶层将会采取过于冒险的决策;他们将会浪费社会的资本。十八年后,在《国民经济学》中,米塞斯不失时机地反讽说,按照这项建议,市场经济是如此之坏,以至于新的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后,不得不立刻就从后门把它重新偷运进来。他接着严厉谴责虚拟市场的支持者目光短浅。资源配置问题主要不是每个工厂内部的管理问题,它是关于可用资本应该投在何处的问题。现有的工厂,哪些应该扩张,哪些应该削减,哪些地点应该建设新的工厂——这些决策是由“资本家、企业家和投机者”做出。虚拟市场的方案绝不可能延伸到他们身上。沿着这个方向,米塞斯在《社会主义》中重述了关于道德风险的分析,他认为“扮演资本家”的想法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对于虚拟资本家来说,无论多高的风险都不为高,因为他们自己几乎不用承担任何负面后果。这样一个体制既非社会主义也非资本主义,它根本什么体制也不是,“它将是一团混乱”。⁴⁵

接着他转向第四方案,根据这一方案,社会主义社会应该运用数理经济学方程式解决经济计算问题。在此,米塞斯重述了自己在1938年一篇同名法语文章中提出的论据:数理方程描述了一种已经处于均衡的事态,但却不是达到任何一个均衡

的具体步骤。

设想我们可以利用尚未达到均衡的经济数据,计算均衡状态,这是一个错误。相信行为主体为了今天的经济计算需要知道均衡状态下将会存在的评价和估量,又是一个错误。⁴⁶

785

他接着总结说,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问题,认清这点,就没必要讨论帕累托和哈耶克提出的关于中央计划的实际问题了。

纯粹现金余额方法

米塞斯的研究始于1912年论货币的著作,至《国民经济学》和《人的行为》而臻于大成。在某些关键地方,他对早期货币理论做了根本性的改进。《国民经济学》的作者是一个比《货币与信用原理》作者更好的货币理论家。在其自传体回忆录中,米塞斯的说法稍有不同。他只是说,他的40年代的著作“完成”了早期整合边际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的计划。⁴⁷一些年后,他以一个更加刺耳的说法“错误表述”概括早年著作的缺陷。在一封德语信件中,他说:

如果脱离市场现象的总体背景,单独处理货币问题,你就不可避免地会误入歧途。我自己对此深有体会。市场过程是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我们不能把它分为片段。我的货币理论直至《人的行为》才达到成熟。⁴⁸

这一成熟理论的基础涉及现金余额方法的极端重要性。现金余额方法可以基于完整的人的行为解释货币价格,而非通过诸如货币“流通速率”这样的机械隐喻。⁴⁹现在,米塞斯强调真正的货币需求其实是现金余额需求。现金余额的价值并不只是来自它们可以用来交换的财货的价值。⁵⁰它们提供了流动购买力,因而具有独立的价值。⁵¹

786

关于货币供给扩张的益处,米塞斯的态度也更加激进。他在《货币与信用原理》中认为,为了适应更大的产出,至少在某些说得过去的情况下,可能需要相应的货币扩张。1940年后,他断然拒绝了这一观念。如今对他来说,货币扩张所能带来的一切利益,都是极为短视的。它们没有系统的正面影响,恰恰相反,只有负面效应。

注 释

1. 米塞斯致弗朗索瓦·佩鲁,信件标注日期为1946年9月28日;Grove City Archive; Perroux file。

2.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9; Scholar's edition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98]),此书和《国民经济学》(Geneva: Editions Union, 1940)在整体结构上几乎是一样的。虽然两者也有少量实质区别,但与它们和同类著作之间的巨大反差相比,就不算什么了。本章我们还将尽可能引用《人的行为》。在《人的行为》中,米塞斯极为强调对实证主义的反驳,而在《国民经济学》里,他主要反驳了施潘和马克思。不仅如此,《人的行为》还加入了一章关于一般概率理论的讨论,并将《国民经济学》的“结论”扩充为《人的行为》更加全面的第七篇,这一篇讨论了行为学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他很早就考虑要出一本美国版,准备修改文本以适合美国读者的特殊背景。参见米塞斯致马克卢普,信件标注日期为1938年12月18日、1939年6月15日和1940年1月30日;Hoover Institution; Machlup-Mises correspondence file。

3. 米塞斯致欧内斯特·安东尼(Ernest Anthony),信件标注日期1953年6月19日;Grove City Archive; Anthony file。

4. 米塞斯致波夫,信件标注日期为1957年5月13日;Grove City Archive; Ballvé files。

5. 这一重点反过来又表明了《基本问题》对《国民经济学》思想发展的关键作用。

6. 注意一个细微之处:认识论的讨论置于行为定义之后,因为科学和认识论本身就是一种行为。另外一个细微之处:在《人的行为》中,米塞斯采纳了实践主义(pragmatist)的真理论定义(“在实践中有效的”),并在后来的全部著作中坚持了这一定义。

7. Carl Menger, *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Vienna: Braumüller, 1871), p. vii.

8. Mises, *Nationalökonomie*, chap. 5, sect. I.

9. 在《社会主义》(*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1)中,这个理论不是在第一部分提出的(第一部分探讨了基本原理),而是在讨论社会主义秩序具体问题的后续部分。

10. 哈伯勒致戴维森,信件标注日期为1945年1月23日;Yale University Press Archive。

11. 默里·罗斯巴德后来指出,仅仅根据人们在不同的可能选项之间进行排序这一事实,就可得出需求曲线必然向下倾斜的结论。参见Murray N. Rothbard, *Man, Economy, and State*, 3rd ed.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93), chap. 2。米塞斯没有这样的推论。他对图形方法在严格分析中的应用是持怀疑态度的(不过他确实接受图形方法作为一种教学手段)。

12. Mises, *Human Action*, p. 270.

13. Ibid., p. 324.

14. Ibid., pp. 328f.

15. 以后他将讨论,经济人假设对现代经济学来说是不切题的,参见 *Human Action*, pp. 62ff。他得出结论说:“关于商品价格、工资率和利率的科学定理,仅仅涉及这些现象本身而

无关乎促使人们决定买卖或者放弃买卖的具体动机。”(p. 64)

16. Ibid., p. 325.

17. Ibid., pp. 245ff.

18. 例如, Ibid., p. 647。

19. Ibid., p. 146.

20. Ibid., p. 147. 几年后约瑟夫·熊彼特指出,古典经济学家的社会分析有着中古经院学者的思想根源。圣托马斯·阿奎那及其追随者已经开创了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传统和对于社会体制功效主义的理解。相反,神圣法则和全能政府则是新教的发明。参见 Joseph A.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art 2, chap. 2, pp. 91–93。

21. Ibid., p. 145.

22. Ibid., p. 145.

23. Ibid., p. 147.

24. “市场是一种民主制度,那里的每一便士都会为你带来投票的权利。”Frank A. Fetter, *The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New York: The Century Co., 1905), p. 395. 几页之后他又声称:“因此,每个人都在衡量所有其他人的服务,而所有人也在评价每一个人。它是价值评判的民主体制。”(p. 410)

25. Joseph A. Schumpeter, *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Munich: Duncker & Humblot, 1911).

26. 在《人的行为》中,他称之为“均匀轮转经济”(evenly rotating economy), pp. 246–47。

27. 米塞斯致一位未知的通信者,信件标注日期为1930年11月24日;Mises Archive 66: 14。

28. 他在1936—1937年冬季学期开始讲授资本和资本相关问题。参见米塞斯致马克卢普,信件标注日期为1937年2月15日;Hoover Institution: Machlup-Mises correspondence file。至此,米塞斯一定已经想清楚了这些问题。

29. Menger, *Grundsätze*, pp. 133ff.

30. Eugen von Böhm-Bawerk, *Capital and Interest* (South Holland, Ill.: Libertarian Press, 1959), p. 265; 重点为原文所有。另见 Böhm-Bawerk, *Positive Theorie des Kapitals* (Innsbruck, 1889), p. 327, and Böhm-Bawerk, *Capital and Interest*, p. 259.

31. 参见 Frank A. Fetter, *Economic Principles*, 2 vols. (New York: The Century Co., 1915); idem, *Capital, Interest, and Rent*, Murray N. Rothbard, ed. (Kansas City: Sheed Andrews and McMeel, 1977).

32. Böhm-Bawerk, *Positive Theorie des Kapitals* (Jena: Gustav Fischer, 1921), pp. 328ff.

33. Mises, *Nationalökonomie*, pp. 439ff.; *Human Action*, pp. 485ff. 米塞斯还批评庞巴维克未能提出一种关于生产时期的真正行为学的理论。

34. Böhm-Bawerk, *Positive Theorie des Kapitals*, p. 327.

35. 欧文·费雪和弗兰克·费特都不认为这是对的;他们甚至提出时间偏好可以是负的。参见 Irving Fisher, *The Rate of Interest* (New York: Macmillan), p. 184; 以及 Frank A.

Fetter, "Interest, Theories: Old and New,"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14): 238f.; idem *Economic Principles*, 2 vols. (New York: The Century Co., 1915), p. 237。

36. 米塞斯致罗伯特·弗莱明(Robert Fleming),信件标注日期为1969年5月13日; Grove City Archive: "F" file。

37. Mises, *Nationalökonomie*, pp. 443f. 他在此处引述了 Fetter,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p. 144, 以及 Franz Cuhel, *Zur Lehre von den Bedürfnissen* (Innsbruck: Wagner, 1907), p. 304。关于这一论证的早期表述,参见 Mises, *Grundprobleme* (Jena: Gustav Fischer, 1933), pp. 23f。

38. Mises, *Nationalökonomie*, p. 446; *Human Action*, p. 483。

39. Mises, *Nationalökonomie*, p. 502。

40. *Ibid.*, pp. 502 - 10. 米塞斯强调,繁荣不是“过度投资”问题,而是资源错误配置。过度消费和过度投资是同时发生的现象。

41. 特别参见 Fred Taylor, "The Guidance of Production in a Socialist Stat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 (1929); Carl Landauer, *Planwirtschaft und Verkehrswirtschaft*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31); H. D. Dickinson, "Price Formation in a Socialist Community," *Economic Journal* 43 (1933); A. P. Lerner, "Economic Theory and Socialist Econom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 (1934); Oskar Lange,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 no. 1 (October 1936); idem, "The Computer and the Marke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 no. 1 (October 1936); idem, *Price Flexibility and Employment* (Bloomington, Ind.: Principia Press, 1944)。

42. Oskar Lange in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B. E. Lippincott, ed. (New York: McGraw-Hill, 1964), p. 57。

43. 特别参见战后一些年间西方最重要的教科书,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New York: McGraw-Hill, 1948)的各种版本。直到苏联帝国解体之前发行的最后一版,萨缪尔森仍然认为:“苏联经济已经证明,与许多怀疑论者早期曾经相信的相反,社会主义命令经济完全可以运作甚至充满活力。”(*Economics*, 13th ed., 1989, p. 837)关于这一问题的出色研究,参见 Mark Skousen, "The Perseverance of Paul Samuelson's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 no. 2 (Spring 1997): 137 - 52。

44. 在实践中,市场社会主义在东方阵营从未发挥重大作用。某些知识分子曾获允许讨论经济计算问题和市场—社会主义解决方案;特别参见 Wlodzimierz Brus, *Funktionsprobleme der sozialistischen Wirtschaft*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61] 1971)。但就实际情形而言,只有中央计划,而没有任何形式的价格竞争。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60年代早期,叶夫谢·G. 利伯曼(Yevsey G. Liberman)提议利用价格激励引导生产,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一个简要的介绍,参见 Alec Nove, "The Liberman Proposals," *Journal of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47 (April 1963): 112 - 18。显然,利伯曼没有提及,更不要说解决米塞斯在1922年指出的那些问题。米塞斯本人评论了这些经济计划的最新时尚,参见他的"Observations on the Russian Reform Movement," *The Freeman* 16, no. 5 (May 1966): 23 - 29。

45. Mises, *Nationalökonomie*, pp. 639f。

46. *Ibid.*, p. 645。

47. Mises, *Erinnerungen* (Stuttgart: Gustav Fischer Verlag, 1978), p. 74; *Notes and Recollections* (Spring Mills, Penn.: Libertarian Press, 1978), p. 112.

48. 米塞斯致汉斯·赫尔维西(Hans Hellwig),信件标注日期为1958年4月10日; Grove City Archive: Hellwig file。

49. Mises, *Nationalökonomie*, pp. 361-65; *Human Action*, pp. 395-402.

50. 这是他所支持的观点,至少在某个关键段落,参见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London: Jonathan Cape, 1934;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0)。参见我们在第六章的讨论。

51. 后来的理论已经包含在《货币与信用原理》第一版中,但却与其他相反观点的陈述夹杂在一起。米塞斯提出的货币需求现金余额方法最初来自门格尔的文章“Geld,”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1st to 3rd eds. (Jena: Gustav Fischer, 1891-1909), chap. 14。米塞斯重新思考这个问题的一个可能来源是埃德温·坎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出版的一本小书。参见 Edwin Cannan, *Money: Its Connexion with Rising and Falling Prices* (London: King & Son, 1918)。在1942年墨西哥市系列演讲中,米塞斯强调个人对货币的需求事实上等同于个人的现金存量,并向听众提到了坎南著作的第83页。参见演讲笔记, Grove City Archive: Mexico 1942 files。

第六部分

米塞斯在美国



米塞斯知道,自己在美国很难获得一个合适的职位。幸运的是,他并不清楚那有多难。实证主义,或他所谓的泛物理主义(pan-physicalism),已经主宰美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长达二十年之久。而在此时,他已经与实证主义彻底分道扬镳了。就在他抵达美国海岸时,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其他一些基金会正在下拨大笔款项用于推动实证主义的发展。因此,他的政治观点当然也就变得非常过时。这片自由的土地曾是激进自由放任主义政策的摇篮,但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开国元勋当年确立起来的原则,到了1940年已经名存实亡。几年后,一位记者概括了当时的形势:

有些作家,至今仍有无数读者记得他们,阅读他们的作品,例如狄更斯、卡莱尔、柯勒律治、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夏洛蒂·勃朗特、拜伦、胡德(《衬衫之歌》)(*Hood The Song of the Shirt*)、伊丽莎白·芭蕾特·布朗宁(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等等。然而,亚当·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麦卡洛克(McCulloch)和穆勒的著作,却只有学者才会翻开。¹

那个时代的美国知识界具有强烈的反资本主义倾向。像米塞斯这样的人要如何才能够融入这样的环境?

790

抵达纽约

1940年8月3日,米塞斯搭乘的邮轮停靠在了纽约市码头。他曾在1931年大萧条期间来过这里,出席了国际商会的会议。从那以后,直到此刻,米塞斯还是第一次踏足纽约。当年他的身份是杰出的经济学家。如今他几乎两手空空来到纽约。他已经五十八岁,不得不重新开始人生。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岁月即将开始。

弗里德里希·翁格尔(Friedrich Unger)为米塞斯夫妇预订了房间,而阿尔弗雷德·许茨则亲自到码头迎接他们。他们见到许茨后的快乐很短暂。许茨身负一个

令人不快的任务,就是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务长罗伯特·卡尔金斯(Robert Calkins)的一封信转交给米塞斯。卡尔金斯在信中告知米塞斯,学校没有预算来雇用他,倒是可以筹措一些经费作为定期津贴提供给他,不过数额不会太多。因此卡尔金斯表示,如果米塞斯选择其他地方更有吸引力的职位,他是可以理解的。²几天后,伯克利的霍华德·埃利斯(Howard Ellis)来信感谢米塞斯寄赠了《国民经济学》一书,并祝他好运。与伯克利的来往就是这些了。

791 马克卢普从加利福尼亚写信给他,说在那儿见到了卡尔金斯教务长,他还建议米塞斯与洛克菲勒基金会联系,争取一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职。此前基金会已经通过设立联合教席的方式资助了许多流亡学者,帮助他们渡过难关。马克卢普相信,这次也不会有问题。因此,米塞斯向基金会的的朋友提出了这项请求,他们在8月15日给他亮了绿灯。现在剩下的问题必须依靠马克卢普解决。但是让米塞斯大失所望的是,这次尝试还是以失败告终。

现在该怎么办?路德维希和玛吉特决定暂时留在纽约。就在这里,很多与他们处境类似的欧洲朋友和熟人也都找到了容身之所。他们已经在间旅馆寻到了合适的住处。接下来的一步特别困难:寻找新的收入来源。伯克利的工作没了,在欧洲的大部分资产也被冻结,这时米塞斯都能数得出所剩的钱够他们支持多少日子。他希望在纽约或别的地方找到一份大学教职,但对经济学家来说,当时的就业市场并不太好。几年后,《军人权利法案》(the G. I. Bill)将在学院和大学里创造出大量新的教授职位,但在1940年,只有很少的全职教职。的确,联邦政府已经开始雇用经济学家来为罗斯福新政机构例如国家资源规划委员会(National Resources Planning Board)服务。另外,1941年12月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有许多经济学家接受了联邦政府的聘用。³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米塞斯在祖国奥地利已经发现自己不适合担任政府公职。那时他作为干预主义反对者的声誉还没那么声名狼藉。不妨想象一下,如果米塞斯进了美国物价管理局(the U. S. 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或者在年轻的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手下做事,又或者在哥伦比亚大学统计研究小组(Statistical Research Group)与米尔顿·弗里德曼一起计算弗里德曼刚刚发明的预扣税(withholding tax)的技术细节,会是怎样的情景。⁴许多欧洲流亡者——包括很多米塞斯的学生和朋友例如弗里茨·马克卢普、奥斯卡·摩根斯特恩和亚伯拉罕·瓦尔德——进了战时政府机构。但是米塞斯只能寻找私立机构的机会,否则无处可去。⁵

792 然而,进入经济学家的自由市场是需要时间的,他已经没有时间了。作为一名理论家,他的确享有极高的国际声誉,但他缺乏美国经济环境的实践经验,而且,他

快五十九岁了。⁶

无论如何,他必须找到一份工作。他动用过去的社会关系帮他在纽约各种机构安排演讲。比如,11月7日,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金融研讨会(Banking Seminar of Columbia University's School of Business)上针对“欧洲的战后重建”(Post-War Reconstruction of Europe)问题做了一场演讲。⁷两周后,他在纽约大学经济学系做了一场演讲,介绍他对经济理论的贡献。12月9日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做了一场演讲,年底参加了美国经济学会在新奥尔良举办的会议。⁸然后,1941年2月11日,他在曼哈顿华尔道夫饭店(Waldorf-Astoria hotel)的鸚鵡套房(Perroquet Suite)为一个非常排外的组织——美国会计师俱乐部(Accountants Club of America)做了一场演讲。这次演讲的邀请是由纽约大学商学院院长约翰·T·马登(John T. Madden)发出的,他告诉米塞斯,这是俱乐部第一次同意为讲座支付酬金(50美元)。演讲的主题是战后欧洲的经济状况。这个俱乐部似乎不是那么在乎学院经济学家,因为它在宣传演讲的广告中指出:米塞斯“虽然[!]位列世界顶尖经济学家之一,却以他的实践观点和能使外行理解的表达方式而闻名。”⁹听众的反应一如往常。一位听众回忆说,那场演讲是“我听过的所有演讲中,思路最清晰,逻辑最合理,分析最发人深省的一场”,会后他又安排了和米塞斯的一次会面,继续讨论那个话题。¹⁰

793

794

其他讲座也很出色。¹¹这位来自维也纳的精力充沛的知识分子给听众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但他的公开露面并没有带来任何类似合约的东西。当时的形势让人绝望。尽管如此,这些活动也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就是使他在志趣相投的知识分子和商人中的知名度提高了不少。

当然,米塞斯也寻求与意识形态上的盟友和潜在盟友建立直接联系。关于这点,最重要的例子是亨利·黑兹利特(1894—1993)。几年前他曾写过一篇赞美《社会主义》的书评,称米塞斯“写出了我们时代的一部经济学经典”。¹²黑兹利特后来回忆他们在纽约相遇的过程:

1940年的一天,我接到了电话。电话那头的人说:“我是米塞斯。”正如我后来告诉很多朋友的那样,这就好像是有人打电话来说“我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我称米塞斯为“经典作家”,而你不会想到一位经典作家会打电话给你!总之,这个电话让我们相识。¹³

那是1940年的8月。黑兹利特在《泰晤士报》(Times)拥有一个专栏,几个月

后他引荐了米塞斯。

795

黑兹利特很可能是米塞斯的第一位美国密友。本杰明·安德森已经去了伯克利,塞利格曼(Seligman)也已于1939年去世。来到新世界的头几年,米塞斯的社交生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旧世界的朋友和熟人。此时欧洲的抵抗精英纷纷来到美国大西洋沿岸,以熬过那段战争岁月,曼哈顿成了他们的联系纽带。由于在纳粹统治下没有安全保障,许多政治家、学者、艺术家、企业家和银行家选择了纽约作为避风港。¹⁴当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中产阶级或上层人士,而且很多是犹太人。路德维希和玛吉特发现居然有那么多的朋友、同僚、学生甚至亲戚已经通过各种途径来到曼哈顿,当然非常惊奇。比如,翁格尔家、盖林格家、许勒尔家、克莱因家、卡里尔家、菲尔特家、许策家(Schuetzes)、胡拉家、埃里克·沃格林、费利克斯·考夫曼、伊曼纽尔·温特(Emmanuel Winter)、伊曼纽尔·温特尼茨、罗伯特·米歇尔(Robert Michels)、恩格尔-雅诺西(Engel-Janosi),等等。事实上,米塞斯甚至可以继续举办过去的私人研讨会,因为研讨会的所有成员当时都在纽约,甚至他在维也纳的家庭医生也在那里。¹⁵



亨利·黑兹利特和米塞斯

796

但是,还有很多人未能成功逃离欧洲,包括他在维也纳最亲近的一些朋友。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有关他们悲惨命运的消息陆续传到了纽约。埃米尔·佩雷尔斯夫妇在一个德国集中营里离世。¹⁶路德维希·贝特尔海姆-加比永最初与家人隔离,被迫居住在维也纳的一个平民区,后来被驱逐出境,从此杳无音讯。¹⁷维克托·格雷茨在德奥合并之后就去世了,留下妻子埃米孤身一人,她后来设法移民到美

国。¹⁸埃瓦尔德·普里布拉姆夫妇由于无法离开比利时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¹⁹

那时仍然没有玛吉特的女儿吉塔的消息,几个月来,米塞斯夫妇一直非常担心她的状况。直到1941年4月,他们才得知,吉塔在路易·鲁吉耶继子的公司里,很安全,并且已经出发前往美国。那时,玛吉特的母亲也已经在纽约了。²⁰

米塞斯和奥地利的政治流亡者也建立了联系。经过一年左右的流亡,他更正式地参与了各种奥地利流亡组织的工作,这些组织在美国1941年12月参战后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从一开始,就常有人向他求助,其中有朋友、熟人,也有一些只是间接认识的人。他们大都是一些没有欧洲履历的学生或雇员。米塞斯很耐心地写了一些推荐信和课堂签到证明,而在很多时候,这确实能够帮助他们得到一份工作。²¹他也不厌其烦地写了不少表示支持的信件,并通过其他方式帮助那些尚未抵达美国避风港的人。²²

797

马克卢普等人为米塞斯写的信并没有带来理想的结果。米塞斯一定开始羡慕哈耶克了,他从伦敦寄来的信中,只提了一些日常琐事,类似下面的内容:

过去一周,德国飞机造成了很多不便,而且当然,我们还有很小的概率会被偏航的飞弹击中,尽管如此,大家很快就适应了,正常的生活没有受到影响。我们很好,我也照常进行工作。如果事态没有太大变动,那就没有理由不继续这些工作。²³

米塞斯当然也有勇气在流弹袭击的环境中生活,但他不能一直没有收入,而那时他的积蓄快要用光了。他在英国有一些存款,是他的著作销售所得,这些存款可以支撑几周或几个月的生活。哈耶克管理着米塞斯在英国的银行账户,但是战时外汇管制使他没有办法把这些资金转出英国,而且过不了多久,可能连从这个账户取钱都不可能了。不过出口商品是行得通的,所以哈耶克做起了书商生意。他从米塞斯的银行账户取出现金,用于购买珍贵书籍——其中包括《国富论》的初版和两套杰里米·边沁的著作全集,然后通过哈佛大学的哈伯勒转寄给米塞斯。这样的办法在平时很没效率,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却是把钱转到国外的唯一方法。²⁴

798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社会研究新学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已经接收了很多来自中

欧的社会科学家,甚至包括米塞斯的一些同事,例如里夏德·许勒尔。可是米塞斯始终没有获得聘约。1940年8月,哈耶克得到一次邀请,但他拒绝了,因为他不愿离开伦敦经济学院的同事。²⁵

799 最终,洛克菲勒基金会再次出面资助了米塞斯。当时基金会社科部门的主管是约瑟夫·H.威利茨(Joseph H. Willits),他签了一份合约,拨给国家经济研究局2500美元,条件是从1940年12月5日起研究局正式录用米塞斯一年。²⁶这份薪酬不及米塞斯在日内瓦薪水的三分之一,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对米塞斯而言已经是雪中送炭了。²⁷

米塞斯与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其他经济学家的交流很少。他在研究局举办了一个研讨会,但是运转状况不佳。他在给哈耶克的信里这样写道:

我的研讨会还在继续。上周M.和L.来参加了一次。我想,他们大概会觉得这研讨会的水准比起维也纳时期差了很多。不过任何事情都有个过程。²⁸

然而事后看来,他似乎不太有时间建立一个类似在维也纳时那样拥有固定成员的团体。所有参与研讨会的学生,很快就进入了政府部门的岗位——联邦政府在战争年间迅速壮大,全国成千上万的年轻毕业生成了政府的雇员。²⁹

800 在国家经济研究局任职的第一年,米塞斯仍用德文写作,而他的同事几乎没人能读德文。他当时肯定设想有朝一日回到欧洲,恢复学术职位。但这愿望有实现的可能吗?这大概是他刚抵达美国时的计划和希望,然而经历了1941年,这个前景变得越发渺茫。

他的著作陆续翻译成了英文。当时负责出版事宜的研究局主管,一位名叫马沙·安德森(Martha Anderson)的人,也在设法为他的一本书稿寻找译者——那部书稿大概是后来出版的《全能政府》的原始德文手稿。1941年11月,安德森推荐马克斯·伊斯门(Max Eastman)担任此项任务。伊斯门是纽约的记者,曾翻译过《资本论》。米塞斯回复说他想见见伊斯门,很有可能1942年3月登门拜访了他,但是最终未能建立学术合作。

黑暗时期和新的计划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薪酬根本不够负担米塞斯一家的生活开支,而在1941年,

这几乎是他们的全部收入。他从未体验过这样的困境。他们一家虽然从来不算大富大贵,但也一直过得十分舒适,而且总能得到家族的帮扶。可是现在,他们几乎连去餐馆饱餐一顿,或看一场电影和歌剧的钱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玛吉特开始学习文秘工作的相关技能。

更加让人沮丧的,是那些坚持抵抗国际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自由国家自身的意识形态问题。米塞斯上次访问美国是在1931年,当时主张革新的干预主义的呼声已经空前高涨,从那以后,事态变得愈加糟糕。罗斯福新政的那些年间,801 报界和各种讲坛上所宣扬的政治福音更进一步转向了左翼。此时,苏联享有极高的国际声誉,共产主义方案也得到了严肃地讨论,自由市场反倒成了落后经济秩序的返祖现象。英国和美国堕入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或两者的某种变体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就是人们不惜牺牲生命为之奋斗的未来吗?如果未来没有希望,那么现在所做的一切是否值得?除了零星的几位勇士,例如亨利·黑兹利特和劳伦斯·费尔蒂希(Lawrence Fertig),不同的声音何在?那些敢于对抗凯恩斯主义诱惑——中央集权理想的化身——的经济学家何在?米塞斯的那些门徒,如今就像他们的流亡身份一样朝不保夕,他们又能坚持多久?

米塞斯一定曾向哈耶克吐露自己的绝望情绪。哈耶克向他保证说“不用担心我会转向凯恩斯主义”,虽然哈耶克的前途看上去也黯淡无光。

你提到英国和美国的经济思想状况非常恶劣,我完全认同你的判断。此时此刻,我们至少还能怀抱对于不远将来的某种希望,可是长期而言,前景却是一片黑暗,这感觉实在可怕。³⁰

米塞斯并不认为自己有能力扭转这一潮流。当时他的职业生涯正处于严重衰退之中。802 他的思想完全不符合当时美国学术界的主流观念,而他也没有办法影响公众舆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著作之所以无法赢得大量读者,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美国出版商几乎总是迎合主流思想出书。他是资本主义最伟大的拥护者,但却无法让大众听到他的声音,因为在一个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的世界,他的著作看来没有太大利润,无法赢得商业出版社的支持。他在给哈耶克的信中写道:

最近这几个月,我都在忙着撰写我的遗作。我觉得自己除了能在期刊上发表一些小短文外,根本出版不了什么作品。³¹

803

1941年4月,米塞斯坠入了整个一生的绝对低谷。玛吉特从三月初起就被流感和一些窦类疾病困扰,病痛甚至使她无法坚持每天撰写日记。米塞斯从不轻易表露自己情绪,但他在给哈耶克的信中写道:“玛吉特还没完全康复。接踵而来的困境好像没个尽头。”³²玛吉特还在担心女儿的情况,无法打起精神好好生活。这样,米塞斯的整个生活充满了悲伤和忧虑。当初离开瑞士的原因是他不愿依附于瑞士政府单方的善意。但是到了美国,情况也没有变得更好。他从事研究的资金来源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光是这点就能说明他的处境。那个时期,左翼极端分子和虚构的数量经济学的狂热崇拜者获得了社会研究新学院待遇丰厚的合同,而米塞斯的全部收入仅相当于一位博士后的津贴数目。甚至有人向他暗示,哪怕这点报酬也不意味着他对经济科学有所贡献,只是这个社会为一位很难靠自己力量生存下去的老人所提供的福利而已。

米塞斯不是那么重视物质财富的人。他曾经告诉过玛吉特,如果她希望变得富有,那么她嫁错人了。不过他也不是安·兰德(Ayn Rand)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中所描述的那种知识分子:崇尚自由至上主义的哲学家,在悲惨的境地中,毅然放弃大学职位,屈就在一个小镇上的汉堡店工作。要是米塞斯真的遭遇那样的命运,他肯定会伤心的。而且,如果米塞斯被迫放弃脑力劳动,经济学将怎样发展,奥地利学派将遭遇何种命运,人类的自由之路又将走向何方?那时,他甚至还没出版过任何一篇用英文写成的论著。他还没有遇到后来那批声名鹊起的美国学生。米塞斯已经把一篇革命性的经济学著作留给这个世界,可惜在战争中没有人能读懂它,在战后也没有人留意到它。也许米塞斯已经在经济思想史中占据了重要一席,可是奥地利学派的自由放任一支却似乎没有机会形成了。

* * *

这段黑暗时期也不是完全没有好事发生,尽管最初似乎不是那么靠谱。亨利·黑兹利特为米塞斯和《纽约时报》牵了线。1941年,米塞斯写下了他的第一篇社论。³³

804

1941年5月,米塞斯参加了一个与美籍奥地利人联盟(Austrian-American League)关系密切的团体的聚会。这个团体的成员包括:迪特里希·冯·希尔德布兰德(Dietrich von Hildebrand)、里夏德·冯·许勒尔、拉乌尔·奥恩海默(Raoul Auernheimer)、埃里希·胡拉(Erich Hula)以及奥托·卡里尔(尼伦施泰因)(Otto Kallir [Nirenstein])。联盟的挂名负责人是冯·希尔德布兰德,但实际推动者是书

记——奥托·卡里尔,正是他促使米塞斯加入了联盟。1941年6月,米塞斯和其他团体成员组建了奥地利委员会,以促成战后奥地利独立。显然,领导权在里夏德·冯·许勒尔手里。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都不赞成在奥地利重建君主制。光是这点就已经从根本上阻碍了委员会和那些信仰共和主义的海外流亡者的合作,特别是社会民主党人。³⁴他们仍然无法认同奥地利独立这一基本原则。他们仍然赞同旧的德奥合并计划——只是这次没有希特勒而已。³⁵

制定战后重建计划仍然是米塞斯工作的重心。1941年5月20日,米塞斯向杨格报告了自己研究项目取得的重大进展——这是一项关于中欧和东欧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米塞斯希望研究成果可以成为这个地区战后重建的参考依据。他表示很快就会开始撰写研究报告,而到7月中旬的时候,他一定已经完成了研究报告并把副本寄给朋友和同事了。在这份长达43页的备忘录中,米塞斯重申了拥有强大中央政府的东欧联盟(East-European Union)所应采取的政治、经济举措:通过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积极回应语言少数民族群(linguistic minorities)的问题,以及针对三个强大的邻国采取的自我保护措施。³⁶

805

在5月底完成的另一份报告中,他指出自己的东方联盟(Eastern Union)计划可以补充建立西方联盟(Western Union)的类似构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终成立了这类政治集团(西方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和东方的华沙公约组织[Warsaw Pact]),而这一建立政治集团的思路,比起两次大战间的国际联盟方案前景更加光明,因为后者只提供了“一个办事处和官僚机构——由于和平意识形态的匮乏”。³⁷

* * *

1941年的秋末,米塞斯遇到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当时他与蒙特斯·德奥卡先生(Señor Montes de Oca)偶然重逢。蒙特斯·德奥卡是墨西哥财政部的一名高官,也是国际银行的执行总裁。米塞斯是在为国际商会工作的那段日子与他相识的。路易斯·蒙特斯·德奥卡(Luis Montes de Oca)是位精明务实的商人,也很欣赏米塞斯的著作。早在1937年或1938年的时候,蒙特斯·德奥卡就曾邀请米塞斯前往墨西哥举办系列演讲,但是米塞斯没有接受。能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重逢于曼哈顿,两人倍感惊喜。蒙特斯·德奥卡一见到米塞斯,就重提了他曾经发出的邀请:到墨西哥访问两个月。³⁸这个邀请是近一年半来米塞斯第一次得到肯定自己的讯息。米塞斯很高兴,而玛吉特看到丈夫的心情愉快,也很开心。

806

米塞斯和蒙特斯·德奥卡还讨论了把米塞斯《社会主义》译成西班牙语的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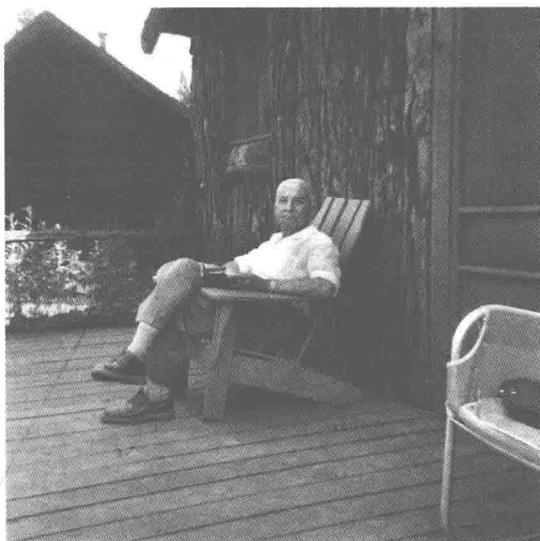
807 划。米塞斯称赞此书法语版准确的语言表达和文字风格,于是蒙特斯·德奥卡提议由他本人以法语版为基础,将此书译成西班牙语(蒙特斯·德奥卡不懂德语)。他还提出了西班牙语版具体的版权费:200美元——相当于那时候米塞斯一个月的工资。这些都是好消息,等他的这位墨西哥朋友一离开,米塞斯就着手为计划安排的墨西哥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Mexico)之行制定课程大纲了。他打算用英语举办八场讲座,主题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另外再用法语举办一场讲座,主题是金本位制和管理通货;还计划开两次研讨会,一次探讨货币与金融,另一次探讨“经济和社会学说在当今政治争议中扮演的角色”。6月12日,他把这些课程设计寄给了蒙特斯·德奥卡。³⁹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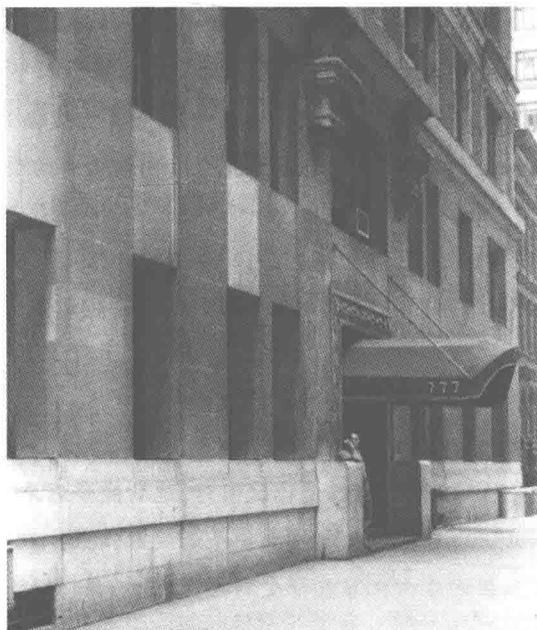
808 过了几周,路德维希和玛吉特离开曼哈顿,前往新罕布什尔州的白山山脉(White Mountains),他们将在那里度过一个悠长假期。他们7月16日乘火车出发,当天就到达了目的地:新罕布什尔州戈勒姆镇(Gorham)的格伦民宿(Glen House),坐落在华盛顿山山脚。华盛顿山是美国东北地区的最高峰。那段日子,他们几乎每天都去山里远足。⁴⁰虽然华盛顿山向来游人众多,不过只要路德维希和玛吉特远离大道,身边就几乎没有别人了。⁴¹白山山脉的景致勾起了他们对阿尔卑斯山的记忆——在欧洲时,米塞斯每年都会去阿尔卑斯山待一个月。这里的环境堪比当年,非常适合他在这里休养生息。咄咄逼人的岩石、冰凉的空气和宽阔的视野,在这一派风和日丽之中,大自然的壮美威严矗立在天地之间。眺望壮阔景致的同时,米塞斯的脑海中浮现出那些接踵而来的重大事件。站在那里,他再次纵观全局,也看到了自己在局中的位置。大概就是此时,米塞斯下定决心要在美国开启自己的人生新的篇章: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并在美国的土地上继续为自由而战。

米塞斯的足迹遍布海拔6288英尺的华盛顿山。⁴²玛吉特看到丈夫重新焕发活力,内心无比喜悦。他们待在格伦民宿的最后一段日子,传来了更多的好消息——《大西洋宪章》(Atlantic Charter)已于8月14日签署。美国政府似乎最终下定了决心,加入战争支援英国,并致力于创建以自由为基石的战后新秩序。⁴³

809 这次假期正是时候。自从美国加入战争,度假就成了不爱国的表现,因此米塞斯一家取消了此后所有度假计划。回纽约后,米塞斯以焕然一新的旺盛精力,重新投入到工作当中。从此,他的境况开始好转,缓慢而又平稳。10月初,他和玛吉特搬进了一套公寓,余生一直住在这里(公寓服从租金管制条例)。这是玛吉特找到的一套位于曼哈顿西区大街777号的三居室公寓。⁴⁴



米塞斯在白山度假



米塞斯在曼哈顿西区大街 777 号的公寓

为了撰写关于东方民主联盟的提案,米塞斯连续工作了好几周。到 10 月份,他完成了联盟备忘录。其中一份初稿是用英文写的,包含他所设计的东欧政治誓

约。现在,米塞斯的思考转向了美国。他在给哈耶克的信中写道:

我现在开始用英语写作了,因为我不想继续增加遗著的份量。目前我在撰写一部涉及整个“反正统”学说的理论大厦及其后果的批判性著作,我希望能在一一年内完成。

他继续说:

你写的关于“科学的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的系列文章是对西方文明衰退史研究最有价值的贡献。我盼望着你能尽快出版整本书。

然而,我对我们努力的实际效果十分怀疑。尊重理性和常识的时代似乎已经消失。空洞的口号取代了论证和思考。

前些天,阿尔文·汉森做了一场关于战后经济重建的演讲。内容只是一些老生常谈:关于充分就业、外汇稀缺、外汇管制和外汇计划的必要性,以及增强自给自足能力等等。他甚至没有提到资金短缺的问题。他似乎相信通过对富人征税就可以使民众的生活品质维持在战前水平。两个世纪以来,经济学的诸多理论都是徒劳,因为这些理论没有消除重商主义偏见。演讲的听众很多是社会政策协会的前会员,他们表示完全赞同演讲者的观点。⁴⁵

810

正当他们在为墨西哥之行作准备时,另一个消息让米塞斯高兴了整整一天,令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1941年12月8日,由于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美国最终还是参战了。现在老天也救不了希特勒了。几个月后,米塞斯写信给一位在马萨诸塞州当牧师的德国朋友,他在信里写道:

当然,战争是很不幸的。但是你说得对,这场战争避免不了,既然发生了,就只能战斗到底。现在很有必要建立一个新规则,在这个新规则下,那些打破和平的人会像各国的暴力犯罪那样受到惩罚。⁴⁶

米塞斯似乎堕入到了自己在比较冷静的时候所称的独裁情结了。他轻率地假定,“新秩序”下的机构会把他们极大的权力用于施行那些他所认可的举措。⁴⁷

811

美国的参战促使许多奥地利名流加入反抗力量,建立了更多正式组织来为战后奥地利的重建作准备,他们确信战争将以盟军的胜利告终。基于对未来事态的

预期,同时也受到罗斯福和丘吉尔签署的《大西洋宪章》的激励,里夏德·冯·库登霍韦-卡莱吉(Richard von Coudenhove-Kalergi)(奥托·冯·哈布斯堡的亲密盟友)向美国政府提交了一封希望战后奥地利享有独立国家待遇的请愿书。米塞斯和一些流亡在外的奥地利要人一起在这份请愿书上签了名。⁴⁸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奥地利委员会在12月召开了数次会议,讨论应对方案。12月13日一次会后,米塞斯准备了一份仅有一页篇幅的声明,这份声明概述了战后奥地利新的基于个人自由原则的政治秩序。声明可能是当天会议的讨论结果,虽然由米塞斯执笔,却没有署他的名字。不管怎样,这份文件满腔热情地欢迎《大西洋宪章》的签署,并称之为“自由民族共同体的新宪法”,文件还表示希望战后奥地利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根据这份文件中最重要的条款,新奥地利将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尽管如此,国家权力的具体形式(议会民主制、君主制等等)显然还是悬而未决。此外,新奥地利不会坚称自己是“主权”国家,因为强调主权和时代精神不一致,取而代之的是寻求融入东欧联盟或者新的国际联盟。

但是,奥地利委员会只是那个时期相继涌现的诸多类似组织中的一个,米塞斯还是另一个组织——“奥地利行动”(领导者是费迪南德·康特·冯·切尔宁[Ferdinand Count von Czernin])的成员。⁴⁹显然这种情况下,他们无法有效表达奥地利的国家利益,所以各个团体的领袖决定通力合作。1942年2月初,正在墨西哥访问的米塞斯收到了一份电报,邀请他加入新成立的奥地利国家委员会(Austrian National Committee)。电报的署名者是瓦尔特·许士尼格(Walter Schuschnigg)(可能是自由奥地利最后一任总理的一位亲属)和汉斯·罗特(Hans Rott)。⁵⁰米塞斯接受了邀请,但他无法亲自出席在曼哈顿召开的成立大会,只好委托同事埃里希·胡拉代表他出席。⁵¹

812

在墨西哥的六周

这次墨西哥之行(1942年1月底到3月)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主办方向他们表达了最高的敬意,在当地丽兹酒店(Ritz)为他们预订了房间。此外,米塞斯还发现了一批训练有素并能接受他的想法的听众。他从1月14日开始举办讲座,到2月20日完成了计划。除了在经济学院用英语授课外,他还在独立法学院(Independent School of Law)用法语举办了两场讲座。⁵²课程只吸引了8—14个学生,尽管如此,米塞斯还是觉得这是“巨大的成功。听众不多是可想而知的,毕竟大部分学生不懂外语”。⁵³蒙特斯·德奥卡出席了所有讲座,不过,米塞斯和爱德华多·霍

813

内多先生(Señor Eduardo Hornedo)之间的讨论尤其热烈。

814 玛吉特通常待在住处,或在附近活动,晚上路德维希会陪着她,也常带她一起出门。他们也在蒙特斯·德奥卡家里度过了很多个晚上。这些会面中,米塞斯反复表达了自己对未来持有的悲观态度,而墨西哥东道主则始终坚持,现在开始为自由而奋斗并实行正确的经济政策还不算太晚。蒙特斯·德奥卡的确非常坚定地认为,墨西哥就是开始这场斗争的最佳地点。甚至在米塞斯离开纽约之前,蒙特斯·德奥卡就在信中向这位奥地利客人发出了一份工作邀请。墨西哥最重要的三大商业组织中的两个——银行家协会(Bankers' Association)和矿业协会(Chamber of the Mining Industry)聘请米塞斯以经济顾问的身份在墨西哥“多待一段时间”。⁵⁴米塞斯在回信中写道,这份工作“让人受宠若惊并且十分吸引人”,他已经“等不及想要知道他即将任职岗位的具体信息”。⁵⁵六周后,蒙特斯·德奥卡发来了一份明确的工作邀请。根据他的计划,米塞斯会成为这两大商业组织下属经济部门的主管。这两个岗位有充足的人力资源可以调用,还有每月1000墨西哥比索的薪金(丽兹酒店单人份的午餐价值3或4比索)。米塞斯还可以在墨西哥国立大学和墨西哥学院(Colegio de Mexico)的任何院系授课和举办研讨会。他也可以接受其他(带薪)教学职务。合约为期三年,随时可以生效——这意味着墨西哥之行结束后,米塞斯甚至都不需要再回美国了。⁵⁶

这真是个巨大的诱惑。如果这份邀约出现在一年前,米塞斯可能会立刻接受。但他已经有了新的计划。他的未来不是在美国吗?蒙特斯·德奥卡想让米塞斯在回信中提前接受这份工作,但这位奥地利朋友立场非常坚定:作决定之前,要先拜访一下这两个组织。

到达墨西哥市后,他与墨西哥东道主讨论了各个领域的话题。他甚至可以写几句西班牙语了。应这些东道主的请求,米塞斯开始撰写一份备忘录,主要分析墨西哥的经济问题。在接下来的几周,米塞斯仔细阅读了墨西哥的统计年鉴,也熟悉了有关墨西哥情况的其他文献。他以最高的效率阅读报刊资料,同时与东道主和其他人展开讨论。慢慢地,墨西哥的经济图景在他脑海里越来越清晰,后来他在写给哈耶克的信中描述道:⁵⁷

815 墨西哥是一个没有工业、缺少资本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土地都很贫瘠。结果……他们只能进口小麦和玉米(米塞斯指的是美国人所说的“玉米”),但是统治者——将军、工会领袖以及激进知识分子,试图通过无情的资本征收来开启工业化进程。不管是这种态度,还是这种态度带来的后果,都与

其他国家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真正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还是有一批少数精英能够洞察问题的实质,并且努力引导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

米塞斯非常赞赏这批墨西哥精英分子,把他们与英国那些抵制全能政府趋势的“小众经济学家”(按照哈耶克的说法)相提并论。⁵⁸米塞斯在谈到自己的墨西哥东道主时,这样说道:

你在其他国家找不到这样的人。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都提倡全面的计划,这和你在《自然》(Nature)一文中的论点相反。威廉爵士(Sir William)的观点(几天前发表于伦敦《泰晤士报》)引起了所有经济学家、商人和压力集团的同感。他们坚信现在发生的事件已经充分证明了“邮局”系统的优越性。人们没有学到任何教训,他们轻视理论,并用其充满错误和偏见的视角解释事实。⁵⁹

事实表明,墨西哥仍然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而且缺乏理性的力量。路易斯·蒙特斯·德奥卡一定感觉到米塞斯没什么热情打理另一个商会,所以提出了一个新的计划:让米塞斯领导一个研究机构——一个私立的“社会科学研究所”。这个安排才比较符合这位奥地利客人的兴趣。当米塞斯离开时,他答应为蒙特斯·德奥卡的一位朋友管理的杂志《美洲纪要》(*Cuadernos Americanos*)写篇文章,以及一篇关于建立某个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简短备忘录,作为未来计划的基础。1942年6月他回到美国后,就整理了相关资料,写了两篇备忘录:一篇关于此项事业的总体规划,另一篇涉及计划建立的机构在制度层面上更为具体的一些设想。⁶⁰

816

奥地利国家委员会

路德维希和玛吉特于3月份回到纽约。他们收到了马克卢普的来信,得知这次他还是未能在罗彻斯特大学为米塞斯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该校经济学系主任表示,马克卢普“应该为他的行为感到羞愧,竟让米塞斯这样一位杰出的经济学专家来我们这里,接受这样一份薪水微薄的工作”。⁶¹

幸运的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给国家经济研究局的资助得到了延续,尽管显然经过一番周折。基于他在上一年度研究活动的六页篇幅的报告,米塞斯在1941年12月就提出了这项申请。基金会直到2月中旬才批准这项申请,但也可能是因

817

为他的墨西哥之行延缓了这一流程。接下来的几个月,米塞斯积极参与了新成立的奥地利国家委员会的活动。正如他在很多私人场合以及书信中提到的,他对欧洲未来的前景持有非常悲观的态度:

你没有办法和不讲道理的人打交道。我不相信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youth)或意大利、匈牙利等国一些类似组织的成员会改邪归正,从事正当事业或非掠夺性的工作。畜生是没有办法在一两个世代之内被驯化的。⁶²

但米塞斯仍然坚守自己的座右铭,因此,上述情况不能成为放弃抵抗而离开工作的理由。相反,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战后政策的准备之中,并鼓励和自己通信的友人加入他的行列。⁶³

818

奥地利国家委员会是由奥托·冯·哈布斯堡一手创立的,他与美国政府高层关系密切,事实证明,他是众多争斗不休的奥地利爱国群体都能接受的共同人选。战争期间,奥托表现出了出色的外交手腕,最终促成盟国在战后重新建立了独立的奥地利国家(1943年10月和11月,美国、英国和俄国的外交部长在莫斯科召开的一次会议产生了相关决议)。奥托的成功也宣扬了君主制原则。⁶⁴他肯定考虑过要在战后复兴自己的王朝,而且很多忠实追随他的人(也包括那些无处不在的野心家,他们嗅到了政治暴利的气味)都鼓励他实施计划。这些流亡海外的奥地利人圈子通常以“奥托皇帝陛下”表示奥托·冯·哈布斯堡,并称他为“殿下”(Imperial Highness)。后来,尽管奥地利君主制复辟的希望日趋黯淡,不过米塞斯在与哈布斯堡通信时,仍然沿用这一尊称。⁶⁵

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白热化的时期,许多奥地利流亡者断言战后哈布斯堡王朝会重新上台。米塞斯在维也纳大学的前同事海因里希·葛雷夫·冯·德真费尔德(Heinrich Graf von Degenfeld),就是基于正统王权思想坚决拥护君主制复辟的人之一。1942年4月中旬,哈布斯堡向米塞斯和其他一些学者进行了咨询,问题大约有四十个到五十个,主要涉及作为奥地利国家委员会和哈布斯堡王室领袖的哈布斯堡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战略战术问题。米塞斯把这项咨询视为首要任务,一周之内就答复了全部问题。不过哈布斯堡只认可了米塞斯这份秘密报告中的一部分——在这部分,米塞斯论述了王朝复辟取得成功的条件。米塞斯写道,如果君主制是建立在自由的全民公投基础上,那么民族自决和君主制复辟之间就不存在矛盾。

819

这个观点体现了作者所继承的波兰传统。⁶⁶事实上,1573年至1795年的波兰

王国是选举产生的；贵族议会全票通过选出国王。但米塞斯的论据并非来自历史先例。确切地说，他认为只有通过选举产生的王朝才会享有和平。如果仅仅基于正统主义的主张而忽略人民的意愿，这样的统治是无法持久的，因为它很可能遭到人民的反抗，直到最终被推翻。作为替代方式，米塞斯单独呈上了一份备忘录，描述了关于建立一个东方民主联盟的提议。⁶⁷



奥托·冯·哈布斯堡

奥地利国家委员会联合了所有奥地利右派人士，这些右派分子通过委员会与华盛顿特区政治代表建立了联系（一位名叫埃贡·冉斯霍芬-维尔特海玛[Egon Ranshofen-Wertheimer]的人）。这个组织的一次成功之举是动员12名州长一起宣布，将1942年7月25日定为“奥地利日”。而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也声明，美国政府从未承认过希特勒对奥地利的吞并。这是整个战争期间奥地利各派右翼流亡者的共同立场：撇清那些德国坏蛋与奥地利受害者之间的关系。（流亡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从来没有放弃过大德意志方案。）

米塞斯参加了1942年4月22日召开的奥地利国家委员会全体大会。一个月后，他当选为战后重建小组委员会委员。1942年6月，他又加入了一个外交政策委员会，对这个委员会似乎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初的几次会议讨论并起草了一份《联合起来的自由奥地利人宣言》，这是以1941年12月奥地利委员会宣言为基础的。不过，与那份文件不同的是，新的宣言声称奥地利当初是被纳粹军队强制接管的，因此实际上那时国家是处在一支外国军队的控制下。而且，宣言不再强调要融入国际政治联盟，而开始强调主权独立的概念。最重要的是，宣言回避了战后奥地利政府形式的问题。根据较早的宣言，政府的形式应该经由全国人民共同磋商决定，但是新的宣言没有提及这一问题，因为米塞斯的前同事德真费尔德伯爵领导下的君主制拥护者希望为未来君主立宪的奥地利保留一个正统主义的思想基础。⁶⁸

暂时来说，这种妥协对米塞斯和其他共和主义者已是很好的结果。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就某些事项达成了一致，这就构成了继续讨论其他问题的基础。米塞斯在一篇《行动日程》(Aktions-Kalender)中描述了这一议程——米塞斯似乎已经在委员会内部发布了这个进度时间表。根据计划，下一步是与两个奥地利左翼流亡者

团体进行谈判,以获得他们对共同宣言的支持。然后公布结果,继续下一轮的磋商,这次是和捷克人、波兰人以及米塞斯推荐加入东欧联盟的其他国家。最后,还要与银行家以及企业家进行协商,以解决新国家建立之初的资金短缺问题。

821 然而这些都没有实现。显然,米塞斯不再积极奔走于委员会的各种活动了,他甚至没有出席 1942 年 11 月 20 日为纪念奥托·冯·哈布斯堡三十岁生日举办的午宴。在委员会工作的这段时间,他确信自己在欧洲已经没有前途了。旧大陆之所以遭受战争的掠夺蹂躏,正是因为这块大陆已经被国家主义的幻想牢牢抓住了。那些为战后奥地利制定计划的流亡者也同样如此。他们的确憎恶国家社会主义,但却并不憎恶社会主义。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而且所有这些都与国家控制有关。很多年后,米塞斯在信中写道:“正如复辟的波旁王朝一样,很多奥地利人什么也没学到,什么都没遗忘。”⁶⁹他在 1942 年的感觉肯定就是这样。

新 朋 友

墨西哥讲座的酬劳增加了米塞斯一家的收入,因此,他们在 1942 年的处境比起刚到美国那年要好得多。不过经济状况还是有些凄凉,他们没有稳定持久的收入,而且米塞斯在奥地利的退休基金被冻结了。1942 年 12 月 8 日,米塞斯写了一份报告,总结了本年度的工作,并申请再次延续研究补助。另外他也试图说服国家经济研究局资助一个旨在阐明现代极权主义起源的大型研究项目。他筹划了一个综合研讨会,参与的人有鲁吉耶、勒普克、哈耶克等人。这个项目没能实现,但到 1943 年 1 月他的研究补助得到了延续。米塞斯甚至一次获得了两年的补助,而条件不变。这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于那些进入美国大学执教大约两年的欧洲流亡学者常设的补助政策。因此,米塞斯可以愉快地获得两倍的资助。然而这将是他们合作的尾声。多给一年补助只是一个不太巧妙的告别仪式。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威利茨表明了他们的态度,而后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卡森(Carson)更明确地告知米塞斯,这是最后一次延期了。⁷⁰

822 幸运的是,米塞斯已经找到了独立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更加可靠的资助来源:全国制造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全国制造商协会领导层反对新经济政策和其他国家主义的计划。他们决心筹划一次反击:发起一次大规模运动教育美国公众他们所谓的自由企业制度的好处。全国制造商协会需要一位同时熟悉商界和学界的知识分子领袖。1943 年 2 月,他们找到了梦寐以求的人选,即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米塞斯曾经在维也纳商会工作多年,善于和商人打交

道,能与这些人有效交流他的经济与政治洞见。就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表示不再支持米塞斯的研究时,美国制造商协会立即介入,提出聘请米塞斯担任协会顾问——“立即上任”。⁷¹于是,米塞斯成了协会经济政策顾问团(the Economic Policy Advisory Group)的一员。后来他还成了全国制造商协会经济原理委员会(Economic Principles Commission)以及国际经济关系顾问团(Advisory Group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的成员。这份聘约提供了3000美元的年薪,比米塞斯在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年薪要多20%。聘任合同一年一续。1944年至1945年,米塞斯的年薪涨到了3600美元。⁷²

823

在工作上,米塞斯与协会秘书诺埃尔·萨金特(Noel Sargent)来往甚密。1943年,萨金特委托米塞斯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货币重建”问题。当年秋天,米塞斯已经就该课题撰写了一篇68页的备忘录。在备忘录中,米塞斯主张回归金本位制,并批评了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和凯恩斯为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Bretton Woods conference)准备的重建计划。几个月后,他参加了全国制造商协会举办的一个专家会议,讨论凯恩斯和怀特的方案。参加者包括:通用汽车公司的鲁弗斯·塔克(Rufus Tucker)、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埃德温·凯默勒(Edwin Kemmerer)以及米塞斯的旧相识阿尔伯特·哈恩。米塞斯和哈恩在曼哈顿期间成了亲密好友。

1944年6月,米塞斯又准备了另一份备忘录,这次的主题是垄断。⁷³几个月后,他在西海岸举办的两场咨询委员会午宴上发表了演讲。当时,耶鲁大学出版社已经为他出版了《官僚体制》(*Bureaucracy*)和《全能政府》两书(同年出版),为他赢得了坚实的声誉。因此,人们把他视为“英国自由思想和自由企业体制(这一体制在美国达到了巅峰)的最杰出和最不屈不挠的卫士”。⁷⁴他在旧金山(10月18日)和洛杉矶(10月25日)全国制造商协会会议上发表了演讲,并遇到了“像伦纳德·里德(Leonard Read)、奥瓦尔·沃茨(Orval Watts)以及R. C. 霍伊尔斯(R. C. Hoiles)那样出类拔萃的人。”⁷⁵

824

米塞斯与伦纳德·里德的相遇具有重要意义。几年前他们曾见过面,当时米塞斯刚到美国不久。后来里德回忆起1940年他们首次见面的情景,米塞斯表示反对政府权力的任何一点超出维持国内和平和市场秩序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运用,这给里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说米塞斯参加过里德家里举办的一场派对。⁷⁶其中一位客人向米塞斯教授发问:

我们所有人都愿意接受您的观点,即我们正在走向一个困难重重的时代,

但是米塞斯博士,假设你是统治美国诸州的独裁者,可以强制实施任何你觉得合适的变革。你会怎么做?

里德清楚记得米塞斯的答案:

米塞斯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会退位!”⁷⁷

825 米塞斯和里德继续保持着书信往来,他可能也在里德的邮寄名单上,并收到过里德出版的150万本四页小册子中的一本。这本小册子写道:“为什么不是1900?”——这是对罗斯福计划立法强征所有人年薪中超过25 000美元部分的反应。里德反对的理由是全国薪水的平均数是1900美元,客观上说,没有理由不是征收所有人年薪中超过1900美元的部分而只征收年薪超过25 000美元的部分。

里德是白手起家的商人,一生主要事业就是担任西海岸诸多商会的行政官。1928年他管理着帕洛阿尔托(Palo Alto)商会,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因为就在当年,这个城市最杰出的市民当选为美国总统。里德组织了一支由700个加利福尼亚人组成的远游队伍前往华盛顿。这一举动吸引了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随行人员的注意。从此他走上了康庄大道。他在加利福尼亚商会系统中登上了更高的职位,最终当上了位于洛杉矶的全世界最大商会的总负责人。那时,他已成为一名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斗士,并出版了第一本书——对罗斯福新经济政策的批评。此外,许多年来他也一直管理着商业组织秘书西部学院(Western School for Commercial Organization Secretaries)。

826 里德在洛杉矶刚一上任,就聘请了西部学院一位非常受欢迎的经济学教授,V. 奥瓦尔·沃茨。⁷⁸沃茨因此成了史上首位被一个美国商会全职聘任的经济学家。总的来说,他们与新政的斗争非常有效,他们在整个加州组织了许多课程以及一些教育性质的会议,米塞斯的讲座就在其中。10月17日周二晚上,也是米塞斯准备在全国制造商协会午宴上发言的前一天,他为扶轮社作了一场关于“信用扩张和经济萧条”的演讲。当晚,他还为圣安娜高中(Santa Ana High School)的听众作了一场关于“战争起因”的报告。米塞斯暂住在R. C. 霍伊尔斯家里,霍伊尔斯发行过一



伦纳德·里德

份报纸,是现在《橘郡纪事报》(*Orange County Register*)的前身。⁷⁹演讲前几周,洛杉矶商会及其注册者开始通过报纸文章和专栏积极宣传这件事,后来午宴也确实很成功。里德尤其牢牢记住了自己的所见所闻。一年后,他将迁居纽约,与米塞斯合作,最终建立了后来成为所有自由至上主义智囊机构源头的组织。两人的联系一直没有间断,直到米塞斯去世。

相比之下,米塞斯与全国制造商协会的结盟却没有持续很久。米塞斯继续向协会“提供建议”,共同署名撰写一份两卷的关于美国私人企业体制的研究,这项成果出版于1946年4月1日。当时协会为了废除战时物价管理局而组织了一次大规模运动,这本书就是运动的一部分。运动取得了成功,管理局撤销了,于是米塞斯的合同也到期了。在那之后,他继续担任全国制造商协会国际经济关系顾问团成员,但到1948年年末,米塞斯提出了辞呈,因为当时协会在通货膨胀及其后果的问题上的立场越来越摇摆不定。压倒米塞斯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协会开始拥护“提高生产力能够解决通货膨胀问题”这个观点。⁸⁰

* * *

几乎就在米塞斯刚开始为全国制造商协会工作的时候,蒙特斯·德奥卡从墨西哥来信说,他正在筹建的国际社会科学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the Social Sciences*)进展良好。现在他请米塞斯提供一份未来可能的常设教授职位人选名单以及相应的工资水平。米塞斯的回复如下:瓦尔特·祖尔茨巴赫、阿尔弗雷德·许茨、路易·鲁吉耶、雅克·吕夫以及米塞斯自己——他们都是住在纽约但没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欧洲流亡者,如果每人每年能有6000美元的薪水,就会愿意常驻墨西哥工作。这是很高的工资水平,事实证明,这是后来学院建成的主要障碍。但在1943年年初,好像什么都是可能的:一边是尚未找到工作的拥有古典自由主义血统的一流知识分子;另一边是有兴趣为这一事业提供资金支持的土豪。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计划:邀请路易·鲁吉耶到墨西哥国立大学举办系列讲座;支持米塞斯准备一项关于墨西哥政治—经济环境的研究(这是蒙特斯·德奥卡替他所在的国际银行做的委托);蒙特斯·德奥卡则继续翻译《社会主义》。⁸¹

米塞斯在为墨西哥市那所研究院提出未来教职人选的时候,也提到了其他一些人名,例如普兰特、马克卢普、拉帕特、勒普克,还有罗宾斯。⁸²为了争取莱昂内尔·罗宾斯加入研究院,他进行了最后一次尝试。1943年初,他曾邀请罗宾斯来到纽约。罗宾斯有着杰出的组织能力和非凡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凭着这些能力,他把学术威望和个人关系网络结合起来。英国的命运,以及欧洲的命运,取决

827

828

于他加入哪边。米塞斯试图让他离开他所工作的剑桥大学以及伦敦的生活环境，呼吸一下自由的新鲜空气。但是罗宾斯没有来到纽约，反而成了英国干预主义政府的拥护者。⁸³

1944年12月，蒙特斯·德奥卡来到纽约，米塞斯终于把墨西哥经济状况研究报告交给了这位墨西哥朋友。此时，蒙特斯·德奥卡正急于为即将出版的西班牙语版《社会主义》加入一篇结语。⁸⁴他的社会科学院计划毫无进展，但他没有放弃。除了薪酬问题，还有一个问题也阻碍了这个计划。这个障碍就是，计划聘用的绝大多数固定或临时教员——罗宾斯、普兰特、马克卢普、祖尔茨巴赫等人，已经分别接受了法国、英国和美国政府陆军部的雇用，战争结束前，他们是不能够或者不愿意离开他们的岗位的。⁸⁵蒙特斯·德奥卡邀请米塞斯在那一年以访问教授的身份返回墨西哥，但米塞斯谢绝了这次邀请，因为他打算8月份申请美国公民身份（距他来到美国正好五年），他想避免因为国外行程而使这次申请出现任何意外。

* * *

米塞斯逐渐融入了纽约的都市氛围，这使得他更加广泛地进入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这种调整的一个标志就是米塞斯社交习惯的改变：他和朋友相处的时候没有以前那么一本正经了。1942年，他为《纽约时报》和其他期刊撰写了许多社论。这个时期，亨利·黑兹利特感到特别愉快，因为他在给奥地利朋友写信的时候，不用再恭敬地写上“米塞斯教授”，而只需要称呼“亲爱的路德维希”（1942年7月），后来则只要称呼他“亲爱的路”（1942年12月）。

1945年4月，米塞斯开始和菲利普·科特尼（Philip Cortney）通信，当时科特尼是科蒂香水公司的副董事长和财务主管。这意味着米塞斯又结交了一位重要而长久的朋友。米塞斯写信祝贺科特尼的一篇文章，他在论文中批评了凯恩斯主义。那时科特尼已经知道米塞斯的著作，他在回信中说“在这世界上所有人中，我最重视你的想法”，他还表示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和米塞斯以及他们共同的朋友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共进晚餐。⁸⁶

不过，在专业上，米塞斯很难进入新的圈子。根本原因在于，他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信念来换取社会认同。直到1944年，米塞斯一直是纽约海外扶轮联谊会（New York Overseas Rotary Fellowship）的会员，但这对他毫无意义。他发现联谊会的聚会极其枯燥乏味，没过多久他就不再出席了。⁸⁷他通过在《纽约时报》工作的黑兹利特，获得了一些接触全国性报刊的机会，但是很快又发生了冲突。

1943年1月3日发表的米塞斯致《纽约时报》主编的一封信，就是个绝好的例



米塞斯和菲利普·科特尼在 20 世纪 50 年代

子。米塞斯在信中阐述说,仅仅通过组织机构不可能保证战后的世界和平。尤其是,他不认为建立新的国际联盟能使国际关系好过两次世界大战间期的情况。唯有通过“政治理念和社会经济意识形态上的激进改变”,转向古典自由主义立场,才能保证世界和平、繁荣。⁸⁸这封信引起了《巴伦周刊》(*Barron's*)主编的兴趣,他开始向米塞斯约稿。⁸⁹但是,这次合作注定无法维持很久。米塞斯只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大企业和普通人》,在经历了《巴伦周刊》某位“合伙人”的强烈反对后,于 1944 年 2 月发表。⁹⁰引起争议的关键是,米塞斯在阐述俄国缺乏创新精神的时候是否过于夸张。米塞斯写道:

831

据我所知,俄国人最大的成就是模仿外国的模式。他们在巴黎和纽约世博会上的展品,主要吸引大家眼光的就是美国农具、福特汽车和拖拉机的山寨版。他们的飞机和坦克不是原创的。今天他们用来打仗的武器几乎都是根据美国租借法案获得的。

顺便说一句,德国对世界武器装备的发展也几乎没有贡献。铁船、装甲船、鱼雷、潜水艇、飞机、机关枪和坦克源自英国、法国和美国。德国参谋部不信任飞机、坦克和提尔皮茨号(*Tirpitz*)战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看不起 U 型潜艇。齐柏林飞船(*Zeppelin*)是一位德国天才发明的。但是,这种飞船无法在商业和军事领域内发挥作用。⁹¹

于是,他与《巴伦周刊》的合作很快就结束了。

同样,米塞斯试图融入美国经济学界专业机构的努力也遭到挫折。1943年10月,弗里茨·马克卢普担任了《美国经济评论》(AER)的编辑,恰在此时,米塞斯却感到自己应该暂时停止与学术期刊继续合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此前米塞斯为不少期刊撰写书评,主要关注那些探讨欧洲战后重建问题的著作。其中两部著作受邀在《美国经济评论》⁹²上发表书评,然而,《美国经济评论》直接刊登了某位阿尔弗雷德·布朗撒尔(Alfred Braunthal)对这两篇评论中的第一篇的答复,却没有给米塞斯回应的机会。对于米塞斯来说,这就是歧视他的明显标志。米塞斯在写给马克卢普的信中,这样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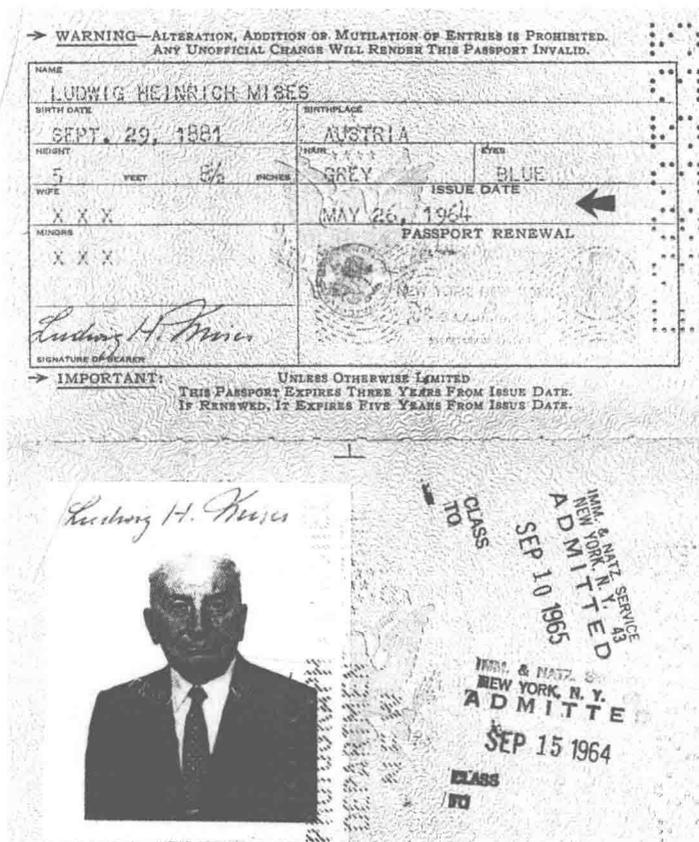
既然期刊编辑因为党派原因未能遵循写作伦理的原则,我就不打算继续为这份期刊供稿了。他们应该把他们的书直接寄给布朗撒尔先生或者其他同志。⁹³

美国公民

1945年8月,米塞斯第一时间提交了入籍申请,到了1946年1月14日,他成了美国公民。⁹⁴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联系过去的雇主,要求支付他的退休金。这笔钱是他应得的,但在1938年8月,一位纳粹官员曾经来信,拒绝支付给他。⁹⁵后来他收到通知,从1945年5月1日起他有权享有每月935.95先令的退休金。退休金转到了他在维也纳旧的银行账户。然而外汇管制还在实施,如果没有国民银行的批准,米塞斯不能把钱转到美国账户上。

米塞斯考虑过重返维也纳吗?没有。他仍然和一些战前旧识如卡尔·布罗克豪森、历史学家和作家里夏德·沙尔马茨(Richard Charnatz)保持着联系。他让爱达荷州的出版商J. H. 吉普森(J. H. Gipson)给他们寄去著作以表思念。⁹⁶他还照顾着路德维希·贝特尔海姆-加比永幸存下来的母亲,贝特尔海姆-加比永本人已经丧生在纳粹手里。⁹⁷不过米塞斯没有借机前往德国或奥地利。这两个国家仍然是占领区,入境需要特别批准。⁹⁸从沙尔马茨的信中他知道维也纳现在的状况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还要糟糕,而且这次没有人领导大家去阻止正在全国蔓延的社会主义化趋势。正如沙尔马茨写的那样,很多奥地利人一直在期盼着盟军的胜利,因为他们希望重获自由——但这自由只是字面上的。实际上他们得到的却是比过去甚至更加严厉政府控制。哪怕那些所谓的“自由”职业,也被迫纳入国家



米塞斯的美国护照,1964年5月26日印发

控制的组织;而且民众仍然依靠定量的食品配给维持生活,就像战争时期最艰难的岁月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战时配给更少,而且有时有了食品券也不一定买得到东西。⁹⁹

不过,米塞斯不想回维也纳还有一个原因。正如他在写给朋友卡尔·布罗克豪森——维也纳大学的一位退休宪法和行政法教授的信中所说:“我不想生活在那些暴民中间,他们甚至在优秀的人遭到屠杀的时候还会鼓掌欢呼。”¹⁰⁰我们不太确定米塞斯在说这话的时候想到的是谁。好心的布罗克豪森试图劝说米塞斯,他的这一苛刻判断并不符合事实——维也纳没有暴民。¹⁰¹但是米塞斯用“暴民”这个词可能是指类似汉斯·迈尔、奥特马·施潘、斯比尔克(Srbik)和尼德勒(Nadler)这样的人。他们曾积极支持纳粹占领奥地利,现在又重新占据了显要位置。最后,米塞斯还是回了一趟维也纳,但只是稍作逗留。

注 释

1. 罗亚尔·威尔伯·弗朗斯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6年11月7日;Grove City Archive; France file。

2. 卡尔金斯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0年8月1日;Grove City Archive; Machlup files。

3. 罗斯福于1944年签署《军人权利法案》。这项法案提供资金用于支持退伍军人进入学院和大学接受教育,因此把他们排除在了劳动市场之外。这项政策从1944年到1956年共花费了美国纳税人大约140亿美元。参见 Theda Skocpol, “Delivering for Young Families: The Resonance of the GI Bill,” *American Prospect* 28 (September 1996), pp. 66–72。2003年,联邦政府雇用3000多位经济学家,相当于美国经济学会15%的会员。彼得·克莱因(Peter Klein)提出,由于这种情况的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经济学界的观念,使他们从此转向了国家主义。参见 Klein, “Why Academic Intellectuals Support Socialism,” unpublished manuscript, presented at the New Zealand Business Roundtable, April 2003。

4. 弗里德曼后来有所悔悟,重新为自己赢得了声誉,他叹息说:“确实,通往利维坦式国家的道路是善意铺就的。”Milton and Rose D. Friedman, *Two Lucky People: Memoi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p. 123。

5. 19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大学吸纳了很多来自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家。例如,埃米尔·莱德雷尔、阿道夫·勒韦(Adolf Loewe)和爱德华·海曼在纽约的政治与社会科学研究研究生院(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Science])找到了工作,卡尔·兰道尔成为伯克利大学的教授。在社会研究新学院供职的相关资料,参见 Gary Mongiovi, “Emigré Economists at the New School, 1933–1945,” Harald Hagemann, ed., *Zur deutschsprachigen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ichen Emigration nach 1933* (Marburg: Metropolis, 1997), pp. 383–403。

6. “我年纪太大了。”米塞斯致马克卢普,信件标注日期为1940年8月7日;Hoover Institution; Machlup-Mises correspondence file。不过单单年龄因素还不是决定性的障碍。里夏德·许勒尔比米塞斯约年长十岁,却在社会研究新学院找到了一份工作。玛吉特请求马克卢普帮助,说丈夫非常沮丧。“他擅于阐述并捍卫一种思想,却对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玛吉特致马克卢普,信件标注日期为1940年8月6日;Hoover Institution; Machlup-Mises correspondence file。

7. Published in *Trusts and Estates* (January 1941), reprinted in Richard Ebeling, ed., *Selected Writings of Ludwig von Mises: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form and Reconstruction*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2000), vol. 3。《信托与地产》的出版商“发售了大约3000本,超出一流教育家和经济学家的一般发行量,也高于机构投资者”。卢诺(Luhnow)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1年3月17日;Grove City Archive; Trusts and Estates file。

8. 纽约大学的演讲最终出版为“My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 Theory,” *Planning for Freedom and Sixteen Other Essays and Addresses*, 4th ed. (South Holland, Ill.: Libertarian Press,

[1952] 1980)。普林斯顿的邀请来自摩根斯特恩。在新奥尔良,米塞斯会见了欧文·费雪及其德国助理汉斯·科尔森(Hans Cohnsen)。参见费雪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1年2月3日;Grove City Archive; Fisher file。

9. 参见 Grove City Archive; Accountants Club of America file。

10. 塞德曼(Seidman)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1年2月19日;Grove City Archive; Accountants Club of America file。

11. 米塞斯致马克卢普,信件标注日期为1940年11月27日;Hoover Institution; Machlup-Mises correspondence file。

12.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January 9, 1938). 关于黑兹利特,参见 Jeffrey Tucker, "Henry Hazlitt: The People's Austrian," Randall G. Holcombe, ed., *15 Great Austrian Economists*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99), chap. 11。

13. Henry Hazlitt, "An Interview with Henry Hazlitt," *Austrian Economics Newsletter* (Spring 1984). 另见 Margit von Mises, *My Years with Ludwig von Mises*, 2nd enlarged ed. (Cedar Falls, Iowa: Center for Futures Education, 1984), p. 58。

14. 战争期间,玛丽安娜·赫茨菲尔德住在伦敦,她请米塞斯代她向她在纽约的朋友们致以问候:"我想那里有上百个我想见的人。"赫茨菲尔德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1年8月23日;Grove City Archive; Herzfeld file。

15. 蒂贝格尔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0年10月31日;Grove City Archive; Thieberger files。

16. 苏西·舍尔森(Susi Schoelson)(克里斯·巴特勒[Chris Butler])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8年9月12日;Grove City Archive; Butler file。舍尔森是佩雷尔斯夫人莉莉·罗斯(Lilli Roth)的侄女。他们生命的最后消息是佩雷尔斯1943年写给姐姐弗里达·贝歇尔·冯·吕登道夫(Frieda Becher von Rüdendorf)的一封信。舍尔森、佩雷尔斯一家和米塞斯以前常在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脉滑雪。1946年7月,米塞斯写信给奥托·弗里德伦德尔(Otto Friedländer)说,佩雷尔斯的"悲惨命运"对他是个"深刻的刺激"(信件标注日期为1946年7月13日;Grove City Archive; Friedländer file)。直到1944年2月,他才得知佩雷尔斯的命运;参见 Grove City Archive; Hoover Library file。

17. 米塞斯致汉斯·科尔森,信件标注日期为1946年2月12日;Grove City Archive; Cohnsen file。新闻记者里夏德·沙尔马茨在贝特尔海姆遭到流放的前夜见到了他。参见沙尔马茨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7年2月26日;Grove City Archive; Charmatz file。沙尔马茨在维也纳的战争中幸存下来,因为他娶了一位雅利安人为妻,但是他们失去了所有的财产。

18. 埃尔莎·布罗克豪森(Elsa Brockhausen)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7年5月4日;Grove City Archive; Brockhausen file。

19. 玛丽安娜·赫茨菲尔德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1年8月23日;Grove City Archive; Herzfeld file。埃瓦尔德的兄弟卡尔到达了华盛顿,并在一些国际组织担任职务。关于米塞斯的朋友和熟人遭受纳粹迫害的情况,另见米塞斯致帕索,信件标注日期为1947年1月29日;Grove City Archive; Passow file。

20. 米塞斯致波特,信件手稿,标注日期为4月17日(1941年);Grove City Archive: Geneva Research Center file。另见卡尔·哈格多恩(Karl Hagedorn)致玛吉特·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7年5月2日;Grove City Archive: Hagedorn file。米塞斯致哈耶克,信件手稿,标注日期为4月18日(1941年);Grove City Archive: Hayek files。

21. 例如,亨利·邦德(Henry Bund)、奥托·埃尔利希(Otto Ehrlich)、贝尔特·霍斯利茨(Bert Hoselitz)、卡尔·卡普(Karl Kapp)、莱昂·克佩尔(Leon Koeppl)、鲁道夫·勒布尔(Rudolf Loeb)、埃德蒙·西尔伯纳、路易丝·佐默、瓦尔特·祖尔茨巴赫。

22. 例如,法律史学者赫尔曼·冯·格里迈森和保罗·芒图及其家人。

23. 哈耶克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0年8月29日;Grove City Archive: Hayek files。在同一封信里,哈耶克还私下透露了一个计划,那就是在稍后的某个时候离开英国,前往纽约的一家基金会工作。雅各布·瓦伊纳参与了此事,并答应提供帮助。然而,随后的战争期间,哈耶克仍然留在了伦敦和剑桥,尽量不让自己受到战争的干扰。他一度十分后悔,因为他的藏书有被燃烧弹摧毁的危险。这些危险“在空无一人的房子里是不可小觑的,因为没人灭火——如果有人及时赶到,这是再容易不过的事”。哈耶克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1年1月12日;Grove City Archive: Hayek files。

24. 哈耶克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0年6月1日,以及后续通信;Grove City Archive: Hayek files。至少在1948年之前,他们一直都用这种方式转移财产,因为英国甚至在战后也继续实行外汇管制。

25. 哈耶克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0年8月29日;Grove City Archive: Hayek files。米塞斯在一份未标注日期的清单手稿上提到过鲁吉耶和胡拉的加入,参见Grove City Archive: Montes de Oca files。

26. William J. Carson to Mises, letter dated December 24, 1940; Grove City Archive: NBER files。

27. 巴尔赞(Barzun)发现“美国大学教授的薪酬不是很高,年薪大约只有9000美元到10000美元”,然后他评论道:“这个行当的收入水准之底,让人倍感心酸,削弱了任何讥讽。比如,1940年有433所专科院校,教师的平均年薪只有1572美元到2130美元;177所师范学院的年薪是2433美元到3600美元。”Jacques Barzun, *Teacher in America* (Indianapolis: Liberty Press, [1945] 1981)。1935年,弗里茨·马克卢普在布法罗大学(University of Buffalo)的起薪是6500美元。参见马克卢普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35年5月6日;Hoover Institution: Machlup-Mises correspondence file。

28. 米塞斯致哈耶克,信件手稿,标注日期为(1941年)4月18日;Grove City Archive: Hayek files。“M.”大概是指马克卢普,“L.”指利泽尔。

29. 米塞斯致拉帕特,信件藏于Graduate Institute Archive。

30. 哈耶克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1年1月12日;Grove City Archive: Hayek files。他接着写道:

我正竭力试图告诫人们,现在的趋势会不可避免地造成经济衰退和法西斯主义。或许我该继续完成我的小册子,写成一本更受欢迎的小书(可能成为六便士系列中的一本),这也是我现在正在做的,我也同时在写大部头的书,但进展缓慢。

三个月后,哈耶克报告说他发表了关于科学主义影响社会思想这个主题的第一篇文章。

31. 米塞斯致哈耶克,答复哈耶克来信的信件手稿,标注日期为1941年5月6日;Grove City Archive: Hayek files。他在给马克卢普的信中写道:“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工作,但是我近来写了很多文章。”米塞斯致马克卢普,信件标注日期为1941年5月20日;Hoover Institution: Machlup-Mises correspondence file。

32. 米塞斯致哈耶克,信件标注日期为1941年4月18日;Grove City Archive: Geneva Research Center file。

33. 参见黑兹利特与米塞斯的通信,藏于Grove City Archive: Hazlitt files。显然,这是他在1941年发表的唯一一篇社论。1942年春,他继续发表了三篇社论,三篇都是讨论德国作战能力的关键后勤问题。随后,1943年,他发表了最后四篇社论,主要围绕战后重建问题,特别是货币问题。他从这些社论每篇得到了10美元的稿酬。工资单参见Grove City Archive: NYT files。

34. 奥托·卡里尔(尼伦施泰因)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1年7月19日;Grove City Archive: Austrian National Committee files。

35. 恩斯特·霍尔指出,直到1945年,流亡海外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一直避免发表可能会被认作承诺奥地利独立或者奥地利国存在的声明。参见Hoor, *Osterreich 1918 - 1938* (Vienna: Bundesverlag für Unterricht, Wissenschaft und Kunst, 1966), p. 46。

36. 这个新的计划和米塞斯在1938年初提出的关于东方民主联盟的提议有所不同。因为新的计划不仅包括多瑙河盆地国家,而且几乎涵盖了整个东欧,包括1933年建立主权国家的众多区域:阿尔巴尼亚、奥地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但泽、爱沙尼亚、希腊、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以及普鲁士的大部分地区。他提出的新的政治实体面积70万平方英里,人口多达1.2亿;使用的语言共有17种。参见Mises, “An Eastern Democratic Union: A Proposal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urable Peace in Eastern Europe,” dated October 1941, 43 pp。这篇报告的第一份打印稿标注日期为1941年7月1日,共15页。通过华盛顿特区的英国大使馆,米塞斯把报告的7月份修改稿寄给了哈耶克和罗宾斯(参见诺埃尔·阿尔[Noel Hall]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1年7月18日;Grove City Archive: “H” files)。1941年5月,米塞斯可能在耶鲁大学做了一场演讲,探讨他为东欧联盟制定的计划。参见欧文·费雪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1年6月11日;Grove City Archive: Fisher file。

37. 米塞斯,《战后重建》,1941年5月28日,共22页,引自第16页。他接着写道:

现在大家的普遍信念是,小国不太可能拥有独立的主权,独立的小国必定消亡。目前看来的确如此……甚至美国也在这些“小国”之列……我相信,西方民主国家所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建立一个联盟……共同防御……我相信,解决战后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在受到威胁的民主国家之间建立一个更加紧密的政治军事联盟。(pp. 17f.)

他的计划中有一个重大缺陷,就是没有提及“和平意识形态”的问题,而只有这种意识形态才能为东欧政治经济的一体化提供一个基础。大约十年后,米塞斯在写给萨尔瓦多·德·马达利亚加(Salvador de Madariaga)的私人信件中含蓄地承认了这一点(参见Grove City Archive: Madariaga file)。

38. 米塞斯致韦拉斯科,信件标注日期为1958年12月16日;Grove City Archive: Velasco files。

39. 关于此信,可以参见蒙特斯·德奥卡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1年8月29日;Grove City Archive: Mexico 1942 files。课程、讲座和研讨会的内容可见马里奥·德·拉·奎瓦(Mario de la Cueva)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1年10月10日;Grove City Archive: Mexico 1942 files。

40. 他们到达那里的第一个周末,他曾短暂回过一次纽约。7月21日和7月23日,他在纽约大学商学院作了题为“政府监管业务的经济意义”的演讲。参见通信,Grove City Archive: Dorau file。

41. “每天有数百辆车子经过我们的住处,仿佛大家急不可待地要去看山景,拍几张快照,然后匆忙离开似的。”(米塞斯致哈耶克,信件手稿,标注日期为1941年8月14日;Grove City Archive: Hayek files)

42. 米塞斯致安妮·罗宾斯(Anne Robbins),信件未标注日期(可能是1943年1月);Grove City Archive: Robbins files。

43. 随着俄国加入反对德国的战争,米塞斯感到更加放心了。玛吉特·冯·米塞斯致马克卢普,信件标注日期为1941年9月3日;Hoover Institution: Machlup-Mises correspondence file。

44. 米塞斯致马克卢普,信件标注日期为1941年9月19日;Hoover Institution: Machlup-Mises correspondence file。

45. 米塞斯致哈耶克,答复哈耶克1941年10月24日来信的信件手稿;Grove City Archive: Hayek files。

46. 米塞斯致奥托·洛夫鲁德(Otto Loverude),信件手稿,标注日期为1942年3月7日;Grove City Archive: Churches files。

47. 参见 Mises, “The Dictatorship Complex,” *Omnipotent Government*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4), chap. 11, sect. 2。在货币思想中他克服了这个错误,尤其体现在他最终拒绝金汇兑本位制一事上。

48. 库登霍韦-卡莱吉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1年11月20日;Grove City Archive: Austrian National Committee files。

49. “奥地利行动”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2年2月4日;Grove City Archive: Austrian National Committee files。

50. 罗特和许士尼格致米塞斯,电报标注日期为1942年2月10日;Grove City Archive: Austrian National Committee files。1941年至1942年,许士尼格是一项救援行动的背后推动者,这项行动的目的是帮助一群以犹太难民为主的流亡者从奥地利转移到美国,当时这些流亡者被困在里斯本。整个战争期间,米塞斯和许士尼格一直保持联系。参见1944年至1945年米塞斯与皮特曼·波特的书信往来,藏于Grove City Archive: Potter file。波特后来去了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大学(Oberlin College),并担任了《美国国际法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的主编。

51. 胡拉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2年2月20日;Grove City Archive: Austrian Na-

tional Committee files。

52. 经济学院的课程支付给米塞斯 800 美元,法学院的讲座他收到了 50 美元。参见蒙特斯·德奥卡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 1941 年 10 月 4 日;Grove City Archive; Mexico 1942 files。同一份资料中还包含了他的讲座的详尽笔记(某种程度上说,他可能仍然不太习惯用英语演讲),这些笔记为重现米塞斯研究的问题提供了依据。

53. 米塞斯致哈耶克,1942 年 3 月 18 日信件的未标日期的手稿;Grove City Archive; Mexico 1942 files。此信日期可以根据哈耶克回信的标注日期推断,后者写于 1942 年 5 月 19 日;Grove City Archive; Hayek files。

54. 蒙特斯·德奥卡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 1941 年 10 月 4 日;Grove City Archive; Mexico 1942 files。

55. 米塞斯致蒙特斯·德奥卡,信件手稿,标注日期为 1941 年 10 月 7 日;Grove City Archive; Mexico 1942 files。

56. 蒙特斯·德奥卡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 1941 年 11 月 29 日;Grove City Archive; Mexico 1942 files。

57. 米塞斯致哈耶克,1942 年 3 月 18 日信件的一份未标日期的手稿;Grove City Archive; Mexico 1942 files。此信日期可以根据哈耶克回信的日期推断:哈耶克回信标注日期为 1942 年 5 月 19 日;Grove City Archive; Hayek files。

58. F. A. Hayek, "Planning, Science, and Freedom," *Nature* (November 15, 1941): 580.

59. 米塞斯致哈耶克,1942 年 3 月 18 日信件的一份未标日期的手稿;Grove City Archive; Mexico 1942 files。“威廉爵士”就是贝弗里奇勋爵。

60. 两篇备忘录都收入 Grove City Archive; Montes de Oca files。该文翻译发表时,题为“*Ideas sobre la Política Económica de la Postguerra*,” *Cuadernos Americanos* 4, no. 4 (July-August 1942): 87-99。初稿的标题是“经济国家主义与和平经济合作”(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Peaceful Economic Cooperation),许多年后发表在 *Money, Method, and the Market Process*, Richard M. Ebeling, ed. (Boston: Kluwer, 1990)。

61. 马克卢普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 1942 年 3 月 16 日;Grove City Archive; Machlup files。

62. 米塞斯致亚历山大·希尔施(Alexander Hirsch),答复希尔施 1943 年 5 月 12 日来信的未标日期的信件手稿;Grove City Archive; “H”files。

63. 米塞斯贡献了几篇备忘录,主要探讨战后重建的原则(参见 Habsburg file)。“Entwurf von Richtlinien für den Wiederaufbau。”

64. 多年来,正统王权运动的领袖一直都是奥地利独立国家地位最热切的拥护者。1933 年,运动遭到镇压,因为奥地利的邻国和从前战争中的敌人对其进行了外交和军事制裁以防王朝复辟。但当镇压停止后,那些拥护正统主义的人很快得到了大片政治版图。到 1938 年,奥托·冯·哈布斯堡从奥地利 4400 个城镇及乡村推选出来的 1540 人中胜出,被任命为荣誉市民。参见 Hoor, *Osterreich 1918-193*, pp. 64-66。

65. 参见米塞斯致哈布斯堡,信件标注日期为 1960 年 5 月 20 日;Grove City Archive; Habsburg files。

66. 参见第一章“家族之根”。

67. 德真费尔德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2年4月11日;米塞斯致德真费尔德,信件标注日期为1942年4月20日;三页篇幅的问卷调查;米塞斯的手稿“Monarchismus, nicht Legitimus;” Grove City Archive; Habsburg files。

68. 试比较几份不同日期的宣言:1942年6月20日的版本,6月25日的修订版,1942年7月1日德真费尔德标注的版本,还有1942年7月12日的最终版;Grove City Archive; Austrian National Committee files。

69. 米塞斯致鲁道夫·贝特霍尔德,信件标注日期为1959年12月8日;Grove City Archive; Berthold file。只有少数团体对他关于建立战后东欧联盟的必要性及其问题的分析感兴趣,其中一个(社会主义的)中东欧计划委员会(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Planning Board)。这个组织谋求在捷克斯洛伐克、希腊、波兰和南斯拉夫之间建立战后联盟。参见奥尔吉耶德·朗格尔(Olgierd Langer)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3年2月18日;Grove City Archive; “C” file。

70. 那时,威利茨与韦斯利·C.米切尔私交甚笃。参见他写给米切尔的信件,标注日期为1944年1月2日;Grove City Archive; AER files。

71. 诺埃尔·萨金特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3年2月10日;Grove City Archive; NAM files。

72. 他的税前收入在1943年增加到了大约6100美元,1944年几乎有7100美元。参见纳税申报表,Grove City Archive; NBER files。

73. 这篇可能就是他死后出版的手稿“Monopoly Prices,”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1, no. 2 (1998)。

74. 米塞斯在1944年10月18日召开的全国制造商协会南加州咨询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讲的介绍;Grove City Archive; NAM files。

75. 米塞斯致富勒(Fuller),信件手稿,标注日期为1944年11月14日;Grove City Archive; Fuller files。里德曾邀请米塞斯代表洛杉矶商会(Los Angeles Chamber of Commerce)举办一场讲座。他从瓦尔特·祖尔茨巴赫那里得知米塞斯将有全国制造商协会西海岸之行——祖尔茨巴赫是他们两人的共同朋友。参见里德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4年8月7日;Grove City Archive; Read files。

76. 现存他们之间最早的通信开始于1943年6月,当时里德询问米塞斯是否愿意在一次商学教育运动中举办讲座。1944年10月19日或20日,里德邀请米塞斯去他家里用餐。参见通信,Grove City Archive; Read files。

77. 引自 Mary Sennholz, Leonard E. Read; *Philosopher of Freedom* (Irvington-on-Hudson, N. Y. :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1993) p. 145。

78. 沃茨是哈佛大学的托马斯·N.卡弗(Thomas N. Carver)教授的门徒。20世纪30年代,卡弗教授曾在里德的商业组织秘书西部学院办过讲座。当里德支付不起卡弗教授的薪金时,沃茨便取而代之。

79. 参见1944年通信,Grove City Archive; Hoiles files。霍尔伊斯发行过几份报纸,他是通过瓦尔特·祖尔茨巴赫知道米塞斯的。

80. 尼迈耶致布朗,信件标注日期为1952年10月2日;Grove City Archive; Nymeyer files.许多年后,他又与全国制造商协会进行了另一次合作,年薪6000美元,加上2400美元的研究支出。米塞斯在写给阿尔贝·于诺(Albert Hunold)的信中谈到他和全国制造商协会的第一次合作,信件标注日期为1947年12月27日;Grove City Archive; Hunold files。

81. 参见他们在1943年1月和2月间的通信;Grove City Archive; Montes de Oca files。

82. 米塞斯致蒙特斯·德奥卡,信件标注日期为1945年7月22日;Grove City Archive; Montes de Oca files。不太清楚这些仅是米塞斯提出的人选,还是蒙特斯·德奥卡在回复中提到的。米塞斯起草了一份很长的未来员工列表(包括固定的和临时的),还有一份简短的课程列表。员工包括:马克卢普、哈伯勒、纳克斯、祖尔茨巴赫、沃格林、波埃特(Poetter)、许茨、鲁吉耶、凯尔森、胡拉、吕夫、博丹、哈耶克、罗宾斯、普兰特、赫特、维泽、伊诺第(Einaudi)、拉帕特、施特里格尔、赫克舍(Heckscher)、布尔坎。主要课程有:(1)经济学;(2)近两百年以来社会—经济学说的历史批判分析;(3)1776年以来的宪政史;(4)1750年以来的经济史和社会史;(5)现代公共财政学。参见Grove City Archive; Montes de Oca files。

83. 参见1943年1月以后的通信;Grove City Archive; Robbins files。现存的书信档案缺少1935年12月至1943年1月之间的文件;在这之后,首先是罗宾斯的妻子艾丽斯的一封信,感谢米塞斯寄来的糖果(巧克力、柠檬汁还有其他的)圣诞礼包。两天后,他的女儿安妮也写了一封信,而后在1月25日,莱昂内尔本人重新接上了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

84. 蒙特斯·德奥卡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5年1月2日;Grove City Archive; Montes de Oca files。

85. 米塞斯致蒙特斯·德奥卡,信件标注日期为1945年7月22日;Grove City Archive; Montes de Oca files。

86. 科特尼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5年4月9日和3月7日;Grove City Archive; Cortney files。米塞斯曾在路易·鲁吉耶的纽约公寓见过莫洛亚。莫洛亚家的晚餐可能是在1945年5月21日或22日。参见莫洛亚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5年5月13日;Grove City Archive; "M" files。

87. 米塞斯致R. C. 霍伊尔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4年6月21日;Grove City Archive; Hoiles files。

88. Mises, "Super-National Organization Held No Way to Peace; Radical Change in Political Mentalities and Social and Economic Ideologies Viewed as Necessary in Order to Eradicate Economic Nationalism," Letter to the Editor,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 1943), p. E-8.

89. 乔治·谢伊(George Shea)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3年2月3日;Grove City Archive; Barron's file。

90. Mises, "Big Business and the Common Man; High Living Standards in U. S. Came from Big Mass Production Enterprise," *Barron's* 24, no. 9 (February 28, 1944), p. 3.

91. 米塞斯致谢伊,信件标注日期为1944年1月19日;Grove City Archive; Barron's file。另见米塞斯致斯特林厄姆,信件标注日期为1946年6月13日;Grove City Archive; "S" files。

92. 米塞斯评论了阿道夫·斯特姆赛尔(Adolf Sturmthal)的《欧洲劳工的悲剧,1918—

1939》(*The Tragedy of European Labor, 1918 - 193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3), 发表于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3, no. 3 (September 1943): 702 - 05; 还有 S. 里昂·利维(S. Leon Levy)的《纳索·W. 西尼尔:现代资本主义的先知》(*Nassau W. Senior: The Prophet of Modern Capitalism*, Boston: Bruce Humphries, 1943), 发表于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4, no. 2 (June 1944): 359 - 61。

93. 米塞斯致马克卢普,信件标注日期为1944年11月26日;Grove City Archive: AER files。五年后,米塞斯又以同样的风格写信给布法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教务长:“5月11日来信收悉,我很抱歉地告知您,关于您的计量经济学会计划,我提供不了什么建议。”米塞斯致萨默斯(Somers),1949年5月17日;Grove City Archive:“S” files。

94. 米塞斯致克勒,信件标注日期为1959年11月21日;Grove City Archive: Köhler files。他宣布放弃世袭奥地利贵族头衔,但仍保留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这个名字,作为笔名。参见1958年5月13日履历;Grove City Archive: U. S. Army War College files。

95. 米塞斯致卡默(Kammer),信件标注日期为1946年2月10日;Grove City Archive: Kammer für Handel, Gewerbe und Industrie files。

96. 吉普森拥有卡克斯顿印刷有限公司(Caxton Printers Ltd.),公司位于爱达荷州考德威尔。他的兄弟是著名的美国殖民历史学家劳伦斯·亨利·吉普森(Lawrence Henry Gipson)。他靠经营印刷工厂和一个办公用品公司赚了钱。他的兴趣使他获得了实在的收益:印刷自己喜欢的文学作品,诸如自由至上保守主义著作(例如,阿尔伯特·J. 诺克[Albert J. Nock]的《我们的敌人——国家》[1935],加雷·加勒特[Garet Garrett]的《革命曾是》[1938],以及埃里克·里特·冯·屈内尔特-莱丁的《自由或平等》[1935])。米塞斯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47年1月。吉普森自发帮助了那些米塞斯认为在艰难的战争岁月里值得帮助的人们。米塞斯推荐了三位奥地利人(布罗克豪森、沙尔马茨,还有长期担任他在维也纳律师的弗里德里希·克勒),以及三位德国人(帕索、弗莱堡大学哲学教授和埃德蒙德·胡塞尔从前的助理欧根·芬克[Eugen Fink],还有汉堡律师、玛吉特家族的朋友卡尔·哈格多恩)。第二年,吉普森再次提供了同样的帮助(1953年春天还有一次)。随后,米塞斯介绍吉普森认识了埃里克·里特·冯·屈内尔特-莱丁,后者成了卡克斯顿印刷公司的新作者。在1952年10月25日的一封信里,米塞斯热情赞扬了屈内尔特-莱丁写的《自由或平等》(*Liberty or Equality*),以及加勒特的三本书(Grove City Archive: Gipson files)。

97. 米塞斯致汉斯·科尔森,信件标注日期为1946年2月12日;Grove City Archive: Cohlrsen file。米塞斯在信里请求科尔森将一个食品包裹寄给海伦妮·贝特尔海姆-加比永。

98. 埃尔莎·布罗克豪森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7年5月4日;Grove City Archive: Brockhausen file。

99. 沙尔马茨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7年2月26日;Grove City Archive: Char-matz file。

100. “Ich sehne mich nicht danach, dem Pobel zu begegnen, der bei dem Niedermetzeln ausgezeichneten Manner Beifall geklatscht hat.” 参见卡尔·布罗克豪森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

期为1947年7月22日;Grove City Archive: Brockhausen file。布罗克豪森还在后来的一些信中重提了这个话题,询问米塞斯是否收到了他的信息。在一封写于1949年7月4日的信里,他说他正准备探讨纳粹战争罪行的起因,此时他已经九十多岁高龄了。

101. 1940年3月初,米塞斯表示他愿意为“我们备受摧残的奥地利”的重建奉献力量。参见米塞斯致普勒克(Plöchl),信件标注日期为1940年4月2日;Grove City College Archive: Plöchl file。显然,过早使用这样的字眼使得米塞斯很难接受后来发生的灾难。

如果说米塞斯在1940年抵达美国之前还对美国精神抱有某种幻想,那么到战争结束时,他的这种幻想已经完全破灭了。此时,美国的公众舆论处于国家主义的支配之下,旧美国的自由精神跌落到了历史最低点。正如米塞斯写给一位德国友人的信中所说:“不幸的是,我们面对美国的计划经济政策,居然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¹类似地,在写给一位前程远大的奥地利年轻经济学家的信中,他说,如果一定要说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学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美国的经济学文献比欧洲还要糟糕:

这里的人非常热衷于不平衡预算、赤字消费、低利率,以及各种类型的严密管制。那些胆敢提出异议的人会被视为“守旧势力和反动分子”,完全无人理睬。²

838 关于这个问题,他还写道:

凯恩斯主义对思想的破坏非常恶劣。例如,得知国民收入从1940年的776亿美元“增长”到了1945年的1610亿美元,每个人都很高兴。³

不过,抵抗力量也在逐渐浮现。当时存在一个自由至上主义反对派的温床,一个正在酝酿反击行动的联结各方领袖的网络——既有思想家,也有组织者,有些单干,有些则组成了小团体。一位历史学家称那几年是“个人主义和杰斐逊主义思想在美国影响最弱的时期”。⁴还好这一低潮只限于政治实践领域。思想领域不再是一片混乱,而是走上了漫长的复苏之路。不过,这些思想家和组织者还是相当分散。他们只能一个个地找出自己的同伴。

他们之中有新闻记者,如亨利·黑兹利特、劳伦斯·费尔蒂希、弗兰克·霍多罗夫(Frank Chodorov)、苏珊娜·拉夫莱特(Suzanne LaFollette)、加雷·加勒特、约

翰·T·弗林(John T. Flynn)以及约翰·张伯伦;还有一些作家,如阿尔伯特·J·诺克、伊莎贝尔·佩特森(Isabel Paterson)、罗丝·怀尔德·莱恩(Rose Wilder Lane)、安·兰德以及费利克斯·莫利(Felix Morley)。组织者则有诸如伦纳德·里德、弗雷德里克·尼迈耶和洛伦·米勒(Loren Miller)这样的人。还有一些愿意赞助教育事业、促进自由放任主义政策的商人,例如贾斯珀·克兰(Jasper Crane)、哈里·埃尔哈特(Harry Earhart)、阿尔弗雷德·科尔伯格(Alfred Kohlberg)、霍华德·皮尤(Howard Pew)、克劳德·罗宾森(Claude Robinson)、皮埃尔·古德里奇(Pierre Goodrich)和威廉·沃尔克(William Volker)。还有大学教师,例如本杰明·安德森、H. J. 达文波特(H. J. Davenport)、弗雷德·弗尔柴尔德(Fred Fairchild)、利奥·沃尔曼(Leo Wolman)、弗兰克·奈特、亨利·西蒙斯,以及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这些人仅仅用了十五年就改变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使美国摆脱骇人的国家主义,但是他们成功地踩住了刹车,并且重新界定了公众辩论的主题。

到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米塞斯的巨大影响和思想引导,古典自由主义开始从废墟中东山再起。⁵这十五年,米塞斯的创造力达到了他生命中最后一次巅峰,也为西方世界再次解放铺平了道路。在此期间,一些新成立的组织扛起自由的大旗,聚集了许多原本各不相干、也不了解自由主义的人,因此,米塞斯的思想得以广泛传播,日益深入人心。一生中,他还是第一次能与那些通过阅读自己的著作掌握经济科学的学生在稳固的基础上一起工作。这是第一批米塞斯主义者,他们很快成为一群比他们的导师还要激进和彻底的自由放任主义倡导者——这是米塞斯没预料到的:在以前的维也纳研讨会上,他曾因比学生更加激进而感到尴尬。

839

自由至上主义的萌芽

在罗斯福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内,许多美国人已经开始厌倦新经济政策。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他们的总统实际上发动了一场美国政府体制的革命。但在罗斯福第三次参加总统竞选时,大部分人还是给他投了票。罗斯福承诺会使美国远离新的欧洲战争,事实上这场欧战最终演化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罗斯福违背他的承诺,加入战争的时候,支持者开始减少了。战争期间,美国人民仍然全力支持总统的决策,但是他们对新政的认识更加清醒了。人们开始听取反对新政的声音,如今这样的批评随处都可听到。

伊莎贝尔·佩特森的《机器之神》(*The God of the Machine*)和罗丝·怀尔德·莱恩的《发现自由》(*The Discovery of Freedom*)慷慨激昂,广泛关注了人们对全能政

840 府损害个人自由的控诉。约翰·T·弗林在他的《罗斯福神话》(*The Roosevelt Myth*)和《当我们前进》(*As We Go Marching*)中揭露了联邦政府干预政策背后的社会主义目的及其影响。1944年初,费利克斯·莫利、约翰·张伯伦和弗兰克·哈尼根(Frank Hanighen)创办了《世间大事》(*Human Events*)周刊。他们的使命是教育美国公众,告诉他们一个令人难过的事实:联邦政府已经被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鼓吹手绑架了。同时,公众也第一次聆听了两位奥地利流亡学者的声音。1944年,米塞斯出版了两本著作:《全能政府》和《官僚体制》,这两本书的目的在于动摇公众的信心——他们认为通过国家权力机构的粗暴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是必要的权宜之计。同年,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出版了他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这本书让他名声大噪。

841 不是只有知识分子才去追问和质疑罗斯福统治的本质和范围。没有学术背景的普通公民现在也重新找回了他们曾经拥有的美德:对政府的不信任。无论是在哪个领域,他们都会发现曾经最害怕的事情目前成了现实。而且,他们不仅注意到了这些现象,还把他们的发现记录下来并广为传播。有个例子可以说明那时的情况:一位经营小型印刷公司的休斯顿企业家,开始好奇新政期间政府到底建立了多少联邦机构。由于没有现成的资料可供参考,他决定自己搜集信息。他将所有机构的名称按字母顺序排列在一张表上,那张表格的长度让人看了会倒吸口气——至少在那时候是这样。最初他只是印了少量的传单寄送给朋友、熟人和他记在本地通讯录上的一些人。结果反响非常热烈。几个月后,他已经卖出了20万份拷贝——而且都是买主主动找他购买的。⁶

1944年9月18日,古典自由主义迎来了最引人注目的命运转折点。这一天,哈耶克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在美国上市,立刻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发表了此书的精要,“每月一书俱乐部”(Book-of-the-Month Club)卖出了100多万本。⁷一夜之间,哈耶克成为一位享誉国际的名人。

842 没人比哈耶克及其出版商更惊讶的了。这次意外的成功主要有四个原因。首先,哈耶克没有运用新的论证,而只是提出了一个极为雄辩和精致的表述,表达了一个战前已在美国公众中拥有广泛认同基础的立场。《通往奴役之路》的核心观点实际上是:政府增加的权力等同于它从公民个人身上剥夺的主权,而政府的全面控制则把公民变成了奴隶——不管这个极权国家属于法西斯主义还是其他主义。第二,战争急剧加速了联邦政府权力的扩张,因此更多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对此感到疑虑。第三,哈耶克再次响应了新自由派的观点,拥护一种看似属于实践主义中间路线的解决方案,而这种方案对美国人很有吸引力。他强调他提倡的不是自由

放任主义,而是某种新的自由主义。⁸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哈耶克还是一位权威的学院经济学家——他在英国十分知名,备受尊敬,这在当时能够唤起美国人精神上的自卑情结。

对于那些坚定的自由捍卫者来说,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对政府当然过于软弱了。《通往奴役之路》的正面方案仍然允许政府控制经济生活。经济体系仍然需要计划,而主导所有计划的当然是政府。哈耶克只是建议计划要为市场竞争服务而非控制所有市场主体的具体行为。从任何一种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这都是一个幼稚的想法;有些人还认为,基于理性的角度,这种思想也是不可取的。在评论哈耶克的方案时,弗兰克·霍多罗夫惊呼:“多愚蠢呐!”他还明确表示,他认为这很像某个懦弱的知识分子提出的方案。⁹

米塞斯很高兴这本书获得成功。不过,他也觉得哈耶克的有些说法具有误导性。哈耶克指出,经济计划是威胁到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诸多政策的根源。但是,计划本身并无危险。真正的问题是:谁来制定计划,如何实施计划? 是否应该通过国家权力机关强制推行一个囊括全体公民的统一计划? 或者,还是每个个人或家庭户主制定许多不同的计划? 1945年3月20日,米塞斯在美国政治科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发表了一个演讲,强调了这一关键的区别。他没有明言的是,这场演讲其实是对哈耶克著作的一个批判性评论。¹⁰

843

几天后的4月3日,哈耶克抵达纽约,开始了关于《通往奴役之路》的巡回演讲。这是他第一次在美国见到过去的导师。¹¹ 此书的面世和巡回演讲大声宣告了历史上又一个重要时代的开始。成千上万的销售量向每个人昭示着,美国人依然热爱自由主义思想,而且这种热爱藏着巨大的政治潜力。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激活这种潜力的最为重要的例子就是伦纳德·里德,他于1945年4月底辞去了洛杉矶商会收入丰厚的工作,而以全国工业协商委员会(National Industrial Conference Board)执行副主席(Executive Vice President)的身份搬到了纽约。里德能够感觉到人们对放任自由主义和经济科学的核心人物米塞斯潜在的巨大兴趣。而且他也明白,我们必须捍卫一个完整的整体自由,而不能零零落落地做出很多让步。但是,回顾1945年的形势,他发现居然没有一个机构符合这个标准,当然也没有哪个有打算支持或推动古典自由主义学者和学生的活动。多年后,他将这一发现概括成四点:

844

第一,整个地球表面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发行(自由哲学)的相关刊物。第二,全国没有哪份杂志愿意发表我们的文章。第三,没有一个出版商愿意出版

我们的著作。第四,直到二十六年前(1945年),还不存在一本现代美国习语写成的关于这种哲学的融贯的文献。我们可以想见自由哲学处于多么枯竭的境地。¹²

845 全国工业协商委员会是个教育机构,宗旨是为全国参与课堂教学的教师提供经济科学领域和美国经济运作方面的相关讯息。里德、加雷·加勒特等人受聘创建一个新的全国教育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目的是让教师、新闻记者和知识分子(哈耶克所谓的“思想的二道贩子”¹³)了解个人自由对于经济繁荣和整个社会的重要意义。里德的任务是为这个项目筹集必要的资金。

米塞斯很清楚里德的努力。1945年5月,弗吕霍夫拖车公司(Fruehauf Trailer Company)副总裁奥尔曼先生(Mr. Allman)向米塞斯请求咨询以下问题:为了在政治上扩大“个体和私营企业的生存经营方式”的影响,可以在组织工作方面做些什么。米塞斯回复说,他的一些朋友正在制定一项即将实施的计划。¹⁴此时米塞斯可能已经和里德重新讨论了他那个得意的计划:创办一份反映自由至上主义观点的刊物。《世间大事》在前一年开始发行,不过米塞斯不太满意的是,这份刊物片面地关注反共产主义(anti-Communism)。问题不仅在于政府干预是否以共产主义理想的名义进行,还在于政府干预本身。创办一份自由至上主义的刊物,将有助于公众了解基本的经济原理。

纽约大学的长期访问

米塞斯传播自由主义福音的努力遇到一个极大的障碍,就是缺少学院背景的支持。正如绝大多数自由市场的捍卫者一样,米塞斯经常对商人和其他公民领袖发表演讲。但是,他没办法对那些正在大学学习的未来知识分子产生直接的影响。这点常常让他感到沮丧。在写给马克卢普的一封信中,他说:

846 各种组织不断邀请我去反驳马克思主义和工会学说(人们把两者视为同一回事),还有凯恩斯和汉森的理论,要求演讲内容是一篇简短的文章,可以在半小时之内读完,而且任何一个高中毕业生都能轻松理解文章的内容。“反驳马克思,但不要用高深的术语,比如价值、辩证唯物主义、平均利润率,等等。反驳凯恩斯,但不要提及乘数、流动性偏好,等等。”¹⁵

不像许多过去的学生和同事,米塞斯一直没能在某个重要大学谋得合适的职位。¹⁶他得到了一些较小的学校的聘约,例如罗切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但他不愿意去这些二流学校。1944年某个时候,一些纽约的朋友和仰慕者提出为他在纽约大学谋求一个客座教授职位。通过纽约大学的一位理事劳伦斯·费尔蒂希,他们最终和纽约大学工商管理研究生院达成了协议:学院邀请米塞斯开办一个经济学研讨班,而米塞斯的薪水则由私人基金支付。¹⁷这一安排定期延续。米塞斯于1945年2月开始了他的课程。¹⁸他在纽约大学做了二十多年的“访问”教授。¹⁹

847

这对米塞斯是个屈辱,不过,事实证明他的研讨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一开始,参加研讨班的就不仅有纽约大学商科的学生,还有来自校外的各色人等:新闻记者、商人、作家和其他大学的学生。这让人想起米塞斯在维也纳举办的研讨会。现在,新的研讨班成了纽约周边对自由放任主义学术研究感兴趣的知识分子的聚集点,同时也吸引了很多国外来访者。在维也纳的时候,米塞斯小组的成员会先在商会办公室聚会,然后转到“重返佛得角”餐厅用餐,再去金斯特勒咖啡馆继续谈话,直到深夜。而在纽约,米塞斯在纽约大学研讨班的学生会和他们的教授一起去儿童饭店(Child's Restaurant)用餐,再去拉斐特咖啡馆(Café Lafayette)继续探讨课上的话题。

研讨班的学生,如汉斯·森霍尔茨(Hans Sennholz)、威廉·彼得森(William Peterson)、乔治·赖斯曼(George Reisman)、伊斯雷尔·柯兹纳(Israel Kirzner)、拉尔夫·莱科,还有默里·罗斯巴德,最终构成了米塞斯学派的坚实核心,互相支持度过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自由至上主义的漫长冬季,并促成米塞斯主义思想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突破。米塞斯鼓励他们加入一个伟大的计划:构建一套系统、全面的自由至上主义哲学体系——这个想法曾经吸引了从16世纪西班牙后期经院哲学家时代直到曼彻斯特学派盛行时期许多有胆有识的思想家。现在回头来看,这一计划的成果可说是相当惊人。这是一次真正让学生追随充满激情和鼓舞人心的老师榜样的机会,另一方面,这个过程也创造出许多重要成就。米塞斯在纽约大学教过的学生,后来不少成为重要学者,乃至经济学、历史学和哲学领域的先驱人物,数量之多,令人惊异。

848

参加研讨班的还有一些慕名而来的日本学生,这可以说明它产生的国际影响力。米塞斯战前发表的著作很受日本读者欢迎,还有几位来自这个远东国度的教授也曾参加他在维也纳的研讨会。战后,安田银行(Yasuda Bank)给米塞斯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米塞斯的《货币与信用原理》“给日本金融界留下了很深刻的印

象,获得了极高的评价。”²⁰当这本书的日语版在1949年面世时,它的影响变得更大——它提供的思想弹药,非常及时地帮助日本抵御了美军占领以后席卷全国的凯恩斯主义思潮。²¹一位日本古典自由主义者后来回忆在自己国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冯·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名字响彻日本。战争期间,就在日本开始试验国家社会主义的时候,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出版了;我自身的经历完全证实了教授预言的准确性。战争结束后,我们不得不抛弃先前的一切,而我则期待着自由企业制度回归。后来发生了一件稀奇的事,美军登陆部队占领日本后,美国人在这实行实行的政策和国家社会主义提倡的几乎一模一样!²²

伦纳德·里德和经济教育基金会

于是,米塞斯开始在纽约大学开班授课,大约一年后,一个新机构即将诞生,这个机构后来成为古典自由主义复兴事业的支柱,并进一步扩大了米塞斯思想的影响。此时伦纳德·里德逐渐开始认为,自己在全国工业协商委员会的工作只是浪费时间和金钱。他会如此失望,主要是因为委员会采取了一个“两造兼听”的方针。这实际上意味着,委员会在华尔道夫饭店举办的双月公开会议,必须给予自由市场支持者和政府干预支持者相同的时间陈述他们的观点。伦纳德·里德认为,这个方针是对当前形势下“两造兼听”真正含义的严重曲解。按照里德的传记作家的说法:

“另一方”无处不在,不管是在政府、教育还有交流中。为了获得政府合同和订单、宽松的信贷条件,还有其他优惠政策,商人甚至主动要求政府限制竞争……如果“一方”在我们身边无孔不入,并且先发制人地主导公众舆论,而使“另一方”的声音被它发出的噪音湮没,那么,你该如何在大众面前展现“两造兼听”?²³

里德认为,继续投资一场为国家主义思想造势的报告,就是拿钱打水漂了。他还感到,自己的良知也不认可这一做法。1945年底,他辞去了职位,开始拜访捐赠人并致歉。²⁴其中一位捐赠人是纽约商人皮埃尔·古德里奇,他鼓励里德创办自己的机构。两个月后,里德建立了经济教育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

tion)(即FEE)。1946年7月,基金会搬迁到了哈德逊河沿岸的欧文顿镇(Irvington-on-Hudson)的一栋充满田园风光的房子里,位于曼哈顿以北几英里,直到现在还在那里。

里德动员了很多企业支持他的事业。他手上有一整本地址簿,而且他本人也认识很多大公司的企业高管和企业主,其中一些人还成了经济教育基金会的理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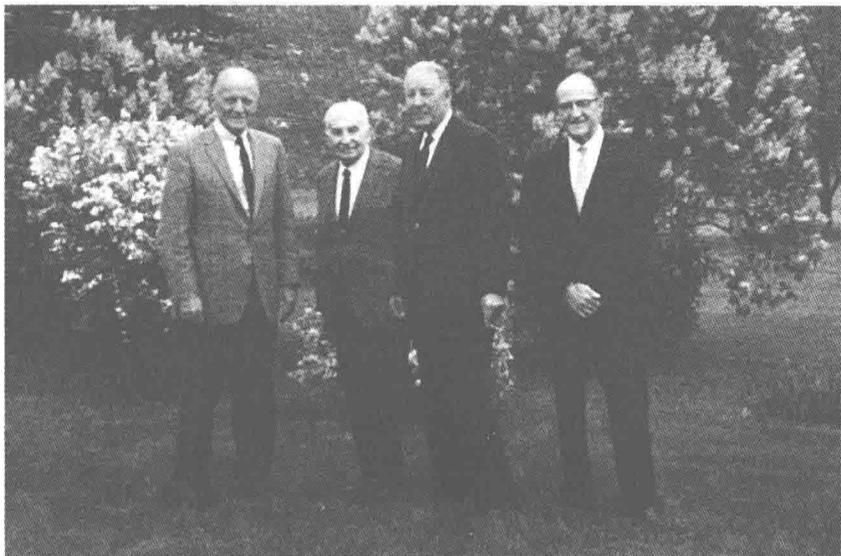
851

基金会的主要活动是,向大约3万户家庭寄送解释“自由问题”的小册子和信件。²⁵里德本人发表了很多公开演讲,并且和其他员工一起,很快开始发起周末研讨会和别的教育项目。小册子和讨论会使全国各地的学生接触到了米塞斯等古典自由主义捍卫者的著作。米塞斯本人是基金会聘用的第一批参与基金会讲座和研讨会的经济学家,此后的二十多年里一直是基金会的思想中心。²⁶

成立经济教育基金会的重大意义难以尽述。尽管基金会的活动没有得到全国更大范围的关注,但是,这个组织的存在本身就为分散的古典自由主义力量提供了中心和方向。基金会为他们带来了自从19世纪自由主义全盛时期以来一直缺少东西:家园。它为一场激动人心的回归19世纪放任自由主义思想的运动提供了物质条件和组织基础。对于政府的适当职能这一关键问题,基金会提供了一个曼彻斯特主义的回答:政府的活动应该严格限于制止“侵犯力量”或身体暴力。²⁷

852

最重要的是,基金会吸引到了许多对自由思想感兴趣的年轻人,因此,米塞斯



(左起)劳伦斯·费尔蒂希、米塞斯、伦纳德·里德、亨利·黑兹利特

最终接触到了一批自己选择参加的学生,他们比参加过纽约大学研讨班的许多学生更能接受米塞斯思想中的政治含义。米塞斯在基金会会议上首次见到的几位学生后来参加了纽约大学每周一次的研讨会,在这些研讨会上,米塞斯能够更加细致地阐述自己的观点。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经济教育基金会为抗衡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即将冒出的新自由主义正统学说提供了一些思想砝码。弗兰克·奈特和亨利·西蒙斯(逝世后)分别于1947和1948年出版了自己的文集,却让他们原来自由至上主义的形象大打折扣,甚至无法分辨他们的思想与社会民主主义有何不同。²⁸芝加哥学派的成员还有阿伦·迪雷克托(Aaron Director)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基金会的影响固然不大,但是如果没有它,芝加哥学派将会完全占领美国自由市场的思想阵地。

弗雷德里克·尼迈耶

几乎就在里德创办这家位于纽约欧文顿镇的经济教育基金会的同时,米塞斯认识了一位新朋友,此人后来成了米塞斯长期的盟友。1946年5月,芝加哥商人弗雷德里克·尼迈耶读了米塞斯的《货币与信用原理》,写信询问作者是否还有其他著作更加深入地讨论这一主题。²⁹接下来的几个月,尼迈耶读了《全能政府》和米塞斯的其他一些英文著作。他是米塞斯作品的理想读者。他在20年代早期接受过经济学教育,后来成了哈佛商业周期指数(Harvard Business Cycle Index)的一名区域代表。他非常熟悉当时美国盛行的货币思想。他发现,《货币与信用原理》中的“方法与机械的货币数量理论完全不同”,因此,他“在理解您的阐述时遇到了一些困难”。造成困难的一个原因是术语上的差异,因此,尼迈耶继而对米塞斯理论中一个关键概念提出疑问:货币需求。³⁰米塞斯同意,他对这个概念的阐述——货币需求就是对购买力的需求——有些模棱两可,更好的表述是:市场参与者有现金持有的需求。米塞斯保证将据此修改自己的著作,并在今后的经济学论文中考虑这个问题。

一段长久的盟友关系就此开始(虽然从未真正超出私交)。尼迈耶很快开始阅读其他奥地利学派著作的英文版,特别是庞巴维克的《资本与利息》。渐渐地,他成了奥地利学派全心全意的仰慕者。他还是一位忠实的加尔文派信徒:“庞巴维克超越了亚当·斯密,正如加尔文超越了路德。”³¹

米塞斯的不可知论并未减少尼迈耶对奥地利经济学家的崇敬。而且,这也没有阻碍米塞斯与美国基督教自由至上主义者之间公开而富有成效的合作。在奥地

利,这样的合作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基督教社会党已经把天主教会推向了思想死路。只有像塞佩尔主教那样的杰出人物,才能克服社会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米塞斯的不满情绪。但是美国的情形很不一样,很多美国的新教牧师热爱个人自由和自由市场,而且他们认为这种热爱是从基督教信仰中自然而然得出的结果。他们中的很多人认为米塞斯的理论是对自己信仰的一种补充。

一位加拿大英国国教会的高级牧师阅读了《人的行为》,并给米塞斯写了信,米塞斯在回信中写道:

您提到福音书不提倡反资本主义政策,对此我完全赞同。数年前,我在自己的作品《社会主义》中探讨过这个问题……我更赞同您的另一个观点:“在《人的行为》一书中,没有一句论述是与基督教信仰相对立的。”³²

米塞斯非常欢迎“精神动员”组织(Spiritual Mobilization)发行它的月刊《信仰与自由》(*Faith and Freedom*)——“精神动员”是1949年12月成立于洛杉矶的一个组织。当然,米塞斯也很清楚大多数新教领袖都支持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或干预主义,而且,天主教会虽然“勇敢地与共产主义战斗”,却并未反对社会主义。不过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他的研究领域了:“我觉得由神学家们讨论这些问题,才是恰当的。”

855

这也是弗雷德里克·尼迈耶的想法。尼迈耶推广米塞斯著作的主要动机是,他认识到放任资本主义思想和基督教教义之间存在互补关系。

米塞斯和尼迈耶第一次见面可能是在1948年1月底。而后,尼迈耶开始思考为什么奥地利经济学派没有在美国兴盛起来,他的结论是:奥地利学派的著作还不够知名。那年秋天,他准备采取行动,尤其是可以借助他的厚厚的地址簿。(“我认识本国一些优秀的企业家。我也是一些重要董事会的成员。”³³)1949年1月底,尼迈耶又见了几次米塞斯,之后想到了一个计划:在芝加哥大学(或者在芝加哥地区别的某所合适的大学)创办一个由米塞斯领导的“自由主义研究所”(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院长是尼迈耶的朋友)³⁴尼迈耶已经争取到了合作伙伴罗伯特·W.贝尔德(Robert W. Baird),还有他的朋友——J. I. 箱包公司(J. I. Case Company)副总裁约翰·T. 布朗(John T. Brown)的支持。截至1949年5月,他们已经和芝加哥地区的很多商人谈了这个计划。

4月底,芝加哥大学告诉尼迈耶,他们更希望这些“不受限制的礼物”能够遵循“学术自由”原则——也就是说,将由大学挑选合适的人选进入计划建立的自由主

856

义研究所工作。米塞斯评论道：

基于这个口号（“学术自由”），各个大学联合抵制了那些敢于站在社会主义之外的其他立场反对干预主义的经济学家。今天的学术自由问题不是：是否应该容忍信仰共产主义的教师？而是：是否只有信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者干预主义的人，才能得到聘用？³⁵

不过，这种抵制并不只来自大学。几年后（变得更加睿智），米塞斯了解到另外一个因素的存在：

当前事态最坏的特征之一就是校友的“愚忠”。只要有人胆敢批评涉及某所大学的任何事物，所有校友都会起来拯救他们的母校。于是我们看到这样奇特的状况：大企业竟然支持大学教员抵制那些不赞同干预主义、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的人。³⁶

不管怎样，在芝加哥大学创办一个由米塞斯领导的“自由主义研究所”的计划没能实现。不过，尼迈耶和他的朋友可能在哈耶克来到芝加哥这件事上出了些力。另外，20世纪50年代初朝圣山学社筹集会议经费的时候，尼迈耶也起了重要作用。³⁷

米塞斯与美国自由至上主义之争

随着纽约大学研讨班的开设、经济教育基金会的成立，以及诸如尼迈耶这样的组织者和出版人的出现，米塞斯的学生和支持者构成了一个真正意气相投的关系网络，这是米塞斯有生以来第一次享有这样的待遇。米塞斯一直是受人尊敬的学者，但他的读者和朋友中很少有人真正欣赏他激进的反国家主义思想，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s）者尤其如此。新自由主义者希望政府负责创造竞争，他们为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准确判断力和务实立场感到自豪。这些人谴责米塞斯在捍卫自由的知识大战中过分夸大了逻辑论证的作用。如果这个指控正确，那么米塞斯无疑是有罪的。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米塞斯“用最严密的逻辑进行斗争，有时甚至连他的朋友都觉得有些过头”。³⁸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C. 西蒙斯就是这样一位朋友，他赞扬米塞斯是“在世最伟大的经济学教师”，也是“他那个时代最顽固的

老派自由主义者或曼彻斯特主义者”。然而西蒙斯也感叹道：“米塞斯可能也是他自己自由至上主义事业最大的敌人。”³⁹

但在新的朋友圈子中,情况则完全不同。许多通过纽约大学研讨班和经济教育基金会活动认识米塞斯的新人,比他本人还要崇尚自由至上主义。突然之间,研讨班中偏向国家主义立场的一方有好几次成了米塞斯自己。美国自由至上主义者如伦纳德·里德和 R. C. 霍伊尔斯,非常强调基于“互不侵犯”原则(“不首先使用暴力”原则)界定政治自由。例如,在《人的行为》出版后,霍伊尔斯曾在私人信件里对米塞斯提出批评,因为米塞斯承认,在单一语言国家,公共教育可以“运行良好”,如果只限于传授阅读、写作和算术的话。霍伊尔斯把这视为一次毫无必要的退让。在他看来,即使在米塞斯所说的条件下,公共教育的存在也是不合理的:

858

事实是,一些并不希望孩子接受公共教育或者没有孩子的人被迫为公共教育买单。这个例子说明,多数群体有权强迫少数群体为他们觉得必要的一切买单。如果这还不算最糟糕的那种政府干预,我真不知道干预到底意味着什么了。

当你做出这个让步,你就否认了我们的政府只能拥有有限的权力。在我看来,政府干预和暴力侵犯等同。请你理解,我并不反对使用武力阻止某人作恶,但是政府没有首先使用武力的权利。政府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防止他人干预自由市场的运作,以及防止他人使用武力强迫某人为其不想要的东西买单。⁴⁰

这一视角完全不同于米塞斯讨论政治问题时的功效主义思路。米塞斯认为谁先开始使用武力这个问题在政治上无关紧要,因为众口不一,很难达成一致。唯一重要的是:为了实现行为主体的最终目的,先行使用武力是否合适,哪怕他的行为从道德角度来看是错误的。大约十年后,米塞斯给威斯康星州一位出版商寄了一封只有两句话的回信,内容意味深长:“我以极大的兴趣读了您令人鼓舞的来信。在我看来,支持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理由是:这一制度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提升了平民的生活水准。”⁴¹

859

此外,米塞斯和美国自由至上主义者之间还有另外一个更加实质的分歧,就是民主问题。经济教育基金会成立几个月后,F. A. “秃头”哈珀(F. A. “Baldy” Harper)认为有必要撰写一份四页的秘密备忘录,为米塞斯关于民主制的观点辩护,反驳奥瓦尔·沃茨的批评,因为后者认为民主制是美式自由主义的对立面。⁴²米塞斯

本人也在1947年与罗丝·怀尔德·莱恩的通信中品尝到了反对民主制独特的美国风味。显然,他们已经和霍伊尔斯等人一起吃过午餐,在莱恩的印象中,米塞斯相信他们对于这些基本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当时的场合她认为不适合探讨这个问题,但她后来写信给米塞斯澄清:

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当然从根本上反对民主制,反对所有提倡或支持民主制的人,因为民主制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社会主义的基础。

民主政治正在摧毁美国政治结构、美国法律和美国经济,正如麦迪逊曾经说过的那样,而且麦考利(Macauley)[原文]也曾预言民主政治将在20世纪造成破坏。⁴³

860 米塞斯没有兴趣讨论这个问题,而且表示自己从不回复那些形容他的作品“老套”或“胡言乱语”的人——正如莱恩在一篇书评中所写的那样。⁴⁴这种状况持续了两年多,后来因为莱恩与霍华德·皮尤之间的友谊,米塞斯和莱恩重新开始以较文明的方式辩论。米塞斯反对莱恩的主要原因是莱恩误解了他。米塞斯从没鼓吹过任何一种具体的议会民主政体,他仅仅强调了以下事实:任何政治体制的运作最终都取决于民众舆论。⁴⁵

米塞斯的美国朋友不同意这一看法,他们继续讨论和通信,然而一直没有结果。不过,这位奥地利学者及其美国读者和学生之间持续的交锋却成了自由至上主义理论继续发展的动力。后来,米塞斯的学生默里·罗斯巴德结合了“不首先使用暴力”原则(non-initiation-of-force criterion)和典型的米塞斯主义者关注的私有财产权利,最终非常谨慎地发挥了米塞斯主义经济学中的激进含义。于是,罗斯巴德创造出一种混合了自由至上主义经济学和自然法伦理学的新学说,这一学说直到今天仍然吸引着许多知识分子的关注。

新环境的激进主义氛围与米塞斯过去朋友的心态形成了鲜明对比——以中欧的标准来看,米塞斯的那些旧识是自由至上主义者;但以美国的标准来看,他们就成为了温和的干预主义者。弗里茨·马克卢普就是这样的例子。1946年,他写信给米塞斯说自己不想为亲工会(pro-labor-union)的听众演讲,请求导师给予精神上的支持。他写道:

861 我需要您的建议:我很快要为美国商会做一次演讲,题目是“作为一般垄断问题之一的垄断工资确定问题”。演讲内容将公开出版,可能会引起不合

我心意的过多关注。如果这场演讲是在科学论坛上举行,我可以引经据典,特别是穆勒等等。但是面对商会,我必须面对现实,讲点策略。我将别无选择,只能如实相告:垄断工资是工会存在的唯一目的,而且,强大的工会组织意味着失业、通货膨胀和独裁国家的形成。一个正直的人怎样才能避免说出这样的话?我还有别的选择吗?……

如果出于政治考虑,无法宣告工会存在的不合法性——假设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我们是否可以考虑政府限制个人工资的增长水平?当然,我指的不是通过国家制定一个固定工资,而是一般性地禁止劳工工资的增长……比如在三年内涨幅不得超过10%,或者诸如此类。这样的做法当然是不可思议的。只字不提这种权宜之计是否更加明智?这样的限制是不可能被接受的。⁴⁶

米塞斯回信说,如果是他自己,他会告诉商会:“首先,把你们自己从错误观念中解放出来。学习经济学。然后再去说服其他人。”米塞斯强调:“我不认为我们有权废止或限制结社自由。除了强权,不应取缔任何自由权利。”⁴⁷

两人之间的通信本来就已相当少见,自此以后,他们的关系更冷淡了。这一隔阂在米塞斯八十岁生日前消融了不少,但在60年代中期,他们的关系是最差的。

862

计划造就混乱

早在1943年,蒙特斯·德奥卡就和米塞斯谈过为西班牙版《社会主义》撰写后记的事,但米塞斯可能直到1945年才开始动笔。在此之前,西班牙版的翻译进度还不得而知。而且,蒙特斯·德奥卡此时还没有完成任何一个他们在1942年商议过的计划,所以米塞斯在考虑给他安排的新的任务上十分小心谨慎。另外,米塞斯甚至还没收到之前已经谈妥的一项墨西哥研究的报酬。西班牙版《社会主义》的墨西哥出版商请米塞斯给他们写一篇讨论苏维埃实验的后记,原因在于这个话题本身很有意思,而且这样能使这本书赶上现在的社会潮流。米塞斯的回复含糊其辞,他建议最好还是为《社会主义》西班牙版写一篇特别的导论。⁴⁸

1946年1月初,米塞斯最终收到了他在1943年所写的墨西哥研究报告的酬劳。他也很快投入到了后记的写作中。打印手稿大约是在1月底完成的。⁴⁹

1946年7月和8月间,米塞斯又开始在墨西哥市举办讲座了。7月的最后几天,哈耶克也加入进来。⁵⁰他们游览了中央高原(Central Plateau),并在查帕拉湖畔

863

(Lake Chapala)住了一段时间。⁵¹旅途中,米塞斯还在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做了一场演讲(8月27日)。蒙特斯·德奥卡担任讲座翻译,这样就能吸引到更多听众。

米塞斯此行的目的之一是讨论那个旷日持久的创办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计划。计划似乎提出之后就搁置了——后续通信没有再提及这个计划。不过,现在另有一个计划渐趋成形。哈耶克试图召集大西洋两岸的古典自由主义学者,建立一个致力于促进个人自由的国际学术团体。他计划在第二年举办一次会议,确保米塞斯参与其中。

本年年底,蒙特斯·德奥卡出任中央银行墨西哥银行(Banco de Mexico)的行长。他的团队后来邀请黑兹利特(1947年1月初)、汉森和哈伯勒举办讲座(1947年7月)。米塞斯本人也在1947年8月再次收到邀请,举办一期批判性地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系列讲座。⁵²

米塞斯刚回纽约,就得知亨利·黑兹利特被迫离开了《纽约时报》。这不是黑兹利特第一次因为政治主张丢掉工作。1933年,黑兹利特曾辞去《国家》(*The Nation*)杂志文学编辑的职位,因为该刊不欢迎他对新政抱有敌意。离开《纽约时报》对黑兹利特而言是一大挫折,但他很快在《新闻周刊》(*Newsweek*)找到了新工作。他在《新闻周刊》能够拥有与在《时报》一样的言论自由。此后他为《新闻周刊》撰写专栏长达二十年,直到再次因为意识形态原因离开。

864 米塞斯的情况比黑兹利特好得多。他继续“访问”纽约大学,在1947年的春季学期开设了一门关于货币改革的课程。1946年秋季学期,米塞斯还见到了很多欧洲经济学家,例如雅克·吕夫、弗朗索瓦·佩鲁、特里格维·霍夫(Trygve Hoff)等人。他们来到美国旅游,并在经济教育基金会和其他机构举办讲座。⁵³其中一个讨论主题似乎就是哈耶克的计划,即建立一个国际古典自由主义学术团体。

朝圣山会议

位于纽约的经济教育基金会成立刚满一周年,一个新的组织诞生了。这个组织提供了一个交流和促进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平台,与基金会不同的是,这个组织没有固定的总部。按照设想,它是学院学者的社团,主要活动就是年会,后来他们在世界各地许多不同城市举办过年会。最重要的是,这个团体是在新自由主义的精神下成立的。从那时起,新自由主义的学者、政治家和新闻记者一直是会员的主体。⁵⁴

建立这个团体是1938年路易·鲁吉耶在巴黎举办的李普曼大会的后续行动。而这一次,主动权自然落到了哈耶克手中。这时哈耶克在大西洋两岸都很出名,这归功于《通往奴役之路》的成功,也因为哈耶克是战后最早与大陆同行恢复联系的西方知识分子之一。⁵⁵在这些会面中,创建一个自由主义组织的想法逐渐成形。1946年7月底哈耶克在墨西哥见到米塞斯的时候,肯定和他讨论过这些想法,但在那时还没确定具体的计划。随后,他从墨西哥飞到了奥斯陆,特里格维·霍夫在那里组织了一次筹备会议。筹备会议讨论了一些模糊的计划:建立一个欧洲知识分子组成的新自由主义协会。“阿克顿-托克维尔协会”(Acton-Tocqueville Society)的计划肯定就是在这场会议上成形的。⁵⁶到年底,哈耶克已经从瑞士(通过于诺)和美国(沃克尔基金会)筹到了协会成立所需的资金。随后他给五十多人寄了邀请函,请他们来瑞士阿尔卑斯山,在朝圣山脚下的日内瓦湖畔参加一个为期十天的会议。

865

哈耶克可能预见到了米塞斯的反应:在寄给米塞斯的邀请函中,哈耶克附上了一份手写的道歉信,为他没有时间和米塞斯详谈计划细节而表示歉意。他的担心果然应验。米塞斯勃然大怒,并写信告诉哈耶克,4月份他绝不可能离开纽约大学,并且“痛恨要去欧洲的主意。我已经看够了衰退”。⁵⁷应黑兹利特的请求,米塞斯写了一份四页的备忘录,其中包含了他的“对哈耶克教授计划的一些意见”。他说,在过去几十年里,为了遏制极权主义浪潮,出现过许多类似的计划,他自己就参与过其中的一些,但每次都失败了,因为这些自由之友也被国家主义病毒感染了:“他们没有意识到,自由是与市场经济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大体上接受了社会主义方案的关键部分。他们投入了一个折中的方案,也就是干预主义。”在备忘录的结尾,他陈述了自己的主要异议:

866

哈耶克教授计划的缺陷在于,实现这个计划所仰赖的许多人是以他们对干预主义的认可而闻名的。在会议开始前澄清这点很有必要。按照我对这个计划的理解,这场集会不是为了重新讨论一条政府法令或一个工会决议是否能够提升民众生活水准这样的问题。如果有人打算重新讨论这些问题,他也没必要去朝圣山朝拜了。他可以在周围找到足够多值得他朝拜的事物。⁵⁸

他在写给哈耶克的信中表达得更为具体:

首先我很担心勒普克的参与,你知道他是一位直言不讳的干预主义者。我

对勃兰特、吉迪恩斯(Gideonse)和伊斯门也持同样看法。这三位都是彻底的社会主义刊物《新领袖》(*New Leader*)的撰稿人——尽管该刊是坚定反苏联的。⁵⁹

867 尽管如此,米塞斯并未否认自己会参加会议,但他提议将会议时间推迟到9月。然而这个提议不太现实。2月初哈耶克再次试图说服这位旧时导师。他淡化了勃兰特、吉迪恩斯和伊斯门与《新领袖》之间联系的重要性,还提到自己就为本杂志撰稿。更重要的是,哈耶克指出会议计划仍然相当开放,而且,这场即将在日内瓦湖畔举行的会议(还有随后的一些会议),主要目的就是争取那些历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加入——他们在许多问题上还持有错误的观念,但是愿意接受新的思想。⁶⁰这点似乎足以说服米塞斯参加会议了。在哈耶克的建议下,米塞斯和这次会议的主要赞助者——位于堪萨斯城的威廉·沃尔克基金会取得了联系,不到一周,经济教育基金会就为米塞斯的行程作好了安排。

* * *

这可能是米塞斯第一次以个人身份接触哈罗德·W. 卢诺(Harold W. Luhnow)和资金充沛的沃尔克基金会。事实证明,这在未来的十五年里将是非常有益的联系,直到60年代基金会进行清算为止。

868 威廉·沃尔克(1859—1947)生于德国,1882年在堪萨斯城创办了一个家具企业,赚了一大笔钱。⁶¹1911年,52岁的沃尔克终于结婚。在那之后,他成了一位慈善家。1932年,他最终设立了私人基金会,以保护他的资本免受税法(尤其是1916年颁布的新的所得税法)蚕食。很有可能是沃尔克本人批准了赞助朝圣山学社会议的计划,因为会议时间是在他去世前7个月。不过更有可能的是,他的侄子哈罗德·卢诺(Harold Luhnow)已经在他之前做了决定。卢诺在1944年担任了基金会的董事,在他的领导下,基金会成了自由至上主义学术研究的主要赞助者。⁶²显然,卢诺的自由至上主义思想主要来源是洛伦·米勒(Loren Miller)。米勒在1942年到1944年间是堪萨斯城公民研究所(Kansas City Civic Research Institute,一个沃尔克基金会投资创办的机构)的高级主管,后来他去了底特律政府研究局(Detroit Bureau of Governmental Research)——战后自由至上主义的另一处资金来源。

沃尔克基金会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美国。到1953年底,基金会事实上为所有朝圣山学社的非美国籍会员支付了会费。⁶³基金会和米塞斯联系非常密切,特别是在卢诺聘用了曾为经济教育基金会工作的赫伯特·康努埃尔(Herbert Cornuelle)和理查德·康努埃尔(Richard Cornuelle)之后。⁶⁴

其他自由至上主义智库和基金后来大多误入歧途，慢慢偏离了它们最初的原则。沃尔克基金会没有走上这条道路。基金会在60年代初进行了清算，当时，董事职位落入了那些不认同基金会创始人自由至上主义倾向的人的手中。

* * *

朝圣山会议于1947年4月1日召开，为期十天。米塞斯在3月25日离开纽约，满怀期待地回到了将近七年未曾踏足的欧洲。会议的议程安排非常简单，与会者拥有充分的自由，自行决定他们将在接下来几天内探讨的话题。

米塞斯和经济教育基金会的里德、哈珀和沃茨，还有黑兹利特和达文波特（《财富》杂志）代表了会议的曼彻斯特主义边缘群体。哈耶克、弗里德曼和马克卢普是新自由主义者；其他诸如瓦尔特·奥伊肯、哈里·吉迪恩斯、贝特朗·德·茹弗内尔（Bertrand de Jouvenel）、弗兰克·奈特、迈克尔·波兰尼、卡尔·波普尔、威廉·勒普克和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这些人，则是自由派社会民主主义者。莫里斯·阿莱斯（Maurice Allais）和莱昂内尔·罗宾斯代表会议的极左派。阿莱斯甚至没法同意4月8日所有其他与会者都表示赞同的模糊的“目标声明”。

哈耶克在公开演讲中确立了战后古典自由主义思想重建运动的议程。按照他的解释，这一议程一方面包括“一段时间以来，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已经受到某些意外的污染，必须对此进行清理”；另一方面，“应该面对那些真正的问题，而某些过分简化的自由主义却回避了这些问题，或者，这些问题正是由于自由主义转向了某种固定、僵化的信条才凸显出来”。⁶⁵正如后来的发展所揭示的，这一计划的具体



威廉·沃尔克

869

870



1947年朝圣山学社首次会议；罗宾斯（最左边）、马克卢普（左边窗户前）、哈耶克（中间）；右边依次为：拉帕特、米塞斯、奥伊肯、斯蒂格勒

意义包括：(1)为古典自由主义受到的广泛批评提供辩解，例如，很多人认为自由主义推动的政策使得大众遭受苦难；(2)把“现代”自由主义和它的前身放任自由主义区别开来。

然而，其他一些预定的演讲，虽然较“新”，却较少“自由主义”的意味。例如，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奥伊肯解释说，要与垄断作战，仅仅制定反垄断法是不够的。立法需要深入推进到各个具体领域，例如公司法、专利法、商标法。他推崇两条经济政策的箴言：第一条是，尽管存在契约自由这回事，但不能利用这项自由限制他人的契约自由；第二条是，应该强制垄断市场参与者按照某种特定方式行事，使得他们像身处“竞争”中一样——也就是说，按照“竞争”市场可能达到的价格水平和产量，决定他们的价格和产量。

871 简言之，奥伊肯端上了一盘曾经支配了1938年李普曼大会的干预主义大餐。那个时候，米塞斯正在巴黎度蜜月，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对这些讨论的反应一反常态地平淡乏味。九年后，他的蜜月期结束了。他以极大的决心反击，捍卫自己的放任自由主义立场，他的态度如此激烈，以至于多年后，朋友劳伦斯·费尔蒂希仍然记得那场辩论。米尔顿·弗里德曼最终表示同意：

我们会议的特点就是就以下论题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宗教和道德价值在创造并保持一个自由社会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工会的作用以及政府行为影响收入分配的适当性。谈到这些论题，我对其中一次讨论的记忆尤为深刻：在争论过程中，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突然站起来，向大会宣布“你们全都是一群社会主义者”，然后怒气冲冲地离开了会议室。然而，即使以最低标准来看，会场上也没有哪个人可以称为社会主义者。⁶⁶

872 弗里德曼没有说明他的“最低标准”是指什么。无论如何，那时米塞斯还是能对社会主义者保持尊重的，因此这一事件也就表明，他对社会主义者混入自由主义者行列的行为实在难以容忍。米塞斯和新自由主义对手的交锋奠定了朝圣山学社未来几年的基调。威廉·勒普克后来还是对米塞斯致以友好的赞美，尽管米塞斯对“朝圣山学社很多成员的无知精神进行了讽刺性的评论”，其中包括勒普克本人。⁶⁷围绕在米塞斯身边的自由至上主义者是少数派，不过，他们得到了美国主要赞助者如沃尔克基金会的资金支持。如果没有这些支持，学社在建立之初的几年就会迅速消亡。只要米塞斯积极参与的会议，要想深入讨论一项获得批准的政府干预措施的细节就是不可能的。放任自由主义已经东山再起了，虽然它还不是主

流观点,但至少是可争论的,也确实引起了一些讨论——对于学社的一些创始会员如莫里斯·阿莱斯来说,这有点吃不消,他很快因为这个原因退出了学社。⁶⁸

除了这些根本的分歧,会议非常成功。4月9日,大约40位与会者建立了朝圣山学社,并选举哈耶克担任主席。⁶⁹

筹备反革命行动

1945年3月,耶鲁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美国版的《国民经济学》。不过不是简单地把德语译成英语。各方一致同意出版一部修订本。⁷⁰接下来的三年半里,米塞斯为了这个计划加紧工作。这次修订没有进行实质的修改。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使作品适应美国读者的思想背景。关于这项任务,米塞斯从亨利·黑兹利特和耶鲁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尤金·戴维森(Eugene Davidson)的经验中获益良多,他们两人提了许多涉及各个领域的建议。例如,美国人十分看重理论和政策建议,就像乔治主义的土地税收理论(Georgist theory of land taxation),因此米塞斯增加了相关论述。⁷¹不过,米塞斯特别修改了书中关于人类行为科学基本哲学问题的讨论。例如,在德文版中,米塞斯认为有必要详细反驳奥特马·施潘的“普遍主义经济学”;现在他则几乎完全删去了这一段,代之以对实证主义和经济理论中的定量方法的驳斥。

873

米塞斯增加了一章全新的讨论——唯一在《国民经济学》原著中没有对应内容的章节,来探讨概率论的基本问题。那时,定量方法已经支配了英语国家的经济分析领域,而概率论就是定量方法的核心。米塞斯的弟弟里夏德开创了所谓的相对频率概率论(relative-frequency theory of probability),在这一章,米塞斯趁机以里夏德的著作为基础,加以发挥。米塞斯大大简化了这一理论的公理阐述,指出其中的标准描述是多余的,不过他没有提及弟弟的名字。



米塞斯与玛吉特开着自家车兜风

米塞斯对弟弟作品的修正不只是学术方面的贡献,同时也是一场典型的“奥地利式”文献争论。十二年前,里夏德曾冒险涉足过他长兄的学术领域,并在自己写的一本书中称放任政策不存在任何科学优点。⁷²现在路德维希予以反击,

874

他向大家证明相对频率理论的表述可以变得多么简洁。

《人的行为》差点成了米塞斯的首部遗著。1948年10月,米塞斯和玛吉特出了一场很严重的车祸。⁷³不过他们死里逃生。1949年春,路德维希对这本书进行了收尾工作。而后他将手稿的副本寄给了出版商和朋友,贾斯珀·克兰就在寄送名单之列。贾斯珀经营着范·诺斯特兰出版公司(Van Nostrand Publishing Company),米塞斯是通过经济教育基金会认识他的。⁷⁴

德国的新自由主义政变

1947年的朝圣山学社会议足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满足米塞斯对欧洲和欧洲学者的好奇心。欧洲成了一片废墟,巴黎也衣衫褴褛。他甚至没有考虑过要回奥地利,欧洲的美好回忆都留在了过去。米塞斯觉得没有必要回旧大陆,因为在那里他只能看到国家主义的愚蠢统治所招致的可悲结果,而这正是他奋斗了一辈子想要避免的状况。下一届朝圣山学社会议计划于1949年7月在瑞士小镇塞利斯贝格(Seelisberg)召开,米塞斯接到会议邀请时,拒绝了。⁷⁵

875

但是,米塞斯在沃尔克基金会的美国朋友们认为,他的参与对学社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只要有他在场,那些干预主义者就没法放开手脚行动。朝圣山学社不仅为美国自由至上主义者提供了国际视野,还使他们能够接触许多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这在美国本土是办不到的。

不仅如此,历史的一大讽刺就是,自由主义原则刚刚在德国大获全胜,因此,深入了解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和德国改革运动的知识分子领袖,将有助于自由至上主义者在美国本土的斗争。美国没有人了解那些改革者,因此对他们非常好奇。⁷⁶伦纳德·里德收到来自德国的消息后,便向米塞斯打听艾哈德这个人。回复如下:

我对艾哈德教授唯一的了解就是,他是经济顾问委员会(Economic Advisory Board)的主席。这个委员会奉行适度干预原则,反对德国各大政党以及彻底倒向社会主义的英国占领军政府所实行的激进的新政主义措施(New Dealism)。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的坚持,可能是由于艾哈德毫不妥协的态度和他对真正自由主义原则的阐述所产生的强大说服力。⁷⁷

然而,若要了解真实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亲自前往欧洲会见艾哈德本人及其

支持者。但是卢诺认为,一定要有米塞斯这样的人参与会议,并为会议确立正确方向,才值得这么做。后来,在赫伯特·康努埃尔和洛伦·米勒的协调下,卢诺力劝米塞斯参加即将在塞利斯贝格召开的学社会议。米塞斯接受了。这将是米塞斯在流亡国外后第二次回到欧洲。⁷⁸

876

6月的某个时候,米塞斯离开了纽约,然后于7月3日前往塞利斯贝格,7月10日离开。会议特别安排了有关劳工市场问题的讨论。⁷⁹不过,正如预料的那样,有关西德近期发生的事件的讨论使得整个会议其他主题黯然失色。

1948年3月,路德维希·艾哈德出任英美占领区的经济管理部门行政长官。艾哈德是社会自由主义(social-liberal)社会学家弗朗茨·奥本海默的门徒,他在自由至上主义的世界还籍籍无名——这或许正是他能够得到这份工作的原因。⁸⁰然而正是这位籍籍无名的艾哈德不失时机地筹划了一场自由主义政变。任职三个月后,艾哈德做出了两项大胆的决定。他违背了英国占领军政府的管制措施,几乎全面废除了价格管制,并且发行了一种新货币:德国马克。

877

第二天,商店里就堆满了商品。战后的几年里,商人削减了生产,零售商囤积商品,拿到黑市出售,以便卖出更高价钱。这些可悲的状况都是纳粹的价格管制体系造成的。这个体系使生产者难以获利,还把开放市场变成了黑市。盟军的占领部队在一小群尚有影响力的左翼经济顾问的要求下,继续维持着这个体系。这些经济顾问认为,中央计划和政府管制比较符合时代潮流。⁸¹艾哈德废止了这个体系,从而创造了将于1949年秋天成立的(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western]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的经济基础。不仅如此,他还推行了一个古典自由主义方案,取代用于战后重建的马歇尔计划。⁸²

艾哈德实行改革一年前,也就是1947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已经提出了通过大规模支出美国税款重建欧洲经济的建议。⁸³在随后的数十年里,人们根据其倡议者的观点,一遍又一遍讲述和重述马歇尔计划的故事,使它慢慢成了现代福利国家的神话。所有西方国家的高中生都知道,马歇尔计划提供的政府支出开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的经济快速增长阶段。

878

然而基于冷静客观的经济思维,我们可以看出,马歇尔计划本质上是个延缓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破产的方案。在私人通信里,米塞斯指出,欧洲各国已经“将铁路、电报、电力、电话、矿山以及很多工厂国有化了”,他继续补充道:

他们已经通过对较高收入征税侵占了大量财富,继续推动这种搜刮富人的政策已经无法为他们带来更多收益。于是,他们希望美国纳税人为他们光

荣的社会主义政策所导致的财政赤字买单。他们称这个方案为马歇尔计划。⁸⁴

879 1948年12月,当伦纳德·里德咨询米塞斯对艾哈德的看法时,米塞斯还不认识这个人。随后几年,米塞斯才开始阅读艾哈德的一些作品。米塞斯发现艾哈德的著作准确反映了他的一些顾问如科隆的经济学教授阿尔弗雷德·米勒-阿尔马克(Alfred Müller-Armack)、威廉·勒普克和瓦尔特·奥伊肯的观点。50年代,米塞斯意识到艾哈德自由市场改革的成功很容易被用来反对市场经济,因为他的改革是以干预主义的名义“兜售”的。因此,米塞斯在自己最出色的著作中以一篇很长的评论向这些德国的改革者表达了敬意:

最近出现的干预主义变种——德国“社会市场经济”(soziale Marktwirtschaft)——的支持者们强调,他们认为市场经济是最有可能实现也最令人满意的社会经济组织体系,同时,他们也反对社会主义的全能政府。当然,所有这些中间路线政策的拥护者也以同样的热情强调了以下这点:他们拒绝曼彻斯特主义和放任自由主义思想。他们说,无论何时何地,只要“经济力量的自由运作”未能产生“对于社会而言”的有益结果,政府就应干预自由市场现象。在做出这样的断言时,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某种特定情况下的经济状况,从“社会”角度来看是否应受谴责,应由政府判断,因此,一种市场状况是否需要政府干预,也就完全取决于政府了。

880 所有这些干预主义倡导者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方案意味着确立政府对全部经济事务的全面控制,因此,最终导致的结果可能与兴登堡模式或德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政府有权判断某种经济状况是否需要干预,那就没有什么自由运作的空间留给市场了。于是,最终决定市场应该生产何种商品、多少数量,以及质量、生产者、生产地点、生产方式的不再是消费者,而是政府。一旦自由市场的运作产生了当局认为对于“社会”不好的结果,政府就会进行干涉。这意味着,市场只有准确遵循政府的意愿行事,才是自由的。市场可以“自由地”按照当局认为“正确”的方式行事,却不能做出当局认为“错误”的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取决于政府。因此,干预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必然倾向于抛弃最初那些使它区别于彻底的社会主义的特点,而将极权主义的全面计划原则全盘接收进来。⁸⁵

米塞斯的保留意见没有因为他与德国新自由主义“秩序”学派(“Ordo” school)代表人物的私交而有所收敛。事实恰恰相反:在50年代中期的私人通信中,米塞斯表示:“我越来越怀疑,是否有可能在朝圣山学社中与秩序—干预主义进行合作。”⁸⁶

* * *

1949年朝圣山学社会议的会址是欧洲自由至上主义的传奇地点之一:坐落于塞利斯贝格山脚下的塞利斯贝格镇。会场位于吕特利维斯(Rütliwiese),附近的牧场正是1291年8月初一批瑞士爱国者的秘密聚会地点,他们在那里策划推翻鲁道夫皇帝的统治。当时,鲁道夫皇帝强加了许多名目繁多的新法律和新的课税。朝圣山学社的会场是在宾馆里,条件更加舒适,而且也并不是所有与会者都急于推翻迅速壮大的新福利国家。比如,威廉·勒普克更加关心的是,在反对“无产阶级化”的斗争中,如何界定政府的角色。卡尔·波普尔则试图在教育和研究领域探讨同样的问题。⁸⁷

881

纽 约 人

米塞斯回到曼哈顿短暂停留之后就前往墨西哥,整个8月都在那里为墨西哥文化协会(Asociacion Mexicana de Cultura)举办讲座。7月29日晚上,他和玛吉特到达了目的地,随后迅速开始了他的十二次经济学理论课程,除了理论探讨,他还带着学生纵览了过去200年间的欧洲历史,并徜徉在思想史的殿堂里。此外,他还解释了“凯恩斯是如何受到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又是如何在很多方面超越他们的”。⁸⁸研讨会的参与者享有提前获得《人的行为》样书的殊荣。⁸⁹

逗留期间,蒙特斯·德奥卡再次委婉地提出米塞斯是否愿意长期留在墨西哥这个问题。米塞斯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复:他现在更希望“待在纽约,因为纽约已经成为目前的思想中心”。蒙特斯·德奥卡没有多说什么,但几个月后他又觉得有必要在信中再次提及这个话题:

墨西哥商人希望您担任多家商业机构的顾问,几乎为此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这或多或少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您在为维也纳商会工作时所展现的能力。⁹⁰

882

深思熟虑之后,米塞斯还是拒绝了,他提到自己年事已高,已经很难熟练掌握西班牙语了。但他强调,如果“年轻二十年,我不会拒绝你好心的提议”。他还提到,这项邀请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十分吸引人的:“我去过你的国家三次,我看到了墨西哥如今的舆论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有利于健全的经济思想。”⁹¹但是这也没有改变他的决定。

现在米塞斯不仅是美国人,他还成了一个纽约人。



米塞斯在纽约

注 释

1. 米塞斯致约翰内斯·巴纳(Johannes Bahner),信件标注日期为1947年6月12日;Grove City Archive:“B”file。约翰内斯·巴纳是Elbeo纺织公司的所有者和首席执行官。

2. 米塞斯致赖因哈德·卡米茨,信件标注日期为1946年10月18日;Grove City Archive:Kamitz file。卡米茨最终当上了财政部长,后来又出任了奥地利国家银行总裁。米塞斯非常尊敬卡米茨,他对卡米茨担任财政部长期间的表现不吝赞美之辞:“在最艰难的处境下,你已证明了你是两位普伦纳(Plener)先生和庞巴维克的合格继任者。”米塞斯致卡米茨,信件标注日期为1961年11月14日;Grove City Archive:Kamitz file。

3. 米塞斯致汉斯·伊劳(Hans Ilau),信件标注日期为1947年5月17日;Grove City Archive:NAM files。

4. Robert M. Crunden, *The Mind and Art of Albert Jay Nock* (Chicago: Henry Regnery,

1964), p. 179.

5. Julian Joseph DelGaudio, *Refugee Economist in America: Ludwig von Mises and American Social and Economic Thought, 1940 - 1986* (Ann Arbor, Mich.: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988).

6. E. M. 比格斯致国会议员 H. P. 富尔默, 信件标注日期为 1943 年 6 月 5 日; Grove City Archive; "B" files。

7. George H. Nash,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 Since 1945*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pp. 6f.

8. F. A.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4), pp. 17, 36.

9. Frank Chodorov, "What This Country Needs Is Guts," analysis 2 (February 1946): 3.

10. 米塞斯的演讲最初发表时题为《为自由而计划》(Planning for Freedom), 与鲁弗斯·S. 塔克为同一批听众所作的一场演讲一起发表在一本 24 页的小册子上: *Economic Planning* (New York: Dynamic America, 1945), pp. 3 - 12。后来, 该文重刊于米塞斯著作《为自由而计划》(*Planning for Freedom*) (South Holland, Ill.: Libertarian Press, 1952)。米塞斯在写给一位巴黎教授 A. 多芬·穆尼尔(A. Dauphin Meunier)的信中提到, 他不喜欢这篇演讲发表时所加上的标题和副标题。1947 年, 演讲的法语版发表在《当代经济学杂志》(*Revue de l'Économie Contemporaine*) 上, 题为《干预和薪水》(L'interventionnisme et le salaire)。参见 Grove City Archive; Dauphin Meunier file。在写给塞尔玛·富勒的一封信里, 他赞美了《通往奴役之路》的优点, 但也承认富勒对这本书的批评态度是恰当的。

哈耶克提出的正面方案和该书的优点相比不是那么重要。不过, 你的朋友非常敏锐, 能够看到这个方案的矛盾之处, 这真让人欣慰。(米塞斯致富勒, 信件手稿, 标注日期为 1944 年 11 月 14 日; Grove City Archive; Fuller files。)

11. 米塞斯致蒙特斯·德奥卡, 信件手稿, 标注日期为 1945 年 4 月 3 日; Grove City Archive; Montes de Oca files。

12. 里德在与乔治·H. 纳什会面时说的话, 纳什引用了这段话, 参见 Nash,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 pp. 22f。

13. F. A. Hayek, "The Intellectuals and Sociali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16 (1949): 417 - 33, reprinted in Bruce Caldwell,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F. A. Hayek*, vol. 10: *Socialism and War: Essays, Documents, Review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p. 222.

14. 奥尔曼致米塞斯, 信件标注日期为 1945 年 5 月 10 日; 米塞斯致奥尔曼, 信件标注日期为 1945 年 5 月 18 日; Grove City Archive; "A" files。

15. 米塞斯致马克卢普, 信件标注日期为 1946 年 12 月 15 日; Grove City Archive; Machlup files。

16. 赫伯特·冯·贝克拉特(Herbert von Beckerath)、格茨·布里夫斯、戈特弗里德·冯·哈伯勒、格奥尔格·哈尔姆和约瑟夫·熊彼特获得了哈佛大学的教职; 马克卢普在新的(洛克菲勒资助的)布法罗大学, 摩根斯特恩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显然, 他们要么不愿意,

要么没有能力帮助米塞斯成为他们的同事。

17. Nash,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 pp. 13, 351, n. 47。纳什在书中提到,黑兹利特和里德参与了这次行动。纳什还提到(*ibid.*, p. 20)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的职位和米塞斯相似,也是由私人基金资助的。我们不太清楚,除了费尔蒂希之外还有谁出资支付米塞斯的薪水。不过,薪水的主要部分极有可能是沃尔克基金会支付的。还有其他一些潜在的资助者,他们后来也赞助了《自由人》,特别是阿尔弗雷德·科尔伯格(进口商)、贾斯珀·克兰、霍华德·皮尤(太阳石油公司)、赫伯特·胡佛(美国前总统)、W. 普伦蒂斯(W. Prentis,阿姆斯特朗软木公司)、W. F. 彼得(W. F. Peter,芝加哥、罗克艾兰和太平洋铁路公司)。参见 Charles H. Hamilton, "The Freeman: The Early Years," R. Lora and W. H. Longton, eds., *The Conservative Press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London: Greenwood, 1999)。

18. 米塞斯致马克卢普,信件标注日期为1944年12月26日;Hoover Institution: Machlup-Mises correspondence file。

19. 米塞斯刚到美国开始找工作的时候,马克卢普就帮他和纽约大学经济学系取得了联系。1940年11月,系主任(斯帕尔)邀请米塞斯做了一个演讲,内容是米塞斯本人对经济学理论的贡献。但是斯帕尔对于聘用米塞斯一事不太上心(或者不太情愿),后来米塞斯就接受了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工作。

20. 东米雄(Yoneo Azuma)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8年7月13日;Grove City Archive: Azuma file。东米雄是荒木光太郎(Mitsutaro Araki)的学生,1925年米塞斯授权荒木光太郎将《货币与信用原理》译成日文出版。荒木生前没有完成该书的翻译工作,但他的学生在战争开始的几年帮他完成了。1948年东米雄写信给米塞斯的时候,翻译手稿也因为战时藏在地窖里而有幸保存下来。米塞斯一直通过东米雄了解日本经济学界的思想发展状况。

21. 几年后,马克卢普曾向米塞斯报告他在东京和日本同事开会时的情形:"他们讨论了你的《货币原理》中的哪些部分是第一版就有的,哪些部分是第二版才加上去的。确实有几位与会者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参见马克卢普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55年3月28日;Hoover Institution: Machlup-Mises correspondence file。

22. 岩井次郎(Jujiro Iwai)致尼迈耶,信件标注日期为1952年1月23日;Grove City Archive: Nymeyer files。

23. Mary Sennholz, *Leonard E. Read: Philosopher of Freedom* (Irvington-on-Hudson, N. Y.: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1993), p. 69。

24. 米塞斯继续受邀参加全国工业协商委员会的其他会议。例如,1946年5月16日,他和伍德利夫·托马斯(Woodlief Thomas,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卢茨以及保罗·萨缪尔森围绕战后利率这个话题进行了讨论。1948年1月22日,他参加了一场座谈会,讨论的是"我们是否应该回归金本位制?"这次他遇到了菲利普·科特尼;其他的参与者有阿尔贝特·哈恩和迈克尔·海尔佩林。参见 Grove City Archive: NICB files。他还可能在1946年或1947年帮朋友瓦尔特·祖尔茨巴赫推荐了一份全国工业协商委员会的工作;参见 Grove City Archive: Sulzbach file。

25. 1949年初达到30 000这个数字。参见里德的备忘录,标注日期为1949年3月23

日; Grove City Archive: FEE files。

26. 基金会支付给米塞斯“定期的固定数额的报酬”,于是,出于一些技术原因(税法),米塞斯在1946年10月成了经济教育基金会的一名正式雇员。参见寇蒂斯(Curtiss)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6年10月8日; Grove City Archive: FEE files。

27. 参见 Nash,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 p. 24。

28. Frank Knight, *Freedom and Reform* (New York: Harper, 1947); Henry C. Simons, *Economic Policy for a Free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29. 尼迈耶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6年5月20日; Grove City Archive: Nymeyer files。

30. 尼迈耶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7年6月12日; Grove City Archive: Nymeyer files。

31. 尼迈耶致莫蒂默·阿德勒(Mortimer Adler),信件标注日期为1948年2月14日; Grove City Archive: Nymeyer files。

32. 米塞斯致 P. C. 阿姆斯特朗(P. C. Armstrong),信件标注日期为1950年1月16日; Grove City Archive: Armstrong file。

33. 尼迈耶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8年10月12日; Grove City Archive: Nymeyer files。

34. 尼迈耶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9年1月25日; Grove City Archive: Nymeyer files。

35. 米塞斯致尼迈耶,信件手稿,答复尼迈耶日期标注为1949年4月26日的信件; Grove City Archive: Nymeyer files。

36. 米塞斯致尼迈耶,信件标注日期为1952年5月17日; Grove City Archive: Nymeyer files。

37. 尼迈耶致哈耶克等人,1952年春、夏的通信, Grove City Archive: Nymeyer files。

38. Nash,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 p. 10。

39. Henry C. Simon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36 (November 1944): 192。

40. 霍伊尔斯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9年9月7日; Grove City College Archive: Hoiles file。

41. 米塞斯致 M. H. 约翰逊(M. H. Johnson),信件标注日期为1956年10月25日; Grove City Archive: “J” files。

42. 参见标注日期为1947年1月13日的备忘录, Grove City Archive: FEE files。

43. 莱恩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7年7月5日; Grove City Archive: Lane files。

44. 按照莱恩所说,米塞斯深受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思想之害。她援引了米塞斯的话:“很显然的,如果统治集团堪当重任,任何一种宪法体系都能运作良好。”随即她评论道:“一派胡言!……(德国的)基本谬误是缺乏理性的政治思想,而这本书却对这种缺陷表示赞赏。”罗丝·怀尔德·莱恩书评,载于 *Economic Council Review of Books* 2, no. 10 (November 1945), p. 3。

45. 参见 1949 年秋和 1950 年秋通信, Grove City Archive: Lane files。
46. 马克卢普致米塞斯, 信件标注日期为 1946 年 12 月 13 日; Grove City College Archive: Machlup files。
47. 米塞斯致马克卢普, 信件标注日期为 1946 年 12 月 15 日; Grove City College Archive: Machlup files。
48. 参见他们在 1945 年 6 月和 7 月的通信; Grove City Archive: Montes de Oca files。
49. 米塞斯致蒙特斯·德奥卡, 信件标注日期为 1946 年 1 月 12 日; Grove City Archive: Montes de Oca files。米塞斯收到了 590 美元作为这项研究的酬劳。他在 1945 年 12 月底完成了后记。参见米塞斯致施密特(Schmidt), 信件标注日期为 1945 年 12 月 31 日; Grove City Archive: Schmidt file。
50. 米塞斯致卡尔·勃兰特(Karl Brandt), 信件标注日期为 1946 年 9 月 7 日; Grove City Archive: Brandt file。
51. 米塞斯致哈耶克, 信件标注日期为 1946 年 12 月 31 日; Grove City Archive: MPS files。
52. 米塞斯致哈耶克, 信件标注日期为 1946 年 12 月 31 日; Grove City Archive: MPS files。
53. Mises to Hayek, letter dated December 31, 1946; Grove City Archive: MPS files。
54. 主要情况参见 R. M. Hartwell, *History of the Mont Pèlerin Society*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95)。
55. 例如, 到 1949 年 1 月, 哈耶克已经访问过奥地利好几次。参见沙尔马茨致米塞斯, 信件标注日期为 1949 年 1 月 27 日; Grove City Archive: Charmatz file。
56. 哈耶克致米塞斯, 信件标注日期为 1946 年 12 月 28 日; Grove City Archive: MPS files。米塞斯致卡尔·勃兰特, 信件标注日期为 1946 年 9 月 7 日; Grove City Archive: Brandt file。米塞斯最早在 1946 年 6 月 28 日就和霍夫有过接触。霍夫在战时写过一份自由至上主义宣言。他把手稿寄往瑞典, 那里的一位美国外交官准备把手稿寄给纽约的阿尔弗雷德·A. 克诺夫(Alfred A. Knopf), 但最后没有寄出。霍夫在战后才知道, 那位外交官认为手稿“不民主”——可能是指对美国战时盟友的基本信条过于吹毛求疵。霍夫还独立得出一个结论: 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可能进行经济计算。米塞斯对这位挪威经济学家非常钦佩。霍夫是“在同时代人里, 少数认识到《人的行为》一书中所探讨问题的重要性的人之一”。米塞斯致霍夫, 信件标注日期为 1950 年 1 月 11 日; Grove City Archive: Hoff files。
57. 米塞斯致哈耶克, 信件标注日期为 1946 年 12 月 31 日; Grove City Archive: MPS files。
58. 米塞斯, 《对哈耶克教授计划的一些意见》, 备忘录打印稿, 日期标注为 1946 年 12 月 31 日; Grove City Archive: MPS files。
59. 米塞斯致哈耶克, 信件标注日期为 1946 年 12 月 31 日; Grove City Archive: MPS files。米塞斯建议哈耶克邀请墨西哥的蒙特斯·德奥卡和韦拉斯科, 古巴的梅斯特利(Macstri)以及澳大利亚的海丁(Hytten)。
60. 哈耶克致米塞斯, 信件标注日期为 1947 年 2 月 3 日; Grove City Archive: MPS files。

61. 关于卢诺,参见堪萨斯城公共图书馆(Kansas City Public Library)的特别收藏,其中还包含了照片。

62. 沃尔克去世后不久,基金会从堪萨斯城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伯林盖姆(Burlingame)。搬迁必定发生在1949年4月到1951年6月间。参见通信,Grove City Archive: Herbert Cornuelle file。

63. 黑兹利特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53年12月21日;Grove City College Archive: Mont Pèlerin Society files。

64. 联络人是理查德·康努埃尔和肯尼斯·邓普顿(Kenneth Templeton)。1953年11月,赫伯特·康努埃尔离开了基金会,前往火奴鲁鲁从事商业方面的工作。

65. F. A. Hayek, "Opening Address to a Conference at Mont Pèlerin,"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p. 148. 另见措辞非常温和的《目标声明》。副本藏于Grove City Archive: Intercollegiate Society of Individualists file (filed around 1964)。

66. Milton Friedman and Rose D. Friedman, *Two Lucky People: Memoi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p. 161.

67. Wilhelm Röpke, "Homage to a Master and a Friend," *The Mont Pèlerin Quarterly* (October 1961): p. 5.

68. 1947年10月,阿莱斯造访经济教育基金会,很有可能正是这次访问加深了他的疑虑,即相对于他的偏好来说,美国自由至上主义过于激进了。赫伯特·康努埃尔在写给米塞斯的信中提到了这次访问,信件标注日期为1947年10月14日;Grove City College Archive: FEE files。

69. 最终,阿伦·迪雷克托和苏黎世的于诺成了学社秘书;奥伊肯、朱克斯(Jewkes)、奈特、拉帕特和吕夫当选为副主席;哈迪(Hardy)成为财务主管。米塞斯、安东尼、吉迪恩斯、罗宾斯和勒普克成为理事会成员。参见《1号主席通告》(President's Circular No. 1),标注日期为1947年11月17日;Grove City Archive: MPS files。10月10日,阿尔贝·于诺通知米塞斯,他将很快收到一本相册作为圣诞礼物,相册里是关于这场会议的七十多张照片。

70. 1945年6月,米塞斯仍说此书“将在明年出版一部美国版”。写给蒂茨(Tietz)的书信手稿;Grove City Archive: Tietz file。

71. 他在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9) 的第632—633页讨论了这个问题,后来写信给他的法国朋友洛斯特·拉绍姆(Lhoste Lachaume)时也有提及。参见波夫(Ballvé)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55年3月18日;Grove City Archive: Ballvé files。另见米塞斯致利迪娅·阿尔卡雷(Lidia Alkalay),信件标注日期为1952年2月19日;Grove City Archive: "A" files。

72. Richard von Mises, *Kleines Lehrbuch des Positivismus: Einführung in die empiristische Wissenschaftsauffassung* (The Hague: Van Stockum & Zoon, 1939)。

73. 哈耶克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8年11月15日;Grove City Archive: Hayek files。米塞斯致弗朗索瓦·佩鲁,信件标注日期为1948年11月13日;Grove City Archive: Perroux file。佩鲁从海伦妮·伯杰·利泽尔那里得知了这场意外的发生。

74. 克兰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9年6月28日;Grove City Archive: Crane file。

75. 1948年,美国赞助发起的一个项目正在维也纳大学举办,显然米塞斯也拒绝了这次活动发出的演讲邀请。弗里茨·马克卢普参加了这个活动。参见蒂贝格尔致米塞斯,1948年4月18日;Grove City Archive: Thieberger files。

76. 美国人对意大利就没那么好奇。当时,路易吉·伊诺第(Luigi Einaudi)在领导了意大利中央银行三年后,当选为意大利总统。

77. 米塞斯致里德,信件标注日期为1948年12月4日;Grove City Archive: FEE files。

78. 1950年3月,米塞斯说他已经去过欧洲两次,不过没有回奥地利。参见米塞斯致埃内斯特·纽伊拉特(Ernest Neurath),信件标注日期为1950年3月13日;Grove City Archive: Neurath file。

79. 米勒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9年3月26日;Grove City College Archive: MPS files。参见《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 Zeitung*)(1945年7月25日)的头版报道。1949年6月米塞斯人在欧洲。参见玛吉特·冯·米塞斯致R.齐格勒(R. Ziegler);Grove City Archive: Cluett, Peabody & Co. file。

80. 关于弗朗茨·奥本海默对他学生路德维希·艾哈德的影响,参见《德意志报》(*Deutsche Zeitung*, 1961年12月30/31日,第20页)上刊登的对艾哈德的采访。纳粹统治期间,艾哈德曾为两个经济研究机构工作。战后,他成了巴伐利亚州的经济部长,还参加了米塞斯一位朋友的私人研讨会。这位朋友是阿道夫·韦伯(Adolf Weber),可能是那个时期最接近于“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教授(参见《明镜周刊》[*Der Spiegel*] 1963年10月16日,在吉布森(Gibson)致米塞斯的一封信中也曾提及,信件标注日期为1964年3月3日;Grove City Archive: “G” file)。韦伯倡导一个关于市场过程和消费者主权的理论,这个理论几乎难以和米塞斯的观点区分开来;参见例如,Adolf Weber, *Weltwirtschaft* (Munich: Richard Pflaum Verlag, 1947), pp. 86, 102, 106, 108。可能正是由于受到韦伯圈子相关讨论的影响,艾哈德才有了1948年6月改革的灵感。

81. 那段时期,瓦尔特·奥伊肯是艾哈德改革背后的知识分子领袖,他写信给米塞斯,谈到进一步放开管制的必要性:“德国当局一直和我保持着密切接触,他们正尽一切努力解除管制。但是德国采纳的来自美国的经济政策本质上还是以中央计划为基础的。”奥伊肯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8年6月25日;Grove City Archive: Read files。

82. 几年后,银行理论家海因里希·冯·里特斯豪森(Heinrich von Rittershausen)在与米塞斯的私人通信中推断,《社会主义》一书为艾哈德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因为在这无书可读的十二年里,所有优秀的年轻人都仔细阅读了这本书”。里特斯豪森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57年8月22日;Grove City Archive: Rittershausen file。里特斯豪森可能是战后德国货币理论家中最认同米塞斯观点的一位。

83. Adolf Wittkowski, *Schriftum zum Marshallplan und zur volkswirtschaftlichen Integration Europas* (Bad Godesberg: Bundesministerium für den Marshallplan, 1953)。

84. 米塞斯致马克·琼斯(Mark Jones),信件标注日期为1948年3月31日;Grove City Archive: Jones file。

85. Mises,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3rd ed. (Chicago: Regnery, 1966),

pp. 723 - 24。直到 50 年代中期,米塞斯显然还是不愿意与艾哈德会面。勒普克认为这是因为米塞斯受了他最密切的德国知识界盟友沃尔克马尔·穆特修斯的影响,穆特修斯是艾哈德经济政策尖锐而无情的批评者。参见穆特修斯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 1954 年 1 月 2 日;Grove City Archive: Muthesius file。

86. 米塞斯致穆特修斯,信件标注日期为 1955 年 6 月 1 日;Grove City Archive: Muthesius file。

87. 前四届朝圣山学社的会议摘要可见 Grove City College Archive: MPS files. Folder #9。1970 年之前全部会议的摘要藏于 folder #33。

88. 米塞斯致蒙特斯·德奥卡,信件标注日期为 1949 年 2 月 26 日;Grove City Archive: Montes de Oca files。一张带有(稍后)关于凯恩斯演讲关键词的手写便条,见 Grove City Archive: May file。

89. 米塞斯致蒙特斯·德奥卡,信件标注日期为 1949 年 7 月 22 日;Grove City Archive: Montes de Oca files。他们下榻在丽兹酒店,随后米塞斯收到了 1500 美元研讨会报酬(此前信中已经说明)。

90. 蒙特斯·德奥卡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 1950 年 2 月 24 日;Grove City Archive: Montes de Oca files。

91. 米塞斯致蒙特斯·德奥卡,信件标注日期为 1950 年 3 月 13 日;Grove City Archive: Montes de Oca files。

第二十章 《人的行为》及其影响

到20世纪40年代末,米塞斯已经很好地融入了新兴的美国自由至上主义网络。他在纽约大学的研讨班,在朝圣山学社会议和其他一些会议上的演讲,还有他的著作,已经对年轻一代学者的思想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即使在有组织的自由至上主义团体之外,米塞斯也成了全国知名的一流经济学家和社会分析家,尽管在大多数学者看来,他的研究方法和政治倾向都太过时了。

1949年9月,《人的行为》出版了,由此,米塞斯的地位和影响有了质的飞跃。一夜之间,米塞斯走到了美国知识分子舞台的中央。此后数十年间,只有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的面世可以与之相提并论。此书为安·兰德带来了更大的名声,至少在大众心中如此。现在米塞斯不仅以一位老派学者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还成了西方文明的伟大思想家之一。他被视为有创造力的天才学者,不仅掌握了自己所研究学科的方方面面,还把这些知识加以转化,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看待社会进程和人际关系的视角。

《人的行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米塞斯在1922年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著也曾引起轰动,但那只是因为人们普遍认识到了社会主义理论无法解决战后重建问题。社会主义先锋曾执掌过德国和奥地利的政权,但他们完全不知道掌权后该做什么。这些社会主义政府的统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急剧恶化了国家状况,于是理论上的危机很快变成政治上的危机。米塞斯在《社会主义》中进行的综合分析,为这一混乱局面提供了一个异常清晰的解释。然而,尽管此书激起了社会主义阵营强烈的愤怒,并促使整整一代人改变了他们的思考模式,却还是没能带来一场真正的运动,因为作者只是一位资历尚浅的经济学家,而且当时也没有任何机构能把被此书说服的人聚集并组织起来。

美国的土壤较为丰饶。它具有悠久的个人自由传统,而且近来又有重返这一传统的趋势。事实上,一场运动正在酝酿中,万事俱备,只等《人的行为》为它赋予思想的内核。同样重要的是,一些机构和个人急于加快这一进程。不仅如此,米塞斯本人已经成为这场群众运动的思想领袖。他认识一些作家和记者,他们推广他

的作品,还有很多人已经准备好赞助他后续的著作。现在,支持者成群结队地来请米塞斯开办讲座和研讨会。富商咨询米塞斯的意见,常常对他言听计从。而《自由人》杂志,作为第一份明显带有米塞斯风格的自由至上主义报刊,如果不是因为《人的行为》给米塞斯带来荣誉,也是不可能面世的。

以前,经济教育基金会仅把米塞斯视为若干顾问之一,现在他却成了基金会真正的精神领袖。看看默里·罗斯巴德的例子,我们就能领略基金会在1949年前的状况。此人后来成了米塞斯最重要的弟子,但在当时却是通过一本攻击近期管制条例的题为《屋顶还是天花板?》(Roofs or Ceilings?)¹的小册子了解到经济教育基金会的。此书由伦纳德·里德发行,一共印制了50万册。小册子的作者是两位年轻的芝加哥经济学家,名叫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乔治·斯蒂格勒。那是1946年9月。罗斯巴德继续阅读经济教育基金会的出版物,并参加他们的会议,然而直到1948年春,这位未来米塞斯主义复兴运动的顶梁柱压根就没听说过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当时,不管是伦纳德·里德还是其他任何一个自由至上主义组织,都不是特别重视米塞斯及其代表的学术传统。接着,《人的行为》挟裹着巨大旋风横空出世,立刻征服了经济教育基金会,使它成了米塞斯主义机构。

885

第一反应

米塞斯及其朋友都没想到这本书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从墨西哥返回后,米塞斯很快离开纽约前往伯克希尔山(Berkshire Mountains)享受两周的假期。²这本书是在1949年9月14日在书店上架的,那时他还在度假。亨利·黑兹利特在《新闻周刊》专栏里宣布了这个消息并大加赞美,他还预测了这本书将在未来发挥的作用:

简而言之,《人的行为》立即成了有史以来捍卫资本主义最坚定、逻辑最严谨的一部著作。近些年来,社会思想的潮流排山倒海般涌向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如果说有哪部书能够扭转这一趋势,那就非《人的行为》莫属了。³

他的预言几乎完全应验了。不到三个月,截止到12月6日,该书销量已经超过4000本,并且正在进行第三次印刷。⁴书的销量越来越大,米塞斯为此欢欣鼓舞了几个月。⁵他在纽约大学研讨班上作了一场演讲,主题为“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和

886

定理以及它们与哲学、历史和政治思想之间的联系”。⁶ 这天是他的生日，9月29日。

1950年新年，黑兹利特、许茨和哈耶克来到路德维希和玛吉特位于曼哈顿西区大街的公寓，和他们一起过节。那时，《人的行为》显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尤其对于一本长达900页的科学著作来说。甚至反对他的思想的人也得承认，这位68岁高龄的经济学家写出了一本“资本主义宣言”⁷，“一场对放任自由主义真正坦率的、无条件的辩护”⁸。

887 接下来的几个月出现了很多书评。不过大多没有什么实质内容——这些书评吹毛求疵的原因在于此书的教廷风格。⁹ 一位评论者大胆地抱怨说，此书的读者“不断地感觉到被辩论得失去了存在感”。¹⁰ 不过其他一些评论认可了这本书的伟大贡献。年轻的默里·罗斯巴德赞扬《人的行为》是一部原创的综合性杰作。此书包含了“完整的经济科学架构”，而这一架构又“稳固地奠基于行为学——关于个体行为的一般原理”。¹¹ 类似地，理查德·C. 康努埃尔强调说，米塞斯整合了价值理论和价格理论，因此，他为资本主义提供辩护的方式无需借助诸如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这样虚构的概念。¹²

888 在德国，这本书也受到了极为热烈的欢迎——科隆大学(Cologne University)教授阿明·斯皮塔勒(Armin Spitaler)在《世界经济评论》(*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上发表了一个长篇书评。在南非，一位年轻教授在约翰内斯堡金山大学(University of Witwatersrand in Johannesburg)1950年秋的就职演讲中表示自己毫无保留地接受米塞斯的认识论观点。他是路德维希·拉赫曼，他的演讲题目是“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经济学”，30年代他是伦敦经济学院的研究生，曾经跟随哈耶克和罗宾斯学习。在那之前，拉赫曼曾在柏林师从维尔纳·桑巴特。那时，拉赫曼已经了解了米塞斯的先验主义认识论(*aprioristic epistemology*)。米塞斯在1933年写的《经济学的基本问题》(*Grundprobleme der Nationalökonomie*) (即《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中首次提出了先验主义认识论，如今这个理论第一次进入了英美国家知识分子的视野。¹³

格奥尔格·克特尔(George Koether)是米塞斯在纽约大学研讨班的学生，1950年9月，他安排纽约的基督教自由基金会(Christian Freedom Foundation)(CFF)转载了《人的行为》第35章——“战争经济学”，这是对朝鲜战争的反应，因为战争很快就会导致新一轮的价格管制和经济控制。当时，克特尔同时为基督教自由基金会和经济教育基金会工作。基督教自由基金会在他们的双周刊——《基督教经济学》(*Christian Economics*)上转载了这个章节。¹⁴ 该刊读者包括全国各地大约10万

名牧师。

这可能是米塞斯首次接触基督教自由基金会及其员工,后来他们之间形成了富有成效的终生合作关系。此后很多年里,格奥尔格·克特尔继续参加米塞斯在纽约大学的研讨班,成了路德维希和玛吉特的私交好友。路德维希去世后,克特尔帮助玛吉特撰写了她的自传体回忆录《我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一起的岁月》(*My Years with Ludwig von Mises*)。¹⁵50年代,克特尔在纽约地区工作,先是在基督教自由基金会和经济教育基金会,后来当了《形象杂志》(*Look Magazine*)的汽车和交通版编辑,最终成了美国钢铁公司(U. S. Steel Corporation)的一位经济专家。¹⁶



米塞斯和格奥尔格·克特尔

米塞斯在基督教自由基金会还有另一位信徒和仰慕者。珀西·劳里·格里夫斯(Percy Laurie Greaves, 1906—1984)出生于布鲁克林,是一位典型的通过自我奋斗获得成功的美国精英。1950年他为基督教自由基金会工作,之前曾做过簿记员、海员、广告经理、经济学讲师、金融编辑、代笔作家以及美国国会的研究助理。在做研究助理时,他曾协助调查珍珠港袭击事件,并参与起草了《塔夫脱-哈特莱法案》(Taft-Hartley Act)。¹⁷格里夫斯忠实地参加了米塞斯在纽约大学研讨班的所有课程,并和未来的妻子贝蒂纳·比恩(Bettina Bien)一起为每一堂课做了记录。¹⁸最终,在公共讲座和研讨会上推广米塞斯主义经济学成了他的事业。但更重要的是,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米塞斯和他八十多岁的妻子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此时照顾他们生活的正是格里夫斯夫妇。1973年米塞斯逝世后,他们继续为玛吉

889

890

特·冯·米塞斯提供帮助。珀西去世后,贝蒂纳继续照顾她所尊敬的老师的遗孀。1993年,玛吉特也去世了,享年103岁。从那之后直到今天,贝蒂纳一直负责管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文献遗产。



(左起)米塞斯、玛吉特、贝蒂纳、珀西·劳里·格里夫斯;摄于1959年

霍华德·克什纳(Howard Kershner)是基督教自由基金会主席和《基督教经济学》编辑,不过基金会和杂志的幕后却是富有的费城实业家J.霍华德·皮尤。皮尤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太阳石油公司(Sun Oil Company),而他本人也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企业家。皮尤除了赞助基督教自由基金会,还承担了许多社会责任。他是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格罗夫城市学院(Grove City College)董事会主席,还是奇尔顿出版社(Chilton Press)老板,这家出版社发行过《探路者》(*Pathfinder*)和《农业期刊》(*Farm Journal*)。¹⁹米塞斯最晚在1945年3月已经认识皮尤,当时全国制造商协会给米塞斯寄了一篇演讲稿,在演讲稿中,皮尤阐述了卡特尔如何威胁到了经济发展。²⁰1948年11月皮尤请求米塞斯给《纽约时报》编辑写一封信,回应某位爱德华·柯林斯(Edward Collins)的专栏,因为他们一致认为这个专栏非常可耻。也就是从那时候起,米塞斯和皮尤开始直接通信。米塞斯拒绝了他的请求,并回复说,任何类似尝试都是徒劳的:

首先,他们习惯于“编辑”、删减这些信件,以减少信中内容的说服力,有时甚至会完全歪曲写信者的意思。其次,编辑或专栏作家拥有给出最终结论

的特权。因此,盲目的读者永远觉得“他的”文章是对的。

为了对抗柯林斯先生(以及很多其他作者)此类所谓“非独断”的独断行为,我们需要一本独立的意见杂志。²¹⁻²²

皮尤很快做出反应。1948年12月初,他会见了《开诚布公》(*Plain Talk*)杂志的工作团队——阿尔弗雷德·科尔伯格、艾萨克·唐莱文(Isaac Don Levine)和尤金·莱昂斯(Eugene Lyons),讨论是否可能“使它成为一本这样的意见杂志”²³。皮尤的想法是为米塞斯、黑兹利特和其他优秀经济学家提供一个舆论平台。这些谈话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不过,两年后,即《人的行为》出版一年后,皮尤再次提出赞助一份刊登自由至上主义观点的杂志,即《自由人》。在未来数年的光荣岁月里,这份刊物将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介绍给更多的公众。

892

皮尤常把太阳石油公司股份赠予他的员工。从1951年开始,他也把股份作为圣诞礼物送给米塞斯。直到1968年,年年如此。他写道:

您把您的一生奉献给了一项伟大的事业:拯救世界免于走上一条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共产主义的道路。而我们其余的人却因过于热衷经营实业而无暇他顾,以至于我们无法看清未来的走向。因此,值此圣诞节之际,我希望您会愿意接受我的礼物——我投入了毕生精力经营的公司的一些股份,以此表达我对您的感谢。²⁴

米塞斯主义者

893

除了米塞斯和他的朋友圈子,还有许多自由至上主义者也不相信《人的行为》能够成为畅销著作。赫伯特·C.康努埃尔和沃尔克基金会的人曾经认为,米塞斯的理论大厦过于精密,一般美国公众可能难以理解。因此,我们需要一个简化版本,以扩大该书的影响,使之进入广大公众的视野。可是谁能写出这样一本书呢?

康努埃尔认为自己已找到了合适的人选,那就是默里·罗斯巴德。罗斯巴德至少从1946年开始,就与经济教育基金会一直保持着联系。²⁵1948年夏,罗斯巴德在基金会举办的一场讲座上第一次见到了米塞斯。²⁶那时罗斯巴德已经取得了数学和经济学学位,但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几乎一无所知。1948年春,他通过了口试,那时他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印象,正如他后来回忆的:“似乎是六十年前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吸收进经济学主流的某些东西。”²⁷罗斯巴德清晰地记得在《人

的行为》出现以前自己的经济学世界观：

894 我有一种明确的、天生的感觉或洞察力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它使我意识到：所有经济学派的理论都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我对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不满意。我想到了制度学派；制度学派对正统英美经济学的批评是对的，然而信奉正统理论的人对制度学派的批评也是对的。这些批评都对，而且我相信简单的供需理论也是对的，但是我却并不真正拥有一个较好的理论基础。我对现有的所有理论都不满意。后来，当我读了《人的行为》，所有环节就都合理了，因为一切都说得通了。²⁸

赫伯特·康努埃尔离开经济教育基金会转到沃尔克基金会之前不久，曾提醒米塞斯关注这位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康努埃尔称罗斯巴德为“我所认识的所有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学生中最杰出的一位”，还提到他有意参加纽约大学的研讨班。²⁹《人的行为》出版前几周，米塞斯和罗斯巴德似乎讨论过罗斯巴德的一个计划，即编写一本米塞斯主义经济学教科书——一份“面向聪明外行的指南”。米塞斯同意了这个计划。于是1949年11月罗斯巴德写信给康努埃尔，表示他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还说米塞斯让他先试写一章——“自由市场中的货币与银行”。³⁰

895 那几个月，罗斯巴德参加了米塞斯在纽约大学的研讨班，冬季学期他们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到了春季又继续讨论其他思想学派。研讨班的学习进一步加强了《人的行为》带给罗斯巴德的感受：“从你那里，我第一次了解到经济学拥有一个连贯的架构，而且我肯定这点也深深镌刻在了研讨班其他成员的脑海之中。”³¹

到了1951年1月初，也就是《人的行为》出版后不到十六个月，康努埃尔和米塞斯收到了那篇试写章节。康努埃尔反应非常热烈，米塞斯也认为罗斯巴德是编写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教科书的合适人选——在他拿到博士学位后。

米塞斯写信给康努埃尔说：

我对罗斯巴德关于货币与银行的文稿十分满意。这篇文章确定无疑地证明了，他比我见过的其他任何人都更有能力撰写一本教科书。我期待着他能在完成毕业论文后尽快投入到这项工作中。³²

不过，康努埃尔没有等他毕业。他为罗斯巴德提供了来自沃尔克基金会的经

费支持,继续推动这项计划。1952年1月1日,罗斯巴德开始为基金会工作,之后的六年他都持续高强度的工作。³³

* * *

许多青年才俊在《人的行为》和米塞斯的研讨班里找到了一个全新的精神家园,默里·罗斯巴德位于他们之首。此后的十五年间,常有乔治·雷希(George Resch)和保罗·坎托(Paul Cantor)这样极具天赋的年轻人突然获准参加纽约大学的研讨班。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获准前往米塞斯的住所。某天,米塞斯正要外出用餐,



默里·罗斯巴德

门铃响了。两个年轻人站在门外,询问米塞斯是否需要订阅《自由人》杂志。米塞斯回绝了,告诉他们自己已经在杂志的寄送名单上。他不知道,这是他和两位最热情的追随者——拉尔夫·莱科和乔治·赖斯曼的首次接触。

当时莱科和赖斯曼都只有十五岁。他们阅读《自由人》杂志已经有一两年了,也读了米塞斯的一些著作。有了这些激励,他们成立了“一个右翼学生组织,科布登俱乐部(Cobden Club)”,准备大干一场。一天,他们决定去拜访心目中的英雄,于是就想到了乔装成推销员的计策。幸运的是,他们随后决定通过正常渠道达到目的,就去了欧文顿镇的经济教育基金会办公地点进行拜访。他们在那里见到了伊万·比尔利(Ivan Bierly)。伊万惊讶于他们的学识,就询问了米塞斯是否愿意接见他们。十天之内,会面就安排好了,老人(幸运的是他记不起他们的脸了)建议这两个男孩“通过正确的方式学习经济学,进到大学校园里去”。³⁴米塞斯说服他们花费更多时间去学习与经济学和自由相关的知识,而不是宣传那些他们实际上并不理解的理论。为了表示相信他们的天赋,米塞斯邀请他们参加自己在纽约大学开设的研讨班——前提是他们不能大声喧哗。

此后许多年间,他们一直参加米塞斯的研讨班,后来成了米塞斯主义经济学重要的倡导者。两人都听从米塞斯的建议学习了德语。莱科将《自由主义》译为英文,赖斯曼则翻译了《基本问题》。³⁵

896

897

演讲和论文

由于《人的行为》取得成功,米塞斯重新转向了与当时盛行的干预主义思想的斗争。1950年4月18日,米塞斯参加了纽约大学俱乐部(New York's University Club)为祝贺《人的行为》作者而举办的招待会,他在餐后演讲的主题是“中间道路政策的经济学”。³⁶两周后,讲稿刊登在《金融与商业纪事》(*Financial and Commercial Chronicle*)上,到了年底,弗雷德里克·尼迈耶为了反对他的加尔文派同道中日益增长的社会主义倾向,把这篇讲稿编成一本小册子,印了1000份。

米塞斯继续就干预主义的方方面面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主要刊登在三份杂志上:《商业与金融纪事》(*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开诚布公》和《自由人》。这些文章不仅从《人的行为》的成功中获益,还进一步激起了底层自由至上主义运动群体对这本书的兴趣。不过米塞斯当然没有幻想它们在短期内产生现实的影响。美国具有悠久的自由至上主义传统,而且这一传统仍然非常强大,但是米塞斯也很清楚,当前的思想潮流正在无情地侵蚀这种力量:“如果美国继续实行干预主义政策,这个国家不久之后就会走向彻底的极权主义。”³⁷他的担忧很快就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所采取的政策中得到了证实。1950年秋,随着战争爆发,美国政府立即重建了战时价格管制体系。

1950年春,米塞斯参加了一场讨论当前朝鲜战争对美国经济影响的会议。会议于4月5日至8日在西弗吉尼亚州白硫黄泉镇(White Sulphur Springs)召开,由沃尔克基金会提供赞助。³⁸随后,米塞斯为1951年朝圣山学社在博瓦隆(Beauvalon)的会议写了一篇很长的论文,论文的主题是企业利润与亏损的本质。在论文中,米塞斯解释说:利润与亏损的唯一来源是企业决策的相对质量,因此,立法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政府干预都无法取消利润和亏损。他还解释了利润与亏损的社会效用,即利润可以引导资源流入那些能以最符合消费者需要的方式加以运用的人的手中;亏损则有助于消灭不合格的企业,从而避免资源浪费。米塞斯在6月初完成了这篇论文,然后就寄给了尼迈耶。³⁹尼迈耶的加尔文派朋友立刻发现这篇论文的内容适合进行广泛传播。甚至在朝圣山学社会议开始之前,尼迈耶就已经同意出版这篇论文并印了5000册,之后沃尔克基金会马上就预订了1500册。⁴⁰

至此,米塞斯重新开始了反对干预主义的斗争,但却调整了自己的策略,没有从自由贸易和直接对外投资开始,而是围绕着诸如中间路线政策、通货膨胀以及利润与亏损等话题展开。他认为应该把目标指向国内干预主义。米塞斯收到一封来

自瑞典的信件,提议发起一场自由贸易运动,米塞斯在回信中解释,为什么这场运动只能建立在针对国内政策所做斗争的基础上: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科布登和舍瓦利耶时代[《科布登-舍瓦利耶条约》是1860年英法签订的自由贸易协议,其名称来源于信奉自由市场的发起人——英国国会议员理查德·科布登和法国政治家米歇尔·舍瓦利耶。——译者注]贸易保护政策的废除,当时商业自由已经存在于每个国家,或至少正在确立。

干预主义时代的情况则截然不同。每个国家都有一套特权体系,不同利益集团(压力集团)的权利各不相同。如果外国商品能够自由进入某国市场进行买卖,那么该国的特权体系就失效了。因此,排除国外竞争就成了国内经济政策必不可少的补充。

美国代表有时会沉迷于谈论自由贸易。这是纯粹的幻想。如果国外商品能够自由进入美国市场,美国的农业政策——农产品平价、补贴、作物表面限制、销毁物资(土豆!),还有其他一些,会在一夜之间崩溃。你能想象现在的英国或者法国实施自由贸易政策吗?

一个国家越是全面控制所有的商业活动,它就越得在经济上“闭关锁国”。因此,为了实现自由贸易,必须首先与国内保护主义政策做斗争。⁴¹

900

这当然不是说他现在不再重视自由贸易了。他仍然在演讲中,偶尔也在信件中谈论这个话题。米塞斯的表达言简意赅,有时他在信里对这个问题的阐述要比书中更加精彩。例如,米塞斯回应了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自由贸易是否会减少美国的就业机会。他回答说:

几乎所有国家的工资水平都比美国低。但是,大部分商品——实际上是所有的工业产品,在美国的生产总成本比在国外低。能否占据市场竞争优势取决于商品的生产总成本,而非全部费用中某项开支的高低。

当然,在自由贸易下,一些规模较小、较不重要的制造业部门会失去部分顾客,因为他们会去购买外国产品。不过,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进口的增长只有在美国的出口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才有可能。如果瑞士手表“涌进”美国市场,则美国必然也有其他一些商品“涌进”瑞士,才能支付他们进口瑞士手表的费用。因为瑞士人并不是把这些手表送给我们。瑞士人是在出售它们。⁴²

901

《自由人》杂志

《人的行为》的成功推动了另一个重要的自由至上主义机构的建立。米塞斯一直坚持认为需要创办一份表达自由市场观点的刊物。现在,新的组织者、新闻记者,尤其是赞助人已经为这样一份刊物做好了准备。它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倡导米塞斯支持的思想。这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成了《自由人》杂志的精神领袖,而杂志又进一步巩固了纽约大学米塞斯研讨班、经济教育基金会和朝圣山学社之间新生的关系网络。《自由人》将在奥地利学派支持下的美国自由至上主义复兴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尽管它最终背离了创办之初的宗旨。两位历史学家恰到好处地概括了它的作用:

很难传达《自由人》杂志在其声誉最隆的1950年至1954年间发挥的关键作用。这些年间,美国左翼知识分子拥有许多知名的、声誉良好的记者可供选择,而右翼几乎没有这样的资源。⁴³

截至1955年底——当时新任股东改变了杂志的本质,一场自觉的、具有一定连贯性的运动已经成形。如果说“苟延残喘的保守主义”是“20世纪50年代的主要趋势”……那么现在《自由人》已经成了它的专业杂志和发表意见的平台。⁴⁴

902 《自由人》最初是以《开诚布公》杂志继承者的身份创刊的,后者已有一段时间陷入了资金困难,只能依靠纽约商人阿尔弗雷德·科尔伯格的资助生存。贾斯珀·克兰筹集了《自由人》的启动资金,因此,赫伯特·胡佛成了主要赞助者,而霍华德·皮尤和克兰本人也提供了数目相当可观的贷款。⁴⁵

903 皮尤和克兰的主要目的是为《人的行为》作者和其他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提供一个舆论平台,不过为了保证刊物的独立,启动资金来自捐赠和贷款而非股份。⁴⁶《自由人》的领导权落入三位编辑之手:亨利·黑兹利特、约翰·张伯伦和苏珊娜·拉夫莱特。张伯伦担任了杂志社社长,黑兹利特是副社长。他们决定发行双周评论,米塞斯则担任了十一人董事会成员。杂志第一期于1950年10月2日面世。⁴⁷

许多评论者对这份新刊物表示了欢迎,因为这是左派支配下媒体格局的一个必要补充。雷蒙德·莫利(Raymond Moley)在《新闻周刊》中向他的读者解释说:

人们很难意识到,那种可能导致自由体制蜕变成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在这个国家是多么根深蒂固。很多年前,这股潮流已经开始涌动,以“进步主义”或“自由主义”的名义增加国家权力特别是联邦政府权力。这是一场有组织的政治运动,最终,它俘虏了罗斯福领导下的民主党。它渗透进我们高等学府的大部分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之中。它支配了我们的文学批评和书评。最后,通过产业工会联合会(CIO)和美国劳工联合会(AFL)的政治斗争,它清楚地形成了一股拥有庞大资金和选票的工会中坚力量。

以下两份意见杂志贡献不小:《国家》和《新共和国》。这些杂志曾是少数异议分子的发声渠道,后来却成了几乎把持学界权力的那种立场的福音。在很大程度上,整整一代教师和思想领袖不得不从这些杂志中认清自己的方向。

904

《自由人》的伟大作用在于反抗这样一种新的正统观念:这种观念认为一切善的东西均来自国家。另外,这一新的异议具有一个优点:它与美国最古老和最优秀的自由传统是一致的——这些传统如果长期遭到忽略,也会萎缩和死亡。⁴⁸

杂志创办之初发展势头良好。订阅数量很快就从第一期的 5203 份上升到了 1951 年 5 月的 12 200 份。到了 1952 年 3 月,《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曾报道说,这份后起之秀的销售量几乎达到了 20 000 份。1952 年 3 月底,阿尔弗雷德·科尔伯格退出杂志当了会计,重新做起了他的进口生意。亚历克斯·希尔曼加入杂志团队,他是《盛会》(Pageant)和《今日人民》(People Today)等一些杂志的发行人。这个时期是奥地利—自由至上主义在美国首次全面绽放。现在,米塞斯感到形势一片大好,他写了一封信,指出自从 1945 年的黑暗时代以来,自由观念的地位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善。⁴⁹

《自由人》不仅为米塞斯提供了一个思想平台,同时也是一个组织网络,通过这个网络,米塞斯可以直接接触到许多学生。在亨利·黑兹利特的倡议下,《自由人》举办了一场为期两周的米塞斯研讨会,时间为 1951 年 6 月 25 日到 7 月 6 日的每天下午,地点为华盛顿广场纽约大学教授俱乐部(NYU Faculty Club)的校友活动室。⁵⁰在第一周,米塞斯讨论了经济分析的基本问题,到第二周,话题转向了货币经济学。年轻的利兰·耶格尔(Leland Yeager)就是研讨会的三十九位参与者之一,当时他还是一位货币经济学研究生。第二周的讨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⁵¹他写道:

905

阅读您的著作让我受益匪浅,然而,亲眼见到您本人,聆听您的声音,才是一次真正令人脱胎换骨的经历。您不仅展现出了一位伟大经济学家的风采,同时也让我们领略到一位卓越的人道主义学者的风范。干预主义者把您视为一位“死硬的反动分子”四处宣扬,结果只是暴露了他们自己的愚蠢无知。多么可悲,世上像您这样无所畏惧的知识分子如此之少!⁵²

906 耶格尔是少数学生参与者之一。参加研讨会的大部分是教师、记者、商人和教授。这两周的讨论非常成功,并促成了1952年6月和7月第二场米塞斯研讨会在旧金山公共图书馆的召开,这次听众有四十六个人。⁵³研讨会的第一周和上次一样,主题也是基本问题。米塞斯论述了他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几年后,这一分析成为他的《理论与历史》中的一个章节。在第二周,他讨论了资本理论(储蓄、投资和资本积累、资本需求,以及国外投资的经济和政治意义)。

第二次研讨会同样非常成功,不过他并未被成功冲昏头脑。当接到加州电视节目的邀请时,米塞斯拒绝了:“我的外国口音很重,不能上电视或电台节目。这些传播媒介会放大演讲者发音的缺陷。”⁵⁴

* * *

按照《开诚布公》的传统,《自由人》的具体目标之一是揭露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面目。反共产主义也提供了一种处理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关系的统一方案,人们可能指责这种方案是在共产主义启发下产生的。然而,关于反共产主义的战略作用,仍然缺乏基本的共识。张伯伦和拉夫莱特认为这是他们的根本任务。对于米塞斯和黑兹利特来说,共产主义只是更为普遍的国家主义恶疾的一个特别可憎的品种,而国家主义在国内的政府干预主义中表现最为显著。

907 最初几年非常关键,当时《自由人》刊登了许多与美国外交政策有关的文章,尤其是关于美国如何对抗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这种集中讨论反共产主义外交政策的做法当然只是权宜之计,因为这样一来,编辑可以扩大读者范围,而不冒犯那些既是反共产主义者又是亲干预主义者的人群。

然而,即使是在外交政策问题上,自由至上主义阵营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立场。其中一派主张政治孤立主义,同时在文化和商业上对其他国家开放。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干预主义者支持美国政府在世界范围内抗击共产主义。后者不太在意通过思想或教育手段对抗共产主义,而把重点放在谴责共产主义渗透、起诉国内叛国罪行和军事打击海外共产主义武装几个方面。伦纳德·里德和劳伦斯·费尔蒂希之

间一次半公开的通信集中体现了这一对立。里德持有一种坚决的反战立场,因为他认识到战争正是政府权力膨胀的主要原因。费尔蒂希评论说:

你的哲学似乎倾向于不抵抗主义,甚至有点无政府主义的味道。我相信,招募军队对于政府来说是一项完全合法的行动。你的言外之意是说,我们反击入侵之前必须一直在岸边等待,这对我来说是完全不可理喻的。你还认为,一个在朝鲜向共产主义者开火的士兵,就像在森特波特(Centerport)砸烂婴儿脑袋的人一样有罪,这点我完全无法苟同。⁵⁵

他继续说,根本问题肯定不是强制本身,因为毕竟税收也是向公民强制征收的。里德回应道:

就个人来说,我绝不认为仅仅因为你我都以集体方式行事,就存在着任何相应的正当权利。基于一种道德立场,集体是否有权按照某种对于个人来说错误的方式行事?不过,关于以下这点我可以让步:你有保卫自己生命和财产安全免于暴力侵犯的道义权利。作为集体,我们同样拥有这种权利,但是不能再进一步。这个推理不是无政府主义,也不是不抵抗主义。我所说的,无非是将权力限制在我所认为恰当的范围之内。⁵⁶

908

几年后,米塞斯在写给英国新自由主义机构经济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创始人安东尼·费雪(Anthony Fisher)的一封信上表达了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他哀叹了铁幕西侧公众舆论的亲社会主义倾向,这一倾向“麻痹了西方所有政治行动,而让俄国得以在匈牙利、波兰和近东为所欲为”。他继续说:

美国的普通知识分子指责英国和法国是侵略者,但是,他却没把俄国在匈牙利的所作所为算作侵略。他会承认,俄国在匈牙利的作为有些粗暴。但他原谅了这种粗暴。在他看来,以西方文明社会的标尺衡量东方事务是不现实的。美国社会认定的野蛮行径,对于东方国家来说,只是每个人的家常便饭。⁵⁷

除此之外,米塞斯并没有卷入这些争论。他在《自由主义》中已经指出,我们应该允许俄罗斯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按照自己的心愿随意折腾,他们可以在西方自

909 由传播他们的意识形态,甚至可以得到秘密雇员的帮助。西方诸国的商人和公民也可以自由地贷款给俄罗斯或其他地方的布尔什维克分子。但是,他所反对的是西方政府主动地支持共产主义的破坏政策,不管是通过补贴出口苏联的商品,还是通过有利于他们的宣传。⁵⁸他在二十五年前已经表明了这一立场,后来也没有收回这些言论中的哪怕一句。他确信,共产主义首先提出了一个思想挑战,因此必须运用思想武器加以反击。⁵⁹米塞斯希望《自由人》刊登更多讨论经济学原理的文章和书评,但他也很清楚,这份刊物缺少这样的人力。

这场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争论预示着延续至今的美国自由至上主义运动内部的分界线,但在当时,20世纪50年代早期,这只是一场正在展开的戏剧性事件的小小插曲——这一事件导致了早期《自由人》杂志的消亡。

这场大戏的主要因素是黑兹利特和张伯伦之间关于编辑方针的策略问题的分歧。后来又有一个因素牵涉进来:得到几位主要赞助人支持的黑兹利特不愿放弃他在《新闻周刊》的职位,全职为《自由人》工作。而且,他们对《自由人》杂志现在的地位和未来的宗旨也有不同想法,因此,黑兹利特-米塞斯阵营和张伯伦-拉夫莱特阵营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了。对米塞斯和黑兹利特来说,杂志的根本任务是教育广大民众,而不是参与各个政治派系的日常纠纷:

910 按照我的看法,《自由人》的作用是为持异见者挑战左派思想提供条件……关键不是反击共产主义,因为这个任务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由其他传播媒介承担了。真正重要的是详细阐述健全的经济学,揭露当前经济思想的谬误。⁶⁰

相反,张伯伦赞同更具进攻性的基调,不仅攻击,而且支持某些特定的个人、党派和政治候选人。他一直密切注视着米塞斯、勒普克和其他学界作者,后来他曾这样指责“不结果实的”报刊:

我们相信,按照创始人的意图,《自由人》应该成为一份综合性的双周评论,广泛关注当代事件,而不只是一份古典经济学杂志,仅仅成为一群杰出经济学家通过论文相互交换意见的园地。⁶¹

简单地说,张伯伦认为杂志必须具备“十字军般的激情……机智、讽刺和社论撕咬”。

黑兹利特回应说：

完全正确。不过，一个人的十字军式激情只是另一个人的猛烈怒火；一个人的机智和讽刺只是另一个人的无聊笑话；一个人的“社论撕咬”只是另一个人的粗鲁谩骂。

经过两年的运作，黑兹利特发现自己的忧虑一语成谶。他引述了芝加哥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的话，后者写信给他说，《自由人》上的文章

就像“大喊大叫”，对于已经皈依或者“彻底拜服”的人来说也许悦耳动听，但却几乎无法说服其他人，至少无法说服那些只服从于理性的人——而就我个人来说，我只关心这部分人。⁶² 911

后来有人提到，黑兹利特本人也很反对发行“那种把麦卡锡奉为圣徒的杂志”。那篇文献还引述了费尔蒂希的话。他说，《自由人》“本该通过逻辑和理性说服读者，而不是刺耳的、甚至有点歇斯底里的声音”。⁶³1952年10月，黑兹利特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一份自由至上主义期刊，据我看来，只有当它能够真正扭转我们这个危机时代民族主义思想浪潮之时，才是值得发行的。但要产生这样的影响，它就必须博得知识分子的尊敬——甚至包括（事实上，尤其应该包括）那些试图皈依的人。但是，除非它能树立自己的尊严和威信，否则是无法赢得这种尊敬的。当然，杂志在不牺牲品质的前提下也应尽可能地吸引更多读者。⁶⁴

事实证明，黑兹利特在《自由人》的工作严重消耗了他的精力，虽然他只是兼职编辑。1952年5月，他为编辑团队引入了一位新人：福里斯特·戴维斯（Forrest Davis），《周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的前任华盛顿编辑。不过没过多久，事情就很清楚：戴维斯不会站在黑兹利特一边。由于他的编辑立场陷于孤立，黑兹利特于6月提交了辞呈。不过，正式地说，他只是“休假四个月”，这是应米塞斯、费尔蒂希和董事会中其他朋友的请求所做的决定，因为他们不愿放弃对《自由人》的控制而将它丢给其他编辑。⁶⁵ 912

至此，张伯伦、拉夫莱特和戴维斯可以说是占尽上风。长期而言，他们的主要

问题是如何获得新的资金来源,而不依赖于原来的财政后盾皮尤和克兰,因为皮尤和克兰是支持黑兹利特一派的。这个问题似乎不难解决:利用《自由人》创办两周年纪念日的时机举办筹资晚宴。然而,纪念日前一个月,黑兹利特阵营开始破坏宴会的准备工作。

现在并不十分清楚是什么促使他们采取这一行动。下述情节似乎是最接近真实情况的:黑兹利特休假期间,霍华德·皮尤向张伯伦阵营和董事会成员明确表态,如果《自由人》专注于传播自由市场哲学的普遍原理,而不是针对具体个人和具体方案的党派攻击——即如果遵循黑兹利特的编辑路线,他将独力资助《自由人》。⁶⁶张伯伦及其盟友没有屈服,于是米塞斯等人进行了最后一次绝望的尝试,试图引导《自由人》回到黑兹利特的立场:他们开始破坏筹资活动,因为一旦筹资成功,编辑团队就可以在经济上脱离皮尤和克兰的控制。

913 斗争变得更加丑恶和私人化。张伯伦写了一些龌龊的信件,指责黑兹利特是皮尤的走狗,而在1953年10月一次激烈的董事会会议上,米塞斯说,比起黑兹利特,张伯伦和拉夫莱特只是二流记者。⁶⁷

黑兹利特本人已于1952年10月8日同时辞去了编辑职位和副社长之职——5月份之后他就有这个意向。与此同时,克兰和费尔蒂希组成了一个多数派,并在1953年1月21日的董事会上选举黑兹利特为杂志主编,之后,张伯伦、拉夫莱特和戴维斯立刻辞职了。⁶⁸

但这只是一次象征性的胜利。半年多的争吵已经把《自由人》推到了破产的边缘。贾斯珀·克兰绝望地试图通过筹款信筹集新的资金,弗雷德里克·尼迈耶则致力于寻找新的广告客户,但都没有结果。⁶⁹几个月后,毫无起色的财政状况开始让黑兹利特大为沮丧,此时他仍然为《新闻周刊》撰稿,同时也承担着其他合约规定的工作。

914 1955年,杂志由欧文顿出版社(Irvington Press)接手,该出版社是经济教育基金会的附属机构,编辑是霍多罗夫。米塞斯为1955年5月的第一期撰写了一篇关于“财富与收入的不平等”的文章。到第二年1月,《自由人》正式成为经济教育基金会的刊物。以后的几十年间,保罗·普瓦罗(Paul Poirot)将担任它的编辑,它将继续发表米塞斯的作品,推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发展。但是,它始终没有赢得大量的普通读者。

尼迈耶的关系

弗雷德里克·尼迈耶曾经刊印过1000本《中间道路政策的经济学》,并在他

的加尔文派同道中免费分送。这场活动产生了热烈的反响。几个月后,爱迪生公司(Edison Company)订购了3100本,诺福克和西部铁路公司(Norfolk and Western Railway Company)订购了800本,还有其他订单也蜂拥而至。⁷⁰至少一个版本越过大西洋落在了欧洲的丰饶土地上。年轻的英国商人安东尼·费雪请求给他寄去48本作为礼物——由于外汇管制的缘故——他也确实收到了。另外,至少还有另外一本越过了太平洋。⁷¹一位日本友人写信给尼迈耶说:

让我觉得意味深长的是,在一个公认为自由企业制度最后堡垒的国度,竟然不得不发行这样一本小册子……如果美国人自己也要让奥地利学者来告诉他们自由企业制度的优点,那么在我看来,整个世界已经病得不轻了。⁷²

915

1950年秋,在策划成功的激励下,尼迈耶在伊利诺伊州南荷兰建立了一家出版公司“消费者—生产者经济服务公司”。这家公司后来成为“自由至上主义出版社”,至今仍在运营。整个50年代,尼迈耶每个月初都会抽出两到三天到纽约与米塞斯见面,共进晚餐或午餐。他们始终没有成为至交好友,但是,尽管一位是犹太不可知论者,一位是荷兰裔美国加尔文派信徒,然而他们之间的关系绝不只是职业联系。尼迈耶最终确信米塞斯是“在世最伟大的基督教内在堡垒的守护者”。在写给霍华德·皮尤的各类信件中,尼迈耶总结了他多年来关于米塞斯的著作对基督教的意义的思考:

如果需要再来一次宗教改革,那么我想,它应建立在宗教改革年代以来行为学和自然科学对人类知识领域贡献的基础上。关于伦理学问题,我已得出结论,冯·米塞斯教授的经济学显然构成了改造希伯来—基督教宗教伦理使之适应现代社会的最令人满意的工具。一旦完成了此类综合,他将成为基督教格外保守的追随者。不过,还要清理某些歪理邪说。⁷³

916

* * *

尼迈耶的出版事业就像所有企业草创之初那样:小规模加上大观念。最初他出版了米塞斯的《通往社会主义的中间道路政策》,不过他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庞大的计划,他计划出版美国版《货币与信用原理》,还有庞巴维克三卷本巨著最终版的译本。⁷⁴米塞斯提醒他说,主要问题不是印刷好书,而是如何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里传播这些思想:

基于本国的最新形势,此类书刊将会遭到大学、图书馆和重要报刊的联合抵制。对我来说,主要问题在于筹集资金打破这类抵制。⁷⁵

917 尼迈耶知道米塞斯是对的,他也知道怎么应付这些问题。他在美国工业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关系网络早已填满了通讯录,而且他还具备绕过出版发行渠道直接与公众建立联系的不可思议的能力。米塞斯对此印象深刻,他开始认真考虑尼迈耶的计划,为他寻找一位翻译庞巴维克著作的称职的德语英译者。

米塞斯想起一位来自德国的年轻人,这个人已经参加了他的纽约大学研讨班一段时间。他于一年前来到美国,属于1949年夏季德国配额放开后的第一批移民。汉斯·森霍尔茨曾在马尔堡和科隆学习经济学,并于1949年春获得科隆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马尔堡时,一位同学曾经建议他研读那位来自维也纳的“尖锐的犹太人”的货币著作,于是,后来当他决定继续学习时,就在纽约大学的教师名册上认出了米塞斯的名字。他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米塞斯的研讨班,几个月后,请求米塞斯指导他的博士论文。后来,森霍尔茨回忆说:

米塞斯教授在纽约大学二十四年间只培养了四位由他指导论文的博士候选人(森霍尔茨、斯帕达罗[Spadaro]、柯兹纳、赖斯曼)。我第一次提出到他门下攻读学位的计划时,他很直率地拒绝了我:“有很多人想让我指导他们,但只有极少数是合格的。”我很吃惊,也很受伤,但我后来了解到,学院每年只授予极少的终极学位,因此也就理解了他的反应。米塞斯教授不愿指导一个可能失败的学生。事实上,最终收归门下的四名学生,可能就是向他提出申请的博士候选人中有望获得成功的全部名额了。六周后,我又重提了请求,这次他的反应大不相同。他欣然接受了我的申请,态度和气,甚至建议了很多论题作为我的论文题目。⁷⁶

918 此后的一些年里,森霍尔茨不仅写作博士论文,同时还在翻译庞巴维克的著作。遵循米塞斯的建议,尼迈耶也聘请了英语为母语的乔治·D. 汉克(George D. Huncke)为合译者。⁷⁷许多年后,森霍尔茨接管了尼迈耶的出版公司,事实证明,尼迈耶与森霍尔茨之间的关系在完成自由至上主义出版社的使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尼迈耶还有一个出版方面的设想,事后看来这个点子非常成功。关于怎样通过一种更加通俗易懂的形式(而不是长达900页的长篇巨著)把米塞斯的思想送

进千家万户,尼迈耶想了很多。1952年,他找到了答案。那年,他的自由至上主义出版社发行了米塞斯的一本文集,此书收入了米塞斯在此前七年间所写的论文。⁷⁸书名为《为自由而计划》(*Planning for Freedom*)。这个名字也是第一篇文章的标题,那是米塞斯在1945年为了回应哈耶克一段关于政府为了促进竞争而制定计划的文字所写的。另外几章批评了干预主义的理论、历史和实践的各个方面。这些章节还比较了干预主义的历史表现和自由市场的运作情况,每一章都可以单独阅读,因而整本书就构成了米塞斯经济学的一个绝好的“简易”介绍。此书销量很好。其中一笔订单还是来自苏联。米塞斯评论说:“我希望《为自由而计划》的购置能够补充莫斯科关于我著作的收藏。”⁷⁹

919

美国版《货币与信用原理》

《人的行为》的成功为1953年《货币与信用原理》新版发行铺平了道路。到了40年代后期,此书已经绝版多年。⁸⁰尼迈耶愿意出版此书的新版,但米塞斯选择了更有声望的耶鲁大学出版社,该社有意出版畅销书作者更多的书。尼迈耶以一种真正的基督徒精神,散发宣传单推广此书。他寄了5000份宣传单给银行家,另外又寄了10000份给其他潜在的读者。⁸¹

利用这次机会,米塞斯增补了此书第四部分——关于“货币重建”的内容,其中提出了重新引入金本位制的思想。他在这里重新表述了过去著作中出现过的观点,不过,此时他的思想更趋成熟,因而表述也更简练。他把这些古老的、较为专门的思想与当前斗争形势结合起来,也即反对那个唯一能够替代金本位制的方案——通货膨胀。米塞斯认为美国正处在通货膨胀和干预主义急剧恶化的边缘,正如他在欧洲所见到的。美国的形势只有一个方面不同于1914年和1923年的德国——出现了强烈反对这一滑坡的声音。⁸²

不过,他还补充了旧版面世以后取得的两个重要洞见。

920

第一个洞见是,哪怕“紧急状况”下的通货膨胀,也是不可取的。此类通货膨胀的支持者承认,正常情况下的通胀政策在经济学上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国家出现紧急状况(例如战争),需要政府的持续运作,而税收和债务又无力维持,那就应该允许实行通货膨胀。⁸³

米塞斯注意到,如果多数公民真正支持政府和政府制定的计划,那么,通货膨胀就是不必要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提高税收实现多数的政治决定。我们只能想到一种适用紧急状况论证的情形:多数并不同意政府的决定。他们可

能认为政府已经拥有足够的资源,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紧急状况。不管哪种情况,诉诸通货膨胀等于建立反民主的少数统治。他在1923年已经提出这个论点,当时正是德国恶性通货膨胀的高峰。不过那时他的言论更加谨慎,也没有坚持这个论点。⁸⁴到了1954年,他毫不含糊地提出,通货膨胀是暴政的经济特征,它不是政府合法收入的工具,而是一种压迫手段:

921

究竟是政府还是多数人民的观点正确,这个问题无须加以讨论。也许政府是对的。但是,我们并不关心这一冲突本身,而只在意执政者为解决问题采取的手段。他们放弃了说服多数人民的民主方式,僭取了本不属于他们的政治权力和道德权利,以规避人民的意志。他们通过欺骗大众、隐瞒自己将要采取的行动的成本赢得合作。他们的行为看似符合代议政府的宪法程序,但在事实上已经不是民选官吏,而成了人民的监护人。民选的行政官员不再自视为人民的受委托人,他把自己变成了独裁领袖。

他继续说:

通货膨胀成为我们时代货币管理的流行手段,并不只是一件偶然的事。通货膨胀是国家主义和专制政府的财政工具,它是逐渐走向极权主义的各种政策和制度的复合体的一个齿轮。⁸⁵

米塞斯在1954年版本中增加的第二个洞见,也偏离了他在1934年的思考,而离1912年此书初版时的观点就更远了。这个洞见是关于实际发行金币的必要性。1912年,他几乎忽略了这个“金属主义”的观点,现在,四十年的经历使他更加睿智。他强调说:

922

黄金必须成为每一个人的现金握存。每个人都必须亲眼看见金币转手,必须习惯于在口袋中装入金币,发薪水时接受金币,在商店购物时支出金币。⁸⁶

当然,米塞斯没有成为一只“金虫”。他对这种黄色金属或任何别的金属没什么特殊的迷恋。关键在于,只有商品通货能够保证货币领域的公民主权。只要他们持有真实货币,就能真正掌握自己的财富,并能立即注意到偏离健全货币政策的

任何迹象。银行或政府任何拒绝兑现支票的行为,都会立即成为欺骗的证据。

革除流弊的必要措施不外及时提醒民众。工人兑现工资支票时,应当了解他被某些违规的伎俩欺骗了。事实证明,总统、国会和最高法院既没能力也不愿保护一般民众和选民免于通货膨胀阴谋的迫害。保障健全通货的责任必须转入新人手中,也即全体人民之手。⁸⁷

最后,米塞斯还注意到,没有任何反对金本位制的理由。只有一种冷嘲热讽的主张,认为重提金本位制是一项乌托邦式的事业。他回应了这一责难,基本上是沿着总结社会主义批判时的思路:

然而,我们只能在两类乌托邦之间选择:其一,不因政府的破坏行为而瘫痪的市场经济乌托邦;其二,全面计划控制下的极权主义乌托邦。选择前者就意味着我们的决定是倾向于金本位制的。⁸⁸

923

幕后推手和巡回学者

米塞斯对自由至上主义运动和一般而言美国右翼的影响,并非只有《人的行为》的成功这一因素。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另外一项却是他在学院经济学家中的相对孤立。到40年代后期,米塞斯已经成了异类,不仅因为他的研究方法,也因为他的政治倾向。接着,《人的行为》把他推到了聚光灯下,突然之间,他对那些为了支持自由市场研究而设立的为数不多但却非常重要的基金的决策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三十年来,洛克菲勒基金会等机构对具有明确“科学”取向的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已经极大地影响了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状况。来自洛克菲勒、福特、卡内基等人的资金,通过洛克菲勒于1923年设立的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流向了各大院校。对于外界来说,委员会代表了七个重要的社会科学学会,但实际上它是独立的实体。1954年1月,一位私人研究顾问,卡尔·埃廷格(Karl E. Ettinger),在写给F. A. 哈耶克的信里评论了这个委员会的角色。他广泛引用了R. B. 福斯迪克(R. B. Fosdick)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历史》(*Histor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一书,最后总结说:

924

似乎存在确凿的证据表明,计量社会学之所以取得正统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金钱的吸引力和基金会的控制,这些基金掌握在基金管理机构的手中,他们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并且赞同社会科学模仿自然科学的方法。⁸⁹

925 只有一批为数极少的个人和机构仍然坚持老派的政治哲学。米塞斯认识所有这些人,而《人的行为》也极大地提高了他的威信。沃尔克基金会自1945年以来就开始向他提供资助。这部著作出版后,基金会开始支持他的讲座和扩大研讨会,甚至开始资助他的学生。从1955年到1969年,沃尔克基金会为纽约大学商业管理研究生院提供了政治经济学一年奖学金。⁹⁰有段时期,他还控制着纽约大学一笔12 500美元的年度预算。⁹¹其他机构也开始提供资助,例如,埃尔哈特基金会承担了旅行费用和学生奖学金,全国制造商协会组织了一些研讨会并支付研讨会的费用,而霍华德·皮尤等人则资助了《自由人》杂志。那些年间,资助米塞斯及其计划几乎成了理所当然之事。他对人事和项目的判断常常是一锤定音的。⁹²

大量资源突然集于米塞斯一人之身,可不只是因为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同时也标志着自由市场运动的一个重要问题:截至50年代早期,尽管学术研究已经获得不少资助,但却缺少米塞斯这样重要的自由至上主义学者。那时形势相当凄凉,正如劳伦斯·费尔蒂希在一封信中所说:

926 就拿哥伦比亚大学教员来说,我很怀疑,整个经济系除了乔治·斯蒂格勒博士和利奥·沃尔曼博士,是否还有其他人赞同自由市场和自由主义观点。在耶鲁大学,直到最近,三十位经济学教师中,只有两位——弗雷德·弗尔柴尔德教授和另外一位——支持老派自由主义观点。哈佛大学的教师团队则处在西摩·哈里斯教授(Professor Seymour Harris)、阿尔文·汉森、斯威齐这类人的支配下,他们之中,从凯恩斯主义者到极端社会主义者各色人等都有。(纽约大学的)教师队伍当然也受凯恩斯主义和集体主义影响,尽管少数杰出学者没有完全走上那条道路,例如约翰·D.威廉斯和萨姆纳·斯利克特(Sumner Slichter)。较小的学院同样如此,例如威廉姆斯学院、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等等。社会研究新学院的教员中连一个自由至上主义学者也没有。莎拉劳伦斯学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大概也产生不出哪怕一个。⁹³

费尔蒂希列出的这些自由至上主义学者没有米塞斯那么原创,那么彻底,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支持也没有那么坦率——所有党派都很清楚这一事实。米塞斯本人认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温和的干预主义者,而他的赞助者们也学会了尊重这一看法。他有时会推荐这些人撰写教科书,例如弗尔柴尔德和谢利(Shelly)的《理解我们的自由经济》(*Understanding Our Free Economy*),还有范西克(Van Sickle)和罗格(Rogge)的《经济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Economics*)。但他很有可能会说,这些教材的干预主义成分只是没有其他教材那么极端而已,在他看来,后者“从理论上讲已经完全被玷污了(马克思、凯恩斯、计量经济学),它们有着激进的干预主义倾向,如果不是彻底的社会主义的话”。⁹⁴

简言之,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角色无可替代,这一事实对于今后几十年的美国自由至上主义运动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后果。

纽约的学术圈子

927

米塞斯在纽约的活动中心是他的纽约大学研讨班。20世纪50年代早期至中期,参加纽约大学研讨班的主要有四个群体。

第一个群体是为了学分参加研讨班的纽约大学学生。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对经济分析的学术问题完全不感兴趣。然而也有例外。早期有位学生曾和米塞斯有过密切的合作,他的名字是休·P·金(Hugh P. King),1951年到1953年担任了米塞斯的助理,后来成了商务顾问。⁹⁵还有一位是莫顿·科布林(Morton Cobrin),1952年他写了一篇300页的硕士论文,以简明易懂的语言浓缩表述了《人的行为》的主要思想。接着,科布林参加了米塞斯关于“政府管制和利润体系”的研讨会。⁹⁶不过,还有一些更加重要的例外。至少三名纽约大学(汉斯·森霍尔茨、伊斯雷尔·柯兹纳和乔治·赖斯曼)正式学生最终成了重要的米塞斯主义者,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在老师止步的地方继续往前推进。⁹⁷

汉斯·森霍尔茨翻译过庞巴维克著作,他于1954年在米塞斯指导下获得了美国博士学位,1955年初出版了论文,题为《欧洲如何幸免于难?》(*How Can Europe Survive?*)。在米塞斯的支持下,森霍尔茨获得了1953—1954学年3000美元埃尔哈特研究经费,这时奖学金计划刚刚开始。⁹⁸米塞斯称赞他在“专业知识、教学能力和个人品质”方面的杰出表现。⁹⁹

928

与森霍尔茨相反,年轻的伊斯雷尔·柯兹纳在参加米塞斯研讨班之前完全不知道米塞斯是什么人。他甚至不是经济专业的学生,而是会计专业的,只是为了完

成学业必须选修一门经济学课程,才来参加米塞斯研讨班。他对经济学一无所知,于是决定选修纽约大学出书最多的经济学教授的课程。从1954年9月开始,柯兹纳坚持多年参加米塞斯研讨班,最终成了(沃尔克基金资助的)年轻学生的助教。他从会计专业转向经济学,投入米塞斯门下,并于1957年获得了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经济观点”(The Economic Point of View)。柯兹纳最终成为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企业家理论研究者,出版了大量著作,直到2002年退休。¹⁰⁰



伊斯雷尔·柯兹纳

第三位正式注册课程的重要米塞斯主义者是

929 乔治·赖斯曼,1963年他在米塞斯指导下取得利率理论研究方向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平均利润理论和平均利润率”。他的毕生研究计划是建立古典经济学、奥地利学派和安·兰德“客观主义”社会哲学之间的伟大综合。作为此项努力的成果,他最终出版了巨著《资本主义》(Capitalism)(1996)。现在他是加利福尼亚佩珀代因大学(Pepperdine University)的荣休教授。

参加研讨班的第二个群体是职业人士和商人。这个群体包括米塞斯的一些私人朋友,如亨利·黑兹利特、劳伦斯·费尔蒂希和格奥尔格·克特。除此之外,还有诸如理查德·弗鲁因博士(Doctor Richard Fruin)这样的人,他是美国海军的指挥官,通过出版物了解到米塞斯,并抓住机会参加了1954年底到1961年底的研讨班课程。

第三个群体来自经济教育基金会。包括基金会员工和那些通过基金会了解到奥地利学派的学生。其中最铁杆的粉丝是贝蒂纳·比恩和珀西·格里夫斯,他们构成了研讨班的核心成员,直到最后结束。

第四个群体是从经济教育基金会分离出来的一些人。它构成了以默里·罗斯巴德为中心的一群年轻的激进自由市场倡导者,包括拉尔夫·莱科、乔治·赖斯曼、伦纳德·利焦和罗伯特·黑森(Robert Hessen)。他们自称为巴斯夏小组(Circle Bastiat)。

930 兰德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出版于1957年,对巴斯夏小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引起了米塞斯和研讨班其他资深参与者的注意。¹⁰¹当年秋天,罗斯巴德读了这部小说,并与赖斯曼不停地讨论此书。他们也继续讨论资本主义积累是否意



巴斯夏小组：左起拉尔夫·莱科、默里·罗斯巴德、乔治·赖斯曼、伦纳德·利焦和罗伯特·黑森

味着利率的下降这个问题。对赖斯曼来说,这些讨论偏离了应该毕生坚持的研究计划。¹⁰²

* * *

无论按照什么标准,这个研讨班的水准都极高。研讨班的最初十年是米塞斯教育生涯的高峰时期。有一位参与者自1945年研讨班开课以来一直出席,他在1952年写了一封感谢信,陈述了令他印象最深的两个事实:

首先,它吸引了许多热心的参与者,他们的职业和专业兴趣各不相同,但却更能刺激富有成果的讨论;其次,不同于大部分研讨课,我们每年的参与都是建立在过去一年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因此,绝对不会让人产生课程内容不断重复的感觉。¹⁰³

研讨班对于此后米塞斯思想的传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因为它聚集了一批优秀的学生,而《人的行为》就是他们继续往前推进的起点。这是以往几批学生不曾拥有的特权,也对他们后来的思想发展以及他们建立的各个流派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森霍尔茨、罗斯巴德和弗里茨·马克卢普的例子,后者

是米塞斯在 20 年代和 30 年代早期的明星学生。他们三人都是出色的知识分子,但只有前两位是真正的米塞斯主义者。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人的行为》的出版。

就像当年指导维也纳和日内瓦的学生那样,米塞斯鼓励他的美国学生运用严格的演绎推理分析政治问题。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这一逻辑推到了极端的政治结论。默里·罗斯巴德在风华正茂的年轻时代曾经吹嘘说,自己即将完成的对市场经济的辩护“将比米塞斯更加右翼,因为它是基于‘福利经济学’,我已经在《纪念文集》的文章中初步提出了这个理论”。¹⁰⁴我们无法想象米塞斯的维也纳学生会吹嘘说比自己的教授更加偏向自由至上主义——这些维也纳学生认为米塞斯的市场经济论证有些偏激。

932 不过,罗斯巴德只是后《人的行为》时代(*post-Human Action period*)米塞斯主义学生中的一个极端例子。他们最爱的消遣是在米塞斯的著作里寻找国家主义的论证和假设,他们乐于“揭露”他的社会主义倾向,罗斯巴德称这位老大师为“非共产主义左翼成员”,学生们为此大笑不已。¹⁰⁵

新的激进主义很快辐射到纽约大学米塞斯研讨班之外。一些作者受到《人的行为》启发,开始把自由、财产和资本主义界定为社会秩序的绝对原则。最著名的例子是安·兰德,她为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提出了大胆肯定的辩护,从而动摇了那个年代的政治正确原则,她的一些著作的标题直接宣告了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正当。例如,《资本主义:不为人知的理想》(*Capitalism—The Unknown Ideal*),还有《自私的美德》(*The Virtue of Selfishness*),都受到《人的行为》影响,她本人也很谦和地承认了这一思想来源。然而兰德并不是例外。1955 年 9 月,米塞斯收到了一篇题为《资本主义宣言》(*The Capitalist Manifesto*)的长篇手稿。作者是一位名叫乔·亚伯拉罕森(*Joe Abrahamson*)的人,希望得到米塞斯的点评。¹⁰⁶这是一位热情的业余作者的作品,但它反映出米塞斯的读者非常广泛。

935 这段光荣岁月的高潮是纪念文集(*Festschrift*)的出版,它是为庆祝米塞斯获得维也纳大学博士学位(1906 年)五十周年而编辑的。1956 年 3 月 7 日,米塞斯在曼哈顿的典礼上接受了这本书。汉斯和玛丽·森霍尔茨组织了这次活动。¹⁰⁷大约在举办庆典的一年前,他们开始邀请研讨班成员如黑兹利特、罗斯巴德和森霍尔茨提供稿件,还向其他许多曾与米塞斯有过联系的知识分子约稿。¹⁰⁸

森霍尔茨很不情愿与米塞斯在维也纳时的学生和同事有过多联系,因为他们的政治倾向远比纽约大学研讨班的学生更缺乏自由主义成分。在纪念文集的二十位作者中,只有三位——勒普克、马克卢普和哈耶克——是米塞斯的维也纳老友。

因此,纪念文集忠实地反映了米塞斯思想环境的变化。它是关于人的自由和自由市场的思想论证的庆典,也是那位殚精竭虑地推进这一思想的人的庆典。书名很能说明问题:《论自由和自由企业》。¹⁰⁹



米塞斯获得维也纳大学博士学位五十周年庆典上:(上)米塞斯与哈耶克;(下)玛吉特、马克卢普、米塞斯、玛丽·森霍尔茨

一本米塞斯主义专著

这是美国新的自由至上主义高涨的年代——《人的行为》的年代。正是此时,默里·罗斯巴德完成了他那本阐述奥地利经济学的“教科书”。最初他的计划只是普及《人的行为》,试图“推广米塞斯的思想,就像麦卡洛克推广李嘉图思想那

936 样”。¹¹⁰但到了1952年10月,他已经决定要写一部更加独立的经济学著作。最终,罗斯巴德完成了一部洋洋洒洒900页的经济科学巨著,讨论了市场经济理论和政府干预主义。这是一部杰作,对下一代米塞斯主义经济学家产生了深刻影响。

1952年冬季学期,罗斯巴德在米塞斯的研讨班上提交了这部作品的部分章节。¹¹¹可能就是在这个学期,他第一次为自己的一些偏离米塞斯思想的学说提供了辩护。教授仍然按照一贯的方式处理这个争端,即学术放任自由主义。他鼓励罗斯巴德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继续走下去。¹¹²

罗斯巴德对米塞斯思想的异议大概代表着一种特殊的美国风格。例如,罗斯巴德逐渐相信,存在一种“基于人的本性和人的本性对于善的判断的理性伦理科学”。因此,他抛弃了马克斯·韦伯的立场,而这正是米塞斯所珍视的——没有伦理科学,只有主观价值判断。罗斯巴德可能是在安·兰德团体的影响下采纳了这个新观点。他在第一章初稿的手稿中解释了人的行为的第一原理,当时罗斯巴德仍然赞同韦伯的立场,这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标准”立场。然而,罗斯巴德可能于1952年间参加了兰德圈子的聚会,在此过程中改变了对科学伦理学问题的看法。¹¹³

另外,罗斯巴德也不接受哲学上的悲观主义——这种哲学似乎构成了米塞斯人类行为理论的基础。米塞斯曾经断言,人的行为是为了解除不满,这意味着他在快乐的时候是放弃行为的。罗斯巴德认为这个观点“与人的本性相抵触,因为人恰恰是在从事创造性活动的时候,才是最快乐的”。¹¹⁴

不过,罗斯巴德很快又在更加基本的问题上与米塞斯发生了冲突。1953年冬季学期期间,他对传统价格理论作了一些评论,这套理论强调成本曲线以及其他古典“客观”价格理论的残余。对这些思路的反驳使他得出了一些全新的结论。罗斯巴德开始相信,整个关于垄断价格的新古典主义理论都依赖于一个完全没有根据的虚构假设,也即可以在这些垄断价格和竞争价格之间进行区分。他相信米塞斯本人也堕入了这个虚构假设的陷阱。米塞斯的确认为,消费者主权会因为垄断价格的出现而受损害。罗斯巴德反驳说:

938 我已经得出结论:这个理论是彻头彻尾的废话。我这么说,不是要在经济理论问题上冒冒失失地反对米塞斯,但在这个具体问题上,我认为他没有摆脱旧的新古典主义方法的束缚。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竞争价格”?如果我们看到这种方法的图表,例如费特的《经济学原理》,我们就能找到竞争价格,而垄断者会根据这个价格估计他的需求曲线。但事实上,我

们永远也不知道竞争价格。竞争价格是行为的结果,而不是给定的数字。即使我们观察到一个人限制某种产品的投资和生产,并且提高价格,我们也无从知道这是从“竞争价格”转向了“垄断价格”,还是从“亚竞争价格”转向了“竞争价格”。正如米塞斯一再告诫我们的,一个脱离了真实行为的概念,如果我们当作真实实体甚至理想实体使用,必定是非法的。因此,竞争价格和垄断价格的整个概念都必须放弃。在自由市场上,只有“自由市场价格”,这个价格是竞争性的,因为买者和卖者可以自由竞争。这一点不仅对个体卖家正确,而且对卡特尔也是一样。因为我已经得出了一个可能更具有革命性的结论:如果卡特尔是自愿的,那就没有什么不对。假设许多公司合并或组建成一个卡特尔,那又如何?许多个别公司的资产汇聚一处,并受全体的节制,他们的权利对应于所有权的比例和他们的契约。但是,这个过程与普通公司的组建有何不同?同样也是一些个体根据自愿达成的契约投入他们的资本和资产。毫无二致。¹¹⁵

又一年过去,1954—1955 学年开始了,米塞斯在他的纽约大学研讨班上集中讨论了价格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的其他问题,可能是因为他感觉到罗斯巴德正处在研究工作的关键时刻,快要接近完成了。他让罗斯巴德做了几次报告,特别是关于罗宾森和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还有销售成本问题。¹¹⁶

939

罗斯巴德的状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整个夏天他都在和年轻的乔治·赖斯曼不停地讨论经济学问题。通过这些讨论,他们提出了米塞斯经济计算理论的一个重要扩展。他们是从这个问题开始的:“为了进行经济计算,经济体内的公司数量应该达到多大规模”,最后他们“得出结论,对于公司内的任何一次‘纵向合并’来说,必须存在一个外部的同一领域的市场,才能进行内部成本分配,诸如此类。因此,如果没有外部市场,任何公司都无法进行公司各个部门之间的计算,而社会主义政府无法进行经济计算只是上述一般结论的一个特例。”¹¹⁷

密集的意见交换,连同米塞斯的研讨班,为罗斯巴德的写作提供了重要激励。到 1955 年 7 月,手稿几乎已经具备了 1962 年最终出版时的样子。¹¹⁸最重要的是,此时罗斯巴德已经完成了解释概念框架的章节,他将在这个框架内同时分析市场经济问题和政府干预措施。与过去的经济学家截然不同——法国 19 世纪放任自由主义学派掌门古斯塔夫·德莫利纳里(Gustave de Molinari)是一个著名的例外——罗斯巴德没有把现代国家视为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相反,他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安全服务:强制的和自由的。前者是现代国家的特征,后者则只存在于

940



(从左至右)默里·罗斯巴德、亨利·黑兹利特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一个假设的自由社会。¹¹⁹

1955年7月,罗斯巴德在沃尔克基金会做了一场报告,他的陈述必定给卢诺和沃尔克基金会其他人敲响了警钟。罗斯巴德第一次阐述了自己彻底反国家主义的世界观,并试图证明这一立场可以在经济学原理中找到根据。这种明目张胆地鼓吹政治无政府主义的言论,哪怕对沃尔克基金会来说显然也太过分了。罗斯巴德再次获得研究经费的延期,1955—1956学年,他用这笔经费修改手稿(至1956年7月已经达到1900页打印稿),最终完成了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不过,有一点是很明确的:今后他不能再依靠沃尔克基金会的支持了,至少不像以前那样。1956年4月,他申请了一笔新的用于研究大萧条的经费,这次是从埃尔哈特基金会申请的。¹²⁰米塞斯明确表示了支持,声称他“完全相信(罗斯巴德)有朝一日将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学家。”¹²¹

罗斯巴德的专著被搁置了。他兼职为经济教育基金会撰写了一本论货币的小书(《为什么我们的钱变薄了?》[*What Has Government Done to Our Money?*]),并在未来几年继续修改他的专著手稿。¹²²沃尔克基金会的董事们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考虑如何对待这份爆炸性的材料,因为它很有可能会分裂新兴的自由至上主义运动。1959年5月,罗斯巴德在一封写给米塞斯的信中宣布手稿已经完成。他还对那段时间很少参加米塞斯的研讨班表示抱歉。¹²³

这份手稿转交到了沃尔克基金会的弗兰克·S. 迈耶(Frank S. Meyer)手中,显

然,他将决定如何了结这个项目。(这个决定也有可能和当时关闭基金的计划有关。)迈耶不是罗斯巴德主义者。他被选中处理此事,就是为了提供关于此书价值的第三方或“客观”意见。他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作者和资助者在不失颜面的前提下达成一致。迈耶指出,此书是“20世纪写出的两三本最重要的经济学讨论之一”,他毫不吝惜地赞扬此书是对经济理论传统的功效主义支柱的重大突破,这个突破打开了一个可能:将经济理论而非集体主义整合进某些保守主义思想中。¹²⁴另一方面,迈耶也告诫说,某些章节“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政治视角,是以一种强硬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写成的”。这些章节应该删除,其中包含的经济内容可以重新构成一章。

942

建议被采纳了。罗斯巴德的专著(删除了无政府主义内容)于1962年出版,题为《人、经济与国家》。他对没有国家的市场社会的讨论最终将在八年后出现在另一本书中,这本书就是《权力与市场》(*Power and Market*)。

森霍尔茨在格罗夫市城市学院

罗斯巴德还在忙于撰写和修改自己的巨著手稿时,汉斯·森霍尔茨成了米塞斯纽约大学研讨班的合格产品。他写了一篇非常详尽的博士论文,并于1955年在贾斯珀·克兰的范·诺斯特兰出版公司出版。他与罗斯巴德完全不同。罗斯巴德通常在夜间工作或和朋友讨论问题,白天多数时候在睡觉,经常一次又一次地错过最后期限,生活凌乱无序;森霍尔茨却具备条顿民族特有的守时、有序和值得信赖的个人美德。到50年代中期,他显然成了米塞斯最重要的学生。

森霍尔茨不仅继承了奥地利的思想传统,而且很有远见,也有动力和热情去推动奥地利学派和迅速发展的自由至上主义思想运动进入20世纪下半叶新的阶段。他不仅意识到关键的政治斗争就是观念之战(而在当前阶段这一斗争主要是在高等教育机构展开),而且还清楚地看到,从内部“转变”主流学界是没有任何希望的。自由至上主义运动的成功依赖于建立平行学术机构的能力,这样才能从外部与现有的社会主义学术势力抗衡。

943

森霍尔茨的悲剧——同时也是自由至上主义运动普遍面临的困境——在于,他的绝大多数建立平行的自由至上主义机构的动议未能获得足够的支持。例如,他从1955年8月开始试图创办自由至上主义杂志,奔走多年无疾而终。¹²⁵50年代末,他试图创办一所美国经济学院(*American School of Economics*),致力于培养未来的大学教授,同样没有成功。这些失败可能是由于潜在赞助者的畏怯,或者因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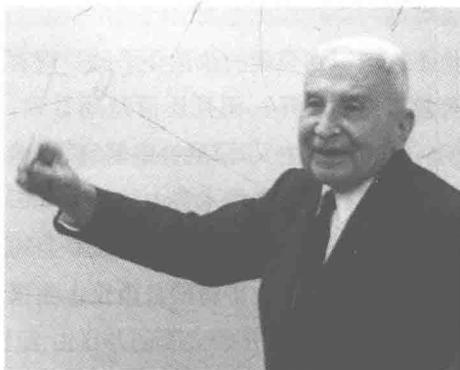
森霍尔茨的年轻和自信。他是一位天生的领袖人物,无法忍受阿谀奉承;他要在整个事业中保持自己的本色。有段时间,他投入到经济教育基金会的工作,并定居在哈德逊河沿岸的欧文顿镇。但是,伦纳德·里德也是一位自我意识很强的人,他的在场使得森霍尔茨没法把经济教育基金会转变成实现自己意义深远的计划的工具。1955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开始寻找新的工作。

944 对森霍尔茨来说,获得一个学术职位并不容易,因为他有三重不利因素:他是老派经济学家,又是自由至上主义者,还是德国人。¹²⁶不过,最终他还是在格罗夫市城市学院找到了工作,这是一所位于宾夕法尼亚西部的文科学院,皮尤家族数代以来一直赞助这所学院。此事再次证明了米塞斯与J.霍华德·皮尤之间的长期联系是多么重要。森霍尔茨第一次见到学院设施的时候,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小礼拜堂是仿照欧洲哥特式大教堂的样式修建的,真是精美绝伦。图书馆的接待室简直可以媲美欧洲的皇家建筑,地上是厚厚的波斯地毯,墙上挂着奢华的原作,家具则是法国古董样式。室内游泳池是按照奥林匹克标准修建的——就缺埃丝特·威廉斯(Esther Williams)了。保龄球场则按威彻斯特俱乐部(Westchester club)标准仿建。女生宿舍号称拥有一架金叶装饰斯坦威钢琴,还有其他一些精美家具。我开始理解为什么那么多教授愿意来格罗夫市,而且来了之后就音信全无了。

另一方面,森霍尔茨对学生的热情并不很高。包括皮尤在内的赞助者们,本来希望他们的捐赠能够促进未来自由社会拥护者和支持者的成长,然而学生大多无法达到他们的期望:“尽管资本家提供的大学设施气派非凡,但在1300位学生中,集体主义者通常就占了75%,还有25%则什么立场也没有。”

945 毫无疑问,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森霍尔茨不畏艰险,无所畏惧地投身于观念之战。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里,他培养了新一代奥地利学派学者,其中包括沃尔特·格林德尔(Walter Grinder)、杰弗里·赫梅尔(Jeffrey Hummel)、亚历杭



米塞斯在纽约大学研讨班讲课

德罗·查富恩(Alejandro Chafuen)、菲利普·纳塔夫(Philippe Nataf)和彼得·贝奇(Peter Boettke)。他发表了数百篇论文、几十本书和小册子。他和罗斯巴德几乎独力创作了现代奥地利学派(米塞斯主义)文献。直到60年代早期,他们的事业并不孤单。米塞斯本人也写了大量文章,我们将在下一章展开讨论。¹²⁷

注 释

1. Milton Friedman and George Stigler, "Roofs or Ceilings?" (Irvington-on-Hudson, N. Y.: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1946).

2. 米塞斯致吉塔,信件标注日期为1949年10月22日;Grove City Archive: Jitta file。

3. Henry Hazlitt, "The Case for Capitalism," *Newsweek* 34 (September 19, 1949), p. 70.

4. 米塞斯致阿明·斯皮塔勒(Armin Spitaler),信件标注日期为1949年12月6日;Grove City College Archive: Spitaler file; 米塞斯致齐格勒,信件标注日期为1949年7月16日;Grove City Archive: Cluett, Peabody & Co. file。

5. 唯一让他担忧的是玛吉特在11月的时候生病了。

6. 参见宣传单,日期标注为1949年8月9日,Grove City Archive: Fertig files。宣传单上提到研讨会是由沃尔克基金会赞助的。

7. Seymour E. Harris, "Capitalist Manifesto," *Saturday Review* 32 (September 24, 1949): 31.

8. John Kenneth Galbraith, "In Defense of Laissez-Fair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October 30, 1949), p. 45. 新年派对是在米塞斯写给哈耶克的信里提到的,信件标注日期为1949年12月13日;Grove City Archive: Hayek files。

9. 在私人信件中,奥斯卡·摩根斯特恩表示,他不认同米塞斯关于博弈论的论述。他没有解释原因,但他提到:

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而且,事实上它的确产生了一些结果,如果没有它,这些结果是不会出现的。现在它被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我可以从某些例子中看出这点。幸运的是,这些都是共同理解层面上的差异问题。

这当然是有帮助的。不过,米塞斯肯定有些困惑,摩根斯特恩竟然记不大起那本他声称“非常深入地”阅读过的著作的书名。(他在信中感谢米塞斯寄给了他一本“经济行为”)。参见摩根斯特恩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50年1月12日;Grove City Archive: Morgenstern file。

10. Alfred Sherrard, "The Free Man's Straightjacket," *New Republic* 122 (January 9, 1950): 18 - 19.

11. Murray N. Rothbard, "Review of Human Action," *Faith and Freedom* (September 1950): 14; idem, "Praxeology," *analysis* (May 1950): 4.

12. Richard Cornuelle, "A New Philosophy of Laissez Faire," *American Affairs* (January 1950): 47-51.

13. 拉赫曼肯定给米塞斯寄过这场演讲的稿子。参见米塞斯致波夫,信件标注日期为1950年12月26日;Grove City Archive; Ballvé files。

14. 参见通信,Grove City Archive; Christian Freedom Foundation file。当时,基督教自由基金会位于曼哈顿西58街26号。1957年前后,它的办公地点搬到了西57街250号。

15. Margit von Mises, *My Years with Ludwig von Mises* (Cedar Falls, Iowa: Center for Futures Education, 1978)。

16. 1959年3月米塞斯写给哈耶克的信中提到后面这个职位。1956年,克特还邀请他的雕塑家朋友埃里克森夫人(Mrs. Erickson)为米塞斯创作了一尊半身像。此后他和米塞斯夫妇很快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Grove City Archive; Koether files)

17. 《美国名人录》(*Who's Who in America*),1952年9月增刊。格里夫斯在1959年3月之前离开了《基督教经济学》。参见格里夫斯致弗雷德里克·尼迈耶,信件标注日期为1959年3月21日;Grove City Archive; Greaves files。他在找工作的时候,自称“世界知名的社会主义谬误分析家和自由市场社会的主要阐释者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教授的主要门徒”。格里夫斯致爱德华·达宁(Edward Duning),信件标注日期为1959年5月26日;Grove City Archive; Greaves files。那时他已经遇见了贝蒂纳·比恩(格里夫斯在1930年已经结过婚,有过3个孩子)。

18. 目前,这些课堂笔记已经进入编辑和出版流程,书名定为《米塞斯研讨会讲座》。其中第一卷已经面世。参见 Mises, *The Free Market and Its Enemies* (Irvington-on-Hudson, N. Y.: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2004)。

19. 参见“致《自由人》杂志有限公司董事会的声明,来自该刊活跃编辑”,1952年10月2日寄给《自由人》杂志董事会信件的附件,p.4;Grove City Archive; *Freeman* files。皮尤家族一直反对干预主义,他们出售了几乎所有欧洲(利润丰厚的)生意,而不愿意加入政府赞助的卡特尔。参见皮尤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54年11月5日;Grove City Archive; Pew files。

20. 瓦达·霍尔施(Vada Horsch)致米塞斯,备忘录标注日期为1945年3月23日;Grove City Archive; NAM files。

21. 米塞斯致皮尤,信件标注日期为1948年11月27日;Grove City Archive; Pew files。

22. 后来有位《人的行为》读者感到奇怪,为什么自由至上主义的观点无法进入报刊,米塞斯私下回信解释说:

这个国家发行的报纸和杂志只有两类,要么是基于商业原则运作,要么是刊载舆论观点的报纸和杂志……第一类刊物的出版商和编辑必须小心避免触犯大多数读者或相当一部分读者的情感。如果编辑收到的文章或信件攻击了关于“公平交易”和类似政策的流行的错误观点,而他们又无法拒绝刊载这些文章或信件,他们就会进行“编辑”。他们删除作者的论证,留下一堆愚蠢的废话。于是,这些文章在读者中产生的影响,恰恰与作者的意图相反。读者会有这样的印象,似乎提倡市场经济的人都是一些傻子和外行……第二类刊物则几乎都是彻底的共产主义者、半共产主义者和其他“比较激进”

的出版物……也有一些例外,例如《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还有《开诚布公》。但是只有银行家和商人会看《华尔街日报》,而《开诚布公》无法得到足够的支持,很有可能倒闭。(米塞斯致沃尔特·哈里森[Walter Harrison],信件标注日期为1949年11月5日;Grove City Archive:“H” files。)

米塞斯本人也遭遇过这类刊物的粗暴对待。例如1944年,《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侮辱《全能政府》的书评,书评作者是一位臭名昭著的斯大林主义者,而且显然从来没读过这本书。

23. 皮尤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8年12月7日;Grove City Archive: Pew files。

24. 皮尤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51年12月3日。显然,两人大约是在1949年10月开始交往,当时皮尤应邀去米塞斯的公寓共进午餐。

25. 威廉·M.寇蒂斯(William M. Curtiss)(经济教育基金会的执行干事)致罗斯巴德,信件标注日期为1946年11月25日;Rothbard Papers。

26. 伦纳德·里德致罗斯巴德,信件标注日期为1948年6月24日;Rothbard Papers (also in Grove City Archive: Read files)。这是7月8日一场会议的邀请函,米塞斯将在会上发表讲话。

27. 罗斯巴德致威廉·F.坎贝尔(William F. Campbell),信件标注日期为1951年4月;Rothbard Papers。

28. 沃尔特·布洛克(Walter Block)和沃尔特·格林德尔(Walter Grinder),“罗斯巴德道出一切:与默里·罗斯巴德的访谈”,1972年12月,第六页;Rothbard Papers。

29. 赫伯特·康努埃尔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9年6月17日;Grove City Archive: FEE files。

30. 参见罗斯巴德写给赫伯特·康努埃尔的信件,1949年11月28日;Rothbard Papers。这篇试写的文章后来被称为“货币论稿”。

31. 罗斯巴德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50年5月18日;Grove City Archive: Rothbard files。

32. 米塞斯致康努埃尔,信件标注日期为1951年2月10日;Rothbard Papers。

33. 写给沃尔克基金会的备忘录:《进展报告:1952年1月1日至10月1日》,13 pp., Rothbard Papers。

34. 莱科和赖斯曼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53年2月24日;Grove City Archive: Raico file。他们的第一次会面是在2月23日。比尔利的2月13日书信藏于同一档案。

35.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 trans. George Reisman (Princeton, N. J.: Van Nostrand, 1960); *The Free and Prosperous Commonwealth*, trans. Ralph Raico (Princeton, N. J.: Van Nostrand, 1962)。第二本书的书名后来再版时改为《自由主义:一篇社会经济论文》(*Liberalism: A Socio-Economic Exposition*) (Kansas City, Kansas: Sheed Andrews and McMeel, 1978)。沃尔克基金会赞助了莱科的翻译工作,他是从1956年夏天开始工作的。

36. 演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参见米塞斯与谢尔比·卡洛姆·戴维斯(Shelby Cullom Davis)之间的通信,Grove City Archive:“D” files。

37. 米塞斯致P. C.阿姆斯特朗(P. C. Armstrong),信件标注日期为1950年3月1日;

Grove City Archive; Armstrong file。

38. 参见会议记录,载于 Aaron Director, ed., *Defense, Controls, and Infl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2)。

39. 与此同时,他至少已经完成了另外一部重要著作的初稿。1951年6月之前,他写一篇手稿,讨论辩证唯物主义,这篇文章后来经过修改收入了《理论与历史》(*Theory and Histor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参见康努埃尔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51年6月6日;Grove City Archive: Herbert Cornuelle file。

40. 尼迈耶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51年5月28日;米塞斯致尼迈耶,信件标注日期为1951年6月21日;Grove City Archive: Nymeyer files。

41. 米塞斯致弗里德里希·赫尼希(Friedrich Hoenig),信件标注日期为1951年12月6日;Grove City Archive:“H”files。类似地,几年后他写信给鲁吉耶说:

可以预期,消除国内干预引起的关税壁垒,必定带来很多益处,而一个干预主义政府可以使这一切化为乌有。在干预主义支配下,只能通过建立一个共同政府实现真正的共同市场,这个共同政府有权为各国政府划定严格的管辖范围。(March 18, 1959; Grove City Archive: Rougier files)

42. 米塞斯致欧内斯特·安东尼,信件标注日期为1953年6月19日;Grove City Archive: Anthony file。

43. George H. Nash,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pp. 28f.

44. Charles H. Hamilton, “*The Freeman: The Early Years*,” R. Lora and W. H. Longton, eds., *The Conservative Press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London: Greenwood, 1999)。

45. 参见“Battle for the *Freeman*,” *Time*, January 26, 1953。在一份标注日期为1952年10月3日的笔记中,约翰·张伯伦称胡佛为“《自由人》的主要创建者”。后来,利奥·沃尔曼成功地启动了一个广告项目,随后由库尔特·拉森(Kurt Lassen)负责运营。参见黑兹利特致张伯伦,信件标注日期为1952年10月24日;Grove City Archive: *Freeman* files。

46. 参见“致《自由人》杂志有限公司董事会的声明,来自该刊活跃编辑”,1952年10月2日寄给《自由人》杂志董事会信件的附件,p. 5;Grove City Archive: *Freeman* files。《自由人》创办不久,弗雷德里克·尼迈耶曾写信给他的商界朋友:

冯·米塞斯博士已经成了这项计划——出版一份真正的自由主义(也即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期刊,抵消铺天盖地的左翼出版物的影响——的主要动力。最终,贾斯珀·克兰先生承担了为这份刊物筹措资金的工作。(尼迈耶致乔特[Choate]等人,信件标注日期为1951年2月13日)

另见尼迈耶致多尔顿,信件标注日期为1953年4月6日;Grove City Archive: Nymeyer files。克兰当时是杜邦(DuPont)董事和执行委员会委员。

47. 《自由人》还有两个同名的前身。第一份《自由人》发行于20世纪20年代的两三年间;编辑是阿尔伯特·J. 诺克。30年代,诺克的前助理苏珊娜·拉夫莱特恢复了该刊,但只发行了大约十四个月。1950年,拉夫莱特加入了张伯伦和黑兹利特的《自由人》编辑团队。参见 Nash,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 p. 27; Hamilton, “*The Freeman*;

The Early Years”。

48. 雷蒙德·莫利在《新闻周刊》的专栏(1950年11月13日)。

49. 米塞斯致V.卡齐米尔-兰伯特(V. Casimir-Lambert),信件标注日期为1951年5月15日;Grove City Archive: Casimir Lambert files。卡齐米尔-兰伯特于1946年离开美国,此时刚刚返回。米塞斯写信给他说,在他离开这段时期,“很多事情”都在朝着好的方向转变。

50. 6月的前三周米塞斯不在纽约,7月10日又再度离开了纽约(可能是为了参加博瓦隆的朝圣山学社会议)。参见米塞斯致里夏德·冯·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51年5月7日;Grove City Archive: Richard von Mises files。

51. 赫伯特·康努埃尔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50年10月30日,以及后来的信件;Grove City Archive: Freeman files。耶格尔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55年6月26日;Grove City Archive: Buck Hill Falls file。

52. 耶格尔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51年7月7日;Grove City Archive: Freeman files。贝蒂纳·比恩为这次研讨会做了笔记。80年代,耶格尔取得了亚拉巴马州奥本大学(Auburn University)政治经济学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讲席。他是一本著名的国际货币关系教科书的作者。

53. 还有另外一次会议也于1951年在白硫磺泉镇召开,米塞斯对这次会议全无好感,因为有太多的国家主义者出席了。参见Nymeyer to Brown, letter dated October 2, 1952; Grove City Archive: Nymeyer files,

54. 米塞斯致詹姆斯·法菲尔德(James Fifield),未标日期,答复法菲尔德1952年7月8日来信的信件手稿;Grove City Archive: Churches files。6月18日之后的几天,米塞斯离开曼哈顿前往旧金山。研讨会结束后,他在加州度过了一个假期,劳动节后回到了曼哈顿。秋季学期于9月22日开始。参见米塞斯致莫顿·科布林(Cobrin),信件标注日期为1952年6月18日;Grove City Archive: “C” files。米塞斯致阿米吕斯的信中提到了这次假期,信件标注日期为1952年6月3日;Grove City Archive: Hamilius files。地点(旧金山)和研讨会会期可见米塞斯致朱丽叶,信件标注日期为1953年9月22日;Grove City Archive: “J” files。

55. 费尔蒂希致里德,信件标注日期为1951年3月15日;Grove City Archive: Fertig file。

56. 里德致费尔蒂希,信件标注日期为1951年3月19日;Grove City Archive: Fertig file。

57. 米塞斯致费雪,信件标注日期为1956年12月10日;Grove City Archive: Fisher file。

58. Mises, *Liberalism*, pp. 153f.

59. 他在致路易·鲁吉耶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这个意见,信件标注日期为1950年5月9日;Grove City Archive: Rougier files。

60. 米塞斯致贾斯珀·克兰,信件标注日期为1954年4月27日;Grove City Archive: Crane file。

61. 参见“致《自由人》杂志有限公司董事会的声明,来自该刊活跃编辑”,1952年10月2日寄给《自由人》杂志董事会信件的附件,pp. 4-5; Grove City Archive: Freeman files。

62. 黑兹利特致张伯伦,信件标注日期为1952年10月24日;Grove City Archive: Free-

man files。许多人都有同样的感觉。一位公司主管解释了为什么他在 1953 年而不是 1952 年(那时老的编辑团队还在其位)的《自由人》上做广告:

去年我们确实考虑过《自由人》,可那时它的煽动性太强,不够客观。现在经过改组,这份期刊已经非常自由了——就这个词的保守主义含义来说。(多尔顿致尼迈耶,信件标注日期为 1953 年 4 月 8 日;Grove City Archive: Nymeyer files)

63. 引自“《自由人》之战”。

64. 黑兹利特致张伯伦,信件标注日期为 1952 年 10 月 24 日;Grove City Archive: Freeman files。

65. 黑兹利特致张伯伦,信件标注日期为 1952 年 10 月 24 日;Grove City Archive: Freeman files。

66. 参见“致《自由人》杂志有限公司董事会的声明,来自该刊活跃编辑”,1952 年 10 月 2 日寄给《自由人》杂志董事会信件的附件;Grove City Archive: Freeman files。

67. 张伯伦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 1952 年 10 月 27 日;Grove City Archive: Freeman files。1952 年 10 月 31 日举行了支持现任编辑团队的信任表决,表决的结果使双方力量对比公开化了。三位编辑本人和希尔曼、彼得斯(Peters)和科尔伯格投了信任票。里德、费尔蒂希、米塞斯和罗宾森夫妇投了反对票。参见手写笔记,Grove City Archive: Freeman files。

68. 张伯伦最后成了《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和《普林斯顿小组》(*Princeton Panel*)的编辑,同时也是《华尔街日报》的长期撰稿人。

69. 亨利·勒涅里(Henry Regnery)对克兰的回复很能说明问题:“我觉得这项事业败局已定。”勒涅里致尼迈耶,信件标注日期为 1953 年 4 月 6 日;Grove City Archive: Nymeyer files。

70. 尼迈耶致德拉菲尔德(Delafield),信件标注日期为 1951 年 4 月 4 日;史密斯致尼迈耶,信件标注日期为 1951 年 6 月 11 日;Grove City Archive: Nymeyer files。遵照米塞斯的指示,尼迈耶以“中间道路政策的经济学”为题出版了这篇文章。参见米塞斯致尼迈耶,信件标注日期为 1950 年 10 月 28 日;Grove City Archive: Nymeyer files。米塞斯获得了销售额 10% 的版税。例证参见尼迈耶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 1951 年 6 月 6 日;Grove City Archive: Nymeyer files。尼迈耶的发行总数是 10 000 册。过了 1961 年年底,很快加印了一版,当时库存还有 1380 册,到了 1965 年,又印了 30 000 册(!)。参见尼迈耶致利普塞特(Lipsett),信件标注日期为 1961 年 10 月 9 日;尼迈耶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 1965 年 7 月 15 日;Grove City Archive: Nymeyer files。

71. 尼迈耶写道:“费雪先生的请求也许是个‘骗局’,但是,我会设想他是一位自由市场和竞争市场的倡导者,他会用这些小册子促进一项美好的事业。”尼迈耶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 1951 年 4 月 23 日;Grove City Archive: Nymeyer files。在拉丁美洲,墨西哥商会联合会(Federation of the Mexican Chambers of Commerce)计划翻译这本册子(米塞斯致尼迈耶,信件标注日期为 1951 年 6 月 21 日)。

72. 岩井次郎致尼迈耶,信件标注日期为 1952 年 1 月 23 日;Grove City Archive: Nymeyer files。

73. 尼迈耶致皮尤,信件标注日期为 1959 年 4 月 22 日;Grove City Archive: Nymeyer

files。关于米塞斯是“在世最伟大的基督教内在堡垒的守护者”这一断言,参见尼迈耶致皮尤,信件标注日期为1959年2月10日;Grove City Archive: Nymeyer files。另见尼迈耶致皮尤,信件标注日期为1956年9月17日;Grove City Archive: Pew files。

74. 尼迈耶也和哈耶克保持联系,哈耶克建议他出版庞巴维克“管制还是经济法则”(Macht oder ökonomisches Gesetz)的译本。随后,尼迈耶咨询了约翰·里夏德·梅茨(John Richard Metz)1931年译本的版权。参见尼迈耶致森霍尔茨和汉克(Huncke),信件标注日期为1951年6月5日;Grove City Archive: Nymeyer files。

75. 米塞斯致尼迈耶,信件标注日期为1951年1月16日;Grove City Archive: Nymeyer files。

76. 他继续写道:“当他得知我是德国的博士且拥有科隆大学的学位时,可能改变了对我的看法,那个学位是我在27岁时,服了将近7年兵役(1939年11月15日至1946年9月14日)之后取得的。”汉斯·森霍尔茨,“寻找我的道路”,施拉鲍姆奖(Schlarbaum award)颁奖典礼上的演讲(加利福尼亚,圣马特奥,2004年10月16日)。爱德华·费西(Edward Facey)也在米塞斯的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

77. 米塞斯的建议是在致尼迈耶的信中提出的,信件标注日期为1951年1月27日;Grove City Archive: Nymeyer files。到1952年12月,两位译者产生了一些冲突。参见尼迈耶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52年12月11日;Grove City Archive: Nymeyer files。

78. 大约一年后,尼迈耶又有了一个新想法,提议为《人的行为》编写一份术语汇编,使它更加清晰易懂。尼迈耶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53年11月25日;Grove City Archive: Nymeyer files。后来,珀西·格里夫斯实现了这个计划。

79. 米塞斯致尼迈耶,信件标注日期为1955年3月24日;Grove City Archive: Nymeyer files。

80. 尼迈耶档案,大约1950年。

81. 他可能随宣传单一起寄出了米塞斯的论文《关于未来必成之事》(About Things to Come)。参见尼迈耶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53年10月22日;Grove City Archive: Nymeyer files。

82. 米塞斯致哈格曼,信件标注日期为1955年1月6日;Grove City Archive: Hagemann file。

83. 他评论说:

只有为数极少的书籍、论文和政治演讲诉诸这一政治理由。这个理由没有得到公开的论述,但其基本观念却在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的思想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Mises,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0], p. 500)

84. Mises, “Die geldtheoretische Seite des Stabilisierungsproblems,” *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164, no. 2 (Munich: Duncker & Humblot, 1923): 32. 另见本书第十二章的讨论。

85. Mises,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p. 468.

86. Ibid., p. 493. 类似地,他在私人信件中写道:“只有一种防止通货膨胀的有效方法,即全部政府支出必须只用税收和公共借款支付,而不能来自商业银行的贷款。”米塞斯致霍华德·皮尤,信件标注日期为1951年11月6日;Grove City Archive: Pew files。

87. Mises,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p. 494.

88. *Ibid.*, p. 500. 他毫不怀疑,这些警告可能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参见他写给鲁吉耶的信,标注日期为1952年1月3日;Grove City Archive: Rougier files。

89. 埃廷格致哈耶克,信件标注日期为1954年1月5日;Grove City Archive: Ettinger file。埃廷格引用了Raymond B. Fosdick, *The Stor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New York: Harper, 1952)。这些评论在政治上的爆炸性来源于大基金享有的免税政策。关于这点,参见Harry D. Gideonse, "Changing Issues in Academic Freedom in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94, no. 2 (1950); 米塞斯的信件标注日期为1954年5月24日;Grove City Archive: U. S. Congress files。米塞斯至迟在1946年就认识了埃廷格。埃廷格从事一项关于消费者合作社的合作研究,这项研究是由石油工业研究基金会(Petroleum Industry Research Foundation)资助的。参见Grove City Archive: Petroleum Industry Research Foundation file。

90. 第一位受资助者是汉斯·森霍尔茨(1955—1956)。伊斯雷尔·柯兹纳是1956—1957年的获奖者,村田敏夫(Toshio Murata)是1959—1960年的获奖者(回日本后,他开始传播米塞斯的理论,并将《经济科学的终极基础》和《人的行为》译成了日语)。只有两位学生连续三年获得奖学金,其中一位是罗伯特·瓜尔涅里(Robert Guarnieri)(1963年到1966年)。参见通信Grove City Archive: Guarnieri file。瓜尔涅里曾是汉斯·森霍尔茨在格罗夫市的学生,后来他成了一位商人。

91. 这些经费的拨付是从1958年12月开始的。参见比尔利致塔格特(Taggart),信件标注日期为1960年3月17日;Grove City Archive。

92. 1958年秋,经济思想史学者埃米尔·考德(Emil Kauder)建议当时正在寻找项目资助的雷蒙德·德罗弗不要直接写信给沃尔克基金会,而是先联系一下米塞斯或哈耶克。参见通信,Grove City Archive: Hoover files。

93. 费尔蒂希致保罗·麦吉(Paul McGhee),信件标注日期为1952年4月3日;Grove City Archive: Fertig files。

94. 米塞斯致波夫,信件标注日期为1956年2月13日,1957年5月13日;Grove City Archive: Ballvé files。

95. 金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53年6月4日;Grove City Archive: King file。

96. 科布林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52年6月10日;Grove City Archive: "C" files。科布林的硕士论文是在多劳博士(Dr. Dorau)的指导下完成的。

97. 名气更大,但却较不重要的,还有路易斯·斯帕达罗和爱德华·福利(Edward Foley)。

98. 直到1955年,他仍然是米塞斯推荐的唯一学生。此时,米塞斯寄希望于“我研讨班的其他学生很快能够达到要求”。米塞斯致洛伦·米勒,信件标注日期为1955年3月21日;Grove City Archive: Earhart Foundation file。

99. 米塞斯致切利沃尔德(Chellevoid),信件标注日期为1956年3月1日;Grove City Archive: Sennholz files。

100. 柯兹纳是1956—1957年沃尔克奖金获得者,并于1957年获得了埃尔哈特基金会

的经费资助。当时,他已经通过了论文答辩,正在作最后修改。参见米塞斯致韦尔(Ware),信件标注日期为1957年1月28日;Grove City Archive: Kirzner files。米塞斯赞扬柯兹纳是“一位立志成为优秀教师和作者的年轻人”。米塞斯致韦尔,信件标注日期为1957年2月7日;Grove City Archive: Kirzner files。

101. 1954年,罗斯巴德开始参与安·兰德团体的活动,不久就退出了,因为他断定兰德不是一位真正的自由至上主义者。不过,《阿特拉斯耸耸肩》出版后,他们之间又有短暂的友好往来,巴斯夏小组也被介绍给了兰德,这最终导致巴斯夏小组分裂。参见罗斯巴德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58年7月17日;Grove City Archive: Rothbard files。另见Justin Raimondo, *An Enemy of the State: The Life of Murray N. Rothbard* (Amherst, N. Y.: Prometheus Books, 2000), p. 109ff。

102. 赖斯曼致韦尔,信件标注日期为1963年7月14日;Grove City Archive: Reisman files。另见赖斯曼《资本主义》前言(Ottawa, Ill.: Jameson books, 1996)。

103. 弗兰克·迪尔森(Frank Dierson)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52年6月10日;Grove City Archive: “D” files。

104. 罗斯巴德,写给R.康努埃尔的报告,1955年7月19日,6页,罗斯巴德文集(至少一页已经丢失)。1954年罗斯巴德曾经写过这篇论文的一个雏形,并投给了《经济学》杂志(没有录用)。参见罗斯巴德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54年9月22日;Grove City Archive: Rothbard files。

105. 引自拉尔夫·莱科对罗斯巴德的回忆,见Llewellyn H. Rockwell, Jr., ed. *Murray N. Rothbard: In Memoriam*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95), p. 3。

106. 亚伯拉罕森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55年9月7日;Grove City Archive: Abrahamson file。米塞斯回信说,他希望不久能有空仔细研究这份宣言。

107. 哈耶克和马克卢普曾经考虑在1951年米塞斯七十大寿时出版一本纪念文集。然而,他们都不愿意承担具体事务,于是转而委托黑兹利特“负责有关文集编辑的技术工作”。参见马克卢普致黑兹利特,信件标注日期为1950年10月28日;Hoover Institution: Machlup-Mises correspondence file。黑兹利特事务太多,无法担任哈耶克和马克卢普的兼职助手,不过关键障碍却是资金问题:他们找不到出版商。参见马克卢普致玛丽·森霍尔茨,信件标注日期为1954年10月1日;Hoover Institution: Machlup-Mises correspondence file。

108. 截至1955年3月,福斯提诺·波夫已经收到稿约。参见波夫致米塞斯,信件落款日期为1955年3月18日;Grove City Archive: Ballvé files。路易·鲁吉耶撤回了他的文章,因为他认为英文翻译很糟糕,而阿尔弗雷德·米勒-阿尔马克则回绝了邀请,声称他没时间;参见Grove City Archive: Mary Sennholz files。

109. 这并不意味着消除了批评的声音。威廉·拉帕特提供了一篇对米塞斯干预主义理论的重要批评。在此,拉帕特发表了长久以来他在私人信件中表达过的思想。例子参见拉帕特在《国民经济学》出版时的评论。拉帕特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40年5月31日;Grove City Archive: Rand file。

110. 罗斯巴德致H.康努埃尔,信件标注日期为1951年3月14日;Rothbard Papers。“麦卡洛克推广李嘉图思想”是指John Ramsay McCulloch,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864] 1965).

111. 参见罗斯巴德为沃尔克基金会写的备忘录:“Progress Report, January 1 to October 1, 1952;” Rothbard Papers。

112. 罗斯巴德致理查德·康努埃尔,信件标注日期为1953年1月3日;Rothbard Papers。

113. 自从1947年11月之后,罗斯巴德与兰德就有间接的联系。到了1953年5月7日,罗斯巴德受委托将赖斯曼和莱科介绍给安·兰德,这意味着,此时他已经是兰德圈子的常客。

114. Rothbard, Progress Report (Rothbard Papers: Memo to Volker Fund, April 1, 1953)。

115. 罗斯巴德致R.康努埃尔,备忘录(“教科书还是专著?”),标注日期为1954年2月;Rothbard Papers。

116. 罗斯巴德致R.康努埃尔,信件标注日期为1954年11月5日;Rothbard Papers。

117. 罗斯巴德致R.康努埃尔,信件标注日期为1954年8月9日;Rothbard Papers。

118. 罗斯巴德致R.康努埃尔,信件标注日期为1955年7月19日;Rothbard Papers。

119. 罗斯巴德主要经济学文章的部分清单,参见约瑟夫·斯特龙伯格(Joseph Stromberg)为《人、经济与国家》第四版写的导言,*Man, Economy, and State*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03)。

120. 罗斯巴德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56年4月2日;罗斯巴德致C.康努埃尔,信件标注日期为1956年5月30日;罗斯巴德致H.W.卢诺,信件标注日期为1956年7月29日;全部藏于Rothbard Papers。罗斯巴德如期收到了埃尔哈特基金会的资助,正好接上沃尔克基金会经费到期的时间,后者被他用于支持专著的写作。

121. 米塞斯致肯尼迪,信件标注日期为1956年4月5日;Grove City Archive; Rothbard files。

122. 应经济教育基金会的请求,米塞斯评论了此书的1957年版本。参见通信,Grove City Archive; Rothbard files。

123. 罗斯巴德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59年5月5日;Grove City Archive; Rothbard files。

124. 弗兰克·迈耶,备忘录:关于默里·罗斯巴德手稿,1959年末或1960年1月;Rothbard Papers。

125. Grove City Archive; American School of Economics files。

126. 瓦达·霍尔施试图把他安排在耶鲁大学。参见瑞安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56年7月9日;Grove City Archive; NAM files。

127. 他仍然极力主张创办一所新的研究生院,培养未来的教授——一所完全奠基于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学院。参见森霍尔茨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56年11月7日;Grove City Archive; American School of Economics files。此后几年,森霍尔茨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推动这个计划;但却没能实现,主要原因是缺乏资金。在另一封信中,他曾提到,对于经济教育基金会来说,创办一所经济学研究生院的计划由来已久。参见森霍尔茨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59年1月10日;Grove City Archive; American School of Economics files。

20世纪50年代初,米塞斯在纽约大学的研讨班越来越多地就认识论问题进行探讨。正如米塞斯对路德维希·拉赫曼所说,他觉得在未来一些年里分析认识论问题将成为社会科学领域内的首要任务。¹他在自己最后两本著作里探讨了这个话题:《理论与历史》(*Theory and History*, 1957)和《经济学的终极基础》(*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1962)。

自从《社会学与历史学》(1929)以及《概念化与理解》(1930)发表以来,这个议题在米塞斯的思想中就占据着重要地位。米塞斯认为这是当代经济学力量最薄弱的两个领域之一(另一个是经济计算理论)。米塞斯在《国民经济学》和《人的行为》中强调了这个问题的历史意义:

人们完全误解了对经济学的本质、范围以及逻辑特征进行争论的意义,他们以为这些争论只是迂腐教授之间的无聊争吵,可以不予理睬。一个广为流传的错误观念认为,虽然空谈家们徒劳无益地长篇大论什么是最恰当的方法,经济学本身却不关心这些无聊的争论,而是安静地走在自己的道路上。然而,奥地利经济学派和自封为“霍亨索伦王朝知识卫士”的普鲁士历史学派之间的方法论之争,以及约翰·贝茨·克拉克学派和美国制度学派之间的讨论,远比“何种程序最有成效”这个问题更为重要。真正的问题是人类行为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及其逻辑合理性。²

948

他得出结论,认为这些经济学认识论批判的背后隐藏着政治动机:

多逻辑论、历史主义和无理性论得以发展,主要动机是为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漠视经济学说提供辩护。社会主义者、种族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始终无法驳倒经济学家的理论,借以表明他们自己捏造的那些学说的正确性。也正因为遭遇了这些挫折,他们才会否认逻辑和认识论原理——所有

人类理性活动都建立在这些原理基础上,不管是世俗活动,还是科学研究。³

因此,经济学认识论并不只是象牙塔知识分子的无聊消遣。它与现实直接相关。那么,经济理论怎么涉及实在?大部分经济学家相信——直到今天仍然相信——他们的命题只涉及现实生活中永远不会出现的假设状态。在米塞斯看来,这个想法是自相矛盾的:

949

奇怪的是,有些学派似乎承认这个观点,尽管如此,他们仍在安安静静地画着曲线图,列着方程式。他们不关心他们的推论有无意义,也不关心这些推论与真实生活和行为之间的关系。⁴

米塞斯本人觉得有必要阐明经济科学的认识论问题,因此他在《人的行为》第二章和第三章用了整整62页篇幅探讨这些问题。

不过,尽管这个问题极端重要,在《人的行为》中的确只扮演着从属角色。贯穿《人的行为》全书的伟大主题是经济计算理论。米塞斯首先分析了没有经济计算的情况,而后讨论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计算,然后是市场经济下的经济计算,最后探讨的是杜绝了经济计算发生之可能性的社会状况(社会主义),以及扭曲了经济计算的情形(干预主义)。从哲学角度看,《人的行为》是对功效主义社会哲学的全面论证——当然这是米塞斯风格的“功效主义”。这一论证的科学核心是经济学,特别是经济计算理论。

在他的新著中,米塞斯重新探讨了功效主义哲学。这次的论证集中在社会分析的认识论上。米塞斯认为,社会实在的科学解释只能基于经济学和历史学,而这两门学科的结论,按照他的理解,都导向了关于功效主义哲学的更加理论化的概括。他表明,另外几种主要理论——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不管具有怎样的科学抱负,在认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它们本质上都是形而上学学说,即它们的主张不是基于可以验证的事实,而是基于空想(正如米塞斯所表明的,其中很多主张是不一致的)。

950

新书最终以《理论与历史》为名出版,副标题是“社会与经济演化的一种解释”。⁵此书至今仍是他的著作中读者最少、最不为人理解的一本。部分困难在于这个主题本身的抽象性。但是主要障碍却是,米塞斯在这本书中不太关注教学方法问题,正如他的其他一些著述那样。大部分人在翻阅一本经济学著作时,事先已经知道自己会得到什么信息。但是,只有极少数人了解社会分析中理论与方法

史方法之间的关系。

米塞斯的新书不是为了讲述人类社会和经济的演化。书中探讨的是各种相互矛盾的叙事方式的认识论问题。在《人的行为》中,米塞斯附带讨论了这些问题。他强调,始于个人行为的经济分析,为人类社会的起源提供了一个纯粹基于事实的描述。整体论方法无法做到这点。他们通过“神学的或形而上学的信仰”解释社会。⁶在《理论与历史》中,米塞斯详细阐述了这个论证,为自由和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全面彻底的认识论辩护。

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社会科学的核心现象:价值。米塞斯阐述了价值的本质,并研究了人类行为之科学分析的含义。在第二部分,他论述道,尽管所有寻找科学规律的努力都必须基于严格的决定论假设,然而,至今为止所有试图找到这些决定思想和价值判断起源的规律的尝试都徒劳无功。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其他一些根据基本的物质条件解释社会的理论,都只是形而上学的猜测。还有一些基于某种终极目标解释社会演化的历史哲学,也是如此。在第三部分,米塞斯对科学的历史分析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发展了德国西南学派历史研究的思路。最后,在第四部分,他批判性地剖析了各种关于历史的推测。在下文中,我们将讨论他的主要贡献。

951

一言以蔽之

对米塞斯来说,分析的起点是“任何认识论的推断必然引向决定论的方向”。这是因为我们运用心智学习所有事物,而我们的心智具有决定论倾向。我们会忍不住去想,所有事情都是由某些原因严格决定的。

无论宇宙和实在的真正本质是什么,人类只能了解他心智的逻辑结构能理解的部分……人类心智的逻辑结构使人接受决定论和因果范畴。在人看来,宇宙中发生的一切都是作为万物源头的X在初期阶段便已呈现的力量、能量以及特性发展的必然结果。万事万物互相关联,而一切变化都是事物内在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如果不是作为前一阶段的必然结果,那就不会发生任何变化。一切事实皆取决于它们的原因,并为原因所限制。事物不可能偏离其必然的发展路径。永恒的法则支配一切。从这层意义上说,决定论是人类探索知识的认识论基础。我们甚至无法形成一个不受决定的宇宙图景。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无法察觉任何有形事物及其变化。它将呈现一团无意识

952 的混乱。我们无法辨别任何事物,也无法将它们与其他事物区分开来。我们无法预期或预言任何事情。在这样的环境里,人就像身处一个陌生的语言环境时那样无助。我们无法计划任何行动,更不用说付诸实施。人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他生活在一个有规则的世界,而且拥有建构因果关系的心智能力。⁷

这个观点暗示着,人的行为至少在理论上是可以根据背后的物质力量加以解释的。我们知道人的行为的直接决定因素是行为个体的想法和价值判断。但是这些想法和价值判断必然又取决于更加根本的原因。如果这个原因是物理或化学的过程,那么对人类行为所做的解释就可能成为应用物理学或应用化学的一个分支。

但是——这也是米塞斯在过去的著作中强调过的关键因素——目前人们对人的行为的更为根本的原因,仍旧一无所知。目前为止,所有试图根据物理、化学或者其他过程解释(人的)观念和价值判断的努力都失败了。关于这类根本决定因素会是什么,存在诸多假设,但至今没有一个得到证实。⁸因此,所有这类假设都只是猜想。它们属于哲学或形而上学的构想,但却不是科学知识。⁹

953 我们关于人类行为间接原因的有限知识,包含两点明确的方法论含义。至少目前看来,所有试图解释人的行为的原因和结果的努力,都必须把个体的行为视为一个终极的起点。他们必须接受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原则。较为年长的经济学家已经在本能地应用这个原则,但是,甚至创造了这个概念的熊彼特,也仅把它视为一种权宜之计。米塞斯提供了对其必然性的认识论证明。方法论个人主义深深植根于不完善的人类知识。

个人行为的因果分析必须考虑以下事实:任何行为都会产生某些不变的结果,即这类行为不论何时何地发生都会产生的结果。例如,货币数量的增长可能导致价格水平高于本来将会达到的水平,不管货币供应的增加是在何时何地发生。对于上述结果的研究是行为学和经济科学的任务。

954 但是,人的行为也有偶然的原因和结果。相同的行为——货币数量增长——可能来自不同的观念和价值判断。而且任何行为的客观结果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也会引发非常不同的个体反应。换句话说,观念和价值判断与人的行为之间的因果链是偶然的。阐明这些偶然的因果链,是历史研究的任务。¹⁰

米塞斯强调,这是对人的行为的科学分析所能达到的极致。从可观察的人的行为开始,我们能够解释某些不变的结果(在经济学的帮助下),我们也能解释某些偶然的結果(通过历史的理解),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能够解释某个特殊例子

中行为个体是如何将其观念和价值判断诉诸行动的(再次通过理解)。米塞斯并不排除个人的一些价值判断和观念可能具有不变的原因,但他再次表示,他自己或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它们是什么。目前,人的行为的偶然原因并不都能基于个例分析通过历史理解得到辨别。而且甚至这种分析方法似乎也没有给出一幅完整图景。还有一些复杂的边缘问题不服从于任何解释:历史个性。米塞斯解释道:

个人的特征,他们的观念和价值判断,以及这些观念和价值判断引导下的行为,无法追溯为某些事物的衍生物。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为何入侵西里西亚,这样的问题是没有答案的,除非你的答案是:因为他是腓特烈二世。¹¹ 955

结论就是,至少目前而言,社会科学无法与自然科学结合为一个统一的科学知识体系。“这一无知将全部知识的领地分裂成了两个独立的领域,通常称为自然的外部事件的领域,以及人类思想与行为的领域。”¹²出于方法论的理由,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分离。米塞斯把这个原则称为方法论的二元主义(methodological dualism)。

如果社会分析仅仅探讨已知事实,就必须将所有社会现象解释为个体行为的结果,而且事件因果链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个人的观念和价值判断。在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二元主义的范围内,科学研究将发展出“行为学”和“历史学”这类学科。前者是描述无论何时何地人的行为的不变结果的学科。后者是这样一门学科,即(1)根据行为主体的观点描述价值判断,以及(2)描述个体行为和其他相关因素如何在一个给定的客观环境中相互结合以产生一个确定结果。历史学通过事后回顾描述行为主体如何理解他被迫采取行动的情境,他的目标以及他所认为在他支配之下的手段。同时,历史学运用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一般原理来描述行为主体的行为造成的客观影响。因此,历史学的使命是以当事人的视角描述社会和经济演化的剧情。它的特殊工具是“心理学”或“具体理解”或——米塞斯喜欢的表达方式——“情意学”(thymology)。 956

在这两门学科中,经济学有着最重要的实践含义。¹³在《人的行为》中,米塞斯已经阐明经济分析直接导向自由放任主义的结论。他论证说,政府干预会引起甚至支持这些干预的人也不希望出现的结果。

在《理论与历史》中,米塞斯从认识论的角度完善了对资本主义的辩护。特别是,他讨论了那些明确地或隐晦地拒绝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二元主义的理论。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目的论历史哲学和实证主义的进路,基本理由是它们没有任何

957 科学依据。这些进路的基础是某些关于社会和经济演化的信念,但是,它们无法交出任何干货。科学的工具——推理与观察,既不能驳倒也不能证实它们的基本信条。不仅如此,倘若这些进路确实提出了可以验证的事实命题,它们的论证的关键结合点又是错误的(或不一致的)。例如,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历史哲学都无法解释他们所相信的社会演变的一般方向是如何通过个人的行为产生的。实证主义轻率地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可观察的人的行为不存在恒久不变的关系。历史主义的拥护者们无论支持何种政府政策都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们同时坚持认为经济法则之类的东西是不存在的。严格地说,这些都是形而上学的或准宗教的学说,不是科学。

科学及进行有益争执的文化

米塞斯认为,形而上学、哲学和宗教的任务是满足人类对知识和确定性的难以遏制的渴望。他评论道:

那些先知认为只有天启能够给人提供完全的确定性,他们是对的。人类的科学探究无法逾越人的理性的不足及其心智的狭隘所造成的限制。¹⁴

几年后,他更加清晰地表述道:

人的心智在探索知识的过程中会诉诸哲学或神学,恰恰因为它们寻求对自然科学无法解答的问题做出解释。¹⁵

958 有些问题,科学至今尚未得出答案(“是什么支配着原子的行为?”);还有一些问题,科学永远无法给出任何解答(“时间是否存在一个起点?”“灵魂会消亡吗?”)。科学只能回答基于可确认事实的问题。科学可以解释社会和经济演变,但必须是存在一些可确认的事实作为这一解释的依据。即便如此,这些事实的科学分析背后必然隐含一些基本假设,这些假设本身是无法证实的:

认为逻辑可以用于证明基本逻辑原理的正确性或有效性,这样的想法是自相矛盾的。关于这些基本的逻辑原理,所有可以说的只是:否认这些原理的正确性或有效性对于人的心灵来说完全没有意义,而人的思维,正因这些原理

的指引,才能导向成功的行为模式。……因果律和不完全归纳法的扩展推论永远无法通过演绎论证来证明;我们只能仰赖一个至今仍然无法证明的主张,即在一切实然现象的关联中皆有一种严格的规律性。如果没有这种一致性,那么关于自然科学的所有主张就都成了轻率的概括。¹⁶

米塞斯确实相信,形而上学、哲学和宗教在某种意义上也与现实相关,但问题是,它们对现实的解释无法通过推理和观察得到验证。因此它们无法像科学命题那样得到证明。因而对一种形而上学或宗教教义的信奉不能基于论证,而必须从本质上依靠一种价值判断。米塞斯坚持认为,价值判断和终极目的是“超越任何理性审查”的。它们只能通过一些价值判断标准得到检验,但是,一旦某个价值判断或终极目的满足这个标准,我们讨论的这个目的也就不再是一个终极目的了;相反,它就成为了为了达到上述标准而采取的一种手段。因此,真正的终极目的是不可能通过推理和观察加以论证的:

959

终极目的的典型特征是,它们完全依赖于每个个人的私人和主观的判断,这些判断无法检验,无法测量,更不能被其他任何人修正。在那些涉及个人的满意和幸福的事情上,每个人都是自己唯一的、最终的仲裁者。¹⁷

甚至那个神圣庄严的正义概念——如果理解为一个终极目的——也是无法论证的。我们必须依靠直觉以及关于内在声音的解释,然而怎么解决不同的直觉以及不同的内在声音之间的冲突?不仅如此,最重要的是,正义不是一种终极目的,它是达成社会合作的一种手段:

所有这些伦理学说都未能理解,在社会联系之外,以及,在社会产生之前——无论是时间上还是逻辑上——并无所谓“正义”可言。一个假想的孤立个人,处在生物竞争的压力下,必然把所有人视为死敌。他唯一关心的是保全自己的生命和健康,他不需要关心自己的生存对其他人造成的后果;他用不着正义。他唯一的焦虑是卫生和防御。但在个人与他人的社会合作中,他将被迫避免与社会生活不相协调的行为。只有那时,正义与不正义的区别才会凸显出来。正义始终指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凡有利于个人,而不损害他的同伴,例如使用某些药物时遵守一定的规则,那就符合卫生之道了。

960

正义的终极尺度是看对于维持社会合作是否有益。有益于维持社会合作

的行为就是正义的,有害于维持社会的行为就是不正义的。¹⁸

这就引起了一个涉及所有社会组织体系的重要的实践问题:这些体系无法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因此,只能依靠个别的价值判断。那么,这些体系的成员如何对待持异议者?一旦有人提出这个疑问,问题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尤其涉及不同的集体主义社会组织体系的成员。他们的出发点是集体先于个人的道德假设:

如果一个人珍视集体价值甚于自身价值,并且据此行事,那么,这是他自己的事。只要集体主义哲学家照此进行,没有人会提出异议。但是他们提出了不同的论点。他们将自己的个人价值判断提升到一种不容置疑的价值标准的高度。他们敦促别人停止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价值判断,而要无条件地采取集体主义赋予了绝对永恒效力的那些规则。¹⁹

如果某些个人不愿支持集体主义的计划,会怎样呢?米塞斯强调,集体主义者依靠暴力解决这个问题:

961

当然,只有一种方法能让自己的价值判断成为至高无上的标准。他必须制服所有持异议者。这正是各种集体主义学说的所有代表正在为之奋斗的事业。他们最终建议使用暴力以及无情地消灭那些他们谴责为异端的人。集体主义是一种支持战争、压制和迫害的学说。倘若任何一种集体主义信条经过努力获得成功,那么除了伟大的独裁者之外,所有人都将失去他们基本的人性。他们将成为握在怪物手中的没有灵魂的棋子。²⁰

我们再次看到,一切集体主义方案的基本问题是,为了论证他们的观点,不管愿不愿意,他们都必须依赖于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是无法证明对错的。相反,科学事实对所有人都是可确认的。任何人都可以自行检验科学家所说内容的真实性。他可以使自己确信,某次行为举措是可行的,而另外一次不可行,或者某次行为举措可以取得较好的结果,而另外一次不可以。科学并不涉及终极目的或价值判断,但它确实提供了通过现世手段达到现世目的的相关知识。因此,对于人类来说,最重要的是为这个世界的合作寻找最低限度的一致同意,尽管他们的信仰和价值判断千差万别。天主教徒、新教徒、犹太人和穆斯林可能无法就神学问题达成一

致,但他们所有人都可以自行检验以下观点:大规模的劳动分工比小规模劳动分工更有生产力,或者,经济计算需要货币价格。因此,即使社会成员有着不同的终极价值判断,一个自由社会依然可以运转。

自由社会的典型特征是,尽管社会成员在许多价值判断上存在分歧,它也照样可以运转。在市场经济中,商业不仅为多数服务,也为各种少数群体服务,只要这些少数群体没有小到现有经济资源无法满足他们的特殊愿望的程度。哲学著作得以出版——尽管很少有人阅读,而且大部分人更愿意读别的书,或不读书——只要读者数量足以支付成本。²¹

962

几年后,米塞斯又进一步越过这一消极辩护转向了一种更加积极的立场。持有异议不仅不与一个自由社会的运行冲突,它实际上还是19世纪达到顶峰的文化和经济发展的背后动力:

往昔美好社会的停滞状态,之所以能转变成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不是因为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变化,而是由于采纳了自由企业原则。这场始于文艺复兴,经过启蒙运动,而在19世纪自由主义时期达到顶峰的伟大的思想运动,既产生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也产生了它的政治后果,或者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政治“上层建筑”——代议政府和个人的公民权利:良心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以及一切沟通方式的自由。现代所有精神成就,都是在这种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氛围中兴盛起来的。在此之前,人类从未经历过19世纪下半叶那样的生活环境,那时,在那些文明国家,哲学、宗教和科学领域的重大问题可以得到自由讨论,而不用担心任何势力的打击报复。那是一个富有成效和有益争执文化的时代。²²

这种有益争执的文化最终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产物,但更准确的原因,却是经济科学的发现和传播。米塞斯认为,这门新学科的“发展和实践应用”是“现代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大事”。²³

963

大众民主社会的英雄

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已经全面陷入衰退。

为什么大多数西方人竟会遗忘,或者不再重视这一现代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大事?在《理论与历史》中,米塞斯提出了他对古典自由主义兴衰的解释。他所思考的核心问题是精英与大众的关系,这一关系在他的认识论反思的框架下得到了分析。

在其他著述中,米塞斯已经强调过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社会进步,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一小群人努力的结果:

关于资本主义带给世俗社会的空前变化,最为惊人的一个事实是,这一变化竟是极少数的作家和为数同样不多的接受这些作家学说的政治家一手完成的。至于一般的懒散大众,乃至多数商人——虽然他们通过贸易在事实上推行了自由放任原则,却不能了解放任主义的精髓。即使是在自由主义的全盛时期,也只有极少数人充分理解自由市场的功能。西方文明是根据少数精英的建议,才采纳了资本主义。²⁴

964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这是因为,最终来看,社会是由思想统治的。因此,传播自己思想的一小群人,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对社会组织产生一种远远超过他们自身力量的影响。

关于统治问题,存在一种相当表面和肤浅的观点,这种观点只看到了自由和专制在其统治方式和管理体系方面的外在规定,也即通过高压和强制的社会机构实施直接控制的统治阶级人数之多少……两百年前,休谟写了一篇不朽的论文:《论政府之首要原则》(On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这篇文章启发了后来关于自由与束缚之区分的现实主义观点。休谟告诉我们,政府(统治)就是少数统治多数。因此,力量较大的最终总是被统治的一方,而统治者所能得到的支持除了舆论以外别无其他。²⁵

现在,米塞斯将这个洞见与他的社会科学认识论结合起来。如果休谟关于观念统治社会的观点是对的,并且,如果科学无法给出新观念如何形成的一般解释,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新的观念是人类历史真正的推动力量:

历史是对人的行为的记载。人的行为就是以较为合意的条件取代较不合意的条件的有意识的努力。而观念却决定了什么是较为合意或较不合意的条件,也决定了我们可以诉诸何种手段改变现状。因此,观念是历史研究的主要

主题……每个新的观念的产生都是一次创新,它为世界事务的进程增添了一些新的闻所未闻的东西。理性历史不会重演的原因在于,每种历史状态都是观念影响的结果,而这种观念异于其他历史时期发挥作用的那些观念。²⁶

965

因此,知识精英才是真正的精英,相比之下,任何时代的强权人物都只是先前时代发展起来的观念的执行者。创造性的天才才是历史的主角和真正的推动力量:

每一个人,无论伟大或是渺小,都在自己时代的历史环境中生活和行动。这些环境是由过去以及当代的所有观念和事件决定的。巨人会比同时代人更加重要,但也终究敌不过许多矮人的联合力量。对于一位政治家来说,只有当他的计划适应时代的舆论气氛,也即适应那些已经获得同胞认可的观念,他才可能获得成功。他能成为一位领袖,只因他已准备引导人们行进在他们想走的道路上,朝向他们想要达到的目标。一位与舆论为敌的政治家是注定失败的。无论这位政治家是专制君主或是民主国家的官员,他都必须给予人民想要的东西,就像一位商人必须为顾客提供他们希望得到的东西一样。

对于那些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文学艺术形式的先驱,情况则有所不同。开拓者们对同时代的群众的欢呼不屑一顾,他们不依赖于自己时代的观念……天才的作品同样也是镶嵌在历史事件的序列之中,也为过去世代的成就所限制,同时,也只是观念演变的短暂篇章。但是,它为思想宝库增添了一些新的闻所未闻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可称为一种创造。人类的真正历史就是观念的历史……而且,在探寻它们的起源时,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发现,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某人产生了一个新的观念。我们是否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则是次要问题。²⁷

966

按照米塞斯的世界观,所有事物和思想都是先前原因的必然结果,而观念则是社会演化的一个动态因素。新观念的发现者和推动者——创造性的天才们——是社会的先驱,是引导人类走上新道路的精英,虽然这些道路有好有坏。²⁸但是,若要发挥这种作用,他们必须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现在的问题是,大部分开辟了 18 世纪和 19 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理性主义哲学家缺乏充分的自知之明。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少数精英,也不觉得社会进步必须依靠少数精英分子的推动。相反,他们沉溺于平等主义的社会幻想。

967

(他们)认为所有人都拥有相同的理性能力。他们忽视聪明人和蠢人之间的区别,甚至忽视开拓性的天才和纯粹因循守旧的广大群众(大众最多只能拥护伟大思想家所阐述的学说,却经常无法理解它们)之间的区别。在理性主义者看来,每个健全的成年人都拥有足够的聪明才智理解最复杂的理论。如果有人无法做到这点,那么错不在他的思想能力,而在于他所接受的教育。只要所有人都享有完善的教育,大家就会和最卓越的圣贤一样聪明而睿智。²⁹⁻³⁰

968 米塞斯认为,正是由于18世纪理性主义者的这一错误(并被19世纪社会主义者永久保存了下来),愚钝的大众越来越不愿意接受知识分子的精神引领,除非他们取悦大众。大众被灌输了这样一种神秘的观念:广大人民永远不会犯错——因此,社会无需知识分子的指引。

尽管面对这样的状况,古典自由主义者仍然支持民主主义,米塞斯也一样。的确,大众民主直接导致了“‘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希特勒、墨索里尼、庇隆和其他一些希腊暴君的现代继承者的独裁统治”。³¹但关键问题在于,是否存在其他可行的政治制度能够阻止这些暴行。虽然20世纪发生了许多政治和人道主义灾难,米塞斯仍然没有放弃民主主义思想。相反,他向精英阶层发出呼吁,希望他们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参与公开辩论,教育同胞理解正确的行为方式:

969 如果那些能够接受健全的政治原则的少数开明人士无法赢得同胞的支持,并使他们改变立场,转而赞同能够促进和维持社会繁荣的政策,那么人类和人类文明也就丧失了任何希望。除了敦促层次较低的大众接受精英的思想,没有其他办法可以保障人类社会的顺利发展。我们只能通过说服来实现这个目标。放弃大众启蒙,而以专制政权迫使人们屈服,是不可行的。长期而言,大多数人的观念无论多么有害,都会继续发挥作用。人类的未来就仰赖于精英阶层引导舆论朝向正确方向的能力。³²

具体而言,对于那些希望操纵社会演化走向更大程度自由的自由至上主义知识分子来说,上述论点意味着什么?他们是否需要寻求一种特殊的政体,或者设计一部特别的宪法?米塞斯对此不以为然。政体完全是一个次要问题,因为暴政可以存在于任何可能的体制下。他论述说,自由至上主义知识分子的主要难题是维持一个能够容忍异议的舆论环境。休谟的洞见是,统治者所能获得的支持只有

舆论，

这种看法如果推至其逻辑上的结论，就会完全改变关于自由的讨论。机械的和算术的观点被抛弃了。如果舆论对统治的结构负有根本责任，那么，它也将决定我们享有的是自由还是奴役。事实上只有一个因素拥有剥夺人们自由的力量——专断的舆论。维护自由的斗争根本而言不是为了阻止暴君或者独裁者的出现，而是为了阻止舆论变得专制。这不是多数对少数的斗争，而是少数（有时这个少数只有孤身一人）对多数的斗争。专制统治最恶劣和最危险的形式是压制异议的多数的统治。这就是托克维尔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得出的结论。³³

如果没有精英对宽容的捍卫，就不可能存在异议文化，经济领域就不可能存在竞争和进步。米塞斯把这个责任归于知识分子，并不说明他很幼稚。知识分子是人类历史戏剧的主角，是的，但是他们的生活态度必须包含真正勇于献身的品质。心酸的个人经历使他认识到，一位亲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无法期待丰富的物质回报。商业图书市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真正的先驱不能指望得到自由市场的丰厚收入：

970

一直以来，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欣赏那些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为半野蛮人所写的粗劣的小说如洪水般涌入书刊市场。但是，这并没有阻碍伟大作家创作不朽的作品。³⁴

同样，关键在于，没有其他社会制度能够提供更好的前景：

当然，有一些人，按照一种文明进步的标准应该视为人群之中最优秀的，但在市场经济下，却不是生活得最好的。一般无知无识的大众，不会正确地认识那些超越了自身之不幸的人们的优点。他们从自身欲望的满足这个角度判断每一个人。所以，拳王与侦探小说家比哲学家和诗人享有更高的声誉，赚更多的钱。那些为这一事实感到遗憾的人当然是对的。但是，我们实在设计不出一种社会制度能够公平地奖赏那些革新者，他们凭着自己的天才将人类引向前所未有的新观念，但正因为这些观念是新的，因此首先就被缺乏同样灵感的大多数人拒绝。³⁵

对于那些伟大但不成功的知识分子来说,唯一的安慰是商界先驱的遭遇也不比他们好:

971

企业家和投机者的利欲一直备受诋毁,可是,正是这种利欲使得他们不断地为大众提供前所未有的商品和服务。民众无法理解用以生产所有这些新奇东西的方法,然而他们的生活却因这些日新月异的产品变得丰裕富饶。这些庸庸碌碌的资本主义体制的受益者们沉湎于一种错觉,以为是他们的日常工作创造了所有这些奇迹。他们把自己的选票投给支持怠工和毁灭政策的统治者。他们视那些为了适应大众消费应运而生的“大企业”为头号公敌,而对(在他们看来)可以通过“惩罚”他们嫉妒的人以改善自己境遇的一切措施,则表示赞成。³⁶

历史研究

米塞斯在第三部分用了全部篇幅探讨历史研究的本质、范围和方法。人们可能感到惊讶,这些内容竟出自一位经济学家。但请记住,米塞斯对经济学的兴趣恰恰因为它是一种指导行动的工具。早年,当他还是一名维也纳大学学生时,就因为这种实践层面的考虑而对历史学派讲授的方法感到不满。《理论与历史》的一段话概括了这个问题:

历史主义者的致命错误在于,他们相信对过去的分析本身就传递出了关于未来行动方向的信息。历史记述提供的是对具体情景的描述;反应取决于行动者所赋予的意义、他试图达到的目的以及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而选择的手段。³⁷

972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一种新历史主义思想正在如火如荼地发展,并且即将征服西方学术界。这场新运动是由统计学家和计量经济学家领导的,他们所持的观点正好是米塞斯在五十多年前就抛弃了的。米塞斯在和尼迈耶的通信中悲叹道:

他们对于他们所谓的“形而上学经济学”充满了蔑视。他们声称,只有“事实”才有价值。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些“事实”是历史事实,而不是自然科学使用这个术语所指的那种事实。

所有这些研究机构、政府经济学家、大学经济学家等等,他们的官方教条包括,例如,社会主义方案无法通过“形而上学”,而只能通过“事实”加以反驳。他们指出,举例来说,利润“只占”国民收入的 $x\%$,或者“只占”销售额的 $y\%$ ，“因此”社会主义是错的。但是,社会主义者相信所有这些利润都不应该存在,而应该充公。他们运用同样的数字来验证他们自己的论点。³⁸

米塞斯转向经济学,是因为这门学科提供了历史研究无法达到的一些领域的知识——哪怕使用计量经济学最高级的技术也是一样——也即,为实现某些社会目的而采取的手段的客观有效性。不过,出于同样的实践动机,他也终生保持着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在《理论与历史》中,米塞斯试图解释,为什么以及通过何种方式历史知识必须补充作为人的行为的指导的经济学。这样,他就为在格林贝格研讨班时期遇到的一个重要插曲画上句号。

在以前的著作中,米塞斯已经强调了行为学和历史学之间的分工。他把历史学描绘为一种剩余学科,致力于研究那些精确学科(exact disciplines)无法解决的问题。³⁹他还特别指出了一个问题,即为不同的原因(这些原因结合起来就导致了某个可观察的结果)分配相对的量化权重。米塞斯把这个问题称为“相关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途径是运用历史学家的特殊工具,理解或者领会(*Verstehen*):

973

历史学家可以列举合力引起一个已知结果的所有因素,也可以列举妨碍这些因素以及可能延迟或者缓和最终结果的所有因素。但他无法运用定量方法确定各个原因对于最终结果发生的作用各有多大——除非通过理解。如果没有理解,他就无法确定各个因素在产生某个结果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理解在历史学领域,差不多相当于定量分析和测量的地位。

但是,对于合力引起某个结果的任何一个原因的相对贡献的理解,无法单独加以证实或反驳。因此,相关性问题是人们在科学问题上产生无法克服的分歧的起因。米塞斯强调,事实上它是持久分歧的唯一根源:

历史理解永远无法产生所有人都必定接受的结论……历史学家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发生分歧。他们或许对非历史学科的学说持有不同看法,或许会将他们的推理建立在对档案记录或多或少完全熟悉的基础上,也或许会对行为

974

人的动机和目标以及他们运用的手段有着不同的理解。所有这些分歧都可以运用“客观”的推理加以解决；关于这些问题，达成全体一致是可能的。但是，历史学家关于相关性判断的分歧，却无法找到一个所有头脑清醒的人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法。⁴⁰

米塞斯希望在《理论与历史》中充实他的理解理论。他不相信必然主观的相关性判断会让历史学成为多余。尽管存在一些缺陷，但也只有历史学这门学科可以解决某些在实践上极为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历史学本身就可以提供关于行为背景的分析。米塞斯强调说，人的行为总是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行为是对一个给定情境的有意识的反应，因而只有当行为的人理解当前状况时才能有所行动。但是，

并不存在对于当前事态的非历史分析这样的东西。现状的考察与描述必定是对刚刚逝去的历史的叙述。有关当前的政治或商业状况的描述，同样不可避免地是对那些造成现状的事件的报道。如果一位商界或政界的新人掌权，他的首要任务就是查明截至上一分钟为止的一切作为。政治家和商人一样，也是通过研究过去的记录来了解目前的情况。⁴¹

975

米塞斯清楚自己在谈论什么。撰写关于当前商业和政治状况的报告曾经是他许多年来赖以生计的日常工作。此外，他也曾在两个关键时刻作过关于政治事态的分析：他在《民族、国家与经济》（1919）和《全能政府》（1949）中分析了促使好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兴起的力量，也分析了两次世界大战中它们的灾难性结局。冷战开始阶段，他又写了第三篇论文《计划造就混乱》（1946），讲述苏联崛起的故事。因此，他在挑战那些可能不同意他的观点的读者时，处于有利的地位：

那些拒绝上述主张的人，可以自己试试描述任何现状而不提及过去——不管是哲学、政治，或是某个战场、股票市场、私人企业。⁴²

但是，历史研究应该追溯到多久以前？政治家或商界领袖是否有可能或有必要搜寻他们上任之前几年甚至更为久远的年代的历史教训？他评论说：“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即我们可以满足于将所有重要因素都顾及到从而能够停止调查研究。”⁴³没有任何先验法则可以帮助我们决定历史研究应该停在哪里。只有

完成额外的研究之后,我们才能判断这些新的历史知识是否有用。无论如何,那种认为随着时间愈加久远,现实意义就会逐渐减少的想法是个严重的错误:

某一事件可能发生在久远的年代和遥远的国度,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证明它对现在没有影响。对于今天数百万美国基督徒来说,3000年前犹太事务的影响,要比不久之前的19世纪下半叶美国印第安人的遭遇重大得多。我们时代罗马教会与苏联之间的冲突,有些因素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东西方教会大分裂。⁴⁴

976

历史研究所运用的特殊知识工具是“理解”或领会——这是德国西南学派提出的术语。在以前的著作中,米塞斯曾提到过这个学派的史学著作并表示赞赏。他在《理论与历史》中阐述了自己对领会理论的理解。他视之为一个发掘事实的工具——通过自省,以及与他人的联系:

它是对人的情感、动机、观念、价值判断和意志的认知,是一种每个人在处理日常事务时都不可或缺的能力,对于诗人、小说家、剧作家以及历史学家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现代认识论将这种历史学家的心理过程称为人类行为之历史学的具体理解……(然而,它)不是历史学家专属的心理过程。每个人在与其同伴的日常交往中都对它有所运用。这是一切人际交往都会用到的技术。托儿所和幼儿园的孩子、做生意的商人、处理国家事务的政客和政治家,都在应用这一技术。⁴⁵

米塞斯不愿意用“心理学”这个词汇描述这种方法,因为到50年代初期,实验心理学作为一门新学科的地位已经相当稳固,几乎等同于心理学本身了。为了避免混淆,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术语命名这种传统的人文主义心理学科:

977

情意学是……各人在与同伴的交往中学到的东西。通过这一途径,他将知道人们评价不同状况的方式,知道他们的希望和欲望,以及他们为了实现这些希望和欲望制定的计划。这是关于人们生活和行为的社会环境的知识,或者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关于他从一些特殊来源了解到的外国社会环境的知识。⁴⁶

米塞斯评论说,西南学派的成员没有意识到经济理论的存在,但这不会削弱他们在澄清历史的逻辑本质方面取得的成就。在《理论与历史》中,米塞斯为领会理论做了一个重要贡献。他指出,领会主要不是应用在对过往的分析,而是作为一个预测未来的工具。事实上有两种类型的历史学家:“过去时期的历史学家,和未来时期的历史学家,也即,行为的人。”⁴⁷西南学派及其追随者,例如阿尔弗雷德·许茨,已经在他们的写作中专门探讨了过去时期的历史学家。但最紧迫的问题却是关于未来时期的历史学家:

978

特殊理解的主要认识论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其他人在未来将会做出怎样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处理这个问题的传统方法,通常把它称为他我(alter ego)问题,或者对他人的理解(Fremdverstehen),然而这种方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它把注意力集中于理解他人在“当下”的行为,或者更准确地说——在过去的行为。但是行为的人也即每一个人,在与同伴的所有关系中,面临的任务并不指向过去,而是指向未来。了解其他人在未来可能会有的反应,是行为人的首要任务。至于了解他们过去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尽管是不可缺少的,但却只是达成这个目的的一种手段。⁴⁸

那么,什么是对于未来行为的领会的逻辑特征?米塞斯毫不犹豫地指出:未来时期的历史学家本质上是一位知识分子企业家(intellectual entrepreneur)。他全部的关于过去偶然事实的认知,都无法被一般化。这些关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环境的信息,怎么可以用于预测未来呢?只有一种方法:未来时期的历史学家只能猜测未来会是怎样。但是如果预言的是未来的人类行为,预测即会显现其固有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靠性:

情意学意义上的心理学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它从历史经验中获得学科知识……情意学所能告诉我们的全部就是,在过去,一些确定的个人或群体按照一种特定的方式进行评价和行为。未来他们是否会用同样的方式进行评价和行动,则是不确定的。有关他们未来的行为,唯一能够断定的就是,对未来进行的不确定的预测是基于人类行为科学的历史学分支的具体理解之上的。⁴⁹

979

这个洞见为争论不休的文化史问题提供了一条线索。文化史是一门充满沙文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偏见的学科。米塞斯身上没有那种仅仅几年前年轻的列维-施

特劳斯(Lévi-Strauss)曾经拥护过的文化相对主义。⁵⁰他相信西方文化的优越性,证据是其他所有文化都急于模仿西方体制,他们相信这种体制为西方带来了富足。另外,他也没有回避这一事实,即这种文化是由白种人创造出来的。但是,这绝不是一种支持种族主义政策的科学理由:

历史经验证实了以下主张,即过去高加索人种的一些分支为建立一个文明所做的努力已经超越了其他人种的成员。但它并不保证未来也是如此。它不允许我们臆断,白种人的这一优势会在未来持续存在……在1760年,如果一位历史学家宣告西方文明主要是拉丁人和英国人的成就,而德国人对此贡献甚微,他说得一点不错……但是,如果有人根据这些事实推论,认为德国人在文化上较为次等,而在未来也将远在法国人和英国人之下,那么,以后的历史进程将会否定他的结论……所有基于历史经验的关于种族问题所发的议论,可以归结为两个主张:第一,各个生物人种之间的主要区别反映在其群体成员取得的文明成就上;第二,在我们的时代,高加索人种的一些分支在文明方面取得的主要成就,已为其他所有种族的绝大多数成员承认——要比他们自己种族的成员所创造的独特文明更加优越。⁵¹

980

反资本主义心境

《理论与历史》出版一年以前,米塞斯已经出版了一本关于应用情意学的小书。此书探讨了反资本主义的心理原因——他称为**反资本主义心境**。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的出版,是在一场详尽无遗的讨论结束之后,讨论主题是反市场经济思想论证的功过是非。我们需要记住,情意学对米塞斯来说是一门剩余学科。领会的目的是说明人类行为中那些无法被其他学科解释的方面。如果经济学能够证明反对市场经济的论据是错误的,那么,怎么解释社会主义和全能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这就是他在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中要探讨的问题,而且一如既往,没有拐弯抹角。他选出了两个因素:思想错误,以及嫉妒和憎恨的卑劣情绪。

从一开始,那些熟悉经济理论的人们就已经彻底看穿了社会主义运动和恢复前资本主义时代干预政策的努力。然而,绝大多数无知无识的民众的观念却完全处在最强烈的嫉妒和憎恶的情感的支配下……他们成为社会主义者,是因为他们被嫉妒和无知所蒙蔽。他们顽固地拒绝学习经济学,毫不理睬

981

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计划的严厉批评。因为在他们眼里,经济学的抽象理论完全是无稽之谈。他们以为自己只相信经验。但他们同样顽固地拒绝承认经验中那些无可辩驳的事实。⁵²

此书引起了更多读者的兴趣,而不知疲倦的尼迈耶也乐于满足市场需求。他让范·诺斯特兰出版公司印了2000本平装版,每本售价60美分。⁵³评论不难预见。黑兹利特、罗斯巴德、莱科等人大加赞扬,与此同时,大部分评论者感到困惑或震惊。《经济学人》则大肆加以诋毁。米塞斯把这个反应视为一个好迹象——此书已经产生影响了。他在给一位希腊友人的信中写道:

正在摧毁英国繁荣及文明的政策先驱——伦敦经济学派——不喜欢我的《反资本主义心境》,而在有见识的人眼中,这种反应正是它的优点。⁵⁴

982 此书的瑞典版引起了强烈的愤怒,米塞斯在另一封信中对此表示满意:

唯一能够证明生产一本书所投入的时间不是浪费的证据就是,它遭到所有墨守成规的人以及普遍流行学说的支持者的抵制……我并不为自己属于一个很小的少数群体而感到羞愧。实际上,这个少数群体尽管很小,却并不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其中包括一些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人。⁵⁵

重新思考基督教信仰

《理论与历史》和《经济学的终极基础》最醒目的特征之一就是频繁提及神学问题。同时,米塞斯在探讨宗教问题尤其是基督教信仰时,还有一个同样显著的微妙变化。在《社会主义》和《人的行为》中,米塞斯一度怀疑基督教信仰与自由社会的原则是否相容,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他已经不怎么持有这种怀疑态度了。让我们思考以下来自《社会主义》初版的陈述:

(我们的)证据表明,上面提到的问题——基督教信仰与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自由社会秩序是否相容,答案是否定的。有生命力的基督教信仰无法与资本主义并存或融入资本主义。⁵⁶

到1949年,他的观点已经有所转变。此时,他把神权政治和宗教信仰彻底区分开来。由于后者并未将其观点强加给人,因此,它不一定与古典自由主义相抵触。虔诚的信徒只需容忍那些他们觉得敏感的话题的争论,比如节育和离婚。不仅如此,米塞斯似乎偏爱那种纯属个人精神事务的宗教信仰。那种宗教不会对社会产生任何影响。他引述了威廉·詹姆斯的著作,对詹姆斯来说,宗教是

人与圣洁、神秘、使人敬畏的神圣存在之间的一种纯粹私人的、个别的关系。它责成个人践行某一行为方式,但它并不断言有关社会的任何问题。⁵⁷

八年后,米塞斯又向基督教立场靠近了一步。我们在《理论与历史》中读到:

在任何伦理原则或任何基于十诫的教义中,都没有什么可以证明对以下这种经济制度的谴责是正当的。这种经济制度使人口成倍增长,并且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众提供了有史以来人类达到的最高生活水准。从宗教的观点来看,婴儿死亡率下降,平均寿命延长,成功战胜瘟疫和疾病,消灭饥荒、文盲、迷信,这些也都显示出了对资本主义的认同。⁵⁸

在同一部著作中,他还强调:“如果伦理学和宗教信仰告诉人们应该更好地利用资本主义带给他们的福祉,也是无可非议的。”他甚至指出,自然法理论的支持者至少预期到了经济学家的某些发现。⁵⁹他只是告诫说:“在没有对其经济后果进行充分研究的情况下,谴责一种社会制度而推荐替代它的另一种制度,这种行为是不负责任的。”⁶⁰又过了五年,他在《经济学的终极基础》中写道:

根据基督教神学和基督教哲学的基本教义,上帝创造人类心智是为了赐予人思考的能力。因为天启和人的理性都是上帝力量的表现形式,所以最终他们不存在任何分歧。上帝不会自相矛盾。哲学和神学的目标就是证明天启和理性的统一。教父和经院哲学试图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⁶¹

米塞斯可能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阅读卡尔·巴尔特(Karl Barth)的著作的。似乎正是在巴耳特的影响下,米塞斯形成了关于经济科学、自由主义和基督教信仰之间关系的成熟判断。⁶²在巴耳特的神学中,上帝是一位“全然的他者”,是不

可能被人的理性所理解的。巴尔特充满激情地为启示神学提供辩护,同时反对自然神学的理智主义假设。⁶³鉴于米塞斯身上极端理性主义的一面,这一论证颇有吸引力。当他发现巴尔特曾经指出“行为的上帝”是个自相矛盾的概念,他一定产生了莫大的兴趣,并把巴尔特视为精神上的挚友。他承认说:

天真的人神同形同性论 (anthropomorphism) 以为上帝就像一位独裁者或钟表匠那样,它的声誉是神学和形而上学的功绩。至于上帝与人全然不同,凡人无法理解他的本质,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对此也没什么可说的。超验之物超出了物理学和生物学能够有所发现的领域。逻辑既无法证明、也无法反驳神学的核心教义。科学——除了历史学——所能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揭露荒谬的巫术以及盲目的观念和实践。⁶⁴

政府干预主义和社会主义显然属于后者。米塞斯指出:

如果没有充分了解相关的物理、化学和生理学知识,一位正直的伦理学家或教士不会考虑参与那些关于技术问题或治疗方法的争论。可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却认为,不懂经济学不会妨碍他们处理经济问题……事实是,那些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与道德和宗教原则相对立的制度而加以反对的人,已经不加批判地、漫不经心地接受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所有经济学教导。他们就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把所有的不幸——经济危机、失业、贫困、犯罪和很多其他弊病,都归咎于资本主义,而把所有令人满意的事物——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生活水准、技术的进步、死亡率的下降等等,都归因于政府和工会的作用。他们无意识地采纳了马克思主义的所有信条,除了——只是次要的——无神论。哲学伦理学和宗教向反资本主义学说的屈服,是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宣传取得的最大胜利。这必然会使哲学伦理学和宗教沦落为图谋毁灭西方文明的势力的帮凶。⁶⁵

986

注 释

1. 他在1956年7月的一场会议上和拉赫曼谈到这点。参见拉赫曼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56年9月17日;Grove City Archive: Lachmann file。

2. Mises, *Human Action*, 3rd ed. (Chicago: Regnery, 1966), p. 4.

3. Ibid., p. 6.

4. Ibid.

5. Mises, *Theory and History: An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Evolutio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6. Mises, *Human Action*, p. 145. See also *ibid.*, pp. 145–47.

7. Mises, *Theory and History*, pp. 73–74. 他强调说,通过一个完美存在比如上帝的视角,事物看上去可能就完全不同。这一立场最接近于莱布尼茨理性主义。关于莱布尼茨理性主义对奥地利精神生活的重要意义,参见 William M. Johnston, *The Austrian Mi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chap. 19. 不过,约翰斯顿并不确定奥地利经济学派是否受到了莱布尼茨传统的影响。参见 *ibid.*, pp. 86f.

8. 十三年前,米塞斯曾经写道:

我们可以合理地提出这样一个假设,即人的心智能力是其身体特征的结果。当然,我们无法验证这个假设是否正确,但也无法证实来自神学思想的相反观点。我们被迫承认,我们并不知道思想如何通过生理过程得以实现。关于某些身体器官的创伤或其他伤害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我们确实有一些模糊的概念;我们知道这类伤害可能限制或者完全摧毁人的心智能力和机能。但这就是我们知道的全部了。(Omnipotent Government [Spring Mills, Penn.: Libertarian Press, 1985], p. 156)

9. 这个观点也适用于 F. A. 哈耶克的 *The Sensory Ord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2)——米塞斯从未提到此书。哈耶克试图分析生理冲动转化为心理认知的机制。显然,米塞斯并不认为哈耶克传达了比形而上学的推测更多的东西。

10. 个人的价值判断和行为

是终极所予(ultimately given),因为我们无法追溯到其他一些事物,而将它们视为这些事物的必然结果。若非如此,那就不能称为终极所予。不过,它们不像自然科学的终极所予那样是人的思考的终点。它们是一种特定思考模式的起点,是关于人类行为的历史科学的特殊理解的起点。(Mises, *Theory and History*, p. 310; emphasis added)

11. Mises, *Theory and History*, p. 183.

12. Ibid., p. 1.

13. Mises, *Theory and History*:

情意学与行为学及经济学没有特殊关系。流行观念认为,现代主观主义经济学——边际效用学派是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的,或与之有着密切联系,这个观念是错误的……行为学并不关注这些事件本身:某人运用心灵或思想或头脑在 A 与 B 之间做出确定的选择。它认为以下事实是理所当然的:宇宙的本质迫使人在不可兼得的目标之间做出选择。它的主题不是这些选择行为的内容,而是它们的结果:行为。它不关心一个人选择什么,而只关心此人按照他的决定进行选择 and 采取行动这一事实。(p. 271; emphasis added)

对一个人进行情意学分析在历史研究中必不可少。它传达了我们可以知道的关于终极目的和价值判断的所有信息。但是,正如上文指出的那样,行为学不需要这一分析,而且它对我们讨论为了实现所寻求的目标而采纳的手段也没有多大用处。(p. 280)

14. Ibid., p. 9.

15. Mises, *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Irvington-on-Hudson, N. Y. :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1962] 2002), p. 117.

16. Mises, *Theory and History*, p. 9.

17. Ibid., p. 12. 注意,米塞斯承认一个人的价值判断可能出错 (ibid., p. 174)。他还认为,人们理所当然可以享受艺术 (ibid., p. 63)。同样地,关键在于,每个个体就是他自己的裁判。

18. Ibid., p. 54.

19. Ibid., pp. 59f.

20. Ibid., pp. 60 - 61.

21. Ibid., p. 61.

22. Mises, *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p. 123.

23. Ibid., p. 3.

24. Mises, *The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 (Princeton, N. J. : Van Nostrand, 1956), chap. 2, sect. 1.

25. Mises, *Theory and History*, pp. 65 - 66.

26. Mises, *ibid.*, pp. 224 - 25. 他继续写道:“文明的本质是观念。如果我们试着区分不同的文明,我们能够发现的具体区别一定是那些决定着不同文明形态的观念的区别。”(ibid.) 另见 *ibid.*, pp. 261f, 以及 Mises, *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pp. 92f.

27. Mises, *Theory and History*, pp. 186—88.

28. 米塞斯对天才特征的强调是他思想的普遍特点,从《社会主义》(Jena: Gustav Fischer, 1922)到《人的行为》(1949),再到《理论与历史》(1957)和《经济学的最后基础》(1962)。我们不知道他的灵感来自哪里,但不排除以下可能:他或许觉得受过教育的人理应知道那位坚持认为“仅有”才能(无论多么伟大)与真正天才之间存在绝对差别的理论家。魏宁格尔(Weininger)在这个世纪初写过这样一段话:

有些人可能拥有一种才能,例如数学才能,这种能力生来就有,而后达到非凡的程度,然后他将能够轻而易举地掌握这门学科最难的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因此就有任何天才,天才是和原创、个性以及自身生产能力的条件一样的东西。相反,有些伟大的天才从未发展出一种具有很高水准的特殊才能。只需要去想一下诺瓦利斯(Novalis)(德国诗人)或让·保尔(Jean Paul)……才能是代代相传的,可能成为一个家族的共同财富(巴赫家族);而天才是不可转让的,永远不会广泛存在,而只属于某些独特的个体(约翰·塞巴斯蒂安)。(Otto Weininger, *Geschlecht und Charakter*, 19th ed. [Vienna: Braumüller, 1920], part 2, chap. 4, p. 126)

29. Mises, *Theory and History*, p. 270. 他补充道:

理性主义的第二个缺陷是忽略了错误思想的问题。大部分理性主义哲学家没有意识到,即使专心致志追求真理的诚实人,也可能会出错。这个先入之见让他们无法公平看待过去的思想体系和形而上学学说。对于一项他们不赞成的学说,他们就会认为那是一种刻意的谎言。他们中的许多人拒绝接受任何宗教,并把宗教视为邪恶骗子进行

蓄意欺骗的产物。

30. 熊彼特曾经沿着非常接近的思路探讨了古典民主主义学说的缺陷。参见 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Sons, 1942), chap. 21. 熊彼特和米塞斯都强调了市场过程和政治运作中领袖人物的关键作用。但与熊彼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米塞斯强调了精神领袖的地位。他还坚持认为,领袖人物有好有坏;他们可能促进社会的维持和繁荣,也有可能导致损害和毁灭。

31. Mises, *Theory and History*, p. 66.

32. Mises, *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p. 95.

33. Mises, *Theory and History*, pp. 66f.

34. Mises,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 chap. 4, sect. 2.

35. Mises, *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p. 113.

36. *Ibid.*, p. 114.

37. Mises, *Theory and History*, p. 288.

38. 米塞斯致尼迈耶,信件标注日期为1953年6月19日;Grove City Archive; Nymeyer files.

39. Mises, *Human Action*, p. 50:

对于逻辑、数学、行为学和自然科学无法完全阐明的现象的精神把握,就是理解的范围,就其无法获得这些学科解释的部分而言。它必须永远不与这些其他知识分支发生矛盾。

40. *Ibid.*, pp. 57 - 58. 在《理论与历史》中,米塞斯谈到了同样的问题:

预测之不稳定,主要是因为这个……问题的错综复杂。不仅预测未来的事件是个麻烦问题。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回溯过去的历史同样也很困难。(p. 314)

另见 *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pp. 67, 103.

41. Mises, *Theory and History*, pp. 287 - 88.

42. *Ibid.*, p. 289.

43. *Ibid.*, p. 290.

44. *Ibid.*, p. 290.

45. *Ibid.*, pp. 264 - 65.

46. *Ibid.*, p. 266.

47. *Ibid.*, p. 320.

48. *Ibid.*, p. 311.

49. *Ibid.*, p. 272. 关于情意学是一种经验主义学科,而不是一种先验学科,另见 *ibid.*, p. 311. 后来,他对思维过程给出了一个更具操作性的描述:

我们通过了解一个人过去的行为建构起一个图式,我们称之为他的性格。我们假设,如果没有特殊原因的干涉,这种性格不会改变,并且,进一步地,我们甚至试图预言特定的环境变化如何影响他的反应。(Mises, *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pp. 50f.)

50. Claude Lévi-Strauss, *Race et Histoire* (Paris: UNESCO, 1952).

51. Mises, *Theory and History*, pp. 335 - 37. 他评论道:

也许只有生物科学能够预测现在人们视为文化落后的那些种族的未来表现。如果生物学发现非高加索人种具有某些必然抑制他们精神机能的解剖特征,那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这样的预测了。但至今为止,生物学还没找到任何这样的特征。

52. Mises,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 chap. 2, sect. 2. 他曾在《社会主义》(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1, p. 384)一书中引述了曼德维尔(Mandeville)、休谟、和沙茨(Schatz)的话,暗示嫉妒的关键作用。1952年10月,他向沃尔克基金会推荐了赫尔穆特·舍克(Helmut Schoeck)关于嫉妒的研究计划。舍克的申请获得批准,他也向米塞斯报告了研究的进展;参见 Grove City Archive; Schoeck file。

53. 尼迈耶致约翰逊,信件标注日期为1956年10月31日和1957年1月10日;Grove City Archive; Nymeyer files。

54. 米塞斯致康斯坦达卡托斯(M. E. Constantacatos),信件标注日期为1957年5月16日;Grove City Archive; Constantacatos files。

55. 米塞斯致特里格维·霍夫,信件标注日期为1957年6月11日;Grove City Archive; Hoff files。米塞斯告诉霍夫,他永远不会回应批评。

56. Mises, *Gemeinwirtschaft*, p. 421.

57. Mises, *Human Action*, p. 156.

58. Mises, *Theory and History*, p. 343.

59. *Ibid.*, p. 45. 这大概是受到了雷蒙德·德罗弗和熊彼特,可能还有玛乔丽·格赖斯-哈钦森(Marjorie Grice-Hutchinson)关于16世纪和17世纪萨拉曼卡学派(School of Salamanca)的论述的影响。

60. *Ibid.*, p. 343.

61. Mises, *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pp. 106f. 在《理论与历史》中,他还不是那么肯定理性和信仰之间的对立可以在基督教神学的范围内得到克服。

我们可以暂且撇开上帝创世、道成肉身、三位一体这些真正的教义,因为它们对人际关系问题没有产生直接影响。但是,很多事情还是会有关联,因为大部分基督教会和宗派——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还没有准备好服从世俗理性以及社会效用视角下的评价。因此基督教神学所表现出来的对自然法则的认可是有限制的。它们接受的是一种特定类型的自然法则,一种不与各个教会和宗派所解读的基督教义对立的法则。它不承认理性的最高地位。它与功效主义哲学的原则格格不入。(*Ibid.*, pp. 46f.)

62. 米塞斯在《反资本主义心境》中提到了巴尔特,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 chap. 2, sect. 2.; 但在《人的行为》中没有提到, *Human Action*, p. 671, n. 8.

63. Karl Barth, *Der Römerbrief* (Munich: Kaiser, 1922).

64. Mises, *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p. 38.

65. Mises, *Theory and History*, pp. 344 - 45.

1956年,美国的奥地利—自由至上主义运动达到了顶点。十年的持续发展促使一些重要出版物和其他突破性进展如潮水般涌现。1955年,汉斯·森霍尔茨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1956年初,他的妻子玛丽为米塞斯编辑了一本纪念文集,这本文集佐证了奥地利—自由至上主义知识分子网络的存在。米塞斯本人出版了《反资本主义心境》,并在1956年朝圣山学社会议上致了开幕词。此次会议于柏林召开,主题为“永久通货膨胀”(The Permanent Inflation)。也是在1956年,默里·罗斯巴德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而森霍尔茨获得了他在格罗夫城市学院的第一份工作。

同样也在1956年,米塞斯开始察觉到外界对自己表示认可的迹象。不像一些朋友和同事如汉斯·凯尔森和约瑟夫·熊彼特那样幸运,米塞斯从没获得过任何奖项、荣誉博士学位、有声望的职位或政治影响力。他一生都逆着潮流前进,这时甚至可能已经不再期盼得到同时代人的赞许了。1937年,维也纳商会试图推选米塞斯担任宫廷枢密官(*Hofrat*)或宫廷顾问(*Court's Counselor*)的职位——奥地利公务员中非政治就任者能够获得的最高的头衔,但希特勒(对奥地利)的接管阻碍了这件事。此后,米塞斯就只能等到差不多七十五岁时才会得到公众的认可。1956年6月,他获得了一项奖金为1.5万美元的威廉·沃尔克杰出服务奖(*William Volker Distinguished Service Award*)。¹一年后,格罗夫城市学院授予了他荣誉博士学位。接下来的几年里,其他荣誉也接踵而来。那段时期,米塞斯备受尊敬,其中最持久标志就是格奥尔格·克特安排为他制作的半身铜像——也是在1956年。

988

获得终身成就的认可通常伴随着一段时间的放松。米塞斯的情况,以及他在20世纪50年代促成的运动也是如此。在公开场合,他开始感觉自己老了。米塞斯从来不是一位演说家,但他在相关议题上的渊博知识以及清晰易懂又有条理的陈述,总是令人印象深刻,特别是在规模较小的场合。他在1958年普林斯顿的朝圣山学社会议上,以及1959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系列演讲中,最后一次显露出了这种激情。此后,他变得前所未有地虚弱。²他的听力越来越差,而且很快就必

须依靠珀西·格里夫斯的帮助才能主持研讨会的讨论。

989 此时,快速成长的奥地利—自由至上主义运动显露了战略缺陷,开始让人很伤脑筋:年龄断层。米塞斯已经将近八十高龄,而他的主要门徒大多只有三十出头——森霍尔茨、罗斯巴德,尤其是柯兹纳。他们中没有中间世代可以从米塞斯颤抖的手中接过领导权。亨利·黑兹利特和伦纳德·里德年龄合适,但却只是他人思想的推广者。他们缺乏领导这场运动的威信,因为这毕竟是一场思想运动。³

现在,这场自由至上主义运动处于这样一些人的影响下:他们已经是学术权威,年龄也正合适担任运动领袖,但在奥地利—自由至上主义的意义,他们不是真正的米塞斯主义者。到60年代初,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兰德已经成了声誉卓著的作家,也是全国公认可以领导一场思想运动的人选。由于他们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到60年代,奥地利—自由至上主义已经大规模地被其他自由至上主义和保守主义运动替代。这一范式转变的最明显的标志包括《国家评论》(创刊于1955年)取代《自由人》杂志,芝加哥学派新自由主义者于60年代接管朝圣山学社,以及一场有组织的兰德主义或者说“客观主义”运动的出现。

990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美国大众舆论正转向干预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时期。1955年,《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封致编辑的信,报道了当时针对美国高中毕业生进行的一次调查,米塞斯想必会对调查结果感到震惊。当被问及对于自由企业的看法时,82%的人说他们不相信美国存在商业竞争;60%的人说公司所有者获取了太多利润;76%的人相信公司所有者的绝大部分利润是通过新机器获得的;55%的人支持“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要求;61%的人拒绝相信利润动机是经济体系的动力;



米塞斯出席1958年的朝圣山学社会议

60%的人说工人不应该生产他们能够生产的全部产品。⁴

此后二十年间,奥地利—自由至上主义运动继续缓慢发展。它以一场地下运动的形式苟延残喘,核心人物包括汉斯·森霍尔茨、默里·罗斯巴德以及70年代后的伊斯雷尔·柯兹纳和路德维希·拉赫曼。由于内部斗争,这场运动更加衰弱。其中最重要的分歧是关于“无政府主义”问题:最低限度的国家对于维持一个自由社会来说是必要的吗?罗斯巴德式的无政府主义者完全拒绝接受这种国家,他们声称,自由市场竞争能比国家垄断更好地提供安全和契约执行的服务(就像所有其他服务一样)。这个立场使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失去了围绕在伦纳德·里德和汉斯·森霍尔茨周围、鼓吹最小国家(或者说“最小无政府主义者”)方案的古典自由主义群体的支持。罗斯巴德思想的连贯性和激进主义仍然吸引着许多出类拔萃的年轻人,而且,当奥地利—自由至上主义运动在八九十年代作为一股强大的思想力量再次出现时(它的中心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这股力量正是处在默里·罗斯巴德的思想领导之下。

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米塞斯见证了一场美国“保守主义”群众运动的兴起,以及新自由主义芝加哥学派在朝圣山学社内部的崛起。他目睹了自己最有前途的一些学生抛弃了对自由企业制度的支持。

保守主义运动和自由至上主义的残存者

991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自由人》杂志已经实现了它的目标:集结五花八门的自由至上主义力量——艾尔伯特·杰伊·诺克(Albert Jay Nock)称他们为“残存者”(the Remnant)。但它在财政和组织上的困难为另一份非左派的期刊敞开了大门,这份期刊将整合美国右派的力量,而其立场的自由至上主义色彩则远少于《自由人》。

《国家评论》于1955年秋突然登上了美国舞台。它的动力来自年轻的主编小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一位有着很强的反共产主义渊源的耶鲁大学毕业生——在校期间,他曾为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搜集过教授和同学的信息。⁵巴克利吸纳了一些在《自由人》杂志无法找到归宿的编辑人才,特别是苏珊娜·拉夫莱特和威廉·亨利·张伯伦,不过,也有罗素·柯克(Russell Kirk)、弗兰克·迈耶、马克斯·伊斯门和埃里克·里特·冯·屈内尔特-莱丁这样的人。

巴克利宣称《国家评论》属于“保守主义,坦率地说”,⁶听到这样的话,来自旧世界的人——如米塞斯,肯定会想,坦率地说,巴克利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国家评论》发行的最初几年,米塞斯确实为它撰写了一些稿件,但他不止一次地强调了自由至上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区别。在答复1957年生日祝贺时,他写道:“不幸的是,我们无法改变这种状况。我是卡尔·马克思、威廉一世和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仍然健在的同时代人,简单地说:一个旧时代的自由主义者(Palao-liberaler)。”⁷

992 1954年10月,耶鲁大学邀请米塞斯参加一个名为“保守主义讲座”的系列活动,发起这些讲座的意图是,“每场讲座将致力于恢复……保守主义这个术语的影响力”,米塞斯谢绝了。他强调说,“保守主义”这个术语在美国没有任何政治根源,在欧洲它的意义也和美国支持的原则正好相反:

保守意味着维持现状。这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的意义仅仅是否定的,拒绝任何改变……在今天的美国,维持现状相当于维持新政和公平施政(Fair Deal)留给这个国家的法规和制度。⁸

“保守主义”这个词汇的突然出现,突显了美国反革命力量的普遍不安。他们很清楚自己反对的是什么:共产主义、法西斯、社会主义、新政、公平施政等等。但是他们支持的是什么?事实上,即使是在新运动的领袖中,经济学知识和坚定的自由至上主义信念也很罕见。求助于保守主义这样的词汇反映了人们对于接受任何清晰正面信息的普遍不安。含糊其辞比较容易,明确提出新运动的核心主张是私有制原则,更困难。其他一些术语也开始传播,例如“有限政府”、“联邦制”和“分权”。米塞斯在一篇论文中强调了独立司法机构的重要性,这一机构“保护个人及其财产免于任何侵犯,无论这种侵犯来自国王还是普通强盗”⁹,然而埃爾哈特基金会的秘书怀疑这个观点是否过于激进。归根结底,美国的法官都是由政府任命和支付报酬的。

993

米塞斯回复说,美国法官的独立在于,即使他们的判决不为行政当局所喜,他们也不会被撤职或起诉。相反,坚持有限政府最多只是有助于“当前美国人反对那些企图推动政府逐步走向极权主义的斗争”。米塞斯继续写道:

但是毫无疑问,除了这个特殊领域,这一术语是无意义的,因为它没有指出哪些与政府有关的事物是应该限制的。例如,每当罢工者实施暴力或进行破坏,工会领袖就可以根据这个口号来为政府的不干涉进行辩护。

因此,明确拥护私有产权及其分支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至高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坚持联邦制和分权无法做到:

在联邦制基础上实行分权,本身无法保证自由。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既有分权也有联邦制,但只有统治者自由的(以及免税的)。市民和农民只能忍受法律的无能,而且无权参与管理,只有缴税的份。¹⁰

这些都是不在新的美国运动中使用“保守主义”标签的很好理由,这场运动抵制的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罗斯福新政以及日益趋向国家主义的主流思想的反市场心态。然而大局已定。《国家评论》创刊四年后,“保守主义”标签已经占据了公共领域。最迟那时为止,米塞斯在《自由人》创刊之初感受到的那种乐观情绪已经消失了。他对未来的看法重新回到了悲观主义,一直以来,这几乎已经成为了他的第二天性。他的学生乔治·赖斯曼有一次说,他觉得放任自由主义者的数量正在增长,米塞斯则回答,一个人如果仍然处于不断认识其他分散的残存者的过程中,自然会产生这样的印象。这个人以为越来越多的人与自己志同道合,但这只是因为他在不断认识更多这样的人。米塞斯相信,增长只存在于个人交往层面,而在绝对数量。还有一次,他评论说,自己的著作就像《死海古卷》,也许要到千年后才会有人重新发现。¹¹

然而,悲观并未阻止米塞斯继续为了信仰和原则而斗争,并且鼓励别人在思想斗争中保持坚定。哈耶克也曾大力抵制过“保守主义”标签,米塞斯在给他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完全赞同你对保守主义的抵制。巴克利为人不坏,也受过良好教育,但在他的著作《从自由主义开始》(*Up from Liberalism*)中,他已经明确界定了自己的立场:“保守主义是对以下事实心照不宣的认同:人类经验中,所有重要的事物都已在我们之前产生;至关重要的探索已经完成,留给我们的任务是去了解这些事物之中显现出来的伟大真理。将来无论发生什么,对于人类而言,它的意义不会超过那些已经逝去的事物。”(p. 154) 奥利真聂、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也表达过同样的观点,虽然说法不同。这个计划竟比所有关于自由以及自由经济思想和物质利益的论述都要吸引人,真是令人悲哀。¹²

导致这个悲哀事实的原因是什么?米塞斯觉得这里有一个未经探究的问题。

他继续说：

我想你没有像我一样，写下那条格言来安慰自己：我的灵魂因我说出这些话而得到救赎。（*Dixi et salvavi animam meam.*）因此问题在于，面对所有这些事情，我们时代的精英怎么可能完全无所适从？怎么可能，例如，美国政府的糖价政策竟然从未受到质疑，而在500个或1000个投票者中至多只有一个可以预期从糖价的制度性上涨得到好处？

我想到的不是众多“知识分子”还有自视为知识分子的人的行为。我指的是那些例如谈论富足生活同时又论及人口过多几乎导致饥荒的问题的作家，不管是虚构作家还是非虚构作家。或者公民自由联盟（Civil Liberties Union），一方面，当它发现某个网球俱乐部拒绝接收黑人会员而只准许他们旁观，立刻想方设法采取行动；但在另一方面，却又宣称参加工作而不加入工会不是一项公民权利。

巴斯夏小组的解体

唯一能与《人的行为》相提并论，称得上是战后初期自由至上主义复兴运动文学丰碑的作品，就是安·兰德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米塞斯对这部作品推崇备至，在一封写给作者的信中这样说道：

《阿特拉斯耸耸肩》不只是一部小说。它也是（或者我可以说，首先是）对导致我们社会灾难的邪恶力量的贴切分析，对我们自封的“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具体反驳，对政府和政党采用的虚伪政策的无情揭露。它对“精神食人族”、“科学的情夫”以及“反工业革命”创造者的“学术胡扯”进行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你有勇气告诉民众任何政客都不曾告诉他们的：你是劣等的，你的生活环境的所有改善，你想当然地以为是自己的功劳，其实却是那些比你优秀的人的努力成果。

如果这是骄傲自大——就像你的一些批评者所说的那样——那也是我们在这福利国家时代不得不说出的真相。¹³

在最初曼哈顿的兰德圈子中，以及后来遍及全美的许多兰德主义团体中，很多成员对安·兰德的作品和主张产生了一种虔诚的尊敬。他们对兰德作品的态度本

质上和基督徒对《圣经》的态度没什么不同,因此,他们在不止一个方面追随着兰德教派。罗斯巴德本人也曾有几个月参加了兰德团体的聚会,他说:“他们对兰德和布兰登的狂热崇拜,只有亲眼看见才会相信,整体氛围是一种宗教教派和托洛茨基主义基层组织的结合。”¹⁴他们要求无条件地忠诚于他们的信条,而且还会骚扰并驱逐那些不赞成团体路线的人。

997

这些兰德主义者特别珍视的信条之一是无神论——相信“上帝不存在”的宗教信仰。对于安·兰德及其追随者来说,质疑任何意图证明上帝存在的证据,以及强调所有可以视为证明了“上帝不存在”的论据或证据,都是理所当然之事。不过,只有面对新入教者,他们才会选择这种论辩方式。而对资深成员,他们认为可以期待一种有关上帝问题的更加“成熟”的态度——无条件地接受无神论。他们不会宽恕异议,尤其不能容忍一个公开承认的基督徒存在于他们中间,他们甚至还会骚扰那些尽管自己是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但和坚定的基督徒结婚的成员。这正是默里·罗斯巴德的情形,因为他的妻子乔安就是一位无怨无悔的新教徒。¹⁵

可能有人会说,兰德主义者坚持一种与其无神论理想一致的行为,对于保存和培育纯粹主义来说是一种健康的态度。的确,从这个观点来看,兰德主义可能与任何其他信仰一样无可非议。但这不是默里·罗斯巴德看待自己与同伴冲突的态度。他对许多问题有着坚定的看法,但他的主要兴趣在于论证和辩论,并认为这是检验立场和主张的最好方法。后来情况显而易见,罗斯巴德更加重视自己与乔安的婚姻而非兰德主义者的身份,于是冲突激化了。1958年夏初,兰德团体要求罗斯巴德抛弃他的有神论妻子,罗斯巴德拒绝了。

998

这一事件对奥地利—自由至上主义运动产生了直接影响,导致了巴斯夏小组的解体。巴斯夏小组是一个米塞斯主义研究小组,聚会地点在默里·罗斯巴德的公寓,成员包括黑森、利焦、莱科和赖斯曼。随后,黑森和赖斯曼留在了兰德圈子,并与曾经的朋友断绝了来往。在他们眼里,罗斯巴德已经背叛了理性。

于是,罗斯巴德开始毫不留情地把他们称为安·兰德邪教。后来他还在电话里和纳撒尼尔·布兰登(Nathaniel Branden)激烈争吵。布兰登比任何人都崇拜他的女主人(两种含义都有)并以此为傲。¹⁶布兰登指控罗斯巴德剽窃,并威胁要起诉他。布兰登声称罗斯巴德在近期的一篇论文中采用了安·兰德和布兰登的妻子芭芭拉的观点,却没有适当地承认这一思想来源。这个指控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罗斯巴德的朋友伦纳德·利焦在公共图书馆只花了几个小时就证明了,那个“剽窃的观点”在几百年前就已经是西方知识遗产的一部分,而且在许多天主教经院思

想家的著作里也有具体的例证。

999 这篇引起争议的论文的初稿是罗斯巴德在一场关于相对主义的专题讨论会上提交的,米塞斯也参加了那场讨论会。¹⁷对于兰德主义者指控罗斯巴德剽窃一事,米塞斯感到惊愕莫名,但他避免直接卷入这场争端。他很确信这件事最后会以对罗斯巴德有利的方式得到解决。米塞斯的确有着很好的理由不在自己的学生和兰德主义者之间制造更多的敌对情绪。60年代初,布兰登的组织在销售米塞斯的著作方面十分成功,特别是《为自由而计划》。1961年末,这本书几乎售罄了,尼迈耶计划出版增补的第二版,包含一篇增加的文章。¹⁸安·兰德和纳撒尼尔·布兰登也试图与米塞斯建立更密切的联系,邀请米塞斯参加他们的夜间讲座和社交聚会。¹⁹

米塞斯在一定程度上回报了他们。他欣赏自己与兰德主义者之间的精神共鸣,但不喜欢他们盲信的热情。他更愿意以无偏见的演讲和写作说服别人,然而兰德主义者却用邪教组织的手段——团体聚会、精神分析以及群体压力来迫使他人信仰转向客观主义。对于那些意见不一致的人,即使是在最重要的问题上,米塞斯也能给予对方完全的尊重,甚至可以成为他们的朋友。此类例子包括路易·鲁吉耶(实证主义者)、哥特弗利德·冯·哈伯勒(干涉主义者)、路易斯·萨默(贸易保护主义者)以及默里·罗斯巴德(无政府主义者)。²⁰利兰·耶格尔(货币主义者)有一次写信给米塞斯说:

1000 我希望你能同意,在支持经济自由主义的人们中间展开一场健康的辩论,探讨一些细节问题,例如价格水平这个概念是否可取,金本位制或价格水平稳定原则是不是更好的货币政策规则。²¹

这个希望完全合乎情理,虽然耶格尔和米塞斯之间的分歧不只限于细节问题。米塞斯不会仅仅因为一个人的观点在他看来全然错误就不尊重对方。他沉浸于基督教欧洲文明的人道主义精神,看待个人高于任何其他事物。当然,他关心的不是个人的灵魂,而是个人的自由。他为每一个转向自由主义事业的人高兴,但却无法对那些通过群体压力或其他形式的骚扰而获得的思想转变感到欣喜。

对米塞斯而言,只有一种罪行是不可原谅的:缺乏诚信。违背个人的真正学识而发言或行动,是不可原谅的。这就是为什么米塞斯与哥特弗利德·哈伯勒维持了终生的友谊——他认为哈伯勒是一位正直的干预主义者;却同弗里茨·马克卢普断绝了关系——当弗里茨·马克卢普开始限制有关金本位制的观点之时。与此同时,米塞斯推荐利兰·耶格尔接受了朝圣山学社的津贴,尽管耶格尔对金本位制

的怀疑程度不比马克卢普少。

但是,兰德主义者不是那么在意琐碎的正直美德。他们只信奉理性(始终是大写的),任何在兰德教派看来不支持理性的人,都是愚蠢、邪恶,或是耳背的。和这样的人绝无可能成为朋友。兰德教派处理意见分歧的方式就是让持异议者面对一项严酷的选择:要么经历一系列没完没了的讨论,而讨论结果却是预先确定的——也即,持异议者已经沦为了反理性主义异端的受害者;要么被驱逐出这个群体,并且遭到全体成员的厌弃。 1001

1961年秋,纳撒尼尔·布兰登再次显示了胁迫对手的特长。《新个人主义评论》(*New Individualist Review*)是拉尔夫·莱科编辑的杂志。当时,莱科正在芝加哥大学哈耶克门下攻读博士学位。《新个人主义评论》发表了一篇批评安·兰德的文章。为此,布兰登要求《新个人主义评论》编辑部成员哈耶克公开与文章的作者脱离关系,并且“坚决要求在《新个人主义评论》上代表你个人并以你的名义向兰德小姐道歉”。²²他还将这封信的副本寄给了给米塞斯,米塞斯肯定很庆幸自己一直与兰德主义者保持距离。当然,哈耶克没有答应这个要求。

米塞斯厌恶这样的威胁。他有一种不同的方式对付诽谤。1961年秋,米塞斯和兰德在一场聚会上相遇,聚会地点是在亨利·黑兹利特家里。²³餐后,他们的讨论演变成一场关于哲学原理的争论,并吸引了旁观者的注意。我们不太清楚他们说了些什么,虽然他们在许多问题上都有严重的分歧。²⁴不管怎样,罗素·柯克目睹了这场讨论,他是众所周知的兰德主义的批评者,后来,据说他在讲座中对学生提到这场讨论,说米塞斯把安·兰德称为“一个愚蠢的犹太女孩”。米塞斯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写信给柯克:“我从未把安·兰德女士——或在那个场合的其他任何人称为‘一个愚蠢的犹太女孩’。如果将来你不再说起这个错误的故事,我会非常感谢。”²⁵ 1002

柯克完全予以否认:

为您报信的人有着兰德邪教的古怪和狂热的特质,她似乎把她听到的关于您和兰德小姐会面的不同版本的细节拼凑在了一起,并把这个拼凑的故事归咎于我。但是,我的间接描述和我听到的版本,都不包含任何反犹太主义的偏见或暗示。在收到您的信之前,我很高兴已经从黑兹利特先生那里听到了关于这场会面的更加准确的描述。²⁶

对抗新自由主义

朝圣山学社是为了“普世”的责任而创立的，它聚集了秉承古典传统的纯正自由主义者和或多或少支持干预主义方案的新自由主义者。从一开始，米塞斯就对这个普世的观念持怀疑态度，但在最初的五六年里，他的顾虑似乎是没必要的，尽管朝圣山学社的所有活动都由来自瑞士的阿尔贝·于诺这位虔诚的新自由主义者组织。米塞斯和于诺初次见面是在1928年于苏黎世召开的社会政策协会的会议上。

于诺是《通往奴役之路》的仰慕者。他是鼓励哈耶克在朝圣山召开学社创立大会的人之一，还为会议筹集了大量资金。在会上，野心勃勃的于诺当选为学社的秘书，但几年后他就不再满足于这个低于哈耶克的职位。他的长期目标是成为朝圣山学社的社长，策略就是让自己无可取代。他处理协会中最小的琐事，到50年代中期，他开始在征求哈耶克意见的情况下处理函件。哈耶克对于诺的这些（职权上的）侵犯行为感到不满，而且他原本就不太喜欢这个人。1956年后，两人的矛盾更加激烈，最终爆发了一场导致学社濒临解散的冲突。

1004 早些年，这场冲突几乎没有表现出来。在于诺等人的支持下，新自由主义成员数量稳定增长，但他们没能控制学社。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尽管于诺获得了瑞士商界的资金支持，他仍然无法与大西洋彼岸调动起来的资金相匹敌。哈耶克、米塞斯和其他一些古典自由主义者在选择讨论主题方面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一方面，这归功于他们的学术血统；另一方面，他们获得来自沃尔克基金会以及尼迈耶、格里德和克兰这些人的大量资金支持。至少到1953年底，沃尔克基金会为几乎所有朝圣山学社的非美国籍会员支付了会费，也时常负担他们的差旅费。²⁷如果需要基金会为某些特定成员出席会议提供资金保证，它会非常乐意满足米塞斯的要求（可能也有哈耶克的要求）。例如，某次米塞斯宣布，由于缺少法国和英国与会人员，他不会参加1954年在威尼斯召开的会议，于是沃尔克基金会随即请他按照相对重要性亲自挑选经费补助的受益人。²⁸因此，在朝圣山学社历史上第一阶段的末期，围绕在哈耶克周围的领导成员远比普通会员——特别是来自欧洲的会员——更加支持自由至上主义。

朝圣山学社会员都很清楚，学社内部同时存在着这些取向如此不同的群体。²⁹即使对新会员来说，这个问题也很明显。关于这点，可以看看让-皮埃尔·阿米吕斯(Jean-Pierre Hamilius)的例子。阿米吕斯是一位年轻的卢森堡大学商学和经济

学教授,米塞斯是通过信件认识他的。³⁰阿米吕斯不久前才接触到古典自由主义文献,随后开始贪婪地阅读并将它们译成法语和德语。米塞斯邀请他参加1953年在塞利斯贝格召开的朝圣山学社会议。³¹阿米吕斯马上就注意到了学社根据意识形态取向和语言的区别划分成了“不同的团体和派别”。他觉得自己更加认同米塞斯、哈耶克、黑兹利特、莫利、费尔蒂希和米勒组成的美国派。其他一些与会者不知道他是米塞斯邀请来的,所以他从他们那里听到了一些关于“保守派(米塞斯、哈耶克……)”的保留意见,有时米塞斯等人也被称为“老派保守主义者”。这位来自卢森堡的年轻教授热切地做着笔记,参与讨论很多尚不属于保守派分子的干预主义方案。例如约翰·范西克尔(John van Sickle)提议向富有的继承人征税,威廉·勒普克支持向房东发放补贴,而奥托·法伊特(Otto Veit)认为,课征重税不会使企业家停止工作。³²路德维希·艾哈德的政党刚在1953年德国大选中获胜,他本人也在会上发表了演讲。

阿米吕斯的报告清楚显示了由于路德维希·艾哈德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德国的胜利引起的学社内部相对力量的变化,这一胜利就是所谓的经济奇迹(*Wirtschaftswunder*)。对于当时主导着主流经济舆论氛围的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奇迹:价格管制的废除和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可以带来如此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对米塞斯那样顽固不化的古典自由主义者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奇迹。但是,艾哈德的成功带来了一些问题,因为这为他的中间道路哲学提供了错误的凭据。这也适用于他最亲近的一些顾问,人们常把他们视为“社会市场经济”支持者或者“秩序学派”经济学领袖:副国务卿米勒-阿尔马克、威廉·勒普克教授(日内瓦),亚历山大·吕斯托(海德堡),瓦尔特·奥伊肯(弗莱堡)。简言之,艾哈德的最初古典自由主义政策的成功却被用于支持随后的干预主义政策,特别是反托拉斯法和通货膨胀政策。

甚至在战前,米塞斯就对大部分德国经济学家评价不高。移居国外后,他一直避免与这些人发生密切的联系。他愿意为一本纪念文集撰稿以向艾哈德表示敬意,但却拒绝为新的标准社会科学词典《社会科学简明词典》(*Handwörterbuch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撰写词条。只是在戈特弗里德·哈伯勒为编者提出请求后,米塞斯才同意撰写“经济自由主义”这个条目,作为哈耶克那篇关于“政治自由主义”的文章的补充。³³朝圣山学社或其他组织与时髦的秩序学派之间的合作前景,并没有让他感到宽慰。他相信,秩序学派的人们不比他毕生反对的社会主义者好多少。事实上,他最终称他们为“秩序—干预主义者”。³⁴而他的纽约朋友似乎也持有完全相同的看法——不过他们不像米塞斯那么犹豫是否要在公开出版的文字中表达这

种观点。

德国国内也有反对艾哈德内阁和秩序学派的干预主义过激手段的古典自由主义者。这个放任自由主义团体的领袖是沃尔克马尔·穆特修斯和汉斯·赫尔维西(Hans Hellwig)。³⁵然而,他们所能做的唯有正直的后防行动。他们无法获得大学教职,因此他们最重要的行动手段就是穆特修斯的杂志,米塞斯曾为这本杂志撰写过几篇文章。赫尔维希写信给米塞斯说:

艾哈德这样的人,也许还有吕斯托教授这样的人更是如此——严格来说和古典自由主义没有太大关系。早期古典自由主义者会直言不讳地把他们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甚至还称他们为社会自由主义者,或者讲坛社会主义者。³⁶

1008 米塞斯答复:

我对“社会市场经济”的政治和政客的真实品质不抱任何幻想。(艾哈德的老师弗朗茨·奥本海默)或多或少传授了(肯尼迪总统的)哈佛顾问(施莱辛格、加尔布雷思等)的新边疆政策(New Frontier)。³⁷

但是,因为美国公众几乎完全不懂外国语言,米塞斯解释说,所以对德国的“社会市场”模式持有一种非常不切实际的想法。美国政治辩论中唯一一个德国政治议题是德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德国中央银行的政策与美国联邦储备局相比,通货膨胀的性质要弱得多。因此,人们觉得德国的统治阶级正致力于实行古典自由主义政策,比如健全货币和国际贸易。

艾哈德的成功改变了朝圣山学社。于是,许多米塞斯曾经强调必须排除在外的议题重新涌入,如反托拉斯的需要和信用扩张可能存在的优点。在这两个问题上,米塞斯都支持沃尔克马尔·穆特修斯的立场。穆特修斯认为打击垄断的最好办法是废除最初创造了垄断的政策和政府体制。米塞斯特别忧虑迟早会有另一轮关于反托拉斯法的讨论。年轻时,他目睹了19世纪90年代卡特尔出现后关于反卡特尔的激烈争论。那时,讨论是由社会政策协会推动的,协会始终在为实行更多干预主义寻找新的理论基础。几十年来,他还没见过什么新的论据,不管是支持哪一方的;而且他还预计,朝圣山学社的任何讨论都会迅速转向干预主义计划,而不会讨论当代垄断价格的主要例子——美国农产品价格政策。可能由于他的影响,

这个议题直到1956年才在柏林召开的朝圣山学社会议上出现。此时,许多德国教授会员强烈要求哈耶克把垄断问题列入计划。这个话题再也无法避免了。³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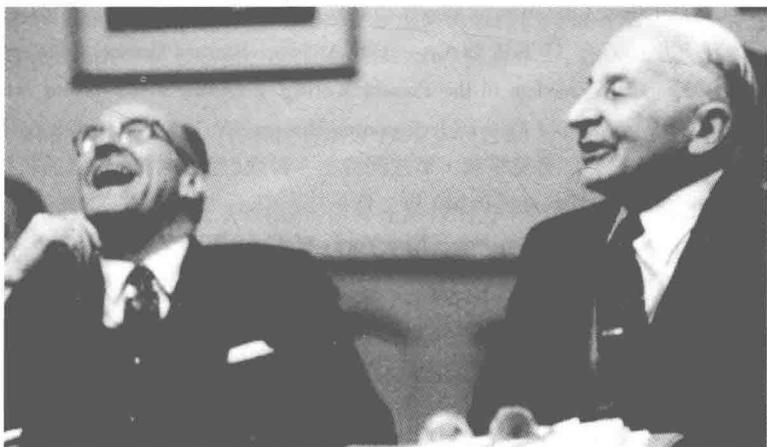
会议完全证实了米塞斯的预期。³⁹结果证明,这是一场历时五年多的朝圣山学社内部斗争的开端。几个月后,哈耶克试图动员一些盟友参加下一届在圣莫里茨(Saint Moritz)召开的会议(1957)——他觉得这次会议对于学社的未来是决定性的,但却无济于事。⁴⁰第二年,哈耶克和于诺的个人关系日趋紧张,这也促使朝圣山学社第一次把会址选在美国——普林斯顿。⁴¹

然而,普林斯顿会议无疑是令人难忘的,因为米塞斯在这次会议上向朝圣山学社发表了最后几场讲座之一,主题为“自由和财产”。这个题目是哈耶克提出的,他急于想在学社会员之间组织一场类似基本问题辩论这样的活动。正如哈耶克承认的那样,他之前的所有努力都以惨败告终。但这却是米塞斯最后几次伟大的公开露面之一。米塞斯的讲话以录音带的形式保存下来,演讲内容表明他仍然处于影响力的鼎盛时期。演讲的印刷版本一直被认为是对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最为简明的陈述。⁴²

此后的三年,哈耶克与他那不顺从的秘书之间的矛盾一直潜伏着。哈耶克无法获得足够的支持免去于诺的职务。大部分美国会员站在哈耶克一边,但他们害怕公开的冲突会摧毁学社。最终,两人在1960年的卡塞尔会议上展开了决战。⁴³哈耶克和于诺一起辞去了职务,但于诺成了学社的副社长,并将在更长的时间里为所欲为。1961年的会议本来是为了庆祝米塞斯八十大寿召开的,但于诺把它变成了

1010

1011



米塞斯和黑兹利特在1960年纽约大学研讨班上。米塞斯说:“我的书在共产主义国家被当作‘坏书’列入禁书名单!”

另一场新自由主义和放任自由主义之间的斗争。秩序—自由主义者将很快被推至幕后；填补权力空白的不是奥地利—自由至上主义者，而是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

注 释

1. *New York Times* (June 21, 1956).
2. 1956年至1957年间，他已经有好几个月感觉不舒服了。5月，学年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期盼着在奥地利和瑞士度过长假。参见米塞斯致康斯坦达卡托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57年5月16日；Grove City Archive: Constantacatos files。
3. 玛丽·森霍尔茨认为，里德的思想地位被低估了。参见 *Leonard E. Read: Philosopher of Freedom* (Irvington-on-Hudson, N. Y.: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1993)。
4. 欧内斯特·C. 哈塞尔费尔特，致编辑的信，《华尔街日报》(1955年2月24日)；副本在 Grove City Archive: NAM files。
5. 参见 Sigmund Diamond, *Compromised Campus: The Collaboration of Universities with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1945–195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6. 参见巴克利群发的信件，标注日期为1955年11月4日；Grove City Archive: Buckley file。信中没有对“保守主义”给出任何定义。
7. 米塞斯致穆特修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57年10月3日；Grove City Archive: Muthesius files。
8. 米塞斯致约翰·贝尔丁·沃特 (John Belding Wirt)，信件标注日期为1954年10月23日；Grove City Archive: Conservatism files。另见米塞斯致理查德·康努埃尔信中的类似陈述，信件标注日期为1965年11月1日；Grove City Archive: Richard Cornuelle file。
9. Mises, “Economic Freedom in the Present World,” *Economic Freedom and Interventionism: An Anthology of Articles and Essays* (Irvington-on-Hudson, N. Y.: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1990), chap. 47。另见亨利·黑兹利特在一封致《纽约时报》编辑的长信中关于改革过于“死板”的美国宪法的呼吁(1942年2月8日)；Grove City Archive: Hazlitt files。另见 Henry Hazlitt, *A New Constitution Now* (New York: McGraw Hill, 1942)。
10. 米塞斯致理查德·韦尔，信件标注日期为1957年10月24日；Grove City Archive: Earhart Foundation files。
11. Jeffrey A. Tucker, “Mises as Mentor: An Interview with George Reisman,” *Austrian Economics Newsletter* 21, no. 3 (Fall, 2001): 4。
12. 米塞斯致哈耶克，信件标注日期为1960年2月18日；Grove City Archive: Hayek files。另见 F. A. 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postscript。
13. 米塞斯致兰德，信件标注日期为1958年1月23日；未知来源。在阅读《阿特拉斯

耸耸肩》(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7)之前,米塞斯并不认为兰德是当代一流的艺术家和哲学家之一。参见 Mises,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 (Princeton, N. J.: Van Nostrand, 1956), chap. 4, p. 2。

14. 罗斯巴德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58年7月17日;Grove City Archive: Rothbard files。

15. 参见 Murray N. Rothbard, *The Sociology of the Ayn Rand Cult* (Port Townsend, Wash.: Liberty Publishing, 1987)。

16. 关于布兰登和兰德,参见 Barbara Branden, *The Passion of Ayn Rand* (New York: Doubleday, 1987)。

17. 讨论会于1959年在埃默里大学举办。沃尔克基金会提供了赞助。埃默里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赫尔穆特·舍克组织了这场会议。舍克还为指控罗斯巴德起草了最尖刻的起诉书。关于兰德和芭芭拉·布兰登,他说:“她们显然严重受到索罗金(Sorokin)(《现代社会学及其相关学科中的流行与怪诞》[*Fads and Foibles*])所谓的发现者情结的折磨。她们似乎认为她们——独创思想的女性创新者,遭到了一位邪恶男性的劫掠。”舍克致一位未知收信人,信件标注日期为1958年8月13日;Grove City Archive: Rothbard Files。

18. 尼迈耶致利普塞特,信件标注日期为1961年10月9日;尼迈耶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61年12月27日;Grove City Archive: Nymeyer files。还有一个在销售米塞斯作品方面十分成功的组织是个人主义者校际协会(Intercollegiate Society of Individualists)。

19. 纳撒尼尔·布兰登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61年1月16日和1961年5月26日;Grove City Archive: Branden files。

20. 没有提到他不回避和(正直的)社会主义者交往。有关的例子是鲍尔一家(the Bauers),直到他们在1919年和米塞斯关系恶化;还有批评家卡尔·兰道尔,可能是于1952年在伯克利大学和米塞斯相遇的。参见兰道尔1952年6月16日给米塞斯的信;Grove City Archive: Ernest Offen file。而且他还帮信奉干涉主义的教授们写推荐信。参见他于1954年1月4日为亚历山大·科卡利斯(Alexander Kokkalis)所写的信;Grove City Archive: Kokkalis file。

21. 耶格尔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55年6月26日;Grove City Archive: Buck Hill Falls file。

22. 纳撒尼尔·布兰登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61年12月15日;Grove City Archive: Branden files。

23. 这不是他们首次见面。1961年7月初,他们已经见过一次,并讨论了“我们都认为至关重要的一些问题”。米塞斯致兰德,信件标注日期为1961年7月10日;Grove City Archive: Rand file。他们可能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都保持着联系。1970年6月,米塞斯向他的墨西哥朋友韦拉斯科承诺,他会向兰德介绍他和他的作品。参见米塞斯致韦拉斯科,信件标注日期为1970年6月27日;Grove City Archive: Rand file。

24. 例如,米塞斯不相信科学的价值理论可以建立一个相关选项的客观排序。他还在公开出版的著作中中断言,艺术和美的本质是“取悦人的事物”。参见 Mises, *Theory and History: An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Evolutio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62。另一方面,在其他大部分问题上,他当然也确实认同兰德的作品。他在与穆特修斯通信时说,安·兰德是反托拉斯政策最强有力的反对者。参见米塞斯致穆特修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62年3月22日;Grove City Archive: Muthesius files。

25. 米塞斯致罗素·柯克,信件标注日期为1962年7月5日;Grove City Archive: Branden files。另见黑兹利特致柯克,信件未标日期;Grove City Archive: Hazlitt file # 9。

26. 柯克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62年7月13日;Grove City Archive: Kirk file。

27. 关于会员赞助的受益者名单,参见黑兹利特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53年12月21日;Grove City Archive: Mont Pèlerin Society files。

28. 米塞斯提名的法国经济学家包括:(1)路易·博丹,(2)丹尼尔·维莱(Daniel Villey),(3)弗朗索瓦·特雷武(François Trevoix);(4)伯特伦特·德·尤未奈尔(Bertrand de Jouvenel);英国经济学家包括:(1)朱克斯;(2)普兰特和(3)丹尼森,还有爱尔兰人邓肯。参见米塞斯致理查德·康努埃尔,信件标注日期为1954年6月4日;Grove City College Archive: Mont Pèlerin Society files。米塞斯没有参加威尼斯会议是因为他要做胆囊手术。两年后,他同意为科斯、纳特(Nutter)、阿尔奇安(Alchian)、菲尔布鲁克(Philbrook)和耶格尔提供资助。参见米塞斯致卢诺,信件标注日期为1956年12月7日;Grove City College Archive: Mont Pèlerin Society files。

29. “大体上说,朝圣山学社内部存在两个对立的阵营:放任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每个人都知道。”Albert Hunold,“How Mises Changed My Mind,”*The Mont Pèlerin Quarterly* III, no. 3 (October 1961): 17。

30. 阿米吕斯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52年2月26日;Grove City Archive: Hamilius files。那时,阿米吕斯29岁。

31. 他也建议邀请了费尔蒂希、科特尼和尼迈耶。哈耶克、拉帕特、吉塔、米塞斯和于诺在理事会议上接纳他们三人为新会员。参见米塞斯致于诺,信件标注日期为1953年6月26日;以及1953年9月9日理事会决议;Grove City Archive: Mont Pèlerin Society files。

32. 阿米吕斯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53年10月11日;Grove City Archive: Hamilius files。

33. 他的稿件最终以“市场”为题发表。参见Mises,“Markt,”*Handwörterbuch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Stuttgart: Gustav Fischer, 1959), part 27, pp. 131–36。他在1955年3月末之前交付了这篇文章。出版商收到他的校样后,又“改进”了他的文章。参见米塞斯致赫尔曼·本特(Hermann Bente),信件标注日期为1960年1月15日;Grove City Archive: “B” file。埃德蒙·A.吉布森(Edmund A. Gibson)翻译了这篇文章,藏于Grove City Archive: “G” file。另见哈伯勒的信件,标注日期为1953年5月19日,藏于Grove City Archive: Haberler file。

34. 米塞斯致穆特修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55年6月1日;Grove City Archive: Muthesius files。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只要是在立场相同的情况下,他就会支持他们。1950年6月,他向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推荐了勒普克的教科书《经济理论》(*Die Lehre von der Wirtschaft*)的译本。参见通信,Grove City Archive: Röpke files。

35. 穆特修斯主要活动范围在法兰克福,经营着两本成功的杂志:*Zeitschrift für das gesamte Kreditwesen* 和 *Monatsblätter für freiheitliche Wirtschaftspolitik*。

36. 赫尔维希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62年1月12日;Grove City Archive; Hellwig file。1955年以来,赫尔维希已经在公开发表的作品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在为穆特修斯的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他认为反托拉斯政策是与自由主义背道而驰的,因而,这种政策的支持者——最著名的是奥伊肯、米克施(Miksch)和伯姆——不应该被称作古典自由主义者。不仅如此,他还有失风度地指出,伯姆和米克施的专著是在纳粹时代出版的,而在那个时代得以出版,就意味着纳粹没有把新自由主义视为一个根本威胁。相反,他们中的不少人喜欢政府给竞争打上“秩序”的印记。赫尔维希知道他在谈论的是什么:在那段非常岁月,他曾是活跃于柏林的一位记者。但是,瓦尔特·奥伊肯的遗孀埃迪特(Edith)和威廉·勒普克强烈抗议并指责穆特修斯发表这种政治不正确的观点。米塞斯站在穆特修斯一边。参见1955年5月的信件,Grove City Archive; Muthesius file。

37. 米塞斯致赫尔维希,信件标注日期为1962年1月19日;Grove City Archive; Hellwig file。米塞斯也很了解艾哈德的经济次长阿尔弗雷德·米勒-阿尔马克的亲通货膨胀观点。1932年,米勒-阿尔马克出版了一本书,进一步阐发了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通货膨胀理论。他认为,信用扩张具有自行实现预期增长的特征。参见 Alfred Müller-Armack's *Entwicklungsgesetze des Kapitalismus* (Berlin: Juncker & Dünnhaupt, 1932)。

38. 哈耶克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55年10月25日;Grove City Archive; Hayek files。

39. 几个月后,他写道:“我希望今年的朝圣山学社会议比柏林那场更有意思。”米塞斯致皮埃尔·古德里奇,信件标注日期为1957年4月3日;Grove City Archive; Goodrich files。古德里奇的公司(印第安纳电话公司)发行的年度报告强调了持续的通货膨胀给美国经济和公司会计(“虚假利润”问题)造成的后果。米塞斯很喜欢这些报告,并且力劝古德里奇更广泛地传播他的观点。

40. 参见哈耶克的通知,标注日期为1956年11月27日;Grove City Archive; Hayek files。

41. 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自由至上主义者试图在美国举办一场朝圣山学社会议,但由于经费原因(欧洲人缺钱),这个计划直到1958年才实现,这次经费是由贾斯珀·克兰设法筹集的。于诺在致勒普克的信里描述了普林斯顿会议上的紧张局势,信件标注日期为1960年4月4日。大约那时,米塞斯在日内瓦期间的学生斯特凡·波斯尼在申请加入学社时遇到了困难。参见他在1958年12月寄给米塞斯的明信片上的询问;Grove City Archive: “P” file。

42. Bettina Bien Greaves, *Austrian Economics: An Anthology* (Irvington-on-Hudson, N. Y.: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1996), pp. 77–82. 声音的数字文件在 [http://www. Mises.org/Media/](http://www.Mises.org/Media/)上可以找到。

43. 参见通信,藏于 Cortney, Fertig, Hunold, and Leoni files。卡塞尔会议之前,于诺在1960年4月4日致勒普克的信中表达了对这些事情的看法,他还把副本寄给了米塞斯。然后,哈耶克在另一封1960年7月3日的公开信中声明,推选取代于诺的新的秘书人选,将是即将到来的全体大会最重要的任务。勒普克对证据进行了仔细审查,越来越相信哈耶克对于诺的指控是无根据的,恰恰相反,有时反而是哈耶克自己超越了职权范围。接着,于诺觉

得哈耶克是受马克卢普和其他试图滥用学社达到个人目的的人(弗里德曼?)的不良影响。都灵会议后,会员沃尔夫冈·弗里克霍费尔(Wolfgang Frickhöffer)和于诺站在了一起——在他的印象里,一个围绕在弗里德曼周围的团体以阴谋和琐事败坏了学社的风气。1962年1月初,布鲁诺·莱昂尼(Bruno Leoni)在一封致朝圣山学社全体会员的公开信中描述了自己和勒普克以及于诺之间的不愉快经历。参见 Grove City Archive: MLS files。他还在给克特尔的一封秘密信件中披露了更多(丑恶的)细节。参见莱昂尼致克特尔,信件标注日期为1961年10月14日;Grove City Archive: Leoni file。

直到大约 1962 年,米塞斯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精力。60 年代初,他完成了四项主要的写作计划,每年还会进行几场公开演讲。但在公开场合,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他微弱的声音和耳聋的事实越来越妨碍到他传奇般的名声。他成了一位活着的自由偶像,但终究是一个生命正在消逝的偶像。

1962 年,他仍然接受很多演讲预约,例如:为残存者(一个与埃蒙德·奥皮茨 [Edmund Opitz] 有关的团体)、在纳撒尼尔·布兰登学会(Nathaniel Branden Institute)为 150 名学生听众、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为美国青年争取自由组织(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YAF)、为沿海联邦储蓄和贷款协会(Coast Federal Savings and Loan Association)、为纽约大学教授俱乐部、为美国管理协会(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以及为自由企业研究所(Free Enterprise Institute)。同年 5 月 16 日晚上,他的声音首次出现在哈佛大学。有人猜测,邀请方不是哈佛大学,他本人甚至都不在场。美国钢铁公司赞助了一系列广播节目,每次节目是一段录制好的长六分钟的关于经济学议题的演讲。米塞斯演讲的主题是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利益冲突。他的节目在哈佛大学、布朗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同步播出。第二天,这场演讲还在达特茅斯学院和耶鲁大学播出。¹

1962 年以后,米塞斯的公开露面不像以前那么频繁,他把精力集中在常规教学活动上。他主持纽约大学研讨班直到 1969 年 5 月,在经济教育基金会的研讨会上发表演讲则延续到 1972 年。在这真正的最后几年,只有他最忠实的朋友和崇拜者——特别是珀西·格里夫斯和贝蒂纳·比恩——继续参加常规研讨会。他们已经习惯于口头陈述的不足之处,同时仍然细致而坚持不懈地为每一场会议做好笔记。格里夫斯总是坐在米塞斯的身边,为这位年迈大师和他的研讨班学生之间的所有交流提供便利。当学生提出一个问题,格里夫斯会在米塞斯耳边大声把这个问题说出来,然后再从这位老者无力的唇边得到答案,用他浑厚的嗓音把米塞斯的话向听众重复一遍。经常会有新的学生出于好奇参加研讨班,却不会留下来,因为讲座的内容很难听懂,而且没有办法和演讲者交流。这些新来者常会好奇,为什么

这个研讨班对那些固定参与者来说显得那么成功。在一些人的印象中,这是一场祷告会,参与者是一群围绕在一位神秘大师身边的狂热信徒——而珀西·格里夫斯就是米塞斯教派的主教,贝蒂纳·比恩则是忠实的女修道院院长。



米塞斯与珀西·格里夫斯

米塞斯没有忽视自己的身体状况。他凭着天性,提前为越来越近的死亡做好了准备。他开始缺席朝圣山学社的会议——那些会议通常在欧洲举行。米塞斯最后一次参加的会议是1965年意大利斯特雷萨的会议。1964年9月,他最后一次见到深爱的维也纳。² 他开始廉价抛售自己收藏的学术期刊。1958年10月,他卖掉了收藏的《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 (全套1—26卷)。³ 此外,1965年7月他取消了自己在皇家经济学会的会员身份。⁴ 1968年末,珀西·格里夫斯帮他卖掉了剩余的期刊。⁵

直到漫长人生的最后日子,米塞斯一直保持着健康的状态。⁶ 他慢慢平静下来,在许多美国朋友和同事辞世以后仍然活着。尼迈耶在1967年去世,科特尼是1971年,哈珀是1973年4月。就在米塞斯开始感觉自己活得太久时,庆祝里夏德·许勒尔100岁寿诞的时刻到了。⁷ 最后一位卡尔·门格尔授予资格的教授仍然在世!

1971年在佛蒙特州曼彻斯特度假期间,米塞斯受到严重的感染而病倒了。⁸ 尽管他身体康复了,却再也无法集中精神,也没法从事任何工作了。据妻子玛吉特回忆,米塞斯说:“最糟的是,我还有那么多东西想给别人,给这个世界,可是我再也不能把它们拼起来了。这真让人痛苦。”⁹ 在生命的最后两年,米塞斯在生活上已

经不能自理,需要帮助和指导。在这关键时期,让玛吉特感到欣慰的是,贝蒂纳·比恩和珀西·格里夫斯随时愿意提供慷慨的帮助。¹⁰

1973年7月,玛吉特带着路德维希踏上了最后一次欧洲之行,去了瑞士卢塞恩镇山上的一处温泉疗养地。他们刚回纽约,米塞斯的身体状况就恶化了,第二天被送往圣文森特医院。1973年10月10日,一个周三的早晨,米塞斯在医院去世。追悼会于10月16日周二中午举办,地点在世界葬礼教堂(Universal Funeral Chapel),位于纽约第52街和列克星敦大道。

最后的写作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米塞斯完成了四项主要的写作计划:《经济学的终极基础》(1962),《人的行为》的第二版(1963),一本叫作《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历史背景》(*Historical Setting of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的小册子(1969)¹¹,以及《人的行为》的第三版(1966)。除此之外,米塞斯还写了几篇文章。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出版物,同时也是唯一一本达到专著篇幅的作品,是《经济学的终极基础》。这是他对社会科学的认识论问题深思了三十多年后的巅峰之作,讨论了这个领域最困难的问题。但是,正如其他作品一样,此书是以简洁清晰的语言写成。从很多方面来看,这都是米塞斯最优秀的著作,澄清了他在以前作品里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核心命题是:(1)存在一些诸如经济法则那样的事物,无法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界定;而且(2)那些在经济学中提倡这种方法的人的论据没有任何科学根据,只是形而上学的推测。简言之,米塞斯的最后一部作品是对实证主义的全力一击。¹²

他特别强调,通过对比经济理论和观测数据来对理论进行检验,实证主义原则自身并非来源于任何经验知识;相反,这个原则是一条先验假设,这种假设否定已知的大部分关于人的行为的基本经验事实——尤其是,人们进行选择,以及不存在已知的支配这些选择的定律。因此,社会科学中观测到的数据和自然科学中使用的数据具有完全不同的本质。后者是一条不可改变的因果链中的元素,因此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可以单独用于证实或推翻物理理论、化学理论,等等。¹³但在社会科学中观测到的数据不属于这样一条普遍存在的因果链。更准确地说,关于这些数据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它们不是这种链条的一部分。它们是单独的事件,因此必须视具体情况个别地进行解读。它们不能用于推导任何普遍定律,也不是证实或推翻经济理论的标准。基于检验的观察在经济学中完全没有意义。

马克思主义者声称自己拥有决定事件进程的“生产力”运作的知识,但其具体方式却是不为外人所知也无从得知的。同样,实证主义者也坚定不移地相信,在人的行为中存在着一些隐秘的固定关系,它们将由未来可检验的理论辨识出来,尽管目前可得的所有证据都表明这种关系并不存在。

1019 米塞斯不遗余力地继续巩固自己的论点。他表明,非欧几何的存在并未否定先验经济科学的可能。类似地,概率论的发展不可能成为反驳决定论论证的手段。另外,关于进化论对于经济学这类先验学科的意义,他得出的结论和朋友鲁吉耶等人全然不同。米塞斯强调了一个严峻的事实,即我们对人类心智在未来的演化一无所知。因此,心智的逻辑结构和行为学结构必须视为仿佛是永恒不变的。出于全部实践目的,它是一个社会科学的先验假设。

米塞斯澄清了经济科学的逻辑本质。他强调说,纯粹的推理能够给予我们关于真实世界的经验知识,因为推理和行为有着完全相同的本质。经济学家坐在扶手椅上分析自己的思维过程,就能识别出基本的经济范畴。

遵循康德的分析,哲学家提出了以下问题:人的心智如何通过先验思维应对外在世界的现实?只要这里涉及行为学,答案就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是先验思维和推理,另一方面是人的行为,两者都是人的心智的表现形式。人的心智的逻辑结构创造了行为的实在。推理和行为是同源同质的,也即同一现象的两个方面。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在行为学中应用恩培多克勒的名言: γνῶσις τοῦ ὁμοίου τῷ ὁμοίῳ¹⁴

这个观点被传统认识论忽视了,因为哲学家们

1020 把思想当作一个与人类活动的其他表现形式相分离的独立领域。他们讨论逻辑和数学问题,却没看到思想的实践方面。他们忽略了先验的行为学领域。¹⁵

米塞斯指出,因为经济学定理是从先验的行为学推断出的,他们提供的是绝对确定的知识:

行为学的每条定理都来自行为范畴的逻辑推理。因此,具有一个先验范畴的逻辑推理所能提供的绝对的确定性。¹⁶

他还强调,甚至是最激进的怀疑主义也不会影响这个结论,恰恰因为行为和思想

具有相同的起源,而且在这个意义上是同质的。在行为的结构中没有什么是人的心智不能充分解释的。在这个意义上,行为学提供了确定的知识。¹⁷

不过,就在此书的下一页,他很快强调说,行为学的知识只是为了在这世界获得成功所需信息的其中一种。未来的选择无法提前决定,单只因为这点,人类事务就有了一种普遍的不确定性,这是行为学的先验确定性无法改变或削弱的:

人总是受到超出自己控制的力量和权力的支配。他的行为是为了尽可能避免那些在他看来会伤害到自己的事物。但最多只能在一个较小限度内做到这点。他永远无法预知自己的行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他所追求的目标,而且,即使达到目标,事后也无法确定(对他自己或别人都是如此)当时的行为是不是所能采取的最好的选择。¹⁸ 1021

最重要的是,不确定性也源于我们对自然的普遍无知。米塞斯没有诸如伯特兰·罗素这样的实证主义者所表现出的自负,罗素认为自然科学最终能够发现这个世界的所有奥秘。¹⁹在米塞斯看来,人类科学勉强能触及事物的表面。尽管它可能是重要的(米塞斯确信科学是推动人类发展的最重要工具),但它不是知识万灵药,也不会使谦逊和虔诚的美德变得多余:

尽管自然科学的进步逐渐扩大了受科学指引的活动的范围,可是,它所涉及的永远只是可能事件的一个极小的领域。而且即使在这极小的领域之内,也不会有绝对的确定性。一心追求的结果,可能会因未得到充分认识或者超出人类掌控的力量的侵入而被阻挠。技术工程无法排除人类生存的这种偶然因素,只能稍稍限制这些因素的作用范围。对于人类有限的知识来说,始终存在一个在人眼里纯粹偶发事件的领域,而使人生成为一场赌博。人常会受到无法预料和无法控制的事件的影响,所以就把希望寄托在那些能够使他避免这些影响的好运上。即使愚笨之人也不会意识不到自己的幸福最终取决于超出人的智慧、知识、预知和准备之外的力量的支配。对于这些力量,所有人的计划都是徒劳。这是宗教眼中不可妄加揣测的天命,对此,我们只好祈祷。²⁰

* * *

1022 米塞斯可能是在1962年初开始修订《人的行为》第二版的。珀西·格里夫斯担任了助手,而且他在1961年秋就已经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他们一起顺利而高效地工作,与此同时,与出版商的合作却没那么成功。耶鲁大学出版社毁了这本书,原因始终不得而知。米塞斯的终身成就被大量印刷错误、不均匀的颜色、段落错位、页码遗漏、页首标题缺失所糟蹋。他很生气,并猜想这是出于政治动机:

由于政治原因,现任的出版社管理层对自己的前任出了我的书表示遗憾。他们尤其对《人的行为》获得的巨大成功表示愤怒。倘若他们有点礼义廉耻,就该开诚布公地告诉作者不想再出他的书了,这样我就可以另外再找一家出版社。²¹

耶鲁大学出版社总算表现出了一点礼貌,于是,米塞斯接着在芝加哥的亨利·勒涅里(Henry Regnery)那里出了第三版,他的朋友尼迈耶可能是中间人。这次,一切按照计划顺利进行,新版本做得很出色。²²

1023 除了一点例外,新版没有进行任何重大修改或新的阐述。²³这个例外涉及自由的定义。改动是由以下事实引起的:20世纪50年代,米塞斯一些最优秀的学生(最著名的是默里·罗斯巴德及其巴斯夏小组)开始传播自由市场观念,反对政府干预,并将这一立场推到他们认为的逻辑结论——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

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最后交锋

1949年,米塞斯这样定义自由:“人只要能够不受他人的任意支配而生活和发展,就是自由的。”²⁴这里的关键词是“任意”——此处未加定义,而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以他们的方式作了解释。因此,1963年,米塞斯开始详细阐述自己的理论。他写道:

自由和奴役的概念只有指向政府的运作方式才有意义……只要政府——强制和压迫的社会组织——将其暴力和暴力威慑的运用限于打击和阻止反社会的行为,才会存在一种可以合理而有意义地称为自由的事物……这种强制并未真正限制人的选择能力……但是,如果政府的所作所为超出了保护人民

免受反社会之徒的暴力和欺诈侵害的范围,就会减少个人基于行为学法则的约束而拥有的自由选择的范围。因此,我们可以把自由定义为这样一种状况:政府暴力对于个人行为的约束没有超过行为学法则的限制边界。²⁵

这段关于他的立场的阐述未能阻止无政府主义者,原因不难看出。在上述段落,米塞斯给出了两个关于自由的定义。 1024

根据第一个定义,如果暴力只用于镇压“反社会”的行为,社会就是自由的。米塞斯只举了一个例子——抢劫——来说明他用这个术语想要表达的含义。²⁶ 如果他的意思是说,暴力如果用于保护财产权利就是合法的,那么米塞斯对自由的定义就在本质上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是一致的,后者仅仅是进一步说明政府必须遵循同样的规则,因此不能通过侵犯财产权利获取税收。米塞斯从未详细分析过这个论点,他对这个问题偶尔发表的一些评论表明,他相信无政府主义只适用于一个天使居住的世界。²⁷ 但是,罗斯巴德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表明,他并不是那么幼稚。²⁸

米塞斯对自由的第二个定义同样不太可能将无政府主义者带离他们的方向,尽管这是出于不同的原因。根据这个定义,人的行为据说受到两种不同性质力量的支配:行为学法则和政府干预。后者的影响是以某种方式加入到前者的影响而表现出来。但是,这不符合米塞斯在书中其他部分关于行为学法则的解释。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政府干预都是通过人类行为法则间接作用于人的。如果人的行为(例如政府行为)是一种“力量”,那么行为学法则并不是相同意义上的一种“力量”;相反,它们是连接一个因果链中任何给定力量的一种关系。 1025

在与布鲁诺·莱昂尼的私人通信中,米塞斯对无政府主义观念“受到美国年轻一代最优秀的一些人的支持”感到遗憾,但他对此有一个现成的心理学解释:无政府主义者是“对国家神化的一个反动”。²⁹

《人的行为》出版之前,米塞斯就和迅速成长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有接触,尤其是通过与西海岸自由至上主义者之间的联系,以及与罗丝·怀尔德·莱恩的通信。他一直徒劳地试图说服这些美国激进分子。大约二十年后,极端反国家主义势力大增。最好的证明是罗斯巴德、莱科和利焦等人的巴斯夏小组。自由报业连锁的出版商雷蒙德·塞勒斯·霍伊尔斯在一封写给米塞斯的信中吹嘘了这种日益增长的影响,那是他们十三年交往的第一次通信。米塞斯曾提出过一个论点,即没有哪个理智的人会建议把提供安全服务的任务委托给私人组织。霍伊尔斯在回应这个论点时说:

我恰好知道一些人，他们就是这么想的。我想，自由学校(Freedom School)的创始人罗伯特·勒费夫尔(Robert LeFevre)相信市场是保护生命和财产的最佳方式。F. A. 哈珀、奥瓦尔·沃茨，我的儿子哈里·霍伊尔斯(Harry Hoiles)、罗斯·怀尔德·莱恩，他们全都相信，《独立宣言》所表达的意思恰如其分，因为一个人没法让别人替自己表达意愿。³⁰

米塞斯以一种霍布斯式的方式作了答复，他反对说，如果不存在强制力量的垄断，“每个人都要时刻保护自己免受他人的侵害”。

你觉得你的原则就是《独立宣言》的那些原则，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更确切地说，你所支持的是一百年前促使美国南部邦联(Confederate States)拒绝承认多数选举的总统的那种原则。不论我们何地何时诉诸这些原则，都会导致杀戮和社会动乱。³¹

现在，这个观点似乎与自决原则相左，至少是米塞斯许多年来一直支持的那种自决原则。米塞斯是否改变了他的想法？20世纪50年代初，他在与牛津大学的萨尔瓦多·德马达利亚加(Salvador de Madariaga)的通信中讨论过这个问题。在其中一封信里，米塞斯认为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已经在他关于国家本质的著名讲座中“明白无误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自决是人们“自行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然而按照勒南的看法，“国家”可以是任何一个自愿组成的联盟。如果一个现存国家的某个亚集突然决定脱离国家自行发展，该怎么办？难道这不是一种自决吗？米塞斯当然非常熟悉这个问题。他的认识来自祖国——这个古老国家正是在19世纪末按照语言界线分崩离析了。关于语言社群的分裂，他承认这种情况的逻辑根据是无可反驳的。只有粗暴的压制可以抵抗这种分裂：

实际情况是，现在尚未出现一种支持操不同语言的民族构成一个统一国家的意识形态。由于缺少这样的学说，我们就没有任何根据反对某片领土上多数人口建立独立国家的要求。唯一的办法，就是诉诸武力(*ultima ratio regum*)了。³²

因此，米塞斯总结说：“构建这样一种能够容纳多种语言群体的国家意识形态，是留给子孙后代的最重大的任务之一。”³³但是，这个结论只是回避了问题。只

有当个体和群体之间存在意识形态的分歧,自决才是重要的。既然我们身处一个缺乏一致意识形态基础的时代,那么,应该如何处理分裂运动?古典自由主义者所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依赖自决原则。而当米塞斯将这个原则用于美国内战的具体例子,他就觉得应该服从于其他同等重要的理由:

我们是否应该把林肯的态度认定为自由主义,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徒劳的。林肯拒绝给予南方各邦独立建国的权利,而这正是美国立国的道德基础,就此而言他当然不是自由主义者。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奴隶制。人们可能主张:真正的问题不是自决,而是奴隶制。事实上,当代欧洲大部分自由主义者都会支持这一主张,因而同情联邦主义者(Unionists)。³⁴ 1028

这段引文表明了米塞斯对于讨论这个问题是多么忐忑不安。他根本无法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十年后,他写道:“如果每块领土都可以通过多数投票决定应该成为独立国家还是一个更大国家的部分,就不会再有征服战争。”³⁵但他仍然没有讨论德马达利亚加的论证:真正的问题在于确定谁该参与这场“独立投票”——即哪些人该算作属于这个国家。米塞斯回避了这个问题:

自由主义者一直认为,对于全体人民或个体公民来说,国家的主权地区究竟占据一块较大的区域还是较小的区域,这点并不重要。国土的大小,区域的一体化——如果这些区域的居民并非自愿要求一体化或者保持一体化——只与特权阶层以及统治阶级有关。³⁶

米塞斯相当突然地终止了他们在1952—1953年间的通信,宣称德马达里亚加的观点是“我听到过的最反自由的命题”。³⁷而当霍伊尔斯表示自己对米塞斯“支持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或者任何形式的专制统治”而感到遗憾时,米塞斯同样突然地终止了他在1962年和霍伊尔斯之间的通信。³⁸但这不妨碍他与无政府主义阵营其他成员的持久交往。1964年1月,他在罗伯特·勒费夫尔的自由学校讲授了一门关于货币的课程。³⁹正是这位勒费夫尔曾经称赞了霍伊尔斯关于无政府主义的简洁表述。米塞斯甚至成了自由学校咨询委员会的一员,最后还加入了F. A. “秃头”哈珀在加利福尼亚的人文研究所顾问委员会。⁴⁰(米塞斯重视正式礼仪,可见他和哈珀非常亲密,才会称他为秃头。⁴¹)他也继续与弗兰克·霍多罗夫的校际个人主义协会(Intercollegiate Society of Individualists)保持联系,而且他从1952年该协 1029

1030 会刚创立时就一直支持。此外,他称赞了研究生拉尔夫·莱科在芝加哥大学(代表校际个人主义协会的一个地方分会)创办的《新个人主义评论》。他为罗斯巴德的《人、经济与国家》写了一篇评论,而且评价似乎比《自由人》或者任何其他期刊都高。⁴²

米塞斯也很关注罗斯巴德后来的写作和活动——尽管常常让他恼怒。1968年费尔蒂希写给米塞斯的一封信可能也传达了米塞斯自己的感受:

罗斯巴德的问题实在让人头疼。我附上这一期的《国家评论》。……现在他和新左派(New Left)结盟了。想象一下!不久前他还加入了某个拥护卡斯特罗和古巴的委员会。看到像他这么卓越的头脑如此自甘堕落,真是可悲。⁴³

与货币主义者的最后交锋

罗斯巴德显然已经误入歧途,但这不是年迈的米塞斯主要担心的事情。令他忧心忡忡的是,整个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货币体系以及基于这一体系的全球货币体系如何走出困境。60年代中期,美国货币当局的总部已经敲响了警钟。外国中央银行和个人在法国的带领下纷纷把美元兑换成黄金。美国政府的黄金储备每天都在减少,而且还在加速。新生代经济学家迅速重申他们那无休止的悲叹,说1031 这些都是“国际收支逆差”的后果,并且要求出台相关措施打击奸商哄抬美国物价,一些人甚至要求实行外汇管制。菲利普·科特尼写信给米塞斯,打听为什么他没有发表任何关于当前灾难的意见。米塞斯答复说,关于这个问题他能说的都已经说过了。不过无论如何,他还是陈述了自己的观点:

有些人认为,一国货币的流入和流出,原因在于该国居民的销售和购买。他们犯了一个大错,他们假定个人的现金持有规模不取决于他本人的计划,而只是他购买和销售的无意识结果。一个人(或一家商业公司或一个公共管理部门)可能会在一天早晨惊讶地发现口袋里连买一张邮票的钱都没有了。如果这个国家大量人口或大量部门都是如此,那会造成多大的灾难!不过,这种学说的支持者未能保持一致,因为他们认为灾难只会发生在不同主权国家居民之间的相互贸易中,而不会出现在行政区划的商业关系中……

世界盛行的观念认为,美国政府会继续推行通货膨胀政策,贮藏在诺克斯

堡(Fort Knox)的黄金迟早会被耗尽,而美国政府将被迫放弃以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把黄金卖给外国政府和外国央行的政策。这解释了美国政府黄金储备的不断外流。

如果我们的文明在今后几年或数十年里不至于完全崩溃,就会重新确立金本位制。⁴⁴

科特尼在回信中谈到了他和雅克·吕夫的最新对话。他还报告说,法国媒体引述了弗里茨·马克卢普在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国会委员会面前的声明,其中马克卢普宣布自己反对金本位制的回归。⁴⁵关于这点,马克卢普已经亲自告诉过米塞斯。这位从前的学生请他“提示可能包含相关材料的著作和文章”,以便支持他的如下主张:法国货币当局在20世纪20年代成功废除了伴随金本位制而来的“自我约束”。⁴⁶ 1032

这对米塞斯肯定是个打击。同年秋天,他在斯特雷萨朝圣山学社会议上遇到了马克卢普,目睹了他对他的新观点的重申。米塞斯非常生气,并告诉玛吉特再也不要和马克卢普说话。⁴⁷以下是马克卢普对这件事的描述:

菲利普·科特尼提出了他一贯的呼吁,即回归金本位制,并大幅提高黄金的法定价格。在听完了他给出的提高黄金价格的理由后,我运用了主席特权来评论这个话题。我把黄金支持者的呼吁比作经过一段时期物价下跌之后工会领袖提高工资率的呼吁……与此类似,黄金游说集团想在一段时期的商品价格下跌之后提高黄金价格……而且还要求在一段时期的商品价格上涨之后提高黄金价格。⁴⁸

难怪米塞斯会生气。这位从前的学生过去是金本位制的支持者,现在却公然把这个问题贬低为特殊政治利益问题。 1033

又一年后,米塞斯感觉到这场危机性质的剧变。他写道:

至少对于美国而言,不久前可以称为一场货币危机的事情现在越来越发展成一场极为严重的政治危机。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市政府自1960年来已经浪费了数目惊人的资金用于支付或多或少不必要的花费,因而现在面临着巨大的赤字。一场严肃的货币改革势在必行,因为执政党(许多年来可能是左派分子)认为(也许是正确的)回归平衡预算将会极大损害其民众的支持率。

这意味着,通货膨胀是目前国家政治行动的主要财政基础,而且,没有哪个“务实”的人或有资格参加选举运动的人,会认为不需要持续增加流通中的货币数量。⁴⁹

米塞斯计划参加1968年4月举行的国际货币问题会议。会议由高级国际关系学院主办。邀请米塞斯的是雅克·弗雷蒙(Jacques Freymond),当时他是学院的主管。不过他是为了满足菲利普·科特尼的要求才提出邀请的。米塞斯对这件事非常期待,但后来科特尼解释,会议议程和结论已经预先确定,而且学术讨论将会受到严格限制。“敬请理解:我们不建议毁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⁵⁰米塞斯立即谢绝参加。

最后的荣誉

1962年10月20日,米塞斯在华盛顿接受了奥地利大使馆颁发的奥地利荣誉勋章。在他要求下,大使馆也邀请奥托·卡里尔参加了午宴。他们还邀请了米塞斯其他一些从前的学生,可能是住在华盛顿的那些。⁵¹1963年6月,米塞斯获得了纽约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1964年获得了弗莱堡大学的政治学荣誉博士学位(那些年哈耶克就在那里)。1969年3月,米塞斯即将退休之际,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的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Fellow)。此次当选可能带有一个特殊目的,即对诺贝尔委员会施加影响,因为同年秋天,诺贝尔委员会将授予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这个奖项却颁给了拉格纳·弗里希(Ragnar Frisch)和扬·廷贝亨(Jan Tinbergen,通译简·丁伯根,据译名辞典改。——译者注),两位今天已经完全被遗忘了的经济学家。米塞斯永远也不会获得诺贝尔奖了,但在他去世一年后,哈耶克以对米塞斯商业周期理论的阐述赢得了这个奖。

1035 这些正式的承认当然值得高兴,但米塞斯并未因为这类认可而妄自尊大。终其一生,他始终献身于自己的思想而非同时代人的欢呼。因此,他一定更为自己的著作获得持续成功感到欣慰。截至1965年9月,尼迈耶已经印了4000本《为自由而计划》。⁵²1969年乔纳森海角出版社(Jonathan Cape)再版了《社会主义》,而经济教育基金会订购了其中1000本。同时,耶鲁大学出版社转让了《官僚体制》、《全能政府》和《理论与历史》的版权,现在这些书由阿灵顿出版社(Arlington House)出版。⁵³

阿灵顿出版社一位名叫小卢埃林·H.罗克韦尔(Llewellyn H. Rockwell, Jr.)



1962年，米塞斯被授予奥地利荣誉勋章

的年轻资深编辑负责这些项目。他在高中时就曾订阅过《自由人》杂志。1968年，他搬到纽约，在那里参加了经济教育基金会的研讨会，并认识了乔治·罗奇（George Roche）。⁵⁴罗克韦尔只见过米塞斯一次，但他热切吸收和理解米塞斯的思想。1982年，他创办了现在著名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

在人生的最后阶段，米塞斯经历的另一种非常特殊的认可是，东方集团的经济学家这群实践者，在事实上对他的经济计算理论做出了证明。1967年秋，共产党执政的捷克斯洛伐克的一群年轻经济学家，开始根据中央计划经济的战后经验复兴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的讨论。卡雷尔·库巴博士（Dr. Karel Kouba）就是其中一位，他的研究题为“社会主义的计划和市场”（Plan and Market in Socialism）。这是一份内部材料，仅供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内部”交流。他研究了米塞斯在1920年以后的原创论文，以及哈耶克后来对其论证的修改，还有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关于这个模式，他写道：“基于当代的经验，我们可以说这个方案纯属理论上的设想。”库巴的一位同事，奥尔德里赫·基恩（Oldrich Kyn），甚至在为《经济评论》（*Ekonomická Revue*）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恢复了米塞斯的观点。《经济评论》是在全球发行的杂志，米塞斯也在订阅。⁵⁵还有一位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向弗里茨·马克卢普吐露说：“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米塞斯和哈耶克是对的，而奥斯卡·兰格只是空想家。”⁵⁶几个月后，这场思想叛乱迎来了1968年短暂的“布拉格之春”——几乎长达八个月的政治和经济自由化，最后被苏联坦克镇压。

1036

最重要的是，一些受米塞斯影响的人以具体行动表达了对他的认可，米塞斯对

此一定非常高兴。1967年4月,一位即将奔赴越南战争前线的好莱坞人把经济教育基金会登记为自己的人身保险受益人。“在我死后,我希望这笔钱(15 000美元)仅用于以下事项:为任何愿意接受的图书馆购置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人的行为》。”⁵⁷

1037 这里可以提及一个有趣的插曲。某次米塞斯参加了在加利福尼亚奥兰治县召开的“自由至上主义会议”(Libertarian Conference)。会议结束后,当地左派人士携带马尔库塞等人的画像来到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举行五一示威游行。于是,米塞斯的接待者写信索要他的照片,用于一场反攻活动。⁵⁸

在米塞斯九十岁生日那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谱系》(*Spectrum*)特别播出了一档关于他的节目。节目主持杰弗里·圣约翰把米塞斯称为“现代经济学的托克维尔”,并说,米塞斯在很久以前就解释过,尼克松式的价格管制是经济独裁。而在过去,这种经济独裁曾制造了共产主义、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⁵⁹在同一天,哈珀的人文研究所赞助了一套两卷的纪念文集,并于10月末送了六套给米塞斯。米塞斯深有感触,对玛吉特说:“身为一个九十多岁老人的唯一好处就是,可以在活着的时候读到自己的讣闻。”⁶⁰

然而还有一些动人的讣闻,米塞斯是不可能读到了。⁶¹

《美国经济评论》,《纪念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881—1973》(In Memoriam: 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第64卷3号(1974年6月):518。弗里茨·马克卢普起草(但没署名):

1038 米塞斯当然不是一位受人欢迎的经济学家。由于他对流行观点和政策直言不讳的批评,对通货膨胀政策、干预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无情抨击,以及在讨论私营企业和自由市场时的强硬态度,他为自己招致了大量知识分子敌人和毁谤者,正如20世纪任何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一样。与此同时,米塞斯又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教师和朋友,他们欣赏他在课堂和研讨会尤其是私人研讨会的教学活动中所表现出的正直和深刻。

罗伯特·詹姆斯·比迪诺托(Robert James Bidinotto),《冯·米塞斯——最后的致敬》,发表于《挣脱束缚!》(*Unbound!*), Boston: Individuals for a Rational Society 2, no. 1 (September-October 1973): 1—2;

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会把我们的时代称为“平庸的时代”。这个世纪唯

一的特色就是人类不断萎缩的精神境界。如果这个时代仍有可取之处,那也完全得益于少数孤独的伟人的成就。他们高瞻远瞩,凭着百折不挠的勇气和坚定的目光引导我们走在未经探索的道路上……

1973年10月10日,这些伟人中的一位倒下了……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博士与世长辞,享年92岁。难以想象我们的时代还有谁曾给予这个世界这么多,而得到的回报却这么少。

约翰·张伯伦,《一位无人问津的经济学先知》(Unsung Economist Who Was Prophet),发表于《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第一版(1973年10月13日),第14页:

像米塞斯那样真正的革新者却要等到死后才能获得公正的认可。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不过,真理最终追上了爱出风头的人,把他们降低到恰如其分的历史的次要位置……冯·米塞斯的伟大著作:《人的行为》,研究了一个社会为了达到生产能的最佳数量所需的条件……将会成为纪念冯·米塞斯的一座永久的丰碑。

英国《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973年10月11日):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教授于昨日逝世,享年92岁。随着他的离去,世界自由主义经济学界失去了最为多产的一位作家,而奥地利也失去了维也纳世纪之交思想精英的最后一位挥之不去的象征……

他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权威阐述者。出乎意料的是,他在亚洲的日本、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中受到了普遍欢迎,而更让人跌破眼镜的是,他还因为阐明了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存在经济计算而赢得了共产主义国家的尊重……

冯·米塞斯在欧洲和美国的亲切、风趣而又极为重视逻辑的教学活动,为他赢得了一批忠实的协助作者和小册子作者团体。

亨利·黑兹利特,在米塞斯追悼会上的发言,1973年10月16日,第6—8页。经济教育基金会印刷(Irvington, N. Y.),第6—8页:

他有着杰出的道德品质:追求正义的勇气,独当一面的能力,还有一种近乎狂热的思想的真诚和坦率,拒绝丝毫偏离或妥协。这常常使他成为一个难以亲近的人,但也树立了一个理想,鼓舞和激励了他的学生以及所有我们这些有幸认识他的人。

《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最新的自由至上主义理论》(1973年10月12日),第5页:

冯·米塞斯先生不仅被其追随者,也被很多完全不赞同他的政治和社会哲学的人认可为一位经济学思想的杰出贡献者。

伊斯雷尔·M.柯兹纳的致敬,《国家评论》第25卷,第45号(1973年11月9日):1246,1260:

对于那些认识他的人来说,路德维希·米塞斯是一位刚正不阿的知识分子人格的生动典范,一位充满热情、百折不挠的学术精神和献身精神的榜样——即使面对那么多同时代人令人震惊的轻视。很难忘记他以自己无畏的表现呈现给我们的严格教诲。

1040 约翰·麦克福尔斯,投资顾问,《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之逝》,在《价值—行动》广播节目中播出的关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纪念演讲,1973年10月14—16日:

米塞斯是一位综合的大师。他为分裂的经济学领域带来了整体性。他是一位有着极大毅力和正直品质的学者,他相信通往集体主义和国家干预的运动会对西方文明构成严重威胁。

《自由经济政策月刊》(*Monatsblätter für Freiheitliche Wirtschaftspolitik*),《最后的自由主义者》(*Der letzte Liberale*),11(1973年11月):645:

“最后的自由主义者”与世长辞。这位有时会说“自由主义,那就是我”的老派自由主义者,划时代的维也纳经济学派的最后一位幸存者,在他92岁时

离开了我们。他得到了越来越少的一批追随者的敬重。在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领域,尤其是在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的领域,他几乎已经成了一位传奇人物。(译自德语)

威廉·H.彼得森,《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一个纪念》,《华尔街日报》(1973年10月12日):

冯·米塞斯先生相信选择。他相信,人类所有决定都是各种选项之间的选择,因而这也确定了整个人类行为的领域……

人们可以摧毁自己和文明,但在一个自由社会(也即一个自由的经济体制),也可以上升到梦想不到的文化、知识和技术高度。无论如何,思想是关键。冯·米塞斯先生坚信的不只是商品和服务的自由市场,还有思想的自由市场——基于人类精神的潜能……

他认为自由社会和自由市场是不可分割的。他为理性和人的潜能而自豪。总而言之,他坚持西方文明最好的传统中的原则。

《新闻报》(*La Prensa*),布宜诺斯艾利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纽约去世》(*Ludwig von Mises: Murió en Nueva York*)(1973年10月18日): 1041

米塞斯的一生、他的著作和会议发言都致力于完善以下命题:人不是自动机器,他们的行为是理性的,而推动这些行为的思想则是历史进程的原始动因。他的思想阐明了政府干预不仅必然导致国家内部的冲突,也会导致国际冲突。(译自西班牙语)

伦纳德·里德在米塞斯追悼会上的发言,1973年10月16日,第8—9页。经济教育基金会印刷(Irvington, N. Y.),第8—9页: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是一位真正的(我用的是这个词的现在时态)教师。超过两代人曾跟随他学习,不计其数的人从他的著作获益。著作和学生是一位教师的不朽纪念碑,而这些纪念碑正属于米塞斯。一代学生终将消逝,但他的著作激发起来的思想,将会成为未来无数代新的学生的泉源。

默里·N. 罗斯巴德,《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881—1973》,《世间大事》,华盛顿特区(1973年10月10日):847:

米塞斯的著作宏大、艰深而又毫不妥协。这些著作的读者见到米塞斯本人肯定会很惊讶,他们可能想象米塞斯是一位冷淡、苛刻、严肃,遭到无足轻重的小人排斥的逻辑学者,对他周围的愚行以及长期遭受的压制和侮辱充满怨恨。

他们大错特错。他们遇到的将是一个天才头脑与温和友善的人格完美结合。我们之中,没有任何人从他的嘴里听到过一句刺耳的或流露内心怨恨的话。温文尔雅、谦恭有礼,路德维希·米塞斯一以贯之地鼓励他的朋友和学生哪怕只是最微不足道的创造力或智慧的表现……

他始终岿然不动,成为我们灵感的源泉、永恒的明星。菲利普·M. 克兰(Philip M. Crane)刊登于《国会议事录》(*Congressional Record*),119:159(1973年10月23日)E6696—6697。

默里·罗斯巴德后来补充道:

米塞斯去世后,我正撰写一篇讣告。莱科教授好心寄来了一段出自雪莱为济慈写的著名悼词《阿童尼》(*Adonais*)的感人至深的文字。一如往常那样,莱科在其中发现了恰好可以作为对米塞斯最后评价的内容:

因为,像他那样的人无须从
世界的蹂躏者借来不朽的荣誉,
他已居于思想领域的帝王之列,
他们都曾和时代的衰风为敌,
在逝去的事物中,唯有他们不会逝去。⁶²

注 释

1. 参见文件和信件,Grove City Archive: Karras file。
2. 米塞斯致哈里·霍伊尔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69年2月25日;Grove City Archive:

“H” files。1964年7月底,他在弗莱堡的瓦尔特·奥伊肯学院(Walter Eucken Institute)做了一场演讲。他接受了哈耶克的一个邀请(Eucken file)。然后他参加了在塞默灵召开的朝圣山学社会议,并去了一趟维也纳。在维也纳,他走访了商业周期研究所(现在的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研究所承认米塞斯是创始人(参见弗朗茨·内姆沙克[Franz Nemschak]致米塞斯,以及弗朗茨·内姆沙克致自由至上主义出版社,信件标注日期为1964年9月3日;Grove City Archive; Osterreichisches Institut für Wirtschaftsforschung files)。

3. 米塞斯致斯韦特和蔡特林格公司,通信时间为1958年10月;Grove City Archive: Swets & Zeitlinger file。在其他信件中,米塞斯强调自己加入计量经济学会只是为了接收期刊。参见米塞斯致尼迈耶,信件标注日期为1953年5月14日;Grove City Archive: Nymeyer files。

4. 致罗宾森的信;Grove City Archive: “R” files。

5. 国际大学书商组织(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Booksellers)致格里夫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69年2月1日;Grove City Archive: Greaves files。

6. 1962年2月,他不得不接受手术(参见米塞斯致穆特修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62年2月21日;Grove City Archive: Muthesius files; 另见1962年3月与马格努斯·格雷格森[Magnus Gregersen]的通信;Grove City Archive: Gregersen file)1966年春,米塞斯遭受病毒感染的痛苦已经一定有很长时间了。参见蒂贝格尔致米塞斯,1966年6月6日;Grove City Archive: Thieberger file。1966年7月3日,路德维希和玛吉特出了一场车祸。后来玛吉特接受了手术治疗。10月末,她痊愈了。参见米塞斯致尼迈耶,信件标注日期为1966年10月25日;Grove City Archive: Nymeyer files。1968年1月,米塞斯至少拔了一颗牙。参见蒂贝格尔致玛吉特·冯·米塞斯,1968年1月18日;Grove City Archive: Thieberger file。1969年6月的大部分时间,他和玛吉特都在生病。参见致鲁吉耶的信件,1969年6月23日;Grove City Archive: Rougier files。

7. 1970年6月;参见Grove City Archive: Schüller file。

8. Fertig files, “S” files, letter from Schiff。另见美国辉格-克里欧辩论协会(American Whig-Clisophic Society)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71年7月25日;玛吉特代米塞斯致该协会,信件标注日期为1971年8月1日;Grove City College: “A” files。

9. Margit von Mises, *My Years with Ludwig von Mises*, 2nd enlarged ed. (Cedar Falls, Iowa: Center for Futures Education, 1984), p. 180。

10. 米塞斯的纽约大学研讨班结束以后,他们表示愿意提供帮助:“我们对您怀着深深的感激。任何时候,只要我们中哪个人可以为您或玛吉特提供任何帮助,请随时吩咐,我们永远乐意为您效劳。”格里夫斯和比恩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69年6月6日;Grove City Archive: Greaves files。

11. 此书西班牙语版本首先于1962年在阿根廷发表。参见Mises, *El Establecimiento Histórico de la Escuela Austriaca de Economía* (Colección Investigaciones No. 43, La Plata: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la Plata, 1962), pp. 691–727。1962年5月2日,米塞斯为纽约大学教授俱乐部做了一场关于“维也纳大学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讲座,这本小书可能就是这场讲

座的产物。讲稿发表于 Bettina Bien Greaves, *Austrian Economics: An Anthology* (Irvington-on-Hudson, N. Y.: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1996), pp. 77–82。

12. 这次攻击不仅涉及维也纳学派(石里克、卡尔纳普、弗兰克等人)的“证实”实证主义,也涉及卡尔·波普尔的“证伪”实证主义。波普尔的理论为演绎法的使用留下了充分余地,而维也纳学派主张严格的演绎;波普尔还声称,只有可证伪的陈述才可能是“科学的”,而维也纳学派认为,所有不可证实的陈述都是无意义的。这些区别当然在很多方面是重要的。不过,对于米塞斯的批评来说,这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他的批评针对着两种实证主义的共同基础。更多细节参见 Hans-Hermann Hoppe, *Economic Science and the Austrian Method*, 2nd ed.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06); Jorg Guido Hülsmann, “Facts and Counterfactuals in Economic Law,” *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 17, no. 1 (2003)。

13. 在这点上,米塞斯赞同波普尔的理论:“经过波普尔纠正的实证主义的可验证性原则是一条无可反驳的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原则。”Mises,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Irvington-on-Hudson, N. Y.: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1962] 1996), p. 120。另见 *ibid.*, pp. 70f。

14. Mises,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p. 43。这句希腊格言的意思是“通过同一途径知道的同一事物的知识”。米塞斯强调说,“行为学的判断应该称为分析的还是综合的,或者,它的过程是否应该归入“纯粹的”套套逻辑,这些问题只是语词之争。”(*ibid.*, p. 45)

15. *Ibid.*, p. 2。

16. *Ibid.*, p. 45。

17. *Ibid.*, p. 65。

18. *Ibid.*, p. 66。

19. Bertrand Russell, *Religion and Sci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1997)。

20. Mises,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pp. 66–67。

21. 引自 Margit von Mises, *My Years with Ludwig von Mises*, p. 110。

22. 米塞斯可能是在 1953 年第一次从尼迈耶那听说勒涅里。参见尼迈耶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 1953 年 4 月 13 日;Grove City Archive: Nymeyer files。

23. 关于主要改动的概述,以及一场相关讨论,参见 Jeffrey M. Herbener, Hans-Hermann Hoppe, and Joseph T. Salerno, “Introduction to the Scholar’s Edition,” Mises, *Human Action*, Scholar’s edition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98)。米塞斯把改动的详尽列表寄给了马德里的雷格,以便西班牙语译本跟上最新的版本。

24. Mises, *Human Action*, p. 279。

25. Mises,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2nd ed.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281–82。另见 *Human Action*, 3rd ed. (Chicago: Regnery, 1966), p. 281。

26. *Human Action*, 2nd ed., p. 280。

27. 大约同一时期的一个典型例子是:

有一派思想浅薄的社会哲学家——无政府主义者，没有理睬这种情形而主张一种无国家的人类组织形态。他们完全忽略了人不是天使这个事实。他们太过愚蠢以至于没有意识到，某个个人或某个群体当然可能为了谋取更大的短期利益而牺牲他们自己和其他人的长期利益。（*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p. 100）

28. 罗斯巴德直到 1970 年才出版《权力与市场》（Princeton, N. J. : D. Van Nostrand, 1970），不过，米塞斯在 60 年代初一定读到过此书的手稿（最初是《人、经济与国家》[Princeton, N. J. : D. Van Nostrand, 1962]的一部分）。

29. 米塞斯致布鲁诺·莱昂尼，信件标注日期为 1965 年 2 月 15 日；Grove City Archive: Mont Pelerin Society files。

30. 霍伊尔斯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 1962 年 5 月 7 日；Grove City Archive: Hoiles file。随后在 5 月 21 日的一封信中，霍伊尔斯主张，自由市场提供安全服务的任务将由保险公司承担，由此引发了后来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争论。

31. 米塞斯致霍伊尔斯，信件标注日期为 1962 年 5 月 14 日；Grove City Archive: Hoiles file。需要注意的是，林肯在 1860 年选举中获得的选票远低于多数。

32. 米塞斯致萨尔瓦多·德马达利亚加，信件标注日期为 1952 年 9 月 9 日；Grove City Archive: Madariaga file。米塞斯在《全能政府》（Spring Mills, Penn. : Libertarian Press, 1985）中批评过马达利亚加。但他仍然非常敬重这位西班牙人——直到此次通信导致他们争吵。事实上他在同一封信中也说：“我想，我对任何在世作者成就的评价，从未超过我在此书第 15 页谈到您时所给予的称赞。”

33. 参见《全能政府》。他可能把国家源于意识形态的“构建”的想法归功于他的朋友路易·鲁吉耶，后者认为不存在任何客观的或科学的标准来为不同的国家划定界限。国家的真正基础是某个特定的“政治迷思”。参见 Louis Rougier, *Les mystiques politiques contemporaines et leurs incidences internationales* (Paris: Recueil Sirey, 1935)。

34. 米塞斯致萨尔瓦多·德马达利亚加，信件标注日期为 1952 年 9 月 9 日；Grove City Archive: Madariaga file。

35. Mises,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p. 94.

36. 米塞斯致德马达利亚加，信件标注日期为 1953 年 4 月 1 日；Grove City Archive: Madariaga file。

37. 德马达利亚加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 1953 年 3 月 11 日；米塞斯致德马达利亚加，信件标注日期为 1953 年 4 月 1 日；Grove City Archive: Madariaga file。

38. 可以再提两个类似例子，在这两个例子中，米塞斯都将有关强制之必要性的通信继续下去：某位主张提高遗产税以便降低所得税的库尔曼先生提醒米塞斯说：“请记住，你说过‘税收是必要的’。”（库尔曼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 1962 年 4 月 7 日；Grove City Archive: Kuhlmann file.）还有一位鲍威尔·莫菲特太太（Mrs. Powell Moffit）抱怨他在《人的行为》第二版中对征兵制度的支持。参见弗吉尼亚·鲍威尔·莫菲特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 1964 年 2 月 2 日；Grove City Archive: “M” files。

39. Grove City Archive: Freedom School files.

40. 麦克劳德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 1965 年 3 月 10 日；Grove City Archive: IHS

files。秃头哈珀在1963年创办了人文研究所。离开经济教育基金会后,他为沃尔克基金会工作过一段时间,而后在瓦伯西学院(Wabash College)开办讲座。

41. 参见米塞斯致哈珀的信件,标注日期为1969年5月8日;Grove City Archive: Farmand file。他在另一封信里写道,自己只能逗留三天,因为还要回去主持纽约大学的研讨班。他还提到自己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米塞斯致哈珀,信件标注日期为1969年6月5日;Grove City Archive: IHS files。

42. 米塞斯致米尔(Meehl),信件标注日期为1963年7月25日;Grove City Archive: "M" files。他还在写给他最欣赏的一位思想家,法国哲学家路易·鲁吉耶的信中称赞了这部作品。参见他致鲁吉耶的信件,标注日期为1962年12月6日;Grove City Archive: Rougier files。信的末尾是:“但是,请先读一读罗斯巴德的书。从认识论的观点来看,此书也是很有意思的。”

43. 费尔蒂希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68年7月12日;Grove City Archive: Fertig Files。

44. 米塞斯,手稿,可能写于1965年2月17日;Grove City Archive: Cortney files。

45. 科特尼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65年4月24日;Grove City Archive: Cortney files。

46. 马克卢普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65年3月22日;Hoover Institution: Machlup-Mises correspondence file。米塞斯显然从未回信。

47. Margit von Mises, *My Years with Ludwig von Mises*, p. 146.

48. 他继续说:“会议结束后,我试着与米塞斯教授交谈,但他突然转身快步走开了。友好关系的中断持续了好几年。”Machlup, “Ludwig von Mises: The Academic Scholar Who Would Not Compromise,” *Wirtschaftspolitische Blätter* 28, no. 4 (1981): 13.

49. 米塞斯致科特尼,信件标注日期为1966年6月27日;Grove City Archive: Cortney Files。

50. 科特尼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68年3月26日;Grove City Archive: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Internationales files。

51. 维尔弗里德·普拉策(Wilfried Platzer)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62年9月25日;Grove City Archive: Osterreichische Botschaft files。

52. 尼迈耶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65年9月28日;Grove City Archive: Nymeyer files。

53. Grove City Archive: FEE files.

54. 1971年,罗克韦尔跟随罗奇前往希尔斯代尔学院(Hillsdale College),管理一些意识形态项目和出版项目,包括米塞斯系列讲座、时事通讯《最初》(*Imprimis*)和希尔斯代尔学院出版社(Hillsdale College Press)。几年后,他加入了国会议员罗恩·保罗(Ron Paul)的团队。罗恩·保罗是米塞斯的一位重要学生,一生都是中央银行制度的反对者。

55. Karel Kouba, *Plan a trh za socialismu* (Prague: Economic Section of the Czechoslovak Academy of the Sciences, 1967); Oldrich Kyn, “Vyzva marxisticke ekonomické teorii,” *ekonomická revue* 7 (1967): 289ff.

56. 马克卢普致米塞斯,信件标注日期为1967年4月18日;Hoover Institution: Machlup-Mises correspondence file。
57. 威廉·S.库什曼(William S. Cushman)致经济教育基金会,信件未标注日期;Grove City Archive: “C” files. 米塞斯在1967年5月1日写信给库什曼。
58. 舒尔曼(Schureman)致米塞斯,1969年5月2日;Grove City Archive: “S” files。
59. Grove City Archive: “D” files.
60. 引自 Margit von Mises, *My Years with Ludwig von Mises*, p. 181。
61. 以下讣闻由贝蒂纳·比恩·格里夫斯和罗伯特·W. 麦吉(Robert W. McGee)收入 *Mise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Irvington-on-Hudson, N. Y. :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1993) pp. 315ff。
62. Murray N. Rothbard, *Ludwig von Mises—Scholar, Creator, Hero* (Auburn, Ala. :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88) p. 74. 最初的引文见 Ralph Raico, “The Legacy of Ludwig von Mises,” *The Libertarian Review* (September 1981) : 22. [译者按:译文引自查良铮译《雪莱抒情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引文首句查译“像他那样的诗人”,此处改为“像他那样的人”。]

若说曾有人孤身抵抗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潮流,那就是冯·米塞斯。但是,他的努力是否真正扭转了这股潮流,却是一个有待未来那些理解他的理论并和他一样热爱自由的人们加以解决的问题。¹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是“最后的自由骑士”,不过,如果把他视为政治思想家,那就大大低估了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他开创了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的统一(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经济计算理论,以及关于经济科学的先验基础的研究。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杰出的体系思想家。他创立了经济理论的综合体系,还强调了经济学在各门科学中的地位,以及它对人类文明的意义。相比于他之前或之后的所有其他经济学家,米塞斯更清晰地表述了经济学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含义。经济学不只是以私有产权为核心的全面政治方案的基础,还是那种和平、合作与宽容享有至高无上地位的整个世界观的基石。

1044 在他看来,选择自由社会并不需要铁石心肠或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可以证明,正是这种社会形态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人类绝大多数的物质、文化和精神利益——超过所有那些依靠掠夺为生的社会。人的理性尽管有限,却是追求幸福的最宝贵的工具;而且它将直接导向古典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理论。有些思想家(其中最著名的是 F. A. 哈耶克)曾经批评社会主义和国家主义是极端理性主义的产物。但在米塞斯看来,计划经济国家和干预主义国家还不够理性,支持它们的知识分子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犯了非常幼稚的错误。但是,这些知识分子没有承认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理论,而是继续孜孜不倦地寻找政府干预主义的新论证——如果必要的话,甚至质疑经济法则本身的存在。这种态度与其说是思想上的傲慢,不如说是道德上的狂妄自大。毕竟,这不是知识领域的虚张声势。这是“对理性的反叛”。²

《人的行为》的主要贡献就是论证这一观点。自 1949 年首次出版以来,米塞斯的这部巨著对于我们时代来说,就相当于《国富论》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地位:

一部关于人类自由的科学手册,同时也是支撑政治自由主义的科学基础。正如亚当·斯密的著作是建立在对那个年代经济知识全面了解的基础上,《人的行为》描述了现代经济学的语法。“现代”经济思想的根基是门格尔等人提出的主观价值理论。米塞斯以一种关于经济计算问题的通论补充了上述理论。它的核心思想是,经济理性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历史上都是偶然的。米塞斯反驳了亚当·斯密以来所有经济文献以及奥地利学派的同道中人,包括维塞尔和哈耶克。他强调说,基于货币价格的经济计算不只是经济计算的一种形式,它是唯一可能的经济计算类型。 1045

因此,人类文明只是特定文化条件的脆弱果实,那些文化条件对于实现货币和货币计算而言必不可少。这里再次出现了经济学的作用。18世纪之后,经济思想的学习、推进和传播带来了生活水准前所未闻的巨大提升,并且由于广大民众的生活足够优越而可以献身于艺术事业和科学研究,因而也创造了大量文化成就。为了保持这些文化成就,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不能忽略它们的经济基础。学习经济学是必需的。米塞斯强调:“在我们的时代,这是首要的公民责任。”³而且他还坚持,由于这个问题极其重要,因而无法托付给公共教育和政府专家:

经济学的教育绝不可以只局限于学校教室或统计官署,也不应该停留于秘传的圈子。它是人类生活和行为的哲学,关系到每个人和每件事。它是文明的精髓,也是人类合乎人性的存在所必不可少的东西。⁴

在巨著的最后几章,米塞斯强调了私人教育的重要性。这是他在漫长一生中直接学到的重要教训:政府的资助会把一种亲政府的倾向带进经济教育和经济研究,因而也就破坏了经济科学的社会功能。他用以下这段话结束了《人的行为》: 1046

经济知识是人类文明结构的基本要素,是现代的工业化和过去几个世纪建立起来的所有道德、知识、技术和医疗成就的基础。它留给我们一个丰富的宝藏,至于我们今后能否善加利用,或者弃之不顾,则取决于我们自己。但是,如果人们未能充分利用这些知识,而置其中的教训和警告于不顾,那么,被消灭的将不是经济学,而是人类社会和种族。⁵

米塞斯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可能回顾了自己投身于经济学研究的一生。他是逐渐认识到这一点的:这门学科是现代文明的思想基础,所有关心他人和人类文

明进程的人都应该熟悉这门学科。青春年少时,米塞斯还没有这种看法,那时他刚接触门格尔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这个观点在他心中慢慢生长,甚至直到年纪相当大时,仍然没有成形。上面引用的这段文字来自《人的行为》。九年前,米塞斯在《国民经济学》中尚未赋予经济学如此之高的地位。但在那时他还只有五十八岁。

1047 米塞斯提到“经济学”的时候,指的是古典经济学家如休谟、斯密、李嘉图、萨伊和巴斯夏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而门格尔等人则根据主观价值理论对它加以改造。20世纪,米塞斯等人又进一步改变了这门科学。按照米塞斯的期望,未来的学者还将继续发展这门科学——它是分析那些涉及稀缺财货的人类行为之逻辑含义的科学。这门科学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政府干预无法创造奇迹,却必然受制于因果规律的无情法则。

这门学科在20世纪,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被一门新的学科所取代,虽然它与旧经济学用了同一个名字,却采取了自然科学的方法解释诸如价格、收入、失业、通胀和增长这些现象。米塞斯化解了这门新学向旧经济学提出的各种挑战。因此,《人的行为》的出版,不仅是他对自己过去研究工作的总结,同时还是一个新的综合,是对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也是对实证主义、实验心理学和博弈论的批判性回应——这些学科至今仍然支配着社会科学领域。三十多年前,米塞斯孤独地反抗这些观念,然而它们仍然取得了成功,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一成功本身造就了米塞斯思想体系持久的重要地位。

1048 今天,米塞斯主义经济学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继续快速成长的范式,许多出版物见证了这一过程,并致力于在他止步的地方继续前进。同时,关于当代经济思想和经济思想史的教科书也对这个范式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最令人惊讶的是,整个过程并未得到机构的支持。米塞斯本人在其职业生涯早期就已经政治不正确了,而在后来,他又因为认识论的立场更加远离了学术时尚。高等学府忽略了他。当权的政治党派不愿听从他的意见,也乐于看到没人听他的意见。米塞斯只获得了某些私人基金会的支持,最著名的是沃尔克基金会和埃尔哈特基金会。他去世后,位于阿拉巴马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继续推进他的遗产。但是,这些经费微薄的少数机构很难与获得官方(政府)支持的组织抗衡。艰苦的斗争并没有终止。

因此,对于米塞斯主义范式在当代的扩张的一个主要解释,就是激励着它的那些观念的非凡活力。米塞斯已经成为经典,但在我们的时代,他还不止于此。经典作者为人类提供了某些根本问题的永恒形式,有时还会包含经受了时间考验的答

案。然而这些问题和答案未必就会触动今天的心灵,或者,未必就与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有关。米塞斯却不是这样。去世三十多年后,他的著述仍然能够打动读者——不管是学者还是外行。而且,他的著作仍与我们息息相关,发人深省。每年仍有成千上万的人购买和阅读他的文字。今天还有多少经济专业学生会读亚当·斯密或大卫·李嘉图写的东西?任何一位经济学教师都知道答案。其他 20 世纪杰出学者如古斯塔夫·卡塞尔和弗兰克·奈特等人的著作也是如此,甚至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著作也已无人问津。在课堂或媒体上,人们常常提到凯恩斯这位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干预主义拥护者,然而很少有人打开他的著作。相反,米塞斯仍然受到世界各地人们的广泛阅读和深入研究,仅次于我们时代流行的教科书作者。

引起这种持久反响的究竟是什么?回头来看,我们这本论述米塞斯生平与著作的传记结尾,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可以提供许多值得信赖的答案。你可以挑出他在各个经济分析领域的重大突破。你也可以提及他的个人品德在很多朋友中间引起的钦佩和鼓舞。但是,我们愿意强调另外一个因素,这个因素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并有助于解释米塞斯著作的魅力以及他本人在思想史上的地位:现实主义的1049认识论。米塞斯的著作支持这样一种观念或假设:社会现实的某些方面无法通过自然科学方法或历史研究得到充分的分析。然而我们可以通过行为学和经济学描述这个层面的社会世界。人的行为具有某些不随时间改变的因果关系。行为学就是探讨这些因果关系的描述性知识。正是这个观念将米塞斯引向了门格尔,并将他转变为一位经济学家(当他开始确信门格尔的确意义重大)。同样也是这个观念,至今仍然吸引着人们阅读米塞斯的著作,并促使我们断然拒绝各种从一开始就否定了现实主义假设而又未能实现自己预定目标的当代研究方法。

任何人若是希望从事人类社会之因果关系的分析,都可以从米塞斯开始,除非你想进一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或者萨拉曼卡学派,继而找到自己的学术道路。根据今天的形势来看,米塞斯的著作提供了现代经济思想与现实主义社会分析悠久传统之间唯一一个未曾间断的联系,这一现实主义传统可以追溯到 14 世纪的尼古拉·奥雷姆。

当然,这并不是说米塞斯范式界定了社会科学的某种完美范式。但它的确为我们提供了某种基于现实主义观点的最新的社会思想体系。因此,目前来说,它似乎是我们从事一项伟大的跨代研究——我们称为社会科学——最有助益的起点。同时它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一切时代和一切地点社会运作方式的最有成效的思想工具。

注 释

1. Bettina Bien Greaves and Robert W. McGee, *Mise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Irvington-on-Hudson, N. Y. :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1993), p. 317. 原始出处 Howard S. Katz, "Ludwig von Mises Dies at Age 92," *Rip-Off Resistance* 1, no. 4 (December 1973): 3。

2. 这个表述来自《人的行为》第三章标题。关于这一问题, 参见 Joseph T. Salerno, "Ludwig von Mises as a Social Rationalist,"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4 (1990): 26 - 54。

3. Mises, *Human Action*, Scholar's edition (Auburn, Ala. :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98), p. 875.

4. *Ibid.*, p. 874.

5. *Ibid.*, p. 881.

译后记

本书不是一本普通的生平传记,甚至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思想传记。不仅因为许氏强调了米塞斯的实践取向,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米塞斯思想的钥匙,而且也因为,这一实践取向是如此之深地与他的理论研究相互勾连。在此,“知行合一”获得了一种新的深刻含义:行为学意义上的内在一致性。

主流观念认为,认知判断和价值立场是可以分离的(正如生产和分配可以分离一样),因此我们有独立的社会科学和政治哲学(或道德哲学)。米塞斯却向我们证明了,通常所谓的价值问题(例如自由先于平等还是平等先于自由),本质上仍然是认知问题。因为价值无争辩,而认知有对错,因此,这一错觉本身就是无穷冲突的根源之一。他的学术研究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消除这一错觉。在他看来,自由主义不是政治立场,而是认知判断。

“知行合一”还意味着,米塞斯不是一位“纯理论家”(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他的兴趣首先是在历史和政治方面。这是他的全部理论研究的起点,也是终点。他是我们时代的真正先知(字面意义上的)。他在预测历史方面所犯的唯一错误,只是因为缺乏军事技术的前沿知识。

真正的问题不是看出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这是可以无限增加的),而是判断这些因果联系之间的逻辑关系和轻重缓急。米塞斯的极端立场(一般人眼中的)当然不是出于愚夫愚妇的轻率鲁莽。恰恰相反,理论认知的明晰和一致,加上历史理解的敏感与深刻,才是他的勇气的真正来源。

就此而言,“全局视角”绝不只是关于社会现象的统一理论,而且还是思想与行为、理论与历史、实然与应然的贯通。幸运的是,反驳干预主义和计划经济是个轻松得多的任务,就其本身而言,只需纸上谈兵即可,不必引证历史经验。这是先验论的理论含义。

如果利率是影响市场的全局因素(因而无法抵消),那么,观念也是影响历史走向的一个全局因素。分散的市场错误可以相互抵消(如果不是利率引起的話),而正确思想和错误观念的折中,只会产生一个程度较轻的错误,也许更坏。这个类

比绝不只是一个隐喻。米塞斯的一生已经见证了社会体制和思想观念的双重扭曲。他给我们的最终启示是：只有观念可以战胜观念。但在所有这些观念之中，自由主义并非一个并列的选项，而是最低限度的共同框架，和平与合作的存在条件。这是先验论的实践含义。

梁捷(上海财经大学)翻译了第一部分(第一章至第三章);李井奎(浙江财经大学)翻译了第二部分(第四章至第六章);沈路翻译了第三部分(第七章至第十一章);李华翻译了第四部分(第十二章至第十五章);黄华侨(杭州师范大学)翻译了第五和第六部分(第十六章至第二十三章)。全书由黄华侨校对并统稿。

许多朋友为这个译本作出了贡献,包括但不限于:肖海鸥、蒲定东、熊越、邝颖达和通天译诸君。还要感谢启蒙编译所汪宇先生的支持,本书编辑曾东玲女士的耐心和细心。

除了少数例外(例如亚当·斯密、维塞尔、庞巴维克、希法亭等),所有人名的译法均以新华社编《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年版)为准。

黄华侨

2016年4月24日

参考文献

- Akademisches Gymnasium Wien. *Jahres-Bericht über das k.k. Akademische Gymnasium in Wien für das Schuljahr 1899/1900*. Vienna: Verlag des k.k. Akademischen Gymnasiums, 1900.
- Alexandre, V, and W.W. Gasparski, eds. *Praxiology: The International Annual of Practical Philosophy and Methodolog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1992. Vol. 7: *The Roots of Praxiology—French Action Theory from Bourdeau and Espinas to Present Day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2000.
- Altschul, Eugen. Book Review in *Magazin der Wirtschaft* (June 19, 1931).
- Amaroso, Luigi, ed. *Cournot nella economia e nella filosofia*. Padua: Cedam, 1939.
- Amonn, Alfred. *Hauptprobleme der Sozialisierung*. Leipzig: Quelle & Meyer, 1919.
- . *Objekt und Grundbegriffe der theoretischen Nationalökonomie*. Vienna: Deuticke, 1911.
- Anderson, Benjamin. *Economics and the Public Welfare*. Indianapolis: Liberty Press, 1979.
- . *The Value of Money*. New York: Macmillan, 1917.
- Anonymous. "Die Gemeinwirtschaft." *Der Deutsche Volkswirt. Literatur-Beilage* no. 1 (December 23, 1932).
- . "Sozialismus—eine Utopie." *1. Handelsbeilage der "Berliner Börsen-Zeitung"* (November 3, 1932).
- Antonelli, Étienne. "Léon Walras et Carl Menger à travers leur correspondance." *Économie appliquée* 6, nos. 2–3 (1953).
- Aquinas, Thomas. "Über die Herrschaft der Fürsten." In *Staatslehre des Thomas von Aquino*, edited by F. Schreyvogel. Jena: Gustav Fischer, 1923.
- Archive of the Hoover Institution at Stanford University. Palo Alto, California.
- Archive of the Wirtschaftskammer. Vienna, Austria.
- Auspitz, Rudolf, and Richard Lieben.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Theorie des Preises*.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889.
- . *Zur Theorie des Preises*.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887.
- Bainville, Jacques. *Les conséquences politiques de la paix*. Paris: Fayard, 1920.
- Baltzarek, Franz. "Ludwig von Mises und die österreichische Wirtschaftspolitik der Zwischenkriegszeit." *Wirtschaftspolitische Blätter* 28, no. 4 (1981).
- Barth, Karl. *Der Römerbrief*. Munich: Kaiser, 1922.
- Barth, Paul.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als Soziologie*, 3rd ed. Leipzig: Reisland, 1922.

- Barzun, Jacques. *Teacher in America*. Indianapolis: Liberty Press, [1945] 1981.
- Bauer, Otto. *Der Weg zum Sozialismus*. Vienna: Verlag der Wiener Volksbuchhandlung, 1919.
- . *Die Nationalitätenfrage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Vienna: Verlag der Wiener Volksbuchhandlung, 1907. Translated as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ities and Social Democrac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 Becker, Gary.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Knopf, 1971.
- Behrend, Manfred. "‘Der Wandschirm, hinter dem nichts geschieht.’ Bildung, Tätigkeit und Ende der ersten deutschen Sozialisierungskommission." *Glasnost* (1998).
- Bendixen, Friedrich. *Das Wesen des Geldes*.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08.
- . "Fünf Jahre Geldtheorie." *Bank-Archiv* 10, no. 10 (1911).
- . *Sozialismus und Volkswirtschaft in der Kriegsverfassung*. Berlin: Guttentag, 1916.
- Bergmann, Eugen von. *Geschichte der nationalökonomischen Krisentheorien*. Stuttgart: Kohlhammer, 1895.
- Bergson, Henri. *L'évolution créatric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07] 1991.
- Bernatzik, Eduard. *Die Ausgestaltung des Nationalgefühls im 19. Jahrhundert*. Hannover: Helwing, 1912.
- Beveridge, William.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Its Problems, 1919–1937*. London: Allen & Unwin, 1960.
- . *Unemployment: A Problem of Industry*, 2nd ed.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930.
- Blaug, Mark. "Comment" [on O'Brien's "Lionel Robbins and the Austrian Connection"]. In *Carl Menger and His Legacy in Economics*, edited by Bruce Caldwell.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5th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 *Great Economists before Keyn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ives and Works of One Hundred Great Economists of the Pa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Boese, Franz. *Geschichte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1872–1932*.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39.
- Boétie, Etienne de la. *The Politics of Obedience: The Discourse of Voluntary Servitude*. New York: Free Life Editions, [1562] 1975.
- Böhm-Bawerk, Eugen von. *Capital and Interest*. South Holland, Ill.: Libertarian Press, 1959.
- . "Eine ‘dynamische’ Theorie des Kapitalzinses." *Zeit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Sozialpolitik und Verwaltung* 22 (1913). Reprinted in *Gesammelte*

- Schriften*, edited by Weiss. Reprint, Frankfurt a.M.: Sauer & Auvermann, 1968. Vol. 2.
- . “Grundzüge der Theorie des wirtschaftlichen Güterwertes.” *Conrad's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n.s. 13 (1886). Reprinted as *Grundzüge der Theorie des wirtschaftlichen Güterwerths*.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932.
- . *Innsbrucker Vorlesungen über Nationalökonomie*, edited by Shigeki Tomo. Marburg: Metropolis, 1998.
- . *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 London: T.F. Unwin, 1989.
- . *Positive Theorie des Kapitals*. Innsbruck, 1889. Reprinted Jena: Gustav Fischer, 1921.
- . *Positive Theory of Capital*. New York: G.E. Stechert, 1930.
- Stephan Boehm. “Schumpeter and Mises.” In *Neoclassical Economic Theory, 1870 to 1930*, edited by Klaus Hennings and Warren J. Samuels. Boston: Kluwer, 1990.
- Bois-Reymond, Emil du. *Über den deutschen Krieg*. Berlin: Hirschwald, 1870.
- Bonnet, Victor. *Etudes sur la monnaie*. Paris: Guillaumin, 1870.
- Bostaph, Samuel. “Friedrich von Wieser's Theory of Socialism: A Magnificent Failure.” *Politická ekonomie* 53, no. 6 (2005).
- . “Wieser on Economic Calculation under Social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6, no. 2 (2003).
- Branden, Barbara. *The Passion of Ayn Rand*. New York: Doubleday, 1987.
- Braun [Browne], Martha St. “Die diesjährigen Verhandlungen des Vereines für Sozialpolitik.” *Neue Freie Presse* (October 8, 1932).
- Briefs, Götz. “Kriegswirtschaftslehre und Kriegswirtschaftspolitik.”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4th ed. 1923. Vol. 5.
- Brook-Shepherd, Gordon. *The Austrians: A Thousand-Year Odyssey*. New York: Carroll & Graf, 1997.
- Browne [Braun], Martha Steffy. “Erinnerungen an das Mises-Privatseminar.” *Wirtschaftspolitische Blätter* 28, no. 4 (1981).
- Bresciani-Turroni, Costantino. *The Economics of Inflation: A Study of Currency Depreciation in Post-War German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37.
- Bukharin, Nikolai. *Economic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 Bundeskommission und Wiener Kammer der gewerblichen Wirtschaft, eds., *100 Jahre Handelskammern in Österreich*. Vienna: Amtsblatt der Bundeskommission der gewerblichen Wirtschaft, 1948.
- Burghardt, Anton. *Soziologie des Geldes und der Inflation*. Vienna: Böhlau, 1977.
- Cairnes, John E. “Essay Towards A Solution of the Gold Question: The Course of the Depreciation.” In *Essays in Political Economy: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London: Macmillan, [1858] 1873.

- Caldwell, Bruce, ed. *Carl Menger and His Legacy in Economic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 “Wieser, Hayek, and Equilibrium Theory.” *Journal des Economistes et des Etudes Humaines* 12, no. 1 (2002).
- Calligaris, L. “Staatliche Theorie des Geldes.” *Münchener Allgemeine Zeitung* (February 1, 1906).
- . “Staatliche Theorie des Geldes.” *Österreichische Rundschau* 7, no. 80 (May 10, 1906).
- Cannan, Edwin. *Money: Its Connexion with Rising and Falling Prices*. London: King & Son, 1918.
- Cantillon, Richard. *Essay on the Nature of Commerce in General*. Reprint,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2001.
- Carell, Erich. Review of Mises’s “*Ursachen der Wirtschaftskrise*.”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135 (1931).
- Caro, Leopold. “Auswanderung und Auswanderungspolitik in Österreich.” *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Socialpolitik* 131 (1909).
- Cassel, Gustav. “Abnormal Deviations in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Economic Journal* 28 (1918).
- . *Grundgedanken der theoretischen Ökonomie*. Leipzig and Erlangen: Hatschek & Scholl, 1926.
- .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Foreign Exchanges.” *Economic Journal* 26 (1916).
- . *Theoretische Sozialökonomie*, 4th ed. Leipzig: Deichert, 1927.
- Cernuschi, Henri. *Nomisma; or, “Legal Tender.”* New York: Appleton & Co., 1877.
- Chamberlain, John. “Battle for the Freeman.” *Time*. January 26, 1953.
- Chodorov, Frank. “What This Country Needs Is Guts.” *analysis* 2 (February 1946).
- Clark, John Bates. *Essentials of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and London: Macmillan, 1914.
- Coase, Ronald. *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 .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 Condillac, Étienne Bonnot, Abbé de. *Commerce and Government: Considered in Their Mutual Relationship*.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1997.
- . *Essai sur l'origine des connaissances humaines* (1746). Included in *Œuvres complètes*. Paris: Tourneux, Lecointe et Durey, 1822. Vol. 1.
- . *Le commerce et le gouvernement* (1776). Included in *Œuvres complètes*. Paris: Tourneux, Lecointe et Durey, 1822. Vol. 4.
- . *Traité des sensations* (1754). Included in *Œuvres complètes*. Paris: Tourneux, Lecointe et Durey, 1822. Vol. 3.
- Cornuelle, Richard. “A New Philosophy of Laissez Faire.” *American Affairs* (January 1950).

- Coquelin, Charles. *Du credit et des banques*. Paris: Guillaumin, 1848.
- Crunden, Robert M. *The Mind and Art of Albert Jay Nock*. Chicago: Henry Regnery, 1964.
- Cubbedu, Raimondo. *The Philosophy of the Austrian School*. London: Routledge, 1993.
- Cuhel, Franz. *Zur Lehre von den Bedürfnissen. Theoretische Untersuchungen über das Grenzgebiet von Ökonomik und Psychologie*. Innsbruck: Wagner, 1907.
- DelGaudio, Juilan Joseph. *Refugee Economist in America: Ludwig von Mises and American Social and Economic Thought, 1940–1986*. Ann Arbor, Mich.: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988.
- Dewey, John. *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 New York: Putnam, 1935.
- Diamond, Sigmund. *Compromised Campus: The Collaboration of Universities with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1945–195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Dickinson, H.D. "Price Formation in a Socialist Community." *Economic Journal* 43 (1933).
- Dietzel, Heinrich. "Beiträge zur Methodik der Wirtschaftswissenschaften."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43 (1884).
- . "Der Ausgangspunkt der Socialwirtschaftslehre und ihr Grundbegriff."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39 (1883).
- . "Individualismus."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4th ed., 1923. Vol. 5.
- . "Selbstinteresse und Methodenstreit in der Wirtschaftstheorie."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3rd ed. Jena: Gustav Fischer, 1911. Vol. 7.
- . *Theoretische Socialökonomik*.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895.
- Dietzgen, Josef. *Gesammelte Werke*, 3rd ed. Stuttgart: Dietz, 1922.
- DiLorenzo, Thomas J., and Jack High. "Antitrust and Competition, Historically Considered." *Economic Inquiry* (July 1988).
- Dimmel, Heinrich. "Ignaz Seipel." *Tausend Jahre Österreich*, edited by Walter Pollock. Vienna: Verlag Jugend und Volk, 1974. Vol. 3.
- Director, Aaron, ed., *Defense, Controls, and Infl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2.
- Douhet, Giulio. *Luftherrschaft*. Berlin: Drei Masken Verlag, 1935.
- Döring, Herbert. *Die Geldtheorien seit Knapp*, 2nd ed. Greifswald: Bamberg, 1922.
- Dreyer, Jacob. *Breadth and Depth in Economics: Fritz Machlup—The Man and His Ideas*.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1978.
- Dub, Moriz. *Die weitere Entwicklung der Katastrophenhauser in Oesterreich mit Streiflichtern auf Deutschland*. Stuttgart: Enke, 1922.
- . *Katastrophenhauser und Geldentwertung*. Stuttgart: Enke, 1920.

- Ebeling, Richard M., ed., *Selected Writings of Ludwig von Mises: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form and Reconstruction*.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2000.
- Ebray, Alcide. *La Paix malpropre (Versailles)—pour la reconciliation par la vérité*. Milano: Unitas, 1924.
- Eckert, Christian. "Friedensverträge. II. Vom staatswissenschaftlichen Standpunkte."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4th ed. Jena: Gustav Fischer, 1927. Vol. 4.
- Edwards, James R. *The Economist of the Century: Ludwig von Mises in the History of Monetary Thought*. New York: Carlton Press, 1985.
- Ekelund, Robert, and Robert Hébert. *Secret Origins of Modern Microeconomics: Dupuit and the Engineer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9.
- Ellis, Howard S. *Exchange Control in Central Europ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 Elster, Ludwig. "Philippovich von Philippsberg, Eugen."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6 (1925).
- Eltis, Shelagh, and Walter Eltis. "The Life and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s of the Abbé de Condillac." In Etienne Bonnot, Abbé de Condillac, *Commerce and Government: Considered in Their Mutual Relationship*.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1997.
- Ermacora, Felix. *Der unbewältigte Friede—St. Germain und die Folgen*. Vienna and Munich: Amaltha, 1989.
- Espinass, Alfred. "Les origines de la technologie" *Revue philosophique* 15 (July to December 1890). Reprinted, *Les origines de la technologie*. Paris: Felix Alcan, 1897.
- Eucken, Walter. *Kritische Betrachtungen zum deutschen Geldproblem*. Jena: Gustav Fischer, 1923.
- Fechner, Gustav Theodor. ("Dr. Mises"). *Beweis, dass der Mond aus Jodine bestehe*, 2nd ed. Leipzig: Voss, 1832.
- . *Vergleichende Anatomie der Engel—Eine Skizze*. Leipzig: Industrie-Comp-toir, 1825.
- Fest, Joachim Fest. *Hitler*. Berlin: Deutsche Buch-Gemeinschaft, 1973.
- Fischel, Alfred, ed. *Das österreichische Sprachenrecht*, 2nd ed. Brünn: Irrgang, 1910.
- . *Materialien zur Sprachenfrage*. Brünn: Irrgang, 1902.
- Fisher, Irving.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Money: Its Determination and Relation to Credit, Interest, and Crises*, 2nd ed.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13] 1985.
- . *Stabilised Money: A History of the Movement*.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35.
- Flexner Report. *Medica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A Report to 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 1910.

- Flynn, John T. *The Roosevelt Myth*. New York: Devin-Adair, 1948. Reprin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alph Raico. San Francisco: Fox & Wilkes, 1998.
- Fosdick, Raymond Blaine. *The Stor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New York: Harper, 1952.
- Fetter, Frank A. *Capital, Interest, and Rent*, edited by Murray N. Rothbard. Kansas City: Sheed Andrews and McMeel, 1977.
- . *Economic Principles*. 2 Vols. New York: The Century Co., 1905 and 1915.
- Franz, Georg. *Liberalismus—Die deutschliberale Bewegung in der habsburgischen Monarchie*. Munich: Callwey, 1955.
- Frege, Gottlob. *Function und Begriff*. Jena: Pohle, 1891.
- . *Die Grundlagen der Arithmetik*. Jena: Pohle, 1884.
- . *Die Grundgesetze der Arithmetik*. Jena: Pohle, 1893. Vol. 1; Jena: Pohle, 1903. Vol. 2.
- Friedman, Milto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 Friedman, Milton, and Anna J. Schwartz.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 Friedman, Milton, and Rose D. Friedman. *Two Lucky People: Memoi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 Fritsch, Theodor. *Anti-Rathenau*, 2nd ed. Leipzig: Hammer, 1919.
- Galbraith, John Kenneth. "In Defense of Laissez-Fair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October 30, 1949).
- Gall, Franz. *Alma Mater Rudolphina 1365–1965—die Wiener Universität und ihre Studenten*. Vienna: Austria Press, 1965.
- Garrett, Garet. *The Revolution Was*. Caldwell, Idaho: Caxton Printers, 1938.
- Geissler, Franz. "Die Entstehung und der Entwicklungsgang der Handelskammern in Österreich." *Hundert Jahre österreichische Wirtschaftsentwicklung, 1848–1948*, edited by Hans Mayer. Vienna: Springer, 1949.
- Gertchev, Nikolay. "Dehomogenizing Mises's Monetary Theory." *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 18, no. 3 (2004).
- Gideonse, Harry D. "Changing Issues in Academic Freedom in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94, no. 2 (1950).
- Göbel, Otto. *Deutsche Rohstoffwirtschaft im Krieg*. Stuttgart: Carnegie Stiftung, 1930.
- Görres-Gesellschaftliche zur Pflege der Wissenschaft, *Staatslexikon*, 7th ed. Freiburg i.Br.: Herder, 1989. Vol. 5
- Gorges, Irmela. *Sozialforschung in Deutschland 1872–1914*, 2nd ed. Frankfurt a.M.: Anton Hain, 1986.
- . *Sozialforsch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18–1933*. Frankfurt a.M.: Anton Hain, 1986.

- Gossen, Hermann Heinrich. *Entwicklung der Gesetze des menschlichen Verkehrs und der daraus fließenden Regeln für menschliches Handeln*. Braunschweig: Vieweg & Sohn, 1854.
- Gottl-Ottlilienfeld, Friedrich von. *Wirtschaft und Technik*, 2nd ed. Tübingen: Mohr, 1923.
- Graduate Institute Archive. Mises files in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Geneva, Switzerland.
- Graf, Martine Brunschwig, Jean-Claude Frachebourg, Norman Scott, and Peter Tschopp. *HEI 1927–2002*. Geneva: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2.
- Graham, F.D. *Exchanges, Prices, and Production in Hyperinflation: Germany, 1920–23*.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30.
- Grassl, Wolfgang, and Barry Smith, eds. *Austrian Economics: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Background*. London: Croom Helm, 1986.
- Gratz, Alois. “Die österreichische Finanzpolitik von 1848 bis 1948.” *Hundert Jahre österreichischer Wirtschaftsentwicklung, 1848–1948*, edited by Hans Mayer. Vienna: Springer, 1949.
- Graetz, Heinrich. *History of the Jews*. Vol. 5.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 1895.
- Greaves, Bettina Bien, ed. *Austrian Economics: An Anthology*. Irvington-on-Hudson, N.Y.: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1996.
- Greaves, Bettina Bien, and Robert W. McGee, eds. *Mise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Irvington-on-Hudson, N.Y.: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1993.
- Grice-Hutchinson, Marjorie. *The School of Salamanca: Readings in Spanish Monetary Theory, 1544–160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2.
- Grove City Archive. Mises files in the Grove City College Library. Grove City, Pennsylvania.
- Grünberg, Carl. *Die Bauernbefreiung und die Auflösung des gutherrlich-bäuerlichen Verhältnisses in Böhmen, Mähren und Schlesien*, 2 vols.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893–1894.
- . *Studien zur österreichischen Agrargeschichte*.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01.
- Gugitz, Gustav. *Das Wiener Kaffeebaus. Ein Stück Kultur- und Lokalgeschichte*. Vienna: Deutscher Verlag für Jugend und Volk, 1940.
- Guglia, Eugen. *Das Theresianum in Wien*. Vienna: Schroll, 1912.
- Haberler, Gottfried von. “Fritz Machlup: In Memoriam.” *Cato Journal* 3, no. 1 (1983).
- . “Mises’s Private Seminar.” In Ludwig von Mises, *Planning for Freedom*, 4th ed. South Holland, Ill.: Libertarian Press, 1980.
- . “Erinnerungen an das Mises-Privatseminar.” *Wirtschaftspolitische Blätter* 28, no. 4 (1981).

- Habermann, Gerd. *Der Wohlfahrtsstaat: Die Geschichte eines Irrwegs*, 2nd ed. Frankfurt: Ullstein, 1997.
- Haller, Carl Ludwig, "Über einige Parteienbenennungen zum besseren Verständnis der Zeitungen und anderer moderner Schriften." *Satan und die Revolution—und andere Schriften*. Vienna: Karolinger, 1991.
- Hamilton, Charles H. "The Freeman: The Early Years." In R. Lora and W.H. Longton. *The Conservative Press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London: Greenwood, 1999.
- Hahn, L. Albert. "Continental European Pre-Keynesianism." *The Economics of Illusion*. New York: Squier Publishing, 1949. Chap. 16. Reprinted in *The Critics of Keynesian Economics*, Henry Hazlitt, ed., 2nd ed. Irvington-on-Hudson, N.Y.: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1995.
- . *Volkswirtschaftliche Theorie des Bankkredits*. Tübingen: Mohr, 1920.
- Hamann, Brigitte. *Rudolf: Kronprinz und Rebell*. Munich: Piper, 1978.
- Harris, Seymour E. "Capitalist Manifesto." *Saturday Review* 32 (September 24, 1949).
- Hartwell, R.M. *History of the Mont Pèlerin Society*.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95.
- Hawtrey, R.G. *Monetary Reconstruction*, 2nd ed.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926.
- Hayek, F.A. "Bemerkungen zum Zurechnungsproblem." *Jahrbuch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124, 3rd series, vol. 69 (1926). Translated as "Some Remarks on the Problem of Imputation." In Hayek, *Money, Capital, and Fluctuations: Early Essays*, edited by Roy McClough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 . *Das Mieterschutzproblem. Nationalökonomische Betrachtungen*. Vienna: Steyermühl-Verlag, 1930.
- , ed. *Capitalism and the Histori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4.
- , ed.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Critical Studies on the Possibilities of Socialism*. London: Routledge, 1935.
- . "Competition as a Discovery Procedure."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5, no. 3 (1968/2002).
- . "Einleitung." Introduction to Hermann Heinrich Gossen, *Entwicklung der Gesetze des menschlichen Verkehrs und der daraus fließenden Regeln für menschliches Handeln*, 3rd ed. Berlin: Prager, 1927.
- . "Einleitung." In Carl Menger, *Gesammelte Werke*. Tübingen: Mohr, 1968.
- . "Einleitung." Introduction to Ludwig von Mises, *Erinnerungen*. Stuttgart: Gustav Fischer, 1978.
- . "Friedrich Freiherr von Wieser." *Jahrbuch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125, 3rd series, vol. 70 (1926).

- . *Geldtheorie und Konjunkturtheorie*. Vienna: Holder-Pichler-Tempsky, 1929.
- . “Gibt es einen Widersinn des Sparens?” *Zeitschrift für Nationalökonomie* 1, no. 3 (1930).
- .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 . *Hayek on Hayek: An Autobiographical Dialogue*.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4.
- . “The Intellectuals and Sociali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16 (1949). Reprinted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F.A. Hayek*, vol. 10: *Socialism and War: Essays, Documents, Reviews*, edited by Bruce Caldwel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 . *Monetary Theory and Trade Cycle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1933.
- . “The Nature and History of the Problem.” In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 . “Opening Address to a Conference at Mont Pèlerin.”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 . “Planning, Science, and Freedom.” *Nature* (November 15, 1941).
- . “Postscript.” In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 . *Prices and P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1931.
- . *Preise und Produktion*. Vienna: Julius Springer, 1933.
- . *Profit, Interest, and Investment and Other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Fluctuation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39.
- . *Pure Theory of Capital*. London: Macmillan, 1941.
- . *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4.
- . *The Sensory Ord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2.
- Hazlitt, Henry. *A New Constitution Now*. New York: McGraw Hill, 1942.
- . “An Interview with Henry Hazlitt.” *Austrian Economics Newsletter* (Spring 1984).
- . “The Case for Capitalism.” *Newsweek* 34 (September 19, 1949).
- . “The 1919 Prophecies of Maynard Keynes.”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March 11, 1945).
- Hébert, Robert F. “Jevons and Menger Re-Homogenized: Who is the Real ‘Odd Man Out?’”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57, no. 3 (1998).
- Heimann, Eduard. *History of Economic Doctrines: An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45.
- Helffferich, Karl. *Das Geld*, 5th ed. Leipzig: Hirschfeld, [1903] 1921.
- Hennecke, Hans Jörg.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Düsseldorf: Wirtschaft und Finanzen, 2000.
- Hennings, Klaus H. *The Austrian Theory of Value and Capital: Studies in the Life and Work of Eugen von Böhm-Bawerk*.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1997.

- Herbener, Jeffrey M., Hans-Hermann Hoppe, Joseph T. Salerno. "Introduction" to Ludwig von Mises,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Scholar's Edition.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98.
- Herkner, Heinrich. "Die Zukunft der Sozialpolitik." *Jubiläumstagung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in Eisenach 1922*. Munich and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23.
- . "Sozialpolitische Wandlungen in der wissenschaftlichen Nationalökonomie." *Der Arbeitgeber* 13, no. 3 (1923).
- Hermann, F.B.W. *Staatswirtschaftliche Untersuchungen*, 1st ed. Munich: Fleischmann, 1832.
- Heyn, Otto. *Die indische Währungsreform*. Berlin, 1903.
- . *Irrtümer auf dem Gebiete des Geldwesens*. Berlin, 1900.
- Hicks, John R. *A Market Theory of Money*. Oxford: Clarendon, 1989.
- . *Capital and Time: A Neo-Austrian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3.
- . "Léon Walras." *Econometrica* (October 1934).
- Hilferding, Rudolph. *Das Finanzkapital*. Berlin: Dietz, [1910] 1947.
- Hobhouse, Leonard T. *Liberalism*.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911.
- Holcombe, Randall G., ed. *15 Great Austrian Economists*.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99.
- Hollander, Paul. *Political Pilgrims*, 4th ed.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1998.
- Holzbauer, Georg. *Barzahlung und Zahlungsmittelversorgung in militärisch besetzten Gebieten*. Jena: Gustav Fischer, 1939.
- Hufeland, Gottlieb. *Neue Grundlegung der Staatswirtschaftskunst*. Giessen and Wetzlar: Tasche & Müller, 1807.
- Hoppe, Hans-Hermann. "Socialism: A Property or "Knowledge Problem?"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9, no. 1 (1996).
- Hoppe, Hans-Hermann, and Joseph T. Salerno. "Friedrich von Wieser und die moderne Österreichische Schule der Nationalökonomie." In *Friedrich von Wiesers. Vadecum zu einem Klassiker der Nationalökonomie*. Düsseldorf: Verlag Wirtschaft und Finanzen, 1999.
- Hörtlehner, Alexander. "Ludwig von Mises und die österreichische Handelskammerorganisation." *Wirtschaftspolitische Blätter* 28, no. 4 (1981).
- Huerta de Soto, Jesús. "New Light on the Prehistory of the Theory of Banking and the School of Salamanca."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9, no. 2 (1996).
- Huddleston, Sisley. *In My Time*. New York: Dutton & Co., 1938.
- . *Popular Diplomacy and War*. Rindge, N.H.: Richard Smith, 1954.
- . *War Unless*.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33.
- Hülsmann, Jörg Guido. "Knowledge, Judgment, and the Use of Property."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10, no. 1 (1997).
- . "Facts and Counterfactuals in Economic Law." *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 17, no. 1 (2003).

- Hume, David. "Of the First Principle of Government." *Essays, Moral and Political*, edited by Eugene F. Miller. Minneapolis: Liberty Fund, 1987.
- Hunold, Albert. "How Mises Changed My Mind." *The Mont Pèlerin Quarterly* 3, no. 3 (October 1961).
- Husserl, Edmund. *Logical Investigations*. Halle a.S.: Max Niemeyer, 1900.
- Ikeda, Yukihiro. *Die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r "Grundsätze" Carl Mengers*. St. Katharinen: Scripta Mercaturae Verlag, 1997.
- Inama-Sternegg, K.T. von. *Deut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4 vols.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879–1901.
- Jaffé, William. "Menger, Jevons and Walras De-Homogenized." *Economic Inquiry* 14 (December 1976).
- Jagschitz, Gerhard. *Die Jugend des Bundeskanzlers Dr. Engelbert Dollfuss*. University of Vienna. Doctoral dissertation, 1967.
- Jahn, Georg. "Freihandelslehre und Freihandelsbewegung."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4th ed. (1927). Vol. 5.
- Jevons, William Stanley.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Macmillan, 1888.
- Johnston, William M. *The Austrian Mi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 . *Vienna, Vienna—The Golden Age, 1815–1914*. Milan: Arnoldo Mondadori, 1981.
- Kamitz, Reinhard. "Die österreichische Geld- und Währungspolitik von 1848 bis 1948." In *Hundert Jahre österreichischer Wirtschaftsentwicklung, 1848–1948*, edited by Hans Mayer. Vienna: Springer, 1949.
- Kann, Robert A. *A Study in Austrian Intellectual History: From Later Baroque to Romanticism*. New York: Praeger, 1960.
- Katz, Howard S. "Ludwig von Mises Dies at Age 92." *Rip-Off Resistance* 1, no. 4 (December 1973).
- Kauder, Emil. *A History of Marginal Utility The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 Kautsky Karl. *Erinnerungen und Erörterungen*. The Hague: Mouton, 1960.
- Kelsen, Hans. *Das Problem der Souveränität und die Theorie des Völkerrechts*. Tübingen: Mohr, 1920.
- . *Der soziologische und der juristische Staatsbegriff*. Tübingen: Mohr, 1922.
- . *Die Staatslehre des Dante Alighieri*. Vienna: Deuticke, 1906.
- . *Hauptprobleme der Staatsrechtslehre*. Tübingen: Mohr, 1911.
- Keynes, John Maynard. *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 London: Macmillan, 1923.

- . *Collected Writings*. London: Macmillan, 1973. Vol. 7.
- .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Howe, 1920.
- . *The End of Laissez-Faire*. London: Hogarth Press, 1926.
- .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New York and London: Harcourt, Brace, 1936.
- . *Indian Currency and Finance*. London: Macmillan, 1913.
- . “Review of *Theorie des Geldes und der Umlaufsmittel*.” *Economic Journal* (September 1914).
- . *Treatise on Mone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0.
- Kink, Rudolf. *Geschichte der kaiserlichen Universität zu Wien*, 2 vols. Vienna: Gerold, 1854.
- Kirzner, Israel.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New York: Macmillan, 1986.
- . *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 . “Menger, Classical Liberalism, and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In *Carl Menger and His Legacy in Economics*, edited by Bruce Caldwell.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 “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 Lessons for Austrians.”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2 (1987).
- Klang, Marcel. *Die geistige Elite Österreichs*. Vienna: Barth, 1936.
- Klein, Peter G. “Why Academic Intellectuals Support Socialism.” Unpublished manuscript, presented at the New Zealand Business Roundtable. April 2003.
- Knapp, Georg F. *Die Bauernbefreiung und der Ursprung der Landarbeiter in den älteren Teilen Preussens*, 2 vols.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887.
- . *Staatliche Theorie des Geldes*, 1st ed. Leipzig, 1905. 2nd ed. Munich &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18.
- . *Die Landarbeiter in Knechtschaft und Freiheit*.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891.
- Knight, Frank. *Freedom and Reform*. New York: Harper, 1947.
- Kotarbinski, Tadeusz. “Considérations sur la théorie générale de la lutte.” *Z Zagadnien Ogólnej Teorii Walki*. Warsaw, 1938.
- Kouba, Karel. *Plan a trb za socialismu*. Prague: Economic Section of the Czechoslovak Academy of the Sciences, 1967.
- Krizek, Jurij. “Die Kriegswirtschaft und das Ende der Monarchie.” In *Die Auflösung des Habsburgerreiches*, edited by R.G. Plaschka and K. Mack. Munich: Oldenbourg, 1970.
- Krüger, Dieter. “Max Weber und die ‘Jüngeren’ im Verein für Socialpolitik.” In *Max Weber und seine Zeitgenossen*, edited by Wolfgang Mommsen and Wolfgang Schwentker, 98–136. Göttingen: Veröffentlichungen des Deutschen Historischen Instituts London, 1988.

- Kuehnelt-Leddihn, Erik von. *Liberty or Equality*. Caldwell, Idaho: Caxton Printers, 1952.
- Kuehnelt-Leddihn, Erik von.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Ludwig von Mises*.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99.
- . *Von Sarajevo nach Sarajevo*. Vienna: Karolinger, 1996.
- k.u.k. Armee. "Kriegsereignisse im Norden. Von der Mobilisierung bis einschliesslich der Schlacht bei Lemberg." *Österreichisch-ungarische Kriegsberichte aus Streffleurs Militärblatt*. Vienna: Seidel & Sohn, 1915.
- Kyn, Oldrich. "Vyzva marxisticke ekonomické teorii." *ekonomická revue* 7 (1967).
- Lambach, Walter. *Diktator Rathenau*. Hamburg: Deutschnationale Verlagsanstalt, 1918.
- Lampe, Adolf. *Allgemeine Webrwirtschaft*. Jena: Gustav Fischer, 1938.
- Landauer, Carl. *Planwirtschaft und Verkehrswirtschaft*.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31.
- . "Übersicht über die neuesten Publikationen Deutschlands und des Auslands."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121, no. 2 (1923).
- Lane, Rose Wilder. Book Review in *Economic Council Review of Books* 2, no. 10 (November 1945).
- Lange, Oskar. "The Computer and the Marke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 no. 1 (October 1936).
- .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 no. 1 (October 1936).
- .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edited by B.E. Lippincott. New York: McGraw-Hill, 1964.
- . *Price Flexibility and Employment*. Bloomington, Ind.: Principia Press, 1944.
- Lauterbach, Albert. Book Review in *Der Holzarbeiter* 40, no. 4 (February 18, 1932).
- Law, John. *Money and Trade Considered with a Proposal for Supplying the Nation with Money*. Edinburgh: Anderson, 1705.
- Lederer, Emil. "Der technische Fortschritt." *Arbeiter-Zeitung* (September 4, 1927).
- . *Technischer Fortschritt und Arbeitslosigkeit*. Tübingen: Mohr, 1931.
- . "Verhandlungen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in Regensburg 1919." *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159 (1920).
- Lerner, Abba P. Lerner. "Economic Theory and Socialist Econom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 (1934).
- Leser, Norbert. "Otto Bauer—Friedrich Adler—Max Adler." *Tausend Jahre Österreich*, edited by Walter Pollack. Vienna: Verlag Jugend und Volk, 1974. Vol. 3.
- Lévi-Strauss, Claude. *Race et Histoire*. Paris: UNESCO, 1952.

- Levy, S. Le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4, no. 2 (June 1944).
- . *Nassau W. Senior: The Prophet of Modern Capitalism*. Boston: Bruce Humphries, 1943.
- Lexis, Wilhelm. “Die Knappsche Geldtheorie.”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3rd series, 32 (1906).
- . “Eine neue Geldtheorie.”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Sozialpolitik* 5 (1906).
- . “Papiergeld.”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Jena: Gustav Fischer, 1893; 2nd ed., 1901, 3rd ed., 1910.
- Liefmann, Robert. *Allgemeine Volkswirtschaftslehre*. Leipzig: Teubner, 1924.
- . *Kartelle und Trusts*. Stuttgart: Moritz, 1924.
- Lindenlaub, Dieter. “Richtungskämpfe im 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Beiheft no. 52 (1967). Reprinted as *Richtungskämpfe im 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 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im Kaiserreich vornehmlich vom Beginn des “Neuen Kurses” bis zum Ausbruch des ersten Weltkrieges, 1890–1914*. Wiesbaden: Steiner, 1967.
- Lippincott, Benjamin E. “Introduction.” In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edited by B.E. Lippincott. New York: McGraw-Hill, 1964.
- Lippmann, Walter.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Good Society*.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37.
- . *La Cité Libre*. Paris: Librairie de Médecis, 1938.
- Locke, John. “Some Considerations of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Lowering of Interest and Raising the Value of Money.” In *Locke on Money*, edited by Patrick Hyde Kell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Vol. 1.
- Lotz, Johann F.E. *Revision der Grund-Begriffe der National-Wirtschaftslehre*. Koburg and Leipzig: Sinner, 1811. Vol. 1.
- Mach, Ernst. “Über Gedankenexperimente.” Reprinted in Mach, *Erkenntnis und Irrtum*, 1897. Reprint, 5th ed. Vienna, 1926. Reprint,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91.
- Machlup, Fritz. *Börsenkredit, Industriekredit und Kapitalbildung*. Vienna: Springer, 1931.
- . *Der Golddevisenstandard*. Halberstadt, 1925.
- . *Führer durch die Krisenpolitik*. Vienna: Springer, 1934.
- . “Ludwig von Mises: The Academic Scholar Who Would Not Compromise.” *Wirtschaftspolitische Blätter* 28, no. 4 (1981).
- Machovec, Frank. *Perfect Competi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s*. London: Routledge, 1995.
- Macleod, Henry D. *Theory and Practice of Banking*. 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55. Vol. 1.
- Mannheim, Karl. *Ideologie und Utopie*. Bonn: Cohen, 1929.

- Mantoux, Etienne. *The Carthaginian Peace or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r. Keyn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 Marchi, Neil de. "League of Nations Economists and the Ideal of Peaceful Change in the Decade of the 'Thirties.'" In *Economics and National Security*, edited by C.D. Goodwi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Martin, Xavier. *L'homme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sa compagne*. Bouère: Dominique Martin Morin, 2001.
- Marshall, Alfred. "The Mecca of the economist lies in economic biology rather than in economic dynamics." In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An Introductory Volume*, 8th ed. London: Macmillan, 1920.
- .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An Introductory Volume*. London: Macmillan, 1891.
- März, Eduard. *Joseph Alois Schumpeter—Forscher, Lehrer und Politiker*. Vienna: Verlag für Geschichte und Politik, 1983.
- . "Die Bauer—Mises-Schumpeter-Kontroverse." *Wirtschaftspolitische Blätter* 28, no. 4 (1981).
- Mautner, Manfred, and Franz Nemschak. *Zum 25 Jährigen Bestand des Österreichischen Institutes für Wirtschaftsforschung*. Vienna: Österreichisches Institut für Wirtschaftsforschung, 1952.
- Mayer, Hans. "Friedrich Freiherr von Wieser." *Neue Österreichische Biographie*. Vienna, 1929. Vol. 6.
- McCulloch, John Ramsay.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864] 1965.
- Meinl, Julius. *Zwang oder Freiheit?* Vienna: Manz, 1918.
- Menger, Carl. *Die Irrtümer des Historismus in der deutschen Nationalökonomie*. Vienna: Alfred Hölder, 1884.
- . "Geld."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1st to 3rd eds. Jena: Gustav Fischer, 1891–1909.
- . *Gesammelte Werke*, edited by F.A. Hayek. Tübingen: Mohr, 1968.
- . *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Vienna: Braumüller, 1871.
- . "Grundzüge einer Klassifikation der Wirtschaftswissenschaften."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n.s. 19 (1889).
- .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6] 1981.
- .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Method of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Particular*.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5.
- .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Methode der Socialwissenschaften und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insbesondere*.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883. Translated as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Method of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Particular*.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5.
- .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Zeitschrift für das Privat- und öffentliche Recht der Gegenwart* 14 (1887).
- Menger, Karl. "X. Beginn der akademischen Laufbahn." Carl Menger Papers, Duke University, Box 21.

- Métall, Rudolf Aladár. *Hans Kelsen*. Vienna: Verlag Franz Deuticke, 1968.
- Meyerson, Émile. *De l'explication dans les sciences*. Paris: Fayot, 1927.
- Mildschuh, W. "Geschichtliche Entwicklung der Geldtheorie."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4 (1927).
- Mill, John Stuart.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1891.
- Milford, Karl. "Hufeland als Vorläufer von Menger und Hayek." In *Wert, Meinung, Bedeutung: Die Tradition der subjektiven Wertlehre in der deutschen Nationalökonomie vor Menger*, edited by Birger Priddat. Marburg: Metro-
polis, 1997.
- Mises, Adele von. "A Day in the House of My Parents." *Tante Adele erzählt*. Unpublished manuscript, 1929.
- Mises Archive. Mises files in the Special Archive for Historico-Documentary Collections. Moscow.
- Mises, Ludwig von. *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 Translated by Hans Sennholz. New York: Arlington House, 1977.
- .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 Princeton, N.J.: Van Nostrand, 1956.
- . "Antimarxismus."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21 (1925). Reprinted in Mises, *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Jena: Gustav Fischer, 1929. Reprint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76. Translated as "Anti-Marxism." In *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 Translated by Hans Sennholz. New York: Arlington House, 1977.
- . "Austrian Empire. Finance and Banking."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2th ed. (1921). Vol. 30.
- . *Bureaucrac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4.
- . "Das Ende des Laissez-Faire, Ideen zur Verbindung von Privat- und Gemeinwirtschaft" (The end of laissez-faire: ideas for combining the private and public economy).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82 (1927).
- . "Das festangelegte Kapital." *Economische Opstellen: Aangeboden aan Prof. C.A. Verriijn Stuart*. Haarlem: De Erven F. Bohn N.V., 1931.
- . "Das Problem gesetzlicher Aufnahme der Barzahlungen in Oesterreich-Ungarn." *Jahrbuch fuer Gesetzgebung, Verwaltung und Volkswirtschaft (Schmollers Jahrbuch)* 33, no. 3 (1909).
- . "Der 'kleine Finanzplan' des Abgeordneten Steinwender." *Neue Freie Presse* (December 5, 1912).
- . "Der Weg der österreichischen Finanzpolitik." *Wirtschaftliche Nachrichten* 18, no. 1 (January 10, 1935).
- . "Der Wiedereintritt Deutsch-Österreichs in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ie Währungsfrage." In *Wirtschaftliche Verhältnisse Deutsch-Österreichs*, edited by Michael Hainisch. *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158.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19.
- . "Die Abstempelung der Kronennoten im jugoslawischen Staate." *Neue Freie Presse* (January 14, 1919).

- . “Die allgemeine Teuerung im Lichte der theoretischen Nationalökonomie.”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Sozialpolitik* 37 (1912).
- . “Die Entwicklung des gutsherrlich-bäuerlichen Verhältnisses in Galizien (1772–1848).” E. Bernatzik and E. von Philippovich, eds. *Wiener staatswissenschaftliche Studie* 4, no. 2 Vienna & Leipzig: Deuticke, 1902.
- . “Die geldtheoretische Seite des Stabilisierungsproblems.” *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164, no. 2. Munich: Duncker & Humblot, 1923. Translated as “Stabilization of the Monetary Unit—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ory.” In *On the Manipulation of Money and Credit*, translated by Percy L. Greaves. New York: Free Market Books, 1978. Reprinted in *The Causes of the Economic Crises*.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06.
- . *Die Gemeinwirtschaft*. Jena: Gustav Fischer, 1922; 2nd ed. 1932.
- . “Die Goldwährung,” *Neues Wiener Tagblatt* (April 12, 1925).
- . “Die Goldwährung und ihre Gegner.” *Neue Freie Presse* (December 25 and 30, 1931).
- . “Die Lehre vom Gelde.” *Forschungen und Fortschritte*. Berlin, February 1928.
- . “Die neue Regierungsvorlage zur Abänderung des Personalsteuergesetzes.” *Neue Freie Presse* (October 10, 1911).
- . “Die Stellung des Geldes im Kreise der wirtschaftlichen Güter.” In *Die Wirtschaftstheorie der Gegenwart*, edited by Hans Mayer. Vienna: Springer, 1932. Vol. 2. Translated as “The Role of Money in the Realm of Economic Goods.” In *Money, Method, and the Market Process: Essays by Ludwig von Mises*, edited by Richard Ebeling. Boston: Kluwer, 1990.
- . “Die wirtschaftspolitischen Motive der österreichischen Valutaregulierung.” *Zeit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Sozialpolitik und Verwaltung* 16 (1907).
- . “Economic Freedom in the Present World.” In *Economic Freedom and Interventionism: An Anthology of Articles and Essays*. Irvington-on-Hudson, N.Y.: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1990. Chap. 47.
- . “Ein Wort zum Monopolpreisproblem.” In *Vom Sinn der Konzentration*, edited by Peter Muthesius. Frankfurt: Knapp, 1965.
- . *El Establecimiento Histórico de la Escuela Austriaca de Economía*. Colección Investigaciones No. 43. La Plata: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la Plata, 1962.
- .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 Translated by George Reisman. Princeton, N.J.: Van Nostrand, 1960. 3rd. ed.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First German edition, 1933.
- . “The Equations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and the Problem of Economic Calculation in a Socialist State.”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3, no. 1 (2000). Translation by Vera Smith for *Economica*, but not published. Original German version never published. French translation by Gaston Leduc in *Revue d'économie politique* 97, no. 6 (1938).
- . “Eugen von Böhm-Bawerk and the Discriminating Reader.” *The Freeman* (August 1959).

- . “Eugen von Philippovich.” *Neue Österreichische Biographie*. Vienna, 1926. Vol. 3.
- . “Finanzreform und Vermögensabgabe.” *Neues Wiener Tagblatt* (January 23, 1918).
- . “The Foreign Exchange Policy of the Austro-Hungarian Bank.” *Economic Journal* 19 (June 1909).
- . *The Free and Prosperous Commonwealth*, translated by Ralph Raico. Princeton, N.J.: Van Nostrand, 1962. The title of the book was changed in subsequent editions to *Liberalism: A Socio-Economic Exposition*. Kansas City, Kansas: Sheed Andrews and McMeel, 1978.
- . *Geldwertstabilisierung und Konjunkturpolitik*. Jena: Gustav Fischer, 1928.
- . *Grundprobleme der Nationalökonomie: Untersuchungen über Verfahren, Aufgaben und Inhalt der Wirtschafts- und Gesellschaftslehre*. Jena: Gustav Fischer, 1933. Translated by George Reisman as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 Princeton, N.J.: Van Nostrand, 1960.
- . *The Historical Setting of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69] 1984.
- .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9; 2nd ed.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3; 3rd ed. Chicago: Regnery, 1966. Scholar's edition.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98.
- . “Interventionismus.”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Sozialpolitik* 56 (1926). Reprinted in *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Translated as “Interventionism,” in *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 Translated by Hans Sennholz. New York: Arlington House, 1977.
- . *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Jena: Gustav Fischer, 1929. Reprint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76.
- . “La Réforme financière en Autriche.” *Revue Économique Internationale* 7, no. 4 (October 1910).
- . *Liberalism: In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Translated by Ralph Raico. Irvington-on-Hudson, N.Y.: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1927] 1985.
- . *Liberalismus*. Jena: Gustav Fischer, 1927. Reprint Sankt Augustin: Academia Verlag, 1993.
- . “Lord Keynes and Say's Law.” In *The Critics of Keynesian Economics*, edited by Henry Hazlitt. Irvington-on-Hudson, N.Y.: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1995. First published in *The Freeman* (October 1950).
- . “Markt.” *Handwörterbuch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Stuttgart: Gustav Fischer, 1959.
- . *Money, Method, and the Market Process: Essays by Ludwig von Mises*, edited by Richard Ebeling. Boston: Kluwer, 1990.
- . “Monopoly Prices.”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1, no. 2 (1998).
- . *Nationalökonomie*. Geneva: Editions Union, 1940.

- .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Vienna: Manz, 1919. Translated by Leland B. Yeager as *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3.
- . “Neue Beiträge zum Problem der sozialistischen Wirtschaftsrechnung.”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51 (December 1923).
- . “Neue Literatur über Geld- und Bankwesen.” *Zeit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Sozialpolitik und Verwaltung* 19 (1910).
- . “Neuere Schriften über Geld- und Bankwesen.” *Zeit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Sozialpolitik und Verwaltung* 17 (1908).
- . *Notes and Recollections*. Spring Mills, Penn.: Libertarian Press, 1978.
- . “Observations on the Russian Reform Movement.” *The Freeman* 16, no. 5 (May 1966).
- . *Omnipotent Government: The Rise of the Total State and Total War*.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4. Reprint, Spring Mills, Penn.: Libertarian Press, 1985.
- . *Planning for Freedom and Sixteen Other Essays and Addresses*, 4th ed. South Holland, Ill.: Libertarian Press, [1952] 1980.
- . “Preface.” In A.S.J. Baster, *Le crépuscule du capitalisme américain—étude économique du New Deal*. Paris: Librairie de Médicis, 1937.
- . “Preistaxen. I. Theorie.”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4th ed. Jena: Gustav Fischer, 1925. Vol. 4. Reprinted as “Theorie der Preistaxen,” *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Jena: Gustav Fischer, 1929. Reprint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76. Translated by Hans Sennholz as “Theory of Price Controls.” In *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 New York: Arlington House, 1977.
- . “Republic of Austria. Banking and Financ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2th ed. [1921]. Vol. 30.
- . *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London: Jonathan Cape, 1936. Reprinted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1.
- . “Soziologie und Geschichte.”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61, no. 3 (1929). Reprinted in Mises, *Grundprobleme der Nationalökonomie*. Jena: Gustav Fischer, 1933. Chap. 2. Translated as “Sociology and History.” In Mises,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 3rd ed.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03. Chap. 2.
- . “Stones into Bread, The Keynesian Miracle.” *The Critics of Keynesian Economics*, edited by Henry Hazlitt, 2nd ed. Irvington-on-Hudson, N.Y.: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1995. First published in *Plain Talk* (March 1948).
- . “Super-National Organization Held No Way to Peace: Radical Change in Political Mentalities and Social and Economic Ideologies Viewed as Necessary in Order to Eradicate Economic Nationalism.” Letter to the Editor.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 1943).

- . *Theorie des Geldes und der Umlaufsmittel*, 1st ed. Munich and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12. 2nd ed. Munich and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24.
- . *Theory and History: An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Evolutio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 .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London: Jonathan Cape, 1912 and 1934. Reprinted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1980.
- . *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Irvington-on-Hudson, N.Y.: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1962] 2002.
- . “Sozialliberalismus.”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81 (1926). Reprinted in Mises, *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Jena: Gustav Fischer, 1929. Reprint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76. Translated as “Social Liberalism.” In *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 Translated by Hans Sennholz. New York: Arlington House, 1977.
- . “Vom Ziel der Handelspolitik.”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42, no. 2 (1916).
- . “Zum Problem gesetzlicher Aufnahme der Barzahlungen in Österreich-Ungarn: Ein Schlusswort gegenüber Walther Federn.” In *Jahrbuch fuer Gesetzgebung, Verwaltung und Volkswirtschaft (Schmollers Jahrbuch)* 34 (1910).
- . “Zur Geschichte der österreichischen Fabrikgesetzgebung.” *Zeit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Socialpolitik und Verwaltung* 14 (1905).
- . “Zur Klassifikation der Geldtheorie”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monetary theories).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44 (1917/1918).
- Mises, Ludwig von, and Arthur Spiethoff, eds. *Probleme der Wertlehre*. 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183/I. Munich and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31.
- , eds. *Probleme der Wertlehre*. 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183/II. Munich and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33.
- Mises, Ludwig von, Edmund Palla, and Engelbert Dollfuss. *Bericht über die Ursachen der wirtschaftlichen Schwierigkeiten Österreichs*. Vienna: Staatsdruckerei, 1930.
- Mises, Margit von. *My Years with Ludwig von Mises*. Cedar Falls, Iowa: Center for Futures Education, 1978.
- Mises, Richard von. *Elemente der technischen Hydromechanik*. Leipzig: B.G. Teubner, 1914.
- . *Kleines Lehrbuch des Positivismus: Einführung in die empiristische Wissenschaftsauffassung*. The Hague: Van Stockum & Zoon, 1939.
- Mitchell, Allan. *Revolution in Bavaria, 1918–1919: The Eisner Regime and the Soviet Republic*.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 Monroe, Arthur E. *Monetary Theory before Adam Smith*.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23] 1966.
- Montesquieu. *Oeuvres completes*. Paris: Gallimard / Pléiade, 1996. Vol. 1.

- Morgenstern, Oscar. *Grenzen der Wirtschaftspolitik*. Vienna: Springer, 1934.
- Müller-Armack, Alfred. *Entwicklungsgesetze des Kapitalismus*. Berlin: Juncker & Dünhaupt, 1932.
- Nash, George H.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 Since 1945*.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 Nau, Heino Heinrich. "Zwei Ökonomien.' Die Vorgeschichte des Werturteilsstreit in der deutschsprachigen Ökonomik." In *Der Werturteilsstreit. Die Äusserungen zur Werturteilsdiskussion im Ausschuss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1913)*, edited by Nau. Marburg: Metropolis, 1996.
- Neudeck, Werner. "Der Einfluss von Ludwig von Mises auf die Österreichische akademische Tradition gestern und heute." *Wirtschaftspolitische Blätter* 28, no. 4 (1981).
- Neupauer, Josef von. *Die Schäden und Gefahren der Valutaregulierung für die Volkswirtschaft und die Kriegsbereitschaft*. Vienna: Lesk & Schwidernoch, 1892.
- Neurath, Otto. *Bayrische Sozialisierungserfabrungen*. Vienna: Neue Erde, 1920.
- . *Die Sozialisierung Sachsens*. Chemnitz: Verlag des Arbeiter- und Soldatenrates, 1919.
- . *Durch die Kriegswirtschaft zur Naturalwirtschaft*. Munich: Callwey, 1919.
- . "Gesetzliche Barzahlungen und Kriegsfall." In *Jahrbuch fuer Gesetzgebung, Verwaltung und Volkswirtschaft (Schmollers Jahrbuch)* 34 (1910).
- . "Vollsozialisierung: Von der nächsten und übernächsten Zukunft." *Deutsche Gemeinwirtschaft* 15 (1920).
- Neurath, Otto, and Wolfgang Schuhmann. *Können wir heute sozialisieren? Eine Darstellung der sozialistischen Lebensordnung und ihres Werdens*. Leipzig: Klinkhardt, 1919.
- Nock, Albert J. Nock. *Our Enemy, The State*. Caldwell, Idaho: Caxton Printers, 1935.
- Nove, Alec. "The Liberman Proposals." *Journal of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47 (April 1963).
- Nurkse, Ragnar. *Internationale Kapitalbewegungen*. Vienna: Springer, 1935.
- Oberndorfer, Johann A. *System der Nationalökonomie*. Landshut: Krüll, 1822.
- O'Brien, Denis, P. *Lionel Robbins*. London: Macmillan, 1988.
- . "Lionel Robbins and the Austrian Connection." In *Carl Menger and His Legacy in Economics*, edited by Bruce Caldwell.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Oppenheim, Heinrich Bernard. *Der Katheder-Sozialismus*. Berlin: Oppenheim, 1872.
- Oppenheimer, Franz. *Theorie der reinen und politischen Ökonomie*, 2nd ed. Berlin: Reimer, 1911.

- Oresme, Nicholas. "A Treatise on the Origin, Nature, Law, and Alterations of Money." In *The De Moneta of Nicholas Oresme and English Mint Documents*, edited by Charles Johnson. London: Nelson & Sons, 1956.
- Ö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Österreichisches biographisches Lexikon, 1815–1950*. Vienna: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75. Vol. 6.
- Palyi, Melchior. *Der Streit um die Staatliche Theorie des Geldes*. Munich: Duncker & Humblot, 1922.
- Pareto, Vilfredo.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Geneva: Droz, [1986], 1964. Vol. 2
- . *Manuel d'économie politique*, 4th ed. Geneva: Droz, [1909] 1966.
- .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Kelley, 1971.
- Patinkin, Don. *Money, Interest, and Prices: An Integration of Monetary and Value Theory*. Evanston, Ill.: Row, Peterson, and Co., 1956.
- Paupié, Kurt. *Handbuch der österreichischen Pressegeschichte 1848–1959*. Vienna: Braumüller, 1960. Vol. 1.
- Peart, Sandra J. "Jevons and Menger Re-Homogenized?"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57, no. 3 (1998).
- Pesch, Heinrich. *Lehrbuch der Nationalökonomie* 5. Freiburg i.Br.: Herder, 1923.
- Philippovich, Eugen von, ed. "Auswanderung und Auswanderungspolitik." *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Socialpolitik* 52 (1892).
- . *Die Bank von England im Dienste der Finanzverwaltung des Staates*. Vienna: Deuticke, 1885. Translated as *History of the Bank of England and Its Financial Services to the State*.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1.
- . *Die Entwicklung der wirtschaftspolitischen Ideen im 19. Jahrhundert*. Tübingen: Mohr, 1910.
- . *Grundriss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Outline of political economy), 3 vols., 9th ed. Tübingen: Mohr, 1911.
- Pierson, Nicolas. "The Problem of Value in the Socialist Community."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Critical Studies on the Possibilities of Socialism*, edited by F.A. Hayek.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35.
- Pigou, A.C. *Industrial Fluctua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27.
- Pogonowski, Cyprian. *Jews in Poland: A Documentary History*. New York: Hippocrene Books, 1993.
- Pohle, Ludwig. *Die gegenwärtige Krisis in der deutschen Volkswirtschaftslehre*. Leipzig: Deichert, 1911.
- Popper, Karl.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London: Routledge, 1945.
- Possony, Stefan. *Die Webrwirtschaft des totalen Krieges*. Vienna: Gerold, 1938.
- Pribram, Alfred. *Die Entstehung der individualistischen Sozialphilosophie*. Leipzig: Hirschfeld, 1912.

- Pribram, Karl. *Die Grundgedanken der Wirtschaftspolitik der Zukunft*. Graz: Leuschner & Lubensky, 1918.
- . *Der Lohnschutz des gewerblichen Arbeiters nach österreichischem Recht*. Vienna: Deuticke, 1904.
- Raico, Ralph. *Die Partei der Freiheit*. Stuttgart: Lucius & Lucius, 1999.
- . “The Legacy of Ludwig von Mises.” *The Libertarian Review* (September 1981).
- Raimondo, Justin. *An Enemy of the State: The Life of Murray N. Rothbard*.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2000.
- Rand, Ayn. *Atlas Shrugged*.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7.
- . *Capitalism: The Unknown Ideal*. New York: Penguin, 1967.
- Rappard, William. *Die Bundesverfassung der Schweizer Eidgenossenschaft, 1848–1948—Vorgeschichte, Ausarbeitung, Weiterentwicklung*. Zurich: Polygraphischer Verlag, 1948.
- Rathenau, Walther. *Autonome Wirtschaft*. Jena: Diederichs, 1919.
- . *Der neue Staat*. Berlin: Gustav Fischer, 1919.
- . *Deutschlands Rohstoffversorgung*. Berlin: Gustav Fischer, 1916.
- . *Die neue Gesellschaft*. Berlin: Gustav Fischer, 1919.
- . *Die neue Wirtschaft*. Berlin: Gustav Fischer, 1918.
- . *Probleme der Friedenswirtschaft*. Berlin: Gustav Fischer, 1917.
- . *Von kommenden Dingen*. Berlin: Gustav Fischer, 1917.
- . *Zur Kritik der Zeit*. Berlin: Gustav Fischer, 1912.
- Rau, Karl Heinrich. *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7th ed. Leipzig and Heidelberg, 1863.
- Reisch, Richard. “Das Kreditproblem der Volkswirtschaft.” *Zeitschrift für Nationalökonomie* 3, no. 1 (1932).
- Riedl, Richard. *Die Aufgaben der Übergangswirtschaft*. Vienna: Veröffentlichungen des Generalkommissariates für die Kriegs- und Übergangswirtschaft No. 1, 1917.
- Renner, Karl. *Staat und Nation*. Vienna: Dietl, 1899.
- Ricardo, David. “Proposals for an Economical and Secure Currency.” In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edited by Piero Sraff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1973. Vol. 4.
- Rigg, Bryan Mark. *Hitler's Jewish Soldiers*. Lawrence: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2004.
- Robbins, Lionel. *Autobiography of an Economist*. London: Macmillan, 1971.
- . *The Great Depression*. London: Macmillan 1934.
- .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lanning*. London: Macmillan, 1937.
- .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 London: Macmillan, 1932.
- Rockwell, Llewellyn H., Jr., ed. “Heart of a Fighter.” *The Free Market* 23, no. 7 (2005).

- , ed. *Murray N. Rothbard: In Memoriam*.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95.
- Rodakiewicz, August. *Die galizischen Bauern unter der polnischen Republik: eine agrarpolitische Untersuchung*. Brünn: Rohrer, 1902.
- . Book Review in *Zeit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Sozialpolitik und Verwaltung* 11 (1902).
- Roover, Raymond de. *Business, Banking, and Economic Thought in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 Röpke, Wilhelm. *Die Konjunktur*. Jena: Gustav Fischer, 1922.
- . “Einführung.” In Walter Lippmann, *Die Gesellschaft freier Menschen*. Bern: Francke, 1937.
- . “Homage to a Master and a Friend.” *The Mont Pèlerin Quarterly* (October 1961).
- . *Krise und Konjunktur*. Leipzig: Quelle & Meyer, 1932.
- . “Review of Mises’s *Ursachen der Wirtschaftskrise*.” *Zeitschrift für Nationalökonomie* 4, no. 2 (1932).
- Roscher, Wilhelm. *Geschichte der National-Oekonomie in Deutschland*, 1st ed. Munich: Oldenbourg, 1874.
- Röskau-Rydel, Isabel. “Galizien, Bukowina, Moldau.” In Röskau-Rydel, *Deutsche Geschichte im Osten Europas: Galizien, Bukowina, Moldau*. Berlin: Siedler, 1999.
- Rosenberg, Wilhelm. *Valutafragen*, 2nd ed. Vienna: Manz, 1918.
- Rothbard, Murray N. *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 5th ed.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00.
- . *Classical Economics: An Austrian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1995.
- . *Economic Thought before Adam Smith*.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1995.
- . *The Ethics of Liberty*, 2nd ed.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8.
- . *For a New Liberty*, 2nd ed. San Francisco: Fox & Wilkes, 1978.
- . *Man, Economy, and State*, 3rd ed.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93.
- . *Man, Economy, and State with Power and Market*. Scholar’s edition.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03.
- . *Power and Market*. Princeton, N.J.: D. Van Nostrand, 1970.
- . “Praxeology.” *analysis* (May 1950).
- . “Review of *Human Action*.” *Faith and Freedom* (September 1950).
- . *Ludwig von Mises: Scholar, Creator, Hero*.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88.
- . *The Sociology of the Ayn Rand Cult*. Port Townsend, Wash.: Liberty Publishing, 1987.

- . “Toward a Reconstruction of Welfare and Utility Economics.” In *On Freedom and Free Enterprise: Essays in Honor of Ludwig von Mises*, edited by Mary Sennholz. New Haven, Conn.: Van Nostrand, 1956.
- Rothschild, Kurt. “Carl Menger.” In *Tausend Jahre Österreich*, edited by Walter Pollack. Vienna: Verlag Jugend und Volk, 1974. Vol. 3.
- Rougier, Louis. “Le Néo-libéralisme.” *Synthèses* (December 1958).
- . *Les mystiques politiques contemporaines et leurs incidences internationales*. Paris: Recueil Sirey, 1935.
- . “Préface.” In *Le Colloque Walter Lippmann*. Paris: Librairie de Médecis, 1938.
- Rueff, Jacques. “L’assurance chômage cause du chômage permanent.” *Revue politique et parlementaire* (December 10, 1925).
- Russell, Bertrand. *Religion and Sci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1997.
- Salerno, Joseph T. “Friedrich von Wieser and F.A. Hayek: The General Equilibrium Tradition in Austrian Economics.” *Journal des Economistes et des Etudes Humaines* 12, no. 2&3 (2002).
- . “Ludwig von Mises as a Social Rationalist.”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4 (1990).
- . “Mises and Hayek Dehomogenized.”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6, no. 2 (1993).
- . “The Place of *Human Ac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conomic Thought.”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2, no. 1 (1999).
- Samuelson, Paul. *Econom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48.
- Schell, Josef. *Gerechtigkeitsidee und Mietengesetzgebung*. Vienna: Manz, 1927.
- Schiff, Erich. *Kapitalbildung und Kapitalaufzehrung im Konjunkturverlauf*. Vienna: Springer, 1933.
- Schirmacher, Wolfgang, ed. *German Essays on Science in the 19th Century*. New York: Continuum, 1996.
- Schmitt, Carl. *Politische Theologie*.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22.
- . *Römischer Katholizismus und politische Form*.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23.
- Schmoller, Gustav. “Die Gerechtigkeit in der Volkswirtschaft.” *Schmollers Jahrbuch* 5 (1881).
- . “Einladung zur Eisenacher Versammlung von 1872.” In Franz Boese, *Geschichte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1872–1932*.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39.
- . “Eröffnungsrede zum 25 jährigen Bestehen des Vereins auf der Kölner Tagung von 1897.” In Franz Boese, *Geschichte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1872–1932*.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39.

- . *Grundriss der allgemeinen Volkswirtschaftslehre*.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00.
- . “Volkswirtschaft, Volkswirtschaftslehre und -methode.”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3rd ed. Jena: Gustav Fischer, 1911. Vol. 8.
- . “Zur Methodologie der Staats und Sozial-Wissenschaften.” *Schmollers Jahrbuch* n.s. 7, no. 3, (1883).
- . *Zur Social- und Gewerbepolitik der Gegenwart*.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890.
- Schönfeld-Illy, Leo. *Wirtschaftsrechnung*. Reprint, Munich: Philosophia, 1924.
- Schorkse, Carl E. *Fin-de-siècle Vienna*. New York: Knopf, 1980.
- Schroeder, Werner. “Bestandsaufbau durch Plünderung—Jüdische Bibliotheken im RSHA 1936–1945.” Paper presented at an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Raub und Restitution in Bibliotheken* (Vienna City Hall, April 23–24, 2003).
- Schubert, Aurel. *The Credit-Anstalt Crisis of 193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Schüller, Richard. *Die klassische Nationalökonomie und ihre Gegner*. Berlin: Heymanns, 1895.
- Schullern-Schrattenhofen, H. “Eugen Ritter von Böhm-Bawerk.” In *Die Universität Innsbruck*, edited by Adolf Günther. Innsbruck: Tyrolia, 1928.
- Schumpeter, Joseph A.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42.
- . *A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 . “Das Sozialprodukt und die Rechenpfennige: Glossen und Beiträge zur Geldtheorie von heute.”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Sozialpolitik* 44 (1917–1918).
- . “Eugen von Böhm-Bawerk.” *Neue Österreichische Biographie*. Vienna, 1925. Vol. 2.
- . “Sozialistische Möglichkeiten von heute.”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Sozialpolitik* 48, no. 2 (1921).
- . *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Munich: Duncker & Humblot, 1911.
- . “Über die mathematische Methode der theoretischen Ökonomie.” *Zeit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Sozialpolitik und Verwaltung* 15 (1906).
- . *Wesen und Hauptinhalt der theoretischen Nationalökonomie*. Munich and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08.
- Seipel, Ignaz. “Minoritätenschutz und Judenfrage nach dem christlichsozialen Programm.” *Völkswohl* 10, no. 2 (February 1919).
- Seligman, Edwin.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1905.
- Sennholz, Mary. *Leonard E. Read: Philosopher of Freedom*. Irvington-on-Hudson, N.Y.: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1993.
- Shahak, Israel. *Jewish History, Jewish Religion: Hitler's Jewish Soldiers: The Untold Story of Nazi Racial Laws and Men of Jewish Descent in the German Military*. London: Pluto Press, 1994.

- Shepherd, Colston. *The Airforce of Today*. London & Glasgow: Blackie & Son, 1939.
- Sherrard, Alfred. "The Free Man's Straightjacket." *New Republic* 122 (January 9, 1950).
- Sieghart, Rudolf. *Die letzten Jahrzehnte einer Grossmacht*. Berlin: Ullstein, 1932.
- Simmel, Georg. *Philosophie des Geldes*. Frankfurt a.M.: Suhrkamp, [1901] 1991.
- Simonin, Jean-Pascal, and François Vatin. *L'oeuvre multiple de Jules Dupuit (1804-1866): Calcul d'ingénieur, analyse économique et pensée sociale*. Angers: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Angers, 2002.
- Simons, Henry C. *A Positive Program for Laissez-Faire. Some Proposals for a Liberal Economic Policy*. Public Policy Pamphlet No. 15.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4.
- . *Economic Policy for a Free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 Singer, Kurt. Book review in *Deutsche Wirtschaftszeitung* (June 1, 1913).
- Skocpol, Theda. "Delivering for Young Families: The Resonance of the GI Bill." *American Prospect* 28 (September 1996).
- Slutsky, Eugen. "Ein Beitrag zur formal-praxeologischen Grundlegung der Ökonomik." *Annales de la classe des sciences sociales-économiques*. Kiev: Académie Oukraïenne des Sciences, 1926.
- Smith, Barry. "Aristotle, Menger, Mises: An Essay in the Metaphysics of Economics." In *Carl Menger and His Legacy in Economics*, edited by Bruce J. Caldwell.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 "Austrian Economics and Austrian Philosophy." In *Austrian Economics: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Background*, edited by Wolfgang Grassl and Barry Smith. London: Croom Helm, 1986.
- Sombart, Werner. *Der proletarische Sozialismus ("Marxismus")*, 10th ed. 2 Vols. Jena: Gustav Fischer, 1924.
- Somary, Felix. *The Raven of Zurich: The Memoirs of Felix Somary*. London: Hurst & Co., 1960.
- Sommer, Louise. "Für die freie Verkehrswirtschaft! (Die Dresdner Tagung des Vereines für Sozialpolitik)." *Wiener Wirtschafts-Woche* (October 12, 1932).
- Sozialisierungskommission. *Vorläufiger Bericht über die Frage der Sozialisierung des Kohlenbergbaues*. Berlin, February 15, 1919.
- Spann, Othmar. *Der Wahre Staat*. Leipzig: Quelle & Meyer, 1921.
- . *Vom Geist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Jena: Gustav Fischer, 1919. Reprint, appendix to *Fundament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3rd ed. Jena: Gustav Fischer, 1923.
- Spiethoff, Arthur. "Krisen."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4th ed. Jena: Gustav Fischer, 1925. Vol. 6.
- Springer, Rudolf. *Das Selbstbestimmungsrecht der Nationen: in besonderer Anwendung auf Oesterreich*. Leipzig: Deuticke, 1918.

- . *Grundlagen und Entwicklungsziele der Österreichisch-Ungarischen Monarchie*. Leipzig: Deuticke, 1906.
- . *Die Krise des Dualismus und das Ende der Déakistischen Episode in der Geschichte der Habsburgischen Monarchie: eine politische Skizze*. Vienna: published by the author, 1904.
- Staatsarchiv. Vienna, Austria.
- Stadler, Karl R. "Victor Adler." *Tausend Jahre Österreich*, edited by Walter Pollack. Vienna: Verlag Jugend und Volk, 1974. Vol. 3.
- Stigler, Georg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Theories: The Formative Period*. New York: Macmillan, 1949.
- Stolper, Wolfgang.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The Public Life of a Private Ma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 Streissler, Erich. "Carl Menger, der deutsche Nationalökonom." *Wert, Meinung, Bedeutung*, edited by B.P. Priddat. Marburg: Metropolis, 1997.
- . "The Influence of German Economics on the Work of Carl Menger and Marshall." In *Carl Menger and His Legacy in Economics*, edited by Bruce Caldwell.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Streissler, Erich W., and Monika Streissler, eds. *Carl Menger's Lectures to Crown Prince Rudolf of Austria*. Aldershot, U.K.: Edward Elgar, 1994.
- Strigl, Richard von. *Die ökonomischen Kategorien und die Organisation der Wirtschaft*. Jena: Gustav Fischer, 1923.
- . *Kapital und Produktion*. Vienna: Springer, 1934.
- Stuart, G.M. Verrijn. *Inleiding tot de Leer der Waardevastheid van het Geld*. The Hague: Mouton, 1919.
- Stucken, Rudolph. *Deutsche Geld- und Kreditpolitik, 1914–1963*, 3rd ed. Tübingen: Mohr, 1964.
- Sturmthal, Adolf. Book Review i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3, no. 3 (September 1943).
- . *The Tragedy of European Labor, 1918–193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3.
- Sulzer, Georg. *Die wirtschaftlichen Grundgesetze in der Gegenwartsphase ihrer Entwicklung*. Zurich: Müller, 1895.
- Swedberg, Richard. *Joseph A. Schumpeter—eine Biographie*. Stuttgart: Klett-Cotta, 1994.
- Taylor, Fred. "The Guidance of Production in a Socialist Stat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 (1929).
- Taylor, Sally J. *Stalin's Apologist: Walter Duranty, the New York Times's Man in Mosco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Thiers, Adolph. *De la propriété*. Paris: Paulin, Lheureux & Cie, 1848.
- Tietze, Hans. *Die Juden Wiens*. Vienna & Leipzig: Tal, 1933.
- Tintner, Gerhard. *Die Preise im Konjunkturverlauf*. Vienna: Springer, 1935.

- Tirala, Lothar Gottlieb. *Rasse, Geist und Seele*. Munich: Lehmann, 1935.
- Tomo, Shigeki. "Eugen von Böhm-Bawerk's Lectures on Economics." In Eugen von Böhm-Bawerk, *Innsbrucker Vorlesungen über Nationalökonomie*. Marburg: Metropolis, 1998.
- . "The Year 1922: A Watershed for Mises and Hayek."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September 2003.
- Treichl, Heinrich. *Fast ein Jahrhundert*. Vienna: Zsolnay, 2003.
- Tschuppik, Walter. Book Review in *Süddeutsche Sonntagspost* (November 8, 1931).
- Tucker, Jeffrey A. "Mises as Mentor: An Interview with George Reisman." *Austrian Economics Newsletter* 21, no. 3 (Fall, 2001).
- Vleugels, Wilhelm. *Die Lösungen des wirtschaftlichen Zurechnungsproblems bei Böhm-Bawerk und Wieser*. Halle: Niemeyer, 1930.
- Voegelin, Erich.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Vol. 34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 *Die politischen Religionen*. Stockholm: Bermann-Fischer, 1939.
- Voigt, Andreas. "Die staatliche Theorie des Geldes."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62 (1906).
- . *Kriegssozialismus und Friedenssozialismus*. Leipzig: Scholl, 1916.
- Wagner, Adolf. *Die russische Papierwährung*. Riga: Kymmell, 1868.
- "Wahlen." *Staatslexikon*, 7th ed. Freiburg i.Br.: Herder, 1989. Col. 830.
- Wald, Abraham. *Berechnung und Ausschaltung von Saisonschwankungen*. Vienna: Springer, 1936.
- Walras, Léon. "Un économiste inconnu: Hermann-Henri Gossen." *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April and May 1885).
- Weber, Adolf. *Weltwirtschaft*. Munich: Richard Pflaum Verlag, 1947.
- Weber, Max.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ed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 .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Tübingen: Mohr, 1922. 7th ed. Tübingen: UTB, 1988.
- . *Der Sozialismus*. Vienna: Phöbus, 1918.
- .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3rd ed. Tübingen: Mohr, 1947. Vol. 1.
- Weininger, Otto. *Geschlecht und Charakter*, 19th ed. Vienna: Braumüller, 1920.
- Weiss, F.X. "Die moderne Tendenz in der Lehre vom Geldwert." *Zeit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Socialpolitik und Verwaltung* 19 (1909).
- . "Eugen von Böhm-Bawerk."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edited by F.X. Weiss. Vienna: Hölder-Pichler-Tempsky, 1926. Reprint, Frankfurt a.M.: Sauer & Auvermann, 1968. Vol. 1.

- W.W. [Weiss-Wellenstein]. “Die Gemeinwirtschaft.’ Die zweite Auflage des Werkes von Ludwig Mises.” *Mitteleuropäische Wirtschaft. Wochenbeilage der “Neuen Freien Presse”* (December 10, 1932).
- Whately, Richard.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olitical Economy*, 3rd ed. London: Parker, [1832] 1847.
- Wicksell, Knut. *Geldzins und Güterpreise*. Jena: Gustav Fischer Verlag, 1898.
- . *Über Wert, Kapital und Rente*. Jena: Gustav Fischer, 1893.
- Wicksteed, Philip H. *The Alphabet of Economic Science*. Reprint,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888] 1970.
- Wieser, Friedrich von. “Das Wesen und der Hauptinhalt der theoretischen Nationalökonomie—kritische Glossen.” *Jahrbuch für Gesetzgebung, Verwaltung und Volkswirtschaft im deutschen Reich* 35, no. 2 (1911). Reprinted in *Gesammelte Abhandlungen*, edited by F.A. Hayek. Tübingen: Mohr, [1911] 1929.
- . “Der Geldwert und seine geschichtlichen Veränderungen.” *Zeit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Sozialpolitik und Verwaltung* 13 (1904). Reprinted in Wieser, *Gesammelte Abhandlungen*, F.A. Hayek, ed. Tübingen: Mohr, 1929.
- . “Der Geldwert und seine Veränderungen.” *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Socialpolitik* 132 (Munich, 1909). Reprinted in Wieser, *Gesammelte Abhandlungen*, edited by F.A. Hayek. Tübingen: Mohr, 1929.
- . *Der natürliche Werth*. Vienna: Hölder-Pichler-Tempsky, 1889.
- . “Grenznutzen,”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2nd and 3rd editions. Jena: Gustav Fischer, 1900. Reprinted in Wieser, *Gesammelte Abhandlungen*, edited by F.A. Hayek. Tübingen: Mohr, [1911] 1929.
- . “Karl Menger.” In *Neue österreichische Biographie: 1815–1918*, edited by Anton Bettelheim. Vienna, 1923. Vol. 1. Reprinted in Wieser, *Gesammelte Abhandlungen*, edited by F.A. Hayek, ed. Tübingen: Mohr, 1929.
- .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Wirtschaft*. Tübingen: Mohr, 1914. Translated as *Social Economics*. New York: Adelphi, 1927.
- . “Theorie des Geldes.”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4th ed. Jena: Gustav Fischer, 1927. Vol. 4.
- . *Über den Ursprung und die Hauptgesetze der wirtschaftlichen Werthes*. Vienna: Hölder-Pichler-Tempsky, 1884.
- . “Über die Messung der Veränderungen des Geldwertes.” *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Socialpolitik* 132 (Munich, 1909). Reprinted in *Gesammelte Abhandlungen*, edited by F.A. Hayek. Tübingen: Mohr, 1929.
- Windelband, Wilhelm. *Kulturwissenschaft und Naturwissenschaft*, 3rd ed. Tübingen: Mohr, 1915.
- . *Präudien*, 8th ed. Tübingen: Mohr, 1922. Vol. 2.
- Winter, Balduin. “Die Rückkehr zum Kind. Wirklichkeit ist mehr als Realität. Drohobycz, die Heimat des Dichters und Traumtänczers Bruno Schulz im vergessenen Europa.” *Freitag. Die Ost-West-Zeitung* (literature section; March 30, 2001).

Wissel, Rudolf. *Die Planwirtschaft*. Hamburg: Auer, 1920.

———. *Praktische Wirtschaftspolitik*. Berlin: Verlag Gesellschaft und Erziehung, 1919.

Wittek, H. “Die kriegswirtschaftlichen Organisationen und Zentralen in Österreich.” *Zeit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1922).

Wittkowski, Adolf. *Schrifttum zum Marshallplan und zur volkswirtschaftlichen Integration Europas*. Bad Godesberg: Bundesministerium für den Marshallplan, 1953.

Yagi, Ki'ichiro. “Carl Menger as Editor: Significance of Journalistic Experience for his Economics and for his Later Life.” *Revue européenne des sciences sociales* 30, no. 92 (1992).

———. “Carl Menger and Historical Aspects of Liberalism in Austria.” Essay presented at a symposium on Carl Menger and the Historical Aspects of Liberalism. Center for 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December 18–19, 2004).

Zuckerlandl, Robert. *Zur Theorie des Preises*, 2nd ed. Leipzig: Stein & Co, [1889] 1936. Reprint, Amsterdam: Liberac, 1968.

Zweig, Stefan. *Die Welt von Gestern—Erinnerungen eines Europäers*. Frankfurt a.M.: Gustav Fischer, 1988.

名称索引

(索引中页码为英文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

- Abrahamson, Joe 乔·亚伯拉罕森 932, 932n
- Acheson 艾奇逊 689n
- Adamson (Professor) 亚当森(教授) 130
- Adler, Alfred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264 - 65n
- Adler,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阿德勒 94n, 279, 666
- Adler, Max 马克斯·阿德勒 94n, 371, 377
- Adler, Mortimer 莫蒂默·阿德勒 854n
- Adler, Valerie 瓦莱里·阿德勒 272
- Adler, Viktor 维克托·阿德勒 58, 58n, 274, 274n, 279, 328, 363 - 64
- Adlers 阿德勒斯 56
- Aehrenthal (Minister) 埃伦塔尔(首相) 194
- Alchian 阿尔钦 1004n
- Alexandre, V. V. 亚历山大 721n
- Alger, Horatio 霍雷肖·阿尔杰 991
- Alkalay, Lidia 利迪娅·阿尔卡雷 873n
- Allais, Maurice 莫里斯·阿莱斯 869, 872, 872n
- Allman 奥尔曼 845, 845n
- Althoff,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阿尔特霍夫 121
- Altschul, Eugen 欧根·阿尔特舒尔 626, 626n
- Amonn, Alfred 阿尔弗雷德·阿蒙 67n, 81n, 274, 274n, 337n, 378, 658n
- Amzalak, Professor 阿姆扎拉克教授 756n
- Anderson, Benjamin M. 本杰明·M.安德森 209n, 222 - 223n, 490n, 654 - 55n, 748, 749, 750n, 838
- Andrew (Hungarian King) 安德鲁(匈牙利国王) 3n
- Anthony, Ernest 欧内斯特·安东尼 760n, 901n
- Antonelli, Etienne 艾蒂安·安东内利 106n
- Antoni 安东尼 872n
- Aquinas, Thomas 托马斯·阿奎那 412n, 557n, 559n, 769n
- Armstrong, P. C. P. C. 阿姆斯特朗 854n, 898n
- Armstrong Cork 科克·阿姆斯特朗 846n
- Arnstein, Fritz 弗里茨·阿恩施泰因 613n
- Auernheimer, Raoul 拉乌尔·奥恩海默 804
- Auspitz, Rudolf 鲁道夫·奥斯皮茨 154 - 55n, 243n
- Azuma, Yoneo 东米雄 848n
- Badeni (Count) 巴德尼(伯爵) 53
- Bahner, Johannes 约翰内斯·巴纳 837n
- Bainville, Jacques 雅克·班维尔 449n
- Baird, Robert W. 罗伯特·W. 贝尔德 855

- Ballod, Carl 卡尔·巴洛德 336n
- Ballvé, Faustino 福斯提诺·波夫 430n, 561n, 760n, 873n, 926n, 935n
- Baltzarek, Franz 弗朗茨·巴尔察里克 95n, 484n, 614n, 615n
- Bamberger, Ludwig 路德维希·班贝格尔 56
- Barone, Enrico 恩里科·巴罗内 591n, 705
- Barth, Karl 卡尔·巴尔特 985, 985n
- Barth, Paul 保罗·巴尔特 204n, 535n
- Bartsch 巴尔奇 274, 274n
- Barzun, Jacques 雅克·巴尔赞 799n
- Baster, A. S. J. A. S. J. 巴斯特 714n
- Bastiat, Frédéric 弗雷德里克·巴斯夏 35n, 253n, 504, 737n
- Batson 巴特森 694
- Baudin, Louis 路易·博丹 737n, 751n, 827-28n, 1004n
- Bauer, Helene 海伦妮·鲍尔 377
- Bauer, Otto 奥托·鲍尔 56, 58n, 66, 94, 94n, 145, 317, 321, 321n, 328, 331-32n, 331-34, 334-35n, 356, 371, 371n, 580, 999-1000n
- Baus 鲍斯 716n
- Beauvallon 博瓦隆 904-05n
- Becher, Maximilian Edler von (Lt. Col.) 马克西米利安·埃德勒·冯·贝歇尔(中校) 295
- Beck (Prime Minister) 贝克(总理) 194
- Becker, Gary 加里·贝克 598n
- Becker, Wilhelm 威廉·贝克尔 723, 723n
- Beckerath, Herbert von 赫伯特·冯·贝克拉特 846n
- Beethoven, Ludwig van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 26-27n
- Behrend, Manfred 曼弗雷德·贝伦德 336n
- Belcredi, Egbert (Count) 埃格伯特·贝尔克雷迪 103n, 439
- Bendixen,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本迪克森 222n, 226-227n, 370n
- Bente, Hermann 赫尔曼·本特 1006n
- Bentham, Jeremy 杰里米·边沁 307, 307n, 482, 635
- Berger, Lise 莉泽·贝格尔 733
- Bergmann, Eugen von 欧根·冯·贝格曼 252n
- Bergson, Henri 亨利·伯格森 600n
- Bermann, Rudolf von 鲁道夫·冯·贝尔曼 622, 622n, 623n
- Bernatzik, Eduard 爱德华·贝尔纳奇克 320n
- Bernstein, Elise (Mises) 埃莉泽·伯恩斯坦 15n
- Berthold, Rudolf 鲁道夫·贝特霍尔德 694n, 721n, 821n
- Bettelheim, Anton 安东·贝特尔海姆 102n, 549n
- Bettelheim-Gabillon, Ludwig 路德维希·贝特尔海姆-加比永 289, 795-96, 834
- Beveridge, William (Lord) 威廉·贝弗里奇(勋爵) 480, 480-81n, 567n, 636-37, 636n, 654-55n, 664, 815n
- Bexner, Franz 弗朗茨·贝克斯纳 35n
- Biberbach (Professor) 比巴巴赫(教授) 665
- Bidinotto, Robert James 罗伯特·詹姆斯·比迪诺托 1038
- Biedermann Bank 比德尔曼银行 163, 189n, 505
- Bien, Bettina. See Greaves, Bettina Bien 贝蒂纳·比恩, 见贝蒂纳·比恩·格里夫斯
- Bierly, Ivan 伊万·比尔利 896, 925n

- Biggers, E. M. E. M. 比格斯 841n
- Blaug, Mark 马克·布劳格 128n, 133 - 34n, 243n, 378n, 469n
- Bloch 布洛赫 615n, 652
- Block, Walter 沃尔特·布洛克 894n
- Blum, Léon 莱昂·布卢姆 715
- Boese, Franz 弗朗茨·伯泽 119n, 120n, 187n, 195n, 199n, 337n, 398n, 496n, 509 - 10n, 510n, 512n, 573n, 662n
- Boétie, Etienne de la 艾蒂安·德·拉博埃西 412n
- Boettke, Peter 彼得·贝奇 945
- Böhm, Stephan 斯特凡·伯姆 162 - 63n
- Böhm-Bawerk, Eugen von 欧根·冯·庞巴维克 63, 73n, 81, 83, 93 - 98, 101, 133 - 34n, 139 - 51, 139n, 140n, 141n, 143 - 44n, 146n, 150n, 153, 157 - 58n, 160n, 162, 165, 170, 173 - 74, 174n, 178 - 79, 179n, 182 - 86, 204, 217 - 18, 217 - 19n, 235, 235n, 237, 241, 241n, 250, 250n, 261, 378n, 385 - 86, 385n, 476, 523, 542, 569n, 590, 592, 633, 675n, 729, 770, 773 - 78, 774 - 76n, 837n, 854, 916n, 917 - 18, 927, 1007 - 08n
- Böhm-Bawerk, Paula (Wieser) 保拉(维塞耳)·庞巴维克 142
- Bois-Reymond, Emil du 埃米尔·迪布瓦-雷蒙 116n
- Boissier, Léopold 利奥波德·布瓦西耶 686n
- Bonitz, Hermann 赫尔曼·博尼茨 35n
- Bonn, Moritz J. 莫里茨·J. 博恩 565 - 66n, 664
- Bonnet, Victor 维克托·博内 252n
- Bonnot, Étienne 艾蒂安·博诺 474n See Condillac, Etienne de 见艾蒂安·德·孔狄亚克
- Borchardt, Knut 克努特·博尔夏特 716 - 17n
- Borel, Eugène 欧仁·博雷尔 690
- Böse, Franz 弗朗茨·伯泽 195n
- Bostaph, Samuel 塞缪尔·博斯塔非 384n
- Boulding, Kenneth 肯尼斯·博尔丁 478, 478n
- Bourquin, Maurice 莫里斯·布尔坎 690, 695, 827 - 28n
- Branden, Barbara 芭芭拉·布兰登 998, 998 - 99n, 998n
- Branden, Nathaniel 纳撒尼尔·布兰登 998, 999, 999n, 1001, 1001n, 1013
- Brandt, Karl 卡尔·勃兰特 862n, 865n, 867
- Braun, [Browne] Martha Stephanie 玛尔塔·斯特凡妮·布劳恩 366, 417, 418, 570n, 581n, 586n, 633n, 659n, 662n
- Brecht, Bertold 贝托尔德·布莱希特 421
- Brentano, Lujó 卢约·布伦塔诺 118, 124n, 198, 538, 542, 565 - 66n
- Bresciani-Turroni, Costantino 科斯坦蒂诺·布雷夏尼-图罗尼 496n
- Briefs, Götz 格茨·布里夫斯 270, 270 - 71n, 529n, 846n
- Bright 布莱特 504
- Brockhausen, Carl 卡尔·布罗克豪森 274, 274n, 728, 833, 833 - 34n, 834, 834 - 35n, 835
- Brockhausen, Elsa 埃尔莎·布罗克豪森 796n, 834n
- Broda 布罗达 274, 274n, 331n
- Brodnitz 布洛德尼兹 433n, 543n, 568n, 570n
- Brody 布罗迪 7, 9

- Brontë, Charlotte 夏洛蒂·勃朗特 789
- Brook-Shepherd, Gordon 戈登·布鲁克-谢泼德 285n
- Brown 布朗 826n
- Brown, John T. 约翰·T. 布朗 855, 905n
- Browning, Elizabeth Barrett 伊丽莎白·芭蕾特·布朗宁 789
- Brünn 布吕恩 321
- Brunner, Otto 奥托·布伦纳 363-64
- Brunschwig 不伦瑞克 687n
- Brus, Włodzimierz 沃齐米日·布鲁斯 783n
- Brusztury 布鲁斯图瑞 283
- Brutzkus, Boris 鲍里斯·布鲁兹库斯 530, 654-55n
- Bücher, Karl 卡尔·比歇尔 468n
- Buckley, William F., Jr. 小威廉·F. 巴克利 991, 991n, 994
- Budge 巴奇 660, 660n
- Bukharin, Nicolai 尼古拉·布哈林 145, 386-87, 386n
- Bukovina 布科维纳 285
- Bund, Henry 亨利·邦德 797n
- Burckhardt, Carl J. 卡尔·J. 布尔克哈特 126n, 686n, 690
- Burghardt, Anton 安东·布格哈特 496n
- Butler, Chris 克里斯·巴特勒 795-96n
- Butler, Eamonn 埃蒙·巴特勒 xiv
- Byron 拜伦 789
- Cairnes, John E. 约翰·E. 凯恩斯 243n
- Caldwell, Bruce 布鲁斯·考德威尔 469-70n, 844n
- Calkins, Robert 罗伯特·卡尔金斯 790, 790n
- Calligaris, L. L. 卡利加里斯 222n
- Campbell, William F. 威廉·F. 坎贝尔 893n
- Cannan, Edwin 埃德温·坎南 164, 565-66n, 567, 786n
- Cantillon, Richard 里夏尔·康蒂永 243, 243n
- Carrell, Erich 埃里希·卡雷尔 624, 624n
- Carlyle 卡莱尔 789
- Carnegie, Andrew 安德鲁·卡内基 923
- Carson, William J. 威廉·J. 卡森 799n
- Carver, Thomas N. 托马斯·N. 卡弗 825n
- Casimir the Great (King) 卡齐米日(国王) 4
- Casimir-Lambert, V. V. 卡齐米尔-兰伯特 904n
- Cassel, Gustav 古斯塔夫·卡塞尔 133-34n, 227-28n, 244, 248, 248n, 469-70n, 469-70, 469n, 481, 509n, 565-66n, 583, 590, 590n, 637, 642, 659, 660, 688, 1048
- Catchings, Waddill 沃迪尔·卡钦斯 633
- Catherine II 叶卡捷琳娜二世 747
- Cernuschi, Henri 亨利·塞努斯基 221, 221n
- Chafuen, Alejandro 亚历杭德罗·查富恩 945
- Chamberlain, John 约翰·张伯伦 763, 840, 902n, 903, 903n, 909, 910, 911n, 912, 912n, 913, 913n, 939, 1038
- Chamberlain, William Henry 威廉·亨利·张伯伦 991
- Charmatz, Richard 里夏德·沙尔马茨 796n, 833, 833-34n, 834, 834n, 864n
- Chellevoid 切利沃尔德 928n
- Chevalier 舍瓦利耶 899
- Chodorov, Frank 弗兰克·霍多罗夫 838, 842, 842n, 913, 1029

- Churchill, Winston 温斯顿·丘吉尔 811
- Clam-Martinic (Count) 克拉姆-马丁尼茨 (伯爵) 279
- Clark, John Bates 约翰·贝茨·克拉克 172, 173, 436n
- Coase, Ronald 罗纳德·科斯 533n, 631, 631n, 634n, 739, 1004n
- Cobden 科布登 504, 899
- Cobrin, Morton 莫顿·科布林 906n, 927, 927n
- Cohrssen, Hans 汉斯·科尔森 793n, 796n, 834n
- Coleridge 柯勒律治 789
- Colm, Gerhard 格哈德·科尔姆 661
- Condillac, Etienne de 艾蒂安·德·孔狄亚克 109, 112-13, 112n, 113i, 113n, 114n, 215n, 308n, 474n
- Condliffe 康德利夫 691
- Conrad, Otto 奥托·康拉德 622n, 624
- Coquelin, Charles 查理·科克兰 252n
- Cornuelle, Herbert 赫伯特·康努埃尔 868, 872n, 875, 893, 894n, 895, 895n, 898n, 935n
- Cornuelle, Richard 理查德·康努埃尔 868, 868n, 887, 887n, 931n, 936n, 938n, 939n, 940n, 941n, 992n, 1004n
- Cortney, Philip 菲利普·科特尼 829, 830n, 1005n, 1015, 1030n, 1032, 1032n, 1033, 1033n, 1034n
- Coudenhove-Kalergi, Richard von 里夏德·冯·库登霍韦-卡莱吉 811, 811n
- Cournot, Augustin 奥古斯丁·库尔诺 722
- Crane, Jasper 贾斯珀·克兰 838, 846n, 874, 874n, 902, 902n, 910n, 913, 913n, 1004
- Cronbach, Else 埃勒斯·克龙巴赫 184
- Crunden, Robert M. 罗伯特·M. 克兰登 838n
- Cubbedu, Raimondo 雷蒙多·库比都 105n
- Cueva, Mario de la 马里奥·德·拉奎瓦 807n
- Cuhel, Franz 弗朗茨·丘赫尔 218-19, 218n, 219n, 390-91, 403, 778, 778n
- Cunow, Heinrich 海因里希·库诺 336n
- Curtiss, William M. 威廉·M. 寇蒂斯 893n
- Cushman, William S. 威廉·S. 库什曼 1036n
- Czardaki 查达奇 283
- Czernin, Ferdinand Count von 斐迪南德·康特·冯·切尔宁 811
- Czernowitz 捷尔诺维茨 163
- Dalton, Hugh 休·多尔顿 482, 902-03n
- Darwin, Charles 查尔斯·达尔文 430
- Davenport, H. J. H. J. 达文波特 838, 869
- Davidson, Eugene 尤金·戴维森 765n, 873
- Davis, Forrest 福里斯特·戴维斯 912
- Davis, Shelby Cullom 谢尔比·卡洛姆·戴维斯 897n
- Dawes, Charles 查尔斯·道斯 509, 510
- Dawes Plan 道斯计划 510
- Degenfeld, Heinrich Graf von 海因里希·葛雷夫·冯·德真费尔德 818, 819n, 820, 820n
- Delafeld 德拉菲尔德 914n
- DelGaudio, Julian 于连·德尔高迪奥 xiv, 839n
- Dennison 丹尼森 1004n
- Dewey, John 约翰·杜威 538, 538n
- Diamond, Sigmund 西格蒙德·戴蒙德

- 991n
- Dickens 狄更斯 789
- Dickinson, H. D. H. D. 迪金森 782n
- Dierson, Frank 弗兰克·迪尔森 930n
- Dietze, Constantin von 康斯坦丁·冯·迪策 662
- Dietzel, Heinrich 海因里希·迪策尔 196, 309, 309n, 533, 533n
- Dietzgen, Josef 约瑟夫·迪茨根 665, 665n
- DiLorenzo, Thomas 托马斯·洛伦佐 547n, 714n
- Director, Aaron 阿伦·迪雷克托 852, 872n, 898n
- Disraeli 迪斯雷利 56
- Dollfuss, Engelbert 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 614, 676, 677, 677n, 678, 684
- Dopsch 多普施 363-64
- Döring, Herbert 赫伯特·德林 508n
- Douhet, Giulio 朱利奥·杜黑 751n
- Dreyer, Jacob 雅各布·德雷尔 477n
- Drohobycz 多罗毕其 10
- Dub, Helene 海伦妮·杜布 287
- Dub, Moritz 莫里茨·杜布 140, 460, 460n
- Duncan 邓肯 1004n
- Duning, Edward 爱德华·达宁 889n
- Dvorak, Max 马克斯·德沃夏克 363-64
- Earhart, Harry 哈里·埃尔哈特 838
- Eastman, Mack 麦克·伊斯门 690, 867, 991
- Ebeling, Richard 理查德·埃贝林 xiv, 725-26n, 793n, 816n
- Ebray, Alcide 阿尔西德·埃布里 449n
- Eckert, Christian 克里斯蒂安·埃克特 326n, 344n, 449n, 486n, 509n, 510
- Edwards, James R. 詹姆斯·R. 爱德华兹 214n
- Egert, Philipp 菲利普·埃杰特 751n
- Ehrenberg 埃伦贝格 196
- Ehrlich, Otto 奥托·埃尔利希 209n, 797n
- Einaudi, Luigi 路易吉·伊诺第 827-28n, 875n
- Einstein, Albert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666
- Eisenach 艾泽纳赫 509-10n
- Eisler, Robert 罗伯特·艾斯勒 616-17, 616n, 727
- Ekelund, Robert 罗伯特·埃克隆德 128n
- Elisabeth (Empress) 伊丽莎白(皇后) 138
- Ellis, Howard S. 霍华德·埃利斯 629n, 790
- Elster, Ludwig 路德维希·埃尔斯特 81n
- Eltis, Shelagh 希拉·艾尔缇斯 112n
- Eltis, Walter 沃尔特·艾尔缇斯 112n
- Engel, Ernst 恩斯特·恩格尔 118
- Engel, Eugen 欧根·恩格尔 60
- Engel-Janosi 恩格尔-雅诺西 730n, 795
- Engels,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49, 369, 665
- Ephrussi, Elisabeth 伊丽莎白·埃弗吕西 365, 365n, 417
- Erhard, Ludwig 路德维希·艾哈德 875, 876, 876n, 877, 878, 880n, 1005, 1006, 1007
- Erickson 埃里克森 888-89n
- Erkelenz 埃克伦茨 559n
- Ermacora, Felix 费利克斯·埃尔马科拉 449n
- Espinas, Alfred 阿尔弗雷德·埃斯皮纳

- 斯 720, 720 - 21n
- Ettinger 埃廷格 924n
- Eucken, Edith 埃迪特·奥伊肯 1007 - 08n
- Eucken, Walter 瓦尔特·奥伊肯 508n, 588, 712, 869, 872n, 877n, 878, 1007 - 08n, 1014 - 15n
- Facey, Edward 爱德华·费西 917 - 18n
- Fairchild, Fred 弗雷德·弗尔柴尔德 838, 926
- Falkenhayn 法金汉 278
- Federn, Walther 瓦尔特·费德恩 186, 186n, 273, 350, 362n
- Ferdinand (Archduke) 斐迪南(大公) 259
- Ferrero, Guglielmo 古列尔莫·费雷罗 690
- Fertig, Lawrence 劳伦斯·费尔蒂希 801, 838, 886n, 907, 907n, 908n, 911, 912, 913, 925, 926, 926n, 929, 1005, 1005n, 1016n, 1030n
- Fest, Joachim 约阿希姆·费斯特 725 - 26n
- Fetter, Frank A. 弗兰克·A. 费特 481, 771n, 775n, 776n, 777, 778, 778n
- Fichte, Johann Gottlieb 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 42
- Fifield, James 詹姆斯·法菲尔德 906n
- Fischel, Alfred 阿尔弗雷德·菲舍尔 320n
- Fischer, Frau 弗劳·菲舍尔 337n
- Fischer, Gustav 古斯塔夫·菲舍尔 561n, 582, 582n, 583n, 644, 644n, 653, 654, 654 - 55n, 700 - 01
- Fisher, Anthony 安东尼·费雪 908
- Fisher, Irving 欧文·费雪 133 - 34n, 244, 244n, 481, 482n, 509n, 517, 583 - 84, 616n, 776n, 777, 793n
- Fishman, Leo 莱奥·菲施曼 68n, 289n
- Fleming, J. Marcus J. 马库斯·弗莱明 691, 696n, 777n
- Flynn, John T. 约翰·T. 弗林 713n, 838, 840
- Foley, Edward 爱德华·福利 927n
- Ford, Henry 亨利·福特 923
- Fosdick, Raymond Blaine 雷蒙德·布莱恩·福斯迪克 453 - 54n, 924, 924n
- Foster, William Trufant 威廉·特鲁芬特·福斯特 633
- Frachebourg, Jean-Claude 让-克洛德·弗拉舍布 185n, 685n
- France, Royal Wilbur 罗亚尔·威尔伯·弗朗斯 751n, 789n
- Franco (General) 弗朗哥(将军) 716
- Franz, Georg 格奥尔格·弗朗茨 56n
- Franz Joseph (Emperor) 弗朗茨·约瑟夫(皇帝) 12n, 15, 23, 35, 48n, 51, 97, 138, 268, 279, 282
- Frederick II 腓特烈大帝 747
- Frege, Gottlob 戈特洛布·弗雷格 165, 165n
- Freud, Sigmund 西格蒙·弗洛伊德 264 - 65n, 363 - 64, 364, 416 - 17n, 727
- Frickhöffer, Wolfgang 沃尔夫冈·弗里克霍费尔 1010 - 11n
- Friedländer, Otto 奥托·弗里德伦德尔 795 - 96n
- Friedman, Milton 米尔顿·弗里德曼 167n, 330, 490n, 712, 791, 792n, 852, 869, 871, 871n, 884n, 885, 989
- Friedman, Rose D. 罗丝·D. 弗里德曼 792n, 871n
- Friedmann, Otto Bernhard 奥托·伯恩哈特·弗里德曼 119n
- Frisch, Ragnar 拉格纳·弗里希 1034

- Frowein 弗罗魏因 644
- Fruin, Richard 理查德·弗鲁因 929
- Fuller, Selma 塞尔玛·富勒 824n, 843n
- Fullmer, H. P. H. P. 富尔默 841n
- Fürth, Emil von 埃米尔·冯·菲尔特 184, 795
- Fürth, Marianne 玛丽安娜·菲尔特 272n
- Gaitskell, Hugh 休·盖茨克尔 674, 675n
- Galbraith, John Kenneth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 791, 886n
- Gall, Franz 弗朗茨·加尔 62n
- Galliani, Ferdinando 费迪南多·加利亚尼 215n
- Gardner, James 詹姆斯·加德纳 650n
- Garrett, Garet 加雷·加勒特 833 - 34n, 838
- Gasparski, W. W. W. W. 加斯帕斯基 721n
- Gauss 高斯 126n
- Geiringer, Otto 奥托·盖林格 575, 795
- Geissler, Franz 弗朗茨·盖斯勒 188n, 361n
- Genovesi, Antonio 安东尼奥·杰诺韦西 215n
- George, Lloyd 劳合·乔治 687n, 873
- Gertchev, Nikolay 尼古拉·戈谢夫 239n
- Gibson 吉布森 876n
- Gideonse, Harry 哈里·吉迪恩斯 867, 869, 872n, 924n
- Ginsberg family 金斯贝格家族 733n
- Gipson, J. H. J. H. 吉普森 833, 833 - 34n
- Gipson, Lawrence Henry 劳伦斯·亨利·吉普森 833 - 34n
- Göbel, Otto 奥托·格贝尔 270 - 71n
- Goldscheid, Ludwig 路德维希·戈德沙伊德 204n
- Goodrich, Pierre 皮埃尔·古德里奇 838, 850, 1009 - 10n
- Gordon, David 大卫·戈登 xiv
- Gorges, Irmela 伊默拉·戈格斯 119n, 565n
- Gorham 戈勒姆 807
- Görög, Dr. 戈罗格博士 343
- Gossen, Hermann Heinrich . *See also* Gossen School 赫尔曼·海因里希·戈森 129n, 130 - 31n, 133n, 134, 153 - 54, 157 - 58n, 170, 218, 243n, 475n, 762 另见戈森学派
- Gothein, Georg 格奥尔格·格泰因 510
- Gottl-Ottlilienfeld, Friedrich von 弗里德里希·冯·戈特尔 - 奥特里连菲尔德 202, 551, 659
- Graetz, Heinrich 海因里希·格雷茨 7, 7n, 28 - 29n, 30n, 347 - 48, 348n, 352n, 647n
- Graetz, Victor 维克托·格雷茨 187, 289, 575, 796
- Graf, Martine Brunschig 马丁内·布伦施伯爵 185n, 335, 685n
- Graham, Frank 弗兰克·格雷厄姆 496n, 688
- Graham, William 威廉·格雷厄姆 304n
- Grassl, Wolfgang 沃尔夫冈·格拉斯尔 105n
- Gratz, Alois 阿洛伊斯·格拉茨 9n, 16n, 143n, 191n, 207n
- Grätz, Viktor 维克托·格雷茨 140
- Graz, Eugen von Philippovich and 欧根·冯·菲利波维奇和 83
- Greaves, Bettina Bien 贝蒂纳·比恩·格里夫斯 xiv, 889 - 90n, 889 - 91, 905n,

- 929, 1010n, 1014, 1016, 1016 - 17n, 1043
- Greaves, Percy 珀西·格里夫斯 xiv, 459n, 889 - 90, 929, 1014 - 16, 1015 - 16n, 1022
- Grede 格里德 1004
- Gregersen 马格努斯·格雷格森 Magnus, 1015n
- Gregory, Theodore 西奥多·格雷戈里 480, 480 - 81n, 481, 572n, 654 - 55n, 688
- Greifs 格雷夫斯 289n
- Grice-Hutchinson, Marjorie 玛乔丽·格赖斯-哈钦森 112n, 984n
- Grimeisen, Hermann von 赫尔曼·冯·格里迈森 752 - 53n, 797n
- Grimm 格林 317
- Grinder, Walter 沃尔特·格林德尔 894n, 945
- Gross, Gustav 古斯塔夫·格罗斯 139
- Grote, Adolf 阿道夫·格罗特 493n
- Grünberg, Carl 卡尔·格林贝格 66 - 74, 78, 243n, 466
- Guarnieri, Robert 罗伯特·瓜尔涅里 924 - 25n
- Guggenheim family 古根海姆家族 733n
- Guggenheim, Paul 保罗·古根海姆 690, 733n
- Gugitz, Gustav 古斯塔夫·古吉茨 25n
- Guglia, Eugen 欧根·古利亚 37n
- Gumplowicz 贡普洛维奇 178
- Gunning, Patrick 帕特里克·冈宁 xiv
- Haberler, Gottfried 戈特弗里德·哈伯勒 368, 404, 465, 478n, 647n, 691, 696n, 701, 702n, 709, 731 - 32, 765n, 827 - 28n, 846n, 999, 1006
- Habermann, Gerd 格尔德·哈伯曼 120n
- Habsburg, Otto von 奥托·冯·哈布斯堡 811, 817 - 18n, 818, 821
- Hagedorn, Karl 卡尔·哈格多恩 796n, 833 - 34n
- Hagemann, Harald 哈拉尔德·哈格曼 702n, 792n, 919n
- Hahn, Albert 阿尔伯特·哈恩 208 - 09, 493, 494n, 588, 649, 649n, 654 - 55n, 823, 850n
- Haider, Miss 海德尔小姐 172n
- Hainisch, Michael 米夏埃尔·海尼施 66, 81n
- Halberstamm, Rosa. *See* Mises, Rosa (Halberstamm) 罗萨·哈伯斯塔姆, 见罗萨·米塞斯(哈伯斯塔姆)
- Halitsch 哈利施 3n
- Haller, Carl Ludwig 卡尔·路德维希·哈勒 444 - 45, 445n
- Halm, Georg 格奥尔格·哈尔姆 654 - 55n, 657, 657n, 660 - 61, 702, 846n
- Hamann, Brigitte 布里吉特·哈曼 102n
- Hamilius, Pierre 皮埃尔·阿米吕斯 561n, 906n, 1004, 1005, 1005n
- Hamilton, Charles H. 查尔斯·H. 汉密尔顿 846n, 901n
- Hammerschlag 哈默施拉格 350
- Hanighen, Frank 弗兰克·哈尼根 840
- Hansen, Alvin 阿尔文·汉森 195n, 330, 674, 691, 925
- Harms, Bernd 贝恩德·哈姆斯 196
- Harper, F. A. "Baldy," F. A. "秃头"哈珀 859, 869, 1015, 1025, 1029, 1029n
- Harris, Seymour E. 西摩·E. 哈里斯 886n, 925
- Hart, Parker T. 帕克·T. 哈特 695, 696n
- Hartmann, Ludo 卢多·哈特曼 66
- Hasselfeldt, Ernest C. 欧内斯特·C. 哈塞尔费尔特 990

- Havenstein, Rudolf 鲁道夫·哈芬施泰因 226 - 27n, 458, 459
- Hawtrey, R. G. R. G. 霍特里 486n, 505n
- Hax, Herbert 赫伯特·哈克斯 469 - 70n
- Hayden, Franz Joseph 弗朗茨·约瑟夫·海登 26 - 27n
- Hayek, Friedrich August von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 87 - 88, 88n, 102n, 104n, 133 - 34n, 140n, 151 - 55n, 152, 161, 161n, 309n, 345n, 360n, 368 - 70, 370n, 377n, 404 - 06, 406n, 451 - 55, 453 - 55n, 461 - 62, 462n, 465 - 66, 467n, 472 - 76, 472 - 77n, 477n, 515n, 554 - 55, 576, 576 - 77n, 588, 588n, 591n, 612, 630 - 32, 630n, 635 - 39n, 635 - 40, 643n, 645n, 646, 647n, 654 - 55n, 658n, 693, 693 - 94n, 701 - 12n, 701 - 12, 720 - 21n, 721, 752 - 54n, 785, 797, 797 - 98n, 801, 801 - 02n, 807n, 810n, 813 - 15n, 821, 827 - 28n, 840, 841 - 46, 842 - 46n, 849, 856n, 862 - 70, 863 - 70n, 874n, 886n, 887, 916n, 918, 924n, 932n, 953n, 989, 995n, 1001 - 05, 1005n, 1009 - 11, 1009 - 11n, 1014 - 15n, 1034 - 35, 1044 - 45. *See also* Austrian School
另见奥地利学派
- Hazlitt, Henry 亨利·黑兹利特 494n, 570n, 718 - 19n, 794 - 95, 794n, 801, 803, 803 - 04n, 830, 838, 863 - 66, 869, 873, 885 - 86, 885n, 892, 902 - 03n, 903, 906, 909 - 13, 929, 932, 981, 989, 992 - 93n, 1001, 1002n, 1004n, 1005, 1039
- Hearnshaw, F. J. C. F. J. C. 赫恩肖 445
- Hébert, Robert 罗伯特·埃贝尔 107n, 128n
- Heckscher, Eli 伊莱·赫克舍 717n, 827 - 28n
-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42
- Heilperin, Michael 迈克尔·海尔佩林 688n, 697, 850n
- Heimann, Eduard 爱德华·海曼 243n, 336n, 654, 737n, 792n
- Heimann, Oscar 奥斯卡·海曼 515n
- Helfferrich, Karl 卡尔·黑尔费里希 177, 225, 225n, 226 - 27n, 228, 458, 459, 498
- Hellwig, Hans 汉斯·赫尔维西 436n, 785n, 1007, 1007 - 08n, 1008n
- Helmholtz 黑尔姆霍尔茨 126n
- Hennecke, Hans Jörg 汉斯·约尔格·亨内克 370n, 639n, 707n
- Hennings, Klaus H. 克劳斯·H. 亨宁斯 139n, 141n, 143n, 151n, 162 - 63n
- Herbener, Jeffrey 杰弗里·赫布纳 xiv, 162n, 1022n
- Herder 赫尔德 465
- Herkner,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赫克纳 202, 204n
- Herkner, Heinrich 海因里希·赫克纳 393, 397, 397n, 398, 398n, 510, 538, 663
- Herriot 埃里奥 509
- Hertz, Wilhelm 威廉·赫兹 690 - 91n
- Herz, Friedrich Otto 弗里德里希·奥托·赫兹 66
- Herzegovina 黑塞哥维那 49 - 50, 193
- Herzfeld, Marianne von 玛丽安娜·冯·赫茨菲尔德 365, 366n, 417, 418, 731n, 795n, 796n
- Herzl, Theodor 西奥多·赫茨尔 30n
- Herzog, defined 公爵 335
- Hesson, Robert 罗伯特·黑森 929, 998

- Heydrich, R. R. 海德里希 727n
- Heyn, Otto 奥托·海恩 244-45n, 798
- Hicks, John R. 约翰·R. 希克斯 128n, 554, 554n, 631, 635, 637n, 641n
- High, Jack 海伊·杰克 547n
- Hildebrand, Bruno 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 124, 124n, 142
- Hildebrand, Dietrich von 迪特里希·冯·希尔德布兰德 804
- Hilferding, Rudolf 鲁道夫·希法亭 37, 145, 163-64, 226-27n, 235, 250n, 437n
- Hilgerdt 希尔格特 691
- Hillman, Alex 亚历克斯·希尔曼 904
- Himmler, Heinrich 海因里希·希姆莱 726
- Hintner, Valentin 瓦伦丁·欣特纳 36
- Hirsch, Alexander 亚历山大·希尔施 817n
- Hitler, Adolf 阿道夫·希特勒 75n, 537, 561n, 565-66, 661, 663, 678-79, 689, 694-95, 726, 729, 729n, 740-41, 747, 804, 819, 968, 987. *See also* Nazism; World War II 另见纳粹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
- Hobhouse, Leonard 伦纳德·霍布豪斯 538, 538n
- Hoening,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赫尼希 900n
- Hoff, Trygve 特里格维·霍夫 865, 865n, 982n
- Hoffmann-Laroche family 奥夫曼·拉罗什家族 686n
- Hohenstein, Leo Thun von (Count) 莱奥·图恩·霍恩施泰因(伯爵) 35, 37
- Hoiles, Harry 哈里·霍伊尔斯 1025
- Hoiles, Raymond Cyrus 雷蒙德·塞勒斯·霍伊尔斯 824, 826n, 830n, 858, 858n, 1014-15n, 1025, 1026n, 1029
- Hollander, Paul 保罗·霍兰德 713n
- Holtfrerich, Carl-Ludwig 卡尔-路德维希·霍尔特弗雷里希 588n
- Holzbauer, Georg 格奥尔格·霍尔茨鲍尔 292n, 312n
- Hood 胡德 789
- Hoor, Ernst 恩斯特·霍尔 580n, 647n, 676n, 677n, 678-79, 804n, 817-18n
- Hoover, Herbert 赫伯特·胡佛 627, 846n
- Hoppe, Hans-Hermann 汉斯-赫尔曼·霍佩 xiv, 162n, 404n, 469-70n, 1017n, 1022n
- Horsch, Vada 瓦达·霍尔施 890n, 943n
- Hoselitz, Bert 贝尔特·霍斯利茨 797n
- Huddleston, Sisley 西斯莉·赫德尔斯顿 449n, 712n
- Hué, Otto 奥托·休 336n
- Hufeland, Gottlieb 戈特利布·胡费兰 115n
- Hula, Erich 埃里希·胡拉 798n, 804, 812, 812n, 827-28n
- Hula family 胡拉家族 795
- Hull, Cordell 科德尔·赫尔 819
- Hülsmann, Jörg Guido 约尔格·吉多·许尔斯曼 404n, 1017n
- Humboldt, W. von W. 冯·洪堡 126n, 465
- Hume, David 大卫·休谟 243n, 555n, 769, 964, 969, 981n
- Hummel, Jeffrey 杰弗里·赫梅尔 945
- Huncke, George D. 乔治·D. 汉克 916n, 918
- Hunold, Albert 阿尔贝·于诺 826n, 872n, 1003, 1004n, 1005n, 1009, 1010, 1011

- Husserl, Edmund 埃德蒙德·胡塞尔
165, 165n, 833 - 34n
- Hutchinson, Terence 特伦斯·哈钦森
707n
- Hutt, William 威廉·赫特 631, 635,
827 - 28n
- Ikeda, Yukihiko 池田行彦 81n, 102n,
103n, 115n, 382n
- Ilau, Hans 汉斯·伊劳 838n
- Itschitani 石谷 674
- Itzig, Fanny 范妮·伊茨格 28 - 29n
- Iwai, Jujiro 岩井次郎 849n, 915n
- Izoulet 伊祖莱 430
- Jaffé, William 威廉·雅费 106 - 07n,
128n, 130 - 31n, 134, 135, 135n, 288n
- Jahn, Georg 格奥尔格·雅恩 509 -
10n, 510, 511 - 12, 511n, 588n
- James, William 威廉·詹姆斯 983
- Janovsky, Dr 亚诺夫斯基博士 516,
516n
- Janssen 扬森 642
- Jenks, Jeremiah W. 杰里迈亚·W. 詹克斯
454
- Jevons, William Stanley 威廉·斯坦利·
杰文斯 127 - 31, 130 - 31n, 133 - 34n,
134, 148n, 153, 157 - 58n, 170, 218,
223 - 24, 406n, 555, 590
- Jewkes 朱克斯 872n, 1004n
- Jitta, Josephus 约瑟夫斯·吉塔 630n,
885n, 1005n
- Johnson, M. H. M. H. 约翰逊 859n
- Johnston, William 威廉·约翰斯顿 17,
17n, 20n, 23n, 26 - 28n, 32n, 35n,
38n, 50n, 54n, 62n, 116, 116n, 952n
- Jones, Mark 马克·琼斯 878n
- Joseph II (Emperor) 约瑟夫二世(皇帝)
6, 71, 91 - 92
- Kafka, Alexandre 亚历山大·卡夫卡
696n
- Kahane, Jacques 雅克·卡亨 482
- Kaindl, R. F. R. F. 凯因德尔 73
- Kaldor, Nicholas 尼古拉斯·卡尔多
631
- Kallir, Klara. See Landau, Klara (Kallir)
克拉拉·卡里尔, 见克拉拉·兰道(卡里
尔)
- Kallir, Otto 奥托·卡里尔 804, 804n
- Kallir family 卡里尔家族 27 - 28, 795
- Kamitz, Reinhard 赖因哈德·卡米茨
230n, 837n
- Kann, Robert 罗伯特·卡恩 62n
- Kant, Immanuel 伊曼努尔·康德 41 -
42, 42n, 126 - 27, 1019
- Kantorowicz, Hermann 赫尔曼·坎托罗维
奇 204n, 664
- Kapp, Karl 卡尔·卡普 797n
- Karl (Emperor) 卡尔大帝 325 - 27
- Karolyi, Michael 米夏埃尔·卡罗伊 326
- Kaser, Kurt 库尔特·卡泽尔 66
- Katz, Howard S. 霍华德·S. 卡茨 1043n
- Katz, Otto 奥托·卡茨 294, 294n
- Kauder, Emil 埃米尔·考德 112n, 925n
- Kaufmann, Felix 费利克斯·考夫曼
406n, 674, 675, 675n, 678 - 79, 680i,
795
- Kautsky, Karl 卡尔·考茨基 37n, 56,
58, 58n, 371, 377n
- Kéler, Sigismund von (General) 西吉斯蒙
德·冯·凯莱尔(将军) 163
- Kelsen, Hans 汉斯·凯尔森 41 - 42,
42n, 60, 66, 67n, 274n, 283, 289n, 363 -
64, 368, 368n, 466, 472, 472n, 690,
690n, 731 - 33, 752, 752n, 827 - 28n,

- 987
- Kemmerer, Edwin 埃德温·凯默勒 823
- Kennedy, John F. (President) 约翰·F. 肯尼迪(总统) 941n, 1008
- Keynes, John Maynard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233, 244n, 449n, 494, 494n, 508 - 09, 509n, 514 - 17, 533n, 536, 536n, 539 - 40n, 549, 551 - 52n, 565 - 68n, 570 - 71n, 570 - 72, 583, 632 - 34, 633n, 638 - 42, 642n, 647, 649n, 716 - 17n, 716 - 18, 763, 801, 823, 838, 848, 881, 926, 1048
- Kierdorf 基尔多夫 198
- Kindleberger, Charles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 755
- King, Hugh P. 休·P. 金 927, 927n
- Kingsley, Charles 查尔斯·金斯利 789
- Kirk, Russell 罗素·柯克 991, 1002, 1002n
- Kirzner, Israel 伊斯雷尔·柯兹纳 xiv, 138n, 172n, 555n, 847, 917, 924 - 25n, 927 - 28, 928n, 988, 990, 1039
- Kittredge, Tracy 特蕾西·基特里奇 479n, 689n
- Klang, Marcel 马塞尔·克朗 265n
- Klarmann, Stella (Mises) 施特拉·克拉尔曼 16n
- Klein, Peter 彼得·克莱因 791n, 795
- Klein, Wilhelm 威廉·克莱因 628n
- Knapp, Georg F. 格奥尔格·F. 克纳普 68, 68n, 72, 195n, 202, 221 - 23n, 221 - 23, 244 - 45n, 248, 273, 493n, 754n
- Knies, Carl 卡尔·克尼斯 142, 149
- Knight, Frank 弗兰克·奈特 674, 722, 838, 852, 852n, 869, 872n, 910, 1048
- Knopf, Alfred A. 阿尔弗雷德·A. 克诺夫 865n
- Koeppel, Leon 莱昂·克佩尔 797n
- Koerber (Prime Minister) 克贝尔(首相) 194
- Koether, George 格奥尔格·克特尔 888, 929, 988
- Kohlberg, Alfred 阿尔弗雷德·科尔伯格 838, 846n, 892, 902, 913n
- Köhler,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克勒 728n, 832n, 833 - 34n
- Kohn, Abraham (Rabbi) 亚伯拉罕·科恩 13
- Kokkalis, Alexander 亚历山大·科卡利斯 999 - 1000n
- Komorczynski, Johann von 约翰·冯·科莫齐恩斯基 139
- König, Wilhelm 威廉·柯尼格 350
- Koopmans 科普曼斯 691
- Köppel 克佩尔 615n
- Kotarbinski, Tadeusz 塔德乌什·科塔宾斯基 719, 720n
- Kouba, Karel 卡雷尔·库巴 1035, 1036, 1036n
- Kraus, Alfred (Gen.) 阿尔弗雷德·克劳斯(将军) 294, 296, 297
- Krizek, Jurij 尤里·克里策克 270 - 71n, 325n
- Kromphardt 克龙普哈特 659
- Kuczynski 库琴斯基 588
- Kuehnelt-Leddihn, Erik Ritter von 埃里克·里特·冯·屈内尔特-莱丁 5, 6n, 33n, 61n, 63n, 65n, 75n, 175, 176n, 678 - 79, 833 - 34n, 991
- Kyn, Oldrich 奥尔德日赫·基恩 1036
- Lachaume, Lhoste 洛斯特·拉绍姆 873n
- Lachmann, Ludwig 路德维希·拉赫曼 631, 887, 888n, 947n, 990

- LaFollette, Suzanne 苏珊娜·拉夫莱特 838, 903, 906, 909, 912-13, 991
- Lambach, Walter 瓦尔特·兰巴赫 370n
- Lambert, Casimir. *See* Casimir-Lambert V. 卡齐米尔·兰伯特, 见 V. 卡齐米尔-兰伯特
- Lammasch, Heinrich 海因里希·拉马施 483-84
- Lampe, Adolf 阿道夫·兰佩 312n
- Landau, Adele. *See* Mises, Adele (Landau) 阿德勒·兰道, 见 阿德勒·米塞斯(兰道)
- Landau, Alfred 阿尔弗雷德·兰道 264n
- Landau, Fischel 菲舍尔·兰道 9, 9n, 28
- Landau, Joachim 约阿希姆·兰道 10, 10n
- Landau, Karl 卡尔·兰道 9
- Landau, Klara (Kallir) 克拉拉·兰道(卡里尔) 9
- Landau, Max 马克斯·兰道 267
- Landau family 兰道家族 27-28
- Landauer, Carl 卡尔·兰道尔 403, 403n, 782n, 792n, 999-1000n
- Landesberger, Herr von 赫尔·冯·兰德斯贝格 273, 350
- Lane, Rose Wilder 罗丝·怀尔德·莱恩 838-40, 859-60, 859n, 860n, 1025
- Lange, Oskar 奥斯卡·兰格 782n, 1035-36
- Langer, Olgierd 奥尔吉耶德·朗格尔 821n
- Laski 拉斯基 369
- Lassalle 拉萨尔 56
- Lassen, Kurt 库尔特·拉森 902n
- Lauterbach, Albert 阿尔伯特·劳特巴赫 626n
- Lavergne 拉韦涅 735
- Law, John 约翰·劳 215n, 233-34, 234n
- Lazarsfeld, Paul 保罗·拉扎斯菲尔德 367
- Lederer, Emil 埃米尔·莱德雷尔 145, 248, 269, 331, 332n, 336-39, 337n, 339n, 351n, 372, 378-80n, 380, 623-25, 623n, 654-55n, 657n, 662, 668, 669n, 672, 792n
- Leduc, Gaston 加斯顿·勒迪克 704n
- LeFevre, Robert 罗伯特·勒费夫尔 1025, 1029
- Leidig 莱迪 198
- Lemberger, Hedwig 黑德维希·伦贝格尔 645n, 646n
- Lenard (Professor) 莱纳德(教授) 665-66
- Leo XIII (Pope) 利奥十三世(教皇) 484-85n
- Leoni, Bruno 布鲁诺·莱昂尼 1025n
- Lerner, Abba 阿巴·勒纳 631, 782n
- Leser, Norbert 诺伯特·莱泽 58n, 123n, 335n
- Levine, Isaac Don 艾萨克·唐莱文 892
- Lévi-Strauss, Claude 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 979, 979n
- Lexis, Wilhelm 威廉·莱克西斯 221, 221n, 244-45n
- Liberman, Yevsey G. 叶夫谢·G. 利伯曼 783n
- Lieben, Richard 里夏德·利本 154-55n, 243n
- Liefmann, Robert 罗伯特·利夫曼 437n, 551, 551n, 660
- Lieser, Helene 海伦妮·利泽尔 365, 417, 418, 575, 733, 799n
- Liggio, Leonard 伦纳德·利焦 929, 998, 1025

- Lincoln, Abraham 亚伯拉罕·林肯 1028
- Linert, Gustav 古斯塔夫·利纳特 628n
- Linoch, Oberst (Col.) 奥伯斯特·林诺奇
(上校) 296, 296n
- Lippincott, Benjamin E. 本杰明·E. 利平
科特 370n, 703n
- Lippmann, Walter 瓦尔特·李普曼 734 -
40, 735n, 738n, 864, 870
- Lipsett 利普塞特 999n
- Litvinov 李维诺夫 712 - 13
- Locke, John 约翰·洛克 308, 308n,
666
- Loebl, Rudolf 鲁道夫·勒布尔 797n
- Loewe, Adolf 阿道夫·勒韦 792n
- Lotz, Johann F. E. 约翰·F. E. 洛茨
382n
- Loveday, Alexander 亚历山大·洛芙迪
642, 691
- Loverude, Otto 奥托·洛夫鲁德 810n
- Löw, Julius 尤利乌斯·勒夫 289n
- Löwe, Adolf 阿道夫·勒韦 573, 573n,
588, 588n
- Ludendorff 鲁登道夫 326
- Lueger, Karl 卡尔·卢埃格尔 36 - 37,
55, 341
- Luhnow, Harold W. 哈罗德·卢诺 867 -
68, 867n, 876, 941n, 1004n
- Lutz,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卢茨
588n, 850n
- Lyons, Eugene 尤金·莱昂斯 892
- Mach, Ernst 恩斯特·马赫 167, 168 -
69n, 666
- Machlup, Fritz 弗里茨·马克卢普 366 -
68, 367n, 404, 465 - 66, 477 - 79n,
477 - 79, 576 - 77n, 646, 647n, 652,
674n, 678, 694 - 95, 695n, 698 - 99n,
698 - 702, 702n, 709, 712, 716, 716n,
722n, 730n, 734n, 748 - 49, 748 - 49n,
753 - 54, 773n, 790, 792, 792n, 794n,
797, 799n, 802n, 808 - 09n, 816n,
827 - 28n, 828 - 32, 832 - 39n, 860,
861n, 869, 931, 932n, 933 - 35n, 1000,
1010 - 11n, 1032, 1032 - 33n, 1036 -
37, 1036n
- Machovec, Frank 弗兰克·马霍韦茨
547n
- Mackensen 马肯森 278, 325n
- Macleod, Henry D. 亨利·麦克劳德
234n
- Madariaga, Salvador de 萨尔瓦多·德马
达利亚加 806n, 1026 - 29, 1027 - 29n
- Madden, John T. 约翰·T. 马登 793
- Mader 马德 723n
- Malthus 马尔萨斯 789
- Mandeville 曼德维尔 981n
- Mannheim, Karl 卡尔·曼海姆 664,
665, 665n
- Mantoux, Etienne 艾蒂安·芒图 570n
- Mantoux, Paul 保罗·芒图 687 - 88,
690 - 92, 697, 754, 754n, 797n
- Marcuse 马尔库塞 1037
- Maresch, Rudolf 鲁道夫·马雷施 184
- Maria Theresa (Empress) 玛丽亚·特蕾西
亚(皇后) 11, 11n, 36, 62, 91
- Marlio 马利欧 735
- Marschak 马尔沙克 702n
- Marshall, Alfred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115n, 164, 567 - 68n
- Marshall, George 乔治·马歇尔 877,
878
- Marsilius of Padua 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
412n
- Martin, Xavier 格扎维埃·马丁 414n
- Marx, Karl 卡尔·马克思 57, 58n,
115, 149, 226 - 27n, 369, 376, 378n,

- 385 - 86, 409, 413, 426, 551, 558, 558n, 565 - 66n, 665 - 66, 846, 926, 991. *See also* Marxism 另见马克思主义
- März, Eduard 爱德华·梅尔茨 162 - 63n, 164n, 369n, 371n, 703n
- Mataja, Victor 维克托·马塔亚 139
- Maurois, André 安德烈·莫洛亚 830, 830n
- Mautner, Manfred 曼弗雷德·毛特纳 574n, 575n, 576 - 77n
- Mayer, Hans 汉斯·迈尔 151n, 153n, 191n, 368, 467 - 69, 468n, 471n, 476, 575, 700n, 729 - 30, 835
- Mayers, Richard 里夏德·迈尔斯 730
- Mayr, Michael 米夏埃尔·迈尔 479 - 80
- McCulloch, John Ramsey 约翰·拉姆齐·麦卡洛克 789, 935, 935n
- McFalls, John 约翰·麦克福尔斯 1039
- McGee, Robert W. 罗伯特·W. 麦吉 1037n, 1043
- McGhee, Paul 保罗·麦吉 926n
- McLeod 麦克劳德 1029n
- Meade 米德 691
- Meehl 米尔 1030n
- Meinl, Julius 尤利乌斯·迈因尔 370n, 646 - 47
- Mellish 梅利什 484 - 85n
- Memel 默默尔 70
- Mendel 孟德尔 178
- Menger, Carl 卡尔·门格尔 63, 67n, 80 - 83, 87 - 90, 95, 101 - 17, 102n, 122 - 23, 124n, 130 - 31n, 136n, 140n, 146 - 53, 148n, 153n, 159 - 61, 160n, 170, 177, 183n, 212, 212n, 215, 215n, 221 - 24, 222 - 23n, 235 - 38, 264, 308 - 10, 309n, 360n, 381 - 91, 382n, 389 - 90n, 390n, 515n, 524, 555, 589, 592, 671, 721 - 22n, 729, 754n, 762, 762n, 770, 774n, 779, 786n, 1049. *See also* Austrian School 另见奥地利学派
- Menger, Max 马克斯·门格尔 102, 104
- Métall, Rudolf A. 鲁道夫·马特尔 42n, 368n
- Meunier, Dauphin 多芬·穆尼尔 843n
- Meyendorff 梅耶多夫 446n, 612n
- Meyer, Frank S. 弗兰克·S. 迈耶 941, 942n, 991
- Meyer, Robert 罗伯特·迈尔 139, 184
- Meyer, Rudolf 鲁道夫·迈尔 439
- Meyerson, Émile 埃米尔·迈尔松 700n
- Meyerson, Helene 海伦妮·迈尔松 284
- Michel, Bernard 贝尔纳·米歇尔 505n
- Michels, Robert 罗伯特·米歇尔 795
- Midutani 水谷 674
- Miksch 米克施 1007 - 008n
- Mildschuh, W. W. 米尔德舒 226 - 27n
- Milford, Karl 卡尔·米尔福德 124n, 729n
- Mill, John Stuart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165, 224, 224n, 226 - 27n, 239n, 243n, 380 - 87, 381n, 406, 424 - 25, 454, 525n, 565 - 66n, 789
- Miller, Loren 洛伦·米勒 875 - 76, 876n, 927n, 1005
- Millerand, Alexander 亚历山大·米勒兰 333, 333n
- Mintz, Ilse 伊尔塞·明茨 417
- Miquel, John von 约翰·冯·米凯尔 333, 333n
- Mischler, Peter 彼得·米施勒 102
- Mises, Abraham 亚伯拉罕·米塞斯 14
- Mises, Adele von (Landau) 阿德勒·冯·米塞斯(兰道) 9 - 10, 17, 17n, 18, 30, 30n, 261, 708
- Mises, Arthur Edler von 阿瑟·埃德勒·

- 冯·米塞斯 9-10, 16, 17, 30, 74-77,
- Mises, Clara 克拉拉·米塞斯 16
- Mises, Efraim Fischel 埃夫拉伊姆·菲舍尔·米塞斯 11
- Mises, Elise. *See* Bernstein, Elise (Mises) 埃莉泽·米塞斯, 见埃莉泽·(米塞斯)伯恩斯坦
- Mises, Emil von 埃米尔·冯·米塞斯 17n
- Mises, Felix von 费利克斯·冯·米塞斯 17n
- Mises, Hermann von 赫尔曼·冯·米塞斯 10-11, 10n, 17n
- Mises, Hirsche 希尔舍·米塞斯 15n
- Mises, Jehuda Löb 耶胡达·勒布·米塞斯 7
- Mises, Ludwig von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 addressing of 地址 335
- alienation of 被疏远 698-708
- American citizenship and 美国国籍和 832-35
- Austrian School and. *See* Austrian School 奥地利学派
- bookkeeping skills and 记账技巧和 18n
- career choice of 择业 59-60
- cultural background of 文化背景 30n
- death of 去世 888, 890, 1016
- education of. *See* Education 教育
- on German economics 评论德国经济 19n
- as "last knight of liberalism," 作为“最后的自由主义骑士” 1043-49
- legacy of 遗产 1037-42, 1048
- marriage of 婚姻 517-22, 606-10, 726, 730, 731, 732, 733. *See also* Mises, Margit von (Serény)
- 另见玛吉特·冯·(谢雷尼)米塞斯
- military service and. *See* Military service 服役, 见服兵役
- professional life career choice and 职业生涯和职业选择 59-60
- challenges of 挑战 193-95
- development of 发展 175-79
- difficult start of 万事开头难 179-82
- Kammer, *see also* Kammer 商会 187-93, 205-07
- theory of money and 货币理论 207-09
- transition to academia and 过渡到学术界 182-87
- Verein für Socialpolitik and 社会政策协会和 195-205
- works of 著作
- Mises, Margit von (Serény) 玛吉特·冯·米塞斯(谢雷尼) 18n, 39n, 365-66n, 406n, 517-18n, 517-22, 521n, 606-09n, 606-10, 612n, 666-67n, 684, 697-98, 698n, 708, 725-26n, 726, 730-33, 731n, 734n, 746, 755, 756-57n, 790-91, 792n, 794n, 796n, 802-03, 807-08, 808n, 874, 876n, 881, 886-90, 888-89n, 1015-16n, 1016, 1022n, 1032, 1032n, 1037n
- Mises, Marie (Nirenstein) 玛丽(尼伦施泰因)·米塞斯 15n
- Mises, Meyer Rachmiel 迈尔·拉赫米尔·米塞斯 3, 12-14, 15, 16
- Mises, Richard von 里夏德·冯·米塞斯 18, 262, 262n, 264-65, 264n, 730n, 734n, 748, 873, 874n, 904-05n
- Mises, Rosa (Halberstamm) 罗萨·米塞斯(哈伯斯塔姆) 12
- Mises, Stella. *See* Klarmann, Stella (Mises) 施特拉·米塞斯, 见施特拉(米塞斯)·

- 克拉尔曼
- Mitchell, Allan 艾伦·米切尔 393n
- Mitchell, Wesley 韦斯利·米切尔 454, 454n, 822n
- Moffit, Mrs. Powell 鲍威尔·莫菲特太太 1029n
- Moley, Raymond 雷蒙德·莫利 903, 904n
- Molinari, Gustave de 古斯塔夫·德莫利纳里 737n, 940
- Mongiovi, Gary 加里·蒙焦维 792n
- Monroe, Arthur E. 阿瑟·E. 门罗 215n
- Montes de Oca, Luis 路易斯·蒙特斯·德·奥卡 571n, 806-07, 807n, 813-14n, 813-16, 816n, 827-29, 827-29n, 843n, 862-63, 862n, 881, 881-82n
- Montesquieu 孟德斯鸠 275, 275n, 406, 454
- Morgenstern, Oscar 奥斯卡·摩根斯特恩 368, 404, 576-77n, 646-47, 647n, 652, 675n, 722-23n, 792, 793n, 846-47n, 886-87n
- Morley, Felix 费利克斯·莫利 838, 840, 1005
- Mozart, Wolfgang Amadeus 沃尔夫冈·阿马多伊斯·莫扎特 26-27n
- Müller-Armack, Alfred 阿尔弗雷德·米勒-阿尔马克 878, 935n, 1008n
- Murata, Toshio 村田敏夫 924-25n
- Musil, Robert 罗伯特·穆西尔 48
- Mussard, André 安德烈·米萨尔 693n
- Mussolini 墨索里尼 678-79, 689, 968
- Muthesius, Peter 彼得·穆特修斯 432-33n
- Muthesius, Volkmar 沃尔克马尔·穆特修斯 493n, 739n, 880n, 1007-08, 1007n
- Nadler 尼德勒 835
- Napoleon 拿破仑 7, 74, 109, 305
- Nash, George H. 乔治·H. 纳什 841n, 844n, 846n, 852n, 857n, 901n, 903n
- Nasse, Erwin 埃尔温·纳塞 119
- Nataf, Philippe 菲利普·纳塔夫 499n, 945
- Nathaniel Branden Institute 纳撒尼尔·布兰登学会 1013
- Nau, Heino Heinrich 海诺·海因里希·瑙 197n, 204n
- Naumann,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瑙曼 196, 198-99, 198n, 432, 537, 538
- Nell-Breuning, O. von O. 冯·内尔-布罗伊宁 443, 443n, 677n
- Nemschak, Franz 弗朗茨·内姆沙克 574-77n, 1014-15n
- Neudeck, Werner 维尔纳·诺伊德克 468n, 476n, 569n
- Neupauer, Josef von 约瑟夫·冯·诺伊保尔 221, 221n
- Neurath, Otto 奥托·纽伊拉特 145-46, 186, 186n, 352n, 371, 371n, 393, 393n, 781
- Neu-Sandez, 新松奇(今属波兰) 102, 264
- Nicholas II (Tsar) 尼古拉二世(沙皇) 96-97
- Nirenstein, Hugo 胡戈·尼伦施泰因 265
- Nirenstein, Isidor 伊西多尔·尼伦施泰因 9n
- Nirenstein, Marie. See Mises, Marie (Nirenstein) 玛丽·尼伦施泰因, 见玛丽(尼伦施泰因)·米塞斯
- Nirenstein, Martin 马丁·尼伦施泰因 261, 265
- Nirenstein, Otto 奥托·尼伦施泰因

- 804, 804n
- Nirenstein family 尼伦施泰因家族 27 - 28, 733
- Nixon, Richard 理查德·尼克松 1037
- Nock, Albert J. 阿尔伯特·J. 诺克 833 - 34n, 991
- Nurkse, Ragnar 罗格纳·纳克斯 576 - 77n, 674, 691, 827 - 28n
- Nutter 纳特 1004n
- Nymeyer, Frederick 弗雷德里克·尼迈耶 574, 586n, 826n, 849n, 853 - 56, 853n, 855 - 56n, 889n, 898, 899n, 902 - 03n, 905n, 913 - 19, 913n, 916n, 918 - 19n, 972, 981n, 999n, 1004, 1005n, 1015, 1022, 1022n, 1035n
- O'Brien, D. P. D. P. 奥布赖恩 481n, 700n
- Oca, Montes de 蒙特斯·德奥卡 798n
- Opitz, Edmund 埃蒙德·奥皮茨 1013
- Oppenheim, Heinrich Bernard 海因里希·贝尔纳德·奥本海默 118n
- Oppenheimer, Franz 弗朗茨·奥本海默 204n, 362, 492n, 551, 551n, 659 - 60, 876n
- Oppenheimer, Hilde 希尔德·奥本海默 287n
- Oresme, Nicholas 尼古拉·奥雷姆 503 - 04, 504n, 1049
- Painlevé 潘勒韦 509
- Paish, George 乔治·佩什 492n
- Palla, Edmund 埃德蒙·帕拉 614
- Palyi, Melchior 梅尔希奥·帕伊 565 - 66n
- Papi, Ugo 乌戈·帕皮 87n, 660n
- Pareto, Vilfredo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 133 - 34n, 590, 590n, 597, 597 - 98n, 637, 705, 706, 785
- Parker 帕克 443n, 677n
- Passow 帕索 196, 654 - 55n
- Paterson, Isabel 伊莎贝尔·佩特森 838, 839
- Patinkin, Don 唐·帕廷金 240, 240n
- Patterson, Samuel 塞缪尔·帕特森 688
- Patzauer, Hans 汉斯·帕曹尔 486
- Paul, Ron 罗恩·保罗 1035n
- Paupié, Kurt 库尔特·波皮耶 103n
- Pegrum 佩格勒姆 749
- Pelzer, Richard 里夏德·佩尔策 182
- Penrose, Professor 彭罗斯教授 753 - 54n
- Perels, Emil 埃米尔·佩雷尔斯 184, 272, 274, 274n, 364, 452, 485n, 575, 795, 795 - 96n
- Peron 庇隆 968
- Perpignan 佩皮尼昂 755, 756
- Perroux, François 弗朗索瓦·佩鲁 674 - 75, 709, 759n, 874n
- Pesch, Heinrich 海因里希·佩施 398n
- Pétain, Marshall 马歇尔·贝当 756
- Peter, W. F. W. F. 彼得 846n
- Peterson, William 威廉·彼得森 847, 1040
- Pew, Howard 霍华德·皮尤 838, 846n, 860, 890 - 92, 890n, 891 - 92n, 902, 913, 916n, 922n, 925, 944
- Philbrook 菲尔布鲁克 1004n
- Philippovich, Eugen von 欧根·冯·菲利波维希 63, 77 - 86, 81n, 95n, 139, 184, 185n, 196, 200, 203 - 04, 273, 276n, 283, 409, 466, 468n, 538
- Pick, Käthe 克特·皮克 364n
- Pierson, Nicolas G. G. 尼古拉·皮尔逊 377n, 454n, 702
- Pigou, A. C. A. C. 庇古 619n

- Pius IX 庇护九世 438n
 Pius XI 庇护十一世 677
 Plant, Arnold 阿诺德·普兰特 482, 635n, 827, 827-28n, 828, 1004n
 Platzner, Wilfried 维尔弗里德·普拉策 1034n
 Plöchl 普勒克 835
 Pohle, Ludwig 路德维希·波勒 121, 177n, 196, 199, 309-10, 310n, 393n, 542, 660
 Poirot, Paul 保罗·普瓦罗 914
 Polak 波拉克 691
 Polanyi, Michael 迈克尔·波兰尼 343, 343n, 712, 869
 Pollak, Herr 赫尔·波拉克 297
 Popper, Karl 卡尔·波普尔 197n, 412n, 869, 881, 1017-18n
 Pösendeiner, Hofrat 霍夫拉特·波森德纳 433n
 Possony, Stefan 斯特凡·波斯尼 312n, 696, 1009-10n
 Potter, Pitman 皮特曼·波特 690, 740, 753-54n, 796n, 812n, 827-28n
 Prentis, W. W. 普伦蒂斯 846n
 Pribram, Alfred Francis 阿尔弗雷德·弗朗西丝·普里布拉姆 569n
 Pribram, Ewald 埃瓦尔德·普里布拉姆 184, 258, 272, 272n, 364
 Pribram, Karl 卡尔·普里布拉姆 67n, 184, 269, 272, 274, 274n, 280-81, 364, 370n, 533, 575, 674, 691
 Proudhon 蒲鲁东 253n
 Przemysl 普热梅希尔 258, 266
 Quesnay 魁奈 109
 Radványi, Jorge 约尔格·劳德瓦尼 646n
 Raico, Ralph 拉尔夫·莱科 xiv, 78n, 118n, 119-20, 120n, 198n, 537-38n, 560n, 713n, 847, 896-97n, 896-97, 929, 932n, 937n, 981, 998, 1001, 1025, 1029, 1042n
 Râmnicu Vâlcea 勒姆尼库沃尔恰 280
 Rand, Ayn 安·兰德 541n, 803, 838, 883, 928-32, 930n, 935n, 936-37, 937n, 989, 996-02, 996n, 998-99n, 1001-02n
 Ranshofen-Wertheimer, Egon 埃贡·冉斯霍芬-维尔特海玛 819
 Rappard, Dr. William 威廉·拉帕特博士 184-85, 684n, 685-96, 686n, 692-93n, 693n, 696n, 752n, 754, 754n, 756, 756-57n, 800n, 827, 827-28n, 872n, 935n, 1005n
 Rathenau, Walther 瓦尔特·拉特瑙 370, 370n, 371
 Rau, Karl Heinrich 卡尔·海因里希·拉乌 382-83n
 Read, Leonard 伦纳德·里德 824, 824-25n, 843, 845, 849-53, 851n, 869, 875, 875n, 878, 885, 893n, 907, 907n, 908, 943, 989, 989n, 990, 1041
 Regnery, Henry 亨利·勒涅里 913n
 Reichmann, Charlotte von 夏洛特·冯·赖希曼 613-14n, 613-14
 Reig 雷格 1022n
 Reisch, Richard 里夏德·赖施 139, 575, 642n
 Reisman, George 乔治·赖斯曼 847, 896, 896-97n, 917, 927-30, 930n, 937n, 939, 994, 998
 Renan 勒南 1026
 Renner, Karl 卡尔·伦纳 66, 278, 321, 321n, 327-28, 331, 349, 356, 479-80

- Ricardo, David 大卫·李嘉图 56, 108 - 11, 109i, 122, 134, 243n, 246, 252, 276, 323n, 427 - 30, 441, 487n, 501 - 02, 525n, 555, 555n, 565 - 66n, 769, 789, 935, 935n, 1048
- Rickert, Heinrich 海因里希·李凯尔特 600n
- Riedl, Richard 里夏德·里德尔 370n
- Rigg, Bryan Mark 布赖恩·马克·里格 75n
- Rist, Charles 夏尔·里斯特 480, 492n, 688n, 704n
- Rittershausen, Heinrich von 海因里希·冯·里特斯豪森 877n
- Robbins, Lionel 莱昂内尔·罗宾斯 171, 171n, 406, 480 - 81n, 481 - 82, 567, 591 - 92n, 619n, 631 - 40, 634 - 37n, 641n, 643, 643n, 648, 648n, 654 - 55n, 664, 664n, 688n, 694, 698 - 700, 700n, 703n, 709, 721 - 22n, 729, 729n, 735, 827 - 28, 827 - 28n, 869, 872n, 887
- Robinson, Claude 克劳德·罗宾森 763, 838
- Roche 罗奇 1035n
- Rockwell, Lew 卢·洛克韦尔 39 - 40, 41n, 932n, 1035
- Rogge 罗格 926
- Roosevelt, Eleanor 埃莉诺·罗斯福 713
- Roosevelt, Franklin Delano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627, 713, 714, 791n, 811, 824 - 25, 839, 903
- Roover, Raymond de 雷蒙德·德罗弗 112n, 925n, 984n
- Röpke, Wilhelm 威廉·勒普克 406, 587n, 624, 625n, 654 - 55n, 690, 709, 712, 738, 738n, 752 - 53, 752n, 821, 827, 869 - 72, 871n, 872n, 878, 880n, 881, 910, 1005 - 11, 1007 - 11n
- Roscher, Wilhelm 威廉·罗雪尔 109, 109n, 124n, 142
- Rosenbaum 罗森鲍姆 362n
- Rosenberg, Wilhelm 威廉·罗森贝格 140, 357n, 484
- Rosenstein-Rodan 罗森斯坦-罗丹 722 - 23n
- Roth, Lilli 莉莉·罗斯 795 - 96n
- Rothbard, JoAnn 乔安·罗斯巴德 997, 998
- Rothbard, Murray 默里·罗斯巴德 xiv, 111n, 112n, 165n, 368n, 436 - 37, 437n, 490n, 546n, 627n, 766n, 775n, 847, 860, 887, 887n, 893 - 95, 893 - 95n, 929 - 32, 930 - 31n, 935 - 42n, 935 - 42, 981, 987 - 90, 997 - 99, 997n, 1024n, 1025, 1030, 1030n, 1041 - 42, 1042n
- Rothschild, Albert 阿尔伯特·罗特席尔德 14n
- Rothschild, Anselm von 安塞尔姆·冯·罗特席尔德 14n, 628 - 29n
- Rothschild, Kurt 库尔特·罗特席尔德 139n
- Rothschild, Salomon 萨洛蒙·罗特席尔德 8n, 14
- Rothschild family 罗特席尔德家族 30, 54, 628
- Roth-Seeffrid 罗斯-泽弗里德 339 - 40n
- Rott 罗特 812n
- Rougier, Louis 路易·鲁吉耶 735 - 36, 735 - 36n, 754n, 756, 796, 798n, 821, 827, 827 - 28n, 830n, 900n, 923n, 935n, 999, 1015n, 1027n, 1030n
- Rüdendorf, Frieda Becher von 弗里达·贝歇尔·冯·吕登道夫 795 - 96n
- Rudolf (Crown Prince) 鲁道夫(皇储) 102n, 138, 183n

- Rudolf (Emperor) 鲁道夫(皇帝) 880
- Rudolf IV (Emperor) 鲁道夫四世(皇帝)
61
- Rueff, Jacques 雅克·吕夫 619n, 688n,
735, 827-28n, 872n, 1032
- Ruml, Beardsley 比尔兹利·拉姆尔
453-54n
- Ruskin 拉斯金 481
- Russell, Bertrand 伯特兰·罗素 257,
1021, 1021n
- Rüstow, Alexander 亚历山大·吕斯托
736, 739n, 1006
- Ryan 瑞安 943n
- Saint John, Jeffrey 杰弗里·圣约翰
1037
- Saitzew, Manuel 曼努埃尔·赛祖 661
- Salerno, Joseph 约瑟夫·萨莱诺 xiv,
162n, 404n, 469-70n, 1022n, 1044n
- Samuels, Warren J. 沃伦·J. 塞缪尔斯
162-63n
- Samuelson, Paul 保罗·萨缪尔森 330,
783n, 850n
- Sargent, Noel 诺埃尔·萨金特 822n,
823
- Sax, Emil 埃米尔·萨克斯 139, 150
- Say, Jean-Baptiste 让-巴蒂斯特·萨伊
110-11, 122, 149, 215n
- Schams, Edward 埃瓦尔德·沙姆斯
367, 367n
- Schatz 沙茨 981n
- Schell, Josef 约瑟夫·舍尔 630n
- Scherer 舍雷尔 317
- Scheu, Robert 罗伯特·朔伊 648-49
- Schiff, Erich 埃里希·席夫 576-77n,
675n
- Schiller 席勒 465
- Schlesinger 施莱辛格 341
- Schlick, Moritz 莫里茨·石里克 363-
64
- Schmerling (Prime Minister) 施梅林(首
相) 46-47
- Schmidt 施密特 862n
- Schmidt-Essen, Alfred 阿尔弗雷德·施密
特-埃森 512
- Schmitt, Carl 卡尔·施米特 438n,
440n, 575n
- Schmoller, Gustav 古斯塔夫·施穆勒
25, 73, 110n, 117-25, 118i, 156-57,
185n, 186, 197-99, 203-04, 222n,
599
- Schober, Johann (Chancellor) 约翰·朔贝
尔(总理) 483
- Schoeck, Helmut 赫尔穆特·舍克 998-
99n
- Schoelson, Susi 苏西·舍尔森 795-
96n
- Schönfeld-Illy, Leo 莱奥·舍恩菲尔德-
伊利 385n
- Schopenhauer 叔本华 666
- Schorske, Carl E. 卡尔·肖尔斯克 22n,
24, 24n, 30n, 37n, 175n
- Schubert, Franz 弗朗茨·舒伯特 26-
27n
- Schuetzes family 许策家族 795
- Schuhmann, Wolfgang 沃尔夫冈·舒曼
371n
- Schüller, Richard 里夏德·许勒尔 124,
124n, 139, 331, 331n, 572-73, 614n,
795, 804, 1015
- Schullern-Schrattenhofen, Hermann von 赫
尔曼·冯·舒伦-施拉腾霍芬 139,
144n
- Schulz, Ottokar (Col.) 奥托卡尔·舒尔
茨(上校) 269n
- Schumpeter, Joseph 约瑟夫·熊彼特

- 37, 101, 112n, 127, 143 - 45n, 145, 148, 148n, 151, 151n, 162 - 74, 179n, 189n, 208, 208n, 233n, 235, 250n, 269, 273 - 74, 283, 331, 349, 350, 362, 362n, 378, 388 - 89, 388n, 431n, 456n, 468 - 71, 468 - 71n, 493, 505, 530n, 565 - 66n, 588n, 637, 714, 769n, 771, 771n, 846n, 967 - 68n, 987, 1008n
- Schureman 舒尔曼 1037n
- Schuschnigg (Chancellor) 许士尼格(总理) 726
- Schuschnigg, Walter 瓦尔特·许士尼格 812, 812n
- Schütz, Alfred 阿尔弗雷德·许茨 368, 465 - 66, 790, 827 - 28n, 886, 977
- Schwarz, Felix 费利克斯·施瓦茨 492n
- Schwarz, Olly 奥利·施瓦茨 272, 274n
- Schwarz, Paul 保罗·施瓦茨 184
- Schwarzenberg (Prince) 施瓦岑贝格(亲王) 321
- Scitovsky, Tibor de 提勃尔·德·西托夫斯基 631
- Scott, Norman 诺曼·斯科特 185n, 685n, 692n, 697n, 699n
- Seidler, Ernst 恩斯特·塞德勒 140, 362
- Seidman 塞德曼 794n
- Seipel, Ignaz (Monsignor) 伊格纳茨·塞佩尔 328, 443, 483, 484, 486, 854
- Sennholz, Hans 汉斯·森霍尔茨 xiv, 197n, 524n, 847, 850n, 916 - 18n, 917, 924 - 25n, 927 - 32, 933 - 35n, 935, 942 - 45, 944n, 987 - 90
- Sennholz, Mary 玛丽·森霍尔茨 165n, 824n, 932 - 33, 933i, 987, 989n
- Serény, Ferdinand 斐迪南德·谢雷尼 607n
- Serény, Gitta 吉塔·谢雷尼 730, 757, 796
- Serény, Margit. See Mises, Margit von (Serény) 玛吉特·谢雷尼, 见玛吉特·冯(谢雷尼)·米塞斯
- Sering, Max 马克斯·泽林 510
- Seyffert 赛弗特 591n
- Shackle, George 乔治·沙克尔 631
- Shaw, George Bernard 萧伯纳 481
- Shea 谢伊 831n
- Shelly 谢利 926
- Sherrard, Alfred 阿尔弗雷德 887n
- Sickle, John van 约翰·范西克尔 1005
- Siebeck, Paul 保罗·西贝克 616n, 617n
- Siebenbürgen 奥地利特兰西瓦尼亚大公国宪法 320
- Sieghart, Rudolf 鲁道夫·西格哈特 8n, 12n, 38n, 46n, 48n, 50n, 52n, 57 - 58n, 64n, 97n, 140, 144n, 176n, 179n, 194, 194n, 263n, 283, 283n, 300 - 01n, 320 - 21n, 326, 326n, 328n, 439n, 578 - 79n
- Silberner, Edmund 埃德蒙·西尔伯纳 696, 797n
- Simmel, Georg 格奥尔格·西美尔 204n, 388n
- Simon 西蒙 612n
- Simonin, Jean-Pascal 让-帕斯卡尔·西蒙南 128 - 29n
- Simons, Henry C. 亨利·C. 西蒙斯 711, 711n, 838, 852, 852n, 857, 857n
- Singer, Kurt 库尔特·辛格 248, 248n
- Slutzky, Eugen 欧根·斯拉茨基 719, 719n, 721
- Smith, Adam 亚当·斯密 108 - 11, 109i, 122, 137, 138, 215n, 401, 409n, 441, 502, 555n, 693, 693 - 94n, 789, 1045, 1048

- Smith, Vera 薇拉·史密斯 704n
- Sokal, Max 马克斯·索卡尔 269n
- Somary, Felix 费利克斯·索马里 22n, 51n, 52 - 53, 53n, 58 - 59, 59n, 82n, 145, 331, 331n
- Sombart, Werner 维尔纳·桑巴特 156 - 57, 196, 198, 202, 204n, 252n, 372, 492n, 530 - 31n, 530 - 31, 536, 565 - 66n, 661 - 62, 887
- Sommer, Louise 路易丝·佐默 258n, 274, 284, 287n, 362n, 365, 662 - 63, 663n, 733, 797n, 999
- Sonnenfels, Joseph von 约瑟夫·冯·索南费尔斯 11, 62, 62n
- Sorokin 索罗金 998 - 99n
- Spadaro, Louis 路易斯·斯帕达罗 917, 927n
- Spahr, Walter E. 沃尔特·E. 斯帕尔 367n, 847n
- Spann, Othmar 奥特马·施潘 368, 368n, 438n, 466 - 67, 472, 472n, 533, 534n, 536, 557n, 565 - 66n, 649, 659 - 60, 677, 728, 835, 873
- Spelman, Laura 劳拉·斯佩尔曼 453 - 54n, 567, 567n, 568n
- Spithoff, Arthur 阿图尔·施皮特霍夫 471n, 593, 594n, 658, 658n, 659n
- Spitaler, Armin 阿明·斯皮塔勒 886n, 887
- Spitzmüller, Alexander 亚历山大·施皮茨米勒 456 - 57n, 456 - 59, 459n, 484n, 505n
- Sprague 斯普拉格 642
- Springer, Rudolf 鲁道夫·施普林格 321n
See also Renner, Karl 另见卡尔·伦纳
- Sraffa 斯拉法 639
- Srbik 斯比尔克 835
- Stalin 斯大林 712, 747
- Stamp, Josiah 乔赛亚·斯坦普 517
- Stein, Lorenz von 洛伦茨·冯·施泰因 124n, 136
- Steinbach 施泰因巴赫 487n
- Steiner, Fritz G. 弗里茨·G. 施泰纳 289n, 331, 331n, 406n, 581n, 621n, 642n, 653, 653n
- Stigler, George 乔治·斯蒂格勒 469 - 70n, 869, 884n, 885, 925
- Stolper, Wolfgang 沃尔夫冈·施托尔珀 162 - 63n
- Stolzmann, Rudolf 鲁道夫·施托尔茨曼 150n
- Stransky, Erwin 埃尔温·斯特兰斯基 258
- Streissler, Erich 埃里希·施特赖斯勒 115n, 117n, 137, 137n, 183n
- Streissler, Monika 莫尼卡·施特赖斯勒 183n
- Strigl, Richard von 里夏德·冯·施特里格尔 145, 171, 171n, 287, 289n, 365, 465, 549, 576 - 77n, 646 - 47, 701, 827 - 28n *See also* Austrian School 另见奥地利学派
- Stringham 斯特林厄姆 831n
- Stromberg, Joseph 约瑟夫·斯特龙伯格 940n
- Strzygowski, Josef 约瑟夫·斯特泽哥维斯基 363 - 64
- Stuart, Verrijn 维瑞京·斯图亚特 508n, 650, 650n, 654 - 55n, 670
- Stürgkh, Karl (Prime Minister) 卡尔·施蒂尔克 279
- Sturmthal, Adolf 阿道夫·斯特姆赛尔 832n
- Sue, Eugène 欧仁·休 103n
- Sulzbach, Walter 瓦尔特·祖尔茨巴赫 632, 632n, 654 - 55n, 797n, 824n,

- 826n, 827, 827-28n, 828, 850n
- Sulzer, Georg 格奥尔格·祖尔策 155n
- Suttner, Bertha von 贝尔塔·冯·苏特纳 257
- Swedberg, Richard 里夏德·斯韦德贝里 162-63n, 164n
- Sweezy, Paul 保罗·斯威齐 631, 925
- Swets & Zeitlinger 斯韦特和蔡特林格 1015n
- Taggart 塔格特 925n
- Takemura 竹村 674
- Templeton, Kenneth 肯尼斯·邓普顿 868n
- Thieberger, Therese 特蕾泽·蒂贝格尔 300n, 641n, 728n, 795n, 874n, 1015n
- Thiers, Adolph 阿道夫·梯也尔 475n
- Thomas, Albert 艾伯特·托马斯 687n
- Thomas, Woodlief 伍德利夫·托马斯 850n
- Tietze, Hans 汉斯·蒂茨 62n, 872n
- Tinbergen, Jan 扬·廷贝亨 691, 1034
- Tintner, Gerhard 格哈德·廷特纳 576-77n, 675
- Tocqueville, Alexis de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406, 454
- Tönnies, Ferdinand 斐迪南德·滕尼斯 204n
- Tooke, Thomas 托马斯·图克 228, 634
- Toysonby 托伊桑比 635
- Treichl, Alfred 阿尔弗雷德·特赖希尔 181n, 188, 189n
- Treichl, Heinrich 海因里希·特赖希尔 181n, 273-74, 274n
- Trevoux, François 弗朗索瓦·特雷武 1004n
- Troltsch, Alfred 阿尔弗雷德·特勒尔奇 204n
- Troltsch, Ernst 恩斯特·特勒尔奇 204n
- Tschopp, Peter 彼得·乔普 185n, 685n
- Tucker, Rufus 鲁弗斯·塔克 823, 843n
- Tugendhat, Georg 格奥尔格·图根哈特 365, 482, 482n
- Turgot 杜尔哥 109
- Unger 翁格尔 748
- Unger,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翁格尔 790, 795
- Van Sickle 范西克 926
- Veit, Otto 奥托·法伊特 1005
- Velasco 韦拉斯科 806n, 1001n
- Veneto 威尼托 285
- Vereijn, C. A. C. A. 维瑞京 623-24
- Villey, Daniel 丹尼尔·维莱 1004n
- Viner, Jacob 雅各布·瓦伊纳 688, 688n, 717n, 797-98n
- Virchow 菲尔绍 126n
- Virgil 维吉尔 34n
- Vleugels, Wilhelm 威廉·弗洛伊格尔斯 385n, 654-55n
- Voegelin, Eric 埃里克·沃格林 406, 406n, 438n, 466n, 514n, 795, 827-28n
- Vogelsang, Freiherr von 冯·福格尔桑男爵 439
- Voigt, Andreas 安德烈亚斯·福格特 121, 222n, 370n
- Volker, William 威廉·沃尔克 838, 867, 868, 868n
- Voltaire 伏尔泰 406, 454
- Wagner, Adolf 阿道夫·瓦格纳 124n, 226-27n, 234, 234n, 235n
- Wagner, Karl 卡尔·瓦格纳 661, 661n
- Wagner Act 《瓦格纳法案》 713n
- Wald, Abraham 亚伯拉罕·瓦尔德 576-

- 77n, 722 - 23n, 792
- Wälder, Robert 罗伯特·瓦尔德 674, 675n, 720n
- Waldermayer 瓦尔德迈尔 185
- Wallas, Graham 格雷厄姆·沃拉斯 482
- Walras, Léon 里昂·瓦尔拉斯 106, 107n, 123n, 127 - 34, 128n, 130 - 31n, 133 - 34n, 157 - 58n, 167, 170 - 71, 223 - 24, 469 - 70, 474, 546, 555, 565 - 66n, 588n, 590, 637, 705 - 06, 762
- Ware, Richard 理查德·韦尔 930n, 992 - 93n
- Watts, Orval 奥瓦尔·沃茨 824, 825, 825n, 859, 869, 1025
- Webb, Beatrice 比阿特丽斯·韦布 481
- Webb, Sidney 西德尼·韦布 481
- Webb, Ursula 厄休拉·韦布 631, 641
- Weber, Adolf 阿道夫·韦伯 196 - 97, 196n, 199 - 200, 542, 654 - 55n, 660, 660n, 876n
- Weber, Alfred 阿尔弗雷德·韦伯 200
- Weber, Max 马克斯·韦伯 121, 196 - 97n, 196 - 208, 202 - 04n, 208, 208n, 214, 269, 273 - 74n, 274n, 288, 307, 372, 393 - 96, 393n, 396n, 399, 412n, 432, 468n, 509 - 10n, 530, 600 - 02n, 601, 671, 936
- Wehberg, Hans 汉斯·韦贝格 690
- Weininger, Otto 奥托·魏宁格尔 66, 416n, 966 - 67n
- Weiss, Franz 弗朗茨·魏斯 87 - 88, 141n, 145, 236, 236n, 280, 454n. *See also* Austrian School 另见奥地利学派
- Weiss-Wellenstein, Gustav 古斯塔夫·魏斯-韦伦施泰因 575, 656n, 731
- Welsh, W. W. W. W. 韦尔什 568n
- Whately, Richard (Archbishop) 理查德·惠特利 215n, 528n
- White, Harry Dexter 哈里·德克斯特·怀特 823
- Whitton, John B. 约翰·B. 惠顿 691
- Wicksell, Knut 克努特·维克塞尔 133 - 34n, 155n, 224n, 225, 227 - 28n, 237n, 252, 252 - 54n
- Wiese, Leopold von 利奥波德·冯·维泽 538, 591, 654 - 55n, 827 - 28n
- Wieselthier, Wilhelm 威廉·维泽尔蒂尔 289n
- Wieser, Friedrich von 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 81, 82n, 95n, 101 - 04, 102n, 104n, 124n, 127, 139, 140n, 142, 150 - 62, 156n, 163 - 74, 167 - 69n, 201, 201n, 218, 225 - 39, 225n, 273, 372 - 73, 380 - 86, 382 - 85n, 402 - 03, 456n, 464 - 79, 468n, 471n, 526, 549n, 565 - 66n, 569, 569n, 571n, 590, 596 - 97, 597n, 637 - 39, 700n, 701 - 02, 706, 729, 762, 781, 1045. *See* Hayek, Friedrich August von 另见哈耶克
- Wieser, Paula. *See* Böhm-Bawerk, Paula (Wieser) 保拉·维塞尔, 见保拉(维塞尔)·庞巴维克
- Wilbrandt, Robert 罗伯特·维尔布兰特 336n
- Wilder, Rose. *See* Lane, Rose Wilder 罗丝·怀尔德, 见罗丝·怀尔德·莱恩
- Wilhelm (Kaiser) 威廉(皇帝) 711
- Wilhelm I 威廉一世 39, 991
- Wilhelm II 威廉二世 374
- William Volker Fund 威廉·福尔克尔基金 846n, 867 - 68, 871, 875, 886n, 894, 895n, 897n, 898, 925n, 928, 928n, 936n, 940 - 41, 981n, 998 - 99n, 1004, 1047
- Williams, John D. 约翰·D. 威廉斯 926

- Willits, Joseph H. 约瑟夫·H. 威利茨
799, 822, 822n
- Wilson, Woodrow 伍德罗·威尔逊 304 -
05, 325, 687
- Windelband, Wilhelm 威廉·文德尔班
600n
- Winter, Balduin 巴尔杜因·温特 11n
- Winter, Emmanuel 伊曼纽尔·温特 795
- Winternitz, Emmanuel 伊曼纽尔·温特尼
茨 675, 795
- Wirt, John Belding 约翰·贝尔丁·沃特
992n
- Wissel, Rudolf 鲁道夫·维塞尔 370n
- Witteck, H. H. 维特克 270 - 71n
- Wittkowski, Adolf 阿道夫·维特科夫斯
基 878n
- Wladimir 弗拉迪米尔 3n
- Wolf 沃尔夫 196
- Wolfrum, Fritz 弗里茨·沃尔夫鲁姆
626n, 630n, 642n, 647, 654 - 55n
- Wollman, Leo 利奥·沃尔曼 838, 902n,
925
- Worlfrum, Fritz 弗里茨·沃尔夫鲁姆
516, 628n, 647n, 648
- Yeager, Leland B. 利兰·B. 耶格勒
192n, 257n, 299n, 329n, 375n, 750n,
905, 905n, 1000, 1000n, 1004n
- Young, Allyn 阿林·杨格 567, 804
- Ziegler, R. R. 齐格勒 876n
- Zimmerman, Alfred 阿尔弗雷德·齐默尔
曼 480 - 81n, 486, 688 - 89n
- Zimmern, Alfred 阿尔弗雷德·齐默恩
688
- Zuckerandl, Robert 罗伯特·楚克坎德
尔 139, 150, 158n
- Zweig, Stefan 斯蒂芬·茨威格 31, 31n,
32n, 573n

主题索引

(索引中页码为英文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

- Abgeordnetenhaus 议会下院 98
- Abiturientenklassen 毕业班 183
- “Abnormal Deviations in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反常的外汇离差现象》 248n
- “About Things to Come,” 《关于未来必成之事》 919n
- Abrechnungsschuldverschreibung 理赔局债券 452
- Academic freedom 学术自由 61n
- AccountantsClub of America 美国会计师俱乐部 793, 793n, 794n
- Acton-Tocqueville Society 阿克顿-托克维尔协会 865
- Actualités scientifiques et industrielles 《科学和产业新闻》 719n
- Adelsakt 封爵公报 3n
- Advokatenwählerverein 律师代表协会 289
- The Aeneid 《埃涅阿斯纪》 34n
- AER. Se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AER, 见《美国经济评论》
- AFL 美国劳工联合会 903
- Age of Enlightened Despotism 开明专制时代 61-62
- 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 《农业调整法案》 713n
- Agriculture 农业 192n
- The Airforce of Today 《当代空军》 751n
- Aix-les-Bains 艾克斯莱班 746, 746n
- Akademisches Gymnasium 学术中学 xiii, 33-45, 60
- Aktions-Kalender 《行动日程》 820
- Albania 阿尔巴尼亚 805n
- Alcohol, taxes on 对酒征税 191-92
- Allgemeine Wehrwirtschaft 《战争经济通论》 312n, 551n
- Alma mater Rudolphina. See University of Vienna 鲁道夫大学, 见维也纳大学
- The Alphabet of Economic Science 《经济学初步》 157-58n
- Alter ego 他我 977-78
- America. See United States 美国
-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美国政治科学学院 843
- American Affairs 《美国事务》 887n
-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美国经济学会 791n, 793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美国经济评论》 776n, 782n, 831, 832, 832n, 1037
- American Indians 美国印第安人 976
- American Individual Enterprise System 《美国私人企业体制》 826
-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美国经济学与社会学杂志》 107n, 128n
- American Prospect 《美国展望》 791n
- American School of Economics 美国经济学院 943
- 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 《美国大萧条》 627n

- Amtsblatt der Universität Wien* 《维也纳大学校报》 363n
- Analytical-compositive method 分析合成方法 106
- Analytical-synthetic method 分析综合方法 106
- Anarchism 无政府主义 330 - 44, 546, 546n, 999, 1023 - 30
- Ancien Régime 旧制度 477, 736
- AncoraVerde 重返佛得角 462, 847
- Angewandte Lohntheorie* 《应用工资理论》 549
- Anglo-Oesterreichische Bank 英奥银行 362n
- Annales de la classe des sciences sociales-économiques* 《社会—经济科学年鉴》 719n
-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年鉴》 857n
- Annexation of Austria. See Anschluss 吞并奥地利, 见德奥合并
- Anschluss 德奥合并 327, 339 - 40n, 729, 796, 804
- The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 《反资本主义心境》 34n, 746n, 963n, 970n, 980 - 82, 981, 981n, 985n, 996n
- Anti-Marxism. See Marxism 反马克思主义, 见马克思主义
- “Antimarxismus,” 《反马克思主义》 531n
- “Antitrust and Competition, Historically Considered,” 《反托拉斯与竞争——一个历史考察》 547n
- Anti-trust movement. See Monopolies 反垄断运动, 见垄断
- Anweisungstheorie. See Assignment theory 指派理论, 见指派理论
- Aragon 阿拉贡 5
- Arbeiter-Zeitung* 《工人报》 623n
-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 150n, 208n, 214, 222n, 273 - 74n, 275, 319n, 372, 396n, 431n, 471n, 506n, 526n, 542n, 544, 544n, 593n, 599n, 654n
- Argentina 阿根廷 xii
- “Aristotle, Menger, Mises: An Essay in the Metaphysics of Economics,” 《亚里士多德、门格尔、米塞斯:关于经济学形而上学的论文》 105n
- Arlington House 阿灵顿出版社 1035
- Armenia, Galicia and 加里西亚和亚美尼亚 4
- Armistice, World War I and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投降 325 - 26
- Armstrong Cork 阿姆斯特朗软木公司 846n
- Art nouveau 新艺术运动 24
- As We Go Marching* 《当我们前进》 840
- Assignment theory 指派理论 233 - 34
- Association, Law of 协作法则 426 - 31
- Association for Social Policy 社会政策协会 119
- Association for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社会科学教育协会 66
- Association of Austrian Banks and Bankers 奥地利银行和银行家协会 365, 418
- Association of Austrian Political Economists 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协会 478
- Association of Merchants and Industrialists in Berlin 商人与工业家协会 515n
- Atheism 无神论 997, 998
- Atlantic Charter 《大西洋宪章》 811
- Atlas Research Foundation 阿特拉斯研究基金 712
- Atlas Shrugged* 《阿特拉斯耸耸肩》 803,

- 883, 930, 930n, 996, 996n
- Auburn University 奥本大学 905n
- “Aufgabe und Umfang der allgemeinen Wissenschaft vom menschlichen Handeln,”
《人类行为科学的任务与范围》 670n
- Ausgleich 奥匈协议 47 - 49, 47n, 49n, 97
- Australia, population mixes and 种族杂居和澳大利亚 303
- Austria 奥地利
- 1873 elections and 1873 年选举和奥地利 10
- creation of Austrian republic and 奥地利共和国成立 75n
- currency of 奥地利货币 355 - 56
- defined 定义 48
- Eastern Democratic Union and 东方民主联盟和奥地利 805n
- economics and 经济学和奥地利 24
- financial market and 金融市场和奥地利 14n
- Habsburgs and 哈布斯堡和奥地利 4
- Hungary and. *See* Austria-Hungary 匈牙利和奥地利, 见奥匈帝国
- industrialization and 工业化和奥地利 8 - 9, 8n, 16
- Judaism and 犹太教和奥地利 5n
- language and 语言和奥地利 320n
- liberalism and 自由主义和奥地利 28
- Michael Hainisch and 米夏埃尔·海尼施和奥地利 66
- Mises and 米塞斯和奥地利 xiii
- Napoleonic wars and 拿破仑战争和奥地利 31 - 32
- Poland and 波兰和奥地利 3
- Polish Club and 波兰俱乐部和奥地利 7
- Reichsrat and 帝国议会和奥地利 10
- revolutionary insurrections in 奥地利的革命起义 13
- Ruthenians and 罗塞尼亚人和奥地利 70
- socialism in. *See* Socialism 奥地利的社会主义, 见社会主义
- University of Vienna and. *See* University of Vienna 维也纳大学和奥地利, 见维也纳大学
- U. S. treaty with 美奥条约 728n
- Vienna and. *See* Vienna 维也纳和奥地利, 见维也纳
- World War II and. *See* World War II 二战和奥地利, 见二战
- World Wars and. *See* World War I; World War II 世界大战和奥地利, 见一战; 二战
- Austria-Hungary 奥匈 46 - 53, 230 - 31, 449 - 50, 450 - 51 *See also* Austria; Habsburg Empire; Hungary; World War I 另见奥地利; 哈布斯堡帝国; 匈牙利; 一战
- Austrian Academy of the Sciences 奥地利科学院 144
- Austrian Chamber of Commerce 奥地利商会 723
- Austrian Day “奥地利日” 819
- Austrian Economics: An Anthology* 《奥地利经济学文选》 1010n, 1017n
- “Austrian Economics and Austrian Philosophy,” 《奥地利经济学和奥地利哲学》 105n
- Austrian Economics: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Background* 《奥地利经济学: 历史和政治背景》 105n
- Austrian Economics Newsletter* 《奥地利经济学通讯》 794n, 994
- “Austrian Empire, Finance and Banking,” 《奥地利帝国, 财政与金融》 185n,

- 270n, 289n, 480n
- Austrian Institute for Business Cycle Research
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 454 - 55,
573 - 77, 612, 691, 1014 - 15n
- "The Austrian Institute for Business Cycle Research," 《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 575n
- Austrian Medal of Honor 奥地利荣誉勋章 1034
- The Austrian Mind* 《奥地利精神》 952n
- "The Austrian Monetary Problem Thirty Years Ago and Today: A Commentary," 《三十年前与今天奥地利的货币问题:一个评论》 459 - 60
- Austrian National Committee 奥地利国家委员会 812, 812n, 816 - 21
- Austrian Political Society. See Österreichische Politische Gesellschaft 奥地利政治学会
- Austrian School 奥地利学派 xii, 101, 125 - 36, 142, 331, 363 - 64, 380, 386, 389, 465 - 66, 472 - 77, 554, 590, 637, 659, 721 - 22n, 737n, 757, 761, 803, 914. See also Böhm-Bawerk, Eugen von; Hayek, Friedrich August von; Kirzner, Israel; Machlup, Fritz; Mayer, Hans; Menger, Carl; Mises, Ludwig von; Rothbard, Murray; Sennholz, Hans; Strigl, Richard von; Weiss, Franz; Wieser, Friedrich von 另见欧根·冯·庞巴维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伊斯雷尔·柯兹纳、弗里茨·马克卢普、汉斯·迈尔、卡尔·门格尔、路德维希·冯·米塞斯、默里·罗斯巴德、汉斯·森霍尔茨、里夏德·冯·施特里格尔、弗朗茨·魏斯、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
-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奥地利经济学派》 555n
-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Vienna," 《维也纳大学的奥地利经济学派》 1017n
- Austrian Society for Politics 奥地利政治学会 272 - 73
- The Austrian Theory of Value and Capital: Studies in the Life and Work of Eugen von Böhm-Bawerk* 《奥地利学派价值理论和资本理论:庞巴维克生平和著作研究》 139n, 141n, 143n
- Austrian Trade Bureau 奥地利贸易局 296
- Austrian-American League 美籍奥地利人联盟 804
- The Austrians: A Thousand-Year Odyssey* 《奥地利人:千年历程》 285n
- Austro-Hungarian Bank 奥匈银行 14n, 180, 180n, 185n, 293, 330, 345 - 47, 455 - 56, 458 - 59, 513
- Austro-libertarianism. See Libertarian movement 奥地利—自由至上主义, 见自由至上主义运动
- Austro-Marxism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368
- "Auswanderung und Auswanderungspolitik," 《移民政策》 276n
- Authoritarianism, socialism and 社会主义和威权主义 419 - 20
-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自传体反思》 406n, 466n
- Autobiography of an Economist* 《一位经济学家的自传》 481n, 634n, 637n, 664n, 729n
- Automobiles 汽车 697, 697n
- "Baccalauréat et socialisme," 《高中学历与社会主义》 35n
- Bad Gastein 巴德加施泰因 296, 296n, 512

- Baden 巴登 270
- Baker-Kellogg investment letter 巴克—凯洛格投资书 568n
- “Balance of Payments and Exchange Rates,” 《收支平衡与外汇汇率》 248, 351n, 353, 353n
- “Balance of Trade and Exchange Rates,” 《贸易平衡与外汇汇率》 353
- Banco de Mexico 墨西哥银行 863
- Bank Charter Act 银行条例 226 - 27n
- Bank deposits 银行存款 216f
- Bank of England 英格兰银行 95n, 298, 632, 641, 641n
- Bank-Archiv 《银行档案》 222n
- Bankers' Association 银行家协会 813
- Banking School 银行学派 226 - 27n, 228, 235
- Banking Seminar of Columbia University 哥伦比亚大学金融研讨会 793
- Bankstelle 银行办公室 293
- Banktheoretische Übungen 银行理论训练 287n
- Banque de France 法兰西银行 488
- Banques et banquiers en Autriche au début du 20e siècle 《20世纪早期的奥地利银行家们》 505n
- Barcelona 巴塞罗那 757
- Bargaining power 交易的力量 542
- Barron's 《巴伦周刊》 830, 831
- Barzahlung und Zahlungsmittelversorgung in militärisch besetzten Gebieten 《军事占领区的现金和现金供给》 292n, 312n
- Bastiat Circle. See Circle Bastiat 巴斯夏小组
- “Battle for the Freeman,” 《自由人》之战 902n, 911n
- Battle of Königgrätz 克尼格雷茨战役 349n
- Bavaria 巴伐利亚 326, 393n
- “Bemerkungen betreffend die Einrichtung einer ukrainischen Notenbank,” 《关于成立乌克兰中央银行的评论》 297n
- “Bemerkungen zum Grundproblem der subjektivistischen Wertlehre,” 《关于主观价值理论基本问题的评论》 593n
- “Bemerkungen zum Zurechnungsproblem,” 《关于归属理论的评论》 473n, 474n
- Berchtesgaden 贝希特斯加登 339 - 40n
- Berechnung und Ausschaltung von Saisonschwankungen 《季节波动的计算和消除》 576 - 77n
- Bericht über die Ursachen der wirtschaftlichen Schwierigkeiten Österreichs 《关于奥地利经济困境的原因的报告》 489n, 578n, 614n
- Berkeley. Se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柏克莱, 见加利福尼亚大学
- Berlin 柏林 13, 20, 24, 29, 49n, 83, 116n, 326, 515n, 713
- Berliner Ensemble 柏林剧团 421
- Berliner Tageblatt 《柏林日报》 652n
- Bernsteinian revisionism 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 57 - 58
- “Bestandsaufbau durch Plünderung—Jüdische Bibliotheken im RSHA 1936 - 1945,” 《劫掠带来的藏书增长——1936 - 1945 年间 RSHA 犹太图书馆》 727
- Beweis, dass der Mond aus Jodine besteht 《证明月亮是由平民男子构成》 93n
- Biedermann Bank 比德尔曼银行 163, 189n, 505
- “Big Business and the Common Man: High Living Standard in U. S. Came from Big Mass Production Enterprise,” 《大企业和普通人:大规模生产企业带来的美国高生

- 活水平》 831n
- Biology, economics and 经济学和生物学 567 - 68n
- Black market, World War I and 一战和黑市 272, 289
- Black Monday 黑色星期一 630
- Bohemia 波西米亚 5n, 29, 46, 50, 68, 727
- The Bolshevik* 《布尔什维克》 444n
- Bolshevism 布尔什维克主义 xi, 291, 332 - 34, 339 - 40, 344, 360, 440, 444n, 666, 714, 747
- Bolshoi Ballet 大剧院芭蕾舞团 421
- Bonds, war 战争国债 337n
- Börsenkredit, Industriekredit und Kapitalbildung* 《外汇信贷、工业信贷与资本形成》 478n, 479n, 576 - 77n, 646
- Bosnia 波斯尼亚 49 - 50, 193, 294
- Boulevard Périphérique 环城大道 22n
- Bourgeois 资产阶级 313 - 14, 666, 668
- Breadth and Depth in Economics; Fritz Machlup—The Man and His Ideas* 《经济学的广度与深度：弗里茨·马克卢普——人品与思想》 477n
- Brechung der Zinsknechtschaft 取缔高利贷 658
- Brest-Litovsk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 291
- Bretton Woods 布雷顿森林 823
- Britain. See Great Britain 英国, 见大不列颠
- British Currency School 英国通货学派 247, 251
- British Morals and Health Act 《道德与健康法案》 91
- British Royal Economic Society 英国皇家经济学会 586
- Brooklyn College 布鲁克林大学 366
- Brussels 布鲁塞尔 480
- Budapest 布达佩斯 270, 492, 492n
- Bulgaria 保加利亚 325, 371, 805n
- Bund 联邦 348 - 49n
- Bundeskammer 联邦商会 723
- Bureau Bond 理赔局债券 452
- Bureau for Claims Settlements 理赔局 451 - 55
- Bureau of Nutrition 营养局 272
- Bureaucracy* 《官僚体制》 180n, 823, 840, 1035
- Business, Banking, and Economic Thought in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欧洲早期的商业、金融和经济思想》 112n
- Business cycles 商业周期 249 - 54, 254n, 454n, 471 - 72, 471n, 573 - 77, 588n, 612, 617 - 18, 660n, 691, 779 - 81, 1034. See also Austrian Institute for Business Cycle Research 另见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
- Café Künstler 金斯特勒咖啡馆 847
- Café Lafayette 拉斐特咖啡馆 847
- Calculations, socialist-calculation debate and 社会主义计算辩论 373 - 80, 387 - 91, 396, 418 - 22, 472, 555n, 594 - 96, 704 - 05, 737 - 38, 764, 781 - 85, 1035
- Calvinism 加尔文主义 898, 915
- Cambridge 剑桥 632, 633, 797 - 98n
- Cannes 戛纳 480
- Cannon Battery no. 1 第一炮兵营 280
- Cantillon effects 康蒂永效应 240 - 44, 241n
- Capital. See Money 资本, 见货币
- Capital, Interest, and Rent* 《资本、利息和租金》 775n
- Capital and Interest* 《资本与利息》 93, 95, 218 - 19n, 675n, 774n, 854

- Capital and Time: A Neo-Austrian Theory* 《资本与时间: 新奥地利学派理论》 554n
- “Capital Consumption,” 《资本消耗》 637n
- Capital theory 资本理论 670
- Capitalism. *See also Theory and History* 资本主义, 另见《理论与历史》
-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 and 反资本主义心境和资本主义 980-82
- Austria and 奥地利和资本主义 56
- Christianity and 基督教信仰和资本主义 439, 442n, 982-86
- defined 定义资本主义 524
- differences with socialism and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 425
- economic calculation and 经济计算和资本主义 379-80
- epistemological case for 资本主义的认识论问题 947-51
- Galicia and 加里西亚和资本主义 16
- heroic elites and 英雄精英和资本主义 963-71
- Karl Marx on 卡尔·马克思论资本主义 57
- maintenance and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and 资本维持和资本积累以及资本主义 421-22
- market economy and 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 993
-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 407-10
- monopolies and 垄断和资本主义 426, 431-37, 437n
- overview of case for 资本主义论证概述 951-57
- property and 产权和资本主义 423-24
- rationality and 理性和资本主义 767-70
- revisionism and 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 635
- salutary dissent and 有益的争执和资本主义 957-63
- study of history and 历史研究和资本主义 971-80
- treatise on 论资本主义的著作 709
- value calculation and 价值计算和资本主义 402
- viability of 资本主义的可行性 380
- Wieser's theory of 维塞尔的资本主义理论 384-85
-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930n
-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制》 431n, 530n, 967-68n
- Capitalism and the Historians* 《资本主义和历史学家》 710n
- Capitalism: The Unknown Ideal* 《资本主义: 不为人知的理想》 541n, 932
- “Capitalist Manifesto,” 《资本主义宣言》 886, 886n, 932
- “Carl Menger,” 《卡尔·门格尔》 139n
- Carl Menger and His Legacy in Economics* 《卡尔·门格尔和他的经济学遗产》 105n, 115n, 128n, 138n, 700n
- “Carl Menger and Historical Aspects of Liberalism in Austria,” 《卡尔·门格尔和奥地利自由主义的历史》 138n
- “Carl Menger as Editor: Significance of Journalistic Experience for his Economics and for his Later Life,” 《作为编辑的卡尔·门格尔: 期刊工作经历对他的经济学和晚年生活的重要性》 104n, 138n
- “Carl Menger, der deutsche Nationalökonom,” 《德国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 115n

- Carl Menger's Lectures to Crown Prince Rudolf of Austria* 《卡尔·门格尔为奥地利鲁道夫王储授课的讲义》 137n, 183n
- Carpathian Mountains 喀尔巴阡山 259, 280 - 81
- The Carthaginian Peace or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r. Keynes* 《迦太基式的和平——凯恩斯先生的经济后果》 570n
- "The Case for Capitalism," 《捍卫资本主义》 885n
- Cash balance approach 现金余额方法 785 - 86
- Catalactics 交换学 528n, 592 - 93
- Catholicism. *See* Christianity 天主教, 见基督教
- Cato Institute 卡托研究所 712
- Cato Journal* 《卡托杂志》 478n
- "The Causes of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世界经济危机的原因》 616, 617n, 625
- Caxton Printers Ltd. 卡克斯顿印刷有限公司 833 - 34n
- Censorship 审查制度 31 - 32, 42
- Center for Housing Reform 住房改革中心 183 - 84
-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Planning Board 中东欧计划委员会 821n
- Central Planning Board 中央计划局 782
- Central Plateau 中央高原 863
- Certificates, money 货币凭证 216f
- CFF. *See* Christian Freedom Foundation
CFF, 见基督教自由基金会
- Chamber of Labor 劳工会议 575, 614
- "Changes in 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美国经济政策的转变》 569
- "Changing Issues in Academic Freedom in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当今美国学术自由的议题转变》 924n
- Chartalists 货币国定派 221
- Chicago School 芝加哥学派 739, 852, 989, 990, 1011
- Chicago Tribune* 《芝加哥论坛报》 1038
- Child labor 童工 91 - 92
- Child's Restaurant 儿童饭店 847
- Chilton Press 奇尔顿出版社 890
- China 中国 97, 193n, 263, 423 - 24n
- Christian Economics* 《基督教经济学》 888, 889n, 890
- Christian Freedom Foundation 基督教自由基金会 888, 888n, 889, 890
- Christian Occident 基督教欧洲文明 1000
- Christian Social Party 基督教社会党 55 - 57, 327, 333 - 34, 349, 350, 491, 614, 676, 677, 854
- Christianity 基督教信仰 4, 4n, 8n, 31, 35, 42, 55, 61 - 62, 64, 434, 437 - 43, 466, 484n, 915, 976, 982 - 86. *See also* Christian Social Party 另见基督教社会党
- CIO 产业工会联合会 903
- Circle Bastiat 巴斯夏小组 930, 930n, 998
- Circulation-credit theory 流通—信用理论 604n
- Citizenship, American 美国公民 832 - 35
- Civil Liberties Union 公民自由联盟 995
- Civil War 内战 1027, 1028
- Civilization, essence of 文明的本质 965n
- Class struggle 阶级斗争 429, 535 - 36
See also Bourgeois; Marxism; Proletariat
另见资产阶级; 马克思主义; 无产阶级
- Classical Economics: An Austrian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古典经济学: 奥地利学派关于经济思想史的视

- 角》 111n
- Classical liberalism. See Liberalism 古典自由主义, 见自由主义
- Coat of arms, Mises 米塞斯纹章 15i
- Cold War 冷战 975
-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埃里克·沃格林文集》 466n
- The Collected Works of F. A. Hayek* 《F. A. 哈耶克文集》 844n
- Collected Writings (Keynes)* 《文选》(凯恩斯) 716n
- Collectivism 集体主义 533n, 561, 960, 961 See also Marxism; Socialism 另见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
-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Critical Studies on the Possibilities of Socialism* 《集体主义经济计划: 关于社会主义之可能性的批判性研究》 377n, 591n, 702n
- Cologne Forschungsinstitut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科隆社会科学研究所 565n
- Cologne University. See University of Cologne 科隆大学, 另见科隆大学
- Columbia University 哥伦比亚大学 163n, 792, 793, 940
- Commerce and Government: Considered in Their Mutual Relationship* 《商业和政府: 两者之间的关系》 112 - 13, 112n, 308n, 474n
- Commercial Association of Lower Austria 下奥地利商业协会 579n
- Commission for the Socialization of German Industry 德国工业社会化委员会 164
- Commodity money 商品货币 216f, 228 - 30, 231n, 583, 767, 922. See also Money 另见货币
- The Common Economy*. See *Die Gemeinwirtschaft* 《共同经济》, 见《社会主义》
- The Commonwealth*. See *Die Gemeinwirtschaft* 《共同体》, 见《社会主义》
- Communism 共产主义 237, 314, 344, 371, 560n, 712, 713, 840, 842, 845, 855, 906, 909, 994, 1037
- Comparative statics 比较静态 171
- Competition 竞争 493 - 505, 539, 546, 547n, 763. See also Monopolies 另见垄断
- 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竞争和企业家》 172n
- “Competition as a Discovery Procedure,” 《竞争作为发现程序》 474n
- Compromised Campus: The Collaboration of the Universities with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1945 - 1955* 《妥协的校园: 大学与情报部门的合作, 1945 - 1955》 991n
- “The Computer and the Market,” 《计算机和市场》 782n
- Concept and Object* 《概念和对象》 165n
- “The Conqu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Spain,” 《论西班牙对合众国的征服》 304n
- Conrad's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康拉德国民经济学和统计学年鉴》 123n, 147, 472
- Conservatism 保守主义 991, 991n, 992
-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 Since 1944* 《1944年以来美国保守主义思想运动》 841n, 844n, 846n, 852n, 857n, 901n, 903n
- The Conservative Press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20世纪美国保守主义报刊》 846n, 901n
- “Considérations sur la théorie général de la lutte,” 《关于斗争理论的一般思考》 720n
-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自由宪章》 995n

- Consumer sovereignty 消费者主权 773 - 79, 876n
- Consumers-Producers Economic Service 消费者—生产者经济服务公司 915
-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Theory of Value,” 《关于价值理论的争论》 668n
- Coty perfume company 科蒂香水公司 829
- Counterfactual value differential 反事实的价值差额 777
-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科学的反革命》 161
- Cournot nella economia e nella filosofia 《经济学和哲学中的库尔诺》 722n
- Credit. See Money 信用, 见货币
- Credit money 信用货币 216f
- Credit organizations 信用机构 439
- Credit-Anstalt bank 信贷银行 14 - 15, 30, 505n, 628, 628 - 29n, 630, 640
- The Credit-Anstalt Crisis of 1931 《1931 信贷危机》 629n
- Crimea, Judaism and 犹太教和克里米亚 5n
- Crimean War 克里米亚战争 39
- The Critics of Keynesian Economics 《凯恩斯经济学批判》 494n, 718n, 719n
- 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 《干预主义批判》 84n, 120n, 196n, 197n, 226 - 27n, 399n, 524, 524n, 526n, 527n, 528n, 529n, 531n, 532n, 533n, 534n, 535n, 536n, 537n, 538n, 541n, 542n, 543n, 544, 544n, 545n, 546n, 548n, 549 - 50n, 549n, 551 - 52n, 553n, 599n, 619n
- Croatia 克罗地亚 5n, 47n, 50, 325, 450
- Cross for Military Merit 十字军功勋章 268
- Cuadernos Americanos 《美洲纪要》 816, 816n
-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Ludwig von Mises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文化背景》 6n, 33n, 61n, 63n, 65n, 176n
- Culture, communalization of 文化的社会化 492
- Currency communities 货币共同体 354 - 55
- Currency competition 货币竞争 493 - 505
- Currency School 通货学派 226 - 27n, 227, 235, 247, 250. See also British Currency School 另见英国通货学派
- Cycles, business. See Business cycles 商业周期, 见商业周期
- Cyclical policy 周期政策 581 - 85
- Czech Republic 捷克共和国 xii, 50, 53, 193n, 303, 325, 450, 515, 516, 805n, 821n, 1035
- Czechoslovak Academy of the Sciences,” 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 1035
- Czernowitz railroad company 切诺维兹铁路公司 9
- Daily Telegraph 《每日电讯报》 1038
- Danube River, Ringstrasse and 环城大道和多瑙河 21
- Danzig 但泽 70, 805n
- Darlehenskassenscheine 信用社纸币 293
- Darmstädter und Nationalbank 达姆施泰特国家银行 630
- Dartmouth 达特茅斯学院 1013
- “Das Ende des Laissez-Faire, Ideen zur Verbindung von Privat-und Gemeinwirtschaft,” 《自由放任的终结: 融合私有经济和公共经济的思想》 572n
- “Das festangelegte Kapital,” 《固定资本投

- 资》 624n
- Das Finanzkapital* 《金融资本》 250n, 437n
- Das Geld* 《货币》 177n, 225, 225n
- “Das Geldproblem,” 《货币问题》 647n
- Das Kapital* 《资本论》 57, 149
- “Das Kreditproblem der Volkswirtschaft,” 《经济中的信用问题》 642n
- Das Mieterschutzproblem. Nationalökonomische Betrachtungen* 《租客保护问题, 国民经济反思》 630n
- Das österreichische Sprachenrecht* 《奥地利言论权利》 320n
- Das Problem der Souveränität und die Theorie des Völkerrechts* 《主权问题与国际法理论》 472n
- “Das Problem gesetzlicher Aufnahme der Barzahlungen in Oesterreich-Ungarn,” 《奥匈帝国现金支付的法律记录问题》 185n
- “Das Ricardo'sche Vergesellschaftungsgesetz,” “李嘉图的社会化法则” 428n
- Das Selbstbestimmungsrecht der Nationen* 《民族自决》 321n
- “Das Sozialprodukt und die Rechenpfennige: Glossen und Beiträge zur Geldtheorie von heute,” 《社会生产和筹码: 对当代货币理论的注解和贡献》 208n, 471n
- Das Theresianum in Wien* 《维也纳特蕾西亚中学》 37n
- Das Wesen des Geldes* 《货币的本质》 222n
- “Das Wesen und der Hauptinhalt der theoretischen Nationalökonomie— kritische Glossen,” 《理论国民经济的本质和主要内容——批判性的注解》 156n, 167 - 68n, 169n, 597n
- Das Wiener Kaffeehaus* 《维也纳的咖啡馆》 25n
- David, Royal House of 大卫王族 15i
- Dawes Plan 道斯计划 510
- “A Day in the House of My Parents,” 《在我父母家中的一天》 30n
- De la propriété* 《财产》 475n
- De l'explication dans les sciences* 《科学解释》 700n
- The De Moneta of Nicholas Oresme and English Mint Documents* 《尼古拉·奥雷姆的货币论和英国铸币档案》 504n
- Debates 辩论
- Mises-Eisler 米塞斯与艾斯勒的辩论 616 - 17
- socialist-calculation debate and 社会主义计算问题之争 373 - 80, 387, 388 - 91, 396, 418 - 22, 472, 555n, 590, 594 - 96, 704, 705, 737 - 38, 764, 781 - 85, 1035
- Decentralization 分权 993
- “Declaration of the United Free Austrians,” 《联合起来的自由奥地利人宣言》 819, 820n
- Deduction of the Laws of Human Interrelationships* 《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 129
- Defense, Controls, and Inflation* 《防御、控制和通胀》 898n
- “In Defense of Laissez-Faire,” 《为自由放任而辩》 886n
- Defensor Pacis* 《保卫和平者》 412n
- Deflation 通缩 243. See also Inflation 另见通胀
- “Dehomogenizing Mises's Monetary Theory,” 《米塞斯货币理论的非均质化》 239n
- “Delivering for Young Families: The Resonance of the GI Bill,” 《面向年轻家庭: 军人权利法案的反响》 791n

- Democracy 民主 410 - 13, 412n, 963 - 71
- Democrats, social 社会民主党人 327, 327 - 28
- Denationalization 去民族化 317
- Department of Law and Government Science 法律和政府科学 60
- Deposits 存款 216f
- “Der Beitrag deutschsprachiger Ökonomen zur konjunkturtheoretischen Debatte der Zwischenkriegszeit,” 《两次大战之间德语经济学家对经济理论辩论的贡献》 588n
- Der Deutsche Volkswirt. Literatur-Beilage* 《德语经济学家——文献增刊》 655n
- “Der Einfluss von Ludwig von Mises auf die Österreichische akademische Tradition gestern und heute,”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对过去和现在奥地利学术传统的影响》 468n, 476n, 569n
- Der ewige Jude in Wien* 《维也纳不朽的犹太人》 103
- “Der Geldwert und seine geschichtlichen Veränderungen,” 《货币的价值及其历史变化》 82n, 201n, 209n, 222 - 23n, 225n, 226, 228n, 231, 231n, 233n, 236n
- Der Golddevisenstandard* 《金汇兑本位》 478n
- Der Holzarbeiter* 《木工》 626n
- “Der Interventionismus als Ursache der Wirtschaftskrise ein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Ludwig Mises,” 《干预主义作为经济危机的起因——与路德维希·米塞斯商榷》 622n
- Der Kampf* 《战斗》 94
- Der Katheder-Sozialismus* 《讲坛 - 社会主义》 118n
- “Der ‘kleine Finanzplan’ des Abgeordneten Steinwender,” 《施泰因文德的“小预算”》 206n
- “Der letzte Liberale,” 《最后的自由主义者》 1040
- Der Lohnschutz des gewerblichen Arbeiters nach österreichischem* 《奥地利法律下产业工人的工资保护》 67n
- Der natürliche Werth* 《自然价值》 153, 154n, 158, 382n, 383n
- Der neue Staat* 《新状态》 370n
- Der oesterreichische Volkswirt* 《奥地利经济学者》 186, 186n
- Der proletarische Sozialismus*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 530n
- Der Römerbrief* 《罗马人》 985n
- Der Sozialismus* 《社会主义》 396n
- Der soziologische und der juristische Staatsbegriff 《社会学意义上的国家和法律意义上的国家》 472n
- Der Spiegel* 《明镜周刊》 876n
- “Der technische Fortschritt,” 《技术进步》 623n
- Der unbewältigte Friede—St. Germain und die Folgen* 《尚未解决的和平——圣日尔曼和约及其后果》 449n
- “Der Wandschirm, hinter dem nichts geschieht,” 《银幕背后,空无一物》 336n
- “Der Weg der österreichischen Finanzpolitik,” 《奥地利财政政策的路线》 629
- Der Weg zum Sozialismus* 《通往社会主义之路》 371, 371n
- Der Werturteilsstreit* 《价值判断之争》 197n, 204n
- “Der Wiedereintritt Deutsch-Österreichs in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ie Währungsfrage,” 《德意志奥地利回归德意志帝国以及通货问题》 345n, 348 - 49n, 349n, 354n. See also World War I 另见一战
- Der Wohlfahrtsstaat: Die Geschichte eines Ir-*

- rwgs 《福利国家:一条曲折的道路》
120n
- Desperado policy 亡命政策 345
- Despotism, Age of Enlightened 专制,开明时代 61-62
- Destructionism 毁灭主义 443-46
- Detroit Bureau of Governmental Research 底特律政府研究局 868
- Deutsche Geld-und Kreditpolitik* 《德国货币政策》 498n
- Deutsche Zeitung* 《德意志报》 876n
- Deutsche Geschichte im Osten Europas: Galizien, Bukowina, Moldau* 《德意志在东西欧的历史:加里西亚、布科维纳和摩尔多瓦》 3n, 70n, 302n
-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Soziologie 德国社会学学会 565n
- Deutsche Rohstoffwirtschaft im Krieg* 《德国战时商品经济》 270-71n
- Deutsches Volkstheater 德国国家剧院 518
- Deut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德意志经济史》 67n, 248n
- Deutsche Wirtschafts-Zeitung* 《德意志经济报》 629
- Deutscher Bund. See Bund 德意志邦联,见邦联
- Deutscher Hauptverband der Industrie* 德意志工业联盟 515n, 616
- Deutschlands Rohstoffversorgung* 《德国战争物质供应》 370n
- Deutschösterreich, defined 德意志奥地利 327
-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rds and Peasants in Galicia," 《加里西亚地主与农民关系的演变, 1772-1848》 67
- Devisenzentralen 外汇交易中心 270n, 273
- Diachronic determination of the value of money 货币价值的历时决定 229, 231
-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辩证唯物主义 898n, 905
- Diamond Jubilee Cross 钻石纪念十字勋章 268
- "The Dictatorship Complex," "独裁复合体" 810n
- "Die Abkopplung der Ökonomie an der Univesität Wien nach 1920," 《1920年之后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的衰退》 729n
- "Die Abstempelung der Kronennoten im jugoslawischen Staate," 《南斯拉夫废除纸币克朗的措施》 347n
- "Die allgemeine Teuerung im Lichte der theoretischen nationalökonomie," 《价格的整体上涨,理论经济学的视角》 150n, 542n
- Die Aufgaben der Übergangswirtschaft* 《转型经济的任务》 370n
- Die Auflösung des Habsburgerreiches* 《哈布斯堡帝国的解体》 270-71n, 325n
- Die Ausgestaltung des Nationalgefühls* 《民族情感的设计》 320n
- Die Bank von England im Dienste der Finanzverwaltung des Staates* 《作为国家财政机构的英格兰银行》 95n
- "Die Bauer-Mises-Schumpeter-Kontroverse," 《鲍尔—米塞斯—熊彼特之争》 369n, 371n, 703n
- Die Bauernbefreiung in Böhmen, Mähren und Schlesien* 《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西里西亚的农民解放运动》 68
- Die Bauernbefreiung und der Ursprung der Landarbeiter in den älteren Teilen Preussens* 《普鲁士老区农奴制的废除和农业工人的起源》 68n

- Die Bauernbefreiung und die Auflösung des gutsherrlich-bäuerlichen Verhältnisses in Böhmen, Mähren und Schlesien* 《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农奴解放运动与农奴-地主关系之废除》 68n
- Die Bettlerin von St. Marx* 《圣马克思的乞丐》 104n
- “Die diesjährigen Verhandlungen des Vereines für Sozialpolitik,” 《社会政策协会年度协商》 659n, 662n
- Die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r “Grundsätze” Carl Mengers* 《门格尔“原理”的起源》 81n, 102n, 103n, 104n, 115n, 382n
- “Die Entstehung und der Entwicklungsgang der Handelskammern in Österreich,” 《奥地利商会的创立和发展历程》 188n, 361n
- Die Entwicklung der wirtschaftspolitischen Ideen* 《经济思想的发展》 86n
- Die galizischen Bauern unter der polnischen Republik: eine agrarpolitische Untersuchung 《波兰共和国治下的加里西亚农民:一项农业政策分析》 73n
- Die gegenwärtige Krisis in der deutschen Volkswirtschaftslehre* 《当前德国经济学的危机》 310n, 393n
- Die geistige Elite Österreichs* 《奥地利的知识精英》 265n
- “Die geldtheoretische Seite des Stabilisierungsproblems,” 《从货币理论的观点考虑稳定问题》 247n, 456n, 459n, 494, 495n, 497n, 499n, 501n, 503n, 504n, 920n
- Die Geldtheorien seit Knapp* 《克纳普之后的货币理论》 508n
- Die Gemeinwirtschaft.* See *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共同经济》, 见《社会主义:一项经济与社会分析》
- “Die Gemeinwirtschaft,” 《共同经济》 655n, 656n
- “Die Gerechtigkeit in der Volkswirtschaft,” 《经济中的正义》 122n
- Die Gesellschaft freier Menschen* 《美好社会》 738n
- “Die Goldwährung und ihre Gegner,” 《金一本位制及其敌人》 517n, 648n
- Die Grundgedanken der Wirtschaftspolitik der Zukunft* 《未来经济政策的基本观念》 370n
- Die Herrschaft der Fürsten.* See “Über die Herrschaft der Fürsten” 《君主政治》, 见《论君主政治》
- Die Hilfe* 《帮助》 559
- Die indische Währungsreform* 《印度通货改革》 244-45n
- Die Irrthümer des Historismus in der deutschen Nationalökonomie* 《德国国民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的错误》 124n
- Die Juden Wiens* 《维也纳犹太人》 62n
- Die Jugend des Bundeskanzlers Dr. Engelbert Dollfuss* 《联邦总理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博士的青年时代》 477n
- Die klassische Nationalökonomie und ihre Gegner* 《古典经济学及其敌人》 124n
- “Die Knappsche Geldtheorie,” 《克纳普的货币理论》 222n
- Die Konjunktur* 《经济》 587n
- “Die kriegswirtschaftlichen Organisationen und Zentralen in Österreich,” 《奥地利战争经济机构和中心》 270-71n
- “Die Kriegswirtschaft und das Ende der Monarchie,” 《战争经济和君主制的终结》 270-71n, 325n
- Die Krise des Dualismus und das Ende der Déakistischen Episode in der Geschichte der*

- Habsburgschen Monarchie* 《二元体制的危机和哈布斯堡君主国历史上一个戏剧性插曲的终结》 321n
- “Die Krise und der Kapitalismus,” 《危机与资本主义》 645, 645n
- Die Landarbeiter in Knechtschaft und Freiheit* 《处于奴役和自由状态下的农场工人》 68n
- Die Lehre von der Wirtschaft* 《经济理论》 1007n
- “Die Lehre von Gelde,” 《货币理论》 582n
- Die letzten Jahrzehnte einer Grossmacht* 《一个超级大国的最后数十年》 8n, 12n, 38n, 46n, 48n, 50n, 52n, 57n, 58n, 64n, 97n, 144n, 176n, 179n, 194n, 263n, 283n, 300-01n, 320-21n, 326n, 328n, 578-79n
- Die Lösungen des wirtschaftlichen Zurechnungsproblems bei Böhm-Bawerk und Wieser* 《庞巴维克和维塞尔关于经济归属问题的解决》 385n
- “Die modern Tendenz in der Lehre vom Geldwert,” 《货币价值理论的现代趋势》 236n
- Die Nationalitätenfrage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主义》 94n, 321n
- Die neue Gesellschaft* 《新社会》 370n
- “Die neue Regierungsvorlange zur Abänderung des Personalsteuergesetzes,” 《新的关于修订个人税收法案的政府议案》 206n
- Die neue Wirtschaft* 《新经济》 370n
- Die ökonomischen Kategorien und die Organisation der Wirtschaft* 《经济范畴和经济组织》 171n
- “Die österreichische Finanzpolitik,” 《奥地利财政政策》 16n, 143n, 191n, 207n
- “Die österreichische Geld- und Währungspolitik von 1848 bis 1948,” 《奥地利货币政策 1848-1948》 230n
- Die Ost-West-Wochenzeitung* 《东西周刊》 11n
- Die Partei der Freiheit* 《自由党》 78n, 118n, 120n, 198n, 537n, 538n
-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als Soziologie* 《作为社会学的历史哲学》 535n
- Die Planwirtschaft* 《计划经济》 370n
- “Die Planwirtschaft und ihre Gegner,” 《命令经济及其反对者》 655n
- “Die politischen Beziehungen Wiens zu den Ländern im Lichte der Volkswirtschaft,” 《从整体经济角度分析维也纳与各省的政治关系》 339n
- Die politischen Religionen* 《政治宗教》 438n
- Die Preise im Konjunkturverlauf* 《商业周期中的价格》 576-77n
- “Die Quantitätstheorie,” 《数量理论》 353n
- Die russische Papierwährung* 《俄国纸币通货》 234n
- “Die Sanierung der europäischen Staatsfinanzen,” 《欧洲公共财政的疗法》 492n
- Die Schäden und Gefahren der Valutaregulierung für die Volkswirtschaft und die Kriegsbereitschaft* 《通货管制对经济和战备的危害》 221n
- Die Sozialisierung Sachsens* 《萨克森的社会化》 371n
- “Die staatliche Theorie des Geldes,” 《货币的国家理论》 222n
- Die Staatslehre des Dante Alighieri* 《但丁的政治理论》 67n
- “Die Stellung des Geldes im Kreise der wirtschaftlichen Güter,” 《货币在经济品

- 流通中的地位》 471n
- Die Universität Innsbruck* 《因斯布鲁克大学》 141n
- Die Ursachen der Wirtschaftskrise* 《经济危机的原因》 617n, 618n, 620n, 624n, 625n
- Die Wehrwirtschaft des totalen Krieges* 《总体战的战争经济》 312n
- Die Welt von Gestern* 《昨日世界》 31n
- Die wirtschaftlichen Grundgesetze in der Gegenwartsphase ihrer Entwicklung* 《当前发展阶段的经济学基本法则》 155n
- “Die wirtschaftspolitischen Motive der österreichischen Valutaregulierung,” 《奥地利通货管制的经济动机》 96, 182n, 221n, 239n, 244 - 45n
- “Die Wirtschaftsrechnung im sozialistischen Gemeinwesen,” 《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计算》 372n
- Die Wirtschaftstheorie der Gegenwart* 《当前经济理论》 471n
- Die Wirtschaftswissenschaft nach dem Kriege* 《战后的经济学》 565 - 66n
- “Die Zukunft der Sozialpolitik,” 《社会政策的未来》 397n
- Differential, value 价值差额 774, 777
- Diktator Rathenau* 《独裁者拉特瑙》 370n
- Direct democracy 直接民主 412 - 13
- The Discovery of Freedom* 《发现自由》 839
- Discursive reasoning 推论理性 671
- “Diskussionsbemerkungen zu den Leitsätzen von Professor v. Mises zur Erörterung der methodologischen Probleme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关于冯·米塞斯教授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讨论的若干指导原则的评论》 720n
- Disproportionality theory 比例失调理论 252n
- Dissent, capitalism and 资本主义和分歧 957 - 63
- Distribution, importance of 分配的重要性 584
-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财富的分配》 172
- Division of labor, value and 价值和劳动分工 114
- Dorn's Volkswirtschaftliche Wochenschrift* 《铎恩国家周刊》 352n
- Dresden 德累斯顿 336n, 594, 657 - 64
- Du credit et des banques* 《信用与银行》 252n
- Dualism, methodological 方法论的二元论 955
- Duncker & Humblot 东克尔与洪布洛特出版社 208, 392, 480 - 81n, 494n, 496n, 505, 505 - 06n, 507, 508n, 659n
- Dunkirk 敦刻尔克 751, 752
- Durch die Kriegswirtschaft zur Naturalwirtschaft, 371n
- Durchlaucht, defined 殿下, 定义 335
- Dutch East Indies, oil and 石油和荷属东印度群岛 11n
- Dynamic economy 动态经济 171 - 73
- Earhart Foundation 埃尔哈特基金会 925, 927 - 28n, 941, 992 - 93, 1047
- Eastern Democratic Union 东方民主联盟 725 - 26n, 805n, 809, 819
- “An Eastern Democratic Union: A Proposal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urable Peace in Eastern Europe,” 《东方民主联盟: 关于实现东欧地区持久和平的一项提议》 805n
- Econometric Society 计量经济学会 1015n

Econometrica, 《计量经济学》 128n,
1015

Econometrics 计量经济学 549

“Economic Action,” 经济行为 887n

The Economic Basis of Class Conflict 《阶级冲突的经济基础》 700

“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 372

Economic Commission 经济委员会 614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eace 《和平的经济后果》 244n, 449n, 570n

Economic Council Review of Books 《经济委员会书评》 860n

Economic Freedom and Interventionism: An Anthology of Articles and Essays 《经济自由和干预主义文选》 992 - 93n

“Economic Freedom in the Present World,” 《当今世界的经济自由》 992 - 93n

Economic Inquiry 《经济调查》 106 - 07n, 547n

Economic Intelligence Unit 经济情报单位 691

Economic Journal 《经济学杂志》 185, 185n, 244n, 248n, 782n

“Economic Liberalism,” 经济自由主义 1006

“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Peaceful Economic Cooperation,” 《经济国家主义与和平的经济合作》 816n

Economic Planning 《计划经济》 843n

The Economic Point of View 《经济观点》 928

Economic Policy for a Free Society 《自由社会的经济政策》 852n

Economic Principles 《经济学原理》 775 - 76n

Economic Principles Commission 经济原理

委员会 822

Economic Science and the Austrian Method 《经济科学与奥地利学派方法》 1017n

Economic Theory 《经济理论》 598n

“Economic Theory and Socialist Economy,” 《经济理论与社会主义经济》 782n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经济理论回顾》 243n, 378n

Economic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有闲阶级经济理论》 386, 386n

Economic Thought before Adam Smith 《亚当·斯密之前的经济思想》 112n

Economica 《经济学》 634, 700, 704n, 931n

Economics 《经济学》 783n

Economics 经济学

crises in 危机 251

interventionism and 干预主义和经济学 84n

language and 语言和经济学 316 - 24

Mises on 米塞斯论经济学 1045

Mises's entry into 米塞斯初入经济学领域 87 - 93

Mises's interest in 米塞斯对经济学的兴趣 44 - 45

natural bases of 经济学的自然基础 567 - 68

primitives and 基础与经济学 105n

rationality and 理性与经济学 288

socialist-calculation debate and 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讨论 373 - 80

static vs. dynamic economy and 静态与动态经济与经济学 171 - 73

treatise on 论经济学 759 - 86. See also Praxeology/Praxiology 另见行为学

types of 经济学的类型 549

“Economics and Knowledge,” 《经济学与知识》 706, 707

- Economics and National Security* 《经济学与国家安全》 691n
- “Economics and Politics,” 《经济学与政治》 665n, 666 - 67n
- Economics and the Public Welfare* 《经济学与公共福利》 490n
- “Economics as a Social Science,”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经济学》 887
- “Economics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of Business,” 《政府管制经济学》 807n
- The Economics of Inflation: A Study of Currency Depreciation in Post-War Germany* 《通货膨胀经济学:关于战后德国通货贬值的研究》 496n
- “The Economics of the Middle-of-the-Road Policy,” 《中间道路政策的经济学》 897, 914
- Economische Opstellen; Aangeboden aan Prof. C. A. Verrijn Stuart 《经济学:献给维 C. A. 瑞京·斯图亚特教授》 624n
- The Economist* 《经济学家》 981
- “Economist Ludwig von Mises; Advanced Libertarian Theory,” 《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最新自由至上主义理论》 1039
- The Economist of the Century; Ludwig von Mises in the History of Monetary Thought* 《世纪经济学家:货币思想史中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214n
-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经济与社会:解释社会学概要》 208n, 393n. See also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另见《经济与社会》
- Edinburgh 爱丁堡 139
- Editorial Committee 编辑委员会 614
- Edler, defined 埃德勒 3, 15, 335
- EDU. See Eastern Democratic Union 东方民主联盟, 另见东方民主联盟
- Education 教育 17, 21 - 27, 61n, 65, 461 - 64. See also specific institutional names 另见具体机构名称
- Efficiency 效率 595n
- Egalitarianism 平均主义 860n
- Ego 自我 977 - 78
- Ehrenzeichen. See Austrian Medal of Honor 奥地利荣誉勋章 另见奥地利荣誉勋章
- “Ein Beitrag zur formal-praxeologischen Grundlegung der Ökonomik,” 《关于经济学的形式—行为学基础的一个贡献》 719n
- “Ein Wort zum Monopolpreisproblem,” 《简评垄断价格问题》 432 - 33n
- “Eine ‘dynamische’ Theorie des Kapitalzins-es,” 《资本利息的“动态”理论》 174n
- “Eine neue Geldtheorie,” 《货币新论》 222n
- “Einführung,” 《导论》 702n, 738n
- “Einladung zur Eisenacher Versammlung von 1872,” 《1872 艾森纳赫会议邀请函》 118n
- “Einleitung,” 《邀请函》 88n, 102n, 104n, 140n, 154 - 55n, 406n, 453n, 454n, 476n, 477n
- Eisenach 艾森纳赫 509 - 10n
- Ekonomická Revue* 《经济评论》 1036
- El Establecimiento Histórico de la Escuela Austriaca de Economía*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历史背景》 1017n
- El Sol* 《太阳报》 715n
- Elasticity, of money 货币弹性 228
- Elbe 易北河 713
- Elementary theory of value 基本价值理论 153 - 54
- Elemente der technischen Hydromechanik* 《流体力学技术原理》 262n
- Eléments d'économie politique* 《政治经济学纲

- 要》 130 - 31n, 762
- Elitism 精英主义 963 - 71
- Emigration 移民 198, 276 - 77. *See also*
Migration 另见移民
- "Emigré Economists at the New School,
1933 - 1945," 《“新学院”的移民经济
学家, 1933 - 1945》 792n
- Emory University 埃默里大学 998 - 99n
- Empirical method 经验方法 106, 126,
671
-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不列颠百科全
书》 185n, 270n, 289n, 347 - 8n, 480n
-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
学百科全书》 644n
- The End of Laissez-Faire* 《自由放任的终
结》 533n, 536n, 539 - 40n, 570, 571,
571n
- An Enemy of the State* 《国家的敌人》
930n
- England. *See* Great Britain 英格兰, 见大不
列颠
- English Guild Socialists 英国的基尔特社
会主义者 377
- Enlightenment liberalism 启蒙自由主义
71, 555n
- Ennoblement Act 封爵公报 3n
- Entrepreneurship 企业家理论 171 - 73,
770 - 73, 774
- Entwicklung der Gesetze des menschlichen
Verkehrs und der daraus fließenden Regeln
für menschliches Handeln* 《人类交换规律
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 67n, 70n,
129, 129n, 133n, 243n, 475n
- Entwicklungsgesetze des Kapitalismus* 《资本
主义的发展规律》 1008n
- "Entwicklungsgang der wirtschafts-und sozial-
politischen Systeme und Ideale," 《经济
和社会—政治体系及观念的发展进程》
468n
- "Entwurf von Richtlinien für den Wiederauf-
bau Österreichs," 《奥地利重建计划草
案》 725 - 26n, 742n, 817n
- Envy 嫉妒 981n
- Ephrussi Bank 弗鲁西银行 365n
-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 *See*
Grundprobleme der Nationalökonomie 《经济
学的认识论问题》, 见《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
- "Epochen der Dogmen und Methodenge-
schichte," 《经济学说和方法》 468n
- Equality 平等 558 - 59, 774
- "The Equations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and the Problem of Economic Calculation in
a Socialist State," 《数理经济学方程和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问题》 704n
- Equilibrium theory 均衡理论 469 - 70n,
588n, 590 - 91, 722, 767, 770 - 73,
784 - 85
- Erfurt 爱尔福特 36
- Erinnerungen* 《回忆录》 10n, 19n, 25 -
26n, 39n, 66n, 77n, 79n, 87 - 91n,
93n, 102n, 139n, 146n, 160n, 178n,
184n, 186 - 88n, 190n, 209n, 214n,
222 - 23n, 288n, 365n, 406n, 453n,
464n, 484n, 486n, 490n, 505n, 531n,
612n, 630n, 678 - 79, 785n
- "Erinnerungen an das Mises-Privat-seminar,"
《米塞斯私人研讨会往事》 366n, 581n,
586n, 633n, 696n
- Erinnerungen und Erörterungen* 《回忆和讨
论》 37n
- Erkenntnis und Irrtum* 《知识和错误》
168 - 69n
- Erlaucht, defined 阁下 335
- Ernährungsamt* 营养局 272
- "Eröffnungsrede zum 25 jährigen Bestehen des

- Vereins auf der Kölner Tagung von 1897, "《1897年科隆会议协会25周年庆典开幕演讲》 120n
- Escape tax 逃亡税 728
- Essai sur l'origine des connaissances humaines* 《论人类知识的起源》 114n
- Essay on the Nature of Commerce in General* 《商业性质概论》 243, 243n
- "Essay Towards a Solution of the Gold Question: The Course of the Depreciation," 《试论黄金问题的解决: 贬值的过程》 243n
- Essays in Political Economy: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政治经济学文集: 理论与应用》 243n
-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实证经济学论文集》 167n
- 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 《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 631n, 634n
- Essen 埃森 574 - 75
- Essentials of Economic Theory* 《经济理论基础》 436n
- Estate parliaments 地区议会 46
- Estonia 爱沙尼亚 5n, 805n
- The Eternal Jew in Vienna 《维也纳不朽的犹太人》 103
- Ethics, Christian vs. market 伦理学, 基督教与市场 437 - 43
- The Ethics of Liberty 《自由的伦理》 546n
- Ethnic contention. See Nationalism 种族冲突, 见民族主义
- Etudes sur la monnaie* 《通货研究》 252n
- "Eugen Ritter von Böhm-Bawerk," 《欧根·里特尔·冯·庞巴维克》 144n
- "Eugen von Böhm-Bawerk," 《欧根·冯·庞巴维克》 141n, 145n, 148n
- "Eugen von Böhm-Bawerk and the Discriminating Reader," 《欧根·冯·庞巴维克与有鉴别力的读者》 45n, 95n
- "Eugen von Böhm-Bawerk's Innsbruck Lectures on Economics," 《欧根·冯·庞巴维克在因斯布鲁克的经济学演讲》 141n
- "Eugen von Philippovich," 《欧根·冯·菲利波维希》 81n, 85n, 202n, 203n
- Europäischer Zoll-Verein* 欧洲关税协会 582
- Europe 欧洲 757
- Europe, decision to leave 决定离开欧洲 746 - 57
- Evolution, social 社会演化 430, 430 - 31n
- Exact method 精确方法 106
- Examina Rigorosa 严格考试 64
- Exchange Control in Central Europe* 《中欧的外汇管制》 629n
- Exchange rates 汇率 244 - 49, 351n, 353, 358 - 59, 573n
- Exchange value 交换价值 158
- Exchanges, Prices, and Production in Hyperinflation: Germany* 《恶性通货膨胀时期的交换、价格和生产: 德国 1920 - 23》 1920 - 23, 496n
- "Excursions of a Socialist into the Field of Epistemology," 《一位涉足认识论领域的社会主义者》 665n
- Experiments, thought 思想实验 168
- Exportakademie 出口学院 361
- Factories 工厂 91 - 92, 439
- "Facts and Counterfactuals in Economic Law," 《经济法则中的事实和反事实》 1017n
- Fads and Foibles* 《现代社会学及其相关学科中的流行与怪诞》 998 - 99n

- Faith and Freedom* 《信仰与自由》 855, 887n
- Family, political economy and 家庭政治经济学 413 - 18
- "Farewell to Professor Mises," 再见,米塞斯教授 679
- Farm Journal* 《农业期刊》 890
-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537 - 38, 560 - 61, 560n, 676, 712, 713, 746n, 752 - 53n, 842, 1037
- Fast ein Jahrhundert* 《百年往事》 181n, 189n, 274n
- Federal Reserve 联邦储备局 611
- Federal Technical University 联邦工业大学 696n
- Federalism 联邦制 992
- Federation of the Mexican Chambers of Commerce 墨西哥商会联合会 914n
- FEE. Se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FEE, 见经济教育基金会
- Feelings, satisfaction and 满足和感觉 131 - 32
- Feminism 女权主义 413 - 18
- Festschrift* 《纪念文集》 931, 932, 935, 987, 1006
- Fiat money 法定货币 216f
- Fiduciary media 流通媒介 216f, 217, 249 - 50, 254n, 507n, 584, 642n. See also Money; *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另见货币;《货币与流通媒介理论》
- Fin de siècle 世纪末 101
- Fin-de-siècle Vienna* 《世纪末的维也纳》 22n, 24n, 37n, 54, 175n
- Final utility 最后效用 157 - 58n
- Financial and Commercial Chronicle* 《金融与商业纪事》 897
- "Finanz-und währungspolitische Fragen in der Gegenwart," 《当前的金融与货币问题》 516n
- "Finanzreform und Vermögensabgabe," 《财政改革与财产税》 290n
- "Finding My Way," 《寻找我的道路》 917 - 18n
-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公司、市场与法律》 533n
- First Law (Gossen's) (戈森)第一定律 129
- Flexner Report 弗莱克斯纳报告 687n
- Fluglehre 《飞行理论》 262
- Food availability during and after WWI 一战期间和之后的食品供应问题 272, 289, 371n, 451, 489
- For a New Liberty* 《为了新自由》 546n
- Forced savings 强迫储蓄 254n
- Ford 福特 697, 697n
- Foreign Exchange Board 外汇管理委员会 643
- "The Foreign Exchange Policy of the Austro-Hungarian Bank," 《奥匈银行的外汇政策》 185n
- Foreign-exchange controls 外汇管制 270n, 273, 640 - 52, 654, 833
- Forschungen und Fortschritte* 《研究和进步》 582n
- Fort Knox 诺克斯堡 1031
- Fortune* magazine 《财富》杂志 869
-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经济教育基金会 849 - 53, 850n, 851p, 857, 859, 864, 867, 869, 872n, 874, 884 - 85, 888, 893 - 94, 893n, 896, 901, 913, 914, 929, 941, 941n, 943, 944n, 1014, 1029n, 1035 - 36n, 1035 - 36, 1041
- The Foundations of Arithmetic* 《算术基础》 165n
- Fractional-reserve banking 部分准备金银行 249 - 54, 298, 499 - 500, 514 - 15

- France 法国 5, 5n, 13, 24, 49n, 117n, 194, 480, 484n, 611, 683, 711, 745, 747, 828, 908
- Franco-Prussian war 普法战争 117n
- Frankfurt 法兰克福 20, 29, 197n, 575
-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s New Deal: From Economic Fascism to Pork-Barrel Politics,”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新政:从经济法西斯到肉桶政治》 714n
- Fraternities, University of Vienna and 维也纳大学和联谊会 65-66
- Frauenklub 女子俱乐部 352n
- Frederick-William University 弗里德里克-威廉大学 116n
- The Free and Prosperous Commonwealth* 《自由与繁荣的国度》 897n
- “The Free Man’s Straightjacket,” 《自由人的紧身衣》 887n
- The Free Market* 《自由市场》 41n
- The Free Market and Its Enemies* 《自由市场及其敌人》 889n
- Freedom and Reform* 《自由和改革》 852n
- Freedom Newspapers 自由报业 1025
- Freedom School 自由学校 1025, 1029
- The Freeman* 《自由人》 45n, 783n, 846n, 890n, 892, 896, 897, 901-14, 902i, 902-03n, 902n, 910n, 911n, 912n, 913n, 925, 989, 991, 994, 1035
- “*The Freeman: The Early Years*,” 《自由人:早期岁月》 846n, 901n
- Free-market unemployment 自由市场失业 619n
- Free-trade theory 自由贸易理论 276-77, 504, 581-85, 737
- “Freihandelslehre und Freihandelsbewegung,” 《自由贸易理论与自由贸易运动》 511n
- Freiherr, defined 男爵 335
-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大革命 445
- Friedensrecht* 《和平法》 452n
- “Friedensverträge. II. Vom staatswissenschaftlichen Standpunkte,” 《和平条约 II:基于政治科学的视角》 326n, 344n, 449n, 486n, 509n
-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 370n, 639n, 707n
- “Friedrich Freiherr von Wieser,” 《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 151n, 152n, 153n, 467n
- “Friedrich von Wieser and F. A. Hayek: The General Equilibrium Tradition in Austrian Economics,” 《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与 F. A. 哈耶克:奥地利经济学中的全局均衡理论传统》 469-70n
- “Friedrich von Wieser und die moderne Österreichische Schule der Nationalökonomie,” 《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与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469-70n
- “Friedrich von Wieser’s Theory of Socialism: A Magnificent Failure,” 《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的社会主义理论:一个辉煌的失败》 384n
- “Friedrich Wieser,” 《弗里德里希·维塞尔》 151n
- Friedrichstrasse 4 弗里德里希大街 4号 4, 17
- Frioul 弗里乌勒 285
- “Fritz Machlup: In Memoriam,” 《回忆弗里茨·马克卢普》 478n
- Fronde 投石党 5
- Fruehauf Trailer Company 弗吕霍夫拖车公司 845
- Fuel and Power, Minister of 燃料电力大臣 675n

- Führer durch die Krisenpolitik* 《危机政策指南》 576 - 77n
- Fundament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经济学基础》 368n
- Fundamental Laws of Arithmetic* 《算术基本法则》 165n
- “Fünf Jahre Geldtheorie,” 《货币理论五年》 222n
- Funktionsprobleme der sozialistischen Wirtschaft* 《社会主义经济的运作问题》 783n
- “Für die freie Verkehrswirtschaft,” 《为自由运输产业》 663n
- Fürst, defined 侯爵 335
- Galicia 加里西亚 3 - 4, 4n, 6, 9 - 10, 10 - 11n, 13 - 14, 16, 29, 54, 67, 70 - 72, 70n, 259 - 60, 264n
- “Galizien, Bukowina, Moldau,” 《加里西亚、布科维纳和莫尔道》 3n, 4n, 7n, 8n, 10n, 12n, 13n, 16n, 70n, 74n, 302n, 321n
- Game theory 博弈论 549
- “Gedanken über die Wirtschaftspolitik nach dem Kriege,” 《战后经济政策思想》 742n
- Gedankenexperimente 思想实验 168
- “Geld,” 《货币》 786n
- Geldtheorie und Konjunkturtheorie 《货币理论与周期理论》 576 - 77n
- Geldwertstabilisierung und Konjunkturpolitik* 《货币稳定与经济政策》 488n, 582 - 83, 584n, 604n
- Geldzins und Güterpreise* 《利息与价格》 224n, 227 - 28n, 228n, 237n, 252, 253n
- Gemeinwirtschaft*. See *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公有经济》，见《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
- Gender issues 性别问题 413 - 18
- General Motors 通用汽车公司 823
-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494, 494n, 567 - 68n, 572, 633n, 638 - 40, 649n, 716 - 17, 717n
- Geneva 日内瓦 xiii, 185, 300n, 483, 569, 616, 685, 687. See also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另见高级国际关系学院
- Geneva Protocol 《日内瓦协议》 483, 509, 577
- Geneva Research Center 日内瓦研究中心 691, 753 - 54n
- Geneva School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ee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日内瓦国际研究学院，见高级国际关系学院
- Genoa 日内瓦 480, 483, 486 - 87, 488, 489, 585
- Gerechtigkeitsidee und Mietengesetzgebung* 《正义观念与租金管制》 630n
- German Essays on Science in the 19th Century* 《德国19世纪科学文集》 126n
- German Federation. See Bund 德意志邦联，见邦联
-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德国历史学派 25, 146
- Germ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德国社会学学会 204
- German University of Prague 布拉格德意志大学 81
- Germany — 德意志
administration of 行政部门 320
Austria-Hungary and 奥匈帝国和日耳曼民族 46 - 47, 49n, 53
conflict and 冲突和德国 724 - 26, 746n
currency of 德国通货 355 - 56

- education and 教育和德国 24
- fallacies of German socialism and 德国社会主义的错误 310 - 16
- Galicia and 加里西亚和德国 3 - 4, 4n
- imperialism and 帝国主义和德国 300, 301 - 06, 740
- Judaism and 犹太教和德国 5, 5n, 19 - 20, 29
- monetary reform and 货币改革和德国 494 - 95
- nationalists and 民族主义者和德国 56, 327
- Neue Freie Presse* and 《新自由报》和德国 30, 30n
- return to classical liberalism and 回归古典自由主义和德国 508 - 13
- revolutionary insurrections in 德国的革命起义 13
- social analysis and 社会分析和德国 306 - 10
- socialism in. *See* Socialism 德国社会主义, 见社会主义
- World Wars and. *See* World War I; World War II 世界大战, 见一战; 二战
- Gesammelte Abhandlungen* 《文集》 82n, 102n, 142n, 156n, 167 - 68n, 201n, 225n, 231n, 597n
-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科学理论论文选》 202n, 600n, 602n
- Gesammelte Schriften* 《作品集》 141n
- Gesammelte Werke* 《著作集》 102n, 124n, 309n, 515n, 665n
- Geschichte der kaiserlichen Universität zu Wien* 《皇家维也纳大学校史》 62n
- Geschichte der National-Oekonomik in Deutschland* 《德国国民经济学的历史》 109n
- Geschichte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社会政策协会的历史》 119n, 120n, 187n, 195n, 199n, 398n, 496n, 509 - 10n, 510n, 573n, 662n
- “Geschichtliche Entwicklung der Geldtheorie,” 《货币理论的历史发展》 226 - 27n
- Geschichte der nationalökonomischen Krisentheorien* 《国民经济危机理论的历史》 252n
- Geschlecht und Charakter* 《性与性格》 66, 416 - 17n, 966 - 67n
- Gesell, Silvio 西尔沃·格泽尔 649, 649n
- Gesellschaft für Soziologie 社会学会 667 - 68
- Gesellschaft österreichischer Volkswirte 奥地利经济学家协会 516n
- “Gesetzliche Barzahlungen und Kriegsfall,” 《法定现金与战争问题》 186n
- Gestapo 盖世太保 727, 728
- the G. I. Bill 军人权利法案 791, 791n
- “Gibt es einen Widersinn des Sparens?” 《存在储蓄悖论吗?》 633n
- Glastnost* 《公开化》 336n
- Gleichschaltung laws 同步行动法案 663 - 64
- Glen House 格伦民宿 807, 808
- The God of the Machine* 《机器之神》 839
- Gold Delegation 黄金委员会 642
- Gold exchange standard 金汇兑本位制 xii, 298, 355, 483 - 93, 498 - 99, 502, 514 - 17, 577 - 81, 649 - 51, 650n
- Golden Bull 《金皮诏书》 5
- Good Society* 《美好社会》 735, 738
- Goods 财货 381, 776
- Gossen School 戈森学派 125 - 36
- “Government and the National Economy,” 《政府和国民经济》 570n

- “Government Control and the Profit System,”
政府管制和利润体系 927
- Government sciences 政府科学 61, 87,
205
-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s. *See also* Interven-
tionism 政府干预, 另见干预主义
- Graduate Facult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
ence 政治与社会科学研究研究生院 792n
-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高级国际关系学院 xiii, 569, 616,
684, 685 - 89, 731n, 1033
-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商业管理研究生院 924. *See* New York
University 见纽约大学
- Graduate studies, education and 教育和研
究生课程 63n
- Grand Tourisme Luxe 长程旅游豪华版
697, 697n
- Grandes 大人物党 5
- Great Austrian Economists 奥地利伟大经
济学家 794n
- Great Britain 英国 xi, 5, 5n, 24, 49n,
95n, 194, 480, 515, 586, 747, 769,
828, 908. *See also* London School of Eco-
nomics 另见伦敦经济学院
- Great Depression 大萧条 615 - 16,
617 - 31, 790, 940
- The Great Depression* 《大萧条》 619n,
700
- Great Economists before Keynes: An Introduc-
tion to the Lives and Works of One Hundred
Great Economists of the Past* 《凯恩斯之
前的伟大经济学家: 过去 100 位伟大经济
学家的生平和著作》 133 - 34n, 469n
- Greece 希腊 4, 805n, 821n
- Greek Orthodox, population of 希腊正教徒
的人口 4n
- Grenzen der Wirtschaftspolitik* 《经济政策的
局限》 576 - 77n
- “Grenznutzen,” 《边际》 156n
- Grenznutzen, defined 边际 157 - 58n
- Gresham's Law 格雷欣法则 247
- Grove City College 格罗夫城市学院 xiii,
942 - 45, 988
- Grünberg Seminar 格林贝格的研讨班
66 - 74, 89 - 90
- Grundgedanken der theoretischen Ökonomie*
《理论经济学原理》 590n
- Grundlagen* 《概论》 124n
- Grundlagen und Entwicklungsziele der
Österreichisch-Ungarischen Monarchie* 《奥
匈帝国的立国之本和发展目标》 321n
- Grundprobleme der Nationalökonomie* 《经济
学的基本问题》 171n, 211n, 467n,
593n, 594n, 599 - 600n, 601n, 603,
603n, 605n, 659n, 668n, 670, 670n,
719n, 722n, 761n, 778n, 887, 897, 897n
- Grundriss der allgemeinen Volkswirtschaftslehre*
《经济学概论》 122n
- Grundriss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政治
经济学概论》 81n
- 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k* 《社会经济规
划大纲》 468n
- Grundriss der Wirtschaftspolitik* 《经济政策
大纲》 525n
- 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国民
经济学原理》 80, 104, 105n, 106n,
124n, 382 - 83n, 382n, 389n, 762n,
774n
- “Grundzüge der Theorie des wirtschaftlichen
Güterwerths,” 《经济财货价值理论》
147, 218 - 19n
- “Grundzüge einer Klassifikation der
Wirtschaftswissenschaften,” 《经济学分
类概论》 124n, 309n
- “The Guidance of Production in a Socialist

- State,” 《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指引》 782n
- Guilds, medieval 中世纪行会 439
- Grundriss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政治经济学概论》 83
- Gymnasien 文理中学 183, 744
- Habsburg Empire 哈布斯堡帝国 3-4, 7-8, 21-27, 46-47, 62, 298, 326, 345, 818. See also Rudolf (Crown Prince); Rudolf I (Emperor); Rudolf IV (Emperor) 另见鲁道夫(王储);鲁道夫一世(皇帝);鲁道夫四世(皇帝)
- Hainfeld party congress 海恩费尔德党代表大会 58
- Hallerstein and Nirenstein bank 哈勒施泰因和尼伦施泰因银行 15
- Hamburg 汉堡 574-75
- Hamburger Bank 汉堡银行 498
- Handbuch der österreichischen Pressegeschichte* 1848-1959 《奥地利报刊历史手册》 103n
- Handelsakademie 商学院 630n
- Handelsbeilage der "Berliner Börsen-Zeitung"* 《柏林交易所日报》贸易增刊 655n
-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政治科学手册》 81n, 110n, 156n, 221n, 226, 226-27n, 244-45n, 270-71n, 309n, 326n, 449n, 471, 471n, 511n, 526, 529n, 533n, 786n, 1006
- Hans Kelsen 《汉斯·凯尔森》 42n, 368n
- Harvard University 哈佛大学 163n, 573-74, 604n, 686, 714, 746, 825n, 846n, 925, 1008, 1013
- Hauptprobleme der Sozialisierung* 《社会化的主要问题》 337n, 472n
- Hauptverband der Industrie Österreichs 奥地利工业联盟 190n, 570n
- Hayek on Hayek: An Autobiographical Dialogue* 《哈耶克论哈耶克:对话式自传》 455n, 462n, 472n
- "Heart of a Fighter," 《战士之心》 41n
- HEI 1927-2002 HEI 1927-2002 185n, 685n, 687n, 688-89n, 692n, 697n, 699n
- Heidelberg 海德堡 142
- Heidelberg University 海德堡大学 288n
- "Henry Hazlitt: The People's Austrian," 《亨利·黑兹利特:人民的奥地利》 794n
- Herrenhaus* 奥地利上议院 138, 144
- Herzegovina 黑塞哥维那 49-50, 193
- Herzog, defined 公爵 335
- Heterogeneous goods 异质的财货 776
- Hillsdale College 希尔斯代尔学院 1035n
- Historical School 历史学派 226-27n, 234-35, 309-10, 589, 660, 711. See also Historicism 另见历史主义
- The Historical Setting of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历史背景》 79n, 120n, 139n, 360n, 555n, 1017
- Historicism 历史主义 77, 80-81, 89-90, 123, 161n, 392, 653, 659, 949, 972. See also Historical School 另见历史学派
- Historiography 历史学科 976
- History, study of 历史研究 971-80
- A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经济分析史》 112n, 128n, 769n
- History of Economic Doctrines: An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 Theory* 《经济学说史:经济理论导引》 243n, 737n
- A History of Marginal Utility Theory* 《边际效用理论的历史》 112n
- History of the Bank of England and Its Finan-*

- cial Services to the State* 《英格兰银行的历史及其对国家的金融服务》 95n
- History of the Jews* 《犹太历史》 7n, 28 - 29n, 30n
- Histor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洛克菲勒基金会历史》 924, 924n
- Hitler* 《希特勒》 725 - 26n
- Hitler's Jewish Soldiers* 《希特勒的犹太战士》 75n
- Hobbesian theory* 《霍布斯主义理论》 1026
- Hoch Rombon 龙博恩山 285
- Hochschule für Welthandel 世界贸易大学 361n
- Hofburgtheater 皇家剧院 22, 23, 41
- Hoffmann-Laroche family 霍夫曼—拉—罗氏家族 686n
- Hoheit, defined 陛下 335
- Hohenzollern, House of 霍亨索伦王朝 116
- Hölder-Pichler-Tempsky 霍尔—皮希勒—腾普斯基 475
- Holism 整体论 161n
- "Homage to a Master and a Friend," 《向一位大师和朋友致敬》 871n
- Homo agens 行为人 598
- Homo oeconomicus 经济人 598, 653, 766 - 67n, 887
- Homogenous goods 同质财货 776
- "The Hoover New Deal of 1932," 《1932年胡佛新政》 627n
- Hotel Badeschloss 巴斯城堡酒店 296n
- Hotel Bristol 布里斯托尔饭店 664
- Hotel National 国家大饭店 286n
- Hotel Ritz 里兹饭店 492n
- House of Habsburg 哈布斯堡王朝 818
- House of Hohenzollern 霍亨索伦王朝 116
- Housing 住房 579n, 630
- How Can Europe Survive?* 《欧洲如何幸免于难?》 927
- "How Mises Changed My Mind," 《米塞斯如何改变了我的思想》 1004n
- "Hufeland als Vorläufer von Menger und Hayek," 《作为门格尔和哈耶克先驱的胡费尔》 124n
-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人的行为》 xii, 88, 96, 161 - 62, 162n, 211, 211n, 214 - 15, 240, 253n, 400 - 01n, 406, 428n, 502, 502n, 640, 651n, 753, 759 - 86, 759n, 761n, 766 - 67n, 775n, 854, 857, 873n, 874, 880n, 881, 883 - 945, 918n, 923 - 24, 927, 931 - 33, 935, 947 - 50, 948n, 950n, 956, 966 - 67n, 973n, 982, 983n, 1017, 1022, 1022 - 24n, 1025, 1029n, 1036, 1044 - 45n, 1044 - 46
- Human Events* 《世间大事》 840, 845, 1041
- Humanism 人道主义 1000
- Humanistic social theory 人文主义社会理论 xii
- Hundert Jahre österreichische Wirtschaftsentwicklung* 《奥地利经济学百年》 1848 - 1948, 9n, 143n, 191n, 230n, 361n
- Hungarian Commemorative Medal of the First World War 匈牙利第一次世界大战纪念勋章 268
- Hungary 匈牙利 5, 5n, 267, 303, 320, 325 - 26, 343, 371, 805n, 908. *See also* Austria-Hungary 另见奥匈帝国
- Hysteria 歇斯底里 416 - 17n
- ICC. *Se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CC, 见国际商会

- Idaho 爱达荷州 833 - 34n
- Idealism 观念论 126, 465 - 66. *See also* Kant, Immanuel 另见伊曼努尔·康德
- "Ideas sobre la Política Económica de la Post-guerra," 《战后的政治经济学思想》 816n
- Ideologie und Utopie*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665n
- Illinois 伊利诺伊州 915
- IMF. *Se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migration 移民 276 - 77, 277n. *See also* Migration 另见移民
- Imperial and Royal Division Artillery Regiment, 74. *See also* Military service
- Imperial General Staff 帝国总参谋部 295 - 96
-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 300, 301 - 06, 310 - 16, 341, 504, 740
- Imperialismus* 《帝国主义》 286, 286n, 299. *See also*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另见《民族、国家和经济》
- Imprimis* 《最初》 1035n
- Imputation, 372 - 73, 382, 385 - 86, 473 归属
- In My Time* 《我的时代》 449n, 712n
- Income, defined 收入 595
- Income theory of the value of money 货币价值的收入理论 232
- Independent School of Law 独立法学院 812 - 13
- Indian Currency and Finance* 《印度通货和财政》 244n
- Indians, American 美洲印第安人 976
- 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 533n, 561, 953, 960, 961
-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个人主义和经济秩序》 475n, 711n
- "Individualismus," 《个人主义》 533n
- Individualpsychologie 个体心理学 264 - 65n
- Individuals for a Rational Society 《理性社会的个人》 1038
- Industrial Fluctuations* 《产业波动》 619n
- Industrialization 工业化 8n, 10, 492
- Industriellenklub 工业俱乐部 190n, 491n, -570
- Inequality 不平等 774
- Inflation 通货膨胀 241 - 43, 248, 312, 312n, 344 - 50, 351 - 52, 356, 455 - 60, 488, 493 - 505, 513n, 578, 584, 641, 642n, 826, 919, 920, 987. *See also* Business cycles; Great Depression 另见商业周期; 大萧条
- "Inflation and the Shortage of Money: Against Continued Use of the Printing Press," 《通货膨胀与货币短缺: 反对继续使用印钞机》 459
- "The Influence of German Economists on the Work of Menger and Marshall," 《德国经济学家对门格尔和马歇尔思想的影响》 115n, 117n
- "Information," 《资料》 727n
- Infrastructure, communilization of 基础设施的公有化 492
- Inleiding tot de Leer der Waardevastheid van het Geld*, 508n 《货币价值的基本研究及导论》
- Innovation 创新 409
- Innsbruck 因斯布鲁克 652n
- Innsbrucker Vorlesungenüber Nationalökonomie* 《因斯布鲁克政治经济学讲义》 141n, 235n, 241n
-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Good Society* 《美好社会原则研究》 735, 735n
- Institut de France* 法兰西学院 139

- Institut für Konjunkturforschung* 商业周期研究所 639n
- 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s Hautes Études Internationales. See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高级国际关系学院, 见高级国际关系学院
- Institute for Business Cycle Research. See Austrian Institute for Business Cycle Research 商业周期研究所, 见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
-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See Austrian Institute for Business Cycle Research 经济研究所, 见商业周期研究所
- Institute for Humane Studies 人文研究所 712
-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经济事务研究所 908
-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国际教育学院 696n
- Institute of the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研究所 815
- Insurance 保险 439
- Intellectual leadership 精神领袖 967 - 68n
- Intellectual power 思想权力 545
- "The Intellectuals and Socialism," 《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 844n
- Intercollegiate Society of Individualists 校际个人主义协会 1029, 1030
- "Interest, Theories: Old and New," 《利息, 各种理论: 新论与旧说》 776n
- Interest rates 利率 308n, 323, 767, 780
- Interest theory 利息理论 773 - 79
- "The International Aspects of Monetary Policy," 《货币政策的国际视角》 693
-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国际商会 514, 567, 568, 569, 615, 627, 628, 644, 652, 652n, 688, 790
-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Europäischer Zoll-Verein 欧洲关税协会 582
-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 国际经济协会 365
-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lanning* 《国际经济计划》 699n
-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国际经济关系 826
-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国际先驱颂辞》 1039
-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 国际知识合作学院 736
-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国际劳工组织 691
-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国际劳工组织 687n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034
- International trade 国际贸易 525
-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Booksellers 国际大学书商组织 1015n
- Internationale Hochschulkurse 国际大学课程 570n
- Internationale Kapitalbewegungen* 《国际资本运动》 576 - 77n
- Inter-temporal misallocation 跨期配置不当 252n
- Interventionism 干预主义 127, 200, 247, 312n, 523 - 31, 542n, 544 - 55, 550n, 579, 618 - 19, 622, 636n, 708 - 11, 764 - 67, 801, 828, 845, 860, 897, 898, 900n, 918 - 19, 985 - 1000, 999 - 1000n, 1007. See also 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 Neo-liberalism 另见《干预主义批判》; 新自由主义
- "Interventionismus," 《干预主义》 544n, 556, 619n
- "An Interview with Henry Hazlitt," 《亨利·

- 黑兹利特访谈》 794n
- “Introduction,” 《导论》 370n, 703n
-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s* 《经济学导论》 926
-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导论课程》 528n
-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Method of the Social Scienc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conomics. See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Methode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insbesondere* 《对于社会科学, 具体而言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探究》
- Iron Curtain 铁幕 908
- Irrtümer auf dem Gebiete des Geldwesens* 《货币体系领域的错误》 244-45n
- Irvington Press 欧文顿出版社 913
- Isonzo Battles 伊松佐河战役 285
- Italy 意大利 xii, 4, 5n, 49n, 50, 194, 344, 450, 484n, 537, 676, 677, 678, 724, 746n, 875n
- Jahrbuch für Gesetzgebung, Verwaltung und Volkswirtschaft im deutschen Reich* 《德意志帝国的立法、行政和经济年鉴》 73, 156n, 167-68n, 185n, 186, 186n
-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经济学和统计学年鉴》 81n, 124n, 151-52n, 218-19n, 222n, 309n, 403n, 467n, 473n, 624n
- Japan 日本 96, 810, 848, 848n, 849
- Jena 耶拿 142
- “Jevons and Menger Re-Homogenized; Who is the Real ‘Odd Man Out’?,” 《杰文斯和门格斯的再混同: 谁是真正的“特立独行”之人?》 107n, 128n
- Jewish Cultural Community 犹太文化社团 12, 16, 30
- Jewish tax 犹太人税 728
- J. I. Case Company J. I. 箱包公司 855
- Joseph A. Schumpeter—eine Biographie* 《约瑟夫·A. 熊彼特传记》 162-63n, 164n
-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The Public Life of a Private Man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 一位平民的公共生活》 162-63n
- Joseph Alois Schumpeter—Forscher, Lehrer, and Politiker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 学者、教师和政治家》 162-63n, 164n
- 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经济学家杂志》 130-31n
- 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et des Etudes Humaines* 《经济学家与人文研究杂志》 469-70n
- 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 《自由至上主义研究杂志》 239n, 1017n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杂志》 575n
- Journal of Praxiology* 《行为学杂志》 721n
- Journal of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苏联和东欧研究杂志》 783n
- Jubiläumstagung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in Eisenach* 《社会政策协会周年纪念艾森纳赫会议》 397n
- Judaism 犹太文明
- capitalism and 资本主义和犹太人 976
- education and 教育和犹太人 62
- ethics and 伦理学和犹太人 438-39
- Fritz Machlup and 弗里茨·马克卢普和犹太人 477
- Galicia and 加里西亚和犹太人 4, 54
-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政府官员和犹太人 331n
- as leaders of the socialist movement 领导

- 社会主义运动的犹太人 56
- liberalism and 自由主义和犹太人
29 - 30
- migration of 犹太移民 15 - 16
- Mischling and 半犹太人与犹太人 75n
- Othmar Spann and 奥特马·施潘和犹太人 467n
- Poland and 波兰和犹太人 5
- Pope Leo XIII and 教皇利奥十三世和犹太人 484 - 85n
- population of 犹太人口 4n
- professional accomplishments of 犹太人的职业成就 19
- Sonnenfels and 索南费尔斯和犹太人 11
- taxes on 犹太人的税负 728
- Vienna and 维也纳和犹太人 11n,
20, 27 - 45
- World War II and 二战和犹太人 742
- Judaism in Poland 《波兰的犹太文明》
5n
- Judenbibliothek 犹太图书馆 727n
- Judenviertel, Lemberg and 伦贝格与犹太人聚居区 11 - 12
- Judgment, value. *See* Value judgments 判断, 价值, 见价值判断
- Jugendstil, Vienna and 维也纳和新艺术运动 24
- Justice 正义 959
- Kaisertum Österreich 奥地利帝国 354n
- Kammer 商会 187 - 93, 205 - 07, 286n,
296, 300n, 331, 337, 337n, 357, 360 -
65, 433, 452, 455, 455n, 462 - 64, 480,
575, 612, 622, 629, 649, 652n, 677n,
684, 723n, 728n, 742, 745 - 46n, 833n,
847, 987
- Kansas City Civic Research Institute 堪萨斯城公民研究所 868
- Kapital und Kapitalzins 《资本与利息》
93, 95
- Kapital und Produktion 《资本与生产》
576 - 77n
- Kapitalbildung und Kapitalaufzehrung im Konjunkturverlauf 《商业周期中资本形成和资本消耗》 576 - 77n
- 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 《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 149n
- "Karl Menger," 《卡尔·门格尔》 102n,
104n, 385n, 549n
- Karl-Troops Cross 卡尔军团十字勋章
268
- Karl-Truppenkreuz 卡尔军团十字勋章
268
- Kartelle und Trusts 《卡特尔和托拉斯》
437n
- Kartellrundschaue 《卡特尔评论》 656n
- Katastrophenhauss und Geldentwertung 《灾难繁荣和通货膨胀》 460n
- Kathedersozialisten 讲坛社会主义 78,
79, 82, 118, 118n, 196, 203, 226 - 27n,
392, 527, 663
- Katholisch-Deutscher Akademikerausschuss 天主教德国学术委员会 477n
- "Keynes' 'National Selbstgenügsamkeit' von 1933. Ein Fall von kooperativer Selbstzensur," 《凯恩斯 1933 年的〈国家自己自足〉——一个主动自我审查的例子》
716 - 17n
- Kiel 基尔 498, 574 - 75
- Kiev 基辅 297
- Kinderhäuser 儿童宿舍 91
- King's College 在国王学院 612n
- Kleines Lehrbuch des Positivismus: Einführung in die empiristische Wissenschaftsauffassung 《实证主义简明教材: 经验主义科学观导论》 874n

- Knight's Cross 骑士十字勋章 281
 "Knowledge, Judgment, and the Use of Property," 《知识、判断和产权的使用》 404n
 Kolo Polske 波兰俱乐部 7
 Königgrätz 克尼格雷茨 46, 74, 349n
 Königsberger Hartung'sche Zeitung 《哥尼斯堡哈通舍报》 609n
 Konjunktur-Gesellschaft 经济协会 575
 Können wir heute sozialisieren? Eine Darstellung der sozialistischen Lebensordnung und ihres Werdens 《今天我们可以社会化吗? 陈述社会主义生活秩序及其实现》 371n
 Konstituierender Reichstag 立宪会议 302n
 Korean War 朝鲜战争 898
 Krakow 克拉科夫 266
 Kreditinstitut für öffentliche Arbeiten 公共工程信用机构 485n
 Kremsier Constitution 克莱姆西尔宪法 320 - 21
 Kriegserinnerungsmedaille 战争纪念勋章 268
 "Kriegsereignisse im Norden. Von der Mobilisierung bis einschliesslich der Schlacht bei Lemberg," 《北线战事: 从战争动员到伦贝格战役》 259n, 264n
 Kriegssozialismus und Friedenssozialismus 《战争社会主义与和平社会主义》 370n
 "Kriegswirtschaftslehre und Kriegswirtschaftspolitik," 《战争经济学与战争经济政策》 270 - 71n
 Kriegszentralen 战争中心 270
 Krise und Konjunktur 《危机与经济学》 587n
 "Krisen," 《危机》 471n
 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干预主义批判》 619n. See *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 另见《干预主义批判》
 "Kritische Beiträge zur volkswirtschaftlichen Lehre von der Güternutzung," 《对于经济财货理论的关键贡献》 146n
 Kritische Betrachtungen zum deutschen Geldproblem 《德国货币问题的关键因素》 508n
 Kulturwissenschaft und Naturwissenschaft 《文化与自然科学》 600n
 Kurienparlamente 地区议会 46, 98
 La Cité Libre 《自由城市》 735n
 La Paix malpropre (Versailles)—pour la reconciliation par la vérité 《纷乱的和平(凡尔赛和约)——通过真相获得和解》 449n
 La Prensa 《新闻报》 1041
 "La Réforme financière en Autriche," 《奥地利的金融改革》 205n
 Labor 劳工 114, 315 - 16, 412 - 13, 421 - 22, 430 - 31, 490, 542n, 558 - 59, 620, 626, 636n. See also Organized labor; Syndicalism 另见组织起来的工人; 工团主义
 "Labour Campaign for the Nationalisation of the Drink Trade," "饮料贸易国有化劳工运动" 481
 Laissez-faire movement 放任自由主义运动 25, 89, 110, 118i, 356, 527 - 28, 533n, 538, 551 - 52n, 573, 694, 709 - 10, 716 - 18, 735 - 37, 768, 789, 803 - 05, 825, 838, 870 - 74, 886, 926, 936, 940, 956, 994, 1007, 1011. See also Libertarian movement 另见自由至上主义运动
 Language 语言
 Austria and 奥地利和语言 320n
 economic/political systems and 经济/政治体系与语言 301 - 02n

- Galicja and 加里西亚和语言 8n
- Mayer Rachmiel Mises and 迈尔·拉赫米尔·米塞斯和语言 13
- nations as communities of 作为语言社群的民族 316-24, 317n
- Polish and 波兰语和语言 13n
- Yiddish and 意第绪语和语言 5
- "L'assurance chômage cause du chômage permanent," 《失业保险导致永久失业》 619n
- Latvia 拉脱维亚 5n, 805n
- Laura Spelman Rockefeller Fund 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基金会 453-54n, 567, 567n, 568n, 686-87
- Lausanne School 洛桑学派 637, 638, 659
- Law, Mises's study of 米塞斯的法律研究 61-64, 181-82, 187
- Law of Association 协作法则 426-31
- Law of Costs 成本定律 147
- Law of satiation 饱和定律 157-58n
- Le Colloque Walter Lippman 瓦尔特·李普曼大会 735n
- Le commerce et le gouvernement* 《贸易与政府》 114n
- Le crépuscule du capitalisme américain—étude économique du New Deal* 《美国资本主义的黄昏——新政的经济研究》 714n
- Le Juif errant* 《游荡的犹太人》 103n
- "Le Néolibéralisme," 《新自由主义》 736n
- Leadership, intellectual 精神领袖 967-68n
- League of Nations 国际联盟 304-06, 486, 574, 574n, 616, 642, 642n, 646, 685, 688, 691, 734, 805
- "League of Nations Economists and the Ideal of Peaceful Change in the Decade of the 'Thirties," 《国联经济学家和三十年代和平转变的理想》 691n
- League of Red Cross Societies 红十字会联盟 686n
- "The Legacy of Ludwig von Mises,"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遗产》 1042n
- Legal positivism 实证主义法学 368
- Lehrbuch der Nationalökonomie* 《教科书经济学》 398n
- Lehre vom Geld* 《货币理论》 660
- Leibnizian rationalism 莱布尼茨理性主义 952n
- Leipzig 莱比锡 142
- "Leitsatz für die Neuordnung der Verhältnisse im Donauraum," 《重建多瑙河地区新秩序的一些原则》 724n
- "Leitsätze zur Erörterung der methodologischen Probleme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zur Kritik des Kaufmann'schen Standpunktes," 《讨论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以及批判考夫曼观点需要服从的一些基本原则》 675n
- Lemberg 伦贝格 4n, 7, 11, 14-15, 16, 70n, 266
- Lemberger Wechselgericht 伦贝格法院 12
- Lemberger Zeitung* 《伦贝格报》 102-03
- "Léon Walras," 《里昂·瓦尔拉斯》 128n
- "Léon Walras et Carl Menger à travers leur correspondance," 《里昂·瓦尔拉斯和卡尔·门格斯的通信》 106n, 130-31n, 157-58n
- Leonard E. Read: Philosopher of Freedom 《伦纳德·里德：自由哲学家》 824n, 850n, 989n
- Leopoli. See Lemberg 伦贝格, 见伦贝格
- Leopolis. See Lemberg 伦贝格, 见伦贝格
- Les conséquences politiques de la paix* 《和平

- 的政治后果》 449n
- “Les Hypothèses de Travail dans la Science Économique,” 《经济科学的工作假设》 722n
- Les mystiques politiques contemporaines et leurs incidences internationales 《当代政治神秘主义及其国际影响》 1027n
- “Les origins de la technologie,” 《技术的起源》 720-21n
- “Letters on Logic,” 《逻辑书信》 665n
- L'évolution créatrice* 《创造的进化》 600n
- L'homme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sa compagne 《有人权的男人和他的伴侣》 414n
- Liberal Institute 自由主义研究所 856
- Liberalism. *See also* Laissez-faire movement; Libertarian movement 自由主义, 另见自由放任运动; 自由至上主义运动
- Austria and 奥地利和自由主义 28
- Christianity and 基督教和自由主义 439, 442
- classical economists and 古典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 655
- critique of 自由主义批判 538-44
- democracy and 民主和自由主义 413
- division of labor and 劳动分工和自由主义 431
- Enlightenment liberalism and 自由主义启蒙和自由主义 71
-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and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和自由主义 475
- Galicia and 加里西亚和自由主义 16
- German economists' return to 德国经济学家回归自由主义 508-13
- in Germany 德国自由主义 537
- history of 自由主义历史 963
- imperialism and 帝国主义和自由主义 302-03
-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 and 国际知识合作学院和自由主义 736
- John Stuart Mill and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自由主义 424-25
- Judaism and 犹太人和自由主义 31
- Karl Marx on 卡尔·马克思论自由主义 57
- Laissez-faire. *See* Laissez-faire liberalism 自由放任, 见放任自由主义
- language and 语言和自由主义 301-02n
- Lippmann Colloquium and 李普曼大会和自由主义 737
- Marxism and 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 530
- Mises as “last knight” of “最后的自由骑士”米塞斯 1043-49
- nature of 自由主义的本质 527-28
- neo-liberals and 新自由派和自由主义 708-12, 734-35, 738, 738n, 842, 869, 874-81, 1003-11
- opposition to 反对自由主义 409
- paleo-liberalism and 老派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 991
- rationality and 理性和自由主义 767-70
- state and 国家和自由主义 318
- summary of Mises's views on 米塞斯自由主义观点概论 322-24
- Liberalism. See Liberalismus* 《自由主义》, 见《自由主义》
- Liberalism: A Socio-Economic Exposition. See Liberalismus* 《自由主义: 一篇社会经济论文》, 见《自由主义》
- 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 《自由主义与社会行为》 538n

- Liberalism; In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See *Liberalismus* 《社会主义:古典传统》,见《自由主义》
- Liberalismus* 《自由主义》 425n, 538n, 544, 556 - 61, 556n, 560n, 767 - 68, 897, 897n, 908, 909n
- Liberalismus—Die deutschliberale Bewegung in der habsburgischen Monarchie* 《自由主义——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德意志自由主义运动》 56n
- Liberman, Yevsey G. 叶夫谢·G. 利伯曼 783n
- “The Liberman Proposals,” 《利伯曼计划》 783n
- Libertarian movement 自由至上主义运动 xii, 124n, 561, 837 - 82, 941, 943, 987 - 91. See also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另见《人的行为》
- Libertarian Press* 自由至上主义出版社 574, 915, 918, 1014 - 15n
- The *Libertarian Review* 《自由至上主义评论》 1042n
- Liberty, historical influence of on Mises* 自由,对米塞斯成长的影响 5
- “*Liberty and Property*,” 《自由和财产》 1010
- Liberty or Equality* 《自由或平等》 833 - 34n
- Liberum Veto* 自由否决权 6
- “*The Life and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s of the Abbé de Condillac*,” 《阿贝·德·孔狄亚克的生平和经济学贡献》 112n
- Limited government* 有限政府 992
- “*L'interventionnisme et le salaire*,” 《干预和薪水》 843n
- Lionel Robbins 莱昂内尔·罗宾斯 481n
- “*Lionel Robbins and the Austrian Connection*,” 《莱昂内尔·罗宾斯与奥地利学派的联系》 700n
- Lippert & Co.* 利珀特公司 654
- Lippmann Colloquium.* See *Lippmann, Walter* 李普曼大会,见瓦尔特·李普曼
- Lisbon* 里斯本 756n, 812n
- Literature, “Young” movements and* “青年”运动与文学 193n
- Lithuania* 立陶宛 805n
- Litvinov* 李维诺夫 712 - 13
- Loan Bureau Notes* 信用社纸币 293
- Lodz* 罗兹 264
- L'oeuvre multiple de Jules Dupuit (1804 - 1866): Calcul d'ingénieur, analyse économique et pensée sociale*, 128 - 29n
- “*The Logical Character of the Science of Human Conduct*,” 《人类行为科学的逻辑特征》 719
- Logical Investigations* 《逻辑研究》 165n
- Logical positivism* 逻辑实证主义 368
- London* 伦敦 22n, 24, 83, 574 - 75. See also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另见伦敦经济学院
-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伦敦经济学院 163 - 64, 445, 479 - 83, 514, 538n, 567 - 68, 568n, 631 - 40, 631n, 639n, 664, 690n, 703n, 798
-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Its Problems, 1919 - 1937* 《伦敦经济学院及其问题》 567n
- Look Magazine* 《形象》杂志 888
- “*Lord Keynes and Say's Law*,” 《凯恩斯勋爵与萨伊定律》 719n
- Los Angeles Chamber of Commerce* 洛杉矶商会 824n, 826
- Loss* 亏损 770 - 73
- Lower Austrian Chamber of Trade, Commerce and Industry* 下奥地利贸易、商业和工业议会 361. See also *Kammer* 另见商会

- LSE. Se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LSE, 见伦敦经济学院
- “Ludwig von Mises,”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1038
- “Ludwig von Mises: 1881 - 1973,”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881 - 1973》 1041
- “Ludwig von Mises Dies at Age 92,”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逝世,享年 92 岁》 1043
- “Ludwig von Mises: In Memoriam,”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一个纪念》 1040
-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 990
- “Ludwig von Mises: Murió en Nueva York,”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纽约去世》 1041
- Ludwig von Mises: Scholar, Creator, Hero*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学者、开创者、英雄》 214n, 368n, 1042n
- “Ludwig von Mises: The Academic Scholar Who Would Not Compromise,”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一位永不妥协的学者》 569n, 1032 - 33n
- “Ludwig von Mises und die österreichische Handelskammerorganisation,”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与奥地利商会组织》 189n, 484n, 745 - 46n
- “Ludwig von Mises und die österreichische Wirtschaftspolitik der Zwischenkriegszeit,”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奥地利的经济政策》 95n, 614n, 615n
- Luftherrschaft* 《空军部队》 751n
- Luxemburg 卢森堡 56
- L'viv. See Lemberg 伦贝格,见伦贝格
- Lviv. See Lemberg 伦贝格,见伦贝格
- Lvov. See Lemberg 伦贝格,见伦贝格
- L'vov. See Lemberg 伦贝格,见伦贝格
- L'wiw. See Lemberg 伦贝格,见伦贝格
- Lwiw. See Lemberg 伦贝格,见伦贝格
- Lwow. See Lemberg 伦贝格,见伦贝格
- Machlup, Morgenstern, Haberler, Hayek und andere* 《马克卢普、摩根斯特恩、哈伯勒、哈耶克及其他人》 647n
- “Macht oder ökonomisches Gesetz?,” 《经济法的力量?》 149, 916n
- Macmillan Report 《麦克米伦报告》 642n
- Madrid 马德里 713
- Magazin der Wirtschaft* 《经济学杂志》 626n
- Magna Carta 《大宪章》 5
- Magnum opus 巨著 942, 1044 - 45
- Magyar, Austria-Hungary and 奥匈帝国和 马扎尔 50
- Man, Economy, and State* 《人、经济与国家》 437n, 766n, 940n, 942, 1024n, 1030
- 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 《没有个性的人》 49
- Manchester 曼彻斯特 130
- Manchester School 曼彻斯特学派 709, 718, 735, 768, 851 - 52
- Manuel d'économie politique* 《政治经济学手册》 590n, 597 - 98n
- Marburg 马尔堡 917
- Marginal utility 边际效用 156, 157, 218, 402
- Marginal-value theory 边际价值理论 385, 425, 466, 471n, 523 - 24, 659
- Market economy 市场经济 381, 736, 742, 762 - 63, 993
- A Market Theory of Money* 《货币的市场理论》 641n
- Mark-exchange standard 马克汇兑本位 355 - 56

- “Markt,” 市场 1006n
- Marriage 婚姻 413 - 18
-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79n, 94, 146, 158, 163, 197n, 313 - 15, 333 - 34, 364, 368, 386 - 87, 406, 431 - 32, 491, 530 - 38, 543 - 44, 659, 667 - 68, 683, 863, 894 - 95, 949, 956, 986, 1018. See also Marx, Karl 另见卡尔·马克思
- “Marxism and the Labor Movement,” 《马克思主义和劳工运动》 558n
- Materialien zur Sprachenfrage* 《语言材料》 320n
- Materialism, dialectical. Se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辩证唯物主义, 见辩证唯物主义
- Mathematical economics 数理经济学 474, 549, 567 - 68n, 605. See also Calculations; Walras, Léon 另见计算; 里昂·瓦尔拉斯
- “Max Weber und der Kathedersozialismus,” 《马克斯·韦伯与讲坛社会主义》 196n
- “Means and Ends of Currency Policy,” 《货币政策的手段和目的》 352n
- Means of production, benefits of 生产资料的益处 407 - 10
- Medal for Military Merit 金质军功勋章 267, 268
- Medals, war 战争勋章 267n, 268,
- Medica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A Report to 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 《美国和加拿大的医学教育: 写给卡内基基金会的教学提升报告》 687n
- Medicine, Vienna and 维也纳和医学 24
- Medieval law, study of 关于中世纪法律的研究 64
- Mehrwert und Gemeinwirtschaft* 《剩余价值和公有经济》 654
- Memel 默默尔 70
- “Menger, Jevons and Walras DeHomogenized,” 《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的分歧》 128n, 135n
- Mercantilism 重商主义 341
- Mercantilism* 《重商主义》 717n
- Metallists 金属主义 xii
- Metaphysics 形而上学 958
- Methodenstreit 方法论之争 117 - 25, 155, 157, 166, 197n, 599
- Methodological dualism 方法论二元主义 955
-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方法论个人主义 953
- Mexico 墨西哥 806, 812 - 16, 821, 827, 829, 881
- “Middle-of-the-Road Policy Leads to Socialism,” 《通往社会主义的中间道路政策》 914n, 916
- Migration 移民 276 - 77, 276n, 277n, 301 - 06, 319, 323
- Militarism 军国主义 504
- Militär-Verdienstkreuz 十字军功勋章 268
- Military service 军队服役 74 - 77, 76p. See also World War I 另见第一次世界大战
- Minarchy 君主制 990
- The Mind and Art of Albert Jay Nock* 《阿尔伯特·杰伊·诺克的艺术和思想》 838n
- Ministry of Finance 财政部 297, 349, 453, 488
-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外交部 331
- “Minoritätenschutz und Judenfrage nach dem christlichsozialen Programm,” 《基督教社会主义计划之后的少数民族保护和犹太问题》 484 - 85n
- Mischling 半犹太人 75n
- “Mises-kreis-Lied,” 《米塞斯小组之歌》

- 680i
- Mise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米塞斯评传》 1037n, 1043
- “Mises and Hayek Dehomogenized,” 《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分歧》 404n
- “Mises as Mentor: An Interview with George Reisman,” 《良师益友米塞斯: 乔治·赖斯曼访谈》 994n
- “Mises Seminar Lectures,” 《米塞斯的研讨会课程》 889n
- Misesian economics, school of 米塞斯主义经济学派 xii
- “Mises’s Private Seminar,” 《米塞斯的私人研讨会》 696n
- Mitteilungen des deutschen Hauptverbandes der Industrie* 《德国中央产业协会声明》 516n
- Mitteleuropäische Wirtschaft. Wochenbeilage der “Neuen Freien Presse,”* 《中欧经济 - 〈新自由报〉每周增刊》 656n
- Mittelstandspolitik 反垄断政策 433n
- Mixed populations 民族杂居 301 - 06
- Mobility. See Migration 阶层变动, 见移民
- Mohr Publishers 莫尔出版社 275, 392, 576n, 617n
- “Monarchismus, nicht Legitimus,” 《非正统王朝的君主制》 819n
- Monatsblätter für freiheitliche Wirtschaftspolitik* 《自由经济政策月刊》 1007n, 1040
- Monetarism 货币主义 1030 - 34
-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货币史》 490n
- Monetary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tability 《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 707
- Monetary Reconstruction* 《货币重建》 486n, 505n
- Monetary reform 货币改革 493 - 505
- Monetary stabilization 货币稳定 581 - 85
- Monetary Stabilization and Cyclical Policy.* See *Geldwertstabilisierung und Konjunkturpolitik* 《货币稳定与周期政策》, 见《货币稳定与周期政策》
- Monetary statism 货币国家主义 221
- Monetary systems. See Money 货币体系, 见货币
- Monetary Theory and Trade Cycle Theory* —《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理论》 638n
- Monetary Theory before Adam Smith* 《亚当斯密之前的货币理论》 215n
- Money 货币
- exchangerate determination and 汇率的决定和货币 244 - 49
- first treatise on 关于货币的首部大作 207 - 09. See also *Theorie des Geldes und der Umlaufmittel* 另见《货币与流通媒介理论》
- fractional reserve banking/business cycles and 部分准备金制银行体系/商业周期与货币 249 - 54
- Mises’s achievements regarding 米塞斯关于货币的成就 211 - 14
- Mises’s theory of 米塞斯的货币理论 236 - 40, 401 - 02n
- monetary reform and 货币改革与货币 493 - 505
- nature of 货币的本质 215 - 23, 216f
- neutrality of 货币中性 240 - 44
- quantity theory of 货币数量论 605
- reconsideration of theory of 重新思考货币理论 505 - 08
- supply of 货币供给 421 - 22
- value theory and 价值理论与货币 223 - 25
- velocity of 货币流通速率 786
- Wieser’s theory of 维塞尔的货币理论 225 - 36

- Money, Capital, and Fluctuations: Early Essays* 《货币、资本与经济波动:早期论文》 473n
- Money, Interest, and Prices: An Integration of Monetary and Value Theory* 《货币、利息和价格:货币与价值理论的整合》 240n
- Money, Method, and the Market Process: Essays by Ludwig von Mises* 《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文选》 136n, 235n, 471n, 816n
- “Money and Banking on the Unhampered Market,” 《不受限制市场的货币和金融》 894
- Money and Trade Considered with a Proposal for Supplying the Nation with Money 《根据一项通过货币供应国民的建议思考货币和贸易》 234n
- Money: Its Connexion with Rising and Falling Prices 《货币:它与价格的上升或下降的关系》 786n
- Money-Interest and Commodity Prices 《货币利息和商品价格》 252
- Monopolies 垄断 426, 431 - 37, 437n, 489n, 547n, 990
- “Monopoly Prices,” 《垄断价格》 823n
- The Mont Pèlerin Quarterly* 《朝圣山学社季刊》 565 - 66n, 871n, 1004n
- Mont Pèlerin Society 朝圣山学社 432, 712, 856, 864 - 72, 868n, 870p, 874 - 75, 880 - 83, 881n, 904 - 05n, 987 - 90, 1000 - 05, 1004 - 05n, 1008 - 15, 1009 - 11n, 1014 - 15n, 1025n, 1032
- Moral implications of socialism 社会主义的道德含义 422 - 24
- Moravia 摩拉维亚 29, 68, 141
- Morgenpost* 《晨报》 10
- Moscow 莫斯科 713n
- Motherhood 母性 413 - 18
- Mount Washington 华盛顿山 808
- Mountain Artillery Regiment 山炮团 280
- Münchener Allgemeine Zeitung* 《慕尼黑评论报》 222n
- Munich, socialization commission in 慕尼黑的社会化委员会 336n
- Murray N. Rothbard: In Memoriam* 《纪念默里·N. 罗斯巴德》 932n
- Music, Vienna and 维也纳和音乐 26 - 27
- “My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 Theory,” 《我对经济理论的贡献》 793n
- My Years with Ludwig von Mises* 《我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一起的岁月》 39n, 365 - 66n, 406n, 517 - 18n, 606n, 608 - 09n, 612n, 698n, 725 - 26n, 730 - 31n, 731n, 756 - 57n, 794n, 888, 888 - 89n, 1016n, 1022n, 1032n, 1037n
- NAM. Se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 NAM, 见全国制造商协会
- Napoleonic wars 拿破仑战争 31 - 32, 243n
- Nathaniel Branden Institute 纳撒尼尔·布兰登学会 1013
- The Nation* 《国家》 903
-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民族、国家与经济》 192n, 222 - 23n, 257n, 260 - 61n, 263n, 265 - 66n, 270 - 71n, 274n, 285n, 299 - 324, 329n, 338 - 39n, 372 - 74, 375n, 523, 526, 526n, 556, 591 - 92n, 750n, 975
- 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See *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 《民族、国家与经济》, 见《民族、国家与经济》
-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 全国制造商协会 822, 823 - 24n, 825 - 27, 890

- National Bureau for Economic Research 国家经济研究局 454n, 574, 689n, 798 - 800, 799n, 816, 821 - 23, 847n
- National Guilds League 国家行业协会同盟 481
- National Industrial Conference Board 全国工业协商委员会 844, 850n
- National Industry Recovery Act 《国家工业振兴法案》 713n
- 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 国家复兴管理局 713n
- National Resources Planning Board 国家资源规划委员会 791
- National Review* 《国家评论》 913n, 989, 991, 1039
- National Socialist Worker Party 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 658n, 661, 676, 684
- National Socialists 国家社会主义 537
- National University of Mexico 墨西哥国立大学 807
- Nationalbank 国家银行 575
-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65, 73
- Nationalökonomie* 《国民经济学》 161 - 62, 211, 211n, 214 - 15, 239 - 40, 239n, 428n, 436n, 640, 709, 734n, 746, 749 - 50, 749n, 759 - 86, 759n, 761 - 62n, 775n, 778n, 780n, 786n, 790, 872 - 73, 935n, 947, 1046
- Nationalökonomie, defined 国民经济学 224n
- Nationalökonomische Gesellschaft 国民经济学会 184, 361, 364, 373, 377, 379, 379n, 465 - 66, 613, 645, 729
- Nations, as language communities 作为语言社群的民族 317
- Native Americans 美洲土著 976
- 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805
- Natural law 自然法 410, 426, 983, 984, 984n
- Natural selection 自然选择 430
- Natural Value 《自然价值》 153, 157 - 58, 229
- Natural value 自然价值 383 - 84, 383n
- The Nature and Essence of Theoretical Economics*. See *Wesen undHauptinhalt der theoretischen Nationalökonomie* 《理论经济学的性质和要义》
- “The Nature and History of the Problem,” 《问题的性质和历史》 711n
-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 《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 171n, 636 - 37, 636n, 700n, 721 - 22n
- “Nazis and Democrats in Austria,” 《奥地利的纳粹与民主派》 729n
- Nazism 纳粹 75n, 334, 663 - 64, 683 - 84, 694 - 95, 726 - 29, 727n, 729n, 740, 740n, 752 - 53n, 1037. See also Hitler, Adolf; World War II 另见阿道夫·希特勒; 第二次世界大战
- NBER. See National Bureau for Economic Research NBER, 见国家经济研究局
- Needs, satisfaction and 满足和需要 132
- Neoclassical Economic Theory* 《新古典经济理论》 162 - 63n
- Neoclassicism 新古典主义 162, 547, 554
- Neo-liberalism 708 - 12, 734 - 35, 738, 738n, 842, 869, 874 - 81, 1003 - 11 新自由主义
- “Neue Beiträge zum Problem der sozialistischen Wirtschaftsrechnung,”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的最新贡献》 654n
- Neue Freie Presse 《新自由报》 30, 30n, 189n, 206, 206n, 261, 284, 287, 347, 347 - 48n, 348n, 351 - 52, 453n, 459, 460n, 645n, 648, 648n, 659n, 662n
- Neue Grundlegung der Staatswirtschaftskunst*

- 《政治经济学新的基础》 115n
- “Neue Literatur über Geld-und Bankwesen,”
《货币与金融前沿文献》 205n
- Neue Österreichische Biographie* 《新奥地利名人传》 81n, 102n, 133 - 34n, 151n, 179n, 202n, 385n, 549n
- Neue Zürcher Zeitung* 《新苏黎世报》 876n
- “Neuere Schriften über Geld-und Bankwesen,” 《关于货币与金融的最新著作》 182n
- Neues Wiener Tagblatt* 《新维也纳日报》 151n, 289 - 90, 290n, 351, 517n, 619n, 647n
- Neu-Sandez 新松奇 102, 264
- A New Constitution Now* 《新宪法》 992 - 93n
- New Deal 新政 627, 627n, 711, 713 - 14, 791, 822, 825, 839, 841, 994
- New Economic Policy 新经济政策 396
- New Frontier 新边疆政策 1008
- New Hampshire 新罕布什尔州 807
- New Individualist Review* 《新个人主义评论》 1001, 1029
- New Leader* 《新领袖》 867
- “New Light on the Prehistory of the Theory of Banking and the School of Salamanca,” 《重新认识银行理论的史前史和萨拉曼卡学派》 112n
- New Orleans 新奥尔良 793, 793n
- “A New Philosophy of Laissez faire,” 《一部新的放任自由主义哲学》 887n
- New Republic* 《新共和国》 887n, 903
-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社会研究新学院 690n, 792n, 803, 926
- New Socialist Man 社会主义新人 315, 374
- New York 纽约 790 - 98
- New York Overseas Rotary Fellowship 纽约海外扶轮联谊会 830
-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纽约证券交易所 611
-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 829 - 30, 830n, 863, 891, 892n, 988n, 992 - 93n
-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纽约时报书评》 570n, 794n, 803, 886n
- New York University 纽约大学 366, 793, 793n, 807n, 845 - 49, 847n, 847p, 857, 863 - 64, 883 - 96, 901, 917, 924 - 35, 938, 947, 1014, 1029n, 1034
- New York University Club 纽约大学俱乐部 897, 904, 1017n
- New Zealand Business Roundtable 新西兰商业圆桌会议 791n
- Newsweek* 《新闻周刊》 863, 885, 885n, 903 - 04, 904n, 913
- NICB. See National Industrial Conference Board NICB, 见全国工业协商委员会
- Niederösterreichische Handels-und Gewerbekammer. See Kammer 下奥地利工商总会, 见商会
- Niederösterreichischen Gewerbeverein 下奥地利商业协会 579n
- “The 1919 Prophecies of Maynard Keynes,” 《梅纳德·凯恩斯的1919预言》 570n
- Nobel Prize 诺贝尔奖 633, 1034
- Nobility 贵族 3, 22
- Nomisma; or, “Legal Tender,”* 《诺米斯玛; 抑或“法币”?》 221n
- Notes 支票 216f
- Notes and Recollections* 《回忆与札记》 25n, 39n, 69n, 87n, 89n, 93n, 187n, 213n, 214n, 220n, 222 - 23n, 239n, 249n, 286, 290n, 332n, 334n, 365 - 66n, 490n, 531n, 785n

- Objective exchange value 客观交换价值 158
- Objectivist social philosophy 客观主义社会学 929, 989, 999
- Objekt und Grundbegriffe der theoretischen Nationalökonomie* 《理论经济学的对象和基本概念》 67n
- "Observations on the Russian Reform Movement," 《关于俄国改革运动的评论》 783n
- October Manifesto 《十月宣言》 97
- Ödenburger Zeitung* 《厄登堡报》 267n
- Odessa 敖德萨 297
- Oesterreichische Nationalbank 奥地利国家银行 628, 642n
- Oeuvres completes* 《作品全集》 35n, 114n, 275
- Office for the Defense Against Enemy Propaganda 反敌宣国防办公室 290
- Office for the Protection of Austrian Assets Abroad 奥地利海外资产保护办公室 452
- 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 物价管理局 791, 826
- Office of the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中央计划经济办公室 393n
- Oil, Galician Pennsylvania and 加里西亚的宾夕法尼亚和石油 10-11n
- Omnipotent Government: The Rise of the Total State and Total War* 《全能政府:极权国家和全面战争的兴起》 257n, 558n, 666-67n, 740, 800, 810n, 823, 840, 853, 892n, 952-53n, 975, 1027n, 1035
- On Freedom and Free Enterprise: Essays in Honor of Ludwig von Mises* 《论自由和自由企业:纪念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文集》 165n, 935
- "On the cause and the principal laws of economic value," 《论经济价值的原因和主要法则》 155n
-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ubjective Theory of Value," 《论主观价值理论的发展》 594n
-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370n, 703n, 782n
- "On the Goal of Trade Policy," 《论贸易政策的目标》 274n
- On the Manipulation of Money and Credit* 《论货币和信用的操纵》 459n
- On the Theory of Needs* 《论需要理论》 218
- 100 Jahre Handelskammern in Österreich* 《奥地利商会百年》 188n, 190n
-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412n
- "Opening Address to a Conference at Mont Pelerin," 《朝圣山大会开幕致辞》 869-70n
- Orange County Register* 《橘郡记事报》 826
- Order of goods 财货等级 381
- Ordo School 奥尔多学派 880, 1006, 1007, 1011
- Organized labor 劳工组织 90-91, 149
- Österreich, defined 东方帝国 327
- Österreich 1918-1938* 《奥地利 1918-1938》 580n, 647n, 676-77n, 678-79, 804n, 817-18n
- Österreichische Politische Gesellschaft 奥地利政治学会 272-73, 458
- Österreichische Rundschau* 《奥地利评论报》 222n
- Österreichische Wirtschafts-Psychologische Forschungsstelle 奥地利经济心理学研究中心 367n
- 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ank 奥地利国家

- 银行 837n
- Österreichischer Klub 奥地利俱乐部 616n
- Österreichischer Volkswirt 《奥地利经济学家》 362n
- Österreichisches Biographisches Lexikon 《奥地利传记辞典》 10n
- Österreichisches Konjunkturforschungsinstitut.
See Austrian Institute for Business Cycle Research 奥地利经济研究所, 见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
- Österreichisch-ungarische Kriegsberichte aus Streffleurs Militärblatt 《来自 Streffleurs 军事杂志的奥匈帝国战报》 259n, 264n
- “Otto Bauer—Friedrich Adler—Max Adler,” 《奥托·鲍尔——弗里德里希·阿德勒——马克斯·韦伯》 58n, 94n, 335n
- Our Enemy, The State 《我们的敌人——国家》 833-34n
- Over-investment 过度投资 781n
- Overpopulation 人口过剩 319n
- Owens College 欧文学院 130
- Ownership, interventionism and 干预主义和所有制 545
- Oxford University 牛津大学 482, 632, 1026
- Pacific Railroad 太平洋铁路公司 846n
- Pageant 《盛会》 904
- Painting, “Young” movements and “青年”运动与绘画 193n
- Paleo-liberalism 老派自由主义 991
- Pan-physicalism 泛物理主义 789
- Paper money 纸币 227
- “Papiergeld,” 纸币 221n, 244-45n
- Paris 巴黎 13, 22n, 24, 480, 683, 751n, 752
- “The Passing of Ludwig von Mises,”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之逝》 1040
- The Passion of Ayn Rand 《安·兰德的激情》 998n
- Pathfinder 《探路者》 890
- Patriotic Front 爱国阵线 677n
- Patriotism, defined 爱国主义 318
- Pearl Harbor 珍珠港 810, 811, 889
- Peasant Liberation in Bohemia, Moravia, and Silesia 《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西里西亚的农民解放运动》 68
- Peasants' liberation movement 农民的解放运动 67
- Pelzer law firm. See Law, Mises's study of 佩尔策律师事务所, 见米塞斯对法律的研究
- People Today 《今日人民》 904
- Perfect Competi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s 《完全竞争与经济学的转型》 547n
- “The Permanent Inflation,” 永久通货膨胀 987
- Perpignan 佩皮尼昂 755, 756
- Perroquet Suite 鹦鹉套房 793
- “The Perseverance of Paul Samuelson's Economics,” 《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的持久影响》 783n
- Persia, revolutions and 革命与波斯 97
- Personal records 私人记录 xiii
- Pester Lloyd 《佩斯劳埃德氏报》 492n
- Petroleum Industry Research Foundation 石油工业研究基金会 924n
- Phenomenology, Vienna and 维也纳和现象学 24
- Philippovich Seminar 菲利波维希研讨班 77-86
- “Philippovich von Philippsberg, Eugen,” 《欧根·菲利波维希·冯·菲利普斯伯格》 81n

- Philosophical Radicals 哲学激进派 482
- Philosophie des Geldes* 《货币哲学》 388n
- Philosophy 哲学 7, 958
- The Philosophy of the Austrian School* 《奥地利学派的哲学》 105n
- Physiocrats 重农主义者 553
- “The Place of *Human Ac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conomic Thought,” 《〈人的行为〉在现代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 162n
- “The Place of the Theory of Money and Fiduciary Media Within the System of Theoretical Economics,” 《货币与流通媒介理论在理论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 507n
- Plain Talk* 《开诚布公》 897, 902, 906
- “Plan and Market in Socialism,” 社会主义的计划和市场 1035
- Planned Chaos* 《计划造就混乱》 975
- “Planning for Freedom,” 《为自由而计划》 843n
- Planning for Freedom and Sixteen Other Essays and Addresses 《为自由而计划——以及另外十六篇论文和演讲》 793n, 843n, 918, 919, 999, 1035
- Plantamour mansion 普兰塔摩大厦 693
- Planwirtschaft und Verkehrswirtschaft* 《计划经济和运输产业》 782n
- Poincaré government 庞加莱政府 509
- Poland 波兰 3 - 8, 4n, 49n, 50, 70, 102, 264, 303, 450, 747, 805n, 819, 821n, 908
- Polenklub 波兰俱乐部 7 - 8
- Polish Club 波兰俱乐部 7
-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 77, 126 - 27, 413 - 18, 427
- “Political Liberalism,” 《政治自由主义》 1006
- Political Pilgrims* 《政治朝圣》 713n
- Politická ekonomie* 《政治经济学》 384n
- Politics 政治
- 1873 elections to the Austrian parliament 1873 年奥地利议会的选举 10
- 1923 shift in 1923 年的政治转向 565
- economics and 经济学和政治 44 - 45
- Galicia and 加里西亚和政治 13, 13n
- gold exchange standard and 金汇兑本位制和政治 577 - 81
- language and 语言和政治 316 - 24
- limitations of 政治的限度 323
- Poland and 波兰和政治 5 - 6
- “Young” movements and “青年”运动和政治 193n
- The Politics of Obedience; The Discourse of Voluntary Servitude 《服从的政治:关于自愿奴役的讨论》 412n
- Politische Theologie* 政治神学 438n
- Polylogism 多逻辑论 665, 668, 948
- Polythea* 《波利提亚》 444n
- Popular Diplomacy and War* 《大众外交与战争》 449n
- Popular Front 人民阵线 716, 751n
- Populations, mixed 杂居民族 301 - 06
- Portugal 葡萄牙 5n, 755 - 57
- Positive analysis 正面分析 565 - 66n
- “A Positive Program for Laissez Faire,” 《自由放任的积极方案》 711, 711n
- Positive Theory of Capital*. See *Positive Theorie des Kapitals* 《资本正面论》, 见《资本正面论》
- Positive Theorie des Kapitals* 《资本正面论》 147, 148, 218 - 19n, 774n, 775n, 776n
- Positivism 实证主义 161n, 167, 197n, 204n, 368, 949, 957, 999, 1017, 1017n
- Positivismusstreit. See Positivism 实证主义之争, 见实证主义
- “Post-war Reconstruction,” 战后重建

- 741n, 805 - 06n
- “Post-War Reconstruction of Europe,” 欧洲的战后重建 793
- Power 权力 419, 545
- “Power and Economic Law,” 《权力与经济法》 523
- Power and Market* 《权力与市场》 437n, 766n, 1024n
- Power or Economic Law?* 《权力或经济定律?》 149 - 50
- Prague, German University of 布拉格德意志大学 81
- Prague Spring 布拉格之春 1036
- Präludien* 《序幕》 600n
- Praxeology/Praxiology 行为学 368, 594 - 95, 719 - 21, 721n, 759 - 60n, 762, 766, 775n, 887, 955, 972, 1020, 1024 - 25, 1049. *See also* Economics, treatise on 另见论经济学
- Praxiology: The International Annual of Practical Philosophy and Methodology 《行为学:国际实践哲学和方法论年鉴》 721n
- “Preface,” 《前言》 735 - 36n
- Preference 偏好 761, 777
- Preise und Production. See Prices and Production* 《价格与生产》, 见《价格与生产》
- “Preistaxen. I. Theorie,” 《价格管制. I. 理论》 526n
-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Foreign Exchanges,” 《当前的外汇状况》 248n
-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Debate,” 《辩论的现状》 703n, 704n
- “Present-day Questions of Financial and Monetary Policy,” 《当代金融和货币政策问题》 516
- Press, government through 通过媒体统治 194
- Price controls 价格管制 356, 526 - 29, 528n, 877, 1037
- Price Flexibility and Employment 《价格弹性与就业》 782n
- “Price Formation in a Socialist Community,” 《社会主义社会的价格形成》 782n
- Price theory 价格理论 154 - 55n, 167, 212 - 13, 254n, 659, 767
- Prices and Production* 《价格与生产》 576 - 77n, 634, 638n, 639, 646
- Pricing process 竞价过程 702
- Primitives of economic theory 经济理论的基础 105n
- Princeton Panel 《普林斯顿小组》 913n
- Princeton University 普林斯顿大学 793, 793n, 823, 846n, 988, 1009, 1010
- Principles* 《原理》 762
- “Principles for the Creation of a New Order in the Danube Area,” 《重建多瑙河地区新秩序的一些原则》 723 - 24
-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经济学原理》 82, 87, 95, 101 - 10, 106n, 115n, 117, 125, 130n, 136, 148n, 161, 212, 388, 389 - 90n, 567 - 68n, 589, 771n, 778n
-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原理》 130, 224n, 226 - 27n, 243n, 381n, 935n
- “The Problem of Stabilization Considere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Monetary Theory.” *See* “Die geldtheoretische Seite des Stabilisierungsproblems” 《从货币理论的观点考虑稳定问题》, 见《从货币理论的观点考虑稳定问题》
- “The Problem of Value in the Socialist Community,” 《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问题》 377n
- Probleme der Friedenswirtschaft* 《和平经济学问题》 370n
- Probleme der Wertlehre* 《价值理论问题》

- 594n, 658, 658n, 659n, 668n, 669n
-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美国哲学学会会议记录》 924n
- Production 生产 407 - 10. *See also* Capitalism 另见资本主义
-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Theories: The Formative Period* 《生产和分配理论:形成阶段》 469 - 70n
- Profit 利润 770 - 73, 928
- Profit, Interest, and Investment and Other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Fluctuations* 《利润、利息和投资——以及其他产业波动理论论文》 345n
- Profitability calculus, socialism and 社会主义和盈利计算 376
- “Progress Report, January 1 to October 1, 1952,” 《进展报告:1952年1月1日至10月1日》 936n
- Proletariat 无产阶级 313 - 14, 535, 881, 968
- Proposals for an Economic and Secure Currency* 《关于一种经济而安全的通货的提议》 487n
- Protectionism 保护主义 504, 525 - 26, 724, 999
- Protestantism, education and 教育和保护主义 62
- Protocols of Rome 《罗马协定》 676n
- Provence, Judaism and 犹太人和普罗旺斯 5n
- Proximate cause of interest 利息的近似原因 778
- Prussia 普鲁士 3, 39, 46, 70, 89n, 117n, 805n
- Przemysl 普热梅希尔 258, 266
- Psychoanalysis 精神分析学 24, 368
- Psychological approach to economics 经济学的心理方法 132 - 33, 383
- “The Psychological Basis of the Opposition to Economic Theory,” 《反对经济理论的心理基础》 668n
- Psychologism 心理主义 161n, 765 - 66
- Psychology 心理学 977, 978
- Purchasing power 购买力 244 - 49. *See also* Money 另见货币
-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Money: Its Determination and Relation to Credit, Interest, and Crises* 《货币的购买力:它的决定以及与信用、利息和危机的关系》 244n
- Pure Theory of Capital 《纯粹资本理论》 639n
- Quadragesimo Anno* 《教皇通谕》 677
- Quantity theory 数量理论 853
-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货币数量理论》 353
-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奥地利经济学季刊》 162n, 384n, 474n, 704n, 823n
-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ities and Social Democracy. See Die Nationalitätenfrage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民族与社会民主主义的问题》, 见《民族与社会民主主义的问题》
- Race et Histoire* 《种族与历史》 979n
- Race issues 种族问题 979 - 80. *See also* Nazism 另见纳粹主义
- Radical labor-unionism. *See* Syndicalism 激进工会主义, 见工团主义
- Railroads 铁路 8 - 9, 8n, 16
- Rammcul Valcery 勒姆尼库沃尔恰 280
- Râmnicu Valcea 勒姆尼库沃尔恰 280
- Rasse, Geist, und Seele* 《种族、心智和灵魂》 666n
- The Rate of Interest* 《利率》 776n

- Rationalism 理性主义 288, 767 - 70, 952n, 959
- Raub und Restitution in Bibliotheken* 《图书馆的劫掠与归还》 727
- The Raven of Zurich* 《苏黎世的乌鸦》 22n, 51n, 53n, 59n, 82n
- Reader's Digest* 《读者文摘》 841
- Reallocative effect of inflation 通胀的再分配效应 243 - 44
- Reason 理性 603, 671, 1001. *See also* Rationalism 另见理性主义
- Reassessing the Presidency* 《重评总统》 714n
- “Recht und Staat,” 《法律与国家》 617n
- Rechte und Verhältnisse vom güterwirtschaftlichen Standpunkte* 《从经济学的观点看财货的权利与条件》 146n, 217n
- Reconstruction, post-World War II 二战之后的重建 740 - 46
- Red Army 红军 xiii, 713, 727
- Red Cross 红十字会 686n, 730n
- Redistributive effect of inflation 通货膨胀的再分配效应 243 - 44
- “Referat über Kapitalzins im Knies'schen Seminar” 《在克尼斯研讨班上关于利息的报告》 142n
- Reform, monetary 货币改革 493 - 505
- Refugee Economist in America: Ludwig von Mises and American Social and Economic Thought, 1940 - 1986* 《流亡经济学家在美国: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与美国1940 - 1986 的社会思想和经济思想》 839n
- Regression theorem 回归定理 236
- Reich, defined 德国 48
- Reichsbank 银行 298, 458, 509
- Reichspost* 《帝国邮报》 331n
- Reichsrat 奥地利议会 10, 47n, 48, 327
- Reichstag 国民大会 328
- Relativism 相对主义 998
- Religion. *See* Atheism; Christianity; Judaism 宗教, 见无神论; 基督教; 犹太教
- Religion and Science* 《宗教与科学》 1021n
- “Remarks on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of the Subjective Theory of Value,” 《关于主观价值理论基本问题的评论》 593, 593n
- The Remnant 残存者 991, 1013
- Renner government 伦纳内阁 163
- Rent control 租金管制 579n, 630, 884, 885
- “Republic of Austria, Banking and Finance,” 《奥地利共和国: 银行和金融》 347 - 48n, 349n, 480n
- Republikanischer Schutzbund* 共和保卫联盟 580n
- Rerum novarum* 《新事通谕》 484 - 85n
- Retenbank 地租银行 498
- “Return to the Gold Standard, the Main Problem of Present-Day Monetary Policy,” 516 《重返金本位制——当代货币政策的主要问题》
- Revenue Act 《税收法案》 627
- Reverse movement of prices 价格逆动 254n
-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奥地利经济学评论》 112n, 404n, 1044n
-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经济研究评论》 700, 782n
- “Review of *Human Action*,” 《〈人的行为〉评论》 887n
- Revision der Grund-Begriffe der National-Wirtschaftslehre* 《国民经济学说基本概念的修正》 382n
- Revolution 革命 326 - 27, 411 - 12, 420 - 21, 445

- Revolution in Bavaria, 1918 - 1919: The Eisner Regime and the Soviet Republic* 《巴伐利亚 1918 - 1919 革命: 艾斯纳政权与苏维埃共和国》 393n
- The Revolution War* 《革命战争》 833 - 34n
- Revue de L'Économie Contemporaine* 《当代经济学杂志》 843n
- Revue d'économie politique* 《政治经济学杂志》 704n, 706
- Revue Économique Internationale* 《国际经济评论》 205n
- Revue européenne des sciences sociales* 《欧洲社会科学评论》 138n
- Revue philosophique* 《哲学杂志》 720 - 21n
- Rhineland 莱茵兰 498
- Ricardian Law of Association 李嘉图协作法则 428n, 763
- Richtungskämpfe im 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 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im Kaiserreich vornehmlich vom Beginn des "Neuen Kurses" bis zum Ausbruch des ersten Weltkrieges, 1890 - 1914* 《社会政策协会的路线斗争: 帝国的科学和社会政策, 从“新时期”到一战爆发》 119n
- Ringstrasse 环城大道 21, 23i
- Rip-Off Resistance* 《撕裂阻力》 1043
- Ritterkreuz 骑士十字勋章 281
- The Road to Serfdom* 《通往奴役之路》 840 - 43, 842 - 43n, 849, 864, 1003
- The Road to Socialism* 《通往社会主义之路》 371
- Robot 苦工制 13 - 14
- Rockefeller Fellowship 洛克菲勒奖学金 367
- Rockefeller Foundation 洛克菲勒基金会 367n, 453, 453 - 54n, 455, 465, 479n, 566 - 69, 567n, 569n, 574n, 576 - 77n, 686, 689, 691, 698 - 99, 790, 799 - 802, 816, 822, 846n, 923, 924, 1035n.
See also Laura Spelman Rockefeller Fund
另见劳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基金
- "The Role of Money in the Realm of Economic Goods," 《货币在经济财货领域的作用》 471n
- Romania 罗马尼亚 xii, 50, 805n
- Romanticism 浪漫主义 466
- Rome 罗马 713
- Römischer Katholizismus und politische Form 《罗马天主教和政治形式》 440n
- "Roofs or Ceilings," 《屋顶还是天花板?》 884, 884n
- The Roosevelt Myth* 《罗斯福神话》 713n, 840
- The Roots of Praxiology—French Action Theory from Bourdeau and Espinas to Present Days* 《行为学的根基——从波尔多、埃斯皮纳斯到今天的法国行为理论》 721n
- "Rothbard Tells All: Interview with Murray Rothbard," 《罗斯巴德致所有人: 默里·罗斯巴德访谈》 894n
- Rothschild family 罗特席尔德家族 30, 54, 628
- Rotterdam 鹿特丹 486, 544
- Rotwild, as nickname for Mises 米塞斯的绰号“赤鹿” 274
- Royal Prussian Academy of the Socially Beneficial Sciences 普鲁士皇家公共利益科学院 36
- Royal Society 皇家协会 139
- Rudolf: Kronprinz und Rebell* 《鲁道夫: 王储和叛逆》 102n
- Ruhr 鲁尔区 509
- Russia 俄罗斯 3, 11n, 16, 96, 194, 259, 281, 303, 326 - 27, 346n, 411 - 12,

- 420 - 21, 713, 724 - 25, 746n, 831, 908. *See also* Bolshevism 另见布尔什维克
- Ruthenians 罗塞尼亚人 4n, 264, 264n
- Saint Petersburg 圣彼得堡 96
- Saint-Germain-en-Laye, Treaty of 《圣日尔曼昂莱条约》 449 - 50
- Salutary dissent, capitalism and 资本主义和有益争执 957 - 63
- San Francisco 旧金山 823 - 24
- Santa Ana High School 圣安娜高中 826
- Santa Ana Register* 《圣安娜登记》 683n
- Sarah Lawrence College 莎拉劳伦斯学院 926
- Satan und die Revolution—und andere Schriften* 《撒旦和革命及其他》 445n
- Satisfaction 满足 129, 132, 219, 383
- Saturday Review* 《周六评论》 886n
- Savings 储蓄 254n, 595
- Schiff, Austro-Hungarian bank and 奥匈银行和席夫 456n
- Schiller 席勒 465
- Schlamperei 粗枝大叶 27
- Schmollers Jahrbuch* 《施穆勒年鉴》 122 - 23n, 157 - 58n
- Schober government 朔贝尔政府 458, 483
- Schönbrunn Palace 美泉宫 23
-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工商管理学院 832n
- School of Economics 经济学派 812, 812n
- School of Salamanca 萨拉曼卡学派 984n
- The School of Salamanca: Readings in Spanish Monetary Theory* 《萨拉曼卡学派: 西班牙货币理论读本》 112n
- Schottengymnasium 肖顿中学 36, 141, 142
- 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社会政策协会著作》 81n, 198n, 201n, 247n, 276n, 337n, 456n, 484n, 495n, 510n, 920n. *See also* World War I 另见一战
- Schriftum zum Marshalplan und zur volkswirtschaftlichen Integration Europas* 《马歇尔计划和欧洲经济一体化文献》 878n
- “Schumpeter and Mises,” 熊彼特和米塞斯 162 - 63n
- Schwiedland, Austro-Hungarian bank and 奥匈银行和施维德兰 456n
- Science 科学 7, 31, 175 - 79, 574, 671n. *See also* Social sciences 另见社会科学
- Scientific Committee for War Economics 战争经济学科学委员会 274 - 75, 284
- Second Law (Gossen's) 戈森第二定律 129
- Secret Origins of Modern Microeconomics; Dupuit and the Engineers* 《现代微观经济学的秘密根源: 杜普伊和工程师们》 128n
- Sejm 国会下院 6
- “Selbstinteresse und Methodenstreit in der Wirtschaftstheorie,” 《自利与经济理论中的方法论之争》 309n
- Selected Writings of Ludwig von Mises: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form and Reconstruction*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文选: 国际改革与重建的政治经济学》 725 - 26n, 793n
- The Sensory Order 《感觉的秩序》 953n
- Serbia 塞尔维亚 50, 193, 259, 325
- Serfdom 奴役 13 - 14
- Sex and Character. See* *Geschlecht und Charakter*

- ter 《性与性格》, 见《性与性格》
- Sexuality 性爱 416-17n, 416-17
- Signum laudis 奖章 267, 268
- Silesia, *Peasant Liberation in Bohemia, Moravia, and Silesia and* 《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西里西亚的农民解放运动》与西里西亚 68
- Silver standard 银本位制 230, 234n
- Slavonia, Austria-Hungary and 奥匈帝国和斯拉沃尼亚 47n
- Slovenia 斯洛文尼亚 50, 325, 450
- Smoot-Hawley 斯穆特—霍利 627
- Social analysis, utilitarianism and 功效主义和社会分析 306-10
- Socialdemocrats 社会民主主义者 327, 327-28
- Social Economics. See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Wirtschaft* 《社会经济学》, 见《社会经济学理论》
- Social evolution 社会演化 430, 430-31n
- Social insurance 社会保障 439
- “Social Liberalism,” 《社会自由主义》 542, 543, 544
- Social liberals 社会自由主义 538. *See also* Liberalism 另见自由主义
- “The Social Order and 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 《社会秩序与政治结构》 392n
-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社会科学
研究委员会 923
-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 599-605, 887
- Social utility 社会效用 159
- Socialism 社会主义
- America and 美国和社会主义 989, 994
- Austria and 奥地利和社会主义 53-59
- calculation and. *See* Calculations 社会主义计算, 见计算
- Catholic Church and 天主教会和社会主义 855
- Christian Social Party and 基督教社会党和社会主义 55-57, 327
- Christianity and 基督教与社会主义 439. *See also* Christian Social Party; Christianity 另见基督教社会党; 基督教
- defined 定义 524
- destructionism and 毁灭主义和社会主义 443-46
- differences with capitalism and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 425
- fallacies of German 德国的错误 310-16, 313n
- fascism and 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 537
- feminism and 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 413-18
- Germany and 德国和社会主义 300
- Hindenburg pattern of 兴登堡式的社会主义 879-80
- inflation and 通胀和社会主义 504
- intellectual context of 社会主义的思想背景 380-91
- language and 语言和社会主义 301-02n
- Law of Association and 协作法则和社会主义 426-31
- as majority party 作为多数派的社会主义 369-73
- Mises's treatise on 米塞斯论社会主义的著作 405-07
- Mises's views on 米塞斯对社会主义的看法 xi, 392-99, 399-404
- moral implications of 社会主义的道德含义 422-24

- National Socialists and 国家社会党和社会主义 537
- Nationalökonomie and 《国民经济学》 762 - 63
- natural law and 自然法和社会主义 410, 426
- post-World War I 一战之后 330 - 44
- private property and 私有财产 557
- socialist-calculation debate and 社会主义计算问题辩论和社会主义 373 - 80, 387, 388 - 91, 396, 418 - 22, 472, 555n, 590, 594 - 96, 704, 705, 737 - 38, 764, 781 - 85, 1035
- U. S. and 美国和社会主义 840
- Wieser's theory of 维塞尔的社会主义理论 372 - 73, 384n
- "Socialism: A Property or Knowledge Problem," 《社会主义:财产或知识问题》 404n
- 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社会主义:经济学和社会学分析》 171n, 392n, 398, 402n, 403 - 16, 406, 409n, 415n, 425 - 43, 427 - 28n, 430n, 434 - 35n, 437n, 440 - 43n, 466, 480 - 81n, 481 - 82, 508, 520, 520 - 21n, 534n, 556, 559, 599n, 601n, 637 - 38n, 637 - 44, 652 - 57, 660, 663, 701n, 722 - 23n, 737n, 763 - 64, 763n, 767 - 68, 783 - 84, 794, 806, 827 - 28, 862, 884, 966 - 67n, 981 - 82n, 982
- Socialism and Social Ac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世纪的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 530
- Socialism and War: Essays, Documents, Reviews* 《社会主义与战争:论文、档案、评论》 844n
- Socialismus und soziale Bewegung im 19. Jahrhundert* 《19世纪的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 530
- "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 Lessons for Austrians," 《社会主义计算问题辩论:奥地利人获得的教益》 555n
- Socialist Party of Germany 德国社会党 119
- Socialists of the Chair. See Kathedersozialisten 讲坛社会主义者, 见讲坛社会主义
- "So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Planning," 《社会主义和经济计划》 352n
- Sociology, 135, 721. See also Social sciences 社会学, 另见社会科学
- "Sociology and History." See *Grundprobleme der Nationalökonomie* 《社会学和历史学》, 见《社会学和历史学》
- "The Sociology of the Ayn Rand Cult," 《安·兰德邪教的社会学》 997n
- Solidarism 社会连带主义 398n
- The Song of the Shirt* 《衬衫之歌》 789
- Sopron 索普隆 267
- Sorbonne 索邦大学 616
- South Holland 南荷兰 915
- Southwest German School 西南学派 977
- "Southwest German School of New Criticism," 《新批判主义的德国西南学派》 600n
- Sovereignty, consumer 消费者主权 773 - 79, 876n
- Sozialforsch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魏玛共和国的社会研究》 565n
- Sozialforschung in Deutschland* 《德国的社会研究》—119n
- Sozialisierungserfahrungen* 《社会化经验》 393n
- Sozialismus und Volkswirtschaft in der Kriegsverfassung* 《战争宪法的社会主义和经济学》 370n
- "Sozialismus—eine Utopie," 《社会主义

- 义——一个乌托邦》 655n
- “Sozialistische Möglichkeiten von heute,”
《社会主义在今天的可能性》 431n
- Sozial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德国社
会党 119
- “Sozialistische Rechnungslegung,” 《社会
主义会计》 343n
- “Sozialliberalismus,” 《社会自由主义》
538n, 570, 619n
- Sozialpolitik 社会政策 711
- “Sozialpolitische Wandlungen in der wissen-
schaftlichen Nationalökonomie,” 《经济
科学中的社会-政治转变》 398n
- 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Bildungsverein 社
会科学教育协会 66
- Soziologie des Geldes und der Inflation 《货
币与通胀的社会学》 496n
- “Soziologie und Geschichte,” 《社会学与
历史》 599n
- Spain 西班牙 xii, 4, 5n, 304n, 484n,
715-16, 755
- Spanish Civil War 西班牙内战 713
- Spectrum 《谱系》 1037
- Spiritual Mobilization 精神动员 855
- Staat und Nation 《国家与民族》 321n
- Staatliche Theorie des Geldes 《货币的国家
理论》 68n, 221-22, 221-23n, 244-
45n, 754n
- Staatsexamen 国家考试 63-64, 74, 92
- Staatskommission für Sozialisierung 国家社
会化委员会 332n, 336n, 336p, 337n,
364n
- Staatslehre des Thomas von Aquino 《托马
斯·阿奎那的国家学说》 557n
- Staatslexikon 《国家百科全书》 414n
- Staatswirtschaftliche Untersuchungen 《国民
经济调查》 382n
- Stabilised Money: A History of the Movement
《稳定货币:运动的历史》 616n
- “Stabilization of the Monetary Unit—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ory.” See “Die geld-
theoretische Seite des Stabilisierungsprob-
lems” 《货币单位的稳定——从理论的
角度看》, 见《货币单位的稳定——从理
论的角度看》
- Stalin's Apologist: Walter Duranty, the New
York Time's Man in Moscow 《斯大林的辩
护者:沃尔特·杜兰蒂,纽约时报安插在
莫斯科的人》 713n
- State Commission for Socialization. See Staats-
kommission für Sozialisierung 国家社
会化委员会, 见国家社会化委员会
- State Theory of Money. See Staatliche Theorie
des Geldes 《货币的国家理论》, 见《货币
的国家理论》
- “Statement of Aims,” 《目标声明》 869-
70n
- “Statement to the Directors of Freeman Maga-
zine, Inc. by its active editors,” 《致〈自
由人〉杂志有限公司董事会的声明, 来自
该刊活跃编辑》 890n
- Static economy 静态经济 171-73, 669,
722n, 838
- Stationary economy. See Equilibrium theory
静态经济, 见均衡理论
- Statism 国家主义 504
- Statistical Research Group 统计研究小组
792
- Statute of Kalisz 卡利兹诏书 4
- Stock market crash 股票市场的崩溃
617. See also Great Depression 另见大
萧条
- “Stones into Bread, The Keynesian Miracle,”
《石头变成面包——凯恩斯奇迹》 718n
- The Stor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洛
克菲勒基金会的故事》 453-54n

- Student life 学生生活 65
- Studien zur Entwicklung der ökonomischen Theorie VIII* 《经济理论发展史研究(卷三)》 586n, 588n
- Studien zur österreichischen Agrargeschichte* 《奥地利农业史研究》 243n
-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哲学、政治和经济学研究》 869 - 70n
-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国际贸易研究》 717n
- A Study in Austrian Intellectual History: From Later Baroque to Romanticism* 《奥地利思想史研究:从巴洛克后期到浪漫主义》 62n
- Stuttgart 斯图加特 336n, 509
- Subjective exchange value 主观交换价值 158
- Subjective utility 主观效用 219n
- Subjectivist theory of value 主观价值理论 112, 115n
- Süddeutsche Sonntagspost* 《南德意志周日邮报》 626n
- Suffrage 选举权 322, 414n, 771n
- Sun Oil 太阳石油公司 846n, 892
- “Super-National Organization Held No Way to Peace: Radical Change in Political Mentalities and Social and Economic Ideologies Viewed as Necessary in Order to Eradicate Economic Nationalism,” 《超国家组织无法维持和平:只有彻底转变政治心理和社会经济意识形态,才能根除经济国家主义》 830n
- Surrogates, money 货币代用品 227
- Swets & Zeitlinger 斯韦特和蔡特林格公司 1015n
- Switzerland 瑞士 752 - 53n, xiii
- Synchronic determination of the value of money 货币价值共时决定 229
- Syndicalism 工团主义 313, 315 - 16
- “Synoptikus,” 西诺迪克斯 321n. See also Renner, Karl 另见卡尔·伦纳
- Synthèses* 《综合》 736n
- System der Nationalökonomie* 《国民经济学体系》 382n
- Szeklers, administration of 塞克勒人的行政部门 320
- Taborstrasse 塔博尔施特拉斯 286n
- Taft-Hartley Act 《塔夫脱 - 哈特莱法案》 889
- Tante Adele erzählt 《阿德勒阿姨说》 17n, 30n
- Tariffs 关税 439
- Tarnopol 塔尔诺波尔 7
- “The Task and Scope of the Science of Human Action,” 《人类行为科学的任务和范围》 670n
- Tausend Jahre Österreich* 《千年奥地利》 58n, 94n, 139n, 151n, 335n
- Taxes 税 143n, 191 - 92, 206 - 07, 312n, 330, 579, 713n, 728, 743 - 44n, 743 - 44
- Teacher in America* 《美国教师》 799n
- Technischer Fortschritt und Arbeitslosigkeit* 《技术进步与失业》 623n
- Technology 技术 8, 31, 1021
-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田纳西流域管理局 713n
- “Textbook or Treatise?” 《教科书还是专著?》 938n
- The Life of Murray N. Rothbard* 《默里·N. 罗斯巴德的生平》 930n
- Theocracy 神权政治 982
- Theoretische Socialökonomik* 《理论社会经济学》 248n, 309n, 469
- Theoretische Untersuchungen über das Grenzge-*

- biet von Ökonomik und Psychologie* 《关于经济学和心理学边界的理论研究》 218n
-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Wirtschaft* 《社会经济理论》 160, 160 - 61n, 385n, 468n
- Theorie der reinen und politischen Ökonomie* 《纯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 551n
- 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经济发展理论》 163, 233n, 250n, 771n
- Theorie des Geldes und der Umlaufmittel.* See *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货币与流通媒介理论》, 见《货币与信用原理》
- Theory and History: An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Evolution* 《理论与历史: 社会经济演化的一种解释》 43n, 90n, 211n, 307n, 399n, 431, 712n, 898n, 906, 947, 950, 950n, 952n, 955n, 956, 956n, 958n, 963, 964n, 966 - 69n, 971 - 72n, 971 - 86, 974 - 75n, 980n, 983 - 84n, 986n, 1002n, 1035
- Theory and Practice of Banking* 《金融理论与实践》 234n
- The Theory of Aggregate Profit and the Average Rate of Profit* 《平均利润理论和平均利润率》 928
-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经济发展理论》 163, 172, 173 - 74, 469, 771
- 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货币与信用原理》 96, 101, 171n, 185n, 207, 212, 216 - 19n, 223n, 233n, 237, 239n, 242 - 45n, 243 - 44, 247n, 249, 253 - 54n, 254, 273n, 344 - 45, 353, 388 - 91, 389n, 391n, 401 - 02n, 480 - 81n, 482, 501, 501n, 505 - 08, 506n, 513 - 21, 586, 589, 591, 591 - 92n, 650, 650 - 51n, 694, 701n, 716, 746n, 780, 785, 786n, 848n, 853, 916, 919 - 23, 920 - 22n
- Theory of Money and Fiduciary Media* 《货币与流通媒介理论》 207
-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道德情操论》 409n
-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理论》 148n, 153, 406n
- “Theory of Price Controls,” 价格管制理论 — 544
- Theory of relativity 相对论 666
- “Therapy of European Public Finance,” 《欧洲公共财政的疗法》 492
- Theresianum gymnasium 特蕾西亚中学 36, 163
- Third Way “第三条道路” 527
- Thought experiments “思想实验” 168
- Thymology 情意学 956n, 977, 978, 978 - 79n
- Time* 《时代周刊》 904
- Time preference 时间偏好 777
- Tobacco 烟草 489n
- Token money 代币 216f
- Tooke Professor of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图克教授 634
- Totalitarianism 现代极权主义 906, 993
- Toulouse 图卢兹 756
- “Toward a Reconstruction of Welfare and Utility Economics,” 《通往福利经济学和效用经济学的重建》 165n
- 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 《货币改革论》 244n, 508 - 09
- Trade Academy for Girls 女子贸易学院 182
- Trade domain 贸易领域 292
- Trade Ministry 贸易部 281
- Trade policy, David Ricardo and 大卫·李嘉图和贸易政策 525
- Trade Policy Department 贸易政策部 331

The Tragedy of European Labor, 1918 - 1939

《欧洲劳工的悲剧, 1918 - 1939》 832n

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 《政治经济学概论》 110 - 11

Traité des sensations 《感觉概论》 114n

Transitional economy 过渡时期经济 329

Transylvania 特兰西瓦尼亚 278 - 79, 280

Travaux du IX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 《第九届国际哲学大赛论文集》 719n

Treatise on Money 《货币论》 244n, 634, 638, 639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家庭论》 598n

"A Treatise on the Origin, Nature, Law, and Alterations of Money," 《论货币的起源、本质和法则》 504n

Treaty of Saint-Germain-en-Laye 《圣日尔曼昂莱条约》 449 - 50

Treaty of Versailles 《凡尔赛和约》 451 - 52, 510, 747

Trust (anti-). See Monopolies (反)托拉斯, 见垄断

Trusts and Estates 《信托与地产》 793n

Turkey 土耳其 97, 263

Two Lucky People: Memoirs 《两个幸运的人》 792n, 871n

Typhoid 伤寒 267

Tyranny, imperialism and 帝国主义和暴政 303 - 04

Über den deutschen Krieg 《论德意志战争》 116n

Über den Ursprung und die Hauptgesetze des wirtschaftlichen Werthes 《论经济价值的根源和主要法则》 153n, 155, 156, 157 - 58n

"Über den Ursprung und die Hauptgesetze des

wirtschaftlichen Werthes," 《论经济价值的根源和主要法则》 469 - 70n

"Über die Herrschaft der Fürsten," 《论君主主的统治》 412, 557n, 559n

"Über die im Hinblick auf das Fortschreiten der Geldentwertung zu ergreifenden Massnahmen," 《论货币贬值的度量方法》 339 - 40n, 341n, 343n, 359n

"Über die mathematische Methode der theoretischen Ökonomie," 《论理论经济学的数学方法》 167n

"Über die Messung der Veränderungen des Geldwertes," 《论货币价值变动的度量》 201n

"Über einige Parteienbenennungen zum besseren Verständnis der Zeitungen und anderer moderner Schriften," 《对一些政党提名的论述, 以便更好理解报纸和其他现代著作》 445n

"Über Gedankenexperimente," 《论思想实验》 168 - 69n

"Über Kriegskostendeckung und Kriegsanleihen," 《战争恢复和战争贷款》 290n

Über Wert, Kapital und Rente 《论价值、资本和租》 155n

"Übersicht über die neuesten Publikationen Deutschlands und des Auslands," 《近期德国和外国出版物概览》 403n

Ukraine 乌克兰 4n, 50, 292, 292 - 97. See World War I 见第一次世界大战

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经济科学的终极基础》 211n, 704n, 924 - 25n, 947, 957n, 961n, 965n, 969 - 70n, 974n, 982, 984, 984n, 985n, 1016 - 21, 1018 - 19n, 1021n, 1028n

Umlaufmittel. See Fiduciary media 流通媒介, 见流通媒介

- Unbound!* 《挣脱束缚!》 1038
- Undergraduate studies, education and 教育和研究生学制 63n
- Understanding Our Free Economy* 《理解我们的自由经济》 926
- Undistributed Profits Tax 未分配利润税 713n
- Unemployment 失业 618, 619n, 621. See also Great Depression 另见大萧条
- Unemployment: A Problem of Industry* 《失业:一个产业问题》 636n
- Union Bank 联合银行 294
- Unions. See Labor 工会, 见劳动
- United States 美国 xi, 11n, 303, 490, 509, 569, 611, 711, 728n, 746 - 57, 790 - 98, 828, 837 - 38, 908. See also Great Depression 另见大萧条
- 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 美国钢铁公司 1013
- Universal history 普遍历史 601
- Universal validity 普遍有效 672
- Universalism 普遍主义 466, 659, 873
- University of Basel 巴塞尔大学 136
- University of Berlin 柏林大学 662
- University of Bonn 伯恩大学 469
- University of Breslau 布雷斯劳大学 665
- University of Brunn/Brno 布隆/布尔诺大学 181
- University of Buffalo 布法罗大学 699, 832n, 846n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亚大学 748, 753, 790, 792n, 1037
- University of Chicago 芝加哥大学 852, 1029, 1030
-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芝加哥大学法学评论》 844n
- University of Cologne 科隆大学 591, 690n, 887, 917, 917 - 18n
- University of Czernowitz 切尔诺维茨大学 73
- University of Geneva 日内瓦大学 663n, 686
- University of Halle 哈雷大学 117
- University of Innsbruck 因斯布鲁克大学 143
- University of Prague 布拉格大学 153
-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罗彻斯特大学 846
- University of Vienna 维也纳大学 41, 61 - 66, 102, 124, 136 - 51, 137n, 209, 225 - 26, 363n, 467n, 745, 818, 932. See also Grünberg Seminar; Philippovich Seminar 另见格林贝格研讨班; 菲利波维希研讨班
- University of Witwatersrand 金山大学 887
- University of Wroclaw 弗罗茨瓦夫大学 782
- University of Würzburg 乌兹堡大学 657
- "Unsung Economist Who Was Prophet," 《一位无人问津的经济学先知》 1038
-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Methode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insbesondere* 《对于社会科学, 具体而言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探究》 123, 123n, 125, 212n, 309
-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Theorie des Preises* 《价格理论探究》 243n
- Up from Liberalism* 《从自由主义开始》 994
- Ursprung und Hauptgesetze*. See *Über den Ursprung und die Hauptgesetze des wirtschaftlichen Werthes* 《根源和主要法则》, 见《论经济价值的根源和主要法则》
- U. S. Chamber of Commerce 美国商会 861
- U. S. Steel Corporation 美国钢铁公司

888

Usury 高利贷 658

Utilitarianism 功效主义 306 - 16, 410 - 13, 482, 523 - 24, 534, 858, 941 - 42, 984n

Utility 效用 132 See also Marginal utility; Subjective utility 另见边际效用; 主观效用

Utrecht 乌得勒支 544

Vademecum zu einem Klassiker der österreichischen Schule 《奥地利学派经典作家手册》 469 - 70n

Validity, universal 普遍有效 672

Value 价值 388n, 402, 761

Value differential 价值差额 774, 777

Value judgments 价值判断 954, 954n, 961

The Value of Money and its Historical Changes. 《货币的价值及其历史变化》

Value theory 价值理论

Austrian vs. Marxist theories of 奥地利学派与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比较 146

calculation/measurement of 价值的计算/度量 219

Carl Menger and 卡尔·门格尔和价值理论 212 - 13

completion of 价值理论的完成 664 - 65, 669 - 70

division of labor and 劳动分工和价值理论 114

exchange (subjective/objective) 交换(主观/客观) 158

Friedrich von Wieser and 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和价值理论 236, 402 - 03

John Locke and 约翰·洛克和价值理论 308n

money theory and 货币理论和价值理论 223 - 25. See also Money. 另见货币

natural value and 自然价值和价值理论 383 - 84

neo-liberals and 新自由派和价值理论 1002n

reconsideration of 重新审视价值理论 589 - 98

relative nature of 价值的相对性质 389, 400 - 01n

subjectivism and 主观主义和价值理论 112, 115n

Valutafragen 《合法性问题》 357n

Van Nostrand Publishing Company 范·诺斯特兰出版公司 874, 981

Vaterländische Front 爱国阵线 580n, 676

Velocity, money and 货币的流通速率 786

Veneto - 威尼托 285

Verein Berliner Kaufleute und Industrieller 商人与工业家协会 515n

Verein für Socialpolitik 社会政策协会 119 - 21, 121n, 195 - 205, 226, 231, 252n, 276n, 336 - 37, 337n, 354, 397, 432, 457n, 459n, 493, 493n, 496n, 499, 509 - 10n, 509 - 13, 512n, 565n, 566, 570 - 73, 573n, 582, 585 - 89, 587n, 587p, 593, 644, 657 - 64, 658n, 664n, 667 - 68, 674, 739n, 810, 1003

Verein österreichischer Volkswirte 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协会 478

Vergleichende Anatomie der Engel—Eine Skizze 《恩格斯的比较解剖学——素描》 93n

“Verhandlungen der Generalversammlung in Mannheim,” 《曼海姆大会上的协商》 198n

“Verhandlungen des Vereins für Socialpoli-

- tik," 《社会政策协会的协商》 203n, 484n, 510n
- Vermögensabgabe 财产税 357
- Versailles 凡尔赛 451 - 52, 510, 687, 688, 692n
- "Victor Adler," 《维克托·阿德勒》 58n
- Vienna 维也纳
- in 1858 1858 的维也纳 23i
- Arthur von Mises and 阿瑟·冯·米塞斯 9
- Bosnia/Herzegovina and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维也纳 193
- career development in 在维也纳的职业发展 176
- Christianity and 基督教和维也纳 55
- communism and 共产主义和维也纳 713
- Deutsches Volkstheater and 德国国家剧院和维也纳 518
- economic circle of 维也纳的经济学圈子 360 - 68
- Eugen von Philippovich and 欧根·冯·菲利浦维希和维也纳 83
- Habsburg Empire and 哈布斯堡帝国和维也纳 21 - 27
- Hermann von Mises and 赫尔曼·冯·米塞斯和维也纳 10
- inflation and 通货膨胀和维也纳 496
- Judaism and 犹太人和维也纳 11n, 19 - 20, 27 - 45
- massacre in 维也纳的屠杀 606
- Max Weber and 马克斯·韦伯和维也纳 288
- Mises family and 米塞斯家族和维也纳 21
- Mises's last visit to 米塞斯最后一次访问维也纳 1014
- Polenklub and 波兰俱乐部和维也纳 7 - 8
- political state of 维也纳的政治状态 16
- population of 维也纳人口 22n
- post-World War I 一战后 834
- railroads and 铁路和维也纳 16
- "Red," "红色维也纳" 490
- revolution and 革命和维也纳 326
- revolutionary insurrections in 维也纳的革命起义 13
- rule of 维也纳的统治 70 - 71
- socialization commission in 维也纳的社会化委员会 336n
- World War I and. See World War I 一战和维也纳, 见第一次世界大战
- Vienna, Vienna 《维也纳, 维也纳》 17n, 20n, 23n, 26 - 27n, 32n, 35n, 38n, 50n, 54n, 62n, 116n
- Vienna Association of Bankers 维也纳银行家协会 297
- Vienna Association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维也纳工商协会 357
- Vienna Chamber of Commerce 维也纳商会 xiii, 187n, 455n
- Vienna Circle 维也纳小组 360 - 68, 674, 721 - 22n, 1017n
- Vienna Circle of the Logical Positivists 维也纳小组和逻辑实证主义 167
- Vienna Fabians 维也纳费边社 83
- Vienna Staatsarchiv 维也纳档案馆 67, 74
- Vienna Studies in Government Science 《维也纳政府科学研究》 67
- Vietnam War 越南战争 1036
- Violence 暴力 411 - 12, 414, 426 - 27, 490, 620, 715 - 16
- The Virtue of Selfishness* 《自私的美德》 932
- Volker Fund. See William Volker Fund 沃尔克基金会, 见威廉·沃尔克基金会
- Volks-Bildungs-Verein 全国教育协会 286

- Volkstheater 人民剧院 41
- “Volkswirtschaft, Volkswirtschaftslehre und -methode,” 《国民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及其方法》 110n
- “Volks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sstrufen,” 《经济发展阶段》 468n
- Volkswirtschaftliche Theorie des Bankkredits 《银行信用的经济理论》 494n
- “Volkswirtschaftslehre,” defined 国家经济理论 224n
- Volkwohl 《人民福利》 484 - 85n
- “Vollsozialisierung: Von der nächsten und übernächsten Zukunft,” 《全面社会化: 继续推进、再进一步》 393n
- Vom Geist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政治经济学的精神》 368n
- Vom Sinn der Konzentration 《产业集中的意义》 432 - 33n
- “Vom Ziel der Handelspolitik,” 《论贸易政策的目标》 274n, 275, 276n, 277n, 319n, 526n
- Von kommenden Dingen 《即将来临的日子》 370n
- “Von Mises to Speak Tonight” 《冯·米塞斯——今夜有话说》 683n
- “Von Mises—A Final Salute,” 《冯·米塞斯——最后的致敬》 1038
- Von Sarajevo nach Sarajevo 《从萨拉热窝到萨拉热窝》 75n, 326n, 676n, 678 - 79
- Vorläufiger Bericht über die Frage der Sozialisierung des Kohlenbergbaues 《关于煤炭采矿业社会化问题的临时报告》 336n
- Voting. See Suffrage 投票, 见选举
- Wage rates 工资率 323, 419, 542, 623, 625, 646, 713n, 767
- Wages and Hours Act 《工资工时法案》 713n
- Wagner Act 《瓦格纳法案》 713n
- “Wahlen,” 《选举》 414n
- Währungsschutz association 货币保护协会 346n
- Waldorf-Astoria hotel 华尔道夫饭店 793, 849
- Wall Streetcrash 华尔街暴跌 612 - 13
- Wall Street Journal 《华尔街日报》 913n, 989, 990, 1040
- Walter Eucken Institute 瓦尔特·奥伊肯学院 1014 - 15n
- Walter Lippman Colloquium 瓦尔特·李普曼大会 734 - 40
- “Wandlungen der österreichischen Finanzpolitik,” 《奥地利财政政策的变化》 289n
- Want-satisfaction. See Satisfaction 需要满足程度, 见满足
- War. See World War I; World War II 战争, 见一战; 二战
- War bonds 战争国债 337n
- War Centrals 战争中心 270
- War Commemorative Medal 战争纪念勋章 268
- War Economics department 战争经济部 331
- War Ministry 军部 274, 286 - 90, 331
- War Unless 449n
- Warsaw Pact 《华沙公约》 805
- Washington Square 华盛顿广场 904
- “The Way of the German People toward National Socialism,” 《德国人民通往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 740
- Wealth of Nations 《国富论》 111, 112, 138, 1044
- Wehrmacht 德国军队 75n, 747, 750
- Welfare State 福利国家 996
- Well-being, satisfaction and 满足和福利 131

- Welt am Morgen* 《上午世界》 619n
- Weltwirtschaft* 《世界经济》 876n
-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世界经济评论》 887
- Weltwirtschaftskonferenz Berlin 1932—1932
年柏林世界经济会议 652n
- “Werk Neues Leben,” “创造新生活”
677n
- Wert, defined 价值 402
- Wert, Meinung, Bedeutung: Die Tradition der subjektiven Wertlehre in der deutschen Nationalökonomie vor Menger* 《价值、观点、意义:门格尔之前德国政治经济学中主观价值理论的传授》 124n
- Wesen und Hauptinhalt der theoretischen Nationalökonomie* 《理论经济学的性质和要义》 162, 162 - 63n, 166n, 167, 169, 171 - 72, 388, 469
- Western School for Commercial Organization Secretaries 商业组织秘书西部学院 825, 825n
- Welthandels-Woche* 世界贸易周 652n
- What Has Government Done to Our Money?* 《为什么我们的钱变薄了?》 941
- “What McCulloch did for Ricardo,” “就像麦卡洛克推广李嘉图思想那样” 935n
- “What This Country Needs Is Guts,” 《这个国家需要的是勇气》 842n
- Whately, Richard (Archbishop) 理查德·惠特利大主教 215n, 528n
- White Mountains 白山山脉 807 - 08
- White Proposals 怀特方案 823
- White Sulphur Springs 白硫磺泉镇 898, 905n
- Who's Who in America* 《美国名人录》 889n
- “Why Academic Intellectuals Support Socialism,” 《学院知识分子为何支持社会主义》 791n
- “Why Not 1,900?” 《为什么不是 1900?》 824
- Wiener staatswissenschaftliche Studie* 4, 67n
- Wiener Tagblatt* 《维也纳日报》 103, 103n
- Wiener Wirtschafts-Woche* 维也纳经济周刊 663n
- Wiener Zeitung* 《维也纳报》 104, 136 - 37
- “Wieser, Hayek, and Equilibrium Theory,” 《维塞尔、哈耶克和均衡理论》 469 - 70n
- “Wieser on Economic Calculation under Socialism,” 《维塞尔论社会主义的经济计算》 384n
- William-E. Rappard 《威廉—E. 拉帕特》 686n, 688n
-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经济与社会》 208n, 393, 468n, 601, 601n. *See also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另见《经济与社会:解释社会学概要》
- Wirtschaft und Wirtschaftswissenschaft*, 468n
- Wirtschaftliche Nachrichten* 《经济新闻》 629n
- Wirtschaftliche Verhältnisse Deutsch-Österreichs* 《德意志、奥地利的经济条件》 345n
- Wirtschaftspolitische Blätter* 《政治—经济报》 95n, 189n, 366n, 369n, 468n, 476n, 484n, 581n, 696n, 703n, 745 - 46n, 1032 - 33n
- Wirtschaftsrechnung* 账单 385n
- Wirtschaftsuniversität 经济大学 361n
- Wirtschaftswunder 经济奇迹 1005
- Wissenschaftlichen Comité für Kriegswirtschaft* 战争经济科学委员会 352n
- World War I 一战 257 - 98, 325 - 27,

- 393, 528 - 29, 751n
- World War II 二战 87, 465, 547, 712, 740 - 46, 791n, 797, 805, 810 - 11, 818, 839, 889
- Written language 书面语言 317n
- Yale Law Journal* 《耶鲁法学期刊》 304n
- Yale University 耶鲁大学 872 - 73, 925, 943n, 991 - 92, 1013, 1022, 1035
- "The Year 1922: A Watershed for Mises and Hayek," 《1922年: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分水岭》 472n
- Yiddish 意第绪语 5
- "Young" movements "青年"运动 193n
- Younger Historical School 青年历史学派 116, 117n, 122, 123
- Yugoslavia 南斯拉夫 805n, 821n
- Z Zagadnien Ogólnej Teorii Walki* 《战争的一般理论》 720n
- "Zahlungsbilanz und Wechselkurse," 《收支平衡与汇率》 248, 351n, 353, 353n
- Zeitgeist "时代精神" 96
- Zeitschrift für das gesamte Kreditwesen* 《信用体系杂志》 1007n
- Zeitschrift für das Privat-und öffentliche Recht der Gegenwart* 《当前私权与公权杂志》 124n
-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国家科学领域杂志》 222n, 538n, 543n, 572n
- Zeitschrift für Nationalökonomie* 《政治经济学杂志》 576 - 77n, 625n, 633n, 642n, 702n, 722 - 23n
- Zeit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Sozialpolitik und Verwaltung*, 《国民经济学、社会政策和管理杂志》 73n, 82n, 91n, 96, 144, 167n, 174n, 182, 182n, 205n, 225n, 236n, 244 - 45n, 270 - 71n, 454n
- Zeitschrift für Wirtschafts-und Sozialwissenschaften* 《经济和社会科学杂志》 716 - 17n
- Zentralstelle für Wohnungsreform 住房改革中心 183 - 84, 272n
- Zentralwirtschaftsamt 中央计划经济办公室 393n
- Zionism 锡安运动 24, 30n
- Zum 25 jährigen Bestand des Österreichischen Institutes für Wirtschaftsforschung* 《奥地利经济研究所 25 周年》 574n, 575n, 576 - 77n
- "Zum Abschluss des Marxschen Systems," 《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 149
- "Zum Problem gesetzlicher Aufnahme der Barzahlungen in Österreich-Ungarn; Ein Schlusswort gegenüber Walther Federn," 《奥匈帝国现金偿付的法律接受问题:瓦尔特·费德恩的概述》 186n
- Zur deutschsprachigen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ichen Emigration nach 1933* 《1933年后德语经济学家的移民》 588n, 729n, 792n
- "Zur Entwicklung der Konjunkturtheorie im deutschen Sprachraum in der Zwischenkriegszeit," 《两次大战之间德语世界经济周期理论的发展》 586n
- "Zur Entwicklung der monetären Konjunkturtheorien: Wicksell, Schumpeter, Mises und Hayek," 《货币经济周期理论的发展:威克塞尔、熊彼特、米塞斯和哈耶克》 588n
- "Zur Geschichte der österreichischen Fabrikgesetzgebung," 《奥地利工厂立法的历史》 91n
- "Zur Klassifikation der Geldtheorie," 《货币理论的分类》 273n, 506n

-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政治经济学批判》 124n, 309n
- Zur Kritik der Zeit 《时代批判》 370n
- Zur Lehre von den Bedürfnissen 《论需要理论》 218, 218n, 219n, 778n
- “Zur Methodologie der Staats-und Sozial-Wissenschaften,” 《政治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 123n
- Zur Social-und Gewerbepolitik der Gegenwart
《当前的社会和贸易政治》 122n
- “Zur Theorie der Produktionsperiode,” 《生产时期理论》 702n
- Zur Theorie des Preises 《价格理论》
154 - 55n, 158n
- Zwang oder Freiheit? 《强制还是自由?》
370n
- “Zwei Ökonomien,” 《两种经济学》 197n

启蒙文库近期书目

苏格兰：现代世界文明的起点 / 阿瑟·赫尔曼

民主与大坝：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实录 / 大卫·利连索尔

论语与算盘 / 涩泽荣一

涩泽荣一传 / 幸田露伴

米塞斯大传 / 约尔格·吉多·许尔斯曼

民主的胜利：西班牙政治变革的进程 / 保罗·普雷斯顿

世界土地所有制变迁史 / 安德罗·林克雷特

发明污染：工业革命以来的煤、烟与文化 / 彼得·索尔谢姆

大雾霾：中世纪以来的伦敦空气污染史 / 彼得·布林布尔科姆

甘地与丘吉尔：对抗与妥协的壮丽史诗 / 阿瑟·赫尔曼

妥协：政治与哲学的历史 / 阿林·弗莫雷斯科

市场是公平的 / 约翰·托马西

如何治理国家：献给当代领袖的政治智慧 / 西塞罗

麦克阿瑟回忆录（全译本） /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弗洛伊德传 / 彼得·盖伊

路易十六之死 / 黄霄文

人的行为 /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哈耶克：没有哪一个人像米塞斯一样给我如此多的思想启发

这本书的前300页如此引人入胜，我忍不住一口气读完了剩下的800多页。我很喜欢这本书。作者对各种理论的总结，对文化政治背景的描绘，对档案资料的充分利用，以及对各种人物个性的生动刻画（这一点尤其令我感兴趣），无不令人拍案叫绝。

——利兰·B.耶格尔（美国经济学家）

这是一部杰作……作者分别做了主题索引和名称索引，注释的位置也恰到好处（有些注释只是引用，有些却是有价值的阐述）。还有很多之前从未见过的照片，随文星点分布，十分方便……这本书是一个伟大的贡献，将使人们（不管是新人还是熟悉米塞斯的旧友）更加了解米塞斯。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学术著作。作者不仅论述了米塞斯的生活和著述，还生动描绘了光辉灿烂的维也纳时光、奥地利学派的发展，那个时代其他思想家如哈耶克的作用，以及米塞斯对美国和世界自由主义的贡献。在所有这些方面，本书都堪称权威。

——拉尔夫·拉伊科（美国自由主义历史学家）

这部关于米塞斯生平的杰作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它的内容和规模超越了所有经济学传记。

——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西班牙经济学家）

上架建议：经济·人物

ISBN 978-7-5520-1291-0



9 787552 012910 >

定价：145.00元



启蒙编译所